总主编 刘绪贻 杨生茂



美国通史

第3卷

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

1861-19世纪末

本卷主编 丁则民

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585-2000



VOL.1 LAY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585-1775

VOL.2 THE INDEPENDENCE AND THE BEGINNING OF PROSPE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1775-1860

VOL.3 AMERICAN CIVIL WAR AND GILDED AGE 1861-THE LATE YEARS OF THE 19^{TH} CENTURY

VOL.4 THE RISE AND EXPAN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898-1929

VOL.5 THE AGE OF FRANKLIN D.ROOSEVELT 1929-1945

VOL.6 POST WW II AMERICAN HISTORY 1945-2000

美国通史

总主编 刘绪贻 杨生茂

第3卷

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
1861-19世纪末

著者 丁则民（本卷主编） 黄仁伟 王旭等

人民出版社

美国通史

总主编（按姓氏笔划）　刘绪贻　杨生茂
策划/编审　邓蜀生

第一卷　美国的奠基时代　1585 – 1775
著　　者　李剑鸣

第二卷　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　1775 – 1860
著　　者　张友伦（本卷主编）　陆镜生　李　青等

第三卷　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　1861 – 19 世纪末
著　　者　丁则民（本卷主编）　黄仁伟　王　旭等

第四卷　崛起和扩张的年代　1898 – 1929
著　　者　余志森（本卷主编）　王春来（本卷副主编）
王锦瑭　陆甦颖　陈　晓

第五卷　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　1929 – 1945
著　　者　刘绪贻　李存训

第六卷　战后美国史　1945 – 2000
著　　者　刘绪贻（本卷主编）　韩　铁　李存训



华盛顿州
西雅图
塞勒姆
俄勒冈州
爱达荷州
博伊西
蒙大拿州
海伦娜
北达科他州
俾斯麦
南达科他州
皮尔
明尼苏达州
圣保罗
威斯康星州
麦迪逊
密歇根州
兰辛
底特律
缅因州
奥古斯塔
蒙彼利埃
康科德
奥尔巴尼
波士顿
普罗维登斯
哈特福德
纽约州
纽约
宾夕法尼亚州
哈里斯堡
费城
特伦顿
多佛
安纳波利斯
华盛顿
里士满
弗吉尼亚州
西弗吉尼亚州
查尔斯顿
俄亥俄州
哥伦布
印第安纳州
印第安纳波利斯
伊利诺伊州
斯普林菲尔德
芝加哥
艾奥瓦州
得梅因
内布拉斯加州
林肯
怀俄明州
夏延
犹他州
盐湖城
内华达州
卡森城
加利福尼亚州
萨克拉门托
圣弗朗西斯科
(旧金山)
洛杉矶
科罗拉多州
丹佛
堪萨斯州
托皮卡
密苏里州
杰斐逊城
肯塔基州
法兰克福
田纳西州
纳什维尔
北卡罗来纳州
罗利
南卡罗来纳州
哥伦比亚
佐治亚州
亚特兰大
亚拉巴马州
蒙哥马利
密西西比州
杰克逊
路易斯安那州
巴吞鲁日
阿肯色州
小石城
俄克拉何马州
俄克拉何马城
新墨西哥州
圣菲
亚利桑那州
菲尼克斯
得克萨斯州
奥斯汀
休斯敦
佛罗里达州
塔拉哈西
迈阿密
阿拉斯加州
朱诺
太平洋
大西洋
中途岛
火奴鲁鲁
(檀香山)
夏威夷岛
① 新罕布什尔州
② 佛蒙特州
③ 马萨诸塞州
④ 罗得岛州
⑤ 康涅狄格州
⑥ 新泽西州
⑦ 特拉华州
⑧ 马里兰州



华盛顿州
西雅图
塞勒姆
俄勒冈州
蒙大拿州
海伦娜
爱达荷州
博伊西
怀俄明州
夏延
北达科他州
俾斯麦
南达科他州
皮尔
明尼苏达州
圣保罗
威斯康星州
麦迪逊
密歇根州
兰辛
底特律
缅因州
奥古斯塔
蒙彼利埃
奥尔巴尼
纽约州
波士顿
普罗维登斯
哈特福德
特伦顿
宾夕法尼亚州
哈里斯堡
匹兹堡
多佛
华盛顿
安纳波利斯
加利福尼亚州
萨克拉门托
圣弗朗西斯科
（旧金山）
洛杉矶
内华达州
卡森城
犹他州
盐湖城
科罗拉多州
丹佛
内布拉斯加州
林肯
艾奥瓦州
得梅因
芝加哥
伊利诺伊州
斯普林菲尔德
印第安纳州
印第安纳波利斯
俄亥俄州
哥伦布
西弗吉尼亚州
查尔斯顿
里士满
弗吉尼亚州
法兰克福
肯塔基州
堪萨斯州
托皮卡
杰斐逊城
密苏里州
纳什维尔
田纳西州
罗利
北卡罗来纳州
亚利桑那州
菲尼克斯
新墨西哥州
圣菲
俄克拉何马城
俄克拉何马州
阿肯色州
小石城
密西西比州
杰克逊
亚拉巴马州
蒙哥马利
亚特兰大
佐治亚州
哥伦比亚
南卡罗来纳州
路易斯安那州
巴吞鲁日
塔拉哈西
佛罗里达州
迈阿密
得克萨斯州
奥斯汀
休斯敦
大
西
洋
太
平
洋
墨西哥湾
阿拉斯加州
朱诺
努尼瓦克岛
科迪亚克岛
阿拉斯加半岛
阿拉斯加湾
亚历山大群岛
阿留申群岛
安德烈亚诺夫群岛
中途岛
夏威夷群岛
火奴鲁鲁
（檀香山）
瓦胡岛
① 新罕布什尔州
② 佛蒙特州
③ 马萨诸塞州
④ 罗得岛州
⑤ 康涅狄格州
⑥ 新泽西州
⑧ 马里兰州

编者说明

本卷《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写内战开始以来直至19世纪末美国历史。全书除引言外，共11章。引言和第4、5章由丁则民撰写，第1章由汪仪撰写，第2章由田锡国撰写，第3章由游恒撰写，第6章由黄仁伟撰写，第7章由卞历南撰写，第8章由徐玮撰写，第9章由王旭撰写，第10章由王贵正撰写，第11章由黄勃撰写。

本书附录是在分主编指导下与黄仁伟组织下，分工合作编制的，其中大事记由邹桂芬、曹学昌编写，参考书目与部分专有名词中英对照表由邹桂芬编辑，历史图片和地图由黄仁伟和曹学昌选定、绘制，索引由邹桂芬、曹学昌和胡锦山共同编制。

全书初稿脱稿后，杨生茂、刘绪贻两位主编进行统稿工作，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根据这部丛书的编写原则和两主编的要求，分主编在黄仁伟和王旭协助下，经过反复研究，作了必要的修改和增删，进行了较细致的文字加工。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南开大学冯承柏同志和北京师范大学黄安年同志仔细阅读了3章试写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担任本书责任编辑的人民出版社编审邓蜀生同志对编书工

作，不断给予关心、督促并提出很好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朱庭光、张椿年等同志曾给予大力支持和赞助；一些美国历史学家和友人如 John R. Moore、James B. Murphy、Harry Ammon 和 William G. Crowell 等先生热情关怀本书的写作，帮助我们掌握美国的美国史研究最新动态及成果，不断赠给我们新书。我们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新闻文化处不断赠给我们美国出版的新书，谨表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赐教，以便我们改进。

1989 年 4 月

由于本卷主编丁则民教授于 2001 年年初病逝，由他的博士弟子、现厦门大学教授王旭写了一篇后记，作为对本书的补充及对丁则民教授的怀念。其他内容未作改动。

2002 年 3 月

引　言

本书写的是从内战爆发到19世纪末的美国历史，主要阐述“镀金时代”美国的发展变化。它是近代美国向现代美国转变的历史时期，其主要特征是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这两个历史性转变带动下，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为20世纪现代美国奠定了基础。

美国内战是北部与南部两种社会制度——即自由雇佣劳动制度与奴隶制度之间矛盾斗争不可调和的必然结果。内战爆发后，美国广大人民在以林肯为首的共和党领导下，经过4年艰苦、英勇的斗争，终于赢得了军事胜利，摧毁了南部奴隶制度，扫除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内战结束后，对如何重建南部政治、经济结构以解决南部各州重返联邦的问题以及刚刚获得解放的黑人应有的权利和地位的问题，联邦政府内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共和党激进派同约翰逊总统的保守、倒退的重建纲领展开了剧烈斗争，终于取得了对南部重建的领导权，使重建按照北部工业资产阶级的意志，以较为民主的方式在南部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的改革，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是，共和党激

进派在稳固地控制联邦政权后，就逐渐放弃了在南部的进一步改革。重建以极不彻底、妥协的方式而告终。它既没有为"解放了的"黑人解决土地问题，也没有切实保证他们运用宪法第十四条和十五条修正案所赋予的各项权利。尽管如此，南部重建毕竟凭借政治、法律手段巩固了内战所带来的历史性转变，基本上消除了种植园奴隶制度和奴隶主阶级寡头专政，把南部纳入全国统一市场，为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发展准备了必要条件。

随着重建的展开，美国历史进入了"镀金时代"，这个时代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美国工业迅速发展，走向集中、垄断，垄断资本主义在国内市场上逐渐居于优势，成为美国经济生活的基础；第二，联邦政权不再为两个利益对立的统治集团所分享，而是为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所独揽；第三，南部走上了缓慢而痛苦的"普鲁士式"发展道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美国闭塞的落后的地区。

在19世纪最后30多年期间，美国资本主义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都有了迅速的发展。在广度方面，突出表现于西部的开拓与移民洪流的涌入。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西部是土地辽阔、资源富庶的地区，它的开发为美国工业提供了丰富的粮食、原料和巨大的市场，从而为美国提供了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优越的发展条件。西部交通运输的发展、特别是横贯大陆铁路的修建，为移民大军的西去和扩大国内市场开辟了道路。源源不断的移民洪流为西部开拓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西部工农业的巨大发展。

与这种广度发展同步进行的是美国资本主义关系的深度发展，即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内战后，全国市场的空前扩大、西部开发的突飞猛进、科学技术革命的刺激和联邦政府的积极扶植政策，都推动着资本在全国各地寻找有利可图的场

所；与此同时，各个资本集团也展开空前剧烈的竞争。在工业蓬勃发展的推动下，企业规模结构在股份资本的基础上，由小型分散的独立企业，通过普尔、托拉斯和控股公司等形式的联合和兼并，发展成为少数巨型的垄断企业，最后导致银行与工业的融合以及金融资本的形成。垄断制的建立和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我扬弃和局部质变，它使生产进一步社会化，横向和纵向的联合把社会经济的各部门结合为一个整体；它使大企业的所有权与管理权日益分离；它使工业资本越来越依赖银行资本，从而形成无所不在的金融寡头统治。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适应了这一时期美国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也带来了更加尖锐的社会矛盾，并在1893年爆发了19世纪美国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

在美国资本主义向纵深发展的同时，它的城市化也进入了鼎盛时期。以大工业为基础的近代工业城市的普遍兴起，经过水陆交通线的联结，逐渐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城市网。它既促进了工业资本的集中与垄断的形成，也使北部、南部与西部聚合为全国统一市场，因而加速了美国工业化的进程。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已由原来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主要资本主义工业国，实现了“新”、“旧”资本主义的交替[1]，成为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典型国家。

随着“新”、“旧”资本主义的交替，美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资本家、工人和农场主三个大集团的内部分化趋势日益增强：与“旧”资本主义相一致的旧阶层不断衰落，而随“新”资本主义产生的新阶层却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内

---

① 即列宁所说的“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被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新资本主义所替代”，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2卷，第210页。

部逐渐分化为垄断资产阶级、旧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垄断就是“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1] 因此，垄断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内其他阶层的矛盾、特别是同保持独立经营的企业主、即旧中产阶级的矛盾加深了。新中产阶级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发展起来的，他们受雇于垄断资本的大企业，但却掌握企业大部分的管理权，其主要职能就是帮助垄断资产阶级“用一切科学办法榨取血汗”。[2]

农场主阶级在美国社会阶级结构中原占有重要的地位和相当大的比重，但是在生产商品化过程中，他们受到国际国内市场的巨大冲击和垄断资本的控制，除少数上升为大农场主外，一部分成为失去经营自主权的租佃农场主，大部分因丧失生产资料而沦为农业工人。为了维护原有的社会经济地位，农场主集团及其领导下的农民进行了长达30年之久反对垄断资本控制和掠夺的斗争，但仍无法摆脱其地位日益下降的厄运。

由于生产技术基础的变革和垄断企业的出现，美国工人阶级构成也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首先，在熟练工人的比重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非熟练工人开始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集中在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垄断企业。其次，白领工人阶层的形成及其数量迅速增长，是垄断企业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的重要体现。在19世纪后期，白领工人还是“非生产性”劳动者，不创造剩余价值，但剩余价值的实现是经由他们完成的。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他们也日益直接进入生产过程，成为剩余价值的创造者。第三，工人贵族阶层的扩大，这个阶层的社会基础是熟练工人和

---

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卷，第831页。

② 列宁：“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8卷，第594—595页。

监工。他们为垄断资本家的高工资政策所收买，在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方面都“资产阶级化”了，从而成为垄断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在19世纪末，“劳联”之所以从维护熟练工人狭隘利益的行业工会组织蜕变为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就表明了工人贵族充当代理人的作用。

向垄断过渡时期，美国社会流动的频繁对阶级结构的变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社会流动表现为人口在地域间的横向流动和社会各阶层间的纵向流动。西进运动导致大量移民西去，从而使人口重心不断向西部移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大批人口流向城市。向垄断过渡则加速了社会各阶层的上下流动。在19世纪后期，有相当一批富豪发迹于社会中下层，中下层之间的对流也较为普遍。东北部垄断资本向中西部迅速扩展，造成了这个地区农场主大批破产，其中一部分为谋求生计流向东部工业地区，另一部分则不得不移往更远的西部寻求新的活动场所。这就形成了巨大的横向对流。这种横向流动与纵向流动相结合，使美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更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

这一时期，涌入美国的移民洪流既大大加速了原有的社会流动，促进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引起了美国排外主义情绪的增长。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来自东欧和南欧各国的“新移民”超过来自西欧和北欧各国的“老移民”，逐渐居于压倒的多数。“新移民”来美国前原属生活贫困、教育文化程度低下的阶层，且不能讲英语。他们的大量入境引起了土生美国人的疑虑和工会组织的恐惧，但却受到垄断资产阶级的欢迎。前者要求限制“新移民”入境，而后者的代言人却坚持自由移民政策，断言限制移民入境，势将发生劳动力的严重短缺，从而不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他们之所以坚持自由移民政策，主要是因为“新移民”能为大企业提供它们所需要的而且比重不断增加的非

熟练工人。

在限制移民入境的呼声日增形势下，美国排外主义者把限制矛头首先针对来自东方的华人，导致1882年国会通过第一个限制移民入境的法案，即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接着便是针对来自东欧和南欧各国的“新移民”。在排外主义组织不断鼓动下，国会于1896—1917年期间连续四次通过以识字为基础的“文化测验”法案，企图限制“新移民”入境，但均为美国三届总统所否决。他们在否决该法案时，虽都标榜美国应是“欧洲被压迫者的庇护所”，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服从于垄断资本集团的意志，以适应大企业不断用移民补充非熟练工人的需要。

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时期，美国的两党政治及其内外政策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个时期，美国的政治特征就是保守主义和腐朽之风。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虽然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增加了社会财富，但也带来了大量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贫富悬殊的鸿沟加深、城乡对立加剧以及腐朽之风盛行等等。垄断资本横行无忌，更加剧了社会经济矛盾，导致工人斗争、农民运动以及各种改革运动此起彼伏，不断高涨，汇成一股波澜壮阔的巨流，而它的斗争锋芒主要是指向垄断资本集团的。为了应付日趋高涨的工农运动，美国统治集团除采用暴力镇压的方法外，也采用“自由主义的”方法，即“趋向于扩大政治权利、实行改良、让步等”方法。[①] 统治集团之所以改变策略，采用“改良、让步”的方法，或是交替使用两种方法，固然是由这一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但往往也是由于社会压力的结果。“新”、“旧”资本主义交替中，原有的结构已不适应新的社会冲突，出现严重

---

① 列宁：“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6卷，第349页。

的“动乱”。为了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并使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得到保证，从市、州到联邦的各级政府都逐渐地采用下层改革派的纲领和要求，部分地调整统治政策，以适应历史的发展趋势。

首先，在国家机器和政治制度方面，出现了一系列缓慢而重要的改革，主要表现于联邦权力日益加强和州权逐渐削弱、旨在消除党派分赃制的文官制度改革以及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等等。其次，在政党方面，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策差别日趋缩小，它们已从内战前两种经济制度的政治代表转变为垄断资产阶级不同集团的政策执行者。再次，重新轮流执政的两大党日益僵化保守，对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所产生的问题提不出相应的对策，只是在第三党运动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下，才不得不从自由放任政策向国家干预政策转变，尽管这种干预政策尚处于萌芽阶段。更为重要的变化是联邦政府开始直接同垄断资本结合，逐渐把对内对外政策都纳入与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相一致的轨道。

随着“边疆的消失”和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美国统治集团大力鼓励商品输出，扩大对外贸易，日益走上了向海外扩张的道路，先后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和拉丁美洲进行了侵略扩张，以夺取海外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与此同时，它积极调整政府的军事机构，增拨军费建造新型的海军舰队，以增强远洋的作战能力，为重新瓜分世界作好准备。

内战后，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带动下，美国教育文化事业也有了蓬勃的发展。普遍义务教育的实施，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素质，并为工农业和其他建设事业提供了有文化的劳动者。在联邦政府大力支持下，高等教育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它在吸收欧洲各国大学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美国大学的组织结构、培养目标和

课程设置等都进行了改革，从而培养了美国工业化进程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

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对美国思想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促使各种社会思潮应运而生，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为美国文学家和艺术家展示了一个新的广阔的创作天地。这一切使美利坚民族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美国涌现了一批遐迩闻名、影响深远的思想界和学术界代表人物，如哲学家亨利·詹姆斯、文学巨擘马克·吐温和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J. 特纳等。此外，许多美国文学家和艺术家也在吸收欧洲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结合美国的实际，创作出许多反映美国现实、具有民族特色的著作和艺术品，从而为近代世界文化艺术增添了新的光彩。

目　　录

引　　言 …………………………………………………………………………… (1)

第一章　美国内战（1861—1865 年） ……………………………… (1)
第一节　内战的序幕与开端………………………………………… (1)
1860 年总统竞选运动 ………………………………………… (1)
南部诸州脱离联邦……………………………………………… (2)
北部各阶层对南部脱离的反应………………………………… (4)
萨姆特陷落与内战开端………………………………………… (5)
第二节　林肯政府为恢复联邦统一而战………………………… (6)
南北双方战争目的与力量对比………………………………… (6)
1861 年战局——北部失利 …………………………………… (8)
海军行动与北部对南部的封锁………………………………… (10)
弗里蒙特与奴隶制问题………………………………………… (11)
南部对外政策的基点 ………………………………………… (13)
北部争取欧洲中立政策的成功 ……………………………… (14)
第三节　联邦军队的胜利进军 …………………………………… (16)
1862 年战局——战事交错…………………………………… (16)
1862 年的革命立法…………………………………………… (17)
林肯与《解放宣言》 ………………………………………… (19)
1863 年战局——优势转向北方 ……………………………… (21)

谢尔曼“向海洋进军” ……………………………………………… (23)
第四节　在战线的后方 …………………………………………………… (24)
联邦政府促进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 ……………………………… (24)
战时北部经济高涨与向西部扩张 …………………………………… (26)
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及其斗争 ……………………………………… (28)
战时南部的状况 ……………………………………………………… (29)
第五节　南部同盟的崩溃和内战的结束 ………………………………… (31)
1864年的总统选举 …………………………………………………… (31)
南部同盟的最终失败及其原因 ……………………………………… (33)
林肯被刺及对林肯的历史评价 ……………………………………… (34)
第二章　南部的重建 …………………………………………………… (37)
第一节　约翰逊重建纲领及其实践 ……………………………………… (38)
林肯重建计划与韦德—戴维斯法案 ………………………………… (38)
约翰逊及其南部重建纲领 …………………………………………… (39)
“黑人法典”和三K党 ……………………………………………… (41)
第二节　激进派反对约翰逊重建纲领的斗争 …………………………… (43)
南部黑人争取基本权利的斗争 ……………………………………… (43)
国会激进派的力量增长 ……………………………………………… (46)
公民权利法案与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 ……………………………… (48)
激进派重建纲领的产生 ……………………………………………… (50)
激进派弹劾约翰逊总统 ……………………………………………… (52)
第三节　共和党激进派的南部重建 ……………………………………… (54)
南部军事管制与民主政权的建立 …………………………………… (54)
南部各州的民主改革 ………………………………………………… (57)
重建时期的贪污舞弊现象 …………………………………………… (59)
黑人在南部重建中的作用 …………………………………………… (60)
南部力量对比的变化 ………………………………………………… (62)
民主政权失败与海斯—蒂尔登妥协 ………………………………… (64)
第四节　重建后的南部 …………………………………………………… (66)

南部农业经济与谷物分成制 …………………………… (66)
种族歧视的加剧与吉姆·克劳制 ……………………… (69)
布克·华盛顿与塔斯克基运动 ………………………… (71)
铁路的铺设与工业的初步发展 ………………………… (74)
第三章　经济高速度发展与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 ……… (77)
第一节　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 ………………………… (77)
促进经济发展的联邦政策 ……………………………… (77)
科学技术的突破与广泛应用 …………………………… (80)
工业化的深入发展 ……………………………………… (83)
交通业、通讯业的重大变革 …………………………… (87)
第二节　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 ………………………… (90)
向垄断过渡的市场条件 ………………………………… (90)
资本的加速积累和集中 ………………………………… (93)
简单协定、普尔和托拉斯 ……………………………… (96)
企业合并高潮与控股公司 ……………………………… (99)
资产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 ……………………………… (102)
第三节　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 (105)
农业商品化和地区专业化 ……………………………… (105)
美国式农业资本主义道路及其变型 …………………… (107)
农业新技术的突破与普及 ……………………………… (110)
第四章　西部的开拓及其对美国发展的历史作用 ……… (113)
第一节　西部印第安人土地的被剥夺 ………………… (114)
大平原的土地和居民 …………………………………… (114)
对印第安人土地的掠夺 ………………………………… (116)
“和平委员会”及其划分印第安人保留区的策略 …… (118)
对保留区的暴虐统治与印第安人的反抗斗争 ………… (120)
联合太平洋铁路的修建与野牛群的灭绝 ……………… (123)
道斯法案的实施及其实质 ……………………………… (125)
第二节　西部的开拓与“最后的边疆” ……………… (127)

开发金银矿的浪潮与西部城镇的兴起 …………………………（127）
铁路的修建与资本集团对矿业开发的控制 ……………………（130）
“牧畜王国” ……………………………………………………（132）
牧牛业的“大本营”与向东北部市场的贩运 …………………（135）
鼓励垦殖西部的土地政策 ………………………………………（136）
大平原的开垦及耕作方式 ………………………………………（138）
“边疆的消失”及其影响 ………………………………………（142）
第三节　西部开拓的历史作用 ……………………………………（144）
西部开拓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 …………………………（144）
美国版图的扩大与新州的建立 …………………………………（145）
西部开拓对美利坚民族性格及政治制度的影响 ………………（147）
第五章　内战后涌入美国的移民洪流及其对美国发展的巨大作用 ……………………………………………（152）
第一节　内战后移民洪流及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 ………………（153）
内战后移民洪流及“老移民”的情况 …………………………（153）
“新移民”的来源及其特点 ……………………………………（156）
“新移民”来美国后生活和工作情况 …………………………（159）
“推和拉”作用的分析 …………………………………………（160）
排外主义的抬头与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 ………………………（163）
第二节　招募华工开发西部与美国排华暴行 ……………………（166）
招募华工开发加州与华侨遭受剥削和迫害 ……………………（166）
“蒲安臣条约”及其实质 ………………………………………（167）
华工对修筑铁路和开垦农田的巨大贡献 ………………………（170）
加州政客煽动下的排华浪潮及其蔓延 …………………………（173）
“排斥华工”成为全国性的政治问题 …………………………（174）
禁止华工入境的“排华法案”及其补充法案 …………………（176）
排华暴行的扩展 …………………………………………………（178）
第三节　美国的“熔炉”与移民对美国发展的巨大贡献 ………（180）
民族“熔炉”与移民的“美国化” ……………………………（180）

移民对美国发展的巨大贡献 ……………………………………… (183)
第六章 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两党政治和国内政策…… (186)
第一节 两党政治的发展变化 ……………………………………… (187)
重建后的两党政治格局 ……………………………………… (187)
两党轮流执政与1890年妥协 ………………………………… (190)
第三党运动与90年代政党改组 ……………………………… (193)
1893年危机与民主党分裂 …………………………………… (196)
1896年总统选举及其历史意义 ……………………………… (198)
第二节 国内政策与社会争端 ……………………………………… (200)
放任政策的发展与作用 ……………………………………… (200)
高关税政策及其作用 ………………………………………… (203)
货币争端及其引起的社会冲突 ……………………………… (205)
从格兰其法到州际商务条例 ………………………………… (208)
反托拉斯运动与反托拉斯法 ………………………………… (211)
第三节 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调整和加强 ………………………… (214)
党魁势力和政治丑闻 ………………………………………… (214)
文官改革运动与彭德尔顿法 ………………………………… (216)
白宫与国会的权力之争 ……………………………………… (219)
国会、最高法院和军队的强化 ……………………………… (221)
联邦主义的新发展及其原因 ………………………………… (224)
第七章 19世纪后期工人运动的发展 ……………………………… (228)
第一节 全国劳工同盟和劳动骑士团 ……………………………… (229)
全国劳工同盟建立及其活动 ………………………………… (229)
凯洛格理论与全国劳工党的失败 …………………………… (231)
70年代危机与劳动骑士团 …………………………………… (233)
劳动骑士团的发展与衰落 …………………………………… (236)
1886年“五一”罢工和“秣市惨案” ………………………… (238)
纽约市竞选和亨利·乔治 ……………………………………… (240)
第二节 劳联的蜕变与90年代工人运动的高涨 ………………… (242)

劳联的建立及其初期的政策 …………………………………… (242)
排斥非熟练工人的政策 ………………………………………… (245)
劳联的阶级合作政策 …………………………………………… (247)
劳联蜕变的社会根源 …………………………………………… (250)
90 年代工人运动的高涨 ………………………………………… (252)
资产阶级改良政策及其作用 …………………………………… (255)
第三节 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 ……………………………… (258)
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初发展 ……………………………………… (258)
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思潮斗争 …………………………………… (260)
社会主义运动与工会的关系 …………………………………… (262)
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利因素 ………………………………… (264)
第八章 19 世纪后期农民运动的高涨 ………………………… (267)
第一节 农场主社会地位衰落及其原因 ………………………… (267)
市场条件恶化及垄断资本盘剥 ………………………………… (267)
牺牲农场主利益的联邦政策 …………………………………… (270)
农场主各阶层的分化状况 ……………………………………… (272)
第二节 农民协进会（格兰其）和绿背纸币运动 ……………… (276)
农民协进会和格兰其法 ………………………………………… (276)
格兰其衰落与绿背纸币运动兴起 ……………………………… (279)
绿背纸币运动的高涨与失败 …………………………………… (281)
第三节 农民联盟和人民党 ……………………………………… (282)
北方联盟和南方联盟 …………………………………………… (282)
农民联盟向第三党的转变 ……………………………………… (285)
人民党的建立及其纲领 ………………………………………… (288)
人民党与民主党合并及其失败 ………………………………… (291)
第九章 城市的大规模兴起与市政改革 ……………………… (295)
第一节 城市的大规模兴起 ……………………………………… (295)
城市发展的一般状况 …………………………………………… (295)
城市的性质、类型与布局 ……………………………………… (298)

城市的兴起与美国经济结构的相应变化 …………………… (300)
城市化加速资本集中与垄断 ………………………………… (303)
第二节　市政管理与城市问题的恶化 …………………………… (305)
把持市政的"无形政府" ……………………………………… (305)
"城市老板"与腐化之风 ……………………………………… (306)
市政管理和贫民窟问题 ……………………………………… (310)
居住区的分化以及黑人聚居区的形成 ……………………… (314)
第三节　市政改革的尝试 ………………………………………… (317)
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及其作用 ………………………………… (317)
改造贫民窟的社区改良运动 ………………………………… (319)
取缔"城市老板"的市政机构改革 ………………………… (321)
社会福音运动及各派教会对城市问题的态度 ……………… (324)
妇女参政权运动和禁酒运动 ………………………………… (327)
市内交通及市政建设其他方面的改进 ……………………… (329)
第十章　19世纪后期美国的对外政策 ……………………… (332)
第一节　美国海外扩张的背景 ………………………………… (332)
美国经济增长与海外市场争夺 ……………………………… (332)
为海外扩张制造舆论 ………………………………………… (334)
"新天定命运"说 …………………………………………… (336)
海军复兴与马汉战略论 ……………………………………… (338)
第二节　美国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 …………………… (340)
染指朝鲜的最初步骤 ………………………………………… (340)
"仁川条约"与美日合谋 …………………………………… (342)
对华侵略的种种手段 ………………………………………… (344)
购买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 ………………………………… (347)
争夺萨摩亚群岛 ……………………………………………… (348)
兼并夏威夷群岛 ……………………………………………… (350)
第三节　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扩张及其与英国在这一地区的角逐 …… (355)
觊觎未来的洋际运河 ………………………………………… (355)

美国对古巴的侵略活动 …………………………………………… (358)
美国插手拉丁美洲事务及其与智利的纠纷 …………………… (360)
第一次泛美会议 ……………………………………………………… (362)
委内瑞拉边界争端与门罗主义的发展 ……………………… (365)
第十一章 19世纪后期美国的思想文化 ……………………… (371)
第一节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变化 ………………………………… (371)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风行及对这一思潮的批判 ……………… (371)
改革理论家及其代表作 ………………………………………… (374)
实用主义哲学及其创始人詹姆斯 …………………………… (375)
杜威的“工具主义”及其影响 ………………………………… (378)
维布伦的新思想 ………………………………………………… (379)
特纳及其“边疆假说” ………………………………………… (380)
第二节 教育 ……………………………………………………………… (383)
内战后初期的美国教育 ………………………………………… (383)
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 …………………………………………… (385)
高等教育改革的进展 …………………………………………… (387)
第三节 文学艺术 ……………………………………………………… (389)
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 …………………………………………… (389)
现实主义文学对垄断资本的揭露 …………………………… (391)
现实主义文学大师马克·吐温 ………………………………… (393)
惠特曼与迪金森的诗歌 ………………………………………… (394)
交响乐队的建立和爵士音乐的出现 ………………………… (396)
民族绘画的成长 ………………………………………………… (397)
雕塑与建筑 ……………………………………………………… (399)
19世纪后期美国历史大事记 ……………………………………… (403)
主要外文参考书目 ……………………………………………………… (416)
索引 ……………………………………………………………………… (429)
再版后记 ……………………………………………………………… (452)

第 一 章

美 国 内 战
(1861—1865 年)

19 世纪中叶，随着美国工业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在北部迅速发展。南部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也在不断扩展。到 50 年代，这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北部自由雇佣劳动制度与南部奴隶制度之间的一场决战，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内战期间，美国的资产阶级领导人民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斗，制定和贯彻了资产阶级的各项政治、经济的政策。资产阶级的正义斗争不仅得到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而且也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巩固了资产阶级政权，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北部资产阶级的胜利，在美国历史上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它扫除了奴隶制度这一美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使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很快跃入世界先进行列。因此，美国内战也被誉为美国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

第一节 内战的序幕与开端

〔1860 年总统竞选运动〕 1860 年的总统大选是一场四方竞选运动。共和党推选阿伯拉罕·林肯为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则

因南北两派意见相悖而分裂。北部民主党提名斯蒂芬·道格拉斯为总统候选人,南部民主党则提名约翰·布雷肯里奇为总统候选人。而由老辉格党、一无所知派等组成的立宪联邦党推出了约翰·贝尔。

共和党在这次竞选中提出了比较符合时代潮流的政治纲领,又成功地开展组织动员,获得了工人、农民的广泛支持,一直处于优势地位。5月,共和党在芝加哥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政纲重申反对向各领地扩展奴隶制,但不干涉各州的奴隶制;强调实行国内改革、保护关税和宅地法;并提出了言论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身自由的资产阶级政治口号。这个纲领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不仅赢得了东北部工业区的拥护,而且使中西部农业区的广大德裔美国人也倒向了共和党。当时的旅美马克思主义者魏德迈等人也认为,共和党的政治纲领具有进步意义。他们号召各地工人支持林肯当选。

然而,无论是南派或北派的民主党都坚持维护奴隶制,他们虚构出解放黑奴将会出现种种可怕情景,煽动人民反对林肯和敌视黑人情绪。南部民主党甚至采用恫吓手段,扬言如果林肯当选,南部各州就退出联邦。但是,由于民主党南北分裂,竞争力量大为削弱。而立宪联邦党企图在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激烈竞争中走一条中间道路。他们除了提出维护宪法和联邦以及实施法律以外,没有提出任何其政治原则,故影响平平。

1860年11月6日举行大选。结果林肯获得了18个自由州中17个州的多数票。虽然他未得到南部10个蓄奴州的任何选票,却拥有选举人团的大多数选票。于是,林肯以绝对优势战胜了所有对手,当选为美国第16任总统。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富有地域色彩的一次选举。

〔南部诸州脱离联邦〕　林肯的当选在南部奴隶主中引起

了极大的不满和恐惧。南卡罗来纳的一位奴隶主政客夫人在日记中写道："刺激是巨大的。"南部到处笼罩着绝望和沮丧的气氛。[①] 在查尔斯顿和孟菲斯等地，分离分子将此看作是分裂联邦的时机，掀起了好战的叫嚣。

南卡罗来纳州首先"发难"，于12月20日宣布脱离联邦。接着在1861年1月中，密西西比、佛罗里达、亚拉巴马、佐治亚、路易斯安那等州先后召开代表大会，均以压倒票数通过了脱离法令。2月1日，得克萨斯州亦以166票比7票宣布退出联邦。4日，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提议下，来自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和南卡罗来纳六州的代表，集会于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8日，大会宣布成立"美利坚诸州同盟"，简称"南部同盟"。翌日，42名代表推举杰斐逊·戴维斯为南部同盟的临时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为副总统，并通过了一个仓促草就的临时宪法。这部宪法顽固坚持奴隶制度，规定"不许通过……任何否认或损害对黑人的占有权"的法律[②]；并公然宣称各州可以"主权和独立的资格"采取行动，获得新的领土，扩张奴隶制度。

南部奴隶主竭力为自己的分裂行径作辩护，声称："分离不同于单纯的革命权利，而是符合宪法的。"[③] 他们强调各州不仅有权不服从违宪的法律，而且享有对国会法令的"废止权"。认为"联邦是各州间契约的产物，因此签订契约的各州是对侵犯其权利的合法裁判人。"[④] 他们甚至说，因为"分离权"也属州权

---

① 佩奇·史密斯：《战火的考验》，纽约1982年，第27页。

② 艾·柯万：《南部同盟社会政治史文献》，纽约1959年，第30页。

③ 亨利·莫里森、塞缪尔·康马杰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天津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79年，上卷，第800页。

④ 理查德·莫里斯：《美国历史百科全书》，纽约1976年，第200—201页。

范畴，而州权本身是得到宪法承认的，所以分离无可置疑地符合宪法。

南部奴隶主阶级的这些理论显然是诡辩。但是，1787 年制定的宪法本身就是州权派与中央集权派妥协的产物，它在联邦权利与州权的关系和界限等问题上，不可避免地留下一些含糊措辞，给南部分裂主义者留下了可乘之隙。然而，联邦宪法毕竟是全国的根本大法，是国家主权的体现。联邦宪法固然承认各州保留某些权利，并且联邦政府不能任意干涉这些权利。即使如此，这些州权仍然是非主权性的。南部奴隶主把州权扩大为主权加以行使，并进而脱离联邦，从根本上违背了联邦宪法。联邦宪法明文规定："本宪法所授予的各项立法权，均属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的合众国国会"，"未经国会同意，任何州不得……与他州或外国缔结协定或契约，亦不得进行战争"[①] 因此，南部奴隶主分裂联邦另建南部同盟，并私立宪法，实际上已把自己置于与联邦宪法全然对立的地位，因而完全是非法的叛逆行为。

〔北部各阶层对南部脱离的反应〕　南部七州脱离联邦后，北部的反应是十分复杂的。共和党激进派及工人、农民中坚定的奴隶制反对者，坚决主张对南部奴隶主的叛乱行径进行严厉的镇压。1861 年 1 月 29 日，激进派领袖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在众议院发表演说时严正指出，南部诸州脱离联邦是叛国行动，必须严惩不贷。在匹兹堡、费城等城市，工人们举行了规模盛大的集会和游行示威，他们高举"联邦是国家的基石"的大标语，愤怒声讨南部奴隶主的叛乱行径。北部自由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也慷慨激昂地呼吁：现在已经到了必须用剑、步枪、火药和弹丸去坚决粉碎奴隶主叛乱的时候了，舍此不能保全联邦。

---

① 埃·V·米切尔：《美国政治百科全书》，纽约 1946 年，第 72、77 页。

北部民主党人却在很大程度上同情叛乱，其右翼“铜头蛇”分子但愿林肯总统和共和党被各种困难压垮。他们煽动反战情绪，甚至鼓动叛乱。各边界蓄奴州虽然没有立即参加叛乱，却也不积极支持联邦和林肯总统，采取观望态度。威廉·加里森、温德尔·菲里普斯等废奴主义者天真地认为，只要让南部脱离联邦就可以解决奴隶制问题。因此，他们一味鼓吹让南部奴隶主和平地走开。共和党保守派即大资产阶级只想到自己的政治、经济权益，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保全刚刚获得的统治地位，而不是奴隶制存废的问题。他们担心收不回南部奴隶主所欠的2.11亿美元的巨额债务，[①] 故极力主张同南部妥协，甚至联名上书，要求国会出面斡旋。

林肯正是在这种复杂形势下出任总统的。1861年3月4日，林肯宣誓就职并发表演说。他阐述了面对当时重大政治争端所持的观点和政策。林肯指出：“从一般法律和宪法的角度来看，各州组成的联邦是永久性的。”因此，“任何一个州都不能单凭自己的动议合法地退出联邦；任何为此通过的决议和法令在法律上都是无效的。”他还重申共和党无意干涉蓄奴州的奴隶制度。最后，他要求南部分离分子不要发动内战，“政府将不会攻击你们，只要你们自己不做侵略者，冲突就不会发生。”他的这篇演说中心思想就是维护联邦统一。他强调“就自然条件来说，我们是不能分离的。我们既不能把各个区域各自搬开，也不能在它们之间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城墙。”[②] 林肯的这一积极思想与他对南部奴隶主的迁就，表现出他的政策的两重性。

〔萨姆特陷落与内战开端〕　林肯宣誓就职的当天，就接

---

① 卡尔·桑德堡：《战争年代的林肯》，纽约1939年，第一卷，第261—262页。

② 菲力普·斯特恩：《林肯的生平与著作》，纽约1940年，第467页。

到萨姆特要塞联邦驻军司令罗伯特·安德森少校送来的紧急报告，他们已经被叛军团团包围，粮食储备仅够维持一个月，如果得不到接济，他们只得放弃要塞。萨姆特是当时南卡罗来纳州内惟一未被叛军当局占领的联邦要塞。1861 年 3 月 3 日，南部叛乱当局任命皮埃尔·博雷加德为查尔斯顿驻军司令，并下令包围萨姆特要塞。尽管这个要塞的战略价值不大，但如果容忍南部叛军轻易将它占领，就必然使联邦原则受到致命的损害。

3 月 9 日，林肯召集第一次会议商量对策。会上，7 名成员中竟有 5 人反对接济要塞。南部叛乱分子不断向林肯政府施加压力，叫嚣："让你们总统试试向萨姆特增援吧，战争的警钟将响彻南部的每一个山头和河谷。"① 3 月末，林肯又连续两天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对策，但会上赞成与反对的意见仍相持不下。林肯权衡利弊，决心正面解决这个问题。会后他立即向陆军部长下令：组织远征部队，务必于 4 月 6 日前做好一切准备，去解救萨姆特要塞。

消息传到蒙哥马利，杰弗逊·戴维斯立即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下令进攻萨姆特要塞。4 月 10 日，南部同盟的陆军部长雷鲁瓦·沃克通知博雷加德，立即要求联邦军队撤出要塞。12 日上午 4 时 30 分，叛军终于向萨姆特要塞射出了内战的第一颗炮弹。炮击持续 33 个小时。14 日下午，安德森少校率领守军，举旗擂鼓，撤出要塞。历时四年的美国内战由此开始。

第二节　林肯政府为恢复联邦统一而战

〔南北双方战争目的与力量对比〕　战幕拉开后，南部奴

---

① 卡尔·桑德堡：《林肯传》，三联书店中译本 1978 年，第 167—168 页。

隶主仍旧声称：同盟诸州脱离联邦仅仅是为了保存自己的权利，促进自己的福利，捍卫州权。事实上，南部奴隶主不惜孤注一掷的真正目的乃是为了维护和扩展奴隶制度。他们甚至扬言要为了建立一个“大奴隶制共和国”而进行军事征战。因此，就其性质言，南部奴隶主所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

北部资产阶级宣布战争的最高目的是恢复联邦的统一。这一战争目的完全反映了刚刚控制联邦政府的北部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他们希望有一个统一的联邦、稳定的局势，以便在限制奴隶制进一步扩展的条件下，加速发展资本主义。因此他们不能容忍分裂。正如芝加哥《论坛报》所说：“北部没有一个党派会同意国家领土、国家军备、国家档案或国家宝藏分裂。”[①] 林肯也明确指出：“这场斗争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②] 北部的战争目的无疑具有进步性。

在战略上，北方应采取果断行动，主动进攻南部。但是，在战争初期北部未能实施正确战略，在战场上一再处于被动地位。南部在战略上采取先发制人、速战速决的策略，他们抢先进攻华盛顿，企图在士气上压倒对方。但是，南部错误地估计了国际国内的基本形势，导致其战略失误。他们一味进攻，反而使自己日趋被动，最终陷于绝境。

双方的基本力量对比亦十分悬殊。北部的实力占压倒优势。它拥有全国 34 个州中的 23 个州，占全国领土面积的 3/4。北部自由人口近2,200 万；而南部自由人口仅 545 万，加上奴隶 352 万，人口仅近 900 万。[③] 北部拥有美国几乎所有钢铁、军火和绝

---

① 艾伦·内文斯：《为联邦而战》，纽约 1959 年，第 1 卷，第 26 页。

② 斯特恩：前引书，第 719 页。

③ 莫里森等：前引书，上卷，第 817 页。

大部分纺织、皮革等工业，仅纽约一个州的工业产值就4倍于南部所有分离州的总产值。[①] 北部还拥有铁路网和许多干线，总长度为22,000英里；南部铁路线仅9,000英里，而且不成网络[②]。北部还掌握着联邦政权，可以依靠政府力量解决战时财政问题；而南部原来就负债累累、缺乏资金，战争更使之财政拮据以至焦头烂额的地步。

南部也拥有一定的有利条件。南部的奴隶主寡头政治比北部的民主政治更易于迅速地集结力量，转入战时行动。南部人崇尚戎马生涯，故拥有比北部更多资历较长、经验丰富的军事人才。且南部叛乱蓄谋已久，早已聚积大量武装力量。南部还有很长的海岸线，便于突破北部的经济封锁。最后，战争在南部土地上进行，使同盟占有地利之便。由于上述因素的作用，尽管在总的力量对比上南部劣于北部，在某些具体力量对比上却优于北部，故在战争初期南部一度取得某些优势。

〔1861年战局——北部失利〕 萨姆特要塞的炮声揭开了内战序幕后，北部人民群情激昂。他们强烈要求联邦政府采取行动，向奴隶制发起进攻。1861年4月15日，林肯发布命令招募75,000名志愿兵服役3个月。5月3日，林肯又下令征召42,000名志愿兵服役3年。北部人民立即热烈响应，纷纷要求参军。印第安纳的一名刚过16岁的青年对其父亲说："我们必须有更多的士兵。我们的祖先建立起这个联邦，我们要从毁灭中拯救它。"[③] 仅两个多月，联邦政府就征召到310,000人，约3倍于原来要求的数额。而第一批志愿兵服役仅3个月的期限就反映出北方缺乏

---

① 莫里森等：前引书，上卷，第819页。

② 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0—241页。

③ 史密斯：前引书，第53页。

长期战争的思想准备。

6月29日，林肯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作战问题。欧文·麦克道尔将军提出，由他率领一支3万人的军队，去攻击布尔河附近的马纳萨斯联轨站上由博雷加德率领的22,000名同盟军。7月18日，麦克道尔率军渡过波托马克河，抵达森特维尔。战争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迅速出击，但是麦克道尔却没有这样做。他过于小心，只派丹尼尔·泰勒带领一支小部队前去侦察，结果与同盟军遭遇接火，暴露了进攻方向。南军约瑟夫·约翰斯顿立即率部乘火车增援博雷加德。直到这时，麦克道尔仍未抢先出击。

7月21日拂晓，麦克道尔发起进攻。他原计划在石桥佯攻，主力迂回到西北实施围歼。石桥佯攻受挫，反而引起豪斯高地激战。托马斯·杰克逊指挥的同盟军像“石壁”一样挡住了联邦军的猛攻。下午，同盟军柯比·史密斯率部9千人赶来增援，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联邦军转人撤退。但由于联邦军缺乏训练和战斗经验，撤退变成了大溃退。

布尔河战役（又称马纳萨斯战役）失败消息传到华盛顿后，北部上下为之震惊，人们称这一天为“黑暗的星期一”。失败使3个月内结束战争的论调销声匿迹。林肯政府从这次失败中汲取教训，准备长期斗争。相反，南部却以这次小胜自吹自擂。

布尔河战败后，林肯立即召见乔治·麦克莱伦，授权他指挥华盛顿军区，命令他重建波托马克军团，使之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麦克莱伦毕业于西点军校，他生性傲慢、自负且野心勃勃，虽熟谙军事理论，却无多少实战经验，尤其对于与战争紧密联系的各种因素缺乏洞察力。他只是由于在西弗吉尼亚曾轻易取胜而名噪一时。麦克莱伦上任后，把波托马克军团扩充到16万人。此后一连数月，只是操练部队、制定计划，却从未把计划付诸实施。他幻想通过充足的军事准备，对里士满实行一次胜利进

攻以结束战争，因此他采取拖延战略。

麦克莱伦长时间按兵不动，引起了舆论的不满。在林肯政府的频频督促下，他才勉强采取行动。10月下旬，他令查尔斯·斯通将军率部越过波托马克河去进行侦察。但斯通早已暗中投敌，将部署告知南军。10月21日，爱德华·贝克上校率小分队执行任务，遭南军伏击。贝克率部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被击溃。贝克等48名官兵阵亡，伤158人，被俘和失踪714人。

麦克莱伦不切实际的战略和无所作为的军事指挥，使联邦军队在波托马克河主战场上再遭重创。当时联邦政府尚未找到更合适的军事人才，而麦克莱伦在政治上的保守态度又较符合林肯的稳健政策，故仍受到重用。11月，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退休，麦克莱伦又被擢升为陆军总司令。

〔海军行动与北部对南部的封锁〕　1861年联邦的军事战果主要来自海军方面。南部同盟成立后，联邦海军中许多来自南部的军官纷纷离职南下，但他们却未能把军舰带走。南部同盟只得依靠征用和改装商船、拖轮等，拼凑成自己的海军。4月17日，戴维斯宣布允许南部武装船只劫夺联邦船只。到1861年底，同盟海军共捕夺了58艘船只，其中15艘是在密西西比河上夺得的。

在戴维斯鼓动南部劫捕联邦船只后两天，林肯就宣布对南部各港口实行封锁，并任命吉迪恩·韦尔斯为海军部长。但在战争初期，联邦海军实际上只拥有8,800人和42艘可供海战的船只。而南部海岸线长达12,000英里，散布着185个大大小小的港口和商埠。因此，严密封锁南部各港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南部真正具有战略价值的港口却不多，从弗吉尼亚的查尔斯角到密西西比河口的海岸线上，与铁路相连的重要港口仅9个即纽波特纽斯、诺福克、维尔明顿、查尔斯顿、萨凡纳、布兰斯维克、

彭萨科拉、莫比亚和新奥尔良等 。联邦海军采取了重点封锁的方针。

韦尔斯上任后，立即下令购买或租借船只扩建海军；同时把大西洋舰队分成北、南两个中队，分别交由戈茨鲍洛夫和亨利·杜邦两位将军指挥。到 1861 年 7 月底，联邦海军已封锁了南部七、八个重要口岸，部署了四支分舰队。重点封锁的第一年已收到显著效果，南部各港口进出船只总数比内战爆发前的一年减少80%。[①]

1861 年夏，联邦海军又开始在南部各重要港口附近建立基地。8 月，海军配合陆军一举攻克了北卡罗来纳海岸的哈特勒斯堡垒。11 月，杜邦将军率舰队攻克南卡罗来纳罗耶尔港外重要战略基地希尔顿赫德。这次胜利为联邦军队扩大战果提供了有利的战略地位。

〔弗里蒙特与奴隶制问题〕　　内战爆发后，北部资产阶级集团对奴隶制存废问题仍存在着尖锐争论。激进派主张“战争应该以废除奴隶制为目标”[②]，认为只有消灭奴隶制度，资本主义才能得到迅速、自由的发展。而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保守派，却强调实业界“不能忍受一场长期的、胜负莫测的、令人厌倦的争斗”[③]，要求与南部同盟妥协；并且以美国宪法为借口，主张对南部奴隶主采取宽大政策，反对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和没收其财产。

在战场上这一斗争反映为如何处置逃亡奴隶问题。保守派强调严格执行逃奴法，将一切逃亡奴隶遣返南部。激进派却主张在

---

① 莫里森等：前引书，上卷，第 843 页。

② 桑德堡：《战争年代的林肯》，纽约 1939 年，第 1 卷，第 564 页。

③ 桑德堡：前引书，第 217 页。

战场上收容逃奴，并将他们解放为自由人。弗吉尼亚门罗要塞驻军司令本杰明·巴勒特是最早收容逃奴的北部将领。林肯在内心里是反对奴隶制，但他过于求稳，对巴特勒的做法并未公开支持。

1861年夏，联邦军与同盟军在密苏里州展开激烈争夺战。约翰·弗里蒙特将军率部作战，攻势凌厉，战绩显赫。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特别是密苏里州内与联邦为敌的武装奴隶主，弗里蒙特在8月30日发布公告，宣称密苏里全境戒严，凡在联邦军队防线以北被捕获的"持有武器者"一律交军事法庭审判，"被判有罪者一律枪决。"并宣布凡持武器反对联邦、或在战场上与南军合作者，其动产和不动产一律没收，其奴隶释为自由人。[①]

弗里蒙特的这一措施的革命意义在于，它首次以解放奴隶对奴隶主施加威胁。这一旗帜鲜明的措施，立即成为北部保守派与激进派斗争的焦点。激进派为弗里蒙特的伟大气魄欢呼，把他宣布的解放奴隶原则看作是"天上降下来的甘露"，因为"这些原则提供了消灭奴隶制的方法。"[②] 保守派却表示极力反对，他们以边界蓄奴州将会转向南部同盟相威胁，要求林肯立即撤销这一命令。林肯也有这种担心，采纳了保守派的意见。9月2日，他得到正式文本后，立即致函弗里蒙特，要求他修改解放奴隶的命令，以便同这年夏天国会通过的《没收法案》协调起来。弗里蒙特拒绝修改命令。保守派和边界蓄奴州的奴隶主乘机继续向林肯施加压力。9月11日，林肯宣布取消弗里蒙特的命令。10月24日，又免除了弗里蒙特西部战区司令的职务。林肯的这一做法挫伤了北部人民反对奴隶制的革命热情，是他在内战前期所犯的一

① 桑德堡：《战争年代的林肯》，第205—206页。

② T. 威廉斯：《林肯与激进派》，麦迪逊1941年，第271页。

个重大错误。

〔南部对外政策的基点〕　南部奴隶主阶级敢于分裂联邦、发动内战，还因为它深信自己能够得到欧洲列强的全力支持和援助。他们把棉花看作是吸引欧洲列强干涉美国内战的一张王牌。南部诸州的棉花生产在内战前的五、六十年代确实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英、法等国棉纺工业的主要原料来源。1850 年至 1860 年间英国所用棉花 80%来自美国[①]。南部奴隶主由此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欧洲列强有求于棉花，南部也就变得不可战胜了，他们手里掌握着的“那根小小的、细弱的棉绒，……能够把世界绞死”[②]。他们一旦停止棉花供应，整个欧洲纺织机的轮子将无法转动。欧洲列强为了自身的利益必将全力支持南部。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詹姆斯·哈蒙特傲慢地说：“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敢对棉花开战。棉花就是王。”[③]

南部同盟把棉花当作赌注，以此争取欧洲列强的支援。他们派出代表去欧洲游说，不仅争取欧洲列强的政治支持和财政援助，还鼓励欧洲列强对内战进行直接武装干涉。

其实，南部奴隶主只是不切实际地夸大了棉花的作用。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棉花虽有一定的作用，但决不能成为各国决定政策的惟一因素。何况 1861 年上半年，英国市场的棉花并不短缺，相反有 50%棉花供过于求。而且英国已可从埃及和印度进口棉花，南部棉花作用更为降低。既然英、法等国不存在失去棉花的威胁，也就没有干涉美国内战的紧迫感了。

而且，南北战争期间，欧洲不但摆脱了对南部棉花的依赖，

① 莫里森等：前引书，上卷，第 847 页。

② 莫里森等：前引书，上卷，第 847 页。

③ E.M. 库尔特：《美利坚南部诸州同盟：1861—1865 年》，得克萨斯 1950 年，第 184—185 页。

却因粮食歉收反而增加了对北部谷物的依赖程度。英国从美国进口的小麦从1860年的1,700万蒲式耳猛增到1862年的6，200万蒲式耳[①]。其他农产品进口也有所增加。结果"称王的不是棉花，而是小麦"[②]了。南部奴隶主在棉花问题上的短浅目光，导致他们确定对外政策基本点的错误，最终只能是自食其果。

〔北部争取欧洲中立政策的成功〕　　美国内战的爆发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英法及欧洲各国对内战进程极为关注。欧洲各国人民对联邦的事业给予很大的同情，"他们把南部看作是反动封建政治的象征，而把北部看作是民主与进步政治的象征。"[③] 因此大多数人深信，"联邦的胜利将证明民主制度完全正确，而联邦的毁灭则将成为民主制度的致命伤。"[④]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密切注视美国内战的动态，并及时撰文系统地阐述美国内战的起因及其性质，号召欧洲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北部的正义事业。

欧洲各列强的统治集团却对南部同盟公开表示同情，他们本能地意识到联邦政府的胜利，将助长欧洲民主运动的发展，从而危及他们在自己国土上的统治。他们对美国北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也怀有莫大的恐惧。因此他们更愿看到美国分裂，甚至希望南部战胜北部，使美国不能在经济上成为欧洲的竞争对手而只能沦于附庸地位。

英国一方面在经济上、军事物质上尽可能援助南部同盟，同时在政治上也公开承认南部同盟为交战国一方，在事实上承认南部同盟为独立的国家。法国的拿破仑三世从1861年起对墨西哥

---

① 莫里森等：前引书，上卷，第848页。
② 莫里森等：前引书，上卷，第848页。
③ 史密斯：前引书，第191页。
④ 莫里森等：前引书，上卷，第845页。

进行干涉，企图乘机染指拉美。西班牙和奥地利也对南部同盟表示了更多的好感和支持，西班牙甚至派出军队协助拿破仑三世干涉墨西哥。总之，欧洲列强大体上站在南部同盟一边。但时代毕竟不同了，美国资本主义生产力正显示出强大的活力。同时，林肯政府一再强调北部进行战争只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并派出外交使团到欧洲各国进行广泛活动。一方面奉劝欧洲各国政府采取中立立场，另一方面积极谋求欧洲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正是这种有利于北部正义事业的强大国际舆论的出现，使欧洲列强不敢贸然行事。

正当北部在战场上失利的1861年下半年，发生了“特仑特号事件”，英国几乎找到干涉美国内战的借口。11月7日，英国邮船“特仑特号”驶离哈瓦那，载着两名南部同盟的代表詹姆斯·梅森和约翰·斯利德尔，前往英国购买武器和订造战舰。翌日，该船被联邦战舰“圣亚新托号”拦截，两名南部代表被捕。消息传到伦敦，英国统治集团为之大哗。他们要求联邦立即释放南部代表，并就这一行动作出道歉和赔偿，否则将诉诸战争。同时立即在加拿大增兵10,000人。

在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际，林肯表现得十分沉着。他深知联邦在此时不可能同时打两个战争。为了集中力量镇压南部奴隶主的叛乱活动，只有暂时向英国让步，以避免英美战争的发生。于是，他下令释放梅森和斯利德尔。同时，林肯明确表示：虽然“这是一个难以吞咽的苦药丸，但我感到宽慰的是，我相信英国在这件事上的胜利只是暂时的。等到我们顺利地结束这场战争之后，我们将会变得非常强大，以至我们能对英国使我们蒙受的种种难堪和它算总账。”[1]

① 桑德堡：《战争年代的林肯》，第1卷，第368页。

第三节　联邦军队的胜利进军

〔1862 年战局——战事交错〕　1862 年 2 月，格兰特将军在田纳西州指挥了一次援助俄亥俄联邦守军的牵制行动。格兰特大军在炮舰配合下，仅半月时间就夺占了田纳西河上的亨利堡和坎伯兰河上的道纳尔逊堡，联邦军队实际上控制了田纳西州。随后，格兰特大军又沿着田纳西河向匹兹堡兰丁进军。4 月 6 日，格兰特部在西洛再次击败南军，在具有战略意义的西部战场上进一步扩大了战果。同时，巴特勒部在南部战场上，与达维德·法拉格特的舰只配合，于 5 月 11 日攻克南部最大的贸易中心和港口新奥尔良。

东部战场上，麦克莱伦虽拥兵十万，仍按兵不动。林肯气愤地撤其陆军总司令之职，仅让他指挥波托马克军团。迫于这种局面，麦克莱伦才开始行动。他制定一个取道约克半岛向里士满实行包抄的计划，并吹嘘"十天内我将进入里士满"。他的计划实际上不可能成功，因为半岛上土质湿软，极不适合带有庞大辎重的大部队的军事行动。

4 月初，麦克莱伦部登陆约克半岛。由于路途泥泞，行进十分缓慢，直到 5 月中才逼进里士满。31 日，麦克莱伦在里士满城外"白橡林"同约翰斯顿交战，未分胜负。之后连日阴雨，麦克莱伦决定等待天晴，以发挥其火炮优势，再向里士满发起总攻。南军将领罗伯特·李已对此察觉，决定先发制人。

罗伯特·李自知兵力不足，难以支撑旷日消耗，故调兵形成局部优势，于 6 月 26 日向麦克莱伦右翼发起攻击。由于托马斯·杰克逊指挥失当，这次攻势受挫。但麦克莱伦却估计南军有 10 万兵力，匆匆后撤，据阵以待。27 日，杰克逊率南军再度向麦

克莱伦的防线正面突击。当夜幕降临时，北军防线被突破。南军全力追击，联邦波托马克军团9万多人顿时溃不成军。“七日战役”中，北军折兵16,000人，攻占里士满计划尽付东流。麦克莱伦的失败，在于他不了解北部进行战争的正义性因而缺乏作战热情，所以未采取以快制胜的战术。南部同盟虽在这次战役中取得了保卫里士满的战略胜利，但为此付出了2万兵力，损失很重。

半岛战役后，罗伯特·李乘胜北上，渡过波托马克河，进入马里兰，欲向纵深突击，以威胁联邦心脏地区。林肯令麦克莱伦前往应战。9月13日，麦克莱伦缴获罗伯特·李关于详述作战方案的191号特别命令，南军意向因而全部暴露。北军迅速抢占两军之间的制高点，李担心南军遭到分割，急忙将分散的各部集中到安提塔姆附近。17日晨，两军对阵，在3英里长的战线上展开战斗。北军兵力为南军2倍。双方列队擂鼓前进，迎面开火。北军火炮优势再度发挥作用，南军死伤惨重。李无法承受巨大损失，18日大败而去。在此关键时刻，昏庸的麦克莱伦竟未追击，使南军安然逃脱。麦克莱伦的严重失职使北部舆论大为愤慨。10月6日，林肯命令他立即渡过波托马克河追赶敌军。但麦克莱伦寻找借口拖延行动。11月7日，林肯终于解除了麦克莱伦对波托马克军团的指挥权。

〔1862年的革命立法〕　随着内战的深入，联邦政府在1862年通过一系列革命立法。

2月25日，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禁止使用军队捕捉及引渡逃亡奴隶的法案，明令“凡违反此规定的任何军官均予免职处分。”[①] 3月10日，参议院也以压倒多数通过这项法案。该法

① 威廉·麦克唐纳：《合众国历史法规选1861—1898年》，纽约1922年，第31—32页。

案推动更多的奴隶投奔北方，从而给本来人力不足的南部以沉重打击。

4月16日，国会又通过在哥伦比亚特区禁止黑人奴隶制的法案。这是个局部解放奴隶的措施，它规定由政府以每人300美元的价格赎买所有奴隶，然后一律给以自由。该法案又提出：被解放的奴隶由政府提供旅费移居利比里亚或海地[①]。该法案虽只涉及首都地区，且具有种族歧视的色彩，但对于推进战争形势仍具有积极意义。

5月20日，林肯终于签署了北部人民久已为之奋斗的“宅地法”。该法案规定：凡身为家长，或年满21岁的合众国公民，或决定依照合众国入籍法的规定填写志愿入籍声明书，同时未曾持械反抗合众国政府者，自1863年1月1日起，只需交纳10美元登记费，即可领得160英亩国有土地；在此土地上耕种5年后即可领取土地执照而成为所有者。“宅地法”是1862年国会立法中最具有进步意义的法律，它的颁布不仅堵塞了奴隶制向西扩张的道路，沉重地打击了奴隶制，而且争取到西部人民对北部的广泛支持，更有利于联邦军队在西部战场转入反攻。

6月19日，国会通过的法案，宣布在各准州及未来一切新领地上废除奴隶制，确定黑人子女有受教育权，但对赔偿奴隶主问题未列专门条款。[②] 这项法案进一步限制了奴隶制发展。

7月14日，参议院通过“西弗吉尼亚加入联邦法案”，宣布在接纳西弗吉尼亚加入联邦的同时，在该州有步骤地废除奴隶制；在1863年7月4日后出生的黑奴子女一律为自由人。[③] 这项

---

① 威廉·麦克唐纳：《合众国历史法规选1861—1898年》，纽约1922年，第35—39页。

② 麦克唐纳，前引书，第42—43页。

③ 麦克唐纳，前引书，第56—58页。

局部解放奴隶的法律到12月才告生效。

7月17日，国会通过“没收法案”。规定凡被宣布犯有叛国罪的叛乱者，应处死刑，但可改判5年徒刑或罚金10,000美元；叛乱者的所有动产与不动产均予没收，其奴隶则解放为自由人；授权总统可使用奴隶去镇压叛乱。① 这意味着打破了黑人不得参军的旧法规。该法案未规定解放奴隶的具体程序，其实际效用很低。同一天，还通过了“民兵法案”，规定凡逃入联邦军队并为之服务的叛乱者之奴隶，其本人及家属均成为自由人。

1862年国会立法虽然大多是因军事需要而采取的局部解放奴隶措施，有些法律并未得到实际的执行，但其积极意义仍应充分肯定。因为“所有这些法律都在起着打击、削弱、侵蚀、蚕食奴隶制的作用，它们把奴隶制的法律屏障炸开了一道道缺口，逐渐破坏着奴隶制生存的支柱和堡垒。”②

〔林肯与《解放宣言》〕　林肯作为个人一直是反对奴隶制的。他始终认为“奴隶制是建立在非正义和错误政策之上的”。③ 但是，作为总统，制定具体政策时，他却十分谨慎。他坦诚地表明：“我天生是反对奴隶制度的，……然而我从不认为总统职位赋予我的权力是无限的，是可以使我按照自己的判断和感情采取官方行动的。”④ 但是，“当解决奴隶制的时机到来时，我确信我一定会尽我的职责，哪怕付出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⑤

早在1860年总统竞选时，林肯就在共和党政纲中提出不再给奴隶制一寸新的土地。在他当选后，立即面临着南部奴隶主分

① 麦克唐纳，前引书，第48—53页。
② 桑德堡：《战争年代的林肯》，第1卷，第578页。
③ R.N.柯伦特：《人所不知的林肯》，纽约1958年，第216页。
④ 斯特恩：前引书，第807页。
⑤ 桑德堡：《战争年代的林肯》，第1卷，第572页。

裂联邦的严峻局面。在这紧要历史关头，社会各阶级的态度极为复杂。林肯处在矛盾冲突的漩涡中心，既受制于大资产阶级保守派的压力，又担心边界州倒向南部同盟。为此他只提出了维护联邦统一的共同目标，尽可能地团结各种力量共同对敌。随着形势变化，到 1862 年 3 月林肯才提出逐步有偿地解放奴隶的方针。虽然这一方针仍较温和，反映了试图通过和平改良方式解决奴隶制问题的意图，但它的锋芒毕竟是指向奴隶制本身。到 1862 年 6 月，林肯已明确表示，解决奴隶制问题“时刻来到了，它使我感到奴隶制必须死亡，以便国家能够生存。”① 7 月，林肯已公开宣称，他将发表“解放宣言”。只是由于半岛战役的失利，他未能将决心付诸实施，又重提战争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摧毁奴隶制。9 月，安提塔姆战役的重大胜利，使林肯终于获得了发布“解放宣言”的机会。9 月 22 日，林肯在内阁会议上宣读了他早已多次修改的“初步解放宣言”草稿，并于 9 月 24 日将“初步解放宣言”公布于世。

“初步解放宣言”首先宣布：在未参加叛乱的四个边界州中，将实行逐步地有偿地解放奴隶的措施。接着宣布：自 1863 年 1 月 1 日起，凡当时仍在叛乱的任何一个州或地区，其境内所有奴隶都应永远获得自由。“初步解放宣言”的发表，在美国人民中引起了极其热烈的反应。废奴派领袖威廉·加里森热情地欢呼：宣言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它的重要性和善行也使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② 另一位废奴派人士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兴奋地说：“我们欢呼我们活到召回这正义的时刻了，……哦，‘永远自由’！长期受奴役的千百万人，……你们解放的时刻指日可

---

① 莫里森等：前引书，上卷，第 867 页。

② 史密斯：前引书，第 292 页。

待了。”①

1863年1月1日，林肯正式颁发“解放宣言”。北部人民为此受到极大鼓舞；广大自由黑人更是欢呼雀跃。南部黑人奴隶也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光明前途，大批逃往北部。南部奴隶主则为之暴跳如雷，谩骂“解放宣言”是“美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骇人听闻的政治罪行，最愚蠢的政治错误”。② 欧洲列强也对“解放宣言”报以辱骂和讽刺。但是，欧洲工人阶级热情支持和欢呼“解放宣言”的发表，英国工人还致信林肯，表达对“解放宣言”的真挚赞美。

“解放宣言”发表后，武装黑人的问题也随之迎刃而解。广大黑人踊跃参军，战斗激情十分高昂。一位黑人在群众集会上说：“如果我们不参加战斗，就是背叛了上帝、背叛了祖国、背叛了种族、背叛了我们自己。”③ 到1863年10月，在北部8个州和南部7个州已建立起58个黑人团队，黑人士兵达37,482人。他们充满了对奴隶制憎恨的怒火，战斗顽强，成为一支勇不可挡的力量。

“解放宣言”是联邦建立后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但它仍然存在着许多缺陷。首先，它还不是一个全面解放奴隶的法令，仅对叛乱州有效。再次，它对边界蓄奴州的奴隶制并无具体措施，使之依然合法存在。

〔*1863年战局——优势转向北方*〕　麦克莱伦被解除波托马克军团司令的职务后，由安布罗斯·伯恩塞德接任，伯恩塞德的注意力仍集中在攻取里士满，而不是对准罗伯特·李所率领的南军主力。结果是使罗伯特·李得以集中力量来对付他。1862年

---

① 史密斯：前引书，第292页。
② 桑德堡：《战争年代的林肯》，第2卷，第20页。
③ 史密斯：前引书，第313页。

12 月 13 日，伯恩塞德在弗雷里克斯堡战役中被罗伯特·李击败。伯恩塞德因此被革职，改由约瑟夫·胡克将军接任。胡克上任后，继续错误地执行进攻里士满的计划，结果在昌斯勒维尔战役中又一次惨败在罗伯特·李手下。尽管南军赢得了这次战役，却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损失兵力12,821 人，“石壁将军”杰克逊亦阵亡。昌斯勒维尔之战是南部同盟在内战中获胜的最后一次战役。此后的战场形势发生变化，优势逐渐转向联邦军队。

罗伯特·李决定在北部开辟战场，他认为只要在北部打一场决定性的胜仗，欧洲列强就会承认南部独立。1863 年 6 月 3 日，李率军73,000 人进军宾夕法尼亚。胡克提议以攻击里士满来对抗罗伯特·李的入侵。林肯否定了这个提议，确定攻击目标应是李军，而不是里士满。但是胡克却以辞职相抗，林肯立即委派乔治·米德接替胡克，令其寻敌作战。南北两军互相探测、捕捉战机。结果于 6 月 30 日在葛底斯堡发生遭遇，双方立即交火，终于演成了内战中著名的葛底斯堡大会战。

7 月 1 日，双方正式列阵开战。罗伯特·李认为南军后勤供应不足，应采取主动进攻战术。南军向联邦军防线连续猛攻 3 日，仍未奏效。3 日，南军炮火猛轰联邦军阵地，直至弹药几乎用尽，战场上一片沉寂。南军以为对方火炮已被摧毁，乃以 3 个师15,000 余人发起冲锋。当他们进入开阔地时，联邦军炮火突然轰鸣，南军被密集的炮弹炸得尸横遍野。罗伯特·李再也不能承受如此惨重的损失，只得下令撤退。林肯令米德抓紧追击，力争全歼。但是米德追击不力，李军又一次得以逃脱。

葛底斯堡战役双方损失都十分惨重。李军兵力损失 1/3，联邦军队也伤亡23,049 人。尽管如此，这次战役对北部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它成为内战的转折点，从此南部不得不放弃其进攻战术而转入战略防御。

为了祭奠在这次战役中英勇献身的将士英灵，林肯于11月19日来到葛底斯堡战场，在典礼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他高度赞扬了阵亡将士们为联邦的正义事业捐躯的崇高精神，并勉励人们为完成阵亡将士们未竟事业继续顽强战斗下去，以使“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存下去。

正当罗伯特·李在葛底斯堡遭到惨败时，在西部战场上更大的灾难又降临到南部同盟的头上。格兰特将军攻克了密西西比河上的重要据点维克斯堡，使联邦军队控制了整条密西西比河，南部同盟的脊椎被拦腰劈为两段。南部同盟再也不能从西部地区得到所需要的粮食和肉类供应，也无法用得克萨斯的棉花向欧洲换取它所需要的武器弹药。更重要的是，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两次大捷，使欧洲列强认识到南部独立已完全不可能，南部同盟陷入彻底孤立。

〔谢尔曼“向海洋进军”〕 1863年秋季，战争的重心已转移到西部战区。格兰特受林肯之命前往田纳西州，指挥查塔努加战役。11月，联邦军一举攻克查塔努加，为进军佐治亚创造了条件。1864年初，格兰特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为了彻底摧毁南部同盟的经济力量，格兰特指示威廉·谢尔曼打到敌方内线去，消灭南军有生力量并破坏其作战资源。

1864年5月，谢尔曼部放弃大部分辎重装备，轻装从查塔努加出发，向佐治亚纵深推进。南军约翰斯顿部企图以设防拖延战术，来阻挡谢尔曼的进军。但谢尔曼也一改以往猛打猛冲的作法，转为迂回作战、绕敌前进，使约翰斯顿不得不撤出阵地，且战且退。约翰斯顿的后退引起戴维斯的不满，改由约翰·胡德接替约翰斯顿。胡德遵戴维斯之命，向谢尔曼连连发动进攻，均遭失败。胡德只得退据亚特兰大。8月底，谢尔曼切断了亚特兰大的铁路线，胡德失去给养而无法困守。9月2日，南部最大的铁

路枢纽和工业城市亚特兰大被联邦军占领。

谢尔曼部休整两个月后，精选62，000名士兵，不带给养，直插南部腹地。11月16日，开始了以萨凡纳为目标的300英里"向海洋进军"。这是一次旨在摧毁敌人后方经济力量和士气的伟大进军。谢尔曼大军横扫佐治亚，所到之处，烧毁存粮，杀死牲畜，捣毁厂房机器，拆除铁路桥梁，无限制征用车辆，意在毁掉一切有用之物。这次破坏性大扫荡，在南部引起极大恐慌。奴隶主们闻风丧胆，纷纷携家逃离。而广大奴隶则把谢尔曼大军视为解放者，表现出无比热烈的情感。据谢尔曼回忆："黑人们简直快乐得发狂了。他们只要听到我的名字，就都围住我的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高呼和祈祷……"① 许多黑人索性跟随谢尔曼大军前进，他们相信这就是走向解放。

谢尔曼向海洋进军几乎未遇有力的抵抗，沿途只是与奴隶主小股武装发生零星战斗，而在华盛顿却有一个多月不知谢尔曼的去向，林肯极为焦虑不安。12月22日，联邦政府终于接到谢尔曼送给"阿伯拉罕大叔和家乡人民的一份很好的圣诞礼物"——谢尔曼大军占领了萨凡纳。"向海洋进军"胜利完成。这在经济上、精神上给南部同盟以决定性打击。南部的重要交通线陷于瘫痪；佐治亚州作为南部主要工业基地遭到毁灭性破坏，使南部同盟的物质缺乏进一步加重。南军再也无法得到充分的粮食供应，士气越发低落，民心动摇。所有这些因素都加速了南部同盟的最终崩溃。

第四节　在战线的后方

〔联邦政府促进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　1860年林肯

---

① 史密斯：前引书，第542页。

当选为总统以后，长期被南部奴隶主占据的总统职位终于转到了工业资产阶级的手中。特别是内战爆发后，随着南部诸州脱离联邦，一系列有利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逐渐付诸实施。

1861 年 3 月，国会顺利地通过了两年前就已提出的莫里尔关税法。接着国会在 1864 年又制定了进一步把进口税率提高到 47%的关税法，有的项目税率达到 100%。实行这些措施既能增加联邦的财政收入，以应付战争开支；又能防止欧洲商品对美国的倾销，从而保证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促进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独立发展。

1862 年，国会通过的“宅地法”，是实现资产阶级土地纲领的重要步骤，它不仅使奴隶制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不复存在，而且加速了西部开发，促进了原料基地和商品销售市场的扩大，推行了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1862 年 7 月，国会通过成立“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法案，责成由这两个公司负责修筑横贯大陆的铁路。为了鼓励私营公司向铁路投资，联邦实行补贴制度。在平原地区修筑每英里铁路补助16,000 美元，丘陵地区每英里补助32,000 美元，山区每英里补助48,000 美元。[①] 铁路公司可无偿地取得铁路两侧 20 英里内的土地，并有权使用国有土地上的木材、石料等。政府还给予铁路公司特殊的银行信贷条件，颁发特许证，允许铁路享有长期或短期免税特权。由此兴起了修筑铁路热潮。

1863 年 2 月，国会通过“国民经济体系法案”，以整顿银行业的混乱，提供全国通货，并保证政府债券获得稳定的市场。内战开始时，美国共有银行1,562 家，分别持有 29 个州颁发的许可

---

① 福克纳：《美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1964 年，下卷，第 154 页。

证，享受五花八门的权利和特权，发行各种流通证券不下7,000种，此外还有5,000种伪钞。[①] 这种情况对资本主义发展显然不利。实行“国民银行法”后，各州立银行相互竞争而造成的币制混乱局面得到相应的控制，保证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金融环境。

1864年7月，国会又通过了“移民法”，并成立一个移民局专管移民事务。该法制定了若干鼓励移民来美定居的条款，如刚到达美国而未加入美国籍者，不能被强制服兵役。“移民法”的实行，使美国获得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仅60年代入境移民就达230万人。“移民法”与“宅地法”互为补充，把吸引移民和开发西部结合起来，既提供了工业赖以发展的原料和劳动力，又扩展了西部的粮仓作用。

此外，联邦政府还采取了开展技术革命、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发展教育事业等政策。这些政策“为迅速的工业增长奠定了法律基础”[②]，同时保证了联邦取得内战胜利的物质基础。

〔战时北部经济高涨与向西部扩张〕　装备和后勤供应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战双方的军力。对战时物质的需求大大刺激了北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1862年后出现了战时经济繁荣。

在工业方面，军械军火、冶铁、毛纺、服装、制鞋、铁路、石油等得到迅速发展。新的工业也不断兴建。仅费城一地，1862年至1864年新建工厂180座。新的技术发明层出不穷。1860年颁发的专利证书为4,363个，到1866年已达8,874个，翻了一番。[③] 铁产量从1861年的73万吨增到1863年的近95万吨。由于

---

① 莫里森等：前引书，上卷，第891页。

② 韦·M·格韦尔：《美国的文明——美国历史》，纽约1957年，第294页。

③ 沃·詹宁斯：《合众国经济进步史》，纽约1926年，第420页。

棉花短缺引起毛纺业兴旺，羊毛消耗量从1860年的8,533万磅骤增至1864年的2.14亿磅[①]。石油增长更为惊人，1859年仅84,000加仑，到1862年已达1.28亿加仑。此外，肉类、炼乳、罐头、蔬菜等食品也应时而兴，发展极快。繁荣的战时工业保证了北部军事实力的不断增长。

在农业方面，也出现了高涨局面。1862年，小麦产量达到了1.77亿蒲式耳的高峰。内战中，北部向欧洲出口粮食的价值达3.3亿美元。这对于促使欧洲保持中立立场起了很大作用。同期的猪肉加工和羊毛产量分别增长了一倍和两倍。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农业机械的不断改进。其中最重要的如麦考密克收割机、阿特金斯自卸收割机、马什联合收割机以及皮特脱粒机等都在内战期间得到广泛使用和不断改进。农业机械既节省了大批劳动力，从而保证了前线的兵员，又使农作物收成不因宕误季节而减产。因此，当时就有人说“战争是麦考密克收割机打赢的。”[②]

早在内战前，加利福尼亚出现的淘金热已给远西部带来了相当数量的人口，形成了科罗拉多、达科他、内华达、爱达荷、俄勒冈等领地，有的发展成为州。1862年“宅地法”实施后，又一次激起涌向西部的人流。在整个内战时期，横越大平原前往西部去务农和淘金者多达30万人。

战时经济高涨及向西部扩张，加速了社会财富的集中过程，资本家由此获得了空前的利润。康涅狄格州的一家军火工厂在1862年的红利为30%；新英格兰一些毛纺织厂接受大量政府订货，分红率也达到10%至40%。[③] 联邦政府为了进行战争共发行

---

① A.M.西蒙斯：《美国历史中的社会力量》，纽约1926年，第276页。

② 西蒙斯：前引书，第278页。

③ 菲特和里斯：《美国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81年，第339页。

公债 28.46 亿美元[①]，银行资本家利用公债投机获得巨大利益，仅杰伊·库克获利就达2,000 万美元[②]。一些企业主利用政府定货之机以劣充好而牟取暴利。军火商哈里斯向政府出售劣质枪，一次就赚得 65 万美元；阿穆尔在一次猪肉买卖中就净挣 200 万美元。还有人甚至与南部进行棉花和武器的走私贸易，或从事海外奴隶贸易。战争中许多企业主和办事人员投机发迹，有些成了百万富翁。摩根、洛克菲勒、卡内基、古尔德、库克等超级富翁的财产基础都是在内战中建立起来的。

〔*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及其斗争*〕　内战期间，联邦政府为了应付战争的庞大开支，采用增加赋税、发行公债和法定纸币等手段大力筹集军费。征税名目繁多，范围甚广，除了对铁路收入、各种交通工具、制造品和银行存款征税外，还对各种生活用品征收消费税，对提货单、保险单、支票及其他证券征收印花税。政府发行公债的利率高达 7%，劳动人民无力购买，大获其利的还是富人。政府发行的绿背纸币不断贬值，造成商品价格急剧上涨，大大超过了劳动者名义工资的增长幅度，1860 年到 1865 年间实际工资下降了 30%[③]。

工人家庭陷入极端贫困之中，他们提出的惟一要求只是物价与工资的平衡。联邦对此未作任何努力，资本家为了聚敛财富，根本不考虑工人的合理要求。工人们只得为了改善基本生活条件而进行罢工斗争。1863 年起，罢工在许多城市展开。仅 1864 年就有约 20 万人参加了各种工会组织[④]。工人运动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大为震惊，各州政府采取了镇压措施来为资本家效劳。

---

①② 比尔德夫妇：《美国文明的兴起》，纽约 1927 年，第 2 卷，第 600 页。

③ 路易斯·M·哈克：《美国传统的形成》，哥伦比亚大学 1947 年，第 2 卷，第 585 页。

④ 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三联书店中译本 1956 年，第 1 卷，第 518 页。

在这种形势下，亲奴隶主的“铜头蛇”势力又活跃起来。他们把自己装扮成工人利益的积极维护者，到处活动，大肆进行反战宣传，说什么让战争继续下去，只会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甚至挑拨说，林肯颁布“解放宣言”是以牺牲白人利益去改善黑人地位的。这些蛊惑人心的宣传蒙骗了部分落后工人。但是大多数工人不仅没有轻信谣言，而且与“铜头蛇”进行了坚决斗争。同时，联邦政府也采取镇压措施，严厉打击“铜头蛇”的反革命活动。

1863 年 3 月 3 日，国会通过了“征兵法”，规定政府将直接征召士兵，凡身体健全，年龄在 20 岁至 45 岁的男子均有服兵役的义务；同时规定，只需缴纳 300 美元，或雇人替换，即可豁免当兵义务。这实际上是只征穷人不征富人的规定。然而，“征兵法”是美国军事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把志愿兵役制改为义务兵役制，每个适龄男子公民都负有这种法律义务。同时，它反映了资产阶级政府要把战斗进行到底的决心，故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到 1863 年底北部兵力已达918,000 人①，充分体现了美国工人阶级的炽热的爱国热忱。

〔战时南部的状况〕　内战促进了北部经济，而对南部则完全相反。内战期间的南部经济陷于困境，逐步走向崩溃。这是南部自身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南部是个巨大的农业区，主要依靠生产棉花、烟草等大宗商品农作物，同北部和欧洲进行贸易交换，从而获取它所需要的工业制成品来维持经济运转；甚至连所需粮食，也得大量来自俄亥俄河以北各州。过分依赖对外贸易成为其致命弱点。内战爆发后，北部对南部实行严密封锁，切断了南部棉花和烟草的出路，使南部既不能从北部市场也无法从欧洲

① 内文斯：前引书，第 2 卷，第 466 页。

市场换取各种必需物品。原来就薄弱的南部工业都转入了军工生产，使南部经济更趋萎缩。

战时南部经济的最大困难是财力不足。南部同盟为了应付繁浩的开支，从 1861 年 3 月起发行小额有息纸币和公债券，此后又一再扩大发行，仅在 1861 年就发行了公债券和纸币各 1 亿美元，到 1864 年底，其纸币流通量已达 20 多亿美元。这造成纸币大幅度贬值，1863 年 3 月，需 60 美元纸币才能兑换 1 美元金币。[①] 经济不景气使公债券难以推销。南部同盟只得实行强硬的重税政策，向南部人民征收所得税、职业税、制酒税和农产品税等。1863 年对农产品征收的税率已是 10%。南部还低价强行征购人民的粮食、马匹、车辆等物资。这些作法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更使南部物资日益枯竭。

粮食匮乏是战时南部的又一大困难。由于粮食进口来源断绝，南部各州不得不大量限制棉花生产而扩大粮食作物的种植。如阿肯色州限定每个劳动力只生产两包棉花，南卡罗来纳州规定每个劳动力只种 1 英亩棉花，亚拉巴马州对超过棉花生产限额者征收超产税[②]。尽管如此，由于奴隶的劳动生产率低下，加上联邦军队不断向南推进，南部的粮食生产水平难以提高。同时，南部运输工具短缺与破旧，进一步加重了南部粮食供应与分配的失调现象。南军在前线往往由于粮食供应不足而贻误战机，影响战局发展。

兵源日趋枯竭也使南部难以继续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南部同盟为得到兵员补充，1862 年 4 月颁布了征兵法，规定在南部实行义务兵制。在 9 月又补充了豁免奴隶主兵役的条款。这一做

① W.E. 伍德沃德：《新编美国史》，纽约 1938 年，第 539 页。

② 查尔斯·A·科尔：《不可抑制的冲突》，纽约 1934 年，第 384 页。

法在南部引起普遍的不满。下层人民纷纷逃避征兵，士兵开小差者日益增多，还多次发生抗征兵役的冲突。南部同盟为了惩处拒不当兵者，悍然停止“人身保护法”，但仍未奏效。据估计，仅在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逃避兵役者达15万人之多；在整个内战期间，南军中开小差的士兵也有20万人①。南部同盟实力不断衰颓。

南部黑人奴隶的反抗斗争也成为南部同盟的一大心腹之患。战争爆发后，奴隶主将更重的生产负担压在奴隶身上，激起奴隶们的反抗。“解放宣言”发表后，广大奴隶深受鼓舞，斗争更加激烈。有的奴隶举行暴动，有的逃奴从隐蔽所袭击奴隶主。据统计，内战期间，至少发生25次黑人起义或密谋②，大约有50万奴隶逃往北部③。南部同盟采取种种恐怖手段来制止奴隶反抗或逃亡，他们烧死、绞死起义奴隶，枪击或砍杀逃亡奴隶，把奴隶迁往“安全”地带严加控制。黑人的反抗斗争对南部同盟的最后瓦解起了重大作用。

战时的南部充满了不可克服的危机。生产落后，经济衰退，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财力、物力、人力日趋枯竭，这些内部因素也决定了南部同盟的失败。

第五节　南部同盟的崩溃和内战的结束

〔1864年的总统选举〕　1864年总统选举是在战争状态下进行的，受到激烈的政治斗争及战争形势的影响，呈现出十分复

---

① 科尔：前引书，第294、298页。

② 刘祚昌：《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458页。

③ 刘祚昌：《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461页。

杂的局面。

当年6月，共和党继续提名林肯为总统候选人。但因前线状况不佳，格兰特在荒野—冷港战役中无所建树，谢尔曼在亚特兰大前线不断受阻，林肯本人在关于战后南部重建问题上，与激进派发生分歧，在共和派内部产生了一个反对林肯的运动。一个名叫约翰·福布斯的大资本家攻击林肯说："林肯是一个衰弱的总统，他缺乏活力、决心、果敢，由于这些原因，国家受了苦难"①。他提出让萨蒙·蔡斯替换林肯当总统候选人。而蔡斯本人也辞去了内阁职务，与一些反对林肯的人结成同盟。一些激进派人士也因林肯否定他们的重建建议而攻击林肯"蓄意侵犯人民的立法权限"，到处鼓动人们重新考虑林肯的候选人资格②。

共和党的内部分歧给民主党创造了机会。他们大肆进行反战宣传，煽动对黑人的种族仇恨和对战时物价上涨的不满，并对林肯大肆诋毁。他们甚至提名麦克莱伦为总统候选人。形势变得对林肯很不利，连一些最坚定拥护林肯的人也劝林肯以议和求得妥协，以便争取再度当选总统。但是，林肯坚决否定了这一建议，他认为这种行动无异于投降。

随着前线战局的变化，政治形势渐渐变得对林肯有利。南部同盟总统戴维斯顽固坚持分裂联邦的立场，拒绝议和。这使共和党内反对派和北部民主党人的反战宣传失去了依据和市场。9月10日，谢尔曼在亚特兰大前线连连报捷，又进一步增强了林肯在竞选中的地位。11月8日，林肯终于战胜麦克莱伦，再度当选为总统。

---

① 史密斯：前引书，第516页。

② 史密斯：前引书，第521—523页。

林肯当选后，立即吁请国会考虑通过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把解放奴隶的措施以宪法形式确定下来。他在12月致国会的咨文中，明确表示了他本人在解放奴隶问题上坚定态度。他说："在我继续留在目前的地位时，我不打算撤回或修改'解放宣言'，也不会把根据这个宣言或国会的任何法案而获得自由的任何人送回去重新当奴隶。"① 为了使修正案在国会获得2/3的多数票，林肯做了大量工作。1865年1月1日，众议院进行最后表决，终于以119票对56票通过。年末，第十三条修正案获得3/4以上州的批准而正式生效。万恶的奴隶制终于被埋葬了。国会还在1865年2月通过了成立自由民局的法案，由该局承担安置管理已获得解放的黑人的职责。

〔南部同盟的最终失败及其原因〕　内战的进程证实了林肯的预言："戴维斯不可能自愿地重新接受联邦，我们也不可能自愿地放弃联邦。"② 尽管南部同盟在战场上仍顽强抵抗，企图取得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地位；但形势对南军越来越不利。1865年2月，谢尔曼大军又发动了新的攻势。他们从萨凡纳北上，准备横扫南、北卡罗来纳，在敌后打一场经济破坏战，然后在弗吉尼亚与格兰特大军会师。谢尔曼部的恐怖政策，使南部奴隶主胆战心惊，望风披靡。17日，谢尔曼进占南卡罗来纳州首府哥伦比亚，次日又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查尔斯顿。3月16日，约翰斯顿试图在北卡罗来纳拦截谢尔曼部，两次受挫。4月中旬，谢尔曼攻克北卡罗来纳州首府罗利，胜利完成了第三次大进军。

与此同时，格兰特大军在波托马克河战区也不断取得新战果。1865年3月中旬，格兰特的115,000大军已把罗伯特·李的

① 斯特恩：前引书，第834页。
② 莫里森等：前引书，第925页。

54,000人围困在彼得斯堡。南军作最后抵抗，仍无法招架联邦军的强大攻势，不得不于4月2日撤出彼得斯堡。里士满陷入一片混乱，奴隶主们纷纷携眷逃窜。4月3日，联邦军队终于开进了被叛乱集团盘踞近4年的里士满。

罗伯特·李试图与约翰斯顿会合后继续顽抗，但前后都被联邦军堵住。4月8日，罗伯特·李的残部在距里士满80英里的阿波马托克斯小村被7万联邦军队包围。这支残军仅3万人，弹尽粮绝，完全丧失抵抗力量。罗伯特·李见大势已去，遂于4月9日向格兰特投降。这意味南北战争的军事对抗基本结束。至5月末，南军最后一支部队在新奥尔良投降。内战终于以北部彻底胜利而告终。

历时4年的内战以北部工业资产阶级的胜利而告终，他们从此巩固地掌握了联邦政权，合众国的完整性得以保存，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障碍奴隶制度被扫除，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美国工业在30年内跃居世界领先地位。

南部同盟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南部奴隶主阶级逆历史潮流而动，无论在人心所向，还是在物质基础方面，都不能与北部相匹敌。南部的奴隶主寡头政治难以形成卓有成效的政治机构，更缺乏精明睿智的政治家。南部军事将领是一些视野狭窄的旧军人，不了解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更不善于采用先进的参谋体制和战争手段。所有这些不利因素本质上是南部的反动社会制度所造成的。

〔林肯被刺及对林肯的历史评价〕　罗伯特·李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后的第三天，林肯发表了他一生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说。他重申了对南部重建问题的意见和政策，其主导思想就是要对失败的南部采取宽大的政策。他提出南部只要有10%的白人举行忠诚宣誓并组成州政府，即可重新加入联邦。林肯甚至拒绝逮捕

内战元凶戴维斯及其内阁成员，并主张不要迫害或杀害过去的敌人。

然而，失败的南部奴隶主并没有对林肯的宽容表示感激。相反，他们因失败而仇恨倍增。1865 年 4 月 14 日，林肯召开了他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决定取消对南部的封锁。当晚，林肯偕夫人来到福特剧院，参加庆祝胜利的晚会。当林肯走向包厢时，在场的一千多名观众起立热烈鼓掌和欢呼。就在林肯观看演出时，一个顽固支持南部叛乱事业的演员约翰·威尔克斯·布思混进了林肯的包厢，在背后向林肯射出了罪恶的子弹。翌日清晨，林肯在邻近剧院的一家私人寓所内与世长辞。陆军部长斯坦顿以极端悲痛的心情说："他现在是属于所有时代的人物了。"

林肯逝世在国内外引起巨大悲痛和震动。150 万人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了林肯的遗容，自动出来致哀的人达 700 多万。许多国家的进步人士和劳动人民也纷纷举行哀悼仪式，发表演讲和宣言，表达对林肯的敬仰和怀念，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吊唁信中也对林肯作了崇高的评价。

林肯受到如此广泛的崇敬与赞美，确实当之无愧。他在美国自由劳动制度与奴隶制度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领导美国人民进行一场维护进步与统一的斗争，平息了奴隶主的叛乱，消灭了奴隶制度，推动了美国社会的发展。

林肯坚持奉行一切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倡导"民有、民治、民享"，其思想闪烁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光辉。他坚定不移地反对奴隶制度，"解放宣言"这一废除奴隶制的历史文献，已永远同林肯的名字联在一起了。

林肯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伟大的政治家品质。他不仅善于审时度势，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政策；而且能倾听人民的意见，从而在内战中能调动各方面力量，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逐步

引导斗争走向胜利。

林肯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他勤奋好学、谦虚诚实、克己奉公、平易近人等优秀品质，博得人们的普遍尊重和敬仰。

林肯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不可避免地带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例如，他反对奴隶制度，但最初不愿无条件地解放黑人，最终也未从经济上给奴隶以彻底解放，还打算将“解放了”的黑人送往国外。尽管如此，在内战时期错综复杂的环境下，林肯为达到革命目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顺应了历史潮流，不失为一位建树甚丰的伟人。总之，他以其杰出的历史贡献，在美国历史上，直与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齐名。

第 二 章

南部的重建

内战摧毁了奴隶制，美国历史进入重建时期。重建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南部各州如何返回联邦，实现统一；二是刚刚获得解放的黑人应有的权利和地位是什么。

林肯遇刺身亡后，继任的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推行了一套更为宽大的重建纲领。南部各州（除得克萨斯外）据此在剥夺黑人选举权的基础上建立起由南部同盟旧官员控制的州政府。这种保守政策遭到共和党激进派和人民的坚决反对。1867 年 3 月，国会通过激进重建纲领，对南部各州实行军事管制，进而建立民主政权，并实施一系列民主改革。然而，北部资产阶级地位的日益稳固导致共和党妥协倾向加强，加之两党在全国范围内势均力敌的局面再度形成，结果造成 1877 年南、北妥协。重建遂以牺牲黑人利益、民主党在南部重新执政而告终。

重建后南部农业中盛行的谷物分成制和工业经济的畸形发展，使南部对北部垄断资本的依赖性不断增强，并在不同程度上妨碍了南部经济的发展。重建后，种族势力也再度抬头。南部各州相继制订一系列法律，致使黑人选举权名存实亡。种族隔离也日趋严重，使黑人的处境雪上加霜。在寻求黑人的出路的斗争

中，塔斯克基运动所倡导的黑人自救路线独树一帜，颇有声势。但种族问题仍然是南部一大痼疾。

第一节　约翰逊重建纲领及其实践

〔林肯重建计划与韦德—戴维斯法案〕　内战后期，共和党内各派已开始考虑对战后南部各州的处理和改造问题。保守派认为，只要南部各州停止分裂和叛乱，废除奴隶制，服从宪法并承认联邦统一，即可恢复其在联邦中的合法地位。激进派则认为，南部各州发动叛乱，已自绝于联邦，丧失了“州”的地位；应作为被征服的省份加以管制，对其主要头目和骨干分子应严厉惩办；必须剥夺叛乱分子的选举权，保证黑人选举权，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州政权方可加入联邦。

林肯作为整个北部资产阶级的代表，始终坚持他对解决南北冲突的一贯立场，即以最大限度的宽容来取得南北和解、恢复联邦统一。1863 年 12 月 8 日，林肯发表《重建与大赦宣言》，提出了他的南部重建纲领。其中包括三个要点：其一是除了南部同盟重要官员和重要军官（陆军上校、海军上尉以上者）、叛乱中罪行严重者和联邦政府军队的叛离者外，其他参与叛乱者在宣誓效忠联邦并承认废除奴隶制后，即可获总统大赦，并恢复其除奴隶外的一切财产权。其二，宣誓效忠的人数不少于 1860 年的 10%时，即可举行选举，产生新的州政府和参加国会两院的议员。其三，新的州政府只要撤销分离决议，承认联邦统一并废除奴隶制度，即可恢复在联邦的平等地位和正常关系。根据这个纲领，大多数叛乱者都将得到赦免并获得政治权利；奴隶主的财产基本上得到保存；而广大黑人既未获得土地也没有选举权，仍处在听任宰割的地位。

林肯重建计划在路易斯安那、阿肯色、田纳西等州付诸实施后，立即遭到激进派的坚决抵制和反对。1864年5月至7月，国会众参两院先后通过激进派重建法案即韦德—戴维斯法案。该法案比林肯重建纲领前进了一步。它提出南部各叛乱州不存在合法政府；各州进行效忠宣誓、组成新政府，制定新宪法的选民基础必须是多数而不是10%；剥夺南部同盟旧官员的选举权和土地所有权。但是，这个法案同样没有赋予黑人以选举权和土地所有权。即使如此，林肯依然否决了这一法案。法案的起草者本杰明·韦德和众议员戴维斯立即发表联合声明，指责林肯是侵犯人民立法权的"独裁者"。同时，国会拒不承认路易斯安那等州政府的合法性，不许它们的代表进入国会。于是，总统与国会在重建问题上的斗争日趋明朗化。由于战争尚未结束，共和党又面临着1864年选举，这场斗争暂时地平息了。

〔约翰逊及其南部重建纲领〕　1865年4月15日，即林肯遇刺身亡的当天，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宣誓就任总统。约翰逊原是田纳西州的政治活动家，曾任国会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他代表南部小农的利益，呼吁废除奴隶主寡头政治。内战爆发后，他站在反对叛乱、维护联邦统一的立场上，成为南部叛乱州惟一忠于联邦的参议员。约翰逊曾多次主张严惩叛乱分子，没收并出售他们的大地产。他的立场赢得北部资产阶级的信任，并在1864年被林肯挑选为副总统。当时激进派也把改变林肯重建计划的希望寄托在约翰逊身上，甚至认为由他继任总统是"一件意外的幸事"[①]。然而，约翰逊反对奴隶主寡头政治的出发点，只是为了维护和扩大南部小农的利益。内战结束后，美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而约翰逊却看不到工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联

---

① J.G. 兰德尔和戴维·唐纳德：《内战与重建》，波士顿1961年，第568页。

邦权力日益集中的必然趋势，依然墨守19世纪初杰斐逊—杰克逊“以农立国”的旧传统，幻想恢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同时，约翰逊保留着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认为黑人地位提高是对白人小农的威胁。因此，他不惜以牺牲黑人利益与战败的南部种植园主谋求和解。

1865年5月29日，约翰逊公开发表《大赦宣言》。宣布按照林肯的《重建与大赦宣言》，除了不予赦免的14种人外，一切直接或间接参加叛乱者概予赦免，并恢复其除奴隶之外的一切财产权。《大赦宣言》与林肯重建计划有着明显的继承性。不同之处在于，它不赦免拥有纳税财产2万美元以上的叛乱者；同时，它赋予总统以特赦权，对于不在大赦之列者，提出特别申请后，总统有权予以特赦。这说明约翰逊的重建政策比林肯的更为宽大。事实上，约翰逊几乎宽恕了绝大部分南部叛乱者。《大赦宣言》发表后，提出特赦要求的人约有15,000，其中获得总统特赦者竟达13,500人，占申请总数的90%。而在被特赦的总人数中，纳税财产在2万美元以上者又达50%。可见，约翰逊关于不予特赦的14种人的规定只是纸上文章。尤其是，约翰逊在一项指示中明确提出，对于“有罪的黑人”一个也不予赦免；而各州的制宪大会代表则应完全由白人选出[①]。这表明约翰逊对黑人怀有强烈的憎恨和敌对情绪。

约翰逊为了避免国会干预，利用1865年国会休会期间加紧推行其重建纲领。在《大赦宣言》发表后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先后发表了有关南、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密西西比、得克萨斯、亚拉巴马和佛罗里达7个州的重建宣言，并任命了各州的临时州长（其他4个南部州已在林肯任内得到承认）。各州也积极执行

① 佩奇·史密斯：前引书，第669—670页。

约翰逊的重建纲领。到1865年末，这些州在根本不让黑人参与的情况下，产生了州宪法、议会和政府，选出其参加国会的参众议员。这些州政府和立法机构基本上操纵在南部同盟旧官员和种植园主手中。它们选出的国会议员中，包括原南部同盟的副总统1人，将军4人，上校5人，内阁成员6人，国会议员58人。[①]南部同盟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原关押在狱，获特赦4个月后，即被佐治亚州选为联邦国会参议员。这些事实证明，约翰逊的重建计划"几乎是根据前南部同盟各州所坚持的条件重新接纳它们进入联邦。"[②]

南部各州新宪法虽然宣布撤销"脱离法案"，废除奴隶制度。但在批准联邦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时，许多州都迟疑不决或提出各种保留条件，试图否认黑人的平等权利和国会关于黑人政治地位的立法权限。在第39届国会开幕前，仅亚拉巴马，南、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4个州批准了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南卡罗来纳还附带声明说：国会关于黑人政治地位的任何立法企图都是违宪的。其他一些州也对此提出保留条件。而密西西比州在修正案生效前一直未予批准。

〔"黑人法典"和三K党〕　约翰逊重建纲领在南部各州的实施，一度造成南部政治出现倒退和反动。逃亡的种植园主纷纷返回故地，夺取被黑人分掉的土地，向政府索取被没收的财产。到1867年2月，联邦政府退还给种植园主的地产和其他财产总值达20亿美元。各州在批准第十三条修正案的同时，都先后制订了以战前奴隶法典为蓝本的"黑人法典"。"黑人法典"以限制黑人自由和民主权利，达到继续保持白人对黑人种族统治的

---

① W.A.杜波依斯：《美国黑人的重建》，纽约1917年，第260—261页。

② 史密斯：前引书，第670页。

目的。在政治方面，黑人没有选举权、参政权和陪审权，也无权出庭提供不利于白人的证词。在经济方面，黑人不得拥有土地，无权自由选择职业和从事独立的经济活动，只能根据合同继续在种植园主的土地上从事强制性劳动；黑人在合同期满前不得擅自离去，否则将因“流浪罪”而遭拘捕，并为种植园主提供无偿劳动。在人身自由和基本权利方面，黑人无权自由迁徙和选择居住地点，有些州还专门划定了黑人居住区，并实行特别通行证制度；严禁黑人与白人通婚，违者将被判“重罪”或受到终身监禁。在这方面的隔离规定，此后又演变为臭名昭著的“吉姆·克劳法”①。

在黑人居多数的各州，“黑人法典”更为严酷。南卡罗来纳州“黑人法典”规定，黑人除根据劳动合同在种植园的土地上从事耕作外，一律不准从事医务、艺术、工商业及其他行业或职业。有的州甚至规定，黑人不得随意接近白人，也不得以表情、语言和行为“侮辱”白人；而雇主则有权对黑人实行体罚和鞭笞。失业黑人游民随时可能遭到罚款或监禁的惩处。

“黑人法典”在实际上否定了黑人的解放，拒不承认黑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使种植园主能够继续奴役黑人。它用法律手段把黑人束缚在种植园的土地上，为种植园保证了廉价劳动力。“黑人法典”不是一种临时性的过渡措施，而是种植园主妄图长期奴役黑人的永久性措施。

南部各州在制定“黑人法典”的同时，还纵容白人种族主义者建立各种恐怖组织，其中最主要的是三K党②。三K党最早出现在1866年夏，由原南部同盟6名退伍军官在田纳西州的普拉

---

① “吉姆·克劳法”是19世纪末南部各州制定的种族隔离法的总称，参看本章第四节。

② 三K党是英文 Ku Klux Klan 的缩写，原是希腊文“党派”之意。

斯基所建立。不久即扩展到亚拉巴马、南、北卡罗来纳及其他南部各州，成为美国历史上活动最广泛、手段最残酷的恐怖组织，也是南部民主党所支持的半军事组织。三K党有一套自上到下的严密组织系统，其骨干分子大多是前同盟官兵，他们怀着复仇的心理，采用种种手段，企图迫使已获解放的黑人就范。

在约翰逊任内，三K党和南部反动势力迫害、杀戮黑人和激进派的事件屡见不鲜。1866年4月，孟菲斯发生黑人与当地警察的冲突，白人暴徒借机向黑人居住区发动疯狂袭击。在持续3天的烧杀劫掠中，46名黑人被杀，80多人受伤，9家黑人住房和12所学校被焚毁，价值10万美元的黑人财产被付之一炬。[1]同年7月，在新奥尔良发生一起更为骇人听闻的残杀黑人事件。当地黑人和激进派举行反对“黑人法典”的群众大会，突然遭到由前同盟将军谢里夫率领的大批白人暴徒袭击，与会群众“像猎物一样地遭到屠杀”，结果48人死亡，160多人受伤[2]。南部其他地方也不断发生类似的流血事件。

南部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暴力恐怖，激起广大黑人和北部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他们不断向约翰逊政府告急，要求惩处恐怖组织，保护黑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但是，约翰逊政府对这些呼吁置之不理，对三K党恐怖活动也无动于衷。约翰逊的这种为虎作伥态度，使南部反动势力气焰更为嚣张。重建面临着夭折的危险。

第二节　激进派反对约翰逊重建纲领的斗争

〔南部黑人争取基本权利的斗争〕　以民主方式满足黑人

① 史密斯：前引书，第707页。
② 史密斯：前引书，第708页。

的土地要求，不仅是保证黑人基本权利的前提，也是南部民主改革的关键。1865年国会通过立法建立的“自由民局”，归陆军部领导，原定期限为内战结束后一年为止，其主要任务是负责救济、安置和监护黑人与白人难民，向黑人出租无主土地。但是，这个机构根本无力解决黑人的土地问题。因归它管理的土地总数仅10万英亩，而且有一部分用来资助铁路公司及其他土地投机者。因此，刚刚获得人身解放的黑人，只有通过自己的斗争来取得土地和其他权利。

1865年秋以后，各地黑人普遍拒绝与种植园主签订劳动合同。在一部分激进派的鼓动下，他们要求每人分到40英亩土地和一头骡子。南部各州不断发生自发占地事件以至小规模武装冲突。在弗吉尼亚州的汉普顿附近，数千名黑人在内战中自发分掉了逃亡奴隶主的土地，并在当地定居下来。1865年夏，这部分黑人举行代表大会，要求政府承认他们对业已分得土地的所有权。他们还积极准备进行武装斗争，结果被政府镇压下去。

当时黑人斗争的另一个突出事例，就是南卡罗来纳州埃狄斯托海岛上黑人保卫土地的斗争。1865年1月谢尔曼将军曾发布战地命令，将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州沿海岛屿定为黑人自由民居住区；每户黑人可分得被没收、被弃置的耕地40英亩。由此在沿海岛屿与沿岸30英里之内定居的黑人约有4万名。约翰逊重建纲领实施后，逃亡奴隶主纷纷返回原地，要求黑人退还土地。黑人们决心保卫已分得的土地，要求联邦政府承认黑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并且使用一切可能得到的武器将自己武装起来。约翰逊总统竟不支持黑人的正当要求，却派自由民局局长奥利弗·霍华德随同两个大种植园主来到埃狄斯托海岛，向黑人讨还土地。种植园主的无理要求遭到黑人的严词拒绝，一位黑人领袖要他们

“回到查尔斯顿去……用自己的劳动谋生”[1]。此后，武装起来的黑人两次赶走前来海岛帮助种植园主索还土地的部队，海岛形势的尖锐化，使政府不得不派遣联邦军队去控制局势。国会激进派也曾多次提出没收大地产、将土地分给黑人的方案，但终未得到共和党的多数支持。其原因在北部资产阶级害怕没收种植园土地会影响北部私有制的稳定，从而危及其自身利益；为数不少的共和党人已成为南部的大土地所有者。史蒂文斯、萨姆纳等人曾多次呼吁，仍无济于事。同时，由于海岛黑人誓死不肯放弃已获得的土地，国会只得在1866年7月通过法案延长自由民局的存在期限并扩大其权限。尽管约翰逊一再否决，国会还是通过了解决海岛土地纠纷的妥协方案。根据此方案，联邦政府确认黑人在该地区已占土地的所有权；以低价向被剥夺土地所有权的黑人出售公有土地，或者黑人以先租后购的方式得到土地；在黑人收割之前，种植园主不得收回土地。该法案是重建时期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最民主方案，它是海岛黑人为保卫土地所有权而勇敢斗争的结果。

南部黑人还展开了反对约翰逊重建纲领和种族压迫政策的斗争。1865年至1867年间，他们广泛举行集会、递交请愿书等，揭露和控诉南部各州歧视压迫黑人、特别是三K党迫害黑人的严重罪行。在1865年11月南卡罗来纳州黑人代表会议交国会的备忘录中，强烈抗议“黑人法典”的出笼，要求全面维护黑人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面的正当权益。它要求给黑人以平等的选举权，保证黑人享有就学、信教、办报、集会以及参加陪审团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享有自由出卖劳动力及从事农业、商业、贸易等各种经济活动的权利[2]。1866年初，黑人领袖道格拉斯代表

---

① 詹姆斯·艾伦：《美国改造时期》，纽约1937年，第61页。

② 艾伦：前引书，第228—229页。

20个州的黑人会见约翰逊，强烈要求给黑人以选举权。但是约翰逊总统借口防止“种族战争”，拒绝了黑人的正当要求。

在弗吉尼亚的里士满，黑人争取权利的斗争取得了成效。《大赦宣言》发布后，里士满的旧官员大批恢复原职。他们颁发黑人特别通行证，并下令关闭刚刚办起的黑人学校。1866年7月，里士满黑人集会抗议当局的反动政策，并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抨击了当局的倒行逆施。在黑人的顽强斗争之下，里士满市长被迫下台，某些压迫黑人的法律亦被取消。这次斗争在各地黑人争取民主权利的浪潮中十分突出，因而影响亦很广泛。

有些州的黑人在联邦军队黑人团队的帮助下，建立了以退伍士兵为核心的黑人民兵组织，同三K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经常给三K党恐怖组织以报复性打击。但这时期黑人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和平的合法斗争，个别地区的武装斗争仅仅是合法斗争的补充形式。

〔国会激进派的力量增长〕　在南部重建问题上，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分成三个政治派别：保守派、激进派和温和派。

保守派主要是那些与南部种植园经济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商业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畏惧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担心自己在南部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因此，他们支持约翰逊的重建纲领，谋求与南部种植园主的和解。

激进派则是新兴的北部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①]。在政治上，他们要求维护共和党人在国会中的优势地位；在经济上要求奉行

---

① 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是宾夕法尼亚的钢铁制造商，与北太平洋铁路公司有密切联系。罗斯科·康克林（第十四条修正案起草人之一）是银行家和金融集团的律师。本杰明·韦德同西部制造商和羊毛厂主有密切联系。查尔斯·萨姆纳则是纺织工业和公债券持有者利益的代表。参见肯尼恩·M·斯坦普：《重建时期，1865—1877年》，纽约1965年，第95—96页。

保护主义的高关税政策和紧缩货币政策，保护制造商和公债持有者的利益。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把选举权给予南部黑人并得到他们的选票支持，才能削弱民主党人的政治势力，防止他们在国会中东山再起；进而保证共和党有效地控制联邦政权，推行有利于工业资产阶级的政策。史蒂文斯警告说，没有黑人的选举权，南部的低关税政策将卷土重来。萨姆纳则说得更明确，认为黑人是推行激进派政策最可靠的保证，因而要利用他们。[①] 可见，激进派之所以主张赋予黑人选举权，固然出于民主信念，而这种信念的真正出发点并不仅仅是为了黑人的权利，而是牵涉到北部资本的自身利益。

温和派是介于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的一个不稳定集团。他们既担心南部民主党人与北部民主党人联合而取得国会多数席位，又不愿意恶化同约翰逊总统的关系。故在许多问题上取折中、调和的立场。由于这是当时国会中最大的一个派别，所以他们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约翰逊刚开始推行其重建纲领时，激进派在国会中仍是少数。仅仅有史蒂文斯、萨姆纳和韦德等少数人意识到这个纲领的危害性及同约翰逊斗争的重要性。而大多数共和党人（包括许多激进派人士）对约翰逊总统仍抱有幻想，在激进派与总统斗争时，采取观望、等待的态度。温和派领袖卡尔·舒尔茨在要求约翰逊承认黑人应获选举权的同时，又劝萨姆纳等人不要与总统决裂。甚至连激进派人士约翰·福布斯也表示充分相信约翰逊，认为他仇恨奴隶主贵族统治，不会允许寡头政治重新复活并支配政权。[②] 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议员核心小组还竭力主张总统和国会

---

① 斯坦普：前引书，第96页。
② 同上书，第84页。

“双方放弃各自的极端主张”，一致制定温和的长期性重建措施。上述情况说明，在重建问题上，激进派还未能控制国会的多数。直到 1866 年 2 月，约翰逊否决了关于延长自由民局存在期限的法案时，国会还无法取得 2/3 的多数票来驳回总统的否决。

然而，约翰逊的重建纲领导致南部政治形势逆转，特别是制定“黑人法典”、否决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以及三 K 党的猖狂进攻等恶性事件的出现，使国会多数共和党人开始向激进派靠拢，从而改变了国会的力量对比。他们认识到，重新执政的南部各州民主党人，根本不肯承认内战的结局和黑人的解放；而约翰逊的重建纲领只能助长南部形势恶化，进而导致民主党人重新取得联邦政权。约翰逊在政治上的狭隘固执，性格上的刚愎自用，也引起了温和派共和党人的反感。一些有影响的温和派代表人物莱曼·特朗布尔、约翰·谢尔曼等，也认为约翰逊背叛了他们。约翰逊甚至歇斯底里地对激进派进行人身攻击，结果是适得其反，使自己空前地孤立起来。1866 年国会选举中，激进派取得决定性胜利，稳固地掌握了两院的 2/3 多数票。

〔公民权利法案与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　1865 年 12 月 4 日，第 39 届国会正式召开。这时南部各州按照约翰逊重建政策选出的代表已在叩击国会的大门。但是，由于激进派和温和派的抵制，国会参众两院均拒绝接纳南部代表。在史蒂文斯的倡导和温和派的支持下，12 月 26 日，由 9 名众议员和 6 名参议员组成国会联合重建委员会，其主席是威廉·弗森登，但真正起领导作用的是史蒂文斯。委员会的任务是对南部政治局势和各州的重建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就南部各州选出的国会议员进入国会等问题提出报告。名义上这是一个咨询机构，实际上是国会领导重建工作的核心组织。保守派吉迪恩·韦尔斯称之为激进派的“中央

理事会”。[1] 同时，国会还作出一项重要决议，强调重建的领导职责属于国会的权限，而不在总统职权范围之内；总统所采取的一切步骤都是临时性的。国会的上述措施不仅挫败了约翰逊立即接纳南部各州重返联邦的计划，否认了南部各州政府的合法性，而且使约翰逊失去了控制重建工作的领导权。

针对南部诸州剥夺黑人权利的“黑人法典”，参议员特朗布尔在 1866 年 1 月提出了公民权利法案。法案规定，除了不纳税的印第安人以外，合众国所有合法居住者，不论其种族、肤色和居住地点，亦不论是否曾为奴隶，一律被认为美国及其所在州的公民，并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任何州和任何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法律、命令、惯例等为借口来剥夺公民应享有的权利。凡违反该法案者均属犯罪行为，应受到罚款或监禁。政府有权在必要时使用武装力量来保证法案的实施。经过一系列激烈辩论，国会两院终于在 3 月 14 日通过该法案。约翰逊总统借口法案“偏袒”黑人，“侵犯州权”和干涉劳资关系而加以否决。但是国会在 4 月 9 日又以 2/3 多数驳回了总统的否决。这就为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制定铺平了道路。

在公民权利法案的基础上，4 月 30 日史蒂文斯以联合重建委员会的名义在众议院提出联邦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国会两院经过一个多月的辩论，于 6 月 13 日通过修正案，交与各州批准。最后通过的修正案删去了原草案中关于无条件地、普遍地赋予南部黑人选举权的要求，但在总体上仍体现了公民权利法案的基本精神。

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合众国的所有合法居住者都是美国公民，各州不得制定或施行剥夺合众国公民的特权与豁免权之法律，也不得剥夺公民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各州在国会的众议

---

① 杜马·马隆编：《美国传记词典》，纽约 1961 年，第 5 卷，第 85 页。

员名额根据其人口进行分配;剥夺部分叛乱者的参政权;宣布南部同盟和各州的战争债务无效,也不得因丧失奴隶而付与奴隶主任何补偿。修正案实际上对南部的政治重建作了总的政策规定。

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不仅对重建具有重要意义,且对美国此后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作用。首先,修正案未对黑人选举权作出无条件的规定,却在第二款中含有另一层语义即南部各州如宁愿减少在国会中的代表名额,即可合法地剥夺黑人选举权。同时各州的所谓"正当法律程序",为剥夺黑人的其他权利留下了一条"合法的"后路。其次,修正案对所保护对象的用辞不是"任何公民"而是"任何人",这既可被解释为"自然人",也可是"法人"。因此这项条款后来被司法机构用作保护垄断企业的法律依据,因为任何一个公司都是"法人"。事后,修正案起草人之一、众议员约翰·宾厄姆在国会演讲中直言不讳地承认使用这一措辞的目的就是为了铁路公司的利益。[①] 因此,这项表面上保护南部黑人生命财产的条款,却成了大公司的护身符。1868 年至 1912 年,最高法院根据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判处的 604 个案例中,有关公司法人的达 312 件,而涉及黑人权利的仅 28 件,其中的 22 件判决不利于黑人。

即使如此,约翰逊总统仍然抵制修正案,并怂恿南部各州拒绝批准。除了激进派共和党人控制的田纳西州以外,南部各州以得克萨斯首先发难,先后作出决议否决第十四条修正案,直至 1868 年实行南部军管后才予以批准。

〔激进派重建纲领的产生〕　1866 年国会选举后,激进派稳固地掌握了两院的 2/3 多数。1867 年 2 月,史蒂文斯以重建委员会的名义提出了第一个激进派重建方案,旋即在众议院通过,

---

① 比尔德夫妇:前引书,第 2 卷,第 111—112 页。

但在参议院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激进派被迫作出让步后，才于3月初获得通过。此方案主要内容是：否认除田纳西州以外的南部各州政府的合法性；将南部10州分为5个军区，实行军管，在合法政府建立前，由军区司令执掌行政与司法权；剥夺一切叛乱分子的选举权和参政权；由不受种族、肤色和过去社会地位限制的选民选举产生制宪代表大会，以合众国宪法为依据制定或修改州宪法；各州根据新的州宪法产生议会和州政府，在州议会批准第十四条修正案，州宪法获得国会承认以后，即可派代表出席国会参众两院，军管遂告结束。

同一天，国会还通过了官职任期法案和军队指挥权法，旨在限制总统权力、保证重建方案的实行。前者规定，未经参议院同意，总统无权罢免在参议院赞同下已任命的政府文职官员（包括内阁成员），也不得擅自任命新官员；否则总统即被认为犯有"重罪"。在此前，宪法并未明确规定政府官员的任免权限，而根据惯例总统可享有任免权。激进派提出这项法案，是为了防止总统破坏激进派重建，尤其是保护惟一支持激进派的内阁成员、陆军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军队指挥权法案规定，总统不经过陆军上将（当时是尤利塞斯·格兰特），无权向军队直接发布命令和指示；未经参议院同意，亦无权罢免或停止陆军上将的职务。这项法案进一步架空了总统，以至取消了宪法赋予总统作为陆海军统帅所享有指挥军队的权力。这两个法案与第一个重建法案配套，为实行南部军管准备了条件。

第一个重建法案是激进派共和党人在南部进行民主重建的纲领性文件。它较严格地限制了南部叛乱者的选举权和参政权，同时无条件地承认了黑人的政治权利，在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广大黑人中得到了热烈的拥护。而约翰逊对这个法案的否决，以及国会以2/3多数推翻总统否决，说明激进派与总统间的矛盾无法获

得妥协。

第一个重建法案缺乏方法、步骤上的具体规定，所以国会又先后通过三个补充性的重建法案。1867 年 3 月，第二个重建法案规定，各州军管当局首先进行选民登记和宣誓，在多数选民赞同的基础上，召开制宪大会并通过州宪法。同年 7 月，第三个重建法案规定由选民登记官审查和确定选民资格；各州临时政府必须服从军管当局和国会的最高权威；军区司令有权罢免不效忠联邦的州级官员。1868 年 3 月，第四个重建法案规定，南部各州新宪法只要得到实际参加投票人数的多数票支持即可生效。上述补充法案都曾遭到约翰逊总统的否决，国会又都以 2/3 多数再次通过。

1867—1868 年国会制定的一系列重建法案及其他有关补充法，全面确定了激进派共和党人的重建纲领及具体计划。它们标志着激进派在与总统的斗争中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反映了整个阶级力量对比中，北部工业资产阶级居于优势地位。而南部的白人小农势力单薄、软弱无力；种植园主尚无东山再起的条件。于是，整个局势控制在激进派手中，它的重建法案因而得以迅速推行。

〔激进派弹劾约翰逊总统〕　约翰逊总统对激进派重建纲领及其补充法案极为不满。他认为这些法案均属违宪，应诉诸最高法院，并采取反击措施。

1867 年 6 月，约翰逊不顾军队指挥权法的规定，直接向南部 5 个军区发布旨在削弱司令官权力的命令，以加强各州政府权力。接着又陆续解除或调离了所有同情和支持激进派的军区司令。例如，他以自己的追随者、南部同盟的同情者温菲尔德·汉考克接替了菲里普·谢里登，后者在任第五军区司令时深得民心。

1867 年 8 月，约翰逊无视官职任期法，下令“停止”惟一

支持激进派的内阁成员、陆军部长斯坦顿的职务。斯坦顿在萨姆纳等人支持下拒绝离职。约翰逊则坚持由格兰特担任临时陆军部长。12月，约翰逊将任免陆军部长的决定送交国会。参议院在1868年1月正式拒绝了约翰逊总统的决定。格兰特此时看到形势突变，也改变了支持约翰逊的态度，立即把陆军部长职务重新交给了斯坦顿。约翰逊对格兰特的这一行为极不满，双方关系急剧恶化，格兰特遂倒向了激进派。约翰逊不甘失败。1868年2月，他再次任命洛伦佐·托马斯少将为临时陆军部长。托马斯受命强行接管陆军部，斯坦顿拒不离职，约翰逊控制陆军部的计划亦告失败。

约翰逊无视国会立法，尤其是两次无端下令免除斯坦顿的行动，极大地激怒了大多数共和党议员。因此，准备对约翰逊发动弹劾。约翰逊对此表示蔑视，并且在其年度咨文中宣布，他“将不得不坚持自己的权利，而且将不顾一切后果地维护这种权利”。[①] 在这种形势下，众议院于1868年2月24日以126对47的压倒多数票决定立即发动对约翰逊的弹劾，并组成了以史蒂文斯为首的七人委员会。3月初，众议院通过该委员会提出的弹劾文件，其中列举了11项罪状，主要是蓄意违反“官职任期法”，罢免斯坦顿职务；对抗人民意志，反对国会重建工作等等。

3月5日，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萨蒙·蔡斯主持下，参议院开始审理弹劾案。审理过程历时两个多月，以司法部长亨利·斯坦伯利为首的4位著名律师为约翰逊总统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他们提出两个主要论点：其一，官职任期法禁止总统免职的内阁成员是由现任总统任内所任命的官员，而斯坦顿是由前任总统林肯任命的，故不在官职任期法的有效范围内，有关条款不适用于

① 斯坦普：前引书，第149页。

约翰逊。[1] 其二，官职任期法本身是否合乎宪法仍未经最高法院裁决，因而不能根据此法来指控约翰逊违宪。[2] 5 月 16 日和 26 日，参议院对弹劾案进行两次表决，票数为 35 票对 19 票，[3] 因差一票不足法定的 2/3 多数，约翰逊被宣告无罪。

激进派对总统的弹劾虽未成功，却借机扩大了影响，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政治优势，为共和党在 1868 年总统竞选中获胜提供了有利地位。参议院对约翰逊的审理尚未结束，共和党就召开了全国大会，提出以民主重建为核心的政纲，并提名内战中成绩显赫的尤利塞斯·格兰特为总统候选人。7 月 4 日，民主党召开全国大会。其政纲中公然反对民主重建，主张在南部恢复白人统治。大会提名在内战中曾与“铜头蛇”联系密切的前纽约州州长霍勒肖·西摩为总统候选人。但是，格兰特轻易地在竞选中击败西摩，当选为美国第 18 任总统，并于 1869 年 3 月 4 日宣誓就职。

第三节　共和党激进派的南部重建

〔南部军事管制与民主政权的建立〕　1867 年 3 月，南部开始实行军事管制。根据重建法案规定，南部 10 个叛乱州被划为五个军区。其中第一军区辖弗吉尼亚；第二军区辖南、北卡罗来纳；第三军区辖佐治亚、亚拉巴马和佛罗里达；第四军区辖密西西比和阿肯色；第五军区辖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每一军区由总统任命一名军区司令，负责所辖州的选举和组建新政府等各项事务。

---

①② 史密斯：前引书，第 784—785 页。

③ 斯坦普：前引书，第 153 页。

在南部推行激进派重建政策的是由三部分力量构成的暂时联盟。他们是“自备毡囊者”、黑人和“屡崽子”。“自备毡囊者”是来自北部的共和党人，代表着北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构成了南部共和党的核心。刚刚获得解放的南部黑人是激进派重建的主要社会基础。所谓“屡崽子”，是南部叛乱者对贫穷白人小农的蔑称。这部分白人小农在内战期间反对分离，战后又愿意接受阿波马托克斯的结局，并支持激进派的重建纲领。①

在南部，同样存在着反对激进派重建的强大力量。这就是种植园主、民主党人和约翰逊时期的州政府。他们以软硬兼施的手段来破坏重建。有的假装支持黑人选举权，把自己打扮成黑人的朋友，诱使黑人投民主党的票，破坏离间黑人与共和党的关系。有的则以解雇相威胁，目的也是为了控制黑人的选票或阻止他们参加选举。更有甚者，三K党及其他恐怖组织采取暴力、私刑等手段来阻止黑人参加和支持激进派重建，因而凶杀恐怖事件屡有发生。

广大黑人为了维护自己的选举权，同种植园主和白人种族主义者展开了坚决斗争。各州黑人普遍举行群众大会，支持激进派重建纲领，要求获得平等的民主权利。例如，亚拉巴马州的黑人代表大会发表了“告亚拉巴马人民书”，要求享有选举权，取消种族隔离，并坚定地宣布支持共和党及其重建纲领。② 其他地方的黑人也在种植园、市镇、投票处以及十字路口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

各州军管当局采取措施以保证重建的顺利进行。他们免除了6名州长和大批中下层行政官员的职务；以军事法庭代替了原来

---

① 约翰·H·富兰克林：《内战后的重建》，芝加哥1961年，第98页。

② 艾伦：前引书，第236—238页。

的州法庭。军管当局还对各种恐怖活动进行了镇压，对一切用解雇、恫吓、暴力等手段干涉或阻止黑人选举的行为，都作为犯罪加以惩处。为了保证黑人有机会参加选民登记和投票，有的军区还延长了登记和选举期限，延长时间多达一个月。

经过激烈斗争，南部各州在 1867 年 10 月先后完成了选民登记程序。登记的黑人选民达 70 多万人，白人选民为 66 万余人。在南卡罗来纳、亚拉巴马、佛罗里达、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等州，大多数黑人都积极参加了选民登记。有相当数量的黑人被选入制宪代表大会，参加建立州政权的工作。但黑人代表占多数的只有南卡罗来纳，达 61%。路易斯安那的黑人代表约占半数。其他各州黑人代表都明显地居少数。从整个南部看，10 个州的黑人代表约占代表总数的 25.8%，表明黑人参政权仍不充分。尽管黑人代表和共和党代表共同占有了代表大会的多数席位，但民主党和保守派进入大会的人数仍然不少。

到 1868 年 5 月，除了得克萨斯州，其他各州都完成了制定宪法的工作。各州新宪法体现了联邦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和激进派重建法案的精神，一方面肯定黑人享有选举权和参政权；另一方面则剥夺了南部叛乱分子的选举权和出任公职的资格。有的州宪法还扩大妇女民主权利、实行义务教育制度，建立民兵组织，以保证民主重建的顺利进行。各州宪法都无例外地维护资产阶级私有制，没有剥夺种植园主的大地产，亦未给黑人分配土地。但它们仍不失为民主重建的决定性步骤。

到 1869 年末，南部 10 州选出了州议会、行政官员及参加国会的参、众议员，各州政府先后宣告成立。在批准州宪法和联邦宪法第十四、十五条修正案之后，各州选出的参、众议员相继被接纳进入国会。到 1870 年 3 月，南部各州在联邦中的平等地位与正常关系终于得到恢复，重返联邦的程序遂告完成。

〔南部各州的民主改革〕　南部各州民主政权成立以后，立即着手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民主改革工作。

其一，确认黑人的平等权利，实行民主政治。根据新的州宪法，各州先后废除“黑人法典”，颁布“公民权利法”，在不同程度上承认了黑人的平等权利。许多州还改革了地方政权和司法制度，各级行政和司法官员均由选举产生，并建立了陪审制度和巡回法庭，承认黑人的参政权与陪审权。虽然各州政府和司法机关中都有一定数量的黑人参政，但是政权仍然掌握在白人手中。各州制定的民权法案也未得到认真实施，黑人仍然遭受着严重的种族歧视。

其二，进行土地和税制改革。南部一些州议会通过了实行有限土地改革的立法。以南卡罗来纳为例，在1868年至1869年间，该州议会通过法案，建立土地委员会，以公款购地，然后分成25—100英亩的小地块，以低价售予黑人和无地白人，为此共拨出贷款50万美元。到1871年，该州由此建立的小农场已近2,000个。

南部各州为了进行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需在财政上筹措资金，由此进行了税制改革。内战前南部对种植园主征收的土地税非常轻微。一个中等工商业者的纳税额约为种植园主的5—6倍。税制改革后，种植园主的土地税额大幅度增加；工商业者的纳税额大大削减；而一部分下层贫民的纳税义务得以免除。南卡罗来纳的每英亩土地税，从内战时的15美分提高到改革后的15美元。1870年，南部11州的纳税财产总值不及1860年的一半，但所缴税款却超过1860年的4倍。[①] 许多无力完税的种植园主不得不将土地充公抵税或低价出售，由此地价急剧下跌。南部各州的地价下跌幅度达50%—70%。密西西比州的种植园主出卖土地

---

① E·默顿·库尔特：《重建时期的南部》，路易斯安那1947年，第155—156页。

64万英亩[1]，南卡罗来纳种植园主因欠税而被充公的土地近27万英亩。这些土地中有一部分被分配或出售给黑人，形成了一些独立的黑人小农。

其三，奖励工商业，资助铁路，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密西西比州颁布了数百份公司特许状，还通过法案规定：免除利润不足4%的工商企业的纳税义务。各州拨出大量款项和土地资助铁路公司。每修筑一英里铁路，州政府就补贴16,000美元。佐治亚州为布伦瑞克—奥尔巴尼铁路提供了600万美元的债券。南部州政府的奖励工商业政策，刺激了北方资本对南部投资的积极性，促进了南部经济发展，同时也给投机者们以巧取豪夺之机，形成了一批暴发户。

其四，改革教育制度，开办免费公立学校。内战前奴隶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南部黑人文盲率达95%以上。南部各州民主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为黑人和贫穷白人提供免费接受教育的机会。这时期的南部教育经费主要来自自由民局和北方的宗教团体。自由民局的教育经费逐年增加，1865年为27万美元，1870年已近100万美元。教会所提供的教育捐助也近157万美元。南部政府以此创办了从幼儿园到高等学校等各类学校。广大黑人也积极筹措资金，自力兴办学校。1866年至1870年的黑人办学经费达78万余美元，黑人儿童入学人数成倍增加。[2]

其五，医治战争创伤，兴办慈善事业。面对严重的战争创伤和普遍贫困的局面，南部各州政府拨出大笔资金修复铁路，架设桥梁，恢复和开办医院、孤儿院和救济机构等公用事业，为黑人

---

① 艾伦：前引书，第142页。

② 杜波依斯：前引书，第648页。

和下层白人提供社会福利服务。

激进派领导的南部重建，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运动。尽管改革的进展很不平衡，有些措施流于形式，但它对南部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重建时期的贪污舞弊现象〕　南部的改革和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各州政府除了提高税率增加财政收入外，还通过大量发行公债来吸收资金。1868—1874年间，佛罗里达发行的公债额增加达10倍，从52万美元增至560万美元。整个南部在1872年的公债总额已达1.32亿美元。[①] 对于百废待举的南部来说，发行大量公债是必要的。但是，当时一批官僚政客和投机分子，乘机假借改革之名挥霍公款，利用各种手段中饱私囊，在南部政界形成腐败之风。例如，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亨利·沃摩思的年薪为8,000美元，而在其任职四年内竟捞取了50万美元。还有一个州长盗卖自由民局的供应品，大量侵吞公物公款。佛罗里达的税务官员竟私分税款50万美元。[②]

贪污舞弊之风严重损害了南部民主政权的形象，民主党人和保守派得到了攻击民主改革的口实。他们以“反对贪污”为名，攻击所谓“黑人统治”。保守派共和党人、《纽约论坛报》的詹姆斯·派克考察了南卡罗来纳后，大肆渲染该州政府的每一个成员都卷入了贪污舞弊的丑闻。一时间，反对南部改革的势力顿然抬头。事实上，腐败之风并非南部重建所独有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的全国性社会现象，而且北方在这方面更甚。联邦政府和各州立法机构几乎都与铁路公司及形形色色的贪污集团联系密切。如纽约市特威德集团案、费城煤气公司麦克梅内斯集团贪污案、联合太平洋铁路“莫比利尔公司案”及“威士忌酒集团案”，都牵涉到许多

①② 斯坦普：前引书，第174—176页。

政界要员。美国史学家约翰·富兰克林分析了这种腐败现象，认为是南北“两个地区、两个党派和两个种族莫不皆然。”[①]

重建时期南部出现腐败现象，还有其特殊原因。首先，内战后南部处于大变动时期，旧结构已崩溃，新结构尚未健全。尤其是政府机构从寡头政治迅速转变为民主政治，同时不健全的民主制又伴随着军事管制，这一系列变动不可避免地产生混乱，给不法分子造成可乘之机。其次，在激进派重建过程中，北部政客和投机分子纷纷南下，出现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局面。这些人利用南部的混乱，大发横财。其三，少数贫苦的白人和黑人进入南部政权后，很快被腐朽之风所侵蚀，卷入了争赃夺利的漩涡。其四，这时美国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经济上的疯狂竞争导致不择手段地拉拢政治代理人。南部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只是镀金时代美国的一个侧面。因此，不能把南部的腐败现象简单地归咎于民主重建和黑人参政。更不能以此来否定整个激进派重建的进步历史作用。

〔黑人在南部重建中的作用〕　广大黑人是激进派重建和南部民主政权的主要社会基础。早在内战时期，忠于联邦的北部黑人和支持他们的白人就已建立了联邦派同盟会。随着联邦军队的作战进程，该组织也于 1863 年进入了南部，并得到迅速发展。激进派重建时期，联邦派同盟会已成为相当广泛的全国性组织。它在纽约和各州首府分别设有全国大委员会和州委员会，还在南部各选区设基层委员会，仅在弗吉尼亚就有 800 个分支机构。到 1867 年，同盟会在南部各地已有 50 万会员。[②] 它的基层组织还组

---

① 约翰·H·富兰克林：《内战后的重建》，芝加哥 1961 年，第 149 页。

② 威廉·福斯特：《美国历史中的黑人》，三联书店中译本 1961 年，第 348 页。

建了黑人民兵连队，经常举行集会和游行，同南部民主党和三K党进行了有效的斗争。1868年以后，同盟会基层组织和黑人民兵连队在南部民主改革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尤其在保卫民主宪法和黑人选举权等方面，其作用是州政府和联邦军队所不能代替的，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三K党恐怖活动的消极影响。

南卡罗来纳是南部惟一黑人占多数的州（黑人占人口的60%以上），因而也是黑人参政比例数最大、作用最突出的一个州。黑人在该州制宪代表大会上表现卓著，有力地驳斥了那些污蔑黑人愚昧、没有参政能力的谬论。例如，黑人代表贝弗利·纳什在演说中指出：对选举活动，黑人可能一开始“没有准备”、“还不理解”，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我们迟早能学会履行我们的职责。”① 一些黑人领袖被选入州议会和州政府担任要职。大部分黑人参政者都工作勤奋，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黑人代表在南卡罗来纳州众议院居多数，但参议院为白人所控制。白人还担任了州长等主要职务。可见，即使在这个黑人参政较为广泛、民主改革较为深入的州，也从未出现所谓“黑人统治”的局面。

在佐治亚州议会中，黑人代表为了捍卫自己的民主权利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868年6月，佐治亚州被接纳进入联邦，军管结束。9月，该州议会就通过了驱逐黑人议员的决议。对此形势，黑人议员领袖亨利·特纳一面在议会中强烈谴责民主党人和保守势力的非法行径，为黑人参政权进行有力辩护；另一方面，他召集82个县136名黑人代表举行会议，对州议会的非法活动提出强烈抗议，同时要求国会出面干预和纠正这种活动。他们的

---

① 富兰克林：前引书，第87页。

斗争得到国会的有力支持。国会决定，在佐治亚州议会恢复黑人合法席位之前，拒绝接纳该州参议员进入国会。但佐治亚州议会公开对抗国会，不仅没有恢复黑人议员的合法席位，而且还于翌年否决了联邦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国会只得重新恢复军事管制，决定该州在批准第十五条修正案以前不得重返联邦。新的军区司令取消了24名民主党议员的资格。重新组成的州议会站在激进派一边，恢复黑人议员的合法席位，批准第十五条修正案；还通过了妇女选举法、监狱改革法等民主立法。佐治亚州经过激烈的反复，终于在1870年7月重返联邦。

黑人的重建斗争也存在着局限性。他们没有力量和条件建立自己的政党，只得尾随于北部。他们的斗争尚处于自发阶段，多数黑人刚由奴隶转变为自由民，思想上仍未得到充分的解放；加上他们的文化素养差，政治训练少，因而难以进行全面、持久的政治斗争。黑人以其相当薄弱的政治经验和物质条件，同盘根错节的白人种族主义势力和根深蒂固的南部民主党较量，在当时不具备获胜的可能。这也是重建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

〔南部力量对比的变化〕　到19世纪70年代初，由内战开始的美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已基本完成。北部资产阶级不仅牢固地掌握了联邦政权，重新实现了联邦统一；而且摧毁了南部奴隶制经济，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建立了关税壁垒和稳定的货币制度。这种形势导致了共和党内妥协思潮的增长。不少共和党人对南部重建和黑人命运已不感兴趣，但愿尽快结束这场无休止的斗争，即使牺牲黑人利益也无关紧要。当时的《民族》周刊反映了这种妥协思潮：“每一个共和党人都已经变得对各州的军事管制十分憎恶，并且完全相

信，不应由国家派士兵去维持一个不能支持自己的州政府。”①

在妥协思潮日益滋长的情况下，共和党参议员舒尔茨和本杰明·布朗首先在密苏里州发起自由派共和党运动。许多有影响的激进派共和党人，如霍勒斯·格里利、查尔斯·亚当斯、萨姆纳等，都先后脱离了正统共和党而转入了自由派。他们认为联邦政府应把更多精力用于国内经济建设，不应纠缠于旷日持久的南部斗争。自由派中多是行政官员，他们对国会滥用权力也感到不满。1872 年总统选举给自由派共和党以独树一帜的机会。他们在辛辛那提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提出了独立的竞选纲领和总统候选人霍勒斯·格里利。自由派的主要政纲是大赦南部叛乱者，结束军管，改革文官制度，承认黑人选举权。民主党为瓦解共和党阵营，也全力支持自由派共和党人。于是，民主党和自由派共和党在政治上暂时结成了联盟。

民主党一方面利用共和党分裂来补充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又因国会于 1872 年 5 月通过的大赦法案而开始恢复元气。根据大赦法案，原来被剥夺出任公职资格的 15 万南部叛乱者中，有 14 万 5 千人重新获得这种资格，其中包括南部同盟副总统斯蒂芬斯和韦德·汉普德将军等人。民主党在南部各州的力量也有所增长。联邦和州政府对工商业的保护政策使农业遭受损失，因此，引起南部白人小农的不满。他们逐渐脱离共和党，转向民主党。相当一部分黑人也对联邦政府的妥协举动感到失望，又经常受到三 K 党的威胁，对共和党的热情亦大大降低。南部各州的“自备毡囊者”处境日益孤立。

南部民主党利用上述形势，在各州展开夺取州政权的活动。他们抓住政府中的贪污舞弊问题大肆破坏民主政权的声誉，谩骂

① 莫里森等：前引书，第 989 页。

激进派共和党人，企图在舆论上占据优势。同时，大力怂恿三K党加剧恐怖活动。仅1869年至1870年，得克萨斯州就发生1,500起杀害黑人事件。有些三K党组织与前同盟退伍官兵勾结，企图直接以暴力夺取政权。南卡罗来纳的三K党暴徒甚至在1870年10月占领了劳伦斯。各州向联邦政府频频告急。

由于南部反动势力的猖獗，黑人参加选举的机会大大减少，大批黑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而黑人选举权是"共和党控制南部的关键。"① 国会为了保护黑人选举权，于1869年2月通过了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明确规定：联邦或任何州均不得以种族、肤色或以前的奴隶身份为借口而剥夺联邦公民的选举权，并授权国会可以通过立法强制执行该修正案。为此国会于1870年和1871年先后通过两个"强制法案"，规定凡企图剥夺任何公民选举权者，须处以500美元罚款或一年以下徒刑；总统在必要时可动用军队以保护公民选举权；总统和国会选举必须在联邦法院监督下进行。1871年4月，国会通过"三K党法案"，授权总统在必要时实行人身保护法，并使用武装力量镇压三K党的暴行和骚乱。但在共和党的妥协思潮逐渐占据上风的情况下，第十五条修正案及有关法案都停留在纸面上而未得到真正的执行。广大黑人失去了联邦政府强有力的保护，以致南部民主政权的基础大为削弱。加上两大党内部构成的变化，1872年以后，南部的政治力量对比已对民主政权越来越不利，激进派重建已成为强弩之末。

〔*民主政权失败与海斯—蒂尔登妥协*〕　联邦政府的软弱退让，使南部民主党一再得逞，形势终于急转直下。佐治亚和北卡罗来纳的民主党首先于1870年控制了州议会，旋又掌握了州

① 福斯特：前引书，第328页。

政权。其他各州民主党也在此后数年中，利用合法与非法手段相继夺得州政权。到 1875 年末，仍保持在激进派共和党手中的仅有南卡罗来纳、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 3 个州，即使这 3 个州的民主政权也已裂隙丛生、很不稳固。

1876 年大选临近时，格兰特政府所暴露的种种丑闻和民主党在南部诸州的重新执政，使形势变得对民主党十分有利，从而出现了内战以来第一次两党势均力敌的局面。共和党提出的竞选政纲是继续执行内战以来通过的各项宪法修正案、保护黑人选举权及其他公民权利、实行保护关税，并以俄亥俄州州长拉瑟福德·海斯为总统候选人。民主党政纲的主要点是取消激进派重建、反对贪污、降低关税，它的总统候选人是纽约州州长塞缪尔·蒂尔登。初步计算竞选结果，蒂尔顿所得普通选票超过海斯 25 万张，但是，迟到的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和俄勒冈 4 个州的选举人票全归海斯。于是海斯以选举人票 185 对 184 的 1 票之差险胜蒂尔顿。

民主党对此结果表示强烈反对，声言要发动向首都华盛顿的进军。然而，南部民主党人权衡利弊后，认为如果接受海斯为总统，很可能使海斯撤走联邦军队、结束对南部的军管；相反，如果蒂尔登出任总统，他绝不敢结束在南部的军事统治。所以，民主党决定以放弃总统职位来同共和党达成政治交易。事实正如他们所预料的。共和党也不愿意为南部黑人而放弃总统职位。于是，两大党的代表达成一项秘密交易，即民主党同意把总统职位交给海斯，以换取共和党在海斯就职后即从南卡罗来纳等三个州撤军、修筑横贯南部的大铁路等许诺。这就形成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海斯—蒂尔登妥协”。

海斯就职后，立即从南卡罗来纳等三个南部州撤出联邦驻军，并将这三个州政权让给了民主党人。至此，民主党重新掌握

了南部各州的政权，重建以南北双方妥协而告终。

重建的这种结局，虽然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上，南部未曾出现所谓的奴隶主复辟，但大多数黑人并未得到土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仍受着严重的歧视，因而重建并未完成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此后，南部走上了一条极为缓慢而痛苦的发展道路。

第四节　重建后的南部

〔南部农业经济与谷物分成制〕　在重建过程中，南部的大土地所有制并未遭到彻底摧毁，除一些土地被来自北方的土地投机商和军官所占有外，大部分土地仍保留在旧种植园主手中。这些种植园主，虽仍保留着大地产，但失去了作为劳动力的奴隶，同时由于战争对南部经济的破坏，又缺乏资金雇佣劳动力；而“解放了”的奴隶在获得人身自由后，没有得到土地，也无力购买生产资料，无法成为独立小农或雇佣工人。于是，土地所有者把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黑人或贫穷白人，租佃制成为南部农业经济的主要生产方式。

租佃制的形式较为复杂，大体上有现金租佃制和谷物分成制。在现金租佃制中，佃户除租种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外，其他生产资料一概自备，秋收时交纳现金或部分收成作为地租。这种佃农可称为租佃农场主，他们虽受商业资本的盘剥，但独立性较强，与典型的资本主义租佃制没有多大差别。但这部分人数较少，在租佃制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谷物分成制。在南部 390 万黑人中，就有 85.6%是谷物分成农。

在谷物分成制中，又有分成制佃农和分成制雇农两种形式。分成制佃农没有土地，只拥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如种籽、农具

等。地租是收获后按一定比例以实物交纳，一般占全部收成的1/4或1/3。大部分黑人都是这种分成制佃农。分成制雇农处境更为艰难。他们往往一无所有。一切生产资料都由土地所有者提供，按其条件从事耕作。秋收时把收成的一半或2/3交给地主作为使用土地的代价。这些谷物分成制佃农和谷物分成制雇农都一无例外地受着大种植园主和北部银行家、高利贷商人的层层盘剥。大批种植园主向北部贷款，然后再以赊销供应生产和生活资料等方式向佃农发放高利贷。他们往往高价贷出这些物品，低价折算农民的收成。佃农若无法偿还，旧债的本息则全部划为新的本金。所以，佃农一旦接受贷款便债台高筑，常无力自拔。种植园主为了把佃农束缚在土地上，勒索债款，便怂恿各州政府先后颁布法律，把佃户中断合同的行为定为犯罪。如1895年佐治亚州通过"流浪法"，对无雇主的劳动者罚款1千美元或判处6至12个月的监禁。这样，只要欠债，佃农事实上就被束缚在种植园主的土地上，不得不以劳役形式偿债，从而形成较残酷的劳役偿债制。负债佃农不仅被迫以全部劳动所得来偿付所欠的债务，受到残酷的剥削，而且在生产和生活上受制于债主，失去了经济独立性。甚至有时一个种植园主可将这种债权转让给另一种植园主，而债务人也就随之被转让了。

所以，谷物分成制一方面具有新的资本主义租佃关系，反映了奴隶占有制向资本主义农业结构的过渡；另一方面，这种过渡又是建立在对佃农的残酷剥夺之上的，带有浓厚的奴隶制残余。这就致使南部农业走上了缓慢而痛苦的"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南部种植园主同北部工业——金融资本

的联系不断加强，成为资产阶级化的种植园主阶层。[①] 原来的奴隶也逐渐演变为新的佃农阶层，即具有不完全人身自由、不完全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同时也有大批贫穷白人沦为分成制佃农。他们在种植园主的严格控制之下，并未摆脱对土地的依赖，不易成为自由的工资劳动者。在这个意义上讲，谷物分成制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南部农业，以至整个南部经济的发展。

谷物分成制的盛行，维系了单一经济作物的农业经济，从另一方面束缚了南部经济发展。重建时期至 19 世纪末，棉花在国际市场上仍是有利可图的作物。北部金融资本当然不甘放弃这一"摇钱树"，力求扩展棉花种植业；仰仗北部提供贷款和资金又习惯于经营植棉业的南部种植园主完全听命于北部，对此并无异议。直接生产者分成农，在金融资本与种植园主的双重控制下，当然别无选择。结果，南部的单一经济作物种植的局面依然如故。1860 年时棉花号称为"王"，到 1890 年，这一趋势仍有增无已。[②] 这种现象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南部更加深了对北部资本的依赖。致使"纽约的金融家们仍在影响南部农业经济的重大决策方面起着左右局势的作用。"[③] 然而，更严重的后果是，这种单一经济作物的种植，严重妨碍了农业技术改造和多样化经济的产生。劳动力密集型的耕作方式、简单的手工劳动、土地的小块经营，仍是南部农业经济的典型特征。整个经济结构缺乏弹性与活力，致使南部经济仍远远落在全国后面。1880 到 1900 年间，南部的人均收入只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51%。[④]

---

① J.M. 维纳："1869 至 1955 年美国南部的经济结构"，《美国历史评论》，1979 年 10 月号。

② 格伦·波特主编：前引书，第 1005 页。

③ 劳伦森·拉森：《南部城市的兴起》，肯塔基 1965 年，第 79 页。

④ 格伦·波特主编：前引书，第 1003 页。

〔种族歧视的加剧与吉姆·克劳制〕　联邦宪法第十四、十五条修正案曾明确规定了黑人的公民权与选举权。但自1877年妥协、民主党在南部占据优势后，保守势力再度抬头，黑人权利面临得而复失的危险。而北部共和党入主白宫后，主要注意力转向如何保障他们在南部的工商业利益，对黑人权利已无心关注，致使黑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南部保守势力的第一个目标便是黑人的选举权。在这一方面，最高法院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早在1876年，最高法院就借口1870年的强制法违宪，予以取消，进而宣称，联邦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并未保证公民有选举权，而只是保证公民不得因种族、肤色或先前的奴隶地位而受歧视的权利。在这里，最高法院实际上是在暗示：此问题不属最高法院管辖范围，各州可自行处理之。

这种做法迎合了种族主义者和保守势力的需要。他们更加放肆地施展种种手法，处心积虑地设法剥夺黑人的选举权，如在选举时，他们往往把投票地点设在远离黑人居住区的地方，或是在沿途制造障碍。在选票上也大做文章，或以假充真，或有意地发放种类多得难以选择的票以混淆黑人选民的分辨力。监票人也与之串通一气。再加上暴力恫吓等手段，致使很多社区黑人无法正常投票，黑人选举权几乎名存实亡。

黑人不甘于这种状况，不断起而反抗，八、九十年代，很多黑人群众参加了蓬勃兴起的农民联盟及其后的人民党运动。同时出现一些黑人自己的组织，如黑人劳动骑士团、全国有色农民联盟等。然而，在当时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这些组织所取得的成就不大。也有很多黑人采用消极的反抗形式，如1879年，黑人不顾当局禁令，大批移往西部，主要是堪萨斯，约有6,000到

25,000人之多，史称“黑人大迁徙”。[1] 有的则移居到北部或南部城市，但境遇并没有实质性改善。

黑人的反抗斗争不断遭到白人种族主义者更加疯狂的报复。1890年，密西西比州的制宪会议通过一条关于选举权的州宪法修正案，要求选民交纳2美元的人头税、并接受文化测验，合格者方可进行选民登记。这一规定将大量黑人排斥在选举大门之外。据参加该会议的惟一黑人代表艾赛亚·T·蒙哥马利分析，这种规定将会剥夺123,000名黑人的选举权，而白人只有11,000人失去选举权。[2] 这样，该宪法修正案有效地规避了联邦宪法第十四、十五条修正案，实质上剥夺了所有黑人的选民权。[3] 这一修正案开了一个罪恶的先例，南部其他各州纷起效尤。1895年南卡罗来纳州通过类似的宪法修正案时，还附加了两年居住期和300美元财产的限制。1898年路易斯安那州更是别出心裁地制订了一项“祖父条款”，规定凡在1867年前享有选举权的成年男子及其后代得以免除教育、财产及纳税的限制而行使投票权，否则无权参加选举。很显然，1867年时没有任何一名黑人在路易斯安那州享有选举权，因而这等于将黑人从选民名册上一笔勾销，剩下的自然都是白人了。这就根本否定了联邦宪法第十四、十五条修正案。随后，南部各州又通过一些限制黑人选举权的立法。

黑人的选举权因此受到极大的限制。1896年时的路易斯安那州曾有130,344名黑人注册参加选举，到1900年，即新的州宪法实施仅两年，只有5,320名黑人见于选举名册。[4] 在密西西比

---

① 威廉·福斯特：《美国历史中的黑人》，三联书店中译本1960年，第393页。

② 约翰·H·富兰克林：《从奴隶制到自由》，纽约，1980年，第263—264页。

③ 内森·I.哈金斯等编：《美国人经历中的关键问题》，纽约，1971年，第85页。

④ 约翰·富兰克林：前引书，第266页。

州，大约每17个黑人中仅有1人有选举资格。总之，在南部各州，黑人选民数量普遍下降了。

在剥夺黑人选举权的同时，种族隔离的作法也在南部各州蔓延开来。最早制订此类法律的是田纳西州。1870年该州曾通过法律禁止种族间通婚。5年后，更进一步制订了第一个“吉姆·克劳”法，[①] 在火车和公共交通中实行隔离。1881年，该州再次制订铁路运输中的“吉姆·克劳”法，规定铁路公司要给黑人另设车厢，黑人必须在指定的车厢就座，不得进入白人车厢。及至1883年最高法院宣布1875年公民权利法案违宪后，更助长了这种气焰。1885年南部大多数州又都制订了在公立学校中实行种族隔离的法律。进而很多州连饭店、酒吧和影剧院等公共场所也开始实行隔离。1891年，佐治亚州又率先制订了电车上的隔离法，使黑人在市内交通中也受到了限制。

到1896年，在“普莱塞控弗格森”一案的判决中，最高法院竟以“分离但平等”原则对公共交通中的种族隔离制给予了法律上的正式承认。从此，黑人身上又多了一层枷锁。种族隔离制不仅使南部政治处于反动状况，而且阻碍美国社会进步近一个世纪之久。

〔布克·华盛顿与塔斯克基运动〕　在一个种族主义猖獗、黑人社会地位每况愈下、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的南部社会，黑人的真正出路何在？为此，广大黑人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斗争。其中，除直接的反抗斗争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布克·华盛顿与塔斯克基运动的兴起。

布克·华盛顿于1856年生于弗吉尼亚州富兰克林郡的一个奴

---

① “吉姆·克劳”相传是1835年左右的一黑人流行歌曲名，后转为歧视黑人的蔑称。

隶家庭。曾就读于汉普顿学院。在院长塞缪尔·阿姆斯特朗的影响下，他深信通过职业教育和体力劳动，黑人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就可以得到改善和提高。怀着这样一种信念，1881 年，他在亚拉巴马州办起了一座生机勃勃的塔斯克基师范工业学院，开始了塔斯克基运动。

华盛顿认为，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上层社会的“地盘非常广阔”。对于黑人来说，只要在经济上富裕起来，就可以跻身于上层社会。那么，怎样才能在经济上富裕起来，他主张通过职业教育，掌握实用技术，这样，“一个人只要能做一点世界上需要做的事情，终究会腾达起来，不论他属于哪一个种族。”① 因此，他主张应教授黑人农业知识和手工艺，并有步骤地发展黑人的商业机构，对历史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可不加考虑。至于当时存在的对黑人的歧视，他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黑人的无能和愚昧所致。黑人对此不应进行斗争，甚至对私刑也应采取忍让态度，因为顺从比反抗对黑人更有利，要培养“忍耐性格”。他公开主张放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毫无成功希望的政治斗争和民权斗争，转而致力于个人经济地位的改善和提高，通过这种自助的道路，总有一天白人会改变种族偏见，黑人将获得充分的公民权。华盛顿接受了交纳人头税和文化测验的选举权利，只不过强调这些措施应当公正地同时施用于白人和黑人。②

1895 年，华盛顿在亚特兰大棉业展览会上发表一篇著名演说，由此而引起全国重视。他在这篇演说中，提出“就地汲水”的号召。他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一只船停泊在南美洲海岸，船上淡水已尽，船员们只好把水桶投入海中碰碰运气。结果，在

---

① 福斯特：前引书，第 445 页。

② 约翰·富兰克林：前引书，第 276 页。

原来以为只有咸水的地方汲起了亚马逊河的清水，全船人员幸免于难。根据这个道理，黑人不必枉费精力向非洲移民或与白人相抗衡，而是尽量利用现有条件改善与白人的关系，委曲求全，以获得自身地位的改善。此故事的另一含义是，南部白人统治阶层也要就地汲水，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黑人劳力，而不必去吸引万里之外的欧洲移民。

这篇演说立即受到北部和南部资产阶级的一致喝彩。而对黑人来说，在南部种族恐怖主义的笼罩下，演说中提出的主张实际上给他们的生存带来了一线希望和出路，因之也受到欢迎。此后，华盛顿在社会中声望不断增大，成为当时黑人运动中最显赫的人物，塔斯克基运动也以其独特的指导与示范作用而风靡一时。很多黑人，特别是塔斯克基附近的黑人农民学习农业技艺，从中确实受益不浅。[①] 在华盛顿的影响下，黑人从事专门技艺及商业的日益增多，到 19 世纪末，“黑人已从事了难以计数的各种类型与规模的商业。”[②] 1900 年，华盛顿召集黑人企业家在波士顿组成“全国黑人企业联盟”，并当选为主席，更加壮大了塔斯克基运动的声势。进入 20 世纪后，这一运动仍方兴未艾。

布克·华盛顿的崛起与塔斯克基运动的日益兴盛是南部重建的一个重要历史现象。当时，南部种族主义猖獗，黑人处于无权的被统治地位，采用暴力斗争极其困难，而且收效并不理想。而华盛顿默认黑人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屈从地位，确实换取了南部白人的宽容和北部大资产阶级的资助和支持。这就使得他的纲领是当时惟一能够使白人、南部白人和黑人这三方面都能接受的方案。

然而，华盛顿的言行也充满矛盾，并非始终一致。他除以妥

---

① 约翰·富兰克林：前引书，第 282 页。

② 约翰·富兰克林：前引书，第 286 页。

协、放弃政治斗争为主要倾向的公开生活外，还有暗中支持民权运动的另一方面。如“他暗中以金钱支持并部署了一系列反对‘祖父条款’，反对取消黑人的陪审权，反对火车上的种族隔离以及反对劳役偿债制的斗争。”[1] 另外，他在私下里还有许多排挤其他黑人领袖，惟塔斯克基运动独尊、党同伐异的举动。因此，华盛顿的个性极其复杂。在当时紧张的种族关系中，他小心翼翼地推行他的委曲求全的黑人路线。

〔铁路的铺设与工业的初步发展〕　南部的社会环境虽差，但那里丰富的矿藏及林木资源、大量廉价劳动力、有利可图的植棉业等对北部投资者仍有较强的吸引力，南部各州也相应地降低税率以吸引外资，因而，80 年代后，大批北部企业家、投机商人等涌入南部，或铺设铁路、或采掘矿藏、或利用当地资源开业设厂。

铁路铺设的进展最为明显。内战期间，南部铁路曾受到相当严重的破坏，战争结束时，仅存的万余英里铁路也多半残缺不全，难于使用。然而，到 1890 年，新旧铁路加在一起，即达 27，655英里。其中，仅 1880 至 1890 年这 10 年，铁路里程就增加了 135%。到 19 世纪末，南部已形成一个完整的铁路网，连结了所有的主要城镇。

铁路网的不断完善，为南部经济注入了活力。各种大宗农作物得以外运，从前因交通不便而难以开采的铁路、煤矿也由此获得了生机，田纳西、弗吉尼亚、亚拉巴马等州的富矿区日益兴隆。大批林木也被源源采伐。1880 年至 1890 年这 10 年间，南部林业产值扩大 10 多倍。毗邻墨西哥湾的 5 个州木材销售量由 1，300万美元猛增到7，300万美元。铁路的铺设，还刺激了南部

---

① L.哈尔兰：“布克·华盛顿传记透视”，载于《美国历史评论》1970 年 10 月刊。

的钢铁冶炼工业。原植根于千里棉田之中的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几年之内就转变成为南部生铁基地。号称“南部的匹茨堡”。

棉花加工与纺织业，本来集中在东北部。重建以后大批投资于此行业的企业家将工厂迁到南部，在植棉区就地加工，以获取最佳经济效益。结果在植棉带出现了大批棉纺业专业城镇。尤其在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亚拉巴马，这种现象更为突出。从而导致北部棉纺业的衰落。棉纺业南移。与此同时，烟草加工业也兴盛起来。1880 年引进的卷烟机，降低了劳动成本，加速了这一行业的发展。1890 年，著名企业家及发明家布坎南·杜克兼并南部 5 家大烟草公司，组成美国烟草公司，垄断了全国香烟生产的一半以上。

上述各个方面的进展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内战前的南部城市，大部分以商业活动为主，这时已转变为工业城镇，同时，原有的大中城市进一步扩大，如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等都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到 1900 年，南部已有 5 个人口在 10 万以上的大城市[①]。

尽管有这些令人瞩目的进展，从总体上说，南部仍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以工厂的数量和资本为例，南部到 1900 年仍未超过它在 1860 年时在全国所占的比重[②]。城市化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况且，南部工业基本以加工业为主，呈畸形发展。所生产的各种半成品都要到北部进行最后加工，而这一道工序恰恰赢利最多。因此，一位统计署官员评论说，尽管制造业和采矿业有了一些进展，但南部工业仍处于摇篮时期。[③] 由于铁路与工业的大部

---

① 劳伦斯·拉森：前引书，第 163 页。

② 查尔斯·M·多拉尔等编：《变革时代：美国简史》，纽约 1980 年版，第 360 页。

③ 劳伦斯·拉森：前引书，第 144 页。

分资本来自北部，这些工交企业的发展势必加深南部对北部经济的依赖。如到90年代，南部的铁路已基本为北部资本集团所控制。于是南部工业与南部农业一样，也纳入了北部垄断资本控制的统一轨道。

第 三 章

经济高速度发展与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

内战后，北部工业资产阶级掌握联邦政权，统一的全国资本主义市场向纵深进一步发展，各种鼓励工业的积极措施与第二次科技革命相结合，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工业化进程。19 世纪最后 30 年的美国经济呈现出罕见的高速度发展。60 年代初美国仍未摆脱对欧洲的经济依附，基本上是个农业国；到 90 年代末美国已拥有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其工业产值跃居世界首位。工业化的深入发展促使企业组织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小型分散的独立企业开始向集约化的联合生产体制转变。剧烈的竞争和企业合并，引起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在美国特定的社会、自然环境和市场条件的作用之下，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一直处于较为顺利的过程中，从而使美国垄断资本较早地确立并由低级向较高层次不断发展。19 世纪末美国的历史性转变为 20 世纪初现代美国经济的基本模式奠定了基础，并为我们揭示了资本主义自我扬弃的内在逻辑。

第一节　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

〔促进经济发展的联邦政策〕　北部工业资产阶级在内战

中执掌联邦政权，摆脱以往南部种植园主集团的羁绊，开始推行一系列有利于工业资本主义的政策。内战结束后，联邦政府进一步发展这些政策，在各方面扶植工业、金融业和商业，使资本主义生产力获得了充分发展的环境。

众所周知的“宅地法”曾使西部农场主获得了数量可观的自由土地，创造了美国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模式。同时这项法令也是内战后鼓励美国工业发展的重要政策。来自东部的铁路公司和土地投机公司依仗政府的赠予和雄厚资本，获得大量无偿和廉价土地，然后转手高价零售。由此赚取的巨额资金又转化为铁路投资，或向远西部矿业和东北部制造业转移。于是，“宅地法”在利用广大的西部土地来收集社会游资、吸引外国资金方面起了不可多得的作用。另一方面，西部形成大批宅地农业主，既为工业发展提供了粮食和原料，又大大开拓了美国国内市场。可见，“宅地法”对内战后美国经济的重要性不容低估。

内战期间联邦政府颁布的“国民银行体系法”对19世纪末的美国金融体制一体化起了重要作用。内战前，各地滥设州立银行和私立银行，造成通货紊乱、金融不稳、储蓄缺乏保障。联邦政府为了动员社会资金支持巨额战费，规定各银行须以其资本的1/3认购政府公债券，方可得到国会颁发的国民银行营业执照，而后发行相当于认购债券价值90%的国民银行券，并保持资本的25%为现金储备。该法执行后，州银行纷纷转变为国民银行，1865年领取执照的国民银行已达1,294家，占全国银行总数的75%[①]。国民银行体系使“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统一的通货”[②]。内战后，联邦政府继续整顿金融体制，实行紧缩银根的

---

① 罗伯特·C·普兹：《美国经济史》，德赖登出版社，1982年，第323页。

② 格伦·波特编：《美国经济史百科全书》，纽约1980年，第1卷，第78页。

硬币政策和金本位制。尽管这有损于债务人利益，但对于美国形成稳定的金融市场，吸引外国资本的投入和加速美国银行资本走向集中起了重要作用。1869年以后，资本积累率以每10年45%至60%的幅度递增，相当于人口增长率的2至3倍[①]。外国资本对美国的投入也从1869年的15亿美元上升到1897年的34亿美元[②]。因此，联邦政府的金融政策部分解决了内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资金短缺问题，为工业和交通业的高速度发展创造了又一重要前提。

内战前曾引起长期争端的关税问题，在内战中以“莫里尔关税法”而告一段落。联邦政府在1860年以后把关税率从20%逐步提高到50%，并长期保持高关税壁垒，减少欧洲工业制成品的打入和竞争，保证美国工业占领国内市场。对内则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禁止各州间的贸易障碍，鼓励商品在国内畅行并展开竞争。联邦的内外贸易政策使美国的商品输出实力增强，1875年以前外贸多为逆差，1879年以后转为顺差为主。同时在外贸构成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上升，农产品和原料的比重下降。正是在这种较好的国内市场条件下，美国工业能够相当完整地建立自己的体系，摆脱对欧洲工业品的依赖状况。

联邦政府促进经济的另一项重要政策是鼓励移民。1864年移民法通过后到1900年，进入美国的移民总数为1,300万，平均每年37万[③]。许多铁路公司和大企业直接在欧洲设办事处招募移民，以吸引足够的劳动力。移民中以16岁至44岁的壮年男性为多，为美国的劳动大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补充。移民的蜂拥而

---

① H.N.沙伊贝等：《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译本，第38页。

② 《美国历史统计》，纽约1975年，第869页。

③ 《美国历史统计》，前引书，第112页。

至，加上每10年20%以上的自然人口增长率，使美国人口从1860年的3,150万增至1900年的7,600万，超过了当时欧洲主要大国。人口密度在同时期从每平方英里10人增至20人。① 美国国内市场的潜在容量和对外经济扩展能力也由此大为增强。正如恩格斯在1882年所预言的，移民“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特别是英国迄今为止的工业垄断地位。”②

联邦政府对这个时期的工业技术发展给予很大关注，特别是以专利制度来保证新技术和发明创造的推广。内战后，联邦政府签发的技术专利特许证逐年增多。1880至1900年间，签发的专利总数每年保持在15,000件至25,000件。同时，美国政府还注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积极吸引外国发明家来美国申请专利。自1883年至1900年，每年给外国人签发的专利证在1,200件以上，占专利总数的4%—5%。而且美国专利局坚持专利的创新性、高水平和实用性，实行严格审查，保证了公布的专利质量较高、较稳定。长期实行专利制度的结果是使美国工业不仅跟上了欧洲技术发展的步伐，而且在许多领域迅速取得了领先地位。

总之，内战后的联邦政府真正展现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制造业报告》中所描绘的蓝图，给工业资本主义在市场、资金、资源、劳动力和技术诸方面创造了比当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要优越的有利条件。

〔科学技术的突破与广泛应用〕　内战后，美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关键因素是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加快。尤其是以电力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崛起，使美国在19世纪末完成

---

① 《美国历史统计》，前引书，第4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0页。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同时，率先进入了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浪潮。内战后美国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匮乏所造成的劳动力成本较高，促使美国资本家尽可能地采用节省劳力、降低成本的新技术。同时，美国工业较英、法等国起步晚，可以直接借鉴别国发展技术的经验教训，尽量少走弯路；加上美国中西部以远的各地区都是新开发的，没有陈旧设备作为包袱和障碍，不存在英国工业所具有的严重的技术更新问题。根据当时世界经济形势，美国必须以跳跃式的发展才能打入国际市场，并防止欧洲产品侵人美国国内市场。还应指出的是，美利坚民族具有积极进取、讲求实效的精神，他们较少受传统束缚，在文化心态上易于接受新科学技术。

19世纪末美国科技发展的重要特点是、吸收欧洲已有的基础理论成就，广泛展开应用科学的研究和工艺技术的发明更新。电力技术在美国最先得到应用和推广就是这种特点的典型表现，其中的杰出人物就是托马斯·爱迪生、乔治·威斯汀豪斯和亚历山大·贝尔。

爱迪生自幼酷爱钻研，经常突发奇想。1869年，他以发明自动计票机所得4万美元酬金，创办了爱迪生公司。1876年又在新泽西州的门洛帕克建立实验室。爱迪生以惊人的智慧和罕见的毅力，进行1,300余次实验，终于在1879年10月21日研制成世界上第一只白炽电灯泡。接着，他开始改进照明系统，包括发电机、馈电线和配电系统。在此基础上，1882年9月第一座中心发电站在纽约建成。美国成为电力工业的故乡。

爱迪生没有解决电流电压不足的输送距离问题，这个障碍是由1886年建立的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突破的。该公司在布法罗首先建立商业性的交流电灯工厂，购买了由南斯拉夫工程师尼科洛·特斯拉发明的交流发电机专利并严密控制达十余年之久，最终解决了交直流互变和高低压互变等应用技术问题。在1892年

的芝加哥博览会上展出了1,000马力发电机，达到当时发电功率最大的水平。到90年代末，美国的重要城市都建立了发电厂，大企业已普遍使用电能作为动力。电力技术的突破加速了美国工业化的进程，使之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并超过以蒸汽动力为基础的英法等国。此外，电的使用亦渗人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导致城市生活中有轨电车的出现和电风扇、电动缝纫机等家用电器的发明，从而改变了社会文化的面貌。

电力革命带动了通讯手段的巨大变革，美国在电话和无线电通讯的应用和推广方面亦相当领先。美籍苏格兰人亚历山大·贝尔在这方面具有独到的贡献。1876年3月10日，贝尔及其助手托马斯·华生首次试验成功世界上第一部实用电话机，并在美国独立百周年费城博览会上引起国际轰动。翌年3月，波士顿的E·霍姆斯制成第一部电话交换机，使电话传递得以系统化。1880年3月贝尔电话公司成立，它以贝尔的各项专利为基础，大规模发展美国电话事业。当年就生产电话机47,900部，1890年达到227,900部，1900年更增到855,900部，美国成为世界上电话使用最为普及的国家。到19世纪末，无线电通讯也迅速从实验室走向了实用。意大利人曼彻斯·G·马可尼在1894至1896年间试验成功无线电通讯。1899年他被美国海军部聘为舰艇无线电设计师。同年又成立马可尼无线电公司，转入大批量生产无线电设备。通讯手段的突破把美国经济联结为更加紧密的整体，加速了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同时，也为文化生活的多样化提供了丰富的来源。

在第二次技术革命中具有领先地位的汽车制造技术，在美国也是后来居上。1893年9月21日，杜里埃兄弟在吸收欧洲汽车技术的基础上，试制成功美国第一辆单汽缸内燃机汽车。这辆汽车外型奇特，车轮是木制的，车厢安有双人座椅和黄铜罩的煤油

车灯。当它首次行驶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大街上时，引来了无数人的好奇目光。同年，亨利·福特制成时速为25英里的汽车。紧随其后埃尔伍德·海恩斯和阿布尔森兄弟试制的汽车相继问世。在这些试制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了美国汽车工业的雏型。

19世纪末美国能够在新技术的突破和推广方面取得如此成效，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实行多轨制的科技研究。政府基本上不插手研究工作，但给予资助和协调，主要由大学、企业集团和民间团体直接从事研究。例如，1875年康涅狄格州威斯莱阳大学在州政府和农业界的资助下，建成美国第一座农业实验站，对当地农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各州纷纷仿效康涅狄格的经验建立起一批农业实验站。许多大公司也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所，它们不再单纯依赖私人发明家的成果转让，而是高薪雇佣专家进行集体研究，为公司提供更加质优价廉、能迅速占领市场的产品。贝尔电话公司、柯达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等都拥有竞争力很强的实验研究机构。还有许多民间团体和私人对科技研究和传播进行资助。英国化学家詹姆斯·史密森捐赠巨款在华盛顿建立史密森博物馆即突出例子。正是由于科学技术通过多种渠道进入社会生产，美国企业界得以出现跳跃式发展，并由此形成企业－大学－政府三者协调科研的模式和传统。

〔工业化的深入发展〕　　工业化发展不仅表现在新技术的突破和渗透方面，而且是各工业部门在生产规模和技术构成方面的质和量的进展。因此，这个时期美国工业革命不再是简单重复英国走过的道路，而是在十分广阔和深刻的层次上实现工业生产力结构的变革。

19世纪最后40年间美国工业的发展速度极为惊人。1860年它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居工业生产第4位，还不足英国工业总产值的1/2。到1890年，美国工业产值已跃居世界首位，占世界

工业总产值的1/3弱，打破了英国工业的垄断地位。在这30余年间，美国工业增长率始终保持在4%至5%之间，在当时资本主义强国中首屈一指。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看，其年增长率为1.4%至1.7%；70年代人均产值531美元，到1900年已达到1,000美元。[①] 如果考虑到这个时期美国很高的人口增长率和移民人口，那么在30年内做到人均产值翻一番，也应承认是生产力高速度发展的标志。

工业化的直接后果是国民经济结构中工业与农业的比重发生根本变化。首先是制造业产值大幅度增长，其指数从1860年到1899年增长了6倍（从16增到100）。由此引起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开始下降。1884年美国工业比重在国民经济中第一次超过农业，[②] 美国开始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同时，制造业内部结构也发生变化，轻工业比重逐年下降，重工业上升。

工业化在各个部门的纵深发展也是相当迅速的，主要表现在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提高和新工艺技术的采用。在钢铁业中，自1863年底特律的沃德炼铁厂首先采用先进的贝塞麦炼钢法（即酸性转炉炼钢法）以后，各企业纷纷淘汰内战前用鼓风炼钢的陈旧工艺，转采新法。由此降低了炼钢成本，钢产量迅速上升。1868年，美国又引进了西门子·马丁炼钢法（即敞炉炼钢法），用这种方法炼出的钢较有韧性，适合制造机车锅炉的钢板。到90年代，苏必利尔湖富铁矿开发和高炉质量的提高，使马丁炼钢法进一步流行。随着新工艺的普及，美国的钢产量从1875年的不足40万吨上升到1900年的1,000万吨[③]。此外，大型高炉、

① 《美国历史统计》，第224页。

②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1488—1960》，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第14页。

③ 《美国历史统计》，第693页。

采矿电铲、卷扬机、大吊车、轧钢水压机等设备投入使用，使钢铁业的生产流程基本实现机械化。

钢产量的激增引起机器制造业的质变，一系列大型机械都以钢代铁，开始由本国工业生产。自动六角转塔车床、电动机、发电机、蒸汽机、建筑工程机械、农业机械、内燃机等等都开始转向大批量生产。机械工业的投资也从1879年的2.4亿美元增至1899年的9.24亿美元[①]。机器制造业规模经济的联合化和专业化，又为零部件的标准化创造了条件。机械修配业和连续生产工艺都随之兴起。机器制造业是整个制造业的核心部分，它带动了其他工业部门的连锁反应。

石油工业是19世纪末美国最为突出的新兴部门。1859年，埃德温·德雷克上校在宾夕法尼亚的泰勒斯维尔打出第一口油井后，“黑色黄金热”旋即风靡美国。整个60年代，原油开采企业从64个猛增到2,300多个，产值从200万美元跃至1,800万美元[②]。到60年代末，炼油业产量达到520万桶，其中出口27万桶，占当时美国出口价值的第4位[③]。70年代以后，石油业开始大量采用分馏和裂化提炼法，加速了炼油工业部门的自动化。同时，大规模铺设输油管道、扩大石油副产品种类，使石油工业向着多种经营的综合部门转变。到1900年，原油产量已近1亿桶，其中300万桶以上供出口。

各工业部门的产量提高刺激了对动力和燃料的需求。1870年制造业使用的动力总量为240万马力，1890年达600万马力；其中水动力不足1/4，蒸汽动力占3/4强[④]。在燃料方面，煤炭燃

---

① 《美国历史统计》，第684页。
② 《美国历史统计》，第580页。
③ 艾达·塔贝尔：《美孚石油公司史》，纽约1963年，第21页。
④ H.N.沙伊贝等：前引书，第40—41页。

料所占比重急剧上升，取代了木炭而成为主要燃料（1865年以前木炭占工业燃料的81%）。煤产量在1860年仅1,800万吨，到1899年煤产量已达2.3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1/3并跃居第一。

传统的轻工业部门如食品业、纺织业、成衣业、木材加工、印刷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较突出的是食品加工业。由于冷藏运输工具的发明和机械装配线的采用，肉类加工在芝加哥等地得到迅速发展，罐头食品开始在市场上行销顺畅。制糖业、榨油业、酿造业等因采用新的精炼和蒸馏工艺而使产量成倍增长。面粉业在采用“匈牙利碾磨法”（将数个钢磨辊用钢轴连结）后，能够大量加工小麦，使面粉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商品。服装、制鞋业也开始采用机械动力和流水作业，生产成本下降4/5。轻工业部门的巨额利润为其他工业部门提供了资金和市场，同时也基本满足了当时激增的美国人口的消费需求。

由于美国各地的自然资源条件不同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这个时期工业发展的地域性特点也相当明显。在大湖区形成以钢铁业、机械业为主的制造业带。在密西西比河中游的伊利诺伊、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明尼苏达和密苏里则形成食品加工业带，其中芝加哥的肉类加工和农机制造，明尼阿波利斯的面粉加工业和圣路易斯的谷类加工都相当发达。中西部地区在1890年制造业比重方面已超过新英格兰地区，成为仅次于大西洋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地区，[①] 由此加速了美国经济重心的西移，1850至1890年间约向西移动225英里[②]。中西部制造业带更接近原料产地和市场，且居于腹地，铁路网发达，新企业较多，故在发展速度上

---

① 哈维·珀洛夫等：《地域、资源和经济增长》，内布拉斯加1960年，第152—153页。

② 福克纳：前引书，下册，第53页。

能快于东北部。东北部制造业带则以轻纺工业、造船业及外贸业为主，受海外市场影响较大。两大制造业带的形成，使19世纪末美国的全国市场更加一体化了。另一方面，地域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也十分突出。直到1880年，南部的制造业和采矿业产值仅1亿美元，只相当于北部的1/20。[①] 远西部和太平洋沿岸诸州尚在开创时期，工业化水平更低。上述地域特点说明，尽管19世纪末美国工业化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向纵深发展，但在其他地区仍有广大空间有待开发，即后人所谓20世纪的"工业边疆"。

〔交通业、通讯业的重大变革〕　促使全国市场进一步联结和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另一重大因素就是19世纪末美国运输和通讯事业的突飞猛进。其核心部分就是铁路运输的巨大发展。全国铁路网总里程从1870年的5.3万英里上升到1900年的近20万英里，超过当时欧洲铁路里程的总和，相当于当时世界铁路总长的1/3。铁路建筑吸收了美国工业的很大部分生产能力，并带动了各部门的加速运转。美国经济史学界根据约瑟夫·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19世纪末的铁路是当时经济生活中最重大的革新和原动力；铁路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和企业活动。这种看法不无道理。

70年代以前，美国铁路大部分集中于北部，铁路网极不完整，缺乏复线和中间枢纽站，且轨距宽窄不一，各种型号达数十种。70年代以后，铁路进入大发展时期。1869年5月10日，联合太平洋铁路和中央太平洋铁路在犹他州的普罗蒙特里峰接轨，标志着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铁路正式建成，把西海岸与东海岸连接了起来。此后不久，大北铁路、北太平洋铁路、圣菲铁路和南太平洋铁路陆续筑成，构成了纵横交错的全国铁路网。在其他技

---

① 哈罗德·G·瓦特：《走向工业成熟》，康涅狄格1975年，第39页。

术设施方面，铁路也采用了许多更新措施。例如，以钢轨取代铁轨提高了路轨的耐久性和载重量，使用大功率机车和重型车辆提高了火车的运载能力，还有空气制动阀、自动接车器和连续信号系统提高了铁路运行安全系数。因此，铁路运输量急剧增长。1882 年至 1900 年铁路客运量从 2.89 亿人次增到 5.77 亿人次，翻了一番；货运量也增加了 2 倍。[①] 铁路运输能力基本上同整个经济增长保持平衡。

政府对铁路的鼓励措施主要是进行土地赠予。从 1850 年至 1871 年，联邦政府赠予铁路的土地达 1.75 亿英亩，铁路实际得到土地约 1.3 亿英亩。同时，政府还给铁路公司以优惠贷款，共约6,500 万美元，这些贷款刺激了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对美国铁路的资本投人。即使在当时的高关税政策下，政府仍对进口路轨实行免税。这些措施保证了主要铁路干线的建成。例如中央太平洋铁路投资的 1/4 和联合太平洋铁路的 1/3 投资均来自赠予土地的价值。由于西部铁路与土地联系在一起，铁路也很快成为向西移民和运出农产品的主要渠道，由此赢得的巨额利润往往又转变为对铁路的再投资，铁路投资总额亦随之不断增加，到 1894 年已达 100 亿美元[②]，成为当时美国经济中资本投入最多的部分。

铁路同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关系越紧密，陷入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程度也越深。由于铁路重复铺设过多，造成营运不足、成本上升；互相竞争导致运价下跌；加上掺水股票使资本周转极不正常；每当危机到来时，铁路受到打击最早、最重。1893 年危机中全国 1/4 以上的铁路宣告破产。纽约金融界乘机大肆兼并。

---

① 《美国历史统计》，第 428—431 页。
② 《美国历史统计》，第 738 页。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4个大集团初步形成。其中由J.P.摩根、詹姆斯·希尔和范德比尔特组成的集团实力最为雄厚，控制铁路里程约8万英里。库恩—罗比公司和爱德华·H·哈里曼组成的集团控制了25,000英里铁路里程和拥有5万英里铁路的大部分股票，位居第二。其三是古尔德家族集团，控制里程约17,000英里。第四个集团是罗德艾兰集团拥有15,000英里铁路线。这4个集团掌握着全国铁路总收入的85%。各集团之间通过股权渗透、兼任董事、普尔联营等方式，使各铁路公司盘根错节地交叉在一起。

其他运输业虽然不及铁路发展迅猛，但也各有其特殊的发展方式。内河运输在这个时期较为萧条，密西西比流域的航运大部分尚未开发。东北部的运河系统亦过于陈旧，不适合大批量运输。仅五大湖流域水运还较繁忙，主要以驳船运输笨重物品和煤铁矿石，其运量从1865年的67万吨上升到1890年的100万吨。由于大湖地区的水运费用仅为铁路的2/5左右，故这一地区的水运在20世纪仍呈上升趋势。这个时期美国海上运输主要依靠租用外国船队来承担，只是沿海贸易保持由美国船队承运，其船舶吨位总和逐年上升，1890年达到340万吨。尽管如此，美国到90年代也开始加紧远洋轮的建造，建立起4个可生产万吨级海轮的大型船厂，为日后的大规模远洋贸易打下基础。其他陆上运输工具以输油管道发展最快，到90年代末，已建成油管约1万英里。市内交通则出现了地下铁道、高架铁路、有轨电车等。这些运输手段补充了铁路运输的不足，构成了更广更深的全国运输网络。

运输系统的巨大发展使邮政、通讯事业相得益彰。从1863年后城市居民开始实行自由邮递制度，到1896年这项制度已普及到大部分乡村。国会在1872年先后立法规定新的邮政分类和

优惠邮件制度，报纸和印刷品均在优惠之列。报纸成为传递商业消息的最重要工具，1880年至1900年间的报纸发行量增加了5倍。随着电话、电报等通讯手段的发展和普及，19世纪末美国已有初具规模的电报、电话网络。1856年成立的西方联合电报公司经过30年竞争，购买了575家电报公司的所有权，在1886年确立了在电报业的统治地位，建立起较完整的全国电报系统。1876年成立的贝尔电话公司后来居上，它购买了几乎每个县的电话特许权。到1880年它所经营的电话线已达300万英里，并在90年代建立起遍及整个美国的贝尔电话系统，其作用超过了西方联合电报公司。电话在美国家庭和社会生活中迅速普及，1880年每千人仅拥有一台电话机，到1900年已达每千人18台。通讯事业的巨大变革使工商业活动得到充分信息，周转加快；使巨大的企业集团能做出集中决策并分散经营；使铁路远距离运行受到更完备的监控；使政党斗争变幻更加莫测，政府对各地出现的紧急事件能作出更迅速的反应；还使人们能在大陆的各端之间保持联系，从而加速了社会流动性。总之，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变革使19世纪末的美国跨入了现代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门槛。

第二节　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

〔向垄断过渡的市场条件〕　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和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出现，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基本前提。然而，资本的集中和垄断还必须获得有利的市场环境。19世纪末的美国正是具备了流通领域的各种变化条件，使商品和金融的运转渠道最终汇集到少数资本集团之中。

首先是工业化形成的城市群和制造业带，为生产集中创造了

有利条件。1880年，新英格兰、大西洋中部和大湖区集中了全国制造业的4/5和城市人口的3/4。这部分工业心脏地区吸收着最大量的农产品和原料，并依靠铁路网把产品输送到全国各地方市场。制造业带内各企业短兵相接，竞争加剧，有利于少数占据生产优势的大企业形成垄断地位。同时，地区的专业化更为部门经济垄断化提供前提。例如，位于苏必利尔湖富铁矿和宾夕法尼亚无烟煤矿之间的匹兹堡，就成为当时独一无二的钢铁工业中心，并由此产生了强大的"美钢"体系。处在西部盛产谷物和肉类的大平原与东北工业区的粮食主要消费市场之间的芝加哥，则迅速兴起独占鳌头的食品加工业和农机制造业。克利夫兰落在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大油田中心地带，从而成为石油巨头"美孚"的发迹地。所有这些，都证明美国的生产力布局特别易于形成高度的垄断组织。

其次，因大批量商品生产而使流通方式发生变革，也为垄断企业深入市场结构的深层，控制整个社会的消费创造条件。19世纪末美国已形成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连结的商品销售网，中心城市为外围市场的商品进行仓储、批发、结算和装运。旧的直接出售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现象逐渐减少，代之以直接与大企业集团挂钩的百货商店、联号商店、邮购商店以及它们下属的零售商店。强大的商品洪流在各方面推动下摧垮小企业的陈旧流通方式。例如新颖的商标、大规模的广告、耐用消费品的赊销方式以及顾客自选自购等等，对资本雄厚的大企业无疑是强有力的刺激。在生产领域内，开始形成专业范围内联合的批发商集团，他们为企业承销商品、代购原料、供应零部件、开辟市场以及向零售商扩大信贷等等。专业化批发商促使企业将资本更集中于生产领域而较少地搁置在流通领域中。而且采用新技术的大企业可以不断降低批发价，迫使落后的同行们屈服。商业广告费用在

1867年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7%左右，到1904年已上升到3.4%[①]，这个水平一直保持至今。这说明激烈的市场竞争最终为垄断企业打开了道路。

其三，交通运输条件空前发展也是垄断企业打破地域隔阂，确立其全国性优势的保证。在内战前，美国的贸易格局大致是货流顺着密西西比河由北向南、沿着伊利运河和五大湖由东向西而进。但是80年代全国铁路网的建成完全打破了这个单向的格局。货物已能够向任何方向运输，支配货流的已不是地区需要，而是经济利益了。在某个部门占据优势的企业打败了临近地区的竞争对手后，可以利用铁路向存在着其他对手的较远地区倾销，直至确立完全的垄断地位。美孚石油公司在这方面是最为突出的。某些势均力敌的大企业各自勾结不同的铁路集团，展开残酷的“运价战”。结果是加速了铁路的合并和大企业之间的联合。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发达的中心城市几乎都成为少数垄断企业争夺的目标，并且最终形成了适合于市场条件的垄断体系。直到本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体系才发生变化。

其四，技术市场同样是孕育着垄断组织的温床。19世纪末技术革新和发明层出不穷，在美国形成了一个日益扩大的技术市场。因美国政府的专利保护制度，促使企业必须以高价抢购最为有利可图的新技术。许多大公司依仗其雄厚资金收买某个部门的全部或绝大部分专利，从而在实际上消除任何对手竞争的可能。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原来的贝尔电话公司）等垄断组织，几乎都是依靠专利垄断发展起来的。尽管在新技术工业中形成垄断的现象较为普遍，但是在传统

---

① 丹尼尔·波普：《全国广告业的发展，1865—1920》，载《经济史季刊》1974年，第295—296页。

工业部门中亦发生类似现象。如联合制鞋机械公司通过各种手段取得该行业的所有技术专利权，从而控制了制鞋工业的全部生产。技术优势与资本优势就是如此转化的。

有利于垄断形成的市场条件还有阻止外国商品竞争的高关税政策和廉价而丰富的农产品及原料市场等。所有这些都为美国垄断资本形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

〔资本的加速积累和集中〕　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必然带来资本的加速积累和集中，由此构成了垄断资本主义的深厚基础。资本积累的规模决定了资本集中的程度。内战后美国经济正体现了这种积累规模大、速度快的特点。

1865年以后美国的社会资本积累率以每10年增加45%至60%的速度上升，相当于人口增长速度的2至3倍。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资本积累价值：1869年为1,120美元，到1899年达3,250美元，大大超过人口平均产值[①]。这些数字说明在这30年中投资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就生产投入要素的指数来看，从1860年到1900年间，劳动力增长1.5倍，土地增长1.5倍，国民生产净值增长4倍，而资本增长达7倍[②]。远远超过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规模。资本积累的主要成分是固定资本即生产资料的增长。因此，高积累率首先是促使资本流向制造业，尤其是重工业即基础工业部门；在这些部门中较快形成资本密集型的垄断企业。

在制造业部门中，资本积累总额在1869—1881年间是240亿美元，在1882—1901年间约为600亿美元。这巨额资本主要来源

---

① 西蒙·库兹涅茨：《美国经济中的资本：它的形成和积累》，普林斯顿1961年，第64—65页。

② 苏珊·李与彼得·帕塞尔：《美国经济史的一种新观点》，纽约1979年，第268页。

有内战中获取暴利的商业资本，将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工业资本，利用存款进行投资贷款的银行资本以及政府提供的拨款和津贴。外国资本也积极投入美国制造业。1865—1898年间，外国投资者控制的美国债券和股票已达34亿美元。丰富的投资来源与高积累率相结合，使工业企业的规模迅速扩大。内战前美国的投资额近百万美元的企业寥若晨星。但到1900年，资本额在百万美元以上的大企业已比比皆是。它们占企业总数的0.9%；却占工人数量的25%和工业产值的38%，表明这类大企业在19世纪末已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①] 以钢铁工业为例，在1870年钢铁厂平均投资额只有15万美元，但到1905年已增至150万美元，其中居垄断地位的美国钢铁公司的投资额已达14亿美元[②]。制造业中其他重工业部门的企业投资规模也大致相同。

如此巨大的投资规模，仅仅依靠某家独立企业的资本力量是无法进行的。为了动员和筹措各方面的资金来源，股份公司成为内战后工业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股份公司具有迅速膨胀资本的功能，在资本集中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它“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③] 内战后的铁路公司正是这种“巨大股份公司的一个新的起点。”[④] 铁路公司为了吸收尽可能多的资金，采用了小额票面股票、持有者承担有限责任、利率根据面额大小而浮动、给予保险的优先股票等等股票经营和运转方式，使股份公司

---

① 菲特与里斯：前引书，第462页。

② 同上。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687页。

④ “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1879年4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47页。

的资本集中速度大为加快。随着铁路狂潮的兴起，铁路公司又进一步采用比股票更吸引投资者的债券发行，持有人的权益更加得到保证。到70年代，主要铁路公司的资本都在1,000万美元以上，中央太平洋、巴尔的摩—俄亥俄、纽约—伊利等铁路公司都超过2,000万美元。[①] 其资本集中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工业部门。到1883年，各铁路公司的名义资本总计已达75亿美元。[②] 尽管其中约有20亿是资本估值过高的掺水股票，这样大规模的资本积聚仍是当时所罕见的。80年代各工业部门也纷纷组成股份公司，加速了工业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过程。到1899年，股份公司的工业产值已占全国工业产值的2/3，成为美国工业生产的主体。[③] 股份公司从内部结构到数量的变化和发展，为企业合并、过渡到垄断提供了现成的资本集中手段。

此外，联邦政府的财政政策也为企业资本积累和集中提供尽可能的有利环境。从1872年开始，国会完全取消了所得税。这时正是股份公司和证券市场进入大发展的时期。取消所得税就意味着以各种证券形式进行周转的资本不对社会和国家承担任何义务。银行和工业资本在整整40年间（至1913年重新实行所得税）完全在竞争、联合、投机和吞并的市场调节中走向了集中。相反，联邦政府以关税、土地税和商品税为主要财源，向内战和重建时期购买国债的大资本归还本息27.558亿美元，[④] 有力地加强了东北部大资本的竞争优势，且使社会财富更快地积聚到大亨寡头手中。内战后的联邦货币政策特别有利于东北部银行资本。它们利用手中控制的过剩通货在广大西部、南部货币匮乏的地区

---

① 格伦·波特：《1860—1910年大企业的兴起》，纽约1973年，第32页。
②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419页。
③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463页。
④ 《美国历史统计》，第720—721页。

发放贷款、从事抵押，由此获得巨额利润。经过增值的货币双向流动，又转向银行对工业的投资与贷款，在一个更大范围的循环中实现了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因此，“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向垄断。”①

总之，资本的积累、积聚和集中是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关键因素，它与前述有关的市场条件相结合，为美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部分质变开辟了道路。

〔简单协定、普尔和托拉斯〕　主要生产部门内若干个大企业的并存，形成尖锐的对峙和竞争。70 年代至 80 年代，大企业之间的价格战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有时双方削价竞争以致难以承受其巨大损失。例如，从芝加哥到纽约当时的每车皮标准运费为 110 美元，但在“运费战”中降至仅 5 美元，甚至低到 1 美元。许多中小企业在这种残酷倾轧中破产倒闭，少数势均力敌的大企业不得不实行暂时妥协以避免同归于尽的后果。它们通过各种协定或联合的方式来防止过分的价格竞争，保持一定的市场秩序和利润水平。70 年代以前的简单协定主要是限制各企业的产量和规定共同价格。这些协定大多是口头默契而缺乏法律约束力，其临时性和不稳定性极为明显。尽管这种协定一度盛行，但由于参与者们随时背弃，残酷的市场竞争有增无已。因此，它就很快被成文的普尔协定所取代。

普尔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垄断组织，其形式也相当繁多不一。从规定产量、价格或划分销售市场，到设立总经销机构，各种流通领域的垄断方式都包括其中。最初是铁路公司采用普尔来控制运价，接着在黄铜业、制盐业、制绳业、煤炭业、酿酒业等部门相继出现。其中以密歇根食盐协会最为典型。70 年代初，全美

---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740 页。

国共有66个盐业公司，互相展开剧烈竞争，每桶食盐销售价猛跌到1至0.5美元。为了制止价格进一步下降，各公司在1876年组建了密歇根食盐协会。其成员公司组成了19人的总经销机构，控制全国食盐销售量的85%。[①] 各成员公司在生产方面仍保持独立，但在销售领域则完全服从于总经销机构，实际上协会已具有辛迪加性质。钢铁业也盛行普尔。1887年成立的钢轨普尔垄断全国钢轨销售的90%以上。[②] 钢轨普尔规定其成员公司的产量，销售价格则由各方协商达成默契。这种普尔具有卡特尔性质，其他工业部门中也较为常见。

各种普尔的共同特征是在流通领域的集中和控制，是走向垄断的重要步骤。但普尔是不同企业在特定条件下的松散联合；一旦条件发生变化，这种松散的利益结合即顷刻瓦解，有关企业可以自由退出或任意违反协议而不受惩处。普尔的市场控制是以牺牲中小企业和消费者利益为基础的，因而激起社会中下层的强烈不满。而且普尔恰恰触犯了美国关于禁止商品贸易中实行限制性行为的习惯法。1887年州际贸易法明文规定铁路普尔为非法行为。这样就使很不稳定的普尔更加失去法律的保护屏障。到80年代末，除了一些短期普尔以外，大公司一般放弃了这种合并形式。

美国的企业联合形式的第二步就是托拉斯的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托拉斯是各企业通过财产托管人而将所有权合并的垄断组织，而不是泛指一切垄断组织或联合企业、大公司。这种在生产集中的基础上形成的高级垄断组织形式首先由美孚石油公司创立。1882年，美孚石油公司采用“财产托管人”的古老形式建

① 范·海斯：《集中与控制》，纽约1921年，第65页。

② 埃利奥斯·琼斯：《美国托拉斯问题》，纽约1928年，第9页。

立了美孚托拉斯。美孚在石油生产的各部分（除原油开采）自成系统，并控制了全国炼油、副产品加工及输油管运输的90%以上。整个美孚托拉斯由40家公司所组成，全体股东推举9名托管人组成董事会，然后将各公司的财产转移到董事会名下，各股东凭托管证按照股份比例在利润总额中获得其应得份额。美孚托拉斯拥有24家公司的全部股份和16家公司的部分股份，发行股票价值7,000万美元，9名托管人拥有其中4,660万美元股票，占股票总额的66%。美孚逐步健全托拉斯组织机构，在董事会下设行政委员会、协调委员会以及专门职能部门组成的办事机构。托拉斯的出现，为企业合并并确立其垄断地位找到一种合法的组织形式，从而在其他工业部门也相继出现托拉斯组织。如棉籽油托拉斯（1884年）、亚麻籽油托拉斯（1885年）、威士忌酒托拉斯、铝制品托拉斯、制糖业托拉斯（均1887年）等等纷纷建立。1887—1897年间资本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大公司共86个，其中20多家大公司垄断了所在部门的生产与销售。这些托拉斯大多出现在加工工业、从事消费品生产的部门，这成为早期垄断组织的一个特点。

列宁指出："美国托拉斯是帝国主义经济或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高表现。"① 托拉斯是资本积聚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是生产集中并走向垄断在生产关系上的直接体现。托拉斯适应了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社会化的客观要求，其内部组织结构的系统化和计划化为联合企业的运转提供了机制。然而，托拉斯所带来的社会财富更加集中到少数寡头手中，加剧了社会贫富悬殊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并加深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由此引起了资本主义向着部分质变的新阶段发展。

---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第35页。

〔企业合并高潮与控股公司〕　19世纪末的美国企业合并进展迅速，在主要工业部门的产量增长与企业数按反比递减。例如，钢铁工业在1870—1905年间产量增加了9倍，企业数却减少了2/3。1880—1905年造船吨位增加1倍，而造船厂减少了1/2。[①] 农机制造业在1860—1905年产值增加5倍之多，工厂数减少了1,500多家。这些都说明生产集中必然伴随着企业合并高潮的到来。

美国垄断组织的发展主要通过纵向合并和横向合并两种趋向进行的。纵向合并是从控制部门内的生产加工过程开始，继而控制其原料来源及销售市场。纵向联合对于专业化企业的流水线生产和有计划分配原料资源十分有利。横向合并是某个或几个大企业将同一产品或相近产品的生产加以控制，进而对该产品销售实行垄断价格。事实上的合并过程往往是纵横交错的，但由于各工业部门生产性质不同，其合并过程则以某种趋向为主。

肉类加工业是纵向合并的突出例子。70年代以前肉类加工的各生产工序包括牲畜屠宰、鲜肉处理、包装都是由许多小公司分别完成。这些小企业虽大多集中在芝加哥，但销售市场主要在东北部城市。生产分散和运输损耗造成很高的生产成本。1878年古斯塔夫斯·斯威夫特建立将各工序联合为一个过程的大公司，他在中西部牧业带建立大型屠宰厂，就地购买和屠宰牲畜；然后用公司的冷藏车把已加工的肉类运往东北部城市；同时在各大城市建立大型冷藏库加以贮存。在此基础上公司又与各地零售商联合经销，从而大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安德鲁·卡内基公司是纵向合并的又一典型例子。70至80年代，卡内基一方面大力投资于新技术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尽可能地控制铁矿石、煤炭和

①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470页。

焦炭等原材料，并建立起公司所属的运输船队和专用铁路线，从而在钢铁工业中最早形成完整的生产体系，使匹兹堡迅速成为钢铁工业的中心。

如果说生产过程本身要求企业实现各种形式的合并，那么周期的经济危机则大大加快了合并的步伐，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催化剂。1893年经济危机就是美国垄断组织发展史上的重要界标。这次危机以金融混乱为起点，使大批资本不足的中小企业纷纷破产，企业合并进入了高潮。这次企业合并高潮从1893年持续到1904年，其间所组成的托拉斯组织350个以上，破产企业达数万个。拉尔夫·纳尔逊认为这次合并高潮中“几乎有一半企业被吞并了，并且有十分之七的合并资本都属于在市场上取得领导地位的那些合并者所占有。”① 经过这次合并高潮，大约有3,000个企业的68.127亿美元资本被合并到垄断组织之中。② 至此，美国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已相当深刻地表现出来了。经济危机只不过是将19世纪最后30年新旧结构交替之中的各种矛盾冲突激化，并转变为新结构的基础。

在这次合并高潮中垄断组织不仅在量的方面发展迅速，而且在质的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即出现了垄断组织的更高形式控股公司。当时的合并方式一是大公司将其他公司的股票与财产全部收买，另一则是采取控股公司，这较之完全收买方式更有利于资本积聚和集中。控股公司是由母子公司组成金字塔式的系统组织。母公司只要掌握子公司一定比例的股票份额，即可获得对子公司的控制权；子公司又以此来控制孙公司。但在经营管理方面，子

① 拉尔夫·勒·纳尔逊：《美国工业的合并运动，1895—1956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9年，第102页。

② 拉尔夫·勒·纳尔逊：《美国工业的合并运动，1895—1956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9年，第37页。

公司仍保持相对独立。新泽西州最先对控股公司给予法律保护。1888—1896年该州为了吸引各大公司的投资，多次修改立法以保证控股公司的合法地位。于是，许多垄断组织纷纷在新泽西州办理营业执照。仅在1899—1901年间，新泽西州每年签发的公司营业执照就达2,172份①。西弗吉尼亚、特拉华、缅因等州也如此效法。垄断组织由此逃避了反托拉斯法的限制，更加无所顾忌地开展各种企业合并。1,000万、5,000万以至1亿美元资本的大公司遍布美国各工业部门。

在创建控股公司的过程中，美孚石油公司在1899年率先从托拉斯变为控股的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即当代的埃克森石油公司前身）。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组织结构呈金字塔形。母公司控制着41个子公司的股份，子公司又控制着70个孙公司，孙公司还拥有自己的下属公司和企业。② 原来托拉斯的财产托管证被取消，资本集中程度大为增强。其生产过程的整体性也进一步提高，石油生产、储存、运输、销售各环节之间形成有机的紧密联合。母公司以决策权为中心，而子公司则保持独立经营的灵活性，改变了以往托拉斯过分集权的弊病。控股公司改变了董事会集所有者和管理者于一身的状况，扩大了经理—管理阶层，建立起"集中化和部门职能化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控股公司的结构比托拉斯更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其垄断程度也更高，因而是一种较成熟的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企业合并高潮扩大了证券交易市场的作用。1893年危机后，证券交易从经营政府公债和铁路股票转向以工业证券投机为主。

---

① 拉尔夫·海迪夫妇：《大企业的先驱，1882—1911年》，匹兹堡1968年，第309页。

② 拉尔夫·海迪夫妇：《大企业的先驱，1882—1911年》，匹兹堡1968年，第312页。

大约有 3/5 的合并企业股票在当时进入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大公司发行巨额证券以吸引资本，从而使金融界越来越渗透到工业资本之中。银行参与工业有价证券的投机交易和公司改组，成为证券市场的中心。另一方面投资银行在这时期蓬勃兴起，作为投资者和企业家之间的中介人，通过代销证券控制企业，从而加速了工业垄断资本与银行垄断资本的融合。J.P. 摩根就是在这种融合过程中成为美国最大财团的首领。他控制的商业银行和纽约第一国民银行拥有雄厚的金融实力，以此为基础对钢铁、造船、电气、农机、铁路等部门进行巨额投资，控制了许多垄断企业的股份，从而形成美国第一个大财团。约翰·洛克菲勒的美孚集团也在 90 年代打入金融界，他通过詹姆斯·斯蒂尔曼控制了花旗银行，进而向其他工业部门和铁路投资，形成当时美国的另一个金融中心。

总之，1893 年危机后，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全面形成，现代美国经济的模式已具雏型。

〔资产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资产阶级内部分化为垄断资产阶级、旧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三个层次，它们既互相分离又互相结合。以此为轴心，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对流和变动。

19 世纪末垄断资产阶级已控制了美国经济的命脉。他们凭借其在生产领域的支配地位，占有着与其人口比例极不相称的社会财富。当时的百万富翁家庭不到全国家庭总数的 1%，但其个人收入却占全部国民收入的 10% 以上。据 1892 年的统计，这些百万富翁中约有 1，300 名从事商业、投资业和银行业；600 多名在制造业中，200 多名在交通运输业；此外还有 400 多名在采矿、木材和石油业①。大约有 100 余个超级富翁平均拥有财富在2,500

① 康马杰等：前引书，第 2 卷，第 362 页。

万美元以上。最为富有的寡头仅 10 人，其财富都在 1 亿美元以上。垄断资本家吸收着全国红利收入的 2/3 和利息收入 1/2，说明他们是食利者阶层的主体。反映出这个阶级的生存基础和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就是最大限度地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垄断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其他阶层的急剧分野，是这个时期整个社会阶级结构最主要的变化。

曾经有过“黄金时代”的美国中产阶级地位急速下降。他们所赖以存在的旧生产方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更无力抵御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和垄断企业的残酷倾轧。在 1873 年和 1893 年的两次经济危机中，中小企业破产总数达 411,908家。[1] 然而，独立企业在数量上仍占企业总数的 90%以上。旧中产阶级为了避免被淘汰的厄运，只得改变其活动方式。其中一部分保留着企业所有权，但在原料和市场等方面不断被垄断企业所控制，逐步成为附属于大企业的专业化协作企业。另一部分被兼并的独立企业主则失去对工厂的控制权，成为股票持有人而分得少部分红利。尽管如此，旧中产阶级地位仍极不稳定，或者由于其“局外性质”成为大财团转嫁危机的牺牲品，或者由于股票行情大幅度浮动而变得身无分文。虽然旧中产阶级也具有向工人榨取剩余价值的本质，但他们也力图通过国家权力来改变垄断资本造成的严重弊端，以改良主义来缓和社会矛盾。在没落之中提出某些进步的要求，是旧中产阶级两重性的特征。

与旧中产阶级相反，“新中产阶级”却随着垄断资本主义而发展起来。这个阶层本身并不拥有企业所有权，他们受雇于垄断资本的大企业；但是他们掌握着一大部分企业管理权，并成为“集体资本家”各层次之间的纽带。控股公司和联合企业的多层

---

① 《美国历史统计》，第 912—913 页。

次结构，造成资本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是新中产阶级产生的首要前提。垄断企业的跨州、跨部门活动使垄断寡头只能在纽约、芝加哥等中心城市遥控，企业的直接管理就操于经理人员之手了。财团大公司的合并、协定、交易等往往委托给中介代理的专职律师、经纪人等，他们比董事们更熟悉整个公司的运转和联接。例如，埃尔伯特·盖利作为法律顾问办理从苏必利尔铁矿到卡内基公司的 12 个大公司合并，组成了巨大的美国钢铁公司，盖利本人也从一名律师跃为总经理。垄断企业为了在竞争中打败对手，尽量采用新技术和高效管理、网罗科技和管理人员，从而扩大了新中产阶级的来源。到 1900 年，农业以外各经济部门的经理人员已达 151 万人，高级工程技术人员有 38 万人。① 其中像创造“血汗劳动制”的泰勒，为垄断资本获取高额利润使用了“一切科学方法”。新中产阶级的两重性同样十分显著：新中产阶级本身受雇于垄断资本，但其收入水平远远高于一般雇员之上，最高年薪可达 10 万美元以上，故也参加了瓜分利润的行列；其中少数人虽然有可能进入财团核心，但多数却地位不稳定。新中产阶级本身执行着个别财团代理人的职能，但其中很多人鼓吹国家干预政策，试图把企业内部的计划管理用于社会改革。新中产阶级的两重性，是进入垄断时期美国社会阶级结构复杂化的关键性因素。

19 世纪末的美国社会阶级结构仍带有新旧交替的特点，但其基本趋势是垄断资产阶级同整个社会日益处于对立状态之中。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条件而出现的新阶层，同时也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否定因素在发展着。

---

① 《美国历史统计》，第 141—142 页。

第三节　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农业商品化和地区专业化〕　在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突飞猛进的同时，农业资本主义也在19世纪末叶获得巨大发展。一方面是西部农业开发和耕地面积空前扩大；另一方面是农业机械化、专业化和商品化的水平迅速提高。60年代宅地法实施和横贯大陆铁路的修筑，使移民如潮水般地涌向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大平原和落基山麓垦荒拓殖。1866年至1900年，全美国的耕地面积由4.07亿英亩增加到8.79亿英亩；农场数由204万个增加到643万个。[①] 其中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发展更加迅速。1870年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农业总产值为全国农业总产值的16%，到1890年已上升为33%[②]；西部人口在全国的比重也从1870年的14%上升到1900年的25%[③]。西部农业的迅速崛起表现出19世纪末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在广度上发展的特点。由于耕地面积急剧扩大，美国农业在这个时期迅速实现以畜力为动力的半机械化。1860—1900年间，农业机械和农具总值从2.46亿美元增加到7.50亿美元。农业劳动生产率成倍地提高。90年代末的小麦劳动生产率比内战前提高了17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农业在这40年间每年以2.5%的速度递增，其总产值也从1860年的22亿美元增加到1900年的58亿美元。这种农业发展速度尽管得力于美国自然条件的优厚，仍然是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

---

① 《美国历史统计》，第228页。
② 沙伊贝等：前引书，第49页。
③ 沙伊贝等：前引书，第56页。

农业生产力提高是与农业商品化程度加深同步进行的。横贯大陆铁路的建成把西部农业与整个国内外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深深卷入商品经济的漩涡。西部农业的生产一直以东部工业城市的需求为市场，并以此来交换所需农业机械和消费用品。东部和南部的农业商品化程度也比内战前大为提高。农产品不仅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而且大量出口成为欧洲市场的主要供应者。例如小麦出口在总产量的比重从 1878 年的 35.8% 上升到 1893 年的 41.5%。其他大宗产品如棉花、肉类等也一直保持着出口的上升趋势。

农业商品化趋势促使美国农业原有的地区专业化进一步发展，在各地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条件差异的基础上，形成了若干以单一作物集中种植的“生产地带”。主要有西部小麦带、中部玉米带、东北部多种经营带和南部棉花带。

内战后，小麦带从原来的俄亥俄河流域向西移至密西西比河以西、密苏里河中上游和太平洋沿岸地区。小麦生产适合于大规模经营，故在这些地区形成一批耕地面积在1,000 英亩至 1 万英亩、实行雇佣劳动制的巨型机械化农场。这些大农场一般直接接受东部的投资和管理，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小麦生产对美国外贸具有重要意义。1860 年美国出口小麦 400 万蒲式耳，仅占出口总值 1.5%；1892 年已达 1.57 亿蒲式耳，占出口总值的 21%。[①]

玉米带主要集中在从俄亥俄、伊利诺伊到艾奥瓦、内布拉斯加等中部诸州。这个地区土壤肥沃，气候温暖；加以盛产玉米作为饲料，故又成为全国主要的牲畜产区。到 80 年代，这里除了生产全国一半以上的玉米以外，还提供了全国食用肉类和肉制品

①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第 127—128 页。

的 50%。19 世纪最后 40 年间，玉米产量增加近 2 倍，肉类出口也随之大幅度上升。

随着中西部和大平原农业迅速开发，东北部地区不得不调整农业生产格局以应付竞争。同时，由于东北部城市居民的食品结构发生变化，这一地区农场主减少了谷物和肉类的大宗生产，转向经营乳制品、家禽饲养、水果、蔬菜和花卉种植等，形成了多种经营农业区。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南部也发展起类似的农业—养殖业经营。

南部在内战后仍保持其棉花生产带的特点。70 年代末，南部棉花产量近 580 万包，超过内战前最高水平。到 1899 年，棉花产值已达 3.24 亿美元，占全国农业总产值的 11%。由于南部分成制的束缚，其机械化水平远低于其他地区。

农业地区专业化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商品化程度。各地区的大规模农产品交易促使在纽约、芝加哥、新奥尔良发展起巨大的农产品交易所。开始多以当场拍卖、银货两清的方式进行"现货"交易。不久，期货买卖盛行起来，农产品的流通速度随之加快。农场主对市场价格变动日趋敏感，竭力依靠农业机械和改良技术来提高产品竞争力。因此，农业的商品化和专业化必然推动其机械化，进而要求粗放农业走向资本密集型农业。

〔美国式农业资本主义道路及其变型〕　内战后西部农业的迅速开发，为美国农业发展开辟了一条不同于欧洲国家的道路，即农业资本主义的"美国式道路"。其基本特点是宅地农民较为自由地获得西部土地，迅速发展起与国内外市场相联系的商品化农业；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农场主发生多层次分化：少数上升为资本充足的机械化大农场主，多数则由于缺乏资本、陷入抵押债务而成为受东部金融资本控制的租佃农场主，另一部分因破产失去生产手段而沦为农业雇佣工人。美国式道路除了上述主

要趋势以外，还发展出一系列变型，即发展类型不同的北部、西部和南部；以及各种合作制的农业组织、国家支持下的农业技术机构和水利设施。因此，“美国式道路”不只是资产阶级革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手段和途径，而且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农业形成的一种模式。

北部（主要包括新英格兰、大西洋中部各州和大湖区东部）是工业发达地区。这里集中了全国工业的5/6，从而为当地农业提供了市场潜力和资金来源，促使北部农业朝着集约型农业不断发展。北部农场的土地经营面积较小，但机械化和投资水平均较高。到19世纪末，这个地区农业的耕地面积有所减少，但单位面积土地上所拥有的农机具和雇佣劳动费用都不断上升，表明北部农业的资本化程度加深。北部农业由于以乳制品、蔬菜水果等产品为主，故其耕地面积远远少于西部和南部，但其产值却占全国农业的一半以上，成为全国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农业区。北部农业模式是“美国式道路”中较为成功且代价较小的一种变型。

西部农业是“美国式道路”的典型模式。首先，内战后农业资本主义在西部的广泛发展与资本化的深层发展存在着尖锐矛盾。在80年代，大平原地区建立一个完整农场至少需要1,000美元以上的投资，用于房屋建筑、围栏、水井和购买机器、工具、饲料及种子等。而新到西部的农场主很难付出这笔资金，加以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不断追加资本以更新设备和提高技术，否则就难以在市场竞争中取胜。这样，一个农场主如不具备3,000美元资本作为最初投入，就不得不弃地而走。而这个时期数十万个农场在西部落户，其所需资金总额就极为惊人了。加上西部缺乏银行和通货，农场主能够取得资金的主要来源就是以土地抵押来取得东部银行和铁路公司的高利率贷款。因此，西部农场主走向破产

的主要途径不是大农场的排挤和竞争，而是东部金融资本渗透和控制。其次，西部农业的超速膨胀面临着日益恶化的市场条件，造成19世纪末持续农产品价格下跌，是西部农场主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19世纪最后30年的美国粮食生产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人口增长率，国内农产品市场相对狭小的同时，国际市场上又遇到加拿大、俄国、阿根廷、印度、埃及等国农产品的有力竞争，加上铁路和工业垄断组织竭力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抬高农产品运价等，使农场主陷于“成本—价格两面夹攻”的困境。1870—1895年间，美国的小麦、玉米、棉花三种主要农产品价格分别下跌了35%至50%[①]。这种市场形势促使西部农场主走向破产。其三，落后的宅地农场生产方式遇到了正在形成的垄断资本的有力破坏，使之不得不被纳入整个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轨道之中。一家一户进行独立垦殖的宅地农场主，是19世纪上半叶美国农业生产的典型组织形式。在19世纪末的商品化、机械化大农业中立即显示出它的陈旧落后的特点。宅地农场主面临着强大的铁路公司、谷仓公司、土地抵押公司以及东北部各种工业垄断组织，难以进行有效的抵抗。尽管农场主进行一系列合作运动试图改变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但他们缺乏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生产手段，故无法同垄断资本进行抗争。因此，宅地农场的独立性日益丧失，只得以租佃农场的形式屈从于东北部垄断资本的控制。一部分农场主则完全失去生产手段成为农业工人。可见，作为典型的“美国式道路”的西部农业，其最后归宿是在资本、市场和土地所有权等方面“相当完整、相当显著、相当痛苦地”依赖于垄断资本。

南部农业发展不同于典型的“美国式道路”，那里的小农基

---

① R.A. 比林顿：前引书，第631页。

本上没有获得自由土地，因而不具备发展“美国式道路”的基本条件。内战后在原来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谷物分成制，是北方的高利贷资本、南方的种植园土地所有者和缺乏生产资料的小农三者的畸形结合。这种半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方式在美国南部存在近一个世纪，使南部资本主义农业走上一条缓慢、痛苦的“普鲁士式发展道路”。（关于南部分成制请详见第二章第四节）

〔*农业新技术的突破与普及*〕　19 世纪末美国农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普及。在这方面，美国政府发挥了积极作用。1862 年联邦政府建立农业部，其最初宗旨就是协助农场主了解最新的农业技术和市场行情。农业部及时收集各地农业生产的成功经验，向各州和地方政府推荐。农业部下属的研究机构开展多种科研活动，研究动植物疾病的控制方法，积极引进国外的农作物新品种并加以推广。1889 年初，农业部正式升格为内阁部，下设“牲畜工业局”、“植物工业局”、“农业化学工程局”、“昆虫与植物检疫局”等，到 20 世纪初该部已拥有 40 个局处，成为一个行政管理与科研综合的部门。农业部先后引进外国植物达43,000 种以上，其中还有来自中国的许多优良品种。农业部在各州设立野外实验站，对植物病虫害进行防治和预报，使美国在 19 世纪末一直未发生大面积的农作物虫灾。在农业部的示范下，各州政府在 70 年代至 90 年代陆续建立农业管理部门，使整个农业管理和科研体制层层得到落实。

在农业部建立的几乎同时，1862 年联邦政府颁布了以促进农业教育为目的的莫里尔土地法。该法全称是“设立学院以促进农业和机械工艺在各州和准州授予公地的法案”。在莫里尔法的推动下，建立起一批州的大学、农业学院和农业专科学校，并通

过短期训练、函授教育等方式来普及农业科技知识。在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等州建立农业实验站的经验基础上，1887年国会通过“哈奇法令”。要求每州普遍建立农业实验站，广泛吸收农业院校参加科技实验工作。由此使美国的农业教育与科研自始就密切联系。到1893年已达到每州一个实验站的要求，不久又增至66个。农业院校、实验站及政府有关部门的配合，使美国农业产值不断上升，体现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巨大影响。此外，联邦和各州政府还积极创办农业报刊500余种，其中有著名的《农业年鉴》、《农业研究评论》、《农作物报告月刊》等，发行量最多的达50万份。

农业技术突破的另一个方面是新型农业机械和农具的层出不穷。西部广大土地开垦和劳动力缺乏的尖锐矛盾，推动了美国农机具发明创造的高潮到来。1878年由威斯康星的约翰·F·阿普耳比发明的“双排打包机”（又译“盘绕扎谷机”）使小麦收割工效提高了8倍。此后，小麦生产带的农业机械化突飞猛进。80年代初，西部开始普遍使用24匹马牵引的康拜因机，把收割、脱粒、捡净、装袋等各道工序连接一起，大大加快了小麦收获速度。1885年，这种收割机的产量已达25万台。随着收获机械的重大改进，各种播种机、中耕机、双铧耙、双铧犁、锄草机等纷纷问世，使田间作业在90年代基本上实现机械化。同时，谷物的装卸、传送机械，玉米的割捆机械也在80年代投入使用。到90年代末，美国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比80年代初提高近1/4，其主要原因是机械化普遍实现。故有人称这段时间为美国的“农业革命时期”。它标志着美国农业也开始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新阶段。

在西部干旱地区，水利灌溉设施的建设成为农业发展的关键。在犹他、科罗拉多、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等州，农场主联

合为集体组织，在政府资助下开发水利。1894年，国会立法规定对各干旱州拨给100万英亩土地资助水利建设。1902年又决定将联邦农业基金用于水利项目。此后，水利勘探设计也成为农业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

应提及的是，美国农场主们在农业科技普及方面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70年代的格兰其组织就把普及农业科技知识作为其基本任务之一，在这过程中培养出大批农场主自己兼任的农业技术人员。80年代末的农民联盟也运用合作组织的资金开发技术，购置新设备。许多州的农业实验站人员参与合作组织的科技活动。即使人民党运动消沉以后，有许多农场主的合作组织转变为农业公司，成为农业新技术开发的重要力量。

简言之，19世纪末美国农业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是整个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西部的巨大开发，工业制造能力的强有力推进，以及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一系列变革，使农业由内战前的小生产方式跃入现代的社会化大生产阶段。农业为工业提供了足够的生活资料和生产原料，保证了这个时期工业生产能力的迅速上升。然而，90年代的农业萧条并未从美国经济中消除阴影，它一直在20世纪美国经济中成为导致危机的潜在因素。

第 四 章

西部的开拓及其对美国发展的历史作用

19 世纪后期西进运动是美国不断扩张领土的运动，也是美国人民和移民开发西部的群众性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和移民从加州往东或越过密西西比河往西，不断涌入这片一望无际的美国心脏地区，开采矿藏、经营牧场、开垦荒地和建立城镇，使资本主义在美国获得广泛的发展，从而为现代美国的诞生奠定了有利的基础。随着西部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新州陆续建立，美国版图也随之扩大。

在这片历史上曾以“美国大沙漠”著称的广阔地区中，有相当一部分已划归印第安人，作为他们的永久居留地。可是，后来又在这里发现了丰富的矿藏和适于放牧的富饶草原，因而开拓者从四面八方涌向这一地区。为了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和扫除西进运动的“障碍”，美国政府采取了驱赶和屠杀印第安人的野蛮政策，在西进运动史上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因此，西部并不像有些美国历史学家所美化的那样，说它是个“伊甸的乐园”，西进运动也不像后来美国小说和电影、电视所渲染的那样充满浪漫传奇的轶事，而是为空前未有的暴力所伴随。尽管如此，西进运动和美国政府推行开发西部的各种政策，却破坏了印第安人的游

牧生活，促使他们脱离原始社会，卷入资本主义社会，逐渐成为美利坚民族的组成部分。

在开发西部的过程中，开拓者的思想、传统和风尚因适应新环境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是进取求实、流动迁徙和民主自治等精神的增强。这些变化进一步塑造了美利坚民族的性格，促进了美国的民主制。

第一节　西部印第安人土地的被剥夺

〔大平原的土地和居民〕　内战结束后，美国人和移民开始大量涌入“最后的西部”，即美国的大平原，进行拓荒和开发。这个大平原的范围包括东起密苏里河西至落基山脉，南起得克萨斯北迄美、加边界的广大地区。这片广大地区的地形是复杂的：既有风沙漫天的平原，又有高耸的山脉；既有荒凉的沙漠，又有深邃的峡谷。由于地形复杂，人烟稀少，长期以来这个地区一直是美国人向西移殖难以逾越的障碍。直到 19 世纪上半期，美国地理书上仍称它为“美国大沙漠”。内战前，多数从东部前往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的商旅都避开这片“沙漠”，绕道而行。但是，这个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落基山麓地区蕴藏有大量金、银和铜等金属，由得克萨斯向北延伸的大草原乃最适于放牧牛、羊的场地。这些富庶的资源和广阔的土地，无论对资本家还是对开拓者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此，内战结束后，随着横贯大陆铁路的建成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向西移殖的障碍也就逐渐被克服了。

内战前，这地区的居民主要是印第安人和为数不多的白人。

1860年，散居在这片草原和山麓地区的印第安人约有25万人。[①]这里的动物除了以草为食物的亿万啮齿动物（鼠和长耳兔）和"草原狗"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巨大的野牛群。据估计，19世纪中叶，在大平原漫游的野牛约有1,200万头之多。[②]印第安人大都骠悍强壮，善于骑射，经常在草原上奔驰，以捕捉野牛为生。牛肉供食用，毛皮可做衣着，还可用来作帐篷。因此，狩猎野牛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中心，也是他们举行宗教祈祷的主要内容。他们为了保护其赖以生存的狩猎场地，对于白人入侵者非常敏感，往往进行顽强的抵抗。当时，这一地区较强的印第安人部落，北部有苏族人（或译为西荷族人）、布莱克菲特（即黑脚）族人、克劳族人、切恩涅族人和阿拉帕霍族人；南部有科曼彻族人、基奥瓦族人、尤特族人和阿巴齐族人等。

这里的白人约有175,000人，其中90%都是男性，散居在后来建州的南、北达科他、蒙大拿、爱达荷、怀俄明、科罗拉多、内华达以及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等地。这些白人，除了定居在犹他的2万多摩门教徒[③]外，也像印第安人一样，过着不断迁徙的生活。他们除捕捉野牛外，还放牧牛、羊群，勘察贵重金属，有时为前往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的移民带路以及拖运横越大陆的货物和邮件等。他们既同印第安人进行贸易，也不时同印第安人发生冲突。

大平原居民的这种荒野生活仅持续了一个短暂时期。随着横

①②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等：《美国共和国，1865年以后》，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59年，第2卷，第66页。

③ 摩门教徒（Mormons）是1830年在纽约州创立的一个教派的信徒，由于实行一夫多妻制，遭到公众的反对，1847年该教派领袖率信徒迁往犹他，在那里组成由摩门教会控制的政府，进行垦荒和兴修水利。1890年，该教派废除了一夫多妻制，6年后，犹他才被联邦接纳为州。

贯大陆铁路的建成以及东部和外国资本的不断渗入，这一地区的采矿业、畜牧业和农业先后兴起，并日益为东部和外国的公司所控制。在开发大平原的过程中，“讨伐”印第安人的战争连续不断，使印第安人遭受大量伤亡和深重的苦难。

〔对印第安人土地的掠夺〕　内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继续推行驱赶印第安人的传统政策。凡是交通线需要穿越的地区，印第安人就必须离开，往往被赶入指定的保留区；就是在已指定的保留区内，如果发现新的矿藏或其他自然资源，印第安人也必须放弃原有的土地，被迫迁往其他更加偏僻、贫瘠的保留区去。为了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美国政府沿用了与酋长签订“条约”以及“购买”等东部通行已久的手段，如果印第安人拒绝服从或稍有反抗，它就运用武力进行威胁，甚至发动“讨伐”战争。从19世纪60年代初起，美国政府开始了连续不断的血腥“讨伐”，一直持续到1890年，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1860年初，美国军队为西南部探矿者开路占地，与散居在新墨西哥山区一带的阿巴齐族人和纳瓦霍族人发生冲突。这次冲突时断时续地持续到1863—1864年。在一系列战争中，两族印第安人终因力量悬殊而被打败，结果664人被杀害，8,793人被俘，其余数千人被迫迁往土地贫瘠的小保留区。[1]

同时，在科罗拉多北部派克山脉附近发现金矿后，许多矿主和开采者蜂拥而来，闯进切恩涅族人和阿拉帕霍族人的保留区，并要求美国军队把他们赶走。结果双方于1861年发生冲突，持续了3年之久。到1864年，两族印第安人被迫放弃他们原有的土地，迁往科罗拉多东部的一个较小保留区去。但在撤离途中，他们遭到美国军队的挑衅。科罗拉多总督要求他们立即集中到指

① 参看雷·A·比林顿：《向西扩张：美国边疆史》，纽约1974年，第564页。

定地点去，才答应停止军事行动。约有700多印第安人轻信了他的保证，集中到里昂要塞附近扎营。但是，在当晚他们入睡后，却被J.M.齐温顿上校统率的1,000多民兵所包围，遭到极其残酷的屠杀。后来，有个目睹这次屠杀的商人作证时说：

“他们（指印第安人——作者）被剥去头皮盖，脑髓被敲出，士兵用小刀剥掉妇女的皮，用棍棒打小孩，还用枪敲打他们的头颅，割断他们的四肢。”①

这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激起了残存的切恩涅族人和阿拉帕霍族人更加剧烈的反抗。经过将近3年的围剿，两族印第安人才被迫于1865年签订“和约”，迁往指定的保留区。同时，散居在得克萨斯和新墨西哥一带的基奥瓦人和科曼彻人部落也遭到同样残暴的袭击，最后落到听任美国军队摆布的境地。

在“讨伐”南部印第安人的战争告一段落时，反对西部和北部印第安人的战争又在好几处爆发了。其中最剧烈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冲突是在蒙大拿爆发的。1865年，为帮助蒙大拿矿主解决供应品运输的困难，美国政府准备从怀俄明的拉拉米要塞修筑一条直通博兹曼和赫勒纳的小道，即“博兹曼小道”。这条小道需要穿越苏族人最好的狩猎场地，因而引起苏族人的强烈抗议。他们在首领红云指挥下，不断袭击运输物资的车队，捣毁筑路工程的设施。1860年2月，美国政府派军队前往镇压，但红云率领的队伍在荒野中消失了。一支由W.J.费特曼上尉指挥的部队进入荒野搜寻时，遭到伏击，结果全军覆没，费特曼也被打死。苏族人在胜利鼓舞下，继续不断出击，迫使美国政府只得放弃修筑这条小道的计划。

美国政府连年“讨伐”印第安人的战争，虽然为西部的开拓

---

① 比林顿：前引书，第568页。

扫除了一些所谓“障碍”，但却支出了庞大的军费。据印第安人事务专员约翰·柯立尔宣称：“在1862年至1867年期间，仅仅对苏族、切恩涅族和纳瓦塞族的战争，就使美国政府花费了一亿美元。”①

“讨伐”印第安人战争的庞大开支和征服苏族战争的失败，都引起了国内舆论的抨击，当时有影响的《民族》周刊发表评论指出：“我们整个的印第安人政策是处置失当的”，“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弊端。”②

〔“和平委员会”及其划分印第安人保留区的策略〕 东部一些评论家认为，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管理不当是造成他们不断反抗的主要因素。这种管理不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管理印第安人事务的权力分属于内政部的印第安人事务局和陆军部，它们各自为政，缺乏集中统一的领导，致使印第安人无所适从。前者被授权管理印第安人土地的转让、支付年金和分配印第安人所需要的供应品。这个机构的全部官职均为政党分赃制的“战利品”，其中许多雇员都是贪污腐化的、不称职的。后者的主要职能就是对“违反”规定的印第安人实行“残酷的惩处”。许多军官力主使用武力，叫嚷“印第安人只对武力或武力威胁作出反应。”③ 其次，西移的白人在联邦政府支持下，经常侵占业已保证给印第安人的土地。因此，这些评论家坚持认为，只有结束军人“火与剑”的政策，采用和平方式公正对待印第安人才是解决

---

① 约翰·柯立尔：《美洲印第安人》，纽约1947年，第128页；转引自威廉·福斯特著：《美洲政治史纲》，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56年，第281页。

② 转引自比林顿：前引书，第570页。

③ 阿雷尔·M·吉布森：《从史前期到现在的美国印第安人》，列克星敦1980年，第395页。

问题的惟一办法。[①]

在舆论不断指责下，国会于 1867 年 3 月通过了一个“与仍在同美国作战的印第安人部落建立和平”的法案，组织一个由 4 名文官、3 名将领组成的“和平委员会”，其任务是结束“苏族人的战争”，消除导致“印第安人战争”的因素，以确保种族间的和平。国会之所以采取这一措施，固然在于平息指责政府的舆论，也由于使用武力迫使印第安人屈服的代价太大，且收效甚微。因此，国会多数议员认为，只有说服印第安人放弃游牧方式，逐渐过渡到在保留区内从事耕耘的定居方式，才能消除“印第安人战争”，从而确保种族间的和平。根据这种意图，“和平委员会”在圣路易斯会议中，主张建立两个容纳大平原大部分印第安人的保留区：一个是位于达科他领地黑山地方的保留区，那里将容纳在北部草原漫游的约45,000 印第安人；另一个是设在现今俄克拉荷马州的保留区，计划诱使南部约86,000 印第安人集中到那里定居。每个保留区都设有一个所谓“公正廉洁”的总督，负责推行“传播先进文明的广泛计划”；各部落都能分配到一定数量的土地，从事农业生产，并由有关官员予以监督和指导。“和平委员会”之所以选定这两个地区作为大平原印第安人的保留区，是因为黑山地方远离横越大陆的交通线，且为多山丘陵地带，对白人开拓者没有什么吸引力；而俄克拉荷马地方原先就是从东南部迁来的“五个文明部落”[②] 保留区的一部分，把它加以扩大便能容纳更多的南部印第安人部落。

“和平委员会”的成员们在与南部印第安人部落首领谈判过

---

① 参看比林顿：前引书，第 570 页。

② 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时，现今美国东南部是为讲马希克吉恩语的印第安人所控制。他们包括乔克托人、奇克卡索人、克里克人、西密诺尔人和契洛克人。后来，他们以“五个文明的部落”著称。

程中，不断使用威胁利诱的各种手法，迫使他们答应率领他们的部族迁往俄克拉荷马地方的保留区。接着，他们又与北部印第安人部落首领谈判。1868 年 4 月，他们以停止修筑波得河小道的承诺与苏族人领袖红云达成协议。根据协议，苏族人同意集中到密苏里河以西达科他领地内的永久保留区，美国政府则承认大角山以东的地方是印第安人不能割让的领地。这样，“和平委员会”的成员们便认为他们已大功告成，可以向国会交待了。但是，他们对实现大平原“种族间和平”的估计是过分乐观了，因为一些印第安人部落首领因受欺骗、收买而签字放弃了数百万英亩的部落土地，但他们并不能迫使自己的部族人改变整个生活方式。相反，大多数印第安年轻战士和小头领纷纷拒绝遵守“条约”，谴责签订“条约”的行动，并准备为保卫印第安人的生存条件而战。从 1868 年秋季开始，印第安人的反抗斗争在各个地区又陆续展开。

〔对保留区的暴虐统治与印第安人的反抗斗争〕　　在西南部，切恩涅族人和阿拉帕霍族人不甘于所受限制，首先于 1868 年秋季冲出了保留区。接着，基奥瓦族人和科曼彻族人也起而响应，约有2,000 印第安人在堪萨斯和得克萨斯一带漫游、狩猎，但他们不断遭到美国军队的袭击。在得克萨斯的沃希托河畔一次战斗中，有 100 多印第安人惨遭杀戮，横尸遍野，其余的印第安人又被赶回保留区。印第安人因不断冲出保留区而与政府军队发生激战的事是屡见不鲜的。据统计，在 1869 到 1875 年期间，政府军队与印第安人发生的激战在 200 次以上，政府军队剿杀印第安人的手段非常野蛮残暴，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1871 年，担任印第安人事务专员的 F. 沃克将军就供认说：“我们对付野蛮人(指印第安人——作者)，就像对付野兽一样，不会涉及国家荣誉的问题。不管是战斗、逃跑，还是运用诡计，那只是个权宜之计

的问题。"[①]

在大平原印第安人被迫迁移到南、北两个保留区后，他们仍保有大片的土地，但这些土地也因不断被剥夺而日益缩小。1869年，国会设立了"印第安人专员委员会"，它与内政部官员共同管理用于补偿印第安人割让土地的拨款，负责控制保留区及其宝贵的自然资源。[②] 1871年，国会又通过了"印第安人拨款法"，其中附加条款规定，美国政府不再承认印第安人部落是个签订条约的独立实体，而且有权处理印第安人事务，无须取得部落的同意。[③] 这样，印第安人在法律上不再被视为"异域人"，通过订立"条约"来掠夺印第安人土地的方式也被废止，但美国政府却享有对保留区及其自然资源的直接控制权，利用所谓"拨款"方式便可任意掠夺印第安人土地，占有保留区内的自然资源。从此，所有印第安人都必须受国会法律和总统行政法令的管辖。[④]

在保留区内，印第安人生活非常困苦。他们虽被迫弃牧务农，但却既无农具，也无种子，因而无法耕种，只得仍以狩猎勉强为生。许多部落不能及时得到政府供应的食品，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政府官员提供的食品和用品，往往是以非法的高价卖给他们，甚至有时是腐烂变质的，其中有"发霉的面粉、腐臭的牛肉和虫蛀的毯子"，[⑤] 因而引起印第安人极大的反感。投机商人也经常用赝品、次品和酒类骗取他们仅有的毛皮和财物。保留区内一旦发现金属或石油贮藏时，印第安人就被从他们居住的地方撵走，迁往更加偏僻的地方去。在政府官员、矿主和投机商专横

①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2卷，第73页。
② 莫里斯主编：前引书，第643页。
③ 莫里斯主编：前引书，第644页。
④ 吉布森：前引书，第396页。
⑤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2卷，第74页。

暴虐的统治下，许多印第安人被逼得走投无路，陷入绝境，只有进行武装斗争，以保卫自身的生存权利。

1875—1876年间，在北部达科他的黑山保留区爆发了苏族人战争。当时，苏族人被迫起事有两个原因：一是修筑北太平洋铁路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侵入他们的保留区；二是1874年在黑山地区发现金矿后，成千上万的淘金者和矿主不顾苏族人的反对，竟成群结伙闯入保留区。1875年，政府军队为庇护这伙人与苏族人发生冲突。1876年，苏族人领袖狂马和坐牛率领至少2,500名战士，① 与政府的"讨伐军"大战于小大角地方，由256人组成的"讨伐军"全部被歼，队长G.卡斯特上尉也被击毙。这次战斗谱写了印第安人反抗斗争的一曲英勇凯歌。

在西北部地区，俄勒冈大龙德地方的内兹帕西族人因反对白人侵占他们的土地于1877年举行起义。政府军队发动进攻后，内兹帕西族领袖约瑟夫率领500多男女老少逃出住地，企图转往加拿大。在政府军追击下，约瑟夫带领他的一伙人在4个月里行军1,300多英里，最后在离加拿大边界不远的地方被拦截镇压了。②

在西南部，新墨西哥的阿巴齐族人，由于不堪忍受保留区的暴虐管制，从70年代初便展开有组织的反抗。接着，他们愤然离开保留区，在美国与墨西哥边界一带流动，并对阻击他们的政府军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到80年代中期，他们在首领吉罗尼摩领导下展开了英勇的战斗，直到1886年吉罗尼摩被俘后，这次

---

① 另一说法是他们率领4,000名战士，参看理查德·柯伦特等：《美国史》，纽约1979年，第2卷，第447页。无论是哪一个数目，都是美国印第安人在一次战斗中调集的一支最大的兵力。

② 参看拉尔夫·安德里斯特：《缓慢的死亡：平原印第安人的末日》（纽约，1964年）一书，转引自约翰·H·卡里等主编：《从内战到现在美国生活的社会结构》，波士顿1981年，第33页。

武装反抗才被镇压下去。

美国印第安人最后一次反抗是南达科他的特顿苏族部落于1890年掀起的武装斗争。他们对政府食品供应的严重不足并把他们的保留区缩小一半都非常不满，准备起事。这时有位印第安人宗教领袖沃沃卡对苏族人宣称，只要举行某种舞蹈和宗教仪式，便可收回他们的土地，白种人也会自然消失。于是苏族人便跳起"魔鬼舞"（这是美国白人对沃沃卡主持的舞蹈的蔑称），但却为此招致了美国军队的干涉。双方发生了冲突，结果是包括坐牛在内的许多苏族战士被杀害了。同时，美国军队还企图解除另一批苏族战士的武装，引起后者的顽强反抗，最后在翁戴德尼地方一场战斗中，有200多苏族战士和妇孺遭到野蛮的屠杀。

印第安人原是美国所在大陆的主人，他们分属于600个左右不同的部落，过着原始社会的游牧生活。自从资本主义势力大举闯入美国西部以来，他们一直处于受欺凌的屈辱地位。为了保卫自身的生存，各部落印第安人进行了殊死的英勇斗争。但由于武器装备的差异和军事力量的悬殊，他们难以抗拒对手的进攻，终于在军事上被打垮了，绝大部分的土地被侵占，整个种族濒于毁灭的边缘。据统计，到1890年，美国印第安人的数目已从早先的150余万人锐减到少于25万人。[①] 美国印第安人人口的大幅度减少，是近代世界民族史上罕见的现象，这说明美国专横暴虐的统治给印第安人造成的灾难。印第安人的反抗斗争之所以失败，固然由于原始的部落无法与资本主义势力相匹敌，也由于各部落间缺乏联系和不够团结。此外，白种人所传播的各种流行病、特别是天花和性病等，也是对印第安人的致命伤。

〔联合太平洋铁路的修建与野牛群的灭绝〕　在大平原印

---

① 吉布森：前引书，第443页。

第安人遭受美国军队围剿屠杀的同时，另一种毁灭印第安人游牧生活条件的灾难发生了，那就是以北美洲骎犎著称的大平原野牛群的逐渐灭绝。这种长满粗毛的野牛是印第安人衣食和各种用品的主要来源，有人曾作过这样形象的比喻：对印第安人来说，野牛是个“奔驰的百货商店”。[①] 因此，只有巨大野牛群在西部漫游，印第安人才能维持他们的游牧生活；一旦野牛群灭绝了，印第安人原先赖以为生的条件也就丧失了。他们除接受联邦政府的特定安排外，别无其他选择。

内战结束时，在大平原漫游的野牛约有1,300余万之多。随着联合太平洋铁路的修建，巨大的野牛群逐渐被分割为两部分，无论南部或北部的野牛群，都遭到铁路工人、矿工、猎人和冒险家的捕捉杀害。联合太平洋铁路通车后，有时一列行驶的火车突然被惊吓乱闯的野牛群所撞翻，因此铁路公司雇用一批专门枪杀野牛的猎人，以保证火车行驶的安全。当时，有个绰号叫“野牛比尔”的科迪以在18个月中杀死4,000头野牛而出了名，他就是受雇于堪萨斯太平洋铁路的猎人。由于各条铁路及其支线相继修建，以枪杀野牛为职业的猎人日益增多，他们和许多业余的打猎者都毫无顾忌地枪杀野牛群，并以此为“娱乐”。这样，南、北两部分野牛都遭到严重的浩劫。到1871年，枪杀野牛群的活动开始更加猖獗。那年宾夕法尼亚州一家制革厂发现野牛皮能制成商品革。该厂遂以每张1—3美元价格收购。这一信息传开后，许多猎人和投机分子都争先恐后涌往大平原，掠取新的致富资源。据统计，在1872—1874年期间，每年平均残杀300万头野牛。后来，野牛骨头也作为肥料出口，残杀之风因而更甚。到1878年，南部的野牛几乎灭绝了，北部平原的野牛群在1883年

① 柯伦特等：前引书，第2卷，第473页。

也消失了。那年，美国国家博物馆为制作野牛的标本曾派出一个考察队去西部，结果找到的野牛还不到200头。到1903年找到野牛的数目更锐减到34头了。[①]

〔道斯法案的实施及其实质〕　美国政府剿灭印第安人的残暴政策，虽然得到矿主、铁路公司、农牧场主和土地投机商的支持和拥护，却引起了东部社会舆论、特别是人道主义者的谴责和反对。他们认为联邦政府以武力迫使印第安人在保留区定居的措施已告失败，经过“讨伐”战争残存下来的印第安人部落仍然坚持它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为了实现西部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和平共处，他们要求取消保留区，建议不再把印第安人看成是部落的成员，而是分别作为独立的个人，并在土地分配方面实行个人所有制的原则下，引导他们从狩猎转向农业，“训练他们履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从而促进他们与白种人的“融合”。这种建议的目的在于瓦解印第安人的部落，把他们生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从而实现对印第安人的同化。

为了扩大这种舆论的影响，各地“印第安人之友”社团纷纷建立，其中主要有“印第安人保护委员会”和“印第安人权利协会”等，出版了许多宣传鼓动性的刊物，要求政府改变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在这方面，著名女作家海伦·H·杰克逊发表的两部作品——《一个可耻的世纪》（1881年出版）和小说《雷蒙娜》（1884年出版）——产生了重要影响。前者是一部谴责政府对印第安人传统政策的控诉书，其中着重揭露了政府残害印第安人的一贯性和“独创性”。她写道：

> “翻阅（白人征服——作者）印第安人历史的记录无论翻到哪里，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每页和每年都有其

① 比林顿：前引书，第579页。

邪恶的污点。一个部落的历史就是所有部落的历史，不同之处只是时间和地点的不同，但是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点都不会对主要事实有什么影响。1880年科罗拉多出现的贪婪和不公正的现象同1830年佐治亚发生的情况是一样的。……现在美国政府不守诺言的手法是同过去一样的熟练，并且由于长期的实践而具有更多的独创性。”[①]

后者是一部描述西班牙人统治时期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困苦处境的小说，内容有点像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不过它的主人公是印第安人，后来被拍成彩色电影，风行一时。[②] 这两部作品使广大读者充分认识到改革对印第安人政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这种要求改革的舆论压力下，联邦政府不得不承认强行同化印第安人政策的失败，因此决定实行土地个人所有的分配制，即把土地分配给个人的办法，并力图把这种办法与教育和传教活动结合起来，构成“改造印第安人的三部曲”。[③] 在联邦政府官员看来，自由处置地产的个人所有制是最主要的，它将使印第安人个体化，进而成为促使他们自行实现“美国化”的动力。

1887年，国会通过了道斯法案，其中主要规定是：（一）解散作为法律实体的印第安人部落，把部落的土地分配给成员个人——每户家长160英亩，每个独身成年人80英亩；（二）联邦政府保有25年托管权，托管满期时，把土地所有权移交给个人并授予美国公民的资格；（三）分配土地给现有部落成员后，余下的保留区土地得向非印第安人定居者开放。[④]

---

① 转引自柯伦特等：前引书，第2卷，第477页。

②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2卷，第75页。

③ 吉布森，前引书，第489页。

④ 莫里斯主编，前引书，第644页。

根据这个法案，每个成年印第安人都能分得土地，但须经托管25年，他才享有土地所有权，并取得美国公民的资格。这是对印第安人的传统政策做出必要的调整，以适应当时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这一法案的实施有着双层的意义：（一）联邦政府力图借此促成印第安人放弃原始社会的游牧生活，逐渐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二）印第安人的法律地位发生了变化，他们已由“化外之民”变成了美国“准公民”了。美国印第安人的法律地位这一变化尽管是纸面上的，但从印第安人一直遭受凌辱和迫害的整个历史来看，不失为一种进展。同时，联邦政府还把它保有25年的托管权解释为防止没有经验的土著人立即处理他们占有的土地，以免受骗上当。看来，这一切好像都是为印第安人着想似的；实际上，这一法案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首先，这个土地分配制度实行后，那些贪婪的白人资本家更进一步大量夺取了印第安人的土地。以俄克拉荷马地方为例，分配制度实施后，“五个文明部落”在那里原有土地1,600万英亩，在以后20年间却丧失了1,450万英亩。[①] 其次，即便印第安人侥幸分到较好的土地，由于他们缺乏土地所有权经验和法律知识，往往为贪婪狡诈的白种人土地投机商所骗去。因而他们在相当长期间仍然一贫如洗，陷于痛苦和悲惨的境地。

第二节　西部的开拓与“最后的边疆”

〔*开发金银矿的浪潮与西部城镇的兴起*〕　大平原并非像早先美国人所想像的那样，尽是沙漠和荒原，而是个拥有广大草原、肥沃土地和丰富矿业资源的地区。在落基山脉和高原地区都

① 福斯特著：前引书，第282—283页。

拥有丰富的金、银、铜、铁、铝、锌等矿藏和深厚的煤层，在得克萨斯一带地下则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

西部矿业开发时期是较短的，它出现于1860年左右，接着是持续30年之久的繁荣兴盛，到1890年以后就逐渐衰落了。各地区矿业开发大体上经历了3个连续的阶段：（一）个别的勘探者用淘金盘和砂矿开采方式采掘地表层矿石（砂）；（二）在较浅的矿床枯竭后，一些公司进入矿区，开采矿脉和石英矿；（三）商业化开采或是最后失败了，或是在有限的基地上继续下去，与此同时牧场主和农民到来了，他们在那里建立起来一个较固定的社区经济。[①]

19世纪50年代，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华金与萨克拉门托流域出现淘金热后，科罗拉多和内华达地方也发现金、银矿。1858年，在落基山东麓派克山脉地区（靠近现今丹佛城）发现金矿，次年闻风而来的探矿者和移民在10万人以上。[②] 他们分别从加利福尼亚和堪萨斯以及东部各地跋山涉水来到科罗拉多，丹佛和其他矿业营地一下子变成了"城镇"。但不久发现，这里虽有金矿，但产量不多。不少探矿者和移民又纷纷离去，留下来的人们转而从事耕种和放牧，为日后科罗拉多经济打下了基础。到70年代初，利德维尔附近发现了银矿，接着在克里浦小河附近也发现了金矿。这些矿藏的发现与开采，使丹佛成为这一地区的商业中心。

同年，在内华达的塔霍湖附近发现丰富的金、银矿。它位于康斯托克矿脉，这是世界上最富的矿脉之一。消息传出后，探矿者和移民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不到一年，在这片原系沙漠荒原

① 科伦特著：前引书，第2卷，第467页。

②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2卷，第78页。

上涌现了许多新兴城镇，其中较大的有弗吉尼亚、奥罗拉和黄金山等。在1859—1863年期间，仅从康斯托克矿脉的砂矿中就采掘出价值1,500万美元的金银。随着技术人员和资本家的到来，开采技术与经营方式也有了改进，在降低成本和提高金银产量方面都取得较好的效果。在60年代初，这里采掘金银普遍使用墨西哥的“还原法”，但这种方法成本高，产量少：从一吨优质矿苗中采出价值200美元的银子，其费用为50美元，回收率仅有65%。在1866年以后10年中，改用新法采掘，每吨的费用降低10美元，而回收率却提高到85%。[①] 1869年，有个名叫阿道夫·苏特罗的普鲁士移民工程师用开凿隧道法开采这里的深矿，银的产量因而猛增。[②]

后来，在爱达荷和蒙大拿地区也发现了金矿，大批探矿者、冒险家和投机商纷纷涌入这两个地区，采掘了价值巨大的金子。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两个地区也出现了像博伊西和赫勒纳（当时名为“最后机会的峡谷”）这样的矿业城镇，但是那里的社会治安是很糟的，经常有一些匪帮和歹徒进行骚扰和抢劫。争吵搏斗、私刑拷打以至枪击厮杀的事件层出不穷。当地开拓者不得不组织起治安维持会，自行制定法规，以维持社会秩序。但是这些城镇的居民是不固定的，他们常随着采矿业的兴衰而流动转移。在60年代，蒙大拿开采了价值1亿多美元这样巨额的贵重金属，但是这个“矿业王国”是短命的，一旦矿源枯竭，人们便纷纷离去，矿业营地的帐篷也消失了。根据1870年人口普查，蒙大拿全境人口仅有2万多人。

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过去在西班牙人统治时期，都

---

①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2卷，第78页。
②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2卷，第78页。

曾以拥有丰富的银矿著称，但60年代美国探矿者在这里交了恶运，没有发现什么值得开采的银矿，不久便撤往其他更有希望的地方去了。在这两个地区，铜矿业的发展比金银开采更为重要，一个位于比斯比，以“铜皇后”著称的矿井采出的铜，其产值超过了金、银矿开采的全部收益。

到1874年，勘探和开采金、银贵重金属的浪潮大体上告一段落，因为各地矿区表面层的矿源日益枯竭，而开采深矿则非一般探矿者力量之所及。从此，西部矿业开发逐渐转移到开采贵金属的深矿和其他贱金属矿了，而这类开采就需要更多的资本和技术了。

〔铁路的修建与资本集团对矿业开发的控制〕　随着西部矿业的兴起，连结中心城市和商业网点的交通运输日益成为突出的问题。当时，有些矿区远离商业网点，一般在几百英里以上，而且陆路运输异常困难，不得不依靠水运。例如，“旧金山要通过帆船和汽船绕过下加利福尼亚的尖端才能达到科罗拉多河河口，来为亚利桑那的科罗拉多河畔矿山服务；把商品运到三角洲来，而后把矿石运到旧金山去冶炼。”[①] 另外一些矿区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和生活用品大都是靠大湖区城镇、特别是芝加哥供应的；它们开采的矿石和金属也需要运往附近的城镇冶炼和加工。可是，在19世纪中叶，联系东、西部或大湖区与西部矿区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1858年9月，有家私营公司派出了第一辆四轮马车从圣路易斯驶往太平洋海岸港口，全程历时24天之久。接着，经营陆路运输的私人公司相继出现，小马快递的邮政制度也建立起来了。但是，这种奔驰在驿道上的马车运输远不能适应西部开发的要求：一是驿道崎岖不平，马车拖运能力有限；二是

① 马丁·里奇：“西进运动”，载格伦·波特主编：前引书，第2卷，第583页。

运输所需时间太长。

为了适应西部开发的需要，横贯大陆的第一条铁路在60年代初开始修建，到1869年，东西相向修建的联合太平洋铁路与中央太平洋铁路在犹他的普罗蒙特里接轨通车了。接着，陆续修建一些通向商业中心城镇的支线。这样，铁路不仅承担了长距离的货运，及时为矿区运送大量的机器设备和物资，而且输送了它所需要的矿工和移民。同时，大批供应行业也在矿区建立起来，那里市场因而有可能维持下去。因此，铁路的相继修建为西部矿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最后一次淘金热是在达科他西部的黑山地区（即苏族印第安人的保留区）出现的。1874年，这里发现金矿的消息在边疆地区广泛传开后，就开始了一场紧张的淘金热。这一地区交通条件较好：修至比斯马克的大北铁路以及从夏延来的马车驿道都能通向这一地区，因此大批探矿者得以迅速涌入这个荒芜的丘陵地区，他们都想利用这一机会掘金致富。一时之间，这里喧腾鼎沸，热闹非凡。但是不久之后，开采的金矿就逐渐为大量提供资金的公司，如宅地公司等所接管和控制。1876年，在南达科他环绕戴得伍德峡谷地区发现了最丰富的金矿脉。随着人口的增加，卡斯特城成为达科他矿区的第一个中心。在一些公司和矿主经营下，这里开采出的金子总值约有9.8亿美元。[①]

从此，西部矿业开采日益为东部资本集团所控制，因为现代矿业开采需要大量资本以及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当时，东部的金融巨头，像纽约的亨利·罗杰斯和洛克菲勒家族、费城的古根海姆家族以及匹兹堡的梅隆家族等，都插足矿业开采，控制了矿业资源并攫取了高额利润。1881年，在蒙大拿的比由特发现了当

①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2卷，第81页。

时世界上最丰富的铜矿藏，铜矿的开采也是在资本集团支持下展开的。由于工业发展对铜线的大量需求，铜的产量激增。这里铜的年产值在 80 年代末超过了金产值，到 1900 年，接近于金银产值的总和。另一种金属——铅也随着电气蓄电池的广泛应用而产量剧增。铅主要产于密苏里州，到 1880 年，在科罗拉多州的利德维尔和爱达荷的克达伦也开采了大量的铅。1901 年，随着汽车的商业化，得克萨斯的“黑金矿”喷出了大量的石油。

西部矿业的开发在时间上虽然是短暂的，但对西部以及全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首先，矿业开发的历程使美国人认识到从密苏里河到太平洋沿岸这一广大地区所拥有的巨大资源。为了开发西部这些资源，矿业资本家要求联邦政府解决“印第安人问题”，大力资助铁路的修建，以及必须为以后农业人口的移入创造条件等。这些要求和主张都对日后美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次，西部矿业开采生产了大量的金、银。据统计，在 1860 到 1890 年的 30 年间，西部矿业开采了价值 12 亿多美元的金子和 9 亿多美元的银子。金、银财富的大量增加使联邦政府能够恢复硬币支付，但也引起了“货币问题”，这一问题成为以后 20 年间美国政党间重要的政治争端之一。再次，资本集团对西部矿业的掠夺式开发，不仅严重损害了印第安人的生存条件，使他们生活受到巨大的威胁，而且严重地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

〔“牧畜王国”〕　美国于 1845 年兼并得克萨斯后，美国人才开始发展牧牛业，经营大牧场。随着牛、马群的不断北移，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也开始发展畜牧业，它因对矿业营地、筑路人员和西去移民供应牛肉和马匹而逐渐兴旺起来。这个畜牧区不断向草原和山麓地区延伸，扩大成为一个“牧畜王国”，其领域包括东起密苏里河西到落基山、南起红河北迄加拿大萨斯喀切温的

广大地区。数百万头的牛群——有得克萨斯长角牛、赫里福特纯种牛以及怀俄明和蒙大拿的小公牛等——在这片茂盛的草原上繁衍起来。经营畜牧业的巨商和大牧场主是这个广大领域的统治者，他们和牧牛人以及牛仔们在这里逐渐形成一种具有独特风俗习惯的社区。牧牛人都须有个放牧的固定基地，由于经营不断扩大，逐渐成为牧场主，他们雇佣一些牛仔，放牧牛群。牧场里有牧主的住宅、雇工的住房和一片放牧的草地。有的牧场是用篱栅围起来的，也有的是敞开式的，但它们都位于接近水源的地方。起初，牧场主雇用的牛仔，大多数都是南部同盟军的退伍军人，后来，黑人逐渐占多数，超过了北部白人和墨西哥人，他们经常被分配做更卑贱、更劳累的活计，如夜间看守牛群和野外烧饭等。根据牧场主的意图，每年春季牛仔们结成一伙，把饲养的牛群从得克萨斯赶到怀俄明和南、北达科他一些地区聚集起来。在放牧的途中，牛仔们手持“六轮枪”，精心驱赶各自牧场主的牛群，以防止狼群的袭击和歹徒的盗窃，并派出先遣人员寻找水源和茂盛的草场。到达放牧区后，他们把打上烙印的小牛在草原上自由放牧一个时期，到小牛长到三、四岁时，就把它们赶往最靠近的牛镇，装上火车运往东部出售。牛仔们的奇异服饰、放牧用具（这些都主要来源于墨西哥牧民）和放牧方式，形成独特的美国牛仔形象。他们放牧牛群的长途跋涉，在后来流行的西部小说和电影中，往往被涂上浪漫传奇的色彩，但实际上他们的放牧生活是非常艰苦和危险的。一般说来，他们放牧生涯的平均年限只有七年。[1] 在驱赶牛群途中，主要危险就是在牲畜熟睡后突如其来的嘈杂喧闹就可能引起它们疯狂的乱窜，以致失散和死亡。为了防止这种喧闹的干扰，牛仔们经常在牛群中哼唱小调或反复呼

① 参看《美国历史简明辞典》，纽约 1983 年，第 258—259 页。

喊。这逐渐发展成为反映牛仔生活的放牧歌曲，并流传下来。①

怀俄明是个最典型的牧畜地区，那里自然条件只适于大规模的放牧，而不宜于耕种。由于牧牛业获利丰厚，② 东部和英国的资本不断流到这里。牧牛业的经济结构逐渐采用公司的形式，有一年，拥有1,200万美元的联合资本的20家公司都在怀俄明获得了特许证。③ 由大牧畜公司的代表组成的"怀俄明牧畜饲养者协会"是这个地区实际上的政府，统治这里达20年之久。它制定了许多管理土地、使用河川湖泊的水权以及驱赶牧畜等有关事项的法律和规定，强制会员和非会员一体遵守；还竭力游说国会议员修订西部土地法，要求承认牧牛场主获得土地的优先权。它力图以欺骗、恐吓和暴力等方式保持怀俄明成为牧场主专用的保留地。④ 有些牧畜公司还不择手段地夺取对草地的控制权，骗取了印第安人数百万英亩的土地。同时把另外数百万英亩的土地用铁蒺藜围起，并沿河溪的水流立桩标明所有权，拒绝农民使用河水，借以阻止农民和牧羊人闯入他们的领地。美国内政部长于1866年报告说："实际上，在西经110度子午线以西的整个放牧地区"，都被牧场主用篱栅围起来了。⑤

内战后20多年间，西部牧畜业之所以能够大规模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内战后，西部国有土地的开放和印第安人保留区的日益缩小，使牧畜业、特别是牧牛业的大规模发展有了广阔的场地。第二，美国和欧洲对肉类消费的增长，从而扩

① 参看前引《美国历史简明辞典》，第258—259页。

② 据称投资5,000美元4年内可获得45,000美元收益，这对东部和英国的资本家当然有很大的吸引力。参看科伦特：前引书，第2卷，第472页。

③ 参看科伦特：前引书，第2卷，第472页。

④ 塞缪尔·莫里森等：前引书，第2卷，第94页。

⑤ 莫里森等：前引书，第2卷，第94页。

大了国内和世界市场对牛、羊肉的需要。第三，横贯大陆铁路及其支线的建成，冷藏车的发明和巨大包装中心的形成，都为牛羊肉和毛皮的外运与加工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牧牛业的“大本营”与向东北部市场的贩运〕　牧牛业的“大本营”是得克萨斯，内战时，那里饲养的长角牛约有500万头。内战后，每头小牛在得克萨斯的售价不超过3至4美元，而北部市场的售价高达40美元。得克萨斯的大牧场主获悉后，决定把牛群赶往北部出售。但是，驱赶牛群前往芝加哥，一则路途遥远，牛群常在迂回曲折的森林中乱窜、散失，难以控制；二则沿途不时遭到定居的农民和印第安人的袭击，牛群损失很大。直到1867年，堪萨斯太平洋铁路线向西延伸到阿比林（一个新兴起来的牛镇），才解决了运输牛群的问题。只要把牛群沿着奇斯霍尔姆小道赶到阿比林，便能将它们装上火车运往芝加哥屠宰场。1868年，得克萨斯驱赶到阿比林的牛群有75,000头，1871年这个数字迅速增加到70万头的高峰。[①] 随着堪萨斯太平洋铁路穿越堪萨斯州向西延伸，新兴的牛镇如埃尔斯沃思、道奇城和纽顿等也先后出现了。在1872—1875年期间，埃尔斯沃思接受了100多万头牛；1876—1879年期间，道奇城也接受了100多万头牛。[②]同时，在联合太平洋铁路线上，先是夏延，接着是拉拉米，都成为接受牛群的始发站。

到70年代，得克萨斯的牧场主发现把小牛群赶往堪萨斯、科罗拉多以及北部草原地区，在青草茂盛的公共牧区放牧4至5年，养肥长膘后再运往中西部和东北部市场，获利更大。据称，每头仅值5美元的小牛，经过4至5年的敞开放牧，运到东部市场去，便可卖到45至60美元。因此，从1878年起，在放牧区

①②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2卷，第85页。

放牧的牧畜业日趋兴旺，在以后七、八年间成为美国获利最多的行业之一。东部和欧洲的资本大量流入这一地区。纷纷建立公司，经营和控制这一行业。

但是，牧畜业的这种兴旺是短暂的，到 80 年代中期，它因天灾和人为的竞争而逐渐衰落。首先，草原的公共牧区因大量牛群的不断涌入而变得拥挤不堪，加上 1885—1886 年出现冬季奇冷、夏季酷热的气候异常情况，牲畜因大片牧草枯萎而大量死亡。其次，当时得克萨斯饲养羊的牧场主也把大批羊群赶往北部草原放牧。羊不仅吃草，而且连草根一起吃了，以致大片的草原逐渐变成荒地。再次，对牧牛业更为致命的打击是众多农民开始在大平原定居下来，并用铁蒺藜将他们的农场围起来。有些农场主还在自己的农场里圈养牲畜，由于精心喂养和管理，牛肉的质量远比放牧区所提供的牛肉为好，因而后者的市场价格猛烈下跌。1882 年，在芝加哥，放牧区牛肉每 100 磅售价是 9.35 美元，而到 1887 年却跌到每 100 磅 1.90 美元了。[①]

牧牛业的这种衰落，在牛仔们的歌唱中也有了反映。那时，他们开始悲叹地唱道：

> “我很少去想 20 年左右以后将发生什么事情，那时企图在牧区定居的农民带来了妻子和孩子，他的狗和铁蒺藜也出现了。”[②]

〔鼓励垦殖西部的土地政策〕　正当牧畜业处于兴旺的时候，却受到了不可抗拒的农民垦殖的压力，他们成千上万地涌入大平原和山谷地区，征服了草原和山麓的荒野，把它们变为可供耕种的农田。内战结束后，美国人想要获得土地的愿望仍是他们

①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 2 卷，第 87 页。

② 同上。

向西迁移的巨大动力。为了鼓励东部居民和外来移民开拓西部，联邦政府于1862年实施宅地法后，又颁布一系列使定居移民易于获得土地的土地法。1862年的宅地法实施后，到1900年联邦政府拨出的土地达8,000万英亩，但其中相当大的部分为冒牌定居者所领去，最后落到牧场主、林场主和土地投机商的手中。尽管如此，宅地法对移民拓殖密西西比河以西广大地区还是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宅地法分配每户160英亩的作法，虽适合于密西西比河流域一带的情况，但对干旱、无树木的大平原来说，不是太大就是太小。对小农户来说，开垦这块土地直到收获所需的费用，加上灌溉、建房、购买设备和请帮工的开支，都非个人力量所能承担。1871年，据农业部估计，光是为这块土地修木围墙一项就需要1,000美元。[①] 对大农场主或农业公司来说，虽都有力量进行投资，也愿意使用适于大平原耕种的新机器，但只有160英亩的土地是不值得投资的。

后来，联邦政府逐渐认识到地区间的差别性这一问题。到1873年，国会通过了育林法，作为西部分配土地的补充措施。这个法案根据育林会带来雨量的理论，对愿意植树40英亩（1878年改为10英亩）的耕种者都授予另外160英亩的土地。这些所谓"申请育林"的种植者共获得900多万英亩的土地，大部分位于内布拉斯加、堪萨斯和南、北达科他等地。这个法案实施后，因效果不大，于1891年废除了。

为了激励移民去西部垦殖和定居，国会又通过两个法案：一个是1877年颁布的荒地法，另一个是1878年颁布的木材和砾石法。前者规定，每个移民按每英亩1.25美元的地价先缴付现款0.25美元，就可占用640英亩荒地；条件是必须保证在3年内至

①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2卷，第88页。

少对其中一部分荒地进行灌溉；荒地灌溉后经有关机构检查合格，再补缴每英亩1.00美元的地价，就可正式取得土地所有权。这个法案是国会在牧场主的压力之下通过的，因为大牧场主总想以最低的地价获得尽可能多的土地。数千农民也根据这个法案购得了不少荒地，但因灌溉工程非常困难，个人财力难以承担，不到3年的期限便都放弃了。结果大片的土地都落到牧场主手中。后者规定，政府出售所谓“不适宜于耕种”而只对采伐木材或采石有用的土地，购买者可按每英亩2.5美元的价格买到不超过160英亩的土地。当时，每英亩2.5美元的价格是很便宜的，用美国西进运动史学者R. 比林顿的话来说：它“约为一根好原木的价格”。[①] 这是适应林场主和矿主的需要而制定的法律。在法案实施后，他们雇佣大批移民去政府登记，把领到的土地证都交给他们，然后发给受雇者每人10到50美元的酬金。这个法案最初只适用于西海岸3个州和内华达，1892年又推广到了其他州的国有土地。这样，美国西部森林地带很快就被林业和矿业资本家以极低的代价收买去了。

同时，根据1862年的莫利尔法和1864年太平洋铁路的修订法，铁路公司、土地公司和各州也从联邦政府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它们向西部定居者出售500—600万英亩的土地至少有五、六次之多，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土地靠近交通线和城镇，每英亩售价2至10美元不等。[②] 有些铁路公司还在国内和欧洲许多城市设立代理机构，为出售土地和开垦西部的优惠条件大事宣传，以广招徕。

〔大平原的开垦及耕作方式〕　西部大量土地的出售与各

---

① 比林顿：前引书，第608页。

②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2卷，第88页。

铁路干线的修建为农民的垦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他们要把半干旱的大平原变成适于耕种的农田，还必须克服一系列的困难和障碍。首先，最紧迫的问题是环绕农田修建篱栅的问题。对农场主来说，无论是饲养牲畜、存贮粪肥，还是维护水源，保证庄稼免遭牲口的祸害，修建篱栅都是绝对必要的。特别是在19世纪70年代，当大平原农场主与牧场主为放牧问题而引起的斗争日趋剧烈的时候，筑篱栅的问题更加突出。前者强烈要求后者筑栅圈养牲畜，而后者则坚持敞开放牧，并要求前者自建篱栅，以防牲畜进入。双方争执不下，甚至发生流血的殴斗。但是，在大平原修筑篱栅是极其困难的，因为那里缺乏树木，以致环绕农田修筑篱栅所需的木材，必须从外地运入，而且费用高昂，一般农户根本无力负担。后来，有些农户曾试用挖沟筑堤或种树成篱等各种办法代替木篱，但都难以推广应用。直到1874年伊利诺伊州农场主J.F.格利登发明的铁蒺藜（即有倒刺的铁丝）投入市场后，筑篱的问题才得到解决。接着，在供应铁丝的东部企业主购买格利登公司的一半股权后，该公司于1876年开始大量生产。那年，生产了300万磅铁蒺藜，售价是每100磅约20美元。5年内，铁蒺藜的销售量急剧上升到8,000万磅，而每100磅的价格却下降到10美元，到1890年更下降到4美元。这样便宜的价格使得大平原大部分适宜耕种的土地都用铁蒺藜围了起来，成为小麦的主要产区。因此，有的美国历史学家强调指出，铁蒺藜“对大平原发展的重要性是堪与轧棉机对南部发展的重要性相比的”。[①]

筑篱问题的解决使大平原的农田耕作有了可能，但是发展农业，扩大种植面积，还需要解决水的问题。大平原是片缺水的干

---

① 莫里斯等：前引书，第2卷，第97页。

旱地区，经常发生周期性水荒。随着牲畜的大量繁殖和农田的不断扩大，供水问题更加突出，特别是那些远离河流的农户遇到更大的困难。那里解决的办法是钻打深井、利用风车汲水和采用旱地农作法等。大平原土质干旱，只有钻打深井，才能找到水源，而钻打100英尺以上的深井就需要机械设备。这种机械设备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制造出来，开始供应。风车的应用解决了从深井汲水的动力问题，因为它是靠大平原上强劲的风力旋转的。到70年代后期，那里许多农场都竖立起高耸的风车，成为大平原景色的一种明显标志。另一较广泛运用的办法就是旱地农作法，它是在一场雨后立即耙地松土以保持湿度防止蒸发的科学方法。采用这种方法，在那里大部分土地播下抗旱性谷类的种子就有可能发芽、生长，经过不断的莳弄，就能取得较好的收成。采用这种农作法的土地，每两年必须休耕一年。只有在那些异常干旱的地带，这种农作法才没有奏效。那里农民遇到的另一困难就是土质坚硬，一般老式的犁因铁质较软翻土很不得力。直到70年代后期，冷淬铁制作的犁大量上市后，这里农民才有了翻土的主要工具。不久，单座的多铧犁也问世了，这样农民就能一次开掘好几条垄沟，从而提高了播种的工作效率。大平原的某些地区经常遭到风暴、冰雹和严寒的袭击，因此秋季收割庄稼必须迅速完成，否则一遇气候突变就有全部被毁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农场主或农户经常担心的不是他能种植多少农田，而是他能及时收割多少庄稼。到80年代，收割扎捆机的发明及其广泛使用解决了这一问题。用这种收割机，两个人赶几匹马每天就可收割20英亩的小麦。后来，半机械化的收割效率日益提高，到1890年，一个西部农民就可能每天收割135英亩的庄稼。[①] 最后还有

①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2卷，第90页。

麦种的问题。那里冬季气候严寒，不能种植东部通常种的越冬小麦，而只能改种春小麦：5月播种，冰冻前收割。春小麦种植推广后，大平原各农业州的小麦产量大大增加，使广大西部成为美国主要的产粮基地。

大平原的干旱少雨、树木缺乏等自然特点，也给农业开拓者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由于这里缺乏木材和石头等建筑材料，农民只得用草原上带有草根的硬泥块垒起矮小的住房，美国人称此为“草根泥屋”。这种粗陋的小屋虽也有些优点，即冬暖夏凉，风吹不倒，也不怕草原的野火，但生活在阴湿的四壁当中感到非常抑郁。在干燥季节，屋顶的泥土和草根经常脱落，到了雨季，屋顶上就成了泥泞不堪的泥潭，不断滴答漏水，主妇只能在屋内打伞作饭，非常令人沮丧。缺乏木材也造成燃料困难，尤其是在严冬季节，取暖问题更加严重。最初，农民用晾干的野牛粪作燃料，后来野牛日渐稀少、绝迹，改烧干草，还设计了特制炉灶，以节约干草。但这些燃料都不能令人满意，直到铁路把煤运入大平原，才解决了问题。总之，在开垦大平原过程中，农民不仅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而且他们的生活也是非常艰苦的。

由于大平原农业生产问题的不断解决以及广大农民的艰苦劳动和铁路运输的广泛延伸，美国西部的最后开拓以空前的速度展开。首先，西部人口急剧增加，在1870至1890年期间，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西部人口从687万多人猛增到1,677万多人。[①] 其次，美国耕种的土地也迅速扩大。据统计，在1860到1900年期间，美国农场主和农民拥有的土地增加了1倍多，即从4.07亿英亩增加到8.41亿英亩，其中用于耕种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比重从

① 莫里森等：前引书，第2卷，第98页。

40%上升到差不多50%。[1] 这样，加上农业半机械化的实现，美国农业广泛而迅速地发展了。在农产品价格因世界市场的竞争而下跌以前，美国农业经历了一个繁荣兴旺的时期。

〔“边疆的消失”及其影响〕　随着西部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开拓工作的广泛开展，在密西西比河与西海岸之间的广大地区逐渐为农、牧场主和林业、矿业公司以及众多的开拓者所占据。因此，189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总监在年度报告中宣称：“直到1880年，这个国家（指美国——作者）还有一条拓居的边疆，但是现在这片荒无人烟的地区已经为一大批分散孤立的拓居地弄得残破不全了，因而简直不能说还有一条边疆线了”。[2] 据此，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边疆学说”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J. 特纳把“边疆的消失”看成是美国历史发展中的里程碑，认为它标志着从1607年开始的西进运动的结束和美国历史新时代的开端。这里他提出了两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是“边疆的消失”是否意味着西进运动的结束？二是美国历史的新时代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这需要结合美国历史发展的实际予以分析。

首先，“边疆的消失”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较小的。因为1890年后西进运动同以前一样仍在继续，而且1890年后30年间为定居和放牧的目的而获得所有权的土地比1890年前30年间还要多些。[3] 尽管人口普查局发出了那个公告，说西部土地每平方英亩平均已有2到6个居民，但实际上，那里只有稀稀落落的居民点，仍有大量空隙的土地有待开垦。据统计，1890年除加州以外整个西部农场数比密西西比单独一州还少，仅有俄亥俄农场

①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2卷，第89页。
② 转引自莫里森等：前引书，第2卷，第99页。
③ 莫里森等：前引书，第2卷，第99页。

数的一半；全部耕种土地的英亩数仅为俄亥俄州的两倍。[①] 因此，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力求改善自己处境的人们仍然遵循霍勒斯·格里利的忠告，[②] 络绎不绝地前往西部。在他们看来，与人口稠密的东部老区相比，西部新区的土地较便宜，竞争者较少，而且发财致富的机会较多，因此他们仍把西部看成是"希望之乡"。不过1890年后那里已经没有无人居住的大面积土地了，他们拓居的土地大部分位于大平原分散孤立的农场之间的空隙地区和蒙大拿、怀俄明等新区。

其次，"边疆的消失"对美国社会心理的影响远远超过经济方面的影响。当时，许多美国人虽然对人口普查局公告的发表感到突然，但也逐渐认识到大陆扩张的时代已告结束，海外经营活动的时代即将开始。怎样适应"边疆的消失"后这种巨大变化是美国社会各阶层都不能不加以考虑的问题，首先是西部农场主和农民，他们过去习惯于迁徙流动并靠土地的肥沃来增产商品粮食，今后能否使自己适应稳定性生活和水土保持的习惯？其次是东部工人，他们过去因劳动力和移民不断涌向西部而保有高工资，以后这种情况还能继续下去吗？再次是矿主和林业采伐公司在开发自然资源的投资上也开始踌躇不前，他们过去一直靠掠夺式的开采和砍伐而获得巨大的利润，今后对固定的自然资源增加投资能否获得按比例增长的收益？有些经济学家也发出警告说，长期以来美国经济一直靠继续不断的扩张而取得迅速的发展，今后在没有新的自然资源可供开发的情况下，这种发展的势头还能保持吗？总之这些疑虑和其他类似的问题都对美国舆论和社会心

---

① 比林顿：前引书，第656页。

② 霍勒斯·格里利（1811—1872年）是美国著名的报纸编辑和改革者，曾发出"青年人向西部去"的口号。

理产生较大的影响。当时，美国统治集团为了适应垄断资本集团争夺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的需要，也利用“边疆消失”后社会心理变化的时机，大力鼓吹向海外扩张。有些扩张主义学者也随声附和，宣扬政府的职责就在于为美国人寻求另外可供开发的地区，鼓吹海外扩张乃“边疆消失”后合乎逻辑的发展。因此，海外扩张是美国历史“新时代”的一个主要方面，所谓“新时代的开端”不过是加强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开始罢了。

第三节　西部开拓的历史作用

〔西部开拓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　西部开拓对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它不仅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国内市场、粮食和原料基地，而且促进了交通运输的迅速发展，吸收了巨额外资，从而使采矿业、牧牛业、铁路建设和其他企业有了蓬勃的发展。在19世纪最后30年，西部拓居的土地比1607—1860年美国整个历史时期开拓的土地面积还要大。经过开拓者的惨淡经营和艰苦劳动，密苏里州以西广大地区发展成为小麦主要产区，使美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小麦供应者；艾奥瓦、内布拉斯加和堪萨斯则成为盛产玉米的地区。西部各地矿山的开采既为美国工业发展提供了所需要的原料，也刺激了商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促进了城镇的兴起。横贯大陆的铁路事业的发展，又加速了大平原和落基山地区的开拓。在1869—1893年，美国先后建成了5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线。这些铁路干线及其支线就像几根长长的动脉从东部心脏地区伸向中西部、西南部和远西部的各个角落，把移民和资本以及器材设备输送到“最后的边区”。“一个国家以这么短的时间，开发了这一片广大土地，这无疑是一篇壮丽的史诗。这种现象在历史上，虽不

能说是绝后的，但可以说是空前的……西部土地对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无论用什么动听的字眼来形容，恐怕也不能算作过分的。”①

美国西进运动是资本主义向广度发展的一个典型，它是受着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制约的。剥削和扩张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备条件。在西进运动中，掠夺印第安人土地和屠杀印第安人的政策，在美国资产阶级看来，标志着“文明”战胜了“野蛮”，是理所当然的。因此，特纳在其著作中之所以完全无视向西扩张的残酷性，硬把西部描绘成“和平的”伊甸乐园，也决非偶然。“西部固然为移民提供了机会，但也不若特纳渲染的那样美好。西去的移民（也）是受着无情的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支配和驱使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西进过程中，造成极大的物质和人力的浪费，无数劳动者在精神上和生命上付出了高昂的代价”。②

〔美国版图的扩大与新州的建立〕　随着西部的开拓和西去移民的激增，美国版图扩大了，新的州也在不断建立。1860年，美国约有 1/3 以上地区被划分为一些联邦控制下的准州（或称领地)。准州设有一个两院的议会：一个由直接选举产生的众议院和一个由众议院提名、经国会选择其中 5 人组成的小型“立法委员会”。③ 准州地方长官对一切立法都拥有否决权。准州议会两院共同选出一名代表，“他将在国会中拥有一个席位，……有权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④ 当准州自由居民人数达到 6 万时，即可被接纳为一个州参加联邦。当时，在东起明尼苏达州西

---

① 杨生茂：“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边疆和区域说”，载《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第 14 页。

② 前引《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第 15 页。

③④ 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建国历程》，纽约 1965 年，第 421 页。参看这一著作的中译本，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香港 1987 年）第 518 页。

到俄勒冈、南起得克萨斯州北迄美、加边界这片广大地区上，还没有一个正式建立的州。但在1860年以后30多年间，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这片广大地区也逐渐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其中大部分包括在新建的各州之内，成为联邦正式的组成部分。因此，建立州制是美国吸收西部的一个重要步骤。①

1864年，毗邻加州的内华达作为一个新州加入联邦。接着，内布拉斯加和科罗拉多分别于1867年和1876年被联邦接纳为新州。随着怀俄明准州的建立，西部的领土再划分也基本完成了，但是这些以矿业资源为基础的准州，很少在短期内具备正式建州的条件。

横贯大陆铁路的陆续建成使西部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它们给西部一些准州带来了长住的农业居民并带动了城镇的兴起，从而为它们争取建州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870年，达科他、爱达荷和华盛顿等准州的人口总共仅有37,000人，到1890年，即北太平洋铁路已经建成和大北铁路即将建成的时候，那里的人口已增加到1,128,000人了。② 因此，这些横贯大陆的铁路在创建西部新州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争取建立正式州的鼓动是持续不断的，特别是在达科他和华盛顿准州中。这种鼓动既反映了公众要求建州的热忱，也表明了职业政客力图成为国会议员和新州官员的欲望。但是，华盛顿和达科他准州的情况却是复杂的，华盛顿准州的居民力求把爱达荷狭长地带划入该州，而达科他准州的公众，则坚持把该准州划分为两个正式州，即南达科他和北达科他加入联邦。虽然这两个准州和其他准州根据人口的数量都有充分的资格取得州的地位，但

① 莫里森等：前引书，第2卷，第101页。
② 莫里森等：前引书，第2卷，第101页。

由于首都华盛顿政党斗争的剧烈而被拖延了 10 年之久。直到 1890 年，国会召开两院联席时，南达科他、北达科他、蒙大拿和华盛顿才取得州的地位，加入联邦。次年，怀俄明和爱达荷也分别被接纳为正式的州。犹他准州是摩门教盛行的地区，该教盛行的一夫多妻制是取得州地位的主要障碍，直到该教领袖宣布放弃这一制度后，才于 1896 年被接纳为新州。到 19 世纪末，西部只有 3 个准州尚未取得州的地位，那就是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俄克拉何马。它们未被接纳为州的原因是各不相同的，综括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种因素：人口稀少、不愿与他州合并作为一个州加入联邦以及准州内印第安人问题尚未得到妥善的处理。

〔西部开拓对美利坚民族性格及政治制度的影响〕　美利坚民族形成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其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主要来源于欧洲，这是人所熟知的史实。随着时代的进展和环境的变换，美国的民族性格和政治制度也有了一些发展变化。西部开拓者主要来自美国东部和欧洲，其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也主要来源于美国东部和欧洲，但西部环境及其开拓对他们的思想、传统、风俗习惯以至组织机构都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通过人员的频繁交往和资源货物的不断交流而逐渐扩大到东部以至全国，从而对进一步塑造美利坚民族性格和促进民主制度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这里仅就几个较突出的方面阐述如下。

首先是开拓者在西部开发过程中所形成的进取、求实精神。内战后，前往西部的开拓者是各种各样的：既有为发财致富而投资于农、牧、林、矿业以及修建铁路的资本家，也有去西部寻求机会和“新奇”的投机者和冒险家，但是大多数却是为摆脱困境而去西部谋生的东部劳动者和外来移民，他们是开拓者的主体。尽管各类人前往西部的动因和目的有所不同，但大多数开拓者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富于进取、求实的精神。他们争取自我改

善的意志和决心都比留在东部的人们坚强，他们较少受到家庭和宅地的束缚，因而在西部开拓过程中呈现出一派进取的气氛；但为了实现自我改善的目的，决不能单凭硬拼蛮干，而必须有从现实出发的求实精神。他们是讲求实际的，既对理论不感兴趣，也不考虑过去和将来的事，而只注意目前，解决每天遇到的实际问题。在一个完全陌生的西部环境中，无论是从事生产或安排生活，他们都不能墨守原有的传统和成规，而需要勇于探索和革新，不断结合实际取得实践的经验。否则，开拓者不仅得不到预期的效果，而且还会因不按科学规律办事而遭到惨重的失败。这种失败的事例在西部开发史中并不是少见的，但它们却从反面教育了开拓者，使他们养成了面对现实，探索问题的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进取、求实精神的影响日益扩大，从而加强塑造了美利坚民族性格这一明显特点。

其次，西部资源富庶，人少地多，因而能为开拓者提供较多改善自己处境和致富的机会，这就助长了流动的习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曾指出，在西部“现实生活中，机会就意味着社会流动性，即个人有机会飞黄腾达而不受其社会地位的束缚。”① 这种社会流动表现为横向流动和纵向流动。内战后，由于西部广泛、迅速的开发，开拓者的横向流动更加频繁，他们为改善自己的处境，从东部涌往西部，其中一部分又从农村移往城镇，最后从城镇移往城市。他们离去的地方又为后来者或外来移民所填补。西部新开发的地区也存在着阶级界限，但不像东部较老的社区那样明显、固定地划分，而且较容易被突破。因为开拓者既有可能在那里开发许多未被利用的资源以致富，又易于在

① 奥斯卡·汉德林：“机会在美国：历史的回顾”，载《交流》，1983年第2期，第63页。

一个尚未定型的社会秩序中获得上升的机会。这种社会经济地位上升，即纵向流动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小农场主靠肥沃土地的丰产很快地便富裕起来，投机者由于出售他在城镇的一些地块而获得一笔巨额收入，运气好的矿工拿起铁锹干一阵子便发现丰富的矿藏，从而发了横财。总之，一个人只要在有利时机的情况下致力于发财致富，他就有可能提高他的社会地位。这种川流不息的人群流动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达到了高潮，而且时断时续地一直持续到现在，使美国人成为一个"流动的民族"。①

第三，西部地域极其广阔，因而开拓者的流动往往是长途跋涉的。为适应远距离迅速流动的需要，西部开拓者逐渐养成了一种"拼命赶"精神。这种精神主要来自开拓者的思想意识和开发实践两方面。在涌向西部过程中，开拓者认为："如果你不能赶在别人的前头，抢先到达那里，好处就可能被别人捞走。"② 可是西去"路途遥远，充满危险：沙漠烈日、缺乏饮水、寒冬深雪、充满敌意的印第安人，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每一个深谋远虑的男子汉加快步伐，以尽可能缩短发生危险的可能性。"③因此，在开拓者看来，最紧要的是抢先到达目的地，即使不能成为第一个，也要尽快地到达那里。正是这种"拼命赶"精神，"明确形成了美国向西迁移时的一大特征，"④ 加强塑造了美国人"讲求速度与效率"的性格。当时，这种"拼命赶"精神也推动了水陆运输的改进和铁路的修建，在改进交通运输的竞争中，承包者都力求技术进步，以便超越竞争者。这一点在西部铁路及其支线的修建上突出反映出来了，后来在美国生活的其他方面也都表现出

① 比林顿：前引书，第654页。
②③ 丹尼尔·布尔斯廷：前引书，第97页。
④ 布尔斯廷：前引书（中译本），第117页。

来。

第四，美国人浪费的传统是由来已久的，而这与西部开拓的历程是有密切关系的，特别是内战后，西部广泛开发所造成的自然资源极大的浪费更助长了这种风气。当时，煤、铁、木材和石油等资源都极为丰富，而且易于开采。比如1859年美国打了第一口油井，只钻探了59英尺深就冒出了石油；许多煤矿都是露天煤矿，这就大大简便了采煤的过程。因此，开拓者一般认为美国自然资源极其富庶，是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只有开发而不是保存资源，才能更快地取得财富。这种对自然资源毫不爱惜的风气就助长了美国人的浪费性格。当时，西部乱砍滥伐原始森林，洗劫矿藏资源的现象层出不穷。开拓者既不考虑节约和保护自然资源，更不为子孙后代着想。到20世纪初，尽管老罗斯福政府推行保护自然资源的政策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美国人的浪费习惯仍延续下去了。

第五，西部开拓对促进美国民主制起了一定的作用。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来源于欧洲和美国东部，而决不像特纳所坚持的那样，说它来源于美国边疆，诞生于“美国的森林”。[①] 西部边疆只不过为美国民主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宜的场所。那里土地所有权的广泛分散以及需要自治来解决独特的地方问题都要求扩大民主权利，从而削弱集中领导的控制。开拓者不喜欢政府干涉他们的生活，就像殖民地人民不喜欢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干涉一样，但却要求政府尽力为他们的开发服务。

在草拟制定西部各州的宪法中，就反映出这种扩大民主权利的趋势。西部各州宪法主要是因袭、摹仿东部各州的宪法，但却反映了开拓者关于扩大民主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一）赋予州

---

① 弗雷德里克·J. 特纳：《美国历史中的边疆》，纽约1976年，第293页。

立法机构较大的权力，因为开拓者认为立法机构更能响应公众舆论的要求；同时把立法权置于公众控制之下，采取了诸如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等。（二）扩大民选官员的范围：州长、立法机构的议员、教育委员会负责人以至法官等都由民选产生。①（三）扩大了公民权，取消了选民的财产限制和宗教测验，成年男子都享有普选权。怀俄明和犹他两州的宪法还规定妇女有选举权，不久以后科罗拉多州和其他西部各州也把这项规定纳入它们的州宪法。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19 世纪后期西进运动是美国不断扩张领土的运动，也是美国人和移民开发西部的群众性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既充满了美国统治集团驱赶、屠杀印第安人的血腥史实，也留下了开拓者披荆斩棘、艰苦奋斗的开发业绩。这种开发业绩既对美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进一步塑造了美利坚民族的性格，促进了美国民主制的发展。

---

① 比林顿：前引书，第 652 页。

② 莫里森等：前引书，第 2 卷，第 104 页。

第五章

内战后涌入美国的移民洪流及其对美国发展的巨大作用

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它的历史进程受着连续不断的移民洪流极大的影响。在世界近代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吸引了数目这样众多、民族（或种族）这样庞杂的外来移民。除了原有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外，所有美国人不是外来移民，便是外来移民的后代。

19世纪后期是美国移民急剧增长的时期，涌入美国的各国人民形成了连续不断的移民洪流。这些移民来自欧洲、亚洲、非洲和拉美等地，其中绝大多数来自欧洲：19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来自西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但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二、三十年期间，来自东欧和南欧各国的移民逐渐居于多数。经过不断的繁衍与融合，美国逐渐形成一个以欧洲白种人占多数的国家。

自建国以来，美国出于对劳动力的需要，一直欢迎外来移民，采取来者不拒的政策。直到1882年“排华法案”实施后，美国才逐渐过渡到以种族和国籍为基础的限制和选择移民政策。这种限制和选择政策主要是针对华侨和东欧、南欧各国移民的。美国采取排华政策，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美国资产阶级既把华工作为剥削的对象，又是其用来挑拨民族关系和对付

本国工人阶级的手段。

这个时期，外来移民对美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生活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他们不仅为美国工业化和西部开发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先进技术，从而大大加速了美国工业化和西部开发的进程，而且丰富了美国精神生活，促进了美利坚民族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节　内战后移民洪流及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

〔内战后移民洪流及“老移民”的情况〕　1860—1900年期间，美国人口总数增加了一倍多，即从3,100多万人增至7,600多万人。在全国人口增长中，外来移民占有很大的部分，仅在这40年间，就有1,400多万移民涌入美国。其中绝大多数来自欧洲：19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来自西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但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二三十年间，来自东欧和南欧各国的移民逐渐居于多数。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涌入美国的移民数目出现了两个高峰年代：一个是1881—1890年，达到了520多万人，另一个是1901—1910年，达到了870余万人之多[①]，它在美国移民史上是个创纪录的数字。这个时期，美国的外来移民在数量上连续出现高峰年代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另方面是有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东欧和南欧各国，人口激增，而本国当时社会经济条件却不足以容纳激增的人口，适应他们生产和生活的要求，以致大量外流。

19世纪80年代以前四五十年间，美国的大部分移民来自英

① 《美国历史统计》，第一部分，第105—106页。

格兰、爱尔兰、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西欧和北欧国家，他们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老移民”。这些移民的数量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了高峰，以后就大为减少，其情况有如下表。19世纪80年代以后，这些国家或地区前往美国移民大为减少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它们本国工业日益发展，因而对劳动力的需要激增；第二，西欧国家，特别是英、德等国开始占领广大的海外殖民地，因而它们国内过剩的人口也可向那些地方转移。

西欧和北欧各国前往美国移民的数目表

（1841—1900年）

国别或地区 / 年代	德国	爱尔兰	英格兰 苏格兰 威尔士	斯堪的纳维亚
1841—1850	434，626	780，719	267，044	13，122
1851—1860	951，657	914，119	423，929	24，680
1861—1870	827，468	435，697	607，076	126，392
1871—1880	718，182	436，871	548，043	242，934
1881—1890	1，452，970	655，540	807，357	655，494
1891—1900	505，152	388，416	271，538	371，512
总计	4，890，055	3，611，362	2，924，987	1，434，134

资料来源：伦纳德·丁内尔斯坦等：《美国人的种族、外来移民与同化史》，纽约1982年版，第12页。

在19世纪中叶以后，西欧和北欧各国的“老移民”之所以离乡背井、移居美国，固然由于他们在本国生活无着以及难以忍受的政治和宗教迫害，也由于当时“美国热”在欧洲盛极一时。那时，美国铁路公司和大企业为了出售铁路沿线的大量土地和招募工厂所迫切需要的劳动力，纷纷在欧洲各国设立代理机构，一方面大渲染移民易于获得便宜土地，经营田园的美妙景象，另方

面广泛宣扬美国就业机会多、工资高的优越条件，以广招徕。有些公司和企业老板在欧洲招募迫切需要的工人时，甚至先垫付来美移民的旅费，日后由他们工资中扣还。此外，早先移居美国的“老移民”也纷纷写信回国，夸耀美国的富庶，甚至把它描绘成“天国乐土”或“希望之乡”。有个来自挪威的移民就在家信中夸大其词地写道：“挪威不能与美国相比，正如一片沙漠不能与鲜花盛开的花园相比一样”。[①] 这对他们故国同胞和亲友自然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同时，由欧洲来美国的移民在出境手续和旅程条件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改进。移民的迁徙自由，逐渐为西欧、北欧各国政府所确认，因为人口过剩的幽灵促使它们把移居外国看成是一种医治本国贫困和人民不满情绪的“安全阀”。欧洲各大港口设施都有所改进，办理离境手续也在简化。远洋轮船取代了帆船，大大缩短了航期，到 19 世纪 70 年代，横渡大西洋的航程无需几个月了，而只需 10 天左右。由于航行日程大大缩短，船上供应的水和食物都易于保持新鲜，疾病和死亡率因而也大为减少。

欧洲的“老移民”到美国后，一部分从事修筑铁路和开凿运河等艰苦劳动，大部分留在他们登陆的港口城市及其周围，充当工人或从事商业活动。到 19 世纪末，旧金山和新奥尔良等城市都有爱尔兰人聚居区。德国在 19 世纪中叶的农业歉收虽然没有恶化到当时爱尔兰那样程度，但是 19 世纪 60 年代由于俾斯麦发动的战争而引起德国各邦的动乱以及大量征兵和雇佣劳动者社会地位的低下都加剧了移民外流的浪潮。德国人是来美国的移民中最大的民族集团，到 19 世纪末达到将近五百万人。他们中多数

---

① 伦纳德·丁内尔斯坦和戴维·里门斯：《美国人的种族，外来移民与同化史》，纽约 1982 年，第 16 页。

在中央北部各州(伊利诺伊、密歇根、密苏里、艾奥瓦和威斯康星)从事农业劳动,也有少数人进入城市,充当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或经营小商店等,因而使圣路易斯、辛辛那提和米尔沃基等中西部城市都富有德意志民族的色彩。甚至在纽约市,他们的人数也超过了其他外来移民。那里的"居民谋生甚至不需要懂英语。"[①]

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人之所以离乡前来美国,除了经济因素外,还有政治和宗教的原因。在瑞典和挪威,由于政教一体,不信国教者与政治上持异议者都遭到迫害和惩治,严峻的征兵法也使得许多青年人逃役外流。在1890年前,他们大部分前往美国中央北部各州产麦区从事耕种,因而中西部、特别是明尼苏达州人口激增。从19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们转向东北部和大西洋中部各州,充当企业工人,也有些去太平洋西北部,从事采伐区和锯木工厂的劳动。据191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资料,有60%以上的瑞典移民及其子女居住在城市及其附近地区。

〔"新移民"的来源及其特点〕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来自东欧和南欧各国移民日益增加,到19世纪90年代他们汇成了一股移民洪流,超过了移入美国人数的一半,后来在20世纪头10年间更增加到占来美国移民总数的72%[②]。这些移民被称为"新移民",以区别于19世纪80年代以前来自西欧和北欧各国的"老移民"。他们分属于意大利人、斯拉夫人和犹太人三个民族集团,主要来自欧洲三个国家:奥匈帝国、意大利和俄国(包括波罗的海国家)。这三个国家的移民数量的增长情况有如下表所示。

---

① 丁内尔斯坦:前引书,第24页。

② 阿瑟·林克等著:《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83年,上册,第11页。

在这批移民来源的变化中，意大利移民数目的增长是个突出的例证：1880 年来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只有 12,000 多人，但到 1907 年却增加到 285,000 多人，占该年来美国移民总数的 22%。①

1871—1910 年来自奥匈帝国、意大利和俄国的移民人数增长表

国别 / 年代	奥匈帝国	意大利	俄国	总和
1871—1880	72,969	55,759	39,284	168,012
1881—1890	353,719	307,309	213,282	874,310
1891—1900	592,707	651,893	505,290	1,749,890
1901—1910	2,145,266	2,045,877	1,597,306	5,788,449
共计	3,164,661	3,060,838	2,355,162	8,580,661

资料来源：《美国历史统计，殖民地时代到 1970 年》，华盛顿政府出版局 1975 年版，第 1 部分，第 105—106 页。

"新移民"具有不同于"老移民"的一些特点。首先，在宗教信仰上，他们不是新教徒，而主要是希腊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的教徒。其次，他们操本国或本民族语言，不能讲英语。第三，他们来自比"老移民"（爱尔兰人除外）贫穷得多的国家，原有生活都较贫困，教育和文化程度也较低，文盲比率大，但是男性和青年所占比重都超过了"老移民"。第四，他们到美国后，大都在城市的本民族聚居区定居谋生。

到 19 世纪末期，美国农村可供出售的便宜土地已经不多，而城市里迅速扩展的轻、重工业都需要大量的非熟练工人，"新移民"正好适应这种需要。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只身来美国的，家眷仍留在本国，因为这些人亦不打算在美国定居，而只想

① 《美国历史统计》，第一部分，第 105—106 页。

寻求发财致富的机会，一旦发迹，便准备衣锦还乡。所以有位美国社会学家称他们为“迁徙的产业工人”。[1]

“新移民”之所以离乡背井，移居美国，基本上同“老移民”一样，也出于政治、经济和宗教等方面原因。不过由于时代背景和地区情况的不同，他们离乡外迁的原因也有某些特点。首先，宗教迫害仍是东欧各国人口外流的原因。在19世纪后期，西欧各国对不同教派的容忍精神日益增多，因此宗教信仰问题已非移民出境的主要原因。但是东欧几个国家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它们继续歧视犹太人宗教，特别是在沙皇俄国占领下的波兰，在19世纪80年代初就因宗教信仰问题发生过对犹太人有组织的迫害，后来还发生了几次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结果造成犹太人大量离境。据统计，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从东欧来美国的犹太人移民在200万人以上，其中大部分来自俄国，也有一部分来自奥匈帝国。其次，由于受到政治迫害而大量出境的是波兰人，他们在波兰被瓜分后受到异族的残暴统治，对俄、德占领当局推行俄罗斯化和日耳曼化的奴役政策深恶痛绝，因而纷纷外迁。第三，由于原有农业秩序的破坏和严重歉收，东欧和南欧各国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背井离乡，特别是意大利农民因生活困苦、走投无路而大量迁往美国。当时，小麦和柑桔等水果价格在世界市场上暴跌，导致了意大利农业经济的衰落，这使得原已生活贫困的农民更陷入绝境。有些来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后来说：那时“如果我们仍留在意大利，那么只有当作食物互相吃掉了。”[2] 当时，在奥匈帝国，许多农民因丧失了土地，无以为生，而新建的工厂又寥寥无几，根本无法吸收大量无地的农民和失业者。这就导致大量

① 参看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2卷，第178页。

② 丁内尔斯坦等：前引书，第33页。

的马扎耳人和斯洛伐克人离境外迁。

〔“新移民”来美国后生活和工作情况〕　“新移民”到美国后，主要分散定居在密西西比河以东和俄亥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他们中多数定居在新英格兰、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等州，也有相当数量的移民前往伊利诺伊和俄亥俄两州谋生，只有很少数去南部各州，这是因为南部在提供土地和就业机会方面都不能与北部相比。

“新移民”中大多数定居在纽约、芝加哥和底特律等一些大城市中，这是因为那里工厂林立、商业发达，就业机会多，而且在民族聚居区里有不少他们的亲友和同胞，这自然有助于他们谋求生计和适应新的环境。这些不同民族聚居区俨然像个大城市里的小城镇，因此有许多美国学者把它们称作“被包围的飞地”，比如当今纽约市里仍存在的“小意大利区”、“犹太人区”和“斯洛伐克人区”等就是这些延续下来的“飞地”的例证。因此，这批在大城市定居的“新移民”，既没有与土生的美国人融合在一起，也与其他民族聚居区彼此隔离，不大往来。

这种民族（或种族）聚集的趋势也反映在移民职业上。他们从事的职业虽然各种各样，但由于民族（或种族）聚合力的作用，往往集中于某些行业或从事某几种职业。比如，“新移民”中最大的民族集团意大利人从事的职业虽较广泛，但他们大部分集中于以下几种职业：接替爱尔兰人，充当铁路工人、建筑队工人以及矿工；经营果园、葡萄园和城郊的蔬菜农场。斯拉夫人多在密歇根、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等州的矿山和工厂劳动，也有些在芝加哥屠宰场和炼钢厂当工人。犹太人主要是在大城市里开店铺，做小生意，也有不少在雪茄工厂和酿酒厂当工人。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因受过教育，有些文化，往往被工厂录用为技术工人。后来，犹太人就利用他们掌握的某些工艺，在纽约市的一些轻工

业行业、特别是服装行业中长期占有优势。

总的看来，“新移民”干的活计大部分属于社会底层的职业，是土生美国人和“老移民”所不屑于的既劳累而又肮脏的活计。但是为了谋生，他们也不得不接受这种工资既低、工作时间又长的重活和粗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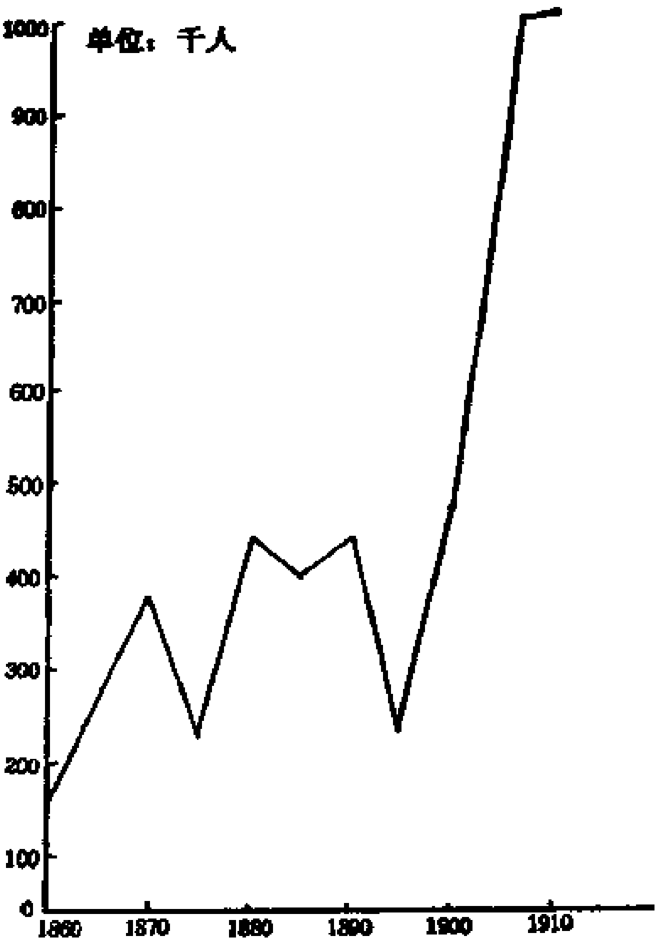
〔“推和拉”作用的分析〕　美国自建国以来，就不断向西部扩张，先后通过购买、谈判、掠夺与合并等方式，逐步把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直到太平洋沿岸的北美大陆纳入美国版图。这片地广人稀、有待开发的广阔土地对外国移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内战以后，随着美国工业化的普遍、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相应的提高。美国工人工资比较高，超过了当时欧洲各国工人工资的水平，这一事实也对外国移民有着较大的吸引力。因此，在19世纪后半期，涌入美国的移民数量是曲线上升的，但有较大的起伏，如下页图所示。这种起伏与美国和移民出境的国家双方经济的发展有什么关系？是美国经济繁荣吸引移民的“拉”，还是欧洲各国经济衰退导致移民外流的“推”起主要作用？对于这种问题，美国经济学界早先的一种说法是：美国外来移民的高潮与低潮与美国商业周期有密切的关系，而与移民离去的国家经济情况的关系较少，即美国外来移民的高潮和低潮是以美国经济繁荣或衰退为转移的。[①] 美国繁荣时期对劳工的需求明显增加，不断从劳动力过剩国家或地区吸引劳工，从而出现移民来美国的高潮；反之，美国经济衰退时期，由于失业人数增长，外来移民的流量迅速减少了。这也就是说，在移民涌入美国这个运动中，美国方面“拉”的力量起了主要作用，而欧洲各国方面

---

① 哈里·杰罗姆：《移民群与商业周期》，纽约1926年，第209页；参看哈里·N. 沙伊贝等：《美国经济史选读》，纽约1964年，第395—405页。

"推"的作用则较小。

1860—1910年迁居美国的移民人数表



资料来源：《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地时代至1957年》，华盛顿1960年，第33—34页。

到本世纪5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布林利·托马斯提出了一个较为复杂的设想。[①] 他认为当时存在一个由互相依存的国家构成的"大西洋经济体"，而移民周期的变化与欧洲和美国经济发展

① 布林利·托马斯：《移民群与经济增长》，1954年版；参看格伦·波特主编：前引书，第3卷，第1072—1073页。

的节奏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不是从短期的商业周期，而是从双方长期的经济发展与资本构成的速度来考察美国外来移民数量的起伏。他指出，当投资额在英国明显增长时，美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就缓慢了，以人力和资本为主体的西进运动也减弱了；可是，资本一旦大量流入美国，那里经济活动便扩展了，移民洪流也就很快地随之而来。根据资本流向和资本构成变化的情况，他认为，1870 年以前，美国工业生产的高涨（以铁路修建、生铁生产和外国投资的增长等为标志）是紧随着一次移民高潮而出现的，所以那时欧洲萧条的“推”比美国繁荣的“拉”对移民去美国有着更大的影响；但在 1870 年以后，当美国经济发生结构变化时，即美国经济首次出现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时，外来移民的高潮是随着美国经济高涨而来的，这标志了“拉”的因素居于主导地位。①

托马斯的这种分析虽然以“大西洋经济体”为名来考察美国外来移民数量的起伏，但实际上，只是以研究英、美两国经济相互作用为依据的，而没有对美国与移民离去的其他国家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因而不可能说明其他国家移民去美国的原因和演变情况。

实际上，在美国经济对移民具有同样吸引力的条件下，各地移民外迁的数量和速度是不一样的，是随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而异的。这种差异和悬殊主要是由移民各自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决定的。一般说来，欧洲各国移民外迁经历着一种普遍的趋势：即开头数量较小，中间出现高峰，末尾急剧下降，而这种趋势与美国经济的发展并无直接关系。比如，1830—1834 年，来自德国的

---

① 参看马尔德温·A·琼斯：“外来移民”，载格伦·波特：前引书，第 3 卷，第 1072 页。

移民只占其全部人口的2.2‰，到19世纪50年代前期上升到9‰的高峰，但在1880—1884年却下降到3.8‰，最后到20世纪初期则更少于1‰，而这个时期却是美国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1]就是在一个国家内，移民外迁的强度也由于地区情况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在1905年匈牙利境内，前往美国的移民比率在马扎耳人中是4‰，而在斯洛伐克人和罗塞尼亚人当中却分别高达19.2‰和15.1‰。[2]

因此，这种大量人口的移动不单纯是由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决定的，而且也取决于移民离去的国家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后者比前者更能确切地说明该国移民外迁的数量和演变。

〔排外主义的抬头与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　自从美国建国以来，美国人一般是赞成广泛吸收外来移民的。这是因为：第一，美国幅员广大，资源富庶，但既缺少劳动力又缺乏技术，因此开拓土地、开发资源和发展经济都有赖于连续不断的移民洪流；第二，美国人相信他们有力量同化外来的移民，认为美国是个不同民族、种族的"熔炉"，经过这座"熔炉"的冶炼，美利坚民族将日益发展壮大。

但是，随着移民洪流的不断到来，土生的美国人和早来的移民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恐惧与担忧。他们害怕日益增多的外来移民会危及美国原有的"社会团结"，特别是害怕移民当中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教徒和欧洲思想激进分子都会在美国煽动和制造"骚乱"，从而威胁美国共和政体和民主制度。甚至担忧外来移民会给美国带来贫困、疾病和罪犯等严重社会问题，从而"结束了

---

① 约翰·博德纳：《迁徙的移民，都市化美国的外来移民史》，布鲁明顿1985年，第3页。

② 同上。

美国对欧洲社会弊病的免疫性。”这种恐惧和担忧由于报刊宣扬欧洲各国政府有计划地把社会渣滓倾倒给美国的报道而更为加剧。特别是宗教偏见在煽起美国排外主义情绪上起了更大的作用。先是爱尔兰和德国天主教徒的大量涌入，继而是东欧和南欧各国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大批到来，都被认为是对美国新教性质的威胁，以致引起了殖民地时期反对天主教活动的复活。在19世纪中叶，美国反对天主教的宣传鼓动不是侧重于教义和教会仪式的差异，而是集中于与欧洲专制主义和暴政有紧密联系的天主教会的信徒对美国现行制度所造成的危险。甚至有人捏造说罗马教廷有个借助天主教徒移民颠覆美国自由制度的阴谋计划，以致酿成了一系列暴徒袭击天主教机构的事件。“一无所知党”便是在50年代反对天主教和外来移民运动中出现的。到19世纪80年代，随着“新移民”中天主教徒的激增和天主教教区学校的不断扩展，美国反对天主教会的排外主义也日益加剧。1887年创立的“美国保护协会”，其宗旨就是限制天主教徒担任公职，支持国家义务教育法，防止天主教会对公立学校影响的扩大。它还利用关于罗马教皇命令天主教徒消灭美国一切异教徒的谣传，大肆煽动反对天主教会的情绪，并在当时中西部农业区得到广泛的支持。同时，犹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也招致了反犹太主义运动的增长。从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犹太人越来越成为

联邦政府对外来移民实行来者不拒的政策，并把管理移民事务的权力留给各州。但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由于西部边疆的消失，外来移民激增，国内排外主义情绪日益增长，联邦政府开始考虑限制移民的政策。

1882年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是第一个以种族和国籍为理由禁止外来移民入境的联邦法案。它规定禁止华工入境十年，并禁止华侨入籍。1892年，国会又将该法案延长十年，到1902年进而无限期延长。“排华法案”虽然是针对中国人的，但也是限制东方人入境的开端。

这个时期，禁止移民入境的对象不仅限于华工，也涉及东欧和南欧各国的劳工。1885年，国会通过了禁止输入契约劳工的法案。这主要是来自劳动骑士团压力的结果，因为它宣称美国雇主们正在签订从东欧和西欧各国输入大量劳工的合同，用以破坏美国工人的罢工和降低工资。

从1890年起，联邦政府开始实行移民管制，并且根据个别选择的原则实行限制。那年，联邦政府设立了移民局，由它直接管理有关移民的事务。1892年，开放了埃利斯岛，把它作为纽约港的移民接受站。这时，禁止入境者的类别也在不断增加：1891年禁止入境者包括穷人、一夫多妻者和传染病患者；到1903年更增加了麻风病患者、妓女、职业乞丐和无政府主义者等，盘查入境者的措施也日益严厉和苛刻。

在1890年以后，随着“新移民”入境数量的激增，排外主义者把矛头日益对准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他们担心“老血统”的美国人有被这批“新移民”淹没的危险，极力鼓吹以认字为基础的“文化测验”，以限制东欧和南欧移民入境。接着，禁止不能阅读一种文字的移民入境的宣传运动便广泛展开了。在排外主义者不断鼓动下，国会于1896年通过一项对移民实行识字测验的法案，即成年的外国

移民不能阅读一段英文或其他文字者，一律不得入境。但这个法案却为克利夫兰总统所否决。在20世纪初期，国会又三次通过类似的法案，但均为历届总统所否决，直到1917年，国会不顾总统的否决，终于以2/3以上的多数票通过有关"文化测验"的法案。

这样，一直对移民敞开着的美国大门——几个世纪以来千百万移民憧憬着的机会之门——到20世纪初期部分地关闭了。这固然是排外主义者大肆活动的结果，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到本世纪初期，美国人口已接近1亿大关，它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缺乏劳动力了。

第二节　招募华工开发西部与美国排华暴行

〔招募华工开发加州与华侨遭受剥削和迫害〕　1848年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山谷发现金矿后，许多淘金者蜂拥而来，东部资本家也开始前往投资。但是那里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成为资本家开发资源的主要困难。为了解决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美国资本家开始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招募华工。在两三年内，被招募前往加州的华工达两万多人。经营远东贸易的美国船商因客、货运量激增，也获得巨额利润。

前往加州的华工不仅为资本家开矿掘金，有些还为他们开荒种地、疏浚河道、修建铁路和房舍等。因此，华工曾以自己的血汗在开发加州历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而且得到一些美国学者的公认和称赞。① 但不久后，华工和华侨都遭到了歧视和迫害。当

---

① 玛丽·库利治在《中国移民》（纽约，1909年）一书结论中称"没有华侨勤勉劳动的贡献，加州是不会像今天这样富庶和安适的"，见该书第478页。美国作家J.H.卡逊在《加州生活》一书中也指出，"华工在开发加州农业资源方面贡献最大"，转引自《中国移民》，第55页。

时，在加州掘金的外籍矿工都须交纳高额的执照税，而外籍矿工中，以华工为最多，因此沉重的赋税负担都落在他们肩上了。据统计，在1850—1870年期间，华侨占加州人口总数不到1/10，但华工缴纳这项税款却达500万美元之巨，占该时期州行政开支的一半。同时，从事掘金的华工又以工资低廉，招致白人矿工的忌恨。当地政客和种族主义者便乘机煽动排华情绪，以取得白人矿工的拥护。在当地法院的纵容和支持下，一些暴徒和种族主义者更肆无忌惮地抢劫和谋害华侨，各地矿区杀害华工的事件也日益增多。杀人者逍遥法外，被谋害者无人过问。1857年，加州《沙斯塔共和报》曾作了较为客观的报道：

> "五年以来，华人之为人谋杀者，不下数百，皆我（指美国——作者）亡命之徒所为。盖谋杀华人之事，无日靡有，而罪人斯得，明正典刑者，最多不过两三次，犹有反对白人为华人抵偿者，窃以人之情忌，其违背天理，莫此为甚。"①

华侨在遭受迫害的同时，还受到加州苛捐杂税的残酷剥削。那里榨取华侨的苛捐杂税真是名目繁多，层出不穷。华工因负担不起这种沉重的苛税而被迫回国者日增。因此，有些加州议员指出，排华政策的实施，不宜过于急骤，因为他们担心倘华工因承受不了过分沉重的赋税而纷纷离境，那么地方政府的经费来源便成了问题。② 所以，采取在华侨不生不死的范围内榨取其财货的作法，便成为这个时期加州排华政策的基本方针了。

〔"蒲安臣条约"及其实质〕　华侨在加州备受歧视和迫害，但是美国政府的政策仍然鼓励华工来美。这是因为美国内战期间，有400万青壮年被征入伍，工农业生产都感到劳动力严重

---

① 玆亨利：《华侨志》，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28年，第138页。

② 库利治：前引书，第33页。

不足。内战结束后，北部资产阶级开始大量投资开发西部，修筑横贯大路的铁路，而开发和建设都需要大批劳工。在劳动力缺乏的情况下，招募华工又形迫切。因此排华论调也暂时收敛起来。1868 年乘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英文原名为安森·伯林格姆）代表清政府出使各国、到达华盛顿时，共和党政府同他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美国一般称之为“蒲安臣条约”)。该条约共有八条，涉及互派领事、商业贸易、宗教信仰以及人民互相往来和旅行、居住等项事宜，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五条，规定“中美两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自便，不得禁阻。”① 这项规定实际上符合了美国对华工日益增长的需要。所以当时鼓吹输入“廉价劳动力”的美国国务卿威廉·H·西沃德，力主把保证中国不受限制地向美国移民这一条写进这个条约。② 因此，这个条约公布时，受到了美国（包括加州在内）舆论界的广泛赞扬。

从表面上看，这个条约似乎是个平等条约，过去许多中外学者也确实是这样看的。直到近年，有的华裔美国学者仍称它是个“非凡的”文件，指出它“明确地处理了中国人向美国移民的问题”，表明了美国“以合作精神发展美、中两国间贸易和经济关系的期望”③ 这种看法可能是为条约的表面词句所眩惑，而没有透过当时美国政府的真正意图观察它的实质。其实，这一条约不过是使美国人来华传教、游历更加自由，并使其在中国招募华工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69 卷，第 20 页。按第五条“入籍”一词恐系当时翻译之误，因该条约英文本并无“入籍”字样，同时本条约中文本第六条亦载有“中国人民在美者亦不得因此条约，即特作为美国人民”，所以与第五条“入籍”一词前后矛盾。

② 参看托马斯·A·贝利：《美国人民外交史》，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 1970 年，第 307—308 页。

③ 杰克·陈（陈依范）：《美国华人的历史》，旧金山 1981 年，第 128—129 页。

活动合法化而已。由于条约载明来往自由，华工去美国的障碍暂被去除，去美国谋生的华工人数因而激增，从 1868 到 1870 年期间，共有 33，000 多人，逐年增加的数字见下表。

1868—1870 年前往美国的华侨人数表

年　份	前往美国的华侨人数
1868 年	5，157 人
1869 年	12，874 人
1870 年	15，825 人
三年合计	33，856 人

资料来源：《美国历史统计，殖民地时代至 1970 年》，华盛顿 1975 年，第一部分，第 108 页。

美国政府既已达到招募华工合法化的目的，因而对清政府代表所提关于美国虐待华侨的软弱抗议，也作了纸面上的让步。该条约第四条规定："……嗣后中国人在美国亦不得因中国人民异教稍有屈抑苛待以昭公允"。[①] 据随同蒲安臣出使的华人代表志刚在他日记中的记载，清政府提出这项条款的原因是："中国人之在金山者，现在被抑勒之事，如华民与本地人争讼，即华民被屈，若无本地人作证，官不准理。不准华人作证，其意以华民异教，不奉耶稣，其言不足信也。又华民在金山工作，每人每年（应为每月——作者）出税银两元，从前各国之人俱纳，现已均免，惟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69 卷，第 20—21 页。

不免华民之税，其意亦因其为异教人也。”[1] 条约虽然明文规定美国对华侨不得“屈抑苛待”，然而实际上仍将华侨看成是异教的“劣等民族”，华侨在各州仍无控诉权和作证权，旧金山市华侨在纳税上所受的歧视待遇并未改变，联邦政府也未因签订这个条约而有所干预，华侨受压抑、歧视的痛苦生活仍然如故。

〔华工对修筑铁路和开垦农田的巨大贡献〕　“蒲安臣条约”签订后，大批去美国的华工正好适应美国修筑铁路和开发西部的需要。1862 年，美国国会通过修筑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铁路的议案。这项工程分别由中央太平洋和联合太平洋两家铁路公司承包，由加州萨克拉门托和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相向修筑，最后在犹他州接轨会合。西部工程由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承包，它所经的加州塞拉岭和内华达州一带，高山峻岭绵亘，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塞拉山区冬季常有暴风雪，沙漠地带夏季干燥炎热，施工条件异常艰险，不少白人工人纷纷离去。西段筑路工程，进展非常迟缓，开工两年之久，铺轨尚不足 50 英里。于是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开始雇用华工，到 1869 年西段全线雇用的筑路工人将近 1 万，其中 9/10 均系华工。华工以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了一系列的艰难险阻，完成了大量繁重而复杂的筑路工程，例如从 1866 年夏季开始，用一年多时间终于打通了穿越塞拉岭长达百里的峥岩通道。有位美国作家对华工开凿这段艰险通道的英勇精神作了客观的描述，他写道：

> “……合恩角（或译为“牛角岭”——作者）犹如一堵花岗岩石墙。它是这一年（指 1866 年——作者）里最不易攻克的难关。它的下部是垂直光滑达一千英尺

---

① 志刚：《初使泰西记》（系《走向世界丛书》的一种），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第 27 页。

的悬崖峭壁。百折不挠的华工腰系绳索，身悬半空，用锤子和钢钎凿出一条险峻的小道，然后再费力地逐步向里扩展，开出一条行使车辆的通道。”①

在塞拉岭开凿隧道的过程中，冬季经常发生雪崩，工地营篷至少四次被雪崩冲落峡谷，死亡华工约有500至1,000人之多。②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承担的西段工程异常艰险，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承担的东段基本属于平川大地，施工容易得多。所以《斯普林菲尔德共和报》编辑指出，后者的铁路工程与前者“对比之下，像是儿戏”。③ 在东西两段展开筑路竞赛的最后阶段，华工创造了每天铺轨10英里的空前纪录。④ 在华工付出巨大牺牲和血汗代价下，中央太平洋铁路终于1869年5月在犹他州的普罗蒙特里与联合太平洋铁路接轨，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连接美国东西部的铁路因而宣告建成。在庆祝这条铁路建成的大会上，华工因受到种族歧视而未能参加，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四巨头之一、招募华工的倡议者、加州法官查尔斯·克劳克在庆祝大会上提醒大家：

“这条铁路之所以能及早完成，大部分应归功于那些贫苦而被人蔑视的中国工人，他们忠诚勤奋，表现著异。”⑤

后来，有些美国历史学家对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建成与华工的功绩也作了较实事求是的描述和评价，他们写道：修筑这条铁路所

---

① 奥斯卡·刘易斯：《四大股东》，纽约1938年，第74—75页；转引自宋李瑞芳著：《美国华人的历史和现状》，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4年，第31页。

② 参看刘伯骥著：《美国华侨史》，台湾1975年，第614—615页。

③ 宋李瑞芳：前引书，第32页。

④ 刘伯骥：前引书，第616页。

⑤ 刘伯骥：前引书，第617页。

"要克服的障碍几乎是难以逾越的"，要"同山中的暴风雪和沙漠的酷热作经常斗争"，"这些困难的克服……应归因于"包括华工在内的数千劳工的"勇敢和献身精神"，施工中"最沉重的部分都落在他们强壮的肩膀上"。[①]

华工还参加修筑了北太平洋铁路线，把这条横贯大陆铁路的受益地区扩大到了西北部。同时，他们也是南太平洋铁路工程的主要劳动力，把这条铁路的支线伸向西南部。

华工除以极大的努力和牺牲建成美国通向西部的铁路线外，还对加州的农业开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介于萨克拉门托河口和圣华金河口之间三角地带现在是加州肥沃的农田和菜园，但它最初是全凭华工勤劳的双手开垦出来的：先是筑堤垦荒，接着修建排水渠道和灌溉系统，才把萨克拉门托河畔的沼泽地变为良田。从 1870 年起，小麦逐渐成为加州主要农作物，但是农场小麦种植从播种、除草和收割全靠中国农业工人。当时，阿拉米达县有位美国农场主说，每逢收割季节，除华工外，其他雇工都靠不住，如果没有华工，那么农作物就收不回来。[②] 华工不仅勤劳可靠，而且多数都比白人农业工人有更熟练的耕作经验。所以当时加州各地农场主都纷纷雇用华工，充当农场的主要劳动力。据统计，1870 年，加州有 1/10 的农业工人是华侨，到 1880 年，华侨农业工人的比例增至 1/3，4 年之后，一半以上的农业劳动力是华侨。[③] 此外，还有不少华工从事果园劳动，据 1886 年加州的统计，受雇于果园的华工有 3 万人，约占该州果园工人总数的 7/8。[④] 总之，华侨是加州农业开垦的一支主力，这是早期美国

---

① 莫里森等：前引书，第 2 卷，第 106—107 页。
② 参看刘伯骥：前引书，第 623 页。
③ 宋李瑞芳：前引书，第 64 页。
④ 参看刘伯骥：前引书，第 623 页。

历史学家所一致公认的。他们开垦荒地、收获庄稼，才使大批涌向西部定居、征服荒野地区的移民得以温饱。

〔*加州政客煽动下的排华浪潮及其蔓延*〕　1873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使初具规模的加州企业受到严重的打击，工厂倒闭，矿区停工，造成大量工人失业。中央太平洋铁路建成后，有近万被解雇的华工也在这时回到旧金山市，流浪徘徊，寻找工作。这引起了白人失业工人的恐惧，他们指责华工接受低工资，形成对他们就业的威胁。于是地方政客和种族主义者乘机挑拨不同民族工人之间的关系，在各种报刊和公众集会中肆意诋毁华工，说他们“智力低下，虚伪成性，道德堕落，生活卑贱”，是世界上“最低劣的民族”。“他们不能为教育所同化，又不能完成任何公民义务”，“如果允许他们呆在美国，那不仅美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要大大降低，而且精神道德方面也要受到毒害”。在排华气氛日趋增长的情况下，有些暴徒开始在一些城镇和中国城侮辱和袭击华侨，而肇事者却未受到任何干涉和惩治。同时，加州的民主党与共和党都竞相以排华为其政治资本，把“排斥华工”列入它们的政纲，以争取工人的选票，从而达到取得加州政权的目的。

1876年加州发生旱灾，造成农业歉收，许多农场主因而破产，大量农民流离失所。接着，作为加州经济支柱的采金业，因矿源枯竭，大量锐减，产值仅及1869年的1/3。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加州社会秩序更加动荡不安，排华情绪也迅速增长。从1877年7月23日起，旧金山市开始了持续三天的排华骚动，一群暴徒和失业工人在市政厅附近的沙地集会后去中国城投掷炸弹，殴打华人，抢劫他们的财物，烧毁他们的店铺，造成损失约达50万美元。这次骚乱，直到驻防的陆海军部队会同警察和市治安维持会组织的“检查棍队”出面弹压后，才停止下来。但是，这种停止只是排华风暴的暂息。以爱尔兰裔的丹尼斯·卡尼

为首的一帮暴徒和种族主义分子继续策划排华运动，并于该年10月成立了加利福尼亚工人党——即所谓“沙地党”。该党虽标榜反对资本家和消灭土地垄断制度，但其主要目标是“以最大的速度并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全部清除国内廉价的中国劳动力”。[1]卡尼也大肆宣扬华工的激增乃是造成工人失业和生活困苦的主要因素，喊出“华人必须滚蛋！”“他们正在夺走我们的工作！”[2]等煽动性口号。他的主张不仅受到当地失业工人的拥护，而且还得到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某些领导人的支持，因而他的党迅速壮大，并在加州某些地区选举中获胜。

在卡尼和“沙地党”鼓动下，加州排华运动日益扩大，并且蔓延到俄勒冈和华盛顿等西部各州，致使西部“各大城市中，苟华侨人数稍多者，几莫不为群众攻击之点，往往焚掠庐舍，侮辱人民，在萨克兰缅多（即萨克拉门托——作者）及旧金山两处，尤属至再至三，连续不断。”[3] 当时中国公使曾向美国政府抗议这种烧杀劫掠华侨的暴行，但是联邦政府却轻描淡写地答复说，它无法干涉各州法律的行使。1879 年，加州制宪会议采纳了“沙地党”提出的一系列的排华措施，修订了州宪法，其中规定：禁止中国移民入境，华侨必须从一些市镇迁出，任何公私机构和企业都不得雇用中国人等。这些措施都直接违反“蒲安臣条约”的规定，但加州政客却顽固坚持，其目的固在于冲淡工人群众反对资本家的斗争，把群众不满情绪转移到排华轨道上来，也在于制造舆论，扩大影响，争取国会制定全国性排华政策。

〔“排斥华工”成为全国性的政治问题〕　到了 19 世纪 70

① 方纳：前引书，第 1 卷，第 720 页。

② 杰克·陈：前引书，第 141 页。

③ 宓亨利：前引书，第 139 页。

年代后期，加州掀起的排华运动这一局部性问题已成为全国性政治的焦点之一。这是因为（一）当时美国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实力已互相接近，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①]，使太平洋沿岸各州在总统选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双方在争夺总统宝座的竞选中，为了迎合西海岸各州选民的排华心理，都竞相把排斥华工列入政纲，以争取西海岸各州的选票。（二）中国移民问题虽然没有直接影响到东部各州，但东部各州政客对加州限制华侨入境的要求却持赞同的态度。这是因为当时东部各州对外来移民的态度也有显著的变化：移民的激增给纽约和波士顿等东部沿海大城市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因而要求限制移民入境的公众舆论日益增强；加上东部出现少数企业主为破坏罢工而雇用华工的事例，也引起了东部工人群众对华工的反感。[②]

在美国政党政治的这种变化形势下，排华问题逐渐被提上了美国政府的议事日程。1879 年，美国国会开始讨论排华问题，通过了西部民主党议员提出的议案，规定到达美国的船只，每艘所载的中国乘客不得超过 15 人。海斯总统虽以其违背“蒲安臣条约”的规定为名予以否决，但迫于国内舆论的压力，于 1880 年派遣了以詹姆斯·安吉尔为首的政府代表团前往中国，迫使清政府为限制华工入境修订条约。在美国的压力下，清政府终于与美国签订了新的条约，即“中美续修条约”。其中第一条规定：“如有时大美国查华工前往美国，或在各处居住，实于美国之益有所妨碍，或与美国内及美国一处地方之平安有所妨碍，大清国准大美国可以或为整理，或定人数年数之限，并非禁止前往。”[③]

① 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一节。

② 参看杰克·陈：前引书，第 150—151 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第 24 卷，第 13 页。

从此，美国取得限制华工入境之权，但该约第四条注明，美国如依照条约制定任何限制华工的新立法，必须事先与清政府取得协议后，方能付诸实施。

〔禁止华工入境的“排华法案”及其补充法案〕　“中美续修条约”签订后，被招募去美国的华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据美国商业部的统计，这几年去美国华侨人数激增。

1880 年　“中美续修条约”签订后去美国的华侨人数表

年份	去美国的华侨人数	在美国华侨总数	附　注
1879	9,604	108,827	
1880	5,802	104,991	离美者多于入境，总数反减。
1881	11,890	105,796	同上
1882	39,579	132,300	在美华侨的最高额。

资料来源：《美国历史统计，殖民时代至 1970 年》，第一部分，第 108 页；库利治：《中国移民》，附表，第 498 页。

去美国华侨人数激增乃美国航运资本家再次大肆招募华工的结果。当时美国北太平洋线和加拿大太平洋线两条横贯大陆北部的铁路开始动工，需要大批劳动力。他们以“苦力”贸易获利丰厚，遂调动船只从事贩运。

加州政客看到这种趋势，一方面指责投机船商牟利行为之不当，另方面抱怨限制华工入境的“中美续修条约”之无效。加州议员约翰·米勒在国会中更是大声疾呼，要求国会采取断然措施。他说，这个限制华工入境的条约已经失败，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那将“使所有贩运人口的船商，无阻碍地继续这种卑鄙的贸易，把繁

衍的中国奴隶们悉数运到加州来。"[1] 他的这种诬蔑华侨的滥调和要求国会采取断然处置的呼吁，都得到西部和南部各州议员的支持。1882年，美国国会在未与清政府协商的情况下，竟然通过了"关于实施与中国人有关的某些条约规定的法令"，即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这一法案的通过表明了排华政策已确定为美国的国策。美国政府违反"中美续修条约"的规定，单方面制定关于中国移民的政策，对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和破坏作用。这个法案包括15条，其中主要规定是：自本法案通过90日开始，10年内禁止华工来美国，所谓"华工"系指熟练的和不熟练的工人，矿工也包括在内；华侨不得加入美国籍，以前与本法案抵触的法令一概作废；凡有意把华工由外国港口，经由水路或陆路带入美国者，均属犯罪行为；其他华侨如无适当的证件，应一律予以驱逐出境。

此后，美国国会还陆续通过了一些排华法案。1884年的补充法案规定：凡开抵美国港口的船只，其船主若有意载运华工来美国，每带一人，船主应处以一年以下的监禁和500美元以下的罚金。这表明美国统治阶级排华政策与船商利益的矛盾。这一补充法案还对"商人"一词作了荒谬的解释，称"商人"乃专指经营商业公司的经理，其他工作人员如襄理、协理、管账员以及店员等均非"商人"。他们通统被列入华工范畴，以便排斥和驱逐。1888年，国会又通过"斯科特法案"，其中规定(一)出境华工一律不得重新入境；(二)过去美国政府所发的华工身份证自即日起通统作废。这就意味着两万余名回国探亲、持证返美国的华工[2] 遭到蛮横无理的闭门羹，有些尚有家属、财产在美国的华工，更遭受妻离子

---

① 库利治：前引书，第169页。

② 在1882—1888年期间，华工领身份证回国的有20,000余人。

散的痛苦。对此，中国驻美公使提出抗议，但是美国国务卿布莱恩却拒绝讨论这一问题，只说国会制定并废除法案；总统只能否决法案。作为国务卿，我无能为力。[①] 1892 年，国会制定了更为苛刻的排斥华人的“吉瑞法案”，规定除清政府外交人员外，禁止一切华人入境；所有在美华侨必须注册，领取居留证；在审理涉及华人的诉讼案件时，不准华人被保释。此后，美国政府在“斯科特法案”和“吉瑞法案”的基础上，不断补充、修订。这些排华法案的实施，不仅完全断绝了华工前往美国的途径，就连其他前往美国的华人，无论是官员和商人，还是教师、学生和过境旅客，也都受到极其苛刻的盘查，形同囚犯。由于美国加紧排华而采取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入境华人急剧减少。据统计，在 1882 年“排华法案”实施后五年期间，每年入境的华人数目由 39，000 多人锐减到 10 人，此后虽有所回升，但也只是在一、二千人之间。[②] 1892 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把 1882 年“排华法案”有效期延长 10 年，到 1902 年更决定把它无限期延长了。

〔排华暴行的扩展〕 1882 年“排华法案”实施后，美国排华地区日趋扩展，迫害华侨的方式也变本加厉，从虐待、拘捕和监禁等方式进而发展到集体驱逐和杀害华侨居民。到 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出现了排华狂潮，迫害华侨的事件愈演愈烈，其中以罗克斯普林斯（即岩泉镇）、塔科马和西雅图等事件为最严重。

1885 年 9 月 2 日，怀俄明州岩泉镇的华人矿工拒绝参加白人矿工的同盟罢工而遭到白人暴徒的突然袭击。华工因毫无准备，惨遭杀戮，计死亡 28 人，重伤 15 人，其余华工被迫逃入山中。

---

① 转引自宋李瑞芳：前引书，第 51 页。

② 《美国历史统计》，第 1 部分，第 108 页。

白人暴徒乘机抢劫华侨财产，全部损失达 14 万多美元。事后清政府驻美公使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惩凶、赔偿，但美国国务卿巴亚德却以根据美国宪法，联邦政府无权干涉地方事务为借口，推脱责任，同时还否认清政府要求赔偿的权利，只答应请求国会拨款"抚恤"。美国政府对这次杀害华工的暴行，便这样草草了事。

同年 10 月 24 日夜，西雅图附近华人矿工的房舍全部为白人暴徒纵火焚烧，事后白人暴徒召开排华大会，决定限令所有华侨于 11 月 1 日前一律离境。11 月 3 日，塔科马也发生白人暴徒袭击华侨的事件，700 余华侨被迫逃往附近的铁路货车上躲避，经过一夜的露宿和恐怖骚扰，有两人死亡，多人得病。11 月 5 日，普压镇又发生了集体驱逐华侨的事件。华盛顿准州之所以连续发生排华暴行同地方政府的支持、纵容是分不开的，因为该准州州长斯奎尔事先对排华暴徒的预谋活动了如指掌，但他并未加以制止，反而采取纵容的态度。[①] 在该准州排华骚动日益蔓延扩大的情况下，克利夫兰总统被迫宣布在该地区戒严，但事后既未惩办肇事的暴徒，也未赔偿华侨的财产损失。

1886 年初，加州各地"赶走华侨"的运动继续扩大，在 1 月到 4 月期间有 35 个社区陆续把华侨驱逐出去，因而逃往旧金山中国城避难的华侨达 2 万人之多。[②] 清政府驻旧金山领事曾就苏特镇于该年 2 月将华侨驱逐出镇的骚动向加州州长提出质询，但他得到的答复是：该镇官员并未报告他们不能维持治安，所以州政府无法过问。这就是美国官员使用推诿责任的一贯手法。

19 世纪 80 年代，美国西部各州驱逐和杀害华侨的骚动此起

---

① 参看《1981—1983 年美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 1983 年，第 349 页。

② 杰克·陈：前引书，第 152 页。

彼伏，连续不断。华侨因而死伤者数百人，财产损失达百万美元以上。

第三节　美国的“熔炉”与移民对美国发展的巨大贡献

〔民族“熔炉”与移民的“美国化”〕　美国移民来源不同，且具有各自的民族传统和特征；他们在北美大陆上，经过长期繁衍与融合，不断充实和扩大了美利坚民族。因此，过去许多美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把美国说成是民族“熔炉”，认为它把众多民族、种族移民的传统和特征“熔化成一种新的独特的金属，倾注于美国环境的铸模，并与美国人的思想揉合在一起了。”①

来自各国和各地区的众多移民在与美国社会接触后，虽然有些仍然保留了各自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并且在某些地区和大城市里形成了独自的聚居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多数、特别是他们的后代逐渐削弱或丧失了各自原有的民族传统和特征，不断为美国这个民族“熔炉”所熔化，从而逐渐实现了“美国化”。在移民“美国化”进程中，有些起重要作用的因素，其中主要是语言、学校教育和社会流动等因素。

在19世纪后期，除了来自英伦三岛的移民外，来自欧洲的其他移民，无论是“老移民”还是“新移民”，大都不会英语，只能讲本国或本民族语言。因此，他们到美国后，大都前往本民族聚居地区居住和谋生，“新移民”更多的是去大城市本民族聚居区投亲靠友、寻找工作。但是，这些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经

① 莫里森等：前引书，第2卷，第174—176页。

过美国学校的教育，掌握了英语，逐渐不用或忘掉了原有的语言。在移民后裔逐渐不能使用原有语言的情况下，那些原先靠使用本民族语言维系的移民组织，诸如各派教会、民族俱乐部、互济会和福利组织等也逐渐削弱或失去了它们原有的作用，用本民族语文出版的报刊种类和发行的数量都有减少的趋势。随着移民及其后裔使用语言的变化，各派教会如天主教会和犹太人教会等在传教、布道时也渐渐用英语代替了原先使用的外国语言。这种变化虽然是渐进的、缓慢的，但却是美国各教派的原有民族特性日趋淡薄的表现，也是移民日益"美国化"的重要标志。[①]

学校教育是消除移民间的民族隔阂和实现民族融合的一个关键因素。移民的后裔在公立学校中是按照美国社会准则受教育的，他们不仅掌握了英语，而且吸收和接受了美国文化。美国清教徒所一贯宣扬的美国社会准则，如通过个人奋斗取得成就的信念已逐渐为移民及其后代所接受。[②] 这样，在具有不同历史背景和民族传统的移民当中，他们之间的差异和分歧日益缩小，而融合成为一体的趋势则不断增强。

移民后裔既受到美国学校共同的教育，又掌握了英语，这自然为他们扩大与土生美国人以及其他民族集团的交往打开了方便之门，也为他们离开本民族聚居区去求职谋生提供了有利条件。移民间交往范围的扩大导致了不同的民族集团和宗教派别的成员之间的通婚。这种通婚也是美国实现民族融合的重要方式。起初，移民与外族通婚是罕见的，他们宁愿回到故国去找配偶，也不愿与当地外族人结婚。这种趋向在第一代"新移民"中更为明显。据说，当罗马天主教徒选择新教徒作为配偶并且不在天主教

---

① 丁内尔斯坦著：前引书，第 133 页。
② 丁内尔斯坦著：前引书，第 138 页。

会举行婚礼时，往往被本教派视为姘居，并受到开除教籍的处分。[①] 不过，随着移民"美国化"的加深，他们与异族的通婚率增加了。但是，坚持在同一宗教系统内结婚的信念，直到本世纪中期仍然是很强烈的。根据这种情况，有的美国历史学家认为，美国社会发展形成的不是单一的"熔炉"，而是由三个部分——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宗教集团——合成的"熔炉"，而且通婚主要是存在于三个宗教集团各自范围内不同民族之间的。[②]

随着美国工业化的迅速的发展以及城市的蓬勃兴起，移民的社会流动也日益增强。这主要表现在横向流动，从事农、牧业的移民向西部迁移，寻求肥沃的土地或适于放牧的场所，许多"新移民"则从城市里聚居区迁往其他城市或地区，寻求发迹致富的途径。这种横向流动有时也为纵向流动所伴随，即少数受过高等教育和掌握技艺的移民随着职业的变化而上升到富裕的阶层。无论是横向流动，还是纵向流动，都大大加强了移民及其后裔与土生美国人及其他来源的移民之间往来交流，从而为互相融合成为一体创造了有利条件。

可是，美国对移民集团的同化并非单向的进程，而是不断吸收各民族、种族优秀的传统和文化，并使它们逐渐成为美利坚民族共享的遗产。比如，"当今美国社会的许多方言、食物、音乐和文化特征都曾一度具有种族的特色，而今却成为（美利坚民族）共同遗产的一部分了。"[③] 各民族集团移居美国后都已发生了变化，而且美国社会在接纳它们之后也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因此，各民族集团在美国这个"熔炉"中并未消失，但它们

---

① 参看丁内尔斯坦等：前引书，第135—136页。

② 参看丁内尔斯坦等：前引书，第135页。

③ 托马斯·索厄尔：《美国种族史》，纽约1981年，第14页。

和美国这个国家都不是原来的老样子了。[1] 美国"熔炉"虽然在同化移民集团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它并没有、将来也不可能创建一个单一种族的社会，而是创立了一个多元的社会。[2] 这个多元的社会正如有的美国作家所指出的那样，倒是像一盘五光十色的沙拉，其中每一种成分既受到整体味道的影响，又保留其各自的特性。

〔*移民对美国发展的巨大贡献*〕　19世纪后期，移民洪流对美国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既对美国提供了它所迫切需要的大量劳动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又帮助开发了它丰富的自然资源，扩大了美国市场，从而大大促进了美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丰富了美国文化艺术生活。难怪有的美国历史学家认为，移民洪流是"美国历史的中心主题"，比"没有贵族政治、边疆的存在、自然资源的富庶、企业家的推动力或被两大洋隔离的安全更加重要"。[3]

首先，这个时期外来移民为美国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据统计，移民中男子多系年富力强者，"新移民"中有85%是从14岁到44岁之间的青壮年。他们中许多人都从事最艰苦而收入较少的劳动：如修筑横贯大陆的铁路，在西部山区开采矿物和在制造业中承担最繁重的体力活等。在1870年，移民工人在一些重要工业中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采矿业中占53.3%，在一些纺织业中占37.6%，在钢铁工业一些部门中占43.4%；到1890年，他们在上述三种工业中所占比重

---

① 托马斯·索厄尔：《美国种族史》，纽约1981年，第14页。

② 参看詹姆斯·S. 奥尔森：《美国历史中种族的重要性》，两卷，纽约1979年，第2卷，序言，第IV页。

③ 参看詹姆斯·S. 奥尔森：前引书，第2卷，序言，第IV页。

分别为49.1%、42.8%和37.9%。[①]

外来移民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这就形成一种自然的技术引进，推动了美国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力的提高。美国政府为加速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步伐，鼓励采用许多新技术和发明，而其中有不少发明家就是外来移民及其后裔。如电话发明家亚历山大·贝尔就是1871年来到美国的苏格兰移民。举世闻名的大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也是移民的后裔。这些发明的应用、推广大大发展了美国电力、电讯工业。移民及其后裔的其他发明都对加速美国工农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对此，列宁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写道，移民"对美国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②]

其次，移民大大促进了美国西部地区的开发。19世纪后期，美国大平原和落基山地带的开发主要依靠移民。在19世纪最后30年内，西部开拓的土地面积比从北美殖民地开始到内战前整个历史时期拓居的土地还大，经过移民披荆斩棘的开拓，美国西部不仅建立了广袤的农业区和放牧区，而且迅速开采了各种各样的矿藏，为发展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提供了它们所迫切需要的矿业原料。在开发西部的最后进程中，移民及其后裔往往承担了最艰辛的任务，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③]

第三，移民洪流促进了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从而有助于形成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格局。广大移民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

---

① 爱德华·E·柯克兰：《充分发展时期的工业》，纽约1961年，第327页。

② 列宁："资本主义和工人移民"，《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9卷，第453—45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0页。

者。他们普遍需要住房、衣着和食品等生活必需的消费品。这就增加了对工农业产品及各种消费品的需求，从而扩大了国内市场，促进了城市的兴起，推动了交通运输的发展。因此，有的美国经济史学家强调指出："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过去的大量富有经验的外来移民的参加，那么 1914 年以前的美国经济的一些方面高速增长的格局，和迅速充实新开发的西部地区、采矿业和伐木业的发展，各城市市场规模的扩大等等，都是不可能实现的"。[①]

最后，外来移民丰富和发展了美国文化艺术生活。他们中有不少杰出艺术家和知名人士，对推动美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中有来自爱尔兰的雕刻艺术家奥古斯塔斯·圣高登斯，来自匈牙利的著名新闻工作者约瑟夫·普利策以及曾在美国侨居的捷克作曲家安东尼·德沃夏克等等。他们的作品不仅丰富了美国人民的文化艺术生活，而且给他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圣—郭登斯精心设计制作的林肯雕塑像和谢尔曼将军骑马的雕塑像至今仍然分别竖立在芝加哥和纽约市，供人们瞻仰。德沃夏克在侨居美国期间，不仅谱写了著名的"来自新大陆"交响曲，还在纽约主持了音乐学院，培养了不少美国音乐家和作曲家，为发展美国音乐事业作出了贡献。

---

① 沙伊贝和福克纳等：前引书，第 135 页。

第六章

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两党政治和国内政策

19世纪最后30年是美国历史上的所谓“镀金时代”。这个时期的政治特征是保守主义的放任政策和腐朽之风盛行。两大党日趋僵化保守，垄断资本逐渐控制政局。由此激化社会矛盾，导致工人斗争和各种改革运动此起彼伏，不断高涨。下层社会斗争与上层的改良政策互为影响，产生了新旧交替的趋势。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策差别日益缩小。它们从内战前两种经济制度的政治代表转变为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策执行者。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放任政策已发展到极端，政府调节干预政策仍在萌芽之中。在经济迅速发展、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形势下，资产阶级被迫调整部分国家机器，加强其镇压和平衡的功能。在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是联邦政府开始与垄断资本直接结合，其内外政策逐渐纳入与大财团利益一致的轨道。新旧交替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社会力量组合，终于在1896年选举中发生了政党力量大改组，为20世纪两党政治的到来开辟了道路。

第一节 两党政治的发展变化

〔重建后的两党政治格局〕 两党力量对比在重建后期已出现明显的消长变化。首先是共和党内部发生新的分化改组。原来的共和党激进派趋于瓦解。一部分不满于格兰特政府腐败之风的共和党人组成“自由派”。南部共和党的几支力量，来自北方的“自备毡囊者”、南方的白人小农和黑人自由民各行其是，难以形成一致的政治力量。1872 年以后共和党内主张坚持激进重建政策的力量已成强弩之末，妥协力量开始占上风。其次是民主党开始恢复在内战中严重受挫的元气，在许多州内同共和党分庭相抗。北部民主党人借助共和党自由派的力量，并乘 1873 年危机造成的民众不满，在 1874 年连续在纽约、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等州获得多数选票，并在这一年占据了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南部民主党到 1875 年已在田纳西、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佐治亚、亚拉巴马、阿肯色、得克萨斯和密西西比等 8 个州据有优势，仅剩南卡罗来纳、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等 3 个州仍控制在共和党和联邦军管当局手中。在此形势下，一旦南北两部分民主党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击败共和党，重新问鼎白宫。

尽管如此，民主党仍不具备立即控制联邦政府的力量。内战严重地破坏了民主党的政党机器和政治形象，而且长期的在野地位使它缺乏共和党所具有的种种便利条件，故在全国性选举中缺乏足够的号召力。更重要的是，南北两部分民主党在政策上分歧颇多，提不出取代共和党政策的完整纲领，甚至找不到有竞争力的总统候选人。1872 年选举中民主党只得借用自由派共和党人霍勒斯·格里利。1876 年民主党挑选了纽约州长塞缪尔·蒂尔登

作为总统候选人，但此人优柔寡断，声望平平。可见，两大党的力量对比并未转变。

1876年选举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两大党的一次历史性妥协。共和党仅比民主党多1张选举人票，而民主党则多得25万张普通选票。为了获得民主党对共和党在联邦继续执政的首肯，共和党决定撤销对南部最后三个州的军事管制，承认民主党对南部各州的完全控制。此即史称"海斯—蒂尔登妥协"。内战后"一边倒"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南部按照现实的力量对比又回到了民主党单独执政的局面。但是民主党的核心力量已经转向了北部，它与共和党一起大力推进有利于工业资产阶级的全国性政策，同时从地域的、集团利益的差别出发与共和党展开角逐。

从1876年到1896年，两大党处于势均力敌的局面。民主党控制着南部和西部的14个州，共和党则在北部16个州占优势。1876年至1892年的5次总统选举，两大党的普通选票差额仅在1%—3%之间。[①] 在1875年至1895年的10届国会中，民主党控制着其中的8届众议院，共和党则掌握着同样届数的参议院。[②] 两党长期维持着均势，用地域斗争的旧旗号来掩盖尖锐的社会争端，这使两党政治如同一潭死水，毫无生气。

共和党以"老大党"自居，无意进行任何改革。主张"稳健"成为抱守陈规的托辞，从海斯总统的话中就可以略见一斑。他认为："我们正处在老问题已经解决，新问题尚未提出的这么一个时期。如果在这种时候采取过激行动，那么它就会把党毁灭

---

① 伯纳德·贝林，布里翁·戴维斯等：《伟大的共和国，美国人民史》，1977年，第621页。

② 小阿瑟·施莱辛格：《美国政党史》，纽约1973年，第2卷，第1428页。

了。稳健是惟一可取的方法。"[1] 此时共和党的注意力已从争夺南部控制权转移到保证北部大资本在全国市场中的利益。但它还是竭力以地域主义的"血衬衫"口号来保持人们对内战的回忆，挑选内战中的联邦将领作为总统候选人，企图保持联邦拯救者的形象，以骗得选票。

这种保守政策使共和党内部离心倾向日益严重。一部分自由派要求改变既定的保守政策，动辄以退党作为要挟，被称为"脱党派"。共和党上层也分裂为"温和派"和"死硬派"。前者空喊改革口号，暗中营私舞弊，其首领是詹姆斯·布莱恩。后者长期把持要职，在国会和各州为所欲为，罗斯科·康克林等人是其主要干将，格兰特也常常充当其后台。在这种保守政策之下，以中西部农场主为主体的共和党中下层受到严重损害。中西部的两党政客为了争取这部分下层力量，不时提出一些与东部不同的口号而名噪一时。例如，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人乔治·彭德尔顿、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人奥立弗·莫顿和约翰·洛根等人，都由此而自成一派。在此基础上，两大党内部逐渐形成了与原来的北部、南部集团并存的中西部集团。这种犬牙交错的政党力量组合，为第三党运动提供了可能。

民主党在表面上抱着所谓"失败的事业"，控制着"团结一致的南部"，形成了大批坚守旧民主党立场的"波旁分子"。另一方面，民主党的内部构成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例如，极有权势的犹太金融集团罗思柴尔德家族此时已成为民主党的重要后台，钢铁业的艾布拉姆·休伊特、铁路业的詹姆斯·菲斯克、农机制造业的赛勒斯·麦考密克等著名的大资本家也纷纷支持民主党。民主党的头面人物塞缪尔·蒂尔登和格罗弗·克利夫兰都曾是纽约银行

① 小阿瑟·施莱辛格：《美国政党史》，纽约 1973 年，第 2 卷，第 1412 页。

业的重要人物。此外，重建后投资于南部各州的北部工业资本，也转而渗入南部诸州的民主党核心。70 年代以后大批涌入美国的移民洪流也影响着民主党的构成。由于共和党的传统势力以白人新教徒为主，故来自爱尔兰和南欧的天主教徒移民大部投靠民主党。尤其是在移民人数较多的中西部，民主党人数上升，在底特律等城市形成了新的民主党势力中心。民主党成分的复杂化，使本质上一致的两大党蒙上了一层互相对立的色彩。

〔两党轮流执政与 1890 年妥协〕　恩格斯对英国的资产阶级两党制曾作评论，“至少在正在争夺统治权的政党中，……是从来没有过原则斗争的；它们中间只有物质利益的冲突。因此，我们把问题的这一方面也适当地研究一下才算是公正的。”① 这段论述同样适用于 19 世纪末美国的两大党斗争。

争权夺利的斗争不仅在两大党之间，而且在两党内部剧烈展开。1880 年总统选举充分表现了这种争斗。当时共和党“死硬派”提名的格兰特和“温和派”推选的布莱恩相持不下，来自俄亥俄州的詹姆斯·加菲尔德充当了“黑马”总统。加菲尔德为了改变自己的“黑马”形象，试图在文官改革中作点文章，却招致了“死硬派”的忌恨。1881 年 7 月 2 日，加菲尔德总统在华盛顿车站遭到因丢失官职而疯狂的查尔斯·奎特的袭击，身负重伤。9 月，加菲尔德去世，死硬派代表人物、副总统切斯特·亚瑟继任总统。此后共和党内腐朽之风更加有恃无恐，争斗不可开交。

民主党利用共和党内讧之机，重整旗鼓。经过 8 年苦心经营，在 1884 年选举中积极争取再入白宫。共和党为了破坏民主党的挑战，抓住克利夫兰的私生活不轨大肆渲染。民主党亦不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第 1 卷，第 547 页。

弱，以揭露布莱恩卷人莫比利尔丑闻展开反击。这场无聊的人身攻击充分表现了两党竞选中虚张声势的伎俩。两党相斗难解难分之时，共和党内自由派的倒戈使民主党获得援兵。克利夫兰接连在纽约、康涅狄格、新泽西和印第安纳等关键州获胜，终于以219张对183张选举人票击败布莱恩。民主党终于结束了连续24年的在野党地位。

克利夫兰上台证明了两大党政策大体一致。格罗弗·克利夫兰是土生土长的纽约州民主党人，曾多年为大公司任辩护律师。在担任布法罗市长和纽约州长时，曾以改革姿态采取一些纠正时弊的措施。他擅长于左右逢源的政客手腕，颇得大资本家们的赞赏。克利夫兰上台后，马上收到铁路巨头杰伊·古尔德的贺电："我感到……在你的掌握之下，这个国家巨大的商业利益将会是安然无恙的。"① 克利夫兰政府的财政部长是纽约的银行家丹尼尔·曼宁，海军部长威廉·惠特尼是美孚集团重要成员②。他的政府在保护大企业利益方面较之其共和党前任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克利夫兰当然也不会错过执政机会，立即对多年未过官瘾的民主党人论功行赏，进行分赃。当时联邦政府雇员的90%约11万名为共和党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要求将他们全部解职。但克利夫兰慑于此际影响较大的文官改革运动，不敢贸然造次，只得撤换其中的4万名官员以犒劳部分效忠分子。在调整政策方面，克利夫兰试图用关税和抚恤金这两个地域性的旧争端，来掩盖其时舆论最为集中的货币争端。抚恤金曾经是共和党稳定其社会基础的主要手段之一，故不断递增。1876年抚恤金支出为联邦财政岁收的1/10，到1886年已达其1/4。共和党以此笼络约40万

①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纽约1977年，第180页。

② 同上书，第179页。

联邦复员军人及其家属100余万人。克利夫兰在位期间对抚恤金提案屡施否决权，以报复共和党人。接着克利夫兰又在1886年提出了关于降低关税率的特别咨文，引起国会内一番空前激烈的辩论。抚恤金和关税问题纠缠在一起，使一度消沉的地域斗争情绪再度上升。为了平息舆论，克利夫兰对"州际商务条例"破例地未加否决；并对文官制度改革也表现出一丝宽容，以讨好共和党自由派。然而在货币问题上，他坚持着前几届共和党政府的硬币政策，始终捍卫着华尔街的利益。总之，在克利夫兰任内，地域斗争的口号和改革立法都只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争夺民心的手段而已。

共和党抓住克利夫兰所处的窘境，在1888年选举政纲中提出"毫不妥协地赞同美国保护关税制度"，赢得了大企业的数百万美元捐助。本杰明·哈里森由此上台，他吹嘘这是"天命"赐予的胜利。宾夕法尼亚的共和党党魁马修·奎伊却说，哈里森从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了他成为总统而锒铛入狱。"① 哈里森是威廉·哈里森总统的孙子，他本人是内战中的联邦将军，又兼印第安纳铁路公司的律师，集世家望族、共和党元老和大企业代表于一身。他作为一个过渡型总统，其政策也具有妥协性特点。

哈里森上台后，先是在官职分赃和抚恤金这两个地域性争端上报复了民主党人。他撤除了3万名民主党人的官职，又在1890年通过"家属抚恤法"，把抚恤金总额提高到1.6亿美元。然而，在改革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哈里森也不得不对日趋尖锐的社会争端作出反应，由此产生了1890年关于托拉斯、货币和关税的三项妥协性立法。

在这三个重要争端上，哈里森政府是有所选择的。首先能影

① 贝林、戴维斯等：前引书，第629页。

响全国政治的是货币问题。共和党力图拉住远西部新加入联邦的6个州（即1889至1890年间建立的怀俄明、爱达荷、北达科他、南达科他、蒙大拿和华盛顿等州）。这些州盛产白银，银币派势力相当大。同时，还要保持共和党的中下层基础，因西部农场主和北部中小企业主债务较重，亦倾向银币派。哈里森政府决定在货币问题上稍作让步，在国会中通过谢尔曼购银法。然后，借用共和党银币派的力量来保证麦金莱关税法的通过。这笔立法交易给大企业带来了实惠，而银币派并未达到自由铸造银币的目的。最后，用一项含糊不清、缺乏强制性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来搪塞改革派和第三党，平息舆论，却无损于托拉斯的真正利益。1890年的三项妥协性立法表明，两大党本身已难以作出重大的政策调整。相反，共和党对南部黑人选举权问题早已视为无足轻重。参议员亨利·洛奇在1890年提出通过联邦监督来控制南部选举程序、防止讹骗黑人选票的“强制法案”，却被国会搁置了。这表明共和党公开纵容南部民主党实行剥夺黑人权利的种族压迫政策。正如当时有人说：“这不过是另一个征兆，预示着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即将发生。人们对货币问题比对选举议案更感兴趣。”①

〔第三党运动与90年代政党改组〕　曾经作为“社会安全阀”的两党政治因保守僵化而失灵了。社会的不满和改革要求就通过第三党运动表现出来。因此，19世纪末的美国第三党相当活跃。从70年代起，就出现了格兰其运动、绿背纸币运动；继而又有禁酒党、反垄断党、联合劳工党和农民联盟等几十个小党；到90年代，它们大多汇集到人民党运动之中，成为美国历史上一场持久、广泛的第三党运动，有力地打破了“镀金时代”沉寂的政治空气。

---

① 小施莱辛格：前引书，第2卷，第1426页。

人民党运动主要在中西部和远西部发展起来。这两个地区既不像南部完全被民主党所控制，也不同于东北部在大企业的左右之下。这里有内战后大量涌入的农场主、牧场主和其他开发者，又有迅速向西挺进的铁路公司和急剧渗入的银行和抵押资本，这两支巨大的社会势力在西部形成冲突的漩涡。这种冲突同两大党在西部的势力真空相结合，为第三党运动兴起提供了空间条件。

这场第三党运动是在向垄断过渡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因此它表现出与经济周期同步进行的时间特点，由此形成了 70 年代初的格兰其运动、80 年代初的绿背纸币运动、90 年代初的人民党运动三个不断上升的高潮。另一方面，它们是基本上尚未脱离两党制框架的第三党，其势力涨落受到两大党的选举活动影响。在中期选举时，第三党选票明显上升，说明它们在州一级较有力量。但在总统选举中则严重下降，又表明在全国政治中第三党实力仍相当薄弱。正是在这种起伏涨落中，第三党影响着两大党的均势。

到 1890 年，农民联盟在西部十几个州内纷纷转为人民党，在有些州已有取代大党之势。在曾号称为“共和党旗帜”的堪萨斯州，人民党控制了州议会多数，并选出其参议员威廉·皮弗。东部共和党对此甚为恐慌，担心引起“雪崩”。南部农民联盟在 1891 年也纷纷脱离民主党而独立，成为民主党在南部的心腹之患。1892 年初，全国有 500 万人签名支持人民党奥马哈政纲，32 个全国性改革团体加入人民党之列，各种第三党报刊已达 1000 多种。

第三党的改革主张，如格兰其的铁路管制立法、绿背纸币党的货币纲领、联合劳工党和反垄断党的反托拉斯口号，农民联盟的国库分库计划，都吸引了两大党的大批下层群众，有力地冲击了两大党的保守政策。1892 年人民党奥马哈纲领集以往各改革

纲领之大成，提出了以国家干预经济为核心的完整纲领，在全国范围内向两大党提出了挑战。西部、南部一些州的两大党头领，为了争取选民，纷纷接过人民党口号，抄袭其纲领，转身一变成为“改革派”代表。如南卡罗来纳州的本杰明·蒂尔曼，得克萨斯州的H. 豪格，明尼苏达州的克纽特·纳尔逊，内布拉斯加州的威廉·布赖恩等人。总之，人民党以其独特的方式对两大党产生了强大的压力。

然而，人民党内部存在的党派成见、地域隔阂、种族歧视以及阶级利益的种种裂痕，使之只能成为各州独立党派的松散联盟。它的主体是西部和南部的农场主，他们主张的低关税、复本位都不能被东北部城市工人所接受。以萨缪尔·冈珀斯为首的劳联和丹尼尔·德里昂为首的社会主义劳工党，从各自立场上排斥人民党，使大部分有组织的工人难以同人民党结合。况且人民党上层多为大银矿主、大农场主和不满于两大党的失意政客，与下层目标极不协调，到关键时刻常常表现出与大党妥协的倾向。加以经费寥寥无几，难以同大党的竞选实力相对抗。这些都说明人民党难以取代两大党中的任何一个大党，最终仍是两党制的一种特殊补充。

人民党在1892年总统选举中充分显示了上述作用。尽管共和党募集了2倍于1888年的竞选捐款，但仍无济于事。人民党拉走了共和党在大平原和落基山区的一大部分选票，“在西部已不存在一个可靠的共和党州了”。[①] 结果是哈里森因所得选票比克利夫兰少3%而归于失败。人民党在此选举中不仅得到103万张普通选票，还得到22张选举人票，选出10名国会议员，控制了24个州立法机构。这次选举大大加速了90年代政党改组。纽

① 拉塞尔·奈：《中西部进步政治》，密歇根1939年，第62页。

约“太阳报”评论说：人民党在两大党之中“引起了一场迫在眉睫的恐慌。”[①]

〔1893年危机与民主党分裂〕　克利夫兰再度上台后，执行了比共和党更为保守的政策。克利夫兰与华尔街的关系更加紧密了。铁路巨头兼银行家惠特尼称克利夫兰的观点“是由东部金融势力炮制的”。[②] 这就是对正在形成的垄断资本实行完全放任的政策，不顾社会冲突和经济危机正在加剧。这种政策在1893年危机中遭到了严重破产。

1892年以后，美国金融形势开始急剧恶化。累积多年的国际债务、铁路债务、农场抵押，同国际股票市场波动、联邦黄金储备锐减交织一起，加上农业长期萧条，农场主购买力相对下降，使美国经济结构难以承受超重负荷。到1893年5月，终于爆发了19世纪美国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一年之中银行破产达624家，破产总额近3.5亿美元。中小企业大批倒闭，工人失业率达20%。农产品价格跌到历史最低水平，联邦黄金储备仅存7,000万美元。[③]

面对极为棘手的“多事之秋”，克利夫兰仍抱着陈旧的放任政策一意孤行。他的观点是“治愈危机的最好办法是装作不知道危机的存在。”[④] 并公开声称，“只要我在总统职位上，政策就不会对企业利益产生任何伤害。”[⑤] 为了保证大资本渡过难关，克利夫兰采取了一系列牺牲工农利益的措施。1893年底，克利夫兰撤销谢尔曼购银法。1894年，他派遣联邦军队镇压普尔曼铁

---

① 拉塞尔·奈：《中西部进步政治》，密歇根1939年，第61页。

②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179页。

③ P.R. 德维：《1885年至1897年的全国性问题》，纽约1907年，第260页。

④ 拉塞尔·奈：前引书，第91页。

⑤ 拉塞尔·奈：前引书，第81页。

路大罢工和“柯克西进军”，并以反托拉斯法的名义逮捕尤金·德布斯等罢工领袖。这些举动得到大资本家和保守派的喝彩，把克利夫兰当政称为“上帝的慈悲”。1894 年，克利夫兰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联邦财政，同以约翰·P·摩根为首的华尔街银行集团达成 1 亿美元以上的债券交易。其价值超过当时联邦黄金储备总额，实际上为摩根集团提供了巨额债息收入。总之，克利夫兰在这次危机中为垄断资本尽效犬马之劳，却使民怨沸腾，民主党内的裂痕加深，一场更大的冲突不可避免。

“危机是政治变革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① 克利夫兰的极端政策把民主党内久已存在的分歧变成了公开的分裂。在危机的沉重打击下，西部和南部的民主党人不肯继续按照东北部民主党上层的旨意行事。他们为了保住在各自州内的大党地位，不再追随克利夫兰的金本位政策，公开打出“自由银币”的旗号。这样，民主党内各种地域势力争斗，抵销了它与共和党的抗衡力量。1894 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失去了在国会两院中的多数席位。面对这种形势，民主党银币派决定以合并人民党的策略来与共和党互争高低。他们先以偷梁换柱的手法提出一个类似于人民党观点的“影子纲领”，用“自由银币”口号取代人民党的各项改革条款。然后推出狂热的银币鼓吹者威廉·布赖恩作为总统候选人；并根据以往的经验，对人民党上层分子许以官职。在布赖恩等人的游说之下，人民党领袖们对民主党充满幻想。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选出一个站在人民党纲领一边的总统，就毋需奢望更多了。他们不顾中下层改革派的激烈反对，将 28 个州的人民党组织拱手奉送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塞缪尔·琼斯，并接受布赖恩作为两党共同的总统候选人。人民党成为民主党的附庸，民主党避免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第 33 卷，第 258—259 页。

了崩溃的厄运，三党斗争重新复归为两党争夺。

〔*1896年总统选举及其历史意义*〕　人民党与民主党的合并，引起了东北部大资本的极度不安。垄断巨头几乎都站到共和党一边。为了保证共和党获胜，俄亥俄州的百万富翁、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马库斯·汉纳亲自坐镇，部署1896年总统竞选。共和党在政纲中提出所谓“健全货币”，实际上坚持了金本位政策，并大肆宣传“高关税即高工资”、“麦金莱即繁荣”，这些口号迷惑了一大批正在危机中挣扎的中小资本家和城市工人。垄断资本家对威廉·麦金莱的出马竞选寄予厚望。美孚集团和摩根家族各自为他解囊25万美元，甚至以往支持民主党的银行家们也转向了麦金莱。共和党所得竞选捐助总数达1,000万美元，创当时的历史纪录。[①] 共和党依仗其雄厚财源，雇佣数千名演讲员，印发2.5亿册宣传材料，并在纽约和芝加哥设立了两个竞选总部以协调各地的活动。与共和党的竞选狂潮相比，民主党仍使用旧式的演说鼓动来争取选民。民主党所得捐助仅30万美元，布赖恩不得不只身乘坐火车四处游说。尽管他行程18,000英里，足迹遍及21个州，到处发表他的“金十字架”演说[②]，但依然难以在东北部工业中心取得响应。他的声音很快就被共和党的广告式宣传所淹没。垄断资本家还采用解雇工人、取消抵押、增加合同附加条款等手段，向工人、农场和小企业主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投票支持共和党。1896年秋的小麦价格上升，也被共和党用来证明是银币政策的失败，从而使中西部小麦带农场主亦倒向共和党，民主党失去了一部分关键性选票。这样，共和党稳定地控制

---

① 小施莱辛格：前引书，第3卷，第2077页。

② “金十字架”是布赖恩在1896年竞选演说中常用的一个名词，指金币政策对社会中下层的沉重压迫。布赖恩也因发明该名词而一时名声大噪。

了占人口多数的东北部、大湖区和太平洋沿岸各州的选票。竞选结果是麦金莱比布赖恩多得57万张普通选票和95张选举人票，双方差距之悬殊是重建以来所没有的。共和党终于在垄断资本的全力支持下赢得了这场空前激烈的竞选。

1896年选举是19世纪后期美国政党力量改组的总结，也是美国两党政治由近代向现代过渡的转折点。

这次选举后，重建以来残存的南北对立的党派格局开始消失。民主党与人民党合并后，在西部的密苏里、内布拉斯加、科罗拉多、蒙大拿等9个州具有优势；在东北部的纽约、新泽西、印第安纳、俄亥俄等州仍保持着较大实力。共和党则在大多数城市中影响上升。在全国82个大中城市中，共和党占据上风的有70个。[①] 这种政党力量的地域分布大致保持到本世纪30年代的新政时期。

1896年后共和党的长期执政并控制多数城市，进一步加强了共和党内垄断资本和保守势力的影响。在1901年，共和党的参议员有1/3来自企业界，而民主党仅有1/7。在支持共和党的企业家中，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占1/5，超过5万美元的占45%；而支持民主党的这两个层次分别占1/10和32%。[②] 在民主党内，西部—南部农业集团以及城市移民集团的作用则相应地更大一些。两大党的构成差别无疑对20世纪美国两党政治有着深刻影响。

经过这次选举，两党斗争策略发生重大变化，旧的地域斗争口号退出政治舞台。两大党都力图利用当时最有影响的社会争端

---

① 卡尔·戴格勒："美国政党与城市兴起"，载于《美国历史评论》1964年第1期，第48页。

② 小施莱辛格：前引书，第3卷，第2073页。

来拉拢选民。民主党不惜屈尊盗用人民党纲领以保持自己的大党地位，为大党“同化”小党提供了经验。共和党为了击败民主党与人民党的联合挑战，以垄断资本的巨额资助来进行大规模的广告式宣传，并辅之以各种经济压力和手段来控制选民，也成为20世纪大党竞选的典型模式。此后民主党长期借用中下层的改革口号，从传统的州权主义和放任政策的鼓吹者，转变为国家干预政策的推行者。与此相反，共和党则长期代表大财团势力，转而成为新的放任政策奉行者。“保守的”共和党和“改革的”民主党交替，成为垄断资产阶级得心应手的工具。

人民党运动在1896年以后销声匿迹，但它提出的改革纲领被继之而起的进步运动所发展，并随着垄断资本主义自身矛盾的深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联邦干预政策的组成部分。20世纪初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提出“新国家主义”，伍德罗·威尔逊提出“新自由主义”，都在金融、托拉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社会福利和劳工等领域开始进行政府干预。这些干预活动又为30年代“新政”提供了经验和雏形。两大党的上述政策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世纪末第三党运动的历史作用。

总之，从“镀金时代”僵化的两党政治，开始转变为20世纪较有弹性的两党政治，是这个时期美国社会上层建筑的重大变化之一。

第二节　国内政策与社会争端

〔*放任政策的发展与作用*〕　放任政策是19世纪末美国国内政策的核心。它的理论来源可上溯到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中的自由贸易理论，反映了19世纪初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反对重商主义、主张自由贸易的利益和要求。19世纪下半叶为赫伯

特·斯宾塞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又为这种政策提供了新的支持。斯宾塞用“生存竞争”、“优胜劣败”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中弱肉强食的现象，恰恰满足了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时期大资本的需要。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9世纪末美国找到了最好的土壤，使放任政策成为一种天经地义的信条。

美国的放任政策又有其特殊的具体内容。它是同贸易保护主义、政府鼓励措施相结合的放任主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1791年的《制造业报告》中已经完整地提出了这种政策，即在关税、银行、货币、专利、交通等方面积极保护和发展大资本的利益。直到内战后，美国工业资产阶级扫除了奴隶制障碍，才得以通过联邦政府较为全面地贯彻上述政策思想。同时，美国的放任政策还得到了宪法的支持，这就是重建时期国会通过的宪法第14条修正案。该修正案原旨在阻止南部各州剥夺黑人权利和财产而提出的“正当法律程序”，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被利用来作为放任企业活动的护身符。法院把修正案中的“任何人”解释为任何“法人”，从而使各个大公司可以“法人”身份为所欲为。而联邦和州政府对企业的任何管制则被归结为“侵犯私人财产和权利”的非正当程序，使之归于违宪和无效。因此，第14条修正案在19世纪末成为放任政策的重要保护，却为干预政策的出现套上了紧箍咒。总之，这时期美国的放任政策，是当时诸种思想的、历史的、经济的、法律的因素结合并充分发展的产物。

放任政策对19世纪末美国社会经济产生了两重作用。它促进了内战后美国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为大企业提供了充分的经济机遇；同时也严重损害了中下层人民利益，造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土地政策为例，内战后联邦政府向铁路公司赠予巨额土地，仅中央太平洋铁路和联合太平洋铁路两家公司所得土地的价

值，就相当于它们投资的26%和34%[①]。石油业、木材业和采矿业也通过土地赠予占有了当时最有价值的油田、森林和矿山。而移居西部的农场主、牧场主、淘金者只得屈从于铁路公司和大矿主们，向他们高价购买土地，或者接受他们的雇佣。内战后联邦的土地政策对于西部的社会冲突、东部与西部的地域矛盾、金融资本的集中和垄断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再以税收政策为例，联邦政府取消了内战中一度实行的所得税，国内税收主要来自农场主交纳的土地税和消费者所承担的商品税。而对当时集中了社会财富大部分的银行、股份公司和托拉斯，几乎没有任何财政监督和税收调节的机制，各种股票、息票、债券和抵押都不在征税之列。相反，税收政策还对银行资本和大企业集团给予各种特殊的恩惠。经过这种税收政策的作用，社会财富以更快的节奏向着华尔街及其他金融中心集中了。可见，放任政策的真正受益者是垄断资本。

两大党在实行放任政策时几乎如出一辙。例如，共和党首领布莱恩曾标榜自己是改革派，但他谈及大企业时却毫不掩饰："托拉斯是私人事务……任何人都无权干预。"[②] 民主党的克利夫兰在任布法罗市长时也曾扮演过改革者的角色，但他入主白宫后，面对得克萨斯州的严重旱灾，他反对拨出任何政府救济，并坚持认为"政府不应当支持人民。"[③] 海斯和克利夫兰在派遣联邦军队镇压工人罢工时，同样毫不手软。两大党共同奉行放任政策，使资本集中和垄断形成得到最有利的环境。各社会集团围绕着放任政策的几个主要方面即关税、货币、铁路及托拉斯等焦

① 沙伊贝等：前引书，第177页。
② 拉塞尔·奈：前引书，第95页。
③ 阿伦·内文斯：《格罗弗·克利夫兰》，纽约1933年版，第332页。

点，展开了尖锐复杂的冲突。

〔高关税政策及其作用〕　关税问题曾经是内战前南北地域斗争的重大争端之一。内战后，共和党利用长期执政的地位，不断提高关税税率。1857年的关税率为19%，到1890年提高到50%以上，形成了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高关税壁垒。旧的地域争端同新的社会冲突交织在一起，引起了多次关税争论。早在60年代初，联邦财政部长詹姆斯·考克斯、联邦税务署特别税务专员戴维·威尔斯都曾提出降低关税的主张，但很快被强大的压力所挫败。此后历任共和党总统都把高关税政策当成自己的护官符。格兰特在1872年连任后，不仅保持了原来的关税率，而且还取消了原来的所得税。海斯上台后，抛弃原来支持自己的低关税派，坚定地执行高关税政策，博得了大企业的青睐，卸职后改任国会关税委员会主席。在阿瑟和哈里森任内，联邦财政每年都有1亿多美元结余，其中有一半以上来自关税收入。但这两个总统都不敢丝毫降低关税率，宁可将财政剩余用于扩大抚恤金、政治分赃和更新海军装备。有时共和党为了避免党内分裂，也调整部分税率，但保持总的关税水平。海斯对此直言不讳："目标是通过减低关税来实行保护关税。"[①]

民主党在内战后仍然是低关税集团的代表。克利夫兰上台后，在全国关税改革联盟支持下，1887年提出一份低关税咨文。根据这项咨文，民主党人米尔斯提出要求普遍降低关税率7%的议案。这在国会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共和党参议员纳尔逊·阿尔德里治和众议员麦金莱率领高关税派展开猛烈反击，米尔斯提案遭到惨败，高关税壁垒依然完整无损。在1890年，高关税派又得到最大实惠，使税率高达50%以上的麦金莱关税法得以通过。

① 贝林、戴维斯等：前引书，第575页。

由于这个税率过高，使美国的出口贸易受到影响，国会又设法对某些集团实行补偿。例如，为了使在古巴投资的美国资本获利，麦金莱法对蔗糖进口实行免税；同时为了补偿国内炼糖业所受损失，政府对糖业资本家给予每磅糖 2 美分的补贴。在 1893 年危机中，高关税政策暴露出造成市场萎缩的缺陷。民主党乘机在 1894 年提出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将平均税率降至 39.9%；同时实行征收所得税，对年收入 4000 美元以上者征税 2%。即使如此微弱的一次税利改革，1895 年仍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1897 年经济再度繁荣以后，麦金莱政府就迫不及待地实行了丁格利关税法，其平均税率高达 57%，并保持了 12 年之久，堪称美国高关税政策的顶峰。

高关税政策对促进美国国内市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 世纪末的美国商品进出口总额仍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1/10，故不足以成为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因素。但是美国的劳动力价格偏高，致使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不利。高关税政策大大提高了美国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比重，从 1860 年的 60% 上升到 1900 年的 97%，[①] 有力地保证了美国在此期间迅速成为世界工业大国。

另一方面，农业受到高关税政策的严重损害。70 年代以后，美国农产品在国内供过于求，过剩严重。在国际市场上，又遇到了加拿大、俄国、阿根廷等国的小麦和埃及、印度棉花的有力竞争。高关税政策引起欧洲国家对美国农产品的严厉报复。美国农产品只得以低价向欧洲市场倾销，反过来又加速了国内价格的猛跌，进一步扩大了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而工业产品却以农产品作为牺牲来保持稳定的国内价格。

---

① 福克纳：前引书，第 75 页。

高关税政策还促进了美国工业的集中和垄断。关税壁垒稳定了国内市场行情，有利于大企业之间建立价格协定、普尔和各种联合体。受到高关税保护的工业部门大多较早地形成垄断。糖业托拉斯总经理哈夫曼承认："高关税乃托拉斯政策。"关税税率调整反映了部门经济和资本集团的发展不平衡。例如，60年代末苏必利尔湖大铜矿被发现后，国会立即对智利铜矿进口征高关税，以进口智利矿石为主的新英格兰冶铜业却由此倒闭。一般地说，受益于高关税政策的主要是面向国内市场的中西部大企业。新英格兰、纽约的出口商、航运业则站在低关税立场上。当时企业实力增长最快的正是中西部，故高关税政策更不易动摇。总之，联邦政府按照资本集团的实力变化来调整关税税率，却牺牲了农场主、中小资本和消费者的利益。

〔货币争端及其引起的社会冲突〕　货币问题较之关税问题更为尖锐复杂。它既是由内战遗留的财政问题所引起，又与向垄断过渡的金融结构密切相关。内战后的美国币制相当混乱，流通的货币五花八门，包括金币、银币证券、国民银行和州立银行的钞票、联邦的绿背纸币和债券等。其中绿背纸币占通货量的一半，约4.5亿美元。绿背纸币既不能兑换黄金，又不能用于国际支付，遂不断贬值。1865年每元绿背纸币的实际价值只等于35美分金币。这种状况造成市场价格波动，银行信用缺乏保证，不利于资本家取得稳定利润，同时影响着美国的国际支付能力，难以吸收急需的欧洲资金。

1866年以后，共和党几次试图恢复硬币支付，但屡屡受挫。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彭德尔顿提出，如果政府用硬币支付公债，就会引起私人债务的硬币支付，那么以往借贷纸币的债务人利益就会受到损失，因此政府仍应以纸币偿债。此即所谓"俄亥俄观点"。格兰特总统对此观点不屑一顾。他决定对所有的联邦

债务实行金币支付。1873年危机造成金融形势恶化，硬币派抢先在1872年12月通过“恢复硬币支付法”。规定从1875年开始以硬币发行量80%的比率陆续收回绿背纸币，直至绿背纸币流通额降至3亿美元；至1878年美元同黄金价值挂钩，全部纸币均可兑换硬币。这个法令表明美国实际上开始实行金本位制。

然而，向垄断过渡时期的中小资本和农场主的大量破产，使债务人与债权人的矛盾有增无减。原来的绿背纸币派把减轻债务的出路转向了通过恢复金银复本位制来增加通货量。早在1837年联邦政府就规定了白银与黄金的比价为16比1。1848年加利福尼亚金矿开采后，出现银贵金贱。1861年，黄金年产量为白银的20倍，银币退出流通。70年代落基山区巨大银矿发现和开采，形势陡变为金贵银贱。但此时欧洲国家已相继实行金本位制，国际市场上白银贬值。尽管如此，联邦政府并未正式废止复本位制，故绿背纸币派就转变为银币派。银币派根据“格雷欣法则”①，认为白银一旦进入流通，就会取代黄金，实现通货膨胀。但是1873年铸币法限制了白银铸币量，从而堵住了债务人的另一条出路，他们愤怒地把该法称为“1873年罪恶”。

慑于银币派的压力，国会在1878年讨论银币问题。密苏里州民主党众议员理查德·布兰德提出了按16比1无限制铸造银币的议案。经过一番争执，金币派通过了稍作让步的布兰德—艾利逊购银法。规定财政部每月购入相当于200万至400万美元的白银并发行同量的银元券。但这无法改变白银供过于求的状况，银元券也难以进入流通，“金银之争”有增无减。80年代末，银币

---

① 格雷欣（1519—1579）是英国经济学家。他提出，一旦发行价值不足的货币即劣币，就会使足值货币即良币退出流通。此即“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

派广泛开展活动，并于1889年成立全国复本位联盟。两大党迫于压力，在政纲中都列入了复本位条款，但实际上都保留了金币政策。1890年，高关税派和银币派达成交易，在国会中通过谢尔曼购银法，实现了暂时的妥协。该法规定财政部每月购银450万盎司，相当于全国的白银月产量；并发行具有货币效力的国库券来支付银价。从1878年布兰德购银法开始，到1893年谢尔曼购银法被撤销，联邦政府共购白银5.34亿美元。但这并未改变畸形的金融结构和通货紧缩的局面，因而也无法平息“金银之争”。1893年危机时黄金储备大量流失，购银法再也无法维持。“金银之争”同整个社会的政治冲突纠缠在一起，成为党派阵营的分水岭。

硬币政策保证了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促使银行资本走向集中和垄断，对内战后美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同样是以牺牲下层人民利益为前提的。随着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深入发展，这种政策的弊端也不断地暴露出来。长期的通货紧缩造成货币供不应求。从1869年到1897年，货币总供应量比总需求量少2%—4%①。人口平均拥有货币量从1865年的30美元降至1890年的27.06美元。② 由此导致利率持续上升，债务不断加重，农业、铁路等部门日益陷入困难境地，成为1893年危机的诱发因素。这种政策也造成了金融分布的极不均衡。东北部所拥有的货币量超过西部和南部总和的几十倍，从而控制了这两个地域的货币供应。这种金融分布的地域格局为东北部银行在西部经营抵押、在南部发放高利贷提供了极有利条件。整个东北部从

① H. 瓦特：前引书，第259页。
② 小施莱辛格：前引书，第2卷，第1705页。

西部抵押中每年收益可达1.8亿美元[①]。但是西部、南部的长期萧条状态，使这种金融结构基础极为脆弱；一旦崩溃，就会导致恶性的连锁反应。

从全国范围看，纽约集中了当时国民银行全部现金储备的40%以上。[②] 华尔街以此控制了全国各部门、各地区的投资方向，形成独一无二的垄断地位。摩根集团在1893年危机中，有能力动员350万盎司黄金来支撑当时面濒临崩溃的联邦信用。这充分证明了内战后货币政策的实质性结果，即联邦政府以全国的财力支持华尔街，最后竟使白宫仰仗华尔街的鼻息。至于金本位和复本位的胜负问题，在1897年以后已无关紧要。黄金产量猛增，使货币发行量从1896年的18亿美元增至1901年的31亿美元，物价也提高了一半。国会在1900年毫不费力地通过金本位法，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金银之争。但金融体制的改革远未完成，货币争端的影子在20世纪美国社会中一直可见。

〔从格兰其法到州际商务条例〕　内战后的铁路建设是美国经济发展的缩影，铁路公司也由此而成为社会矛盾冲突的焦点。铁路巨头得到了政府的巨额土地赠予和津贴，但仍欲壑难填。他们采取“掺水股票”[③]、回扣、运费率歧视、价格协定、普尔等方式，攫取巨额非法利润。仅掺水股票的年收入就可达2.4亿美元。[④] 运费率歧视亦骇人听闻，西部平均运费率相当于东部的4倍。农场主收入的3/5用于运费支付。铁路公司还兼营谷仓和土地抵押，操纵农产品价格和利率，成为西部农业的“天

---

① 拉塞尔·奈：前引书，第22页。

②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401页。

③ 指在实际投资总额以外掺入的虚假股票，而这些虚假股票同样参加利润分配，故谓之“掺水”。

④ 小施莱辛格：前引书，第2卷，第1702页。

然垄断者"。因此，西部各州首先兴起了管制铁路的立法运动。

1869年至1875年，在格兰其组织推动下，伊利诺伊、艾奥瓦、明尼苏达、威斯康星等州立法机构，通过一系列政府管制铁路经营和运费率的法令，被称为"格兰其法"。根据这些法令，各州建立有权监督或制定铁路运费率的铁路管制委员会，禁止运费率歧视，禁止平行线路合并以保持竞争等等。它们是"州际商务条例"的蓝本。此时的最高法院仍承认"格兰其法"的法律效力，并在芒恩诉伊利诺伊案中判决州政府有权管制州际铁路。

80年代后，6个垄断集团基本上将全国的铁路网瓜分完毕，跨州运输成为铁路经营的主要方式。铁路公司与托拉斯互相勾结，排挤中小资本和农场主的现象更加严重。铁路公司操纵各州政局相当普遍。例如，圣菲铁路在堪萨斯拥有全权；在内布拉斯加，则是布林顿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两家分享。格兰其法变得空有其文。剧烈竞争也造成了运费暴跌，许多铁路公司损失惨重。它们试图订立统一的运费率，却终未成功。于是，管制铁路的呼声在全国范围内更为高涨了。

80年代末，管制铁路的立法活动在更广、更高的范围展开。1886年，全国30个州建立铁路管制委员会。国会参议院组成以谢必尔·卡勒姆为首的委员会。他们根据各州经验，提出建立联邦铁路管制委员会的议案。各铁路公司则愿意接受"较为宽仁"的控制，因为无情竞争使他们徒劳而无所获。最高法院则从反面促成了联邦管制。1886年，最高法院在沃巴什判案中否认了伊利诺伊州规定铁路运费的权利，并认为这违背了联邦宪法关于州际贸易的条款。各州的铁路管制实际上变得无效，人们只得诉诸联邦政府的力量。国会参、众两院在格兰其法和卡勒姆议案的基础上，形成"州际商务条例"，并在1887年2月4日以压倒多数通过。克利夫兰总统慑于社会压力而签署了这项法案。联邦政府

就这样不自觉地从放任政策向干预政策走出了第一步。

1887 年“州际商务条例”的主要内容是：设立一个由 5 名成员组成的州际商务委员会，经总统征得参议院同意后任命。各铁路公司须将运费率公开，禁止运价歧视和普尔等。从内容上看，这项条例并不比格兰其法有更多的创新。但是，它对于联邦政府的结构和职能的发展变化有着深刻的意义。这项法律是联邦宪法关于州际商务条款的第一个具体体现，为联邦政府在其他经济领域的干预提供了先例和法律依据。同时，州际商务委员会有权调查各铁路公司的营业状况，传讯证人，作出某些裁决或发布指令。它在隶属关系上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兼有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的特点。以后出现的各种联邦管制机构大多是这种模式的继续和发展。

尽管纳尔逊·阿尔德里治等保守派将这项立法说成是“无异于一场革命”，州际商务委员会仍长期软弱无能。因为它的权力是非强制性的，铁路公司可以拒不接受并向最高法院上诉。事实上是最高法院的复审权决定一切。1887 至 1905 年间的 16 项上诉案件中，最高法院的 15 项判决有利于铁路公司。有的案件拖延 5 年以上，使委员会的裁决无法执行。1900 年的 1 份国会报告承认铁路公司仍在实行价格歧视，其“程度也许和以往相同”。[①] 该委员会形同虚设，还由于其成员绝大多数来自两大党保守派。他们认为如果立即实施管制，将会引起强烈变化，使铁路公司蒙受“非常严重的损失”。[②] 因此，州际商务委员会不可能为了有效地执行职责而去触犯垄断巨头们。相反，委员会在搜集统计资料、提出分析和建议、提供业务咨询等方面，却为垄断资本提供

---

① 福克纳：前引书，第 171 页。

② 沙伊贝等：前引书，第 191 页。

了方便。可见，这个时期的干预政策极为微弱，其有效程度只能以垄断资本的需要为转移。

〔反托拉斯运动与反托拉斯法〕　1882年美孚石油公司组成托拉斯以后，各垄断集团纷纷效法，在钢铁、肉类加工、烟草、制糖、农机制造等部门出现了一系列托拉斯组织。它们滥用垄断特权，巧取豪夺，对社会中下层构成严重威胁。旧中产阶级为了避免完全破产的厄运，恢复旧日的“机会均等”，展开了一场反托拉斯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的思想代表是当时颇享盛名的改良主义者亨利·乔治、爱德华·贝拉米和亨利·劳埃德。他们从农业民主思想、乌托邦思想等旧观念出发，揭露和谴责托拉斯的罪恶，同时提出由国家控制托拉斯的主张。他们著书立说，乔治的《进步与贫困》、贝拉米的《回顾》、劳埃德的《反对共和国的财富》风靡全国。反托拉斯运动在这些人影响下形成一股颇有声势的浪潮。在北部城市中出现了单一税论者、国家主义者、反垄断党和联合劳工党等反托拉斯组织。在西部各州，农场主为主体的第三党推动各州议会通过了一系列反托拉斯立法。80年代末，反托拉斯已同关税、货币争端一样，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了。

各州反托拉斯立法最初都因袭了16世纪英国的反垄断习惯法，把一切垄断和合谋性联合都定为非法行为。在当时14个州的反托拉斯立法中，以密歇根州最为完整。它规定，凡限制、控制、妨碍或管制产量或市场价格的任何合同、协定、默契和联合均为非法，并详尽地规定了惩处方式和执行机构。同铁路管制一样，各州无法对跨州经营的托拉斯进行有效的干预。更复杂的是，1889年新泽西州立法为各个跨州经营的大公司提供营业执照，使许多垄断企业逃脱了所在州的管制。州一级反托拉斯法的疲软无力，促使各州改革派转向了联邦的立法和干预。

两大党为了争取选民也竞相做出反托拉斯的姿态。在1884

年的民主党政纲中就已列入了反垄断条款，试图乘机打击共和党。共和党也不得不在1888年政纲中点缀反托拉斯的辞令，哈里森许诺要实行“禁止”托拉斯的立法。国会组成了专门调查托拉斯情况的普乔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报告承认托拉斯过分膨胀已是既成事实，它们控制了许多部门，并正渗入新的地域。仅在纽约股票市场上参与交易的20余个托拉斯，各自的交易金额都达几千万美元[①]。仅1889至1890年，众议院接到的反托拉斯立法已有16份。此时国会再也不能对托拉斯问题假作不知，只得把它同关税、货币争端放在一起，作为党派妥协的一个筹码。

1890年反托拉斯法名义上是由参议员约翰·谢尔曼提出的，实际上是由佛蒙特州的参议员乔治·F·爱德蒙参照各州反托拉斯法并汲取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后起草的。爱德蒙的草案认为所有企业联合都“阻碍了完全、自由的竞争”[②]。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把草案措辞改得更加含混无力。参议院的辩论只涉及了法案与宪法的一致性问题以及关税和垄断的关系，根本没有研究对垄断行为的具体惩处办法。结果是参众两院仅有一票反对就轻易地通过了该法。保守派领袖托马斯·普拉特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认为这项立法无意于惩处和禁止托拉斯，因而被称为将“惩罚托拉斯的立法送到了国人面前。”[③]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共7项条款。它宣布任何限制、垄断州际贸易或对外贸易的合同、联合均为非法，须处以罚款5,000美元或1年徒刑的惩罚；受到上述非法行为损害者可起诉并索取3倍于损失的赔款。但这些条款没有明确“不合理行为”的范围，也

① V.S. 克拉克：《美国制造业史》，华盛顿1929年，第2卷，第176—177页。
② 默尔·芬索德等：《政府与美国经济》，纽约1959年，第446—448页。
③ 芬索德：前引书，第448页。

没有具体说明“托拉斯”、“垄断”等概念的涵义。其惩治方式都是微不足道的，因而垄断组织不可能真正受到制约。谢尔曼本人也认为，反托拉斯法是把旧的习惯法运用于州际、国际贸易中，故“要在合法的和非法的联合企业之间用法律语言明确其界限是困难的”[①]。可见，反托拉斯法的缺陷既是由两大党的欺骗策略所造成，也表现出旧法律概念与新经济现象之间的矛盾，使之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最高法院对反托拉斯法采取极端保守的态度。一方面，最高法院为受控的托拉斯竭力开脱。在1895年的奈特公司案中，最高法院把占全国糖产量95%的奈特公司判为合法，并诡辩说制造业不属于贸易范围，故不在反托拉斯法的惩罚之列。由于这个判例，制造业的其他托拉斯也幸免于制裁。另一方面，最高法院却把反托拉斯法用于镇压工人罢工。1894年普尔曼罢工时曾拒绝运输邮件，司法部以“限制贸易罪”对罢工领袖尤金·德布斯提出起诉，最高法院则依据反托拉斯法判处德布斯徒刑。克利夫兰任内仅有5起反托拉斯案，其中4起是控告工会的。而1890至1900年的18起反托拉斯案例中，没有一个托拉斯遭到解散。[②]

国会和行政部门同样削弱了反托拉斯法的执行。国会在10余年间没有为反托拉斯法提供执行经费和机构。直到1903年，司法部才设立反托拉斯局，每年经费为50万美元，仍远不足以对付数百个巨型垄断组织。司法部长理查德·奥尔尼等人在一系列反托拉斯判例中都直接支持了最高法院。因此，1890年后托拉斯数量继续骤增。仅1899至1901年间组成的托拉斯就有146

---

① 芬索德：前引书，第448页。

②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565页。

家[1]。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种种弱点日渐暴露，对垄断资本发展也产生不利影响。20世纪初，托拉斯开始向控股公司转变。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等总统屡经修补，在1913年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基础上形成了较完整的反托拉斯法体系。尽管反托拉斯法未能抑制垄断组织的膨胀，但它毕竟标志着放任政策进一步转向干预政策，联邦政府不得不开始借助于“看得见的手”来保持社会经济结构的平衡了。

第三节　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调整和加强

〔*党魁势力和政治丑闻*〕　在“镀金时代”，党魁势力恶性膨胀。党魁亦称政治老板。他们控制各级政党机器，纵横捭阖，游说策划于幕前幕后；依靠恩赐官职来拉拢党派骨干，进而控制各种选举和州、联邦的政局。一些关键州的大党魁，如纽约州的罗斯科·康克林、缅因州的詹姆斯·布莱恩等，都由此发迹并盘踞国会多年。同样，得到官职的党派忠诚分子也利用职权来回报党魁。他们挪用政府财政来充实本党金库，把大批合同、专利、投标转让给支持本党的企业家等。可见，政治分赃、恩赐庇护和党魁老板三位一体，是造成当时腐败政治的主要原因之一。进入80年代，一批新党魁出现，如宾夕法尼亚州的马修·奎伊、纽约州的托马斯·普拉特、罗得艾兰州的纳尔逊·阿尔德里治、加利福尼亚州的乔治·赫斯特等。他们与注重地域问题的旧党魁不同，而是长期坐镇国会，遥控各州，从容地进行全国性的政治交易。90年代以后，出现了垄断资本家直接充任的特大党魁，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人马库斯·汉纳是其代表。汉纳本人是百万富翁，弃

---

①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565页。

商从政，成为赫赫有名的“总统制造者”。此后的麦金莱、塔夫脱、哈定等总统均出自俄亥俄州，同汉纳的苦心经营不无关系。

正是在这种党魁横行的年代里，政治丑闻充斥着美国社会。1871年纽约市民主党的坦慕尼厅“特威德集团案”首先遭到揭露。威廉·特威德从1869年开始控制坦慕尼厅，进而操纵纽约市政府。仅在2年时间里，特威德集团侵吞公款就达1亿美元之多。这次揭露使两党政治中最腐败的内幕暴露于世，举国震惊。民主党大伤元气，就大力搜集共和党上层丑闻作为报复，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互相攻讦。在“莫比利尔公司案”中，许多共和党头面人物接受了大量股票赠予，副总统舒勒·考尔法克斯和参议院领袖詹姆斯·加菲尔德也都牵连其中。此案又引出一大批联邦高级官员的营私舞弊案。例如，海军部利用签订军舰制造合同之机分得赃款几十万美元。陆军部则大量出售西部地区的皮货贸易特权。内政部、财政部与土地投机商公开勾结，借分配西部土地而大捞便宜。甚至美国驻英国和巴西的大使也盗用合众国名义诈骗巨款后逃之夭夭。纽约、波士顿、旧金山等主要海关无一不是贪污黑巢。许多丑闻一直涉及到白宫内部。在逃税漏税的“威士忌集团案”中，总统私人秘书参与密谋并通风报信，但却得到格兰特总统的庇护，依然逍遥法外。

各州的政治腐败也不亚于联邦政府。纽约州议会把伊利铁路的控制权以低价卖给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公开出售立法法案。伊利诺伊州的某届议会通过了700多项有利于大公司的立法。在艾奥瓦、明尼苏达、加利福尼亚等州，这类舞弊行径也是司空见惯的。

这种政治腐败现象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在企业界的疯狂竞争中充满着欺诈手段，侵吞股票、制造假破产、发放掺水股票、故挚事端等等，都成为聚敛财富的极佳手段。西部土地、矿藏和

铁路都是投机家和暴发户们的理想场所。商业的欺诈和疯狂造成一种狂热的投机心理，使政界的钻营舞弊也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向垄断过渡时期的美国经济为政治“新贵”和既得利益集团提供了“天赐良机”。

〔文官改革运动与彭德尔顿法〕　　腐败的党魁政治使政府效率低下，支出庞大，既损及下层民众利益，又危及统治秩序。有识之士对此深为忧虑，认为改变分赃制度是势在必行。其中的代表人物多是行政部门的改革派官员，如乔治·科蒂斯、汉密尔顿·菲希、詹姆斯·考克斯和卡尔·舒尔茨等人。在他们的鼓动下，兴起了一场美国文官制改革运动。

美国文官改革运动经历了较长的准备阶段。1867 年，国会众议员托马斯·詹克斯已提出报告，主张借鉴中国科举制及英、法、普鲁士等国的文官制度，实行官员考试录用、选拔制度。这个提议在国会中遭到冷遇，却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70 年代以后，改革派不断向国会施加压力，1871 年使“文官拨款法”得以通过。该法附件规定了组成由总统任命的制定文官管理规则的委员会。科蒂斯任首届委员会主席。1872 年 6 月举行了第一次文官考试。这项初步改革遭到保守派的拼命抵制，国会拒绝对文官委员会拨款。到 1875 年科蒂斯被迫辞职，改革中途搁浅。1880 年海斯总统支持文官制改革。由道曼·伊顿出任文官委员会主席。伊顿发表《英国文官制度改革史》，为美国文官制度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同时，舒尔茨、谢尔曼等人各自在内政部、财政部进行改革试验，为进一步改革提供了经验。党魁势力则把文官制改革说成是中国科举制的翻版，将会破坏美国民主政治等等。他们还利用改革中的缺陷，偷梁换柱，试图把文官考试变成另一种分赃形式。改革派为了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在 1881 年成立了全国文官改革联盟。改革联盟广泛揭露党魁分赃的弊端，

为进一步推行改革扫清障碍。

正当改革派与党魁势力僵持不下时，发生了举国震惊的1881年加菲尔德被刺事件。分赃制造成一些政客疯狂追逐官职，以致出现铤而走险、持枪行刺的恶果。这不仅使改革派和社会中下层感到切肤之痛，许多官员和政客也不得不承认分赃制已成为过时的赘疣，19世纪初确立的党派分赃制已不适应对数十万官员进行选拔的需要了。国会在舆论压力下，经过多次辩论，于1883年初通过了由参议员彭德尔顿提出的文官法案。从此，文官改革开始纳入法律程序之内。

彭德尔顿文官法吸取别国文官制的长处，总结并提出一整套美国的文官管理规则。这些规则直到目前仍保持稳定。其主要内容有：对官员选拔实行竞争性的公开考试和考核制，同时对高级要职实行选举制和任命制；按照各州人口比例分配政府官员名额；实行文官预备期制度；禁止现职政府官员介入党派活动；禁止以官职作为竞选诱饵；文官隶属于行政部门。彭德尔顿法的核心是实行竞争淘汰的考绩制，即根据公职人员的能力和政绩，按照公开竞争原则决定其录用和提拔降退。彭德尔顿法还规定了文官委员会的组成与权限，其职能包括举行文官考试、调查文官法执行情况以及制定各项细则。虽然文官委员会几度险遭撤除，但仍得到保持和发展，直到1979年才改组为联邦人事管理总署。

文官法虽然得以通过，但是它以部分保留赐官分赃制作为代价，在实行中仍很不彻底。1883年文官法的适用范围只及当时联邦官员的12%，州和地方政府仍在实行分赃制。克利夫兰、哈里森、麦金莱等总统利用文官法覆盖面狭窄的缺陷，继续在政府内充塞党派势力。但是总的趋势是功绩制范围不断扩大，到1900年已占联邦文官的20%。文官法的另一个缺陷是没有任期

限制，这被保守派人士攻击为终身任职。联邦政府直到1920年实行官员退休制，才弥补了这个缺陷。国会在党魁势力的操纵下，动辄使用调查权来阻挠文官委员会的工作进展，还借口文官委员会不应成为官僚机构，削砍委员会的拨款和编制。曾在委员会任职6年的西奥多·罗斯福认为：由于力量悬殊，仅仅靠文官委员会是无法制止违反文官法的现象的。[①] 直至20世纪美国政府在其他方面的改革配套进行，文官法才较全面地得以实施。1950年采用功绩制的联邦官员已达90%。[②]

文官制改革对于美国政治体制的调整具有深刻影响。首先，以功绩制取代分赃制，有利于统治阶级网罗人才，提高官员素质和政府效率，也相对体现了“机会均等”原则，使知识分子有较多机会进入政界，从而扩大了统治基础，缓和了社会矛盾。其次，逐步形成了由总统垂直领导的行政人事制度，将党魁把持的政治分赃转变为由总统进行的权力分配；总统成为两大党的实际领袖，使行政和立法的制衡关系发生新变化。其三，限制了官员直接介入党派活动，切断了政府对两大党提供的财源，客观上促使两大党更多地向垄断资本靠拢以取得竞选支持。双方找到了结合的共同点，两大党用政纲和金钱吸引选票比用官职笼络少数党派骨干更能争取选民，大企业直接过问政纲和候选人比通过党魁间接控制政局更为有效。其四，政府官员中的党员忠诚分子越来越被技术专家所取代，国会和内阁开始大量聘用管理专家和技术人员，许多专业研究人员纷纷进入政界兼职，这甚至引起了大学课程设置和学术研究动向的一系列变化。总之，文官制改革引起了连锁反应，使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相对顺应了经济结构变化的要

① 莫里森编：《西奥多·罗斯福通信集》，哈佛1951年，第1卷，第166页。
② 吕贝克·格鲁弗：《美国史》，马萨诸塞1981年，第538页。

求。

〔白宫与国会的权力之争〕　重建后的联邦决策权一度由国会掌握。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为了恢复其权力优势，与国会展开了复杂的权力斗争。首先在官职任命权方面展开。1867年官职任期法是重建时期激进派击败约翰逊总统的一张王牌。此后国会坚持与总统分享官职任免权。海斯就任总统后，未同国会磋商即独立进行组阁；接着又几度与党魁势力代表罗斯科·康克林较量，控制了对纽约海关官员的任命权，在内战后首开先例。克利夫兰上台后利用文官改革的形势，在1887年3月迫使国会撤销了官职任期法，为恢复总统的完整权力走出了第一步。

国会还竭力插手内阁各部事务。在70年代初，部分国会议员已主张总统应尽量少过问内阁事务，内阁部长们应直接对国会各对应的委员会负责[①]。1881年，国会再次要求各部每月向国会报告工作。这种架空总统的手法显然有悖于三权分立原则，故未被行政部门接受。国会又利用其接受上诉、进行调查的特权，来干预内阁各部。1880至1886年国会接受上诉案达3,000余件。这又引起了司法部门的不满。国会只得以调查各部情况作为主要渗透手段，在1887年组成了参议院考克瑞尔委员会，1893年又组成了参众两院的联合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考核各部工作，接受各部的工作报告白皮书。结果是国会未能控制内阁各部，却形成了一种监督、改善行政部门的重要手段，促进了新的制衡关系建立。尽管如此，到1905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开始对内阁各部加强控制，上述两个委员会就寿终正寝。

财政支配权是双方争夺的又一个焦点。财政决策直接与关

---

① L.D.怀特：《共和党时代，1869—1901年》，麦克米兰公司1958年，第47页。

税、货币、土地、铁路、抚恤金等重大争端相关，故又与党派斗争纠缠在一起。例如，海斯为了增加对联邦在南部驻军的拨款，克利夫兰为了减少抚恤金支出，都曾与相对立的国会发生争执。总的看，行政部门对于财政拨款的数量和使用方向仍无真正的发言权。尽管如此，行政部门仍尽力保持对既有拨款的支配权。约翰·谢尔曼任财政部长期间，提出专款专用、收支平衡、不得提前付款和透支等财政管理原则，使财政部对其他各部拨款使用情况有监督权，从而部分抵销了国会的影响。双方僵持到1921年，行政部门中专设了联邦预算局，才使国会与内阁的财政职责较为分明。

立法与行政的权力斗争反映了这个时期旧的地域性政策同新的全国性政策之间的更替。行政权力较为适应这种更替，从而得到保持和发展。从内战后到20世纪初，内阁增加了5个部[①]，直接推动了行政权力的上升。其中的农业部开展了科研指导、市场调查、生产监督和信息传递等业务，为其他各部提供了经验。行政部门的职能扩大还表现在新设立的一系列独立委员会，如文官委员会和州际贸易委员会等。这些机构既对总统负责，又具有准司法和准立法的职能，故比旧行政机构更具有灵活性，成为以后行政权力扩展的主要形式。总统直属的白宫办公机构也开始形成，从格兰特时的6名办公人员发展到麦金莱的几十个人，并得到国会的专项拨款。白宫机构的发展，使总统得以更加自行其是而不忌国会的插手。行政职能扩大，为联邦政府增加大批官员，其人数从1871年的53,000人增到1901年的256,000人，30年内

① 1862年成立的农业部在1889年升格为正式内阁部；原有的邮政总局和检察总署，在1872年和1870年分别升为内阁的邮政部和司法部；1903年成立的商业和劳工部，在1913年分设为内阁的商业部和劳工部。

增加近四倍。[1]

总统为首的行政权力上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经济集中的趋势。全国市场的形成要求联邦政府迅速有效地处理全国性争端。而国会内党魁势力纷争，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和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长期对峙，使立法部门难以“用一个声音说话”。相反，80年代以后历届总统竭力摆脱“看门人”的角色，克利夫兰在其两次任内使用否决权300余次，有力促进了总统地位上升。总统所处的位置较有利于联邦政府、两大党与垄断资本的三者结合。克利夫兰与纽约金融界、哈里森与铁路集团、麦金莱与中西部制造业集团均关系甚密，为国会的党魁势力所不及。在竞选过程中，总统比国会表现得更“开明”一些，作出改革姿态以争取民心，故在调整政策方面略胜一筹。此外，总统能比国会更迅速、更坚决地保护企业利益，在历次经济危机和大罢工面前，总统都采取非常措施来保护资本家渡过难关。因此，行政权力上升也是向垄断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尖锐的产物。正如当时有学者所预言的：“有理由相信，（总统权力）将达到一个比内战以来任何时候都要高的地位。在美国各地的趋势正在把权力和责任集中于一个人，这是毫无疑问的。”[2] 当然，真正形成总统权力中心的还是从西奥多·罗斯福、经过伍德罗·威尔逊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那个时期。

〔国会、最高法院和军队的强化〕　国会曾长期被保守势力所控制，其议员中相当一部分是文化素质较低的内战时期复员军人和党派骨干。这种落后的构成使国会在19世纪末联邦政府中的地位下降。然而，国会的结构也在发生缓慢的变化，各种院

① 《美国历史统计》，第294页。
② J·布莱斯：《美利坚共和国》，纽约1894年，第2卷，第846页。

外集团和专业委员会的活动加强。

院外集团又称“压力集团”，即某种相同利益的社会集团通过各种途径向国会施加影响的政治力量。19世纪末的院外集团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由党魁直接操纵的政党机器。二是由大资本控制的企业集团，如铁路集团、糖业集团、制造商协会等等。三是内战后遗留的有关地域斗争的集团，如“共和党大军”[1]。四是与重大社会争端有关的团体，如文官改革联盟、复本位联盟、关税改革联盟等。五是来自社会下层的集团，如农场主集团、“黑幕揭发者”等。各种院外集团互相交叉，往往通过达成默契和妥协来保证某些立法得以通过。由于地域结构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某些旧的院外集团日渐衰落。如内战前很有影响的南方集团，此时已无足轻重；在70年代曾颇有势力的共和党大军，到90年代几乎销声匿迹。而与垄断资本主义同时发展的一些集团则颐指气使，左右政局。如全国制造商协会，其主席是显赫一时的马库斯·汉纳，在参、众两院势力甚众。其他一些集团的首领也往往出任国会的委员会主席或内阁部长。院外集团是两党制和国会的补充，亦是财团控制政府的重要途径，又被称为“无形国会”或“第三院”。

随着社会经济活动急剧扩大，立法过程变得更加繁忙和复杂。每届国会讨论的议案从70年代的37,000项增至80年代的74,000项[2]。为了应付这种局面，立法程序的主要环节越来越在各专业P委员会中进行，国会的辩论和表决成为一种形式。国会的委员会可分为两种：一是关系到国会法定职能和权限的常设委

---

① 内战后由大批原联邦复员军人及其家属组成的社会政治集团，因坚持地域主义口号，要求扩大抚恤金额，追随共和党保守政策而得其名。

② 戴维斯等：前引书，第643页。

员会，如关税、筹款和拨款、上诉委员会等等，均由当时最有影响的政界人物担任主席，如加菲尔德、海斯、谢尔曼等。二是负责重要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的专门委员会，如彭德尔顿委员会、普乔委员会、考克瑞尔委员会等。委员会的增多使议员的职业化趋势日益明显，其更换率从70年代的58%降至90年代的24%[①]。其服务年资也越来越长，当时有影响的两名众议院议长托马斯·里德和约瑟夫·坎农的服务年资分别是20年和28年[②]。于是，各个委员会掌握着实际立法权，年资最长的议员操纵着立法程序，使国会更加失去“民选”的意义。同时，国会构成的相对稳定使之保守性增强，也更有利于垄断资本对立法过程施加影响。

最高法院在阻碍改革、破坏罢工和维持种族压迫等方面具有行政、立法部门所不具备的特殊作用。它之所以有恃无恐，在于它受到所谓“司法独立”的保护。国会在重建时期为了制约行政部门，并阻止民主党人进入最高法院，于1869年明确规定最高法院由9名法官组成，并再度肯定法官的终身任职制。终身任职制使大法官们得以顽固守旧而无后忧。最高法院还利用“司法复审权”对各种改革立法横加阻挡，动辄以“正当法律程序”宣判联邦和州的干预政策为“违宪”。反托拉斯法经过他们的解释变成了作用全然不同的双刃剑。罢工领袖被最高法院判为“垄断贸易”的“罪犯”，而在南部横行不法迫害黑人的三K党问题却是“联邦无法干预的各州内部事务”。最高法院充当保守势力的主要堡垒，即使在奥立弗·霍尔姆斯法官提出改革理论后仍纹丝不动，直到本世纪30年代“新政”才触及了这块“禁地”。

---

① N. 鲍尔斯拜：“联邦众议院的制度化”，《美国政治学评论》1968年第1期，第146—148页。

② 同上。

内战结束后，联邦军队的主要任务从平定南部叛乱和执行军管，逐步转移到治服西部印第安人和防止北部城市工人的罢工蔓延。适应这种转变，其人数从100万人削减到3万人左右，这并不意味着军队地位下降。相反，联邦政府一直对军队给予优惠的拨款。陆军的巨额抚恤金和装备开支是联邦政府的第一项主要开支。海军拨款从70年代的400万美元增到90年代的3,000万美元。到1893年，美国海军已建造22艘5,000吨铁甲舰，形成了距海岸线1,000英里以外的作战能力，为大规模海外扩张准备了条件[①]。除了更新和加强军队装备以外，联邦政府还着手改造建国初期延续下来的旧指挥系统。麦金莱任内的陆军部长艾利胡·卢特开始设立总参谋部，用以制定防御和动员计划、调查部队效率和状况、协调军兵种行动，在陆军部与部队之间建立起较为畅通的渠道。美西战争后，总参谋部进一步得到加强，并在1903年为国会正式批准。总之，经过19世纪末联邦政府对军事机器的调整与加强，美国军队基本上适应了20世纪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对内统治、对外扩张的要求。

〔联邦主义的新发展及其原因〕　内战从政治上摧毁了州权主义恶性发展的产物、即分裂主义的南部同盟。接踵而来的全国市场迅速扩大，又从经济上削弱了州权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垄断资本取代分散的自由资本而居统治地位，为实行更完整的全国性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些因素都促进了美国的联邦主义在19世纪末的新发展。

联邦主义发展还由于当时一系列具体因素的作用。从政府的人事构成上看，内战前的南部官员绝大多数在战争中和战后退出了联邦政府。这就直接消除了旧地域主义重新占据优势的可能

---

① L. 怀特：前引书，第159—160页。

性。同时，重建后的联邦政府仍然注意保持地域政治的力量平衡。海斯总统在其内阁中保留一名南部官员和几名边界州官员担任部长的作法，被以后的总统们沿袭而成为惯例。从宪法体系上看，联邦主义发展与第十三、十四、十五条修正案有密切关系。这三条修正案名义上是为了保证黑人权利而制定的，实际上处处包含着削弱州权的涵义。三条修正案都明文规定：“联邦国会有权以适当的立法强制执行本条。”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州权抵制联邦权力的法律依据，迫使各州最终在政治上服从联邦。

联邦主义发展有其经济趋势的内在作用。19 世纪末国内外市场的激烈竞争，促使联邦政府在关税、货币、土地、铁路和专利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资助和鼓励企业的发展，联邦权力也由此随着经济增长而得到发展。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也要求联邦积极干预各州内部事务。各州既无法遏制垄断企业的极端行为，也难以应付工人运动的严重挑战，只有借助联邦政府的力量才能使各州保持内部稳定。联邦主义加强还借助于美国政治区划的变化。一批西部新州建立，从开始它们就缺乏州权主义传统，而且比旧州更依赖联邦的财政支持，从而间接加强了联邦主义。

同时，各州仍保留着部分独立性，不同的地域在政策上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反映了美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差异。例如，南部各州保存了实行种族隔离的“吉姆·克劳制”，挫败了联邦干预南部选举的企图；中西部各州在第三党的推动下，较早制定了铁路管制和反托拉斯立法；远西部的新州创立了包括创制权、复决权、直接选举和无记名投票等民主程序的州宪法；东北部各州较早地开始实行城市环境改善和劳工保护等改良主义政策。各州、各地域的特殊政策从不同方面影响到国会的力量对比和三权制衡关系，补充和发展了联邦的全国性政策。

如果说，美国建国初期的联邦主义特点是从邦联走向联邦；19世纪中叶至内战的联邦主义特点是逐步铲除分裂主义、巩固联邦的统一；那么，可以认为19世纪末的联邦主义发展的主要特点在于联邦政府与垄断资本开始全面结合。1893年危机导致企业合并高潮，垄断组织在主要工业部门确立优势，摩根集团通过公债交易控制了联邦金融命脉。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必然要转变为政治上的主宰地位。1896年总统选举，共和党候选人麦金莱得到各个垄断集团的解囊相助，作为垄断资产阶级的第一个全权代表登上总统宝座。由于两大党上层一致倒向麦金莱，国会中的形势也对他特别有利。当时国会的"四巨头"即罗德艾兰的纳尔逊·阿尔德里治、康涅狄格的奥维尔·普拉特、艾奥瓦的威廉·艾利森和威斯康星的约翰·斯普纳，都曾是麦金莱当参议员时的重要伙伴。他们代表着东北部和中西部两大城市群的垄断集团利益。麦金莱的后台马克·汉纳也走向了前台，亲自坐镇国会。于是，麦金莱就成为总统、国会、垄断资本和两大党四位一体的人格化了。这标志着垄断资本与联邦政府全面结合的时代开始，这种结合本身也是联邦主义战胜地域主义或州权主义的象征。

麦金莱上台后，立即组成一个权势极大的内阁。政界元老约翰·谢尔曼担任了国务卿，他与洛克菲勒私交甚厚。内政部长布利斯是纽约大银行家、公平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陆军部长卢瑟尔·阿尔格是密歇根州的木材业巨头，继而又由摩根的法律顾问艾利胡·卢特担任。此外，许多大企业家还被任命为驻英、法、德、日等国的使节。麦金莱政府由此被称为"百万富翁俱乐部"。总统按照各财团实力来分配权力，比旧党魁的分赃制更符合垄断资本的要求。从此，百万富翁本人出任内阁部长或联邦政府要职成为屡见不鲜的事情了。

三权制衡关系变化、联邦主义发展、垄断资本与联邦政府结

合，三者不约而同地加强了总统权力。政府机构的调整与增设，官员素质和效率提高，镇压和平衡两种职能的同步发展，使整个国家机器开始适应经济运转的要求。尽管这些变化是被动的、不自觉的，但是它们的历史意义仍在于为20世纪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大政府”出现准备了条件。

第七章

19世纪后期工人运动的发展

19世纪后期是美国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时期。工业革命造成的市场急剧扩张，向垄断过渡所产生的剧烈竞争，促使企业资本家强化剥削手段，导致工人地位和生活条件下降，是这一时期美国工人运动高涨的直接原因。工人运动的发展水平及其阶段性特点又为工业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不平衡发展所制约。60年代，代表熟练手工业者的工人组织主要是为摆脱雇佣劳动制、恢复旧工匠地位而斗争。这种与工业革命发展趋势相背离的斗争目标导致它们的衰落。80年代以后，与大机器工业相结合的新熟练工人开始在美国工人运动中占主导地位，产生了以劳联为代表的新工联主义。早期劳联虽然摆脱了乌托邦改良主义，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却局限于经济斗争的狭隘目标，逐渐形成了它的机会主义路线。90年代以后，它的领导者为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积极推行劳资合作政策，结果把美国工人运动引入歧途。

尽管如此，美国工人阶级英勇的反抗斗争，仍极大地震动了美国社会。1886年，美国工人为实现八小时工作日制举行了具有世界意义的罢工斗争。90年代后，随着垄断资本统治的确立，罢工斗争更加集中和剧烈，把19世纪末美国工人运动推向了高

潮。

美国工人运动另一重大缺陷是同社会主义运动相互分离。其原因除了资产阶级的政策作用和劳联的消极影响外，还由于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存在着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以致它难以取得对工会组织的领导地位。

第一节　全国劳工同盟和劳动骑士团

〔全国劳工同盟建立及其活动〕　内战前，美国工人运动的规模仍受到工业革命发展水平较低的限制，工会组织大多是地方性的城市工会。其成分主要是技工与工匠，故带有浓厚的行会色彩。五、六十年代前后，大机器工业在全部制造业中仍未占据优势地位。内战后，工业受到战争刺激而迅速发展，市场扩大又造成企业间、地区间的剧烈竞争。资本家为追逐高额利润，不断加强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东部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指数从 1861 年的 100 降到 1864 年的 64。① 一方面，工业革命尚未在各部门最后完成，大批熟练手工工人仍保持着旧的经济地位和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势不可当的工业革命又日益威胁着熟练工人的存在条件。内战后的工人运动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展开的。

美国工会运动曾在 1857 年经济危机和内战初期受到严重影响，在 1862 年以后又开始复兴。到 1865 年 11 月，在 69 个行业中已建立了 300 个工会组织，会员总数为 20 万人。② 其中 70%集中在马萨诸塞、纽约和宾夕法尼亚三个州。较大的工会组织是铸工、技工、木工及印刷工人的行业工会。各地工会组织纷纷建

① H.G. 瓦特：前引书，第 49 页。
② 约瑟夫·雷贝克：《美国劳工史》，纽约 1966 年，第 111 页。

立，为全国性的统一工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各行业工会经过长期酝酿，于 1866 年 8 月 20 日，在巴尔的摩成立了全国劳工同盟。来自 13 个州的 77 名代表，分别代表着各个地方大会、城市联合会、八小时联盟和全国性工会的大约 6 万名工人。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代表会议，标志着美国工人运动进入新阶段。

这次大会讨论的内容包括罢工、八小时工作日、合作社运动和土地改革等问题。大会的各委员会报告中表述了全国劳工同盟的主要观点和原则。首先，大会认为应将所有的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组织进工会；但不主张罢工，认为罢工对工人“极其有害”，应以仲裁来解决劳资冲突。[①] 其次，大会讨论了八小时工作日和政治行动问题，认为应该建立以八小时工作日为目标的全国劳工党；但是部分代表反对建立政党和政治行动。其三，会议认为合作社是对“现存工业制度的种种弊端的一种可靠和永久的补救方法”，还提出“全部土地只分配给实际拓荒者”的口号。[②] 这两个观点表明全国劳工同盟深受当时的改良主义思潮影响，并同西部农场主保持着相当多的联系。

1866 年以后，在全国劳工同盟的推动下，八小时工作日运动出现了第一次浪潮。由于工人组织薄弱和联合水平较低，这次浪潮并未取得实质性效果。1868 年 6 月，国会通过法律，规定联邦政府雇佣的劳工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另外还有六个州通过了八小时工作日法。尽管这些法律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仍足以证明八小时工作日运动已经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注意并产生了一定的

---

① 约翰·R·康芒斯：《美国工业社会文献史》，纽约，1958 年，第 9 卷，第 130—132 页。

② 康芒斯：前引书，第 134—137、138—140 页。

影响。

全国劳工同盟对合作社运动更为重视。1866年，在纽约州特洛伊建立了第一家合作制的翻砂厂。此后三年中，合作社运动在各行业工人中纷纷展开。其中以铸工国际工会主席威廉·席威斯领导的合作工场最为重要。席威斯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活动，“使合作思想在许多工会组织中几乎成了惟一的话题。”[①] 总的看来，合作社运动范围仍然很窄，它与大机器工业的工厂工人基本上不发生联系。这就决定了合作社运动具有保守、改良的色彩，而且同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以及政治斗争互不相容。另一方面，合作社运动缺乏基本的周转资金，得不到可靠的贷款来源，在资本主义结构内部显然是难以维持下去的。合作社运动的上述局限性使之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之中。

〔凯洛格理论与全国劳工党的失败〕　为了使合作社运动得到出路，许多工会组织和会员接受了爱德华·凯洛格的低值货币理论。凯洛格原是个纽约商人，经营失败后转向研究金融制度，并于1848年发表了《劳动及其他资本》。凯洛格认为，现存的金融制度纵容金融家造成货币短缺以提高利率，给劳工和平民带来了灾难。因此他主张由联邦政府发行以不动产为基础的纸币，利率规定为1%；以此迫使银行降低利率，使农场主、小企业主和熟练工匠能获得急需的货币和贷款。凯洛格甚至提出，一旦实行这种改革，最终会导致雇佣劳动制度的废除。显然，这种理论是相当肤浅幼稚的。凯洛格理论在50年代对工会运动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在内战后，由于金融问题的冲突和合作社运动兴起，低值货币论成为对工会运动及其他改良运动有重要影响的思潮。席威斯、理查德·特里弗雷克等劳工领袖一时都成为这个理

① 玛丽·比尔德：《美国劳工运动简史》，纽约，1928年，第75页。

论的崇拜者。

1867年，全国劳工同盟提出一项金融改革纲领，将凯洛格理论更加具体化了。该项纲领提出，取消国民银行制度；由政府规定利率，公债利率为3%；政府以绿背纸币向公民贷款，利率为1%。[①] 这项金融改革的目的在于，一是使合作社得到充分贷款；二是使中小企业主获得所需资金以保持在那些企业中的工人就业机会。可见，它既反映了合作社运动的工人要求，也有利于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中小资本和农场主。作为内战后第一个金融改革纲领，对后来绿背纸币党、农民联盟和人民党的金融改革纲领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为了实现这种金融改革，全国劳工同盟将其主要注意力从合作社运动转向建立政党的准备工作。1867年，劳工同盟在芝加哥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建立“全国劳工党”的要求。到1870年终于采取实际步骤，选举产生了全国劳工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1872年，该党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城召开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准备参加当年的总统选举。劳工党把绿背纸币计划作为主要纲领，这就偏离了劳工同盟原来注重合作社运动的路线，使下层群众与上层领导逐渐脱离。同时，劳工党一旦卷入政党角逐，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资产阶级政客的操纵。于是，劳工党的总统提名活动就成了一种徒劳的努力。随着提名活动的失败，金融改革纲领也付诸东流，全国劳工同盟迅速瓦解。这种从合作社运动走向金融改革及政党斗争，并趋于失败的道路，在19世纪末的美国第三党中十分典型。后来的格兰其、农民联盟和人民党都有类似的经历，劳工党只是首开其例罢了。

---

① 雷贝克：前引书，第123—124页。

全国劳工同盟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各行业工会联合起来的第一个工人组织，它的出现是内战后美国工人运动走向高潮的标志；同时，它的纲领和实践的局限性，反映了这个时期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一方面，全国劳工同盟把八小时工作日作为自己的目标，表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在局部地区已有相当的发展。另一方面，它竭力倡导合作社实验和金融改革，试图以此来摆脱雇佣劳动制度，幻想回到昔日小手工业者的“黄金时代”。这说明在劳工同盟中产业工人的比例较小，熟练工匠、破产小业主及西部农场主的影响仍然很大，他们同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相背离的。从思想上看，由于劳工同盟的阶级构成，决定它难以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却对凯洛格理论一见如故。恩格斯尖锐地指出：凯洛格的货币理论是一种“幼稚看法”，以为工人贫困原因在于“需要钱的时候却没有钱，这是由于世间的钱根本不够。”“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只有通过实验和破产才能纠正过来……”[①] 因此，全国劳工同盟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而兴起，又随着工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而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

〔70年代危机与劳动骑士团〕　1873年9月，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美国，并一直持续到1878年。工人们在这场危机中受到惨重打击。全国有1/5工人长期失业，2/5工人处于半失业状态。在一些主要工业部门的工人工资被降低40%至60%。工会运动也遭到严重挫折。1873年的30个工会，到1877年仅存不到10个。会员人数也从30万减到仅5万人。[②] 在危机的打击下，美国工人阶级并未停止自己的斗争，他们以英勇的罢工斗争在美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宝贵的一页。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9卷第53页。

② 雷贝克：前引书，第129—130页。

1875年，马萨诸塞福尔河区的纺织工人，为了抗议资本家连续4次削减工资，举行了长达8个星期的罢工斗争，最后由于饥饿而被迫接受资本家的工资条件。同年，宾夕法尼亚无烟煤矿的矿工在约翰·沃尔什的领导下，进行了一场更为持久的罢工斗争。1874年底，矿主们将矿工工资削减10%—20%，并取消最低工资限额。矿工们忍无可忍，奋起反抗。罢工从1月一直坚持到6月。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矿工们被迫停止罢工。沃尔什在《全国工人论坛报》上写道："我们被击败了"，"在我们的妻子儿女的无情需要下，被迫接受了"被削减的工资条件。[①] 即使这样，宾州法院仍将10名矿工判处了绞刑，暴露了法律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实质。

比这两次罢工更为艰巨的是1877年宾夕法尼亚铁路大罢工。危机期间，铁路工人被削减工资35%，大批工人遭到解雇和黑名单迫害，劳资冲突加深。1877年宾州铁路公司再度削减工资10%，激起工人更大义愤。7月16日，从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开始，罢工迅速在各铁路沿线展开。在匹兹堡，斗争最为激烈。罢工工人控制了线路，货运完全瘫痪。连前来镇压的当地民兵也加入了罢工行列。州长只得从费城调来600名民兵。在双方冲突中，26名工人当场身亡，全城为之震怒。工人潮水般地涌到枪杀现场，包围了民兵部队，迫使他们撤出匹兹堡。整个城市被工人控制了。州政府只得求助于联邦政府。海斯总统直接派遣联邦军队，终于在8月2日将罢工残酷地镇压了。为期两周的罢工使铁路公司的损失达500万美元。[②] 在美国历史上这是联邦军队首次镇压罢工运动。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促使联邦政府大大

① 方纳：前引书，第1卷，第670—678页。

② 雷贝克：前引书，第134—135页。

强化了国家的镇压职能。

70年代的罢工斗争对19世纪末美国工人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一部分觉悟工人开始认识到，联邦政府和两大党是资本家的忠实看守人，决不能幻想它们的慈悲。要争取工人的利益，只有加强工人自身的团结。必须弥补以往工会组织的严重缺陷，建立工会会费制度，以保证在罢工时发挥紧急的援助作用。70年代末以后的工会组织开始趋向严密化。这次罢工高潮主要发生在工业革命水平较高的东北部地区，特别是工人集中的纺织、煤矿和铁路等产业部门。这也证明这些地区和部门的工人开始摆脱旧的乌托邦幻想，走上实际斗争的道路。

这时期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仍大大低于东北部地区。1870年，该地区制造业的年产值仅为全国的18.7%①。工业集中现象仍不多见，工人的流动性较大，并且与小业主、农场主等阶层互为渗透。这使中西部的工人运动仍滞留在东北部70年代以前的水平。从全国范围看，家庭手工业与手工工场在制造业中仍占重要位置。1870年，手工产品占制造业总产量的50%。因此，许多旧式的行业工会组织在危机后仍能逐渐恢复。到80年代初，它们重新回到了旧的乌托邦改良主义轨道上去了。上述状况成为劳动骑士团影响扩大，特别是在中西部形成较大力量的社会基础。

劳动骑士团成立于1869年，是尤赖亚·史蒂芬斯领导一些服装工人所建立，全名为“神圣劳动骑士团”。骑士团接纳一切以工资收入为生的人，其中包括商人、雇主、农场主（不包括律师、医生和银行家)。这就决定了劳动骑士团是个成分复杂的改良主义团体。1873年危机后，劳动骑士团向中西部地区发展。

---

① 瓦特：前引书，第97页。

到1878年秋，骑士团组织已扩展到俄亥俄、伊利诺伊、印第安纳等州。一些在危机中濒于瓦解的工会组织也转入了骑士团。危机结束后，骑士团已成为当时美国容纳工人人数最多的组织。

1878年1月，骑士团在宾夕法尼亚州雷丁城召开首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所通过的章程进一步明确了骑士团的乌托邦改良主义宗旨。它在序言中宣称：工人只有把“每一个工业生产部门都组织起来”，才能避免赤贫化和享受幸福；为此，工人必须接受知识的指导；建立“生产与分配的合作制度”，最终实现劳资双方的和睦相处，公平分享果实。概言之，骑士团的基本原则就是“组织、教育、合作”。这样一个纲领“代表着工人阶级内部各种色彩的、个人的和地方的意见”。然而它是“美国实际上整个雇佣工人阶级的产儿，是把他们联合起来的惟一的全国性的纽带”。① 骑士团的这种复杂性在后来的实践中一再表现出来。

〔*劳动骑士团的发展与衰落*〕　劳动骑士团奉行的改良主义路线使之未能成为美国工人运动的主体，相反却随着大机器工业的发展而走向衰落。

1886年以前，骑士团领导集团热衷于合作运动。从1884年至1886年间，骑士团建立的合作社有135个，大多数是资金在1万美元左右的小型合作社，② 其经营的范围包括银行、杂货店、报社、作坊和工厂。这些合作社实验大多是在乡村或半乡村地区进行的。骑士团把这些实验看作是摆脱雇佣劳动、上升到业主地位的捷径。③ 但是，现实无情地打碎了他们的梦幻。“自由企业”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向垄断过渡的激烈竞争和货币短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0、261页。

② 雷贝克：前引书，第160页。

③ J.N.格罗勃：《工人与乌托邦》，奎德兰吉尔1960年，第46页。

缺的金融结构，使这些本小利微的合作社根本无法与大资本抗争。到1888年，骑士团的合作社已大多失败。骑士团苦心经营的合作社运动的失败，证明保存小生产、抵制大工业的努力是徒劳的。这从另一方面促进了美国工人运动之转变。

尽管乌托邦改良主义已成为死胡同，但是骑士团领导们仍然不肯改变初衷，并竭力反对组织以提高工资、缩短工时为目的的罢工斗争。骑士团大师傅（即总会长）特伦斯·鲍德利认为，提高工资是一种“浅见”，不过是“每天增加几分钱”而已。骑士团另一总会成员赖特宣称：增加工资、减少工时不会带来劳工的解放。[①] 他们还认为，任何罢工只能把工会搞垮。骑士团上层的这些观点，恰恰为资本家所利用，他们乘机加强对骑士团会员工人的压迫。骑士团下层决定改变这种破产了的政策。他们纷纷摒弃合作社运动，独立地展开了一系列罢工斗争。仅在1885年骑士团会员们所进行的罢工斗争就达196次。[②] 其中以1884年底至1885年初的密苏里太平洋铁路罢工较为突出。这个铁路公司的工人反对杰伊·古尔德两次削减工资，在骑士团地方分会的领导下举行了罢工，并得到铁路工人兄弟会的支持。铁路公司被迫停止削减工资，罢工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再次证明了骑士团守旧政策的破产，同时也扩大了骑士团的影响。大批工人涌入了骑士团，其人数从1885年的11万人猛增到1886年的72万人。这是骑士团的鼎盛时期。

骑士团的迅速发展，使之更加陷入了自我矛盾的境地。这种矛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骑士团下层要求改变原有政策和组织形式的离心倾向加强；二是以行业为基础的全国性工会兴起，吸

---

① J.N.格罗勃：《工人与乌托邦》，奎德兰吉尔1960年，第38页。

② 祖波克：《美国史纲》，三联书店中译本，1972年上册，第148页。

引着骑士团下层群众。骑士团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的两种冲突，尤其是骑士团与行业工会的冲突更为严重。骑士团旨在以合作制来取代雇佣劳动制；而工会则把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工作条件作为斗争目标。尽管这种宗旨都未脱离改良主义轨道，但工会注重实际经济利益的改良主义，比骑士团的乌托邦式合作运动更具有吸引力。在不同宗旨之下，二者的组织形式也截然不同。骑士团的主体组织是按地域、由不同行业组成的混合大会，并主要服务于政治目的。而行业工会却有利于工人的罢工斗争和集体谈判，更适合于当时工人运动的直接需要。骑士团的基层组织有许多是行业性的，容易接受行业工会的组织形式。于是，骑士团的内部分歧就同骑士团与各行业工会争夺工人群众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了。

1881 年，美国与加拿大有组织的行业与劳工联合会成立。其代表有 59 名来自骑士团，占代表的半数以上。这对骑士团本身发展构成了威胁。为了防止下层会员脱离，骑士团在 1882 年作出决议，鼓励下层组织建立全国性行业工会。这就与其他行业工会发生激烈冲突。1883 年至 1885 年，砌砖与石工、印刷、司机、铅管、制鞋、雪茄等行业工会纷纷与骑士团发生纠纷。到 1886 年，几乎所有的行业工会都指责骑士团领导集团。这场冲突最后导致了骑士团与各工会分道扬镳。由雪茄工会发起，各全国性行业工会联合组成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终于取代劳动骑士团而成为美国最大的工人组织。骑士团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了。

〔1886 年“五一”罢工和“秣市惨案”〕　80 年代中叶，美国工业革命进入最后的完成阶段。工厂制不仅在东北部，而且在中西部大湖区基本上确立。美国工人阶级不仅在人数上大大增加，而且其稳定性也大为增强。如恩格斯在 1887 年所指出的：

美国已经存在"一个新的、特殊的阶级，……即无产者的阶级。"① 这个阶级开始抛弃旧的乌托邦改良主义，转向同资本家直接对抗的经济斗争，并由此形成日益强烈的阶级意识。因此，美国工人运动在80年代迅速高涨。仅在1886年至1890年，共发生罢工6,000余起，参加的工人达200万以上。② 这次工人运动高潮的突出标志就是1886年"五一"大罢工为起点的八小时工作日运动。

自从劳动骑士团的合作运动受挫以后，新兴的行业工会就把八小时工作日作为主要目标提出来了。1884年至1885年，美国与加拿大有组织的行业与劳工联合会两次通过决议，规定在1886年5月1日在全国同时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经联合会的积极组织，全国有35万工人参加了这次总罢工。他们上街示威游行，要求实现八小时工作日。芝加哥是这次罢工斗争的中心，有4万多工人参加了罢工，还有45,000多工人虽未参加罢工，但自行缩短了工作日。整个罢工涉及到11,000多家企业，极大地震动了美国社会。由于劳动骑士团领导拒绝支持这场罢工，八小时工作日运动未能得到预期结果。但仍有18万工人实现了八小时工作日；20多万工人的工作日缩短到十小时和九小时。③

在这场运动影响下发生的芝加哥"秣市惨案"，是这时期美国工人运动的又一重大事件。1886年5月初，芝加哥麦考密克收割机工厂关闭，1,000多工人被解雇。工人们被迫举行罢工。5月3日，工人与工贼发生冲突，警察前来干预，当场打死4名工人，伤亡多人。翌晚，3,000名工人集会于秣市，工人领袖奥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84页。

② 沙伊贝等：前引书，第163页。

③ 方纳：前引书，第2卷，第103—104页。

古斯特·斯皮斯发表演说，抗议警察的暴行。集会临结束时，180名警察赶到会场。斯皮斯正与警方交涉，突然有人向警察投掷炸弹，警察死亡一人，受伤若干。芝加哥警察局立即以“炸弹案”为由逮捕斯皮斯等8名工人领袖。芝加哥和各地民主人士纷纷签名营救，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工人也集会声援芝加哥被捕工人。但伊利诺伊州政府竟断然将斯皮斯等4人处以死刑。斯皮斯等人在绞架上高呼：“让全世界人民听到美国人民的声音吧！”4名英雄牺牲后，有几万人送葬，这表达了人民对他们的崇高敬意。

“五一”大罢工及“秣市惨案”迅速提高了美国工人阶级的觉悟，极大地锻炼了美国工人的战斗力。同时，五月事件也向全世界揭露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凶残本质。他们不仅杀害了工人领袖，而且采用各种手段反攻倒算，取消八小时工作制，实行恐怖统治。恩格斯在1886年6月3日就指出：“地球上资产阶级的最后一个天堂正在迅速变成涤罪所，而只有刚成长起来的美国无产阶级的迅速发展，才有可能使它不致像欧洲那样变为地狱。”[1]为了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通过决议，正式规定每年五月一日为国际劳动节。从此，国际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共同节日。

〔纽约市竞选和亨利·乔治〕　在展开大规模经济斗争的同时，美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也发展起来了。1886年纽约市长选举运动就表现出工人的政治力量。这场政治斗争起因于1883年至1886年纽约市中央劳工联合会多次展开的联合抵制雇主的斗争。这种抵制斗争不久就发展为工会同法院的政治斗争。为了保证工人在政治上的权利和地位，1886年8月，纽约各个劳工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482页。

团体在中央劳工联合会的发起下，决定在即将到来的市长竞选中，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即组成“独立劳工党”，提名亨利·乔治为市长候选人，并由乔治本人制定竞选纲领。

亨利·乔治是个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学家。他在1879年发表的《进步与贫困》，提出了单一土地税理论。他认为，社会上贫富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者被剥夺了土地，在于土地垄断和地租。要清除贫困，必须实行土地国有化，对私有土地征收单一累进税，并逐渐消灭土地垄断现象。在乔治的竞选纲领中，除了一项有关司法程序的改革条款外，其他内容都是主张单一税的。马克思、恩格斯对亨利·乔治的理论有过深刻的论述。马克思认为，亨利·乔治的书“是拯救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的尝试”。[①] 他“在理论方面是非常落后的，他根本不懂得剩余价值的本质。”[②] 恩格斯明确区分了科学社会主义与乔治改良主义的本质区别，他认为，前者是“实行整个社会生产体系的全面的变革”；后者是“把现在的社会生产方式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仅仅把土地的分配调整一下”。[③] 经典作家对乔治理论的批判，同样适用于美国工人运动中的其他改良主义思潮。

尽管亨利·乔治所散布的是一种幻想，但他对美国现存秩序的尖锐批判和对工人处境的深刻同情，仍然博得了纽约各工会以至鲍德利、塞缪尔·冈珀斯等人的支持，有数以万计的工人阅读了《进步与贫困》。但是，由于“独立劳工党”缺乏竞选经验，民主党的坦慕尼厅又广泛使用贿赂手段，结果民主党候选人休伊特以9万多张选票当选为市长。亨利·乔治得到68,000张选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18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191—19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0页。

仍超过了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1] 乔治虽然落选了，但这次选举表现出纽约工人阶级敢于同两大党抗争的觉悟与实力。慑于工人参与政治的威力，纽约市立法机构匆匆通过了一系列劳工立法，对劳资关系稍作修补和调整。纽约市工人参与政党斗争的经验，促使其他重要城市在1886年底组成了新的工人政党，芝加哥、米尔沃基工人都参加了竞选运动。总的看来，1886年选举反映了美国工人阶级的不成熟性，他们还难以摆脱资产阶级民主和改良主义的深刻影响，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政党尚未出现。

1886年作为美国工人运动的重大转折点载入了史册。旧的乌托邦式的改良主义工人运动开始被产业无产阶级争取政治、经济地位和权利的直接斗争所代替。工人运动的范围从东北部扩展到中西部，工人的组织程度更高了。恩格斯评论说：在1886年，“美国社会发生了一次在任何其他国家至少需要10年才能完成的变革。”[2]

第二节　劳联的蜕变与90年代工人运动的高涨

〔*劳联的建立及其初期的政策*〕　80年代美国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淘汰了旧的劳动骑士团的纲领和组织形式。实践要求有一种更高形式的全国性工会组织。1886年成立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简称“劳联”）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

劳联的前身是1881年组成的“美国及加拿大有组织的各行业及工会联合会”。1886年12月28日，劳工联合会在俄亥俄州

---

① 方纳：前引书，第2卷，第1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5页。

的哥伦布城正式成立。有 25 个工人组织、12 个全国性工会的 42 名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代表着约 15 万名工会会员。[①] 大会通过的劳联章程明确指出："整个文明世界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所有国家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斗争。……如果工人不联合起来以求得保护和利益，千百万劳动者就会陷入极端悲惨的境地。"[②] 基于这种认识，劳联的宗旨就是积极建立从地方到全国，以至国际性的行业工会，"以便互相援助，并争取通过符合劳动人民利益的全国性立法"[③]。劳联的上述指导思想比劳动骑士团的合作社理论前进了一步，即把目标集中于直接经济斗争以改善工人地位。

在组织原则方面，劳联与骑士团有两个重大区别。一是会员必须是支持工会的雇佣劳动者，这使劳联成为纯粹的工会组织，不像骑士团那样成份繁杂。二是劳联不是按产业原则、而是按狭隘的行业原则建立的，这造成若干个行业工会并存于一个企业，难以统一行动。劳联组织的这两个特点说明它具有新旧交替的两重性。一方面表现出雇佣工人阶级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阶级意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熟练技工维护其既得利益的保守意识。这种两重性影响到劳联后来的发展趋势。

在劳联成立大会上，塞缪尔·冈珀斯被选为执委会主席。冈珀斯 1850 年生于伦敦的一个卷烟工人家庭，10 岁开始当学徒，故较早受到英国工联主义思潮熏陶。1863 年移居美国，不久加入纽约市雪茄工人工会。1875 年当选为雪茄工会的一个基层组织的主席。1877 年罢工失败后，冈珀斯开始改组工会。他加强

---

① F.R. 杜勒斯：《美国劳工史》，纽约 1955 年，第 161 页。

② F. 塔夫脱：《冈珀斯时代的劳联》，纽约 1957 年，第 61 页。

③ 方纳：前引书，第 2 卷，第 142 页。

了上层工会对基层组织的管辖权，健全了会费制和储备基金制度，使会员在遇到不测和参加罢工时有一定的保证。这些措施稳固了工会组织，使雪茄工会成为劳联的核心组织之一。1881 年，冈珀斯又当选为美一加行业与劳工联合会的组织委员会主席，在更大范围内推行了雪茄工会的经验。冈珀斯的组织才能使他在各工会中赢得较高威信，因此，从 1886 年起，除了 1895 年以外，冈珀斯终生担任劳联主席职务，一直到 1924 年去世。

劳联在取代骑士团成为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以后，采取了一些促进工人斗争的政策。1888 年末，劳联决定重新开展八小时工作日运动。1889 年，在冈珀斯的建议下，木工工会首先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翌年 5 月 1 日，许多工会以游行、募捐的方式支持木工斗争。结果是 137 个城市的 4 万多名木工争得了八小时工作日，近 3 万名工人的工作日减到了 9 小时。

在对待黑人加入工会的问题上，劳联自始就存在着两重倾向。起初，劳联否定了完全排斥黑人入会的做法。例如，1890 年，劳联拒绝对实行种族歧视的机械工会发给执照，另建承认黑白工人平等的新机械工会。在 1893 年锅炉、造船工会加入劳联时，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同时，劳联对黑人实行了单独组织黑人工会的做法，使黑人不能得到白人工会的有力支持。这又表现出劳联的种族歧视倾向。

从开始起，劳联政策中的根本错误就是反对进行政治斗争，拒绝建立工人政党，对社会主义运动持敌视态度。劳联内部的社会主义者曾同这种政策展开斗争。在 1893 年的芝加哥大会上，托马斯·摩根提出著名的“十一点政治纲领”，其核心是“全部生产资料和分配手段归全民集体所有。”当时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这项纲领。但是冈珀斯为首的劳联上层决心抵制这个纲领，并认

为这个纲领关系到劳联的前途。[1] 1894 年底，冈珀斯等密谋策划，将“政治纲领”实际上加以否决。1895 年劳联的决议宣称：“美国劳工联合会没有政治纲领。”[2] 劳联彻底地抛弃政治纲领，使其从一般的改良主义开始转向机会主义。

劳联初期政策曾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它致力于改善工人的经济状况，通过经济斗争来团结和教育工人，并形成较有力的全国性工会组织。但是，劳联排斥占大多数的非熟练工人，使美国工人阶级队伍陷入分裂。它崇尚经济斗争而拒绝政治斗争，使之停留在自发阶段，成为一个新工联主义的组织。劳联主张不触动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制度，对社会主义抱有顽固的敌视态度，严重阻碍了美国工人运动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冈珀斯声称：“除了增加每一美分的工资外，其他的目的是没有的。”劳联政策的局限性必然导致其后期的完全蜕变。

〔排斥非熟练工人的政策〕　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劳联不断加强其排斥非熟练工人的政策。首先，劳联在 1894 年至 1896 年先后接纳了拒绝黑人入会的机械、锅炉、造船等工会。至 1900 年，劳联章程也作了重大修改，公开规定组成单独的有色人种工会，然后再发给劳联执照。冈珀斯宣称，将黑人与白人工人隔离，对整个工人运动都是最合适的，可以避免“引起不愉快。”[3] 至此，劳联把种族歧视作为一种政策固定下来。在劳联上层的怂恿下，许多劳联基层负责人公开宣扬白人沙文主义。他们污蔑黑人“粗笨”，是“天生的罢工破坏者”，因而“完全不适合加入工会。”[4] 一些工会甚至同雇主们达成秘密协定，在许多

① 格罗勃：前引书，第 178 页。
② 塔夫脱：前引书，第 73 页。
③ 方纳：前引书，第 2 卷，第 455 页。
④ 方纳：前引书，第 2 卷，第 463 页。

工种上都写明“只雇白人”。据不完全统计，几乎所有的技术工种，如电气、煤气、管道安装、各种司机、起重与升降机驾驶员、机械工等几十种熟练和半熟练工种完全排斥了黑人。即使在同样工种内，黑人的工作时间更长而工资更低。可见，劳联的种族歧视政策直接加强了资本家对黑人的压迫。

劳联对移民工人、女工的排斥也是触目惊心的。移民工人大部分是非熟练工人，劳联对他们同样采取排斥、敌视的政策。劳联上层借口“新移民”不能适应工会组织，容易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等，制定了一系列阻碍移民工人加入工会的措施。例如要求移民工人必须具有美国公民身份、交纳100至500美元的入会费、经全国工会领导人批准、接受文化测验等。劳联甚至与国会、联邦移民局合伙使用立法和行政手段歧视移民工人。在这种情况下，移民工人很少有机会成为熟练工人。据统计，在1903年的全部移民中，只有14.5%成为熟练工人。① 劳联对女工也采取了许多苛刻条件，使她们极难加入工会。女工们由于缺乏工会保护和集体斗争的力量，其工资水平要比男工少1/4至1/2。在1900年，全国受雇用的女工达500万人，她们的低廉工资为雇主们带来了超额利润。②

大机器工业使各工种更紧密地联结起来，行业工会在大企业中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工人斗争的新的需要。劳联上层却坚持行业工会的形式，由此造成各行业工会之间频频发生管辖权之争。对这些争端，劳联多次裁决“所有工会会员都应属于各自的行业工会。”③ 劳联将这种陈旧的组织形式一直保持到20世纪30年代，

① 方纳：前引书，第2卷，第467页。

② 方纳：前引书，第2卷，第473—474页。

③ 塔夫脱：前引书，第187—188页。

顽固地抵制产业工会的发展，其实质是为了保持熟练工人的特权地位和既得利益。大部分工人被排斥在工会之外，到 1900 年，美国有组织的工人仅 79 万，占全部劳动力的 2.7%。[①] 可见，劳联排斥非熟练工人的政策是美国工人运动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

劳联的这种政策大大加强了熟练工人“贵族化”的趋向。在 90 年代，美国熟练工人约占全部劳动力的 12% 至 14%，他们的工资水平比非熟练工人高出一倍以上。[②] 而有组织的熟练工人不足全部劳动力的 3%，其工资水平更是大大高于其他 97% 的工人。至于劳联上层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已资产阶级化了，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人贵族。劳联的政策压低了非熟练工人的就业条件和工资水平，使垄断资本能够从源源不断的高额利润中拿出极小部分来满足这些工人贵族的私利。作为交换条件，劳联则使非熟练工人处于无组织的状态。劳联蜕变为典型的工人贵族组织，对 20 世纪美国工人运动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这是向垄断过渡时期美国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现象。

〔*劳联的阶级合作政策*〕　劳联蜕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行劳资合作、为垄断资本辩护的政策。早在 1883 年，冈珀斯等人就公开赞成雇佣劳动制，认为“雇主有权得到一份利润。”[③] 因此，“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相互敌视是毫无必要的。”[④] 进入 90 年代以后，劳联领导人不仅对当时席卷美国的反托拉斯运动十分冷漠，而且公开站出来为托拉斯辩护。当时劳联内部的左

---

① 李和帕塞尔：前引书，第 342 页。

② 《美国历史统计》，第 168 页。

③ H.C. 利夫赛：《冈珀斯与美国有组织的劳工》，波士顿 1978 年，第 125—126 页。

④ 卡尔·戴格勒：《形成现代美国的诸力量》，纽约 1970 年，第 267 页。

派代表们已提出：随着托拉斯迅速兴起，工会必须采取新的政策，否则劳工运动就会受挫，甚至出现连续几十年的低潮。[①] 劳联上层对这些强烈呼吁无动于衷，认为是杞人忧天，并坚决反对在垄断企业中发展工会组织的主张。他们认为托拉斯并未危及熟练工人利益，组织大型工会，只会引起激烈的阶级对抗。这样，劳联领导坐失了一个使美国工人运动得到广泛发展的良机。

垄断资本十分重视寻求劳联上层的好感和支持，希望由他们出面来说明托拉斯对工人的好处。冈珀斯等人则甘愿效劳。在1899年芝加哥公民联合会举办的州际托拉斯会议上，冈珀斯和服装工会总书记亨利·怀特一致认为，只有公司数目受到限制并消灭竞争，才能保证高额利润；资本家也才能付出高额工资。因此，工人与托拉斯并无争执，他们只要求“分享利润”。[②] 他们的观点受到资产阶级报刊的热烈赞扬，他们一再被邀请向全国各地的企业组织发表演说。而劳联的基层组织和下层会员对此却异常愤慨。他们称冈珀斯等人是“劳工运动的寄生虫和叛徒”、“托拉斯的工具。”[③] 冈珀斯等人对工人们的抗议不屑一顾。他们继续施加影响，阻止劳联加入广泛发展的反托拉斯运动，并警告其下属组织不得用劳联名义发表任何反托拉斯的声明。

在人民党运动和普尔曼罢工中，劳联的阶级合作政策表现得尤为突出。从1890年开始，劳联就抵制人民党运动。他们声称人民党是“富裕农场主的党”，实际上是坚持不参与任何政治斗争的立场。人民党在其纲领和实践中都支持工会运动，劳联基层组织也认为应与之联合行动，但冈珀斯依然拒绝与人民党结成任

---

① 方纳：前引书，第2卷，第479—481页。

② 方纳：前引书，第2卷，第487—488页。

③ 方纳：前引书，第2卷，第490页。

何同盟。直到1896年选举，劳联还作出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支持工人的独立政治行动。对此，当时著名作家亨利·劳埃德发表评论，指出劳联领袖们的作用是“保证工会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政党”，他们“起带头羊的作用，以防止工人群众脱离控制。”[①] 这些评论是一针见血的。

对于1894年普尔曼罢工，劳联一直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当芝加哥铁路工人浴血搏斗，迫切需要全国工人声援时，劳联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到铁路工人精疲力尽时，冈珀斯才前往芝加哥去“仲裁”，假惺惺地提出由劳联捐赠1,000美元，资助罢工领袖德布斯作为诉讼费用。罢工失败后极为困厄的铁路工会会员们仍未得到劳联的分文相助。劳联之所以采取如此冷酷的做法，是因为德布斯领导的铁路工会是个产业工会，它与劳联所属的铁路兄弟会处于竞争地位。趁罢工之机来削弱铁路工会，也就消除了对劳联行业工会原则的现实威胁。冈珀斯本人也承认，他在这次罢工中的方针就是尽最大努力以维护铁路兄弟会的完整。[②]

1900年10月，垄断资产阶级决定召开“全国公民联合会”，参加者主要是大企业家、保守的舆论界人士和以劳联为代表的劳工领袖。会议主持者拉尔夫·伊斯利在给冈珀斯的信中，申明会议的宗旨是在互谅的基础上，调整劳资关系。冈珀斯为首的29名劳联代表出席了会议。有名的“总统制造者”马克·汉纳担任联合会主席，冈珀斯则是第一副主席。在会议中，伊斯利和冈珀斯经过一夜密谈，达成了劳资合作的默契和妥协：劳联拒不过问政治并力图使工会具有保守色彩；而企业界的让步则是允许在大

---

① 方纳：前引书，第2卷，第444页。

② 塞缪尔·冈珀斯：《七十年生活与劳工》，纽约1962年，第1卷，第414页。

公司内组织工会。[①] 从此，阶级合作成为劳联的基本方针。

〔劳联蜕变的社会根源〕　劳联的蜕变是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是由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在诸因素中，美国工人阶级的特殊构成尤应注意。同时，工厂制的确立、垄断资本形成、资产阶级对劳工政策的转变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思潮变化都起了重要作用。

如前所述，劳联形成、发展于美国工业革命的最后完成时期，同时又是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时期。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对美国工人阶级构成、尤其是熟练工人的地位产生极大影响。一方面，大批旧的熟练工人即手工工匠或半手工技工被大机器生产所淘汰，开始沦为半熟练工人或非熟练工人；另有一部分熟练工人则适应了大机器生产，进入了新的技术部门和工种而转变为新熟练工人。新熟练工人为了避免重蹈旧熟练工人的覆辙，就以工种、行业为基础，形成了一系列保护自己利益的行业工会。因此，作为这些行业工会的集合体，劳联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

另一方面，迅速发展的美国工业造成了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它同19世纪末涌入美国的移民高潮相结合，形成了美国工人阶级的一个新阶层。在19世纪70年代，进入美国的移民为300万人；80年代为550万人；90年代为400万人。[②] 30年内共进入移民1,250万人。“新移民”进入机器生产的大企业，成为非熟练工人的主体。资本家以比本地工人低得多的工资雇佣这批移民工人，使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产生了利益差异。原来就以保持熟练工人地位为宗旨的劳联，力图扩大这种差异。因此在组织

① 方纳：前引书，第2卷，第499—500页。

② 《美国工业委员会报告》，华盛顿1902年，第19卷，第957—961页。

形式上加强了排斥非熟练工人的措施，使非熟练工人尽可能处于无组织状态。于是，劳联从保护既得利益出发，转向了同资本家一起排挤非熟练工人的轨道。

同时，以“老移民”为主的熟练工人大多是盎格鲁—新教—白种人，他们把“新移民”和黑人看作是一种异己力量。原有的经济利益摩擦又同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冲突纠缠在一起，使美国工人运动更加难以统一。劳联的政策恰恰与美国资产阶级对工人“分而治之”的策略相吻合，实际上成为维护美国资本主义秩序的卫道者。劳联政策阻碍了美国工人运动向广度发展，致使大多数工人被排斥在外；亦难以向深度发展，使工会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互相分离，无法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

劳联的蜕变是美国工人贵族阶层形成的直接表现。劳联所代表的熟练工人，不足美国工人总数的10%，而他们的工资水平却是非熟练工人的几倍。至于劳联的上层，通过高额会费制度和垄断资本给予他们的优惠待遇，其收入又是普通熟练工人的几十倍，从而形成了一小部分高踞工人之上的工会官僚。加上一批被资本家收买了的监工、工头和工贼，形成了一个特殊阶层。这个阶层从思想上和生活方式上都资产阶级化了。他们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同垄断资本分享高额利润中的极小部分，因而把保存垄断资本主义视为自己的护身符。

劳联上层不仅阻止工人同资本家发生真正的对抗，而且在政治上麻痹工人群众，起到了两大党所不能起的作用。冈珀斯的著名口号就是：“酬报你的朋友，惩罚你的敌人。”无论两大党中哪一个，只要接受劳联所提出的某些经济要求，劳联就尽力为这个大党拉选票；反之，则在选举中加以报复。冈珀斯自认为这证明了劳联的力量，两大党中哪一个都离不开它。这实际上恰恰是使劳联堕落为两大党的附庸，从而使第三党，不论是改良主义的人

民党还是社会主义劳工党，都难以形成强大的抗衡力量。劳联对美国扩张主义政策也热烈支持，说明它在内外政策上都追随资产阶级。它受到白宫和华尔街的青睐，也就不足为奇了。曾经叫嚷要对罢工"像镇压巴黎公社那样进行镇压"、"把他们的十来个领袖弄到墙前枪毙"的西奥多·罗斯福，在1901年入主白宫以后，对冈珀斯大为赞赏，称他为"最好的公民"，两人结为盟友。[1]冈珀斯在全国公民联合会中的所作所为，更是博得整个垄断资产阶级的一片掌声。

总之，美国工人阶级的特殊构成，是劳联蜕变的重要前提；这种构成又同19世纪末特定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导致劳联蜕变。这证明了帝国主义阶段的一个共同趋向，即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有可能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2]

〔90年代工人运动的高涨〕　工人运动并不因为劳联的阻挠而停止下来。进入90年代后，美国工人又发动了一系列重大的罢工斗争。这些罢工同1893年危机相结合，表现出向垄断过渡的最后时刻社会阶级斗争空前激烈。其中最有意义的是1892年霍姆斯特德钢铁工人罢工和1894年普尔曼铁路大罢工。

霍姆斯特德钢厂属卡内基钢铁公司。厂内熟练工人大部分属于钢铁工人混合协会，他们曾取得为期3年的工资协定。到1892年协定期满。厂方决定借机打击工会，削减了325名熟练工人的工资。到6月30日，厂方解雇工人，并招来300名平克顿[3]密探"保护工厂"。工人们决定以罢工回答资本家的挑战。熟练工

---

① 亨利·普林格尔：《西奥多·罗斯福》，纽约1938年，第124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822页。

③ 私人侦探组织。全名为平克顿全国侦探署。由艾伦·平克顿于1850年建立。19世纪后叶，在中西部专以协助资本家破坏罢工而著称。

人与非熟练工人摒弃成见，联合起来保卫共同利益。7 月 6 日晨，工人们与平克顿密探展开激战，把他们逐出霍姆斯特德，钢铁工会控制了整个城市。卡内基公司只得向宾夕法尼亚州长紧急求援。州长派出8,000 名国民警卫队，将1,000 名外地工人护送进厂。罢工工人仍然不屈，同厂方进行了长达 4 个月的法庭诉讼。工人虽然胜诉，但经济上消耗过重，元气大伤，至 11 月 20 日被迫复工。这次罢工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大机器生产发展，使熟练工人在企业中的重要性削弱，资本家能够随时雇用大批非熟练工人来恢复生产。这也暴露出熟练工人的行业工会存在着致命弱点。罢工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劳联领导人的变节。他们在罢工斗争的关键时刻，拒绝在其他工业部门中组织工人声援，使霍姆斯特德地区罢工工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次罢工失败，不仅结束了该厂的工会活动，而且导致钢铁工人混合协会全面衰落。到 1901 年，钢铁业工人共有 16 万，但工会会员不足 1 万。[①]

在 1892 年，还爆发了另外三次较大的罢工斗争，即爱达荷州的科达伦银矿罢工、纽约州布法罗铁路扳道工罢工和田纳西州东部煤矿矿工反对囚犯劳动制度的斗争。这些工人斗争都在联邦军队和州民兵的镇压下失败了。一系列失败表明，资本家越来越依赖政府的暴力机器，对工人阶级进行残酷镇压，整个力量对比对工人阶级日益不利。

1893 年危机爆发使劳资冲突进一步激化。工人阶级在这次危机中遭到极沉重打击。到 1893 年底，119 个城市中的失业工人

---

① 路易斯·L. 罗文：《美国劳联的历史：政策和前景》，华盛顿 1933 年，第 63 页。

已达 300 万。[1] 大批失业工人形成一支新的抗议力量。他们纷纷自发地徒步行进到首都华盛顿进行请愿，其中以雅各布·柯克西率领的“饥饿大军”最为著名。柯克西本人是俄亥俄州的一个制造商。危机期间，他提出一项改革计划，以增加绿背纸币发行量为资本，举办公共工程来安置失业工人。这项计划比以往的国家干预政策更前进了一步，即要求国家直接组织劳动力市场，并将此同对生产、金融的干预结合起来。极端保守的克利夫兰政府对此毫不理睬。于是，柯克西在 1894 年春，率领 500 多名失业工人从俄亥俄州的马西隆出发向首都华盛顿进军。5 月 1 日，“饥饿大军”进入华盛顿举行请愿。警察借口队伍进入国会大厦地带，强行驱散了请愿队伍，并扣押了柯克西本人。“柯克西进军”失败了。他的改革计划在当时也未免失之于天真，但是这种改革思想却是后来 30 年代“新政”中“以工代赈”的最初萌芽。

普尔曼罢工是 90 年代工人斗争的高潮。危机爆发后，普尔曼公司削减了工人工资的 22%，但房租及其他费用丝毫不减。工人们不堪忍受，与公司进行交涉，遭到拒绝。于是在 1894 年 5 月 11 日，普尔曼工人全体罢工。普尔曼工人大都属于尤金·德布斯领导的铁路工会，该工会按产业原则建立，当时已有 15 万人。铁路工会立即对普尔曼工人进行声援。6 月 26 日，西部各铁路线 6 万名工人参加罢工，整个西部运输陷入瘫痪。联合抵制很快就扩展到南部和东部。各铁路公司也决定以联合行动来压制罢工工人。拥有全国 24 条干线，资本达 8 亿多美元的铁路经理联合总会决心支持普尔曼公司，以此来消除德布斯为首的铁路工会的威胁。[2] 联邦司法部长理查德·奥尔尼本人就是几条铁路的董事，

---

① 方纳：前引书，第 2 卷，第 235 页。

② R.O. 博耶等：前引书，第 126 页。

他坚决站在经理联合总会一边，用“一切合法手段”来粉碎罢工。奥尔尼罗织了所谓“罢工是阴谋限制贸易”的罪名，企图援引反托拉斯法的有关条例对罢工领袖提出起诉。7月初，芝加哥的联邦地区法院颁布禁令，禁止任何人“干涉”芝加哥各铁路线的一切业务。这项禁令遭到罢工工人的有力抵制。该法院只得请求克利夫兰政府派遣联邦军队前往弹压。7月4日，联邦军队进入芝加哥，当地政府又派遣了2,600名法警和5,000名州民兵协助弹压。由铁路公司承担这些军警的全部费用。大批工人愤怒地聚集在车场和轨道上，烧毁货车和货物，流血事件不断发生，局势极为混乱。联邦军队不断增加，最多时达14,000人。而在罢工工人方面，却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声援。劳联领导拒绝了德布斯的求援呼吁，认为同联邦军队进行斗争是没有前途的，应停止罢工。形势对工人极为不利。德布斯等工人领袖被捕，工人及家属贫困难忍，铁路工会日趋瓦解，这次罢工终于失败了。

1894年普尔曼罢工显示了美国铁路工人的伟大力量，它震撼了刚刚确立的美国垄断资本，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次罢工揭示了无产阶级同垄断资产阶级在整体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联邦和州政府在这种斗争中不惜一切代价、动用各种手段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劳联上层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则充分暴露出为垄断资本效劳的本来面目。90年代美国工人运动在规模上大大超过了80年代，但是工会组织的形式基本上停留在80年代，少数产业工会也在这次斗争中严重受挫。美国工人运动终于未能在90年代危机中进入新的阶段，而在危机以后则陷入了长期消沉之中。

〔资产阶级改良政策及其作用〕　面对汹涌澎湃的工人运动，资产阶级内部一些较有远见的代表人物意识到，单纯依靠镇压是无济于事的，需要辅之以调和政策。早在1878年，国会调

查罢工的专门委员会主席、制铁业巨商艾布拉姆·休伊特就指出："一股新的势力已经进人工商界，我们必须承认这股势力……资本已做好了同劳工讨论问题的准备。"① 8年后，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写道："迟早必须承认"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因为"工会对劳动与资本都是有利的。"因此，劳资关系"必须重新作出某些调整。"② 某些垄断资本家认为，"秣市惨案"只是劳资双方一系列冲突的开端。③ 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马克·汉纳甚至疾呼："必须改变传统政策，否则工人将把我们送上绞架！"所有这些说明，改变单纯镇压的做法已势在必行。而且，英国等欧洲国家所实行的改良政策已起作用，为美国资产阶级提供了借鉴。

从70年代开始，有关劳工的改良立法逐渐从各州向联邦政府扩展。在1874年，马萨诸塞州就订立了缩短女工童工工时的立法。纽约州在80年代也实行了厂房安全法。从1886年至1900年，除南部以外，各州相继推行各种劳工立法，其中包括工业纠纷仲裁法、童工法、女工法、安全工厂法、事故责任法及工时法等。联邦政府为了及时地处理劳资冲突，在1884年建立了劳工局，作为调查和仲裁劳工问题的一个部。为了防止各地罢工影响到联邦政府本身，在1892年实行了联邦雇员的八小时工作日。1898年国会又通过立法，规定州际运输中劳资冲突由联邦仲裁。上述改良立法虽属扬汤止沸之举，但它们毕竟是工人斗争的成果，相对改善了工人的处境；也为20世纪社会改良提供了经验。

---

① A.C.柯克兰：《工业成熟，1860—1897年的企业、劳工及政府政策》，纽约1961年，第397页。

② 丹尼尔·纳尔逊：《经理与工人，1880—1920年美国新工厂制度的起源》，威斯康辛1980年，第51—52页。

③ 莫里森、康马杰：前引书，第2卷，第169页。

同时表明垄断资产阶级不得不采用各种手段来保持平衡了。

资产阶级改良政策不仅通过立法来体现，还表现在垄断资本家直接拉拢和收买工会领导人和熟练工人上层，竭力培养工人贵族。如前所述，1900 年全国公民联合会上资产阶级与工会代表达成默契。垄断资本家承认熟练工人的工会，在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诸方面作出让步；而劳联领导人则同意不在大企业中“制造事端”，不反对金融资本的经济控制，不从事独立的政治活动。垄断资产阶级政策变化和劳联的蜕变同时发生，说明向垄断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①

垄断资产阶级政策变化的另一个深刻的原因，在于这种政策也适应了大资本在竞争中排挤中小资本的需要。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和改善劳动条件，必然增加生产中的劳动成本，这对于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中小资本当然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在新兴的重工业部门占据优势的垄断资本把阶级调和政策当成打击中小企业的一种手段，从而加速了垄断确立的进程。恩格斯指出：“所有这些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使资本加速积聚于少数人手中和消灭那些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不能维持下去的小竞争者的一种手段。”因此，“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鼓吹和平和协调了。”② 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正确地揭示了垄断资产阶级改良政策的深刻根源和多重影响。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3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73—274 页。

第三节　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

〔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初发展〕　早在19世纪50年代，约瑟夫·魏德迈等人从德国移居美国，为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主要是在弗里德里克·阿·左尔格等人建立第一国际支部以后。1867年，左尔格写信给马克思，表示要建立第一国际美国支部的愿望，得到了马克思的支持。同年10月，左尔格领导的共产主义俱乐部成为第一国际在美国的第一个组织。翌年，共产主义俱乐部又同德籍工人总会合并，成立纽约社会党，但该党存在仅数月就解散了。[①] 1869年，第一国际在美国的3个支部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第一国际北美临时中央委员会，左尔格当选为通讯书记。从此，第一国际北美支部进入了发展时期。

1872年7月6日，北美支部在纽约举行首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北美联合会，下属22个支部，近2,000名会员。[②] 其章程规定，每个支部内雇佣工人比例必须达到3/4以上，应积极支持工会活动。[③] 这种正确的政策使北美联合会得到稳步发展。至1873年，东北部和中西部的主要工业城市都已建立起第一国际的支部。但北美联合会在组织上有严重缺陷。一是主要骨干大多是德籍移民，存在着浓厚的宗派倾向。二是各种中产阶级改良派纷纷加入其中，削弱了组织的无产阶级性质。这两个缺陷对后来的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有很大的消极作用。

---

① H.奎特：《美国社会主义的形成》，印第安纳波利斯1964年，第9页。
② 巴赫等著：《第一国际》，三联书店1981年中译本，第2卷，第510页。
③ 尤·切斯克洛夫：《第一国际》，三联书店1974年中译本，第280—281页。

1873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第一国际北美联合会实际上成为失业工人运动的组织核心。它发动和领导了1874年1月13日的纽约汤普金斯广场示威游行。这次斗争在警察突袭下失败了，仍显示了第一国际各支部在美国工人阶级中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同时，第一国际还努力同全国劳工同盟加强联系。但是，劳工同盟一方面表示"坚持国际工人协会的诸原则"；另一方面，却否决了加入第一国际的决议案。① 直至劳工同盟趋于瓦解，仍未真正接受第一国际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

第一国际美国支部共存在了近十年。尽管它没有获得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它对社会主义传播仍起了重要作用，并增强了美国工人阶级与欧洲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到1876年，第一国际由于历史条件变化而宣布解散，北美支部的大部分成员亦转入了美国工人党即后来的社会主义劳工党。

美国社会主义劳工党是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拉萨尔派妥协的产物。70年代以后，随着外籍移民大量增多，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尤其是拉萨尔主义也渗透到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之中。拉萨尔从所谓"铁的工资规律"出发，否定工会组织和经济斗争；主张在国家帮助下建立合作社，依靠政治选票来取得解放。70年代危机期间，拉萨尔观点泛滥一时。当时建立的伊利诺伊劳工党和北美社会民主工人党都以拉萨尔观点为其行动纲领，但在1874年选举中均告失败。以此为契机，第一国际美国支部与伊利诺伊劳工党开始走向联合，并在1875年拟定了把社会主义组织联合为统一政党的计划。1876年7月，美国的社会主义者连续召开两次会议，完成了建立统一政党的准备工作，并

① A.C.约翰逊：《俄国革命前美国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纽约1974年，第40页。

于7月22日正式成立了美国工人党，代表着约3,000名美国社会主义者。在左尔格、魏德迈等人影响下，其党纲采取了第一国际的工会政策，决定首先致力于改善工人状况的经济斗争。但是，设在芝加哥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则被拉萨尔派所控制。美国工人党内部从开始就存在着对立的政策和观点之间的斗争。

〔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思潮斗争〕　70年代末以后，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思潮斗争日趋剧烈。同拉萨尔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使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呈现出曲折的发展趋势。

美国工人党建立以后，拉萨尔派的控制力量逐渐取得优势。1877年12月，该党改名为社会主义劳工党。拉萨尔派的帕尔顿当选为全国书记。原来的党章被修改，党的指导原则变成了拉萨尔派的信条："科学是兵工厂，理性是武器，选票是弹药。"在1878年选举中，该党一度获得较多选票。但是1879年经济转向繁荣，劳工党的选票迅速下降。党员人数也从10,000人减到2,600余人。[①] 由于党的力量迅速削弱，一些领袖人物开始对政治行动感到失望。其中一派向右转向完全脱离政治的单纯工联主义；另一派则主张放弃选举，放弃工会组织和经济斗争，而代之以工人的武装行动。这部分极端派就成为美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开端。

美国无政府主义同样具有国际背景。许多来到美国的移民都曾受到过本国政府的迫害。例如来自德国的移民曾受到1878年俾斯麦"非常法"的迫害；来自俄国和意大利的移民亦遭本国政府的镇压。这些移民往往带有绝望的情绪，把诉诸暴力和恐怖手段作为惟一的斗争手段，成为无政府主义思潮在美国的社会基础。

---

① 卡尔·里夫：《丹尼尔·德里昂的生平及其时代》，纽约1972年，第35页。

早在1875年，芝加哥的一些社会主义者就成立了一个武装团体以抵抗警察镇压。1877年铁路罢工中，社会主义劳工党的许多党员也参加了这个运动。不久，劳工党内就武装行动问题发生分歧，并导致1880年的分裂。纽约的少数极端派在1880年脱党并成立社会革命党人俱乐部。这种分裂组织很快向其他城市蔓延。其中以阿尔伯特·帕森斯和奥古斯特·斯皮斯领导的芝加哥俱乐部最为著名。1881年，这些分裂组织在芝加哥成立社会革命党，其纲领声称按“共产主义原则”组织工会；谴责参与投票选举；并把武装斗争作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武器。这个分裂组织和极左纲领大大加剧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内部混乱。

1882年，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约翰·莫斯特来到美国，旋即成为美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公认领袖。1883年，他们在匹兹堡成立所谓“国际工人协会”。[1] 该协会通过了莫斯特起草的宣言，强调“用一切手段……来摧毁现存的阶级统治”，“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2] 这个分裂组织使社会主义劳工党难以保持其组织的完整。到1883年，劳工党只有1,500名党员了，而无政府主义的“国际”则号称拥有7,000会员。同时，无政府主义者还渗透到一些工会组织中，仅在芝加哥，“国际”控制的工会会员就有5,000名至6,000名。至1885年，其势力盛极一时。然而，1886年的“秣市惨案”使无政府主义大失人心。许多无政府主义的支持者开始意识到这种思潮的危害。“国际工人协会”开始走向衰落。

由于拉萨尔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泛滥，社会主义劳工党一直

---

① 该组织的英文全称为 International Working People' s Association. 与第一国际原名：International Workingmen' s Association 不同。

② 方纳：前引书，第2卷，第39页。

未能得到真正的巩固和发展。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个党只有一个虚名，因为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它在美国任何地方都没有作为一个政党出现。而且它对美国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外来的。"①因此，他们"不了解怎样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推动美国人民大众前进的杠杆。"②

〔社会主义运动与工会的关系〕　8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劳工党尽可能地排除拉萨尔派的干扰，在各工会中积极活动，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劳工党参与了许多行业工会和城市中央工会的建立过程。例如，家具工人协会曾是第一国际支部建立的工会组织。到1884年，该工会仍号召其会员"加入以社会主义劳工党纲领为基础的独立劳工党。"③ 1882年建立的中央工会，其纲领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精神"，并在工人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886年，已拥有207个附属工会，共15万会员。这些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同样具有现实的社会基础。

但是社会主义劳工党始终未能深入当时的主要工会组织骑士团和劳联，未能将它们争取到社会主义方面来。劳联内部的社会主义者，曾多次提出建立独立工人政党的议案，但屡遭否决。社会主义劳工党与劳联上层的矛盾遂日益激化。在纽约中央工会内部，骑士团与劳工党的支持者也发生分裂。劳联的冈珀斯又插手这场纠纷。于是，劳工党与上述两个主要工会陷入更复杂的冲突纠葛之中。到1889年，冈珀斯断然拒绝深受劳工党影响的纽约中央工会加入劳联。在1890年劳联代表大会上，劳工党的卢西恩·萨尼尔与冈珀斯展开了长时间激烈辩论，结果是萨尼尔被大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89—39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纽约1953年，第161—162页。

③ A.C. 约翰逊：前引书，第47页。

会取消了代表资格。这次斗争表明劳联采取了与劳工党公开决裂的立场。

劳工党在劳联内受挫，激怒了党内以丹尼尔·德里昂为代表的宗派主义集团。德里昂曾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法讲师，于1890年加入社会主义劳工党，旋即成为党内领袖。他认为，继续争取劳联已毫无意义。1893年他著文于党的《人民》周刊，号召劳联中的劳工党员退出劳联。他写道："事情已经完全清楚了。……要教育和团结他们是根本不可能的。社会革命一定要踏着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前进……"[①] 德里昂的这些过激言词大大恶化了劳工党与其他工会的关系。德里昂为了推进"社会革命"，又转向争取早已衰落的劳动骑士团。但亦未奏效。到1895年，劳动骑士团亦与劳工党分道扬镳了。在劳工党的下层，仍有一些党员继续在劳联中工作，例如1893年提出劳联"政治纲领"的摩根等人。但他们的主张在劳联和劳工党两方面都得不到支持。劳工党争取工会的努力竟付诸东流。

德里昂面对困难的形势，开始建立社会主义行业与劳工联盟。1895年12月，这个新组织成立，提出"政治和经济运动并进"的原则。但是，在实际中很难实行这个原则。劳工党在1896年代表大会上又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劳联和骑士团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缓冲器"；同时号召全国的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行业与劳工联盟的"革命精神灌输到所有的工人组织中去"。[②] 这项决议意味着劳工党的工会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即开始实行"双重工会"政策。这种政策要求劳工党从劳联组织中退出，放弃对它们的教育和联合，而在各工业部门重新组织与劳联对立的

---

① 方纳：前引书，第2卷，第369—370页。

② 卡尔·里夫：前引书，第59—60页。

行业与劳工联盟。推行“双重工会”以后，大批中间立场的工人被赶入保守工会的阵营，许多倾向劳工党的工会也纷纷退出了行业与劳工联盟。这个联盟的成员从创立时的15,000人减至1899年的5,000余人，其中大多数是外国出生的。[①] 这样，劳工党与广大工人群众的组织和斗争脱节了。它从“左”的方面把自己同工人阶级对立起来，成为一个“纯粹的德国宗派”。[②] 与此同时，劳工党的内讧也日益加剧，最后导致完全分裂。其中一派在1901年成立了美国社会党。此后，美国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利因素〕　从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义传入美国，到1901年社会党建立，美国社会主义运动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在此期间，社会主义思想得到了传播，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然而，科学社会主义未能成为美国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相反，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缓慢，多次分裂；社会主义政党一再失误，以致没有掌握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

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停滞不前的原因相当复杂。首先，从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因素来看：一方面，德国移民是社会主义在美国的主要传播者，他们带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不会讲英语，脱离广大工人基本群众。同时他们借口美国工会组织的理论水平低，拒绝加入其中，最后堕落为“纯粹的德国宗派”。另一方面，欧洲的各种机会主义思潮大量流入美国。它们在欧洲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深刻批判，而在美国却未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其中以德国的拉萨尔主义、法国的无政府主义和英国的工联主义影响最大。这同前一个因素结合，使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不仅

① 威廉·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纽约1952年，第8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347页。

没有真正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却被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流派弄得混乱不堪，难以形成无产阶级的战斗核心。

其次，从外部因素来看，美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欧洲有很大的差异。它是一个“从未经过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在资产阶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年轻国家。”[①] 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迅速，工人的生活条件一般高于当时的欧洲工人。这种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使美国社会难以形成发生革命的客观环境，从而也阻碍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同时，西部自由土地的存在，在较长历史时期内成为防止阶级冲突加剧、形成稳定的阶级意识的“安全阀”。此外，美国民族成分的复杂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着美国工人阶级整体意识的发展。本地白人工人多在劳联控制之下，而移民工人多被拒于工会之外，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难以获得适合的土壤。在政治上，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较为完善，使工人能在一定的合法范围内维护自己的利益，从而削弱了组织独立工人政党的自觉性。

再次，美国资产阶级擅长于交替使用镇压与安抚两手策略，阻止工人群众投身于社会主义运动。在19世纪末，联邦政府多次对工人运动实行残酷镇压，遏制了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潮，许多罢工的领导人和参加者纷纷退出社会主义运动。资产阶级还动用各种舆论机器，把社会主义描绘成“外来的颠覆阴谋”，使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望而生畏。资产阶级软硬兼施的手法颇为奏效。80至90年代的各州劳工立法相对改善了工人的处境，使工人更易于接受各种改良主义思潮，对推翻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更加模糊不清。

总之，19世纪末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停滞不前的深刻原因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558页。

于当时美国社会仍不具备革命的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即美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生产力发展仍有较大的容纳余地。说明这种停滞不前的状况及其原因，不仅有助于认识当时美国社会阶级矛盾演变的进程，而且可以更全面地分析 20 世纪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两种错误倾向的存在，同样反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和普遍性。

第八章

19 世纪后期农民运动的高涨

19 世纪最后 30 年间，美国农业半机械化、专业化和商品化迅速发展，宅地农场主日益脱离半自然经济状态而深深卷人国内外市场。同时，垄断资本在货币金融、铁路运输、市场价格、土地资源等方面对农业的控制不断强化。这两种趋势的冲突，导致农产品价格长期持续下跌，农场主地位日益恶化。为了摆脱破产的厄运，广大农场主展开一系列斗争，构成 19 世纪后期日趋高涨的农民运动。这场运动从以合作社运动为中心的经济斗争开始，发展到独立的政治斗争；从建立地域性组织到联合为全国性的第三党。这场农民运动历时之久、范围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当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均属罕见。这场运动的发展脉络和特点，揭示了农业资本主义的“美国式道路”的归宿；也是了解向垄断过渡时期美国社会阶级结构、经济结构、地域结构变化的重要条件。

第一节　农场主社会地位衰落及其原因

〔市场条件恶化及垄断资本盘剥〕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

农业商品化和机械化程度不断加深，美国农场主的经济生活与国内外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然后，随着垄断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优势逐步确立，农场主的商业联系也日益成为垄断资本渗透和控制农业的途径。另一方面，农产品受到市场各种竞争力量的冲击，而农场主无力摆脱价格下跌的趋势。因此，农场主的社会经济地位随着卷入市场的进程而急剧衰落。

首先，大企业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对农场主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农产品的销售和加工，他们通过普尔（联营）和托拉斯等垄断组织控制原料和产品的市场价格。但是作为个体经营的农场主，受到生产分散性和地区差异的制约，却难以联合起来有效地控制、调节生产和价格。因此，农场主常常被迫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在市场上抛售其农产品。不仅如此，美国农业的惊人增长不断受到国际市场上强有力的竞争。大约有 2/3 以上的棉花、1/4 以上的小麦在国外市场销售，以玉米为饲料的畜牧业也有很大比重出口。但是，从 80 年代至 90 年代，俄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阿根廷的小麦和谷物、埃及和印度的棉花潮水般涌入欧洲市场，迫使美国农产品价格一跌再跌。1866 年小麦每蒲式耳价格为 1.52 美元，此后 30 多年中长期低于单价 1 美元，1894 年甚至惨跌到 0.49 美元。棉花在 1871 年每磅为 18 美分，此后 30 年间棉价始终低于 10 美分。[①] 然而，农场主还必须不断添置新型农机具等生产资料以增加产量，更要每年支付 6 亿美元来购买消费用品。于是，他们在竞争市场上出售农产品，却在受高关税保护、被垄断组织控制的市场上购买工业品；作为买方和卖方，农场主都受到剪刀差的盘剥。可见，19 世纪后期农业的蓬勃发展，对农场主并不意味着“黄金时代”的到来，却使他们

①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 536 页。

遭到农产品过剩和价格跌落的双重折磨。有时农场主实在迫于无奈，只得将收获的玉米全部当作燃料付之一炬。面对着极不利的市场条件，农场主的不满达到了极限，成为农民运动的深刻动因。

其次，几乎全部农产品都必须经过铁路公司运往东部以及欧洲市场，因此铁路成为垄断资本控制农业的主要渠道。铁路剥削农场主最常用的手段之一是实行运价歧视。由于西部农业区的铁路营运额较低，加上大企业勾结铁路公司实行优惠差价，铁路公司就把各种财政亏损全部转嫁到农产品运费上，由农场主来承担铁路混乱的后果。例如，从北达科他州东部的法戈到明尼苏达州德卢斯的小麦运费，几乎是从明尼阿波利斯到芝加哥运费的2倍，而后者的距离却比前者长2倍。从密西西比河以西运输谷物到大西洋沿岸，每蒲式耳运价高达52.5美分，而小麦时价为106.7美分，玉米为41.1美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等地的农场主抱怨：他们需"花费1蒲式耳玉米的价格才能运另一蒲式耳玉米到市场去。"[①] 至于垄断企业如"美孚"等可以随时调用车辆，并享有回扣、减价和特价等优惠。政府官员们还常常得到铁路公司的免费乘车证。官员和铁路之间贿赂舞弊成风，农场主对此痛心疾首，切齿不平。

铁路公司还与芝加哥、新奥尔良等地农产品交易所勾结，在铁路沿线设立许多堆栈和粮仓，控制了农产品和牲畜的收购价格。在收获季节，铁路和栈仓公司就乘机压低粮价、收取高额贮存费，对农场主进行无情盘剥。据估计，中西部、西部和南部运往东部市场的农产品收入，至少有一半落入中介商人之手。[②]

---

① 希克斯：前引书，第60—61页。

② A. 内文斯：《近代美国的出现，1865—1878年》，纽约1927年，第164页。

对农场主更为致命的是严重缺乏资金。他们为了定居垦荒、购置农业机械和维持农作物收获前的生计，不得不四处求贷。东北部银行利用西部缺乏通货的状况，派出代理人建立贷款机构。农场主一旦接受这种高利贷，就陷入债海不可自拔。为了偿清债务，农场主们只得以土地、动产、甚至尚未收获的庄稼作为抵押。而东部银行发放的贷款利率一般为 1.5 分至 1.8 分，南部各州高达 3—4 分。七、八十年代在西部经营的几十家抵押公司，每年给东北部金融资本带来收益达 1.8 亿美元。农场主的债务总额却从 1880 年的 3.43 亿美元上升到 5.86 亿美元。[①] 将农场抵押的农户在 1890 年已达 88.7 万户，到 1900 年更增至 112.8 万户，约占全部农场主的 1/3。[②] 农场主为了扩大生产而追加资本的结果是失去其视为根本的土地所有权。这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心理上对传统的宅地农民是沉重打击。负债累累的农场主试图在合作运动和政府干预中找回自己原有的地位，正是 19 世纪末美国农民运动的心理动因。

正如 1890 年《农场主联盟报》所揭露的：在内布拉斯加州共有 3 项主要收入来源，一是种植玉米的收入；一是运费的收入；一是利息收入。前者是农场主辛勤劳动所得，后二者正是铁路和抵押公司瓜分农场主劳动所得的收入。[③] 这种情况不独发生在内布拉斯加，而且在整个西部以至南部莫不概然。这也是农民运动普遍发展的基本原因。

〔牺牲农场主利益的联邦政策〕　　内战后联邦政府虽然在发展农业方面采取了一些具体的积极措施，但是在一系列方针政

---

① A.M.施莱辛格：《现代美国的兴起，1861—1951 年》，纽约 1954 年，第 148 页。

② 《第 13 次人口调查（1910 年）》，第 5 卷，华盛顿 1913 年，第 160 页。

③ 希克斯：前引书，第 83 页。

策上，基本上是以牺牲农场主利益来保证工业资产阶级、银行家、公债持有人和土地投机商的利益。因此，农场主的不满和积怨与日俱增。

在土地政策上，联邦政府名义上规定了无偿分配国有土地的原则，但是“宅地法”又附有“折偿”条款，即在宅地上居住6个月，按每英亩1.25美元现金交付即可取得这块土地的所有权。“折偿”方式实际上为土地投机商抢购土地大开方便之门。他们纷纷成立公司，假冒“实际移住者”的名义抢购土地。仅在1882年以后的20年中，按“折偿”条例处理的公有土地2，000万英亩，约占宅地分配的23%。国有土地委员会也不得不承认“折偿（条款）成了国有土地以惊人的速度转到大公司掌握中的巧妙手段。”① 联邦政府在赠予铁路公司土地方面是极为慷慨的。至1871年，拨给各铁路公司的土地已达1.75亿英亩；各州政府也向铁路公司赠拨大量土地；两级政府共拨给铁路公司2亿英亩土地。② 铁路公司除了占用一小部分土地铺设路轨，其余均以每英亩2至15美元价格出售。铁路公司通过土地赠予一方面获得大量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又控制了铁路两侧的农场主，使之成为铁路公司的盘剥对象。总之，“宅地法”的大部分实惠被土地投机商和铁路公司占据了。农场主所得土地不仅数量少，而且多半是质次、偏远的荒凉地段。他们不满联邦政府，同铁路、土地公司一再展开争夺土地的激烈斗争。

促使农场主经济状况恶化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联邦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70年代以后，联邦政府采取紧缩通货的政策，停

---

① 蒂尔登：《被看作美国农业革命的基础的内战时期立法》，洛杉矶1937年，第116页。

②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416—417页。

发纸币、限制银币、逐步推行金本位制。这些措施虽然稳定了信用市场，有利于投资和国际支付，但也加剧了货币供应严重不足和通货量分布极不平衡状况。东北部金融界利用西部和南部的通货紧缺，加紧进行高利贷和土地抵押活动。尤其在农产品大宗上市时，通货不足更显紧迫。谷仓公司乘机大煞买价，抵押公司则竭力抬高利率，农场主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紧缩通货和物价下跌互为影响，身负重债的农场主不得不用升值的美元来支付本息。他们在 1870 年仍可用1,000 蒲式耳小麦来偿还1,000 美元债务，到 1890 年却要用2,000 蒲式耳小麦才能偿清这些债务。因此，追求一种符合农场主利益的金融政策和体制，成为这个时期美国农民运动的重要目标之一。财政政策的另一方面是税收制度。以国内税为例，农场主需为其土地纳税，在其消费品中承担商品税，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但是东部银行资本却不为其西部抵押和高利贷承担任何税收义务，可以有恃无恐地抓紧进行抵押活动。至于高关税政策的双刃剑作用，即在市场上保护工业资本、打击农产品价格方面胜过其他政策，以致美国农场主成为“保护贸易”的牺牲品，这已是众所周知的。

如果说土地政策从外围扫清了垄断资本渗入农业的途径，那么金融政策则在核心部分使垄断资本掐住了农场主的咽喉。农场主试图摆脱越勒越紧的绳索，他们在反对垄断控制的同时，把矛头对准了制定这种种政策的联邦政府和两大党。这也是农业合作社运动最终转向政党斗争的深刻原因。

〔农场主各阶层的分化状况〕　在农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农场主从以往的宅地小农分化为利益不同的各个阶层。新阶层随着资本主义关系发展而增大，旧阶层则相应地衰落下去。

农业集中现象虽不十分普遍，但在小麦生产带出现了为数不

少的大农场。1880年至1900年间，西北地区1,0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由29,000个增至47,000个。[1] 这些大农场的资本化和机械化程度较高，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也较发达。大农场主（包括大牧场主）往往同当地的矿业资本和铁路公司联系密切，成为西部地方政治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构成了农业资产阶级的主体。在一些全国性争端上，大农场主与东部资本存在着利益冲突，故需要利用中小农场主的力量，充当农民运动的组织者。但在地方性政策上，他们又同租佃农场主分歧颇大。最终大农场主也难以避免在经济上受垄断资本控制、在政治上归附两大党的命运。

在东北部集约型农业中产生了专业化农场主。这些农场主虽拥有土地面积较小，如新英格兰平均每个农户的耕地仅为西北地区的1/4。但他们资本投放量大，其每英亩耕地使用机器的平均价值为其他地区的2至3倍；使用雇佣劳动的平均价值也是其他地区的3倍。[2] 因此，这种专业化农场主构成了美国农业资产阶级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东北部农场的市场条件较好，其产品价格远不像大宗农产品那样猛烈下跌，资金来源较为充足，运输费用和消费品价格都相对稳定，故这个地区的农场主较少地卷入后期农民运动高潮。

美国农场主的主体是西部广大的宅地农民。1868年至1900年，在西部获得宅地的小农场主共有68万户。如包括购买铁路公司和土地公司土地的移民，这个时期西部农场增加达100万户以上。其中60%以上是耕地不足100英亩的小农场主。在西部干旱地区进行粗放耕作的条件下，100英亩规模的小农场几乎难以维持生计。加以负债累累，其中大部分小农场主只得以土地抵押

---

① 《美国历史统计》，前引书，第46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2卷，第33页。

来进行再生产。到1890年，在伊利诺伊、内布拉斯加、堪萨斯等8个州的农场抵押率分别达36.7%至61.7%之间[①]。80年代末的西部严重干旱和90年代初经济危机的连续打击，使美国农业陷入空前的困境，西部土地抵押发生崩溃式的连锁反应。抵押取消率达70%至90%。[②] 大批土地所有权转入东部金融资本之手。由于东部资本与西部土地在空间上分离，不便直接经营，从而把农场经营管理权仍保留给已经破产的旧农场主。于是，在土地抵押制的基础上，形成了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东北部“不在地主”和西部租佃农场主。租佃农场主是“半所有者”，与完全失去生产手段的分成农和农业工人不同。他们仍拥有一定的资本，能在机械、土地改良和雇工方面进行部分投资。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到金融资本的控制和剥削。因此，租佃农场主是农业社会化和金融资本渗入农业二者结合的产物。租佃农场主与东部垄断集团的冲突几乎涉及19世纪末各种社会政治争端，他们成为这一时期农民运动的主体。但是由于租佃农场主的经济力量薄弱和生产的分散性，他们亦无力改变自己的地位衰落。

在南部，金融资本的控制是同内战后形成的谷物分成制相结合的。南部的高利贷商人、种植园主和北部银行代理商三位一体，构成了南部特有的“不在地主”。分成农以全年收成作为抵押，向高利贷地主取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可见分成农既无土地所有权，也无资本使用和管理权，故是农业无产阶级的变型。况且南部种植园地主还制定各种立法限制分成农自由流动。在1880年，分成农占南部黑人农民的40%，白人农民的30%；到

---

① 斯托克：“地产抵押、抵押取消和西部农业动乱”，载于《经济史杂志》1984年第4期第94页。

② L.B.奈：前引书，第41页。

1900 年，南部白人农民也大多沦为分成农了。① 在分成制的束缚下，南部人口平均收人仅及全国水平的 1/2，而黑人又比南部白人平均水平低 2/3 以上。南部分成农的经济处境和社会地位，使他们同南部高利贷地主和北部金融资本之间的冲突十分尖锐，但又难以进行有效的抗争。加上历史遗留的种族偏见和地域隔阂，造成南部农民运动的发展艰难。

此外，还有相当多的小农场主完全破产而沦为农业雇佣工人。以中西部 7 个主要谷物生产州为例（伊利诺伊、艾奥瓦、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明尼苏达、北达科他和南达科他），在 1880—1900 年间，农业工人从 36 万余人增加到 63 万余人。② 就全国而言，1900 年的农业工人总数已达到 200 万人，相当于农场户主总数的 35.5%。农业无产阶级人数迅速增长，表明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趋于成熟。但美国农业工人以季节工居多，其分散、流动性很大，故难以在 19 世纪末农民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尽管农场主分化为若干不同阶层，但他们同金融资本、工业垄断集团、铁路公司以及联邦政府的尖锐矛盾却是共同的，其社会地位下降趋势也大体相仿。因此，这个曾经在美国社会中居人口多数的集团，在其走向衰落的困境中发出了进行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强烈呼声，给即将到来的 20 世纪美国投下了一道深远的光束。

---

① 波特主编：《美国经济史百科全书》，前引书，第 1 卷第 381 页。

② 沙伊贝，前引书，第 67—68 页。

第二节　农民协进会（格兰其）和绿背纸币运动

〔农民协进会和格兰其法〕　农民协进会是内战后美国第一个全国性农民组织，它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推动了农民运动的第一个高潮。1867年11月，奥利弗·凯利在首都华盛顿创立“农业保护者协进会”(即格兰其)。凯利曾任农业部职员，对南部农村作过调查，对那里的落后状况和农民的困苦处境深有感触。他按照共济会的秘密组织形式创办了农民协进会，其宗旨是倡导农场主互助合作，交流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发展农村教育，以改进农场主的状况。可见，格兰其的初期是个不过问政治的农业教育组织。至1871年，它在9个州建立180个地方分会，其中一半设在艾奥瓦州。然而，参加协进会的中小农场主却对华盛顿总部的纲领和行动不满。他们认为只有进行有组织的经济活动，才能摆脱困境。有些地方组织提出“合作起来”以针对流通领域的垄断行为。1869年，一些州和地方的协进会建立起商务代办所，为会员出售农产品，代购农具、种籽和牲畜，设置临时仓库贮存谷物，有时还向会员提供市场行情。协进会的活动表明独立农场主开始进行经济合作的尝试。

1873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农产品价格猛烈下跌，普尔等垄断组织形式在工业、铁路部门中广泛发展，农场主面临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恶化。更多的农场主把协进会看作是自已经济利益的保护者。1874年，全国37个州中已有32个州建立起州一级协进会组织，地方分会21,697个，会员总数猛增至80万。[1] 在中西部

①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542页。

和南部地区，几乎每个县和社区都建立起分会。除了中小农场主外，还有大批城镇小商人和小企业主也纷纷加入协进会。

农民协进会的力量壮大，使其领导人和纲领也变得更为激进。1874年圣路易斯大会发表的宣言提出："反对垄断资本的暴政，……反对贷款制度和抵押制度。"① 同时又提出"我们不是资本的敌人"，"只是希望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在农场主和制造商之间建立尽可能直接和友好的关系。"这个纲领反映了协进会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幻想。他们试图以合作制和阶级调和来阻止中小农场主和小商人、小企业主的破产，却又力图阻挡正在出现的向垄断过渡趋势，从而在思想上陷入混乱。在行动中协进会更明确了发展集体所有的合作制的措施，这一点比其成立初期前进了一大步。

1873—1875年，农民协进会展开大规模的合作运动。从缅因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广大土地上，出现了成千上万个合作商店、粮仓货栈、保险公司以及少数银行。26个州协进会建立起经营批发业务的"经纪人制度"，为会员储运、代销农产品。南部某些州协进会派出经纪人常驻纽约和英国的利物浦，随时掌握棉花市场行情。加利福尼亚协进会还自行装运17艘船的粮食，直接向国外销售。同时，这些机构还设法从制造商那里直接批发农机具和日用品，以较低廉价格向会员出售，以减少中间盘剥。在堪萨斯、密苏里等中部各州协进会还投资兴办小型制造业工厂，生产农业机械，加工面粉、奶酪、大麻纤维等农产品。其中艾奥瓦的一家收割机厂在1874年就生产收割机250多台，并以市价的一半出售给会员。农民协进会在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这一系列改革，为农场主们提供了实惠，并且积累了参与社会化生产的经

---

① C.C. 泰勒：《美国农民运动，1620—1920》，纽约1953年，第134页。

验。仅艾奥瓦一个州的合作机构就为其会员节省40%的运输费和100万美元的购置费。[①]

尽管农民协进会在其纲领中坚持它不是政党组织，不讨论政治和宗教问题，但在其经济活动中又不能不参加到政治斗争和立法活动中去。在基层会员的推动下，1876年农民协进会在华盛顿组成一个院外活动集团，对国会立法施加影响。各州协进会也有相当多的组织转变为地方性政党。1873至1876年在中西部和西部的11个州涌现出一系列农民政党，如反垄断党、改革党和独立党等。这些小党的纲领主要集中在敦促联邦和州政府制定铁路管制立法；实行合理的赋税制度；将西部国有土地授予真正的垦殖者；由国家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等。这些农民政党和协进会在地方政治中积极展开活动，并在某些州暂时取得某些优势。在威斯康星、明尼苏达、伊利诺伊和艾奥瓦等4州议会中，在农民协进会和独立小党一起推动下，管制铁路的立法得以通过。这些称为"格兰其法"的立法主要是对铁路运输的最高限价、收费率、长短途和小额货运的差价等作出一般规定。西部其他各州很快效法，"格兰其法"迅速传播，得到社会中下层的广泛支持。但是，铁路公司竭力诋毁格兰其法，指责这种管制违反了特许营业证规定，侵犯法人财产权，触犯联邦宪法关于州际贸易的条款。铁路公司与中西部州发生一系列争执，构成所谓"格兰其案件"。1877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对"芒恩诉伊利诺伊州案"和"派克诉芝加哥—西北铁路公司案"中，都判决州政府的管制铁路为合法，因为铁路公司是关系到公共利益的事业，必须服从公众的管理，并认为"铁路运费属于州政府有关的内部事务"。这样，农民协进会在立法斗争方面取得暂时的上风。格兰其法作为对放任

① 艾伦·内文斯和亨利·康马杰合著：《美国史》，华盛顿1966年，第370页。

政策和垄断行为的第一次冲击，对以后的立法有深远影响。

〔格兰其衰落与绿背纸币运动兴起〕　1876年以后，农民协进会运动转入低潮，其地方组织松弛瓦解。1880年其会员人数锐减至12万余人。农民协进会以合作社运动和单项立法来抵抗垄断组织、挽救农场主的衰落趋势，自然是力不从心。具体地说，协进会缺乏足够的资金来支持大批合作商店、企业和公司，而且管理不善，经营范围过大，加以垄断组织的排挤倾轧，这些企业因而大部分倒闭。虽有少数得以维持，但已不是为格兰其成员利益而活动的集体合作组织了。从政治上看，格兰其法对铁路公司并未构成真正制约，并且实行时间较短。各州政府大多与铁路公司互为利用，将格兰其法搁置不理，或修改得面目全非。1876年后危机转向繁荣，农场主对投身运动的兴趣淡漠。加以协进会内部成分复杂，要求不一，难以在进一步发展时确定目标。农民协进会作为19世纪末第一次全国性农民运动高潮，其历史作用仍值得肯定。它推动分散的个体农场主走向联合，并积累了在商品经济的竞争中广泛活动的经验。它为后来的农民运动提供了骨干和经验，其中许多会员转入绿背纸币党或农民联盟，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格兰其法也在联邦州际贸易条例中得到了发展。

当农民协进会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时，另一个农民运动高潮已悄然来到了。这就是1874年以后绿背纸币运动的兴起。绿背纸币运动不同于农民协进会之处，主要在于它以政治斗争为主，并建立以农场主为主体的全国性政党。其活动范围以中西部为主，但在东北部也有很大影响。绿背纸币运动的上述特点产生于这场运动的争端焦点即货币问题。对于内战后遗留的国债和纸币问题的解决方式，涉及到当时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债权人希望以足值的硬币来支付全部债务，尽管他们在内战中是以纸币购买大部

分债券的。而债务人则希望仍以纸币偿债，如换以硬币付债则会使他们的私人债务成倍增加。然而联邦政府站在债权人利益一边，在1869年决定以金币偿付全部国债。在1873年，联邦政府又决定停止印发纸币、逐步实行金本位制。这两项立法实际上是置负债累累的农场主于更加艰难的境地，它将导致价格进一步下跌，债务更加上升。其他面临破产的小企业主也对紧缩通货政策持反对立场。主张通货膨胀的债务人集团从爱德华·凯洛格那里接受了低值货币论，认为联邦政府应改革金融制度，发行低值货币，并由政府发放低利率贷款，使社会中下层得以摆脱破产的厄运。这种观点把信贷资本看作资本的主要形式，把通货膨胀视为改造社会的基础，显然是极为幼稚的幻想。但是由于这种理论揭露了当时联邦政府支持金融资本对社会中下层的掠夺，激起了人们对于改革金融体制的强烈要求。正值1873年危机的到来，绿背纸币运动迅速在北部各州风靡起来。

1874年11月，在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农民党的发起下，纽约、新泽西、康涅狄格、密歇根、肯塔基等7个州的农场主和部分工人代表，在印第安纳波利斯集会，决议成立新的政党。其宗旨是抵制垄断资本的侵犯、改革税制、纠正政府腐败现象并"适当解决货币问题"，由此揭开绿背纸币运动的序幕。1875年3月在克利夫兰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正式成立独立党，并通过以金融改革为中心的政治纲领。这项纲领认为金融问题比其他问题更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实际利益，要求以绿背纸币偿付国债、废除1875年恢复硬币支付法。独立党的核心要求围绕着绿背纸币问题，所以它被通称为绿背纸币党。1876年，绿背纸币党决定参加当年的总统竞选，推选纽约慈善家彼得·库珀为总统候选人。在竞选纲领中，绿背纸币党着重提出了废除硬币法、增发纸币等4项要求，但在其他方面并未拿出更有力的改革主张。况且竞选

经费极为不足，故所得选票仅8万余张，占全国选票总额的1%。由此可见，绿背纸币党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货币问题上，并不能吸引足够的下层群众。

〔绿背纸币运动的高涨与失败〕 70年代后期，绿背纸币运动成为农场主与工人运动交汇的聚合点。在1877年的铁路罢工期间，中西部的农场主积极展开声援，向罢工工人捐赠粮食和马铃薯。很多工人组织在这过程中与绿背纸币党建立密切联系。工会也从1877年罢工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与农场主联合的必要性。在纽约、新泽西和马萨诸塞等州的工人党在地方选举中和绿背纸币党联合，取得重要进展。在这些联合行动的基础上，1878年2月"工人及货币改革者全国代表大会"在托来多召开。许多著名工人领袖和绿背纸币党活动家出席了会议，会上正式成立了绿背劳工党。大会纲领揭露了农场主、工人生活水准和收入不断下降，"一种无可比拟的苦难已侵袭着我们人民中的贫困阶层和中产阶级。……贫穷与饥饿已充斥国家的每个角落。"① 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于政策法令"以高利贷者、银行家及公债持有人的利益为出发点。"绿背劳工党进一步发展了农民协进会的纲领。它将斗争焦点从铁路管制转变为货币体制的改革；提出实行累进所得税；要求建立劳工统计局，反映工人的利益和要求。这些纲领发展说明农民运动已向第三党运动发展，而且要求政府实行干预政策越来越成为其纲领的核心部分。1878年中期选举中，绿背劳工党获得106万张选票，14名代表当选为国会众议员，地方选举中也取得重大成果。绿背劳工党比绿背纸币党更具有群众基础，它在全国政治中所产生的影响也超过了农民协进会及其他独立小党。

---

① 方纳：前引书，第709页。

1878年以后，绿背纸币运动逐渐走向低落。其原因之一在于联邦政府在1879年正式以硬币偿还绿背纸币债务后，并未出现物价暴跌，小麦、玉米等大宗农产品价格还略有回升。这种情况使许多农场主对货币问题失去兴趣，纷纷退出运动。另一方面，绿背纸币运动中的工人与农场主的利益歧异，其联合并不巩固。东北部工人对通货紧缩政策的关切远不如中西部农场主。绿背纸币运动的上层领导人却把金融改革视为治愈社会痼疾的灵丹妙药，并不关心工人的疾苦，其政纲中反映工人要求的条款越来越少。绿背纸币党的有些领袖甚至声称决不与"共产主义或工会之类的劳工团体"建立联系，"我们的全部需要只是一种在全国通用的绿背钞票和一个诚实的政府。"[①] 许多工会组织和工人对此怨言甚多，遂脱离绿背劳工党。在1880年大选中，该党候选人只获得30万张选票。1882年绿背纸币党与工会的政治联盟已彻底瓦解。1884年后绿背纸币党不再活动于美国政治舞台上了。绿背纸币运动虽然在政治斗争方面比农民协进会前进了一步，但它的经济活动毫无进展，社会基础更为纷杂，故难以对大党构成真正的挑战。

第三节　农民联盟和人民党

〔北方联盟和南方联盟〕　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叶，先是农民联盟、后是人民党相继兴起，构成了这个时期美国农民运动的第三次高潮。这次高潮继承和发展了前两次的主要特点。在影响范围上，它席卷整个中西部、远西部和南部，并波及东北部。在活动方式上，它不仅掀起更为广泛的合作运动，而且形成

① 方纳：前引书，第1卷，第714—715页。

了以农场主为主体的全国性第三党，展开了对两党政治有力的挑战。其斗争锋芒直指东北部的垄断组织，对90年代的全国形势产生了深刻影响。

80年代各地农场主在原格兰其和绿背纸币运动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许多自发的地方组织。这些组织在互相支持的过程中组成了跨州的农民联盟。其中以“全国农民联盟”（即北方联盟）和“全国农民联盟和工业联合会”（即南方联盟）为最有影响。

早在1880年4月，芝加哥《西部农村报》编辑密尔顿·乔治就在伊利诺伊州的库克县创建农民联盟。许多曾是格兰其活动的地区也跟着出现这类农场主组织。从一开始农民联盟就运用报纸等舆论工具揭露垄断组织、铁路公司和政府官员互为勾结、压榨农场主的丑行，号召全国各地农场主联合起来，为保卫自身利益进行斗争。同年10月，“农民运输问题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召开。各地农场主组织的数百名代表出席会议，并在会上正式成立“全国农民联盟”。联盟继承了格兰其在合作、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活动方式，同时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要求。其政纲明确指出：铁路是“名副其实的垄断”，“是对现存法律的挑战”；它盘剥民众、腐蚀政界、阻碍自由竞争、威胁共和制度。[①] 因此，农民联盟就是要联合全国的农场主，制止垄断资本的横行不法。其具体要求就是实行政府管制铁路，建立合理税制等。为此，农民联盟力争将自己的代表选入政府、参与立法，实现其改革纲领。从这最初纲领看，北方联盟的主要注意力仍集中在铁路管制问题上。

北方联盟在堪萨斯、艾奥瓦、威斯康星、伊利诺伊等州迅速发展，到1882年已有2,000个基层组织，成员达10万人，并建

① 希克斯：前引书，第98页。

立起州级联盟组织。1887 年中西部遭受严重旱灾，农场主处境恶化。更多农场主接受农民联盟的纲领，参加人数增至 40 万，其中以堪萨斯为最多。同年 10 月，联盟在明尼阿波利斯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更为激进的纲领，其中包括实行铁路国有化和自由无限制地铸造银币等条款。在联盟下级组织的报刊编辑中，形成了一批较有思想的激进派。他们已经开始讨论政府、垄断企业和农业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改革理论了，为以后人民党纲领的提出作舆论准备。

南方联盟的起源甚至早于北方联盟。1874—1875 年间得克萨斯兰巴萨斯县的边疆农场主为了抵御马贼、大地主及大牧场主的强取豪夺，建立一些秘密的自卫组织。这个组织又扩展到附近各县，并在 1878 年与其他农场主组织联合为“得克萨斯农民大联盟”。此后较长时间内“大联盟”不参与政治经济斗争，发展缓慢。1884 年，联盟决定改变组织性质，将合作社运动作为其主要活动方式，为盟员提供有利的商业活动。“大联盟”在各地设立股份公司和合作商店、谷仓、轧棉机工厂、保险公司等。合作企业的商品价格一般低于市场价格 1/4 至 1/2。联盟还在达拉斯建立农产品销售中心，以保持价格稳定。联盟的经济活动吸引了大批农场主，1885—1886 年其地方组织由 700 个增至3,500 个。正在大联盟蓬勃发展之时，C.W. 麦丘恩当选为执委会主席。麦丘恩主办《全国经济学家报》，在农场主改革派中很有声望。他修改了联盟纲领，提出取缔外资控制的铁路公司、增收铁路财产税和土地投机的调节税、增加货币发行量、制定州际贸易法等改革主张，使纲领具有较为先进的思想特征。另一方面，麦丘恩极力消除联盟内部的分裂倾向，使“大联盟”成为南部各农民组织中最有吸引力的一个改革团体。

在 80 年代，南部其他州也陆续出现了农场主的合作组织。

例如，1880年建立的路易斯安那农民联盟；1883年阿肯色州农场主建立的“农业车轮会”在1888年已发展会员50万人。这些组织与得克萨斯“大联盟”互相呼应，构成犄角之势。麦丘恩为了在整个南方形成强有力的农场主组织，派出联络人员往阿拉巴马、密西西比、田纳西、肯塔基和密苏里等州开展工作。1887年1月，“大联盟”首先与路易斯安那农民联盟合并，组成“全国农民联盟”。翌年，又与“农业车轮会”联合。1889年，南方的三大农民组织合称为“全国农民联盟和工业联合会”，即南方联盟。南方联盟在南部各州积极扩大影响，不久又吸收了北卡罗来纳农民协会。到1890年，南方联盟及相关的农民组织共有会员300万人，比北方联盟会员多2倍。其基本成分是农场主、分成农、农业工人和乡村小知识分子，对于金融界、商业、地产、铁路等行业人士一概拒之门外。南方联盟对黑人分成农仍持歧视态度。一方面规定禁止黑人参加联盟，另一方面又声称与黑人农民组织进行政治合作，以借助这部分社会力量。南方联盟在首都华盛顿设立总部，并办报刊近200种。其声势不仅遍及南部各州，而且对北部、西部也产生了很大震动。

〔农民联盟向第三党的转变〕　80年代末，西部大平原发生连续严重干旱。从内布拉斯加向南直至得克萨斯热风横行，庄稼焦萎，草原干枯。冬季奇寒和风暴袭击，又将牲畜大批冻死。同时，市场条件更趋恶劣。玉米价格降至每蒲式耳仅10美分。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西部农场主破产速度加快。1890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南北达科他、明尼苏达的人口平均抵押债务额居全国前列，平均每2至3人中就有一份抵押债务①，而且抵押取消率高达2/3以上。在这样的困难境地中，农场主更加把改

① 希克斯：前引书，第23页。

善状况的希望寄予农民联盟的政治经济力量加强，渴望能通过政府干预使农场主保持在市场上的一席之地。正是上述形势，推动着农民联盟向第三党转变。

1889年12月，南方联盟在圣路易斯召开代表大会，北方联盟、全国其他重要农民组织及劳动骑士团亦有代表出席。南北两大联盟在大会上制定了共同纲领，其要点仍集中在货币、铁路、土地、税收等重大争端上。纲领提出实行无限制铸造银币，发行充足的法定货币；取缔“不在地主”，收回铁路公司的多余土地和没收外国辛迪加所占土地；实行累进所得税等。圣路易斯纲领集中了格兰其、绿背纸币党历次纲领的基本改革要求，体现出农场主与东部大资本的矛盾尖锐化。这个纲领也反映了南北农民联盟在改革的主要方面持有一致立场，为两个联盟的进一步合作准备了积极的前提。

圣路易斯大会的另一重要成果就是在麦丘恩设计的合作制度和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国库分库计划”。这项计划要求联邦政府在每个农业年产值50万美元以上的县内设立国库分库，按寄存的农产品价值80%发行法定纸币贷款，利率为一厘。农场主通过分库在行情相当时出售贮存的农产品，或取得分库证券偿付债款、保险费和运输装卸费等。如一年内农产品未被赎出，分库有权自行处理。国库分库计划的实施需要联邦政府至少增加5.5亿美元的货币供应量。因此，该计划不仅为解决农业资金和价格问题提供了途径，而且促使政府实行一种与市场供求关系相适应的有弹性的通货膨胀政策。这项计划比绿背纸币理论更接近资本主义金融市场的现实，成为后来的联邦储备体系所借鉴的蓝图之一。它也总结了农场主合作社运动的经验，力图将合作制与联邦政府干预政策结合起来。农民联盟要实现分库计划，就必须力争在联邦政府中取得足够的影响力。这就要联盟尽快地转变为

全国性政党。可见，分库计划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有深刻的意义。

然而，南北联盟合并为全国性政党的主观条件并未成熟。首先是西部农场主与南部分成农的经济利益和地域要求不尽一致，故在纲领和组织形式上仍有分歧。西部农场主认为小麦不及棉花易于储存，故对分库计划不感兴趣。他们对南部农民以棉籽油制造人造黄油亦不满，因这样有碍于北部畜产品和奶油制品市场的扩大。两大联盟在对黑人农民加入联盟的问题上亦观点对立。尽管南部黑人农民在 1886 年已成立“全国有色农民联盟及合作协会”，到 1890 年已有成员 100 万人；但南方联盟仍抱着种族歧视的偏见，拒绝接受黑人加入南方联盟。北方联盟则力主与有色联盟合并。北方联盟还担心人数众多的南方联盟会吞没自己的力量。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南北联盟未能达成合并的协议。

然而，农民联盟的政治、经济活动仍然为第三党的形成提供了基础。80 年代末的农场主合作社运动比格兰其时期规模和形式都更有发展。例如，南卡罗来纳、南北达科他农民联盟都采用由农场主集资的股份公司来保证合作企业的资金周转。得克萨斯、密西西比、佐治亚等州农民联盟建立了信贷销售和赊销的农产品交易中心。到 1890 年，在 18 个州的农场主合作机构年交易总额已达 1 千万美元，其经营范围从经销农产品到谷仓、银行、保险业、铁路和航运。合作社运动的发展，必然与垄断组织展开交锋。例如在 1888 年麻业托拉斯将黄麻包装布的售价提高 1 倍，南方联盟决定展开抵制，最后迫使麻业托拉斯把黄麻布售价从每米 14 美分降至 5 美分。这场斗争显示了农民联盟的实力。在总体上，合作机构与垄断组织之间的实力对比相当悬殊。垄断资本不可能把市场控制权让给农民联盟。他们通过银行拒绝提供贷款，铁路公司实行运费歧视，制造公司拒绝以批发价格出售农机

和日用品，打击合作企业，使其中大部分难以维持而停业。经济斗争的受挫，使农民联盟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政治斗争。

广大农场主对两大党的诺言也日益感到幻灭，他们迫切要求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第三党。1890 年，西部诸州首先出现农场主的独立政党：在堪萨斯、印第安纳的“人民党”，南达科他的“独立党”，内布拉斯加的“人民独立党”，科罗拉多的“独立联合党”等。南方联盟也开展了政治斗争，但他们主要是通过民主党来实现其要求。1890 年中期选举表现了农民联盟强烈的政治倾向。在联盟支持下，第三党在 7 个州议会的参众两院中据控制地位，在 6 个州的众议院占有优势。在当选的 332 名国会议员中，倾向农民联盟的议员有 52 名。这次中期选举推动了农民联盟向全国性第三党转变的趋向。

〔人民党的建立及其纲领〕　90 年代是美国社会急剧转变的时期。1893 年危机爆发，使农业萧条达到最低点。同时银价惨跌，西部银矿几乎完全停产。通货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全国性争端的焦点，各种社会力量展开激烈斗争。农场主集团也竭尽全力在这次政治角逐中取得自己的地位，从而迅速地从农民联盟转变为人民党，农民运动遂在这一时期发展到最高峰。

1890 年末，各地农场主组织开始共同商讨建立第三党问题，尤其在 1891 年 5 月的辛辛那提大会上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次大会共有 33 个州和地区的1,400 名代表出席。南北两大联盟的领导人及其改革团体的主要代表进行磋商，拟定共同政纲。北方联盟为了促进统一，接受了“国库分库计划”。同时，南方联盟却担心建立第三党，会在南部分散白人选票，仍幻想通过民主党进行改革。但是，南部的农民群众对上层领导人的迟疑不决极为不满。如《全国经济学家》当时所指出的：南方存在着一个深深的愤怒暗流；如果民主党不能表明对下层民众的同情，整个南方

就会出现一个新党。[1] 下层群众的强烈情绪，使南方联盟领导人不得不走上独立斗争的道路。在辛辛那提大会上，农民联盟为了获得工人支持，在纲领中列入了八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限额的条款。农民联盟的努力确实吸引了劳动骑士团、俄亥俄矿工联盟等工人组织，但并未在劳联等主要工会中产生积极的反响。

1892年2月22日，人民党在圣路易斯召开成立大会。除了南北农民联盟以外，还有若干工会组织、全国报刊改革协会、基督教妇女联合会也派代表参加，共有22个组织、约800名代表。这次大会主要解决了对建立第三党的必要性的看法，绝大多数代表都支持转变为人民党。然而，真正使人民党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的是1892年7月召开的奥马哈大会。这次大会所制定的人民党纲领在美国政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奥马哈纲领"。

奥马哈纲领尖锐谴责了垄断势力的专横和两党政治的腐败。它指出："美国富豪无视我们的共和国并危害我们的自由，肆无忌惮地窃取我国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劳动果实以建立他们的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巨富。""两大党为了争权夺利和分赃不均所作的斗争，我们已目睹二三十年了。""我们控诉支配这两党的势力集团，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现存的可怕情况，相反却容许这种状况继续发展。"[2] 因此，纲领宣称不消除社会弊病、实现平等权利，已经组织起来的改革力量的斗争决不会停息。

奥马哈纲领的核心内容是对当时经济、政治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革。其主要方面有：建立全国统一的有弹性的货币体制，按16比1的银金比价自由地铸造银币，使人口平均货币流通量达

---

① 罗彻斯特：前引书，第69页。

② K.H.波特：《全国政党纲领集1848—1968》，坎布里奇1972年，第89—91页。

到50美元以上（相当于当时实际拥有量的2倍），在农业州实行国库分库计划。在土地制度方面收回铁路公司和其他企业的过剩土地，剥夺外国公司和“不在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给实际拓殖者分配土地。实行铁路、电报、电话、邮政的国有化，按照人民利益加以管理。改革税收制度，实行累进所得税，减少对农业土地税收。在政治制度方面，实行总统、副总统一届任期制，实行无记名投票、参议员直接选举、公民创制权和复决权。在劳资关系方面，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禁止童工，取缔工贼和平克顿密探，限制外国移民。①

奥马哈纲领集19世纪末美国各改革纲领之大成，并且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有发展。其突出特点是斗争矛头直指横行一时的垄断资本，揭露两大党的保守和腐败，提出了一整套国家干预经济的方案和政策。纲领的致命弱点在于对联邦政府抱有过于乐观的幻想，以为国家会自动调节金融和市场；并且错误地估计形势，把迅速增长的人民党力量看作足以取代两大党的政治力量，似乎类似内战前共和党取代辉格党的局面还会再现。事实上，这个时期的垄断资本主义正在形成之中，其内部矛盾尚未发展到极为严峻的地步，因此联邦政府就不可能对现存结构进行关键性的改革，更不会轻易接受第三党提出的纲领。而且农场主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它已从内战前北部资产阶级反对南方奴隶主的政治同盟者沦为东北部垄断资本掠夺、控制的对象，因而也就不可能再出现小党取代大党的局面。尽管如此，奥马哈纲领在当时引起了美国各界的震动，在此纲领上签字的民众达500多万人。这表明人民党一出现于美国政坛上，就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向两大党腐朽政治发起冲击。

---

① K.H. 波特：前引书，第89—91页。

人民党成立后，立即参加1892年总统选举。原北方联盟主席詹姆斯·韦弗被推为总统候选人，南方联盟的詹姆斯·菲尔德为副总统候选人。人民党在大选中虽不能扭转乾坤，但所获的104万张选票也足以使两大党震慑。同时，人民党还有5名代表当选为参议员，10名选为众议员。在地方选举中，4名人民党人当选为州长（科罗拉多、堪萨斯、北达科他和怀俄明），6,500个人民党人当选为地方官员。这些人民党人在联邦和地方立法部门中不懈地为奥马哈纲领作出努力，使人民党第一次成为两大党以外能够在全国政治中取得发言权的第三党。

〔人民党与民主党合并及其失败〕　人民党的崛起引起两大党上层的恐慌，奥马哈纲领以其充满改革精神吸引了农场主、小资本家、部分工人和部分知识分子。劳联的下层组织也部分地转向与人民党合作的立场。1894年中期选举中人民党获得选票1,471,590张，当选国会参、众议员各6名，还有数百人被选为州政府官员。在这次选举中，人民党在工业地区选票明显增加。例如在圣保罗和明尼阿波利斯获得25,000票。在宾夕法尼亚的选票比1892年增加1倍。这对于曾经把中西部看作传统势力范围的共和党是个沉重打击。在南方，长期一党统治的民主党也面临着人民党的严重挑战。在1894年选举中，人民党在南部诸州获得选票的比例上升，如在亚拉巴马州得到48%的选票，在北卡罗来纳则达到54%。

两大党为了防止更多的下层选民转向支持人民党，在其纲领中点缀一些改革条款以改变其保守僵化的形象。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威廉·麦金莱在1892年明尼阿波利斯大会上，提出实行廉洁选举、管制托拉斯、改革文官制度和实行复本位制等口号以蛊惑人心。而民主党更是利用下层群众在金融问题上的关切心理，狡黠地抓住“自由铸造银币”的口号。民主党的1896年选举纲

领是与人民党奥马哈纲领十分相似的"影子纲领"。它剽窃了大部分改革主张加以改头换面，就是不提最关键的金融体制改革。同时删掉了农场主们十分关切的土地问题和铁路运价问题，还把劳工条款偷换为限制移民、实行劳资纠纷仲裁。民主党还推出了西部银币派首领威廉·布赖恩。布赖恩以其"不要把人类钉在金十字架上"的喊叫迷惑了相当大一批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通过这些策略变化，民主党把领导权移到了银币派手中，并作好了兼并人民党的准备。

在这种形势下，人民党内部早存在的阶级差异和地域矛盾顿时显现出来。人民党上层以大农场主、银矿主和职业政客为主，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利用人民党群众力量取得官职，并迫使政府通过自由铸造银币的法令，使人民党变成"自由银币党"。1896 年人民党在圣路易斯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主席 H.E. 托比尼克为首的合并派竭力主张接受民主党的建议，放弃奥马哈纲领，支持布赖恩为总统候选人。代表中小农场主和佃农利益的"中间道路派"激烈反对合并主张，指出这是民主党吞并人民党的阴谋。他们认为，如果放弃奥马哈纲领则意味着"人民党运动的投降和整个组织的垮台。"[①] 堪萨斯一位人民党人在致大会信中说："不要强迫我们倒退到民主党那里去，我们不愿意去。"[②] 但是，上层分子不顾群众的激烈反对，认为人民党再进行大选努力是徒劳的。因为他们认为，经过几年的经济危机，人民党的下层群众已精疲力竭，根本无力交纳活动经费，整个人民党财源枯竭。如果依靠民主党，至少能部分地反映人民党的要求。他们这种"半个面包胜于没有面包"的心理正中民主党头领们的下怀。民主党全

---

① 希克斯：前引书，第 357—358 页。

② 罗彻斯特：前引书，第 114 页。

国委员会主席琼斯抓住时机，与人民党上层紧急磋商，终于拟就了两党在28个州内实行合并的具体程序。这样，已经成为两大党心腹之患的人民党运动中断了。

民主党尽管在合并了人民党后，阵脚一度稳住了。但是它已无法改变同共和党的悬殊力量对比。布赖恩仅得到西部银矿主的30万美元竞选资助，仅是麦金莱所得竞选款项的1/20。而且人民党下层在合并后情绪沮丧，正赶上1890年秋小麦价格回升，共和党以此证明为银币政策的破产，小麦带的农场主转向了共和党，使布赖恩失去一部分关键性选票。加上人口众多的工业州全部倒向共和党，布赖恩所得的选举人票比麦金莱少了近100张。民主党—人民党联合阵线终于崩溃了。

人民党在1896年后虽然仍有余波泛泛，但终究平平。直至20世纪初，人民党的一些地方组织还在活动，而改革运动的主体已转移到北部工业城市的进步运动中去了。历时近30年的美国农民运动逐渐平寂下去，但人民党的思想和社会影响却持久地存在着。伍德罗·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两位民主党总统都在其执政期间部分地实现了人民党的改革要求，大部分人民党下层群众也随之转变为民主党的社会基础。

人民党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小规模的农场主经济无法与垄断资本的强大实力抗衡。其社会化、资本化程度较低，决定了它只能从属于垄断资本的控制。而在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条件下，农场主依靠其社会力量，仍然能够在政治、经济上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因此，美国农场主在资本主义深入发展的历史时期展开这场规模宏大的社会运动，是与当时其他国家所不同的。美国农民运动也由此兼有进步性和保守性的两重特点。这场农民运动所采取的合作制形式、政党组织和改革纲领等斗争方式，都是历史上各国农民运动所不及的。尤其是人民党关于经济改革的

许多设想，虽然在19世纪末美国并不具备实现的客观条件，但它所涉及的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不能不朝着这种改革的基本方向发展。这就是19世纪末美国农民运动的历史地位。

第九章

城市的大规模兴起与市政改革

伴随工业化的迅猛发展,美国城市化也进入鼎盛时期。至19世纪末,在全国初步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系,进而美国的经济重心、人口流向和城乡结构等也出现一系列相应的变化。

城市的大规模兴起,也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在联邦政府自由放任政策的纵容下,握有市政实权的城市老板与各大企业沆瀣一气、互相利用,腐败之风充斥于市政管理,市政建设也弊端丛生,出现严重无政府状态,与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极不协调。

急剧膨胀的城市问题，造成尖锐的社会矛盾，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自八九十年代起，各种改革运动纷纷涌现，其中以社区改良运动和市政机构改革最令人瞩目。各派教会也程度不同地参与社会事务、致力于城市改革。虽然这些改革刚刚铺开，所获得的直接成果还很有限，但许多主张与实践都为进一步改革铺平了道路，拉开了进步运动的序幕。

第一节 城市的大规模兴起

〔城市发展的一般状况〕 内战前，美国绝大多数人口居

住在农村，是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当时工业化的广度和深度均有局限，经济重心偏于东北一隅，城市也相应地集中在大西洋沿岸狭长地带的北部，如纽约、波士顿、费城等重要城市。这些城市以商业活动为主，起对外贸易和对内交流的中心作用。由于西部开发和铁路铺设的刺激，在密西西比河畔及其以东的内陆地区也出现一些中小型城市，主要是作为东北部与内陆地区经济往来的中转站，如圣路易斯、辛辛那提、芝加哥等。在密西西比河以西，仅星星点点散布着一些小型居民点和采矿中心。这一时期城市的初步发展，为更大规模的城市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内战后，伴随美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城市化也进入一个鼎盛时期，这突出反映在城市化的速度上。1790 年美国联邦政府首次进行人口普查时，城市人口[①] 仅占全国总人口的 5.1%，至 1920 年则跃增至 50.9%，这种具有决定性意义变迁的高峰期恰恰出现在 19 世纪后半期[②]。1860 至 1900 年间，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 19.8%上升到 39.6%，这一速度在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城市的数量也有显著增长，其中10,000 到 25,000 人的城市由 58 个增加到 280 个，100,000 人以上的城市由 9 个增加到 38 个[③]。至 19 世纪末，一个以大中小各类城市构成的城市网已在全国范围初步形成。这种现象当然令人瞩目。美国著名史学家老阿瑟·施莱辛格甚至主张以“城市理论”取代当时主宰史坛的特纳的“边疆理论”，去解释这段美国历史[④]。

---

① 1940 年美国联邦人口普查局正式规定：2500 人以上的居民点为城市。

② 《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地时期到 1957 年》，1961 年，第 7 页。

③ 戴维·韦德：《移民与城市：19 世纪美国变化的地理》，纽约，1977 年，第 22 页。

④ 阿瑟·M·施莱辛格：《1878 至 1898 年间美国城市的兴起》，纽约，1941 年，第 80 页。

然而，由于工业化的不平衡发展，城市化也存在着地域上的明显差异。东北部工业化起步较早，因而该地区城市发展在全国一直居于领先地位。1860至1900年间，该地区城市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例每10年平均上升7.8%以上，远远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1890年时，全国平均每3个人中有1个居住在城市，而东北部每2个人就有1个居住在城市。纽约市在全国城市中一直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1900年它与布鲁克林合并之后，人口将近300万，是当时世界上第二大城市，仅次于伦敦。其他城市如波士顿、费城等也有较大发展。如费城人口从1860到1900年增长近3倍，达150万，在全国居第3位。

中西部地区自然地理条件较为优越，在农业、交通等方面又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因而内战一结束，东北部企业家、大商人等纷纷前往，形成投资兴办企业的热潮，中西部旋即成为全国工业化的中心地区。这就使得该地区城市化起点高，发展潜力亦相当雄厚。在它发展的高峰期，即1880至1890年，其城市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率上升了10.4%，这使得东北部也相形见绌，在美国历史上更属空前。截止1900年，在全国10个2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仅中西部就有4个：芝加哥、圣路易斯、克利夫兰、底特律。这样，仅用三四十年时间，中西部就已由若干分散孤立的中小城市一跃而为美国一个主要的城市化地区。

在这些城市中，以芝加哥的崛起最引人注目。19世纪初，芝加哥还是人迹罕至之处。30年代移民西进，芝加哥兴隆起来，不久扩建为市。50年代铁路的铺设，更使其成为中西部重镇。但是，1871年芝加哥遭受特大火灾，全市2/3被化为灰烬，10万余人无家可归，因而受到重创。但这却构成芝加哥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余烬未尽，在东部资本的帮助下，重建即已开始。1880年该市人口再度恢复到50万，1890年跨过100万大关，

1900年又跨200万大关，每10年翻一番，一跃而成为美国第二大城市，在当时世界各大城市中也雄居第5位，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①。1893年，世界博览会在芝加哥隆重举办，更使这座城市遐迩闻名。

与东北部和中西部相比，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工业化略逊一筹，城市化也因此受到一定影响。80年代以后工业化速度加快，形成一股动力，但主要是促进了某些地区性中心城市的发展，没有形成各种规模城市的同步发展，各级城市间的联系与依存关系也较东北部和中西部为弱。发展较快的单个城市主要有：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堪萨斯州的堪萨斯城和威奇托，明尼苏达州的德卢斯和明尼阿波利斯，科罗拉多州的丹佛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圣弗朗西斯科）等。这些城市的人口在1880至1890年间，分别增长了2倍到9倍，成为各地区的中心城市。

南部投资环境很差。那里战后重建需要时间，而且铁路很少，因此工业化迟迟难以展开，城市化也起步晚、速度慢，远远落在其他地区后面。1860年时，全国10，000人口以上的城市有93个，南部仅占14个。当时全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9.8%，南部仅为7.2%。到1900年，才缓缓上升到15.2%，尚不及全国1860年时的水平，和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相差将近50年。1870年，新奥尔良曾在全国大城市居第8位，但到1910年时已退居第15位，是南部惟一的人口在25万以上的大城市。路易斯维尔和亚特兰大在南部也属较大城市，到19世纪末人口刚过10万大关。

〔城市的性质、类型与布局〕　这个城市化的鼎盛时期的

---

① 康斯坦斯·M·格林：《美国城市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纽约，1957年，第100页。

另一突出现象是以大机器工业为基础的近代工业城市渐居主导地位。到1900年，全国15个大型城市中，除新奥尔良外，均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

这些城市，按其性质和作用的不同，可大致分为几种类型：第一，包括多种产业的综合性全国中心城市，如纽约、芝加哥；第二，以某种产业为主的专业化地方中心城市，如巴尔的摩、费城、辛辛那提、圣路易斯、明尼阿波利斯等；第三，单一产业的专业化小城市，如伊丽莎白、托莱多、大瀑布城等；第四，卫星城，一种是“工厂城”，围绕某大城市所建，实即该城某大企业的分支，以匹兹堡周围大批小型钢铁冶炼城镇最为典型；另一种是“卧城”，或称住宅区，隶属于某一大城市，以疏散该城过分密集的人口，如芝加哥的福莱斯特，波士顿的布鲁克莱恩。上述四种城市主要分布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沿袭旧格局的商业城市或商业与农副产品加工业混合的城市，或采矿冶炼中心，多分布在西部及南部。

总的来说，在这些类型众多的城市中，最突出的、也是占多数的是专业化城市。所谓专业化城市，是以某种产业为主、其他产业为辅的城市。上面提到的第2、3、4种类型的城市都可称为专业化城市，只是在专业化程度上有所不同。它们是竞争的产物，其形成大致有以下几种途径：

首先，一些企业向农牧业发达地区集中而形成农畜产品加工专业化城市。如堪萨斯城曾与圣路易斯和芝加哥的企业争夺谷物加工市场，屡屡失利。后来，该城多数企业把重点转向肉类加工业（因该城接近西南大草原地区的“牧畜王国”），使堪萨斯城逐渐成为肉类、罐头加工中心。明尼阿波利斯市在70年代尚不引人注目，但到80年代，中西部以西地区农业日益兴盛，吸引了大批谷物加工企业，致使该市迅速在西北谷物带中夺得领先地

位。孟菲斯市曾以原木加工为主，后因竞争失利，很多企业转而利用当地棉花生产优势加工棉籽油，使该市逐渐成为南部棉籽油生产基地。

其次，一些企业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交通条件从事专业化生产。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宾夕法尼亚煤田和大湖区铁矿之间兴起的一大批以钢铁冶炼和加工为主的城市。如匹兹堡及其周围众多的钢铁冶炼小城镇就是专门从事钢铁冶炼，以及板材、线材、管材等钢铁半成品的初步加工的。

再次，各专业化企业在激烈竞争中采用先进技术，不断提高专业化程度。如纽约州的斯克内克塔迪市在电力工业中先行一步，后来成为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大本营。一些企业也往往利用当地居民的专长实行专业化生产。如密尔沃基市酿酒业的兴盛主要得益于有丰富酿酒经验的德裔移民，它所生产的酒驰名全国。在东北部，许多企业为避开中西部专业化企业的竞争锋芒，不得不放弃经营不善的产业，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当地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上。如马萨诸塞州霍利奥克市的成衣、制鞋及造纸业，洛厄尔市的毛纺业和编织业，经过一番技术改造，均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

这些不同规模、各种类型的城市，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分布日趋均衡，进而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形成了以综合性城市与专业性城市相结合、大中小城市相结合、相互依存、同步发展的城市体系。东北部城市体系，由全国性中心城市纽约和地方性中心城市费城、波士顿等及大批中小型城市构成；中西部城市体系由全国性中心城市芝加哥和地方性中心城市密尔沃基、圣路易斯、底特律等和众多中小型城市构成。这两个城市体系集中了众多的工业企业，构成美国工业布局的心脏地区。

〔城市的兴起与美国经济结构的相应变化〕　自由资本主

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无疑是经济结构剧烈变革的时期，大规模兴起的城市，构成这种变革的关键一环。

城市作为经济活动的枢纽和生产社会化的巨大杠杆，便利与刺激了美国工业化的发展。一般来说，工业企业集中于城市，有利于大机器工业的分工协作和专业化生产，便于分散的生产过程汇合成为彼此不可分割的社会化生产过程。城市体系的形成，以其整体性见长，更充分地发挥了城市的这种作用。仅以中西部城市体系为例：匹兹堡、芝加哥等市利用苏必利尔湖铁矿和宾夕法尼亚西部和其他地区煤田，形成钢铁冶炼中心；以其生产的钢锭及各种钢铁半成品为主要原料，底特律、克利夫兰、辛辛那提、哥伦布等市分别形成机械产品制造、机车制造、农机制造、船舶制造等专业化城市；密如蛛网的铁路是这一体系的得力媒介。从自然资源的开发、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加工、直至成品生产的全过程均可在这一城市体系中完成。这一方面有利于对资源的综合利用，使地区经济得到较合理的组合；另一方面减少了中间产品的远距离运输及损耗，缩短了生产周期，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这种优越性是分散孤立的单个城市所不可比拟的。因而，很多工业企业都把厂址设在东北部或中西部城市中。即使不在那里直接建厂的厂商，也多半将总部设在那里，或派驻代理商。“在 1900 年人口普查所确定的 185 个工业联合体中，有 70 个总部设在纽约，18 个在芝加哥，16 个在匹兹堡，6 个在克利夫兰，费城和旧金山各有 5 个，其他城市均未超过 4 个。”[①] 显然，东北部和中西部两个城市体系已构成全国经济发展的中心。

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体系的工业布局又各有特色。中西部城

① 格伦·波特主编：前引书，第 1052 页。

市多集中于原料产地，利用当地优势，着重发展了粮食、肉类加工、钢铁冶炼、机械加工等新兴工业，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面临中西部的激烈竞争，东北部城市也不断强化其专业化程度，侧重于它的传统工业，如纺织、制革、烟草加工、日用五金等等，即以轻工业为主。轻、重两大工业区的形成，使全国工业体系臻于完善。

城市的大规模兴起，造成空前广泛的就业机会，吸引大批移民和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迅速取代向西部农村流动，成为人口流向的主要趋势。这一方面反映在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据统计，1910 年时全国4,200 万城市居民中约有1,100 万是 1880 年后由农村流入城市的。① 另一方面表现在移民的绝大部分也涌入城市。在 1860 至 1890 年间城市所增加的人口中，有 54%以上是外来移民。② 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由于就业机会多，容纳力强，外来移民一般占城市人口总数的 70%以上。③ 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纽约市。"纽约—布鲁克林是世界最大的移民中心。它所拥有的意大利裔居民相当于那不勒斯人口的一半，它的德裔居民和汉堡的人数相当，它的爱尔兰裔居民与都柏林的人数相当，它的犹太人是华沙人口的两倍半"。④ 大致算来，纽约市每 5 个居民中有 4 个是外来移民或其后裔。如果说美国是个民族大熔炉，那么其融合过程主要是在城市中完成的。

随着中西部城市的崛起和新的工业中心形成，曾经偏于东北

---

① 查尔斯·格莱布和 A.T. 布朗合著：《美国城市史》，纽约，1983 年，第 136 页。

② 巴里·波尔森：《美国经济史》，纽约，1981 年，第 327 页。

③ 赫伯特·G·古特：《工业化美国的劳动、文化和社会》，纽约，1976 年，第 40 页。

④ 阿瑟·M·施莱辛格：前引书，第 73 页。

一隅的经济重心逐步西移。这最突出地反映在制造业的地理变化上。无论制造业雇佣人数还是产值，中西部在全国所占比重均持续上升，东北部则相对下降，[1] 进而造成美国制造业重心西移。根据美国第12届国情调查报告，从1850至1890年间，美国制造业重心向西移动了225英里。

中西部工业经济的长足发展，为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农业开发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使西部开发成果得到巩固。1870年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农业产值大约只占全国农业总产值的16%，到1890年上升到33%，成为全国著名的农业产区。制造业与农业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全国人口重心西移。根据联邦人口普查局统计，从1850到1900年，美国的人口重心向西推进了200多英里，达到印第安纳州中部。[2]

中西部城市的崛起，使这一地区在美国经济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也由此纳入全国经济发展的统一轨道。这是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结构剧烈变革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

〔城市化加速资本集中与垄断〕　城市的大规模兴起，为垄断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一点在专业性城市和城市体系中体现得最为鲜明。在专业化城市中，同类企业共聚一处，短兵相接，竞争激烈。竞争的结果往往是一个或几个企业在同类部门中居于魁首地位，该城市也就成为夺得这种垄断地位的企业的大本营。美孚石油公司所在地克利夫兰市和美国自行车总公司所在地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市，就是明显的例证。至于城市体

① 哈洛德·瓦特：前引书，第97页。

② 美国联邦人口普查局编：《1977年美国统计资料概要》，华盛顿，1977年，第9页。

系，则以其特有的各城市间经济上的密切联系而为垄断组织的纵向联合或横向联合创造了有利环境。如在钢铁专业生产基地匹兹堡地区，众多的中小城市都是相互匹配、同步发展的。卡内基钢铁公司夺得钢铁业垄断地位后，又轻易地吞并了匹兹堡周围数十个钢铁冶炼城镇中的企业，形成显赫一时的大型垄断企业美国钢铁公司。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垄断组织之所以蓬勃兴起，与城市体系形成很有关系。

垄断组织的形成是伴随着残酷竞争的，城市的发展也带有这一鲜明的印记。芝加哥和圣路易斯两个城市的某些企业对密西西比河上游地区控制权的斗争，是极为典型的。圣路易斯市地理位置优越，内战前河运贸易盛极一时，囊括整个密西西比河上游地区。五六十年代，随着铁路向西延伸，芝加哥崭露头角，许多从事农畜产品加工的企业云集于此，试图通过铁路的铺设来夺取密西西比河中、上游运输业的优势。出于这种暂时的共同目的，它们组成很多团体，如“工业俱乐部”、“伊利诺伊制造业者协会”等等，以便联合对付圣路易斯市。此后，这两个城市中的同类企业为争夺地方控制权和铁路修筑权，展开了数十年的斗争。芝加哥一些企业大力资助伊利诺伊中央铁路的修筑。该铁路横穿伊利诺伊州。掌握了它，芝加哥便控制了密西西比河中、上游地区与东北部的贸易往来。进而，芝加哥市企业凭借四通八达的铁路网，赢得了控制原料来源和销售市场的主动权，并不断蚕食圣路易斯市所影响的地区，结果使圣路易斯这个中西部重镇丧失了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商业贸易中首屈一指的地位，甚至在一个时期变得一蹶不振。

城市的大规模兴起，便利了工业资本的集中与垄断的形成。这既促使工业的发展超过农业，同时也加剧了工业垄断资本对中小农场主的盘剥，致使城乡矛盾更形尖锐。在城市发展最快的地

区，这一矛盾也就更为突出。如垄断性企业控制了中西部乃至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的农产品价格，销售市场、铁路运输以及金融信贷等，这当然不能不引起农场主和小农户们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所以中西部成为农民协进会、绿背纸币党、农民联盟和人民党等等此伏彼起的农民运动的一个中心地区。

城市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也给美国社会带来一系列剧烈变化。需要认识和解决的纷繁复杂的城市问题接踵而至，成为美国社会面临的新的紧迫问题。

第二节　市政管理与城市问题的恶化

〔*把持市政的“无形政府”*〕　城市的迅速发展，亟需建立与健全相应的市政机构和管理体制。但是90年代以前，美国联邦政府一直奉行自由放任政策，不干预企业活动，对城市事务也疏于过问，从未制定过全国的统一政策和原则。各州对城市的管理则是五花八门，或者由州议会分管，或者由市议会独揽，结果造成城市行政部门普遍软弱、机构设置权限不清，也不完备。再加上美国城市历史较短，缺乏管理经验，这就形成一种权力“真空”，使一些职业政客乘虚而入。这些人平日浪迹于街头巷尾，熟悉城市事务。他们拉帮结伙，并投靠某一大党为进身之阶，进而通过层层党派组织操纵竞选、恩赐官职、安插亲信，构成党派机器把持市政。为避免人们注意，他们多半不出任显要公职，而是通过党派机器在幕后发号施令，实际上是城市政府的“太上皇”，因而时人称之为“城市老板”。这一现象于60年代首先出现于东北部大城市，七八十年代后，随着西部和南部城市的兴起，也像瘟疫一样蔓延到全国各大城市。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城市政府，基本上是在城市老板及其帮派势力把持之下。这就是后

来改革派称谓的“无形政府”时期。[1]

城市老板及其帮派势力得以把持市政、显赫一时的原因，不仅在于市政机构软弱和党派财团的支持，也由于他们能施展手腕去拉拢移民、骗取选票。城市老板多半是移民或其后裔，出身低下，与移民有天然联系。这一特定身份，使移民对他们抱有很大幻想。他们则利用移民初到美国，人地生疏，难于谋求生计的时机，许以小恩小惠进行拉拢。比如一些城市老板专门派代理人常驻码头，接待那些举目无亲的移民，简化他们的入境手续，帮助寻找住所及工作，甚至提供必要的贷款。有的城市老板还在圣诞节之际亲自送给移民一些小礼物，并免费供餐。实际上，城市老板们只是用贪污所得钱财的一小部分来接济移民，但这些小恩小惠确实蒙蔽了许多移民。再加上美国城市人口流动性大，移民对美国政治不甚了解等因素，移民在市政选举时往往支持城市老板，而很少考虑他们的政治意图。凭借移民的选票与支持，这些城市老板麾下的帮派势力得以跻身于市或州一级政府，进而结党营私，把持市政大权。

本来就软弱松散的市政机构，在城市老板的把持下更趋混乱。他们在州、市两级立法部门中安插党棍势力，州议会干预市政的作法，司空见惯。据统计，仅 1867 年一年内纽约州议会所通过的有关该州城市的立法，就超过了整个英国在这以前 30 年的立法总和。[2] 城市政府的实权操在城市老板控制下的立法部门之手，行政部门近于瘫痪，市长也徒有其名。

〔“城市老板”与腐化之风〕　城市老板把持市政，使社会

---

① K.T. 杰克逊等编：《美国历史上的城市》，纽约，1972 年，第 358 页。

② 布莱克·梅克尔维：《1860 至 1915 年间美国的城市化》，纽约，1962 年，第 87 页。

上盛行的政治腐败之风在各城市泛滥起来。按照大多数城市的规定，市议会一般有权管理市政资金的征集和开销，发放市区铁路修筑特许权，签发承包公用事业的合同以及购置城市必备设备等。这些权力的运用，没有正式而严密的法定程序，于是城市老板们就此上下其手。他们通过对市议会的操纵，明目张胆地出售特许权和承包合同，肆行房地产投机和公用事业股票投机。倘若妓院、酒吧的老板乃至某些罪犯能够给他们一笔相应的贿赂，就可为非做歹，肆意妄为；一些大企业向城市老板行贿后，则不仅可逃避正常的课税，甚至连永久的特许权都买得到。至于其他种种以权牟利的肮脏交易，更是不胜枚举。在这方面最典型、也可以说是最臭名昭著的为纽约市老板威廉·M·特威德。

威廉·M·特威德（1823—1878），是苏格兰移民的后裔。早年曾任志愿消防队队长。60年代，他投靠纽约市民主党组织坦慕尼协会（即“坦慕尼厅”）后步入政界。在这一组织中他拼凑起帮派班底，继而通过各种手段控制了整个纽约市的市政大权。60年代后，他的帮派兄弟们一度同时据有该市市长和三个最重要的市法官职位以及其他所有经选举产生的市政官员的职位，此外，还据有纽约州长职位及州议会中很多席位。[①] 特威德本人只担任市监理部主席和市公共工程特派员，但他通过坦慕尼厅的帮派兄弟，享有对纽约市政府的绝对控制权。他手下的帮派弟兄个个刁钻奸滑、老于世故，人称“特威德帮”。他们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把同伙拉入市政部门，如伪造选民名册，谎报选举结果，收买持异议的官员，以及用小恩小惠拉拢移民等；另一方面虚报账目，变相贪污市政资金。特威德要求每一位出任公职者都要虚报账

---

① 杰伊·S·古德曼：《美国城市政府及其政治的变迁》，纽约，1980年，第128页。

目，最初虚报的比率是10%，继而上升到66%，最后竟高达85%。特威德亲自主持建造的纽约县政府办公大楼，竣工后的实际花销相当于该工程原设计所需造价数倍以上。楼内家具和日用品价格也高得惊人。40把椅子和3张桌子便合价179,000美元，每只寒暑表竟达7,500美元以上。[①] 在区区一座大楼的工程上，贪污如此之巨，群情为之哗然。《纽约时报》一语双关地讽刺特威德为“泥水匠大王”。在特威德“当政”期间，“仅1870年1年，纽约市的市政债务就由3,600万美元陡增至9,700万美元，至翌年末，该项债务竟已超过纽约市不动产总值的12%”。[②] 特威德手下的人均善于勒索贿赂，而且名目繁多：只要某家企业或商号向他们奉送一笔可观的酬金，就可得到市政房地产交易的情报，甚至获准开设赌博或卖淫的场所；如果某厂家承包市政工程合同，则须把所得的65%作为回扣给城市老板；如果某家企业违法受控，只要它立即向特威德一伙奉送一笔款子，即可免于起诉，这类贿金被谑称为“免于起诉款”。

特威德只是当时美国城市老板中臭名远扬的一个，其他大大小小满身铜臭的城市老板也比比皆是。在费城，有号称“王”的詹姆斯·麦克梅内斯；在波士顿，有号称“沙皇”的马丁·洛马斯内；在阿尔巴尼，有奥尔康内四兄弟；在芝加哥，因城市发展较快，一度出现几个老板各霸一方的局面；圣路易斯、辛辛那提、匹兹堡等大城市均有各自的城市老板；甚至首都华盛顿特区也在城市老板亚历山大·谢泼德的把持之下。城市老板的普遍存在，使得行贿受贿、假公济私、贪污腐化成为美国城市政府中司空见

---

① 利昂·F·里特沃克等著：《美国史》，新泽西，1982年，第2卷，第495页。

② 贾罗尔·B·曼海姆：《不堪回首：美国政治问题的历史透视》，纽约，1976年，第76页。

惯的现象。从1860到1900年间，全国市政部门的债务由200万美元猛增到14亿美元。这笔钱绝大部分流入城市老板及其党徒们的腰包。在美国史学家哈洛德·津克考察的18个城市老板中，有10个拥有至少100万美元的财产。① 其中，芝加哥的罗杰·沙利文留下遗产价值150万美元以上，费城的麦克梅内斯至少"赚"了240万美元，匹兹堡的克里斯·马吉至少拥有450万美元以上的不动产和其他财产。② 城市政府实际上已成为腐败与无能的象征。无怪乎当时一位著名教育家这样评论说："美国的城市政府是基督教世界中最糟糕的政府——最奢侈、最腐败、最无能。"③

城市老板的出现，实质上是党魁制在城市中的反映。它们不仅代表所属党派的利益，而且也与某些大企业集团沆瀣一气、互相利用。例如，特威德操纵纽约市法院，给铁路业大亨杰伊·古尔德以伊利铁路控制权；作为回报，特威德被聘为该公司的董事兼法律顾问，年薪高达10万美元。④ 从这种肮脏的交易中可以看出，城市老板实际上是集政党势力、市政权力和大企业利益三位于一体。有的城市老板本身就是大企业的代表，尤其是与市政建设有关的一些行业利益的代理人。如费城老板麦克梅内斯拥有对该市各天然气公司的控制权，芝加哥老板沙利文则与该市公用事业各公司过从甚密。有了城市老板的支持，这些企业便可肆无忌惮地为追逐超额利润而横行不法、各行其是，至于应担负的社会义务，则从未予以考虑。其结果必然是造成市政管理混乱和市

① 杰伊·S·古德曼：前引书，第124页。

② K. T. 杰克逊等编：前引书，第365页。

③ 亚历山大·B·卡洛编：《附有评论的美国城市史论文集》，纽约，1973年，第46页。

④ 贾罗尔·曼海姆：前引书，第76页。

政建设的无政府状态。

〔市政管理和贫民窟问题〕　城市的迅速发展，产生了交通、住房、卫生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市议会不得不通过某些立法，对改善市政者予以特权或减课其财产税。由于城市老板从中作祟，与有关企业主从事幕后交易，这种特许权不仅条件慷慨，而且期限很长，往往是50至100年。阿尔巴尼市曾授予某公司以1,000年特许权。至19世纪末，布法罗市还授予某公司以999年特许权。[1] 这种特许权往往变相成为大企业攫取垄断地位的护身符，它们据此更加恣意妄为。如在纽约，授予铺设第一条市区铁路的公司以特许权时，由于该公司事先已用金钱打通关节，市政当局便有意含混其辞，对该公司施工中所占用街道及土地的范围未加明确的限制。结果，该公司在铺轨时随意占地、横穿街道。第一期线路建成后，该公司按规定将其收入的5%上缴市政部门，但对此后铺设线路的利润上缴问题，市政府未作明文规定，因此该公司索性不承担这种义务了。80年代末，各大城市在交通和照明等方面授予特许权时，都存在类似问题。

尽管各城市一再以重金和优厚的条件促进市政建设，但对这方面投资的企业主却醉心于攫取高额利润，往往施工中敷衍塞责、质量低劣，市政工程建设进展不大。更重要的是，私营企业利用所获得的特许权，开始大量控制城市公用事业。据统计，1900年时，归私营企业所有的水厂为1,539个，煤气厂951个，发电厂2,572个；而归市政府管辖的水厂、煤气厂和发电厂则分别为1,787个，14个，490个。[2] 又如1899年时，各城市营运的

---

① 查尔斯·格莱布等：前引书，第190页。

② E.S.格里菲思：《近代英美城市政府的发展》，伦敦，1972年，第80页。

3,326条交通线路中，约有46%归私营企业所有与经营。[1] 甚至有的整个城市都由一个大企业独家创建与直接掌管。较典型的例子是1880年普尔曼公司创建的普尔曼城，那里除学校以外的一切设施都归该公司所有。普尔曼公司创建该城旨在提高本企业经济效益，而对工人们的居住及生活条件则漠然置之，因而，那里居住条件的恶劣程度和其他城市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1894年爆发的震惊全国的普尔曼工人大罢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居住条件的恶化。

杂乱无章的市政管理加剧了城市建设的无政府状态。城市的公用事业、服务性行业等远远跟不上城市发展的需要；即使有所发展，也是参差不齐，毫无计划和秩序。以排水系统的建设为例，至19世纪末，很多城市仍未建成较完备的排水系统。在费城和圣路易斯，其排水系统总长度仅相当于这两个城市街道总长度的一半多一点，而巴尔的摩、新奥尔良和莫比尔等城市依旧大部靠露天排水沟排泄污水。[2] 各城市的污染问题也相当严重。当时有人对匹兹堡作了如下的描述："好的时候，它是一个烟雾弥漫、阴沉沉的城市；糟糕的时候，几乎想像不出还有什么地方比它更肮脏、更混乱、更令人沮丧。"[3] 只有在假日，大多数工厂歇工时，那里的空气才会显得清朗些。

市政建设的弊端更集中、更鲜明地反映在贫民窟问题上。随着工业勃兴，大批移民涌入城市。企业主们一味榨取他们的劳动，而很少投资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导致市区内住房紧缺。房地产商人则趁机大肆进行投机活动，从中牟取暴利。他们或者把

① 查尔斯·格莱布编：《美国城市史文献》，伊利诺伊，1963年，第179页。
② 查尔斯·格莱布编：前引书，第179页。
③ 查尔斯·格莱布编：前引书，第236页。

所占有的地皮划成小块待价而沽，或者兴建简陋住宅，或者改建旧房，以出租营利，如将原独户住宅改建成可容纳 8 至 12 户居住的小单元房间。这样，贫民窟开始大批形成，尤其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发展较快的地方这种现象更为突出。"1890 年，美国平均每套住宅居住 5.45 人，而纽约市却高达 18.52 人，辛辛那提是 8.87 人，芝加哥是 8.6 人，波士顿是 8.52 人，哈特福德是 8.12 人，蒙大拿是 4.9 人。"① 纽约市的人口密度显然居于首位。1879 年，纽约市的贫民窟住宅即已有21,000 个，至 1900 年更增至43,000 个，容纳居民高达 150 万，而当时整个纽约市人口尚不足 400 万。

在贫民窟内，人口过度拥挤，房屋建设简陋、公用设施奇缺。诸如室内照明、通风、取暖、卫生设施等条件都极差。很多贫民窟集中区既缺少排水系统，又无污物处理设施，巷口和露天阴沟常遍布垃圾和污水，空气中也弥漫着腐败的气味。当时一位美国《太阳报》的年轻记者雅各布·里斯深入纽约市贫民窟进行实地考察，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写出《那一半人怎样生活?》一书，真实地披露了贫民窟居民的悲惨处境，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他在书中写道："这些楼层的全部新鲜空气都是从那扇永远乒乓作响的过道门和那些黑洞洞的卧室窗户透过来的……过道里到处都是污水坑，所有的住户都由此出入，因而在炎夏之际也都要忍受这些臭气熏天的污水坑的毒害……几堵阴暗的砖墙之间的间隙是（所谓的）院子，那上边有一狭长的烟尘弥漫的天空才是这里居民所能望到的苍天。"② 另据 1884 年关于芝加哥贫民窟的一份调查报告反映，这种住房"完全违反了排水设备、管道

---

① 卡尔·戴格勒：前引书，第 312 页。

② 雅各布·里斯：《那一半人怎样生活?》，纽约，1890 年，第 43—44 页。

装设、照明、通风、防备火灾或意外事故等安全设施的所有规定；无视一切卫生法规；阴沟和厕所均令人作呕；挤得水泄不通的房屋又脏又暗；导致他们的食物易于腐烂；周围的街巷以及堆满腐烂东西和遍地臭水坑的后面空地也同样肮脏不堪。”[①] 在贫民窟集中区，由于住处拥挤而简陋，火灾也屡见不鲜。然而，就是从这些改建或新建的如此简陋的住房中，房地产商人仍攫取了惊人的利润。他们所索取的房租几乎都是敲诈性的，一般房租的年利润均相当于该房产总值的 10% 至 12%，有的甚至高达 40%。[②] 而且，破旧的房屋也不予以及时修缮，房主对那些无力支付或不愿预付房租的住户不是进行起诉，就是加以驱逐。

在贫民窟集中区，卫生设施极不完备。很多城市垃圾无法处理，只得就地掩埋，或倾倒在露天阴沟。这些垃圾传播疾病自不待说，还因堆积日久，流淌至邻近水井污染水源，人们饮用后大量罹病。1880 年，纽约市曾对 85 口水井进行检测，结果发现只有一口井水质未受污染，尚可饮用，被标明为“好井”。八、九十年代，没有任何城市对饮水进行过滤或消毒。

恶劣的环境导致疾病流行，霍乱、伤寒、白喉等流行病四处蔓延，威胁着贫民窟居民的健康与生命。1873 年，孟菲斯的贫民窟区首先发生一场流行病，随后迅速扩散，致使该市人口损失达 10%。[③] 贫民窟居民的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死亡率直线上升，这在婴幼儿中更为突出。据记载，“19 世纪末在芝加哥的一个区里，每 5 个婴儿中有 3 个在未满周岁时就夭亡了”。[④]

---

① 方纳：前引书，第 23 页。

② 查尔斯·格莱布：前引书，第 167 页。

③ 托马斯·科克伦等：前引书，第 265 页。

④ 奥斯卡·汉德林：《背井离乡的人们：构成美国民族的巨大移民群的非凡经历》，波士顿，1973 年，第 139 页。

贫民窟及其恶劣的环境不仅威胁着贫民窟居民的日常生活，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大企业的正常生产，成为整个社会的突出问题，这就迫使一些城市不得不采取一些改善措施。1879年，纽约市首次通过“贫民窟法案”，倡导兴建哑铃式住宅。这种建筑在楼房之间有一定空间，与原有的挤得水泄不通的贫民窟相比，可谓一种改善。但是，按此标准兴建的住房未过多久也变得拥挤不堪。其他城市的住房情况也曾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持续的时间同样有限。“直到1908年，纽约市还未对经济公寓式的住房采取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其他城市在制定有效措施方面更是一拖再拖。”①

〔居住区的分化以及黑人聚居区的形成〕　随着移民的不断涌入和贫民窟环境的日益恶化，市中心区逐渐变得破旧而混乱。腰缠万贯的工商业巨头们索性迁往市郊，也就是当时的城市外沿，选择宽敞恬静、景色宜人的地方建造豪华的宅第、别墅和舞厅等，动辄耗资千万美元。一些经济地位逐渐上升的新中产阶级也随之外迁。随着城市面积不断扩展，向郊区迁移也就形成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无力外迁的普通市民如新移民和非熟练工人等贫困阶层只得留在市中心区。这一现象是继七、八十年代市内交通的改善后，相继在各大城市出现的，其中以芝加哥最为典型。该市的居住区大致可分为三层：里层也称内城或中心商业区，居住着贫困的市民和新移民；最外层是富豪阶层的住所；中间层则是日益富裕的新中产阶级住户；此外，市内还有几处环境宜人的地方成了阔佬们的城中之城。在那里，挤得水泄不通的贫民窟和富丽堂皇的豪华宅第形成鲜明对照。当时欧洲的一些来访者发现芝加哥的贫富悬殊状况仅次于英国的伦敦，顿觉不寒而

① 托马斯·科克伦等：前引书，第265页。

栗。又如在纽约，居住区分离的结果在该市东南部形成一个贫民窟最集中的社区，其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竟达 50 万人，居世界之首位。①

这一时期居住区分布中的另一重要现象是黑人聚居区的初步形成。内战后，由于黑人社会地位的部分改善和南部经济结构的变更，首先出现大批黑人移居南部城市的浪潮，70 年代后，这一浪潮转向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1870 至 1880 年间，平均每年离开南部的黑人约68,000 人，此后逐年增加，至 1900 年时已达194,000 人。这些黑人绝大部分都涌入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例如，从 1870 到 1890 年，芝加哥的黑人人口就增加了三倍。另据统计，到 1900 年，黑人居民在5,000 人以上的城市有 72 个，纽约和费城的黑人数量分别是50,000 人，华盛顿、巴尔的摩、新奥尔良等城市的黑人数量则更多一些，在孟菲斯、亚特兰大、萨凡纳、什里夫波特等南部城市，黑人的数量甚至超过了白人。但就黑人城市人口占各地区黑人总数的比例而言，1900 年时南部仅占 20%，而在东北部和中西部，这一比例却高达 70%。也就是说，在后两个地区中的黑人，大都是居住在城市中的。

内战后最初十年，城市中的黑人和白人还是混居的。八九十年代以后，南部种族主义日益猖獗，黑人不断受到政治迫害和种族歧视，地位每况愈下。"吉姆·克劳法"所规定的住房及生活方面的隔离，对黑人来说更是雪上加霜。随着大批黑人移居城市，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也由乡村到城市、由南部向北部蔓延开来。在城市中，为防范种族主义者的暴力骚扰并彼此照应，黑人倾向于聚居，再加上富有的白人不断外迁，市中心区逐渐形成黑人聚居的地方。在这些聚居区里，黑人不仅住处拥挤，而且受到种种盘

---

① K.T. 杰克逊等编：前引书，第 181 页。

剥和歧视。1885年，纽约市一家黑人报纸宣称，仅房租一项就至少要耗费普通黑人居民收入的1/3以上，有时甚至高达1/2，而这些住房都十分简陋，根本不值这样高的租金。从总体上看，虽然黑人聚居区还不如20世纪时那样明确、固定，但在北部已具雏形。黑人聚居区的初步形成，加速了整个城市居住区的分化。

社会问题在城市的集中，自然造成较尖锐的社会矛盾。处在社会底层的工人群众，直接处于社会矛盾的漩涡之中，迫切要求自身状况的改善，多次以有组织的形式进行斗争。在城市发展较快的地区，往往也是工人运动高涨的地区。1886年遍及全国的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仅在芝加哥一个城市就有40,000人参加罢工，轰动一时的秣市惨案就发生在那里。1892年匹兹堡附近的霍姆斯特德工人大罢工和1894年工厂城普尔曼工人大罢工，都是美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重大工人斗争。

黑人也不甘于屈辱的地位，他们自发地组成各种团体，甚至联合起来筹建自己的企业、保险公司、教会等。但黑人的这些活动经常遭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野蛮干预和破坏，以致酿成1900年纽约市的种族大骚乱。大批黑人不仅在骚乱中遇难，而且损失了仅有的财产。种族关系日趋紧张，成为美国城市所特有的一大矛盾。

城市中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也表现在犯罪问题上。据人口普查的有关资料，从1880到1890年，全国犯罪收监率上升50%，大部分案件都发生在城市。另据芝加哥《时报》披露，从1881到1898年，该市杀人案件从1,266起剧增到7,480起。纵横交错的社会矛盾，使城市成为“风暴的中心”。① 雅各布·里斯一针见

---

① 托马斯·科克伦等：前引书，第250页。

血地指出："或者是我们扫除贫民窟，或者是贫民窟吞噬我们，非此即彼"。① 城市问题日益上升为全国性的首要问题，引起整个社会的普遍关注，终于在90年代形成声势浩大的城市改革运动。

第三节 市政改革的尝试

〔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及其作用〕 城市人口增多，形成对报刊书籍的迫切需求，使新闻出版业成为一个相当有利可图的部门，吸引了大量资本。在竞争中新闻出版业不断采用新技术。七八十年代以后，排版机、轮转印刷机和折报机等相继发明并投入使用，变革了整个印刷过程。1879年，国会又通过邮政法，将杂志列为二级邮件，更刺激了新闻出版业的发展。

1870年，全国的报纸发行量为280万份，到1899年跃增为2，400万份。在各家报纸之中，约瑟夫·普利策主办的《世界报》最负盛名。这份报纸不仅最早使用套色印刷，而且敢于披露市政内幕、抨击时弊，因而畅销一时。1886年，即该报创刊仅3年，其发行量即已达到25万份，到19世纪末，成为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当然，在抨击时弊的同时，普利策也常常以言过其实、耸人听闻的报道招揽读者，扩大发行量，这种手法被人们概称为"黄色新闻"。② 在报纸发行量剧增的同时，反映城市生活的各种杂志也竞相问世。除原有的早期杂志外，《麦克卢尔》、《大众科学》、《全国地理》、《妇女家庭》等刊物也开始

---

① 转引自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民主的历程》，纽约，1973年，第284页。

② 因普利策在《世界报》上刊载一套连环漫画以黄色颜料为底色而得名。

称誉舆坛。其中1883年创刊的《妇女家庭》杂志到1890年发行量即高达100万份。

新闻出版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丰富了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它为城市改革运动提供了一个强大的舆论阵地。在纽约市老板特威德“当政”期间，《时报》和《哈珀周刊》等曾刊载大量文章，把他和坦慕尼厅的大量丑闻公诸于众。“从1870年9月20日起整整一年时间，《时报》对‘特威德帮’及其同伙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抨击，一天也未中止。”① 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在《哈珀周刊》上刊登多幅既泼辣尖刻、又通俗易懂的漫画，使得很多不懂英文的移民也开始认清了特威德一伙的本来面目。这一切使得特威德和坦慕尼厅声名狼藉，再加上特威德一伙贪污甚巨，全市财政濒于崩溃，很多投资于市政建设的银行家和企业主也忧心忡忡，对他们产生不满。在这些因素作用下，特威德受到起诉和公审，最后于1878年死于狱中。1894年，牧师查尔斯·帕克赫斯特专程赴曼哈顿岛考察，将那里令人作呕的居住状况以及市政官员与某些企业主互相庇护、朋比为奸的丑闻如实地反映给新闻界。这些确凿的证据激起选民们的强烈不满，法庭不得不进行调查，结果使坦慕尼厅推举的候选人连续两年未能得到市议会的席位。在芝加哥，英国记者威廉·斯特德撰写了《如果耶稣降临芝加哥》一书，生动地揭露了在伊利诺伊一些大城市中，政客、警察和犯罪分子之间所从事的不可告人的肮脏交易。据说此书出版当天即售出7,000册，引发了芝加哥市的一场改革运动，并不断促使人们对该市和其他城市中此类问题的关注。②

---

① 亚历山大·卡洛编：前引书，第193页。

② 查尔斯·格莱布等：前引书，第216页。

各种书刊杂志对市政腐败的揭露与鞭挞，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要求改革的呼声空前高涨，城市改革运动逐步形成。19世纪末叶的城市改革运动，因参加的阶层比较广泛，声势颇为浩大。根据改革所采取的不同途径和侧重点，这一运动主要分为两翼：一翼面向城市下层，主张改革贫民窟以矫正社会弊端；另一翼着眼于市政机构，旨在取缔城市老板，提高市政机构的效能。

〔改造贫民窟的社区改良运动〕　社区改良运动，主要是用改善贫民窟居民生活及文化水平的方法来改造贫民窟。它的倡导者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中以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女学生居多。他们对市政机构中盛行的腐败现象固然深感忧虑，但认为社会之所以动荡不安，主要原因在于贫民窟居民的生活条件的不断恶化，如果任其发展，以至达到贫民窟居民无法忍受的程度，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与其改革市政机构，不如直接帮助城市下层居民，使之摆脱困境。这种作法在当时已有先例可援。七八十年代的英国，一些社会改革者曾用救济和教育贫民的方法改造伦敦市有名的贫民窟集中区伦敦东区，收到一定效果，如1884年创建的“汤因比厅”，即是一有效的尝试。

1887至1888年，美国社区改良运动的主要倡导人简·亚当斯赴英考察，并详细参观了汤因比厅。回国后，她立即和朋友艾伦·斯塔尔于1889年创办“赫尔会所”。这个会所坐落在芝加哥市贫民窟集中区，原名赫尔大楼。赫尔会所建成后，最初是作为日间托儿所兼辅导妇女家务，后来增设成人文化补习课程，以及音乐、美术教育等。参加这些活动者一概免费。这一会所的创办深得人心，其他城市的改革者纷纷仿效，在东北部和中西部的一些大城市相继创办此类设施，如波士顿的“南端会所”，纽约市的“格林威会所”，“亨利街社会福利院”等。到1895年，全国

至少有50所此类会所，而且其数量还在不断地增加。[1] 改革者认为，在最贫困的社区创办会所，供那里的居民居住、学习和娱乐，就会在他们的指导下，形成一些社区的教育和娱乐中心。这样，既可改善那里居民的生活状况，又可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水平，增强生活上的自立能力，从而缩小他们与“特权阶层”之间的鸿沟，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水平。改革者们还组成保护儿童俱乐部，开辟娱乐场地，建立图书馆、体育馆等，并敦促市政府建造公园。亚当斯本人甚至设法谋得本社区的垃圾监管员职务，以便监督地产商和垃圾承包商履行其义务。

改革者们深入贫民窟集中区，不仅努力帮助那里的居民提高文化生活水平，而且还试图通过实地考察贫民窟现状，以制订具体改造方案。通过实地考察，他们收集了大量资料，撰写出一批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如亚当斯的《赫尔会所图文集》，劳伦斯·威利尔和罗伯特·德雷斯特合著的《贫民窟住宅问题》，罗伯特·亨特的《芝加哥贫民窟状况》等等。这些著作的出版，进一步唤起整个社会对贫民窟问题的重视，并在很大程度上为一些改革性立法提供了依据。

当然，社区改良运动仅局限于东北部和中西部一些大城市，未能在全国广泛展开，改革者们试图凭自身的力量来解决整个社会中两极分化的现实，不啻杯水车薪。但这些活动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给贫民窟居民提供了多少直接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它开创了社区改良的实验，启发与教育了社会公众，对当时和以后的社会改革都产生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进入20世纪后，这一改革运动仍方兴未艾，并且对30年代罗斯福推行“新政”也有一定影响。甚至时至今日，很多社区改良组织都是从19世纪末这场

① 查尔斯·格莱布著：前引书，第238页。

改良运动中繁衍下来的。

〔取缔"城市老板"的市政机构改革〕　市政机构改革运动的声势和历史影响，都比社区改良运动大得多。这一改革是由资产阶级中上层发起的，如各新兴工业部门的大企业主和董事、大商人、大银行家、不动产行业和保险公司的大股东，以及部分与其利益有关的新中产阶级。他们之所以积极主张市政机构改革，完全是从本阶级利益出发的。内战后经济的蓬勃发展，为他们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投资环境和赢利机会，因而一度无暇顾及市政权力的归属。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老板作为权力结构的一种补充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尚可反映他们的利益。但在城市老板把持之下，市政机构积弊日重：一方面，城市老板仅仅反映某个党派、某些财团的利益，毕竟不是整个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不利于整个资产阶级内部的权力平衡；另一方面，城市老板热衷于牟取金钱，毫无管理市政的责任感，导致市政管理混乱，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为了缓解乃至平息这种动荡局面，并使切身利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必须取缔城市老板。但城市老板权势盘根错节，又施展种种笼络手段取得了移民的支持，因而轻易难以根除，惟有采取强有力的改革措施。这样，八九十年代以后，各大城市几乎不约而同地掀起了市政机构的改革运动。

市政机构改革初期所提出的纲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张城市自治，以排除州立法部门对市政的过分干预；第二，加强城市行政部门、尤其是市长的权限，以遏制城市老板通过市议会干预市政；第三，城市选举实行超党派原则，并与州一级选举分别进行，尽量减少城市政府的政治色彩，以杜绝城市老板倚仗党派势力操纵市政；第四，起用专门人才主管城市行政事务，按企业管理的模式对城市实行科学管理。总之，改革的焦点在于从根本上取缔城市老板及其帮派势力，代之以由"有才干的

企业家管理的、经济与有效能”的城市政府。①

80年代中期以后，在各大中城市纷纷涌现出许多由大企业主、银行家、大商人等组成的改革组织，如企业家俱乐部、市民俱乐部等，连许多商会也成了改革性组织。到1896年，全国共有此类改革团体200多个。② 在这些团体中较为突出的是芝加哥市民联盟，该联盟曾在1896和1897年两次市政选举中获很多席位，在议会中占优势，便利了改革的进行。在这些改革团体的推动下，改革纲领部分地得到实现。1888年，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最先实行了超党派的市政选举。③ 与此同时，这些改革团体还推举一些企业家竞选市长，以市长职位为阵地展开改革，号称“强市长”。这些市长大都侧重机构改革，在扩大城市自治权、加强城市行政部门权力和提高行政效率方面都作了一定的努力。如布法罗市长格罗弗·克利夫兰屡次施行否决权，否决了党派机器操纵下的市议会通过的很多法案，被人们誉为“否决市长”。他的做法受到改革派的嘉许，后来被推举为总统候选人并当选。④ 在这方面较有作为的市长还有纽约市长塞恩·洛，旧金山市长詹姆斯·费伦等。另外，也有某些市长试图进行某些社会改革，代表人物为底特律市长黑曾·平格里，克利夫兰市长汤姆·约翰逊，特利多市长塞缪尔·琼斯。他们所进行的社会改革主要是赋税改革、市内交通改革和公用事业收归政府所有等。

市政机构改革运动在19世纪末已初步展开并持续发展，但步调很不一致，就其所取得的直接成果而言也很有限，而且很不

---

① 塞缪尔·海斯：“进步运动时期城市政府的改革政纲”，载《太平洋西北季刊》，1964年10月号。

② 查尔斯·格莱布编：前引书，第371页。

③ 杰伊·古德曼：前引书，第133页。

④ 威廉·温特：《美国城市的政治组织形式》，纽约，1969年，第71页。

巩固。这固然是与后来声势浩大的进步运动尚未全面展开、以致市政改革势孤力单有关，但从运动的本身来看，也有其局限性。这明显表现在：领导改革的大资产阶级热衷于如何从城市老板手中夺取市政权力，而对城市中下层人民摆脱困境的要求都不屑一顾，更不肯与社区改良运动联合起来。他们所提出的城市自治、超党派的市政以及赋税平等之类改革纲领对移民、劳工、少数民族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它们丝毫没有涉及他们亟需解决的住房、就业等问题。相反，城市老板却千方百计地拉拢这些人地两生的移民，部分地解决了他们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甚至在移民与土生白人发生矛盾时，城市老板还出面调停，俨然成了移民的“保护人”。相形之下，移民们出自对城市老板的感激，宁愿让他们当权，也不愿响应市政机构改革派的空洞口号。因而每逢市政选举，改革派所得选票大部来自富有者阶层居住的选区，而在贫困者集中的选区却得票寥寥。他们的改革成果当然也就很难保持下去。市政机构改革运动发展得比较缓慢而艰难的另一个原因是，城市老板的权势盘根错节，在州、市两级都有支持他们的政党机器，而且市政腐败与州一级政府的党派专权有着密切的关联。费城的改革最能说明这个问题。80 年代，该市改革派经过近 10 年的努力方罢黜城市老板麦克梅内斯，可是，州共和党老板马修·奎伊随即又把戴维·马丁安插进去，改革成果毁于一旦。[①] 由此可见，仅仅推举几个改革派市长或进行某些枝节改革，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如欲摧毁城市老板的政治基础，必须在体制上予以彻底改革，而且这种改革应与州的改革同步进行。

1894 年，全国 46 个改革团体的代表在费城集会，商讨联合

---

① 布莱克·梅克尔维：前引书，第 96 页。

起来进行改革的问题，翌年组成了“全国市政同盟”。这标志着市政机构改革运动已发展到全国规模。该同盟成立后，协助各市建立改革组织，出版探讨改革的刊物，并派代表赴欧洲、主要是英国考察，借鉴其市政管理经验，推动了改革的深入发展。1898年，该同盟又制定“城市章程范本”，主张加强城市行政部门的权力，推广“强市长”的经验。在运动深入发展过程中，又出现大量探讨改革的论著。这些论著无一例外地主张将企业管理模式试用于市政机构，并提出很多具体措施，从而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纲领。而且，进入20世纪后，进步运动逐渐在州和联邦政府中形成一股强大的攻势，有力地带动了各个方面的改革。在以上诸因素的作用下，市政机构改革取得了较大进展，新的体制开始确立，城市委员会制和城市经理制相继应运而生。

〔社会福音运动及各派教会对城市问题的态度〕　面临八九十年代社会两极分化现象和社会动荡的局面，美国各派教会已无法置身世外了。为了保持对下层群众的影响，各派教会不得不放弃它们不干预社会事务的传统，转而致力于城市改革。

新教是最先起来探讨城市问题的。这一教派在美国传播时间较长，具有很大影响。从传统上讲，新教主张当个人面临不幸时，应努力进行“个人自救”，教会不应干预。但是，到19世纪末，美国已成为高度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经济结构和社会阶级结构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一方面把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残酷的生存竞争之中，整个社会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个人自救”的说教对人们、尤其是下层教徒已失去说服力；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化而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实用主义等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对传统的基督教义构成尖锐的挑战。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交叉作用下，人们对基督教逐渐失去信仰，教徒数量锐减。这种情况使很多新教首脑人物忧心

忡忡。现实表明，原有的教义已无法适应正在经历着剧烈变革的社会的需要，亟需改变。在这种形势下，社会福音运动应运而生了。

社会福音运动的信念是：人生于“一个罪恶的社会，这一事实乃是产生深重罪恶的根源”，解救办法是耶稣下凡“建立一个新的环境”，来“拯救难以管教的人们，改造罪恶的社会”，因此教徒应成为社会改革者。这种信念被概括为“教会的社会信条”。[①] 这些改革教义的思想在七八十年代已初露端倪，后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福音运动，至90年代达到高潮。参加这场运动的教士，一般可分为两派：自由派教士只主张工资、住房和劳动条件的某些改革；而激进派教士则不仅主张改善劳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而且反对联邦政府实行的自由放任政策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哲学，甚至宣称要改变全国的企业体制以拯救人类。其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华盛顿·格拉登和沃尔特·劳申布施，他们的代表作分别为《实用的基督教》和《基督教社会的危机》。这些书在当时影响很大，对社会福音运动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八九十年代后，福音派教士纷纷走出教会大门，筹建各种慈善机构，开办各种神学讨论班，开设社会基督教和社会伦理学课程。在这些活动中，最有影响的是“救世军”组织。它是1878年由英国卫理公会牧师威廉·布思在伦敦首创，1880年传入美国。救世军的宗旨是帮助城市中信教甚至不信教的贫穷居民。它向社会呼吁：“溺水者需要（救援的）绳索，而不是空洞的宗教说教”。[②] 为此，救世军专设“贫民窟支队”，深入贫民窟集中区，创办医院和贫民救济所，组织儿童俱乐部，建立各种社会救

---

① 《美国大百科全书》，1980年，第25卷，第127页。

② 查尔斯·格莱布等：前引书，第236页。

济机构等。福音派教士还创建大批学校，并大力发展青年组织。在他们的倡导及组织下，50年代创立的“基督教男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均有较大发展，至1897年时会员分别达到26万和3万余人。社会福音运动的不断深入，逐渐消弭了教派之间的分歧。进入20世纪后形成了全国性组织“联邦基督教协进会”，将社会福音运动推向一个更有组织的阶段。

社会福音运动的很多主张无论对当时的城市改革，还是对美国宗教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强烈影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中很多主张“在30年代的‘新政’立法中得到体现”,[①] 也决非偶然。但是，社会福音运动并未得到新教各个派别的一致响应。如浸礼会、卫理公会等主要由熟练工匠、富裕农场主乃至大企业主所组成的教派，依旧主张个人对罪过负责，宗教不干预社会事务。对城市改革的这种消极态度当然与他们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有直接关系。如石油业大亨洛克菲勒就是个有名的浸礼会长老；股票市场大亨丹尼尔·德鲁是位狂热的卫理公会教徒。至20世纪初，随着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日益发展，社会福音运动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逐渐失去号召力。

社会福音运动的局限性，更突出地反映在新教对美国的其他教派持排斥态度，尤其是对美国另一大教派天主教所持的敌视态度上。19世纪后期，正是美国天主教徒急剧增加的时期。1860年时美国天主教徒为300万，到1895年已达1250万之多。[②] 在80年代以后涌入美国的大批“新移民”中，除犹太教徒外，大部分是天主教徒，而这些天主教徒多半都很贫穷。他们来到美国后，纷纷涌入城市。美国的天主教会不同于各派新教，它在传统

① 威廉·哈里斯等编：《新哥伦比亚百科全书》，纽约，1975年，第2549页。

② 西德尼·阿尔斯特罗姆：《美国人民宗教史》，纽黑文，1972年，第827页。

上关心穷苦教徒的需要。内战以前，天主教在东北部城市中曾进行过慈善活动，内战后，这种活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其他城市。天主教不仅开展慈善救济活动，而且创办学校，开设英语课程等，旨在帮助移民能更快地适应美国的城市化环境。但这些活动却引起某些新教首脑人物的猜忌，他们惟恐天主教徒通过这些活动控制城市，进而影响全国。再加上当时出现的民族纠纷，新老移民间的矛盾等因素，反天主教的恐怖活动日趋表面化。1887 年组成的“美国保护协会”，就有意利用这些矛盾，排斥打击天主教会及其教徒，因此天主教的慈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

在宗教领域所展开的社会改革，虽然主要是慈善活动和某些宣传鼓动，但宗教界能够正视现实，摆脱传统教规束缚，不同程度地参与社会事务，这本身在教义上就是一个巨大的突破，而且对城市改革具有推动作用。

〔*妇女参政权运动和禁酒运动*〕　19 世纪下半期的美国妇女，已逐渐成为整个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走出家门，到户外工作。在内战后到 19 世纪末这段时间，女子参加工作的人数急剧增加，其增长速度超过男子，也超过了妇女总人口的增长速度。1870 到 1900 年间，妇女人口总数上升了 48.7%，而妇女参加工作的人数则跃增了 64%。[1] 与此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妇女进入大学和专科学校学习。内战后，为女子专设的学校相继涌现，如瓦萨学院、威尔斯利学院、史密斯学院、布赖恩·玛尔学院等。许多州立学校也取消了对妇女的限制，到 1900 年，全国 80%的学院、大学以及专科学校都接受妇女了。而且，又出现一些男女合校的私立大学。这就为妇女提供了较充足的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妇女们参加工作和享受高等教育，开

---

① 格伦·波特主编：前引书，第 991 页。

阔了眼界，增强了社会参与意识，同时也产生了改善自身在社会中地位的要求，因此，大量妇女投身到19世纪末的改革洪流中，如社区改良运动即是以妇女为主体的改革。在改革活动中，妇女们日益意识到争取参政权的必要性，并为此进行了持久不懈的努力。

争取妇女参政权的斗争，起步于40年代，但当时参加斗争人数少，影响有限。八九十年代后，才开始形成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的斗争，并涌现出一些著名的领袖人物，苏珊·布劳内尔·安东尼即是突出的一个。安东尼于1820年生于马萨诸塞州亚当斯市一个笃信教友派的家庭。内战时期，她是反奴隶制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内战后，全力投入妇女参政权的斗争。当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授予所有男性公民选举权时，她曾力图使妇女享有同样权力，但未成功。后来，她与著名女权运动领导人伊利莎白·卡迪·斯坦顿合作，在纽约出版了《革命》周刊，主张妇女应享有选举权、对自己财产支配权、以及离婚后对子女的监护权等，并为此到全国各地游说，争取广泛的同情与支持。

但是，对于如何争取妇女参政权，安东尼和其他女权领导人之间存在很大分歧，以致形成两大派别。以安东尼和斯坦顿为代表的一派，主张通过联邦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实现妇女参政权，她们于1869年5月组成全国妇女参政权协会。以露西·斯通和朱利亚·W·豪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以各州宪法修正案形式实现妇女参政权更为可行，她们于同年11月另组美国妇女参政权协会，并出版《妇女杂志》。这种组织上的分歧极大地削弱了妇女参政权运动的力量。再加上当时社会变动，问题纷杂，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因此妇女参政权的斗争进展较迟缓。直到1890年，这两大组织才联合起来，组成全美妇女参政权协会，并将两派主张结合起来，提出以联邦宪法修正案或各州宪法修正案两条途径去

争取妇女参政权。斯坦顿为该协会首届主席。两个组织的联合增强了妇女参政权运动的声势和实力，因而获得较明显进展。至19世纪末，已有怀俄明州、科罗拉多州、犹他州、爱达荷州等授予妇女以选举权。

很多妇女在争取参政权的同时，也积极投入禁酒运动。当时最活跃的禁酒组织是1874年组成的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该组织建立之初，其纲领较温和，仅仅试图诉诸于社会道德的力量来实现禁酒。1879年弗朗西斯·韦拉德出任主席后始有较大变化。她不赞成搞单纯的禁酒斗争，而主张与其他方面改革运动实行广泛的联合。此后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支持妇女参政权斗争、服饰改革、人民党运动，甚至劳工运动。结果，该组织声誉日增，到1890年，会员已达16万人。[①] 当时致力于妇女、儿童、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改革的某些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的影响，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的改革。

当然，这一时期的妇女参政权运动和禁酒运动还处于初期阶段，未取得十分明显而巨大的成就。但这些运动已达于全国规模，并且形成有组织的斗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都为20世纪的进一步改革准备了必不可少的有利条件。

〔市内交通及市政建设其他方面的改进〕　由于城市勃兴所产生的客观要求和市政特许权的刺激，市政建设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善，尤其是在市内交通方面。

19世纪上半期，各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是“有轨马车”。这种马车在铁轨上行驶，车厢很长，一般可载40个乘客，最多可容纳74人。但这种车在市中心区行驶颇为不便，尤其在上、下

---

① 罗伯特·凯利：《美国过去的形成》，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86年，第421页。

班高峰时，往往车辆堵塞，影响交通。尽管如此，因一时还未出现更好的交通工具取代它，直到 80 年代仍在应用。

60 年代，有人试图将蒸汽机车应用于市内交通，但因这种机车车体庞大，不宜在市区街道上行驶，于是出现了“高架铁路”的构想。1867 年，纽约市架设第一条高架铁路。这种“火车”通常是由一辆小型蒸汽机车牵引四个车厢，运载能力较强。八九十年代，芝加哥、堪萨斯等城市相继建造了一些高架铁路。

70 年代，人们又发明了“缆车”。这种车也是在铁轨上行驶，通过车下悬浮的钢缆绳进行操纵。它的速度相当于有轨马车两倍以上，而且适于爬坡，在旧金山这样的山城尤为适用。1873 年旧金山市率先使用缆车，随后也有一些城市采用之。

然而，高架铁路和缆车均有缺陷，或是造价昂贵，或是使用不便，不宜大规模推广。城市交通的重大技术突破是电力的应用。80 年代，电机的发明为电力的应用开辟了广阔途径。不久，安那波利斯市一位工程师弗兰克·J·斯普拉格成功地设计出有轨电车，并进行了远程输电试验。1887 年，他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建成美国第一条市内电气化铁路，即有轨电车。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与改进，有轨电车的造价下降且效能提高，很快在各城市风行起来。1890 年，全国已有 51 个城市使用了有轨电车，5 年后，全国的有轨电车系统达 850 条，线路总长度达 1 万英里。[①] 有轨电车的出现使有轨马车大为逊色。1890 年，在市内铁轨线路总长度中，有轨马车尚占 69.7%，到 1902 年陡降至 1.1%，而有轨电车所占比例则高达 97%。[②] 尽管这时的有轨电车还有许多尚需改进之处，但它和以前的市内交通工具相比，在基本造价、

① 查尔斯·格莱布等：前引书，第 160 页。

② 查尔斯·格莱布等：前引书，第 160 页。

安全性能、运载能力等方面均居明显优势，所使用的动力也由马力和蒸汽变为电力，因此，它的发明及其应用是城市交通史上的一个巨大飞跃。

除市内交通以外，市政建设在照明、通讯、建筑以及桥梁架设等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改进。爱迪生发明白炽灯后，最早被用于室内照明。如 1884 年，芝加哥全市住房都采用了电灯照明。1897 年，电弧光灯问世，取代火苗跳跃不定的汽灯而成为户外照明的主要用具。八九十年代后，电报和电话也进入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领域，极大地便利了城市内部以及各城市间的信息传递。

在建筑方面，集中供热系统和钢架结构建筑法先后于七八十年代试行，标志着建筑水平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高层建筑得以风靡一时。如芝加哥开始以其成群的十余层高的摩天大楼而名噪一时。

城市间的频繁往来，也刺激了桥梁的架设。到 1909 年，全国共架设了长度在 500 英尺以上的桥梁达 365 座。这些桥梁，不仅架设速度快，而且技术水平高超。如 1883 年落成的“纽约——布鲁克林大桥”，长达 1 英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悬桥。[①]

总之，由于种种因素的刺激，市政建设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善，但就总体而言，仍有众多庞杂的问题亟待解决。诚如有的美国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这一时期城市虽有改进，“但仍保留了许多丑恶和野蛮的特色”。[②] 八九十年代所展开的城市改革运动，虽步履艰难，但毕竟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从而为 20 世纪更大规模的改革开辟了道路，拉开了进步运动的序幕。

---

① 老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 89 页。

②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等：前引书，第 2 卷，第 269 页。

第十章

19世纪后期美国的对外政策

在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年代，美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为美国从大陆扩张转向海外扩张创造了条件，从而使它在对外政策方面也作了重要的改变。为了适应商品输出、争夺势力范围的需要，美国抛弃了它的孤立主义传统，日益走上了海外扩张的道路。它一方面利用门罗主义作为干涉拉丁美洲国家的内政、排挤英国势力的工具，以实现它独霸拉丁美洲的野心。另一方面积极扩充海军实力，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进行频繁的侵略扩张，以夺取新的领地和势力范围。1898年，它发动了美西战争，接着控制了古巴，霸占了菲律宾，兼并了夏威夷群岛，从而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行列。

第一节　美国海外扩张的背景

〔美国经济增长与海外市场争夺〕　美国的对外扩张是它的经济发展在政治领域的延伸。在美国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随着美国工农业生产的巨大增长，美国进口商品激增，出口

商品则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同时，美国对外贸易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内战前，美国进口制成品，出口小麦、棉花等粮食作物和原料；到19世纪后期，出口项目开始把纺织品、农具、机械、铁路设备等制成品包括进去，进口项目列入了羊毛、砂糖、咖啡、铜、石油和橡胶等与新兴工业有关和城市居民需要的物资。在美国对外贸易中，出口总额1870年为39,277万美元，1880年为83,563万美元，增长了100%以上。对外贸易长期存在的入超局面，在70年代中期以后基本上得到扭转，逆差变为顺差。美国的对外投资在70年代初只是个别情况，这是因为那时美国尚无过剩资本，但资本外流的情况已经开始出现。80年代末以后美国的资本输出虽然有限，但已变得经常了，主要是投向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和太平洋地区，其中墨西哥和秘鲁都是最早吸引美国资金的国家。

1873、1882、1893年的三次经济危机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的反映，表明美国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与市场相对不足的尖锐矛盾。但是直到西部边疆“消失”之前，美国的企业家大多是全神贯注于他们的国内事业。19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的对外贸易津贴仍然为数甚微，它宁愿靠保护关税促进国内开发。

当然这种情况并不能冲淡美国日益增强的对外扩张的势头。1878年，纽约的一些企业家便曾催促国会拨款扩充美国的国外通讯设施。1879年，美孚石油公司开始向国外倾销产品。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远西部轮船公司、兰德麦克来尼公司和纽约人寿保险公司等，都向国外派出了常驻代表，有的还在国外建立了分支机构。尽管有些美国商人开始时缺乏良好训练，经商不顾时令季节，不研究市场的需要，加上语言不通，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方面远不如英、德等国商人。但是在七、八十年代，美国的商业活动已经遍及世界各地。除了加拿大和欧洲这些传统的市场

外，还有太平洋的萨摩亚和夏威夷以及拉丁美洲、远东和非洲。美国早在70年代就谋求打开刚果的门户，随后参加了1884年在柏林召开的刚果问题国际会议，渴望非洲成为它自由扩张的场地。此外，连人迹罕至的北极也受到美国的注意，甚至有人急于要在北极建立战略据点，并把这种倡议叫做“光荣”的竞赛。

美国急于扩张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它的经济实力与它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极不相称。189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已跃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1%；而它在世界贸易中则占第3位，落后于英国和德国，仅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0%；在对外投资方面，它更是远远落在英、法、德诸国之后。[1] 改变这种状况，就成为19世纪末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更重要的是，当美国步入世界舞台时，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已经霸占了可以瓜分的绝大多部分殖民地，而德国、日本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加入了列强角逐之列。因此，美国的扩张活动一开始即面临着严峻形势。尽管美国国内市场尚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但它已不能等待国内市场饱和之后再去强占海外市场。“美国之鹰”渴望展开它已经丰满的羽翼，在19世纪末的国际角逐中去占据一席之地。

〔为海外扩张制造舆论〕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政界、军界、商界以至舆论界的大批要人，都宣扬极端的沙文主义，主张推行以武力为后盾的扩张主义对外政策。著名的海军战略学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声称：“至少有1/3的机械和农产品超过我们的需要，我们必须输出这些产品，或者驱逐生产这些产品的

---

① 库钦斯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史研究》，三联书店，第45、41、42、93页。

人。”[1] 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约翰·米勒认为：“现在已到了这样的时候，国家繁荣，到处兴建制造业，因而需要寻求新的市场以保持我们的工厂开工。”[2]

许多城市工商企业组织，更是对追求海外市场表现了极大热情。当时纽约已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该市商会年会曾热烈讨论了推动对外贸易问题，作出了相应决议，并向政府提交了请愿书。其中特别反对英国对拉丁美洲贸易的垄断，担心美国的排华最终会影响它在远东的经济利益。纽约商会和运输委员会在一次会议上还通过决议，建议大西洋沿岸城市共同讨论它们一致关心的商业问题。与此同时，商业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有影响的代表刊物有《美国投资》、《制造业和建造业者》、《铁路时代》、《美国出口商》和《钢铁时代》等，这些杂志常常鼓吹政府应当帮助工商业者去开拓国际市场。1885 年的一期《钢铁时代》强调，商人和制造业者需要“鼓舞性”的政策，政府应当不惜以武力去为商人开拓市场。“有枪才能旅行”[3] 的观念，已为这些杂志所习用。另有一家商业杂志认为，“我们的对外贸易进行得‘很好’，可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对外贸易进行得更好。我们拥有肥沃的土地、良好的气候、精力旺盛的人民等优势以及世界上最完善的交通系统，为什么要落在后面呢?”“美国完全可以成为世界工厂和金融中心，也可成为世界的谷仓。”[4]

美国政府在推动美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

---

① 查尔斯·S·坎贝尔：《美国对外关系的转变（1865—1900）》；纽约，1976 年，第 109 页。

② 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编：《美国外交的形成》第 1 卷，芝加哥，1962 年，第 339 页。

③ 米尔顿·普雷瑟：《冲出美国：1865—1890 年外交关系研究》，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71 年，第 24 页。

④ 米尔顿·普雷瑟，前引书，第 33 页。

用。海斯总统的国务卿威廉·M·埃瓦茨遴选一批具有从事工商业经验的人出任驻外领事，要求这些领事每月提供一份驻地的详细经济情报，其中包括工商业活动、银行活动以及金融、税收、交通和劳工等方面的信息。有的经济情报还分析了某些美国商品在海外滞销的原因，提出了怎样做广告，鼓吹在海外设立工商企业和银行的分支机构，甚至建议开办永久性商品展览机构等等。美国驻外人员提供的准确经济情报，深受美国国内工商企业主、各地商会和经济刊物的欢迎，大大推动了美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

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是直接关系到美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一件大事。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民主党和共和党围绕关税问题展开的长期斗争，反映了企业界内保护主义者和自由贸易鼓吹者之间的激烈矛盾，而美国政府的更迭，也使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呈现出摇摆不定的状况。自由贸易主义者认为，高关税势必带来国外对美国海外经济活动的敌视；保护主义者则强调，低关税会使便宜的英国货物泛滥美国市场。后来一些开朗的保护主义者提出一项折中办法，即互惠贸易。互惠贸易成为日后美国对加拿大尤其是对拉丁美洲大力推行的政策，它既是美国扩大市场的手段，又是用来“对抗欧洲在这个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地区的影响。”①

〔“新天定命运”说〕　“天定命运”说认为美国人在北美大陆上进行的扩张和征服乃顺应上帝赋予的使命。在 19 世纪上半期，这种“天定命运”说主要反映了美国种植园主的扩张要求：除向美国西部扩展外，还对邻近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扩张活动。内战后，由于奴隶制度的垮台，“天定命运”说也随之沉寂

---

① 米尔顿·普雷瑟，前引书，第 33 页。

了。

随着美国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对外扩张的要求不断增长，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天定命运”说又盛行起来，人们称之为“新天定命运”说。它反映了美国工商企业家的扩张要求。他们的扩张活动不仅限于毗邻美国的国家和地区，而且还致力于夺取海外领地和扩大势力范围。“新天定命运”说同早期“天定命运”说相比虽然同是宣扬宿命论，却多了一些哲理依据。其中主要的是种族优越论。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盛行，美国的种族优越论也是甚嚣尘上。有的学者以生物界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为依据，力图证明盎格罗—萨克逊种族的优越性是不可争辩的，它注定是要负起“文明的传播者”的任务的。[①] 有些传教士则把宗教活动与经济扩张结合起来：在海外传播福音中开拓市场，在开拓市场中传播福音。在传播福音中，他们把美国人说成天定的选民，是被上帝挑选来领导落后民族的基督教徒。因此，美国“有能力把它的制度传播于全人类，把它的统治扩大到整个地球。”[②] 这就是“新天定命运”说的核心。

“新天定命运”说的另一种依据是地缘政治学。有的美国扩张主义者，如布鲁克斯·亚当斯就极力宣扬地缘政治，说美国必将控制亚洲，并且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他认为，俄国和日本是美国在争夺亚洲角逐中两个危险的对手，因此，美国应加剧和利用俄、日两国的矛盾，使它得以在广阔的亚洲地区居于支配地位。为了说明美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他还运用西方历史的发展加以论证。在他看来，“世界文明的一些中心，都是随着经济财

---

① 参看本书第11章第1节。

② 转引自J.W.普拉特：《1898年的扩张主义者》，巴尔摩尔，1936年，第6页。

富和边疆提供的机会环绕地球向西伸展，并且这条伸展的路线是显而易见的：从地中海沿岸地区通过西欧到大不列颠，然后横越大西洋到北美大陆。”[①] 他所说的世界文明中心，实际就是统治世界中心，按照他的逻辑，美国注定成为统治世界中心。

〔海军复兴与马汉战略论〕　复兴海军即建设现代海军，是美国对外扩张的必要条件，也是美国在这个时期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海军，是一支由142艘过时的木质结构船只组成的舰队，没有一艘铁甲舰，其中较大的适于远航的只有12艘，并且都已服役多年。实际上，这是一支速度很慢、攻击能力很差、在战争中难以取胜的舰队。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建设现代海军，整个80年代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展开了热烈讨论。参议员约翰·摩根抱怨说：“美国政府的政策一直处于踌躇不前的困境，这是因为没有一支巨大的舰队提供可供使用的力量。”[②] 海军部长威廉·惠特尼等海军官员认为：“很明显，有强大海军才能有成功的外交。”根据同样的认识，他们认为“采取强硬的对外政策立场而没有强大海军的支持，就是招致灾难。”[③] 从拉瑟福德·海斯开始直到本杰明·哈里森的几届总统，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支持建设强大海军的。曾两次出任国务卿的詹姆斯·布莱恩更是积极致力于建设大海军，鼓吹不断扩大建设海军的必要性。于是，要求美国“有一支比得上地球上任何其他国家的海军，”“建设海军，直到用完美国国库最后一块美元”[④] 这样的呼声，就甚

---

① 转引自丁则民：《“边疆学说”与美国对外扩张政策》，载《美国历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0年，第508—509页。

② 威廉斯编：前引书，第338页。

③ 威廉斯：前引书，第338页。

④ 威廉斯：前引书，第343页。

嚣尘上了。

在美国复兴海军的活动中，影响最大的是后来被称为美国“现代海军之父”的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马汉毕业于美国海军最高学府安那波利斯海军学院，其后长期在美国海军中任职。内战后，随着美国海上扩张活动范围逐渐扩大，他又率舰驰向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各地进行活动。后来他以海军上校身份出任海战学院讲师，致力于海军史和海军战略的研究和讲授。马汉是美国著名的海军战略家和海军史学家，也是著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马汉的海军战略思想的代表作有1890年问世的《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和1892年发表的《制海权对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年）》。在这些著作中，马汉特别详细地考察了英国在17、18世纪同西班牙、荷兰和法国争夺霸权的多次重大海战，研究了英国建立强大繁荣的“日不落帝国”的历史。他指出英国的繁荣强大归根结蒂是因为那时英国掌握了制海权，建立了地球上第一流的和最强大的海军。因此，他认为，制海权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是国家繁荣和富强的物质因素中的首要因素。“历史的钥匙……就是制海权”。①

马汉认为美国拥有成为世界上海军强国必须具备的一切条件。他说这些条件是：（一）居于直接通向海洋的地理位置；（二）拥有深水良港的延伸海岸线以及流经肥沃农耕地带的巨大河流等自然结构；（三）沿海地区人口的适当分布；（四）具有从事航海和开发海上资源的足够人力；（五）具有经商才能的民族秉赋；（六）奉行明智政策的政治结构。

---

① 威廉斯：前引书，第341页。

马汉强调海军是进攻的武器。他认为美国海军不应仅限于保卫美国边疆，还必须能够在任何地方保护美国商业，并强大到足以采取主动行动。只有强大海军才能重创敌人，取得海上的统治地位，促进美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

他还认为美国要变成海军强国，除了必须建立起世界上第一流的海军外，还必须在靠近美国的水域建立战略基地，在世界海洋的关津要道上建立据点和夺取殖民地。他在鼓吹向太平洋和加勒比海扩张时，特别强调美国需要据有夏威夷的珍珠港，萨摩亚的帕果帕果这样的加煤站和开凿沟通两洋的巴拿马运河。这就是他勾画的美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为适应复兴海军加速对外扩张的需要，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883 年，美国国会通过拨款以建造 4 艘现代铁甲舰的议案，1885 年，海军部决定在新港举办海战学院，1886 年开始建造的战列舰“缅因”号于 1890 年建成下水。从 1890 年起，美国开始大力建造第一流战舰，到 1900 年共建造了 15 艘一流战列舰和 5 艘装甲巡洋舰。随着美国海军实力的增强，美国海军实力在世界各国中由 1880 年的第 12 位上升到 1895 年的第 5 位，到 1900 年进而上升到仅次于英、法两国的世界第 3 位。在 1898 年的美西战争中，美国就是靠这支刚刚建立起来的新海军打败了西班牙。

第二节　美国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

〔染指朝鲜的最初步骤〕　在远东，美国从鸦片战争起就参加了侵略者的行列。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正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周边的国家也日益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犯。美国在 1853 年派马修·佩理少将率舰打开

了日本门户，之后便以日本为踏板来到朝鲜。打开朝鲜门户被美国当局看作是它的“海军在内战和美西战争之间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①

1866—1871年，是美国侵略朝鲜活动的第一阶段。开始时它出动武装商船，继则派出海军舰只，敲打朝鲜的大门。1866年，在天津的美商结伙20多人，乘坐武装商船“谢尔曼将军号”于7月闯入大同江直至平壤，一面要求朝鲜通商和供应船上需用的粮食，一面测量水位，侦察地形，企图盗掘平壤王陵埋藏的宝物。朝鲜政府仅同意提供粮食，但拒绝通商。于是，美国这艘帆船竟炮轰江中往来的朝鲜船只，但却遭到朝鲜军民有力的还击，结果该武装帆船被焚毁，船上人员亦全部死亡。“谢尔曼将军号”事件后，另一个美国人F.琼金斯于1868年组织了一个100多人的“勘查队”，乘美船“中国号”侵入朝鲜。他们沿用“谢尔曼将军号”故伎，去忠清北道盗劫陵墓，甚至策划盗取陵墓中的国王尸骨用以胁迫朝鲜订立通商条约。结果也可耻地失败了。

在美国海盗船只侵朝活动接连失败后，1871年美国派它驻中国公使F.镂斐迪偕同其驻华海军司令J.罗杰斯率军舰5艘，以调查所谓“谢尔曼将军号”事件为由，于5月间闯入汉江，企图偷袭汉城，迫使朝鲜订立通商条约。驻守汉江朝鲜军队被迫开炮阻止美舰前进。在双方发生炮战时，美海军陆战队750人强行登陆，屠杀了大批朝鲜军民。但在朝鲜人民坚决反对下，以镂斐迪为首的美国侵略者，到7月初不得不偃旗息鼓，从朝鲜撤退出去。

1876年2月，日本政府靠炮舰政策强迫朝鲜签订了所谓《朝日修好条约》，即《江华条约》，规定开釜山、仁川、元山等

---

① 普雷瑟：前引书，第220页。

港为商埠，日本在朝鲜享有治外法权等特权。这件事更加推动美国急于闯入朝鲜。1878年美国政府决定派遣海军准将罗伯特·薛斐尔（即舒费尔特），乘海防舰“台康德罗加号”去朝鲜执行任务，这就开始了美国侵略朝鲜的第二阶段。

薛斐尔是一个很顽固的扩张主义分子，他坚持“美国是太平洋的开拓者，”“从未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失去信心。”① 同时他汲取了前段强迫朝鲜开埠通商遭到失败的教训，这一次采取了借助日本和中国斡旋的办法。1880年春，薛斐尔到达日本，打算由日本驶往朝鲜釜山。由于日本对薛斐尔使命怀有戒心，担心美朝通商会损害它在朝鲜的优势，因而拒绝在薛斐尔和朝鲜之间进行调解，只允诺把薛斐尔要求晋见朝鲜国王和谋求缔结通商条约的信件转交朝鲜官员。但是薛斐尔信中所提的要求遭到朝鲜断然拒绝。

薛斐尔遭到失败后，转请清政府向朝鲜说项。他以日本在远东的扩张相威胁，说朝鲜如不与美国缔约，便可能完全为日本所控制。这种说法果然打动了李鸿章。他遂劝说朝鲜与美国通商以牵制日本以及俄国对朝鲜的野心。在清政府敦促下，朝鲜于1882年5月与美国订立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即“仁川条约”。

〔“仁川条约”与美日合谋〕　“仁川条约”是不平等条约，除规定朝鲜开放3个港口、保护美国人通商自由外，美国人还享有治外法权，并规定朝鲜课征进口税不得超过货物价值的10%。此外还把1884年“中美望厦条约”提出的“利益均沾”原则搬到朝鲜，规定嗣后凡朝鲜让与其他国家的权益，美国官民应一体均沾。这项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给美国开辟了一条扩大

---

① 普雷瑟：前引书，第222页。

扩张活动的途径。条约还规定：由于其他国家对朝鲜的不公正行动和压迫引起的纷争，美国得进行“斡旋”。这一条款给日后美国反对中国援助朝鲜，支持日本侵略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美国之所以确认朝鲜为“主权独立”的国家，无非是要排除中国给予朝鲜的援助，除掉它侵略朝鲜道路上的一大障碍。美国把“仁川条约”的缔结看作一大胜利，说它“预示着太平洋地区很快就会成为美国商业领地，”① 吹捧它是“美国对外政策积极形象的惟一范例。”② 1883 年以后，英、俄、德、法等国都效法美国的“范例”，相继同朝鲜订立了类似朝美条约的不平等的双边条约。

“仁川条约”开辟了美国侵略朝鲜的新阶段。此后，它一面对朝鲜进行经济渗透，一面反对传统的中朝关系，支持日本的侵朝活动。不久，美国烟草、砂糖、石油等商品便涌入朝鲜市场，美商还强行向朝鲜推销4,000 支来福枪，高价出售过时的陈旧船只。此外，美国还夺得了种种经济权益，包括仁川至中国上海和釜山至日本长崎的海上航线开辟权，云山金矿勘探权、郁陵岛森林采伐权和王宫电灯架设、电站修建权。切斯特·阿瑟总统也说：“朝鲜现在正在引起（美国）关心对外贸易发展的人们的注视。”③

1873 年，美国还以在朝鲜外籍人中传教的名义，取得在朝鲜传教的权利。1884 年以后，美国传教士大量涌入朝鲜。他们最初以汉城为中心进行活动，后来扩展到京畿道、平安南道和咸镜道等地。有些传教士以办教育和慈善事业为名，宣传“西方文

---

① 普雷瑟：前引书，第 22 页。
② 普雷瑟：前引书，第 223 页。
③ 金熙一：《美国侵略朝鲜史》（日译本），东京，昭和 47 年，第 50 页。

明”，也有的直接为美国的经济扩张进行活动。

这个时期假日本之手扩大侵略朝鲜，已经成为美国的基本策略。以实现朝鲜“独立”为名的“甲申政变”就是在美国支持下演出的丑剧，其目的就在于勾结日本反对中国。朝日“江华条约”缔结后，日本扶植朝鲜卖国势力组成开化党。1884年（甲申年），日本在美国支持下，利用法国进攻安南挑起中法战争之际，唆使开化党首领金玉均、朴永孝等人以鸿门宴方式发动政变，杀害反对投靠日本的显要大臣多人，并劫持国王妄图夺取政权，但终因朝鲜人民的反对和中国军队的介入，“甲申政变”失败了，朴永孝等人纷纷逃亡美国。参加政变的日本侵略军，也被中国军队赶出汉城。但是，不久日军增援部队在仁川登陆，中国因陷于中法战争，被迫于1885年4月同日本签订了关于朝鲜问题的“天津条约”。规定中日两国军队同时撤离朝鲜，日后必要时，经过会商，双方均有出兵朝鲜的权利。

日本在朝鲜的侵略势力的不断扩大，是同美国的支持分不开的。以查尔斯·李仙得这个先后出任过美国驻厦门领事和日本外务省顾问的扩张主义分子为首，一大批美国人充任朝鲜内政、外交、军事乃至海关的顾问，任意摆布朝鲜国王，致使“美国在汉城的势力很容易地居于其他各国之上。”[①]

〔对华侵略的种种手段〕　早在内战前，美国便注意到太平洋彼岸的“非凡帝国”中国的巨大贸易潜力，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大规模贸易。”[②] 进入80年代时，美国国务卿威廉·W. 埃瓦茨更为兴奋地宣称：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具有不可限量的前途”，并断言由中国出口“到欧洲诸国的贸易，将要由（美国）我们的

① 转引自卿汝楫：前引书，第389页。
② 普雷瑟，前引书，第214页。

贸易及金融体系来控制。"[1] 美国在 19 世纪后期正是抱着这样的野心，或在欧洲列强侵略中国时趁火打劫，或支持日本侵略中国，或直接通过它派往中国的官员、商人和传教士等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活动。

中美"天津条约"和"利益均沾"原则，使美国在中国获得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缔结的其他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取得了新的巨大殖民利益：它不仅可以派出公使常驻北京，还可以利用大批新开口岸，使其商业势力由沿海各省伸入到长江上游；有关通商、海关和税率的各项规定，给美国货物倾销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传教士得到由通商口岸自由进入内地传教的权利和外国人游历内地的自由，更加便利了美国侵华活动；准许华工出国的条款，后来给美国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美国传教士在侵略中国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美国来华的传教士 1845 年为 20 人，1898 年猛增到1,500 人左右，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侵略中国的规模和速度。这些传教士深入到一般白人足迹不到的中国内地，他们除了宗教活动外，还从事各种职业，包括经营商店、工厂、建立诊疗所和学校等，广泛搜集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文化以及政治、经济等方面情报。各地教堂经常包揽诉讼、破坏中国司法主权；各地教士不断制造事端，勒索赔偿，强夺民产，甚至在通商大埠为美国占据大块租界地。上海美国租界就是由教士滋事强占的。19 世纪 60 年代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传教士的侵略活动，导致各地教案迭起，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不断反抗和斗争。

假手日本侵略中国是美国在华扩张的又一手段。1872 年，日本在美国支持下监禁琉球国王，废除了琉球对中国的"宗藩"

---

① 转引自卿汝楫：前引书，第 36 页。

关系，1878年进而废除琉球国王，把琉球并入日本，改为日本冲绳县。同时美国根据马修·佩理1854年同琉球缔结的“美国琉球条约”继续保有自由使用琉球土地的权利。这样，日美两国就把琉球变为它们靠近中国海岸的活动据点。

台湾是美国早在19世纪40年代末就曾企图染指的地方。为了侵占台湾，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广泛搜集了关于台湾港湾、地理、交通、居民和海防的情报。1872年日本开始策划侵占台湾时，美国驻日本公使积极为之出谋划策，李仙得还亲自赶往日本，把台湾的领海图、地图等方面情报资料交给日本。1874年日本出兵进攻台湾时，美国陆海军官多人参加战斗，李仙得还参加了指挥。后来，由于清政府派出2万军队去台湾迎战日本侵略军，加上岛上居民奋勇抵抗，日本才被迫撤出其侵略军，并派官员来中国谈判。这时，美国驻天津领事不仅替日本探听中国态度，还胁迫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否则日本“必不退兵，且将决裂。”[①] 结果，中国在同意赔偿日本白银50万两之后，才暂时保持了对台湾的主权。

中日甲午战争进一步暴露了美国假手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战争爆发前，中国鉴于日本蓄意制造战争，曾两次请求美国政府会同其他列强出面调停，但都被美国拒绝。它声称严守中立，不能进行干涉，并诡称它看不出日本要诉诸战争。战争开始后，中中从朝鲜败退，打算言和，英、俄、法、德各国也有意进行调停，美国仍以不拟干涉为借口拒绝参与。因为它认为“中国遭到败北，直到它的皇室受到威胁为止，都是有益的事情。”[②] 后来在中日议和中，美国极力反对欧洲列强参与调解，力图独自左右

① 卿汝楫：前引书，第366页。
② 卿汝楫：前引书，第202页。

中日和谈。“马关条约”关于允许外国在中国兴办工业、开矿、修建铁路等条款，也是美国协助拟定的。经过这次和议，美国获得了它在中国一直谋求但未得到的殖民权益。

甲午战争后，美国怀着极大野心参加了19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1895—1898年，美国对华商品输出由360万美元增加到近1,000万美元。美国还在甲午战争结束前，就制订了在中国兴办银行、修筑铁路和开矿的计划，并打算占有大沽港和三沙湾。为取得芦汉、津镇、粤汉等铁路的修筑权和给予中国贷款，美国同欧洲列强展开了剧烈的争夺。由于美国在总的力量对比中尚处于不利地位，故其许多计划落空。但美国终以对中日马关议和有“功”，在1898年4月从清政府初步取得粤汉铁路承造权；随后乘机于同年9月提出了旨在挤进中国、夺取地盘的“门户开放”政策。

〔购买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　阿拉斯加在18世纪末沦为俄国殖民地。它是北美洲连接远东、日本路程最短的交通要道，也是19世纪后期美国对外扩张中最早获得的一块领土，而今成为美国在北太平洋的战略要地。

1867年3月，俄国为了加剧英美之间的矛盾，也为了取得一笔收入，派官员到美国洽谈出售阿拉斯加问题。当时美国国务卿威廉·西沃德是个狂热的扩张主义者。他在同俄国谈判时，开始时出价500万美元，后以720万美元的代价同俄国在一夜之间达成了购买阿拉斯加的协议，并且急不可待地于翌日凌晨在协议书上正式签字。实际上，美国以每平方英亩1.2美元的代价买到了这个巨大的半岛。

那时在美国，只有少数渔民希望得到出入阿拉斯加海港的权利，一部分加利福尼亚商人谋求在那里从事毛皮贸易的特权，而多数人对阿拉斯加是一无所知的。西沃德签订购买阿拉斯加协议

后，立即在国内引起一片反对声，说阿拉斯加是“西沃德的冰箱”，认为“没有必要（因购买阿拉斯加）去激怒英国人”，批评这是“一笔糟糕的交易”，“一个异乎寻常的错误”。

但是西沃德顽强地争取了许多国会议员的支持。其中的关键人物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查尔斯·萨姆纳。他是一个很有影响的雄辩家。在西沃德的支持下，萨姆纳狂热宣传占有阿拉斯加既可以提高美国在太平洋的地位，消除俄罗斯君主制对北美的威胁，又能防止英国抢先占有这个地方以加剧它对美国的威胁，并增进美俄两国的友谊以对付共同的敌人英国。结果参议院接受了西沃德的扩张主义立场，1867 年 4 月和 7 月，参众两院分别都以多数票通过了这项协议。

阿留申群岛是阿拉斯加和俄国堪察加半岛之间的弧形列岛，绵延约 200 公里。1867 年美国购买阿拉斯加时，包括这群岛在内。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总面积为 155.8 万平方公里，购买这两个地方使美国版图扩大近 1/3。西沃德在其国务卿任内，还在太平洋获得了一群有战略价值的小岛——即中途岛，它们于 1867 年 8 月为美国海军所占据，成为美国在太平洋的前哨阵地。

〔争夺萨摩亚群岛〕　争夺和侵占萨摩亚群岛，是美国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在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侵略活动之一。萨摩亚群岛位于南太平洋的重要海上通道，是通往西太平洋的路标。美国政府早在 19 世纪 30 年代为适应捕鲸业发展的要求，曾派出科学考察团到这里进行考察，但是直到内战前萨摩亚群岛并没有引起美国的重视。内战后，在美国海军搜寻逃往海外南部同盟私掠船的活动中，才使美感到有在这里设立一个加煤站的必要，以发展它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海上交通运输。1869 年，横贯北美大陆的联合太平洋铁路建成，促进了美国经由西海岸同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贸易，萨摩亚因而更加引起美国的重视。1872

年，美国海军军官在萨摩亚登陆，取得帕果帕果港建立海军基地的特权，此后美国便积极谋求对萨摩亚的控制。1877 年 5 月在萨摩亚升起美国国旗，这是美国企图在此建立保护国的标志。1878 年，美国迫使萨摩亚在华盛顿签订了一项条约，确认美国在萨摩亚群岛东部的主要岛屿土土伊拉岛的帕果帕果港建立加煤站的权利，美国人在萨摩亚享有领事裁判权；条约还规定萨摩亚同任何其他国家发生纠纷时美国得进行调处。这个条约是美国对萨摩亚政策的基石。

当时同美国争夺萨摩亚的有英国和德国。在美国—萨摩亚条约缔结后的第二年，英、德两国也强迫萨摩亚接受了同样的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和美国同样的殖民特权。实际上，这时美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不具备单独控制萨摩亚的实力，而萨摩亚这个小小的群岛，实则时刻都处在大国争夺的阴谋之中。当地的波利尼西亚居民备受欺凌和侮辱，并在殖民主义者的挑动下陷入了血腥的内部冲突和混乱。1887 年夏，美国国务卿托马斯·贝阿德在紧迫的形势下邀请英、德两国驻华盛顿使节讨论萨摩亚问题。德国差不多是和美国同时登上国际舞台参加瓜分世界的活动，因此美、德两国在萨摩亚狭路相逢，竞争尤为激烈。当时德国对萨摩亚的贸易比美国多。德国在会上坚持在贸易中占优势的大国应当控制这个群岛。英国为削弱美国在萨摩亚的地位，采取了支持德国的立场。美国为同英、德两国抗争，打出了“尊重”萨摩亚自主权的旗号。结果英、美、德三国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由于达不成任何协议而破裂了。

随后，德国寻衅对萨摩亚宣战，驱逐了受到美国支持的萨摩亚国王，另立它自己的傀儡。贝阿德抗议德国破坏萨摩亚的现存秩序，同时在美国国内出现了一片战争叫嚣，表示决心保护美国在萨摩亚的殖民权益。国会立即通过决议，拨款 50 万美元保护

萨摩亚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另外又拨款10万美元用于建设帕果帕果港。这时萨摩亚的上空战云密布，一支英国舰队、3艘德国战船和3艘美国战船都停泊在帕果帕果以西的阿皮亚港，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不过，当时德国并不想为萨摩亚同美国发生公开对抗，遂采取主动行动邀请英、美代表到柏林重开关于萨摩亚问题的谈判，但直到柏林会议前夕，萨摩亚的局势仍然是爆炸性的。幸而1889年3月16日飓风袭击阿皮亚港，英国舰队仓皇逃离，美国和德国舰只大部被毁，人员伤亡惨重。这才使局势化险为夷，避免了美国同它的竞争者之间的战争。

讨论萨摩亚问题的柏林会议于1889年4月29日开幕。由于美、德两国战舰都已被暴风摧毁，会议气氛反而有所改善，各方都出人意料地表现出和解态度。6月14日，会议达成协议，决定恢复萨摩亚国王名义上的统治，而岛上的一切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均被置于英、美、德三国领事的共同控制之下，萨摩亚人民则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美国和英、德两国又勾结起来，使萨摩亚处于美、英、德三国的共同保护之下，但这并不是它们争夺萨摩亚的终结。美西战争之后，1899年英、美、德三国又达成新的交易：英国退出对萨摩亚的争夺，作为补偿，德国承认太平洋上的东卡岛和所罗门群岛的一部分为英国属地；以西经171度为界的西萨摩亚群岛归德国所有；包括土土伊拉港在内的东萨摩亚群岛为美国所有。这样，美国和德国就实现了对萨摩亚群岛的最后瓜分。

〔*兼并夏威夷群岛*〕　夏威夷群岛是太平洋上比萨摩亚群岛更为重要的通往西太平洋的交通枢纽，被美国看作是它商业的前哨基地，也是太平洋上美国海防的第一线。这个群岛是英国人在18世纪发现的。继英国之后，法国和美国的殖民势力也相继而来，成为英、法、美三国觊觎的地方。但是直到19世纪前期，

由于殖民国家的相互牵制，谁也未能独占夏威夷群岛。70年代后，法国在普法战争失败后从夏威夷退了出去，英国由于在世界许多地方遇到有力的挑战，随着夏威夷王位继承斗争中亲英势力的失败也退出了对夏威夷的争夺。惟独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后自以为成了太平洋上一支新兴的力量，试图插足夏威夷，对后来美国兼并夏威夷的活动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在夏威夷的外国殖民者中为数最多的是美国人。他们主要是充当土人酋长顾问的传教士、经营甘蔗的种植园主和商人等。进入80年代，这些美国人已掌握了夏威夷经济的命脉。当时，美国国务卿、狂热的扩张主义分子詹姆斯·布莱恩就提出美国在夏威夷群岛有优先利益，反对其他殖民国家插手于夏威夷事务。他说："夏威夷群岛不能并入亚洲体系。一旦它放弃独立地位，根据自然法则和政治上的需要，必然要并入美国体系，而且必须并入美国体系。"[①]

在兼并夏威夷的活动中，美国外交官员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同夏威夷签订了3个条约，但都因为没有能满足美国统治集团的扩张野心被国会拒绝了。到1875年，当时的国务卿汉密尔顿·菲希终于迫使夏威夷接受了适应美国扩张意图的所谓互惠条约，规定降低双方关税，夏威夷不得割让领土给其他国家。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准许夏威夷生产的糖免税进口。这个条约促进了夏威夷制糖业的发展，到1877年至1887年的10年里，糖产量增加4倍。然而由于夏威夷的糖大部向美国输出，结果使夏威夷在经济上大大增加了对美国的依赖性，这也是美国兼并夏威夷的重要一步。1887年修改1875年条约时，美国又取得在夏威夷群岛瓦胡岛的珍珠港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利，从而使这个群岛进一步

① 日本国际研究会编：《美国的太平洋政策》，东京，昭和17年，第8—9页。

落入美国手中。

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兼并夏威夷的活动进入最后阶段。1890年美国通过的麦金莱关税法有力地促进了兼并夏威夷的进程，这项税法宣布免除糖的进口税；同时为保护国内制糖业，联邦政府决定给美国糖厂以每磅2美分的补贴。这样一来，夏威夷的糖在美国市场上不仅为得到补贴的美国国内制糖业所排挤，还受到古巴、爪哇和巴西糖的竞争。结果夏威夷糖价暴跌，使夏威夷的美国糖厂主和甘蔗种植园主受到很大打击。他们认为，只有使夏威夷同美国合并，才能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麦金莱关税法关于免除糖税的规定，是有利于美国扩张主义者兼并夏威夷群岛的措施，它推动夏威夷岛上的美国糖业利益集团发动了旨在使夏威夷与美国合并的政变，策划了历史上所说的“糖的阴谋”。[①]

1891年，热爱独立的夏威夷女王李留奥卡拉尼即位。她在夏威夷群岛土著居民的支持下，反对夏威夷与美国合并，反对由白种人操纵制定的1887年宪法，响亮地提出了“夏威夷是夏威夷人的”[②] 口号。1893年1月，李留奥卡拉尼女王发布敕令，宣布废除1887年宪法，同时颁布新宪法。新宪法扩大了王权，削减了白种人控制的立法会议的权利和外国人的特权，规定一切白人除和土著妇女结婚者外均被剥夺选举权。

在麦金莱关税法实施后，岛上美国种植园主、商人和传教士等，在美国驻夏威夷公使约翰·史蒂文斯的支持下，于1月16日发动所谓“革命”——反对夏威夷政府的政变。这一天，美国船只“波士顿”号上的150名武装人员，以保护美国人生命财产为名，在夏威夷首府檀香山登陆，迫使李留奥卡拉尼女王退位，成

---

① 托马斯·贝利：《美国人民外交史》，纽约，1964年，第429页。

② 托马斯·贝利：前引书，第430页。

立由殖民主义者组成的临时政府，建立了所谓共和政体。接着于1月19日派出一个由4名美国人和1名英国人组成的所谓“夏威夷代表团”，赶往华盛顿策划夏威夷与美国正式合并。

史蒂文斯是这次政变的积极支持者。他在麦金莱关税法实施之后便鼓吹对夏威夷“实行坚决果断的合并措施”。① 政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他又越权承认了殖民主义者的所谓“革命”政权，宣布夏威夷为美国的保护国。他还打电报给美国国务院说：“夏威夷梨子现在完全成熟了，这是美国采摘的黄金季节。如果不迅速实行合并，这些（夏威夷）人由于他们的需要，很可能使夏威夷成为英国殖民地。”② “夏威夷代表团”到达美国时，由新任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接待，他也是个狂热的扩张主义者。1893年2月14日，他和“夏威夷代表团”签订了美国合并夏威夷群岛的条约，并急忙于哈里森总统离任前两周送请参议院批准。

但是，兼并夏威夷的条约在美国国内引起两种截然相反的反响，特别是由于哈里森的继任者克利夫兰总统的反对，在一个时期内被搁置了起来。扩张主义者要求批准这项条约，指出如果美国不取得这个群岛，英国或日本就“可能取得它反对美国”。反对这项条约的主要是民主党人，他们认为这项条约是“糖业大王”制造出来的，要求彻底揭露兼并夏威夷的阴谋，质问“为什么要急忙丢开久经考验的孤立主义政策开始卷入……帝国主义纠纷呢?”又说：“拥有复杂居民的夏威夷到头来能成为（美国）一个州吗?”③

以反对扩张相标榜的克利夫兰反对废黜夏威夷女王。他就任

---

① 转引自祖波克：前引书，第197页。

② 贝利：前引书，第430页。

③ 贝利：前引书，第431页。

总统后，立即于3月9日从参议院撤回等待审议的1893年条约，并特派参议员詹姆斯·布隆特为全权代表，去夏威夷调查推翻李留奥卡拉尼的政变的真相。布隆特刚到夏威夷，便要求参与政变的美军回到他们的船上去，命令降下檀香山政府大厦上的美国星条旗。布隆特的调查报告认为，夏威夷的多数居民反对夏威夷与美国合并。他断言没有美国援助，檀香山的政变不会成功；而没有史蒂文斯事先作出的给予支持的保证，政变根本不会发生。接着，克利夫兰由夏威夷召回史蒂文斯，并责成新任美国驻夏威夷大使与被废黜的李留奥卡拉尼和政变当局接触，以恢复夏威夷女王的王位。

克利夫兰所以把兼并夏威夷群岛一事搁置起来，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意见分歧，主要是美国国内糖业利益集团反对兼并夏威夷。但是，夏威夷糖业集团和美国扩张主义者是不肯退让的。前者指责克利夫兰干涉夏威夷"内政"，拒不交出政权；后者则在美国国内对克利夫兰展开猛烈攻击。就连克利夫兰的民主党阵营中，也有人反对李留奥卡拉尼复位。他们说，民主党从来没有复辟君主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克利夫兰只得把夏威夷问题提交国会。在国会讨论中，有的批评克利夫兰解决夏威夷问题的方式超越了他的权力，也有的对克利夫兰表示支持。1894年2月以后，众、参两院先后通过了关于夏威夷问题的决议。众议院谴责史蒂文斯的活动，参议院认为美国不应干涉夏威夷群岛的内政，也反对任何其他国家进行干涉。这就是说美国国会既没有立即接受兼并夏威夷的1893年条约，也没有要求恢复1893年政变前的状态，实际上是承认了政变所造成的局面。1898年4月，美西战争爆发后，美国终于在战争歇斯底里的气氛中于7月7日由国会两院联合决议，经麦金莱总统签署后实现了对夏威夷的兼并。

第三节　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扩张及其与英国在这一地区的角逐

〔觊觎未来的洋际运河〕　在中美洲地峡地区开凿运河，一直是美洲人民的长期愿望。但是，地峡地区有关国家难以单独承担开凿运河的巨额资金和技术，这就给大国的介入造成了机会，而且引起了英、美、法各国在这一地区的争夺。随着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的兴起，西进运动迅速推进，美国国内修建中美地峡运河的呼声日益增长。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美国曾在 19 世纪中叶，分别同哥伦比亚和尼加拉瓜签订了条约，以取得日后在这两国中任何一国领土上修建洋际运河的权利。

然而，美国企图开凿洋际运河，必然要与在中美洲拥有很大势力的英国发生冲突。根据 1850 年美、英缔结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双方曾约定在运河建成后，共同确保运河中立，并保证运河向所有国家开放。后来美国把这个条约看成是它修建和单独控制运河的主要障碍，因而力图废除该约。进入 19 世纪 80 年代后，由于对外扩张的需要，美国为修建洋际运河问题加紧了与英、法的争夺。

美国同法国的争夺，主要是围绕包括资金、技术在内的运河开凿问题进行的，同英国的争夺主要是牵涉到废除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的问题，而一切争夺最后都是为了达到控制和独霸运河的目的。1879 年，由苏伊士运河的创办人菲迪南·德雷塞普任董事长的一家法国公司，从哥伦比亚取得在巴拿马开凿运河的权利，德雷塞普本人还到美国进行大量活动，贿买某些政客和院外集团的说客，谋求支持或至少不反对法国开凿运河的活动。海斯总统鉴于这一形势，于 1880 年 3 月在致国会的特别咨文中发表了一

项强硬的声明。他说美国“力图建筑一条由它控制的运河，它不能同意将此控制权让给任何欧洲国家或国家的联合。”① 海斯还强调这条运河实际将是“美国海岸线的一部分。”② 这个声明是对法国谋求开凿运河的活动作出的反应，同时也标志着美国争夺运河的活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美国争夺运河的主要对手是英国。随着美国实力的增长，1850年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关于双方确保运河中立化的规定越来越不能适应美国的需要，因而它力图在海斯声明的基础上，改变这项条约。在1881—1883年间，美国就这一条约问题同英国进行了频繁的交涉。布莱恩国务卿在1881年下半年连续三次照会英国，要求对这一条约作重大修改。布莱恩照会说这项条约是在30年前的特殊形势下缔结的，现在这一形势已不复存在；美国太平洋沿岸地区的迅速发展以及美国东西两岸交通往来的需要，已使运河区实际成为美国海岸线的一部分。因此，决不能保证运河对美国或哥伦比亚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实行中立，美国“不能允许任何触犯我们在美洲大陆的权利……的条约永久存在下去”，“美国首要的要求是强调它控制运河通路的权利”。③ 弗雷德里克·弗里林海森接替布莱恩任国务卿后，继续同英国进行交涉，他在1882—1883年间两次照会英国，重申美国立场，并明确指出，门罗总统提出的欧洲国家不得干涉美洲事务的思想就来自英国政府的建议。

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的中心思想，就是保证运河中立化。在

---

① J.D.理查逊：《总统咨文及文件汇编，1789—1897年》，10卷册，华盛顿，1907年，第7卷，第585页。

② 朱利叶斯·W.普拉特等：《美国外交政策史》，伦敦，1980年，第148页。

③ 鲁尔·J.巴特利特：《美国外交的历程，美国对外关系史文件与资料》，多伦多，1964年，第393页。

美国实力尚弱的时候，保证运河中立化正好适应美国的需要，借以防止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独占未来的运河。随着美国实力的加强，它对运河问题的立场有了很大的变化：它既把运河区看作美国海岸线的一部分，那就势必否认运河的中立地位，进而排斥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势力，谋求独霸运河区，以适应它对外扩张的需要。这当然是英国所不能接受的。英国对布莱恩和弗里林海森的历次照会都报以冷淡态度，它坚持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不仅涉及特定的运河，而是规定了英美两国共同确立的对所有连结两洋的水道的普遍原则。英国不但反对对这项条约作重大修改，甚至主张以这项条约为基础制定一个所有海洋国家参加的协定。英国指责美国把运河区当作自己的海岸线势必威胁到中美洲国家的独立。它还提醒美国说，既然在缔约谈判时不论美国政府和批准该约的参议院都没有认为门罗宣言是缔结该约的障碍，现在美国就不应当说它违反门罗主义了。

当时美国要求废除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独霸运河的心情急如星火，但却被英国泼了冷水，因而连续交涉三年都没有结果。1884 年，弗里林海森虽然同尼加拉瓜又商订了一个条约，规定由美国在尼加拉瓜境内修筑一条运河，置于美、尼两国共同保护之下，美国则保证尼加拉瓜的领土的完整。但是这样并不能改变美国在争夺运河问题上所处的不利地位。1885 年克利夫兰就任总统后，立即从参议院的议事日程中撤出美尼条约，并在致国会的咨文里声明地峡交通不应为任何一个国家所控制。这是因为美国国内反对这一条约的舆论日益增强，而且克利夫兰政府也不愿为此与英国发生纠纷，只得暂时收回美国独霸地峡的要求。直到 20 世纪初，由于英国同其他欧洲列强在中近东、远东和南非的争夺激化，美国争夺运河的活动才取得胜利，英国终于同意废除克莱顿—布尔沃条约，把兴建和管理巴拿马运河的权利让给美

国。

〔美国对古巴的侵略活动〕　从19世纪初期以来，美国一直怀有兼并古巴的野心。内战以后，美国忙于南部的重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因而暂将兼并古巴的问题搁置起来。但是，美国仍然密切注意古巴岛上的局势，以便抓着有利时机实现其侵略野心。在古巴人民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十年战争（1868—1878年）期间，美国进步人士同情古巴起义者，要求美国政府承认起义者为交战的一方，从而使起义者能公开地从美国购买武器装备，但美国扩张主义者却反对承认起义者为交战的一方。结果，美国政府采取了所谓“中立”的立场。1873年，西班牙殖民当局在海上俘获了一条属于古巴人所有的武器运输船，即“弗吉尼厄斯号”，并将53名船员处决。西班牙殖民当局的这一行动引起美国公众极大的关注，因为该船悬挂美国国旗，有些海员是美国人。为此，美国和西班牙的关系顿时紧张起来，直到后者归还该船并对处决人员的家属偿付赔款才缓和下来。

在十年战争结束后，美国对古巴的野心日益增长，加强了它对古巴的侵略活动。这是因为（一）美国对古巴的经济渗透日益增强，到1893年美国人在岛上种植园、矿场和铁路的投资达5,000万美元，美国与该岛贸易达到1亿美元，而且美国主要依靠古巴提供的蔗糖；[1] 在修建中美洲地峡运河的工程即将提上日程时，古巴在加勒比海的军事战略地位更重要了。

在西班牙殖民当局专横统治下，古巴人民于1895年再次掀起了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起义。这次起义固然是西班牙殖民当局残酷压榨造成的，也与美国关税政策的调整有关。根据1890

---

① 雷·A. 比林顿和马丁·里奇：《1865年以后美国历史，附有问答》，托托瓦，新泽西，1981年，第105页。

年麦金莱关税法，美国对进口蔗糖实行免税，这就鼓励了岛上蔗糖种植园的扩大。但是不久，美国于1894年又制订了威尔逊—戈勒姆关税法，其中规定对进口的古巴糖征收40%的关税。这样，古巴刚刚扩大的蔗糖生产就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许多蔗糖种植园和制糖厂纷纷解雇工人，从而更加重了古巴人民的苦难。

在这次反抗西班牙专制的起义中，古巴人采取了游击战术：化整为零，声东击西，使西班牙殖民军疲于奔命。西班牙殖民当局苦于抓不到真正的起义者，竟决定用最残酷的手段镇压起义者，把成千上万的农民赶入集中营。集中营有如死牢，条件极其恶劣，被囚禁的人们大批死于饥饿和疾病，仅哈瓦那一省，就死了5万人。有关岛上殖民当局残酷杀害无辜的报道激起了美国公众极大的义愤。进步人士要求美国政府承认古巴的革命政府并给它以道义上和财政上的援助，而亨利·洛奇和老罗斯福等狂热的扩张主义者则希望美国对西班牙开仗，以便兼并古巴，把它变为美国的保护国。威廉·赫斯特和约瑟夫·普利策主办的《纽约世界报》和《纽约日报》竞相以耸人听闻的手法报道古巴不断发生的暴力事件，以煽动沙文主义情绪，制造发动战争的舆论。实际上，代表垄断资本集团的美国政府，只想颠覆西班牙在古巴的统治，而不愿古巴人民取得胜利和真正独立。

1896年4月，美国国务卿奥尔尼照会西班牙，建议由美国调解西班牙与古巴起义者之间的冲突，但为西班牙所拒绝。于是，美国遂以帮助古巴人摆脱西班牙的压迫为名，准备发动夺取古巴的战争。这种战争鼓动随着麦金莱总统的上台而加强了。这位以主张“古巴独立”的政纲而当选的总统就职后，即对西班牙殖民者魏勒在古巴残暴的恐怖统治提出抗议。在古巴投资的美国银行家和企业家也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措施，以恢复该岛的和平。尽管麦金莱总统把自己装扮成古巴人民的保卫者，实际上他的主

要目的是在保护美国在古巴投资者和糖厂老板的利益。

在美国日益加强对古巴的干预情况下，西班牙后退了，首先把魏勒从古巴召回，接着答应改变它的集中营政策，保证给古巴人更大的自治权利等。但是，1898 年 2 月发生了美国战舰“缅因号”爆炸事件，结果该舰在哈瓦那港沉没，260 人丧生。于是，麦金莱在美国扩张主义者鼓动下，便利用这一爆炸事件，向国会提出咨文，要求对西班牙宣战。

从 19 世纪 80 年代起，美国不仅加强对古巴的侵略活动，而且积极插手拉丁美洲国家的纠纷，甚至干涉拉丁美洲国家的内政，以扩大它在那一地区的影响。

〔美国插手拉丁美洲事务及其与智利的纠纷〕　19 世纪 80 年代，拉丁美洲国家间的重大纠纷有：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边界争端；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的边界争端以及秘鲁、玻利维亚同智利的边界争端。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的争端是欧洲国家出面调停的，而没有由美国仲裁。这引起了美国国务卿布莱恩的不满，因为他认为纯属美洲的事务是理应同华盛顿商量并由它仲裁的。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争端中，美国表面上同情较弱的危地马拉，要求墨西哥作出让步，但是墨西哥拒绝了美国的干预，结果美国既没能给危地马拉帮助，反而招致了墨西哥的反感。美国插手秘鲁、玻利维亚同智利的争端，也引起智利长期对美国的仇视，成为 19 世纪末美国同拉美国家一系列纠纷中的突出事件。

1879—1883 年，智利侵占玻利维亚和秘鲁在太平洋沿岸沙漠地带的硝石矿藏，又拒绝交纳硝石生产税，以致在三国之间引起了一场新的战争，即通常所说的“太平洋战争”，亦称“硝石战争”。秘鲁和玻利维亚都没有战争准备，也缺乏在沙漠地带作战的能力；智利则有一支经过良好训练的陆军和实力较强的海军。

战争开始后，智利在陆地和海上两个战场上都取得了胜利：既占领了玻利维亚沿海大片领土，还攻占了秘鲁首都利马。于是，布莱恩趁机对这场战争进行斡旋，并以维护拉丁美洲和平和稳定为名，反对战胜国智利提出的领土要求，以维护该地区的领土现状。但是，美国的斡旋活动却为智利所拒绝。这反映了美国同智利背后英国殖民势力的矛盾，因为智利硝石的开采大部为英国资本家所控制。

1891 年，美国和智利之间又出现新的摩擦。这一年年初，智利发生内战，亲英国的议会党发动政变，把得到美国支持的巴尔马塞达总统赶下台。不久，议会党政府派遣一艘轮船"伊塔塔号"前往美国圣迭戈装运军火，但为美所扣留；当该船逃出港口驶返智利时，又为美国派出的军舰所截获。这一事件，连同美国驻智利公使馆允许巴尔马塞达人员政治避难事件，使掌权的议会党宣布美国驻智利公使为不受欢迎的人。这样，美国与智利之间的龃龉就日益加剧。同年 10 月，又发生美国"巴尔的摩"号在智利度假的海员遭到袭击的事件，结果两名美国海员被害，17 人受重伤，另有多人遭到智利警察的拘禁，因而两国关系更加紧张。

对于美国海员遭到袭击的事件，美国政府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哈里森总统宣布：智利的"这种侮辱，对美国海员是一贯的。"① 他要求智利立即赔偿美国的损失，并且威胁说："如果这些正当的希望落空，""我将以特别咨文提请国会注意这件事，以采取可能必要的行动。"② 智利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和威胁，两国

---

① A.T. 沃尔韦勒："哈里森、布莱恩和 1889—1893 年的美国外交政策"，转引自威廉斯：前引书，第 359 页。

② 贝利：前引书，第 417 页。

关系因而更加恶化，大有爆发战争的危险。

1891年冬，美国和智利都在狂热地准备战争，哈里森的战争政策得到国会民主党议员的支持。为了煽动战争歇斯底里，美国政府还把一名在智利被害的海员的遗体，停放在曾经停放林肯遗体的费城独立大厅供人参观。智利则从德国购买了枪支，并说它的海军已作好待命出发的一切准备。但是由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所持的立场，形势变得对智利愈来愈不利。智利的宿敌秘鲁采取积极支持美国的态度，甚至提出割让钦博特给美国作为永久海军基地。阿根廷也是同智利边界争端发生过战争的国家，它一面命令海军准备战争，一面表示它可以向美军提供牛肉和其他供应品。巴西的新共和政府由于刚刚得到美国的承认，对美国和智利的纠纷则采取中立的态度。

在实力对比和国际形势显然都对美国有利的形势下，1892年1月21日美国政府向智利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智利为"巴尔的摩"号事件向美国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并威胁说，如果美国的要求遭到拒绝，美国"除了决定停止同智利政府的外交关系外，没有别的选择"。[①] 在美国巨大压力下，智利终于在1月26日被迫屈服。它向美国道了歉，还给美国受伤海员和死者家属赔偿75,000美元。美国虽然在这场纠纷中胜利了，但是却加深了智利对美国的仇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勾销了布莱恩在第一次泛美会议上所取得的为数不多的成果。

〔第一次泛美会议〕　加强西半球合作的泛美思想，在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革命斗争时期，曾得到所有拉丁美洲革命领导人的热情支持。但是，19世纪后期美国所鼓吹的泛美主义，却与上述的泛美思想根本不同。它是美国排挤欧洲国家、加强对

① 贝利：前引书，第418页。

拉丁美洲各国经济和政治控制的工具。美国认为，没有哪一个市场“是能够跟拉丁美洲市场相比的，或者是能够给美国带来更大利益的。”[①] 但是在门罗宣言发表后的60年里，它对欧洲国家向拉丁美洲的扩张却始终无力抵御，直到80年代美国才积极干预拉丁美洲的事务，同欧洲列强、主要是英国展开角逐。

19世纪80年代，英国控制了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对外贸易，这使它在政治上也处于强有力的地位。美国同拉丁美洲贸易则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年年都有很大的逆差。更使它不能容忍的是，它每年要从拉丁美洲买进100万美元的原料，而拉丁美洲国家则用这笔收益进口欧洲制成品。当时，美国同欧洲列强——特别同英国在拉丁美洲的竞争主要是争夺商品市场。美国力主召开泛美会议，开展同拉丁美洲国家建立所谓新姊妹关系的活动，就是为了给她的商品出口创造有利的条件。

1881年12月29日，美国国务卿布莱恩向18个美洲国家发出1882年在华盛顿召开泛美会议的邀请。但是，由于秘鲁同智利的战争所引起的南美国家的紧张局势，以及美国国内反对干涉智利内政的政治斗争，美国撤销了这一邀请。不过，召开泛美会议仍是美国统治集团的迫切要求，在克利夫兰总统任期即将届满时，国会两院于1888年通过法案，决定授权总统召开泛美会议，随即向拉丁美洲国家再次发出请柬。

哈里森总统执政后，一度去职的布莱恩又回到国务院任职，主持了1889年10月2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一届泛美会议。除多米尼加外，当时17个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都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布莱恩对会议作了精心安排，他先是发表了恭维到会代表的

---

① 转引自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美国近代史纲》，下册，三联书店中译本，1977年，第724页。

欢迎词，然后热情邀请他们前往美国各大城市参观、游览，所到之处，都给予盛情的接待。布莱恩企图用这样的活动方式显示美国的工业发展和经济实力，宣扬泛美主义以抵制欧洲的影响，从而给会议第二阶段讨论实质性的问题定下调子。

11月18日，泛美会议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在会上提出讨论的问题有：建立关税同盟并统一海关章程；实行货币同盟，在贸易往来中实行统一的支付手段；统一度量衡制度；制定专利权保障法；建立解决美洲国家争端的仲裁法庭。其中布莱恩最急切谋求解决的主要问题，一是实行关税同盟，二是建立国际争端仲裁机构。他认为，解决这两个主要问题，不仅有助于维护和平，防止南、北美洲再次发生战争，而且还可以“培植同所有美洲国家友好的商业关系，极大地增加美国出口贸易……使我们（的国家）得以有力地同欧洲制造业国家相抗衡。”[①]

在泛美会议上，布莱恩的倡议虽然得到许多国家的“赞许”，实际上统统没有能实现。会议只是表示了支持订立双边贸易的倾向，同意设立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其任务只是交换经济情报。为此，设常设机构——美洲共和国商务局于华盛顿，后改称泛美联盟。

第一次泛美会议的召开，是美国对英国在拉丁美洲优势的“尖锐的挑战”，[②] 也是美国伸向拉丁美洲的“一条臂膀”。[③] 布莱恩在会上提出的一系列倡议，则是美国在拉丁美洲进行扩张的纲领，它受到拉丁美洲国家巧妙的抵制以及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有力反对，最后遭到失败。会议的结果，在美国国内也招致了批

---

① 普拉特等：前引书，第157页。

② 福斯特：前引书，第338页。

③ 福斯特：前引书，第339页。

评。但是，泛美会议终于由多年的空谈变成了现实，泛美主义从此变成了在美国控制下的有组织的活动。会议期间，布莱恩给予拉丁美洲国家代表的友好接待，掩盖了美国扩张野心，也多少消除了它们对北美巨人的恐惧心理。

〔委内瑞拉边界争端与门罗主义的发展〕　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边界争端，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插手后，成为美国与拉美关系冲突中的另一突出事件，也是它同英国在拉丁美洲的一场重要角逐。从此，门罗主义成为美国在拉丁美洲的霸权主义的同义语。

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位于南美大陆东北端，濒临大西洋。从委内瑞拉境内的主要河流奥里诺科河入海处以东至英属圭亚那的埃塞奎博河以西的地区，自1814年英国领有圭亚那一部分后，双方就存在着边界纠纷。有争议的这片崎岖的丛林地带对委内瑞拉保卫奥里诺科河口的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后来由于这一地带发现了金矿，双方的争执更加尖锐起来。英国曾多次试图由它单方面划定边界线，但都为委内瑞拉所拒绝。委内瑞拉一直坚持以英属圭亚那境内的埃塞奎博河为界。

80年代美国插手拉丁美洲事务后，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的边界争端进入了新阶段。委内瑞拉在边界纠纷解决无期的情况下，1882年决定诉诸国际公断，多次向美国指控英国在边界问题上的蛮横立场，促请美国本着"不朽的门罗精神"进行调解，给以仲裁。美国则把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的边界争端当作它涉足拉丁美洲的大好时机，一再敦促英国作出让步。委内瑞拉由于确信在同英国的争执中会得到美国的同情和支持，因而于1887年毅然断绝了同英国的外交关系。同年，美国正式提出愿协助双方解决争端进行仲裁的建议，结果被伦敦拒绝。这意味着英、美在拉丁美洲斗争的激化。

在克利夫兰总统第二次任职时期，美国在委内瑞拉已拥有重要殖民利益，美国资本家不仅已经取得奥里诺科河下游和三角洲地带大片领土的租让权以开采黄金，还正在加紧勘探委内瑞拉境内的石油产地，这就更加促使美国以支持委内瑞拉反对侵略为名，不断攻击英国。实际上，美国就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边界争端所展开的宣传运动，日益暴露出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扩张野心。《纽约论坛报》指责“英国垂涎并试图夺取”委内瑞拉领土。[①] 共和党的青年参议员亨利·洛奇在《北美评论》著文指出：如果允许英国“取得委内瑞拉领土，就不能防止它得到整个委内瑞拉或其他任何南美国家，……门罗主义的最高权威必须建立，并且立即建立——如有可能使用和平手段，如果需要使用武力。”[②] 1894年，前任美国驻委内瑞拉公使，当时担任委内瑞拉在华盛顿的宣传员的威廉·斯克罗格斯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英国对委内瑞拉的侵略，门罗主义受到考验》，呼吁美国应对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边界争端采取强硬立场。

1895年5月，理查德·奥尔尼出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尼的任命表明：曾以反对扩张相标榜的克利夫兰总统，在同英国的斗争中转而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他认为，“坚持门罗主义是他的职责。”[③] 1895年7月20日，奥尔尼向英国发出了一份关于委内瑞拉问题的照会，表明“这一争执涉及美国的名誉和利益，因此它对这一争执之长期悬而未决不能熟视无睹。”[④] 他在照会中坚持美国有权干预这项争执，以支持委内瑞拉维护其领土的完整。

---

① 纳尔逊·布莱克：“克利夫兰的委内瑞拉政策”，载威廉斯，前引书，第367页。

② 贝利：前引书，第440页。

③ 威廉斯：前引书，第371页。

④ 转引自祖波克：前引书，第178页。

照会的大部分是关于门罗主义对这一争执的适用问题，它在阐述美国同其他南美国家的特殊关系时强调指出："美洲国家，无论南美国家，或北美国家，由于地理相邻，天然的同情感，类似的政府结构，在政治上和商业上都是美国的朋友和盟友。如果容忍任何一个美洲国家被一个欧洲国家征服，形势自然会完全改观，并且意味着完全丧失它们同我们的天然关系带来的好处。"[①]因此，奥尔尼在照会中宣告："不仅欧洲国家不应干涉美洲事务，而且任何欧洲大国这样做都将被看作同美国利益相抗衡，并引起美国的反对。"[②]奥尔尼照会在阐述门罗主义时，进一步强调："现在美国是本大陆的主人，它的意旨就是它干预所涉及的问题的法律"[③]，"这是因为除了所有其他原因外，美国的无限资源加上它的隔离开来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环境的主宰者，实际上是任何或所有其他国家都无法击败的。"[④]

奥尔尼照会对门罗主义所作的新的诠释，已公然把它变成为美国垄断资本集团服务的美国侵略政策的工具，并宣告它是欧美关系应当遵守的原则。美国以其发展起来的实力为后盾的这个原则与它主宰拉丁美洲的野心结合起来，其作用和影响就远远超出了委内瑞拉边界问题的范围。它不仅是美国干涉委内瑞拉边界问题的根据，也是美国妄图独霸拉丁美洲的宣言。

但是，英国对奥尔尼照会表示了极大的蔑视。英国海军立即在英属圭亚那作了军事部署，并以此作为对奥尔尼照会的回答。英国政府根本不理会美国政府等待答复的焦急心情，迟在4个月后，才由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正式复照美国。他在复照中明确指出，美国用新奇的办法来扩充和发展门罗主义，但在当前的情况

---

①② 戈德温编：《美国外交政策文件摘编》，纽约，1959年，第192页。

③④ 戈德温编：前引书，第193—194页。

下是没有理由使用这一主义的，而这一主义尤其不能适用于英国和委内瑞拉的边界争端。因为他认为这一边界争端根本与美国无关，它只是英国领地的边界问题，“而这块领地在委内瑞拉共和国出现之前长期属于英国国王。”总之，英国的复照表明它不承认门罗主义是国际法，不承认门罗主义适用于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边界纠纷，也不接受美国对这场纠纷进行仲裁。

由于英国拒绝仲裁，两国关系仍陷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克利夫兰总统在 1895 年 12 月 17 日致国会的咨文中，表示不能容忍欧洲国家在拉丁美洲的扩张。他说一个欧洲国家占领与我们毗邻的一个美洲共和国的领土，“这正是门罗总统所说的‘危害我们的和平与安全’的行为。”[①] 他进一步说，由于英国拒绝将争执交付仲裁解决，美国有责任采取措施，以决定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之间的边界。因此，他建议国会组织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责成它对边界问题进行必要的调查，并在最短期内提出报告。克利夫兰威胁说：“在调查后，我们认为属于委内瑞拉领土的任何部分，被英国占领或在其上行使管辖，我认为美国的责任就在于把它当作对美国权利和利益的侵犯，给以全力的抵抗。”[②] 他还表示，在他提出这一建议时，完全了解他所承担的责任和可能引起的一切后果。

克利夫兰充满火药味的咨文，煽起了美国举国的战争狂热。国会对克利夫兰咨文表示热烈欢迎，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拨款 10 万美元给边界调查委员会。纽约市警察专员部长官西奥多·罗斯福表示：他“相信这个国家需要战争”，并说：“我宁愿战争快些

---

① 巴特利编：前引书，第 350—351 页。

② 巴特利编：前引书，第 350—351 页。

到来。”① 许多内战时的老兵表示愿意提供他们的服务，当时美国26个州的州长保证支持总统的立场，爱尔兰人全国联盟则保证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动员10万志愿人员。

美国的态度虽然咄咄逼人，但是它却没有采取有力的备战措施，实际上是恫吓多于行动。在克利夫兰咨文提出后，美国海军进行了战争准备，把它的2/3舰只集中到拉丁美洲。但是，英国也不想打仗。这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国内反战力量的活动，他们认为为了几千平方英里蚊虫丛生的地区去同美国人打仗是不可思议的。下院354名议员在一份致克利夫兰和美国国会的同意仲裁的信件上签了名，800名英国工人通过决议要求政府接受仲裁，英国作家给美国发出的呼吁也要求和平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更重要的是英国资本家已在美国有巨大的投资以及当时英国同法国和俄国在北非和中近东的矛盾加深，尤其同德国在南非的争夺日趋激化，都使英国政府不仅不能轻率地同美国破裂，而且必须致力于改善同美国的关系。这就促使英国在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边界争端中的僵硬立场发生急剧变化。

美国的边界调查委员会成立后，奥尔尼把它的活动通知英国和委内瑞拉，要求它们接受这个委员会可能给予的“帮助”。英国不仅同意了这一请求，甚至连以前将边界问题交给国际法庭解决的要求也表示同意。由于英国态度的转变，英国和委内瑞拉的代表于1897年2月在华盛顿正式签订了一项解决争议的协定，并把这一边界争端问题提交仲裁法庭公断。1899年10月，仲裁法庭在巴黎作出最后裁决，决定各方控制50年以上的争议区不列入仲裁范围，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的最后边界线大体按舍恩

---

① 贝利：前引书，第444页。

伯克线[1]划分，只是将这条线东侧北端接近奥里诺科河河口地区和南端的一部分地区划给委内瑞拉，其他部分则划归英属圭亚那。

根据国际法庭仲裁的结果，委内瑞拉在领土上得到了一定的满足，即得到了奥里诺科河河口及其三角洲地带，但大部分争议地区却判给了英属圭亚那，而美国也为此作了较大的让步。但是，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的不是委内瑞拉在边界划定方面的得失，而是解决这场纠纷的方式，即英国在美国以及其他国际斗争的压力下，终于改变态度，接受仲裁以解决边界争端的方式。这实际上等于英国承认了美国在拉丁美洲事务上的特殊地位，默认了美国在拉丁美洲推行的门罗主义。这是19世纪末期美国和英国在拉丁美洲的一场意义重大的较量。通过这场较量，美国迫使英国退却，因而逐渐在拉丁美洲占了上风。从此，它更积极致力于推行门罗主义，把它作为在拉丁美洲建立霸权的工具。

---

① 舍恩伯克线是1840年英国人罗伯特·舍恩伯克在现场勘查后所划定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的边界线。

第 十 一 章

19 世纪后期美国的思想文化

19 世纪后期美国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化对它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也使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极大改变。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各种社会思潮应运而生。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新的社会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复杂变化的社会生活为作家、艺术家们展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新的创作天地。

内战以后，美国民族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出现了亨利·詹姆斯这样不但在美国、而且在欧洲产生巨大影响的哲学家；产生了雄踞美国文坛近半个世纪、享誉世界的文学巨擘马克·吐温；诗歌、绘画、雕塑、建筑等各个艺术领域人才迭出，教育、新闻等事业蓬勃发展。到了 20 世纪初，这个建国只有 100 多年历史的年轻国家，以其具有鲜明特色的、丰富的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艺术殿堂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第一节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变化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风行及对这一思潮的批判〕　1859

年，查尔斯·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在整个西方思想界引起了一场革命。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应运而生了。内战后，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经过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宣扬，传入了美国，一时成为影响最大的社会思潮。

斯宾塞是19世纪后期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他试图用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学说去解释人类社会。他认为，人类社会内部不同集团、不同民族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是“生存斗争”，其结果也必然是“适者生存”。在他看来，经过这种长期的斗争，就能产生由一批体力最强、智力最高的人组成的“美好富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切罪恶和不道德都将消灭，“利他主义”将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从这种立场出发，斯宾塞反对一切社会改革方案，认为改革只能干扰社会的自然演进。他蔑视穷人，把穷苦大众说成是不适于生存的人。他宣扬：弱肉强食、“自然选择”，劣等人要让位于优秀者。在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阶段，这种学说迎合了19世纪后期美国所流行的那种冒险投机和无情竞争的精神，为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和资本家剥削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

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约翰·菲斯克是斯宾塞的追随者，积极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他在一些著作中使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法则解释社会现象，把国家、民族、阶级之间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荒谬地归结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他进而宣称“经过自然选择，美国已经成为优胜的国家，已经表明适于生存的美国人自然地合乎逻辑地应统治弱者，即不适于生存的人。”①

---

① 威廉斯编：前引书，第1卷，第332页。

著名牧师、美国福音派教会联盟总干事乔赛亚·斯特朗是与非斯克齐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披着宗教的外衣，宣扬种族优越论。1885年，他出版了一本畅销书《我们的国家》，其中把美国人说成是天定的选民，是被上帝挑选出来领导落后民族的基督教徒。他写道："这个种族（指美国人——作者）具有不可超越的能力，它背后拥有一切数不尽的财富力量。我们应该希望它成为伟大的自由、纯正的基督教和最高的文明的保存者。这个种族显示某些非常的进取特性，足以把它的制度传播于全人类，把它的统治扩大到整个地球。"①

其他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也大肆鼓吹种族主义的"理论"，认为只有盎格鲁-萨克逊种族才是"优秀种族"，它"为了文明的利益"，有责任干涉其他民族的事务。②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喧嚣一时之际，一些进步学者对之起而抨击，其中最著名的是社会学家莱斯特·沃德。沃德反对流行的那种认为自然与社会现象均非人类所能控制的理论。他断言，科学所带来的所有实际利益都是人类控制自然的结果。在他看来，无论从自然科学还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人类的职责就是支配、控制自然，而决不是仿效自然和听任自然的摆布。所以，他批评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要求政府干预经济。他进一步指出，垄断剥夺了许多人成功的机会，一个代表所有人利益的民主政府，应制定促进社会福利的立法和计划，并对剥夺经济机会的垄断采取严厉制裁的措施，以保证实现真正的个人主义。

美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单一税论"倡导者亨利·乔治③

① 转引自J.W.普拉特：《1898年的扩张主义者》，巴尔摩尔1936年，第6页。

② 威廉斯编：前引书，第332页。

③ 参看本书第七章，第一节。

也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批判。乔治在他的主要著作《进步与贫困》一书中批判斯宾塞贬损人的价值，在某些方面把人类降到比动物还低的地位。他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人发财而另一些人却在受苦。因此，他反对斯宾塞所谓"适者生存"的原则，认为社会进步取决于人类协作和社会平等，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人的创造力；不平等现象盛行之时，人类协作即告中止，文明也就随之衰落。

也有一些学者对种族优越论进行抨击，认为这种"理论"是把达尔文关于生物界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原则应用于人类社会的种族关系，其目的在于宣扬盎格鲁－萨克逊种族优越论，并以此为依据建立美国霸权的"理论"，进而为美国统治集团侵略和奴役弱小民族和国家的行动辩护。

〔改革理论家及其代表作〕　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总财富因而激增，但伴随经济进步的却是贫富差别愈加悬殊，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卡内基、洛克菲勒、范德比尔特和摩根等金融巨头家财巨万。他们在美国家庭总数中仅占1%，而年收入竟占全国总收入的10%以上。这些富豪们穷奢极欲，夸豪斗富，一掷千金；而千百万穷苦工人、农民终年劳碌，其所得却不足以温饱。在纽约及其他大城市，富豪们华邸旁不远处就是肮脏破烂的贫民窟，有的人目睹这种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痛感于种种社会弊端，开始探求改造社会的途径。前已介绍过的亨利·乔治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位。

与亨利·乔治同时，美国出现了一位更富于想像力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爱德华·贝拉米。1887年，贝拉米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回顾》。在这部乌托邦型小说中，他虚构了一个与当时倾轧争斗的美国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未来理想社会。这个社会根除了战争、贫困、犯罪和疾病，没有军队和监狱，既安宁又美好。

在他的理想社会中，“全国工商业不再由少数属于私人的、不负责的大公司或辛迪加，以追逐私利为目的任意经营，而由一个惟一代表人民的辛迪加来经营，为全国人民谋福利。也就是说，国家组织成为一个大的企业公司，所有其他公司都被吸收进去。它代替了一切其他资本家，成为惟一的资本家。它是独一无二的雇主，吞并了以前所有的较小的垄断组织，成为最后一个垄断组织。它的利润和各种结余都由全体公民共同享受。”① 在这个社会中，国家的行政管理和生产管理是统一的，政府和官员的主要职能是指挥和监督生产。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理想社会，在贝拉米看来，可以依靠社会舆论和人类健全的理智，以及人类合群的和慷慨的本性来实现，“根本没有任何暴力行动……只能采取辩论的方式”。② 贝拉米依靠道德原则和所谓“人类健全的理智”进入一个新的理想社会，这只能说是十足的幻想。

〔实用主义哲学及其创始人詹姆斯〕　实用主义是生长在美国土壤上的一个哲学流派。19 世纪 70 年代，美国哲学家查尔斯·皮尔斯最早提出了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到了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威廉·詹姆斯和约翰·杜威把实用主义加以发挥和系统化，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从而使实用主义成为美国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皮尔斯、詹姆斯和杜威曾被人喻为美国实用主义“神圣家族”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其中詹姆斯是实用主义哲学的奠基人。

詹姆斯出身于纽约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研究宗教和哲学的作家，与当时著名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拉尔夫·爱默

---

①② 爱德华·贝拉米：《回顾，公元 1887—2000 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4 年，第 47—48 页。

生等人过往甚密，詹姆斯因而从小就受到他们的影响。1869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医学院，后在该校教授解剖学和生理学等课程，从 19 世纪 80 年代起改教哲学和心理学，成为这两门学科的教授。他早期的研究领域是心理学。1890 年，他发表了《心理学原理》，这不但是一部心理学著作，也是一部哲学著作，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在这部著作中，詹姆斯反对斯宾塞的宿命论，认为人类进行思维的目的在于“帮助改变世界”。他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和人类的创造力，反对那种把人看成是完全听任环境摆布、成为周围环境塑造而成的机器的观点。詹姆斯认为，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自我”，这个“自我”有它自己的意志，这种意志虽然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但同时又反作用于环境，人类就是在这种与环境不停地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中生活，而不是听任外界力量摆布的生物。

1907 年，詹姆斯出版了他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实用主义》。这部书奠定了他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真正奠基人的地位。实用主义的核心是它的真理观。皮尔斯提出过实用主义真理观的基本概念，认为一个陈述的真理如能被实验所证实，它就是有意义的。詹姆斯把这一思想加以发挥，把观念的真理性同观念的客观效用等同起来。在詹姆斯看来，真理的意义不过是使试验与经验圆满地联系起来。所以，“对于实用主义者，真理成为经验中各种各样确定的、有作用价值的类名。”[①] 所谓使经验（包括观念）与试验圆满地联系起来，就是概念会给生活带来好处，“只要我们相信一个观念对我们的生活是有益的，它就是真的。”[②] 詹姆斯特别用这种信条去论证宗教信仰的真理性。他说：“如果神学

① 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79 年，第 38 页。

② 詹姆斯：前引书，第 41 页。

的各种观念证明对于具体生活确有价值，那么，在实用主义者看来，在确有这么多的价值这一意义上说，这就是真的了。”例如，在一个人相信了上帝以后，“上帝这个名称至少会给你一种精神上的休假日的好处。”[①] 所以詹姆斯把真理和有用直接等同起来，认为“‘它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的’，‘它是真的，因为它是有用的’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在詹姆斯看来，人类之所以把追求真理当作首要任务，其原因就在于它对人类生活具有这种明显的好处。这样一来，在詹姆斯这里，真理不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成了“有效用”、“能满足我的需要”的同义语。只要符合这一标准，那么即使是宗教甚至谎言也都具有真理的性质。

实用主义哲学是一种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哲学。它强调人的创造性，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或逻辑出发，主张通过考察其实际效果来检验一切理论和学说。这些主张不但符合美国人那种求实的价值观念和进取精神，也适应了那种复杂多变、不断开拓、剧烈竞争的美国社会生活的要求，所以，实用主义成为一种与以往那种深奥难解的经院式哲学不同的、“入世”的哲学，成为当时美国社会各种改革的理论基础，其影响所及，包括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历史等各个领域和学科。从这方面的意义来讲，实用主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意义。它所宣扬的那种极端功利主义、竞争冒险和为获得“效果”甚至可以不择手段的自私与残忍精神，迎合了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和当时的时代风气，所以很快为资产阶级中的各个阶层所欣然接受，流行一时。实用主义哲学否定真理的任何客观内容，把效用、功用当作真理的惟一标志和准绳，把真理看成是纯粹人为的主观的东

---

① 詹姆斯：前引书，第104页。

西，这事实上是混淆了真理与谬误、事实与谎言的界限，所以具有明显的反科学的一面。

〔杜威的“工具主义”及其影响〕　继詹姆斯之后，约翰·杜威又进一步发展了实用主义哲学。杜威是美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他1878年毕业于佛蒙特州立大学，做过中学教师。1882年又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以后先后在密歇根、明尼苏达、芝加哥、哥伦比亚等大学任教。杜威起初是个理想主义者，后来受詹姆斯著作的影响，在19世纪90年代转向实用主义，并把实用主义的一般原则推广到政治、文化教育以及道德等各方面，同时还在詹姆斯的“有用即是真理”的理论基础上，建立起他自己的“工具主义”。“工具主义”否认理论思维的意义，把一切科学理论归结为“经验”，认为它们只是个人应付环境的“工具”，同时把一切概念、学说统统视为假设，都看成工具。在杜威看来，它们同其他工具一样，其价值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所造成的结果中显现出的功效。因此，一种理论是否成为真理，并不在于它是真是假，而在于它有效无效。显然，杜威这种真理观是同詹姆斯一脉相承的。

杜威虽然接受了“有用即是真理”的真理观，但他反对坐在书斋内把哲学作为单纯的学术来研究，而是认为哲学必须同人的生活和社会现实发生联系，以促进社会目的的实现和政治行动的发展。在杜威看来，使哲学与教育结合起来，是实现上述目的与促进发展的最好方式，而且可以发挥哲学的最大推动作用，因为教育是塑造人的理智和情感倾向的全过程，是与每个人发生关系的事。所以他认为通过普遍的教育活动，便能把实用主义哲学所宣扬的世界观与思想方法灌输给人们，使它发挥最大效用。杜威否认把生产关系看成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基础的观点，他认为社

会是由具有最初的人性（诸如本能、习惯等）的个人结合而成的，社会既然只是人性的组合，因此教育在改进社会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要使社会进步，只需采用发展人性、刺激智慧的教育方法，使社会改革通过教育的方法而不是通过斗争来实现。为了检验和实践他的哲学理论，杜威一面通过创办实验学校等活动实践自己的教育理论，一面撰写大量教育论著，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如关于教育的本质，他提出了"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继续不断的改造"等著名观点。杜威的教育理论不乏革新与合理之处，对欧美的现代教育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他把教育看成是改造社会、推动人类进步的惟一手段，反对任何社会革命，这在客观上无疑起到了维护垄断资本统治的作用，所以，垄断资产阶级对他的哲学体系大为赞赏，他本人被誉为"哲学家中的哲学家"，"在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己的哲学中体现了美国人的理想"，还被说成"是美国人民的顾问和导师"。

〔维布伦的新思想〕　在进化论的冲击和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下，19 世纪后期美国的经济、法律、宗教以及教育思想和学术思想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明显变化，总的趋势是一切从现实需要出发，改造或摒弃陈腐的思想观念，以新的思想和方式解释历史和对待现实，以适应新的社会要求。

在这一时期，尽管亨利·乔治和贝拉米等人提出了具有很大吸引力的社会改革的主张，但在各大学中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传统的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从这种思想出发，财富的不平等被说成是刺激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竞争则是满足个人需要的最好方式，能给绝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的利益，而且只有在不受任何控制的社会中，自然的经济法则才能最好地发挥作用。

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向这种传统思想

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他们严厉批评经济上自由放任政策，主张政府应合理地运用其权力来改善社会。1885年，在理查德·伊里领导下，美国经济学会成立了，宣布支持政府对经济进行积极干预。在承认工业社会中个人主动精神存在的同时，该学会又明确指出，自由放任的信条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在道德上是腐朽的。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位美国近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索尔斯坦·维布伦。维布伦曾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密苏里大学任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制度学派”的创始人。他写了《为什么经济学不是进化的科学?》、《有闲阶级论》和《企业论》等著作，批判当时流行的“正统”的经济学理论。维布伦认为社会是一个复合体，人的生活和行为相互影响并可归纳为几种类型。社会和人的行为类型都在不断变化，但这种变化在有限的范围内能够加以预测，所以他力图建立以研究“制度”的演进为中心的经济理论体系。维布伦主张在经济学研究中运用数量及统计研究的方法，这种归纳法对后来的经济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维布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进化论的影响，他还把伦理学、心理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引入经济学领域。他说百万富翁不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他们对社会毫无用处。他对“商业”与“工业”两者间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前者所关心只是利润，因而是反社会的；而后者关心的是组织工艺的生产过程，因而是有益于社会的。总之，维布伦在他的著作中为当时许多改革者提供了他们经常反对“掠夺性的财富”、不在地主所有制和利润制度的理论依据。

〔特纳及其“边疆假说”〕　在历史学领域内，19世纪末有一支异军突起，这就是特纳及其创立的“中西部学派”。弗雷德里克·特纳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他一生著述不多，但它的理论在美国史学界居支配地位达30多年之久，对美国资产阶级史

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1893年，特纳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历史协会上宣读了题为“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的论文，在美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这篇论文系统地阐述了西部在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作用，它不但奠定了特纳“边疆假说”的基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时美国资产阶级史学的转折点：美国历史的注意重心开始从美国历史的欧洲起源（“生源说”）转向结合美国实际，开始从北美大陆东部转向西部。人们开始把“移动的边疆”视为理解整个美国历史、解释美国发展独特性的钥匙。特纳所说的边疆，指的是任何时候介于该大陆已被拓殖的地区与人迹未到的地区或印第安人地区之间的地带。就美国而言，指的就是存在着广大“自由土地”的西部。他说：“这条一直向后退缩的自由土地的边疆是美国发展的关键”。他认为这条由于殖民地人群的推进而不断向西移动的边疆，是“原始与文明、自然状态与制度、野蛮与教化、初步与复杂的会合点，”在两者遭遇的地方，边疆就对双方起了使它们发生新陈代谢的变化的作用，但前者不可避免地让位于后者。这个过程表现为人征服了自然和文明的到来。这样，就在原来仅仅是“单纯的和无生气的大陆”上，不断向前推进的边疆留下了“一个复杂的神经系统”，即逐渐成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和一种文明。这整个进程不但使人和制度摆脱了对欧洲的依附，而且促进了人和制度的“美国化”。用特纳自己的话来说，美国就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与独特的地理因素接触”后相互作用的产物。同时，特纳还强调指出美国边疆的特点，认为它明显地有别于欧洲的边疆，后者是一条穿越稠密人口的设防边界线，而前者在19世纪末以前一直处于一片“自由土地”的边缘。因此，他认为“自由土地”的存在及其开发——“西进运动”——在美国历史中具有独特的决定性意义，它说明了美国历史的发展，这

种历史发展的主要特征就是扩张。因为征服自然以及新的地域已成为美国人的“天定命运”。[①]

特纳历史观的提出，使19世纪美国史学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独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美国资产阶级学者写了很多历史著作，但他们中多数人都认为美国制度只不过是欧洲制度的延续，因此往往用“生源说”来解释美国历史的发展，而本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特殊条件则大都被忽略了。针对这种情况，特纳独树一帜，认为不能用“生源说”来阐述美国历史，而必须结合美国的具体条件来加以阐述，这就使美国资产阶级史学前进了一大步。其次他结合美国实际，提出西部开发在美国历史上的重大意义，这使他抓住了美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特征。在他之前，虽然也有人提出开发西部的重要性，而就这个问题提出系统性的理论他是第一人。

特纳的历史观中，也有很多谬误和矛盾之处。例如，他把印第安人世代生息的广大美洲土地说成是“无主土地”或“自由土地”，这就把美国向西部扩张的“西进运动”中印第安人遭受驱赶和屠杀的悲惨遭遇轻易抹去了。特纳也夸大了西部开拓及其对美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性，似乎它是不受资本主义规律制约的、世界文明史上不同寻常的特殊现象。特纳强调说，美国社会的发展和繁荣是建立在边疆不断扩展的基础之上的，西部“自由土地”的存在为东部的工人和贫穷农民提供了谋生和发财致富的机会，形成了“社会安全阀”，使美国的社会矛盾不断缓和。在阶级斗争日趋激烈、工农运动日益高涨的19世纪后期，这种“安全阀”理论迎合了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因为它在广大工人中传播了摆

---

① 以上特纳论点参阅特纳“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载于杨生茂主编：《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1984年。

脱贫困的幻想，涣散了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同时，19世纪末边疆消失后，特纳所鼓吹的美国对外扩张乃“天定命运”说，也适应了美国统治集团推行对外扩张政策的需要。

第二节　教　　育

〔*内战后初期的美国教育*〕　内战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城市人口的激增，原有可利用的教育机构、设施和传统的教育形式都远远不能满足和适应时代的需要，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内战结束后的最初10年间，美国的国民教育仍相当落后。据1870年的统计，当年年龄在10岁以上的人口中，文盲总数竟达600万，占全部人口的1/5左右。在这个以民主制度自诩的国家里，全国800多万选民中，有160多万人甚至不认识他们自己所投选票上的名字。当时全国5—18岁之间的学龄儿童和青年有1,200多万，其中将近一半的儿童和青年（540多万）是在得不到任何学校教育的情况下成长的。① 而南方的教育更不发达。战后的南部满目疮痍，教育事业也遭到极大破坏：教师奇缺，财力枯竭，各州无力提供教育经费，大部分学校都已关门。加上内战后南部有近400万解放了的黑人获得公民权，但他们中很少有人受过最起码的教育，所以黑人教育也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直到1876年，能够就学的黑人儿童仍然是极少数。② 所以，尽管内战后南部各州都把“人民有受教育的权利”这一原则写进了州宪法，但教育事业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因而这一原则未能付诸

---

① K.L.瓦塞尔编：《美国教育社会史》，芝加哥，1965年，第2卷，第38页。

② 瓦塞尔编：前引书，第2卷，第23—24页。

实现。

面对教育极端落后这种状况，从70年代起，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开始大力发展公共教育事业，投入了巨额资金。1870年，用于公共教育事业的开支为6,300万美元，1910年超过了24,000万美元。在此期间，普遍义务教育得到迅速的发展。1870年，在全国公立小学注册的学生总数是680多万，到1900年猛增到1,500多万。在此期间，在校注册的中小学生在全国5—17岁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57%上升到72%以上。文盲占全部人口的比重，由1880年的17%下降到1910年的7.7%。[①]

这一时期中等教育的发展速度也相当快。1870年，美国只有160所公立、私立中学，在校学生只有8万多人，到1880年，公立中学便猛增到800所，学生有11万人，1890年达到2,500多所，学生20多万。到了1900年，已经有6,000所中学和51万在校中学生。[②]

在内战前，美国的师范教育很落后，全国只有12所培养教师的学校。内战以后，随着普遍义务教育的发展，对教师的需求量激增，教育逐渐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对师资力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各州开始竞相建立教师学院，到1900年，全国每州都至少有一所师范学院。在许多著名的大学中，如芝加哥、哈佛、哥伦比亚、斯坦福以及其他大学，都建立了教育学院。[③] 与此同时，为了改革过去那种陈旧落后的教育，以适应新的工业社会的需要，教育开始被认为是一门科学而引起重视与研究。通过埃德加·希尔顿和威廉·哈里斯等一些教育家的不懈努力，许多外

---

① 理查德·霍夫斯塔德：前引书，第306页。

② 戈登·C. 李：《当代美国教育》，纽约1957年，第161页。

③ 理查德·柯伦特等著：《美国历史》，第2卷，纽约1979年，第533页。

国著名教育家的理论被介绍进来。1882 年，还建立了以研究教育科学为主旨的全国赫巴特协会。

〔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　　内战结束后，发展和改革高等教育成为现代工业社会的迫切需要，于是教育成了日益被人们重视的事业。旧的大学得到迅速改造与扩大，新的各类高等院校广泛地建立起来，学校为更多的青年提供了求学的机会。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体系上，都为美国现代高等教育奠定了基础。

联邦政府对教育的大力支持和赞助，是 19 世纪高等教育振兴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措施，是莫里尔法的实施。贾斯廷·莫里尔是佛蒙特州的众议员，他坚持认为受教育是美国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极力主张联邦政府拨出公共土地以支持普通学校和大学。他认为这样做不但符合宪法赋予政府的权力，而且会促进受教育机会的平等，消除文盲，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内战之前，高等教育一直被看成是私人或宗教团体的事业，政府从来不加干预和资助。1862 年，林肯总统签署了由莫里尔倡议，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莫里尔法。这一法令的实施，使联邦政府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莫里尔法规定，按各州在国会中代表的人数，凡是有参议员或众议员一人，联邦政府便拨给该州 3 万英亩公共土地，各州可出售该项土地，把所得款项作为教育基金，支持建立农业学院或机械技术学院。这项法令实施后，共有1,300 多万英亩公共土地转到各州手中，先后成立 69 所“土地赠予”学院（即用出售联邦赠地所得款项建立的学院），西部许多州也因此建立了州立大学。[1] 1892 年，国会又通过第二个莫里尔法，规定联邦对每一所土地赠予学院提供年度

① 莫里森等著：前引书，第 2 卷，第 310 页。

拨款，并使南部各州得以建立类似的学院。莫里尔法是美国历史上关于教育的重要立法，对美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世纪后期，美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一些大企业家和金融巨头从他们所攫取的巨额剩余价值中拿出一部分款项，以慈善事业的形式对高等教育进行了大量私人捐赠，这种私人捐赠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也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1867年，一个住在英国的美国商人乔治·皮博迪捐赠200万美元，建立了皮博迪教育基金，用以发展南部的教育。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这种私人捐赠的巨额资金陆续涌来。以哈佛大学为例，1869年对它的私人捐赠就约达200万美元。其他如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一大批私立大学，都在私人慈善事业的帮助下获得发展。对于这些原有大学来说，这些捐赠为它们提供了巨额经费，使他们有可能聘请高水平的教师，添置图书和仪器设备，扩大学校规模，使学校达到更高的水平。与此同时，又创办了许多私立大学。1868年，靠电报业起家的百万富翁伊兹拉·康奈尔出资创办了康奈尔大学；1875年，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创办了范德比尔特大学；1876年，巴尔的摩的大银行家和铁路巨商约翰斯·霍普金斯创办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885年，铁路富商利兰·斯坦福创办了斯坦福大学；1891年，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赠款3,400万美元，建立了芝加哥大学。这些大企业家与金融巨头捐赠巨款兴办高等教育，固然使高等学校可以培养和输送工业化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同时可借此表明他们对公共事业的关心，从而改变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缓和社会各阶层对他们积聚大量财富的不满情绪。用钢铁大王卡内基的话来说，这种私人捐赠是现实社会中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消除剂”和贫富之间的“调合剂”。从1881年起，他就赠款或提供建筑物建立了许多公

共图书馆。正是从这一时期起，私人对教育及其他公共文化事业的捐赠逐渐成为风气。时至今日，私人基金会在美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中仍起着重要作用。

〔高等教育改革的进展〕　19 世纪后期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对高等教育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和大胆创新。与欧洲相比，内战前美国的大学不但数量少、规模小，而且教育思想、课程设置和教学管理都非常落后。

在 19 世纪后期，有一大批美国人陆续从当时教育先进的德国和英国学成回国，其中一部分人后来成为富有强烈进取心和改革精神的新型教育家，给美国沉闷闭塞的高等教育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新鲜空气。他们中有的担任了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老牌私立大学的校长，有的主持了密歇根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刚具雏形的州立大学。这些年轻的校长们不但大胆学习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教育理论、方法和经验，而且勇于创新。他们筚路蓝缕，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开路先锋和中坚力量。

这些新型教育家为大学制定了新的办学方针，即一所大学既要传播知识，还要创造知识，这就需要有一支由学者组成的教师队伍。这些教师既要在课堂上传授新的知识，又能以其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因此，是否具有专门知识就成为聘任教授的标准。大批新型教师被吸收进大学，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也被德国的讲授讨论法所取代。1869 年，曾在德国学习过的 35 岁的化学家查尔斯·埃里奥特出任哈佛大学校长。在他的领导下，这所美国资格最老的大学成了改革的开路先锋。埃里奥特敏锐地意识到内战和工业化给美国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对哈佛大学的组织结构、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等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把它改造成了适应新的社会需要的新型大学。他打破过去那种僵化的课程设置，在哈佛首先实行了选修课制，即开设范围广泛的各

类课程，供学生自由选择。此举一出，哈佛成了其他大学群起效法的楷模。他预见到美国社会发展的长远需要，恢复了哈佛大学的法学院和医学院，建立了管理学院，使它们建立在符合社会实际需要的基础上。与埃利奥特同时，在亨利·巴那德和安德鲁·怀特等杰出的教育家的不懈努力下，哥伦比亚和康奈尔等大学也蓬勃发展起来。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培养研究生制度也从国外移植进来。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分别在 1871 年和 1872 年成立了研究生院，并在研究生中实行讨论班制度（即习明纳尔）。在培养研究生方面，成绩最突出的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这所大学的创办宗旨是以培养研究生为主。在校长丹尼尔·吉尔曼的领导下，这里培养出了一批后来在经济学、历史学、哲学及政界等各个领域卓有成就的人才。到 20 世纪初，各个大学普遍成立了研究生院，注册的研究生总数超过 5 千人。

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另一个突出成就就是为了满足新的社会需要，各种类型的专业学院开始发展起来，如哈佛法学院，霍普金斯医学院，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建筑学院，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密苏里新闻学院和芝加哥教育学院等等。这样，高等教育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培养出直接服务于社会的各种专门人才。事实证明，这些专业学院培养出的各类专业人员在职业能力上远胜于各个行业中那些没受过专门训练、只凭经验工作的人。与此同时，随着平等意识的增强和妇女运功的兴起，妇女作为“二等公民”的地位开始有所改变，建立了许多新的女子学院，大部分州立大学先后实现了男女同校，妇女受教育的机会有了明显增加。相比之下，种族歧视等因素使广大黑人仍处于极不平等的地位。1892 年第二次莫里尔法颁布后，美国也陆续成立了一些黑人学院，但入学黑人数目与其人口总数相比是微不

足道的，对绝大多数黑人来说，接受高等教育在当时只能是一种梦想。

第三节 文学艺术

〔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 美国民族文学的最初繁荣是在19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形成了生气勃勃的浪漫主义文学潮流，产生了华盛顿·欧文、费尼莫尔·库柏、拉尔夫·爱默生、纳撒尼尔·霍桑等优秀作家，并以沃尔特·惠特曼的诗歌创作达到了高峰。到了19世纪后期，由于内战的严酷现实和战后美国社会深刻巨大的变化，新一代的作家开始以批判的目光更严肃地看待社会，更真实、更深刻地表现现实人生，文学潮流自然而然地转向现实主义。

在美国首倡现实主义文学的是小说家和批评家威廉·豪威尔斯。豪威尔斯极力反对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小说，认为小说的主要作用是教诲，而不是娱乐，所以应采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写作。他心中的“现实主义”是“不多不少地忠实于所描写的对象”。豪威尔斯是一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了近40部长篇小说，但几乎没有什么传世之作。他早期的作品主要表现中小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1885)是他的代表作。书中把一个靠剥削矿工而暴发的资本家拉帕姆写成是一个靠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诚实人，称颂他为了不失信用而宁肯自己破产，具有崇高的道德。到80年代后半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工人运动进一步高涨，阶级矛盾愈加尖锐，豪威尔斯作品中的暴露因素有所加强，开始谴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风气败坏和道德沦丧。1889年，他写了长篇小说《时来运转》，反映了当时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冲突，接触到了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但他把阶级

斗争看成是“观点上的分歧”。1894年和1907年，豪威尔斯又先后发表了《从阿特鲁利亚来的旅行家》和《穿过针眼》两部空想小说，鼓吹通过“公民投票”而产生的基督教社会主义。

豪威尔斯是美国作家中宣扬“美国例外论”的代表人物。他曾说：“谁在美国写出一部像《罪与罚》那么悲惨透顶的小说，谁就在说谎，犯了错误，”因为“充分享受生存权利的美国人，生活在一个与俄国完全不同的世界，说的是另一种语言，呼吸的空气纯洁而又活跃，前途光明灿烂”，因此“我们的小说越是描写生活微笑的一面，就越能表现美国”。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作品的主要倾向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秩序，其创作方法则被称为“微笑的现实主义”。

到19世纪90年代，有一批优秀的青年小说家脱颖而出。这些青年作家以描写城乡中下层人民生活为主，开拓了新的题材领域。他们目光敏锐，手法大胆，在作品中揭露垄断资本统治下丑恶痛苦的现实，对垄断资本排挤和盘剥中小资产阶级表示强烈义愤，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城乡穷苦劳动群众表示深切同情。这些作家触到了时代的脉搏，写出了活生生的美国社会，他们之中最突出的是哈姆林·加兰、斯蒂芬·克莱恩和弗兰克·诺里斯。

加兰出生于美国中西部农村，他目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贫富悬殊现象，痛感于广大农民在垄断资本的盘剥下，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悲惨状况，写了许多描写边疆农村生活的作品。在小说集《大路》（1891）中，他以边疆农民们为主人公，用强烈的愤懑和真切的同情写出了他们艰辛劳苦的农庄生活。作者写道，在他重访达科他农村时，“那些孤零零的农舍突然进人视野，看上去如同野兽的洞穴，人们过的那种毫无色彩、毫无乐趣的生活使我心中刺痛，……大自然风光秀丽，一如从前，但云霞日影无法掩藏这里人们的穷困。”农民们“就像落在糖锅里的苍蝇，

……越是挣扎，越容易把腿挣断。”在后来的作品中，加兰放弃了现实主义，改而宣扬民族主义和乔治的“地产单一税”主张，使他作品的思想性受到了损害。

〔现实主义文学对垄断资本的揭露〕　90年代以后，美国文学开始更深刻揭露垄断资本所造成的罪恶与弊端。1901年，弗兰克·诺里斯发表了他的优秀长篇小说，即《小麦史诗》的第一部《章鱼》。在这部小说中，诺里斯以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农村为广阔的背景，真实生动地描写了西部中小农场主同垄断资本（指铁路公司）之间尖锐冲突和生死斗争。作者用极其热情的语言赞美土地，赞美西部农民纯朴自然的性格和生活。但贪婪残忍的铁路公司巧取豪夺，力图抢走铁路沿线农民们苦心经营、赖以生存的农场，因而农场主们被迫联合起来同铁路公司斗争。铁路公司控制了州的政治、经济权力，法院也站在它们一边，农场主们无法与其抗衡。最后铁路公司竟强行没收农场，同农场主发生了流血冲突，结果农场主失败，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作者站在中小农场主一边，满怀义愤地控诉垄断资本家的罪恶。铁路资本好像一条巨大而凶恶的章鱼，触手伸向四面八方，所及之处，任何人也难以摆脱。作者把农场主同铁路公司之间的斗争看成是小麦所代表的“善”同铁路公司所代表的“恶”之间的斗争，相信善终将战胜恶，并设计了一个铁路公司经理失足落入小麦堆中不能自拔，最后被“淹死”的结局，实际上表现了人们在强大的垄断资本面前无能为力的情绪。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城市也迅速兴起，城市不但成为工商业中心和政治文化中心，而且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繁荣”的象征。有位青年作家无情揭开了这层“繁荣”的帷幕，大胆暴露出19世纪末期城市生活中最悲惨、黑暗和丑恶的一面，这个作家就是斯蒂芬·克莱恩。他的第一部小说《街头女梅吉》（1893），

取材于纽约贫民窟的生活。女主人公梅吉为生活所迫，沦为妓女，最后因不堪忍受这种痛苦生活而自杀。作者揭露了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生活在城市贫民窟中人们的悲惨处境，表明妇女沦落并非是因为道德堕落，而是社会逼迫所致。这本小说因为揭了资本主义的疮疤，写成后竟找不到地方出版，克莱恩只好自费印行。克莱恩的其他作品还有描写南北战争的长篇小说《红色英勇勋章》（1895）和许多短篇小说。克莱恩的作品风格独特，观察敏锐，富于色彩感，表现力较强。他赋予写实小说和短篇小说以特有的形式，对后来的海明威、福克纳、斯坦贝克等著名作家都有影响，被看成是美国现代小说的创始人。克莱恩只活了29岁，如果天假以年，也许会写出更好的作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还出现了一个重要作家和评论家亨利·詹姆斯。他是著名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的弟弟，他一生中写了许多小说和大量文学评论，他的题材领域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而基本主题则是年轻的美国同古老的欧洲新、旧两个大陆之间的对立，象征两种道德观念的冲突。亨利·詹姆斯的主要作品有《贵妇人画像》、《波士顿人》、《卡萨玛西玛公主》、《鸽翼》、《使节》、《金碗》等。詹姆斯对美国资产阶级上层的生活及思想情绪极为熟悉，而且往往持批判态度；但对下层人民所知甚少，而且怀有精神贵族的偏见。他无视道德品质的社会根源，很少描写社会环境；他的政治态度也很保守，甚至在作品中讥讽、嘲笑进步的民主运动。詹姆斯在西方评论界备受推崇，有人说他是"描写优美的良知的史学家"。他对文学的主要贡献是对小说艺术进行了新的尝试，如采用"意识中心"这种新的叙述技巧、对人物心理和意识进行细致分析等，这对后来的"现代派"作家如托马斯·沃尔夫等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认为是英美现代主义小说的先声。

〔现实主义文学大师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原名塞缪尔·朗荷恩·克列门斯，出生于密苏里州的佛罗里达。4岁时，他全家迁居密苏里州的汉尼巴尔，他在密西西比河岸边这个小镇上度过了短暂的童年。12岁丧父后，马克·吐温便开始独立谋生，先后做过印刷所学徒、排字工人，在密西西比河的轮船上当过舵手(他的笔名马克·吐温就是水手术语，意为“水深两㖊”)，去西部淘过金，当过新闻记者等。艰难动荡的生活使马克·吐温形成了坚毅、幽默、豪放的性格，丰富的经历为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他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土壤之中。自1865年发表了成名作《卡拉韦拉斯县著名的跳蛙及其他故事》后，他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写了多部长篇小说和许多短篇及政论，他的创作是19世纪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

尖锐讥讽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和无情揭露19世纪后期美国的政治腐败是马克·吐温作品的一个突出特色。在短篇小说《竞选州长》中，他把竞选活动中政客们的丑恶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谴责他们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惜使用一切最肮脏卑鄙的手段。在短篇《田纳西的新闻界》中，马克·吐温用荒诞夸张的手法，尖刻讽刺了美国报界中那种耸人听闻和尔虞我诈的恶劣风气。1873年，他和另一位作家查尔斯·沃纳合写了长篇小说《镀金时代》，揭露国会议员们贪赃受贿，政府机关和投机家沆瀣一气，追逐暴利、搜刮民财的罪恶勾当，针砭当时弥漫全国的投机风气。马克·吐温尖刻地把19世纪后期这个资本主义“繁荣”时代称为“镀金时代”，而根本不是什么“黄金时代”。从此，“镀金”成了19世纪后期美国社会的标记。

小说《王子与贫儿》写的是王子与贫儿阴错阳差，身份颠倒后遭受的不同经历，作者借用历史题材谴责专制暴政，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热爱。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格美国佬》

一书中，则使用荒诞手法，让一个19世纪铁匠出身的美国人汉克·摩根倒退到6世纪的英国去生活，用现代人的眼光观察英国社会，抨击封建制度和教会专制。1883年，马克·吐温还发表了他重访密西西比河所写的随笔《密西西比河上》，以出色的抒情笔调描绘大河的自然景色，回忆当年的舵手生活，体现了作者对自由的向往。

1884年，马克·吐温发表了他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作者通过小说主人公哈克贝利·费恩逃出家庭、追求自由的流浪生活，满怀深情地描绘了密西西比河上的迷人景色，展示了一幅广阔的美国社会的图画，并对一切黑暗和丑恶进行鞭挞。在小说中，作者对黑人表示深切的同情，赋予他们平等的人格和高尚淳朴的心灵。小说主人公哈克那种冲破一切束缚，在大河上任意漂流、不顾一切去追求自由，去开拓新天地的精神，正是美国劳动人民开发西部时期那种坚毅、乐观、追求自由和新生活的拓殖精神的写照。作品真实强烈地体现出了美国人民的民族性格和时代精神。这部小说风格雄浑豪放，语言清新淳朴、活泼自然而又富于变化，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是马克·吐温现实主义技巧的高峰。

到了90年代，马克·吐温写了《败坏哈德兰堡的人》和《三万元遗产》等短篇小说，嘲笑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金元崇拜，突出金钱对人们的腐蚀作用，讽刺的笔调更加辛辣尖刻。同时他还写了许多尖锐的政论文章，抨击美国政府所推行的反动的内外政策。

马克·吐温深深地植根于人民之中，是一位具有强烈民主思想和斗争精神的伟大作家，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座山峰，他的作品对美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惠特曼与迪金森的诗歌〕　19世纪后期，美国著名诗人

首推沃尔特·惠特曼。他是从浪漫主义诗歌向现实主义诗歌过渡时期的领袖。他生于纽约长岛一个工人家庭，只上过5年学，后来做过印刷厂学徒、小学教师、报社记者和编辑等。青年时期，他沿俄亥俄河与密西西比河旅行到新奥尔良，又溯流而上经芝加哥、大湖区，顺哈得孙河返回。沿途所见所闻为他的著名诗歌集《草叶集》提供了思想启示和创作素材。

1885年《草叶集》第一版问世后，一直不断增订再版，前后共出了12版之多。最后收入的诗歌有400多首，其中最长的一首，即后来被称为《自己之歌》的那首诗，共1,336行。这首诗是作者最重要的诗歌之一，基本上体现了他毕生的主要思想。诗中多次提到草叶，说它象征着一切平凡、普通的东西和平凡的普通人。诗以纽约的街道和长岛的海滩为背景，描绘了铁匠、木工、船夫、筑路者和拉纤者等各劳动阶层的生活。这首《自己之歌》实际上就是美国发展、成长的一种艺术写照。

惠特曼不仅以独特的方式歌颂新生的美国生活，对于美国的民主理想、个性的发展以及普通人的快乐、自助的精神，也都满腔热情地加以颂扬。《我听见美国在歌唱》一首诗刻画出美国人在新大陆用自己的双手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的生动情景，读来令人振奋。对于边疆西移、版图日益扩展的美国，他感到极大的欢欣鼓舞。

在诗歌写作方面，他挣脱了英国诗歌格调的传统，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自由，因而开创了美国诗歌写作的新格律。他的“自由体诗”不仅被誉为美国独立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成为“美国文艺复兴”的有机组成部分，对现代美国诗歌以至西方诗歌都有深远的影响。

埃米莉·迪金森是美国“镀金时代”另一杰出的抒情诗人。她出身于马萨诸塞州的一个有名望的律师家庭，从小就受到正统

的宗教的教育。她从30岁起，便开始写诗，但她深居简出，不与外界接触，在平静而孤独的生活中埋头写诗，留下诗稿1,700多首，但在她生前只有7首诗被朋友从她的信件中抄录出发表，所以她的诗歌实际上不为当时人所知。她死后，出版了多卷的诗集，对美国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

迪金森喜欢读爱默生的诗歌和散文，受到爱默生反对权威、崇尚直觉的观点的影响，以致使她与正统的宗教感情发生冲突。她的诗歌主要写高傲的孤独、对宗教追求的失望、死的安祥等，反映了她复杂的心理状态。她和惠特曼都是"镀金时代"杰出的诗人，但在诗歌内容方面两人是不同的。惠特曼注视外部世界，而迪金森却着意探讨人的内心。在诗歌写作的技巧上，两人也迥然不同。惠特曼以其无所不包的"事物、地方与人的清单"式诗句而著称，而迪金森所表述的却是准确、简明的短小精悍的诗句。

迪金森认为，诗人的责任在于运用突出的具体的意象表现抽象的思想。她虽然深居简出，但对19世纪后期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并非一无所知。她的诗歌也带有时代的气息。从她的一些诗歌中，可以看出她对"镀金时代"的物质主义和世态炎凉的抨击。

〔交响乐队的建立和爵士音乐的出现〕　在19世纪后期，随着文化教育的发展和来自"音乐之乡"——中欧和东欧国家移民的增多，美国爱好音乐的风气日盛，人们对交响乐队日益增长的兴趣就说明这种发展。1878年，在德裔音乐家利奥波德·达姆罗施的领导下，纽约交响乐协会组成了。1881年，波士顿交响乐队在芝加哥乐队指挥西奥多·托马斯支持下也建立起来。接着，芝加哥、辛辛那提和匹兹堡的交响乐队也先后组建了。

这些交响乐队主要演奏欧洲作曲家的作品，有时也演奏一些

美国乐曲，颇受听众的欢迎。作曲家爱德华·麦克道尔常采用美国的主题谱曲，为交响乐队提供了一些美国乐曲。但是浪漫主义作曲家埃塞尔伯特·内文比起麦克道尔更为当时美国人所熟知，因为他谱写了一些为美国人所喜欢的像“玫瑰园”那样的小型乐曲。

同时，一种纯粹美国本地的音乐形式——爵士音乐①也出现了，它是从新奥尔良和孟斐斯等城市黑人民间表演艺术演化而来的，通常用“爵士乐”和“慢四步爵士舞曲”的旋律表现出来。这种音乐具有活泼欢快和放纵的特点，后来日益受到美国人的欢迎，成为美国通俗音乐的主流。

黑人歌唱家也为美国音乐传统添加了黑人的圣歌。菲斯克大学黑人民歌歌唱家和汉普顿学院黑人圣歌歌唱队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都受到热烈欢迎。

〔民族绘画的成长〕　美国绘画艺术走上民族化道路是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那时，一代新的画家开始以浪漫的手法描绘自然风光，富于想像的美国风景画派即所谓“哈得孙画派”逐渐形成了。19世纪美国的风景画大师是乔治·英尼斯。他从小自学作画，后来受法国巴比松派画家的影响，逐渐形成自己的画风。他的风景画布局合度，剪裁得体，画意内涵，用色也极为丰富，技法质朴而精美。英尼斯特别见长于绘画中倾注感情，描绘稍纵即逝的风景中的光和云，摇曳不定的风景，炫目华丽的落日余晖或神秘宁静的月夜风景。他的主要作品有《在格林伍德下面》、《风偃雨息》、《秋天的早晨》、《度过风暴》、《月亮东升》和《蒙特克莱的冬晨》等。

美国民族绘画艺术的真正形成和繁荣是在19世纪后半期，这

---

① 这个词的来源出于非洲的“jazz”一词，它是埃及以西的北非海岸的当地名称。

一时期出现了两个最优秀的画家，就是被称为19世纪美国艺术中并立的两座山峰的温斯登·霍默和托马斯·埃金斯。他们的油画创作把美国现实主义传统风格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立了摆脱欧洲影响的正宗画风。

霍默几乎没有受过系统的美术教育，靠自学成功，是一个地道的美国画家。霍默早期的作品主要是描写战争、黑人生活的风俗画，他以纯熟的手法描绘马克·吐温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新世界的地方生活，作品充满了强烈的美国气息，因此有人说他的风景画和风俗画是“在美国的水中受洗礼的。”19世纪70年代中期后，他开始抛弃风俗画和插图而潜心专攻风景画的创作。霍默是19世纪美国最杰出的水彩画家，他的作品使美国的水彩画从气派小、不自然、充满陈旧气氛的绘画效果里挣脱出来，而代之以笔力雄健、明亮新鲜和优雅的色调。霍默以其毕生的精力描绘雄伟的自然，刻画坚毅、淳朴、勇敢善良的美国人民。他的风景画作品中几乎都有人物形象，而且几乎都是猎手、渔夫、黑人、农妇、战士、救险队员等劳动人民的形象。他画中的人物不是风景的点缀，环境也不只是人物的陪衬，而是人物与环境有机地结为一个富于生命力的整体，相得益彰，浑然天成，使作品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霍默极其热爱大海，表现大海的奇伟壮阔和人同海洋、同大自然的顽强斗争是他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如油画《救生索》(1884)、《夜雾将临》(1885)和《遇难信号》(1900)等作品，画风刚健雄壮，笔触遒劲阔大，色彩对比强烈，具有扣人心弦的力量。到了晚年，他全力描写大海，为了取得准确真实的效果，他有时会为了一个景色的再现而等上几年。他拒绝全凭记忆作画的方法，为了观察暴风雨的磅礴气势，他甚至搬到海边茅屋去居住。这种对大自然的酷爱和献身精神，造就了他的纪念碑性的、富有英雄气概的作品。霍默的其他主要作品还有《扬鞭》、《营火》、《海岸》、《猎人与狗》等。

同霍默相比，托马斯·埃金斯也继承了内战前美国绘画中的现实主义传统，但他更偏重于描绘人物个性和内心世界，有时把绘画对象隐藏多年的性格特点都挖掘出来，以致许多人甚至不愿请他画像。埃金斯受过系统的学院式美术教育，并在巴黎等地学习研究。但他在教学和创作上，却反对艺术学院公式化的“美”，坚决主张真实地反映生活。他在宾夕法尼亚艺术学院任教时，曾坚持要在男女合班的素描课中画全裸的男模特，因而遭到学院“权威”们的攻击及社会上清教徒式的宗教人士的责难，而埃金斯却以辞职表示了决不妥协的精神。埃金斯的代表作《格罗斯大夫的临床教学》(1875)充分表现了他这种向保守观念挑战的精神。他以严格的写实技巧，刻画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画的虽然是血淋淋的外科手术的场面，却使人感到冷静的科学力量与求知和救人的热情。此后，埃金斯又作了许多肖像画，其中有医生、乐师、画家、僧侣、歌星和女演员、商人及普通妇女，这些作品都朴质无华，毫无修饰，有如浑金璞玉。由于他的肖像画朴直不讳，常常招致抱怨。埃金斯坚信自己的艺术主张，努力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的肖像画都是以深远的性格描写见长，他对于生活的敏锐感受和他作品所具有的地方色彩，使他成为 19 世纪末美国杰出的却不受人欢迎的肖像画家，但他的大量作品却被珍藏下来。

〔雕塑与建筑〕　内战之前，美国已经出现了一些大型的纪念碑性雕塑作品，但很少有建筑雕刻。内战结束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崛起，许多城市都创办了一些艺术学院，建立了博物馆，同时也兴建了很多广场、纪念堂等纪念性建筑，于是雕塑和建筑几乎同步发展起来。但就建筑雕塑而言，战后 10 年内只有对假古典主义的意大利雕塑的摹仿，而没有产生比较高水平的纪念碑性作品。1876 年费城举行的美国建国百年展览会是美国雕塑艺术发展的转折点，标志着美国雕塑艺术已经从罗马冷酷的假古典主义转到巴黎

生动的浪漫主义。19世纪美国雕塑艺术的两个杰出代表人物是奥林·沃纳和奥古斯塔斯·圣—郭登斯。沃纳的作品明朗，富于感情，优美而妩媚。圣—郭登斯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雕刻家之一，他把美国的雕塑提高到世界水平，在美国美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的表现手法奔放自由，对于人物的刻画真实生动，把自然的动作同千锤百炼的轮廓结合在一起。圣—郭登斯在纽约麦迪逊广场塑立的《法拉格特纪念碑》是他的成名作，这个纪念碑的人物性格刻画异常生动出色，结构严谨，为美国纪念碑创作树立了榜样。1887年，圣—郭登斯为芝加哥林肯公园所雕塑的林肯纪念像，获得了极大成功。他巧妙地安排明暗对比，手法灵活生动，使这位伟大政治家朴实机敏的形象在现实主义和夸张的手法中得到更加深刻的鲜明的处理。有人认为这座雕像“征服了人们的想像力，成为合众国最著名的纪念碑”。圣—郭登斯其他重要的作品还有纽约的谢尔曼将军铜像，以及他在首都华盛顿为亨利·亚当斯夫人制做的墓碑雕像《神的世界》等。《神的世界》被认为是圣—郭登斯最重要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与圣—郭登斯同时，还有一位卓有成就的雕塑家丹尼尔·弗伦奇。弗伦奇于1850年出生于新罕布什尔州，先后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和法国巴黎学习雕塑。他的作品手法细腻、刀法自如，曾多次在国际展览会上获奖。弗伦奇一生勤于创作，为美国大都市、大学、纪念堂、博物馆留下了许多精美的纪念像。他的主要作品有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美国民兵》、哈佛大学的《约翰·哈佛纪念像》、米尔顿的《战争纪念碑》、华盛顿的《林肯纪念碑》、华盛顿林肯纪念堂的《林肯坐像》以及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塑像》等。其中华盛顿林肯纪念堂的《林肯坐像》，可以说是弗伦奇的代表作：林肯端坐在宽大的椅子上，两臂高高抬起，平搭在两侧扶手之上，身材瘦削但挺拔岸然，面容清癯，神情刚毅，目光微微俯视，沉思之中流露出隐隐的忧虑。塑

像的整个造型像一座雄伟峭拔的山峰，又像一匹蹲伏于峭崖之上，背负青天，振翮欲飞的雄鹰。作者把这位深受美国人民爱戴、质朴坚毅、胸怀博大的政治家的精神面貌真实地刻画出来了。

内战结束后的10多年间，美国的建筑艺术没有什么创新，更谈不上风格与特色，只是盲目模仿古典和照搬国外，修了许多摹仿中世纪的假哥特式的公众建筑，其特点是粗俗华丽，但华而不实。不过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两位杰出的建筑师，就是亨利·理查森和理查德·亨特。理查森试图把罗马建筑术移植到美国，没有成功，但他设计的建筑却因为具有一种完整性而大受欢迎。他的主要作品有波士顿的三一教堂和哈佛大学的奥斯汀堂。与理查森同时，亨特把法国文艺复兴风格介绍到美国，摹仿法国式大别墅或宫廷式的城镇房舍，为美国的富豪们建造了许多乡间别墅。

19世纪后期，由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都要求能适应其需要的新的建筑物，如车站、仓库、商场、办公大楼、博览会场等。这些建筑的要求同陈旧的建筑观念、创作方法和艺术形式等等发生了越来越尖锐的矛盾，这些矛盾是旧的建筑学所不能解决的。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带来了城市的急剧膨胀和人口剧增，各种商业、工业等类机构的出现和扩大等因素导致城市地价暴涨，所以人们开始寻求在尽可能小的占地面积上获得尽量大的建筑空间，大企业和大的商业、金融业等机构也需要大型建筑，把其所属机构相对集中起来，以提高效率、加强竞争。在这种时代的需要推动下，加上新的建筑材料（如钢铁、玻璃、钢筋混凝土）和新发明（如电梯）的出现以及相应的结构科学的发展，在19世纪末期，一种崭新的建筑形式——摩天大楼应运而生。著名建筑师路易斯·沙利文领导了这一新的潮流。他设计的主要建筑有纽约州布法罗的保险大楼和芝加哥的斯科特百货商店。摩天大楼是美国的一大发明，也是建筑史上的一次突破。这种建筑形式适应了高速发展

的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大城市的需要，在充分利用新的建筑材料和空间的前提下，提供了尽可能大的利用空间，具有较大的实用性。但早期的摩天楼式样单调，而且争先恐后向高度发展，几乎遮天蔽日，使城市中的人们几乎整天生活在阴影之中。沙利文还为芝加哥国际博览会交通大楼设计了入口——“金门”。沙利文设计的金门借鉴了古代凯旋门的形式，但线条洗练简捷，整个建筑稳重而不呆板，富丽而不粗俗，古典美中透出现代气息，是融古代、现代风格于一炉的杰作。

19世纪后期美国历史大事记

1860年

11月6日	共和党人亚伯拉罕·林肯当选为美国总统。
12月20日	南卡罗来纳州首先宣布脱离联邦。

1861年

2月8日	南部7个蓄奴州代表集会亚拉巴马州首府蒙哥马利，宣布成立“美利坚诸州同盟”，简称“南部同盟”。
3月4日	林肯就任总统。
4月12日	南部同盟军攻占萨姆特要塞，内战爆发。
7月16日—21日	联邦军队在布尔河畔马纳萨斯首战失利。
7月25日	国会授权总统召集50万志愿军。
8月30日	约翰·弗里蒙特将军在密苏里州颁布“解放奴隶”的命令。
9月11日	林肯撤销弗里蒙特关于“解放奴隶”的命令，并于同年10月将其免职。
10月21日	联邦军队在鲍尔斯高地败北。
10月24日	丹佛至萨克拉门托电报线接通，传递第一份跨越大陆的电报通讯。

11月 美英之间因“特伦特事件”而出现战争危机，12月，危机以美国让步而告结束。

1862年

2月15日 尤利塞斯·格兰特率联邦军攻陷多纳尔森堡。
3月10日 联邦政府颁布禁止军队追捕和引渡逃奴的法令。
4月25日 联邦军队攻克南部贸易中心新奥尔良。
5月20日 林肯政府颁布“宅地法”。
6月5日 美国在外交上承认利比里亚和海地两个黑人国家。
6月6日 联邦海军占领田纳西州孟菲斯。
6月26日—7月2日 联邦军队在“七日战役”中失败。
7月1日 国会通过成立“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法案；国会同时通过累进所得税法案。
7月2日 林肯签署“莫里尔赠予学院土地法”。
9月22日 “预备解放奴隶宣言”发表。
9月17日 南部同盟军在安提塔姆战役中被击败。
12月1日 林肯在国情咨文中建议对解放奴隶以补偿并向国外移迁黑人。

1863年

1月1日 林肯政府发表《解放宣言》。
2月24日 亚利桑那准州成立。
2月25日 国会通过《关于国民银行体系的法案》。
3月3日 国会通过《征兵法》；国会建立国家科学院；爱达荷准州成立（包括现今爱达荷、蒙大拿和怀俄明3个州）。
4月20日 林肯宣布作为战时措施成立西弗吉尼亚州（6月20日正式成立）。
5月14—23日 格兰特攻克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并猛攻维克斯堡。
5月28日 第一个黑人志愿军团队加入联邦军队作战。

6月20日	第一个国民银行在费城成立。
7月1—4日	联邦军队取得葛底斯堡大捷。
7月3日	格兰特率军攻陷维克斯堡，联邦军队得以控制整个密西西比河。
11月19日	林肯发表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
11月23—25日	联邦军队查塔努加大捷。
12月8日	林肯向国会提出《关于大赦及重建宣言》。

1864年

2月至3月	联邦军队为西南部探矿者开路占地而与阿巴齐族和纳瓦霍族印第安人发生冲突，后来印第安人被迫迁往保留地。
2月24日	国会通过《关于全面征召黑人入伍法案》。
3月12日	格兰特被任命为联邦军总司令。
4月4日	法国在墨西哥扶植傀儡政权，美国众议院决议谴责。
4月8日	参议院通过联邦宪法第13条修正案。
5月7日	威廉·谢尔曼率军进攻佐治亚州，开始“向海洋进军”。
7月4日	国会通过《移民法》，并成立联邦移民事务局。
7月8日	国会通过《韦德—戴维斯法案》。
10月31日	内华达州作为第36州加入联邦。
11月8日	林肯再次当选总统，安德鲁·约翰逊为副总统。
11月29日	联邦骑兵队在科罗拉多准州屠杀印第安人500余人。
12月21日	谢尔曼大军攻克萨凡纳，完成“向海洋进军”。

1865年

1月31日	众议院通过联邦宪法第13条修正案，并送交各州批准。
3月3日	国会通过成立自由民局的法案。同日，国会对各州银行纸币征税10%。

4月3日	联邦军队攻克南部同盟“首府”里士满。
4月9日	罗伯特·李率军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美国内战结束。
4月14日	林肯在华盛顿福特剧院遇刺，翌日逝世，约翰逊就任总统。
5月29日	约翰逊发表《大赦宣言》；南部各州开始制订迫害黑人的“黑人法典”。
10月	埃利斯托岛黑人争取土地的武装斗争获胜。
11月18日	塞缪尔·克莱门斯以笔名马克·吐温发表第一部小说《卡拉韦拉斯县著名的跳蛙》。
12月18日	第13条修正案在29个州得到批准，奴隶制在全国成为非法。
12月26日	国会两院组成“联合重建委员会”。

1866年

4月9日	国会通过《公民权利法案》。
5月	三K党在田纳西州普拉斯基建立。
6月16日	国会两院通过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
8月20—25日	全国劳工同盟在巴尔的摩成立。

1867年

3月	国会通过《与印第安人建立和平法》，并组成“和平委员会”，以结束对印第安人的战争。
3月1日	内布拉斯加作为第37州加入联邦。
3月2日	国会通过共和党激进派的《重建法案》，规定对南部诸州实行军事管制，授予黑人选举权，在南部各州成立新的政府。
3月30日	美国政府从俄国购买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4月9日获得参议院批准。
8月28日	美国海军占领中途岛。

12月4日	奥利佛·凯利等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创建“农民协进会”（格兰其）。

1868年

2月24日	众议院提出弹劾约翰逊总统议案。
3月30日	参议院组成特别法庭，受理弹劾约翰逊案。
3月—4月	“和平委员会”分别与南、北部印第安人部落首领达成“协议”，迫使印第安人迁往指定的两个保留区。
	美国引进“西门子——马丁炼钢法”（敞炉式炼钢法）。
5月26日	约翰逊总统被宣布无罪。
7月28日	第14条修正案获得30个州批准而生效。
	美国与清政府代表团在华盛顿签订“中美续修条约”（即“蒲安臣条约”）。
12月25日	约翰逊总统宣布无条件赦免南部叛乱者。

1869年

2月27日	国会通过联邦宪法第15条修正案。
3月4日	格兰特就任美国第18届总统。
3月18日	国会决定以黄金偿付国债，赎回绿背纸币。
4月13日	格兰其在华盛顿特区召开首届年会。
5月10日	第一条横贯大陆铁路——联合太平洋铁路在犹他州普罗蒙特里接轨。
9月1日	全国禁酒党在芝加哥成立。
12月9日	劳动骑士团成立。

1870年

1月10日	约翰·洛克菲勒创办美孚石油公司。
3月30日	宪法第15条修正案获得29个州批准而生效。

5月13日　国会通过《强制法案》，授权联邦法院强制实施第15条修正案。

12月10日　怀俄明准州立法给妇女以选举和担任公职权。

1871年

3月3日　国会设立文官制度改革委员会，乔治·柯蒂斯为首任主席。

4月20日　国会通过《三K党法案》，即第二个"强制法案"。

7月8日　纽约市"特威德集团"贪污案被揭露。

10月8—10日　芝加哥市遭受特大火灾。

1872年

3月1日　国会立法设立黄石国家公园。

5月1日　自由派共和党人在辛辛那提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5月22日　国会通过《大赦法》，恢复全体南部公民的公民权。

6月10日　自由民局结束工作。

9月4日　莫比利尔公司舞弊案被揭露。

9月14日　英美就内战中海事损失进行国际仲裁。

11月5日　格兰特再度当选为总统。

1873年

2月12日　国会通过《铸币法》，限制银币铸造量。

3月3日　国会通过《育林法》。

4月14日　最高法院声称公民权来自州宪法，为南部诸州剥夺黑人权利制造根据。

1874年

马克·吐温与查尔斯·沃纳合著的长篇小说《镀金时代》发表。

3月11日	威斯康星州通过第一个管制铁路的《格兰其法》。
11月3日	民主党在内战后第一次控制国会众议院。
11月18日	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成立。
11月24日	J.F.格利登获得发明铁蒺藜专利权，解决了西部农场修筑栅栏的关键问题。
11月25日	绿背纸币党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成立。

1875年

1月14日	国会通过《恢复硬币支付法》。
1月30日	美国与夏威夷王国缔结贸易互惠条约。
1月—6月	宾夕法尼亚州煤矿工人大罢工，遭到镇压。
5月1日	“威士忌集团案”被揭露。
10月	达科他西部黑山地区出现淘金热。

1876年

3月7日	亚历山大·贝尔获得电话发明专利权。
5月10日	纪念独立百周年博览会在费城开幕。
6月25日	苏族印第安人与联邦军队在达科他的小大角地区激战。
8月1日	科罗拉多作为第38州加入联邦。
11月7日	总统选举中发生海斯与蒂尔顿之争。

1877年

3月2日	两大党在南部问题上达成“海斯——蒂尔顿妥协”。
	拉瑟福德·海斯当选为美国第19届总统。南部重建结束。
3月3日	国会通过《荒地法》。
4月24日	最后一批联邦军队撤离新奥尔良。
7月17日	宾夕法尼亚铁路工人罢工。

7月23—26日	加州各地发生排华浪潮。

1878年

2月19日	托马斯·爱迪生获得留声机发明专利权。
2月22日	绿背纸币劳工党在俄亥俄州托伦多成立。
2月28日	国会通过《布兰德—艾利逊购银法》。
11月5日	民主党在46届国会的参、众两院居多数。

1879年

5月7日	加州通过禁止雇用华人的州宪法条款。
10月21日	爱迪生发明白炽电灯（翌年1月27日获专利权）。

1880年

	“中美续修条约”签订，承认美国有权整理、限制华工前往美国。
3月	美国贝尔电话公司成立。
3月24日	社会福音运动在费城建立“救世军”。
10月	全国农民联盟（即“北方联盟”）在芝加哥正式成立。
11月2日	共和党詹姆斯·加菲尔德当选总统。

1881年

2月10日	布克·华盛顿在亚拉巴马州创办塔斯克基学院。
7月2日	加菲尔德总统在华盛顿车站遇刺，9月19日去世。
8月2日	塞缪尔·冈珀斯脱离劳动骑士团，在匹兹堡成立工会联合会。
9月20日	切斯特·艾伦·阿瑟就任美国第21届总统。

1882年

1月2日	美孚石油公司组成由9人董事会控制的托拉斯。

5月22日	美国迫使朝鲜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即“仁川条约”）。
5月6日	国会通过“排斥华工法”，规定10年内禁止华工入境。
9月4日	爱迪生在纽约珍珠街建立第一座中心电站。

1883年

1月16日	国会通过“彭德尔顿文官法”。
3月3日	国会批准建造3艘钢甲巡洋舰。
3月24日	纽约至芝加哥第一条长途电话开通。
9月8日	北太平洋铁路建成，是为第二条横贯大陆铁路。

1884年

1月1日	马克·吐温发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6月27日	联邦政府建立劳工统计局。
8月5日	在纽约港举行自由女神像奠基典礼。
11月4日	民主党人格罗弗·克利夫兰当选总统，两党重新开始轮流执政。

1885年

2月26日	国会通过《合同工法》，禁止契约劳工入境。
8月10日	美国第一条市内有轨电车线在巴尔的摩建成。
8月至9月	西部各州发生排华浪潮。

1886年

5月1—4日	美国约3千万工人为实现八小时工作日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1889年第二国际将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
5月3—4日	芝加哥发生“秣市惨案”。
7月1日	联邦最高法院在“沃巴什案”中禁止各州政府管制铁路。

8月	亨利·乔治参加纽约市长竞选。
12月7—8日	美国劳工联合会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成立，冈珀斯任主席。

1887年

2月4日	国会通过《州际商务条例》，并设立州际商务委员会。
2月8日	国会通过《道斯法案》，规定把属于印第安人部落的土地分配给部落成员个人。
3月3日	国会通过《哈奇法》，对农业教育和科研予以津贴。

1888年

6月13日	国会将联邦劳工局改为独立的劳工部。
11月6日	共和党人本杰明·哈里森当选总统。

1889年

2月9日	农业部（1862年成立）升格为内阁的正式部。
10月2日	第一次泛美会议在华盛顿召开。
11月	南达科他、北达科他、蒙大拿、华盛顿作为第39至42州加入联邦。
12月	农民联盟在圣路易斯召开大会。

1890年

	美国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首位。
	美国人口普查局总监宣布，西部拓居的边疆线已消失，标志美国西进运动告一段落。
	联邦政府设立移民局。
	马汉的《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出版。
5月2日	俄克拉何马建立准州。
7月2日	国会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7月3—10日	爱达荷和怀俄明作为第43、44州加入联邦。
7月14日	国会通过“谢尔曼购银法”。
10月	国会通过“麦金莱关税法”。
11月1日	密西西比州通过一项州宪法条款，要求选民交纳人头税和接受文化测验。
11月—1891年1月	西部印第安人与联邦军队发生“鬼神舞战争”，为印第安人最后一次大规模反抗。

1891年

3月3日	国会通过“保留森林法”，建立13个国家森林保护区。联邦成立11个上诉巡回法院。
5月18日	全国农民组织在辛辛那提集会，决定组建人民党。
7月31日	爱迪生发明电影摄影机。

1892年

2月22日	人民党在圣路易斯成立。
4月19日	J·杜里埃试制成功美国第一辆单缸汽车。
5月5日	国会决定将“排华法案”延长10年。
7月1—9日	霍姆斯台德钢铁工人罢工。
7月2—5日	人民党通过著名的“奥马哈纲领”。
11月8日	民主党人克利夫兰当选总统。

1893年

1月17日	美国策动夏威夷政变，迫使夏威夷女王李留奥卡拉尼退位。
3月—10月	美国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此后经济萧条达3年之久。
5月10日	世界博览会在芝加哥开幕。
6月20日	尤金·德布斯建立产业性美国铁路工会。
7月12日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宣读

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

8月7日　克利夫兰总统撤销“谢尔曼购银法”，民主党陷入分裂。

1894年

3月17日　中美缔结关于禁止华工移居美国的条约。

3月25日—5月1日　雅各布·柯克西发动“向华盛顿进军”。

5月—8月　普尔曼工人大罢工，联邦军队前往镇压。

5月　全国市政同盟在费城成立。

8月28日　国会通过《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削减部分关税率并征收所得税。

1895年

5月15日　全国复本位联盟在盐湖城召开大会。

7月20日　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重申美国关于拉美事务的“门罗主义”立场。

9月18日　布克·华盛顿在亚特兰大棉业展览会上发表著名演说。

10月12日　威斯汀豪斯电力公司在尼亚加拉瀑布城建成第一个发电网。

12月17日　克利夫兰总统在致国会的咨文中，就英属圭亚那同委内瑞拉的边境纠纷，声称美国有权干涉拉美事务。

12月　德里昂建立社会主义行业与劳工联盟，奉行“双重工会”政策。

1896年

1月4日　犹他作为第45州加入联邦。

1月21日　美国制造商全国联合会成立。

5月28日　最高法院在“普莱塞控弗格森”案中，提出“分离但平等”原则。

7月22日	人民党与民主党合并，共同推举威廉·布赖恩为总统候选人。
10月1日	邮政部建立乡村免费邮递制度。
11月3日	共和党人威廉·麦金莱当选总统。

1897年

3月2日	克利夫兰总统否决关于对移民进行文化测验的立法。
6月15日	美国社会民主党在芝加哥成立。
7月7日	国会通过《丁格利关税法》，平均税率高达57%。

1898年

	美国发动美西战争，夺得关岛、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群岛，并迫使古巴成为美国的保护国。
5月12日	路易斯安那州制定“祖父条款”，剥夺大多数黑人的公民权。

1899年

9月6日	国务卿约翰·海发表对华“门户开放”政策。

1900年

10月	劳联领导集团参加全国公民联合会。

主要外文参考书目

艾伦，詹姆斯（Allen，James S.）

《美国改造时期》（*Reconstruction*，*The Battle for Democracy*，*1865—1877*，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1973）

安德鲁斯，韦恩（Andrews，Wayen）

《简明美国史词典》（*Concise Dictionary of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62）

贝莱，托马斯（Bailey，Thomas A.）

《美国人民外交史》（*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New York：Prentice-Hall Inc.，1974）

贝林、戴维斯等（Baily，B. and Davis，D. et al）

《伟大的共和国》（*The Great Republic*，*A History of American People*，Massachusetts，D. C. Heath and Co.，1981）

巴特利特，鲁尔（Bartleet，Ruhl J.）

《美国外交记事，美国对外关系史文献与资料》（The Record of *American Diplomacy*，*Documents and 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Toronto：Alfred. A. Knopf，1964）

比尔德夫妇（Beard，Charles & Beard，Mary）

《美国文明的兴起》（*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7）

比米斯，塞缪尔（Bemis，Samuel F.）

《美国外交史》(*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50)
比林顿,雷(Billington, Ray A.)
《向西扩张,美国边疆史》(*Westward Expansion: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74)
博德纳,约翰(Bodnar, John)
《迁徙的移民,都市化美国的外来移民》(*The Transplanted: A History of Immigrants in Urban Ame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布尔斯廷,丹尼尔(Boorstin, Daniel J.)
《美国人:建国历程》(*The Americans: The National Experien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65)
博耶和摩莱斯(Boyer, R. O. & Morais, H. M.)
《未发表过的劳工故事》(*Labor's Untold Story*, New York: Cameron Associates, 1955)
伯切尔,R. A.(Burchell, R. A.)
《向西扩张:美国历史文献》(*Westward Expansion: American Historical Documents*. London: 1974)
卡洛,亚历山大编(Callow, Alexander B.)
《美国城市史:附有评论的论文集》(*American Urban History: An Interpretative Reader with Commentaries*, New York: Oxford Univ. Pr., 1973)
坎伯尔,查尔斯(Campbell, Charles S.)
《美国对外关系的转变,1865—1900年》(*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865—1900*. New York: Harper Colophen Books, *1976*)
钱得勒,小阿尔弗雷德(Chandler, Alfred D. Jr.)
《战略与结构:美国工业企业史上的篇章》(*Strategy and Structure: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Industrial Enterprise*, Cambridge: Mit Pr., *1962*)
《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中的管理革命》(*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1977*)

《美国华人的历史》（*The Chinese of America*，San Francisco：Harper & Row，Publishers，*1981*）

科克伦和米勒（Cochran，Thomas C. & Miller，William）

《企业时代：工业美国社会史》（*The Age of Enterprise：a Social History of Industrial America*，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61*）

科尔，查尔斯（Cole，Charles A.）

《不可抑制的冲突，*1850—1851*》（*The Irrepressible Conflict*，*1850—1851*，New York：Scholarly Pr.，Inc.，1971）

康马杰，亨利编（Commager，Henry S.）

《美国历史文献》，第一卷（*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vol*. 1 New York：Aphleton-Century-Crofts，1962）

《美国历史简明词典》（*Concise Dictionary of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Scribner's Charles，Sons，1983）

库利治，玛丽（Coolidge，Mary R.）

《中国移民》（*Chinese Immigration*，New York，Ayer Co.，Pubs，Inc.，1909）

库尔特，E. M.（Coulter，E. M.）

《美利坚南部同盟诸州，1861—1865 年》（*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1861—1865*. Texas：La State Univ. Pr.，1950）

《重建时期的南部，1865—1877 年》（*The South During Reconstruction*，*1865—1877*，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47）

柯伦特，理查德（Current，Richard N.）

《人所不知的林肯》（*The Lincoln Nobody Knows*，New York：Greenwood House，1958）

柯伦特，理查德等（Current，Richard N. & Williams，T. & Freidel，Frank）

《美国历史》，第 2 卷（*American History*，*vol*. 2 *Since 1965*，New York：Knopf，Alfred A.，Inc.，1979）

丁内尔斯坦，伦纳德等（Dinnerstein，Leonard et al）

《美国人的种族：外来移民与同化史》（*Ethnic Americans：A History of*

Immigration and Assimila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 1982)
杜波依斯，威廉（Du Bois, William E. B.）
《美国黑人的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Atheneum Pubs., 1965）
杜甘，M. A.（Duggan, M. A.）
《反托拉斯与最高法院》（*Antitrust and the US. Supreme Court*, New York: Federal Legal Publisher, 1981）
杜勒斯，福斯特（Dulles, Foster R.）
《美国劳工史》（*Labor in America: A History*, New York: Herlan Daridson Inc., 1955）
邓宁，威廉（Dunning, William A.）
《内战与重建论文集》（*Essays on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Ayer Co. Pubs., 1965）
方纳，菲利普（Foner, Philip S.）
《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2卷（*Hist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 1, 2.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Co., Inc, 1947—1955）
富兰克林，约翰·霍普（Franklin, John Hope）
《内战后的重建》（*Reconstruction: After the Civil War*,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1）
《从奴隶制到自由：美国黑人的历史》（*From Slavery to Freedom: A History of Negro Americans*, New York: Alered A. Knopf Inc., 1980）
加拉蒂，约翰（Garraty, John A.）
《1870年—1890年美国社会变革》（*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 Society, 1870—1890*. Columbia Univ. of South Carolina Pr., 1968）
格韦尔，韦斯利（Gewehr, Wesley M.）
《美国的文明——美国历史》（*American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57）
吉布森，阿雷尔（Gibson, Arrell M.）

《美国印第安人：从史前到现在》（*The American Indian: Prehistory to Present*, Mass.: D. C. Heath and Co., 1980）

格莱布，查尔斯编（Glaab, Charles N.）

《美国城市史文献》（*The American City: A Documentary History*, Illiois: Dorsey, 1963）

格莱布与布朗（Glaab, Charles N. & Brown, A. T.）

《美国城市史》（*A History of Urban America*, New York: Collier Macmillan Publishers, 1983）

戈德温，罗伯特（Goldwin, Robert A.）

《美国外交政策文献摘编》（*Reading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 Pr., 1959）

戈德温，L.（Goodwyn, L.）

《人民党时刻：美国农业反叛简史》（*The Populist Moment: a History of Agrarian Revolt in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 Pr., 1978）

格林，康斯坦斯（Green, Constance M.）

《美国城市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American Cities in Growth of the Na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57）

格罗勃，杰拉尔德（Grob, Gerald N.）

《工人与乌托邦》（*Workers and Utopia*, Quadrangle: The New York Times Co., 1960）

哈克，路易斯（Hacker, Louis M.）

《美国传统的形成》（*The Shaping of American Tradition*, Columbia Univ. Press, 1947）

哈克与肯德里克（Hacker, Louis M. & Kendrick, Benjamin B.）

《1865年以来的美国》（*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65. New York: F. S. Crofts, 1949）

哈特，艾伯特编（Hart, Albert B.）

《当代人进述美国历史》，第4卷（*American History told by Contemporaries*, *vol*. 4.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64）

希克斯，约翰（Hicks，John D.）

《人民党的反叛：农民联盟和人民党史》（*The Populist Revolt: a History of the Farmer's Alliance and the People's Party*，Univ. of Minnesota Press，1931）

海迪，拉尔夫与海迪，穆迪尔（Hidy，Ralph W. & Hidy，Mudiel E.）

《大企业的先驱，1882—1911 年》（*Pioneering in Big Business 1882—1911*，New York：Harper & Row，1955）

霍夫斯塔特，理查德（Hofstadter，Richard）

《改革时代：从布赖恩到罗斯福》（*The Age of Reform From W. J. Bryan to F. D. Roosevelt*，New York：Random House，1955）

霍夫斯塔特，理查德等（Hofstadter，Richard et al）

《1865 年以后美国共和国》（*The American Republic Since 1865*，Englewood Cliffs：P-H，1959）

胡根布姆（Hoogenboom，Ari）

《取缔分赃制：文官改革运动史 1865—1883 年》（*Outlawing the Spoils: A History of the Civil Service Reform Movement 1865—1883*，Illinois：Greenwood Pr.，1961）

杰克逊与舒尔茨编（Jackson，K. T. & Schultz，S. K. ed.）

《美国历史上的城市》（*Cities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1972）

詹宁斯，沃尔特（Jennings，Walter）

《合众国经济进步史》（*A History of Economic Progress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Thomas Y. Crowell Co.，1926）

琼斯，埃利奥特（Jones，Eliot）

《美国托拉斯问题》（*The Trust Problem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The Macmillan Publishing Co.，Inc.，1928）

琼斯，马尔德温（Jones，Maldwyn A.）

《外国移民》（Immigration），载波特，格伦（Porter，Glenn）主编《美国经济史百科全书》，第 3 卷（*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vol*. 3.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80）

《美利坚南部同盟代表大会议事录 1861—1865 年》（*Journal of the*

Congress of 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1861—1865. Washington: Kraus Reprint Co, 1968)

凯勒，莫顿（Keller, Morton）

《国家事务：19 世纪末美国社会生活》(*Affairs of State: Public Life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 1977)

李，戈登（Lee, Cordon C.）

《现代美国教育》（*Education in Modern American*, New York: HB & W, 1957)

利夫赛，哈罗德（Livesay, Harold C.）

《塞缪尔·冈珀斯与美国有组织的劳工》（*Samuel Gompers and Organized Labor in America*,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78)

马隆，杜马编（Malone, Dumas)

《美国传记词典》，第 5 卷（*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 *vol*, 5, New York: Scribner, 1961)

马库斯，R. O.（Marcus, R. O.）

《老大党：镀金时代的政治结构 1880—1898 年》（*Grand Old Party: Political Structure in The Gilded Age* 1880—1898. New York: 1971)

麦克唐纳，威廉（McDonald, William)

《合众国历史法规选，1861—1898 年》（*Select Statutes of United States History, 1861—1898*, New York: 1922)

麦基特里克，埃里克（McKitrick, Eric L.）

《安德鲁·约翰逊与重建》(*Andrew Johnson and Reconstruc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梅克尔维，布莱克（Meckelvey, Blake)

《1860 至 1915 年美国的城市化》（*The Urbanization of America, 1860—1915*. New York: 1962)

米勒，乔治（Miller, George H.）

《铁路与格兰其法》（*Railroads and the Granger Laws*, Madison: Univ. of Wisconsin Pr., 1971)

米切尔，埃德温（Mitchell，Edwin V.）
《美国政治百科全书》（*An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Greenwood，1946）
摩尔根，H. W.（Morgan，H. Wayne）
《从海斯到麦金莱：1877—1898 年全国党派政治》（*From Hays to McKinley：National Party Politics 1877—1898*，New York：Syracuse Univ. Pr.，1969）
莫里斯，塞缪尔等（Morison，Samuel E. et al）
《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第 2 卷（*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vol*. 2. New York：Oxford Univ.，1980）
莫里斯，理查德（Morris，Richard B.）
《美国历史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Harrper & Row Publishers，1976）
迈尔斯，古斯塔夫斯（Myers，Gustavus）
《美国大财阀发家史》（*History of the Great American Fortunes*. Chicago：Charles H. Kerr，Publishing，Co.，1936）
内文斯，阿伦（Nevins，Allan）
《为联邦而战》（*The War for the Union*，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59）
奈，卢瑟尔（Nyer，Russel B.）
《中西部进步政治：它的起源与发展的历史研究，1870—1958 年》（*Midwestern Progressive Politics：a History Study of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1870—1958*，Michigan Univ. Pr.，1959）
奥尔森，詹姆斯（Olson，James S.）
《种族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2 卷（*The Ethnic Dimension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St. Martin's Pr.，Inc.，1979. Two vols.）
奎特，霍华德（Quint，Howard H.）
《美国社会主义的形成》（*The Forging of American Socialism*，New York：The Bobbs-Merrill Co.，Inc.，1964）

兰德尔和唐纳德（Randall，J. G. & Donald，David）

《内战与重建》（*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Boston：D. C. Heath and Co，. 1961）

兰德尔，J. G.（Randall，J. G.）

《总统任期内的林肯》（*Lincoln the President*，New York：Dodd Mead & Co.，1945）

雷贝克，约瑟夫（Rayback，Joseph G.）

《美国劳工史》（*A History of American Labor*，New York：Free Pr.，1966）

里斯，雅各布（Riis，Jacob A.）

《那一半人怎样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New York：Hill and Wang，1957）

罗杰斯，丹尼尔（Rodgers，Daniel T.）

《工业化美国的职业准则 1850—1920 年》（*The Work Ethic in Industrial America，1850—1920*. Chicago：Univ. of Chicago Pr.，1979）

普雷瑟，米尔顿（Plesur，Milton）

《冲出美国，1865—1890 年外交关系研究》（*America's Outward Thrust，Approaches to Foreign Affairs，1865 – 1890*，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Dekalb，1971）

波拉科夫，基思（Polakoff，Keith J.）

《美国历史上的政党》（*Political Parties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81）

波特，格伦（Porter，Glenn E.）

《全国政党纲领集，1840—1968 年》（*National Party Platforms 1840—1968*，Cambridge，Mass.，1972）

《美国经济史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80）

《1860—1910 年大企业的兴起》（*The Rise of Big Business，1860—1910*，New York：Harlan Davidson.，Inc.，1973）

普拉特，朱利叶斯（Pratt，Julius W.）

《美国外交政策史》(*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Prentic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1980)
桑德堡，卡尔（Sandburg, Carl)
《战争年代的林肯》 (*Abraham Lincoln, The War Year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39)
施莱辛格，小阿瑟（Schlesinger, Arthur M. Jr.)
《美国政党史》，第2卷 (*History of the U. S. Political Parties*, *vol*. 2, New York :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73)
施莱辛格，阿瑟（Schlesinger, Arthur M. Sr.)
《1878—1898年间美国城市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City, 1878—1898*. New York : Macmillan, 1941)
西格与古利克（Seager, Henry R. & Gulick, Charles A. Jr.)
《托拉斯与公司的问题》 (*Trust and Corporation Problem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29)
香农，弗雷德（Shannon, Fred A.)
《美国农民运动》(*American Farmer' s Movements*, New York : Anv, Vann-Rein, 1954)
《农场主的最后边疆》 (*The Farmer' s Last Frontier*, New York :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45)
西蒙斯，A. M.（Simons, A. M.)
《美国历史中的社会势力》(*Social Forces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 The Macmillan Co., 1922)
斯科考洛耐克，斯蒂芬（Skocoronek, Stephen)
《建设一个新的美国：全国性行政管理能力的扩大1877—1920年》(*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1877—1920*, Cambirdge: Univ. Pr., 1982)
史密斯，佩奇（Smith, Page)
《战火的考验》(*Trial by Fire*, New York : 1982)
索厄尔，托马斯（Sowell, Thomas)

《美国种族史》（*Ethnic America: A History*, New York : Basic Books, Inc., 1981）

斯坦普，肯尼思（Stampp, Kennith M.）

《重建时代，1865—1877年》（*The Era of Reconstruction, 1865—1877*,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5）

斯特恩，菲力普·范多朗（Stern, Philip Van Doron）

《林肯的生平与著作》（*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Abraham Lincoln*,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40）

塔夫脱，菲力普（Taft, Philip）

《冈珀斯时代的劳联》（*The A. F. of L. in the Time of Gompers*, New York :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57）

泰勒，C. C.（Taylor, C. C.）

《农民运动1620—1920》（*The Farmer's Movement 1620—1920*. New York: Greenwood, 1954）

托马斯，布林利（Thomas, Brinley）

《外来移民在经济方面的积极贡献》（*The Positive Contribution by Immigrants: the Economic Aspect*）见哈里·N·沙伊贝（Harry N. Scheiber）主编《美国经济史选读》（*United States Economic History, Selected Readings*, New York : Alfred A. Knopf, 1964）

特纳，弗雷德里克（Turner, Frederick J.）

《美国历史中的边疆》（*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1976）

恩格尔，欧文（Unger, Irwin）

《绿背纸币时代，1865—1879年》（*The Greenback Era, 1865—1879* Princeton Univ. Pr., 1964）

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局（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cus）

《美国历史统计，殖民地时代到1970年》，2卷（*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2 vols.)
瓦萨尔，雷纳编（Vassar, Rena L. ed.）
《美国教育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Education*, *vol*. 2, Chicago: Rand McNally & Co., 1965）
瓦特，哈罗德（Vatter, Horold G.）
《工业成熟的趋势，1860—1914年美国的经济》（*The Drive to Industrial Maturity, The U. S. Economy, 1860—1914*, Connecticut : Greenwood Press, 1975）
沃德，戴维（Ward, David）
《城市与移民：19世纪美国变化的地理》（*Cities and Immigrants: A Geography of Change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 Pr., 1971）
韦尔，诺曼（Ware, Norman J.）
《1860—1895年的美国劳工运动》（*The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0—1895*,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 1929）
沃纳，山姆（Warner, Sam B.）
《一轰而起的城市：美国城市史》（*The Urban Wilderness,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City*, New York : 1972）
怀特，伦纳德（White, Leonard D.）
《共和党时代，1869—1910年行政史研究》（*The Republican Era : A Study in Administrative History, 1869—1901*, New York : 1978）
威廉斯，霍尔（Williams, R. Hall）
《决定的年代：19世纪90年代美国政治》（*Years of Decision: American Politics in the* 1890' *s*. New York: *Random*, 1978）
威廉斯，T.（*williams*, T.）
《林肯与激进派》（*Lincoln and the Radicals*, Madison : Univ. of Winsoons Pr., 1941）
威廉斯，W. A.（Williams, William Appleman）
《美国外交的形成》，第1卷（*The Shaping of American Diplomacy*, *vol*. 1.

Chicago：Rand McNally & Co.，1962）
伍德沃德，W. E.（Woodward，W. E.）
《新编美国史》（*A New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1938）
耶洛维茨，欧文（Yellowitz，Irwin）
《1850—1900年工业化与美国劳工运动》（*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1850—1900*，New York：Kennikat Press，1977）

索　引

（按汉语拼音字母为序）

A

阿巴齐族人　Apache Indians　115，116，122

阿比林（堪萨斯）　Abilene（Kansas）　135

阿波马托克斯村　Appomattox　34，55

阿尔德里治，纳尔逊·W·　Aldrich，Nelson W.　203，210，214，226

阿尔格，卢瑟尔　Alger，Russel　226

阿拉帕霍族人　Arapaho Indians　115—117，120

阿姆斯特朗，塞缪尔　Armstrong，Sammuel　72

阿布尔森兄弟　The Abelsons　83

阿瑟，切斯特·A·　Arthur，Chester A.　190，203，343

埃迪斯托岛　Edisto Island　44

埃尔斯沃思（堪萨斯）　Ellsworth（Kansas）　135

埃金斯，托马斯　Edkins，Thomas　398，399

埃里奥特，查尔斯·W·　Eliot，Charles W.　387，388

埃利斯岛（纽约港）　Ellis Island（New York Harbor）165

埃瓦茨，威廉·M·　Evarts，William M.　336，344

阿利森，威廉·B·　Allison，William B.　226

爱迪生，托马斯　Edison，Thomas　81，184，331

爱默生，拉尔夫·W·Emerson，Ralph W.　376，389，396

安德森，罗伯特　Anderson，Robert

6
安东尼，苏姗·B· Anthony, Susan B. 328
安吉尔，詹姆斯·B· Angell, James B. 175
“安全阀” “Safe Valve” 155, 193, 265, 382
安提塔姆之战 Battle of Antietam 17, 20
奥尔尼，理查德 Olney, Richard 213, 254, 255, 359, 366, 367
奥罗拉（科罗拉多） Aurora (Colorado) 129
奥马哈纲领 Omaha Platform 194, 195, 289—292

B

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 Baltimore-Ohio Railroad Company 95
“巴尔的摩”号 “Baltimore” 361, 362
巴拿马运河 Panama Canal 340, 357
巴特勒，本杰明 Butler, Benjamin 12, 16
八小时工作日 Eight-Hour Day 228, 230, 239, 244, 256, 289, 290
八小时联盟 Eight-Hour League 230
《败坏哈德兰堡的人》 Man that Corrupted Hadleyburg 394
半岛战役（七日战役） Peninsula Campaign (Seven Days' Battle) 17, 20
鲍德利，特伦斯·V· Powderley, Terence V. 237, 241
北方联盟 Northern Alliance 282—288, 291
北美社会民主工人党 Social Democratic Workingmen's Party of North America 259
北太平洋铁路 Northern Pacific Railroad 87, 122, 146, 172
贝阿德，托马斯·F· Bayard, Thomas F. 349
“被包围的飞地” “encircled enclave” 159
贝尔电话公司 Bell Telephone Company 82, 83, 90, 92
贝尔，亚历山大·G· Belle, Alexander Graham 81, 82, 184
贝尔，约翰 Bell, John 2
贝克，爱德华 Beck, Edward 10
贝拉米，爱德华 Bellamy, Edward 211, 374, 375, 379
贝塞麦炼钢法 Bessemer Process of Steel Manufacture 84
比由特（蒙大拿） Butte (Montana) 131
“边疆假说” Frontier Hypothesis

380, 381
《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 Significance of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381
宾夕法尼亚铁路罢工（1877） Strike of Pennsylvania Railroad (1877) 234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 Pennsylvania Railroad Company 234, 333
"波旁分子" "Bourbonists" 189
伯恩塞德，安布罗斯·E· Burnside, Ambrose Everett 21, 22
博雷加德，皮埃尔 Bearuegard, Pierre 6, 9
博伊西（爱达荷） Boise (Idaho) 129
"博兹曼小道" "Bozemen Trail" 117
"补充法案"（1884） Supplementary Act of 1884 177
布尔河战役 Bull Run, Battle of 9
布莱恩，詹姆斯·G· Blaine, James G. 178, 189—191, 202, 214, 338, 351, 356, 357, 360—365
布赖恩，威廉·J· Bryan, William J. 195, 197—199, 292, 293
布兰德—艾利逊购银法 Bland-Allison Act 206, 207
布兰德，理查德 Bland, Richard 206
布雷肯里奇，约翰·C· Breckenridge, John C. 2
布隆特，詹姆斯·H· Blout, James H. 354
布思，威廉 Booth, William 325
布思，约翰·W· Booth, John Wilkes 35
"不在地主" "absentee landlord" 274, 286, 290, 380
波托马克河 Potamac River 9, 10, 17, 33

C

蔡斯，萨蒙 Chase, Salmon 32, 53
查塔努加战役 Chattanooga, Campaign 23
《草叶集》 Leaves of Grass 395
"掺水股票" "Watered Bond" 88, 95, 208, 215
"屠崽子" "Scalawages" 55
昌斯勒维尔战役 Chancellorsville, Battle of 22
城市经理制 City Manager System 324
城市老板 city boss 295, 305, 306, 308, 309, 319, 321, 323
城市联合会 City Federations 230
城市体系 Urban System 300, 301, 303, 304

城市委员会制　City Commission System　324
重建　Reconstruction　序1，序2，32，34，37—41，43，45—56，59，60，62，64—66，68，73，75，95，187，190，199，201，219，223，225，298，358
“重建法案”　Reconstruction Act　39，51，52，54，56
《重建与大赦宣言》　Proclamation of Amnesty and Reconstruction　38，40

D

达姆罗施，利奥波德　Damrosch，Leopold　396
大北铁路　Great Northern Railroad　87，131，146
《大路》　Main Street　390
大赦法案　Act of Amnesty　63
大师傅　Grand Master Workman　237
“大西洋经济体”　“Atlantic Economy”　162
戴得伍德峡谷　Deadwood Gulch　131
戴维斯，杰斐逊　Davis，Jefferson　3，6，10，23，32，33，35
丹佛　Denver　128，298，449，450
单一税论　Single Tax　241，373
党魁制　The Boss Politics　309
道格拉斯，弗雷德里克　Douglass，Frederick　4，20，45
道格拉斯，斯蒂芬·A·　Douglas，Stephen A.　2
道奇城（堪萨斯）　Dodge City (Kansas)　135
道斯法案　Dawes Act　125，126
德布斯，尤金·E·　Debs，Eugene E.　197，213，249，254，255
德籍工人总会　General Germen Workingmen' s Union　258
得克萨斯农民大联盟　Farmers' Alliance of Texas　284
德雷克，埃德温　Drake，Edwin　85
德雷塞普，菲迪南　De Lesseps，Ferdinand　355
德里昂，丹尼尔　De Leon，Daniel　195，263
德沃夏克，安东尼　Dvorak，Anton　185
第一国际　First International　258，259，260，262
低值货币论　Theory of Cheap Money　231，280
迪金森，埃米莉　Dickinson，Emily　395，396
蒂尔登，塞缪尔　Tilden，Samuel　65，187，190
蒂尔曼，本杰明　Tilman，Benjamin　195
丁格利关税法　Dingley Tariff Act

204
独立党　Independent Party　278，280，288
独立劳工党　Independent Labor Party　241
独立联合党　Independent Union Party　288
杜克，布坎南　Duke，Buchanan　75
杜威，约翰　Dewey，John　375，378，379
"镀金时代"　"Gilded Age"　序1，序2，60，186，193，200，214，393，395，396

E

"俄亥俄观点"　"Ohio Idea"　205

F

《反对共和国的财富》　The Wealth against Commonwealth　211
反垄断党　Anti-Monopoly Party　193，194，211，278
反托拉斯法　Anti-trust Law　101，197，211—214，223，255
反托拉斯运动　Anti-trust Movement　211，247，248
泛美会议　Pan-American Conference　362—364
泛美联盟　Pan-American Union　364
泛美主义　Pan-Americanism　362，364
范德比尔特，考纳留斯　Vanderbilt，Cornelius　89，215，374，386
放任政策　Laisses-faire Policy　186，200—202，210，214，295，305，325，373，380
菲尔德，詹姆斯·G·　Field，James G.　291
菲利普斯，温德尔　Phillips，Wendell　5
菲希，汉密尔顿　Fish，Hamilton　216，351
菲斯克，詹姆斯　Fisk，James　189
菲斯克大学　Fisk University　397
废奴主义者　Abolitionists　5
废止权　Nullification　3
费伦，詹姆斯　Phelan，James　322
费特曼上尉，W. J.　Captain Fetterman，W. J.　117
分成制　Share Cropping System　66—68，107，110，275
"分离但平等"原则　"Separate but equal" doctrine　71
分赃制　The Spoils System　序7，118，216—218，226
"弗吉尼厄斯"号　"Virginius"　358
弗里林海森，弗雷德里克·T·　Frelinghuysen，Frederick T.　356，357
弗里蒙特，约翰　Fremont，John

11, 12
福克纳，威廉　Faulkner, William　392
福斯特，约翰·W·　Foster, John W.　353
福特剧院　Ford Theater　35
福特，亨利　Ford, Henry　83
腐朽政治　Political Corruption　290
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　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　329
复本位制　Bimetalism　206, 291

G

改革党　Reform Party　278
盖利，埃尔伯特·H·　Gary, Elbert H.　104
冈珀斯，塞缪尔　Gompers, Samuel　195, 241, 243—245, 247—249, 251, 252, 262
钢铁工人混合协会　Amalgamated Association of Iron and Steel Workers　252, 253
高架铁路　Elevated Railroad　89, 330
葛底斯堡战役　Battle of Gettysburg　22
格兰其　Grange　112, 194, 209, 232, 276, 283, 286, 287
格兰其法　Granger Laws　208—210, 278, 279
格兰特，尤利塞斯　Grant, Ulysses　16, 23, 32—34, 51, 53, 54, 65, 187, 189, 190, 203, 205, 215, 220
格雷欣法则　The Gratian Law　206
格拉登，华盛顿　Gladden, Washington　325
格里利，霍勒斯　Greeley, Horace　63, 143, 187
公民权利法案　Civil Rights Act　48, 49, 57, 71
工厂城镇　Mill Town　299
"工具主义"　"Instrumentalism"　378
工联主义　Trade Unionism　228, 245, 260, 264
功绩制　Merit System　217, 218
共产主义俱乐部　Communist Club　258
共和党　Republican Party　序1，序7, 1, 2, 5, 19, 32, 37—39, 45, 47, 53—56, 63—65, 69, 168, 173, 175, 187—200, 202—205, 212, 215, 221, 226, 290, 291, 293, 323, 336, 366
共和党大军　Grand Army of the Republic (CAR)　222
古根海姆家族　The Guggenheims　131

古尔德，杰伊　Gould, Jay　28, 191, 237, 309
官职任期法　Tenure of Office Act　51—54, 219
国际工人协会（IWMA）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IWMA)　35, 259
"国际工人协会"（IWPA）　International Workingpeople's Association (IWPA)　261
国际工人协会北美联合会　North American Federation of the IWMA　258
国家主义者　Nationalist　211
国库分库计划　Sub-treasury Scheme　194, 286, 288, 290
国民银行体系法　Act of National Bank System　78

H

哈得逊画派　Hudson Paintings　397
哈里曼，爱德华·H·　Harriman, Edward H.　89
哈里森，本杰明　Harrison, Benjamin　192, 193, 195, 203, 212, 217, 221, 338, 353, 361—363
哈里斯，威廉·T·　Harris, William T.　385
海恩斯，埃尔伍德　Haynes, Elwood　83
海伦娜（或赫勒纳，于蒙大拿）　Helena (Montana)　129
海明威，欧内斯特　Hemingway, Ernest　392
海斯，拉瑟福德　Hayes, Rutherford　65, 175, 188, 202, 203, 216, 219, 220, 222, 225, 234, 336, 338, 355, 356
海斯—蒂尔登妥协　Hayes-Tilden Compromise　64, 65, 188
汉密尔顿，亚历山大　Hamilton, Alexander　80, 201
汉纳，马库斯·A·　Hanna, Marcus Alonzo　197, 213, 221, 226, 249, 256
汉普顿学院　Hampton Institute　397
行业工会　Trade Union　229, 230, 233, 235, 238, 239, 243, 246, 250, 253, 262
豪，朱利娅·W·　Howe, Julia W.　328
豪格，H·H·　Hogg, H. H.　195
豪威尔斯，威廉·D·　Howells, William D.　389, 390
霍姆斯特德罢工（1892年）　Homestead Strike of Steel Workers　252, 316
合作社运动　Cooperation Movement　230—232, 236—238, 267, 270,

272, 277, 279, 284, 286, 287
“和平委员会”　“Peace Commission”　118—120
赫尔会所　Hull House　319
“黑幕揭发者”“Muckrakers”　222
黑人法典　Black Code　41—43, 45, 48, 49, 57
黑山（南达科他）　Black Hill (South Dakota)　119, 122, 131
“黑色黄金热”　“Black Gold Rush”　85
“红云”　Red Cloud　117, 120
胡德，约翰　Hood, John　23
胡克，约瑟夫　Hooker, Joseph　22
华工　Chinese Labor　152, 165—179, 345
华生，托马斯　Watson, Thomas　82
华盛顿，布克·T·　Washington, Booker T.　71—74
怀俄明牧畜饲养者协会　Wyoming Stock Growers Association　134
怀特，亨利　White, Henry　248
荒地法（1873年）　Desert Land Act (1873)　137
荒野—冷港战役　Wilderness and Coldharbor, Battle of　32
黄金山　Gold Hill　129
恢复硬币支付法　Resumption Act　206, 280
《回顾》　Looking Backward　374
惠特曼，沃尔特　Whitman, Walt　211, 389, 395, 396
惠特尼，威廉·C·　Whitney, William Collins　191, 196, 338
霍姆斯，E.　Homes, E.　82
霍姆斯，奥利弗·温德尔　Holmes, Oliver Windle　223
霍默，温斯顿　Homer, Winston　398, 399
霍普金斯，约翰斯　Hopkins, Johns　386

J

基奥瓦族人　Kiowa Indians　115, 117, 120
基督教妇女联合会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289
基督教男青年会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326
基督教女青年会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326
激进派共和党人　Radical Republicans　50—52, 63, 64
吉罗尼摩酋长　Chief Geronimo　122, 123
“吉姆·克劳制”　“Jim Crow System”　69, 225
“吉瑞法案”　“Geary Act”　178
家具工人协会　Furniture Workers As-

sociation 262
加菲尔德，詹姆斯·A· Garfield, James A. 190, 215, 217, 223
加兰，哈姆林 Garland, Hamlin 390
加里森，威廉·L· Garrison, William L. 5, 20
杰克逊，海伦·H· Jackson, Helen H. 125
杰克逊，托马斯 Jackson, Thomas 9, 16, 22
《解放宣言》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19—21, 29, 31, 33, 35
经理联合总会 General Managers' Association 254, 255
金本位法（1900 年） Gold Standard Act of 1900 208
金本位制 Gold Standard System 79, 206, 272, 280
"金十字架"演说 "Golden Cross" Speech 198
《进步与贫困》 Progress and Poverty 211, 241, 374
禁酒党 Prohibition Party 193
救世军 Salvation Army 325
爵士音乐 Jazz Music 396, 397
军队指挥权法 Command of the Arm Act 51, 52

K

卡勒姆，谢尔必·M· Cullom, Shelby Moore 209
卡内基，安德鲁 Carnegie, Andrew 28, 99, 256, 374, 386
卡斯特上尉，G. A. Captain Custer, George A. 122
凯利，奥利弗·H· Kelley, Oliver H. 276
凯洛格，爱德华 Kellogg, Edward 231, 280
堪萨斯太平洋铁路 Kansas Pacific Railroad 124, 135
坎农，约瑟夫·G· Canno, Joseph G. 223
康克林，罗斯科 Conkling, Roscoe 189, 214, 219
康奈尔，伊兹拉 Cornell, Ezra 386
康斯托克矿脉 Comstock Lode 128, 129
考尔法克斯，斯凯勒 Colfax, Schuyler 215
考克瑞尔—道克利委员会 Committee of Cockrell-Dockrey 219, 223
考克斯，詹姆斯·D· Cox, James D. 203, 216
柯达公司 Eastman Kodak Company 83
科迪（野牛比尔） Cody, (Buffalo Bill) 124
"柯克西进军" "Coxey's Army"

196，253
柯克西，雅各布·S· Coxey, Jacob S. 253
克莱恩，斯蒂芬 Crane, Stephen 390，392
克莱顿反托拉斯法 Clayton Anti-Trust Act 214
克莱顿—布尔沃条约 Clayton-Bulwer Treaty 355—357
克劳族人 Crow Indians 115
克里浦小河 Cripple Creek 128
克利夫兰，格罗弗 Cleveland, Grover 166，179，190—192，195—197，202，203，209，213，217，219—221，254，255，322，353，354，357，363，365，366，368，369
克列门斯，塞缪尔·朗荷恩 Clemens, Samuel Langhorne 393
科曼彻族人 Comanche Indians 115，117，120
科达伦（爱达荷） Coeur d' Alene (Idaho) 253
科达伦银矿罢工 Strike of Coeur d' Alene Silver Mine 253
库恩—罗比 Kuhn-Loeb 89
库克，杰伊 Cooke, Jay 28
库珀，彼得 Cooper, Peter 280
狂马 Crazy Horse 122
奎特，查尔斯 Quit, Charles 190
奎伊，马修·S· Quay, Matthew S. 192，214，323

L

拉萨尔派 Lassaleans 259，260，262
缆车 Cable car 330
劳埃德，亨利·D· Lloyd, Henry D. 211，249
劳动骑士团 Knights of Labor 165，229，233，235—239，242，243，262，263，286，289
劳工立法 Labor Law 242，256，265
劳申布施，沃尔特 Rauschenbusch, Walter 325
劳役偿债制 Peonage 67，74
"老大党" "Old Grand Party" (OGP) 188
"老移民" "Old Immigrants" 序5，153—158，160，180，251
《雷蒙娜》 Ramona 125
理查森，亨利·H· Richardson, Henry H. 401
里德，托马斯·B· Reed, Thomas B. 223
雷丁大会 Reading Convention 236
里斯，雅各布·A· Riss, Jacob A. 312，316

李留奥卡拉尼女王 Liliuokalani, Queen 352, 354
李，罗伯特 Lee, Robert 16, 17, 21—23, 33, 34
李仙得，查尔斯 Le Gendre, Charles 344, 346
利德维尔（科罗拉多州） Leadville (Colorado) 128, 132
立宪联邦党 Constitutional Union Party 2
联邦储备体系 Federal Reserve System 286
联邦基督教协进会 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 of Christ in America 326
"联邦派同盟会" "Union League Clubs" 60
联邦人事管理总署 Federal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217
联合重建委员会 Joint Committee on Reconstruction 48, 49
联合劳工党 Union Labor Party 193, 194, 211
联合太平洋铁路 Union Pacific Railroad 60, 87, 88, 124, 131, 135, 171, 201, 348
林肯，亚伯拉罕 Lincoln, Abraham 序 1, 1, 2, 5—10, 12, 15—24, 29, 32—39, 40, 53, 185, 385, 400, 401
流浪法 Vagrant Law 67
卢特，艾利胡 Root, Elihu 224, 226
路易斯安那农民联盟 Farmers' Alliance of Louisiana 285
绿背劳工党 Greenback Labor Party 281, 282
绿背纸币 Greenback 28, 205, 206, 232, 254, 280, 282, 286
绿背纸币党 Greenback Party 194, 232, 279, 280—282, 286, 305
绿背纸币运动 Greenback Movement 193, 194, 279—283
罗杰斯，亨利·H· Rogers, Henry H. 131
罗思柴尔德家族 The Rothschilds 189
罗斯福，西奥多 Roosevelt, Theodore 150, 200, 214, 218, 219, 221, 242, 252, 359, 368
洛根，约翰·D· Logan, John D. 189
洛克菲勒，约翰·D· Rockefeller, John D. 28, 102, 226, 326, 374, 386
洛马斯内，马丁 Lomasney, Matin 308
洛奇，亨利·C· Lodge, Henry C. 193, 359, 366

洛，塞思 Low, Seth 322

M

马汉，艾尔弗雷德·T· Mahan, Alfred Thayer 334, 338, 339

麦考密克，赛勒斯·H· McCormick, Cyrus Hall 189

麦克道尔，爱德华 MacDowell, Edward 397

麦克道尔，欧文 McDowell, Irvin 9

麦克莱伦，乔治 McClellan, George 9, 10, 16, 17, 21, 32

麦克梅内斯，詹姆斯 McManes, James 308, 309, 323

麦金莱，威廉 Mckinley, William 198, 199, 203, 204, 215, 217, 220, 221, 224, 226, 291, 293, 354, 359, 360

麦金莱关税法（1890年） McKinley Tariff Act (1890) 193, 203, 352, 353, 359

麦丘恩，查尔斯·W· Macune, Charels W. 284—286

曼宁，丹尼尔 Manning, Daniel 191

芒恩诉伊利诺伊案（1876年） Munn V. Illinois (1876) 209, 278

梅森，詹姆斯 Mason, James 15

美孚石油公司 Standard Oil Company 92, 97, 98, 101, 211, 303, 333

“美国保护协会” “American Protective Association” 164, 327

“美国大沙漠” “American Great Desert” 113, 114

美国妇女参政权协会 American Women Suffrage Association 328

美国钢铁公司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 94, 104, 304

美国工人党 Workingmen' s Party of America 259, 260

美国劳工联合会（劳联）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FL) 序5, 228, 229, 238, 242—253, 255, 262, 263, 265, 289, 291

“美国例外论” “American Exceptionism” 390

《美国琉球条约》 Ryukyu Treaty 346

美国社会党 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 264

美国铁路工会 American Railway Union 254

美国与加拿大有组织的行业与劳工联合会 An Economic Federation of Organized Trades and LaborUn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238,

239, 242, 244
美国烟草公司 American Tobacco Company 75
美利坚诸州同盟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3
美西战争 American-Spanish War 224, 332, 340, 341, 350, 354
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即“美洲国家组织”）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American Republics 364
美洲共和国商务局 Commercial Bureau of American Republic 364
“门户开放”政策 “Open Door” Policy 347
门罗主义 Monroe Doctrine 332, 357, 365—368, 370
蒙哥马利，艾赛亚·T· Montgomery, Isaiah T. 70
米德，乔治 Meade, George 22
米勒，约翰·F· Miller, John F. 176, 335
密歇根反托拉斯法 Michigan Antitrust Law 211
密歇根食盐协会 Michigan Salt Association 97
“缅因号” “Maine” 340, 360
民主党 Democratic Party 序 7, 1, 2, 32, 37, 43, 54, 56, 61, 65, 69, 173, 175, 186—194, 197—200, 203, 206, 212, 215, 221, 241, 288, 291—293, 336, 354, 362
摩根，托马斯 Morgan, Thomas 244, 263
摩根，约翰·P· Morgan, John Pierpont 28, 89, 102, 197, 338, 374
摩门教徒 Mormons 115
莫比利尔公司丑闻案 Scandal of Credit Mobilier 60, 191, 215
莫顿，奥利弗 Morton, Oliver 189
莫里尔关税法 Morrill, Tariff Act 25, 79
莫里尔法 Morrill Act 110, 138, 385, 386, 388
莫里尔，贾斯廷·S· Morrill, Justin Smith 385
莫斯特，约翰 Most, Johann 261
没收法案 Confiscation Act 12, 19
秣市惨案 Haymarket Riot 238—240, 256, 261, 316
木材和砾石法 Timber and Stone Act 137
“牧畜王国” “Cattle Kingdom” 132, 299

N

纳斯特，托马斯 Nast, Thomas 318

纳尔逊，克纽特　Nelson, Knute　195
纳瓦霍族人　Navaho Indians　116, 118
奈特公司案（1895 年）　U. S. v. E. C. Knight & Co.（1895）　213
南方联盟　Southern Alliance　282—289, 291
南太平洋铁路　Southern Pacific Railroad　88, 172
内文，埃塞尔伯特　Nevin, Ethelbert　397
内战　Civil War　序 1, 序 7, 1, 5, 6, 11, 13—15, 17, 22, 25, 27—29, 31, 33, 34, 36—39, 44, 57, 58, 62, 74, 77—80, 93, 94, 106—108, 110, 112, 114, 116, 124, 134, 135, 147, 148, 150, 153, 160, 168, 184, 187—189, 192, 194, 201—203, 205, 207, 208, 219—222, 224, 226, 229, 231—233, 270, 274, 276, 279, 290, 295—297, 304, 315, 321, 327, 328, 333, 336, 339, 341, 344, 348, 358, 369, 383, 385, 399, 401
内兹帕西族人　Nez Perce Indians　122
牛仔　Cowboy　133
纽顿（堪萨斯州）　Newton（Kansas）　135
纽约世界报　New York World　359
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308
纽约日报　New York Journal　359
纽约商会　Chamber of Commerce, New York　335
纽约社会党　Social Party of New York　258
纽约—伊利铁路公司　New York-Erie Railroad Company　95
纽约中央工会　New York Central Trade Union　262
纽约中央劳工联合会　New York Central Labor Federation　240, 241
农民联盟　Farmers' Alliance　69, 112, 193, 194, 232, 282, 283, 286—289, 305
农民协进会（格兰其）　Farmers' Mutual Benefit Association　276—279, 281, 305
农业车轮会　Agricultural Wheel　285
诺里斯，弗兰克　Norris, Frank　390, 391

P

帕克赫斯特，查尔斯　Parkhurst, Charles　318
帕森斯，阿尔伯特　Parsons, Albert　261

“排华法案” “Chinese Exclusion Act” 152，164，165，177，178
派克山区 Pike Mountains 116，128
佩理，马修 Perry，Matthew 340，346
彭德尔顿，乔治 Pendleton，George 189，205，217
彭德尔顿文官法 Pendleton Civil Service Act 217
皮弗，威廉 Peffer，William A. 194
皮尔斯，查尔斯·S· Pierce，Charles S. 375，376
贫民窟支队 slum brigade 325
“贫民窟法案” “Slum Act” 314
平格里，黑曾 Pingree，Hazen 322
平克顿密探 Pinkertons 252—253，290
蒲安臣（伯林格姆，安森） Burlingame，Anson 168，169
蒲安臣条约（1868年） Burlingame Treaty（1868） 168，170，174，175
普尔（联营） pool 89，96，97，205，208，210，268，276
普尔曼城 Pullman Town 311
普尔曼罢工（1894年） Pullman Strike of 1894 197，213，248，249，254，255
普拉特，奥维尔·H· Platt，Orville H. 226
普拉特，托马斯 Platt，Thomas 212，214
普莱塞控弗格森案 Plessy V. Ferguson 71
普利策，约瑟夫 Pulitzer，Joseph 185，317，359
普罗蒙特里峰（犹他） Promontory，Peak（Utah） 87，131，171
普乔委员会 Pujo Committee 212，223
皮阿拉普镇 Puyallup Town（Washington State） 179

Q

奇斯霍尔姆小道 Chisholm Trail 135
《企业论》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380
“强市长” “Strong Mayor” 322，324
“强制法案” “Force Bill” 64，69，193
乔治，亨利 George，Henry 211，240—242，373，374，379，391
乔治，密尔顿 George，Milton 283
切恩涅族人 Cheyenne，Indians 115—118，120
琼斯，塞缪尔·M· Jones，Samuel

Milton 197, 293, 322
全国报刊改革协会 National Reformers Press Association 289
全国复本位联盟 National Bemetallism League 207, 328
全国妇女参政权协会 National Women' s Suffrage Association 328
全国公民联合会 National Civic Federation 249, 252, 257
全国关税改革联盟 National Tariff Reform League 203
全国黑人企业联盟 National Negro Business League 73
全国劳工党 National Labor Party 230—232
全国劳工同盟 National Labor Union 229—233, 259
全国农民联盟和工业联合会 National Farmers' Alliance and Industrial Union 283, 285
全国市政同盟 National Municipal League 324
全国文官改革联盟 National Civil Service Reform League 217
全国有色农民联盟 Colored Farmers' National Alliance 69, 287
全国制造商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s 222, 256
全美妇女参政权协会 National American Women's Suffrage Association 328

R

仁川条约 Treaty of Inch' on 342, 343
人民党 The People's Party (Populist Party) 194—200, 232, 248, 251, 282, 284, 288—294, 305
人民党运动 Populist Movement 69, 112, 193, 194, 200, 248, 293, 329
人身保护法 Habeas Corpus Act 31, 64
"熔炉" "Melting Pot" 163, 180, 182, 183, 302

S

萨克拉门托流域 Sacramento Valley 128
萨姆纳，查尔斯 Sumner, Charles 45—47, 53, 63, 348
萨姆特要塞 Fort Sumter 6, 8
塞拉岭 Sierra Mts. 170, 171
三K党 Ku Klux Klan 42, 43, 45, 46, 48, 55, 61, 63, 64, 223
三K党法 Ku Klux Klan Act 64
萨尼尔，卢西恩 Sanial, Lucian 262
沙地党（加州工人党） "Sand-Lots" (Workingmen' s Party of Cali-

fornia）174
沙利文，罗杰　Sullivan, Roger　309
沙利文，路易斯　Sullivan, Louis　402
社会达尔文主义　Social Darwinism　201, 324, 325, 337, 339, 371, 372
社会福音运动　Social Gospel Movement　324—326
社会革命党人　Social Revolutionaries　261
社会主义行业与劳工联盟　Socialist Trade and Labor Alliance　263, 264
社会主义劳工党　Socialist Labor Party　174, 195, 252, 259—264
社区改良运动　Settlement Movement　295, 319—321, 323, 328
"生源说"　"Germ Theory"　381, 382
圣菲铁路　Sante Fe Railroad　87, 209
圣—郭登斯，奥古斯特　St. Gaudens, Augustus　185, 400
圣华金河　San Joaquin River　128, 172
"圣路易斯纲领"（1874年）　"St. Louis Platform"（1874）　286
"圣亚新托号"　"San Jacinto"　15
"失败的事业"　"The Lost Gause"　189
"16比1"　"Sixteen to One Ratio"　206, 289
实用主义　Pragmatism　324, 375—379
史蒂芬斯，尤赖亚·S·　Stephens, Uriah S.　235
史蒂文斯，撒迪厄斯　Stevens, Thaddeus　4, 45—50, 53
史蒂文斯，约翰·L·　Stevens, John L.　352—354
史密森博物馆　Smithsonian Museum　83
史密森，詹姆斯　Smithson, James　83
史密斯，埃德蒙·柯比　Smith, Edmound Kirby　9
舒尔茨，卡尔　Schurz, Carl　47, 63, 216
"双重工会"　"Dual Trade Union"　263
斯宾塞，赫伯特　Spencer, Herbert　201, 372, 374, 376
斯蒂尔曼，詹姆斯　Stillman, James　102
斯利德尔，约翰　Slidell, John　15
斯克罗格斯，威廉　Scruggs, William　366
斯科特法案　Scott Act　177, 178

斯科特，温菲尔德　Scott, Winfield　10
斯奎尔，伊弗雷姆·G·　Squier, Ephraim George　179
斯密，亚当　Smith, Adam　200
斯皮斯，奥古斯特　Spies, August　240，261
斯普拉格，弗兰克·J·　Sprague, Frank J.　330
斯普纳，约翰·C·　Spooner, John C.　226
斯塔尔，艾伦·G·　Starr, Allen G.　319
斯坦贝克，约翰　Steinbeck, John　392
斯坦顿，埃德温　Stanton, Edwin　35，51，53
斯坦顿，伊丽莎白·C·　Stanton, Elizabeth C.　328，329
斯坦福，利兰　Standford, Leland　386
斯蒂芬斯，亚历山大·H·　Stephens, Alexander H.　3，41，63
斯通，查尔斯　Stone, Charles　10
斯通，露西　Stone, Lucy　328
斯威夫特公司　Swift Company　99
斯威夫特，古斯塔夫斯·F·　Swift, Gustavus F.　99
死硬派　Stalwarts　189，190
苏特罗，阿道夫　Sutro, Adolph　129
苏特镇（加利福尼亚）　Sutter (California)　179
苏族人（或西荷族人）　Sioux Indians　115，117—120，122，123，131

T

塔科马（华盛顿州）　Tacoma (Washington)　178，179
塔斯克基学院　Tuskegee Institute　72
“台康德罗加”号　“Ticonderoga”　342
太平洋铁路法　Pacific Railroad Act　25
泰勒，丹尼尔　Tayler, Denial　9
泰勒，弗雷德里克·W·　Taylor, Frederick Winslow　104
坦慕尼厅（即坦慕尼协会）　Tammany Hall　215，241，307，318
汤普金斯广场（纽约）　Tompkins Square (New York)　259
汤因比厅（伦敦）Toynbee Hall (London)　319
特里弗雷克，理查德　Trevellick, Richard　231
“特仑特号事件”　“Trent Affair”　15
特纳，弗利德里克·杰克逊　Turner,

Frederick Jackson　序 8，142，145，150，296，380—383
特斯拉，尼科洛　Tesla，Nichola　81
"特威德帮丑闻案"　Scandal of Tweed Ring　60，215，318
特威德，威廉　Tweed，William　60，215，307—309，318
"天定命运"　"Manifest Destiny"　336，337，382，383
铁路兄弟会　"Railroad Brotherhood"　237，249
通用电气公司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83，92，300
"铜皇后"　"Copper Queen"　130
"铜头蛇"　"Copperheads"　5，29，54
吐温，马克　Twain，Mark　序 8，371，393，394，398
"团结一致的南部"　"Solid South"　189
脱党派　Mugwumps　189
"脱离法令"　"Ordinances of Secession"　41
"推与拉"　"Push-Pull"　160
托比尼克，赫曼·E·　Taubeneck，Herman E.　292
托拉斯　Trust　序 3，96—101，192，193，200，202，205，209，211—214，247，248，268，287，291
托马斯，西奥多　Thomas，Theodore　396

W

《王子与贫儿》　Prince and the Pauper　393
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　Wilson-Gorman Tariff Act　204，259
威尔逊，伍德罗　Wilson，Woodrow　200，214，221，293
"威士忌酒集团"丑闻案　Scandal of "Whisky Ring"　60，215
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　Westinghouse Electric Co.　81，92
韦德—戴维斯法案　Wade-Davis Bill　38，39
韦拉德，弗朗西斯　Willard，Frances　329
韦尔斯，吉迪恩　Welles，Gideon　10，11，48
韦弗，詹姆斯　Weaver，James B.　291
维布伦，索尔斯坦·B·　Veblen，Thorstein B.　379，380
维克斯堡战役　Vicksburg，Battle of　23
魏勒，瓦勒利阿诺　Weyler，Valeriano　359，360
魏德迈，约瑟夫　Weydemeyer，Johseph　2，258，260

文官拨款法　Civil Service Appropriation Act　216
文官委员会　Commission of Civil Service　216—218，220
“文化测验”　“Literacy Test”　序 6，70，72，165，166，246
沃巴什诉伊利诺伊州案（1886 年）　Wabash v. Illinois (1886)　209
沃尔什，约翰·F·　Walsh, John F.　234
沃克将军，F.　General Walker, F.　120
沃纳，奥林　Waner, Olin　400
沃纳，查尔斯　Warner, Charles　393
乌托邦改良主义　Utopia Reformism　228，235—237，239
无政府主义　Anarchism　260，261，264
“五个文明部落”　“Five Civilized Tribes”　119，127
“五一”大罢工（1886 年）　“May Day” Strike　238—240

X

西方联合电报公司　West Union Telegram Company　90
西进运动　Westward Movement　序 5，113，138，142，145，151，162，355，381，382
西门子—马丁（敞炉）炼钢法　Siemens—Martin (Open-Hearth) Process　84
西沃德，威廉·H·　Seward, William H.　168，347，348
希尔，詹姆斯　Hill, James　89
希尔顿，埃德加·A·　Hillton, Edga A.　385
席威斯，威廉·H·　Sylvis, William H.　231
夏延（怀俄明）　Cheyenne (Wyoming)　131，135
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　Thirteenth Amendment of Constitution　33，41，48，225
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　Fourteenth Amendment of Constitution　序 2，48—51，56，69，70，201，225，328
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　Fifteenth Amendment of Constitution　序 2，56，62，64，69，70，225
现金租佃制　Cash Tenancy　66
“向海洋进军”　“March to the Sea”　23，24
小马快递制　Pony Express　130
“小意大利区”　“Little Italies”　159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Sherman Anti-

trust Act 193, 212, 214
谢尔曼购银法 Sherman Silver Purchase Act 193, 207
"谢尔曼将军号" "General Sherman" 341
谢尔曼，威廉·T· Sherman, William T. 23, 24, 32, 33, 44, 185, 212, 213
谢尔曼，约翰 Sherman, John 48, 216, 220, 223, 226
谢里登，菲力普 Sheridan, Philip 521
"新天定命运"说 "Neo-Manifest Destiny" 336, 337
"新移民" "New Immigrants" 序5，序6，156—160，164，165，180—183，246，250，251，326
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 New Jersey Standard Oil Company 101
休伊特，艾布拉姆·S· Hewitt, Abram S. 188, 240, 254
熊彼特，约瑟夫 Schumpeter, Joseph 87
薛斐尔，罗伯特·W· Shufeldt, Robert W. 342
"血衬衫" "Blood Shirts" 189

Y

哑铃式住宅 dumb-bell tenement 314
亚当斯，布鲁克斯 Adams, Brooks 337
亚当斯，简 Addams, Jane 319, 320
1893年危机 Crisis of 1893
1873年危机 Crisis of 1873 187, 206, 235, 259, 276, 280
"1873年罪恶" "The Crime of 1873" 206
1873年铸币法 Coinage Act of 1873 206
伊顿，道曼 Eaton, Dorman 216
《一个可耻的世纪》 A Century of Dishonor 125—126
"一无所知党" Know Nothing Party 序2，164
伊里，理查德 Ely, Richard 380
伊利诺伊劳工党 Labor Party of Illinois 259
移民法 Immigration Act 26, 79
移民局 Immigrant Bureau 26, 165
伊斯利，拉尔夫 Easley, Ralph 249
银币派 Silverists 193, 197, 206, 207, 292
印第安人保护委员会 Indian Protective Commission 125
印第安人拨款法 Indian Appropriations Act 121
印第安人保留区 Indian Reservations

118，134
印第安人权利协会 Indian Rights Association 125
印第安人事务管理委员会 Board of Indian Affairs 118，121
印第安人专员委员会 Board of Indian Commissioners 121
英尼斯，乔治 Inness，George 397
“影子纲领” “Shadow Platform” 197，292
犹太人区 “Jewish Ghettos” 159
尤特族人 Ute Indians 115
《有闲阶级论》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380
育林法 Timber Culture Act 137
院外集团 lobby 221，222，355
约翰斯顿，约瑟夫 Johnston，Joseph 9，16，23，33，34
约翰逊，安德鲁 Johnson，Andrew 序1，37，39—41，43—55，219
约翰逊，汤姆 Johnson，Tom 322

Z

宅地法 Homestead Act 2，2，18，25—27，78，105，137，271
詹克斯，托马斯 Jenks，Thomas 216
詹姆斯，威廉 James，William
《章鱼》 Octopus 391
征兵法 Enrollment Act 29，30
“正当法律程序” “Due Process of Law” 50，201，223
芝加哥公民联合会 Chicago Civic Federation 28
芝加哥市民联盟 Chicago Civic Confederation 322
住宅城镇（卧城） dormitory town 299
志刚 Zhi Gang 169
“制度学派” “Institutional School” 380
《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339
治安维持会 The Vigilance Committee 173
中美望厦条约 Sino-American Wangshia Treaty 342
“中西部学派” Mid-west School 380
中央太平洋铁路 Central Pacific Railroad 87，88，131，171，173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 Central Pacific Railroad Company 25，95，170，171，201
州际商务条例 Interstate Commerce Act 192，20—210，279，284
州际商务委员会 Commission of Interestate Commerce 210，220
“自备毡囊者” Carpet-bagger 55，63，187

自由民局　Freedmen's Bureau　33，44，45，47，48，58，59
自由派共和党人　Liberal Republicans　63，187
"自由银币"　"Free Silver"　197
"祖父条款"　"Grandfather Clause"　70，74
租佃农场主　Tenant Farmer　序 4，66，107，273，274
左尔格，弗里德里克·A·　Sorge，Frederick A.　258，260
"坐牛"　"Sitting Bull"　122，123

再版后记

《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1861—19世纪末》第一版发表于1990年6月，屈指算来至今已10年有余。主编丁则民教授，也是笔者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导师，为该书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从编写人员的选定、全书的布局谋篇、观点体例和行文风格等都进行了认真的筹划与督导。各章的执笔者，无论对该章内容熟悉程度如何，都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再深入一步，发表了数篇很有分量的论文后，才动笔写就。在书稿的写作过程中，曾专门召开3次审稿会，还多次征求美国权威学者的意见。至于具体执笔人员展开的各种讨论，则已无法用次数衡量。之后，又经丛书的两位主编认真审阅，几经推敲与反复修改，方定稿付梓，“历时8年始成书”。这本书和后来陆续出版的其他各卷一起构成我国在美国历史著述方面最厚重、并具有一定权威性的通史类论著，得到国内美国研究同行们的首肯和好评。

借此次再版之机，本当再事雕琢，以求锦上添花，可惜业师于去岁不幸病逝，未能如愿，成为本书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病榻之前，业师嘱本人代笔，委以重托。但因时间久远，各章执笔者已多有变动，无法一一联络，本人不敢、也无力独自对整个书

稿妄加改动。所幸本书问世后，在业师的带领下，东北师大美国研究所同仁仍继续拓展相关研究，对这一时期的土地关系、矿业开发、铁路业、畜牧业、农业、城市化乃至摩门教等诸多方面都有深层次的探讨，有很多新的认识可资借鉴。所以，根据总主编和责任编辑的建议，本人趁此次再版的机会，将印刷和行文上的重要纰漏剔出，同时，以后记的形式对书中某些问题进行补充或修正，以尽可能丰富我们对这段时期美国历史的全方位认识。

首先要修正的是本人执笔的第九章“城市的大规模兴起与市政改革”。由于城市化在当时是一个新领域，本人前无借鉴，驾驭整体的功力也很有限；又由于本人的硕士学位论文选取的是美国中西部，对中西部有偏爱，因此在书中笔墨略多，论述也确实有一定深度；相比之下，对西部的论述却是一带而过。后来，笔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现了这一问题，并专门选取西部城市化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我在该文中提出，尽管同中西部相比，西部城市化的整体水平，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同步程度，在全国所占比重等方面并不显要，但不可否认的是，西部城市化作为工业化时期边远地区城市化而有其典型意义和独特的研究价值，理应占有一席之地。现在看来，这个认识确有必要在本书再版时加以补充。

那么，如何认识西部的典型意义呢？西部位于美国经济区划的边缘地带（periphery，也可称边远地区），它与位于美国核心地区（core）的中西部城市化道路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分属两种不同的区域开发和城市化类型。中西部地区所经历的是典型的传统模式，其顺序大致为：农业开发或矿业开发—工业化—城市化。在此过程中，农业地区的乡镇发展为小城镇，原有的小城镇上升为小城市，小城市则进一步成为大中型城市或地区性中心城市，

属常规性逐级递进。相比之下，西部城市化沿着一条与中西部截然不同的道路而发展：其一，绝大部分城镇是西部开发的先导和主体；其二，西部的主要城市均呈跳跃性发展。

微徵史实，可以看出，西部城镇确实是西部开发的先导。绝大部分城镇，无论是矿业城镇还是铁路城镇，都兴起于毫无人烟的莽莽荒原之上，超越了农业开发阶段。同样有意义的现象是，西部城镇不仅是西部开发的先导，而且一直是西部开发的主体。其直接表现是，西部人口稀少，但城市化比例却很高，而且城市化速度很快。就整个西部而言，从1860到1910年间，城市人口总数由600万增加到4200万，城市化比例由20%增长到4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5.7%）。其中，山区各州为40.7%，太平洋沿岸各州则高达56%。作为美国经济中尚未开发的边缘地区，用50年左右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城市化，这种速度无疑是相当快的。

单纯从城市化发展速度看，西部和中西部都很快，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即中西部各级城镇发展较为均匀，逐级递进；而西部在小城镇兴起的同时，大城市发展更迅速一些，几个地区性中心城市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小城镇——一般城市—地区性中心城市等几次过渡，阶段性不明显。譬如，旧金山由40年代末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村落发展到1890年的30万人口，成为西部居统领地位的大商埠，在全国大城市中名列第九。落基山东麓的丹佛，发展势头也很猛，1860年时在地图上还找不到它，到1900年其人口已达到13.4万人。有鉴于此，有的美国史学者把旧金山和丹佛称为“速成式”城市（Instant Cities）。洛杉矶比它们兴起的时间稍晚，到1910年，人口也达32万，成为在规模上仅次于旧金山的西部大城市。所以说，西部各地区性中心城市的发展进程，较其他地区的同类级别城市迅速得多，带有跳跃性特

征。

西部开发之所以会形成上述局面，一方面是其地理条件所决定的。西部山地居多、交通不便、人烟稀少，难以同时进行全面开发。其自然经济又属矿产资源型，不宜发展大规模的多样化经济，而开发之初所必需的主要是经济联系功能较强的中心性“支点”，作为沟通东部与西部腹地的“桥头堡”，而不是以分散和渐进性发展为特征的农业经济，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走中西部式的城市化道路。另一方面，这种以城市为先导的开发只有在工业化时期才有实现的可能。如西部开发的第一步——采矿业的发展就需要大量矿冶设施及先进的钻探采掘技术。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美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由东向西，依次进行。19世纪后半期开发的重点是在西部，中西部则是进一步完善的问题。中西部在迅速成为一个新的工业中心的同时，也和东北部一道，带动着西部的开发。这除了资本西移外，也包括劳力和生产生活资料向西部的大量转移，从而便利了城镇的“超前”性发展。以城市为先导，当然并不是城镇的普遍兴起，而只能是有重点地进行，亦即走“点”状城市化的道路。这最充分地反映在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丹佛等西部四个地区性中心城市的兴起过程中。它们都是19世纪后期由小城镇一跃而为地区性中心城市的。以城市为先导，当然也不是不发展农业。西部城镇超越农业开发阶段，径直进入城市化阶段，有其特定的时空条件，它的进一步发展仍有赖于周围农业地区的开发。在城市经济初步完善后，具备一定实力，可为农业地区提供了农用设备、资金和技术，又使农业的迅速开发成为可能。诚然，如果没有西部城镇的刺激，西部迟早也会进入农业开发阶段，但未必会这样快，有这样大的规模。

可以看出，美国西部与中西部在城市化的总趋势上是一致

的，但在具体途径与形式上均有诸多不同之处，反映了处于美国经济核心区和边远地区截然不同的城市化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西部并不是在简单重复东部城市化的模式，而是开辟了一条有自身特色的边远地区城市化道路。

在19世纪后期的美国历史上，横贯大陆铁路的铺设也是一个不可小觑的问题，可惜本书相关内容篇幅嫌少，而且分散在几个小章节，不易引起读者的注意。关于铁路，可以有很多需要讨论的问题，但至少有两个方面是需要列为专题的：其一，联邦政府的土地政策与横贯大陆铁路的铺设；其二，铁路业率先走向垄断。

19世纪后期，美国西部开发过程中乃至整个美国历史中最令人瞩目的现象之一，就是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铺设了多达五条横贯大陆铁路，即：联合太平洋—中央太平洋铁路（1869年）；北太平洋铁路（1883年）；圣菲铁路（1885年）；南太平洋铁路（1887年）；大北铁路（1893年）。这五条大铁路，总长7万英里，并附有无数条支线，深入到西部腹地，对西部开发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当时，美国东部还处于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很多方面都需要资金和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在西部广袤的地域上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无疑是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当然有很多因素，但它与美国联邦政府土地政策的直接关系是不可忽略的。

根据1862年《太平洋铁路法案》，联合太平洋铁路和中央太平洋铁路二公司可得到400英尺宽的路基用地，以及建立车站、仓库、水站、临时工房、机车器械工厂、某些铁路建筑物等必需的土地。更重要的是，每修筑1英里铁路，就可得到沿线两侧各5个以间隔方式划分的地块（每个地块1英里见方，等于640英

亩）。这些地块可由铁路公司自行处置。为刺激新开发地区铁路铺设，该法规定在尚未建州的地区土地赠予数量加倍。另外，每修筑1英里铁路，铁路公司可从联邦政府那里得到具有明显政策倾斜性的贷款：在平原地区为1.6万美元，丘陵地带为3.2万美元，山地为4.8万美元，以保证铁路线的均匀分布。这些政策使铁路公司获得了大量土地，从1850年到停止土地赠予的1871年，国会赠予各铁路公司的土地总计约1亿英亩以上，再加上西部各州赠予的数千万英亩的土地，各铁路公司所得的土地近1.8亿英亩（此数字在美国史学界存在争议，但其数量无疑是非常可观的）。

铁路与土地相结合所产生的各种效益和影响远远超过了两者相加之和。土地凭铁路之便而增值，成为铁路公司的巨大财源，铁路公司则通过种种途径，促成土地增值。其途径之一是直接出售土地，对象主要是移民。各铁路公司均出动大量人马奔赴东部乃至欧洲各国，通过各种媒体大张旗鼓地宣传游说，西部已有城镇为了自身的发展，也力图吸引移民，这与铁路公司的作法异曲同工，来自美国东部和欧洲的移民纷纷西迁，结果，铁路公司的土地不仅销路看好，而且售价飙升。

除直接向移民出售土地外，铁路公司还专设一些城镇开发公司，自行设计与创建城镇，从而形成别具一格的铁路城镇。通过这种途径，城镇中的地价增值幅度远远高于一般土地，铁路公司获利翻番；另一方面，城镇新兴，必然吸附大批人口，铁路的客货运输量也将相应增加，不啻一举两得。在铁路城镇创建过程中，诱人的投机利润使土地投机商们趋之若鹜。其中除部分投机商受雇于铁路公司外，还有一些专门在铁路沿线，寻求机会，伺机而动。他们或者与铁路一道，或者赶在铁路铺设之前，选址建镇，有时买下数个地块乃至全部地块，待价而沽，从而形成西部

城市化中的特有现象：镇址投机（Townsite Speculation）。据一位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著名镇址投机商在其传记中的记述，他曾计划建造一条横贯大陆的城镇线，像“城市公路”一样，把旧金山和波士顿联为一体。这种说法尽管有些夸张，但毕竟明显地反映出铁路公司是何等地热衷于建造铁路城镇。

这一政策的结果是“双赢”。城镇的创建和镇址投机，在经济上的直接后果是铁路公司得到最大的实惠。如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创建的本顿城，地块收入即为1.7万美元。另如北太平洋铁路在北达科他创建的詹姆斯敦，那里售价高达2700美元的地块，在该城未建前仅为25美元。但从美国政府方面来讲，它所预留的与铁路交叉分布的地块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增加了政府的岁入。更重要的是，铁路铺设带动了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带动了西部的大规模开发，成为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起飞的支撑力量。

当然，这一政策也产生了始料不及的消极后果，这种慷慨的土地赠予，使铁路部门转瞬成为一个空前庞大的“土地帝国”，从而操纵了西部的经济命脉，造成很多社会矛盾。所以，铁路成为大量中小企业主和农场主抨击的主要对象。这是产生下一个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个问题就是，铁路在19世纪后半期在美国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中所扮演了独特的角色。美国的第一个垄断组织形式—普尔就是首先出现在铁路业，换句话说，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序幕是由铁路业拉开的，而且在后来的反垄断斗争中，铁路公司几乎是众矢之的，所以铁路业的这一侧面也值得费些笔墨交代。

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较，铁路有其自身特点，这些特点使铁路成为最易受自由竞争影响和损害的企业，正因如此，走向垄断就是一个不得已但又很自然的选择。不过，在东部，铁路公司之间竞争激烈，往往是头破血流，两败俱伤，西部却并没有发生东

部那样的运费战，倒是最先采取了合作的方式：铁路普尔，这也是耐人寻味的。其原因之一是因为西部铁路从修建伊始就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如资本匮乏、股票掺水等，经济实力不稳，轻易不敢开启运费战；另一原因是美国刺激西部铁路铺设的土地政策和贷款政策使铁路在西部远远超过人口的移动，铁路线过剩，运输量不足，供大于求。权衡之下，类似东部那样的无限制的竞争对铁路公司往往是得不偿失，容易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一些明智的铁路公司为避免在竞争中与对手同归于尽，便采取普尔作为变通办法。此外，西部地区资源分布不均匀，气候土壤也有很大的优劣差异，结果，铁路在这些地区的竞争，自然也相对集中，也是普尔得以较早产生的原因。

虽然普尔作为一种初级组织形式在全国普及，并且在减少竞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它本身所无法克服的一些缺陷注定了它的寿命是不会长久的。与其他经济部门不同，美国铁路业中未能出现独霸全国铁路的一个或几个铁路巨头，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垄断组织系统的任务就由来自铁路外部的力量、即以摩根为代表的银行家们来完成。银行资本以1893—1897年经济危机为契机介入铁路经营管理。不久全国铁路系统由四大垄断公司控制的局面形成，美国铁路业成为垄断程度最高的部门之一，并且采用垄断组织的最高形式控股公司，形成所谓的铁路大帝国。银行资本介入铁路经营管理，是美国金融资本形成的主要标志之一。银行资本在铁路业获得巨大成功后，又以此为手段进一步操纵其他经济部门的命脉。可以说，银行资本插手铁路并获得成功标志着金融资本操纵国家经济生活的开始。

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是此时期历史发展的主线，自然也是该书的重头戏。该书在此方面的总体把握也确实下了很大工夫，但主要限于论及工商业部门的垄断，如再对铁路这一最具有美国特

色的部门而且也是垄断最早出现的部门加以论述，当可更为全面。

19世纪美国历史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西部开发。西部开发，是一部带有史诗性的历史现象，它对美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甚至是难以估量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美国的西部开发就没有现代美国。但是，在我们为美国西部开发的令人目眩的辉煌成就所折服时，往往会忽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西部开发过程中的失误现象，这些失误所导致的消极后果到19世纪后期开始凸显。因此，如果说在上一卷（《美国的独立与初步繁荣》，该卷主要论述19世纪上半期）里这个问题可以忽略不计的话，在本卷中则是不可回避的。诚然，对于此问题，书中有所涉猎，但与对铁路的论述一样，非常分散，重视程度很不够。

美国西部开发中的失误现象似在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得比较突出：

第一，开发活动对西部土壤和自然植被的破坏。在西部开发过程中，农业、畜牧业、伐木业这些第一产业的不当开发对西部土壤、植被的破坏最为严重。在西部开发过程中，竭泽而渔的开发方式相当普遍。在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农业生产的三要素中，西部土地最多也最便宜，而资本和劳动力恰恰都是最昂贵的。因此，农民都尽可能少用劳动力和资本，在增加或保持土壤的肥力方面，却从来都是漠然置之。天长日久，这种粗放式经营的结果，造成了土壤肥力流失，有机物减少，土地板结的恶果，难以恢复，大片平原沃土变成沟壑纵横的不毛之地。

砍伐树木，开荒种地，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从殖民地时期就是如此。到美国内战前，西部边疆的拓荒者已经一路滥砍到了明尼苏达州，南部则跨过了密西西比河。破坏植被的祸首还有畜

牧业。畜牧业到19世纪后期已形成相当大的规模，成了大平原地区的主导产业，它的兴盛是以草原植被的巨大破坏为代价的。在大平原畜牧业流行“散放”式放牧，破坏植被的速度极快。到20世纪30年代大平原地区出现沙尘暴，与这一现象有其内在联系。

第二，对自然环境的污染。这主要体现在中西部的加工工业和西部采矿业。早期城市发展，就根本没有考虑防治污染问题。后来的远西部采矿业开发，先是淘金热对地表的破坏，山体裸露，后是大型采矿机械以及提炼矿产品排出的废水废气和用于分解矿物的一些化学药剂的残余，都对环境产生了破坏。匹兹堡的钢铁冶炼业曾称雄全美，是遐迩闻名的“钢铁城”，为美国工业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但同时钢铁业也使这座城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匹兹堡的上空经常烟雾弥漫，被戏称为“黑城”。以至于人们常把匹兹堡与英国的曼彻斯特相提并论。在匹兹堡的大型工业企业的内部，可谓管理井然有序，效率颇高，但在整个匹兹堡的市政建设与管理上，却呈现典型的无政府状态。三四十年代匹兹堡投巨资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可谓亡羊补牢，对当时其他城市产生很大的警示作用。但回过头来看，若没有19世纪的放纵行为，后来改造的代价就会小得多。

第三，资源浪费。在采矿业的初级阶段，大量采矿者都是受黄金的诱惑来到矿区，他们只对金银感兴趣，因此不管是在淘金热还是在其后的浅层开采中，他们对于和金银相伴生的其他矿物质如石英等都弃之如履。同时，很多浅层露天矿因无法再采掘到金银而被放弃，一旦被放弃，就很难再进行深层采掘，因此，这些露天矿井之下埋藏的矿藏就长眠于地下了。由于矿产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因此这种失控的大肆开采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在铁路铺设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铁路公司为独吞地产投机所带来的好处，往往置现有城镇于不顾，单独建设新的城镇。如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西部终点站避开西雅图建造塔科马，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建夏延而绕过矿业综合性城市密西西比河以西第二大城市丹佛等等都是明显的例证。铁路公司为所欲为，如入无人之境。这样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鲜有其匹。至于铁路公司后来成为西部庞大的土地帝国，颐指气使，成为垄断业巨头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就更是尽人皆知的，这在当时就是美国中下层群起而攻之的对象，劣迹昭彰，读者自可鉴别，无须今天再费笔墨赘述，只是把它与西部开发的失误结合起来分析，多了一层历史思考的视角和感悟。在房地产开发中，更是充满了泡沫经济现象。在恶性竞争的驱动下，很多开发商不顾实际，热衷于“镇址投机”，或有意炒作，结果出现大量闲置的地块或镇址，很多成为人迹罕至的“鬼城”（Ghost town）。这些地点最后只剩下一个功能：赚取今天怀有猎奇心理的游客的门票费。

我们当然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要求历史，苛求一个世纪前披荆斩棘的开拓者，但有些是本应能够避免的，就应该做客观分析了。如果再从吸取经验教训的角度看，我们今天的边远地区开发应该、而且也可以完全避免这些失误。换句话说，我们有后发的优势可资利用。但利用这个优势有个前提，那就是要准确认识美国西部开发的失误究竟有哪些，这些失误哪些是人为的，哪些是难以避免的，哪些是边远地区开发必然伴随的副产品。

19 世纪后期美国史是一部恢弘的历史画卷，还有很多领域尚待进一步发掘。业师后来在此领域做了大量的深入探求，同时还指导学生作了大量研究和资料搜寻工作。这些研究成果，当可丰富我们对 19 世纪后期美国史和美国西部开发的认识和了解，

希望感兴趣的读者查找相关刊物阅读。我们作为先生薪火的传人，负有的使命之一就是在此方面继续加倍努力，将更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奉献给学术界同仁，方可告慰业师的在天之灵。

王旭

2002年7月于厦门大学



总主编 刘绪贻 杨生茂

美国通史

第4卷

崛起和扩张的年代

1898-1929

本卷主编 余志森

人民出版社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585-2000



VOL.1 LAY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585-1775

VOL.2 THE INDEPENDENCE AND THE BEGINNING OF PROSPE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1775-1860

VOL.3 AMERICAN CIVIL WAR AND GILDED AGE 1861-THE LATE YEARS OF THE 19TH CENTURY

VOL.4 THE RISE AND EXPAN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898-1929

VOL.5 THE AGE OF FRANKLIN D.ROOSEVELT 1929-1945

VOL.6 POST WW II AMERICAN HISTORY 1945-2000

美国通史

第4卷

崛起和扩张的年代

1898-1929

总主编 刘绪贻 杨生茂

著者 余志森（本卷主编） 王春来（本卷副主编）
王锦瑭 陆甦颖 陈晓

人民出版社

美国通史

总主编（按姓氏笔划）　刘绪贻　杨生茂
策划/编审　邓蜀生

第一卷　美国的奠基时代　1585－1775
著　　者　李剑鸣

第二卷　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　1775－1860
著　　者　张友伦（本卷主编）　陆镜生　李　青等

第三卷　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　1861－19世纪末
著　　者　丁则民（本卷主编）　黄仁伟　王　旭等

第四卷　崛起和扩张的年代　1898－1929
著　　者　余志森（本卷主编）　王春来（本卷副主编）
王锦瑭　陆甦颖　陈　晓

第五卷　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　1929－1945
著　　者　刘绪贻　李存训

第六卷　战后美国史　1945－2000
著　　者　刘绪贻（本卷主编）　韩　铁　李存训



华盛顿州
西雅图
塞勒姆
俄勒冈州
蒙大拿州
海伦娜
爱达荷州
博伊西
北达科他州
俾斯麦
南达科他州
皮尔
明尼苏达州
圣保罗
威斯康星州
麦迪逊
密歇根州
兰辛
底特律
缅因州
奥古斯塔
蒙彼利埃
康科德
波士顿
普罗维登斯
哈特福德
奥尔巴尼
纽约州
纽约
特伦顿
宾夕法尼亚州
哈里斯堡
费城
匹兹堡
多佛
华盛顿
安纳波利斯
加利福尼亚州
萨克拉门托
圣弗朗西斯科
（旧金山）
洛杉矶
内华达州
卡森城
犹他州
盐湖城
怀俄明州
夏延
科罗拉多州
丹佛
内布拉斯加州
林肯
艾奥瓦州
得梅因
伊利诺伊州
斯普林菲尔德
芝加哥
印第安纳州
印第安纳波利斯
俄亥俄州
哥伦布
西弗吉尼亚州
查尔斯顿
弗吉尼亚州
里士满
堪萨斯州
托皮卡
密苏里州
杰斐逊城
肯塔基州
法兰克福
田纳西州
纳什维尔
北卡罗来纳州
罗利
亚利桑那州
菲尼克斯
新墨西哥州
圣菲
俄克拉何马州
俄克拉何马城
阿肯色州
小石城
南卡罗来纳州
哥伦比亚
密西西比州
杰克逊
亚拉巴马州
蒙哥马利
佐治亚州
亚特兰大
得克萨斯州
奥斯汀
休斯敦
路易斯安那州
巴吞鲁日
佛罗里达州
塔拉哈西
迈阿密
墨西哥湾
太平洋
大西洋
阿拉斯加州
朱诺
圣劳伦斯岛
努尼瓦克岛
白令海
阿拉斯加湾
阿拉斯加半岛
科迪亚克岛
亚历山大群岛
阿留申群岛
阿图岛
安德烈亚诺夫群岛
夏威夷群岛
中途岛
太平洋
火奴鲁鲁
（檀香山）
瓦胡岛
夏威夷州
① 新罕布什尔州
② 佛蒙特州
③ 马萨诸塞州
④ 罗得岛州
⑤ 康涅狄格州
⑥ 新泽西州
⑦ 特拉华州
⑧ 马里兰州
⑨ 哥伦比亚特区



华盛顿州
西雅图
奥林匹亚
俄勒冈州
塞勒姆
爱达荷州
博伊西
蒙大拿州
海伦娜
北达科他州
俾斯麦
南达科他州
皮尔
明尼苏达州
圣保罗
威斯康星州
麦迪逊
密歇根湖
兰辛
底特律
怀俄明州
夏延
加利福尼亚州
萨克拉门托
圣弗朗西斯科
（旧金山）
洛杉矶
内华达州
卡森城
犹他州
盐湖城
科罗拉多州
丹佛
内布拉斯加州
林肯
艾奥瓦州
得梅因
伊利诺伊州
芝加哥
斯普林菲尔德
印第安纳州
印第安纳波利斯
俄亥俄州
哥伦布
宾夕法尼亚州
哈里斯堡
匹兹堡
费城
纽约州
奥尔巴尼
纽约
缅因州
奥古斯塔
蒙彼利埃
康科德
波士顿
普罗维登斯
哈特福德
特伦顿
多佛
安纳波利斯
华盛顿
西弗吉尼亚州
查尔斯顿
弗吉尼亚州
里士满
堪萨斯州
托皮卡
密苏里州
杰斐逊城
肯塔基州
法兰克福
亚利桑那州
菲尼克斯
新墨西哥州
圣菲
俄克拉何马州
俄克拉何马城
阿肯色州
小石城
田纳西州
纳什维尔
北卡罗来纳州
罗利
南卡罗来纳州
哥伦比亚
得克萨斯州
奥斯汀
休斯敦
路易斯安那州
巴吞鲁日
密西西比州
杰克逊
亚拉巴马州
蒙哥马利
佐治亚州
亚特兰大
佛罗里达州
塔拉哈西
迈阿密
墨西哥湾
太平洋
大西洋
阿拉斯加州
朱诺
圣劳伦斯岛
努尼瓦克岛
白令海
阿拉斯加湾
阿拉斯加半岛
科迪亚克岛
亚历山大群岛
阿留申群岛
阿图岛
安德烈亚诺夫群岛
夏威夷群岛
中途岛
火奴鲁鲁
（檀香山）
瓦胡岛
夏威夷岛
① 新罕布什尔州
② 佛蒙特州
③ 马萨诸塞州
④ 罗得岛州
⑤ 康涅狄格州
⑥ 新泽西州
⑦ 特拉华州
⑧ 马里兰州
⑨ 哥伦比亚特区

著者说明

本卷为《崛起和扩张的年代：1898—1929》，内容包括1898年美西战争以来美国的对外扩张，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和工业化、城市化和垄断化的实现，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直至20世纪20年代末的金融崩溃。全书共11章。引言、第1、2、3、10章为余志森撰写；第4、5、6章为王春来撰写；第8、9章为陆甦颖撰写；第7章为陈晓撰写；第11章为王锦瑭撰写。全书由余志森统稿修订。附录3种均由俞世恩编写或编制，余志森、陆甦颖核定。参加编写工作的还有郭尚鑫和李治国。

本卷的初稿在分卷主编加工的基础上，由刘绪贻、杨生茂两位主编进行全书统稿，并由分卷主编进行最后加工。

担任本书责任编辑的人民出版社邓蜀生编审在全书编写过程中，不断给予关心、督促并提出很好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朱庭光、张椿年两位研究员曾给予大力支持和协助；一些美国历史学家为帮助我们掌握美国史学界的美国史研究最新成果和信息，不断给予支持和赠书。我们一并在此致以深切的谢意。

在本卷编写过程中，刘绪贻、丁则民先生和王寅女士还专门提供了大量极有学术价值的英文原版著作，刘绪贻、杨生茂、邓蜀生先生拨冗对提纲进行认真审阅，并提出了十分中肯的修改意见。李世洞先生专函寄来他的写作纲要供我们参考。孟庆龙先生也为本书的资料收集提供了帮助。本卷在编写中力求反映国内美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和体现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水准，对于国内美国史研究者和同行的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时间紧迫，水平所限，诚恳希望读者和同行对本书的不足与缺点，提出宝贵批评和帮助。

2001 年 9 月 10 日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和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 ………………………………（6）
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 ……………………………………（6）
完成新工业革命的有利条件（7）　新工业革命的完成（9）　新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12）
二、工业化的实现 ……………………………………………（16）
美国农业机械化的开始（16）　工业化和工业社会的形成（19）　现代铁路交通运输网络的完善和远西部的成功开发（22）　世界工业强国地位的巩固（25）
三、城市化的初步实现 ………………………………………（27）
大西洋沿岸老城市的新发展（28）　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城市化（32）　西部城市化的历史进程（33）　相对缓慢的南部城市化进程（36）　全国城市化程度的差异和城市化带来的负面效应（39）　20世纪初

美国城市化的特点（42）
四、巨型企业、托拉斯和金融财团……………………………………（50）
巨型企业的崛起和发展（50） 第一次兼并高潮和托拉斯帝国（53） 八大财团最后形成（56） 现代企业的定型（59） 关于托拉斯的争论（62） 大企业家的历史功过（69）
第二章 美西战争和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政策……………………（82）
一、世界强国地位的确立和海洋扩张战略……………………………（83）
世界强国地位的确立和世界被瓜分完毕（83） 传统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的结合（88）
二、美西战争：历史上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94）
美西关系恶化（94） 美西战争：历史上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96） “西奥多·罗斯福推论”和大棒政策（99）塔夫脱的金元外交（102） 威尔逊的使命外交（104）
三、向太平洋地区和亚洲的扩张 ………………………………………（105）
侵占菲律宾（106） 攫取夏威夷（109） 美国对华政策的出发点（112） “门户开放”政策（114） 美国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122） 拉拢日本牺牲中国（128）
四、向拉丁美洲的进一步扩张 …………………………………………（132）
占领古巴和波多黎各（133） 调停委内瑞拉危机（136） 强取巴拿马运河开凿权（138） 美国和巴拿马的冲突（142） 塔夫脱在中美洲的经济扩张（147）武装干涉墨西哥，占领海地和多米尼加（148） 对海地的军事统治（150） 侵犯多米尼

加和尼加拉瓜主权（151）
五、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大国仲裁角色 ……………………………… （153）
第一次海牙会议（154） 西奥多·罗斯福
调停日俄战争（154） 美国调停第一次摩
洛哥危机（158） 第二次海牙会议（160）
六、关于帝国主义的辩论：美国人民
反对美西战争和帝国主义扩张政策 …………………………… （164）
对于帝国主义的批判（164） 反帝国主
义同盟（167）
第三章 社会大变动和群众运动新高涨 ………………………… （171）
一、工业化带来社会大变动：传统社会
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关键时期 …………………………………… （172）
美国城市和农村（173） 农民对工业化
和城市化的反应（179） 农业人口的部
分城市化（182） 农业社会中的新气象（185）
二、社会结构的新变化 ………………………………………………… （187）
大企业家阶层的出现（188） 中产阶级
的形成和壮大（189） 产业工人队伍的
扩大及其境遇（191） 童工的普遍使用
（196） 农民的变迁（201） 新移民（204）
贫困人口的增加（212）
三、社会人口流动高潮 ………………………………………………… （214）
美国经济地区结构的变化（214） 农村
劳动力向城市转移（216） 黑人大迁徙（218）
四、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 …………………………… （221）
工人运动 （221）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
斗争（223）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创
建和活动（224） 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曲
折发展（226）

五、妇女继续为争取权利而斗争 ……………………………………（227）
工业化对妇女的影响（227） 妇女运动
的高涨（229）
六、少数族裔的抗争 ………………………………………………（232）
印第安人的抗争（232） 黑人的反抗斗
争（234）
第四章 国内资产阶级改革运动——“进步
主义运动”的兴起 ……………………………………（237）
一、“黑幕揭发”的掀起和暴露文学的兴盛 ……………………（237）
“黑幕揭发”运动的兴起（238） 暴露
文学的兴盛（244）
二、进步主义思潮的形成 …………………………………………（249）
保守思潮——自由放任主义趋向衰落（249）
反传统的新社会思潮的形成（253） 克
罗利的新政治哲学（258） 破除改革的
法律障碍：实用主义法学和政治科学的
形成（260） 新的宗教哲学——“社会
福音”的兴起（261）
三、社会经济领域的群众性改革运动 ……………………………（265）
社会正义运动的兴起（266） 童工保护
问题（268） 女工保护及最低工资立法
（270） 建立工伤事故保险体制（271）
最高法院和社会立法（272） 女权运动
的深入（275）
四、市政改革的深入 ………………………………………………（277）
城市之羞（277） 城市的“反叛”：市政
改革运动的兴起（280） 克利夫兰市的改
革（283） 新型市政体制的建立（284）
五、州级改革运动的兴起 …………………………………………（289）

州的耻辱和改革运动的兴盛（290） “好斗的鲍勃”与威斯康星州的改革（291）
“还政于民”与政治领域内的改革（294）
经济和社会领域内的改革（296）

第五章 西奥多·罗斯福与进步主义改革 ……………………… （300）

一、罗斯福的反托拉斯斗争 ……………………………………… （300）

白宫最年轻的总统（301） 打击托拉斯：“托拉斯轰炸机”（304） 罗斯福反托拉斯政策的评价（309）

二、“公正施政” ……………………………………………………… （313）

“公正施政”的推行（313） “公正施政”的评价（316） 1904年选举（319）

三、政府与企业 ……………………………………………………… （321）

加强对铁路的管理（321） 政府与企业间的“协作”（325）

四、保护自然资源 …………………………………………………… （326）

自然资源保护运动的兴起（327） 罗斯福与自然资源的保护（329） 与“老卫士派”的分歧（333）

五、塔夫脱主政：改革的停顿 ……………………………………… （335）

1908年的选举：塔夫脱上台（335）
谨小慎微的塔夫脱总统（337） 共和党的四分五裂（338） 罗斯福与塔夫脱分道扬镳（341）

第六章 威尔逊与进步主义改革的高潮 ……………………… （344）

一、威尔逊与“新自由” ……………………………………………… （345）

1912年选举：改革派的胜利（345） 白宫新主——威尔逊（348） 威尔逊的政治学：“新自由”与强势总统（350）

二、关税政策和银行改革 …………………………………………… (352)
关税改革：安德伍德—西蒙斯法（353）
银行改革：联邦储备法（357） 对联邦
储备法的简要评价（361）
三、反托拉斯立法 …………………………………………………… (363)
克莱顿反托拉斯法（363） 联邦贸易委
员会的建立（366）
四、转向新国家主义 ………………………………………………… (368)
五、“新自由”与美国黑人及南方 ………………………………… (371)
1900 年之后的南方（371） 北方的美
国黑人（375） 南方的美国黑人（376）
六、进步主义改革的扼要评价 …………………………………… (379)
第七章 美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 (381)
一、战争初期美国的中立政策 …………………………………… (381)
战争初期美国的反应（381） 英、德在
美国的宣传及其影响（383） 美国政府
的中立（384） 战争对美国经济的早期
影响和政府保护经济的措施（387）
二、通向美国参战之路 …………………………………………… (390)
德国开始潜艇战（390） 德国潜艇威
胁加剧（392） 1915 年以来美国的调停
（395） 中立时期的美英关系（397）
美国宣布参战（400）
三、战时美国 ……………………………………………………… (401)
战争动员（401） 政府对经济的计划和
统制（403） 政府对粮食和燃料的管制
（404） 对运输的战时管制（406） 战
时财政和税收（407） 战时劳工（410）
战时的公民自由权（411）

四、美国的军事行动 …………………………………………………… (412)
战前的国内军事动员 (412) 美国海军
和军事行动 (413) 美国陆军和军事行
动 (416)
五、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 …………………………………… (419)
计划的提出 (419) 计划的主要内容 (422)
计划作为和谈的基础 (425)
六、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争斗 …………………………………… (427)
威尔逊出席巴黎和会 (427) 巴黎和会
对殖民地的处置和赔偿问题 (428) 威
尔逊牺牲中国利益 (430) 威尔逊与国
会围绕批准国联盟约的斗争 (433) 第
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的影响 (436)
第八章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 …………………………………… (438)
一、共和党执政的20年代 ……………………………………………… (438)
从威尔逊到哈定：1920年的大选 (438)
"俄亥俄帮"和政府丑闻 (441) 从副
总统到总统：柯立芝如愿以偿 (442)
在期待中走向前台：胡佛入主白宫 (444)
哈定—柯立芝—胡佛的执政信条 (446)
梅隆及其财政政策 (450) 农业集团和
农业政策 (454) 最高法院的保守倾向 (456)
二、管理革命与技术革新 …………………………………………… (457)
泰勒制的推广 (457) 福特工厂的流水
线作业 (459)
三、20年代的经济繁荣及其问题 ………………………………… (460)
汽车王国的出现 (461) 工业帝国的壮
大 (464) 政府对企业兼并的政策 (467)
广告与新的消费和生活观念 (469) 美

国人日常生活的变化（471） 投资热潮
和股市泡沫（473） 1929年股市的崩溃（476）
繁荣中的不平衡（479）
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社会运动 ……………………………… （482）
“疲惫的进步运动”（483） 劳工运动的
低潮和美国共产党的成立（485） 限制
移民的运动和政策（487） 原教旨主义
运动与布赖恩—斯科普斯案（489） 禁
而不止的禁酒运动（491） 新三K党的
猖獗（494） 女性的进一步解放（496）
第九章 20年代美国的对外政策 ………………………………… （499）
一、2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 …………………………………… （499）
20年代的国内外环境（499） 20年代
美国外交决策的原则（501）
二、斡旋于国际事务之中 …………………………………………… （506）
国联与国际法庭（506） 华盛顿会议与
裁军行动（509） 最惠国待遇的扩展（512）
凯洛格—白里安公约（513）
三、对欧洲的有限干预 ……………………………………………… （515）
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515） 对苏俄
的态度（517）
四、对美洲扩张政策的收缩 ………………………………………… （519）
美国对拉美的总体战略（520） 与哥伦
比亚和墨西哥的争斗（522） 从加勒比
撤军（524） 美国与加拿大（527）
五、对亚太地区的继续争夺 ………………………………………… （528）
美日关系（529） 菲律宾的独立问题（531）
扩大在中国的势力（532）
第十章 1898—1929年美国政治体制的变化 …………………… （535）

一、三权分立的权力重心由国会转向总统 ……………………………… (536)
以“总统为中心”的三权分立新格局的形成（536） 新格局形成的具体原因和历史意义（543）
二、联邦制的变化 ………………………………………………………………… (545)
联邦权力的增大（547） 联邦权力增大的具体原因（551）
三、政党制的新现象：两党趋同、第三党的壮大和利益集团的活跃 ……………………………… (552)
两党的趋同（553） 两党成分的变化（555）
第三党运动的发展和变化（560） 利益集团的活跃（565）
四、国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 (573)
国会发展的现代时期（575） 议长权力的减弱（578）
五、司法部门的变化 ………………………………………………………… (579)
六、选举制度的改善 ………………………………………………………… (583)
选举方法的改革：直接选举法（583）
选民范围和选举范围的扩大（585）
选举制变革的原因（587）
七、市政管理体制的创新 …………………………………………………… (589)
第十一章 文化思想新成果 ………………………………………………… (593)
一、文学的繁荣 ……………………………………………………………… (593)
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593） 主要的现实主义作家及其作品（595） “迷惘的一代”文学（601） 诗歌（604） 戏剧（606） 黑人文学（608）
二、艺术的发展 ……………………………………………………………… (611)
音乐（611） 电影（615） 绘画（618）

雕塑和建筑（624）
三、史学新成就 ………………………………………………（627）
历史科学的新阶段（627） 进步主义史学（629） 比尔德与经济史观（630） 帕林顿与思想史学派（632） 种族主义史学（633） 康蒙斯—威斯康星学派（635）
四、实用主义哲学与现代教育 ………………………………（636）
实用主义的黄金时代（636） 进步主义教育运动（639） 20世纪初美国教育的新发展（643）
五、宗教 ………………………………………………………（648）
美国教会的新发展（648） 新的理性思潮和社会巨变对教会的影响（652） 现代主义和原教旨主义（654）
美国历史大事记 ………………………………………………（658）
主要中外文参考书目 …………………………………………（682）
索引 ……………………………………………………………（708）

引　　言

19—20世纪之交（1898—1929年）是美国历史上全面完成始于南北战争以来（即镀金时代）的巨大转变的时代，是美国自独立以来变化最快、最猛、最烈的时期之一。第二次工业革命全面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和垄断化基本实现。美国经济、科技、文化高速发展，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迅速转化；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以私人垄断为特征的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美国在世界上由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跃而为国际一流的经济和军事强国。美国从殖民地跃至世界一等强国，在西半球陡然崛起，并开始雄心勃勃地越过大洋向东半球肆意扩张。

崛起和扩张成为美国世纪之交的时代主题。美国在崛起中扩张，在扩张中崛起。

取代旧霸主英国，追求世界首强地位，为垄断资本开拓海外"新边疆"，成了美国统治者和财团大亨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美国政府制订对外政策的指路星辰。1898年美国终于与老牌帝国西班牙打响了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枪声，从而揭开了美国大规模海外扩张活动的序幕。美国扩张主义者清醒地认识到太平洋在新世纪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伴随着美国国内扩张主义思潮的鼓

噪声，美国军舰和军队把星条旗插向从老牌强国西班牙手中夺取的新领地：菲律宾、古巴等地；他们越过太平洋以菲律宾为跳板向中国进军，正式提出对华的“门户开放”照会，形成了美国独立的对华政策；派遣军队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中国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并积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向中国渗透，企图让东方文明古国“西方化”和“美国化”。美国近邻拉丁美洲历来是它扩张的重点地区之一。西奥多·罗斯福提出了新门罗主义——“罗斯福推论”，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扩张主义政策。美国政府“用不太高尚”的手段攫取了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权，调解了委内瑞拉危机，拒欧洲列强于拉丁美洲之外，军事占领古巴、海地、多米尼加、尼加拉瓜等国。

在美国向海外扩张的过程中，扩张主义思潮又沉渣泛起并达到了新的可怕高度，由于它承继了传统扩张主义（基督教“使命”原则和“天定命运”论）思潮的精髓，又有现代帝国主义为追求高额利润的经济军事扩张野心，因而变得更富侵略性、扩张性和欺骗性。美国有识之士和进步人士对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思潮展开激烈辩论，力排众议，言之凿凿。对外扩张虽然加速了美国国内的经济发展，但最终也使它遭到了报复。

巨大的发展以巨大的代价为条件，迅猛崛起以沉痛的牺牲为前提。工业化、城市化和垄断化给美国带来巨变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工业社会综合症：复杂的工业社会结构和城市分层导致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产品的极大丰富与分配的不合理，提高效率和公平原则间的矛盾导致贫富差距悬殊；垄断的无度和无序膨胀破坏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游戏规则，致使中小资本强烈不满；权力和金钱的联姻，垄断集团和政府的勾结，导致政治腐败，丑闻迭出；物质生活的富裕与精神生活的空虚，造成文明的失落和道德的沦丧；千百万外来移民为美国带来勃勃生机，也

导致城市贫民区域的扩大和蔓延。美国就像一架正在起飞冲向蓝天的飞机，在起飞时发生了剧烈的震荡和失衡。及时改革和调整成为美国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从19世纪9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进步主义运动就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改革运动。虽然很难说这是一场有统一目标、有计划、有步骤的全国性运动，但它确实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包括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社会主义运动、黑人运动和社会正义运动在内的强大社会运动是它的直接推动力量（有的属于运动本身的组成部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起了先导作用，他们首先提出新的社会理论作为运动的理论指导，他们揭露黑幕为改革制造有力的舆论，在联邦、州、市镇各级改革派和各领域改革派的领导下，美国人民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各类社会改革。最后美国政府采用立法手段将改革成果肯定下来。这场运动体现了群众性的某些自发性也兼具政治精英们的自觉因素，运动中的局部目标和地区目的虽不完全相同，但是在大的改革方向上是一致的。进步主义运动取得了积极成果。在政治上既加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又扩大了人民的选举权。既扩大了选举的范围（如参议员由民选产生），也扩大了选民的范围（选举权扩大到了妇女）。市政体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取消了城市政治机器（城市老板），摸索和建立了若干种新的城市管理模式，对建立现代管理体制和遏制政治腐败起到了积极作用，修正和理顺了美国的政治游戏规则，使资本主义顺利地由“自由”竞争体制向垄断体制过渡。在社会和劳动方面，一些立法和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劳资关系，政府以总裁者自居宣称“公正施政”。通过了每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有关保护儿童和妇女权益的法规等。在文化思想上涌现了进步主义文学、进步主义教育、进步主义史学等积极成果。

进步主义运动从本质上说是美国社会对工业化作出的一种反应。为了适应已经工业化了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必须作出相应改革。这种改革既要进一步推进工业发展又要避免工业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它是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节功能的体现。资本主义制度由自由体制向垄断体制的转化必然引起社会阵痛和震动，进步主义运动在不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对其体制内的部分结构和游戏规则作出调整和修正，使之适合新的历史条件。它也是美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场改革，目的在于使美国从传统社会顺利向现代社会转化。改革中的某些举措具有现代化意义，推动了社会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同步发展。

在美国工业化和改革进程中，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了，这是一场残酷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人类史上的巨大悲剧，对美国却是一个可资利用的机遇。美国从开始的中立，最后走上通向战争之路，抓住了机遇从战争中获得巨大利益。战争使美国成为提供军事物资和生活资源的军火商和世界工厂，大发战争横财；战争使美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协约国和同盟国两败俱伤，美国坐收渔利。美国人民为早日结束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战后美国提出以建立国联为中心的“十四点计划”，就是美国企图建立以它为领导的世界新秩序的蓝本。

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共和党人再次入主白宫。鉴于美国人对国家干预和一战期间的军事轨道的反感，三届共和党政府又回复了自由放任政策，当然这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自由放任。美国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管理革命和科技创新，在经历短暂危机后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美国工农业总产量在世界上独居鳌头，美国人过着当时世界上最高水准的生活，尽管仍有许多贫困人口存在。在外交上，美国政府从实用主义出发，时而采用孤立主义，时而实行扩张主义，总的战略是企图巩固其扩张

高潮期取得的“成果”。在世界列强之间美国极力鼓吹裁减军备以建立某种均势，维护以美国为领导的世界和平局面。为此美国参与对新生苏俄的武装干涉和所谓的对苏经济援助；在远东与日本既勾结又有矛盾，继续支持中国军阀政府侵犯中国人民利益；在拉丁美洲美国企图巩固在那里所建立的亲美政权，稳定“后院”；在欧洲继续在英、法、德等大国之间搞平衡，不使德国过于贫弱而失去对抗英法的牵制作用，大力推行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企求在欧洲均势中保持美国的特殊地位。

20年代对美国人说来也许是一个和平的年代，也许还是一个繁荣的年代，那时有人不是已经断言福特“打败”了马克思了吗？但是，在美国20年代经济繁荣的背后却潜伏着阴森森的危机，当美国人沉醉于舒适的住宅、漂亮的小汽车、便捷的电冰箱、洗衣机和无线电等等物质享受，争先恐后抢购股票渴求一夜发财的“幸福”时刻，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的滚滚乌云正在向他们袭来……。本书的最后一个句号就在此划下。从此，美国进入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

第一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和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

变化往往是衡量时代的尺子。如同总的人类历史发展一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似江海的波涛潮涨潮落，其间总会出现若干快速飞跃的高涨时期，即巨大变革时期，质变或部分质变或巨大的量变时期，从一个阶段跃向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

20世纪初年的美国就处在这样一个历史关键性时刻。虽然这种巨变始于美国南北战争以后，但这场变化的完成和最后成果的取得却是新世纪开端的20—30年里。这种变化是全面、深刻和多层面的，其中最本质、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全面完成，以及由此而来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垄断化的基本实现。

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

工业革命是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和自然环境等综合因素发展的必然产物。工业革命是一个历史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具备了开展新工业革命的各种前提条件，成为人

类史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之一。美国内战以后特别在19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新工业革命，90年代后向纵深发展，20世纪初工业革命取得全面胜利。新工业革命成为推动美国现代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生产力飞速发展，新产业层出不穷，科学创新和技术发明快速转化为生产力，美国社会状况和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思想文化有新的突破，传统的价值观念发生变革。总之，美国是带着丰硕的成果、巨大的转变和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从19世纪跨入20世纪的。在新世纪开初的岁月里，整个美国社会经历了数十年的巨大变化以后，以崭新的但令人震惊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上：从此美国社会开始完全建立在一个全新的工业文明的物质基础之上。

〔完成新工业革命的有利条件〕　内战以后美国北部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完成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就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首先，在经济上美国已有大量资本积累可供发展新工业部门之用，为工业进一步集中与资本集中奠定了雄厚基础。根据美国1900年普查报告，投入工业的资本在10年内增加了50%。1900年拥有100万美元资本的工业公司已并不少见。

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是美国深入开展和完成新工业革命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1905—1910年出现移民高峰，来自南欧和东欧国家的移民为美国的工农业发展和进一步开展新工业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1896年以后，来自东南欧的移民数首次超过来自西欧北欧的移民。1902—1914年短短12年里的移民总量超过1820—1880年间60年的移民数。1907年据美国国会有关部门的统计，在美国的钢铁、煤矿、建筑、铜矿和炼油等基础工业中，外国出生的工人平均占劳动力的60%。棉制品工业的劳动力，如洛厄尔19世纪创立时的劳力全部是当地的农村妇女，20世纪初

它的几乎70%的劳力是外国出生的。[1] 移民不仅充当了劳动力而且为美国带来了欧洲的先进科学技术，同时他们还承担了美国工业发展中那些最艰苦、最繁重和最危险而本地工人不愿干的工作，他们充当了美国新工业革命中的主力军。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时英国得益于因圈地运动破产的自耕农作为主要劳动力来源的话，那么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受惠于大批从世界各地离别家乡而来的移民。

广阔的国内市场和不断增强的内需是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得以深入开展和最后完成的前提条件之一。虽然当时美国不如英国法国那样有广阔的海外殖民地所形成的商品市场，但是美国有着英法无法比拟的国内市场和日益增长的内部需求。人口迅速增长直接导致了内需的扩大，自南北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美国人口从3150万增长到9200万。铁路交通的迅速发展直接推动了国内市场的形成。1902年美国的铁路线几乎已经编织成一个巨大的交通网络，它已经可以直接或接近全国所有的大小村庄。“这个庞大的铁路网有助于建立一个全国性市场，从而促进了大规模生产和‘巨型企业’的成长。”[2] 全国铁路网的建成使各地货物可以根据商业利益运往全国各地，经济利益成为指导货流的主要因素，国内贸易获得迅猛发展。国内需求的增长促进了国内商业的活跃，国内从事商业的人员比例激增。

科学技术上的优势是完成新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开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成就和基础，在它的最后完成阶段，科学技术依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20世纪初，美国进入

---

① 卡尔·N·德格勒：《今从史出：形成当代美国的力量》，哈泼和罗出版公司，1959年，第282页。

② 吉尔伯特·C·菲特和吉姆·E·里斯：《美国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沈阳，1981年，第413页。

了科学创新和技术发明的突飞猛进阶段，成为“发明时代”；新发明层出不穷，新产品令人眼花缭乱。19世纪末所开放的技术发明之花在20世纪初结出丰硕成果，科学成果迅速转化为新产业。在使科学成果和技术发明转化为生产力方面，美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和成就。美利坚民族的求实精神导致了美国人重视科学试验和技术改进的优良传统，虽然美国已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但是它们没有成为新技术发展的障碍，20世纪以来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对于新工业革命的最后完成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在工业革命进程中涌现出来的一批发明家成为企业家，直接推动了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新产业。

美国优越的自然条件也为新工业革命的完成提供了有力保证。美国有丰富的煤、铁、有色金属、森林、石油为新工业革命中涌现的新产业，如：钢铁工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汽车工业、采矿冶炼等等提供了丰裕的物质资源。美国辽阔而肥沃的土地给农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地。20世纪初美国进入农业繁荣时期。1910年的美国农业总产值高达90亿美元，大约比1899年增加了1倍。高水平的农业又为工业化铺垫了厚实的基础。美国是两洋国家，它的东海岸和西海岸则为开展国际贸易提供了最佳良港。

机遇是为有准备的人而来的，有利条件则是为能抓住机遇的人们准备的。美国不仅具备了上述天时地利条件，更重要的是美国人民抓住了历史机遇，他们利用南北战争的革命胜利成果，利用这场革命所创造的稳定的政治局面，集中民族的全部精华和精力，在19世纪最后30年开展工业革命，进入20世纪后又不失时机地完成了这场新工业革命。

〔新工业革命的完成〕　新工业革命完成于何时何刻难以划定具体时日，况且工业革命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发展也不平

衡。这里我们所言工业革命完成是指整个美国国家而言，新工业革命兴起于“镀金时代”，完成于20世纪初，即“进步主义时代”，历时半个世纪之久。新的标志性产业的形成和稳定发展可以被视作新工业革命深入发展和完成的重要标志。如果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的标志是机器制造业的诞生，那么新工业革命完成的标志是代表这场革命的新产业的形成和稳定发展，以及它们在国民经济领域中确立了主要地位。20世纪初美国的新产业已经最后形成并得以充分发展，它们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经济革命首先表现在动力上的革命。1860年美国的畜力几乎占全国非人力动力构成中的2/3，1890年，改进了的蒸汽动力已成为全国总动力中的60%，1900年，两个新动力即电力和内燃机的出现，构成了20世纪工业的基础。[①] 恩格斯早在1883年以其敏锐的目光预见电力革命的前景，他说：“菲勒克就电工技术革命掀起了一阵喧嚷，确丝毫不理解这件事的意义……但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蒸汽机教我们把热变成机械运动，而电的利用将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使一切形式的能——热、机械运动、电磁光——互相转化，并在工业中加以利用。”[②] 20世纪初电力工业部门成为美国现代工业体系中的重要部门之一。1913年美国发电量达到248亿度，1919年电力达到全国动力总容量2940匹马力的1/3。电的发明应用也进入新阶段，1910年美国出现了无线电广播，无线电发展到电子管时代，1910年美国已有电话700万台。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最早的电影院。

石油工业也是新工业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产业。1900年它

---

① 卡尔·N·德格勒：《经济革命的时代：1876—1900》，斯各特出版公司，伊利诺伊，1977年，第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35卷，第445—446页。

已达到每年6362万桶的稳定高产。石油炼油技术继续改进，特别在高温高压作用下分解石油的新技术和制造合成汽油的工程技术都有突破性进展。与此相关的化学工业也成为独立工业部门。

钢铁工业的发展是新工业革命的产物。1860年美国生铁产量100万吨还不到，1915年已超过3300万吨，1899年已占全世界生铁产量的1/3。1899年美国的钢产量已占全世界的43%。

汽车工业是最具代表性的新产业。它的诞生和发展被称为一场"汽车革命"。[①]美国发明家亨利·福特在1903年与人在底特律创建福特汽车公司并且运用部件标准化原理，大批量生产价格低廉的产品，使美国汽车工业迅速扩展，他生产的汽车价格直线下降，1909—1910年，每辆汽车的价格从780美元跌至360美元。1914年美国年产汽车57.3万辆，1920—1921年福特汽车公司年生产量为125万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

新的工业体制和管理体系的诞生和完善是新工业革命完成的重要标志之一。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大企业的形成和自动生产流水线的诞生和定型。大企业的出现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特有现象也是工业体制上的重大变革。而生产流水线的出现是工厂管理制度上的一场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工厂制取代了工场制，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是以大生产和流水线生产取代一般小规模机器生产的过程。自动生产流水线的诞生是与美国的汽车工业的发展分不开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的贡献巨大。早在1903年他就说过："制造汽车的办法就是使一辆汽车和另一辆汽车一样，使它们全都一样，使它们在出厂时完全一样。"为此他认为某一型号汽车的零件，不仅对同一型号的所有其他汽车是通用的，而且和他们已经生产出来的所有汽车的相似零件也是通用的。为了实践

---

① 弗雷德里克·L·艾伦：《巨变》，哈珀兄弟出版公司，1952年，第121页。

他的理想，他在汽车工业中创立了自动生产流水线。1917 年福特的里弗鲁日汽车厂就是按照连续生产流水线的要求建成的。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式工厂。“工厂如今成了一辆汽车从布置在关键地点的工人们照管的装配线上逐步完成的地方。”① 管理革命既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又成为工业革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泰勒管理制度的诞生也是新工业革命完成的标志。

工业革命的完成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连处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人也对此大为吃惊。1902 年一个英国工会领袖代表团访问美国，企图寻求美国生产迅速发展的“秘密”，最后他们发现谜底就是：在美国工厂中广泛使用了机器。一位成员在报告中写道：美国人“几乎在每件事情上都用上了节约劳动的数字，实在令人震惊”。②

〔新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　探究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特点和经验是有益的。首先，在工业革命中涌现的工业研究试验室是成功的尝试。虽然工业研究试验室的建立并非美国独有，但是继爱迪生在门罗公园建立工业实验室以后，美国在 20 世纪初涌现出了大批工业研究实验室，无论其规模和作用都使其他国家望尘莫及。“在美国现代工业研究实验室终于找到了它的安身立命之所，使它得以空前地发展起来。它是美国 20 世纪的一个奇迹。”③ 事实证明这是科学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新产品迅速产业化的有效途径。1900 年通用电气公司建立第一个工业研究实验室，32 岁的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教授威利斯·惠特尼为它的

---

① 丹尼尔·J·布尔斯廷：《美国人：南北战争以来的经历》（中译本），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年，第 797 页。

② 德格勒：前引书，《经济革命的时代：1876—1900》，第 31 页。

③ 布尔斯廷：前引书，第 783 页。

第一任组织者（1900—1928）。他在斯克内克塔迪（纽约）建立了研究实验室并任该室主任，后又物色了一批出类拔萃的科学家进行共同研究。1902 年，他发现用敷金属的炭丝制作白炽灯的亮度比原来的灯丝增加 25%。后来他一直研究现代电灯泡的工作。1905 年美国物理学家、工程师威廉·库利吉参加实验室工作，3 年后（1908 年）他帮助惠特尼完善了钨丝的制作使之成为现代照明灯泡的组成部分。后他又对 X 射线管进行研究改制使之能产生可以预测的精确的辐射量，获得专利并开创了 X 光的新时代。库利吉管成为现代 X 射线管的原型。通用电气公司在这门新兴科学中又取得领先地位。美国物理化学家欧文·朗缪尔 1909 年加入实验室工作。他的研究表明在灯泡中加入惰性气体能大大延长灯泡寿命。他又发展了真空泵和无线电广播用的高真空电子管，后还提出新的原子理论等等。

工业研究实验室同美国巨型企业的命运是互为依存紧密相连的。企业提供大量资金资助科学家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科学家们的新发明新创造反过来给企业带来新产品、新成果、新活力。一个巨型企业光靠优质的老产品是无法维持下去的，它的任务是促使事物变成陈旧过时的东西。私人咨询实验室创始人阿瑟·利特尔对纤维素产品进行投资取得成功，他的研究成果分别为柯达公司和拉斯特龙公司所利用。1916 年他到坎布利奇，不久就在被称为利特尔研究大厦的实验室里与研究人员们一起进行十分广泛的研究工作。1919 年，利特尔成功地在试验性工厂中发明了一种试验性造纸机，帮助确立了在大规模投产前特别建立的工厂以试验新技术的做法。利特尔的信条是"研究是工业之母"。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见解。

20 世纪初，美国许多大公司认识到建立工业实验室的重要性，实验室如雨后春笋在美国土地上崛起，几乎包含了所有的重

要产业，如：石油、化学、电话等等。1902 年美国杜邦家族通过合并 100 家商号创建杜邦公司，并于 1911 年建立杜邦实验室，公司产品由单一生产火药开始转入产品多样化和投资多样化。1884 年开办伊斯曼干片和胶卷公司的乔治·伊斯曼于 1912 年建立了柯达实验室。1927 年伊斯曼—柯达公司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摄影工业公司之一，垄断了美国的摄影工业。1913 年美国橡胶公司实验室建立。1899 年美孚石油公司托拉斯被迫解散而成立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1919 年新泽西建立美孚石油公司实验室。1925 年贝尔电话实验室建立，它的总办事处设在新泽西州的默里希尔，成立后有上万件科学和工程技术得到革新取得辉煌成就，现已成为全世界最有权威性的研究机关之一。在这种有效的研究机构中，一些学者、科学家和发明家大有用武之地。一些教授走出校门，跨入实验室投身于科学和企业结合之路，因而在新的工业革命浪潮中，美国涌现出一批由发明家兼企业家的新型企业家。

其次，美利坚民族的求实精神和创新意识对工业革命的完成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早在 19 世纪美国就涌现了一大批发明家如：发明轧花机的伊莱·惠特尼、研制成高压蒸汽机和纤维精梳机的奥利弗·埃文思、发明缝纫机的伊莱亚斯·豪、开创炼乳工艺的盖尔·博登、电报发明人和建立第一条电报线的塞缪尔·莫尔斯、电话发明家亚历山大·贝尔、发明第一架柯达照相机的乔治·伊斯曼、发明赛璐珞制造法的约翰·海厄特、发明凹衍射光栅的美国物理学家亨利·罗兰等等。美利坚民族是一个移民构成的民族，移民具有一种特别的创造精神，他们敢于探索新领域、开拓新边疆。美国科学家强调科学发明和发现的应用性，强调科学成果的开放性，美国第一任物理学会主席亨利·罗兰在 1899 年发表演说“呼吁美国纯科学研究”时指出：“我们能够想像一位隐居哲学家

也许能作出许多有益的发现，然而，要是他将此藏之于自身，他决不可能要求它对世界有任何裨益。因为他的未公开的成果仅是他的个人所得，于世界尚无补益。只有当他使这些发现用强有力的语言让世人知晓并足以引起注意和相信这是真理时，人类始能受惠。”① 在科学研究和大学教育中提倡学术自由，造成一种自由研究科学的氛围有利于创新意识的培养。美国芝加哥大学首任校长威廉·哈珀提出学术自由的主张，1899 年 6 月 30 日该大学通过决议宣布，大学教师在任何课题上有演讲自由是该校的基本法则，无论现在或将来都不能改变它；教授的观点只代表他本人，校方不支持有争议的任何一方。② 这种学术氛围和倡导鼓励了美国人的创造力。一位美国权威人士说得好：“工业中的这种方法的发展来源于我国人民的创造力。他们不受传统势力或因循守旧的习惯所束缚，爱好机器作业，特别热衷于寻求最好最简单的机械化生产方法。③

凭借 19 世纪的积累，进入 20 世纪后美国人经过发明创造又推出了大批新的实用性成果。1900—1915 年授予专利 96.9 万项，平均每年获得专利的发明数超过 1860 年以前整个美国历史上所获专利的总和。当然要推广这些发明并使这些发明转化为生产力，需要大量有技术的、勤奋的工人。一位专利局的官员在 1900 年这样写道：“要利用这些发明取得最好的效果需要美国工人的聪明智慧，结果导致了聪敏的发明和爱思索的人的结合。在聪敏的机器后面糊涂人是毫无用处的。”为了使劳动者适应工业化的要求，美国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资是惊人的。一位权威人士估

---

① 不列颠大百科出版公司：《美国年鉴（第 12 卷）1895—1904，平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改革》，芝加哥，1968 年，第 262 页。

② 《美国年鉴》，第 12 卷，第 499 页。

③ 转引自吉尔伯特·C·菲特和吉姆·E·里斯：《美国经济史》，第 386 页。

计在公共教育上，美国从1860年投资6000万美元猛增到1900年的5亿300万美元，到了1910年，美国70%的黑人男子和95%的白人男子有文化①。

工业革命的基本完成给美国带来了令人震惊的划时代的巨大后果，使美国社会从底层到上层，从经济到政治，从思想文化到社会习俗，甚至连美国人自身的生存方式似乎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的主要表现是美国在20世纪初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垄断化。新工业革命完成以后美国的经济基础完全建立在全新的大工业和大公司基础之上，并且最终使美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美国的社会领域以城市生活为特征的全新生存方式展现在美国人的面前，大都市崛起，摩天楼矗立，贫民窟相伴而生；在社会经济制度领域内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更高的阶段：从巨型企业、大银行到垄断大财团，直到垄断资本主义，即以私人垄断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在美国最后确立。

二、工业化的实现

美国工业化的进程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展开是同步的。20世纪初，美国新工业革命完成之时就是美国工业化实现之日。农业机械化的开始是美国工业化过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美国农业机械化的开始〕　　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一样，农业革命往往是工业革命的先导和它的一个重要内容。美国农业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关系非常密切，由于美国走了一条美国式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即以对美国农民最有利的方式解决了土地问题，加上土地辽阔肥沃，土地投机买卖盛行，美国农业发展

---

① 德格勒：《经济革命的时代：1876—1900》，第31页。

持续稳定，高产多样，基础厚实，为新工业革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首先，它既为工业人口提供充裕的生活保障，又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工业原料；其次，大量的农业人口（根据1910年的人口普查，农村的美国人占总人口一半以上）既是工业革命所需要的产业工人的后备大军，又构成购买国内工业品的巨大市场。在美国历史进程中，农业始终是推动工业革命的强大动力。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深入和完成同样需要依赖农业的坚实基础，同时工业革命的开展和完成反过来又会大大促使以机械化为核心的农业革命的实现。美国有关农业发展的统计资料表明，南北战争以后美国农业的机械化开始有一定发展，但真正的全面的机械化却开始于1910年以后，也即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阶段，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1902年，C.W. 哈特与C.H. 帕尔合作研制成第一台汽油拖拉机，被称为“老式一号”。后来他们创立“哈特—帕尔公司”，专门生产此类拖拉机。直到1913年以后汽油拖拉机才胜过蒸汽拖拉机而得以推广。1900年，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些大农场上，巨型蒸汽拖拉机拖着16张犁、4个耙和1架播种机，同时犁地和播种，一天作业面积为50英亩。在干旱地区人们又发明风力抽水；为翻耕硬地，农民使用新式冷硬铸铁犁。在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上，各种机械被陆续发明和应用。

农业机械化促进了农业的规模生产，因而农场数也大为增加，1860—1916美国农场数从200万个增加到640万个。农场的财产也得益于机械化，全国农场的财产激增，1860年仅为70亿美元，1910年高达360多亿美元。[①]

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上升。据统计，从1860年到1910年，每一个农业劳动力的平均收获面积由

① 吉尔伯特·C·菲特和吉姆·E·里斯：《美国经济史》，前引书，第516页。

每年 12 英亩增加到 23 英亩，几乎翻倍。小麦生产增长近 3 倍，达 1632 万吨，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小麦供应国，玉米生产增长 2.5 倍多，达 6858 万吨，棉花增长约 4 倍，达 217 万吨。1910 年美国农业总产值高达 90 亿美元，一位观察家不无自豪和夸张地说："美国农业一次收成，就可以把比利时王国的一切连同国王一起买到手；两次收成可以买进意大利；三次收成可以买来奥匈帝国；五次收成，如按现货交易价格折算，能够把俄罗斯帝国从沙皇手里买进来。"①

与此同时，农业的功能和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也发生重要变化，农业商品化加速是最大特点。美国农民不仅提供国内人民的生活需要和工业原料，而且为出口农产品进行生产。1910 年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占输出总值的 51%。主要输出畜产品和粮食（小麦），还有棉花。20 世纪初美国农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地价不断飙升，由于西部边疆被宣布结束，政治家们预言粮食将成为一个紧迫问题，因而引起人们的恐慌，1900—1920 年美国土地价格飞涨，抢购土地成风。

当然，因为美国是一个地域十分广阔的国家，农业机械化的程度发展很不平衡，从地区分析，美国西部和北部机械化速度最快，特别是西部的加利福尼亚、中部大西洋沿岸和中央平原东北部发展最快。1910 年美国农场约有 38% 位于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土地上。20 世纪初，全国小麦生产中心向西迁移，转向南北达科他、内布拉斯加、堪萨斯等州，同它们毗邻的东部诸州形成了玉米带。1909 年仅艾奥瓦和伊利诺伊两州的玉米产量就占全国的 28%。为适应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需求，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东北部，农民们大力发展乳牛、家禽的饲养，开发水果蔬菜以满

①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 531—532 页。

足城市居民之需。西部地区随着开发的加速，原来发展较慢的农业也取得长足的进步，20世纪初太平洋沿岸各州在农业上开展多种经营取得成效，加利福尼亚州很快成为全国的水果生产基地。南部的农业在很快医治好战争创伤以后，抓住了工业革命的机遇，生产飞速发展，特别是棉花生产占有特殊地位。1909年南部农民的棉花产量为1060多万包（但是棉花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一直不高)。此外南部还生产烟草、稻米、蔗糖等等。

〔工业化和工业社会的形成〕　美国全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从南北战争结束后开始，历经数十年，到20世纪初工业革命最后完成，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就，在全国范围内工业迅猛发展，并从北部向南部和西部扩展。“大企业时代”取代了“小企业时代”。1865—1900年工业产品价值增长了500%，20世纪初增长率更高。新的工业部门和大型的工业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已最后占主导地位，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已经建立，工业城市相应涌现，基本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从国家的人口增长和结构变化也可见一斑。1860至1914年间美国人口增长3倍左右，在工厂工作的工人却增长了5.5倍，工业所创造的产值增长了12倍，投资在工业的资产增长22倍。1890年工业产值第一次超过了农业产值。

在经济领域，机械化程度的高低是衡量工业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20世纪初美国工厂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劳力，广泛采用先进的经过改进的机械。由于机械化程度高，工厂主们尝到使用机器的甜头。1902年一个英国访问团访美，其成员斯蒂门在参观后这样说：“美国工人并不比他们的英国兄弟干得更累，而是存在着使用最新改良机器的趋势：一台新机器应该在今天使用；更好的机器在明天出现，将生产更多产品；最好和最新的机器已准备好，而不管它的价格多少。”他又说：“（我们）使用机器是为了降低工资，而美国却意味着增加工资和减少工时，他们的雇主

鼓励工人这样做。”[1] 另一位英国代表认为美国雇主并不比英国雇主更爱他的工人，而是他认识到新式机器的效益。

美国实现工业化的另一个标志是从地域上看，全国性的工业扩张取得成效。美国北方的工业革命起步早，历经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有深厚的工业基础，但是美国南部和西部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大多数州以农业经济为主体。随着新工业革命的推进，工业化浪潮席卷南方和西部，呈现出一派全国工业化的新气象。南方本是美国最落后的农业地区，工业化程度低下，但是20世纪初的工业化浪潮也席卷了那里，南方出现了一个所谓“北方化”的过程。特别是盛产棉花的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纺织工业，1915年全美国棉花制品总量中60%是南方出产的。期间一些北方的工厂为利用南方出产棉花的优势纷纷迁至南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南方的钢铁和采矿也发展起来。特别是得克萨斯州石油的开采已成为20世纪初南方工业化的标志。路易斯安那的硫磺和其他化学工业得到发展，木材工业几乎在南方所有具备森林资源的各州发展起来。烟草工业也同样获得进展。一战前，美国南方已经初步实现了“北方化”，这是一种永久性的变化，因为这表明北方的工业之路已为南方所接受。诚如美国学者德格勒所说：“当然，事实上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工厂传入南方只是深入到南方生活的表层而已，因为对绝大多数南方人包括黑人和白人而言，土地和季节仍是他们生活的中心，正如他们的父辈曾经经历过的那样。但是，对于将来南方的工业化却是一件奇迹，它标志着南方熔入国家的开始，与农业传统决裂已经作出，按照北方的形象重塑南方业已开始。随着工厂进入城镇，黑人和白人慢慢

---

① 德格勒：《今从史出》，前引书，第244页。

地重塑农业的南方，正如他们一直在总体上重建美国文明那样。”① 20世纪初美国地区经济发生重大变化，一些落后地区迅速发展了工业，卷入全国工业化的潮流。

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在全国所有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等部门全面推进；就工业部门而言，它的各种产业都卷入这个过程。除了工业革命中所涌现的新产业外，传统产业也得到改造和技术更新。

工业发展规模巨大、资金雄厚是美国工业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到1900年大企业形式在美国经济中已占主导地位，矿产品总产量的86%和工业品的2/3都由企业所生产。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北方已经取得重大成果，但是并没有带来如20世纪初那样的工业化的深刻程度。只有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才给美国带来以大企业为特征的工业化的辉煌成果。其中的差异是现代工业和传统工业的差别，不但表现在规模和经营方面，更在内在的结构方面有重大差别。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巨型企业”不仅仅在企业的规模上、外形上远远超过以前的工厂，更为重要的是现代企业包含了许多独立的各不相同的运作单位，他们被一些不同等级的工薪行政者所管理。②

作为一个国家来说，是否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是判断工业化实现与否的重要内容。20世纪初的美国已经建立起独立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它的工业体系已经完全不依赖别国而能独立运转，具有独立的能源供应和机械制造能力，门类俱全，部门完整，因此能够生产出本国所需要的一切主要工业品，这个工业体

---

① 本段内容参见德格勒：《今从史出》，前引书，第256页。

② 查尔斯·卡尔洪：《镀金时代》，特拉华，学术资料出版公司，1996年，第10页。

系又具备持续发展的潜能和与外国竞争、接受挑战的能力。

20世纪初美国已完成了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实现了美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巨变。美国学者查尔斯·卡尔洪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他说："期间，美国人生活中的中心事件是国家从一个巨大的农业的、乡村的、孤立的、地方的和传统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工业的、城市的、一体的、全国的和现代的社会。这个进程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以前延续至1900年以后。"

他又说："20世纪初，美国在工业化世界中能够炫耀它规模最大的、发明最多、生产能力最强的经济。它的公民享受着地球上最高的生活水平。但是这些发展深深地引起了许多忧虑，这就是该时代许多政治纷扰的焦点。"[①]

有关美国工业化完成的时间美国学者见仁见智。[②]

〔现代铁路交通运输网络的完善和远西部的成功开发〕

一般而言，交通运输是美国工业革命的先行官，美国的经济腾飞依赖交通运输的完善和发展；工业革命取得的成果又直接推动交通运输业。如：美国钢铁工业的进展为铁路事业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为钢轨取代铁轨创造了物质条件。20世纪初，美国的交通运输网络在工业化进程中已经建成和完善。广袤的大陆已被纵横交错的铁路网连成一片。1900年，营业的铁路线已在19万英里以上，超过欧洲铁路线的总长度，几乎等于全世界铁路线的一半。铁路网的建成和铁路的延伸成了远西部开发的先决条件。可以这样说，随着铁路线的延伸，令人目不暇接的工业品和

---

① 卡尔洪：前引书，第9页。

② 有的美国学者将美国工业化完成的时间划在19世纪末，如：美国学者塞勒斯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决定性阶段在19世纪末完成的。"见查尔斯·塞勒斯等：《美国历史专题》，兰德·麦克纳利学院出版，芝加哥，1977年，第213页。

令人耳目一新的工业化信息被带到了僻远地区，工业化也随之在那里逐步开展，新的居民点和城镇开始兴起。铁路网的建立不仅对经济领域发生重大影响，而且有不可估量的社会意义，如：它还推动了美国现代广告业和邮购事业的发展就是明显的例子。借助铁路运输网络，艾伦·蒙哥马利·沃德开办邮购公司取得极大成功。理查德·沃伦·西尔斯利用铁路火车站代理人的有利条件兴办邮购公司后发展为庞大的商品零售公司，该公司发行的商品目录不仅数目惊人，而且影响巨大，甚至成为农民们喜爱和经常使用的“圣经”。铁路网的建成和完善促进了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带动了西部的开拓，刺激了钢铁工业、能源开发等等，带动了整个美国工业化历史进程。

在铁路线蜿蜒曲折向西推进和移民辛勤开发西部的过程中，陆地“边疆”逐渐消失。189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宣布美国人长久熟悉的边疆已经消逝，因为“原先无居民的地区现已被一块块孤立的定居点插入，很难说还存在一条边疆线”。当然边疆的消逝并不意味着西部开发的完成和结束，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却标志着西部深度开发和工业化的开始。1898年以后，远西部在前数十年开发的基础上继续拓展并取得可喜成绩，它们开始熔入全国工业化的大熔炉之中。西部边疆的消逝意味着印第安人的灾难。目睹印第安人状况的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威斯勒这样写道：“保留地给了印第安人一个天堂。从某种意义上，他成了集中营地的囚犯，虽然他的头皮是安全的。他可以享受免费医疗和教育。当然，印第安人远无幸福……因为征服者的脚踩在他们的脖子上。”[①] 90年代以后印第安人基本上停止了武力反抗。北美洲

① 罗德门·保尔：《远西部和大平原的转变：1859—1900》，哈珀和罗出版公司，纽约，1988年，第138页。

最早的居民开始成为美国的最新公民。

20世纪初，美国远西部在以前几十年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一个突飞猛进的新阶段，隆隆机器声代替了往昔的宁静，边缘地区呈现工业化的勃勃生气。就拿美国和墨西哥边疆地区来说，在沿着美墨边疆，从南得克萨斯经南加利福尼亚的广袤边地，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里发生了决定性变化，随着铁路的延伸，这些原来非常孤立的地区被卷入美国国内市场。南得克萨斯州棉花和蔬菜取代了原来的农产品得到大幅度增长，冶炼厂在埃尔帕索建立，铜矿在亚利桑那开挖，南加利福尼亚蓬勃兴起农业水利事业，由于铁路建筑和工业兴起，大量廉价劳动力随之而来，人口激增，1900年以后，更是成倍增长。

矿业的兴起一直是远西部得以开发的机遇。90年代以后由于铜矿的开发，使亚利桑那州和蒙大拿州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的进程。"铜业大王"马克斯·戴利在蒙大拿州比尤特附近的阿纳康达开发铜矿，成绩卓然。他在1895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铜矿生产商，1900年去世时在蒙大拿的财产值高达2500万美元。同年，他还在扩大他的矿业，正在建造带有世界上最高烟囱的最大熔炉。后来美国企业家古根海姆父子在1901年购得美国冶炼公司控股权，继续在那里开发铜矿事业。道格拉斯城市的建立也是因冶炼业而发展，该市地处亚利桑那州东南部，1900年建立时是炼铜中心，后为墨西哥入境港。美国工业化推动远西部的开发，远西部地区根据本地区特点发展自己。

农业是远西部的重要经济部门，农业机械化和水利灌溉使农业得到进一步提高，也成为远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如：索尔特河谷的水利灌溉推动了农业发展也带动了其他产业和人口的增加，该地区就逐渐发展为一个城市，成为该领地最大的城市——菲尼克斯。加利福尼亚的发展更是同农业和采矿业联系在一

起，特别是后者。采矿技术的改进使加州颇获声望，“虽然不是在加利福尼亚发明的，但是挖矿在加州改进得如此之速因而从1898年始，‘加利福尼亚式’挖矿技术被广泛推广使用。加利福尼亚制造的设备出口到世界各地，与此同时加州的金产量远远超过其他各州的总产量”。①

在淘金热中兴起的城市丹佛，地处大平原的西缘，1906年建成美国造币局丹佛分部，生产全美国钱币的75%，成为美国第二大金库。一位到过美国远西部的英国人在1898年写道：“美国变化进程速度如此之快以致企望得到一本指南书……几乎毫无用处。丹佛市以这样的速度改变着它的外貌：这种速度已被解释成为……今天只能行走马匹的小道，明天就成了公路，后天就变成了铁路。”

远西部的开发成功是美国工业化蓝图上的一道绚丽的风景线。

〔世界工业强国地位的巩固〕　工业革命的完成和工业化的实现使美国很快成为世界工厂，世界工业强国的地位获得巩固。美国从19世纪50年代起到19世纪末，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4年其增长已超过20倍。1890年美国工业制品的总值超过农产品的总值，标志着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已占主导地位。1900年工业制品价值超过农产品价值2倍多，农业社会让位于工业社会。

新世纪初，美国工业在世界上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860年，美国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生产的第4位，1894年已跃居第1位，生产量等于欧洲各国生产总量的一半。20世纪初美国在工业上的优势更为突出，1913年工业产品已占世界工业总产品1/3

① 罗德门·保尔：前引书，第260页。

以上，比英、法、德、日四国工业产品总量还多。美国的世界工业强国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美国凭借其强国地位和经济实力积极扩大对外贸易，把美国制造的产品打进了世界市场，1897年以后美国出口大大超过进口，每年约有5亿美元的顺差。并且在对外贸易中美国的产品结构发生变化。原料出口额逐步下降，从1866年的70%下降为1914年的40%；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出口比重从1866年的16%上升为1914年的48%，主要出口商品是钢铁、木材制品、精炼油、铜制品、小汽车、农业机械等等。

美国外贸发展迅速的根本原因应归功于美国工业化的巨大成就。1901年一位美国学者在他的书中写道："我们在商业上已经打入世界上每一个市场。它是我们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我们正迅速迈向世界经济霸权。"[①] 20世纪初年，全球各地几乎都可以看到和买到美国货。美国出口商品的价值1895年是8亿美元,1914年迅速增长为23亿美元,增长了240%,在这短短的20年里,单是工业制品的出口就增长了几乎500%。美国生产的石油和铜一半出口国外。西方多数人在使用"美国制造"的商品，东方人也开始购买美国货，因此出现了世界"美国化"的说法。1901年，一位名叫威廉·斯蒂德的英国人在描绘世界美国化时说："在英国国内生活中，我们已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早晨，一个普通人从新英格兰制造的床单上起身，他用'威廉斯'香皂和杨基保险剃刀刮胡子，在穿着北卡罗来纳短袜的脚上套上波士顿靴子，扣紧了康涅狄格吊带，轻轻地把沃尔瑟姆[②]（Waltham）或沃特伯里[③]

---

① 埃米里·S·罗森伯格：《美国梦的扩展：经济文化扩张1890—1945》，纽约，1982年，第22页。

② 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城市，该市的沃尔瑟姆钟表公司曾是世界最大手表公司之一。

③ 美国康涅狄格州西部城市曾有发达的钟表工业。

(Waterbury) 牌手表放入口袋，然后坐下进早餐。此时，他会对夫人穿的伊利诺伊前胸挺直的紧身胸衣和外配的马萨诸塞的短外套称赞几句。接着他就开始吃早餐了：用大草原面粉做的面包……巴尔的摩来的罐装牡蛎和堪萨斯小熏猪肉，而他的夫人则享受着薄薄一片片的芝加哥牛舌，孩子们得到的是'魁克'[1] (Quaker) 麦片。同时，他还阅读着由美国机器用美国墨水印制在美国纸上的晨报，也许还是纽约市一位聪慧的新闻记者编辑的呢。"[2] 这话虽不免有些夸张，但却生动地反映了美国货在英国被广泛消费的情景。

美国不仅将自己的工农业产品打入世界市场，使美国货遍及全球，而且开始积极将资本投入国外。1898 年时美国在国外总投资额只有 6.845 亿美元，1914 年，增加到 35.138 亿美元，几乎增加了 5 倍多。

如果说 19 世纪英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不久就成为"日不落"的世界工厂，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 世纪初美国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工业化以后，就已把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抛在后面，成为世界的头等经济强国了。

三、城市化的初步实现

所谓城市化一般指人口集中到城市或城市地区的历史过程，具体表现为城市人口的增长和人口分布向城市地区集中。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初步实现了城市化。美国学者 J·斯特朗曾在 1898 年出版的著作中，在分析了当时美

① 美国著名魁克麦片公司生产的产品。
② 埃米里·S·罗森伯格：前引书，第 15 页。

国农村人口大量移入城市的三大原因后，预言："在美国城市人口对农村人口占绝对优势以前，不会很久，我们就将是一个城市国家。"① 果不其然，20世纪初美国就成了"城市国家"。

根据美国统计局的统计，1860年美国总人口为3149万人，其中城市人口为620万，城市人口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9.8%；1900年，总人口为7590万，城市人口为3010万，占39.7%；1920年，总人口为10570万，城市人口为5410万，占51.2%。从城市人口的增长可以推测美国城市化在1920年基本实现。

20世纪20年代，美国土地上星罗棋布的大中小城市被发达畅通的交通体系串联一起；美国东西南北各地和两洋沿岸的土地连成一体，交通线上的大小城市宛如串连一起的透亮珍珠，城市越来越成为美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中心。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开展基本同步。如果说19世纪下半叶，大批美国新城市勃然兴起的话，那么20世纪初的20多年里，美国基本完成了城市化的进程。

〔大西洋沿岸老城市的新发展〕　大西洋沿岸老城市的新发展是美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人口的变化是城市发展的尺度。如：纽约1860年人口为117万，1920年已为562万；费城在1890年人口就超过了100万。

东部城市化不仅表现为城市人口迅速增长，而且在城市的性质和功能上也发生某些变化。纽约市从一个普通商埠，在1870年成为国际性大都市，1920年一跃而为国际金融中心。② 1910年在大纽约地区，产值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制造公司528家，有100万资产以上的托拉斯公司44个；美国两大财团——摩根财

① 《美国年鉴》，第12卷，第217页。

② 详见林广博士论文：《移民与纽约城市发展》，1998年，华东师范大学。

团和洛克菲勒财团都以纽约为大本营。纽约的华尔街成为全国甚至是世界的金融街。纽约内部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原先比较发达的第二产业如机器制造、造船业等开始让位于服装业、运输业和建筑业等；整个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通讯信息、商业、金融保险等取得显著地位。纽约还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20 世纪初随着移民高潮的到来，大量移民涌进城市，导致居民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移民所占比例之高在美国城市中首屈一指。

20 世纪初的纽约已经形成了现代国际大都市的某些特征。1898 年 1 月 1 日大纽约正式成立，城市面积扩大为 320 平方英里，拥有人口 330 万，包括布鲁克林、昆斯、布朗克斯和斯塔滕岛，开始向世界性大都市发展，年财政预算达 90 亿美元。当时曼哈顿已建成一批拔地而起、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1908 年建成 47 层高 169 米的大厦，为当时世界之最。1907 年 50 层的都市生活塔楼高耸纽约，1913 年的伍尔沃斯大厦建成开创了摩天大楼的新风格和新潮流，高 238 米，58 层。1920 年，克莱勒斯大厦建成，高达 318 米，超过法国巴黎的艾菲尔铁塔，创世界最高建筑物的记录。1929 年，纽约已兴建了 188 幢摩天大楼。美国发明家欧文·W·科耳班使用窗玻璃机生产大块玻璃，被誉为“第一部可以把窗玻璃连续拉制成任何宽度的机器”，1916 年他又完成了连续生产平板玻璃的方法。在此前后美国的摩天大楼开始采用大块玻璃建造窗口。美国摩天楼建筑中的第一个大学派芝加哥学派，除了在建筑中初次使用钢铁外，还以最早应用玻璃著称。如：芝加哥 1899—1904 年卡森·皮里·斯科特大厦就是以其“芝加哥式窗子”而著称。大厦的墙壁全是透明的平面玻璃，蔚为壮观。纽约市的建筑物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时，玻璃和钢铁混合的新建筑物也应运而生，1904 年建成的辛格·罗夫特大厦，其主楼

矗立在百老汇大街上，这是“创造性地把彩色赤土、玻璃和钢铁揉合在一起”的杰作。在高楼林立的纽约市，纽约时报广场成为城市中心，白天这里车水马龙，人流奔腾；夜间灯火辉煌，流光溢彩，橱窗通明，犹如一颗夜明珠。[①] 摩天大楼的建立反映了纽约商业、金融业和其他的企业行为的繁荣和发达。

现代市内交通系统的建立也是国际大都市的标志之一。20 世纪的头 20 年里，纽约、芝加哥、费城等大城市在这方面取得令人惊异的成绩。以纽约为例，1883 年后市内交通网络建设中最令纽约人惊喜的是连接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大桥的建成，这是一条 1 英里长的铁桥，有 2 条铁路线、4 条公路线、1 条人行线。1904 年，由于电气铁路的改进，纽约建立了第一条地铁线，从市政厅到第 145 街。1913 年纽约建成大中央火车站。当时火车代表最伟大的进步，而城市的火车站则象征着城市的现代化。后来纽约—纽黑文—哈特福德铁路公司在 1907—1914 年首先在纽约与纽黑文之间的铁路线上实现电气化。

重要的文化设施的建立也是城市化不可或缺的内容。美国最大的市立公共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于 1895 年建立，该馆中央大楼位于 42 号街与第 5 街的交叉处，1911 年正式对外开放。这座古典风格的建筑物里珍藏着包括《独立宣言》在内的许多珍本。1902 年，一座色彩艳丽的哥特式建筑物，坐落在纽约中央公园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心馆）建成。1919 年，纽约每日新闻创刊。1892 年纽约植物园由哥伦比亚大学植物学教授纳撒尼尔·洛德·布里顿建立，1900 年正式对外开放。1911 年布鲁克林植物园建立。

总之，纽约市的发展可以成为东部沿海大城市的代表。“纽

---

① 参见林广博士论文。

约无可争辩地作为全国的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进入了 20 世纪。城市的发展极大地依赖于技术的改进。1904 年蒸汽铁路被电气铁路取代，新的水利资源正获开发，钢结构迅速增长，第一条地铁建成，城市本身正使自己组织成为一个超乎寻常发展的城市”。①

伟大的法国建筑家科比西埃赞扬说：“(纽约) 是一个变化进程中的城市。今天它属于世界。出乎任何人的预料，它已成为世界城市皇冠上的宝石，是豪华城市的皇冠，它是柔和的珍珠，或闪闪放光的黄玉石，或光芒四射的青金石，或令人伤感的紫水晶！纽约是一颗伟大的钻石，沉甸甸的，不加修饰的，光芒闪耀，扬扬得意。”②

犹如纽约一样，20 世纪初美国大西洋沿岸和中部的其他城市，华盛顿、费城、波士顿等也经历了与纽约相类似的经历，构成了美国初步实现城市化的一幅绚丽画面。华盛顿作为美国首都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获得迅速发展。19 世纪末，该市的人口、面积、建筑大为增加。朗方设计的国会大厦和白宫均吸收了巴罗克式建筑风格。城市体现了美国政治中心的庄重和独特的风格。

费城一直是宾州的工业中心，也是教育中心。内战结束后，进入了第二次繁荣时期。继 1876 年建国 100 周年博览会后，20 世纪初又开始规划道路系统改善交通的问题。1914 年贯通全城长 7 英里的罗斯福林荫大道建成，1918 年富兰克林林园大道建成竣工，将费城的贯通南北的主干线和风景区——费尔芒特连接起来。特别是地铁的建成更具有意义，1907 年第一条地铁完工，

---

① 《美国年鉴》，第 12 卷，第 37 页。

② F.R. 维利斯：《西方文明：城市透视》，第 2 卷，D.C. 希斯出版公司，马萨诸塞，1977 年，第 502 页。

第二条接着在1908年开通。1922年开始兴建的现代化悬吊式大桥于1926年飞架特拉华河上，命名为本杰明·富兰克林大桥。[①]

波士顿是由老城镇发展而成的。19世纪后半叶开始，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和商业取代了原先的海上贸易成为主要行业。该市第一条地铁于1897年建成。波士顿的文化建设在美国是闻名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有新的建树和业绩，除了以前所建的著名高等学府外，1898年建立东北大学，1906年建立萨福克大学，1895年建成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图书馆大厦，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风格，上饰著名壁画。

〔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城市化〕　太平洋沿岸的城市发展在美国城市化进程中具有全新的美国特色和最重要的意义，这些城市的开拓和发展成为城市化的新方向，对美国西部经济的繁荣起了决定性作用：使“西部城市网”基本形成和进一步完善。该区域的中心城市旧金山从淘金热开始兴起以来，发展迅速，19世纪末成为美国太平洋区域的大商埠。在原有工业基础上，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旧金山不仅城市规模随之扩大，而且工业部门发展均衡、全面，具有很强的适应性。1900年，在全国15个工业城市中按工业产量和产值已经排名第9。主要工业部门有制糖、冶炼、机械、建筑、制瓶、酿酒、成衣、面粉加工、印刷等。1906年大地震以后旧金山人民重建家园。1915年旧金山以崭新的面貌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一展旧金山人民的风采，既提高了城市知名度又促进了该地区的工业发展。

洛杉矶得益于地产业和石油开发。1892年洛杉矶市内发现石油，1897年已开挖油井2300口，不久石油产量激增，连同2

---

① 参见王旭、黄柯可主编：《城市社会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53、254页。

个邻镇一起1902年共产石油900万桶。随着石油开采的兴旺，洛杉矶人口迅速增长，1900年该市人口为10.2万人，1920年为57.6万人。20年中增长了5倍。1901年，一位美国学者说："洛杉矶某一天会成为全国性的大都市，这并非梦想，而是现有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① 本世纪20年代以来，"好莱坞"的建立意味着电影创作业的兴起，电影创作业很快成为洛杉矶的基本产业之一，它不仅成为洛杉矶的一大文化特色而且也对美国文化作出了独特贡献。1914年巴拿马运河开通更给洛杉矶的海运业务带来机遇。在城市化浪潮中洛杉矶显示了它的巨大魅力。

20世纪初，西雅图已发展成为"太平洋皇后城"。这同西部的深入开发特别是西北部各州的林业开发和木材远销有关，1897年阿拉斯加出现的淘金热又为它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机。1900—1910年间该市开展了削平丹尼山、填平城市西部洼地的大型工程，取得成效。1912年西雅图的进出口总值超过新奥尔良，成为美国第5大港市。1909年西雅图举办了阿拉斯加—育空太平洋展览会获得成功，吸引了375万观众。1916年组建的波音飞机公司为日后西雅图的飞机制造业奠定了基础，成为该市的支柱产业。在城市发展中，西雅图人所创造的"西雅图精神"成为一股强大的推动力和精神力量。

〔西部城市化的历史进程〕　美国的老中西部——大湖区是一个工业区，其中密歇根州是最具代表性的。20世纪初，密歇根经济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工业领域从开采转为加工，经济领域由农业转向工业，从农村转为城市，这些变化反映了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要进程。该州的底特律一直是汽车的同义词。

① C.D.威拉德：《洛杉矶先驱史》，洛杉矶，1901年，第362页。转引自王旭：《美国西海岸大城市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9页。

1914年1月5日，汽车大王福特宣布给雇员一天发5美元工资（2倍于通常工资），次日就有万名工人要求到福特工厂就职。从此底特律改变了往日的面貌，人口激增，经济繁荣。汽车工业“制造”了一个新城市。这是一个新产业造就了一个新城市的典型。

芝加哥是大湖地区最大的城市，也是中西部新崛起的大城市的典型。它地处美国的心脏，一直被认为是美国社会的缩影。1871年大火以后，芝加哥人重建家园，再塑城市新貌。芝加哥人口在1860年为10.9万人，1900年高达200万，位居世界第五，1920年已达270万人，成为美国社会多方面的中心。1880年电梯发明并投入使用以后，使建造高层建筑由理想成为现实。19世纪末以前，多幢摩天大楼在芝加哥已经高高矗立，1899—1904年又建造了由当代“摩天大师”路易斯·沙利文设计的斯科特商厦等摩天大楼，“它不但在时间上，而且在风格上跨两个世纪，是传统风格和现代风格的非凡结合”。[①]

20世纪初，在芝加哥建造摩天大楼成为狂热，《芝加哥论坛报》为庆祝该报创刊75周年决定兴建一座“永恒的”报业大楼，1922年在世界上悬赏10万美元征求设计方案，后在260个方案中选中了一个由美国人约翰·米德·豪厄尔和雷蒙德·胡德设计的方案——哥特教堂式的芝加哥论坛报大厦，于1927年建成。同时在20世纪初芝加哥也揭开了“城市美化运动”的序幕。美国建筑师、美国建筑师协会主席丹尼尔·伯纳姆在1907—1909年与贝内特合作制定了芝加哥城市规划，史称伯纳姆规划，规划具有远见卓识，主张在城市周围和湖滨地区保留一圈森林地带，沿密歇根湖建立公园区，加宽主街道和建立市政中心等。这是现代化

---

① （美）悉尼·利布兰克：《20世纪美国建筑》，中译本，许为础等译，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14页。

城市的重要内容。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芝加哥已成为世界建筑创新中心，走在城市建筑现代化的前列。

如果说在城市化进程中大西洋沿岸的老城市表现为变“高”长“大”，由商业中心转向工业城市的话，那么西部和远西部的城市化则表现为大批新兴的中小城市的扩建和发展，它们犹如串串葡萄长在美国西部广袤的原野上，或铁路线两旁，或矿井四周，或大河上下，形成美国 20 世纪初城市化初步实现时期的壮丽奇观。如：采煤工业造就了西弗吉尼亚州的小城镇的发展。1870 年该州仅开采 60 万吨煤，1912 年产量上升到 6700 万吨。

地处中央的俄亥俄州，在西部人的眼中它属于东部，在东部人看来它属于西部，该州的克利夫兰是一个移民城市，最早的移民是新英格兰人，后来是爱尔兰人。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大批德国人、爱尔兰人、威尔士人、法国人、苏格兰人、波希米亚人、犹太人、波兰人、斯洛文尼亚人、立陶宛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等等来到这里，烧高炉，炼石油。因此人口激增。1860 年仅 4.3 万人，1910 年已激增为 56 万人。1914 年这里成立的克利夫兰基金会是美国成立年限最长、规模最大的地方基金会。

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 1899 年因伐木业兴盛而大获发展，后来面粉业继而成为主要行业。1860 年人口仅为 0.25 万人，1900 年已达 20.2 万人，1920 年为 38 万人。

肯塔基州最大城市是路易斯维尔，19 世纪 80 年代路易斯维尔和纳什维尔铁路延伸到佛罗里达的杰克逊维尔。该市后来成为美国威士忌酒和卷烟的主要产地之一。

新奥尔良是路易斯安那州的最大城市，曾是密西西比河的出海口。有较长的历史。19 世纪初是它的黄金时代，20 世纪初因受铁路交通冲击一度衰败，1840—1900 年从美国第 3 大城市降为第 12 位。后因驳船和拖船的出现，河运复兴，进行城市改造重

获新生。

普赖斯市是美国犹他州中部城市，1877年由摩门教徒所建。1883年铁路通车后发展迅速。1892年设建制，以采煤、牧业和农业为主。

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在1923年建立了乡下俱乐部广场，是美国第一座完全按照规划建立起来的购物中心。

俄克拉何马州的塔尔萨市，建于1879年，起初是穿越印第安领土的马车驿道上的一个邮局所在地，直到1905年它的名字仍是塔尔萨镇，一个居民这样说："我们穿过那里时得躲避四处游逛的猪、羊和牛，有时野兽也会走到城里来。"① 但是1906年附近的高质量的格伦石油矿的发现给它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石油公司的总部设在那里。城内建有小摩天楼。在西部的其他城市里，一些小摩天楼也在渺无人烟和广阔无垠的草原上耸立起来，美国人建造的摩天楼是工作和生活用房，成了人类能力的最高象征。

远西部的丹佛市更是一个新兴城市的典型。中西部一些新兴小城市因规划在先，建筑于后，所以整齐划一，状如棋盘，市中心是一条主街和主要市政建筑物，其余街道南北东西交叉。

中西部（包括太平洋沿岸）在全国城市化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初，美国城市化的中心地区就在那里，全国10大城市中有4个在中西部，芝加哥名列前茅，成为全国第二大城市。

〔相对缓慢的南部城市化进程〕　与其他地区相比美国南方地区的城市化速度显得缓慢和滞后，总体水平较低。如密西西比州除了杰克逊、海湾沿岸和该州西北的孟菲斯外，几乎没有几

---

① 尼尔·彼尔斯、杰里·哈格斯特洛姆：《美国志：五十州现状》（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8年，第860页。

个可以被称为是非常城市化的人口集中地。尽管如此，南方地区城市化还是取得可喜成果并富有特色。一些城市兴起的规模和速度在全国也令人刮目相看。如：伯明翰是亚拉巴马州的第一大城市，是南部的“匹兹堡”。它是在内战以后工业发展的年代里兴起的，逐渐成为美国南部钢铁中心。1880 年仅为 3000 人，1920 年为 17.8 万人。纳什维尔历来是中南部的一个贸易和金融中心，产生了一些极其富有的大家族。1860 年人口 1.6 万人，1920 年为 11.8 万人

佛罗里达的城市化在南方地区中颇具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佛罗里达的真正历史是在 19 世纪 80 年代第一批大投资者到来之后才开始的。他们就是美国金融家亨利·弗拉格勒（1911 年前一直任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董事）和亨利·普兰特。普兰特则耗资 300 万美元兴建坦帕湾旅馆，并于 1891 年开张。弗拉格勒在圣奥古斯丁修建庞斯·德·里昂旅馆，后又将铁路修到棕榈海滩。1904 年他投资修建的跨越亚热带礁群的海上铁路工程开始进行。1912 年，82 岁的他乘坐第一列火车从杰克逊维尔到基韦斯特，目睹途中经过的许多桥梁和海上路段。

佛罗里达的城市化与旅游业的发展分不开。该州大城市迈阿密完全是一个人工拓造出来的豪华旅游休养中心及工商金融大都会。1912 年还是一片红树林沼泽，1913 年已有 1.1 万居民，每年游客 1.25 万。1920 年迈阿密已有居民 2.9 万人，“成为一个初具规模、以阳光和海滩为特色的旅游城市”。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流行阳光有利健康的说法，北方人大量涌入迈阿密，交通的便捷也有利人们南来度假。地产商们利用佛罗里达州当时尚未开征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的优惠条件，掀起一股地产大推销和投机买卖热潮，1923—1926 年达到高潮。由于旅游业的发展，佛罗里达州的人均收入在 1928 年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74%。

如果说佛罗里达靠旅游业兴建和发展了城市，那么得克萨斯州的城市化是在石油开采的推动下进行的。该州的第一次石油大发现是在1901年1月，在一个叫斯宾德尔托普的不显眼的土岗上，黑色的油浆汹涌地喷射出来，从此石油开发商涌进了墨西哥湾沿海地区，德士古和海湾这样的石油大公司诞生了。休斯顿的崛起也与石油开发结下不解之缘。它的地理条件差，多泥泞沼泽，气候炎热，经常遭受流行性黄热病的袭击。该市前商会执行副会长马文·赫尔利曾评价说："这是任何人所能找到的最不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建城地点。"[①] 它的大发展是从1901年发现石油开始的，斯宾德尔托普使休斯顿成为一个巨大的石油中心。工业大幅度发展起来，大大促进了城市扩大和繁荣。1914年休斯顿航道通航，更为城市的兴旺发达带来新的机遇。该运河长81.3公里，深11米，最小宽度90米。航道水深且河面宽阔，可容纳远洋轮船。在吨位上休斯顿港仅次于纽约和新奥尔良。后来这个深水港使休斯顿成为全国自由贸易的鼓吹者。许多国家在这里设立领事馆。

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在内战后成为带有传奇色彩的西部的第一座牛城，是赶牛路线的基地。20世纪初成为得克萨斯最大的城市和金融中心，后被休斯顿和达拉斯所超过。该城的多数建筑建于本世纪20—30年代。"圣安东尼奥属于得克萨斯，但是它在某些方面又超越了得克萨斯"。1914年这里建立了动物园和水族馆，占地面积为20公顷，园内有天然喷泉和岩壁，有大量野生动物和鸟类，是美国东南部最好的动物展览点之一。得克萨斯州北部城市达拉斯19世纪70年代铁路通车后商业获得极大发展。1907年组建达拉斯棉花交易所。随着城市发展，达拉斯人口从1880年的1万人，发展到1920年的15.8万人。一些文化设施也随

① 尼尔·彼尔斯、杰里·哈格斯特洛姆：前引书，第899页。

之建立，1904年建成市立动物园，占地20公顷，以爬行类动物为特点。此外，南方还涌现了一些富有特色的中小城市。

〔全国城市化程度的差异和城市化带来的负面效应〕　美国城市化的速度是相当快的。1790年美国只有6座8000或8000以上人口的城镇，1890年已发展为449个，1910年已猛增为778个。但是由于美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国土广大的国家，不同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呈现不同特色，发展很不平衡。马萨诸塞州的城市人口占该州总人口的92%以上，纽约为78.8%；但北达科他州和密西西比州的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1%。就全国而言，平均城市化率为45.7%，100万人口以上城市为3个，50—100万人口城市为5个，25—50万人口城市为11个，10—25万人口城市为31个，5—10万人口城市为59个。另一个资料显示，1910年美国最大的25个城市中，南部地区仅有4个，即路易斯维尔、华盛顿特区、新奥尔良和巴尔的摩。但是南方新兴城市的人口增长率很高。1900—1910年，休斯顿人口增长76.6%，达拉斯增加116%，伯明翰增长245%。[①] 值得注意的是中西部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初，全美国的主要城市化中心就在那里，全国10大城市中有4个在中西部，芝加哥名列前茅，位居全国第二。

这种城市化程度的差异与美国自然地理的横断面极为相似：东西（阿巴拉契亚山脉和大西洋沿岸，科迪勒拉山系和太平洋沿岸）两边高，中间低洼；北部高，南部低。城市化的程度大致符合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中部农业地区经济相对滞后的特点。也即城市化和自然条件有着重要关系。这同人类历史上一般城市发展有着相似的轨迹，沿海或河口总是人类聚居之地，也是与外界沟

①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371—372页。

通交流之处，因而商业发达，人口众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北方开展工业革命较早，在南北战争前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因此这次工业革命中产生的产业，如：纺织业、采煤、炼铁、制糖、造船、机器制造等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的工业城市较多。南方在重建后进入了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的历史进程，起步晚。有些城市人口的增长并不是自然增长的结果，也不是由于国内农民大量进城所致，而是因为大批国外移民的直接进入城市造成的，这在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各州中最为突出，也是造成一些地区城市人口激增的原因。

正如人类历史上一切发展进程一样，城市化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给人类带来巨大裨益的同时也必然会产生某些负面效应，也许这是因为人类每征服自然一步，自然必然会向人类进行一次报复的结果。诚如美国学者韦伯所言："城市，作为进步的焦点，不可避免地包含好与坏两方面。"① 这种负面效应表现为社会性的和自然性的两个方面。社会性主要是指城市化给人类带来社会方面的负面效应。在一些大城市，特别如纽约、芝加哥等等大都市，在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的同时又生成了既脏乱又贫困的贫民窟，工业区的人类生存条件受到严重威胁，由于大城市的不断"扩大"，城市社会问题和城市病与日俱增。纽约形成了黑人聚居区——哈莱姆。本世纪 20 年代，哈莱姆居住了 17 万黑人、4 万多波多黎各人。由于人多房少，加上周围街区阻止该区居民外移，这里人口拥挤，失业率高，卫生条件极差。诸如哈莱姆这样的区域在美国各个大城市都有，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城市化后出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贫富悬殊。据 1910 年调查，波士顿不熟练工人每周工资只有 9—12 美元，而且一年内失业多天都没有收

① 卡尔洪：前引书，第 108 页。

入。但是在城市的另一端却存在着只占美国家庭总数1%的工商界巨头，他们的奢侈生活与贫民窟居民饥寒交迫形成鲜明对照。

城市化的负面效应在自然方面主要表现为：1. 工业城市产生了各种污染。其中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光污染等等。如城市交通发达导致大量汽车的使用，因而产生大量的废气和噪音；工业污水产生水污染使城市内河河水变质发黑；摩天大楼上使用过多的玻璃造成过量光线折射产生光污染；城市人口密集每天产生的垃圾，特别是其中的化纤品同样造成严重环境污染。2. 工业发展引起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特别是新兴工业城市的出现，自然资源大量被无节制、无计划地开发利用造成资源浪费，如木材的滥砍滥伐，野生动物的滥捕滥杀，或因城市的高楼大厦的无序建造致使绿地面积大量减少，甚至使城市变成一座死气沉沉的“水泥森林”。1898年一位英国旅游者是这样描绘匹兹堡的：“白天烟雾弥漫城市上空，晚间河岸边是一片高炉发出的火光。它（匹兹堡）坐落在两条河流的汇合处：莫农加希拉河流淌着污浊的黄色水流，阿勒格尼河则河水发黑……因为这里发现了煤矿、天然气和铁矿，所以工业已经失去控制地发展起来……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杂居一处，穷人们居住在租来的陋屋或是匆匆搭建的或毫不考虑道路和位置的棚户中，他们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一间新房。这是一个最杂乱无章的城市，但是至今还没有一种要求条件变得健康和体面的公共精神或大众意识。”①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城市问题已经凸现，1898年一位美国社会福音布道者就说：“20世纪的问题必将是城市。”② 美

---

① 雷蒙德·莫尔：《新城市：工业时代的城市美国，1860—1920》，哈兰·戴维森出版公司，伊利诺伊，1985年，第3页。

② 同上，第194页。

国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敏锐地洞见污染和生态问题。芝加哥一些专家早在 19 世纪末就提出美化城市运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执政期间力图在保护自然资源方面有所作为，因此他在任内曾为保护自然资源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国家土地的锐减，美国国会授权总统用 15 年时间将剩余土地转为国有森林，结果罗斯福用了 7 年时间转变了 7800 万公顷土地，为后代保存了公园、矿藏，包括石油、煤田，还有水利资源。1909 年美国建立了第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1916 年国会设立国家公园管理局。努力克服城市化带来的负面效应。

〔*20 世纪初美国城市化的特点*〕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美国人根据本国的国情走了一条美国式的道路，既具有世界城市化的共同特点，又有美国特色。美国的国情主要是：第一、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因此美国城市化的道路和移民的迁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二、美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因此美国城市化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展互为因果，相得益彰；第三、美国是一个不断从东部向西部推进和开发的国家，它的城市化与西部开发同步而行。因而形成了以下特点。

第一，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在世界史上城市化包含两个过程，即前工业时代的城市化阶段和现代城市化阶段。后者与工业革命不仅紧密相连而且形成为两个互动的社会发展过程。即使是美国东部，城市化起步较早，但是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整个国家发展起点高、历史短，它不是在人类古代社会的基地上而是在近代文明基础上建造起来的国家，所以美国东部老城市的发展仍属于现代城市化的阶段。如纽约、费城、波士顿等城市的发展与美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基本同步，较之于世界其他古文明地区的城市化，表现了年轻、跳跃的特点。20 世纪初，美国城市化具有新的特点，即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程同步进行。美国第

二次工业革命开展于内战以后完成于20世纪20年代，约为半个世纪左右。美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基本与此相符，大批西部新兴城市崛起和高速发展在19世纪后半期以后，特别在70年代以后，并在20世纪20年代初步实现了城市化。工业革命的基本完成和城市化的初步实现是一个互动过程，工业发展推动了城市化，城市发展促进了工业化。如：第二次工业革命进程中的新产业部门的崛起直接导致新兴工业城市，大大小小的“钢铁城”、“汽车城”、“石油城”、“石化城”、“电影城”等的大量涌现。工业革命改变了交通运输工具，建立交通网络，电气火车取代蒸汽火车，汽车的普及等等，促进了城市的扩大和某种郊区化的趋势，使城市规模成倍扩大。由于钢材和大块玻璃的使用和电梯的发明，城市建筑发生重大革命，摩天大楼耸立大地，城市的商业中心与日俱增。巨型企业的出现和工厂规模的巨型化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反之亦然。城市规模的扩大促使劳动力的大量集中，也使多种产业得到综合发展，又为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的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发展空间，提高了人们的文明程度，使培养大批专业人才成为可能，在发展综合实力方面占有优势，成为推动新科技革命的强大动力。大城市的出现和发展为扩大内需和增大国内市场提供了最有效的形式和最广阔的空间和场所。工业发展不仅促使城市扩大，也促使中小工业城市的建立，促使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此外，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的自来水、污水排放、卫生设备的制造和空调设备都在20世纪初应运而生，这既是工业化的产物，也是城市化的条件。

第二，美国城市化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首先是老城市新发展——东部大城市向现代都市演进。20世纪初美国城市化进程中，东部大城市的发展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这些城市可以纽约为

代表，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这些城市在规模上、功能上、外貌上都发生了部分质的变化，而且较早地遇到并逐步探索现代城市化中出现的新问题。20世纪初，纽约、费城、波士顿的规模都已大为扩展。1898年纽约成为大纽约以后，无论在城市人口还是城市区域都呈现出成倍增长的速度。在功能上，这些老城市都由原来的商业城市发展成为复合型的工业城市（既有传统工业又有新兴工业），成为多功能的综合性城市，或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或为地区金融中心，或为全国经济中心，纽约更是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跻身于巴黎、伦敦等世界大都市之列。城市面貌随之发生巨大变化。摩天大楼成为纽约的标志性建筑物。市内交通运输向地下和天空的立体型发展，立交桥和地铁先后出现。在城市化过程中也出现了新问题，如：贫民窟问题，城市犯罪问题，工业污染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对其他后发地区的城市化有一定借鉴意义。

其次是城市化的主体——西部城市化的初步实现。西部城市化是20世纪初美国城市化中最重要、最光辉、最有特色的部分，也是当时美国城市化的主旋律。它的特点是两个高：高速度和高起点。[①] 西部各大地区城市化速度之快令人瞠目。据王旭研究，美国东北部的城市从初创到定型和成熟一般需要150年左右的时间，在中西部约需60年上下，西部仅需30—40年。从整个西部

---

① 中国学者对美国城市化研究的最新成果令人鼓舞。1994年丁则民先生曾对美国西部城市化特点作了简要概括："起点高，速度快，带有跳跃性的特点。"他认为西部小城镇发展为大城市"不是逐级递进，而是具有跳跃性特征"。详见王旭：《美国西海岸大城市研究》序。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曾于1996年8月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中美城市化比较国际学术讨论会"。1999年，王章辉和黄柯可提出："在世界城市化历史进程中，美国呈现出相当明显的特征。其城市化过程以中西部和西部为代表，走的不是循序渐进式道路，而是具有'突发式'、'高潮型'的独特性。"详见前引书，《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第284页。

分析这种高速度更为明显。比较一下东部老城市的代表纽约和中西部新兴大城市的典型芝加哥更能看出西部地区城市化的速度。芝加哥建城时间远较纽约为晚，几乎晚了2个世纪，1830年人口仅50人左右，1837年达到4000人。但发展规模与纽约相似，到20世纪20年代都已成为美国排名一二的大都市（1920年人口为270万），跻身国际大都市的行列，但芝加哥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纽约，城市美化运动走在纽约之前，设计摩天大楼也是芝加哥学派独占鳌头。原因是纽约是老城市，老有老的优点，但历史包袱沉重，在发展过程中需花相当时间改造旧城区和调整旧格局。芝加哥不同，它没有包袱，在空白的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并且在城市兴起与拓展时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勃兴，加上它的自然优势，因此依托工业革命中的新产业之兴起乘风而上，它的重工业很快超过了纽约。总之，美国西部地区城市化速度之快在世界城市化历史上尚属少见。

所谓高起点就是指西部城市在初创时就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同步，它不仅没有走一般城市发展的道路，即从农贸据点到商业城镇，进而为工业城市的老路；也没有经历城市功能转化的历程，而是越过商业阶段和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直接在新工业革命基础上形成带有现代特征的城市。如“汽车城”、“钢铁城”、“石油城”等等都是依托在新产业上发展而成的城市，“电影城”、“旅游城”等等也都是新工业革命中涌现的新的文化产业所导致的。换言之，这些城市是工业化直接“化”出来的，是直接在荒野上建起来的工业城市，有时一个新产业“产”出一个新城市，有时若干新产业“产”出一个综合性的城市，有时铁路线的延伸直接“生”出城镇来，或促使小城镇“长大”变富，有时一个新矿的开采“开”出了一个新城市，进而推动了地方性的中心城市形成，它们往往以某种产业为主，兼及其他辅助产业，如以农产品

加工和酿酒为主的密尔沃基，以肉食罐头加工为主的圣路易斯，以巨型钢铁企业闻名的匹兹堡，以钢铁机械产品著称的底特律，此外诸如啤酒城、纺织城、金镇、银镇等等专业性小城镇比比皆是。它们不像东部老城市那样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路程，在新产业革命中需要经历一个改造旧产业和变革旧城区的阶段。其次，这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能充分利用东部老城市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并且直接在美化城市运动（19世纪末开始）等现代城市指导原则下，或在规划基础上，或在预防污染基础上发展城市，因此在20世纪初这些城市进人定型和成熟时已具有现代性：城市中的生产设施、生活设施和文化设施配套，城市美化初具规模，城市交通畅通多样，城市主衔和道路成为棋盘网络型，甚至城郊化也已开始等等。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西部城市中还有一些大学城、学院城，它们同样是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绽放出来的奇葩。如美国加利福尼亚中西部城市伯克利规模不大但开设多所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太平洋宗教学校、加利福尼亚聋盲人学校和阿姆斯特朗学院等等。伊利诺伊中部城镇诺默尔就是因为设立诺默尔大学发展起来的。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城就是因斯坦福大学而建立。艾奥瓦州中东部城市格林纳尔就是因格林纳尔学院而发展。以一所大学或若干所大学为中心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学院城，这些城市具有商业、交通及其他服务行业，也是美国城市化中的一个部分。

西部城市化其实是美国西进运动的产物，是西进运动的伟大成果和结晶，是美国人民和外来移民在美国广袤荒凉的土地上开拓、垦殖，最终使农业的西部变为工业化的西部、城市化的西部的一部伟大壮观的史诗。

再次，南部城市化速度虽较慢但城市发展快。相对而言，美

国南方的城市化在规模上、速度上落在全国之后。1910 年南部城市人口仅占 21%，农村人口占到 79%；10 年后，1920 年城市人口占 25%，农村人口占 75%。而同时期的北部和西部城市人口已高达 84%，农村人口只有 16%。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当时的美国南方还不能认为已经实现了城市化。最主要的原因是南方还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导，工业化程度不高。1900 年，南方地区的劳动力依然是农业为主，从事矿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等的比例在全国是最低的，表明南方工业化程度不高，这就直接影响到它的城市化水平。当然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南方在城市化进程中毫无作为，就单个城市或城市本身发展特别是一些新兴城市而言，城建速度很快。1900—1920 年达拉斯人口增长率为 202%，伯明翰人口增长率为 468%，新奥尔良人口增长率为 134%。

第三，外来移民在城市化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美国城市化离不开外来移民，移民是推动美国城市化的强大动力，也是美国实现城市化的一支生力军，移民参与了城市化进程的每一个阶段：从城市兴起、发展壮大到转型变革和城市现代化的实现。这是美国城市化的最大特点，因为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这里我们主要关注和研究 20 世纪初，即美国初步实现城市化进程中移民的历史作用。

首先，移民直接参与美国城市的兴建，甚至直接创建了“移民城镇”，促使城市人口大幅增长。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是美国历史上的移民高潮期。19 世纪下半叶的外来移民多为北欧斯堪的那维亚人、德国人、东南欧人和亚洲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从 1880 年起，来自东南欧国家的移民人数激增，1891—1900 年，这些新移民占移民总数的 52%，1901—1910 年则上升到 72%。这些移民一部分进入东部城市，使那里的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大部分迁居中西部，散居在城镇中；他们大多在钢铁厂、纺织厂、

铁路线上和矿山里谋生，使中西部城市的人口大量增加。1910年加利福尼亚州的16个县中有13个县外来人口占20%，华盛顿州人口的21%是外国出生的。20年代末，外国出生的人口占西部总人口的大约28%，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另据统计，美国世纪之交时，外国出生的居民中有一半居住在2.5万人或以上的160个城市中，有的比例甚至更高。俄罗斯人——主要是犹太人75%居住在这样规模的城市中，意大利和爱尔兰人中的2/3居住在这样规模的城市中。新移民们在美国土地上直接创建了城市，"这样的新城市十分不同于共和国早期那些在森林中开辟或建于贸易和交通线交汇处的城市。移民城市是美国工业扩张的直接产物，大量的新来者用他们在新的铁矿或新的钢厂形成的移民工人群体而建起了城市。这些新城镇是新工业扩展的边疆。"① 这样的城镇在宾夕法尼亚、西弗吉尼亚、亚拉巴马和伊利诺伊的煤田附近脱颖而出，在明尼苏达州的铁矿周围和密歇根的铜矿开采处悄然崛起。根据美国移民局的报告，1910年纽约州布法罗不远处的西塞内加，仅仅只有10年的短暂历史而人口却已达2万人，其中4/5是移民。1910年，伊利诺伊的匈牙利好罗镇有1.5万保加利亚人在钢厂工作。宾州的沙勒罗瓦和俄亥俄的福特城都是典型的移民城市。

移民成为城市建设中的生力军。20世纪初来美国的移民多数是壮年劳动力，1901—1910年，来美国的移民几乎70%是男子，而在1850—1860年男子比例不到60%。他们在城市的工矿中劳作，为城市建设作出巨大贡献。1910年只有14%的外国出生的人口在农村工作，而43.5%的人在工矿企业和制造业谋生。根据国会1907年的调查，在基础工业诸如钢铁、采煤、建筑、

---

① 德格勒：《今从史出》，前引书，第290—291页。

铜矿开采和冶炼中，平均劳动力的60%是外国出生的。[①] 从欧洲来的移民将母国的先进技术带到了美国，如比利时移民带来了高超的玻璃制造技术，英国移民带来机械技艺等等。一些移民中的杰出人才更为美国城市化作出难以估量的贡献。如：拉脱维亚犹太人工程师穆瓦塞夫参与设计纽约建于1903年的威廉斯堡大桥，参与设计1909年建成的昆士博罗和曼哈顿大桥，还参与设计乔治·华盛顿大桥、巴约纳大桥等等。而犹太人主要在金融商业方面在城市化中发挥作用，如犹太人银行家斯希夫为纽约市的金融业建立功勋。另一方面大量来自东欧和南欧的没有特殊技术的新移民往往在最艰苦的岗位上劳动，即在城市工业和建筑业中，承担着那些最艰苦、最危险、收入最低的工作，换言之新移民们在城市建设中担当着最为艰辛的工作。同年的移民调查报告指出，在烟煤矿业中，所有白领工作都由美国人或老移民及他们的后裔担任，来自南欧和东欧的新移民只能干捡煤和其他非技术的一般活儿。这种现象也反映在其他行业中，如玻璃工业因其艰苦几乎都依赖新移民而维持和运作着。1900年纽约兴建地铁，1.2万工人中大部分是新来乍到的意大利移民。1900年纽约的普通工人中的25%是意大利移民。大量非技术移民工人的存在还促进了工业机械化的进程，因为雇主们为了雇佣廉价的劳动力，促使他们购买和使用非技术工人容易操作的机器因而加快了机械化。外来移民在美国城市中还为城市中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生机，作出贡献。

当然，移民在美国城市化的进程中也产生了另一方面的影响，诸如在一些大都市中出现移民居住区，这些地区因移民国别、族裔、文化背景不同，特别是美国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往往会产生种族矛盾和发生冲突；同时因为移民收入低微生活条件

---

① 德格勒：《今从史出》，前引书，第282页。

较差，社区的安全问题较多。这些区域往往会滋生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许多社会问题。

20世纪初，与美国城市化初步完成阶段相伴随的是经济领域垄断化的完成。

四、巨型企业、托拉斯和金融财团

〔巨型企业的崛起和发展〕　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生产力领域给美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工业化和城市化基本实现；在生产关系领域则带来了意义深远的美国经济体制中垄断化的完成，实现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和转化。美国的新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城市化、垄断化是一个基本同步和互动的历史进程，是一个系统发展的美国社会进化工程。

经济领域中的垄断化过程也始于内战以后，基本完成于20世纪初。19世纪60—7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发展到顶点，垄断组织开始萌芽。1873年美国国会一调查委员会宣称，国家迅将出现和布满一些掌握控制无数财富、拥有巨大影响和权力的庞大公司。1873年经济危机后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大大加快，垄断组织得到广泛发展。

巨型企业的兴起和发展是垄断化的第一步。虽然作为一种合法的体制——巨型企业萌芽于16世纪英国的股份公司，19世纪这类企业在某些行业已经取代单资企业，在内战以前美国这类企业组织在运河和铁路行业中已经出现，但是在工业领域还没有成为一种明显的企业形式。1900年这类股份公司获得迅猛发展，采矿业产量中的86%和制造业中的2/3都是由股份公司所生

产的。[1] 股份公司促进了企业巨型化和生产进一步集中发展。这是因为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释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成为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的强大原动力。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是以工厂取代手工工场，因此是以生产单一商品为目的的独资工厂为特征的。在新工业革命进程中，大规模生产的现代工厂取代了旧式的小规模的工厂。新工业革命中涌现的新能源、新的生产工艺以及新的生产要求和管理，逐步促使工厂的外部规模和内部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最终形成了以准确性、系统性、连续性、高速运转和经济性为原则的生产流水线。工厂与工厂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出现了合并的趋势，形成巨型企业。从 90 年代开始，美国的一些工厂企业经由纵向和横向两条途径实行联合和兼并向巨型企业转化。一些公司还通过扩展或收买其他企业成为巨型企业。19 世纪 60 年代典型的美国工商业仍是独资业主开办的小企业，一个家庭或一个合伙商所有的企业。这类企业大多在当地经营买卖。但是到了 90 年代美国工商业系统的“基本结构已经变化”，独资企业渐渐为巨型公司（股份公司）所取代。20 世纪初，巨型企业已经侵入了美国国民经济的大多数部门。巨型企业的产生为垄断组织的形成铺平了道路。垄断组织是巨型企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有学者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是由巨型公司组成的一种制度。”[2]

如果说，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强大动力和根本原因，那么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崛起的新产业则为形成巨型企业和垄断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电力、钢铁、化学、石油

---

① 德格勒：《经济革命的时代：1876—1900》，第 36 页。

② 保罗·巴兰、保罗·斯威尔：《垄断资本》（中译本），商务印书馆，北京，1997 年，第 53 页。

和汽车等新兴工业部门具有先进的生产能力，它们没有旧产业部门的包袱，一开始就采用最新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因而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同时由于生产特点所决定，这些新产业部门都具有大生产的特点，产业自身就具备了生产一体化的要求。美国最早创立流水线的是新兴的汽车工业，最早的垄断组织托拉斯产生于石油工业，托拉斯运动发展最快的部门是在新兴工业部门：电力、钢铁、化学、汽车等部门，绝非偶然。有的新工业本身就是新技术发展的产物。整个美国电气工业发展的历史就是这种科学技术进步促进工业垄断化的历史。同第一次工业革命相比，这些产业部门都具有大生产的特点，它们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建立大规模的生产基地。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19 世纪 70 年代，美国的主要工业是“为农业经济服务的”，因此这些厂商往往规模较小，在当地购买原料和出售成品；到了 20 世纪初，美国更多的公司是“在进行生产资料的生产”，商业经济已成为工业经济，即进行重工业产品的生产。以前那种小型工厂已无法承担大规模生产任务，因此巨型企业随新产业的诞生而应运而生，20 世纪初的这些公司已成为规模巨大、有垂直领导体系的、集中化的企业了。[①]

促进巨型企业兴起和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美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由于城市的兴起和城市化的初步实现，不断扩大的城市建设和与日俱增的城市居民形成了对商品的大量需求，城市建筑需要大量的钢材、木材、玻璃等等建筑材料，城市发展和交通运输的扩展需要耗费大量的能源，致使电力、石油、煤气的供应量扶摇直上；城市居民对粮食、肉类、水果、蔬菜等造成大批量的需

① 哈里·马格多夫：《帝国主义时代》，商务印书馆，北京，1975 年，第 26—27 页。

求。一些独资的小企业无法适应这种大批量的物质需求，他们或者谋求扩大经营规模，或被其他企业“吃”掉。面对这样大的市场，企业还要考虑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走合并之路势在必然。另外一些诸如食品加工类的企业为了占领全国市场，还努力在全国出售它们的产品，甚至需要掌握交通运输部门专门运送它们的货物，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经营范围越来越广。“它们（巨型企业）占有它们所需要的一切，从原材料（油井、蔗糖种植园、煤矿和铁矿）到交通运输工具（铁路、管道、汽船公司和大湖铁船）和市场设施（仓库、零售店和批发分配代理商）。此类所有形式同仅仅控制单一产品的同行业结合形成了鲜明对照。”①

总之，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崛起的新工业部门为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转向垄断提供了物质基础，新工业部门的诞生发展同资本主义垄断化的过程相辅相成。当然，旧的、传统的工业部门也会因资本主义内在规律的作用由自由竞争走向集中和垄断，但是如果离开新工业革命的推动，离开这些新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工业部门，离开这些新能源、新科技的应用，资本主义经济要全面实现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转化是难以想像的。巨型企业的继续发展就是企业之间进一步形成垄断集团，即导致了垄断组织的出现，进一步又使巨型企业更加巨型化。企业间组成的垄断集团在美国主要有普尔、卡特尔、托拉斯和控股公司等等。美国垄断组织发展大致经历4个阶段：19世纪60—70年代是其萌芽时期，1879—1890年是托拉斯运动时期，1897—1903年是联合、合并阶段，是托拉斯发展的决定性时期，1903—20年代末为托拉斯稳步发展阶段。

〔第一次兼并高潮和托拉斯帝国〕　　早在19世纪50—60

① 德格勒：《经济革命的时代1876—1900》，第37页。

年代，美国出现垄断的最初形式：普尔。这是一种短期销售协定的联合制，往往只是规定产品产量和价格，划分销售市场，以保证参加者的垄断利益。70年代美国出现了一批以卡特尔为形式的早期垄断形式。但是无论是普尔还是卡特尔这些早期垄断形式都是一种不稳定的、短期性的垄断组织。

19世纪80年代始，美国出现了较高级的垄断组织——托拉斯。1882年美国企业史上出现了第一个托拉斯：美孚石油公司（也译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早在1870年，约翰·洛克菲勒组建美孚石油公司，当时资本为100万美元。1879年，美孚石油公司生产的石油已占全国产量的90—95%。1882年美孚石油公司改组为托拉斯，有14个石油公司参加，此外还控制了其他26个石油公司的多数股票。美孚托拉斯掌握了美国产油区的各大铁路，建筑了四通八达的输油管，拥有自己的仓库码头，还有上百艘海轮，控制了全美国90%的石油。美孚石油公司名义资本为7000万美元，其中4600万掌握在洛克菲勒为首的9个委托人手中，公司业务也为这9人所左右。

托拉斯一般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或与产品有关的企业合并而成，旨在垄断销售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和投资范围，增强竞争力量，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加入托拉斯的各个股东公司将其股票交由董事会而领取一种所谓信托券成为股东，完全失去了在生产、商业和法律上的独立性。企业经营事务和财务活动完全由董事会负责，原业主仅作为股东按股份取得红利。它的管理机构虽然由股东代表选举产生，实质上受大股东的控制。托拉斯因其是完整的企业联合组织，较为稳定、可靠，因而在美国迅速蔓延扩展。

19世纪90年代直至20世纪初美国出现组建托拉斯高潮。继在榨油、炼铝、酿酒、制烟和屠宰等部门出现托拉斯后，自然资

源开发和运输领域也出现建立托拉斯的高潮。20世纪初，美国主要工业部门都已被少数几个托拉斯所垄断，形成了各工业部门中的"大王"。1901年摩根家族凭借其巨大的财势利用摩根钢铁工业在竞争中不断集中的机遇，同剩下的几个最有实力的钢铁集团谈判达成协议，将4个集团合并成一体化的摩根钢铁联合企业，拥有铁矿、煤矿、铁路和运输船只，1907年他的所有职工已有21万人以上，控制了全美60%的铁路，生产了66%的原钢和近50%的钢铁预制品。1910年钢铁产量分别达到1400万吨和1200万吨。1901—1910年间，平均年纯收入为1.12亿美元。

1898—1904年美国出现第一次企业兼并高潮。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必然导致垄断，这是托拉斯得以发展的基本原因，而经济危机则是促进垄断的催化剂，继1873年经济危机以后，美国在1882年、1893年、1903年和1907年连续出现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促使优胜劣汰，垄断加剧。同时，美国证券市场的形成也成了促使形成兼并高潮的酵母。自1863年纽约股票交易所建立以后，波士顿股票交易所、费城股票交易所和巴尔的摩股票交易所也相继成立。股票交易市场的形成，使工业股票得以上市，这就为企业兼并创造了条件。兼并高潮是垄断组织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统计资料表明，1904年美国各经济部门的440个大托拉斯共拥有资金204亿美元，而其中的1/3的资金掌握在最大的7家托拉斯手中。同年，产值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有1900家，只占整个制造业企业总数的2.2%，但其产值却占制造业总产值的49%，所雇职工人数占行业职工总数的1/3。①

具体而言，1906年有7个垄断集团控制了全国铁路总利润的85%左右。范德比尔特铁路公司控制纽约—芝加哥地区铁路；

---

①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卷，第740页。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控制从费城和巴尔的摩以西的铁路；摩根财团控制美国东南部铁路；詹姆斯·杰伊尔公司控制西北地区铁路；哈里曼财团控制中央大铁道和南太平洋铁路；古尔德铁路公司和罗克·艾斯兰系统占有密西西比河流域的铁路。[①] “钢铁王国”——摩根在1901年组成的摩根钢铁公司控制了美国钢铁产量的65%。1900—1910年4大垄断集团（道奇、安纳康达、肯尼科特和卡劳梅特—赫克莱铜矿公司）控制了美国铜产量的75%。1909年美孚石油公司控制全国石油的66%。福特汽车公司在1913年生产了全美国汽车总量的50%。1907年，摩根完全接管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当时公司所属各公司共装有电话机300万部，其他独立公司也装有相同机数，1912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装机数已超过500万部，其他独立公司只装机360万部。1898年美国奥蒂斯升降机公司兼并其他8家升降机公司，总资产高达1100万美元，生产了几乎世界上所有最高建筑物的升降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成为第一批跨国公司。

总之，20世纪初年，垄断已成为美国全部经济生活中的基础，垄断组织（主要是托拉斯）遍布美国的工厂、矿山、油田、铁路、交通运输以及公用事业各个部门。

〔八大财团最后形成〕　　在垄断化进程中，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又逐渐融合，从而形成了金融资本和大财团，出现了金融寡头。

19世纪末美国出现了金融界的巨型企业。1898年纽约最大的17家商业银行拥有全市63家商业银行存款总额的70%；1900年3家最大的人寿保险公司：公平保险公司、互惠保险公司和纽

---

① 王锦瑭、钟文范、李世洞：《美国现代大企业与美国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武昌，1995年，第6页。

约人寿保险公司拥有全美国人寿保险公司资产总额和保险单总额各半数以上。纽约的两家合伙经营的银行和两家商业银行各自形成了有力的金融垄断组织。[1] 工业垄断组织和金融垄断组织的形成为两者的联姻创造了条件，为财团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1898—1900年银行巨头摩根共合并了20多家钢铁公司，后又以4.8亿美元的高价收买了卡内基的钢铁公司。1901年，他组建了摩根钢铁公司，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达10亿美元的大公司。摩根将银行资本渗入工业资本之中，从而形成美国第一个首屈一指的摩根财团。1912年，该财团在112家大公司中拥有341个董事席位，并在100家子公司中拥有较大股份。摩根本人是美国21条铁路、通用电气公司、西方联合公司、普尔曼车厢公司和3个保险公司的董事。财团控制了第一国民银行、银行信托公司等13家金融机构，合计资产总额达30.4亿美元，其中摩根公司实力最为雄厚，称雄金融界，被誉为“银行家的银行家”。财团还拥有一些大型公司，如：美国钢铁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纽约中央铁路公司以及其他几家全国最大的保险公司。到19世纪末，摩根在商界的信誉已超过了美国政府。[2] “一些评论家指出，摩根比大多数总统的权力都大。”[3]

建立财团的另一个典型就是依靠雄厚的工业资本渗入银行金融领域，最后成为仅次于摩根财团的洛克菲勒财团。70年代洛克菲勒创办了美孚石油公司，在掌握了美国石油业后，他又控制了煤气、电气、制锌、制铅、炼铜、炼钢等企业。90年代始他将工业资本投向银行业，与斯蒂尔曼共同掌握了花旗银行，并利

---

① 引自王锦瑭、钟文范、李世洞：前引书，第15页。

② （美）罗伯特·索贝尔、戴维·B·西西利亚：《企业家：美国人的创业精神》，（中译本），三联书店，北京，1989年，第150页。

③ 同上书，第148页。

用所得利润再投资，或组建新的工业垄断公司，或收买其他企业的股票攫取控制权，由此形成实力雄厚的财团。

20世纪初美国形成了8大财团，除摩根和洛克菲勒两大财团外，还有库恩—罗比财团：德裔犹太人A·库恩和S·罗比于1867年创办库恩—罗比公司，主要投资铁路事业。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间该财团有“铁路王国”之称，垄断了美国铁路。还投资银行、钢铁、石油、电气等部门。

梅隆财团：T·梅隆于1869年创办托马斯·梅隆银行，1902年更名为梅隆国民银行，这是他发家的金融支柱，后与工业资本融合形成财团。梅隆银行在1890年就控制匹兹堡冶炼公司，后改名为美国铝公司，1910年以来一直垄断了美国的铝生产。长期来通过金融机构控制匹兹堡地区的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

杜邦财团：是一个典型的家族托拉斯。杜邦公司在1918年资产高达3亿美元，成为当时最大的垄断公司之一。

芝加哥财团：美国中西部地区财团。20世纪初，由当地富豪家族麦考密克家族、伍德家族及新兴的克朗家族组成。他们利用当地的农业优势，发展肉类加工和农业机械，使芝加哥地区成为仅次于纽约的工商业中心和金融中心。在商业上占有优势。成立于1866年的西尔斯—娄巴克公司为该财团所属。20世纪初经营邮购业务获巨大发展，它的零售商店和供应点遍及全国。

克利夫兰财团：克利夫兰地区的几家关系密切的豪富家族，如：马瑟、汉纳、汉富雷、伊顿等，利用当地丰富的煤铁资源，创办钢铁工业获巨额利润后再投资银行业，并将资本投向橡胶工业和铁路运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具备了财团的条件。

波士顿财团：由19世纪经营奴隶贸易而致富的波士顿地区的富豪，如：洛威尔、劳伦斯、亚当斯、洛奇等家族组成。他们利用海外殖民攫取的财富投资于商业银行、保险事业和投资公

司，并依靠这些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投资纺织、制革、制鞋、服装、食品以及化工等轻纺工业。20世纪初几家世代通婚的家族以波士顿第一银行为核心，形成财团。

此外，还有一些中小财团伴随大财团而生。它们一般都依附某一大财团而生存。

20世纪初年，8大财团形成以后就掌握了美国的经济命脉。美国一些主要工业部门中，都有一家大垄断公司的产品量占整个部门总产量的90%以上，而这些大公司的背后就是垄断财团。以8大财团为主体的美国金融资本不仅支配着整个美国国民经济，成为商业和企业生活的"心脏"和"源泉"，而且还操纵政府，干预政务，并将其触角伸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到垄断阶段，成为以托拉斯为特点的垄断资本主义，或托拉斯帝国主义。

〔现代企业的定型〕　在美国经济垄断化过程中，现代大企业的初步形成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历史成果。现代企业形式——股份公司在企业垄断化和巨型化进程中脱颖而出。虽然股份公司这种企业形式在美国经济史上早就出现过，最终还可追溯到16世纪的英国，但是股份公司作为现代企业在美国真正形成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后。从19世纪50—60年代起股份公司进入迅速发展阶段。20世纪初尽管美国的独资企业形式在经济生活中仍占多数，但在大企业中股份公司已在美国成为一种主导企业形式，成为一种基本的组织形式。股份公司的发展和巨型企业的兴起是同步的，都是适应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兴工业部门的需要而产生的，如：钢铁工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电力工业等等都是需要巨额投资才能兴办的，因而独资企业的形式很难在这些部门有立足之地。同时新兴产业部门已不是生产单一产品的企业，它们往往在纵向上从原料到销售都纳入经营范

围；在横向上同时经营若干相关产品。独资企业要进行这种多样性的生产也无能为力。而股份公司却具有适应上述情况的优点和性能。

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股份公司是巨型企业的最有效的一种组织形式。巨型企业并不是仅仅在规模上、人数上比以前的独资企业成倍地扩大，更为重要的是其内涵，即企业内部的资本所有制形式、生产结构和管理模式所体现的现代性，远远超越了以前的独资企业的形式。

在资本所有形式上，独资企业的资本所有制为个人所有，股份公司则是若干股东的资本所有制，即由分散的私人资本变成集体资本家所有的股份制形式，从而使企业由个别私人资本家变成集体资本家（股东）所有制。这样就为吸收社会资金提供了便捷的途径，也为公司兼并其他企业提供了某种方便。而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发展与证券市场的发育和运作密不可分。

生产结构上也发生明显变化。独资企业因受规模资金所限，以生产单一产品为特征，产品销售往往在地域上也有所局限。股份公司是巨型企业的组织形式，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和大规模的生产能力，或是一条龙经营，即从原料到加工，从成品到销售，从运输到商店经销都由企业自身来完成；或是生产多种产品，生产不同产品的企业由于不断地兼并联合，不仅使企业规模扩大，而且使产品的内容变得多样化。

生产管理上同样发生了显著的重大变化，即所有权和管理权的逐步分离。因为股份制巨型企业是集体资本家（包括股东）所有，在管理上就不可能按照独资企业那样进行家长式的个别资本家的管理模式；但是也不可能进行所谓的“集体”管理，让每一位股东都参与企业管理和经营。同时企业为了扩大生产，添置设备需要发行新股票向投资者筹集资金，必然导致公司股权的进一

步分散。因此股份公司需要有一批领取薪金的专门从事管理和经营的人员，它们受资本所有者的委托实施经营和管理。在实践中就形成了所谓经理式的公司的管理模式。它的具体组织结构是：董事会是资本所有者的代表机构，下设总经理掌握经营和管理全权。他下面再按企业业务分设管理机构由副总经理司其职，负责生产、销售、人事、研究与开发、财务等工作。这种管理体制是一种高度集权的体制。财团领袖人物可以对所属企业实行单一的垂直领导，犹如天主教会和拿破仑政府一样实行有效的集权管理。著名黑幕揭发者、女记者爱达·塔贝尔说：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的“管理集中化与天主教会或拿破仑政府一样不折不扣。”这些专业管理人员“他们每日聚会，把全部时间花在康采恩的管理和发展问题上。……石油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能进入他们的视野，从美国东部的奥什克什市的油绳，到苏联石油在中国的竞争，无不是他们的论题。”而公司的创始人和主持人洛克菲勒完全是组织方面的“奇才”，他绝对“精密地”操纵他自己设计的这架“机器”，“这架机器的思维所产生的影响，从纽约城的权力中枢到最卑微的输油管道巡察工都能感受到”。[1] 在企业管理上A·卡内基堪称杰出人才。他“抢占市场”的强烈意识是他的钢铁公司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卡内基牢牢掌握市场信息，并不失时机地转换产品打人市场。他认为“占领市场越早越好”。90年代，他敏锐地感觉到对钢铁公司来说铁路市场行将结束，带着特有的目光瞄向城市建筑市场，“卡内基是第一个最早带着幻想看到城市中心成长的人，他认识到由于电梯发明使建造多层结构成为可能，钢铁公司可以如以前提供铁轨一样在未来提

---

① 引自詹姆斯·罗伯特：《美国神话与美国现实》，（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29—230页。

供钢梁服务。”为此“卡内基不仅改变产品结构而且改变市场资源”，还将目光瞄准了国际市场。因而卡内基在90年代结束时，“将他的公司由一个十分成功的企业建成为一个工业王国”。[1]

总之，从美国第一次企业合并高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大企业已进入其成熟期。美国的整个工业结构甚至经济结构都已具备了现代形态。也就是说，美国垄断资本主义最后确立的同时，美国现代企业已趋成熟。

〔关于托拉斯的争论〕　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社会巨变必然会引起人们认识上的差异和思想上的争论。对于出现于美国社会和经济领域中的垄断现象和具体组织，对于美国社会上发生的种种变化，美国社会各阶层人民持有不同看法，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观望者有之，议论纷纷，情绪激奋。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亚当斯把美国垄断化的时代比喻为“恐龙时代”，他说：“（以古代恐龙时代出现的同样方式，）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各种因素合并起来突然出现在我们的社会和经济世界中，从未想像过的大规模公司的巨型企业，犹如古代恐龙似乎是命中注定要统治大地的。它的躯体、力量和进攻武器表明他无敌于天下。”[2] 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著名改革家、思想家梁启超目睹耳闻美国人对托拉斯的辩论后，在他的《新大陆游记》中这样写道，在美国，人们视托拉斯为“怪物”、“猛兽”，各阶层人民都关注其发展。托拉斯究

① 约瑟夫·华尔：《安德鲁·卡内基》，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86—587页。该书第一版于1970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华尔教授是当代美国企业史学派的著名历史学家之一。该书被评价为“不仅是一个伟大王国缔造者和慈善家的高明研究，而且是美国巨型企业兴起的引人入胜的编年史。”

② 詹姆斯·T·亚当斯：《美国史诗》，蓝带出版社，纽约，1931年，第342—343页。

竟为何物?“政府之焦虑，学者之讨论，民间各团体之所哗嚣调查，新闻纸上所研究争辩，举全国8000万人之视线，无不束于此一点。”生动记载和描绘了美国上下对垄断的关注。关于托拉斯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有人肯定，有人否定。新闻报上辩论不断。梁启超又进一步将美国人的争论加以归纳，认为托拉斯的产生给美国带来十二“利”和十“弊”。所谓“利”就是：1. 可以利用最新最大最敏之机器而尽其所用；2. 资本既合并，则创出之物其价也随而廉；3. 以工场伙多之故，可以实行分业之学理，使日趋精密；4. 能有余力利用废物，使无弃材；5. 以全国本业皆合同故，能节制生产毋使有羡不足，因以免物价之涨落无定，而资本家无时常倒闭之患，劳力者也不至被牵涉而失其业；6. 能经营附属事业，扩张外国贩路；7. 能淘汰冗员，节减薪费；8. 凡一切竞争之冗费皆可节约；9. 可节省运送费；10. 信用日益坚实；11. 以资本雄大故，不假借贷，无畏外界市场之恐慌；12. 可以交换智识，奖励技术。

托拉斯的弊端为：1. 以全权委诸一二人之专制，苟不得其人，则全局失败；2. 规模太大，难于统一监督；3. 独占一业，竞争失去，技术改进中止；4. 工人失业；5. 使小资本家无法自存；6. 以廉价勒买原料，高价售货损害产家和消费者的利益；7. 日杂粗窳以欺市众；8. 滥用保护关税之权，低价售到国外，高价售于国内；9. 剥削工人更甚；10. 垄断企业一有失败，则其证券搅乱市场。梁启超的概括虽不能说已经十分全面科学，但在客观上反映了美国人民对托拉斯利弊分析之大端。

梁启超的概括尚属旁观者之评述，美国人自己对托拉斯的评价，也许更贴切、更直接。1899年9月，在芝加哥曾召开了一次讨论有关托拉斯的专题会议，出席者中有中西部的几位州长，有劳工代表，有工厂主代表，有农民代表等等。代表们出自不同

的地位、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视角围绕托拉斯问题各叙己见。一位农民代表说："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些企业已经将许多在一个州或若干州的分散企业合并起来……使它们在统一管理之下。这些大型企业，或大家都知道的托拉斯建立起更大的权力，这种权力促使它们推行已经侵犯个人权利的政策，或者已经使用它们的影响限制贸易，伤害劳动权利，摧毁其他财产的价值，剥夺他人利用它们自己资本的权利，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对公共政策的明显反对，对共和国最大利益的破坏。"他认为托拉斯的行为正将共和国推人到一个危险境地。因此美国人民应该做的第一步就是推动国会通过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反托拉斯法，明确规定托拉斯的什么行为是伤害公共政策和损害私人企业等等。应该用法律来制止托拉斯利用州给予的特权破坏其他企业和剥夺其他公民使用它们的财产，制止它们利用权力和影响限制贸易，制止它们利用大量钱财控制政党和议会。

一位编辑则持有不同看法，他开门见山地说："合作的权利如同比赛权利一样是毫无疑义的；比赛权包含了退出竞争的权利；合作常是一种竞争方法，从更开阔的视野看，竞争经常是合作的手段；两者均为合法的、有序的、无侵犯性的个人行为，两者都将在平等自由的社会法律指导下实施；任何个人或机构用立法行为或任何侵犯性力量企图去禁阻或限制合作或竞争，就这样的人和机构而言，他们将可能因他们的这种企图被公正地评价为自由的敌人、进步的敌人、社会的敌人和人类的敌人。"从此出发，他认为托拉斯如同其他各种工业联合一样，以联合的形式努力做着联合组织中每一个个人正在从事的事情。托拉斯不是一个可以被控告的机构。有人用托拉斯否定竞争来攻讦和否定这种合作形式是荒谬的，说托拉斯否定了竞争等于说竞争否定了竞争。有人认为托拉斯靠生产和出售比在托拉斯外生产的产品更廉价的

产品否定了竞争，如果这理由成立的话，那么每个成功的竞争者不是也都否定了竞争？

对托拉斯持反对态度的工会领导人约翰·海斯在发言中指出，托拉斯和联合问题已经超越了生产和价格等有关制造商的合法运作问题，它已被提升到政府政策的高度，包括人权问题、个人自由、公民地位、公民尊严、自卫权利、关于财富权利的限制问题、商业侵权问题、创建能够保卫我们自由、人格和独立的屏障问题。他认为“托拉斯”这个概念是如此的不肯定、如此的含糊和如此的不确定……我们必须对它作出可靠的界定。韦伯斯特将托拉斯定义为“控制生产和价格的一种联合”。这个定义提供了我们从法理上批判它们的充分理由，因为控制生产包括了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包括了我们公民的自由——实际上就是我们政府存在的形式。他的结论是“托拉斯的政策是一个反对社会最大利益和摧毁我们自由制度和对大众政府的有组织的肆意侵犯。”

一位社会主义者认为为了处理托拉斯必须了解它们的起源。托拉斯不是怪物而是一种现象，它还会继续发展，在20世纪某一时候，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所有工业将在托拉斯的控制之下。我们无法停止它们的发展犹如企图在河上筑坝去阻止浩浩荡荡的密西西比河一样。他认为一旦所有工业部门都建立托拉斯后，资本将会全面地改变它的性质。托拉斯机器完全准备交给民主社会的手中——即大众控制。没有人能想像一个社会化的工业将会是被分裂为成千上万个的小企业。对于托拉斯，我们该做的第一件事是企望未来企业实行公有和管理；第二件事是保护劳工反对托拉斯；第三件能够做的事是使一些私人企业实行公共控制，即建立所谓的公用事业，诸如城市所有的市政建设等等。

为托拉斯辩护的制造商们在会上也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一位代表这样说，在一些合理的有限联合企业内部能够减低生产成

本。这样的联合企业能够使用最新的改进了的机器和使总的设备工具适应技术上的进步，这在资本缺乏和规模很小的企业里是难以实现的。联合对社会是安全的，资本的联合建设了铁路降低了交通运输费用，美国钢铁生产正适应整个世界的需求甚至美国本身的需求。他还认为在美国除了国家特许的企业以外，真正的垄断是不可能的，工业领域内的联合也不会影响中间商的利益。[1]

上述资料表明美国的农民、社会主义者和工会领袖对托拉斯采取了否定态度，他们严厉批判托拉斯，揭露它给美国人民和社会带来的祸害和弊端，指出托拉斯的存在违背了美国人民的价值观念；工厂主和编辑代表则站在相反的立场上，肯定托拉斯给美国社会带来的进步和利益，认为托拉斯的建立符合美国精神。

大企业家如何看待托拉斯？约翰·洛克菲勒 1899 年在美国工业委员会前作证时讲述了他的石油公司的起家历史，竭力维护托拉斯的合理性及其优越性，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企业发展变得可能时，我们发现进一步集资是必要的，即获取和需求人员和资本，于是组成了 100 万美元资本的美孚石油公司。后来我们发现有更多的资金可获得，发现更多的投资者对企业有兴趣，我们的资金增长到了 350 万美元。因为企业增长、发展和国内外市场的取得，更多的个人和资金投入我们的企业，新的公司代理处组织起来，但目标经常是相同的——用提供最优秀和最廉价的商品来扩展我们的事业。"在谈到石油公司成功之道时，他说："(成功) 在于他坚持这样的政策：通过优质廉价的产品极大地扩展他的企业。在发现、获取和利用最优最省的生产方法上不惜工本。他寻求最优秀的管理人员和工人并为此支付高额薪金。他为

① 有关 1899 年芝加哥的托拉斯研讨会的材料均来自《美国年鉴》，第 12 卷，第 279—298 页。

了更好和更新的设备毫不犹豫地淘汰旧机器和旧工厂。他将工厂设在他们能以最低价格供应市场的地点。他不仅为主要产品也为所有可能的副产品寻求市场，为将它们打人市场不计工本。他毫不犹豫地投资数百万美元到减低储集和分配石油的方法上：即使用输油管，特种卡车，运油轮船和运油车。他在每一个重要的铁路车站修建汽油罐以减低储油和送油的成本。他不惜代价将产品打入世界市场，包括文明人的市场和不文明人的市场。他对美国石油充满信心，并已投入数百万美元去实现他的目标，固守市场，同俄罗斯和所有产油国家和反对美国石油的竞争者进行竞争。”

洛克菲勒认为关于工业联合的讨论已经太晚了。工业联合是必要的。如果美国人在全美各州和国外都具有扩展他们企业的特权，那么他们必须是大规模的并且需要更多的企业代理。关于工业联合的优越性，他认为：1. 是能调动必要的资本；2. 扩展企业范围；3. 增加对事业感兴趣的人的数量；4. 节约企业费用；5. 企业因许多具有丰富经历的有关人员的知识获得改进和节省；6. 授予公众的权力以更低价格改进产品和依然使股东获利；7. 给劳工以永久的职业和良好的薪金收入。

当问及托拉斯会对公众造成哪些主要弊端或危险时，洛克菲勒回答说：“危险就在于被联合企业所授予的权力可能被滥用；在于组成联合企业的目的不是为了扩大事业而是为了在证券市场上进行投机，因而价格会被暂时抬高而不是降低。这种滥用权力的事情在不同程度上在所有的大企业或小企业中都可能出现，因此这种反对联合的争论如同因蒸汽也许会爆炸而反对蒸汽一样。其实蒸汽是必要的，而且也能使它做到相对的安全。联合是必要的，它的滥用权力也能够被限制到最小程度；要不然，我们的立法者们一定明白他们缺乏能力去处理最重要的工业工具。迄今为

止，大多数立法企图不是努力去控制联合而是想摧毁它，因而他们是徒劳的。”①

上述时代的人对托拉斯的纷纷议论不仅反映了托拉斯在美国出现时给美国带来多大的震动和影响，而且表明托拉斯垄断组织的形成给美国不同阶层的人民带来了不同的利弊。其实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出现，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为垄断阶段是一种必然的历史发展进程，是在工业革命的猛烈推动下，生产高度集中和资本高度集中的必然的逻辑发展。各种垄断组织（包括托拉斯在内）都是垄断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事物，它们的产生不是以人类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它们的优劣、利弊也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因人们的反对而不存在，反之亦然。但是20世纪初美国经济迅猛发展的事实说明，当时垄断的形成基本适应生产关系，容纳了生产力的发展，巨型企业适应了大生产的需要。总之垄断的形成是一种生产力自然发展的产物，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生产力和大规模生产势必造成生产的集中，集中就会自然地趋向垄断。诚如列宁所说：“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垄断。因为几十个大型企业彼此之间容易形成协定，另一方面，正是企业的规模巨大，造成竞争的困难，产生了垄断的趋势。”② 同时，现代企业科学的管理方法符合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的需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自由竞争中出现的某些弊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不触动根本制度（包括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条件下，为适应生产力高度发展实行的一种内部机制的调节，但是托拉斯也给经济发展带来某些阻碍，追求高额利润驱使托拉斯产生各种弊端，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本

① 《美国年鉴》，第12卷，第312—316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0页。

身的根本矛盾并没有因为进入垄断阶段而解决或消失，因此经济危机还是周期性地出现，贫富不均成为难以克服的痼疾，竞争以更高的形式甚至更激烈的程度出现。但是，总体而言，托拉斯的出现和形成对当时美国的整个社会来说还是利大于弊，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正面效应胜于其负面效应；同时托拉斯的产生是工业发展势在必行的趋势，谁也无法加以制止。所以托拉斯刚在美国出现时，有人反对并主张禁止托拉斯，但是托拉斯还是不断发展起来，并且“日盛一日”，迫使人们对它改变看法转变态度。对此梁启超概括说，经过一段时期以后，美国政府和美国舆论“幡然一变，知此物之发生，由于天演理势”，“于是禁遏之政策，一变为补救之政策”。梁的说法符合当时美国实际的。1913 年以后，美国在托拉斯问题上已出现一种明确的倾向，“主张管理托拉斯而不是解散托拉斯。国会顺应这种情绪制定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①] 20 世纪初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在全民的辩论声中最后确立起来。

〔*大企业家的历史功过*〕　巨型企业的崛起，垄断组织的形成都是大生产发展的必然。但是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前行都是通过人类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而实现的，通过一批适应时代需要的个人或群体的有意识活动创造出来的。在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垄断化的进程中，最基本的动力和主要生力军是美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移民，他们担当了工业化的重任，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艰辛，用他们的双手创造了现代美国。同时，一批大大小小的企业家也应运而生，成为一支特殊的历史力量。要对大企业家下定义是十分困难的，他们有着各种不同的头衔和称呼，如：企

---

① 德怀特·L·杜蒙德：《现代美国 1896—1946》，（中译本），商务印书馆，北京，1984 年，第 194 页。

业家、实业家、工业政治家、投机家、发明家、幻想家等。一般而言，他们是企业的创建者、组织者或管理者，有的是发明家和创新者，他们是垄断化的推动者，他们是托拉斯的领袖人物，他们是美国各行各业中的“大王”：汽车大王、钢铁大王、石油大王等等，他们是银行家和工业家，他们是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他们是证券市场上的投机家……。20世纪初在美国最负盛名的主要大企业家代表有约翰·洛克菲勒（1839—1937），安德鲁·卡内基（1835—1919），约翰·摩根（1837—1913），托马斯·爱迪生（1847—1931），亨利·福特（1863—1947）等等。

这些企业家群体的崛起、发展和成熟与美国垄断发展阶段相一致，也是垄断化的直接产物。内战以后随着新工业革命的开展、大企业崛起，美国出现了大企业家；19世纪80—90年代，随着垄断的兴起和高涨，大企业家群体形成；20世纪初，美国出现第一次企业兼并高潮，垄断化基本完成，美国大企业家群体进入成熟阶段并形成了财团这个新的顶尖阶层。在垄断形式上，他们开始采用“控股公司”的新形式。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在这方面独领风骚。1892年，美孚石油公司解散后，新泽西州首先通过有利于美孚公司的“控股公司法”，允许一家公司拥有其他州的公司股票。1899年美孚托拉斯改组为控股公司：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洛克菲勒为最大股东，掌握着公司股票额的25%。总公司下设41个子公司，子公司又拥有70多个下属公司。后又将资本投入金融界控制6家银行，形成垄断财团。即使1911年5月15日，美国最高法院责令其解散，但是解散为34个独立公司后，原股东地位并未变化，洛克菲勒仍掌握实权。财团势力已不可动摇。摩根财团也同样如此。20世纪初美国已形成8大财团。大企业家中的新阶层——财团已经形成，他们已成为美国财富和等级金字塔的顶峰。他们人数不多但能量极大。因此垄断资本主

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①] 1892年美国《世界》报列出全美3045名百万富翁，《论坛报》将它增为4047名。1900年参议院从中又遴选出25名百万富翁。垄断财团的势力日盛，俨然成为一个金融王国，诚如一位美国评论家在20世纪初所评的那样，“（美国钢铁公司）的每年收益和扩展的钱财超过除世界上最大的政府外的所有国家；它的债务比欧洲许多较小国家的还大；它绝对控制了将近马里兰州或内布拉斯加州那么多人口的命运，直接影响着在数量上两倍于它们人口的命运。”[②]

这些企业家不论他们有着多么不同的称呼，但都同企业和垄断联系在一起，同财富密不可分。因此人们在评价大企业、垄断和托拉斯的时候往往与这些企业家挂上钩，毁其毁，誉同誉，毁誉不一，见智见仁。大企业家出现后，美国历史学家小查尔斯·亚当斯就攻讦他们是“伊利强盗”，他的兄弟亨利·亚当斯则警告说：“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统治权力被委信于少数私人公民手中”，大企业将被一个人或数人的联合所控制，他们将利用这些新的利维坦[③]，成为国家的统治者。[④] 后来，美国一批“黑幕揭发者”将企业家们描绘成为来自上层的毁灭文明的野蛮人，并用大量的调查材料揭露企业家们卑劣的发迹史。1934年美国史学家马修·约瑟夫森出版了他的《强盗大王：1861—1901年美国大资本家》，给美国大企业家正式冠以“强盗大王”的恶名。但是他说这个称呼“出自于19世纪80年代堪萨斯绿背纸币者和平民

---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40页。

② 约翰·蒂珀尔：《镀金时代的强盗：企业家还是偶像崇拜的反对者?》，引自西德尼·芬尼和杰拉尔德·布朗：《美国的过去》第2卷，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65年，第37页。

③ 利维坦为犹太教传说中的巨兽。据《圣经》所载它将成为海洋的统治者。

④ 西德尼·芬尼和杰拉尔德·布朗：前引书，第35页。

主义者的民间传说”。[①] 所谓强盗就是他们夺取了不应得到的东西，所谓大王就是他们是所属领域的实际统治者。大企业家曾被笼统地作为垄断资本家阶级，作为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和阻碍社会发展和腐朽生产关系的代表者加以全盘否定和鞭挞，将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其实，大企业家本人在世时曾为他们自己的作为进行过自我辩解和评说：坚持认为他们发展企业和敛财所获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他们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宣称他们的所作所为给全社会包括穷人在内全体成员都带来裨益。使穷人们享受到了以前富人享受不到的东西。卡内基将他的论文集题名为“企业王国”，这也许是他给自己封的一个最合适的头衔。他在1900年写信告诉朋友说：“我们不是为了美元，幸运的是你我和我们的合伙者都已经富足，或正在富起来。我们在企业中，在完成有用的部分中获得乐趣——这是我们的最大回报。”[②] 一些研究企业家历史并对他们持肯定态度、抱有好感的美国学者，在批评大企业家的声浪中纷纷为大企业家鸣不平，称誉他们为“工业政治家”、“实业界的拿破仑”等等，认为他们在经济领域作出的贡献可以同美国的开国元勋在政治上的作为相提并论。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说：“大企业家们在这块大陆上兴建了四通八达的铁路系统，一步步地建立起我国的商业，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总的说来为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③]

可见，美国大企业家是一个在历史上有争议的群体。这是因为他的复杂性质和历史两面性所决定的。如果我们对这个群体稍

---

① 阿伯拉罕·艾森斯坦德：《美国历史：1865年以后》第2卷，T.Y.克罗威尔出版公司，纽约，1979年，第120页。

② 约瑟夫·华尔：前引书，第640—641页。

③ 詹姆斯·罗伯特：前引书，第239页。

作分析就会发现这个群体的构成本身是十分复杂的：他们中既有世袭的百万富翁，也有出身贫困而最后发迹的，有漂洋过海而来的移民在新大陆发财致富的，有靠自己的科学发明飞黄腾达的，有赖于时运机遇而爬上社会顶端的……。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成功地达到了胜利的彼岸，但他们在经济领域发挥巨大能量的途径和手段却各不相同，呈现八仙过海的纷纭现象，有的靠发挥自己的才干取得成功，有的靠远见卓识抓住机遇成效显著，有的靠自己的发明获得专利而发财，也有的靠施展手腕获取巨利，有的靠卑劣伎俩“吃掉”别人，靠丧心病狂的欺诈攫取财富，有的与腐败的政界勾结权钱交易大发横财。他们在商场上的表现不乏智慧和勇气，不乏胆识和远见；也充满欺诈与卑劣，充满堕落和无耻。大企业家的最后归宿也不完全一样，有的最后成为慈善家，用建立基金会的形式把财富“还给”社会，或慷慨解囊到处建立图书馆，或资助科学机构，或奖励青年学子；也有大肆挥霍过着挥金如土、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暴殄天物……。大企业家群体的这种复杂性决定了人们在认识评价他们时的多样性和争议性。

这种复杂性还决定了大企业家群体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具有两面性的特点。一方面，他们充当了人类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化过程中的工具和代表人物，在推进美国工业化和垄断化方面起了积极作用。首先，在经济垄断化进程中，这批大企业家以自己的胆略和勇气，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渠道将企业搞大，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且以特有的进取心在残酷的竞争中取胜，成为经济领域各行各业的领头羊，成为各类“大王”，充当了垄断化的先锋。可以说他们是垄断进程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他们是生产集中自然走向垄断过程中的自觉执行者。如同战争年代需要军事家，革命时

代需要革命家，文艺复兴时代出现思想巨人一样，工业时代呼唤企业家的到来。诚如诺里斯1902年所说："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变化的时代，我们这个世纪的伟大字眼不再是战争而是商业……如果狮心王理查德（理查一世）活到今天的话，那他一定是一位联合钢铁公司的主要代表了。"①

其次，他们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倡导者。20世纪初美国建立了现代企业管理体系，股份公司已成为美国大企业中的主导形式。这同大企业家们的积极推行和发展股份公司形式是分不开的。他们不仅利用股份公司的形式而且创造和丰富了管理上的新鲜经验，并将它推进到新的高度，成为现代股份公司，甚至创造出控股公司的新形式。他们创造和发展了股份公司，同时又成为这些公司的核心人物，操纵公司。在公司内部企业家们又推行管理革命，摸索和建立了现代的管理体制。这方面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走在了前面。他在纽约百老汇大街26号设立由9人组成的最高董事会，下设专家委员会和职能委员会。"从9位托管人的活动方式看，他们完全像是一个行业的9位合股人，似乎只有他们才与该行业有关。"② 管理人员都为领取薪金者。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美国经济史家称道说："在美国所有企业的领导权还为个人企业家或传统的企业方法管理时，美孚的管理工作迅速为领取薪金的职员所取代。"③ 泰勒更是管理革命的创始人。他的著作《计件工资制》、《车间管理》、《科学管理原理》等都是有关科学管理的专门著作，对后世有重要影响。1903年福特汽车公司采用泰勒制取得良好效果。科学管理不仅对美国而且对全

---

① 埃米里·罗森伯格：前引书，第15页。
② 詹姆斯·罗伯特：前引书，第229页。
③ H·福克纳：《自由放任的衰落：1877—1917》，纽约，1951年，第424页。

世界都产生积极影响。

再次，大企业家往往从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角度出发，在企业内部大力运用新的科技发明从而较为迅速地将科学技术转化为新的生产力，推动科学技术的全面进步。特别是一些大企业家本身就是发明家，如爱迪生、福特、泰勒、汤姆森等等。他们直接参与新产品的研制和发明。汤姆森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中进行技术改造，采用多种新技术，福特的T型汽车，爱迪生的各类家用电气等等，都是大企业家直接参与下生产的。另一些大企业家本身不是发明家但重视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钢铁大王卡内基在企业内建立化学实验室，大胆起用德国化学家弗里克斯博士。他说："我们发现……一位有学问的德国人——弗里克斯博士——向我们公开了许多奥秘。"卡内基采用了化学博士的意见进行技术改造，大大降低了钢轨的价格。洛克菲勒曾经说：通过优质廉价的产品极大地扩展他的企业。在发现、获取和利用最优最省的生产方法上不惜工本。他寻求最优秀的管理人员和工人并为此支付高额薪金。他为了更好和更新的设备毫不犹豫地淘汰旧机器和旧工厂。为此他聘用德国化学专家、炼油专家赫尔曼·弗雷克开发印第安纳州的利马油田，并成功地将那里开采出来的含硫量很高的"酸油"精炼成可用石油，1899年美孚石油公司炼油4600万桶，其中50%来自利马油田。在海外市场上，美孚石油成为提供中国灯油的主要供应商。[①]

最后，部分大企业家建立了基金会成为美国现代基金会的开创者。在美国从事慈善事业方面，最为人称道的是百万富翁卡内基，他已成为美国著名的慈善家。他在1901至1919年间共出资5600万美元在欧美地区建立2509座图书馆。1911年以1.25亿的

① 西德尼·芬尼和杰拉尔德·布朗：前引书，第65页。

巨额建立纽约卡内基基金公司，成为当时美国规模和资金最大的现代化基金会。卡内基不仅积极行善而且还创立行善理论，他在晚年写了著名的《论财富》，提出了慈善理论，认为遗产有三种处理方式：或由死者家属处理，或捐赠给公共事业，或由活着的所有者管理，其中以捐赠公共事业为佳。他认为致富是依靠美国社会制度，因而致富后需回报社会，将一部分财富返回社会改善其他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返回财产的最好方式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生存能力和应变能力为目的的基金会。他甚至认为富人的财产是为穷人“保管”的。卡内基的理论不管有多大程度上的真实性，但在美国产生了较大影响。洛克菲勒继 1889 年捐款 60 万美元兴建芝加哥大学以后，又在 1901 年捐资 20 万美元组建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1905—1919 年间总共捐资 12900 万美元给教育委员会。1913 年他又以 1 亿美元为起点建立洛克菲勒基金会。1910 年以前美国已有基金会 144 个。这种基金会不仅使受益的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业因得到资助而发展，还有利于整个社会；而且从社会角度分析基金会的设立也是一种缩小分配差异的有效手段，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犹如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一样，美国大企业家群体对历史发展的正面作用与负面效应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们在促进工业化和垄断化的同时，对整个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消极影响也显而易见。因为他们充任了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转化时期的历史代理人和工具，由于这种转化本身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中进行的，是一种大鱼吃小鱼式的十分残酷的竞争过程，必然充满着种种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不道德和不公正。同时在转化过程中，大企业家追求的目标始终是高额的垄断利润，这种驱动力可以使他们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最后，这种转化的最终结果是在美国确立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这种制度的种种弊端甚至罪恶都会在他们

身上得到反应。因为他们是转化的推动者，也是转化成功后的得益者，他们窃取了工业革命的伟大成果，最终都踞于财富金字塔的顶端。一句话，大企业家功在垄断，罪在垄断。

首先，大企业家的发迹建立在中小企业主和广大劳动者（包括工人、农民和外来移民）破产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为什么工人农民和中小企业主对垄断十分憎恨和恐惧的原因。为卡内基、洛克菲勒、摩根等大企业家实现巨富和成功而付出惨重代价的首先是他们企业中的广大劳动群众。泰勒制明显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对工人们而言，却是意味着使他们成为流水线上的机器，他们每天上千次地重复一个简单的动作而毫无自由。福特汽车厂被工人们称为“把人变成机器的人间地狱”。一位美国学者说得好：世纪之交的“泰勒主义”作为一种理性化运动和严厉工作纪律的制度，进一步减低了生产成本，因而提高了美国人竞争的锋芒。但是由于使用这些已经成为“机械化”的人，使人类劳动变成机器技术的扩展，泰勒主义强化了雇主和工人间的阶级紧张关系，产生了反对增产流水线的狂潮和停止已增高了的生产率。美国制造商们沉湎于生产更多的产品而毫不关注社会分层和由于他们的“流程”所产生的冲突和斗争。[①] 特别是在污染严重的企业里，工人们的身心健康更是受到严重伤害。如 19 世纪 90 年代，卡内基的宾夕法尼亚霍姆斯特工厂空气污染十分严重。工人们对此展开坚决斗争。1913 年美孚石油子公司科罗拉多燃料与铁矿公司的工人们无法忍受种种残害而开展罢工斗争。“美国人民不仅怀疑每一个百万富翁敛取钱财的手段，而且准备相信每一个巨大财富的背后就是罪恶”。他们认为成百万人创造的财富已被少数人自私地盗用，已被强盗大王们用他们不负责任地占用企业

① 埃米里·罗森伯格：前引书，第 20 页。

所盗用。“成百万人的辛劳成果被无耻地巧取豪夺而为少数人去建立巨大的产业，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些占有者又转而蔑视共和国和危及自由”。[①] 有人这样说：“在洛克菲勒走过的道路上，遍布着破产的人和被遗弃的工厂，摆在他面前的只是对巨大财富资源的不容置疑的控制。”[②]

其次，垄断造成企业内部的集权统治，这就为个人滥用权力和进行不正当竞争提供了可能，必将导致严重社会经济后果。翻开这些大企业家的发家史，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据。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的发家就是典型。洛克菲勒采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搞垮别人，扼杀竞争者，因而被称为“工业杀手”，他的竞争手段之毒辣和残忍连推崇企业家的历史学家阿兰·内文斯也不得不说：“迄今为止，这是美国所有工业家集团所能想像得出的最残酷最无情的最能致人于死地的手段。”卡内基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特别在打击合伙人方面颇有手段。1900年他与焦炭大王弗立克的争端就是一例。最后因害怕弗立克揭露肮脏内幕而罢手。这些大企业家往往为追求高额利润而破坏竞争的游戏规则，常常为一己之私利兴风作浪、肆意横行、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秩序，造成国内经济运转的无序状态。他们的触觉还伸向美国的海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在那里展开竞争，强夺市场和攫取原料，给那里的人民带来痛苦和牺牲。此外他们还不惜挑起国际事端制造危机破坏人类安宁。从生态角度看，企业家们在利用科学技术提高利润的同时却又破坏生态平衡和自然资源。为了压低价格和降低成本，他们不惜破坏自然资源，无计划地大肆开采矿藏、滥伐林

① 西德尼·芬尼和杰拉尔德·布朗：前引书，第55页。

② 本·巴鲁克·塞利格曼：《美国企业史》，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76页。

木、消耗能源，给地球带来严重污染。

再次，财团和政府勾结，权钱交易造成滋生腐败的温床。大企业家们积累大量财富以后势必要在政治上施展身手，一是为了取得政治地位干预国家重大决策，操纵国家的政治命运；二是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而寻求政治保护伞。20世纪以前他们往往收买政客作为他们的代言人。20世纪初，大财团形成后，他们就直接走上前台，或担任要职、或资助政党、或资助总统选举以左右国家政治。在这方面摩根财团最为典型。20世纪初摩根财团成为美国政府的幕后操纵者之一。他资助历届美国总统上台（从格兰特、克利夫兰、西奥多·罗斯福、威尔逊到胡佛），由于摩根的政治作用日益增大，《华尔街日报》称他为“华尔街主神”，说他在“1901年重新组织了这个世界”。在美国中央银行储备体系建立和完备以前，摩根财团俨然成为中央银行的化身，屡屡帮助政府解决经济危机。1907年美国金融危机，西奥多·罗斯福特意邀请摩根共商国是，解决危机。可见其政治地位绝非一般。洛克菲勒则通过资助共和党参加竞选和与议会领袖联姻参与政治，以致共和党就像洛克菲勒基金会一样“几乎完全从属于洛克菲勒家属”。为了便于直接参政，企业家们还组织各种联合团体。继1895年成立的全国制造商协会后，1912年又建立了大企业家的联合组织——美国商会。1916年建立的布鲁金斯学会其成员多为大企业家和政府官员。1919年成立的国际事务协会（1921年更名为对外关系委员会）其成员近一半是大企业家或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律师。操纵舆论工具是大企业家们干预国家政治生活的有力手段。他们深知舆论宣传的重要性，舍得花钱控制他们，摩根财团控制的《华尔街日报》被称为是富人的“圣经”。总之，财团像一头章鱼，它的罪恶触须伸向全美国的任何地方，攫取一切可以抓住的东西。诚如美国学者所言：“实际上，我国

是被一系列工业、金融、政治、学术和文化中心所统治。而这些中心是同梅隆、卡内基、洛克菲勒、摩根、福特、麦考密克、范德比尔特……的姓名分不开的，就是这个系统影响了总统候选人的挑选，控制了国会两院，决定摩根对外政策，规定了经济方面优先考虑的方针，形成了文化和道德方面的标准，确定了谁该有权和谁该无权。"①

少数财团控制政治以后，权钱交易盛行，腐败成风，给美国的政治生活造成严重后果。如：1910年，罗伯特·阿奇伯尔德被塔夫脱总统任命为联邦巡回法官从事商务法院工作。这位法官在办案过程中竟收受被告某铁路公司的贿赂：免费让他和家人去欧洲旅行一次，最后是该铁路公司打赢了官司；有一次他又收受某铁路公司的钱财，作为交换条件他使该公司在官司中获胜。在任法官期间他竟还从事煤矿产业的投机买卖。他的罪行涉及伊利铁路公司、拉海谷铁路公司、路易斯维尔和纳什维尔铁路公司和费城—里丁铁路公司等。后东窗事发，1913年他终于受到参议院的弹劾被免去职务。《纽约时报》评论说："他树立了一个榜样，使腐败变得更容易了。"此类腐败案件在20世纪初的美国绝非少数。

大企业家在发迹后，一般都攫取大量财富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引起广大人民的愤恨。垄断化带来的必然后果之一就是贫富不均，社会财富如同企业兼并一样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根据1913年成立的美国联邦工业关系专门委员会提供的报告，在美国占全国人口2%的"富人"却拥有全国总财富的60%；占人口65%的"穷人"只拥有5%的财富；中产阶级占人口的33%，拥

---

① 柯克帕特里克·塞尔：《权势的转移》，（中译本），商务印书馆，北京，1976年，第3页。

有财富 35%。而工商界巨头亿万富翁——卡内基、洛克菲勒、范德比尔特、摩根等等只占美国家庭总数的 1%，却占有全国总收入的 15%左右。他们往往像赚钱一样拼命花钱，但是只为他自己和他的家庭。他们讲排场摆阔气，范德比尔特、摩根等人物可谓是这方面的代表。范的名字成了大量不动产的代名词。威廉·K·范德比尔特在长岛有一个豪华寓所，内有 110 个房间，45 个浴盆和一个容纳 100 辆小汽车的大车库。他的儿子花 600—700 万美元建造有 250 间房间的豪华住宅，建巨大的游艇。摩根不仅在国内有豪宅，而且还在英国买下城堡。

总之，大企业家群体充当了美国经济大潮中的弄潮儿，作为美国垄断化历史进程中的一支重要历史力量，他们的性格特征和思想素质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美国这段历史的发展轨迹和特点。他们勇于进取，敢于冒险，敢为天下先，抓住商机义无反顾，反映了时代迅猛向前发展的历史趋势；他们那种为追求财富而不惜采用任何手段的残忍，为竞争而不顾任何道德准绳，反映了他们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的某些社会本质。[①] 历史就是这样通过善与恶、功与罪、正面与反面的相互斗争和作用向前推进。20 世纪初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本完成和推动，美国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以个人垄断资本主义为特征的垄断资本主义最后确立，实现了美国历史上的“重大转变”。[②] 美国作为经济强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崛起在西方。

① 参见陆月娟："试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大企业家的历史作用"，《上饶师专学报》，1999 年，第 2 期。

② 罗伯特·韦尔伯：《寻求秩序：1877—1920》，纽约，希尔和王出版公司，1967 年，前言。

第二章

美西战争和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政策

美国工业革命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使美国成为工业大国而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世纪之交，美国沧桑巨变成为列强中最具潜力的“后起之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促使美国改变其外交形象和对外政策，寻求与其地位相称的国际声望和影响，在国际上发挥与其地位相当的作用。垄断资本主义成为美国向外争夺市场和资本输出的强劲动力，垄断资本家成为美国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直接驱动者和策划者；美国历史上的扩张主义传统为它在20世纪初年对外扩张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理论基础和历史经验。传统的扩张主义思潮和垄断时期帝国主义的扩张欲望结合成一种美国20世纪所特有的更强烈、更富侵略性的扩张主义政策和行动。“为实现它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梦想，经过半个世纪的准备以后，一个美利坚帝国的新样式，临时披上盔甲登上了国际舞台。”①

---

① 西德尼·芬尼、杰拉尔德编：《美国历史》，第2卷，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纽约，1961年，第223页。

一、世界强国地位的确立和海洋扩张战略

扩张主义是美国的历史传统，其实，美国的立国就是基督教向外扩展，信徒们作为上帝选民在新世界建立“山巅之城”使命感的产物；19世纪40年代在西进洪流中美国社会流行一种被称之为“天定命运”的扩张主义思潮，宣扬西部土地是上帝对美国人的恩赐，非美国人莫属。随着北美大陆边疆的消失，扩张主义者的目光早就盯上了新大陆以外的领土和领海。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兴起后，“适者生存”成为他们对外扩张的理论依据。

〔世界强国地位的确立和世界被瓜分完毕〕　美国虽然在内战以后开始崛起，但当时其国际地位依然属于二流国家。它名列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俄国和意大利等之后，充其量世界老七而已。但是历史跨入20世纪后，美国就令人刮目相看了，它作为世界经济强国之一已被国际社会所承认。“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外交家和作家很少用同样的口气将美国与6个已公认的强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俄国和意大利相提并论。20世纪初，它们几乎一成不变地将它包括在内了。”①这是由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所决定的。它全年的生产总值在19世纪90年代已跃居世界首位，已将老牌列强英国和法国等抛在身后。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必然结果。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美国在国际上以前所未有的勃勃野心积极寻求资本市场、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不断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代表美国大资本家利益的全国制造

---

① 欧内斯特·梅：《帝国民主：美国作为强国崛起》，哈珀和罗出版公司，纽约，1961年，第6页。

商协会，在1897年和1898年召开的年会上，一些企业家和商人强烈要求对外扩张。该会主席西奥多·塞奇在1898年年会上说："本协会是正当合众国制造商开始认识国外市场存在着他们机会之际成立的。由于会员中包括了大部分从事对外贸易的大制造商，所以发展对外贸易，本协会有着比合众国的其他机构都更为重要的利害关系。"一位纽约商人在会上力主打通地峡开辟新航线，他说："太平洋大规模贸易的展开，日本的开发，许多中国港口的开放，巨大的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的完成……假如我们要在太平洋国家的贸易中占有合理地位的话，开通这条航路，对我们整个民族来说都是必要的。……这条运河必须修筑，而且必须由美国人来修筑，由美国人来控制。"① 话语显露出一种不可一世的霸道气势。

经济利益需要政治权力的保护和支持，经济强国地位需要相称的国际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当时，美国在国外已经开始其殖民活动，在海外积极进行资本投资，海外的美国势力已经成为推动美国政府实行殖民政策的驱动力量。例如：美国制糖工业托拉斯在古巴已经有相当实力。古巴生产的糖90%输往美国。1898年，古巴第二次独立战争时，在古巴有直接经济利害关系的美国商人和企业家、银行家等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措施稳定古巴的政治局面，保护他们的利益。纽约商人曾给麦金莱总统写了请愿书，在列举了古巴发生的冲突已给美国造成的工商业的种种损失后，他们说："这一剧烈而有破坏性的冲突除了已使美国工商业蒙受巨大的损失而外，其危害美国利益的程度已达如此严重，致使我国政府确有正当理由，以恢复和平为惟一目标而迅速采取有效措

---

① 杨生茂、冯承柏、李元良编：《美西战争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1年，第47—48页。

施。”[①] 总之大企业家和大制造商为了大肆向外扩张开拓市场，积极组织力量对国外进行探索和调查，他们迫切需要在美国政界寻求靠山和支持；而美国政府也急切需要仰仗他们的经济势力稳定和发展国家利益，于是动用手中的权力和国家机器保护他们“走向”世界。商界和政界联手，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互为依存和利用，用国家力量保护商人到海外冒险，成为19世纪末年理解美国经济生活的两条主线。“这两个因素——美国制造者为寻求国外市场进行深入调查和麦金莱政府的迫切企求在这场冒险中支援商业社团——是理解1897—1898年新帝国的经济领域的两条线索。”[②]

关于经济扩张和政治扩张的关系，共和党议员、扩张主义者阿尔伯特·贝弗里奇讲得更为露骨：“今天我们种植着我们消费不完的粮食，今天我们制造着多于我们使用的产品。今天我们的工业社会是一个拥挤的社会；工人多于工作岗位；资本多于投资。我们无需更多的钱财——我们需要更多的流通和就业。因此我们必须为我们的产品找到新的市场，为我们的资本找到新的投资场所，为劳工找到新的工作岗位。”[③] 他极力鼓吹美国在1898年的对外扩张，宣称美国在扩张中获取的利益就意味着美国的劳动者有新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意味着美国农民生产的每一蒲式耳的小麦和谷物，每一磅牛油和食用肉，他们生产的每一种产品的价格都将得到提高。当时，美国一批扩张主义政客们在国会雄辩滔滔，在会外串联活动，极力推进扩张政策。“当美国进入新的1898年时，新的辛迪加和院外活动集团正为推进美国在东方

---

①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61页。

② 西德尼·芬尼、杰拉尔德编：前引书，第206页。

③ 《美国年鉴》，第12卷，第201页。

的利益而组织起来。”[①]

美国历史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曾在1900年发表《美国经济霸权》一书，预见在半个世纪内世界上只有俄国和美国两大强国，而经济上的霸权只有美国拥有。1901年他发表文章提出战争是经济竞争的极端状态，认为1897年至1901年间，美国出口超过进口额高达5.1亿美元，而且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增长，因为美国农产品可以在欧洲低价出卖，矿产品作为原材料也可以在欧洲销售，大部分的钢铁制品和其他工业较低档的产品都可以在欧洲廉价出售。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将越来越多地把欧洲挤出中间市场，如果美国加把劲，它的商品将可以欧洲国家无法竞争的低价充斥欧洲。欧洲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状况毫无改变地继续下去，他们已将美国看成是一个危险的敌人，一个竞争对手。亚当斯认为美国和欧洲之间，不是妥协就是战争，除非美国强大到使他们认为发动战争是危险的……。[②]

美国不仅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且在军事上也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咄咄逼人。强大的美国逐步成为国际社会的危险因素而受人瞩目，20世纪初在国际舞台上甚至出现了关于“美国危险”的阴影。1903年法国的一位前外交部长问道：“我们是否面临美国危险……旧世界将面对美国而走向失败？”“美国危险”一词常常出现在德国议会和争论中。一位英国记者W·T·斯蒂德在他的著作《世界美国化》中对美国作了非常偏颇的评价，他说：现在英国仅有两个选择，或与美国联合，“或沦为讲英语的比利时的地位”。1905年一位法国杰出而审慎的历史学家亨利·豪瑟尔写道：“人们在报纸上、会议上、议会里听到的除了美国危险外别

---

① 西德尼·芬尼、杰拉尔德编：前引书，第206页。

② 《美国年鉴》，第12卷，第426—427页。

无他物。”[①] 可见，美国已经从不被人注意的二流国家变成世人害怕的“美国危险”。

美国危险的另一个表现就是马汉的海上实力论迅速流行于世，引人瞩目。在19世纪中期，欧洲人只不过看到许多美国人在重新谈论“天定命运”，达尔文主义生物学的主要普及者约翰·菲斯克在30多个美国城镇演讲“天定命运”，但是菲斯克在国外并没有多少知名度。世纪之交，马汉鼓吹海上实力的书籍在1890年一出版，就在英国引起反响；接着，德国国王阅读后就下令将该书译成德文并在全国所有的海军图书馆收藏。“不久，马汉在欧洲犹如在美国一样享有盛名了。”[②] 马汉的出名在于他的理论，他以英国为例，说明实力的基本因素是商业——包括打开市场像殖民地那样保护市场——商船经商和战时用军事力量和海军保护商船和贸易。马汉的理论不仅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指路星辰，而且成为世界列强指导治国和外交的圭臬。马汉理论之所以受到列强的青睐，还因为加强海上实力符合垄断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反映了帝国主义的扩张本质。当然，列强重视马汉理论也反映了他们对美国危险的担忧，他们从马汉的言论中似乎也听到了美国人霍霍磨刀的声音。

但是当美国跻身世界列强，雄心勃勃地开始向海外扩张的时候，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已将世界瓜分，其中的非洲已被他们瓜分完毕。1914年，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保持政治独立外，其他所有非洲国家都已沦为殖民地。英国占有非洲的902万平方公里土地，占非洲总面积的30%；法国占非洲总面积的35%，德国占8%，意大利为7%，比利时为7%，葡萄牙为6.9%，西

---

① 欧内斯特·梅：前引书，第5—6页。

② 欧内斯特·梅：前引书，第8页。

班牙为1%。[1] 老牌列强和新列强之间在经济实力和占有殖民地的多寡之间产生了极大反差。美国和德国的综合实力虽然已大大超过英国、法国、西班牙、俄国等国，但是他们在世界上的殖民地和利益范围的数量却远远落在他们的后面，望尘莫及。为了打破这种不平衡，建立与资本和实力相称的殖民帝国，美国国内的扩张主义思潮再次泛起，并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传统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的结合〕　美国的扩张主义思潮是根深蒂固的。美国本身就是欧洲扩张的产物，它的扩张主义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欧洲。"欧洲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可用欧洲基督教的扩张主义来解释。与欧洲其他大宗教完全不同，基督教浸透了普济主义、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从一开始起，基督教就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宗教；从使徒时代到现在，积极传教一直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特点。"[2] 美国殖民地时期，移民始祖们作为上帝的"选民"肩负基督教使命来到新世界建立"山巅之城"，这本身就意味着对新世界的扩张。因此"自从独立以来，美国人已经周期性地变成侵略性和好争吵的"。19世纪40年代中期，美国出现了天定命运论——"一个名称新颖的扩张主义形式"，"它意味着由上苍预先安排的向尚未清楚界定的地区进行扩张。有的理解为向太平洋沿岸扩张；有的认为扩张到北美洲大陆；也有认为扩张到整个半球的。……直到19世纪中期，它吸引了足够的民众形成了一场运动。……为了完成未

---

① 见艾周昌、郑家馨主编：《非洲通史（近代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年，第622—623页。

②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来伟大美利坚国家的结构，一个世纪也许是必要的。”[1] 在这种思潮的鼓舞下，美国统治者发动了与墨西哥的战争，并为了实现“天定命运”占领太平洋沿岸，威胁同英国开战。一些人已经谈论窃取西班牙的古巴，一些人支持匈牙利革命，企图干涉欧洲事务，一些参议员认为美国可以击败任何欧洲的联盟。内战即将爆发时，国务卿西沃德甚至建议林肯总统挑起与欧洲的纷争以避免内战。[2] 如果说基督教使命感和“天定命运”论是传统扩张主义，那么以马汉为代表的海上实力论就是美国帝国主义时代的新扩张主义，马汉（包括鼓吹扩张主义的一些美国政客，如：阿尔伯特·贝弗里奇等）是其最完美的理论代表和鼓吹者，美国总统麦金莱、西奥多·罗斯福（习称老罗斯福）、塔夫脱和威尔逊则是其最忠实、最积极的推行者和执行者。其中尤以西奥多·罗斯福为代表。他于 1897 年 6 月 2 日在纽波特海军学院发表演讲，鼓吹建立强大的海军和不惜战争，说：“一个真正自豪、勇敢的伟大民族，将敢于承担一切战争的灾难，而不愿以国家荣誉为代价去购买那种卑鄙的繁荣。……如果我们拥有一支令人畏惧的海军，那么，为了坚持门罗主义而被拖入一场战争的机会实在是很少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支海军，战争可以在任何时候降临到我们头上。没有以武力为后盾的外交是全然无用的；外交家是军人的仆从而不是军人的主人。……我们要求一支强大的海军，部分是因为我们认为拥有这样一支海军是和平的最可靠的保证，部分是因为我们感到如果一个国家在必要时不愿孤注一掷，以战争作为对一切事情的最高裁判，不愿大量的流血、流泪，耗费财

① F·默克：《美国历史上的天定命运和使命感》，阿尔弗雷德·A·诺夫出版公司，纽约，1966 年，第 24 页。

② 欧内斯特·梅：前引书，第 7 页。

富，而情愿丧失荣誉和声望，那么这个国家的生活就毫无价值。"① 罗斯福极力把马汉的理论变成为现实，将扩张主义思潮变成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战略，鼓吹美国应该拥有一支"令人惧怕"的强大海军，鼓吹以武力为外交的后盾，美国要实现强国梦必须依靠实力，其中最主要的是海上实力。传统扩张主义主要适应美国的大陆扩张需要，主要武器还是枪炮和政治讹诈；新扩张主义适应海外扩张，即要越过国界线远渡重洋，主要依赖于海军实力和国际外交策略。

当然传统扩张主义和新扩张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其理论依据是盎格鲁—撒克逊的种族优越论。贝弗里奇这样说："我们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必须遵从我们的血统来占有新市场和新土地，假如新土地是必需的话。（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缔造帝国的本能。"② 以前仗着这种高贵血统论，他们开拓新世界，在北美建立殖民地；他们肩负上帝使命不断向西挺进，甚至不惜用血和火强占墨西哥的土地；20 世纪初，他们又要凭着缔造帝国的"本能"向着海外占领"新市场和新土地"。贝弗里奇 1898 年 9 月 16 日又在国会发表演说，鼓吹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美国的政府形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因此美国人应将它们推广到全世界。他认为对外扩张不仅是商业和政治方面，而且还有美国人的道德优越性都应该向美国以外的世界各地传播。③ 老罗斯福早在 1897 年就写道："如果英国推翻了马赫迪派和打开了苏丹，那么它正在尽到一个文明国家的责任。"他还说："讲英语的种族应该统治南非……，美国……应该统治西半球。"诚如美国史家霍华

①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 50—51 页。
②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 66 页。
③ 《美国年鉴》，第 12 卷，第 198 页。

德·比尔所言：老罗斯福和他的朋友们坚信讲英语民族的扩张意味着世界和平的取得和文明的扩展，“这个信念主导了他对外交政策的观察。”①

简而言之，美国20世纪初的新扩张主义是传统扩张主义的继续和发展，② 是一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扩展欲望和思潮。美国众议员吉布森竟然说：“财富、权力和光荣是人类野心最伟大的目标。它们是海盗两千年前就渴望的三件东西。这就是促使他们的后代敢于在海上冒险，在大陆上追随作为指引西进道路的‘帝国之星’敢冒风雨的三件事。……老海盗精神表现在陆地上。它是我们民族的主导精神。它决心走自己的路。‘天定命运’是它的宣言，它的格言，它的信念和它的战斗呐喊；即使现在美国人民正开始新的航程，他们依然在这种精神和这种原则的激励之下……”③ 。帝国主义扩张主义虽然与传统扩张主义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和共性，但仍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第一，它以海外扩张为特点。当时美国的大陆扩张已经完成，北美大陆已无地可“扩”，新扩张主义以海外国家和地域为扩张目标，因而具有

---

① 霍华德·比尔：《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世界强权的兴起》，科利尔—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纽约，1967年，第45—46页。

② 美国历史学家默克在他的《美国历史上的天定命运和使命感》（阿尔弗雷德·诺夫出版公司，1966年，纽约）中认为：“19世纪90年代的帝国主义被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仅仅是19世纪40年代的天定命运论的变种而已。这是一种错误。它是天定命运论的反题。天定命运是大陆主义。它意味北美洲的吸纳。它在州权中找到鼓舞。……1899年的扩张主义是偏狭的帝国主义，它受到同类的国家主义的鼓舞。”（第256—257页）。他还认为大陆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教义从未真实反映美国的民族精神，“较为真实反映民族精神的是使命感”（第261页）。默克将美国历史上的使命感、天定命运和扩张主义完全对立起来加以考察评价，似难自圆其说。其实，美国历史上的基督教使命感、天定命运论和19世纪90年代的扩张主义间虽然存在某种差异，但无法否认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诸如种族优越论、文明优越论的思想联系和共同点。

③ 阿尔伯特·K·温伯格：《天定命运：美国历史上的国家主义的扩张主义研究》，四方院子图书出版社，芝加哥，1963年，第266页。

极大的侵略性，美国扩张主义理论经过海上实力论的充实，即他们的扩张已经超越任何空间界限，在他们的眼中除了美国利益外地球上不存在任何地域界限，只要符合美国利益，世界上任何地方他们都可以占领，使之成为美国领土的一部分。贝弗里奇在1898年9月16日赤裸裸地对国会说："距离和海洋无可争议。我们祖辈购买的和占领的全部领土都属毗邻是不争的事实。1819年佛罗里达与纽约的距离比今天波多黎各与芝加哥的更远；1845年得克萨斯与华盛顿的距离比1898年夏威夷与波士顿的更远；1847年的加利福尼亚比如今的菲律宾更难进人。直布罗陀与伦敦的距离比哈瓦那与华盛顿更远；墨尔本与利物浦的距离比马尼拉与旧金山更远。海洋无法将我们和责任与期望之地分离……"①

第二，新扩张主义以海军实力为手段。因为美国既然进行海外扩张就必须具备越洋的手段和实力，而这非海军莫属。同时这种海外扩张又必然与其他列强在海上相遇相争，海军实力的大小最后决定这种较量的结果。因此美国必然会遇到竞争对手，其中美国认为最大的对手是老牌列强英国——往日的世界海军之王；另一个就是德国，它的海军实力正在飞速增强。因此美国扩张主义者致力于宣扬力量，炫耀武力。《华盛顿邮报》的一篇社论这样说："一种新的意识——力量的意识似乎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思想，有了它我们就有一种新的渴望，即渴求显示我们的力量……。野心，利益，追求土地，荣耀，纯粹的好斗，无论它是什么，我们被一种新的感觉变得生气勃勃。我们面对着一个陌生的命运。人民口中尝到的帝国滋味恰恰就像丛林中的血腥味一样。它意味着一种帝国政策，共和国，复兴，在已经武装起来的国家

① 《美国年鉴》，第12卷，第200页。

中占有一席之地。”[1] 西奥多·罗斯福入主白宫后就要求国会拨款建立一支有世界影响的海军舰队。1908年，美国已建成位于世界第二的海军舰队：29艘新型战列舰组成的总吨位达611万吨的舰队。

第三，以垄断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海外扩张，特别是以开拓投资场所为具体内容。新扩张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相结合。以大棒为后盾，用金元开路，军事、政治、经济三“管”齐下。在经济上表现出对海外国家疯狂的掠夺性和功利性。

第四，新扩张主义综合了传统扩张主义的理论和说教，以使命感为基础，继续以基督教教义的神圣使命和传播文明为己任作为美国对外扩张的美丽外衣，采用文化手段向海外国家输出基督教文明和帝国主义文化。罗斯福上台前不久就说过：“在文明世界里没有，也不能有野蛮。对生活在野蛮中的人民而言，我们的责任就是关注他们从锁链中争得自由，我们只有摧毁野蛮本身，才能使他们获得自由。传教士、商人和士兵在这场建设中也许都有各自的作用要发挥，最终使人民道德提高和获得进步。”[2] 同时，这种新扩张主义还可以追溯到种族主义思想。有学者认为西奥多·罗斯福曾经是一位种族主义者，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是伯吉士的学生，他也受到种族扩张梦想的鼓舞。在他的历史著作《西方的胜利》中，罗斯福从边民与印第安人的斗争中得出结论：白人的到来无法阻止，美国的发展代表了这种种族成长的伟大历史的最高成就。”[3]

美国新扩张主义犹如一柄利剑在与西班牙的首次较量中露出了那阴冷而锋利的青光，挑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

---

① 温伯格：前引书，第289页。

② 温伯格：前引书，第429—430页。

③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比肯出版公司，波士顿，1955年，第175页。

二、美西战争：历史上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

20世纪初，在美国扩张主义者的世界地图上，太平洋地区和加勒比海区域成了他们海外扩张的战略重点，昔日世界强国西班牙成了美国扩张道路上的最直接的障碍。西班牙曾经在世界上风云一时，在拉丁美洲和太平洋上占有大量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但是18世纪以来，西班牙国运日衰，不久就为英法等国所超。19世纪末，在新兴帝国美国、德国、日本迅速崛起之时，西班牙更显衰败老朽之态，在古巴的统治也摇摇欲坠。

〔美西关系恶化〕　早在1895年，古巴人民就发动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起义。1896年西班牙政府镇压古巴起义。美国人民同情古巴人民，在古巴投资的美国商人和企业家也积极支持古巴人民起义。美国麦金莱政府利用人民的同情，在1896年6月向西班牙政府提出抗议。其实，美国政府早就为了争夺海外市场和势力范围准备同西班牙摊牌。1897年4月19日，西奥多·罗斯福就任美国海军部副部长。9月，他就开始考虑同西班牙的作战方案。9月20日，他在写给约·戴·朗的信中说："应准备立即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把我们的主力放在古巴，由沃克将军统率，并以一支由埃文斯或某位类似的人物率领的飞行舰队对付西班牙，而亚洲舰队对菲律宾作战，我相信事情不会出现很大困难。"[①] 1898年，美国政府又以保护美侨为名派遣"缅因"号战舰开赴哈瓦那。接着，美国报纸，特别是威廉·R·赫斯特主编的《纽约日报》和约瑟夫·普利策主编的《纽约世界》，立即掀起和制造反对西班牙的舆论。有的报纸还公开了所谓西班牙驻美公使

①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160—161页。

称美国总统为“狡狯政客”的信件。1898年2月15日晚间，“缅因”号战舰在哈瓦那被炸沉，350多名官兵伤亡（2名军官和264名士兵殉难）[①]。同年3月的调查结果表明缅因号战舰“系由一枚水雷爆炸而被毁，水雷爆炸引起该舰前部两处或多处弹药舱的局部爆炸”，[②] 但是无法肯定是谁所为。不久，全美掀起了反西班牙的狂潮，“牢记缅因号”在美国成为激动人心的口号。美国报刊更是推波助澜。如：《美国人日报》极力煽动美国同西班牙开战，报纸头条大标题为“缅因号因背叛被炸！”和“全国为战争狂热而激动！”[③] 阿尔伯特·肖的《评论者之评论》在1898年4月发表社论，也加入了这场战争宣传的大合唱。社论带有煽动的口吻说：“他们（西班牙）将缅因号在哈瓦那的出现看成是对西班牙在该岛主权的威胁，看成是对叛乱的鼓励。……在这真正紧急的时刻，……在美国只有少数人——我们不会相信在7500万人口中会超过10个人——认为美国在古巴危机面前应该放下武器，而与西班牙握手言和接受西班牙的主权……”[④]。美国最受人重视的报纸《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也参与其中，主笔亨利·沃特森在1898年4月20日发表社论，从所谓“法则”的角度论证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正义性。他说：“我们不要在名称档案馆里那已发了霉的记录中找到我们对这场战争的正当理由。我们在至高无上的法则中——高于土地的、动产的、人体的、人的灵魂的各种名称的法律的法则中——即人的法则、上帝的法则中找到

---

① 法兰克·N·马吉尔：《历史大事记：美国卷》，第2卷，萨伦出版公司，新泽西，1975年，第1286页，该书认为大约260美国人被炸死。最后统计约266人丧生，伤百余人。

②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143页。

③ 《美国年鉴》，第12卷，第168页。

④ 《美国年鉴》，第12卷，第169—172页。

它。我们从自己的灵感中，从我们自己的命运中找到它。我们从费城敲响我们自己主权的自由钟那里找到它；我们在枪口下赢得我们独立的爱国者的鲜血里找到它……”[①]。他企图从美国人的价值观念中获取同西班牙开战的“正当”理由。

随着美国国会中主战派的呼声日益高涨，麦金莱政府加速备战。1898年2月25日，美国海军准将乔治·杜威在香港太平洋基地接到海军部命令——“如果西班牙宣战，你的任务是监视西班牙舰队，使之不离开亚洲海岸，然后对菲律宾群岛发动攻击”。[②] 3月25日，麦金莱总统在白宫接到来自纽约市的一位值得信赖的政治顾问、《纽约先驱报》主编里克的电报，说：“这里的大企业现在都相信我们将有一场战争。相信所有人都欢迎战争，摆脱担忧。”[③] 4月10日，西班牙政府发表同意停战的声明；4月11日，美国总统要求国会授权使用武力，确保古巴获得自由。4月19日国会经过激烈争论参众两院分别以42票对35票，311票对6票通过决议，主张“承认古巴人民的独立，要求西班牙政府放弃它对古巴岛的权力和统治，并从古巴和古巴水域撤退其陆海军部队，责成合众国总统使用合众国陆海军实行这些决议。”[④] 4月24日，西班牙向美国宣战。1898年4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正式向西班牙宣战。

〔美西战争：历史上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 1898年5月1日早晨，美国太平洋舰队在马尼拉湾击溃西班牙舰队，美西战争正式爆发！美国海军准将乔治·杜威所率舰队损失甚微，但西班牙舰队大伤元气：3艘被击沉，8艘被焚毁，2艘被俘。美国

---

① 《美国年鉴》，第12卷，第194页。

②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171页。

③ 西德尼·芬尼、杰拉尔德编：《美国历史》，第2卷，前引书，第213页。

④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173页。

海军取胜后，利用菲律宾起义军的力量共同抗击西班牙军事力量，最后占领马尼拉。

自1898年5月1日开始，美国在马尼拉湾海战胜利以后，战争主要在古巴战场进行。1898年5月19日，西班牙舰队在塞维拉率领下，从佛得角来到古巴圣地亚哥港，6月美国海军在海军中将桑普森领导下抵达圣地亚哥附近。6月14日，美国陆军在古巴登陆，西奥多·罗斯福率领的第一义勇骑兵团也在古巴战场参战逞威。7月3日，美军在古巴圣地亚哥港彻底击溃西班牙海军上将所率的西班牙加勒比海舰队，"3个世纪以前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击败以来，衰败中的西班牙帝国海军力量现在又受到了一次致命的打击。"① 7月17日，美国威廉·谢夫特将军攻占圣地亚哥市，22万西班牙官兵在圣地亚哥被围投降。同月下旬，美国军队几乎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波多黎各。西班牙在战争中败北，8月12日西班牙政府请求停战。在整个战争中，美国陆军死280名，伤1577名；海军死伤和退役共91名。② 有人形容美国轻易取胜时说："胜利似乎像采摘成熟的草莓那样容易得来。"③

10月，美西双方代表在巴黎会面商讨战后安排问题。12月10日，美西双方在巴黎签订和约，西班牙放弃古巴并承认古巴独立，将关岛和波多黎各割让给美国，还以2000万美元为代价将菲律宾群岛主权转让给美国。190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普拉特修正案，规定古巴不得向美国以外的其他任何国家转让土地；美国取得在古巴建立军事基地的权利，并可以维护古巴"独

---

① 马吉尔：前引书，第1287页。
②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228页。
③ 詹姆斯·T·亚当斯：前引书，第338页。

立”而对其进行干涉等等。1903年美国强占古巴两处海军基地。

美西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共和党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在波士顿发表演说，道出了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他说：“和英国一样，我们要在全世界设立贸易站，我们要使我们的商船遍及于各大洋，我们要建立与我们的伟大国家相适应的海军；广大的殖民地将在我们的贸易站周围扩展开来；美国的法律、美国的秩序、美国的文明和美国的国旗将在迄今为止是血腥而黑暗的土地上树立起来。假如这是意味着将星条旗飘扬在巴拿马运河上空，在夏威夷上空，在古巴和南海上空，那就让我们欢欣鼓舞地面对那一含意而且实现它吧……”①。

美国参议员亨利·C·洛奇在美西战争后向国会发表演说为美国占领菲律宾辩护，赤裸裸地大谈“获得菲律宾群岛对美国的利益”。除了菲律宾本土的丰盛资源外，他还特别谈到美国占领菲律宾对进一步向中国扩张的“重要意义”，他说：“杜威的胜利使我们在东方问题中处于优势地位。”②

美西战争的胜利证实了马汉海上实力论的“正确”。战争刚结束，1899年马汉就对战争进行总结发表专论，指出20世纪初期殖民主义的某些特点。他认为应该学习英国的殖民统治经验，“以英国的经验为指导”，反对像西班牙殖民者那样“对劣等种族实行残酷压迫”。③

美国在美西战争中获胜，拉开了美国大规模海外扩张的序幕。美西战争对美国的未来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这是美国由大陆扩张发展为海上扩张的转折点，这场战争标志其外交政策已由孤

---

①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66页。
②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286页。
③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276页。

立主义转向对外扩张主义。战争的胜利加强了美国与拉丁美洲和远东地区的联系。战争的胜利使美国成为一个殖民帝国，“这场战争的结果为这些商人进一步经济扩张提供了新的机会”。[①] 它使美国开始成为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世界强国。

美西战争结束后，麦金莱总统继续推行他的对外扩张战略。但是，1901 年 9 月 6 日他在纽约州布法罗的泛美博览会的音乐厅前不幸遇刺，14 日身亡。

〔“西奥多·罗斯福推论”[②] 和大棒政策〕　麦金莱遇刺身亡后，西奥多·罗斯福于 1901 年 9 月 14 日接任美国总统。他是一位狂热的扩张主义者，他信奉维持世界秩序是一切文明强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国际事务中他强调实力的重要性。老罗斯福在 1904 年和 1905 年对国会提出国情咨文，主张奉行门罗主义对拉丁美洲进行干涉以保持该地区的所谓稳定。他提出了门罗主义的“推理”。1904 年 12 月 6 日，他在给国会的国情咨文中说：“导致文明社会纽带全面松弛的长期为非作歹或软弱无能，在美洲如同其他地方一样，会最终需要某一文明国家进行干涉，而美国在西半球如果遇到这种为非作歹或软弱无能的罪恶昭著的事情，为了恪守门罗主义，也不得不勉强施行国际警察力量。……我们对它们的干涉只是最后手段，仅仅在他们明显地无能或不愿在国内外维护正义，危害到我们美国利益或招致外国人侵伤害美洲国家整个躯体时才这样做。”[③] 老罗斯福在 1905 年 12 月 5 日给国会的第 5 次国情咨文中，进一步提出了他的推论。他说：“对和平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就是门罗主义，因为它已经一直如此，并正由这个

---

① 西德尼·芬尼、杰拉尔德编：前引书，第 207 页。

② 亦译作“申论”。

③ 詹姆斯·纽比尔等：《美国历史注释本》，韦茨华斯出版公司，加利福尼亚，1971 年，第 351 页。

国家所发展和已为其他国家所接受。没有任何政策如同它一样有效地促进西半球的和平，和给予其上的每一个国家沿着他们自己的道路发展的机会。如果我们拒绝使这个主义适应变化着的条件，现在它会全面陈旧，它不可能符合当今时代的任何需要，事实上，可能被当今时代废弃不用。由于我们已经提出让它符合本半球增长和变化着的需要，它在国内是有用的，在国外正得到承认。"①

老罗斯福的外交政策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即以"大棒"为主。1903—1904年间，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提出建立一支强大和有效的海军的计划，但是遭到来自俄亥俄的众议员西奥多·伯顿的反对，1904年2月22日，伯顿在国会发表演说反对海军计划。次日，老罗斯福就写信给他予以答复，宣扬"没有海军就没有帝国"的观点。他说："让我非常简短地指出我认为希望停止建造海军的那些人的根本错误……一个令人不可饶恕的罪行是，在一个需要力量和勇气的时候，人们表现得缺乏勇气和力量。""如果过去8年里共和党所作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不应该吞并夏威夷，或不应该取得菲律宾，或不应该在古巴建立保护国体制，或不应该开始建造巴拿马运河，那么我们得转变政策和放弃建立海军；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坚持这些政策而不用一支海军去支持它们，将会给我们的子孙后代铸成一个巨大的错误。""要是我们在菲律宾有一个海军基地；要是我们在亚洲海域有一支海军舰队，或在我们人民希望找到市场的东亚发挥最微弱的作用，那么在苏比克湾建立一个我们的海军基地就是最重要的。""现在中国成了列强的消遣玩物，因为她一直在思想上藐

① 约翰·格拉蒂、罗伯特·戴维尼：《20世纪美国：当代文件和观点》，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波士顿，1968年，第38页。

视和没有在海岸和水域建造军事力量，因此无力维持国内秩序和外御侵略。欧洲小国虽然在许多情况下领导了荣耀和自尊的生活，但无力在外交事务中完成任何重大作为，就是因为他们在良好愿望的背后缺乏力量的要素。相反，我们已经一直为海牙法庭和国际仲裁事业所作甚多；我们已经在我们南方水域维持和平；结束了古巴、菲律宾和巴拿马的流血骚乱和流血的国内争斗；我们能够对中国施加和平影响。因为，仅仅因为同正义与和平的目的相随的是，我们拥有一支表明我们不会驯服顺从非正义或默认破坏和平的海军。"①

关于老罗斯福提出门罗主义推论的实质，美国学者认为“西奥多·罗斯福不满新世界的力量平衡。他企求美国对西半球的统治，因而他推行计划，实现他的目标政策。……他特别害怕欧洲列强干涉那些中美洲和加勒比尚未稳定的共和国。为防止这种危险，他发展了他本人对门罗主义的推论”②。使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变成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在外交手段上，他的信条是“说话温和，手握大棒……”，这就是所谓的“大棒政策”。为了增加“大棒”的份量，老罗斯福大力发展美国的海军力量，使美国海军综合实力由世界第7位急剧上升为第2位。

对于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威廉·威廉斯谴责他是一个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有人将他和布鲁克斯·亚当斯、亨利·洛奇一起称为“一个战争连绵不绝的世界上的3个枪手”。也有人认为罗斯福“是中美洲的警察，列强间的和平缔造者”。有的学者深入分析认为罗斯福的扩张主义倾向基于如下3方面的需求：一是要求控制那些战略要地，依此进击地峡运河；一是将每一个欧洲列

---

① 《美国年鉴》，第12卷，前引书，第597—598页。

② 约翰·格拉蒂、罗伯特·戴维尼：前引书，第35页。

强赶出这块大陆；一是保证一些较弱小国家不要拒绝一个肩负优秀民族使命的大国的计划。他认为罗斯福对国家政策和国家实力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坚定的把握，他懂得在国际关系中最崇高的理想是毫无价值的，除非它有实力为后盾。[1] 有的学者认为，同老罗斯福经常被摘录的格言相矛盾的是，"罗斯福说话并不总是温和的，有时他的棍棒也大得不够"。[2]

老罗斯福的门罗主义"推论"的实质就是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变为"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门罗总统提出门罗主义与罗斯福对其所作的"推论"，反映了美国传统扩张主义和新扩张主义的区别。前者是在美国羽翼未丰、国力甚弱、人微言轻的背景下，在拉丁美洲各国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形势下，门罗总统出于美国利益考虑，为避免欧洲列强染指拉丁美洲所提出的一项外交原则。在表面上多少带有某些尊重拉丁美洲国家主权的意味。但是罗斯福的"推论"明显地发出这样的信息：拉丁美洲国家是需要文明国家加以管理的落后和不文明的地区，这个负有管理责任的文明国家不是别人，就是美国。美国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在拉丁美洲维护稳定和和平的国际警察的责任。隐含其背后的真正目的是美国要独占拉丁美洲，使其成为美国的利益范围。这是因为美国已今非昔比，在国际上它已头角崭露、财大气粗、穷兵黩武，可以对别的国家指手划脚，仗势欺人了。

〔塔夫脱的金元外交〕　1908年，罗斯福政府的陆军部长、"生就一个当法官的头脑"的塔夫脱在大选中获胜。次年冬天，在一个"大冷天"宣誓就职。塔夫脱继续美国的扩张主义外

---

① G.K. 哈纳斯和 J.S. 沃克编：《美国外交关系史学评论编纂史》，格林伍德出版社，康涅狄克，1981年，第93页。

② 查尔斯·塞勒斯等：《美国史专题》，兰德·麦克纳利学院出版公司，芝加哥，1977年，第281页。

交政策。1910年，塔夫脱在匹兹堡发表演讲，提出了所谓的“金元外交”。他说：“促进和平关系和促进商业关系是一致的。如果美国保证他的公民在国外投资的合法权利的保护，将促使这样的大规模投资和刺激扩大商业关系，其结果是值得赞扬的。这样的外交被称为‘金元外交’，……这种外交给予其他国家的商人为世界商业竞争以一个他们自己政府非常乐意提供的有利条件，我们政府不应该忽视给予他自己的商人、制造商和资本家提供这个有利条件。……追随这样的政策，美国资本向外国政府提供贷款是合情合理的。政府不仅以资本家的利益而且以期望中的广泛国家利益来衡量企业对实施贷款的支持。”① 当时美国的外贸额每年已高达20亿美元。塔夫脱在1912年12月给国会的最后一份国情咨文中对金元外交作了进一步的辩解，他说金元外交是为了保护中美洲国家不受沉重的外债和拮据的国内财政的危害，美国政府支持和鼓励美国银行家向这些国家的财政复兴助一臂之力。金元外交是门罗主义的扩大。“美国政府乐于鼓励和支持那些愿意伸手援助，使这些国家财政得到复兴的美国银行家，因为这种财政复兴和防止海关成为所谓独裁者的掠夺对象，乃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一方面可消除外国债权人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可消除革命混乱的威胁。”他又说：“在中国，鼓励金融投资以促使中国自助的政策，已经产生使门户开放政策得到新的生命和实际应用的效果。”② 事实上，塔夫脱上台后，依靠国务卿P.C.诺克斯直接指导加勒比地区的政策，依靠威廉·菲利普和维拉特·斯特赖特处理远东问题。他于1912年对他的“金元外交”作了系

① 约翰·加雷迪、罗伯特·戴维尼：前引书，第45页。

②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商务印书馆，北京，1964年，第123—124页。

统和本质说明，即“以金元代替枪弹”，但并非放弃枪弹，而是金元和枪弹并用，以枪弹为后盾，用金元开路，对弱小国家实行资本输出和经济侵略。

美国学者在评价塔夫脱外交政策时，都注意到他的最高目标是用“非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取代领土帝国主义，即用黄金代替枪弹去获得超额资本和商品的出路，从而避免正式的殖民主义和政治控制。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强调金元外交仅仅是为了与世界上其他各国的外交政策和美国其他各届行政当局的外交政策相区别而已。也有学者把金元外交贬为“只是一个把自己依附于门罗主义身上的一个令人讨厌的藤壶而已”。有人认为老罗斯福的外交政策是通过利益范围取得大国的力量平衡，塔夫脱则通过普遍的经济原则达到同样目的。老罗斯福更多地从欧洲范围考虑他的外交政策，塔夫脱则从不发达国家及他们的商业要求考虑美国的外交政策。①

〔威尔逊的使命外交〕　　1912 年美国大选，民主党提名威尔逊为总统候选人。这位曾是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饱学之士，在担任新泽西州州长时颇有政绩的教授和历史学家，在竞选中提出“新自由”的口号压倒了共和党老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取得选举胜利，从而结束了共和党人的长期执政，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第 28 任总统，开始了民主党人的新的统治。他上台以后，在国内积极推行“新自由”；对外政策上，企图改变前任的共和党外交政策，出于他的喀尔文教的信念和对盎格鲁—撒克逊民主制度的长期研究，提出用道德原则而不是经济利益或政治强权处理与外国的关系，特别是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他企图向拉丁美洲人民传播如何制定宪法和选举诚实的政治领导人。威尔逊上台后

① 哈纳斯和沃克编：前引书，第 101 页。

曾标榜他的外交政策是基于正义而不是利益，“新自由”将是美国的输出品之一，因此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威尔逊搞的是“使命外交”①；同时他还宣称美国将在拉丁美洲实行睦邻政策。其实他的睦邻政策是大棒政策的继续。威尔逊1913年在亚拉巴马的莫比尔发表演说，在谈到对拉丁美洲的外交政策时侈谈友谊和荣誉。他说：“我们必须证明我们自己是他们的朋友，是他们平等和诚实的战士。你们不可能在不平等地位上成为朋友。你们不可能在没有诚实的一切名义下成为朋友……理解必定是生长一切友谊果实的土壤……美国决不用征服再去寻求另外的1英尺领土。”② 威尔逊对外极力推行所谓“使命外交”；对邻国还经常强调所谓“睦邻”关系，事实上是继续实施美国的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战略，特别对拉丁美洲和亚洲进行新的扩张活动。

总之，在“大棒政策”、“金元外交”、“使命外交”之下，美国大肆对外扩张，在军舰大炮的护卫下，美国星条旗插向他们所认为的新“边疆”，跨越太平洋，登上中国的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土地，“美国造”的商品向世界各地倾销……。

三、向太平洋地区和亚洲的扩张

美西战争的直接后果就是促使美国向太平洋和大洋彼岸的亚洲进行扩张，美国利用对西班牙的胜利取代了它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向西扩而张之，同时促使美国形成了对中国的完整政策。1903年5月，T·罗斯福在旧金山说：“在我来到太平洋沿岸前，

---

① 阿瑟·林克：《伍德罗·威尔逊和进步主义时代：1910—1917》，前引书，作者在第82页注释中说明，“传教士外交”并非技术性含义，外交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外的传教士和传教活动。它的确切含义简单地说就是把期望帮助其他国家作为外交目的。

② 约翰·格拉蒂、罗伯特·A·戴维尼：前引书，第46页。

我是一个扩张主义者，来到这里以后我无法理解任何人……除了是一个扩张主义者外还能是任何别的什么。”[①] 太平洋使他垂涎三尺，迫不及待。

〔侵占菲律宾〕　强烈主张向远东扩张的美国政客，前美国驻中国公使查尔斯·邓比认为太平洋命中注定比大西洋具有更大的商机，他从远东地区对美国所具有的战略意义的视角为美国占领菲律宾辩护，1898 年 11 月他发表文章公然宣扬：“我们有权作为占领者取得菲律宾。我们有权占领它们以作为对战争的部分补偿。……如果我们放弃菲律宾，我们将丢失在远东坚持我们影响的良机，如果我们蓄意这样做，将遭世人嘲笑。我们为何占领马尼拉？我们为何派出 20000 军队去吕宋？……”“菲律宾是我们在远东的立足点。占领它们能给予我们地位与影响，也带给我们富有价值的进出口贸易。”他认为现在的美国已经不是华盛顿总统时代的美国了，它的对外政策应该改变，他说：“我知道根据华盛顿告别演说的教导存在着一种反对占领外国领土的国家意识，但是世界前进了，环境变化了。我们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有巨大的商业需要照顾。我们要与世界商业国家竞争那遥远的市场。现在是商业而不是政治成了国王，是制造业主和商人主宰外交和控制选举。”[②] 在美国扩张主义者的眼中，菲律宾在美国向远东“进军”中具有战略意义，美国必欲夺之而后快。

但是菲律宾人民是热爱独立的民族。早在 1896 年，菲律宾人民就掀起了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革命运动。1897 年下半年，领导人 E·阿奎纳多和战友们在香港建立基地。美西战争爆发后，他们认为这是推翻西班牙统治，争取国家独立的天赐良

---

① 比尔：前引书，第 159 页。

② 《美国年鉴》，第 12 卷，第 234—235 页。

机。但是他们发现美国海军领导人杜威只关心共同合作抗击西班牙的军事问题，闭口不谈菲律宾的独立大业。虽然阿奎纳多组织了一支3万人左右的武装队伍并且多次取得了辉煌的军事胜利，但是美军坚持拥有最高权威，全权接受马尼拉西班牙当局的投降，没有他们的允许菲律宾人民的武装力量不得进入马尼拉城。因而在菲律宾“当西班牙国旗降下时，取代它的不是菲律宾革命者的旗帜而是美国的星条旗”。[①] 阿奎纳多知悉美国企图吞并菲律宾的意图后，就在1898年6月12日宣布菲律宾脱离西班牙而独立，成立菲律宾临时共和国，他被推选为总统。8月13日，经过一场不流血的战斗，美军占领马尼拉市区，菲律宾起义者则控制了菲律宾国家的其他地区。1898年9月16日，美国总统麦金莱给在欧洲与西班牙谈判的代表发去指示，美国要取得对整个吕宋岛的“全部权利和主权”[②]；10月下旬，麦金莱又指示美国要取得整个菲律宾群岛的主权。美国利用了菲律宾人民的力量共同推翻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但窃取了全部胜利成果，根据美西两国在巴黎签订的和约，美国取得了对菲律宾的统治权。菲律宾人民从前门赶走了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却在后门引来了美国的殖民主义统治者。

美国占领菲律宾以后，无视该国人民的独立要求，因而激起他们的反抗，菲律宾人民不承认美国对菲律宾具有主权。阿奎纳多与美国关系日益恶化。1899年1月23日菲律宾共和国正式成立，阿奎纳多当选为总统。2月4日晚上，马尼拉爆发反美起义；美国军队立即进行血腥镇压。是年春天，美军为镇压菲律宾起义军向北一直推进到吕宋平原中部，卷人了一场与菲律宾人民

① 马吉尔：前引书，第1291页。

② 《美国年鉴》，第12卷，第233页。

之间的不义战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在这场战争中，“较之美西战争花费了更多的钱财和牺牲了更多的生命”。[1] 最后美军兵力高达74万人。美国政府侵略菲律宾的政策受到国内舆论的再次猛烈批评，麦金莱总统在1899年11月21日发表谈话为自己的政策辩护，毫无掩饰地鼓吹美国占领菲律宾“有理”的扩张主义，他宣称美国不能把菲律宾群岛归还给西班牙，因为这对美国来说是胆怯和不荣誉的；美国不能把菲律宾转交给东方的竞争对手德国和法国，这会招致经济损失和信誉丧失；美国也不能容许菲律宾独立，因为这将导致比西班牙统治更糟的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美国惟一能做的就是取得全部菲律宾群岛，然后对菲律宾人民晓以基督教理想，教以西方文明。麦金莱总统的辩解是典型的侵略有理的强盗逻辑。

1901年，美军利用军事优势以强凌弱在菲律宾建立了639个据点。[2] 11月，阿奎纳多率军进入北部山区，菲律宾人民反美斗争由正规战转为游击战争。1901年，萨马岛的菲律宾游击队重创美国侵略军，残忍的美国将军史密斯发动报复性战役，杀害大批无辜菲律宾平民。3月23日阿奎纳多在北吕宋岛被俘，并向国人呼吁停止反抗和接受美国统治。但菲律宾游击队的西米恩·奥拉、马卡里奥·萨凯等领导人分别在北方和南方继续领导抗美游击战争，直到1904—1906年在萨马岛进行的最后一次战役为止。战争期间，美国总统麦金莱曾于1899年和1900年分别派出以舒尔曼为首和以塔夫脱为首的菲律宾委员会到那里活动，并于1901年7月在那里成立了民政政府。

美国军队镇压菲律宾人民的独立运动长达3年余，造成美军

① 马吉尔：前引书，第1292页。

② 马吉尔：前引书，第1292页。

4000人丧生，菲律宾军队牺牲约在1万至2万人之间，约有20万平民死于疾病和饥馑。① 造成这场悲剧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有的美国历史学家认为美国人对菲律宾的无知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据统计，1818—1898年美国期刊上仅发表有35篇有关菲律宾的论文。美国人对菲律宾的无知达到何等程度以致有的美国人"还不知道菲律宾究竟是群岛还是罐头食品"。这种无知导致美国人无法阻止政府对菲律宾采取的强硬的侵略立场。《文摘》的新闻抽样调查表明，当时约43%的美国人倾向吞并菲律宾，24.6%反对，32.4%犹豫。《纽约先驱报》在1898年12月发现498名编辑中有305名支持吞并菲律宾的政策。② 但是美国民众对菲律宾缺乏了解和无知，不能成为美国政府侵占菲律宾和向菲律宾人民发动战争的理由。

美国殖民主义者在残酷侵占菲律宾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对夏威夷下手。

〔攫取夏威夷〕 夏威夷素称"太平洋的十字路口"，1898年为美国所并吞，1900年设立夏威夷地区。美国国会曾对并吞夏威夷产生过犹豫，且发生激烈争论。麦金莱政府对此也难以定夺。但是"美西战争明显地改变了麦金莱。他由此决心吞并夏威夷"。③ 早在1897年，美国国会中有人反对吞并夏威夷。特别是众议院议长托马斯·里德持激烈的否定态度。但是美西战争爆发特别是杜威在马尼拉湾的胜利，使许多国会议员相信美国真正"需要"夏威夷。1898年4月23日的《纽约论坛报》声称夏威夷岛也许已经占领。一些主张吞并的扩张主义者更是积极活动，声

---

① 马吉尔：前引书，第1293页。

② 转引自马吉尔：前引书，第1295页。

③ 欧内斯特·梅：前引书，第243页。

言他们能够得到所需要的219名议员的签名使里德的否决无效。《太阳报》的保尔·戴纳写信给威尔逊将军说："我相信我们正好似将枪对着里德的脑袋那样有效地对付他。"① 里德停止活动以后，吞并夏威夷的决议毫无疑问将在国会获得通过。6月4日，《纽约论坛报》甚至声言总统希望吞并夏威夷。后来，麦金莱对人说："我们需要夏威夷就好像我们需要加利福尼亚一样强烈。"②

7月7日，美国国会通过关于归并夏威夷群岛的联合决议，决议宣称："接受、承认和批准上述转让。故上述夏威夷群岛及其属地特此合并为美国领土之一部分，隶属于美国的主权范围。上述全部和单独的财产和权利概归美利坚合众国所有。"③ 8月12日，美国占领夏威夷群岛，使之成为美国领土的一部分，成为美国太平洋航线上的中继站。1899年12月2日美国与德国和英国签订"关于调整萨摩亚群岛争端协定"，美国取得土土伊拉岛和帕果—帕果港，使萨摩亚群岛成为美国在太平洋上又一个重要基地。

同时，夏威夷以西500公里、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最南端的关岛也根据美西巴黎和约作为对战争的赔偿由西班牙割让给美国。美国占领关岛具有军事上的战略意义。世纪之交，海军在军事上显示了越来越重要的战略作用，因而煤的供应和电缆的铺设又是加强海军力量的基本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杜威将军在菲律宾的命运取决于煤的充分供应和电缆通讯的便利。在美西战争初期，有人问杜威将军太平洋上何处建立加煤港为最佳地

① 欧内斯特·梅：前引书，第243页。
② 欧内斯特·梅：前引书，第244页。
③ 转引自杨生茂等：前引书，第248页。

点，他在回答中将关岛列于其中。数年前曾访问过卡罗林群岛的舰队司令斯托克顿在给美国海军学院（世界上首座海军最高学府）创始人、海军少将卢斯的信中描绘了关岛的情势和重要性："我越是想到马里亚纳群岛，我越会想到它们在太平洋上作为停留地的价值。长期被美国捕鲸船作为集合地的关岛是夏威夷和菲律宾的直航线，它所处的位置正好使这里乘船到日本、韩国、中国上海和香港，以及菲律宾港口乘船到这里都约为5天的时间。如果我们在菲律宾确保维持一个加煤港，我们就可以从旧金山或巴拿马地峡运河去夏威夷，从夏威夷到关岛，再从关岛去菲律宾，这就是凭借美国的停留地越过太平洋去加煤港的全部旅程了。"① 卢斯根据斯托克顿的意见，强烈要求参议员洛奇利用他自己的影响达到美国占领关岛的目的。他告诉参议员说："我说，'立即'因为战争结束似乎已经可见。一旦和平获得，我们在建立外围供煤站的道路上将无所作为了。"1898年7月，西班牙在巴黎的代表只同意在马里亚纳群岛中仅割让一个岛屿给美国。同年9月16日，美国总统指示在巴黎的代表：美国选择了关岛。②1899年2月10日，麦金莱总统向国会发表演说："夏威夷岛和关岛成为美国领土，形成越洋途中的便利的停留地，那么美国和所有太平洋岛屿间的快捷电缆通讯的必要性已经迫在眉睫。"③1911年，关岛总督E·G·玻恩写道："从西班牙手中接管关岛的目标，当时的计划基本上是为保证贯通太平洋电缆登陆地的安全。"④

---

① E.S.波默罗伊：《太平洋前哨：美国在关岛和密克罗尼亚的战略》，拉萨尔出版社，纽约，1970年，第9页。

② 同上书，第10页。

③ 波默罗伊：前引书，第8页。

④ 波默罗伊：前引书，第7页。

美国占领关岛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同德国抗衡，不让卡罗林群岛落入敌手。卢斯将军在1898年5月10日要求参议员洛奇呼吁占领关岛时已经注意到德国的勃勃野心，因此他说："我们也许不希望永久地占领它们，但是在战后的利益平衡中，它们将价值连城。"[①] 布兰福德力主美国的和谈代表不要让德国在太平洋上占一席之地。因为这些岛屿可以提供许多良港和加煤站，如果落入敌手，它们将对美国太平洋沿岸和菲律宾间的交通线构成严重威胁。他露骨地宣称："如果我们要占领中国海附近的领土，我们就需要珀路斯岛、卡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②] 1911年，担任美国海军学院负责人的马汉据说已经提出使关岛成为"太平洋的直布罗陀"的进一步计划。曾在关岛服役的海军军官麦肯从美国海军战略高度论及关岛的重要性说，夏威夷和关岛是整个太平洋上的两个战略中心。关岛是太平洋海域西部的中心，夏威夷则为东部中心。如果关岛建成美国一流海军基地将能够保护和威慑从海参崴到新加坡的全部战略地区，保护和威慑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到埃斯奎莫尔特交通线侧叶的战略要地。[③]

美国侵占菲律宾、攫取夏威夷和关岛只是他们向太平洋野心勃勃扩张计划的第一步。

〔美国对华政策的出发点〕　美国占领了菲律宾、夏威夷和关岛，下一步就是它的重大目标：进入中国。夏威夷和菲律宾仅仅是它们远征东亚和中国的一块跳板而已。美国扩张主义早就对远东垂涎三尺。当人们以菲律宾不与美国领土毗邻为由批评美国政府企图侵占它时，贝弗里奇声称："我们的海军将使它们成

---

① 波默罗伊：前引书，第14页。
② 波默罗伊：前引书，第14页。
③ 波默罗伊：前引书，第14页。

为毗邻！”美西战争结束以后，他更是声嘶力竭地鼓吹向远东扩张，为此他特意去菲律宾旅行并使他自己成为研究该地区问题的专家。在菲律宾他同数百人谈话，访问战场，记下各种材料。1900年1月9日，他不顾美国国会新参议员不得马上发表演说的传统惯例，抓住机会在国会发表演讲，说：“菲律宾永远是属于我们美国的领土，正如宪法所称。一出菲律宾就是中国的无限市场。我们将不会从那里任何一方撤退。我们将不会放弃在该群岛海域的责任。我们将不会失去在东方的机会。我们将不会抛弃在上帝庇佑下我们的种族和作为托管人以及世界文明的使命的所属部分。我们不要像被鞭打的奴隶似地为他们的重负而抱憾，而应抱着为一个值得我们贡献力量的任务而高兴，以及对上帝——他已经将我们作为他的选民从此去领导世界复兴——的感恩之情推进我们自己的工作。”① 太平洋是美国的“内湖”，菲律宾是“美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就成了美国的“比邻”。接着美国就可以像对待比邻墨西哥那样对待中国。这就是他们的扩张逻辑。

其次，在美国扩张主义者眼中，中国是一块大肥肉，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谁取得了中国这个大市场，谁就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谁就能成为世界第一流强国。贝弗里奇又说：“今后我们最大的贸易一定是在亚洲。太平洋是我们的海洋。……中国是我们天然的消费者。较之现在和未来的商业强国：英国、德国或俄国，她与我们更靠近。……菲律宾提供了我们在整个东方大门口的一个基地。……有了菲律宾，那个强国现在是将来永远是美利坚共和国……”②。布鲁克斯·亚当斯在他1900年出版的《美国经济霸权》中宣称：

---

① 《美国年鉴》，第12卷，前引书，第336页。

② 《美国年鉴》，第12卷，第337页。

“中国命运的结局也许与下世纪的经济霸权紧密相连。”鼓吹昔日英帝国对中国的“责任”已经落到美国身上，美国必须在中国取代英国的地位。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利益成了他们扩张这一地区的最大驱动力之一。

第三，美国扩张主义者视太平洋为未来世界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地区，美国要成为未来世纪世界的主宰必须取得对太平洋的霸权。而中国是太平洋地区的大国之一。他们深知中国在未来20世纪里的份量，“太平洋是未来的商业海洋。将来大多数战争将为商业利益而争。因此统治太平洋的强国就是统治世界的强国。”向太平洋地区和中国的扩张还是美国争夺未来世界霸权的重要步骤。老罗斯福在1905年说：“我们未来的历史将更多地取决于我们所面临中国的太平洋上的地位，而不是取决于我们所面临欧洲的大西洋上的地位。”[1] 马汉在1900年出版了《亚洲问题》一书，分析了亚洲特别是中国是未来世界列强必争之地，北有俄国虎视眈眈，南有英国垂涎三尺。俄国是陆上霸权，英国是海上霸权，谁控制了中国谁就掌握了未来。他进一步鼓吹美国应该利用海上力量获得中国的长江流域——中国的心脏，这样就可以使中国摆脱其他外来列强的统治。

〔“门户开放”政策〕　一般说，19世纪中叶美国的对华政策还依赖于英国而尚未形成其独立、完整和系统的政策体系。19世纪末，美国羽翼已丰，国力强盛。随着世界强国地位的最后确立，出于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的政治经济需要，美国开始重视中国和亚太地区对美国的战略利益，并逐步形成和推出其独立的对华政策。查尔斯·邓比在谈到美国占领菲律宾的意义时，特别提到占领菲律宾有利于对中国的扩张。他说：

---

① 比尔：前引书，第161页。

“全世界都视中国为我们国内产品——我们的木材，我们的机车，我们的煤油，我们的铁轨，我们的布匹，我们的采矿设备，以及其他大量物品——的一个最辉煌的市场。除了日本，我们比任何其他商业国家更接近中国。在我们面前有一个将使太平洋对我们比大西洋更为重要的无限前景。旧金山、西雅图和塔科马还处在它们的幼年期，但是它们命中注定将要与纽约、芝加哥和费城一比高低。”①

但是，当美国人认识到中国对美国有如此重要意义的时候，中国早已不是如美国以前尚未开垦的西部广袤荒原一样，它已面临世界列强（其中包括美国在内）的蹂躏和宰割。1840 年以后中国已逐步殖民地、半殖民地化。1895 年以后，远东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曾在 19 世纪 50 年代被美国“黑船”打开大门的日本，这时已成为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之一，它以狂妄的野心和毒辣的手段利用近邻的优势疯狂推行侵华政策，致使欧洲诸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受到冲击，原先的平衡和均势被打破。1895 年，中国在中日战争中败北，日本利用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迫使中国割让辽东半岛，不仅严重损害和危及中国的神圣主权，也威胁了俄国在华利益。俄国拉拢德国和法国迫使日本让步。日本的侵华行动不仅打破了原先列强在华的瓜分格局，而且刺激和促发了他们对华开始新一轮的争夺和瓜分。

俄国、德国和法国以“干涉还辽”有“功”向中国提出进一步无理的侵略要求，俄国提出它的西伯利亚铁路穿越中国满洲，法国则要求在广西修筑龙州铁路，德国要求租借海港等等。英国早在 1898 年以前就宣布中国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并租借九龙和威海卫。列强瓜分中国最后形成严重局面：俄国企图独霸中

① 《美国年鉴》，第 12 卷，第 235 页。

国东北地区；德国强占胶州湾，还把山东作为其势力范围；法国强占中国广州湾，又将其势力伸向中国西南地区；日本通过《马关条约》掠取台湾和澎湖后还将势力扩张到福建省。

面对世界列强这新一轮瓜分中国的狂潮，美国虽然因忙于美西战争而无暇顾及，但它并没有消极观望。相反，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尝到海外扩张甜头的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根据实现世界强国目标和向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张的战略需要，以新殖民主义为策略原则，提出了对华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

其实，最早提出"门户开放"的是英国，它曾凭借自己的经济势力早在19世纪中期就主张在中国实行自由贸易。由于经常谈论这样的政策，所以1898年英国议会再次谈到门户开放时有人竟说："这个著名用语一再地被重复引用，令人烦得几乎作呕。"[①] 1898年3月，英国政府在给麦金莱总统的秘密信件中提出，"一些强国目前可能吞并中国领土的一些地区或建立租借地等等，面对此种形势，英国是否能指望同美国合作一起反对外国的这类行动，美国是否准备在一旦发生意外事故时同英国一起反对这类措施。"[②] 但是，19世纪末的美国早已不是一个世纪前的美国了，决然不愿在外交上再次成为英国的配角，并且出于不结盟的原则，拒绝了英国提出的这一政策。此外，当时的英国已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和租借地，也失去了充当门户开放政策的倡议者的资格。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向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发出照会，并要求他们将此转交各自政府。照会主要内容为：一、在中国任何所谓利益范围，或租借地

① 乔治·凯南：《美国外交》，葵阳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89年，第20页。

② 乔治·凯南：前引书，第21页。

内的任何通商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干涉；二、对于上述利益范围内（除自由港外）一切口岸装卸的一切货物，无论属于何国，均适用中国现行的关税率，其税款应由中国政府征收；三、任何这样“范围”内的任何口岸，对进出港的他国船舶不得课以高于本国船舶的港务费；任何此种“范围”内所敷设、管理或经营的铁路运输他国人民的货物通过此种“范围”，运费不得高于本国人民同样距离所运输的同类货物。[1] 照会发出以后，各国的反应虽各不相同，有的积极，有的消极，有的敷衍，但都闪烁其辞地表明了态度，海约翰急忙宣布各国政府已经明确接受了美国提出的上述原则。

1900年，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斗争——义和团运动，声势浩大，震惊列强。不久美国参与8国列强组成的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血腥镇压起义。中国面临被列强肢解的危险。这时美国害怕因为列强在华均势再次被打破而失去它在华的一切利益，海约翰于7月3日代表美国政府再次向列强发出照会，史称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它宣称：“值此中国情势危急之际，美国宜在目前环境许可之范围内阐明态度。……总统的目的是，正如迄今为止一直与其他列强诸国采取一致行动：1. 开展与北京的联系和营救处于危险中的美国官员、传教士和其他美国人；2. 对在华所有地区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提供一切可能的保护；3. 保卫和保护一切美国的合法利益；4. 援助（帝国）阻止其混乱蔓延到帝国其他省份和再次出现此种灾难。当然预言取得最后效果的意义为时过早，但是美国政府的政策乃是寻求一种解决办法，使中国获得永久安全与和平，保全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维护各友邦受条约与国际法所保障的一切权利，并保护全世

① 《美国年鉴》，第12卷，第327—328页。

界在中华帝国境内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① 照会无需各国作出答复，它强调了"保全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和在整个中国实行"门户开放"的原则，较之前次照会有更为明确的含义。至此，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已趋完整。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并不是如海约翰所言是为了使中国获得永久安全与和平，也不是为了保全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实质上完全是为了美国自身的根本利益。虽然美国在 1899 年对华贸易仅占全国总贸易额的 2%，但是有 4 亿人口的中国是美国未来的重要潜在市场，美国政界和商界人士对此有深刻印象。美国孜孜以求的商业利益是它的对华政策的指路星辰。面对列强瓜分中国的严峻形势，美国不能听之任之坐视列强把中国全部瓜分，它要尽最大的努力企求以最小代价取得在华的最大利益。门户开放政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美国最聪明最有利可图的一种选择。如果美国像其他列强一样追求在中国的一地一域，或为其利益范围，或为势力范围，一则行不通，二则名声不佳。门户开放政策既可获保全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之美名，又可坐收其他列强在华所取得的同样之实利。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诚如有的美国学者所言："在某种意义上，美国采取反对欧洲殖民主义的立场是为了占领欧洲市场在中国的份额而已。"② "保全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是美国针对当时列强无视美国利益瓜分中国的危急形势，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的一种手段和措施，为了阻止由一个或若干列强把美国排除在外主宰中国、独占中国利益的企图。③有的

① 约翰·格拉蒂、罗伯特·戴维尼：《20 世纪美国：当代文件和观点》，前引书，第 19 页。参见王玮主编：《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1776—1995》，山东人民出版社，济南，1995 年，第 134 页。

② 马吉尔：前引书，第 1298 页。

③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 287 页。

美国学者认为美国政府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在“拯救微弱中国”的背后，有着美国出口商和制造商同4亿中国人进行贸易的渴求。[①] 因为中国对美国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老罗斯福一语破的地说：“由于我们的势力和我们在太平洋的利益的疾速增长，不管中国发生什么事情，对我们来说，都必定是最深切的利害攸关的国家大事……我们主张‘门户开放’以及这个政策所包含的一切；不仅要在沿海一带取得扩大的商业机会，而且还要从水道进入内地……”。美国企求在中国的门户洞开后，迅速进入中国内地，占领中国市场。[②] 海约翰在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宣布确认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原则仅5个月后，就秘密指令美国驻北京公使设法在中国福建省的三沙湾为美国获得一个海军加煤站。而当日本察觉俄国在中国加快侵占中国满洲的步伐，询问美国是否准备用武力捍卫美国宣布的原则维护中国行政完整时，美国竟答复说：“目前并不准备单独或同其他国家合作，试图通过任何可能与其他国家为敌的示威行动在东方强制推行这些观点。”[③] 可见，美国政府所谓维护中国行政完整等等只不过是说说而已的幌子。

实际上，美国的“门户开放”既是美国为了实现强国梦又是显示其强国地位的一项政策。美国是世界列强中的“后起之秀”，它的经济实力已在19世纪末超过老牌列强英国、法国而独占世界“鳌头”。但是它的经济强国地位与其国际政治地位之间尚有很大差距。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瓜分世界方面已“捷足先登”，美国只是在美西战争中捞到一些好处，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一些岛

① 哈纳斯和沃克编：前引书，第96页。
②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前引书，第118页。
③ 乔治·凯南：前引书，第28页。

屿而已，在国际事务上美国并没有重大发言权。在中国问题上，美国具有很大野心，占领菲律宾的重要目标就是为了今后美国的在华利益。列强在没有同美国打招呼的情况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瓜分肢解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是对已经是经济强国的美国的一种轻视。可是，美国在美西战争中已经显示了战胜老牌帝国的荣耀和成就，它迫切希望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增加在国际政治关系中的份量，争取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政治强国。美国打出了“门户开放”的牌，向列强显示自己的存在和份量。美国参议员洛奇在1900年3月7日向参议院发表演说：“菲律宾的占领使我们成为东方的强国，不但有了发言权，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有力量支持这种发言权。国务卿海先生要求欧洲列强保证我们在中国的一切条约权利和维持门户开放的政策，并已获得它们的同意。我无意于抹煞我们立国百年以来的这一最重要和最辉煌的外交成就，但是我要说：列强对美国的建议之所以同意，因为它们是面对着马尼拉的主人。若是3年以前，它们或许会对我们耸耸肩，一笑置之吧。可是对一个占据了马尼拉湾，并且有舰队游弋其间的强国，它们不得不作出客气的答复。马尼拉和宏伟的马尼拉湾是东方的宝藏和珍珠。如在我们手里，它将变为最大的集散地之一和世界最富的商埠之一。……将保持中国市场对我们的开放，并使美国企业得以在东方的整个贸易中首屈一指。”[①] 这种分析真是入木三分！T·罗斯福总统在1901年12月3日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一方面阐述门户开放政策与美国利益的关系，同时又大肆鼓吹美国应该创建“能在公海上打出霸权来”的美国巨型海军战舰。[②] 门户开放政策和建立海军联系在一起作

①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287页。

②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前引书，第118页。

为施政重点绝非偶然，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是以其武力为后盾的，美国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它的“门户开放”政策只能成为被列强耻笑的话柄而已。当然，美国愿不愿意真的使用武力去“捍卫”门户开放那又是另一码事了。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还是一种发端于19世纪末流行于20世纪的新殖民主义政策。这是一种更多地以资本输出为特点的全球性殖民政策和体系。它是以强大的经济优势为后盾，甚至超越地区界限的一种殖民政策。带有某种开放性和更大的竞争性。美国政界和商界曾经为扩张海外市场的手段和策略进行过辩论，他们在如下两种方法中进行选择：一是占领别国土地并对其在政治和经济上实行控制；一是寻求开放门户，然后对开放的土地依然从经济上实行控制。辩论的结果自由贸易政策获胜。这是一种比老殖民主义更为有利更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实际上发生的是，美国采取反对其他国家的殖民主义是为了推进它的经济帝国主义。”[①] 有美国学者指出，T·罗斯福集团是在制止美国经济体制呆滞和用积极的海外经济扩张来实现这个目标的名义下，保卫他们的经济利益，“由于传统殖民地的公共利益的衰落，门户开放政策的吸引力大大增强。”[②]

检验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客观历史作用的最公正的法官是这项政策在中国的实践，换言之，美国政府在门户开放政策下对中国人民究竟干了些什么，而不是海约翰的凿凿言辞。其实，老罗斯福对门户开放政策能否实现和贯彻心存疑惑。1905年，他说：“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是一件大好事，我希望它在将来会是一件行之有效的事，只要它能得到普遍的外交协议的维护；

① 马吉尔：前引书，第1299页。

② 哈纳斯和沃克编：前引书，第96页。

但是，正如整个满洲的历史所证明的，在俄国统治下和在日本统治下都一样，只要有一个强国决心置'门户开放'政策于不顾，宁可冒战争的风险也不愿放弃它的打算，'门户开放'政策也就烟消云散了。"①

〔美国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　1900年，美国军队参与八国联军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是美国向中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前后的第一个重大政治行动，恰恰在两次美国政府的门户开放照会之间发生了镇压义和团运动，也许这不是一种历史的巧合。美国参与镇压中国的反帝运动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污点。马汉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诬蔑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反动运动"，它的目的是要"割断同现实生活惟一可能的源泉的联系"，鼓吹对义和团使用武力。② 老罗斯福一直依靠他的一些密友经常提供的信息了解中国情况。其中有90年代中期在德国驻华使馆供职的斯潘克·斯腾伯格，他经常向这个罗斯福提供中国信息；还有曾长期供职于美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兼汉学家柔克义也与罗斯福经常联系并提供情况。1900年罗斯福致函柔克义说："听说你将去中国我思想上感到好像如释重负，我将非常感激你能为我提供的任何暗示。"③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罗斯福坚决认为派军队去中国是合法的，因为美国需要"为了自己的商人、农民和工资收入者去保卫公开市场的利益"。他还极力主张西方列强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中国义和团起义。他写信告诉他的德国朋友斯潘克·斯腾伯格说："我们所有的西方伙伴让中国的运动发展到如此危机的地步是愚蠢的。但是我认为当半打的国家都是自私自利的，相

① 乔治·凯南：前引书，第35—36页。
② 哈纳斯和沃克编：前引书，第168页。
③ 比尔：前引书，第166页。

互妒嫉或猜疑的及其他等等，这样一种愚蠢是无法避免的。”他希望至少德国和美国应该在中国采取联合行动。[1] 1900 年，美国政府派出罗斯福总统赏识的、在美西战争中立过功勋的查非（又译沙飞）将军指挥美国远征队去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罗斯福把义和团起义看成是同菲律宾阿奎纳多起义一样的民众叛乱，颠倒黑白地认为不能给中国人以“自由”去屠杀邻国。这是罗斯福根深蒂固的白人优越论的大暴露。诚如美国学者所言：“在罗斯福的思想中，义和团是中国人性格缺陷的产物。中国人和菲律宾人一样，必须由西方列强将他们从野蛮中‘解脱’出来，因此使用外国军队是必要的。”[2] 当罗斯福知道包括美国军队在内的 8 国联军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以后，依然无动于衷。1901 年 3 月初他写信给美国远征军指挥查非将军说：“因为你在中国已经干的一切——从你的作战方式直到你应该采用的方法，我们全都是你的受惠人。”他的镇压义和团的帝国主义立场受到美国人民的谴责，更受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和仇恨。比尔教授说得好：“如果罗斯福十分容易地忘记了美国和其他外国军队在中国所干的事，但中国人是不会忘记的。他们已经看到‘文明’国家的代表在基督、法律和秩序的名义下所干的掠夺、强奸、屠杀、蹂躏。他们已经目睹了这些文明国家的‘有纪律’的军队捣毁了他们的家园。在罗斯福的眼中，中国人是可以轻视的，因为他们太虚弱而无法抵抗，但是他们决不会忘却。”[3]

罗斯福在对华关系上喜欢挥舞他手中的“大棒”。1904 年秋，中国人民为了反对美国的排华政策，计划开展抵制美国货和

① 比尔：前引书，第 169—170 页。
② 比尔：前引书，第 170—171 页。
③ 比尔：前引书，第 173 页。

抵制中美贸易的群众运动。1905年6月初，抵制运动在全国兴起，而且得到了美国华人的大力支持。7月7日，运动已经席卷包括广州、澳门、厦门等在内的25个城市。罗斯福企图迫使中国政府制止抵制运动，他一方面向国会提出修改排华法案的某些部分，一方面准备对中国使用武力。1905年底和1906年初，美国海军舰队向菲律宾增加力量，一些美国报刊也制造动武舆论。华盛顿邮报发表高级官员的权威报告说，如果中国的形势得不到改善，美国就向菲律宾增兵，1900年为镇压义和团派出的美国军队组织不善的错误不应重犯，鼓吹要选派美国青年和年富力强的军官参加预期中的对华远征。1906年1月11日，罗斯福向塔夫脱提出忠告：国防部应该“绝对地相信我们要提供一支充足的远征军”，他具体建议至少直接需派出15000人，一个月内再追派5000人。他提醒国防部长说：“中国军队比5年前更难对付……我们不应该冒任何风险，”[①] 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美国没有出兵中国，罗斯福于4月2日写信告诉伍德，说：“我不相信将会有一次对中国的远征，但是我喜欢相信：如果一旦需要，我们将不会是毫无准备的。”[②] 罗斯福对中国抵制运动的“强硬”政策是他的扩张主义思想和种族优越论的反映，美国学者比尔认为：“罗斯福是其殖民主义观点局限性的牺牲品。他的问题不是缺乏信息，而是一种观点使他无法以20世纪世界的目光看待中国。”[③]

1909年，W·H·塔夫脱继任美国总统以后，企图用经济手段进一步在中国实施门户开放政策，也即用“金元外交”取代老罗

① 比尔：前引书，第215页。
② 比尔：前引书，第218页。
③ 比尔：前引书，第219页。

斯福的力量均衡原则。塔夫脱的对华政策有力助手维拉特·斯特赖特是一位年轻的美国外交官员，他与美国银行界有密切联系，与新国务卿诺克斯交往甚密。他在中国满洲任职时深知日本对华具有的勃勃野心。1908年他回华盛顿警告美国政府如果不在中国继续努力的话，门户开放政策将被瓦解。1909年春，美国政府根据斯特赖特的建议，为保证美国在中国事务中有一定发言权，决定鼓励美国银行家向中国投资，进一步打开中国的门户。1909年6月，欧洲银行家签订协议资助中国修建中南线铁路。美国乘机向英、日、俄、法、德、中提出所谓“诺克斯计划”，将中国的东北铁路中立化。美国国务院提出备忘录阐述了对华投资对美国的重要性，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发展交通有很大空间，中华帝国将建成的铁路网络需要大量贷款，美国参加本次贷款就能为它在中国未来的投资带来机会。中国的铁路建设、采矿发展将带来对设备、机器和原料的需求，美国银行家参加贷款后在指定聘用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方面就有发言权，这些人员将有权决定购买何种设备、机器和原料，这就能保证美国在中国贸易和经济生活中的“合理份额”。有4亿人口的中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将大量需求西方国家的工业产品。美国计划获得商业中的“合理份额”。美国对外商业贸易的发展不仅意味着对出口有利，而且必然带来国内的大量就业机会。世界进入20世纪以后，太平洋地区对美国显得越来越重要，美国“不能自鸣得意地坐视中国的无限商机落到其他人的手中”。备忘录指出：“这项贷款将使美国在管理中国的财政，在东方外交和财政紧密联系方面插上一手。”[①] 诺克斯计划引起了美国和日本两国间的激烈争斗。其实美国对中国的铁路运输事业早有野心。早在1895年美国驻北京

① 格拉蒂、戴维尼：前引书，第26—28页。

公使田贝就提出了“田贝计划”，打算在中国建立铁路干线网络，企图夺取中国的东北铁路。但遭到俄国强烈反对。1905年美国公使康格再次提出关于东北铁路国际化问题，并企图利用日本插手加以控制，后因日本另有所图而失败。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人手中取得中国南满铁路，成了美国实施东北铁路国际化的最大障碍。由于列强在中国都有各自利益，“各怀鬼胎”，对美国的计划反应不一，在日俄的反对下诺克斯计划最后破产。[①]

威尔逊上台后继续执行对华侵略政策。1912年，以美国为首的六国银行团同中国袁世凯相勾结，企图把中国的财政置于国际监督之下，为中国修筑铁路向中国提供贷款1.25亿美元。但是美国在银行团中未获监督官职位。威尔逊总统刚入主白宫就借此大做文章，以银行团的行为已触及中国的行政独立为借口，宣称“应该以一些更好的方式帮助中国”。1913年3月18日，他签署公开声明退出6国银行集团。威尔逊后来向国会说明：“如果我们与其他列强一起参加这笔贷款，我们除了仅仅影响中国之外将一无所获，我们将失去海约翰国务卿主张门户开放而使美国取得的骄傲地位。”[②] 这些话道出了美国退出6国银行集团的真实用心。其时，德国人就猜测美国将退出银行团，并把它作为在中国取得好意的手段。诚如美国学者林克所说：“因此，行政当局公正处理中国问题的野心，只有当美国在远东摆脱据说是邪恶的欧洲影响发挥一手作用时才能满足。”[③] 5月2日，美国在没有与其他列强订立协议的情况下，首先正式单独承认中国的袁世凯卖国政府，却对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多次要求美国承认中华民

---

① 详见余伟：“美日在东北的一场激烈争夺”，见汪熙主编：《中美关系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② 阿瑟·林克：前引书，第84页。

③ 阿瑟·林克：前引书，第84页。

国不予理睬。此后美国加紧了对中国的投资，财团们纷纷抢滩中国市场。

在推行门户开放政策时，素有推行“使命外交”政策之称的威尔逊总统十分注重在思想政治文化领域对中国进行潜移默化的文化渗透。在这方面美国传教士和美国教授们起了先锋作用。早期来华的著名传教士丁韪良，1898—1900年任中国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义和团起义时，他力主各国划定势力范围，为帝国主义张目。1908年再回北京传教。1913年美国大学教授古德诺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1915年他在《亚细亚日报》上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鼓吹中国宜于君主立宪制度，诬陷中国“民智低下”，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在1913年出版《尊孔》一书，鼓吹为防止“社会之骚动兴起”，“孔教”与“基督教”应该相互结合，即帝国主义文化与封建文化结合，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据统计，1914年美国来华的教士达2500人，美国在华全部教会和文化方面的财产约为1000万美元。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1913年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经常以政治学专家和学者的身份在华鼓吹和传播美国的民主政治理论和制度，在实践中他积极推行美国偏袒日本、损害中国利益的蓝辛—石井协定。1919年辞职后他又成为中国北洋军阀的法律顾问。

为了在华推行美国和西方的文化教育和传播西方文明，在美国政府的积极支持下，美国基督教和天主教教会大力在华开办各类学校和文化设施，教会大学在中国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1910年美国教会在成都开办华西协和大学，在南京建立金陵大学堂，1913年有杭州的之江大学，1914年有长沙雅礼大学，山东的齐鲁医学院，1915年在南京开办金陵女子大学，1916年在福建开办协和大学等等。据统计，1899年，即义和团刚起事时，

基督教在中国各地创办的学校已超过数千所，仅美国教会开办的初等学校就达1032所，中、高等学校74所。天主教在中国江南创办的各类学校有558所。1916年，教会学校学生数已在中国同级学校学生中占有相当比例，初级学校为4%，中等学校为11%，高等学校占80%。[①] 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大学生是教会学校毕业的。美国传教士们为了推动在华的教育事业和有效地宣传西方文化还专门成立全国教育机构“中华教育会”，并于1893年、1896年、1899年、1902年分别召开数次全国会议，更有系统、有计划地在中国推行美国和西方的教育体系和观念，传播基督教。与此同时，美国也注重在中国吸收留学生赴美学习，1911年中国已有800名留学生在美国。[②] 在揭露美国统治者向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和推行“使命”外交的扩张本质时，对于中国各类教会学校在推动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传播西方先进文化和冲击中国旧的教育体系，批判旧的教育观念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理应给以历史主义的总结和肯定。事实上，与美国扩张主义者的愿望相反，教会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日后成为推动中国改革的爱国知识分子，其中的激进分子更是成了中国反帝反封建运动中的先锋。

〔拉拢日本牺牲中国〕　拉日制华是美国在东亚的一贯策略。在调停日俄战争以后，美国进一步对日本又打又拉，以对抗俄国和实施其对华的门户开放政策。1907年美国和日本签订君子协定解决了因加利福尼亚对日本移民的歧视性立法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安抚日本。同时又耀武扬威，1907年12月，罗斯福主要是为了向日本显示美国的海军实力以致让它不要在远东轻举妄

① 刘鉴唐：“近代教会学校教育与中国教育制度改革”，见顾学稼等编：《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页、第49页注53。

②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北京，第152页。

动，派出了一支由16艘战列舰组成的美国舰队——“白色大舰队”，声势赫赫地开始了一次全球航行，历时1年余。1908年，这支美国海军舰队——当时世界上第三大海军舰队特地安排去日本东京访问。随后美国国务卿伊莱休·鲁特不失时机地在华盛顿同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进行会谈，并于1908年11月30日签订了所谓“鲁特—高平协定”，其主要内容是美国和日本两国愿意保持太平洋地区的现状，维护门户开放政策和维护中国的行政独立和完整。美国承认日本兼并朝鲜的权利和它在中国东北地区所享有的特殊地位。这是美日妥协牺牲中国利益的又一步骤。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根据美国的外交文件所载，美国曾经试图利用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迫使中国政府同意由美国取代德国在中国胶州湾的权利，后因种种原因未果。[①] 同时美国为了达到将中国置于以美国起主要作用的“国际监督”之下的目的，1914年9月15日签订了中美解纷免战条约。规定由国际公会作为解决中美争执事件的仲裁者。国际公会由5人组成。4名会员分别由缔约国成员担任，其中1名需为本国人，第5会员为会长，经商议由第三国担任。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美日妥协助长了日本侵华的势头。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当面向袁世凯提出侵华秘密条款，即臭名昭著的21条。主要内容为：一、承认并扩大日本取代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二、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特权；三、汉冶萍公司为中日合办；四、中国沿海港湾和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他国；五、中国必须聘用日本人为中国的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等等。2月14日，日本正式

---

① （苏）纳罗奇尼茨基等：《远东国际关系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北京，第359页。

向各国驻华使馆通报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21条”（第5部分未公开），后中国报刊揭露了条约的全文。列强先后向日本提出照会。1915年3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布赖恩在照会中提请日本政府注意美国在中国，特别是根据1844年、1858年、1868年和1903年的条约在满洲、内蒙古和山东省所享有的权利和特权。他又通过美国驻日大使要求美国能够得到在中国福建沿海参加港口建设的权利。美国在事件开始时，事实上，“准备承认日本对满洲和山东省的最高利益，讨论怎样利用这样的承认作为处理加利福尼亚问题的讨价还价的武器”。[①] 美国的这种态度和立场鼓励日本的野心，受到美国舆论的批评。美国总统威尔逊决定采取强硬态度。4月27日，国务卿布赖恩通知驻华公使：国务院不再拒绝公开他们的立场，因为这种沉默已经被解释成对日本要求的默许。后他又在美国报刊上发表有关声明。[②] 5月7日，日本政府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政府在48小时内予以答复。9日，袁世凯承认21条，除了第5部分内容“容日后协商”外。美国迫不及待地声明要享有最惠国待遇，企图利用日本的无耻要求，谋取美国在华的利益。[③] 美国布赖恩国务卿在袁世凯正式签约前，给中、日政府发出照会指出：“美国政府谨通知日本政府：美国对于日本和中国已经缔结或行将缔结的任何协定或约定，凡有损美国及其在华公民的条约权利或中华民国之政治或行政完整或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国际对华政策者，一概不能予以

---

① 阿瑟·林克：《伍德罗·威尔逊和进步主义时代，1910—1917》，前引书，第88页。

② 阿瑟·林克：前引书，第89页。

③ 余志森：《美国史纲：从殖民地到超级大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26页。

承认。”[1] 美国首先迫不及待地把维护本国利益放在首位。可是，它不仅在“21条”问题上极端自私地维护美国自身的利益，而且还对中国施加压力去满足日本的无耻要求，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国务卿布赖恩以调停者的口吻说什么：“日本不应该要求太多，中国也不应该让与太少。”1915年8月26日，美国总统威尔逊曾就21条中的第5部分内容要求国务卿布赖恩向美国驻日大使古斯理发出电报，建议日方关于顾问、武器等方面不要单独行事，可以与其他列强一起行动。美国不反对日本在“满洲和东蒙”范围内施行警政监督。美国在臭名昭著的21条的第5部分问题上还企图寻求与日本妥协的道路。1915年5月6日，美国国务院要求美国驻华大使保尔·里斯奇告诉被侵略方的中国政府要以“忍耐和友好”的精神与侵略方日本政府谈判，向袁世凯施加压力。[2] 暴露了美国在中日关系上偏袒日本牺牲中国利益的强权政治和帝国主义政策，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质和虚伪性也昭然若揭。

在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美国为缓和与日本在中国政策上的矛盾和实现妥协，再一次牺牲中国利益。1917年11月2日，美国国务卿蓝辛与日本驻美大使石井通过换文确定了美日关于中国的协定，即所谓蓝辛—石井协定，企图用含糊的词句掩饰美日的歧见。在协定中，日本保证尊重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但认为协定中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所谓“特殊利益”，为他们向中国提出的特殊利益的要求提供了法律根据；美方则解释所谓特殊利益仅指日本同中国接壤地区的商工企业而已。蓝辛—石井协定是美

---

① 《美国外交文件》，1915年，第146页。转引自（苏）纳罗奇尼茨基等：《远东国际关系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北京，第366页。

② 引自邓蜀川：“威尔逊与中国”，见杨生茂等编：《美国史论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96页。

日两国撇开中国讨论所谓中国问题，美国竟然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和中国政府的拒绝，1917年11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中国政府不因他国文书互认，有所拘束。”[①] 但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继续进行威胁和欺骗，1917年1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蓝辛会见北京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时强调美国签约的正确，胡说在当时条件下与日本合作是惟一出路；同时以美国与它的邻国关系为例，鼓吹邻国因其地理上的邻近可以享有特殊利益。美国政府的政策不但受到中国人民的反对而且招致美国人民的批评。蓝辛—石井协定于1923年3月30日废止。

美国向太平洋地区大事扩张的同时，从未忘记它对南部拉丁美洲各邻国所担负的“使命”。

四、向拉丁美洲的进一步扩张

拉丁美洲是美国的近邻，又是它的后院。所以它是美国向海外扩张的最早和最重要的目标之一。19世纪20年代，美国提出的“门罗主义”就是美国对拉丁美洲实行扩张的战略方针：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不许欧洲列强染指拉丁美洲。20世纪初，美国一跃而为世界经济军事强国，就迫不及待为实现梦寐以求的“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的梦想大干起来。美国不惜利用海军实力采用武装侵略的罪恶手段，充当国际警察，维护加勒比海的“秩序”，在拉丁美洲建立和扶持亲美政权，使那里成为美国的一统天下。从1898年起的35年中，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对拉丁美

---

① （苏）纳罗奇尼茨基等：前引书，第379—380页。

洲实行的重大武装侵略行动不下23起。[①]

〔占领古巴和波多黎各〕　美西战争结束后，1898年12月10日，美国与西班牙签订了巴黎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古巴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美国政府鉴于在菲律宾的教训，害怕激起古巴人民的反美斗争，无力在菲律宾和古巴同时进行两场殖民战争。1899年1月1日，古巴获得美军占领下的独立。美国在古巴建立了以军事总督为首的军事占领制度，采取“统治而不兼并”的政策。[②] 1900年9月，在美国总督伍德将军，曾任老罗斯福招募的美国志愿兵第一骑兵团司令官的导演下，古巴组成制宪会议，制定宪法和在法律上正式确定古美关系。1901年2月，依美国宪法为蓝本的古巴宪法草案最终完成，但其中没有关于古巴和美国关系的内容。当时的美国陆军部长E·鲁特为此提出若干条款要求古巴制宪会议将它们列入宪法，主要内容有：依据宪法组成的古巴政府不得签订任何损害古巴独立的条约或未经美国同意不得给予任何强权以任何权利；不得举借超过通常收入的债务；美国对古巴具有干涉之权和保持一个军事基地的权利；古巴政府必须执行美国军政府的法令。这些条款明显侵犯了古巴主权，遭到古巴人民的坚决反对，制宪会议拒绝讨论。总督伍德在向制宪会议施加压力的同时，又提出一项表示善意的附加条款。1901年3月2日，美国康涅狄克州参议员奥维尔·普拉特在鲁特提出的条款和伍德的附加案基础上进行适当包装组合，向参议院提出了所谓陆军拨款方案的补充条款，美国国会通过后，史称“普拉特修正案”。1901年6月，古巴被迫接受美国强加的“普拉特修正

---

① 冯承柏、李元良：“马汉的海上实力论”，见杨生茂等编：《美国史论文选》，第292页。

② 丁则民：“1899—1923年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侵略政策”。见杨生茂等编：《美国史论文选》，第334页。

案"，将它列入古巴宪法。根据修正案美国在古巴享有干预古巴内政的权利和在瓜塔那摩建立美军事基地的权利。1902 年 5 月美军撤退，古巴共和国成立。1903 年 2 月，美国迫使古巴签订协定把古巴的瓜塔那摩和翁达湾作为美国军事基地。"普拉特修正案"实质上是将古巴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它是美国海外殖民扩张的一项帝国主义外交原则，是美国门罗主义原则的新实践和新证据。古巴著名律师说："我们古巴人民一致认为，'普拉特修正案'把古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和白宫的一种保护国。"[①]

美国政府十分清楚，对古巴的政治控制和干涉是为美国向古巴获取经济利益开路的。早在 1898 年，有人在美国的《世纪杂志》上写道："（在古巴）出现一个稳定的政府和消除革命的保证，美国人就有可能由这个岛（古巴）供应它们所需的全部食糖，并且可能以比其他地方更低的价格得到它。"[②] 经过一番内部争论，1902 年 12 月，美国老罗斯福政府与古巴签订了"互惠条约"。次年，条约获美国国会通过。普拉特修正案是套在古巴人民脖子上的政治绞索，互惠条约则成为美国控制古巴经济的咒语。此后，美国同古巴的贸易额激增，古巴逐步成为美国食糖的原料产地，最终成为一个单一经济作物的国家。

古巴人民对美国的政治控制和经济盘剥强烈不满。1906 年古巴人民发动 8 月起义，自发起义很快变成反美斗争。美军第二次开进古巴镇压自由党人起义，并在古巴建立第二次军事占领制度，占领时间长达 3 年之久，美军最后在 1909 年撤出。1912 年 5 月古巴又爆发黑人起义，美国对古巴再次进行军事干涉。5 年以

---

① 转引自丁则民论文：前引书，第 339 页。

② （苏）I·德门特也夫：《美国：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进步出版公司，莫斯科，英译本，1979 年，第 146 页。

后，1917年美国对古巴再次进行军事干预。美国对古巴的不断军事占领和干预构成了美古历史上最为可耻的一页。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曾经不安地说："每天我都在冒着生命的危险，为着我的祖国和我的职责，我要努力避免古巴刚从西班牙赢得独立，就被美国跨过西印度群岛，来侵略我们拉丁美洲各国。"[①] 不幸的是，他的担忧竟成了残酷的事实。

在占领古巴期间，一股兼并古巴的强烈扩张主义思潮在美国甚嚣尘上，有人甚至叫嚷古巴应该成为美国的一个州。1903年12月12日，一位参议员在国会说："当古巴在它的宪法、法律和自由方面仿效美国，并且将有500万到600万人按照美国方针受教育从而适于享有美国公民一切权利的时候，日子就不太遥远了。于是，随着来自古巴的倡议，我们就能够欢迎我们国旗上另一颗星了。"[②] 有的美国报纸甚至宣称占领与美国海岸近邻的古巴是"天定命运"。[③]

美西战争后，美国还根据巴黎和约夺得波多黎各。当时波多黎各是一个西班牙殖民地，也是一个具有西班牙习俗的文明民族，并于1897年实行内部自治。共有居民95.3万人，其中白人近59万人。1900年4月12日，美国通过福拉克法，为了统治波多黎各，专门成立一个总督和六名行政长官的委员会，行政长官由秘书长、检察长、会计长、审计长、内务委员和教育委员组成。美国人还在波多黎各组成35人的代表院和相当于上院的"行政会议"，由六名行政官员和另由美国政府指定的五人组成，但必须保证其中有五名波多黎各人。华盛顿还任命五名最高法院

---

① 转引自李春辉：《拉丁美洲国家史稿》，商务印书馆，北京，1973年，第448—449页。

② 转引自丁则民论文：前引书，第344—345页。

③ 转引自丁则民论文：前引书，第344—345页。

的法官负责那里的司法工作。根据该法，波多黎各可以管理自己的关税。1917年，岛上居民取得了美国国民的资格。

〔调停委内瑞拉危机〕　委内瑞拉独立以后完全成为考迪罗独裁统治的国家。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于1898年成为第一个统治委内瑞拉的山里人，结束了由平原人和加拉加斯城市人控制国家最高权力的局面，人称他是在委内瑞拉实行独裁统治的“安第斯山的狮子”。1902年11月，英、德两国同意借口向委内瑞拉索债采取联合行动，12月9日，他们用海军封锁了它的5个港口，掠夺了4艘炮舰。10日，军队在委内瑞拉登陆。13日，军队实行轰炸。16日，意大利加盟，英、德、意三强共同对付委内瑞拉。

老罗斯福对委内瑞拉事件保持高度警觉。1901年12月14日，德国政府正式通知他，为了索债他们可能暂时占领委内瑞拉的一些领土，仅仅3天以后，罗斯福立即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给美国海军部，要求建立一个军事基地以准备应付突然战争。1902年1月，海军部派出司令约翰·皮尔斯伯里去调查德军在委内瑞拉的行动。2月，美国国务院企图了解外国军队在委内瑞拉登陆及其行进路线的动态。6月，驻加勒比海的美国海军接到通知进行军事大动员。罗斯福指示杜威将军整装待命。罗斯福以美国海军为后盾最后迫使德国就范，维护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原则取得成功。“一些当时的证据表明，海军被用作对德外交政策的支撑，时至12月底目标已经赢得。”[①] 同时，罗斯福总统在外交和政治上也积极采取行动，12月5日，即英德正式攻击委内瑞拉海军前5天，美国向英德两国表示如果英德排除使用任何武力的必要性，美国总统将非常高兴。12月8日，美国驻英公使亨利·

① 比尔：前引书，第357页。

怀特在英国首都与英国首相举行秘密交谈，表示对委内瑞拉形势的忧虑，提醒首相不要被德国引导而干出违逆公众舆论的事情。后他又接连同首相会谈。美国政府同时对德国政府展开外交活动。12月18日美国政府提醒德国政府，如果它不立刻同意调停，国会也许会通过决议命令总统强制实施门罗主义去反对它。[①] 在处理委内瑞拉事件中，罗斯福又打出了德拉哥主义的牌，委内瑞拉危机时，阿根廷外长德拉哥写信给阿根廷驻华盛顿公使反对欧洲列强以索债为由对委内瑞拉动用武力。他的主张被称为"德拉哥主义"。西奥多·罗斯福借口维护德拉哥宣言，出面调停，要求欧洲列强将委内瑞拉危机提交国际法庭裁决，委内瑞拉总统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表示接受。但是遭德国拒绝。最后，罗斯福派出美国所有海军由杜威将军指挥在加勒比海举行"演习"，"德国才接受调停"。[②]

老罗斯福以武力为后盾在外交和政治上既对英德施加压力又对他们进行分化离间。欧洲列强只得勉强服从，委内瑞拉危机解决，美国遂乘虚而入。

危机一方面表明各帝国主义列强在拉丁美洲的尖锐矛盾和利害冲突，同时也暴露了美国企图独占拉丁美洲的野心。老罗斯福在调停过程中非常强调美国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他认为解决这类国际争端单纯依靠国际法庭是不够的，"最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支一流的海军和一支有效的规模虽小的陆军。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产生短缺，海牙法庭是无法拯救我们的。"[③] 美国学者认为罗斯福调停委内瑞拉是他形成门罗主义推论的出发点："著名的

---

① 比尔：前引书，第360页。

② 亚当斯：前引书，第356页。

③ 比尔：前引书，第291页。

门罗主义推论起始于1902年的形势。由于委内瑞拉拒付大笔欠款，英国、意大利和德国已派遣战舰封锁它的港口。虽然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美国已经承认这种经济封锁的权力，但是罗斯福总统担心这样的行动将导致对西半球领土事实上的军事渗透和占领，侵害门罗主义。于是，总统在1904年12月6日给国会的第4次咨文中宣布了一项政策，实际上，就是使美国成为西半球的警察。”[①] 在这篇演说中，罗斯福典型地运用了他的著名格言，“开始时说话温和但是最后导致大棒的挥舞。”[②] 委内瑞拉事件不仅促成了罗斯福的门罗主义推论，而且使美国的门罗主义对德国、对英国，甚至对整个欧洲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它的作用远远超过了19世纪20年代门罗主义产生的年代。对于罗斯福来说，诚如美国学者套用伏尔泰关于上帝的名言所说：“如果不存在门罗主义的话，也有必要创造出一个来。”“它根本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策问题。”[③] 有人公开认为：“国际法中将为‘罗斯福主义’，即完备和完成了的门罗主义，留有空间。保护拉丁美洲利益反对欧洲干预的权利……将不得不被宣布保护欧洲（和北美利益）反对南美洲干预的权利相平衡。”[④]

但是，美国政府在调停委内瑞拉危机中可能赢得的拉美国家对他的尊敬和友谊，很快在巴拿马事件中丧失殆尽。

〔强取巴拿马运河开凿权〕　罗斯福的门罗主义推论一旦

---

① 詹姆斯·G·纽比尔等：前引书，第349—350页。美国学者阿尔伯特·温伯格认为，如果将西奥多·罗斯福的政策原则仅仅停留在认为是门罗主义的推论上是不够的。因为罗斯福的思想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它的基础与门罗主义无多大关系。他认为罗斯福深受帝国主义者约翰·伯吉斯（John Burgess）的影响。详见温伯格：前引书，第429页。

② 温伯格：前引书，第428页。

③ 比尔：前引书，第368—369页。

④ 温伯格：前引书，第426—427页。

出笼，就成为美国向拉丁美洲扩张的总方针。而强占巴拿马运河开凿权是他扩张计划中的梦寐以求的伟大梦想之一。马汉曾经从加强美国海军实力的战略高度出发竭力鼓吹在中美洲地峡开凿运河，以便缩短美国海军航程，有效进行两洋战争。美西战争期间美舰“俄勒冈”号绕过南美洲的远距离航程耗时费力，贻误战机，使美国领导人倍感开凿巴拿马运河之迫切。1899 年 3 月 30 日，美国国会授权行政当局对此事的可能性进行调查。1900 年 2 月 5 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和英国驻美大使庞斯福德签订第一个条约，但未获美国国会批准；1901 年 11 月 18 日，再次签订海约翰—庞斯福德条约，明确废除了 1850 年签订的克莱顿—布尔沃协定（该约规定美英两国共同管理规划中的中美洲运河），美国免除了接受国际共管巴拿马运河的义务，获得开凿、管理和防卫运河的独占权，允许任何其他国家的船只为和平目的通过该运河。1902 年 6 月 29 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签署了斯普纳法案，批准在巴拿马修建运河。1903 年 1 月 22 日，美国同哥伦比亚签订了海约翰—埃尔兰条约，强迫哥伦比亚政府在巴拿马省划出一条 15 英里宽的地区供开凿运河之用，租给美国 99 年；美国则以一次付清 1000 万美元和每年偿付 25 万美元给哥伦比亚政府为代价。但哥伦比亚共和国国会以侵犯国家主权和补偿太少为由拒绝批准条约。后哥伦比亚要求提高地价为 1500 万美元等，均遭海约翰拒绝。美国公使向国务院汇报说：“没有问题，反对批准条约的公共舆论虽然强烈，但哥伦比亚公共舆论在控制立法机关方面不是必要的有力因素。”①

尽管如此，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为了开凿运河曾计划要求国会授权他动用武力从哥伦比亚夺取这块土地。后改变主意，

---

① 威廉·麦克凯：《美国和巴拿马共和国》，纽约，拉塞尔，1965 年，第 12 页。

决定在巴拿马阴谋策动政变、寻求政治代理人，实现美国开凿巴拿马运河计划。法国出生的比诺-瓦里亚是一位工程师，也是法国运河公司的老板。他曾受美国委托与哥伦比亚谈判，谈判失败后，他参与鼓动巴拿马的政变，促使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而独立。他与罗斯福的朋友法学家约翰·穆东会面后知道美国对巴拿马运河仍有兴趣，10月10日，他拜访美国国务卿首席助理罗密斯，并通过他得以同正忙于总统竞选的美国总统会面。会面后他估计罗斯福总统不会不乐意看到巴拿马发生革命。10月29日，他得知哥伦比亚军队开往巴拿马，急忙赶到华盛顿通知罗密斯"革命即将发生"，并与海约翰会面。11月2日，罗斯福总统命令美国军舰"纳什维尔"号驶抵科隆支持巴拿马政变（美舰"亚特兰大"、"迪克斯"和"波士顿"号早在10月19日已待命准备应付突发事件）。11月3日比诺-瓦里亚收买曼努埃尔-阿马多尔在巴拿马发动政变制造"独立革命"。次日召开群众大会，阿马多尔宣布为巴拿马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在就职典礼上，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英勇精神使全世界惊讶。昨天我们还是哥伦比亚的奴隶，——而今天我们获得了自由。罗斯福总统'援助'了我们……罗斯福万岁！美国政府万岁！"[①] 3天后，美国政府立即承认巴拿马独立。11月13日，比诺-瓦里亚正式接到华盛顿通知成为巴拿马共和国的驻美公使，并立即着手起草美巴协定，对于该协定"海约翰没作重要修改就立即接受了"。[②] 11月18日，美国和巴拿马签订海约翰—比诺-瓦里亚条约。条约规定，美国为开凿运河在巴拿马永久占领10英里宽的地峡，并在该地区实行统治和设防；为此，美国承认巴拿马独立，并立即支付1000万

① 转引自李春辉：前引书，第418页。

② 麦克凯：前引书，第17页。

美元，9年以后每年支付25万美元作为经济补偿。1903年12月2日，巴拿马在比诺-瓦里亚的竭力推动下批准了条约；1904年2月23日，美国国会批准条约，2天后美国总统签署条约。罗斯福在后来的回忆中这样说："我先把运河拿下来，然后再把这个问题交给国会去辩论，而当辩论继续进行的时候，运河的建筑工作就已经向前推进了。"他毫不掩饰地说："我拿下了巴拿马，运河区完全变成了我们的，巴拿马共和国也全部在我们的势力控制之下。"①

在哥伦比亚人民的眼中，美国政府为取得巴拿马运河的开发权策划了一场卑劣的政治阴谋，而法国人比诺-瓦里亚在这笔肮脏的政治交易中，起到了最肮脏的作用，获得了最肮脏的大笔利润。比诺-瓦里亚本人因此成了新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杰出成员，获得了该公司价值4000万美元的股票。对于法国来说，比诺-瓦里亚是一位英雄，他为法国公司争得了大笔股票；对于美国政府，他的忠心耿耿的服务赢得了罗斯福总统给予的高度评价："你最后解开了已使几百年来人类无能为力的难题，为你珍贵的祖国和全世界作出了最杰出的服务。"②

老罗斯福在1903年12月7日向美国国会报告说："依据条约的条款规定，美国保证和维护巴拿马共和国的独立。准予美国永久使用、占领和控制一条宽10英里以及两边延伸入海的3英里的地峡，及区域外所有为建造运河和豪华工程的必要土地，以及巴拿马湾的岛屿。"③ 美国用卑劣的政治手腕制造"革命"，阴谋使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而独立，最后通过巴拿马傀儡政权实现

① 转引自李春辉：前引书，第418页。
② 麦克凯：前引书，第17—18页。
③ 麦克凯：前引书，第17页。

美国在巴拿马地峡开凿、控制和管理运河的目的。取得运河开凿权对美国海军舰队将来出入太平洋和大西洋，实施海上扩张战略提供了最为有利的条件。在客观上巴拿马运河的开凿对于缩短南美洲航线有着重要意义（约可缩短1万公里左右），有利于世界航运事业。巴拿马运河的设计和开凿是在人类运河史上谱写了一首恢宏悲壮的诗篇。

1904年巴拿马运河正式动工。美国陆军上校和工程师乔治·戈瑟尔斯主持开凿工作。1907年西奥多·罗斯福任命他为地峡运河委员会主席和总工程师。1908年1月，戈瑟尔斯全面负责开凿和管理工作。运河开凿困难重重，他克服了技术上和管理上的许多困难，耗时10年，1914年巴拿马运河正式竣工。1914年8月15日，一艘美国军舰首航成功。1915年春天正式全线通航。运河全长约82公里，宽152—304米。建筑费用为23300万美元，参加修筑的巴拿马和其他国家的劳工牺牲者高达7万人，因此运河区被称为"死亡的海岸"。[①] 运河大大缩短了美国东西两岸的水陆航程，为美国带来的经济效益和军事利益难以估量，客观上也为人类带来经济和交通上的裨益。

对于西奥多·罗斯福在强占巴拿马运河开凿权中的所作所为，美国外交史专家塞缪尔·比米斯曾说："1903年的干涉在美国的拉美政策上是惟一的一个真正的污迹，也是一个最伟大的大污迹。"有的美国学者认为罗斯福急于干这肮脏勾当是"悲剧性错误和不可原谅的"。有的认为他"用不太高尚的手段获得了高尚的结果"。[②]

〔美国和巴拿马的冲突〕　　美国政府在庆贺取得了巴拿马

---

① 转引自李春辉：前引书，第419页。

② 哈纳斯和沃克编：前引书，第95页。

运河开凿权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埋下了与巴拿马人民间的矛盾的种子。巴拿马运河动工不久，在巴拿马运河区实施进出口、海关、税收和邮局建设的时候，就引起了巴拿马的激烈抗议，美巴双方几乎为此开展了长达数月的外交谈判，最后还是由美国国防部长塔夫脱出面解决了事。1904 年 6 月 24 日，塔夫脱签署命令允许巴拿马运河区向友好国家为商用目的而开放，并将该区划分成两个海关区域。克利斯托瓦尔拟划为巴拿马运河的大西洋沿岸的终端；安孔为运河在太平洋的入口港，并将按照美国征税方式在那里征收进口税。巴拿马运河区总督乔治·戴维斯没有公布该命令的第 8 和第 9 部分，其内容为"运河区总督有权为运河区和巴拿马共和国之间的海关服务，保护两国政府的海关收入和防止欺诈和走私，参与同巴拿马共和国总统签订协议。"①

美巴双方发生的重大争议集中在对海约翰—比诺-瓦里亚条约的理解上。众所周知，该条约仅仅在巴拿马宣布独立后 15 天里匆忙制定的，而且代表巴拿马谈判方的竟是一位法国公民比诺-瓦里亚。1904 年 7 月 15 日，巴拿马市商会向巴拿马总统阿马杜尔提交备忘录，反对美国在运河区建造进出港口、海关和征税。商人们埋怨说无论条约的精神还是文字都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在运河区内建设上述机构。他们在备忘录上说："（该地区的）商业、农业和畜牧业将被毁灭，从这些资源提取税收的巴拿马政府将遭遇同样的命运。灾祸将遍及全国，人民将被迫迁移。根据条约的第 1 条，美国保证巴拿马共和国的独立。但是根据提议中建设的巴拿马共和国将陷入已经存在的最糟糕的依附、奴役和饥饿。"②美国政府对此表示不满，态度十分傲慢。7 月底，巴拿马总统要

① 麦克凯：前引书，第 23 页。
② 麦克凯：前引书，第 26 页。

求美国驻巴拿马公使约翰·巴雷特作出回答，反对美国政府对条约的践踏。巴雷特向华盛顿汇报说，巴拿马人民情绪激昂，对美国的不信任已达到非常危险的地步，除非修改6月24日的命令。7月26日，巴雷特电告美国国务院：巴拿马的激动日增，形势危急。他认为问题最重要的症结是关于运河区的主权问题。他分析说："如果总统的命令在颁布和执行之前，在华盛顿或在巴拿马通过外交途径认真讨论的话，整个麻烦也许可以避免。"①

8月11日，巴拿马驻华盛顿公使致美国国务卿一备忘录，指出根据海约翰—埃尔兰条约和海约翰—比诺-瓦里亚条约，巴拿马并没有把主权转让给美国。只有在海约翰—比诺-瓦里亚条约的第3条中提到主权问题，他认为该条约第3条的陈述是，如果美国对领土有主权的话，美国将行使权利、权力和权威。他还对该条约的第6、10、12、13、23条等等作出自己的解释。他认为结论应该是两个国家共同行使对运河区的主权。备忘录指出骚乱是由6月24日的命令引发的。美国不应该开放克利斯托瓦尔和安孔为运河的出入港口。因为它没有这种权力。而且这些出入港口都是巴拿马城市的一部分，条约第2条规定排除了巴拿马城市和科隆及其连接部分的领土。所以巴拿马政府无法接受同条约相矛盾的状况。巴拿马政府仅仅允许美国在必要时或作为权宜之计提供对运河的保护使之对全世界自由通航，防止被任何外国势力进行不当活动。但没有把运河区转让给美国成为它用高关税作为它的财政收入的一个来源。

美国政府对此持强硬态度，向巴拿马人民挥舞"大棒"。8月中旬，美国海军上将J·G·沃尔克将军主持运河区工作。他傲慢地告诉巴拿马官员，美国决不对此作出让步，因为这是罗斯福

---

① 麦克凯：前引书，第27页。

总统支持的地峡运河委员会的决定性的态度。

同时，美国政府又使用“说话柔和一点”的策略。8月18日，美国国务院给巴拿马公使一封由瓦里亚写的信的复印件。该信写于1904年1月19日，正值美国参议院辩论有关在运河区修建终点港的问题。当时作为巴拿马方官员的瓦里亚在信中说，巴拿马市和科隆市的港湾与运河的港湾是完全分离和独立的，但是位于这两个进口处的港湾，船只在通过运河时必须使用。如有麻烦，美国可由条约第2条给以适当保护。巴拿马公使立即予以回击，他认为瓦里亚依据的只是1903年11月18日签订的条约而已。后来巴拿马官员发现了该国政务院批准瓦里亚信件的文件，事情就变得十分复杂。巴拿马国内舆论从批评美国政府转向巴拿马政务院。美巴继续举行外交谈判。巴拿马政府批评美国政府不尊重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巴拿马政府，要求美国驻巴公使约翰·巴雷特参加所有会议和签订所有协议。

1904年10月18日，美国总统命令国防部长威廉·塔夫脱赴运河区和巴拿马解决争端。24日海约翰对巴拿马备忘录作出答复。他坚持认为美国向友好国家为商务目的开放运河、在运河区征收关税、建设邮局开展区内外的邮务活动都是合理的。这些权力基于美国对运河区的主权。海约翰批评巴拿马政府在对条约进行解释时搞错了对象，把美国当成了一个私人公司——法国运河公司。他宣称：“美国为此种目的，用此种方式向本半球它的姐妹国家可能要求领土和主权是如此显现的天命而无需讨论。”①

11月22日，塔夫脱离开美国启航访问巴拿马。27日星期天抵达科隆，然后搭乘专车赴巴拿马市，他告诉巴拿马人：“美国政府在这个地峡计划做的事情只是建立一条连接两洋的运河，它

---

① 麦克凯：前引书，第38页。

将不仅带给你们国家，而且给美国和全人类带来巨大利益。”[1]在美巴谈判中，美国坚持自己的立场，但在某些问题上也作出了适当让步。1904年12月3日双方签订协议。但是协议并没有消除美巴之间的矛盾。

酷爱独立和自由的巴拿马人民对巴拿马宪法第136条抱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因为它规定了美国政府为重建所谓公共和平与宪法秩序可以干预巴拿马共和国的任何部分。当时在巴拿马市流传的爱国小册子称宪法第136条是把“羞愧的脸色”留传给未来整整几代人的“巨大和永久的羞耻和侮辱”。[2] 1906年巴拿马计划举行大选，自由党和保守党争端日趋激烈，自由党的反美情绪高涨准备举行政治示威。美国决定对大选进行监督。塔夫脱在1906年4月26日发出指示，“（巴拿马）共和国任何地方发生的暴动都将极大地增加美国建筑运河的困难……我认为美国必将适当地阻止对运河建设的不可避免的干扰，镇压共和国任何地方发生的暴动。”[3] 1908年巴拿马又举行选举，美国海军以“监督选举”为名在巴拿马登陆。1918年，美国海军直接在巴拿马驻扎。

美国在开凿巴拿马运河和干预巴拿马内政的同时，还不失时机地推行金元外交。根据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凯的研究，1903年美国水果公司占有巴拿马铁路和土地，在巴拿马有200多万美元的资产。中南美洲电报公司，新泽西美国商业发展公司等等都在巴拿马经商。1903年以后，美国在巴拿马的投资者数量激增。美国的一些州在巴拿马建立了农业殖民地。如：190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奇里基改良公司在该省省会戴维开设办公室旨在开发奇

① 麦克凯：前引书，第40页。
② 麦克凯：前引书，第63页。
③ 麦克凯：前引书，第68页。

里基省。1906年美国新泽西州的奥兰治、圣路易斯和密苏里的居民组成巴拿马公司在巴拿马东部的圣布拉斯半岛建立一个农业殖民地。

美国银行业也打入了巴拿马。美国的康涅狄克国际金融公司，美国商业发展银行和西弗吉尼亚的巴拿马金融公司在运河区开展金融活动。国际金融公司在巴拿马、科隆都设有分部，1910年巴拿马金融公司在巴拿马和科隆开展业务。1913年大陆银行和信托公司在运河区建立。1915年华盛顿特区的商业国家银行在巴拿马市和克利斯托瓦尔设立分部；运河区银行在科隆开张。美国企业家还在巴拿马开发交通运输，接着石油公司也在巴拿马兴起。

〔*塔夫脱在中美洲的经济扩张*〕　塔夫脱上台后害怕老罗斯福的政策会导致美国对中美洲的频繁干涉，同时他认为中美洲国家的许多麻烦都因财政问题而生。它们从欧洲银行借贷许多资金而无力偿还其利息，因此常常邀请外国加以干预保证还债。塔夫脱决定采取用美元取代欧洲资金的方法加强对拉丁美洲的控制和扩张。在塔夫脱任内，美国国务院大力鼓励美国私人银行家向中美洲国家大量贷款，特别是向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投资。对塔夫脱而言尼加拉瓜是最头疼的麻烦。1909年那里爆发一场得到美国支持的反对独裁者塞拉亚的革命。塞拉亚从1893年执政以来几乎垄断了国家的一切资源，还入侵洪都拉斯，撕毁中美洲5国签署的和平协议。塞拉亚向欧洲银行借贷了巨额款项。美国在那里也有它的经济利益，特别是联合果品公司在尼加拉瓜很有经济实力，他们支持反对塞拉亚的起义。1909年12月，塞拉亚以参加起义的罪名处决了2名美国职业军人。坚持支持塔夫脱“金元外交”的美国国务卿诺克斯指责塞拉亚的暴行并宣布与尼加拉瓜断交。1910年初，塞拉亚被迫出逃尼加拉瓜到墨西哥避难，

尼加拉瓜建立了新政府。次年，塔夫脱和诺克斯强迫新政府将从欧洲银行的贷款转为向美国借贷。1912年，尼加拉瓜发生反对亲美政权的起义，美国银行家要求塔夫脱政府派军队去尼加拉瓜维护“秩序”。美国海军陆战队被派往那里一直驻留到1925年。

〔武装干涉墨西哥，占领海地和多米尼加〕　威尔逊在进入白宫前曾对他的普林斯顿朋友们说：“如果我在任内不得不主要去处理外交事务，那将是命运的嘲弄。”但是命运不仅嘲弄了威尔逊，而且还十分残酷。他上任不久就遇上了邻国墨西哥发生的令他惶恐的麻烦。

1908年墨西哥独裁总统迪亚斯曾向美国记者透露他将于1910年离任，但后又改变主意声明参加1910年竞选争取连任。当时墨西哥经济衰退，工人罢工不断，农民苦难深重，迪亚斯难以维持统治。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家马德罗协助组织反连选连任党并成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但后以煽动起义罪被当局逮捕，交保获释后逃亡美国。1910年10月，他宣布自己为墨西哥合法总统。他的政治伙伴发动起义攻占华雷斯城，迪亚斯宣布辞职。1911年10月墨西哥举行总统选举，马德罗获胜，结束了独裁者迪亚斯的统治。马德罗面对迪亚斯派的谋反危险和更激进派别的攻击，还要面对美国大使亨利·威尔逊的干扰。1913年2月墨西哥发生军事叛乱。马德罗依靠维克托里亚诺·韦尔塔将军平息叛乱。但是与迪亚斯派勾结的韦尔塔在英国支持下，推翻了政府，杀害了马德罗。韦尔塔上台后实行独裁统治，解散立法机构，镇压一切政治反对派。1913年，威尔逊正好入主白宫。墨西哥的政变引起美国不满而拒绝承认韦尔塔政府。1913年墨西哥国内卡兰萨等率领军队反对韦尔塔政权。1914年美国和墨西哥发生所谓坦皮科事件，墨西哥军队逮捕了在坦皮科的美国水兵，虽很快释放了他们，但是美国政府仍要求墨西哥向美国国旗鸣21响

礼炮致歉。韦尔塔不允，威尔逊派军队于1904年4月22日占领了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23日卡兰萨致信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说："侵略我们的领土和在韦拉·克鲁斯的永久驻军构成对我们作为一个自由和独立主权存在的侵犯，它将把我们拖入一场直至今天我们仍希望去避免的不平等战争。"[①] 美国侵墨事件受到拉美许多国家的抗议，蒙得维的亚、圣地亚哥、智利、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等地发生一系列反美示威，那里的报纸都谴责美国的行为是"另一个帝国主义的天定命运"。[②] 1914年韦尔塔辞职出逃。次年卡兰萨军队击败分裂武装就任临时总统。韦尔塔在1915年去美国后因在墨西哥煽动叛乱被捕。卡兰萨在1915年5月1日成为正式法定总统并获美国承认。但是卡兰萨革命政权依然面临重重困难和复杂的政治形势。曾一度得到美国支持的维拉控制了墨西哥的北部江山，为了实现他的政治野心制造事端反对卡兰萨，维拉在1906年3月9日带领军队袭击了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哥伦布城并杀死19名美国人。1916年3月，威尔逊派约翰·潘兴率领军队远征墨西哥。早就反对美国军队入侵韦拉·克鲁斯的卡兰萨总统坚决反对和阻止美国军队入侵墨西哥领土哥伦布市。从1906年至1917年1月15日，美墨双方举行谈判，美国军队自1917年1月27日开始从墨西哥撤退。同时，卡兰萨政权继续在国内进行改革，1916年10月22日，墨西哥人民选举了制宪会议并于当年12月和次年1月召开会议通过了墨西哥宪法，1917年3月11日新的议会和符合宪法的总统卡兰萨正式选举产生，美国立即加以承认。至此，"墨西哥—美国关系上近乎悲剧的一章

① 阿瑟·林克：前引书，第125页，注41。
② 阿瑟·林克：前引书，第124页，注39。

结束了”。[1]

1916年11月25日任德国外长的齐默尔曼为挑起美国与墨西哥的纷争，给德国驻墨西哥公使发去密电。1917年2月，美国从英国情报处截获德国外长致德国驻墨西哥大使电报，获悉德国当局计划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同墨西哥建立联盟。电报声称德国将给予墨西哥以通常的财政援助，鼓励墨西哥向美国收复失地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并要求墨西哥同日本结盟反对美国等等。1917年3月1日，电报公开后，美国国内激起了强烈的反德情绪。德国非但没有达到破坏美墨关系的目的，反而加速了美国的参战步伐。

〔对海地的军事统治〕　在威尔逊总统宣誓就职不久，海地新总统被选出。但是海地很快爆发了革命，1914年1月27日总统退位。2月8日，奥雷斯特·萨莫当选总统。9、10月间，海地政局又陷于混乱，萨莫政权垮台。1914年12月，美国总统威尔逊乘海地内乱派遣一支海军陆战队在太子港登陆，将海地国家银行中价值50万美元的黄金储备劫往纽约。[2] 海地再次登场的新领袖又于1915年1月被推翻。1915年初，沙姆上台，美国派出代表团与海地政府谈判。7月27日海地总统在群众暴乱中丧生。美国立即以“保护美国人和外国人利益”为名，于次日正式派遣海军司令卡普顿率军在海地登陆，并占领太子港等重要港口。从此海地沦于美国的军事控制之下。

8月12日，在美国操纵下海地举行新总统选举。亲美傀儡总统达梯圭纳维上台，但真正的统治者还是美国海军司令卡普顿。1915年9月16日美国迫使海地签订条约，规定美国对海地

---

① 阿瑟·林克：前引书，第145页。

② 李春辉：前引书，第472页。

的海关和财政实施监督；在美国官员领导下成立地方警察；海地政府放弃将本国领土租让给其他国家的权利等等。1915 年年底，海地参院批准条约，1916 年 2 月美国参院批准生效，为期 10 年。1917 年美国为海地制定新宪法。认可美国的占领行为和准许美国在海地取得土地所有权。美国对海地的军事占领对海地人民犯下了屠杀无辜的罪行。美国学者认为："对海地的军事占领建立在冷血屠杀之上。近 3000 人——大多是非武装的平民——被杀，仅仅因为一个美国军官和在名单中的 12 人的失踪。前美国领事詹姆斯·约翰逊报告说：'和平仅仅意味着用机枪在山上猎杀衣衫褴褛的海地人。'这场秘密战为'有功的民主人士'提供了成百个就业职位。他们以豪华的殖民地方式生活：乘舒适汽车，住宽敞住所，还有廉价的忠心不二的仆人护理他们。军事占领的费用和白人殖民统治者的开销全由海地政府支付。"① 这是美军占领海地施行暴力的真实写照！

面对美国的军事控制，海地人民不断进行反抗。1915 年海地人民发动游击战。1918 年比拉提领导人民反对美国占领军的武装起义，在不长的时间里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 5000 人，起义一直坚持到 1920 年。

〔侵犯多米尼加和尼加拉瓜主权〕　美国对海地的邻国多米尼加采取了同海地一样的控制政策。1903 年 1 月 31 日，美国借口维护"圣多明各开发公司"对多米尼加政府贷款的利益，强迫多米尼加政府签订一项协议，规定由多米尼加政府赎回此项债券。1904 年，西奥多·罗斯福借口多米尼加拒绝偿清债务，挥舞大棒，派出武装力量入侵多米尼加领海，强迫它同意让美国监督

---

① 杰弗里·佩雷特：《20 世纪美国历史》，西门和舒斯特出版公司，纽约，1982 年，第 126 页。

其海关税收和国家财政，1907年2月25日美国又逼迫多米尼加同意美国在50年内具有征收多米尼加海关关税的权利，并由美国总统直接任命和保护多米尼加税务使和助理。至此，美国完全控制了多米尼加的财政和经济。

美国控制了多米尼加的海关收入后，在银行家的别有用心的怂恿下，美国政府派詹姆斯·沙利文去多米尼加担任美国代表。

1916年仲夏，美国国务院认为多米尼加局势已无法控制，必须加以全面管制。威尔逊总统解除了沙利文的职务，任命资深官员威廉·拉塞尔接替，同时派出使者赴多米尼加会见所有政治领导人，警告他们如果他们无法平息国内的混乱，美国将对他们实行军事控制。1916年年底，威尔逊派遣海军陆战队在多米尼加登陆，不久美国军队占领多米尼加的首都和其他城市。美国占领军达1.8万人。美军高级指挥官H·S·纳普上尉将多米尼加共和国置于美军控制之下。12月26日宣布解散多米尼加国会。此后，美国军事当局还在多米尼加的地方建立听命于美国的政权。美国占领军在那里剥夺了多米尼加人民的政治权利，培植和训练由美国当局直接领导的职业军，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逮捕爱国人士。借助军事占领，美国资本涌入多米尼加，开辟甘蔗种植园，修筑铁路、港口和桥梁，美国公司和银行控制多米尼加的经济命脉等等。这就是美国保证邻国“稳定、秩序”的真实写照。“当哈定入主白宫时，被威尔逊派遣去保护美国财产和亲美政权的美国部队驻守在海地、古巴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这些占领军不仅败坏了美国的声誉，同时还在那些国家粉碎了给予负责任的政府去发展的任何机会。”①

同时，尼加拉瓜也早已成为美国垂涎的猎物。早在1897年5

① 佩雷特：前引书，第126页。

月老罗斯福就写信给马汉说："我相信我们应该立即建造尼加拉瓜运河。"[①] 尼加拉瓜总统塞拉亚从1893年直至1910年长期执政，对内依靠武力实行独裁，垄断了国家的一切资源，但也进行了一些适当的改革，对外也曾采取了一些不满美国的政策。1906年他拒绝出席维持中美洲和平的圣何塞会议，还入侵并推翻了洪都拉斯政府，又企图在萨尔瓦多"制造"革命。他坚决反对美国修建尼加拉瓜运河的计划，引起美国的极大不满。1909年，美国支持尼加拉瓜保守党人推翻塞拉亚统治的行动，建立起以埃斯特拉达为总统的保守政府。1913年6月9—11日，美国和尼加拉瓜签订条约，美国以300万美元代价购买开凿尼加拉瓜运河的土地，美国对该款项的使用进行监督；根据条约美国加紧对尼加拉瓜的控制和干预，维护尼加拉瓜的"独立"。[②] 1912年，尼加拉瓜爆发反对阿道夫·迪亚斯统治的斗争。为了维护亲美的傀儡政权，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尼加拉瓜登陆，对该国进行军事控制。1914年8月5日，美国和尼加拉瓜签订了"布赖恩—查莫罗条约"，规定美国享有在尼加拉瓜开凿尼加拉瓜运河的权利，享有在丰塞卡湾建立海军基地的自由，并有权长期租借加勒比海科恩群岛。后因遭尼加拉瓜邻国的抗议，美国没有实现在那里开凿运河的计划仅在科恩群岛建造了一座灯塔而已。

五、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大国仲裁角色

20世纪初，美国大肆向远东和拉丁美洲扩张的同时，在国际事务中又到处指手划脚，盛气凌人。

---

① 比尔：前引书，第52页。

② 阿瑟·林克：前引书，第96页。

〔第一次海牙会议〕　　1899年5月18日—7月29日，由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提议在荷兰海牙召开了第一次海牙会议。共有26个国家参加，美洲仅美国和墨西哥派代表出席。俄国外交大臣米哈伊尔在邀约中提出建议讨论限制扩军，减少新武器的部署；会议将1864年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即一切治疗伤病员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有免除被占被俘后被破坏的权利，一切参加战斗者应得到公平的待遇和治疗，援助伤员的平民应受到保护，公认红十字作为识别公约涉及的人员和装备的标记等原则，均应在海战中加以应用；修订有关地面战法规和惯例的布鲁塞尔宣言。会议最后签订了公约，发表三禁宣言：禁止使用窒息性毒气，禁止使用达姆弹，禁止从气球上发射子弹或炸药。会议对“交战国地位的条件”下了定义，对其他地面战与海战的惯例作出解释。最重要的成果是通过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公约，成立常设仲裁法院。但是对会议的主要议题限制军备问题没有达成协议。美国参加了会议，并且努力发挥大国的作用。A·T·马汉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会议，他在会上投票反对国际仲裁。

〔西奥多·罗斯福调停日俄战争〕　　罗斯福在对东亚实行扩张和对华推行门户开放的过程中，希望在东亚建立起某种政治均势，借此美国可以通过协调妥协和多边或单边会谈进行平衡，抬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并可以在东亚获取巨大利益。但是日本的崛起和它的对华野心经常打破这种均势，造成欧洲列强诸国在东亚地区的新矛盾和不平衡。罗斯福总统在对日本、俄国、德国等国在东亚的力量和意图作出分析以后，对日本的认识经过一番变化以后逐步趋向稳定，他既认为日本是美国的潜在对手因而对它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特别在海军建设方面美国决不能落在其后；又认识到日本是东亚地区的惟一强国，也可以成为美国在东亚遏制俄国扩张的重要力量，所以罗斯福为要利用日本作为牵制俄国的

制衡器竭力讨好日本，对日本采取友好的外交态势，以日制俄，以日制华，建立新的平衡。调停日俄战争就是罗斯福建立远东政治均势的一次重大努力。

1904年至1905年，日俄两国在中国土地上发生了一场为争夺控制满洲和朝鲜的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后，俄国企图控制中国的满洲和朝鲜。而日本当时在朝鲜已有落脚点，希望美国能阻止俄国实现它控制满洲的美梦。但是美国有礼貌地通知日本：美国不准备用武力实施其门户开放政策。日本转而与英国结盟，企求欧洲国家共同干涉俄的扩张，不让俄国计划得逞。1904年2月8日，日本向驻守中国旅顺口港的俄国海军舰队发起突然进攻，揭开了日俄战争的序幕。日本联合舰队在旅顺口封锁俄国海军舰队长达10个月左右，迫使俄军于1905年1月投降。在陆上，侵占中国东北的日军向俄军发起进击。由于俄国兵力有限，给养不足，指挥不力，致使日军连连获胜。1905年5月27日，东乡的日舰在对马海峡与前来支援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遭遇，日舰纵队直穿俄国前进中的横队击毁33艘敌舰，大获全胜。俄军惨败以后，国内又爆发革命风暴，沙皇尼古拉二世内外交困。

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始终关注着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两强战争。他从美国的强国地位出发信奉力量平衡的政治学说以达到维持国际秩序和稳定的目的。在日俄战争中他企图扮演一个仲裁者的角色。战争爆发时，罗斯福同情日本，把俄国看成是破坏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侵略者。但在日本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罗斯福企图在两国间进行调停，以恢复亚洲战前的力量均衡。两国最终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条约规定日本获得对中国辽东半岛（旅顺口）和南满铁路（通往旅顺口）和库页岛的一半控制权。1906年罗斯福为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是

美国作为世界大国在亚洲扩大其政治影响的惊人举措。早在1905年1月，罗斯福开始有了进行调停的最初想法，他通过私人朋友赖斯与英国进行秘密联系，后又企图与俄国沙皇联络，但困难重重。[①]

5月27、28日，日本海军舰队击溃俄国舰队，罗斯福再次努力结束战争。6月5日美国总统立即以国务院名义给美国驻俄公使迈耶发去秘密备忘录，要他立即求见沙皇陛下向他说明他是根据总统个人的指示，向皇帝陛下提出总统约请俄国代表与日本代表关于是否缔结和平交换意见的要求。总统最迫切和最真诚地希望向俄国提出对它最为有利的劝告。1905年8月9日，日俄和谈正式在美国新罕布什尔的朴茨茅斯举行。

西奥多·罗斯福调停日俄战争是美国向远东推行扩张政策的一个具体举措。美国总统企求在处理远东地区的国际问题中发挥“一等”大国作用，显示美国的政治实力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所以在调解过程中罗斯福不顾昔日世界强国英国的干扰和影响，独立自主地运用纵横捭阖的政治手段，利用德国、法国、英国与日本和俄国的复杂关系，拉日压俄，软硬兼施，最终抓住俄军惨败的有利时机，逼俄就范。罗斯福的调停也是美国在远东推行的均势政策和策略的产物。美国政治家对俄国和日本的现状和未来有他们自己的判断。在经历了一定的实际接触以后，罗斯福认为美西战争以来，俄国是一个完全没有信誉的国家，它缺乏对事实的理解和概念，它不愿面对现实，它对自身的强弱缺乏了解，它无法应对突发事件。而日本的行为已经显示出它将是一个凶恶的敌人，虽然现在美国的海军力量在数量上还是优于日本的。他希望说服美国人民一方面要公正和礼貌地对待日本人，一方面要保

① 比尔：前引书，第244页。

持美国海军的优势。这样就不需要害怕日本了。如果美国像布鲁克斯·亚当斯所说的那样，它自己仅仅是“富裕、进取和手无寸铁”的话，也许在某一时刻日本会对美国造成伤害。无论如何，只要美国处在正义的、武装起来的地位，它就能够把握它的未来，无论是反对日本还是德国，无论是在大西洋还是太平洋……[①]。美国对日本的看法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在调停日俄战争过程中罗斯福的同情倾向于日本方面。不过，虽然他对俄国怀有恶感，但是他又要利用俄国牵制日本，因此不希望俄国在战后完全被逐出远东地区，让日本无所顾忌地在远东称霸。他认为如果日俄战争尽早结束的话，远东的均势不可能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战争继续下去俄国可能会失去它的东西伯利亚地区，最后无法同日本抗衡。罗斯福写信给洛奇说：“如果看到俄国被全部逐出太平洋沿岸，我将会感到遗憾……但是假如俄国拒绝和平，类似的事情必将发生。”[②] 诚如美国学者所言：“他不喜欢俄国，但是他不要它放逐出东亚或变得如此虚弱以致它不能牵制日本。”[③] 罗斯福的均衡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是一脉相承的。他所谓在远东地区实现列强的均势完全以牺牲中国为代价。罗斯福希望日俄战争结束后“为美国和其他商人打开满洲的贸易”。[④] 在调解日俄战争期间罗斯福始终将中国排除在外，甚至不让中国参加朴茨茅斯会议，战争发生在中国领土上，中国人民对战争却没有丝毫发言权，这是极不公正的。有的美国学者认为这是罗斯福将中国人民视为“落后民众”而无法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立作用的观点导

---

① 格拉蒂、戴维尼：前引书，第 21－24 页。
② 比尔：前引书，第 272 页。
③ 比尔：前引书，第 272 页。
④ 比尔：前引书，第 273 页。

致的错误。[①]

〔美国调停第一次摩洛哥危机〕　20世纪初，在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狂潮中，由于法国和德国的矛盾爆发了摩洛哥危机。1904年4月8日，法国和英国签订了《关于埃及和摩洛哥的声明》。10月，法国为瓜分摩洛哥又同西班牙签订密约，为了换取它在摩洛哥获得的全部权利，以同意不反对英国在埃及的行动为条件作交易。但是德国对此大为不满，而坚持在这个地区实行门户开放政策。1905年3月底，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出访丹吉尔并发表针对性的强硬讲话，宣称摩洛哥苏丹是绝对独立的君主，在承认苏丹独立的前提下，各国在摩洛哥享有同等的权利。后来，德国劝说罗斯福总统出面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摩洛哥问题。1906年1月，国际会议在西班牙的阿尔赫西拉斯召开，出席国家有法国、英国、德国、美国、西班牙、俄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和摩洛哥等14个国家。危机虽然缓解，但德国并不满意，因为会上意大利、俄国、英国和美国都支持法国，4月7日通过了阿尔赫西拉斯条例。“会议本身的故事已广为人知，但是罗斯福的作用鲜被理解，此次会议也极大地有助于理解罗斯福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对他所面临的问题的想法”。[②] 其实，罗斯福是这次会议的实际组织者之一。德国竭力要求召开会议，英法坚决反对。美国从中调停。2月25日，德国首相比洛亲王给驻美大使写去长信，3月6日，罗斯福得悉信件内容：比洛要求美国支持德国在摩洛哥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要求，德国对摩洛哥决无领土野心，只是反对法国和西班牙排斥其他国家的商业利益。罗斯福表示他将指示美驻摩洛哥大使密切配合德国的工作。在给美国大

---

① 比尔：前引书，第289页。

② 比尔：前引书，第306页。

使的命令中，罗斯福告诉他要同法国保持最友好的关系，也要小心保持同德国驻摩洛哥大使的联系，让他知道美国总统已经指示他应该作些什么工作；罗斯福也希望他处理好同英国和其他国家代表的关系。罗斯福积极派员分别与英法政府沟通，了解各方意图。1905 年 6 月初，摩洛哥苏丹向各列强发出邀请出席会议。英国外长认为此次会议完全是德国反对法国的一个阴谋。罗斯福电告德国和法国政府：除非法国默认，美国将不参加会议。6 月 6 日，法国召开内阁会议，坚持反德立场与英国签订英法条约的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辞职，内阁制订了对德国较为和解的政策，希望和平解决争端。罗斯福利用有利时机召见德国、法国和英国大使。他向德国政府表示，他将为会议充分发挥他的作用；他告诉英国：如果法国同意参加会议那么英国不要为会议设置障碍；对法国，他坦率地说："我知道你的政府将会考虑我正在调停此事，但是因为摩洛哥问题预示着一场将破坏世界和平的德法战争，所以我认为我这样作是正当的。"[①] 罗斯福说服法国改变态度后，国际会议最终得以召开。

罗斯福在会议进程中继续发挥调停作用致使会议顺利进行。会议矛盾主要是德法争夺摩洛哥的权利问题，焦点集中在摩洛哥的警察和摩洛哥银行上面。德国企图与法国共同控制摩洛哥警察和摩洛哥银行。1906 年 2 月中旬，会议出现危机。罗斯福最终提出 4 点建议。德国接受了其中的第 1、2、4 点，反对其中的第 3 点。后经罗斯福调停，德国和法国都愿意接受美国提出的修改方案，会议取得一定成效。法国政府感谢罗斯福为会议最后解决问题所作的如此繁忙的"个人活动"。德国首相感谢罗斯福为世

① 比尔：前引书，第 315 页。

界和平所作的"伟大服务"。[①] 但是，罗斯福在调解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的作用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议题"。[②]

〔第二次海牙会议〕　如果说美国在第一次海牙会议上尚未显示其大国风范的话，那么在第二次海牙会议上，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角色充分地表演了一番。罗斯福总统几乎充当了会议的中心人物。他为第二次海牙会议的召开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04年，他首倡召开会议，由俄国沙皇出面召集。罗斯福写信给卡内基说："要是我能与德皇，法国和英国的负责任的权威人士会面，我认为我能在这次海牙会议的事务中提供帮助。"[③] 在会议准备时期，罗斯福总统尽力与法国和英国政府举行会谈，他认为只要法国、英国和美国联合起来就能实现会议的宗旨。他还坚持要使会议获得成功必须根据现行条件，不能超越现实做一些不可能实现的事。他说："我相信只有在我们的条件下不要试图走得太远，在海牙才能取得一些实际的进步。"[④]

1907年6月15日至10月18日海牙第二次会议举行。有44个国家参加。在美国的坚持下，拉丁美洲的所有国家几乎都参加了会议。会上，在美国代表支持下，采纳了阿根廷外交部长德拉哥的德拉哥主义，反对通过军事干涉向任何南美洲国家强行索取

---

① 关于西奥多·罗斯福在调停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和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中的作用，历史学家意见纷纭。一些欧洲历史学家多持否定与贬低的态度，部分美国史家也持相似观点。英国著名近代外交史学家乔治·果奇广泛使用欧洲的历史材料后肯定了罗斯福的重要作用。美国阿伦·内文斯认为亨利·赖特的文件"从一开始就证明美国在会议上的作用是最重要的"。详见霍华德·比尔：前引书，第333页注28。本文从20世纪初美国力图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大国作用的角度分析本事件，客观评价西奥多·罗斯福的历史作用。

② 哈纳斯和沃克编：前引书，第99页。

③ 比尔：前引书，第292页。

④ 比尔：前引书，第293页。

债款。这实际上是对罗斯福处理委内瑞拉事件的肯定。会上，美国代表提出建立一个比第一次海牙会议建立的“仲裁法庭”更为有效的永久性国际法庭，法庭法官的选拔不考虑国家和外交关系纯粹从法学上考虑，美国想控制国际法庭的企图昭然若揭。会议最后通过了该提案的原则但不同意它的选拔法官的方法。

限制军备问题是会议的中心议题。罗斯福倾向于限制军备而不主张裁军。但是很多与会者认为罗斯福提出限制军备是不真诚的，他们尖锐地指出，罗斯福在1898年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及他在1900年和1905年的演说足已证明他崇尚武力，反对限制军备。罗斯福为实现他的限制军备建议，早在会议开幕前就积极展开外交活动。他通过美国驻意公使征求意大利国王的意见。意大利国王认为限制军备将会招致全世界军火商们的强烈抗议，德国皇帝决不会让克虏伯限制他们的军火产量。罗斯福又想说服英国政府站在他一边。通过他的朋友历史学家乔治·屈威廉作为调解人，他写信给他说：“我认识到要达成他们限制军备的协议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认为达成限制战舰规模的一些协议似乎是可能的。”[①] 罗斯福坚决要求英国同意将战舰限制在1.5万吨级。但是他的努力收效不大，因为俄国、日本，特别是德国坚决反对限制战舰吨级的建议。虽然罗斯福为限制军备作了大量外交工作，但是会议还是没有在限制军备问题上达成协议。会议仅在关于使用武力索债问题，关于地面战和海战中中立国家和人员的权利义务问题，关于敷设自动潜水促发水雷问题，关于敌方商船地位问题，以及关于战时海军进行炮击问题等等方面签订了条约。

美国之所以对限制军备和限制战舰吨位感兴趣，迫切希望在海牙会议上通过有关决议，完全出于它自身利益的考虑，因为当

① 比尔：前引书，第295页。

时美国海军力量虽然已有很大发展，但是尚未超过英国，而德国和日本则在加强海军力量方面不惜工本，军备竞赛的速度令人惧怕，构成了对美国的极大威胁，罗斯福的限制军备建议是要限制别人的军备，而不是限制美国的军备。“罗斯福在第二次海牙会议中的作用极大地表明了他自己对国际行动的态度，也极大地表明了用国际行动取得和平的困难”。[①] 但是历史学家们认为，罗斯福在第二次海牙会议中的作用不如他在调解日俄战争和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那样出色。他所使用的方法和关注程度都有所不同。[②]

其实，罗斯福对国际争端的上述三次调解含义深邃，决非仅仅是受人之托涉足其间而已，而是美国政府的一种深思熟虑、老谋深算之举，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美国在20世纪初年的国际战略意图。罗斯福调解日俄战争，在远东使日俄互制，维持平衡，实现美国在华的门户开放政策，为美国在远东的进一步扩张创造了条件，如听任日俄两虎争斗不息，最后很可能导致日本在远东称霸，对美国构成威胁。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美国应德国之邀协调处理了德国与法英在非洲的矛盾，召开国际会议，表面上美国在非洲没有太多的直接利益，实际上美国的调停使德国与法英处于某种平衡态势，互相牵制，在国际政治中有利于美国的根本地位；罗斯福在筹备和召开第二次海牙会议中起了调解和某种组织作用，涉足全球性的裁军问题。从调解远东问题、非洲问题到全球性问题，从调解部分列强关系走向调解世界性的国际问题和列强的整体关系，提出限制军备维护世界和平的目标。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口号下，美国企图在各国限制军备之际乘机扩展本国军

---

① 比尔：前引书，第291页。

② 哈纳斯和沃克编：前引书，第99页。

力，实现它在世界军事力量对比上独占鳌头的目标。尽管历史学家们议论纷纷，但三次调解活动给美国带来的利益无可否认。一是提高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在调解过程中美国无形中被置于超越其他列强之上的地位，美国总统由中间人、仲裁者转化为带有某种决定意义的特殊角色；二是美化了美国的国际形象，罗斯福成为和平使者，美国成为人类和平事业的保卫者；三是维护了美国在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利益。当然，罗斯福的调解对所涉地区的和平和世界和平的维护有其不可否认的某些积极作用。

更重要的是，地区争端的发生和限制军备的争议都深刻地反映了20世纪初期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和新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重新瓜分世界的争斗。美国作为后起之秀，与老牌列强有矛盾，导致了美西战争，开帝国主义战争之先河；美国同新兴列强德国和日本也有争斗，对它们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美国政府利用这些矛盾，使列强互相制约，企图在世界上维持一种力量平衡和均势，不让某种势力占据主导地位。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罗斯福总统热衷于调解国际争端，但他不是人类和平和正义的使者和捍卫者。他是一位善于审时度势，玩弄权术，软硬兼施，信奉力量平衡，追求世界霸权的政坛高手；他是一位积极推行帝国主义扩张政策，处心积虑发展美国海军实力，决心让美国星条旗飘扬在所有新“边疆”的美国至上主义者。

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在国内受到强烈的反对，国会内外，政坛上下，社团民间，引发了一场广泛和意义深远的辩论。

六、关于帝国主义的辩论：美国人民反对美西战争和帝国主义扩张政策

〔对于帝国主义的批判〕　美西战争爆发前后，美国人民掀起了批判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浪潮。社会主义者从阶级分析的视角揭露美国政府对古巴的侵略行为的阶级本质，指出侵略古巴的目的只是为了美国资本家的利益。1898 年 4 月 27 日社会劳工党的《人民报》发表社论指出："古巴的自由只不过是个借口，真正的目的是战争，而战争仅仅是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这种目的我们共和党内形形色色处于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级思想上很清楚，并且答应在'爱国主义'的喧嚣之下，和蹚着没膝深的美国人和古巴工人阶级的血水来实现这一目的。"① 针对帝国主义者提出的所谓为了美国人的利益，社会主义者阿尔杰农·李一针见血地揭露美国统治者的所谓"保护美国人的利益"的谎言，他说：它"并非指保护从事耕耘、播种、收割、摘棉花、开采煤铁矿、磨麦、织布、建筑房舍等美国人的利益。它指的是保护农场主、工厂主等以他人汗水为生的无所事事的资产阶级的利益。"②

深受种族迫害和歧视的美国黑人们从美国政府执行种族歧视政策的角度批驳他们的帝国主义的伪善论调，刘易斯·道格拉斯说："本届政府控制权所到之处，对黑人的歧视十分盛行。古巴、波多黎各、夏威夷和马尼拉的人民同在美国被迫害的印地安人和受凌辱的黑人一样，都很了解这一点。……企图让我们相信杀害

①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 293 页。
②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 294 页。

菲律宾人是为了一个好政府，是对生命和自由提供保护，是维护对幸福的追求，这是一种最令人作呕的伪善。”[①]

一些富有正义感的学者纷纷起来揭露扩张主义的严重危害。美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威廉·萨姆纳著文《关于领土扩张的谬论》，从扩张和民主制度的关系揭示无限扩张会危害民主政体的后果，这种扩张会带来分裂的危险，他指出：“认为一个国家在取得了适当的规模以后，增进领土就等于增进财富和力量，这种观念乃是一种错觉。”无限制的扩张“极有害于共和制度和民主政体。……一切扩张都会给原有群众的内部结合赋予一种新的气质，带有造成新的内部分裂的危险。”[②] 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唐纳写了《帝国主义的危险》揭露帝国主义政策的危险是“一个有关我们的民族希望和要求，有关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事业，以及我们盼望我们美国成为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③]

1899年1月9日，美国和西班牙的巴黎协定已经签订，美国国会对此进行表决通过，国会内又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参议员亨利·洛奇等极力维护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占领菲律宾的侵略行为。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乔治·霍尔力排众议反对占领菲律宾，他从国家主权和美国《独立宣言》的根本精神出发批驳扩张有理、侵略合法论，说：“我们现在必须处理的问题就是，国会是否可以不经另外一个国家的同意和违背他们的意志，去征服和统治他们，是否可以征服和统治一个独立的、不同的和人数众多的民族，是否可以征服和统治一个以后不会有美国人居住，不会成为美国州的，而且不会参与完成和实现制定宪法所要达到目

①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299-300页。
②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304页。
③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313-321页。

的的地区……。”[1] 他认为这样做与《独立宣言》所体现和列举的神圣原则毫不相容，也违背了美国宪法的宗旨。他气愤地说，美国开国元勋们决不会想到他们的后代会“由于胜利冲昏头脑而忘记这些神圣庄严的真理，以致穿上冒牌帝王抛弃的旧衣趾高气扬起来”；决不会想到“他们的后代会对一次胜利后的火药味和枪炮声感到兴奋，就像一个小孩对7月4日国庆上午的烟花鞭炮感到非常兴奋那样。”[2] 美国德裔政治领袖、全国文官制度改革同盟主席（1892—1901年）卡尔·舒尔茨也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坚决反对者，他认为麦金莱总统对菲律宾继续开战使美国的代议制政府本身受到损害。美国《民族》周刊创始人、出生于爱尔兰的E·戈德金在《民族》周刊上著文反对美国的海外扩张。

反帝国主义者弗雷德里克·古金在1899年出版的《一组书面回答》中指出美国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将会给美国带来严重后果，他说：“这个国家的人民需要考虑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允许制定帝国主义政策，那么这种政策对我们自己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3] 1899年，莫里森·斯威夫特发表《帝国主义和自由》一书，对麦金莱总统及其谋士的扩张主义思想进行抨击，指出美国占领菲律宾是犯罪行为。

在反对帝国主义政策的正义呼声中，美国伟大文学家马克·吐温的批判以他特有的锐利和深刻著称。1901年他在《北美评论》上发表了《给在黑暗中的人》，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进行了严厉谴责和讽刺：“是呀，我们对他们（菲律宾）一直如此友好，一直用如此多的方法使他们振奋起来！我们把枪支弹药借给他

---

①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307－308页。
② 乔治·凯南：前引书，第12页。
③ 乔治·凯南：前引书，第14页。

们；用它忠告他们；用它交换他们令人喜悦的礼节；将我们的病号和伤员置于他们的友善关心之下；把我们的西班牙犯人交由他们人道和诚实的手中；和他们肩并肩地与‘共同敌人’（我们自己的用词）战斗；赞扬他们的勇气，赞扬他们的豪侠，赞扬他们的仁慈，赞扬他们的美好荣耀的行为；借用他们的战壕，借用他们先前从西班牙人那里俘获的强固阵地；安抚他们；欺骗他们——冠冕堂皇地宣布我们的土地和海军力量将给予他们以自由，并取代恶劣的西班牙政府——愚弄他们，利用他们，直到我们不再需要他们时为止；接着就嘲笑这个被吸干了的桔子，最后将它丢弃。”①

美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强烈呼声虽然最终没能阻止美国统治者向太平洋西部的扩张，没能制止美国帝国主义者在远东地区和拉丁美洲的血腥暴行，但是他们的正义之声在历史上永远闪耀着智慧和诚实的光芒，一个世纪后，美国学者这样说：“然而回顾这些往事，人们也会深深感到反扩张主义者提出的告诫非常有力而诚恳；他们的合乎逻辑的论点从未被真正驳倒过……”②

〔反帝国主义同盟〕　除了唇枪舌剑的辩论外，美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还组织了反帝国主义同盟。第一个同盟成立于1898年6月15日，它在波士顿召开了一次以反对帝国主义为主题的会议，主持人加马列尔·布雷福德在演说中说，他一直反对美西战争，现在则是进行有组织的抗议，因为存在着美利坚共和国将成为一个殖民帝国的危险。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扩张主义是大会的主旋律。会上有人严厉批评美国政府占领西班牙殖民地的

① 格拉蒂、戴维尼：前引书，第13－14页。
② 德门特也夫：前引书，第173－174页。

行动破坏了美国政府所赖以建立的原则。美国不仅抛弃了他们自夸的门罗主义，不仅无视华盛顿提出的为后来政府一直追随的不干涉欧洲争端的明智政策，而且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军事强国，肩负着陆海军的沉重负担，威胁数千英里外的复杂纷争。最后会议通过决议，并按照独立战争期间成立的通讯委员会那样选举产生了“通讯委员会”。[1] 美国杰出文学家马克·吐温参加了同盟的领导工作。

此后，美国许多大城市陆续组织了反对帝国主义同盟。虽然参加同盟的成员成分复杂，政治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共同谴责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如：1899 年 9 月成立的华盛顿地区的反帝同盟在纲领中写道：“它们的目的是，采用各种合法手段反对发动征服菲律宾土地或吞并或统治任何违背他们居民意志的战争。”[2] 又如：芝加哥大会通过的反帝同盟纲领批评了美国政府对菲律宾的政策，要求“立即停止由西班牙开始、并由我们继续的反对自由的战争”。他们深刻指出：“真正的火线不在马尼拉郊外。敌人就在我们国内。1861 年敌人的企图是分裂国家，1899 年敌人的企图是要摧毁立国的基本原则和最崇高的理想。”[3] 1899 年 10 月 17－18 日来自全国各地的约万名代表聚会芝加哥，建立了全国反对帝国主义同盟。早年曾是美国内战和战后重建时期的激进共和党人的马萨诸塞州的乔治·鲍特韦尔，被选为全国反帝同盟主席。同盟总部最后从波士顿移往芝加哥。同盟成立以后积极开展宣传活动，据 1902 年新英格兰反帝同盟的秘书报告说：“在这 4 年里，全国 8 个大城市里建立了同盟，它们出版书

---

① 德门特也夫：前引书，第 173－174 页。

② 德门特也夫：前引书，第 176 页。

③ 杨生茂等：前引书，第 323 页。

籍、小册子、演讲和传单不下400万次（册）。”[①] 其中有些书籍如：鲍特维尔的《共和国还是帝国》、戴维·乔丹的《帝国民主》、乔治·赫荣的《美帝国主义》等等有较大影响，流行全国。此外，还有一些宣传反帝国主义思想的通俗读物，文笔生动活泼。一本名为《自由问答手册》的小册子，问道：“为什么一个民族不应该统治另一个民族？”回答是“因为所有民族都有与生俱来的和不可转让的自由权——有权以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以及自治或由选举产生统治者。”对“菲律宾人是否是美国敌人”的回答是“不……他们正在为他们的自由，正在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统治自己的权力而战斗。”等等[②]

总之，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扩张主义的呼声在美国已经汇成一股洪流，声势浩大。关于美国国内的反战和反殖民政策传播的情况，俄国驻美大使曾于1898年6月向圣彼得堡报告说：“整整一半的美国人不赞成政府所采取的政策。”9月，他又报告了美国人民对政府政策“广泛而犀利”的批评，还开列了反对派中最突出人物的名单，如乔治·霍尔、参议员卡尔·舒尔茨、J·莫里尔、亨利·波特等。他的记叙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美国国内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浩大声势。[③]

在广泛而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声浪中，反对战争的和平运动也达到了一个高潮。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政治家和学者中有着各种不同的指导思想和各自的出发点，有的从社会主义思想出发，有的从批判美国的种族主义出发，有的从美国立国精神和宪法原则出发批评美国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有的从和平主义的愿

① 德门特也夫：前引书，第181页。
② 德门特也夫：前引书，第182页。
③ 德门特也夫：前引书，第174页。

望出发，有的是从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人种学、环境卫生学、工业主义和国际主义等视角作出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判断和思考。[1] 反战并不单纯是思想上的批评运动，和平运动也在实践中不断取得成果，1906 年成立了美国国际调停联合会，1910 年成立了美国司法解决国际争端协会，后又相继成立了世界和平基金会和主要用于和平研究的卡内基基金会，1913 年还建立了教会和平协会等等。

---

① 参见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1865—1917》，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4 年，第 152 页。

第三章

社会大变动和群众运动新高涨

20世纪初年的美国，由于新工业革命的完成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初步实现，美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换和变动。“工业化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是一股崭新的、强劲的力量，即使在它开始之刻，它就重塑着美国的面貌。”① 美国社会的变化是全面和深刻的，从社会结构、社会分层到社会风貌和社会思潮等等，这种变化在总体和本质上是美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它不仅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发生了改变，也使人们对生活的态度、信念、思想行为和方式随之发生变动。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工业主义改变了美国的社会风貌。大规模生产刺激了移民，促使了城市增长，提供了支持生产的劳动者和消费者。这个循环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诚如我们所见，也改变了他们考虑生活的方式。”②

---

① 德格勒：《今从史出》，第272页。

② 格伦·奥尔茨库勒：《美国社会思想中的种族、族裔和阶级：1865—1919》，哈兰·戴维森出版公司，伊利诺伊，1982年，第76页。

巨大的社会变动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的震荡和重新组合，导致社会利益的重组和再分配，促使不同阶级、阶层和经济利益集团间关系的调整；社会的这种动荡和不平衡势必会引发社会不同群体发动的各类运动：工人罢工、农民抗争、妇女要求权利、社会主义运动、禁酒运动等等。群众运动成为一股强劲的力量推动了美国社会各种改革运动，自下而上的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立法相互交叉，互为因果，汇成20世纪初年美国社会上的一场蔚为壮观的改革运动：进步主义运动。实际上这场运动是美国人在整体上对工业化作出的强烈反应，它既是工业化所引发的结果，又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工业化，实现社会新的平衡和平稳转化而采取的措施。进步主义成了美国20世纪初年的时代主题。“美国人对工业化的反应是美国历史上的平民主义—进步主义时期的主题……”①

一、工业化带来社会大变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关键时期

早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时美国社会就步入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自19世纪后半期开始，整个美国社会（包括北方和南方）才全面卷入了由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迅猛转变的全过程；20世纪初年这种转化进入关键时期，并取得了最后成功。美国的乡村和小城镇都卷进了城市化的浪潮。“工业主义的作用——有时是它们的结果，即城市化——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对城镇的意义是深远的。许多城镇卷进了这

① 塞缪尔·海斯：《对工业主义的反应：1885—1914》，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23页。

个热潮，它们相信如果它们不加入进去就会死路一条，一些城镇则表示忧虑并企图瞒报城镇人口的数字。总之，与进步一起成长的信念占据了他们。"[①] 虽然城市化使大量农村人口转向城市，但是小城镇和农村的人口仍有一定增长。因为当时美国的总人口在大幅度增加。"事实上在1880年至1920年间，大多数小城镇和村庄的人口还在增长——虽然不如城市增长得那么快。"[②]

〔美国城市和农村〕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化。农业社会与城市社会有什么区别？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和难以简单加以回答的问题。因为这种区别表现在各个方面，有环境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交通的、习俗的、心理的等等；这种区别也表现在各种不同的层面上，有深层次的、有浅表的，有形式上的，有本质上的，有外形的，有内在的。"农民本能地认识这条界限，知道什么时候他已越过了界限，明白他自己已经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但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意义上究竟何时由乡村进入了城市呢？"

工业化促使社会变化，但社会变化较工业化更为复杂和深刻。政治革命往往带来许多戏剧性效果：轰轰烈烈的政权更迭，权力斗争，阶级搏杀，暴力与战争；工业革命则在无声无息中进行：工厂林立、水坝拦河而筑、高楼拔地而起，汽车火车奔驰大地；社会革命完全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习俗、社会生活甚至包括服饰等等悄悄地变更着。这是一场涉及社会方方面面和每个社会成员的变化，更具群众性、广泛性和

---

① 理查德·林吉曼：《美国小镇》，G.P.普特南后裔出版公司，纽约，1980年，第359页。

② 林吉曼：前引书，第328页。

深刻性。正是它几乎是与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同步发生着。

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区别，首先表现在城市的多样性和农村的单一性方面。城市是一个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的综合体，现代城市社会更是大工业的产物。就环境而言，城市是一系列环境组成的复合体，“城市”不是单个环境模式，实际上是一个系列环境。例如一个3000人口的城市很明显地不同于一个300万人口的社会环境。多样性的基础是城市社会的经济结构，城市内有各种经济成分和经济类别，因而在就业方面城市人的职业呈现多样性。就个人而言，城市和农村最明显的不同是职业的不同，在城市除了农业一切都有，在农村只有农业。城市生活、习惯和工作的多样性都是环境造成的。在这种环境里可以发现大量的多样化的职业。

其次，城市和农村的最大差异表现在城市人和农村人之间的不同。诚如奥斯瓦德·斯宾格勒所说：“农村人和城市人有不同的本质。首先，他们感觉到这种不同；接着他们被这种感觉所支配，最后他们停止了相互间的理解。”[1] 人的差别是环境造成的。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变化最后都集中在城市。诸如波士顿、纽约和芝加哥这样的城市中心正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接受了经济革命无数变异的所有力量，已经成为社会变化的热气腾腾的巨锅。在这种巨锅中养育了现代城市人，一些来自农村的人在巨锅中也变成了城市人。美国学者沃伦·威尔逊在1916年美国社会学学会会议上作了一个题为“农村与城市的挑战”的报告，他的陈述和观点反映了当时美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中的某些基本的社会特征。他认为美国城市与农村的差

① 德格勒：《今从史出》，第315页。

别的基础在于人，即美国人被分成为两种不同的层次：城市人和农村人。美国农村主要由老移民构成，很少新移民；城市中却充满着新移民，因而城市社会反映了这些新移民的特点和活动。老移民的结构较为单纯，基本上是来自西欧国家的移民先祖及其后裔；新移民特别是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新移民大多来自中欧、东南欧等其他地区，成分复杂。他从老移民和“新”移民的角度分析了当时美国的城乡差异不无道理。关于城乡差别，乡村生活运动的领导者比迪·贝利还从农民生产方式的角度加以解释，他写道：“乡村生活最不足的一个地方是它在社会和经济方式两方面都缺乏组织或凝聚力。农民分散的原因是他们地产之间的距离，也因为他们拥有他们自己的土地。……缺乏使他们联合起来行动的这样的一种共同感情。”[①]

再次，城市和农村的反差还表现在某些社会习俗上，农民缺乏相互间的联系和沟通，许多农民局限在土地上，干他们的“事业”，难以理解土地以外的事物；城市人却有着多样化的思想。各种高度专业化的思想模式、工业人物、机器和企业成员都来到城市。他们给城市带来了机械的、行政的、充满渴望的、乐观的和幽默的社会。农村却缺少这样的多样性，缺乏那种在城市已经过剩的原创性的因素。沃伦还提出了城市和农村若干方面的差异。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形式不同。城市流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但是农村却没有这种经济形式，他们的合作仅仅建立在农村邻居的天然合作伙伴的关系上。小城镇的社会生活是直接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也是最接近农村社会生活的。“这些市镇和村庄成为周围农业居民采购物品与寻求娱乐的中心，已经有一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了。”[②]开始时小城镇内居民可以根据居民房屋的颜

①② 林吉曼：前引书，第329页。

色和特点认出户主，后来城镇规模扩大建立了邮递制度，各家各户设立了门牌号码。但是一些喜欢农村生活而常常聚居一起的人们常常抱怨住宅号码，而喜欢离开农村的妇女则用她们的住宅号码显耀她们对城市生活的理解。

城市虽然人口多、区域大，但城市人之间却缺乏相互联系和关心，因此孤独感常常成为城市人的心理特征。农民刚到城市就不适应城市这种孤独的生活。谢乐伍德·安德生在描绘俄亥俄温斯伯格市的一个农村孩童时说，他随他父亲从农村来到城镇开店营生，但是害怕温斯伯格人对他家的态度，他们称他家很怪，至少他认为他们是这样看的。最后他只好回到农村继续他的农村生活。他说："我们出外谋生时，生活全变了。我白天劳作晚上睡觉。我常常因为见不到人而只能像现在那样冥思苦想而已。傍晚，我到邮局或去车站观看火车开来，没有一个人同我说话……"[①]。孤独成了城市人的特点，诚如19世纪90年代的一位教士所写："在城市人们很少有邻居意识，你也许会与邻居仅仅间隔数英尺，而数年不见他的面，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孤独导致自杀成为当时美国城市中的一种社会现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美国社会的自杀率也不断上升。1860年为10万人口平均3.18人，1922年则上升为11.9人。[②]

与城市市民的孤独相反，美国农村生活的特点是，村民们起得很早，息工时尚有余力。因此他们有余暇的时间相互娱乐和聊天，社会交际活动频繁。妇女们干完了她们的家务活后就常常会与邻居们交谈，内容广涉婚姻、孩子出生、意外事故或死亡等。各种传闻户户相传，家家知晓。一些年老体衰已不务农活的农民

① 林吉曼：前引书，第59页。

② 德格勒：《今从史出》，第319页。

则数年如一日地每天与人围绕庄稼和气候直至病逝或再婚等话题，谈论不休。这些活动非常适应家庭和社区的关系。在农村邻里关系十分密切，人们遇到病痛或灾难就会很快得到富有同情心的邻里的同情和关心；同样人们做错了什么事也会受到邻里的评论和指责。农民们的聊天成了非正式的法官和陪审团。人们经常通过聊天形成一种价值判断或舆论，对规范人们的道德起着重要影响。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教堂和会议室往往是农村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地点。正规的组织都有一些规则，成员都是经挑选的，因此一些小小的过失污点可以限制人们参加包含于整个社区在内的社交活动。农村的社会活动不如城市丰富，但是在周日，教堂的钟声响彻全镇。主日学校也逐步标准化。此外教堂还募捐钱物和庆祝节日，起着凝聚人心的作用。婚丧活动在传统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小村镇凡遇婚丧事宜，邻里亲戚都会成群出席。特别是金婚纪念，隆重非凡，这不仅是因为能实现金婚的老人稀少，而且人们也喜欢以此证明小镇上的婚姻更为稳固。此外，乡村集市和集会也是农业社会的一种常见的活动。有的地方每年举行数次，参加人数众多。这种活动后来遗存到城市社会，适应了现代化社会生活的变化，赋予它以新的内容和形式。

城市和农村在文化设施上也存在着明显差距。20世纪美国城市学校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但在农村学校中保守主义的影响超过了对其他各类机构。当然，20世纪初农业科学在美国全民教育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极大地影响了农村思想。当时正在兴起的农业大学和各州建立的农业部和国家农业部对农村的影响也促使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方向转化。城市和农村的宗教和教堂也有差异。在城市中，一些新教教堂和教职人员面对城市中激增的犯罪活动和道德沦丧认为城市是非教徒们的“家”，并看不起城市中的劳动阶级，所以当某地区住满了劳动群众以后，教堂就

往外迁徙。如：芝加哥某地区有6万居民却无一所教堂。[①]

但是城乡最广泛的差别是两者的精神生活，农民认为自己是自给自足的生产者，城市人往往把自己看成是消费者。虽然农民现在也是某些商品的购买者，但是他们的思想深处还是认为这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生活。他们依然将眼前的大多数商品看成是在他们拥有或租用的土地上，甚至是他们家屋里生产出来的。这种观念导致他们产生独立于城市和瞧不起城市人，甚至对有关城市的事物产生对抗的态度。关于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在当时美国大致有3种看法：一是认为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互不联系，相互独立；二是认为两者相互对抗和竞争；三是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紧密联系，互为因果，认为"美国历史上，城市增长与畜牧业的系统理想主义的发展和对农业的特殊教育的增长相一致。"[②] 美国学者德格勒认为由于城市和农村在物质方面有差异，因而在他们的思想习惯上也产生差异，这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农民的生活和生产往往依赖于气候、季节变化，因而农民中间缺少一种公共意识，缺乏一种公共土地、共同未来、共同命运的意识。他们的家庭较为闭塞。城市人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有不同的兴趣、不同的职业，城市家庭与社会发生较为紧密的联系，甚至它的生存离不开社会。城市人每天进进出出，事业或成或败。城市本身的面貌由城市人亲手建造或由他们亲手毁灭，而农村生活却犹如自然本身自生自灭。因为城乡在文化上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因而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明显差距。19世纪90年代美国出版的《人名词典》所收人物中城市人的比例是农村人的2倍。[③]

---

① 德格勒：《经济革命的时代：1876—1900》，第158页。

② 《美国年鉴》，第14卷，第88页。

③ 德格勒：《今从史出》，第318页。

但是20世纪初年，美国城乡这两个不同的社会已开始进一步接近、同化和相互依赖。农村向城市的转化进入关键时期，其中农村的主体——农民则在转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农民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反应〕　工业化渗透到美国人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和每一个活动。美国人如何对这种转变作出反应？如何适应他们已经缠入的商业和金融网络？如何对城市生活方式渗入他们占统治地位的农村文化作出反应？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如何看待新移民？农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感到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新的城市中心根本改变了小城镇和农村的文化模式。农民妒嫉城市日益增长的人口、财富和力量，但是他们也害怕陌生的新利益和活动使城市产生懒散闲暇成为可能，害怕移民中出现的机构。这种变化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迫使他们去维护他们在州和国家中更广泛生活的权利，去转变植根于农村并在整个农村中占统治地位的传统。农村社区的居民感到他们的生活模式，即他们认为是传统的美国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①

接着，农民似乎开始认为工业化是一种无法摆脱的选择。一般说来，随着工业化的开始，美国人对工业化就作出了反应，美国19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加深和加剧了美国人对工业化的反应，加强了对这种迅速变化的冲击和适应。20世纪美国人开始慢慢学会如何在一个新的工业制度下生活，他们无法去选择，更不可能去摧毁这个制度，只能慢慢地去适应它，渐渐地融入这个社会，最后成为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整体美国人而言，“组织起来”是对工业化的最基本的反应。美国学者塞缪尔·海斯认为美国人对工业化的反应是：不是组织起来就是灭亡。他认为：“个别的企业家、农民、工人无法对付非个人化的价格—

① 海斯：前引书，第110页。

市场网络，但是他们立刻发现他们作为集团就能够应付这可观的力量，因此个体经济企业让位于集体企业。生产者联合控制他们出售自己商品的条件；分配者联合起来影响市场和交通；工人们组织工会与管理者对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进行讨价还价；农民和工业品消费者联合降低买卖价格；只有城市消费者没有联合起来。这种组织革命在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后形成势头，并以日益增长的力量继续发展到 20 世纪上半期。”① 美国农民面对工业化对农村的冲击也曾经组织起来进行抗争，但是，随着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滔滔洪流蓬勃奔腾汹涌，农民们在强大的工业力量的推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的旋涡，跨越了由农村进入城市的门槛，慢慢地城市化，慢慢地转化为商人、企业主。

在转化进程中，一些农民还是希望保持他们原来的农村生活传统。面对农村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农民们还是顾虑重重：他们害怕建造农村公路只是为了城里人的利益，他们只希望建造农村通向市场的公路通道；他们担心农村学校为城里人控制，他们的子女接受的全是城市教育，他们担忧科学务农将会改变他们传统的耕作方式，让他们放弃世代相传的传统经验等等。在农业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的潮流中，一些农民还是不理解、不放心，他们在无奈接受新事物的同时，还不时进行一些有限的抵制和抗争。

他们不仅抵制这些由城市鼓动起来的所谓新生活运动，阻止

地的原教旨主义运动也有着相类似的动机：反对对圣经作较自由宽松的解释，主张提高城市社会对教会的关注，保守的宗教领袖重新宣扬对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信念。在数量众多的乡村教会里，教会领袖们抵制将权威看成真理源泉的批评，这种反攻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1909年，两位加利福尼亚石油百万富翁资助出版宣扬这种观点的《基本原理：对真理的证明》，很快销售了300万册。①

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初美国的禁酒运动也是农村抵御城市"侵犯"的一种反应。禁酒运动的目标主要针对城市的沙龙和城市酒鬼。禁酒运动的发动者认为城市政府的主要罪恶是因为政府官员和沙龙所有者结成腐败联盟所致。在一些农业州，反沙龙联盟建立起州级范围的禁酒法令，从1907年佐治亚州开始直到1916年，至少在美国南方和西部有14个州实施了禁酒法。其实与农村比邻的小城镇也有类似现象发生，"城镇对红色，激进，工会，外国人，移民，沙龙和酒精，天主教，一定程度上的犹太人——所有大城市的弊病都持反对立场。"②

尽管农民对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作出了强烈反应，但时代潮流还是不可逆转。美国人向城市移居的进程无法阻挡，美国实现工业化的形势日新月异，美国终于成为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国家，美国实现了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化。有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说得好："美国诞生于农村，移居在城市。"③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美国的城市社会包括大都市和中小城镇都是一种新兴的现代工业社会，而传统的农业社会本身

---

① 海斯：前引书，第113－114页。

② 林吉曼：前引书，第340页。

③ 约翰·卡里和尤里乌斯·温伯格：《社会经纬：内战以来的美国生活》，小布朗出版公司，波士顿，1978年，第77页。

也发生了向城市转化的变动，这是一种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从农村中诞生的美国终于成功地“移居”到城市，成为一个工业国家和城市社会。美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一种对城市社会的恐惧和不安的思潮，托马斯·杰斐逊崇尚农村社会，认为城市社会将给美国带来各种社会问题，甚至道德沦丧等等。著名历史学家特纳认为是边疆而不是城市创造了美国文明。但是城市化毕竟冲破了美国农村的宁静和稳定，不顾人们的忧虑和担心随着工业化的开展新兴城市蓬勃兴起。美国人大批大批由农村涌向城市，或在居住的农村田野矿山上亲手建起新城镇，星罗棋布的城市成为美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已成普遍现象。“在本世纪最初的 20 年中，北部和中西部小市镇和乡村几乎每家至少都有一个人变成了城市居民。”① 农村向城市转化逐渐模糊了城乡社会的面貌。“随着向城市的移民，美国的‘城市’与‘农村’社会不再是遥远的两极。……犹如战后的两个国家，他们打开了边界，逐步交换民众，设置交通线。城镇在经济上已同城市连成一起，城市为他们的产品提供市场，城镇也越来越成为城市商品的消费者，同样在思想上也是如此。”②

〔农业人口的部分城市化〕　20 世纪初大批美国大中城市的崛起和发展，使多数美国人从以前的农村社会转向全新的城市社会，过起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社会生活。甚至连小城镇的人口比例也下降不少。“城市化时代有意义的变化是居住小镇的总人口的百分比在慢慢地下降。例如：在 1903 年的中西部，少于 5000 人口的乡镇总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 18%，但是 1932 年则

---

① 德怀德·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 年，第 41 页。

② 林吉曼：前引书，第 392 页。

下降为16%。"[1] 诚如美国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的研究成果表明，美国城市是美国工业化最重要的成果，犹如内战前美国南方的种植园是南方农业发展的产物一样，犹如北方的小农场制度是北方农业秩序的决定性因素那样，美国城市在19世纪末已第一次成为全美国生活中的主导因素。城市成为国家社会生活和文化进步的中心，城市民众创造了全新的社会需要：要求城市社会具有更好的照明，便捷的交通，高层而舒适的建筑，优良的文化品位和精神生活。因此在城市中可以找到最好的教堂，最好的报纸，最好的博物馆、文化艺术走廊，最好的书店和最好的剧场等等。同时，美国城市往往具有一种非常类似的特点，即相似性。美国的城市除了大都市如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等等以外，典型的美国城市大都是"千市一面"，城市面貌和结构都"似曾相识"。因而有的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城市相互间的差异仅仅在于一些城市在建筑中使用了较多的木料，有的使用了较多的砖瓦，仅此而已。许多地方都是差不多的棋盘格式的布局，街道整齐划一，商店、邮局、银行几乎按照同样的格局安置有序，主街上有相似的银行和邮局，有同样的带着良好设施的旅社，同样的中产阶级人士在匆匆地忙碌着……，甚至还有相同的街名。当然农民进入大城市所感受到的反差较之进入中小城市更大，因此更不易适应，但是城市毕竟是一种新的社会，与农村相比毕竟存在一种质的差别。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美国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中作为组成新社会的每个个体同样经历了一个在物质和精神上充满痛苦的缓慢过程。这正是社会转型的艰难之所在。"大多数美

---

① 林吉曼：前引书，第329页。

国人适应工业化是缓慢和痛苦的。"[1] 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城市社会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与农村大相径庭有天壤之别。城市社会的生活节奏紧张而有序。工厂、公司、机关、学校和行政管理部门等等都有严格的管理体制和严厉的纪律。其次，城市虽然有较多的就业机会，但是失业危险始终像阴影一样笼罩在人们头上，城市的生活条件优裕但费用昂贵，城市生活富裕舒适但社会问题复杂，犯罪率高，污染严重，城市人容易受到各种诱惑，稍不慎就容易跌入罪恶的深渊，因此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巨大。再次，城市人之间的关系远较农村人疏远、冷漠和缺少关心。在由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化过程中，大部分农民适应了新社会的环境，生活得更好，但也有一些农民无法适应这种变化而回到农村，有的则被城市生活的激流所湮没了。"每个市民在从乡村生活方式过渡到城市生活方式的时候，都不得不适应精神紧张的环境，新的饮食习惯、新的休息和娱乐方式。他们不能不完全适应一种先赚钱后花钱的体制，这种体制因有失业之虞而受到限制。公寓住宅，有浴室、暖气、电灯并且还要同邻居相处，这总是比不上以前的菜园、花草和新鲜空气。有些人对于这种变化能够很容易地很好地适应了；其他的人在罪恶和犯罪的莫大引诱下动摇了；另外还有一些人由于身心机能和习惯遭到不可避免的扰乱而感到不同程度的痛苦。"[2] 经历了这种变化，许多农民成为城市居民的一员，他们随着市场经济海洋的波涛而驶入新生活的彼岸，进入了新的城市生活的层次。关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美国学者以一小镇为例加以说明。在俄克拉何马的安吉代博镇周围的农场从 1900 至 1907 年间农业人口降低了 25%。大

---

① 海斯：前引书，第 24 页。

② 杜蒙德：前引书，第 43 页。

约有一半农民出卖掉土地进了城，在那里从事建筑房屋、地产买卖等，其他人则到邻州尚未开垦的土地上务农；留下的人大多是北方人，他们虽然讨厌那里的气候但必须住满必要的5年才能获得土地，然后将其出卖外出。稳定不走的是来自肯塔基的农民、德国人和其他移民。但这不是典型的，大部分农村的农民是移向周围的小城镇或更远的西部。来到这里务农的外国移民通常是优秀的农民。[1] 而留在农村的农民们同样经历着一个令人惊讶的转化。

〔农业社会中的新气象〕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强劲春风吹皱了农村平静的生活湖面。农村出现了新气象，农村变了样：公路和铁路筑到了田野，工业品涌进农村，电器产品给农村带来光明和温暖，时髦服饰在农村展现，人们谈论的话题也大多是关于城市的新闻。农村现代化了。

在工业化进程中，农民的数量虽然大大减少，但是农村的新面貌却日新月异。20世纪初的美国农村不再是传统的中世纪的农村或殖民地时代的农村了，它已经逐步变成现代的农业社会。工业化给农村带来了半机械化和机械化，机械代替了人力和畜力，电力给农村带来活力和光明，公路修筑到了偏远乡村，火车进入山谷旷野。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农村生活运动”，领导运动的学者们提出了建立农村公路、建立农村学校和改进农业技术等等目标。其中科学务农的开展影响最大，科学务农就是科学种田。为此各州都陆续建起农学院和科学试验站，向农民们传授科学知识和科学兴农的道理，在农村普及科学知识。州农业学院和试验站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科学的发展。领导者们还进一步建议每县都必须拥有一位农业专家对农事提供指导，这对科学种田大有

---

① 林吉曼：前引书，第331页。

裨益。1912年纽约县设立美国第一个农业专门家。美国植物学家利比迪·贝利，于1903年至1913年间任纽约州立农学院院长，他和其他农学家领导了“农村生活运动”，目的是通过对农业科学化和农作物的改良使乡村生活更富吸引力和更有利可图，把城市社区的优惠带给农村地区，防止农村人口的衰落。他的各类措施后为各县效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因粮食压力巨大，对农业专家寄予更大希望，“农村生活运动”因而大为推广，收效显著。

美国农村在20世纪初的新面貌还表现在经济方式上的深刻变化：20世纪初美国的农业已经成为全美国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并且卷入了世界市场。美国农产品不仅满足了美国城市人口的需求，而且为国际市场提供商品。农业商业化使农民的生产变成了商品生产，他们不再为满足自己和自己家庭的需求和生计而劳动，而是为了出卖商品而生产。这样，商品经济像强酸一样把农村自然经济的经济模式最后彻底瓦解和溶化，使美国农村完全成为生产商品经济的基地，这正是农业现代化的特征之一。这样，美国农民要根据市场需求决定自己的生产计划，参与国内和国际的市场竞争。

美国农民的生活方式也逐渐受到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而“市民化”。城市的存在对农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当然是肯定的和建设性的影响，城市的存在也越来越趋向去干预和组织农村生活。如：现在提供牛奶的农民必须根据城市需要送奶进城，即要间隔12小时，每天上午4点到下午4点向城市居民提供牛奶。其他农产品也必须按城市的需求组织供应，根据城市生活规律运输和销售。城市已经成为美国农民思想中一个重要因素，他们必须根据城市的需要组织劳动，并使之更加工业化和机械化，提高生产效率，减低产品成本，参与竞争。

农民的生活方式随之改变，他们的吃、穿、用、住越来越变得像城市居民了。1901年，当时美国农业统计员乔治·霍尔姆斯告诉工业委员会说："这是农民的新时代。他们远远超过了以前，现在他是一个世界公民。廉价而精美的图书和期刊放置在客厅和起居室的书架和桌子上，较之以前，他们更多地外出旅行和长途旅游。他们的孩子受到比他们自己孩童时代更好的教育，他们的穿戴比他们儿童时代优美得多。他们比以前更经常地与城镇生活联系起来。"① 关于农民生活受城市影响的问题，早在1896年美国社会学家法兰克·吉廷斯就这样说："孤独的农民和他的家庭已经开始以悲惨的方式受到现代生活情调的影响。他们不再对城市奢侈生活熟视无睹，他们不再满足俭朴的生活方式。房屋需重新改装和修缮；桌台要多式多样；衣服一定要'时髦'，马匹、马车和马具一定要豪华。"对此德格勒认为："20世纪初的年代里，城市价值观已经渗入农村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无法谈论城市和农村生活间的明显区别；现在仅仅存在城市主义的不同程度而已。"②

二、社会结构的新变化

"伴随着经济革命，社会结构的若干变化发生了。"③ 经济领域的革命性变化势必导致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异，变化越烈，变异越大，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及工业化、城市化和垄断化的初步实现使美国国内的社会

① 德格勒：《今从史出》，第326页。

② 德格勒：《今从史出》，第329页。

③ 雷蒙德·麦克、卡尔文·布雷德福：《转变中的美国：社会变化模式》，兰德出版社，纽约，1979年，第70页。

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阶级关系更趋复杂。随着城市的增加和扩大，社会结构和分层，城市人之间的差异也扩大了。

新阶层的出现和旧阶级的变化构成了这种社会结构变化的主要内容。美国的社会结构变了，支撑美国社会的构架变了，犹如化学反应一样，美国社会经历了一个阶级和阶层重组和分化的过程，一些新质产生了，某些旧质消失了。

〔大企业家阶层的出现〕　20世纪初，美国社会中已经明显地形成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大企业家或垄断资本家的阶层。

大企业家群体，即垄断资产阶级，他们随着垄断资本的形成、扩展和大企业的崛起而形成和发展起来，最终成为美国社会中经济上最富有、政治上最有势力的群体和阶层。他们比一般工业资产阶级或中小企业家有更大的资本和实力，他们在美国社会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他们垄断了美国的国家经济命脉，操纵着关系国计民生的财政金融，各垄断集团间还存在极为激烈的竞争。（详见第一章有关章节）

这个阶级和阶层是美国社会中最富有的一部分，是垄断资本的人格化。“财富如无尽的江河一般，源源不绝地流入那些设立公司、修建铁路、开办电话电报，和开发这个新工业帝国的天然资源的人们手中。”[①] 这些人还通过开办银行和金融机构敛财，他们的财富如滚雪球似地膨胀起来。1917年，这个占全国人口1%的最高阶层的收入竟占全国总收入的14.2%，包括了全国红利收入的72.4%和全国利息收入的45%。[②]

他们是美国社会中最有权势的阶层。他们通过对总统选举的资助和各种经济手段在美国政府中寻求代理人和代言人，贯彻他

① 杜蒙德：前引书，第27页。

②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593页。

们的政治主张；或在幕后与政界巨头进行政治交易。有人认为当时一些百万富翁的威望甚至超过了美国总统，总统决定某些重要政策要征求他们的意见。

他们在社会上人数少、能量大。他们往往具有极为强烈的追求财富的欲望，敢于冒任何风险的精神，为达到目的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品格；他们在商场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政界玩弄权术、纵横捭阖。

一般说，他们信奉个人主义，维护他们的利益，美国制造商协会在1904年的章程中公开"拥护个人主义"，他们宣称："我们坚持这样一个理论原则，即个人是权威的单位、权力的单位和发展的单位。"具体而言就是"工厂老板有经营他们财产的绝对权利，并且必须保持这些权利，使之不受任何一伙匪徒和违法者的侵犯。"他们对产业工人和工会抱有敌意。一个铁路大王曾经说过："去他妈的群众！"[①] 在劳资关系上，他们鼓吹只有劳资合作成为合伙人才能创造财富并使生产增长成为可能。[②]

〔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壮大〕　早在19世纪上半期，美国小城镇中已经出现中产阶级，他们"包括杂货商，商人，店主，手工业者，职员，医生，律师，牙医，教师，牧师，簿记员，小官员——受人尊敬，勤奋的，敬畏上帝，早睡早起，留意邻居评价，一心赚钱不违常规的。"[③] 在城市化进程中，这些中产阶级生活发生变化。就其居住条件而言，19世纪90年代的城镇大多数中产阶级的住宅是"宽25英尺，深125—150英尺，紧靠人行道，后面还有一个花园。……内置老式家具，底楼是客厅、厨

① 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1865—1917》，第188页。
② 《美国年鉴》，第14卷，第23—24页。
③ 林吉曼：前引书，第170页。

房、餐厅，楼上是3—4个卧室”。[①] 随着大企业的崛起，中产阶级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20世纪初与美国大企业与生俱来的不仅是一批大企业家，而且还形成了一个白领阶层。“这个时期，伴随大型工业企业的出现俱来的是一个管理官僚阶层的增长——白领工作力量集中在新的市中心的办公大楼中。”[②] 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从1870—1920年制造‘另一半人’和贫民窟的同样力量也创造了他们的对立面——新的城市中产阶级和城郊区。”新的城市中产阶级从1870年的75.6万人扩展到1910年的560.9万人，人数扩大了大约7倍多。白领阶层的形成壮大了美国中产阶级的队伍。

大企业的出现，企业管理权和所有权的分离产生了一个以薪金维生的管理阶层；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技能的提高，技术工人队伍不断壮大，因而在垄断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形成了一个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其中包括企业中的中低层管理人员和企业中的白领工人，也包括自由职业者，如医生、教师、律师等等。从城市的居住状况分析，一些贫困的阶层留在市中心地段，一些富有者则往郊区转移，在那里建起独家居住的别墅。在城市中已经形成居住城郊的阶层。根据美国学者萨姆·沃纳的研究，1870—1900年波士顿已经有一批居住在城郊的社会阶层。他们希望居住在收入丰厚的人群中间。他们在城郊建起掩映在绿树丛中的私人别墅。他们告诉城市工人只要他们积攒了足够的钱财，他们也同样能拥有舒适和成功的象征：私人别墅。城市工人梦想能为自己的家庭得到这样的城郊式的居住条件，但是成功者毕竟不

① 林吉曼：前引书，第291页。

② 雷蒙德·莫尔：前引书，《新城市：工业时代的城市美国：1860—1920》，第40页。

多。而一些中产阶级成员则迁往城市边缘地区，居住在朴实的公寓或独家居住的房屋中。

但是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不稳定，一部分人可能爬上富人的阶层，一部分人可能坠入穷人的行列。他们向上看着上层人士的豪华生活时充满憧憬，向下望见“另一半人”的痛苦生活时不寒而栗。诚如一位学者所言：“新城市中产阶级的成员——经济管理者，热心城市社会改革者，国家文化的仲裁者，引人注目的商人和向上爬的钻营之徒——他们因恐惧和害怕被迫注视着另一半人的生活。他们因多种原因被拖入这个另一半人中去。”[①] 此语较为真实地揭示了美国中产阶级人士因多种原因沦为下层人士的事实和他们害怕成为“另一半人”的心态。

〔产业工人队伍的扩大及其境遇〕　“随着工厂制度和固定资本而来的是社会结构的另一个重要变化：自由劳动。”[②] 美国工业化过程中，产业工人队伍增长的速度特别快。因为工厂已经成为城市构架中的主要特征之一。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城市区域的扩大，工厂规模和数量也随之增大，导致产业工人数量激增。其次，城市本身的发展又产生了市政建设的新行业，这些行业需要大量工人。如：城市的水处理和水供应需要建造大量水厂。1890—1920 年间，美国建立的水厂从 1878 家扩大为 9850 家，而受惠于过滤水的人口从 31 万扩大为 1700 万人。[③] 其他诸如煤气厂、公交公司等等都需要大量产业工人。工业化进程中不断涌现的新产业更需要成千上万的产业后备军，大批新矿山、新工厂、新铁路、新公路的建造开拓吸引大量劳动者加入工人阶级

① 戴维·利维廷编：《另一半人是如何生活的（雅各布·里斯）》，圣马丁出版社，纽约，1996 年，第 29 页。

② 麦克、布雷德福：前引书，第 57 页。

③ 查尔斯·卡尔洪：前引书，第 104 页。

的队伍。1890 年美国大约有 2300 万人参加劳动，或是总人口的 37%是劳动者。1900 年，工人标准的工厂劳动时间是每周 54—60 小时，每年为 3000 小时。[①]

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从 1865—1920 年的半个世纪里，使美国社会发生转变的结构性变化也继续重组了工人阶级的构成。"[②] 南北战争结束时，美国超过 50%以上的成人都不是雇佣工人，1920 年美国成为城市国家后，绝大多数的成人已成为被雇佣者。在 1870 至 1920 年间，约有 1100 万美国人从农村来到城市，2000 万移民来到美国，他们大部分在城市定居。从 1900—1920 年，美国整个劳动力增长几乎高达 50%时，非受雇者包括农民在内仅仅增长 10%左右。

城市工人的生活条件是艰苦的。进步主义时代一些政府和私人的社会工作者对当时纽约市的工人家庭收入作过估计，一个典型的工人阶级家庭最低的健康和生活必需开支估计是，一个 4 口之家是每年收入在 800 美元到 876 美元之间，单身是 505 美元，一个劳动妇女是 466 美元。但是联邦、州和私人研究机构的调查结果表明工人实际收入低于上述标准。如美国移民委员会对 1 万名工资收入者的抽样调查发现，他们的平均年收入最高为 413 美元，将近一半的人收入低于 400 美元，女工收入是男工的一半，她们中的三分之二的收入低于 300 美元一年。移民家庭收入更是微薄，据统计一个移民家庭的平均总收入（包括丈夫、妻子和孩子的）都在上述必需生活费（每年 800 美元）以下，特别是新抵达美国的移民。纽约州工厂调查委员会（1911—1915）发现了同

---

① 麦克、布雷德福：前引书，第 73—74 页。

② 梅尔文·杜波斯基：《工业主义和美国工人：1865—1920》，哈兰·戴维森出版公司，伊利诺伊，1975 年，第 3 页。

样令人沮丧的证据，在对109481名工资收入者的抽样调查后，据报告，绝大多数人收入是每周10美元，其中15—30%的作为新手的劳动力仅为3美元至6美元。委员会发现纽约市的各类低收入工业中心工人的平均收入都低于最低生活费用标准。两位调查女工情况的人员发现每5名女工中有4名需要外加补贴始能达到州委员会提出的健康和生活必需的最低标准。一位女工埋怨说："我不是活着，仅仅是存在着。我无法如你称为生活的那样活着。……我要花多少个月的时间才能积攒点钱买一件衣服或一双鞋……在我一生中从未有过这样最艰难的挣扎。"据1910年调查，波士顿非熟练工人每周只挣9—12美元，而且每年还失业多时，全年总收入更低。

工作条件的低劣使工人过着工业奴隶的生活。据美国学者的研究，马萨诸塞的纺织中心劳伦斯城是全国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城市。在匹兹堡这座钢铁城市中，钢铁工人饱受痛苦生活的折磨。一位报告者说："他们（工人的孩子们）的脸色显得特别衰老，他们的目光中显露出早熟，这都是每天不是为生活，而是为了生存而挣扎的结果。"明尼苏达的矿工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他们心酸地说："如果我们要吃就没法穿，如果我们要穿就没得吃。"在西弗吉尼亚和肯塔基的山区煤矿中，工人们就像工业奴隶一样在封建式的矿主的统治下。

低收入的工人们在不安全的工作条件下劳动时间又特别长，直到1920年，技术工人每周工作时间平均为50.4小时，非技术工人为53.7小时。钢铁工人每周平均63.1小时，一些基础流程需要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7天工作。超负荷的劳动导致经常发生工伤事故的惨剧，工人死亡率激增。在西部工业地区，1880—1900年每年有35000名工人死亡，536000人受伤。

更可悲的是，工人们还在工伤事故中牺牲大批无辜的生命。

1909年伊利诺伊的彻丽镇的煤矿爆炸中180人死亡。1911年纽约市一个现代的“防火顶”工场发生大火，146名劳动妇女和姑娘被大火吞噬。1917年夏蒙大拿州164名铜矿工人在矿井中被烤炙致死。[①]

对整个工人阶级而言，他们都还面临失业的危险。美国的经济危机和萧条造成阶段性的失业循环，劳动方式和气候的变化形成季节性的失业，新机器取代劳动力会造成结构性的失业。如：1908年到1909年短暂的萧条引起广泛的失业，1913—1914年更为严重。经过1901—1907年相对繁荣以后，在1908年至1915年间失业人数占国内劳力的4.4%，其中3年高达8%。又如：纽约州劳动局统计每年6月和12月的失业情况时发现超过10%的非工会劳力在上述时间处于失业状态，1913年由于经济危机和一系列罢工斗争，纽约40%的成衣工人和25%的建筑工人没有职业。失业必然造成贫困。根据美国学者罗伯特·亨特研究，世纪之交时波士顿和纽约几乎有20%的人口处于贫困之中。亨特认为，每4个工人中有1人的年收入会因某一个时期延长数月的被迫失业而锐减。[②]

美国的产业工人因为与大规模生产相联系所以具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是当时美国社会中一个凝聚力强大和组织得最好的群体；由于受资本家剥削因而具有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精神。19世纪末全国性工人组织已经出现，并且领导工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取得重要成果。20世纪初一些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再次形成（详见后面的工人运动）。美国产业工人成为国际工人运动

---

① 本节有关美国工人生活状况的材料均引自梅尔文·杜波斯基：前引书，第17—20页。

② 杜波斯基：前引书，第22页。

中数量最多、最有组织的队伍之一。

劳动者的业余生活是他们社会生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研究当时工人群众的业余生活状况有助于对他们的处境作出整体性了解。美国学者罗伊·罗森兹维格对伍斯特市进行调查研究后写成专著《从酒店到剧场区：工人和电影》，反映了劳工阶级的业余生活。他在书中对工人的业余生活，特别是与电影业发展的关系作了大量描绘。他认为20世纪初美国社会中沙龙的衰落和电影的兴起是紧密相连的。“当伍斯特市沙龙开始进入内部转变进程时，一个劳动阶级休闲的新形式发展起来——电影——证明是一个从族裔劳动阶级生活中心取代沙龙的非常强大的力量。”[①] 1910年对1000位纽约劳动者作抽样调查发现，虽然5分钱电影尚未将沙龙逐出休闲界，但是平衡已经打破，调查者中的60%人在电影院度过休闲时间，仅30%的人常去沙龙。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电影已经作为普通劳动者休闲的最普及的形式，而且每周几乎吸引了美国人口的一半，即5000万观众观看电影。根据美国学者研究，1912年在伍斯特有3家廉价电影院，最贫困的移民聚在最差影院，较好一些的劳工们带着他们的妻儿拥挤在“家庭”影院，离此不远的“壮丽”影院也聚集着相似的人群。在娱乐活动中明显地反映出阶级差异。在纽约同样如此。1910年，蓝领工人仅构成该市上演剧场观众的2%左右，而成为廉价电影院的主要观众（约为75%）。

在伍斯特，电影还是移民与美国主流社会进行非工作联系的重要途径。一位13岁的意大利移民在1907年到达伍斯特时说：“在意大利我住在农村从未见过电影，来到这里我对看电影感到

① 托马斯·弗雷泽：《美国历史的民间部分》，第2卷，HBJ出版公司，纽约，1987年，第108页。

兴趣。”他在工厂每周工作60小时，但是他还是用积余下来的60美分中的一部分看电影。在纽约，一位受到父母严格管教的意大利服装女工回忆说：“我被允许独自外出的惟一地方就是电影院，父母亲不让我到任何其他地方，即使我已经24岁了。”另一位女工回忆说她后来的丈夫就是在电影院认识的。20世纪初由于妇女参加劳动的比例增高，电影院观众的结构也出现变化。在伍斯特同样如此，从1890到1910年妇女参加劳动的比例由19.5%上升到23.7%。因而廉价电影院观众中妇女和儿童的比例增加。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斯克拉认为：“电影作为一种事业，一种社会现象，只是当它们符合劳动阶级的需要和希望时才进入美国生活的。”电影的早期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劳动阶级观众。观看电影成为劳动阶级文化。劳动群众与廉价电影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工人阶级的面貌。

〔童工的普遍使用〕　20世纪初，美国工业化还导致了一个畸形的社会后果：大批童工的出现。童工已成为美国劳动阶级中的一部分，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中最艰苦最悲惨的要数煤矿中的童工。美国政府曾发表研究报告披露了1919年美国谢南道河谷煤矿区的童工情况，反映了20世纪初年美国童工艰苦生活和悲苦境况的冰山一角。如同美国其他任何矿区一样，工业迅猛发展既给美国人民带来了无数财富，但也巨大地改变了这里的生态环境和自然风貌，原先是美丽可人的乡村现在成了一个工业污染严重的黑色城镇，它的上空充满着黑色尘埃，空气因混杂烟灰也变为黑色，这里有堆满垃圾的建筑物和贫民窟，工人们从作业区回来脸上都沾满了煤灰尘埃，似乎带着黑色面具一般。这里的树木早已被砍光作为矿井中的支架。在这样的环境中，童工们和他们的父辈在这里劳作不息。童工和成年工人站在运送煤块的传送带的旁边，在煤块滚动发出的持续不断的噪杂声

中劳动，照看传送带将煤块送入粉碎机打碎。这工作没有技术要求但是非常肮脏，到处是飞扬的煤灰，窗上粘着煤灰，空气中飞扬煤灰，人们的肺里也充满煤灰。有人说："你在碎煤机旁开始工作，在碎煤机旁结束工作，最后也粉碎了自己。"[①] 更惨酷的是，童工们还被派往地下矿井劳动。调查期间，委员会发现在地下矿井劳动的 163 名童工中，92 名开始是看门工，他们站在黑暗或半黑暗的坑道里，负责开启或关闭通道中的门，放行煤车。看门童工中，17 人仅是 13 岁，3 人只有 12 岁时就参加了正式工作。有些童工还被分配在有危险的工段劳动。如：在把最后残留煤块从煤柱或墙上凿下的工段里，童工们要不时用手将飞速转动着的风扇转向在那里工作的工人，这里不仅到处是废物而且经常发生塌方事故，工人们常常因此致残致伤，甚至丧生。由于工作条件恶劣，这里工伤事故不断，童工们也不能幸免于难。有的在事故中丧生，有的致残。该地区在 1919 年，即调查阶段共有 978 名童工曾在矿山工作（包括短期和非正规的），其中有 178 人遭到事故伤害。

童工们以各种方式出卖劳动力挣钱。其中卖报又是一种特殊方式，大批报童的出现形成了当时美国社会的又一奇特现象。报童成了童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890 年美国 2/3 的日报在下午出版；1900 年，人们下班回家路上读的晚报在数量上约以 3 比 1 的比例超过日报。随着城市化的实现，人口的增长，信息传播量的扩大，人们不仅有更多的时间在家里，或在轮渡上，或在火车上，或在公共汽车上读报，而且急切地渴求各种商业信息。因此晚报数量激增。1912 年雅各布·里斯曾经揭露过报童的艰苦生活环境，说："今天的报童是另一类小家伙，他们有家和亲人。"后

① 《美国年鉴》，第 14 卷，第 321—322 页。

来报童的工作条件起了某种变化，即他们是“一群生活在家里，放学后去卖报的商业小家伙。”[①] 19世纪报童们在街上整天卖日报；20世纪初报童们则在放学后外出卖晚报。这样可以弥补他们因无法卖日报造成的经济损失。卖报由全日制变成业余制以后，美国报童数量激增。因为晚报有大量最新信息和商业广告需要立即送到顾客手中，加上晚报售报正值工厂企业的下班时间，人们行色匆匆在回家路上，所以报业经理、编辑、出版商和广告商们需要组织大量人力将刚出版的报纸送到读者手中，这时童工充当了他们所需要的最好角色。美国学者认为20世纪的最初20年里“新闻报只能依靠报童而别无选择”。[②] 当然报童的族裔结构不同，他们来自美国不同的族裔。例如：纽约市75%的报童是俄罗斯犹太人或意大利人；在芝加哥超过2/3的报童是“美国人”、黑人、德国人或爱尔兰人；巴尔的摩40%的报童是“美国白人”；辛辛那提29%的报童是美国有色人种；达拉斯80%的报童是“美国人”或北欧人。据调查，童工的家庭出身基本是劳工阶级。纽约1917年7月对806个报童的家庭出身进行调查发现，他们的父亲除了4名是承包商和建筑商，5名杂货商，23名职员，7名推销员和一些白领工人外，其他大多数是劳工、裁缝、驾驶员、小贩、搬运工、熨衣工、（渔业）陆上服务人员、擦皮鞋者、技术工匠和工厂雇员。

美国历史记录表明，20世纪最初10年在美国街上卖报的报童数量之多以致成为他们这一代少年中多数人的普遍生活经历，当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需要经济收入时，少年儿童们就会上街卖报。因此美国许多传记作家或自传作者都会提到他们在20世纪

① 弗雷泽：前引书，第139页。
② 弗雷泽：前引书，第142页。

初年的童年卖报经历，如：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欧文·伯林、乔·布朗、乔治·伯恩斯、威廉·道格拉斯、华纳兄弟等等在他们的传记中都或多或少谈到了他们作为报童时的一段生活。关于美国当时报童的确切数字是难以统计的。只能根据一些地方史和社会研究的成果加以推测和估算。

20世纪初的报童的处境虽然较之19世纪时要好，但是依然存在问题。报童们要为筹集第一笔款项而担心，然后又得计算领取多少报纸为好，因为晚报不如日报销售时间长，领多了卖不了就会亏本，领少了不够卖会失去顾客。他们在售报时还要千方百计地向顾客宣传报纸的重大新闻加以推销，在大街上边叫边卖。因此凡是遇到重大新闻诸如战争、谋杀案、自然灾害等新闻时，报童们庆幸这是他们推销报纸的好机会。美国喜剧演员乔·布朗在离开俄亥俄的托莱多市街道半个世纪以后，还生动地回忆起他当报童时的情景，说："在我卖报生涯中最丰盛的一周要算麦金莱总统被谋杀后的一周，他在布法罗展览会被枪击后还活了一星期，那整整一周内人们对新闻的兴趣处于狂热之中。"[①] 布朗在那一周推销报纸超过了他梦寐以求的最好的可能数量。《泰坦尼克》号轮沉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等等都为报童们提供了推销的好机会。这时，报童们简直成了报纸编辑在积极传播新闻。但是更多的时候报童们还是卖不完报纸。报童在街上大声推销报纸不仅遭人白眼还受到人们的谴责和非难。纽约人抱怨纽约简直成了世界上报童叫喊声最噪杂的地方。1912年夏，有人投书《时代》杂志抱怨报童已经成为麻烦制造者，影响病人的健康和休息。1917年10月，纽约《时代》杂志甚至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警察行动起来制止报童的噪杂声……" 报道纽约警察局已经接

① 弗雷泽：前引书，第149页。

到人们指责报童制造麻烦的投书，报童不仅在市区而且在郊区利用大家对世界大战的关注更改各种新闻大肆推销报纸等等，警察局负责人表示要尽力制止这类麻烦。在美西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数众多的报童犹如“街角上的路灯一般”在大街上排列齐整地高喊头条新闻。西雅图等城市通过法令禁止报童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区内大声叫卖。当然也有社会正义人士为报童辩护，一位亚特兰大法官在法庭上申辩说，报童们有权“在街上叫卖他们的报纸，只要他们不妨碍交通和影响病人……人行道既为百万富翁也为报童所用。”①

报童们为了推销报纸需要忍受很多苦难，他们的工作时间决定于报纸出版的时间，因而往往拖得很长。如：在巴尔的摩报童卖晚报，就要等待费城报纸的到来，大约在晚上 10 点左右报纸从费城运到，报童在后半夜 1 点半就要到达编辑部取报。在芝加哥报童往往半夜取得第一份报纸一直卖到第二天凌晨。纽约的报童在时报广场从傍晚开始推销晚报直到半夜以后。星期六晚上是报童们卖报的最好时机，因此他们常常在星期六晚上彻夜不眠，有的卖当天晚报，有的等待星期日报纸的到来。时任全国消费者协会秘书的佛罗伦斯·凯利女士在纽约市目睹报童在深夜卖报的情景说：“午夜 12 点 1 刻，一个小孩，面黄肌瘦，可怜而衣衫褴褛的小孩还站在妇女旅馆——玛莎·华盛顿饭店的门口卖报。”②

因为一个城市里有若干份晚报和其他报纸，报商们都希望自己的报纸有好销路，所以利用报童拼命促销。在报纸推销商或发行经理的挑动下经常发生贩卖不同报纸的报童间的殴斗，推销商们甚至雇佣年青打手对报童进行打击和威胁，对贩卖其他报纸的

① 弗雷泽：前引书，第 151 页。

② 弗雷泽：前引书，第 153—154 页。

报童加以拦阻，不让他们在街上卖报。如：20世纪初，当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报纸进入芝加哥市场时，报摊和报童拒绝卖他的报纸，赫斯特就雇佣成人打手强迫报摊和报童卖他们的报纸——“美国人”和“检查人”报，导致报战的全面爆发，但是受害的往往是报童。

〔农民的变迁〕　工业改变了农村面貌，交通的改进和提高扩大和规范了农民市场，使大规模的专业农场的建立成为可能，使大规模农场使用昂贵的机械成为必要。[①] 从全国范围而言，1860—1916年，美国农场数从200万个增加到640万个，农场土地总面积由4007万多英亩扩大为8790万英亩。据统计，1900年美国参加劳动的总人数中37.5%是在农场工作。[②] 由于工业化的实现，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目的发生了重要变化，总趋势是农业生产变得更为商品化。农民们往往实现了生产专业化，根据自己特点和优势为市场的需要生产若干农产品。农业的全面商品化和市场化使美国农场主阶层处在一个巨大变动的时期，农场主自身经历着一场变革。农场主的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化，他们由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转化为农业商人或农民企业家。这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农民适应社会转变的产物。“市场，机器和科学使美国农业从一个相对简单运作、小量资本和少量知识的事业转变为一种较复杂的事务，因此需要日益增长的投资、设备、科学信息和对市场的密切关注。现在，农民无可抗拒地卷入了一个复杂的工业体系。他们只有不是作为样样都能干的万金油，而是作为一个精打细算的、机灵的、有学识的商人才能

① 林吉曼：前引书，第331页。
② 麦克、布雷德福：前引书，第74页。

生存。"[①] 美国农民已在向农业企业家和农民商人转化，这是农业逐步工业化和商品化的结果。

其次，美国农场主阶层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世界市场的农产品供应者，美国农民已经卷入到世界经济网络中去。面临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他们带着困难慢慢学会去解决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像商人那样精确地计算价格和成本，共同联合起来去对付强大的市场力量。他们埋怨他们的生产成本太高，而价格太低。农民们生产谷物越多，收入却越少。如：1912 年美国生产了 67775.8 万蒲式耳谷物，较 1913 年为多，但农民收入反比 1913 年为低，只有 17163.8 万美元。[②] 主要原因是农产品价格受国际市场制约，美国农产品要与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埃及和俄国农产品进行竞争，价格不断下降，如：19 世纪 60 年代美国谷物平均价格每蒲式耳约为 60 美分，但是在 1896—1900 年间，下降为每蒲式耳为 28 美分；小麦由 1 美元多下降为 60 美分；棉花从 16 美分下降为 8 美分。1900 年美国 1/3 的农民是租地自己耕作的佃农。[③]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农民的命运已和国际市场的荣辱盛衰息息相关。

农场主为了适应工业化的要求，必须学习科学务农的知识。诚如美国学者所言，这时美国正处于农业革命的过程中。科学务农成为当时美国农业的重要举措，也对农场主阶层产生不小的冲击。1914 年美国科研机构首次提出在农业中推广科学方法和手段，但是对于美国大量小农而言收效甚微，他们还是固守传统的农作方法。美国政府和科学家向农民有步骤地推广科学方法。首

---

① 海斯：前引书，第 15 页。

② 《美国年鉴》，第 14 卷，第 2—3 页。

③ 奥斯卡·汉德林：《美国人：新美国人民史》，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1963 年，第 280 页。

先，他们要求农民选用改良种子，并使良种种植率从25%提高到100%；第二，教育农民如何使自己的产品市场化，尽可能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出售给顾客；第三，让农民懂得进行有利的买卖；第四，要求农民们明白使不断增长的农场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在出卖农产品中取得更大利益，再以低价购进所需物品，使他们过上更勤奋、更欢乐、更有希望的生活。农民们在社会和政府的支持下学习新的科学知识和经商本领。同时，农业革命还大大冲击了农民的个体思想，使他们在实践中明白合作精神不仅能使他们免受垄断集团的伤害，而且可以有效地增加他们作为科学农民和企业管理者的利益。但是一些农民将这些忠告看成是让羊羔躺在狮子脚下。长期以来他们害怕城市的企业家和商人；同样城市企业家和商人也对农民心存怀疑。[①] 农场主的上述变化是他们对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所作的一种反应。“美国农民向商人转化仅仅是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最明显的后果。”[②]

20世纪初美国农场主经历了一个生活较为富裕的时期。在世纪之交的15年里，美国农业进入黄金时代。原因是工业发展速度超过农业，因此增强了对农产品的需求，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加上地价上涨也给美国农民带来好运。“一般说来，在南北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农民享受了最富裕的生活。”[③] 但是农场主们遇到的问题仍不少。首先是美国有利于工业发展的关税保护政策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当他们出卖农产品时受到自由市场的价格波动的影响只能低价出售；当他们购进生产或生活所需的工业品时，却因保护关税政策而不得不高价购进，经济

① 《美国年鉴》，第14卷，第4页。
② 德格勒：《今从史出》，第337页。
③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533页。

损失严重。“农民在竞争市场上销售农产品，而在受保护、被控制的市场上购买工业品；他们作为买方和卖方都处在不利地位。”其次，垄断化给美国农场主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痛苦。垄断集团操纵工业品的价格和垄断原料的渠道，迫使农民在他们的控制下出售农产品和购买工业品，此外他们还掌握全国或地区的运输工具控制农产品的外运内销，对农民进行无端盘剥。农场主阶层中也出现垄断化的趋势，一些农场主兼并了中小农场主的土地逐渐成为农村中的大农场主，他们与财团勾结，控制农业资本，霸占农村市场和原料收购，对土地和资本实行垄断。中小农场主纷纷破产，农场主沦为农业工人。因此美国农民深受垄断之苦，他们甚至已经沦落到“只为垄断土地的财主砍柴打水”的奴仆地位。[①]

〔新移民〕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及其后裔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主体。因此移民的构成及其变化状况是研究美国社会结构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国外移民再次大量涌入美国形成蔚为壮观的高潮。美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移民高潮。第一次是 19 世纪中叶，移民大多来自爱尔兰、德国、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第二次移民高潮开始在 19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移民来自南欧和东欧：波兰、俄罗斯、意大利、希腊、匈牙利、亚美尼亚、土耳其、东欧犹太人和各种斯拉夫人。甚至还有中国和日本移民。据统计，从 1870 年至 1924 年间共有 2000 万移民来到美国，其中 75%是来自东欧和南欧，约有 500 万意大利人，200 万东欧犹太人，还有斯拉夫人、波兰人、奥匈人等等。来到美国的移民分布全国各地。如：法裔加拿大人移居新英格兰地区的工业城

①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 541 页。

市，墨西哥人则在加利福尼亚或西南和中西部城市如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底特律等地定居。诚如经济学家里查德·伊斯林所言："（当时）移民美国规模之巨大在人类历史上是无法比拟的。"[①] 移民规模之大，成分之复杂可从移民入关时的场面情景略知一二。一位从奥匈帝国来到美国的亨利·罗斯回忆1907年抵达美国埃利斯岛时说："这是1907年5月间的事，说起这年，正是来美国移民人数最多的一年。这一天（春天至今，天天如此），从早到晚，外国移民成百上千地拥挤在甲板上。世界上哪一处的人都有：双下巴、剃平头的条顿人；满脸大胡子的俄罗斯人；须发蓬乱的犹太人，里面还夹杂着面容温顺的斯洛伐克人；两颊光滑、肤色棕黑的亚美尼亚人；还有爱长酒刺的希腊人和眼角布满皱纹的丹麦人等等。"[②] 大部分外来移民在母国都是农民，来到美国后他们将城市作为目的地，所以移民人流入关以后就很快涌向美国城市，像水银落在地上一般消失在美国社会中间。1900年美国全国外来移民总数的大约2/3是城市人口，1920年城市人口已扩大到3/4。新移民集中在工业城市成了美国当时社会的一大特点。1910年，移民和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孩子构成了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克利夫兰、底特律和密尔沃基市人口的70%；在旧金山、纽瓦克、匹兹堡、圣路易斯、费城、辛辛那提他们的比例在50—70%之间。[③] 在城市中，外来移民在城市中逐步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移民区域。带有血缘和种族特点的机构如教堂、咖啡屋、沙龙、饭店、旅社、杂货店等等，它们往往像磁铁一般吸引着该城市或其他城市中的"同乡邻居"。

---

① 莫尔：前引书，第22—23页。

② 邓蜀生：《美国与移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46页。

③ 莫尔：前引书，第25页。

新移民构成了美国劳工阶层的最低层，他们的生活境遇十分悲惨，居住条件极为简陋困难，移民居住地往往成为美国城市中的贫民区。一位英国访问者在目睹贫民区惨状后这样说：“我决不会说地狱是丑陋的。”对于移民工人的痛苦遭遇，一位亲身经历者激动地说：“这就是美国人夸耀的自由和机会——自由就是为尊敬的公民使用可怕的两轮手推车去出售卷心菜，机会就是让尊敬的公民居住在那些怪异的、肮脏的和照不到阳光的洞穴（租屋）里。”① 纽约移民居住条件更糟。19 世纪 90 年代，纽约下东部地区每平方英里平均居住 33 万人，而同时的伦敦最高居住率为每平方英里 17.5 万人，纽约拥挤程度几乎高出伦敦 1 倍！一位观察家这样写道：“瞧上瞧下，走这走那，满目破碎、无序、恐怖和可憎；处处是污秽，人行道拥挤不堪，窗户旁躺着人，门阶上充斥团团烟雾。毫无秀色可言。”② 移民工人在美国经常受到种族歧视，因此他们往往从事劳动强度大，工作条件差，工资收益低的工种，他们的工资收入大大低于白人劳工。移民工人的收入低下是造成他们贫困的主要原因。1909 年匹兹堡的家庭最低生活费用需要每周 15 美元，但是该市的移民工人中的三分之二收入不到每周 12.50 美元，其中的一半人每周收入还低于 10 美元。③

美国社会中的不同移民集团因他们各自文化背景和母国地位的差异在发展中也显现一些区别和特点。美国的犹太移民是外来移民中一个很有特色，堪称最成功的移民群体。从世纪之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约有 150 万犹太移民蜂拥美国。特别是东欧犹

---

① 杜波斯基：前引书，第 23 页。

② 华尔特·特拉纳：《从济贫法到福利国家：美国社会福利史》，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纽约，1989 年，第 149 页。

③ 特拉纳：前引书，第 149 页。

太人集中在美国的纽约市的东南端，饱受贫民窟之苦。曼哈顿东南端的居住条件十分拥挤，“到世纪之交，曼哈顿东南端平均每英亩土地上住着700多人，密度超过孟买最差劲的贫民窟。”[①] 1908年的调查资料表明，曼哈顿东南端的居民家庭，一个房间住有2人以下的不到1/10。一半以上的家庭都是每个房间睡上3—4人，还有1/3以上家庭一个房间睡上5或5人以上。[②] 在就业方面，据统计1880—1915年间，犹太移民中一度有10%是小贩，只有5%的犹太移民从事高级白领行业，但就美国犹太人整体而言，有2/3是熟练的技术工。当时的犹太移民在美国是最成功的移民群体之一。他们在人口的垂直流动中趋向于向上发展，即由社会低层次向高或较高层次发展。如：1897—1907年间，曼哈顿地区犹太人中担任医生职业的由450人增为1000人，药剂师由45人增为115人，牙科医生由59人增为350人。整个纽约的犹太人从事“高级白领”职业的人数比例大增，从1880年的5%扩大到1905年的15%，小商贩的人数下降75%。[③] 但是，当时美国社会上的反犹苗头已经显露。“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几十年中，犹太人确曾成为美国社会的目标。”[④] 美国一些有地位的人、家属或集团甚至拒绝与犹太人新贵交往。由于在20世纪初美国的犹太移民加入了白领阶层的人数日益增多，美国社会开始公开抵制和歧视犹太人。甚至报上的招聘广告中出现“不欢迎犹太人”的话语。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国内出现反犹狂热。

---

① （美国）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沈宗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7页。

② 同上书，第111页。

③ 同上书，第114页。

④ 邓蜀生：《美国历史与美国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9页。

世纪之交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除了10多万劳工，大多从事海员、泥瓦匠、裁缝、鞋匠、理发师等职业。而从事教师、医生、律师的还不足100人。意裔工人工资低于白人。据统计，1910年，美籍意裔男子所得的年收入低于本土白人或黑人的。就职业而言，1905年在纽约的第一代意大利移民中有40%是非熟练工人。1910年波士顿的意大利移民几乎有2/3的人是属于体力工人，从事白领工作的仅占12%。意大利移民在美国参加市政管理工作的，从最低层的清道夫到警察、职员占有相当比例。1898年以后纽约发展为“大纽约”，该市的大量市政建设为意大利移民的就业提供了机会。1911年纽约的意大利男性移民45%在建筑行业当壮工，15%当工匠。1914年初纽约就有800多家职业介绍所专为意大利移民服务。[①] 19世纪末在纽约公共工程充当市政职员的大约8000人。旧金山的意大利移民几乎“垄断”了清道夫等其他市政管理工作。意大利移民还从事教育工作，纽约的意大利人1915年就有400名左右教师，芝加哥的意大利人在1920年初大约有42人。意大利移民劳工中曾盛行包工头制度。包工头一般是具有某种组织能力和强悍贪婪之人，专司招募、组织和监督意大利劳工之职，他们的“业务”范围已扩大到美国若干城市，他们的网络甚至跨越美国和意大利。如：19世纪末，包工头控制着纽约全部劳力的2/3，在芝加哥有20%的意大利人为包工头干活。包工头在美国老板和意大利移民中间充当中介，赚取丰厚的报酬。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意大利移民在社会垂直流动中也出现了向上的流动趋势，纽约的意大利移民开始从原来居住的贫困区向长岛、威斯特切斯特地区，向城郊区迁徙。意大利人逐渐向主流社会融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保持和发挥了他们

① 邓蜀生：《美国与移民》，第142页。

的优越的音乐素养。

移民结构的变化还牵涉到他们与主流社会的融合问题。20世纪的新移民来到美国以后面临母国文化传统和美国两种不同文化的冲击和融合。他们既要保持母国文化传统和语言，又要适应新的美国文化环境，逐渐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美国学者西奥多·索罗特在对希腊移民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20世纪初年在美国的希腊移民强烈地希望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为此他们在美国的居住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教堂，负责本地区的学校教育，甚至上演本民族的戏剧和音乐，还保持了希腊人独特的咖啡屋。在文化冲突和融合问题上，他们首先面临一个双语问题，一方面他们明白孩子们在公立学校学习英语是必要的，但是本国的希腊语也不能荒废，他们要求自己的后代学习希腊语言，他们开始把教堂作为孩子学习希腊语的学校。因为他们的教堂只接纳讲希腊语的人，教职人员就是最好的希腊语教师。为了让孩子们不忘希腊语，他们还建立社区学校教授希腊语，以致希腊孩子们特别辛苦。在公立学校放学以后，他们还得进希腊学校学语言直到傍晚。在语言学校里各种年龄段的孩子们集中一起，最年幼的只有5—6岁。他们或者挤在教堂的地下室，或在租来的会堂、或在空闲的仓库里、或在社区中心学习希腊语。一些移民特别强调说："让我们种族的伟大品格……渗透进在美国出生的孩子……教他们希腊语，用希腊人的性格和德行影响他们。"但是这样的学校因为学生的负担太重而收效甚微。1914年芝加哥的希腊学校也许是其他城市中的典型。据估计约有500位出身希腊移民家庭的孩子参加了希腊学校。但学校条件很差，孩子们白天上公立学校，下午很晚了还要进希腊学校，致使年幼的他们身心疲乏，缺乏学习兴趣。

如同建立希腊学校一样普遍，希腊移民社区还建立了不少友

谊社团。开始时这些社团成员一般有15—30人组成，由12—15人组成的委员会管理。成员们有一定的制服，特别是社团还有自己组织的印章，甚至每一个社团组织有主席、副主席、秘书和财务人员等。参加社团的成员是根据原来居住在希腊的村庄、城镇、地区甚至岛屿决定的。成员间相互帮助关心。他们集资兴建学校、桥梁、道路等公共设施。1907年，美国已有这样的希腊移民社团大约100多个，仅纽约就有30个，此外他们还有一种全国性的组织。同时希腊移民还在美国的居住区建起咖啡屋这样的社交场所。因为开办咖啡屋费资不多，设备简单，发展迅速。这些咖啡屋往往成了希腊工人打发业余时间的好去处。每间咖啡屋都取了一个自己的好名称。希腊移民们在这里喝咖啡谈论天下事。成为社区活动的中心。有时大家聚在那里谈论战事，希腊打败土耳其的事成为谈话热点，为此有的咖啡屋还特意挂上一张希腊地图。当然有些咖啡屋最后演变成赌博场所。后来咖啡屋逐渐失去了它存在的必要，因为移民们对美国的了解日益加深，在美国的朋友日渐增多，社交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英语水平随之提高，咖啡屋后来就成了早期希腊移民生活的象征和回忆而已。

宗教活动也是希腊移民团体的重要社交方式。妇女们经常在周末或周日到教堂活动。宗教节日往往是移民们聚会的好时光。其中命名节比生日更热闹。这是从欧洲带来的习俗。亲朋好友在命名节互相访问和祝福。此外基督教的很多节日和婚礼都是吸引移民参加的大好机会。此外希腊移民同时还出版了希腊文的报纸。[①] 希腊移民的状况仅仅是整个美国新移民社会的一个缩影而已。

20世纪初年，美国东方移民的处境日益恶化是一大特点。

---

① 卡里和温伯格：前引书，第95—102页。

自1882年美国政府通过第一个排华法案以后，各种加强补充排华法的法案不断出台①，1904年，美国限禁华工条例续订，“禁例”增为60多条。在美国政府的排华法案的鼓动下，华人在美国处境更为困难，他们被无辜驱赶的惨剧屡有发生，如：1903年波士顿发生拘捕华人200余名的事件。更有甚者，华人刚进入美国大门就遭遇艰险和歧视。据研究美国移民史的中国学者邓蜀生的记述，1910年1月21日，耗资20万美元的天使岛移民拘留站正式启用。华人们一踏上美国国土就被拘禁在天使岛的“木笼”里，过着非人的生活。1910年3月16日，旧金山的《世界日报》登载了“木屋拘囚序”，一位被囚华人以悲痛的心情写道：“躬到美域，徒观海水之汪洋；船泊码头，转拔埃仑之孤岛。离埠十里，托足孤峰。三层木屋坚如万里长城；几度监牢，长扃此门锁钥。同胞数百，难期漏网之鱼；黄种半千，恍若密罗之雀。”报社编辑为此按语：“笔者以身受之苦，作悲愤之文。血耶？泪耶？墨耶？吾知海内外同胞读之，必告无限激刺矣。虽然，吾同胞虽有无限之激刺，空作楚囚之对泣，亦何济于事。”② 日本移民境遇比华人要好一些，他们趁华人被排斥之机来美寻求机会，1900—1905年约有9万日本移民纷至沓来进入美国。1907年一年就有3万多人。但是，1907—1908年美国与日本政府还是签订了实际上是禁止日本人移民美国的协议。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这样说：“到1908年，几乎完全排斥了东方移民。”③ 在美国的日本移民同在美的华人的遭遇一样：“先是受欢迎，继之被排斥，再继之被施以暴行。”1900年5月7日，旧金山市市长在大会上大肆

① （美）宋李瑞芳：《美国华人的历史和现状》，商务印书馆，北京，1984年，第53页。

② 邓蜀生：《美国与移民》，第258页。

③ 林克、卡顿：前引书，上册，第16页。

诬蔑华人和日本移民说："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不是地道的公民，他们都不是美国公民那样的人。"美国报纸上出现诸如："日本人是对美国妇女的威胁"、"褐色人是公共学校的祸害：成年人挤走了孩子"、"日本人的血汗作坊是我市的耻辱。"等等。1907 年 5 月 20 日旧金山发生暴徒袭击日本旅馆和澡堂事件。[①]

总体而言，20 世纪初来美国的移民，尽管有些移民集团在社会垂直流动中流向较高层次，一些人的生活也许比在母国多有改善；但总体遭遇是悲惨的、令人不满的。他们为美国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得到的回报却非常令人失望。一位名叫弗里德里克·哈斯金写了这样一首移民歌："我是外来移民……我为屠宰业和肉类包装业提供 85%的劳动力。我承担烟煤矿 7/10 的劳动力。我承担羊毛厂劳动的 78%。我提供棉纺工厂 9/10 的劳动。我制作全部服装的 19/20，我制作鞋的 50%。然而，我却是美国的一个大问题。"[②] 移民（包括西方和东方的）为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立下汗马功劳，为美国这座新兴的世界工业大厦奠下坚实基石，可是到头来他们却被歧视、被驱赶。这是美国历史上的耻辱。

〔贫困人口的增加〕　　贫困问题的出现和贫困人口阶层的形成是美国社会结构变动的又一突出现象。虽然这个问题在美国早已有之，但 20 世纪初显得更为突出。美国人因而对此加以更多的关注。关于贫困问题，一些传统的观点认为穷人的贫穷是咎由自取，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戴维·威尔斯这样说："穷人倒霉是因为穷，他们自己害了自己。"[③] 19 世纪 90 年代一些美国社会工

---

① 邓蜀生：《美国与移民》，第 299—230 页。
② 邓蜀生：《美国与移民》，第 147 页。
③ 梅里亚姆：前引书，第 187 页。

作者经过对穷人生活条件的大量调查研究以后，对贫困的成因提出了新的看法。其中最出色的是芝加哥的J·亚当斯、纽约市的L·华尔德和R·亨特。R·亨特在1904年出版了他的《贫困》一书。在他的笔下，美国的穷人被描绘成："他们像犯人一般在欲求的刺激下，在饥饿的鞭策下，从黎明工作到夜幕降临，或从日落干到黎明。"他估计在这个他曾生活过的社区中，处境最艰苦的有5万男人、妇女和孩子，他们一直生活在贫穷或贫困的边缘之中。描绘他们如何工作、如何饥馑和渴求摆脱困境简直是不可能的。[①]

亨特所描绘的情景仅是美国穷人中的很小一部分，事实上当时美国确实已经形成了一个贫困人口阶层。亨特认为，穷人作为一个阶级他们有最长的工作时间和最低的收入，他们面临最尖锐的竞争——来自各地的非技术工人到这里寻求职业，他们受血汗劳动制的压迫，他们租赁的房屋条件最差但租金比其他阶级所付的要多，他们背负着比其他任何阶级更高的死亡重担，他们没有任何积余，因而处在随时失去工作的实际危险之中，他们可能因为经济或其他原因立刻失业。根据亨特的估计，在正常繁荣年景，美国约有不少于1000万人处在贫困之中，即少吃缺穿和居住困难的。其中400万人是公开的乞讨者。200多万人是一年中有4—6个月失业的工人。在失业率最高的地区每年约有50万外来移民男子来此求职。美国有几乎一半的家庭生活并不富裕。约有170万正当求学年龄的小孩面临沦为童工的境地。约有500万妇女发现她们必须为生活而寻求工作。约有200万妇女在工厂或工场劳动。每年约有100万工人在劳动时因事故而伤亡。约有1000万人生活得可以。贫困产生穷人，穷人形成贫民窟，贫民

① 《美国年鉴》，第12卷，第588页。

窟成为美国城市的一部分。雅各布·里斯在1902年发表了著名文章《与贫民窟的斗争》，他在文中揭露说："在宣言颁布10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睁眼看到的是：城市中的劳动妇女一天工钱只有60美分，生产1打短裤才得40美分，贫民墓地夺走城里1/10的人，每年有1/10的人死于战乱，这恰恰是贫民窟里婴儿的死亡率。"他深刻指出："在与贫民窟的斗争中，我们要么战胜，要么灭亡，没有中间路可走。"①

在贫困成因的分析中，亨特进一步指出："我们过分倾向于认为那些处于贫困的人是一些不为自身利益奋斗、只是等待别人解救他们的无用之辈。"其实不然，他们是"被一种支配他们命运的残忍的经济力量拖入绝望的。"② 这种分析应该说是颇有见地的，贫困的产生不能归罪于穷人本身，而应从社会、经济等深层次领域寻找原因。亨特所指的经济力量就是当时美国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这是一种无形的经济力量，造成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化，穷的穷，富的富；穷的越穷，富的越富。当时美国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尚未建立更是强化了这种贫富不均的趋势和力度。

三、社会人口流动高潮

〔美国经济地区结构的变化〕　经济地区结构和社会结构密不可分。世纪之交，美国经济发生了地区结构的变化。大致而言，美国的工业区域向中西部扩展和延伸，经济重心出现向西推

---

① （美）戴安娜·拉维奇：《美国读本》下册，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491、493页。

② 《美国年鉴》，第12卷，第586页。

移发展的趋势，原来的工业基地依然获得重大发展。工业集中在美国的东北部，即俄亥俄河之北和密西西比河以东，主要有钢铁工业、纺织和制鞋工厂，还有木材工业和家具工厂等等，这里还有美国最密集的铁路网；有的地区因资源丰富导致工业发展，如宾夕法尼亚的煤，中部大西洋沿岸地区和大湖区的木材，新英格兰的丰富水力资源带动了这些地区相关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一些有利的交通条件促使全国性的东西交通线的形成。如：伊利运河穿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将东部地区和大湖区联系起来。此外工业布局还受到老工业和商业中心的影响，如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的出海口直接影响了工业布局。

美国的南部和西部以农业和矿业为主，成为北方工业产品的市场，并为它们提供粮食和原材料。南方提供棉花、烟草和稻米，中西部和太平洋沿岸地区为东北的城市和欧洲城市市场提供粮食，大平原地区则提供牛肉制品。农产品基地有一个向西转移的过程。如：最初的粮食产地在中部大西洋沿岸诸州，后转移到圣路易斯，再转至明尼阿波利斯和堪萨斯市；牛肉和猪肉制品移到了中西部的西部地区，全国的屠宰业中心由辛辛那提转向芝加哥，最后往西移至堪萨斯市、苏城等6个养牛场的边缘。西部地区还往东部运送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如：先是上大湖区后从蒙大拿、亚利桑那、犹他等州向东部运送铁矿石和铜矿石。铅锌矿则从堪萨斯、密苏里和阿肯色等州运出。木材从西北太平洋沿岸地区发出。

西部和南部形成了新的工业区域，成为美国的新兴经济区。但是西部和南部涌现的新工业城市同样离不开东部工业区，他们仍然需要东部地区生产的工业制品，农机、建筑材料、服装等等。这些涌现出来的地区专业化经济和全国经济体制融为一体。

同一经济地区内部，农村和城市间的专业区别也日益扩大。

城市成为工业活动的中心，集中了生产出来的工业品，远远超过了以前农民在农村所完成的工作。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向城市涌来，生产成品从这里输出。城市成了最大的进出口岸、生产中心，资本、技术和管理能力的集聚地。城市的核心是商业，其他的人类活动都尾随这个核心而生，以适应一个新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社区。①

虽然美国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社会，人口流动比例在世界各国中居于前列，甚至也可以说美国社会一直处在流动之中。但是这种流动犹如汹涌波涛，起伏相间。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次人口流动的高潮，包括从欧洲向美国大量移民形成人口迁移潮流，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转移，由东部向西部流动，由南方向北方流动；在垂直流动中，美国人由社会低层次向高层次流动，或由高层次向低层次流动，在两股相反方向的垂直流动潮的汇合点中形成了中产阶级的荣辱盛衰，但总的流动趋势是向上的。有的美国学者曾经认为美国历史就是一部美国人从农民转变为工人，再由工人转变为职员的历史。世纪之交时期正是美国的第一阶段：即由农民转化为工人阶段，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当然这个转化的历史过程与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紧密相连，互为因果。在人口流动中，黑人向北方城市和南部城市的进军占有重要地位。世纪之交的美国人口流动高潮包含农村人口向城市工业人口转移和黑人由南部向北方大迁移两大内容。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美国世纪之交的劳动力转移高潮是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完成阶段的直接后果。工业革命一方面造成了对大量工业劳动力的需求，各种勃然兴起的工业部

---

① 海斯：前引书，第15—17页。

门成为吸纳劳动力的巨大蓄水池，除了社会上各种闲散劳力被吸收加入工业劳动大军以外，国外移民也像被磁石吸引一般来到美国，他们同国内农村劳动力一起纷纷转向城市。从农村到城市，从农场到工厂，变农民为工人是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带来了农村的半机械化和机械化，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农业生产领域出现劳动力过剩的现象，这就为农业人口转向工业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这种人口流动与城市化构成一个互动的过程，城市兴起为接纳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提供了巨大空间，农村人口转向城市则为城市化提供了大量建设者和未来城市市民的主体阶层。所以，20 世纪初的这次美国劳动力转移高潮恰恰与美国城市化的初步实现相一致，与美国工业革命的完成相同步。

美国工业城市人口流动即人口迁入迁出的比例是相当高的。随着城市的扩大，城市不断吸纳新的成员，不断将多余的人口“溢出”城市。[①] 因此当我们从统计材料上知道某城市在若干年内人口增长比例时，其实际上的增长数字要高得多。美国人经常处于流动的状态中，根据美国历史学家研究，一个标准的工人在一生工作期间大约干了 30 个工种，在 12 个不同城镇生活过。

根据我国学者的最新研究，[②] 19 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人口流动主要是从中西部向西移动，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例如：从威斯康星和伊利诺伊州就有 50 多万人向西迁移，27 万人在内布拉斯加停留，余者 20 多万人向俄勒冈进军直至太平洋沿岸。有 27 万人从中部州阿肯色和密苏里向西迁移，一部分进入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另一支向加利福尼亚挺进。

---

① 莫尔：前引书，第 26 页。

② 详见王章辉、黄柯可：《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前引书。

事实上，历史上的西进运动并没有因为“边疆”宣布结束而停止，它在20世纪初的20年间继续向西推进和发展，主要表现为西部各州人口激增和开发成功。如：北达科他州的人口1900年为31.9万人，在短短的10年里就翻了一番达64.6万人（1920年）。南达科他、科罗拉多、爱达荷、蒙大拿、犹他、怀俄明等州的人口也同样显著增加。西南部的得克萨斯、俄克拉何马、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等州的迅速开发反映了西进的规模和成效。这些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美国的新工业区。

农村人口转向城市以后，在城市人口的社会垂直流动中造成了原来的白人工人向上流动的趋势，除了农村人口大量人城以外，国外移民的大批到来也是造成美国人口垂直流动向上发展的重要原因。由于成千上万移民梦幻般地涌进美国，促进了美国大量内部需求，带动经济飞速发展，给美国工人带来了就业机会；其次，因为大批移民是非技术或半技术劳工，他们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中占领了大量收入低、非技术的工作岗位，这就造成大批白人工人向技术强、收入高的岗位流动，职业结构发生变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美国的数百万移民，事实上不知不觉地为那里的人民造成了一定数量的向上流动。”[1]

〔黑人大迁徙〕　19世纪末和新世纪最初的20年，在美国出现的人口大转移高潮中，黑人向北方迁移形成了一股最有特色的潮流，“其数量堪与历史上历次国际大移民相比。”[2] 他们跨出地区和州际界限，涌向北方的大西洋沿岸和中西部城市。其特点不但是迁移路程长，而且是黑人们离开了世代生息的宁静而痛苦的乡村来到嘈杂陌生的城市，寻求新的生活。终于使美国所谓

① 麦克、布雷德福：前引书，第109页。

② （美国）托马斯·索威尔：前引书，第267页。

的“黑色地带”瓦解消融。

城市新边疆为美国国内的南方黑人提供了迁徙的新空间。内战结束后其实已经出现了南方黑人向北方城市移民的趋势。1900—1910年，19.4万黑人移居城市，1910—1920年55.5万黑人迁入城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结束时，这种迁徙运动因北方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加剧。20世纪20年代共有75万以上的黑人离开了南方。[①] 大部分黑人涌向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1920年居住在非南方地区的黑人中大约有85%在城市中生活。1920年前，纽约、费城、芝加哥等城市都兴起了它们的最大的黑人社区。20世纪头10年内，工业心脏地区诸如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圣路易斯、堪萨斯等城市都成了黑人们的“希望之乡”。[②] 当然与此同时部分南方黑人也在南方城市中寻求他们的生存之地，20世纪头20年，南方城市黑人居民增加了48.9万人；20年代，南方城市黑人居民增加39.7万，而农村人口却减少了47.9万人。黑人的大量外移，甚至造成农村劳动力的枯竭，只有老人、病人和儿童被留弃在南方农村，甚至使“产量丰富的棉花种植场变成了荒芜的土地”。[③]

从南方的肯塔基、亚拉巴马、密西西比、佐治亚等州向外迁移的黑人数量最多。黑人大规模外移有其深刻的内因和外因。黑人虽然世世代代生活在南方，但是奴隶制度对黑人造成了无以复加的痛苦和悲伤。南北战争后，虽然奴隶制在法律上已经废除，但是黑人并没有真正获得解放，因此离开南方一直成为黑人的强烈愿望。早在内战爆发前黑人们就利用“地下铁道”，冒着生命

① （美国）托马斯·索威尔：前引书，第267页。
② 莫尔：前引书，第21—22页。
③ 杜蒙德：前引书，第36—37页。

危险冲破重重障碍奔赴没有奴隶制的北方，争取人身自由，摆脱奴隶制及其残余成了黑人们离开南方的强大推动力，这是黑人北移的深刻历史背景；同时在工业化的高潮中，南方的农业机械化程度日益提高，农业劳动力的多余也促使南方黑人大规模北移，有的黑人在南方农村难以维生。从北方的外部条件而言，那里的工业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黑人无疑是最优秀的劳力，他们不计报酬，刻苦耐劳，因此很快成为劳动力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一部分，加上黑人还没有自己的劳工组织，所以雇主们可以随意对他们压低工资、加长工时，甚至随意开除。在白人工人发动罢工时，黑人往往可以被雇主作为替代者加以雇佣。总之，北方对黑人来说具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南方的推力和北方的引力形成了黑人北移的滚滚洪流。

根据菲特的研究，1910 年美国黑人总数约为 980 万，1920 年增加至 1040 万。1890—1910 年，75%的黑人居住在南方农村，但是一些黑人已经开始迁出南方农村。1890 年开始出现黑人大迁徙。1890—1900 年，南卡罗来纳迁出 6.5 万人，弗吉尼亚 7.1 万人。

黑人们虽然怀着美好的憧憬背井离乡从南方来到北方，从农村来到城市，冲破了奴隶制度残余的桎梏，获得了某种改善。但是黑人们到了北方进了城市还是摆脱不了美国种族歧视的浓重阴影，城市黑人的生活条件依然艰苦。南方城市中盛行种族隔离。黑人被迫住在隔离区，黑人子女只能在隔离区的学校上学。北方城市中，黑人因收入微薄只能在黑人聚居区入住，在黑人学校入学，与黑人商人做买卖。纽约市的哈莱姆贫民窟地区就是最好的典型。1900 年美国全国大约有一半的黑人是文盲。[①] 虽然少数黑

① 麦克、布雷德福：前引书，第 57 页。

人也开始接受高等教育或经商涉足金融业，1909年有黑人在密西西比州开设一家储蓄保险公司，但是诚如一位著名美国历史学家所说："总之，对美国黑人来说1890到1920的30年是最黑暗的时期。"①

四、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

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像魔术一般在美国大地上突然展现出无数工厂铁路，摩天大楼，机器轰鸣，汽车奔驰；另一方面又奇迹般地使美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阶级和阶层重新组合，财富实行新的分配，阶级矛盾和经济利益集团间的矛盾趋于激烈，不同的阶级和利益集团出自自身的利益向社会提出各自要求。社会动荡，群众运动随之兴起。

〔工人运动〕　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初出现了曲折发展的形势。"到世纪末，美国已经成熟为一个工业社会，它的劳工运动也已经历了一个痛苦的和常常是不确定的成长模式。"② 19世纪90年代美国工人罢工出现高潮。据1900年美国工业委员会的报告，1881—1900年，美国全国共发生22793起工人罢工，波及11.7万家工商企业。这些罢工事件（75%）主要起因于工资和工时问题。1900年，美国无烟煤矿工人在约翰·米切尔的领导下为要求提高工资和若干改革举行罢工，结果以工人取得提高工资10%而胜利告终，但斗争并没有结束。1902年5月，工人因雇主拒绝同工会进行谈判再次举行罢工斗争。后由罗

① 塞缪尔·莫里森：《牛津美国人民史》，第3卷，新美国图书出版公司，纽约，1972年，第109页。

② 杜波斯基：前引书，第30页。

斯福总统出面进行调停再增加工人工资 10% 予以解决。1898—1908 年间，国际印刷工人联合会为他们的成员在印刷行业赢得了每天 8 小时工作制，代表技术工人的铁路兄弟会也取得了斗争成果。[①] 1901 年美国钢铁公司 6 万多工人罢工。1909 年纽约万名制衣工人罢工。1910—1914 年西部矿工举行罢工斗争。1913 年密歇根矿工联合会组织矿工罢工。

1913—1914 年科罗拉多矿工们举行反对洛克菲勒的科罗拉多燃料和钢铁公司大罢工，轰动全国。该州当局竟然出动军警进行镇压，他们向罢工者居住的帐篷上倾倒煤油纵火，甚至使用机关枪向罢工者和家属扫射，杀死妇女、儿童和工人 20 名左右，后工人们在此专门立碑纪念死难者。但小约翰·洛克菲勒却无视工人要求，不顾公众舆论和威尔逊总统的压力，专断横行。他还于 1916 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题为《劳方和资方——合伙人》的文章，冠冕堂皇地鼓吹“在处理工业问题中，我们的困难是由于太长时间不理解劳资双方的真实利益。”资方离开劳方无法推动轮子前进，反之亦然。只有劳资成为合伙人才能创造财富并使生产增长成为可能。[②] 妄图欺骗舆论。

在对付工人罢工斗争中，一些资本卫道士表现出露骨的反劳工的立场。1902 年费城无烟煤矿工人罢工期间，一位名为克拉克的公民以基督的名义在 1902 年 7 月 17 日写信给费城和雷丁铁路主席乔治·比尔，呼吁他对工人作出让步结束罢工。比尔对此作出的答复令人愤怒，引起公众舆论的关注和批评，他在答复中竟然说什么：“我不知道你是谁。我看你是一个教士，但是你偏爱倾向于劳工有权去控制他在其中只应得到他合理劳动所得，而

---

① 杜波斯基：前引书，第 87—88 页。

② 《美国年鉴》，第 14 卷，第 23—24 页。

别无他利的企业。……劳工的权利和利益将得到保护和关心，但不是由劳工的煽动者，而是由上帝以他无限的智慧已经授予控制国家财产权益的基督教徒，而且成功的管理也极其依赖于他们。……牢记上帝依然在统治，牢记这是一种法律和秩序，而不是暴力和犯罪的统治。"[①] 这种超保守主义的观点完全反映了资本家控制财富的顽固立场。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斗争〕　19 世纪后半期，美国工人已经组织起来，形成了颇有影响的全国性工人组织，进行多次卓有成效的斗争。其中美国劳工联合会（简称劳联）最为突出。它是在劳动骑士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898 年以前发展缓慢，原因在于内部分裂和罢工失利。此后劳联的工人队伍发展迅速，成员从 1897 年的 26.5 万人，增加到 1918 年的 272.5 万人。[②] 但是美国劳联从 90 年代开始走上阶级调和、排斥非熟练工人和实行种族歧视的歧途。美国工人运动史专家康蒙斯认为"1894 年到 1904 年可以叫做'资本和工人的蜜月时期'。"劳联领袖龚伯斯已经成为工人贵族，他将工会办公地从印地安那波利斯迁往首都华盛顿，使之成为一个社会和政治机构，"龚伯斯的穿着打扮则更像是一个绅士和企业管理人员，而不像一个工人或 19 世纪的劳工领袖。"[③] 在龚伯斯的领导下，劳联已成为一个有技术、受尊敬的工人阶级精英的舒适的家。龚伯斯在 1906 年这样说："工会不是周日学校，它是工资收入者的组织。处理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问题。"他认为工会组织和工会运动不需要理论，反对工人运动和知识分子结合，排斥知识分子。他认为与不懂工人运

---

① 《美国年鉴》，第 14 卷，第 455 页。

② 杜蒙德：前引书，第 112 页；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 501 页。

③ 杜波斯基：前引书，第 86—87 页。

动实践的知识分子纠缠结合是危险的。其他一些工会领袖也都有着与他相类似的看法。约翰·米切尔说："劳联为劳动者服务，但不反对任何人。他们不仇视雇主，对一般公众利益也毫无敌意。……不存在劳资对立的必要。"有人主张劳工运动"不要反对雇佣者的利益"，龚伯斯则进而言之："要为雇佣者的利益行动。"事实证明劳联已是工业资本的朋友而不是他们的敌人。[1]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创建和活动〕　20世纪初，正当劳联盛行阶级调和主义将工人运动引入歧途时，世界产联的建立和活动构成了美国工人运动历史上最为绚丽的一页。在创建世界产联过程中美国的非熟练工人积极性最高，1893年成立的西部矿业联盟是他们的基本力量。这是一个战斗力很强的工人组织，对劳联的阶级调和论抱有强烈的反感。他们在1898年5月的盐湖城大会上决定成立西部工人联合会同劳联相对抗。1902年，他们根据德布斯建议将组织扩大到东部工人地区，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双重工会——全国工人联盟，为创建世界产业联合会打下了基础。

1905年6月27日，一些左翼工联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来自美国西部矿工联盟、全国工人联盟、社会主义党左翼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代表，在芝加哥布兰德会堂集会，成立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主要领导人是威廉·海伍德，他出生在盐湖城，曾当过矿工和农民，领导过工人运动，参加过美国社会党。他对工人富于同情心，他在世界产联成立大会上说："我们在这里集会是为了把这个国家的工人联合起来形成阶级的运动，这个运动将把从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目标。我们要到贫民区去找工人群众，把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像样的水平。"工

---

① 德格勒：《今从史出》，第267页。

人运动领袖德布斯、德里昂都在会上作了发言。大会对劳联的阶级调和政策加以严厉批评，指出劳联已经趋于明显的反动，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属品。会议洋溢着一种团结战斗的气氛，与会者为来自东部的德里昂、来自西部的海伍德和来自中部的德布斯能参加会议欢聚一堂感到欢欣鼓舞。海伍德将大会比喻为“工人阶级的大陆会议”。[①] 德布斯在会上说：“两者必居其一，一方是劳联和资本主义，另一方是产业工人和社会主义。”[②] 世界产联主张暴力革命，采取直接行动摧毁资本主义。它的纲领序言中写道：“工人阶级同雇主阶级毫无共同之处。只要成百万工人还在忍受饥饿和穷困，构成雇主阶级的少数人还在享有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就不可能实现和平。”

世界产联成立之初有约5—6万成员，最多时达到10万人左右。它成立以后积极开展工人斗争，组织过一些成功的罢工，1906—1907年共领导了24次工人罢工，失败仅2次而已。在罢工斗争中，世界产联领导人注意通过罢工提高工人的觉悟水平和主动性，力排种族主义的影响，例如：世界产联在传单《致有色男女工人》上写道：“如果你是雇佣工人，就欢迎你光临世界产联会堂，而不管你是什么肤色。由此你可以看到，世界产联不是白人的联合会，也不是红色或是黄色人的联合会，而是工人联合会。”它也是第一个接纳华裔美国人的劳工组织。世界产联还在流动工人中进行了广泛而有效的活动，把街头巷尾作为动员工人的场所。[③] 但是由于组织中存在工团主义思潮的影响，加上组织

---

① 见张友伦：《美国社会变革与美国工人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90—292页。

② 杜波斯基：前引书，第101页。

③ 张友伦：前引书，第293—294页。

内部不断分裂，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

体。

〔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曲折发展〕　美国社会党的建立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重要标志性事件。自 1898 年始，德布斯和伯杰成为组织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德布斯被列宁称誉为“美国无产阶级最敬爱的领袖之一”。他们得到反对德里昂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拥护。德布斯团结了美国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在 1901 年建立美国社会党。此后美国社会党的力量和影响在美国日益增长。德布斯参加了 1900 年、1904 年、1912 年和 1920 年的总统选举。1912 年，德布斯参加美国总统竞选获得 89.7011 万张选票。美国社会党严厉批评美国劳联的阶级调和路线。德布斯曾说劳联是被工人贵族控制的工会组织，“我们谈论改革那个处于工人贵族绝对统治下的腐败透顶的劳联，正像把玫瑰油撒在臭水池里一样，白白浪费时间。”[2] 令人遗憾的是 1909 年社会党左右翼开始分化。

美国社会主义者在组织实际活动的同时，还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宣传工作。例如：里维雷特·维尔曾在 1902 年专门出版了一本题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宣传小册子，他在书中强调

剥削……社会主义者要求一个社会的全面变革——变化如此激进以致成为一个社会革命。'革命'这个概念用来描绘最后目标的取得，而非实现目标的手段或策略。"①

五、妇女继续为争取权利而斗争

〔工业化对妇女的影响〕　妇女和妇女运动是20世纪初年美国社会运动潮流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和组成部分。这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改变了美国妇女社会生活条件的必然结果，也是美国妇女对工业化和城市化作出的一种反应。

初步实现了从家庭走向社会的梦想是工业化给妇女带来的最大变化和惠顾。这使她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质的转折。由于工业化进程造成了对大量自由劳动力的需求，这就给妇女参加劳动提供了客观需要；许多家用电器诸如电灯、电熨斗、电烤箱等等的发明和使用，为妇女走出家庭摆脱繁重的家务提供了现实可能；工业化使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家庭生活简化减轻了家务劳动的强度，为妇女参加社会劳动创造了条件。自镀金时代开始，美国妇女参加劳动的比例已经逐年提高，1870 年外出劳动的妇女占整个妇女人数的 15%，1900 年占 21%。1910 年，每千人中有 243 人参加了工作，包括 189.1 万已婚妇女在内。妇女参加劳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得到的回报却是难以想像的不公平和不合理。美国劳工局在 1907 年到 1909 年间对棉纺织厂、绢织厂、服装厂、玻璃制造厂和丝织品制造厂等进行调查，发现在这些行业的女工特别多，但是她们的工资却最低，低廉到只能维持她们的最低生活需求而已。1914 年，大约有一半 16 岁以上

① 《美国年鉴》，第 12 卷，第 496—497 页。

的女工，每周工资仅为6美元多一点。① 在妇女劳动大军中，移民和黑人妇女在家庭佣工和制造业中占有绝对多数。他们大多住在贫民窟和租赁的房屋里，饮食失调，缺乏阳光、新鲜空气和娱乐设备，医疗照顾不够和自来水不清洁等等，因此在妇女和儿童中间出现了像早年边疆时期那种骇人听闻的高死亡率。② 典型的女工是城市中的年轻单身女子，她们不是移民就是移民子女。她们往往和家人住在一起，她们的职业多为家庭佣工，即在雇主和中产阶级家庭帮佣。女工的收入低于男工，往往只能养活自己而已。据统计，一个自给的女工生活费用约为平均每周5.51美元，她们的平均收入为5.68美元。③ 在南方城市中，黑人已婚妇女参加劳动的数量是白人妇女的5倍左右。

工业化也冲击了美国妇女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和思想观念。总体而言，妇女因为参加劳动减少了在经济上对丈夫的依赖，独立性得到提高，所以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利有所增强。因而冲击了家庭婚姻观念和家庭的稳固性，离婚率呈现上升趋势。从1890年的10万分之53上升到1900年的10万分之73，1916年的10万分之112。④ 妇女首先提出离婚的人数日增。工业化时代，美国妇女在服饰上也有了新的追求，劳动妇女和爱好体育活动的女子追求服饰的实用和简便，渐渐改变了过去以高领、紧身、拖地为特征的旧服饰。与婚姻恋爱观相联系的是生育观，据统计在白领阶层的妇女中生育率已有大幅下降。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妇女群体自身的结构也随之发

---

① 哈罗德·福克纳：《追求社会公正：1898—1914》，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31年，第153、154页。

② 杜蒙德：前引书，第44页。

③ 卡尔洪：前引书，第122页。

④ 福克纳：前引书，第168页。

生了变化，逐渐形成了一支中产阶级妇女队伍。一些家境较好的妇女开始摆脱家务的羁绊冲出家庭走上社会，外出劳动或进入学校深造。1910年美国约有8500名妇女进入大学或专科学校学习，约有数十万人参加工作成为教士或职员等等。[①] 中产阶级妇女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平等意识，她们站在妇女运动的前列，发表文章宣传男女平等和争取妇女权利的重要性。20世纪初年美国妇女运动出现新的高涨形势。

〔*妇女运动的高涨*〕　争取男女平等一直是美国妇女运动的目标之一。在1898年美国一些州依然存在男女不平等、歧视妇女的严重现象。例如：美国有7个州法律规定父亲对子女的权威性；6个州仍然规定父亲为一家之首，妻子必须服从丈夫；3个州在法律上采取双重标准：通奸只有在妻子成为冒犯者时才能成为离婚的理由等等，不一而足。[②] 但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何在？美国妇女领袖们对此作出了深刻分析。美国著名妇女运动理论家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在1898年发表的《妇女与经济》中说道："妇女的劳动不仅在内容上受限制，在形式上也一样受到制约。即使允许她们干这做那，她们也只能独自悄悄地进行，所从事的是最原始的手工劳动……"[③] 她认为经济地位不平等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本症结之所在。所以她主张妇女要取得地位最本质的是取得经济独立。美国学者德格勒认为"《妇女与经济》成了20世纪初美国和欧洲妇女运动一本主要读物，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是一位从事妇女事业的主要知识分子。"[④]

女权运动成为美国妇女运动的主流，领导人之一的M·凯里·

---

① 林克、卡顿：《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册，第73页。

② 德格勒：《经济革命的时代：1896—1900》，第172页。

③ 戴安娜·拉维奇编：前引书，第474页。

④ 德格勒：《经济革命的时代：1896—1900》，第172页。

托马斯于1899年成为宾夕法尼亚布林莫尔学院院长。1901年她发表文章《妇女应受不同的高等教育吗?》。她在文中说:“妇女在大学期间应该享有最广泛的教育。这种教育应是不分男女性别的,原因是:一、我相信最好的教育只有一种;二、男女将作为同志、知心朋友、生活伴侣,一道生活,一道工作;三、如果男女在大学里,受到同样的知识训练,拥有同样的道德情操,那么,他们本身卓有成效的幸福生活以及他们后代子女的幸福日子都将有增无减。”[1] 1900年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在合并原来的妇女组织基础上建立起来了,领导人为卡丽·查普曼·卡特。在她的领导下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再现辉煌,1902年她在就职演说中说:“过去,妇女运动的全部努力在于推翻女性在家庭中的隶属地位。这一目的已基本达到。……现在的问题是:作为整体的女性是否应顺从作为整体的男性?能否允许在生活的各个部门享有自治权的女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享有自治权?一个男子支配一个女子是不对的,整个男性支配整个女性也同样不对。”[2]

美国女社会改革家,因在1889年创建赫尔大厦闻名遐迩的简·亚当斯积极支持妇女获得选举权,并且身体力行积极投身社会活动。1910年担任美国全国社会工作者会议的第一任女主席,1915年任国际海牙妇女大会主席。与以前的女权运动不同的是,20世纪初年,在新的领导人带领下美国女权运动更注重斗争策略,注意与其他群众团体的合作,在争取实现妇女选举权的斗争大目标时着重行动而不是停留在口头宣传上,她们举行各类社会活动,包括游行示威、群众集会等等,因而成效显著,最终取得选举权。

---

① 德格勒:《经济革命的时代:1896—1900》,第488页。

② (美)戴安娜·拉维奇编:前引书,第498—499页。

20世纪初美国妇女运动中还有一股值得注意的力量：即妇女节育运动。节制生育是关系妇女切身利益的大事。该运动领导人是被称为“计划生育之母”的美国节制生育运动创始人玛格丽特·桑格，她曾说：“一个妇女不能称自己为自由人，除非她拥有和掌握自己的身体。”1914年她创办《妇女反抗者》（后改为《节制生育评论》)。为了宣传节制生育的重要性，她向人们散发有关小册子和邮寄节育知识材料。她发表过不少有关节育的论著，在《妇女和新人类》一书中，她说：“节育的问题直接产生于妇女挣脱束缚，争取自由的努力。”“是妇女经年累月肩负着怀孕、生育、培养多余子女的重担。……看着畸形、瘦弱、营养不良、劳累过度的孩子，是妇女的心最先、最多、最深地受到刺痛。因为害怕再次怀孕，是她们的爱情生活最先窒息。是她们的自我表现机会因此最先丧失。”① 她不但是节制生育运动的宣传者更是一位实践者。1916年她大胆地在布鲁克林城创建美国第一所节制生育诊所，候诊者人满为患排成长龙。她因此在1917年因“有伤风化”的莫须有罪名被拘禁30天。但她的工作受到妇女的支持和同情，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上取得成果。1921年，桑格夫人创立美国节制生育联盟，并任该组织主席；1927年组织了世界第一次人口会议在日内瓦成功召开。1922年，桑格夫人还到过中国，在上海和北京等地宣传节育。她因而也成了节制生育运动的国际领导人。她创导的节育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全球发生的影响与日俱增。

女工是美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她们除了积极参加行业工人罢工斗争外，还独立进行罢工争取自身权益。1909年3月，美国芝加哥女工举行罢工和游行，得到世界和全国妇女的支持。

① （美）戴安娜·拉维奇编：前引书，第581、583页。

1910年国际妇女代表大会决定将3月8日定为国际妇女节，这是美国妇女斗争的胜利成果。

20世纪初美国妇女运动进入更为有组织的阶段，一系列的妇女组织建立起来并开展了有效的社会活动。1899年成立了全国消费者联盟，领导人为约瑟芬·洛厄尔、佛罗伦斯·凯利和约瑟芬·戈德马克；1901年建立了青年联盟，1903年建立了美国全国妇女工会联盟，推动建立该组织的是玛格丽特·德赖尔·罗宾斯和玛丽·麦克道尔。已有成百万的妇女参加各类妇女俱乐部。

六、少数族裔的抗争

〔印第安人的抗争〕　20世纪初虽然印第安人被认为结束了武装反抗，但是他们的抗争从未停止。原因是印第安人的处境并未真正得到改善。据统计，1890年美国印第安人总数为27万左右，1910年减为22万人。从1901年开始美国印第安人进入一个被认为是美国人的过程。1901年在俄克拉何马保留地的5个部落获美国公民身份。① 1906年美国通过柏克法案修正案，取消了印第安人保留地内的部落制度和土地公有制，使白人进一步夺取保留地内土地成为合法化。1907年保留地的其他印第安人归化入美国籍。虽然在1890年开始，印第安人一般结束了武装反抗白人侵犯的斗争方式，但是印第安人依然常常被剥夺土地，被赶出保留地，公民权利被否定。1900年大约有25万印第安人发现他们即使在保留地生活，他们的生存权也无法得到保障。首先，在保留地里一些印第安人部落因为不习惯那里的单调生活，在疾病和营养不良等因素的侵袭下人口锐减，平原印第安人曾有

① 邓蜀生：《美国与移民》，前引书，第81页。

15万人，但1907年只剩5.3万人。32个部落中有6个已经被消灭。“黑足”部落从1.5万人锐减为5000人。9万多居住在太平洋沿岸西北部的印第安人锐减到1.6万人。[①]

其次，在保留地中，印第安人的权利也经常遭到轻视甚至侵犯。美国新闻记者乔治·凯南于1902年3月29日发表文章题为：“保留地印第安人有授予权吗?”文章揭露了有关印第安人保留地受到侵犯的事实。这是根据政府与苏族印第安人在1868年协议建立的一个印第安人保留地。那里是一片光秃秃的半干旱土地。20年后，即1888年这里的一半土地被白人占有。1902年，这里只有3700名印第安人居住在密西西比河沿岸，他们勤劳、友好和忠诚，在文明进程中取得长足的进步。1901年，芝加哥、密尔沃基和圣保罗铁路公司计划将铁路修筑到保留地东南角的对面。公司企图说服印第安人为公司投资人的利益让出一大块保留地作为牧牛场。在1901年5月3日召开的会议上，印第安人表示拒绝。因为他们已经有1.5万头牛和8000头马，为此他们将需要利用开发保留地的东南部土地。同年5月15日，印第安人事务专员琼斯写信给华盛顿的助理说：“我非常喜欢从保留地得到多余的土地作为牧场。但是没有印第安人的同意，我们无能为力。”但是5个月后，即同年10月9日，这位印第安人事务专员却改变主意，未经印第安人同意竟然答应铁路公司的要求，诱使印第安人签订有利于铁路公司的协议，并在协议中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把印第安人同意的“保留地的未居住地区”改成“保留地的居住地区”，即将印第安人居住的、开发改良好的土地都辟为牧场。这种无理要求激起印第安人的抗议，1902年1月13日，保留地的3位印第安人领袖电告阿肯色州参议员琼斯说：“有400

①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587页。

家庭居住在根据协议建议的界限之内，他们反对签署这样的联合协议。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也一致提出抗议。这样做，我们的农场将被蹂躏和践踏。我们在家乡的建筑和农耕的一切努力将化为乌有。"[1] 抗争终于取得成功。

〔黑人的反抗斗争〕　　20世纪初年，美国黑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斗争，高举黑人运动反抗的旗帜，成为现代黑人解放运动的良好开端。面对19世纪晚期黑人运动中的妥协倾向和布克·华盛顿的温和路线的影响，1903年美国黑人著名学者杜波伊斯出版了《黑人的灵魂》一书，提出黑人斗争的强硬道路，并富有预见地说："20世纪的问题是种族歧视下的肤色界限问题"。在书中，他明确地揭示了美国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两重性，说："一个人总感到自己的双重性——一方面是美国人，另一方面是黑人；两颗灵魂，两种思想，两种无法妥协的抗争，在同一个黑人身躯中两种冲突的理想；只是其自身的顽强毅力才免使自己的身躯被撕得破碎。"他还批评了黑人运动中布克·华盛顿提出的妥协路线。1905年7月11日—13日黑人报纸《卫报》在尼亚加拉召开大会，揭露和抗议黑人在美国社会遭受的迫害和歧视，发起了尼亚加拉运动，杜波伊斯当选为总干事。尼亚加拉运动之原则声明（据说是杜波伊斯起草的）强调了维护黑人的选举权、公民自由、谋生机会、教育权等等权益，严正地宣称："我们认为美国公民中的这一阶级应着重不断地反对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我们还支持反对剥夺我们民权的斗争。只是由于种族或肤色不同而加以歧视，这是野蛮行径，无论习俗、权术和偏见如何使之神圣化，我们全然不管。"声明还指出"将黑人子弟排除在陆军和海

---

① 《美国年鉴》，第14卷，第476—480页。

军训练学校门外，是不公正的。"[1] 尼亚加拉运动持续了4年。在黑人争取权利的斗争中，杜波伊斯特别强调黑人的高等教育问题，1906年他被邀在汉普顿参加会议发表演说，题为“汉普顿概念”，他说，在现代世界中他们这个种族最缺乏的是什么——即他们最需要的，或他们最失败的是什么？他想一些人也许会同意并回答这个问题：有人也许会说是教育，有人会说是财富，一些人会说是耐心，一些人说是能力，特别是组织能力。然而他认为多数回答者也许会理解他所给予的答案：能量。[2] 他不同意黑人仅仅接受一般的普通教育或技术职业教育，而应该接受高等教育，培养黑人自己的人才和领袖。

1908年8月，在林肯的故乡伊利诺伊的斯普林菲尔德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白人迫害黑人的流血事件，激起民愤，震惊全国。在抨击暴力事件过程中，一些正义人士经过筹划于1909年5月31日和6月1日在纽约召开讨论黑人地位大会，约300多人与会，杜波伊斯在会上发言指出黑人的问题在政治上如同经济上一样非常重要。会上建立了美国的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NAACP)，杜波伊斯是该会的创建者之一。其他领导人还有奥斯瓦德·加里森·维拉德（废奴主义者威廉·加里森之孙）、威廉·华林、玛丽·怀特等等。“建立美国有色人种协会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重建以来使黑人权利成为全国改革焦点的第一次重大尝试”。[3] 总之，20世纪初，美国黑人斗争在强硬路线指引下取得了出色成就。

---

① 戴安娜·拉维奇编：前引书，第509页。

② 杜波伊斯：《黑人教育》，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7页。

③ 法兰克·马吉尔编：《历史大事记美国丛书》第3卷，萨尔姆出版公司，新泽西，1975年，第1386页。

社会结构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发生深刻变化。“19世纪和20世纪城市惊人的增长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的历程。世界范围的城市扩展在社会组织和文化的重要模式方面正带来巨大变化。”[1] 有的阶层崛起，有的阶层衰亡，中产阶级壮大，工人阶级队伍扩大；社会流动加速，黑人大迁移，移民掀起高潮，农业人口流向城市，人们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攀升；社会问题加剧，贫富不均，种族歧视，环境污染；群众斗争自下而上连绵不断，工人罢工，社会主义运动曲折发展，妇女争取权利，黑人斗争走向强硬。由下而上的群众斗争汇成推动改革的巨大动力，惟改革才有出路。美国社会面临重大改革，进步主义运动应运而生。

① 麦克、布雷德福：前引书，第5页。

第 四 章

国内资产阶级改革运动——“进步主义运动”的兴起

面对工业化、城市化和垄断资本主义化带来的诸多社会难题，面对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美国民众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与困惑之中。何以心中珍藏的理想与严酷的现实出现了如此强烈的反差？早在19世纪末年，美国的农场主阶层、都市工人阶级以及部分中产阶级人士，就开始提出各种各样的改革要求和主张，有的甚至在一定范围之内将其付诸实践并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社会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社会上要求变革的呼声日趋高涨。19世纪后期改革的涓涓细流，终于在新世纪降临之际，汇集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改革浪潮。这便是美国历史上所谓的“进步主义运动”。

一、“黑幕揭发”的掀起和暴露文学的兴盛

舆论总是改革运动的先导。20世纪初年，“当分散的、无组织的进步主义队伍在美国的各个角落逐渐地汇集时，一种新的新

闻时尚骤然间将进步主义运动带人人们视野的中心，"[1] 这种"新的新闻时尚"便是所谓"黑幕揭发"运动。它的兴起，堪称新闻领域内的一场"革命"。此间，一群号称"黑幕揭发者"的新闻记者和时事评论家，探查美国社会中的阴暗角落，揭露美国社会生活中的耻辱和腐败，大声疾呼人们警惕那些对民主政治前途产生不妙影响的变化，推动了大规模的全国性改革运动的开展。与此同时，文学领域内也涌现出一大批现实主义的、有着丰富思想内容的文学作品，称之为"暴露文学"。

〔"黑幕揭发"运动的兴起〕　20 世纪头十年间，一些正直的、有社会良心的新闻工作者，受职业道德的驱使，拿起自己锐利的笔，专注于揭露美国社会的不平等以及其他各种为人关注的问题，例如 1895 年以后托拉斯惊人的成长，政治上的腐败，劳工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力量的兴起，城市化的罪恶，教育上的失败以及卖淫、种族关系等等。进步主义时代的很多美国人认为，这些问题对于美国自由政府的存续构成一个潜在的威胁，除非充分地唤醒民众发动一场针对这些问题的改革。新闻领域内的黑幕揭发者所做的实际上就是这方面的舆论动员工作。

黑幕揭发者继承了 19 世纪 80、90 年代《麦克卢尔》、《芒西》和《世界主义者》等大众杂志形成的传统。多年来，《论坛》、《竞技场》、《麦克卢尔》甚至稳重的《大西洋月刊》这样的杂志，一直刊登描述各种各样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弊端的文章。亨利·劳埃德在《大西洋月刊》上对准美孚石油公司所放的第一炮，可以远溯到 1881 年。诸如亨利·乔治、尤金·德布斯这样的激进分子，早在 90 年代初就在《竞技场》上讨论各种问题。乔西亚·夫莱恩特 1900 年在《麦克卢尔》上暴露了罪犯与纽约警察

① 约翰·格拉蒂：《1865 年以来的美利坚民族》，纽约，1966 年，第 230 页。

之间的腐败关系。这类文学的节奏和力度稳步增长。直至1902年秋，《麦克卢尔》开始刊登三篇极具影响力的连载文章，其一是爱达·塔贝尔关于美孚石油公司的文章，其二是林肯·斯蒂芬斯有关都市政治机器的作品，其三是雷·斯坦纳德·贝克的文章。

《麦克卢尔》杂志的创始人麦克卢尔“是一位热情奔放但有点古怪的爱尔兰人”，具有经营头脑，善于捕捉新思想和读者。他了解到公众对于铁路和工业联合体扩张的激动心情，逐渐产生办廉价刊物的新颖想法，决定刊登具有当时经济和社会重要性的文章。1896年，他让年轻的属下爱达·塔贝尔写一部美孚石油公司的历史，并计划下一年2月份开始连载。结果塔贝尔小姐整整花了5年时间从事艰巨的研究和写作，完成了《美孚石油公司史》，并于1902年11月起在《麦克卢尔》上刊登，连载15个月，轰动全国。

塔贝尔的作品以冷静客观见长，她的《美孚石油公司史》注重事实，将洛克菲勒及其同伙建立石油垄断的种种手段揭露得淋漓尽致。她对洛克菲勒手法的谴责令很多美国人大为震惊，同时也令很多人高兴不已。洛克菲勒是“自我造就者”的缩影以及自由企业体制的国家象征，塔贝尔关于他的公司的起源以及惯用的集聚财富的手法的揭露，引起很多深思的美国人对美国自由企业体制的利弊进行重新审视。1904年，她的文章结集出版。

在1903年1月号的社论里，麦克卢尔声称“美国人品行”的某些方面出了大问题，因为刊登的这些文章表明，大量的美国雇主、工人和政治家实质上都是不道德的。更为严重的是，律师成了大企业的工具，法官允许作恶的人逃避正义，教会变成物质至上，学院甚至无法理解社会正在发生什么。这篇社论写道：

“已经阅读过本期杂志的人中有多少人注意到它里面包含有三篇关于同一主题的文章？我们并非刻意地将它们放到一起。1

月号的《麦克卢尔》对美国人这样地加以责难以致我们每一个人停下来深思，纯属巧合。有多少人注意到这点了呢？

标题文章‘明尼阿波利斯的耻辱’或许更应该称之为‘美国人对法律的蔑视’。那一标题用于本期塔贝尔小姐‘美孚石油公司史’的篇章也会很合适。将之用于贝克先生的‘工作的权利’将太完美了。总之，这些文章已差不多反映出我们的这种危险特性是多么的普遍。塔贝尔小姐讲述了我们的资本家如何依据法律，深思熟虑地、精明地图谋打破限制他们的法律，以及滥用它去限制其他和他们一样的人。贝克先生让人们看到，劳工——资本的古老敌人以及托拉斯违法行为的主要抱怨者，本身在犯罪并为自己作辩解。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耻辱’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市政府如何利用罪犯犯罪来为选任官谋取利益，而公民们——有着良好血统和一般教养之上的美国人以及诚实的、健康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却自满地站在一旁，未能为之警觉。

资本家、工人、政治家、公民——全都在违法，或是听凭法律遭到侵犯。还有谁剩下来坚守法律呢？律师吗？这个国家里的一些最出色的律师确实被雇佣，但不是进入法庭去替案子辩护，而是在为公司和商号出谋划策，看如何能够在没有冒太大惩处危险的情况下钻法律的空子。法官吗？他们中太多的人如此尊重法律，以致于由于某些‘错误’或模棱两可的措辞，他们就退居办公室，成为自由人……。教会呢？……

已经没有剩下什么人了，除了我们。资本（由于劳工的违法行为而义愤填膺）正在得知自己的对头对法律的蔑视是对财产的威胁。劳工已经尖声地喊出自己的信念：资本的非法权力是对工人的一个威胁。这两者越来越接近。去年 11 月，当以芝加哥为中心的铁路运输工人威胁着要罢工的时候，他们走到了一起，通过提高工资解决了问题，同时也提高了运费。他们让公众掏腰

包。我们都在干坏事，都在让公众掏腰包。公众就是人民。

我们忘记了我们都是人民；当我们每个人将今天的账单推给别人时，债务仅仅是延期偿付，别人正在将其推还给我们。我们最终将不得不付出，我们当中每个人概不例外。而且最终的债务总数将是我们的自由。"①

在社论的结尾，麦克卢尔呼吁"人民"发起对恶行的道德远征。杂志一出版，很快销售一空。通过阅读它所刊载的文章，"成千上万的读者发现自己含糊的忧虑被提出来了，一些人积极地投身于各种进步主义运动之中，更多的人消极地表示支持。"②

《麦克卢尔》杂志总编辑林肯·斯蒂芬斯（1866—1936年）堪称20世纪最优秀的记者之一，他为密苏里州圣路易市的党魁政治所吸引，开始了城市黑幕揭发的非凡经历。他第一篇重要揭露文章"圣路易市特威德统治的日子里"出现于1902年10月号上。1902—1903年间，他先后调查了圣路易、明尼阿波利斯、匹兹堡、费城、芝加哥和纽约等地的政治状况，所见所闻令他眼界大开，所发现的政治腐败现象之普遍，程度之深之广，令他吃惊不已。他将这一切发现，公诸于《麦克卢尔》杂志，并得出结论性的看法："城市的腐败主要是由于人们驰废的道德引起的。"③文章发表后，他的知名度大增，某些地方政客也因为文章所揭发出的真相而忧心忡忡。1904年，这些揭露城市腐败的系列文章汇编成册出版，名为《城市之羞》。

斯蒂芬斯接着致力于揭露密苏里州、罗得岛州的政治腐败，其成果于1905—1906年在《麦克卢尔》上连载，并于1906年汇

---

① 《美国年鉴》，第12卷，第533—534页。

② 约翰·格拉蒂：前引书，第231页。

③ 里查德·E·马歇尔、约翰·E·威尔兹：《从进步主义时代到常态》，J. B. 里平科特公司，费城和纽约，1973年，第9页。

编成书出版，名为《争取自治的斗争》。在揭露了两个州之后，斯蒂芬斯又将注意力转向联邦政府，目标对准那些具有新英格兰血统的“WASP”领袖们的腐败。

《麦克卢尔》杂志第三个重要的黑幕揭发者雷·斯坦纳德·贝克，着力从事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调查，其笔触先后指向了1903—1904年的科罗拉多煤矿大罢工、铁路公司的不法行为以及当时南北方盛行的白人种族主义。他的《铁路公司受审判》对铁路进行了有力的控诉，既有学术价值，又有说服力，推动了罗斯福总统插手扩大州际贸易委员会权力的斗争。

除此之外，《麦克卢尔》还拥有其他一些出色记者。伯顿·亨德里克1906年公布了纽约各保险公司的腐化堕落和管理不善的揭发材料。乔治·特纳1909年揭露了中西部城市芝加哥的警察与有组织的卖淫业相勾结的黑幕，引起有关部门的极大关注。为此而专门成立的罪恶调查委员会经过一番深入调查之后，于1911年提出了一份非常著名的调查报告。

《麦克卢尔》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刹那间便成为一份畅销杂志，月发行量达到25万册以上。其他杂志也争相仿效。《科利尔》杂志揭露了专卖药物的骗局和“黄色报人”威廉·赫斯特的诡计，《人人》杂志揭发了牛肉托拉斯的垄断，也都同样引起人们的关注。

1903—1909年间，黑幕揭发活动日益兴隆，触及美国生活的每个阴暗角落，揭发题材涵盖政府、劳工、工会、大企业、华尔街、健康医疗、食品工业、童工、女权、贫民窟生活、人寿保险、药品业、学院运动员、卖淫、血汗工厂、政治腐败等等方面。这些黑幕揭发文章总体上建构在事实之上，格调上充满了义愤，主要诉诸公众的良心，同时它也包含一定的“煽情”成份，某些杂志一味地迎合公众对丑闻的爱好，片面地投好中产阶级阅

读的口味。所以，有历史学家指出：黑幕揭发作家中，“很多人是活跃的改革家，另一些仅仅是接受了任务的诚实的新闻记者，还有一些人则是利用流行时尚的玩世不恭的雇佣文人。”[①]

玩世不恭的文人中有一类便是所谓的“黄色”黑幕揭发作家或出版商。这些不正派的出版商和作家利用黑幕揭发，作为生财之道。第一个黄色黑幕揭发作家是托马斯·劳森，他在1905年刊登于《人人》杂志上的连载文章《疯狂的金融》，揭发了高度发展的金融业这个怪物的内幕，但对金融腐化的揭发过分渲染、高度夸张。但文章产生的影响巨大，使得《人人》杂志的发行额一年内就由15万份猛增至75万份以上，同时也加强了公众控制股票市场的要求，这种要求最终促成了1913年普乔委员会的成立和立法调查活动的开展。另一个例子是“黄色报人”威廉·赫斯特。1906年，他宣称他的《世界主义者》杂志即将发表所有揭发文章中“最为强悍有力的”揭发文章。事实上，他即将炮制的由小说家戴维·菲利普斯执笔的名为《参议院的背叛》的连载文章，“是把真实、虚构和彻头彻尾的撒谎结合起来了”。

正是由于某些黑幕揭发作家作品的这种“过分渲染”和“扭曲事实”，激起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产生厌烦心理。在1906年的一次演说中，罗斯福对专门以社会黑幕为题材的新闻记者和作家横加指责，将他们比作约翰·班扬的小说《天路历程》中“拿着粪耙的人”。他不客气地说：“在班扬的《天路历程》中，你们可以回想起对那个拿着粪耙的人的描写。那个人从不看方向，只是手持粪耙低头朝下。人们拿神圣的皇冠换他的粪耙，但是他既不抬头也不看一眼递过去的皇冠，只知道一个劲地耙地上的脏东西。”“黑幕揭发者”原意为“耙粪者（Muckraker)”，本来是罗斯

① 约翰·格拉蒂：前引书，第231页。

福送给那些专门揭发社会黑暗的人的一个带有侮辱性的恶名，然而却被他们心安理得地接了过去。从此，该名称与黑幕揭发文章一起广为传播。

20世纪初黑幕揭发运动的兴起，也大大得益于技术上的进步。由于印刷技术的突破，报刊的印刷成本大幅度降低，刊物的零售价大幅度下降，平均由35美分降低至10美分，从而拓宽了市场。而报刊发行量的扩大，又使得这种传媒作为社会变革工具的重要性大大增强。总之，廉价刊物给黑幕揭发者提供了舆论宣传工具，这种宣传推动了社会变革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虽然黑幕揭发者并非进步运动的创始者，他们只不过是“美国社会一场更大运动（即进步主义）中的新闻工作者的一种声音”，[①] 但是，他们的加入及其活动，“激发起中产阶级的义愤，有助于促使进步运动成为一场全国的起义，而不是一系列零散的战斗。”[②]

〔暴露文学的兴盛〕　几乎与黑幕揭发开展的同时，一种献身于改革事业的暴露文学创作在90年代蓬勃兴起。

暴露文学始于70年代后期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1879年）的问世；随着80年代后期爱德华·贝拉米的空想社会主义小说《回顾》（1888年）的发表而具有声势；到90年代中期前后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尖锐抨击美孚石油托拉斯的《与共和国抗衡的财富》（1894年）而臻于成熟。此后，美国报刊上指责和揭露蔚然成风。

如同黑幕揭发运动的兴盛一样，暴露文学的兴起，也是中产阶级美国人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产物，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良知觉

① 罗伯特·戴维尼等：《美国今昔》，斯科特和福雷斯曼公司，伊利诺斯州，1986年，第355页。

② 阿瑟·林克等著，刘绪贻等译：《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上），第76页。

醒的结果。20世纪初年，美国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已经非常突出，受过良好教育、往往具有正直心的作家便以其现实主义的笔调，对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弊端进行坦率的再现和暴露，甚至作无情的鞭挞和针砭。暴露文学的兴起，也与1900年以后美国文学创作中自然主义的价值取向相一致。自然主义流派强调，必须像生物学家研究动物世界那样研究人性，并且不用同情的眼光也不用道德的标准去描绘纯粹的自然现象。

著名作家西奥多·德莱塞、弗兰克·诺里斯、厄普顿·辛克莱和杰克·伦敦等都是著名的现实主义暴露文学的代表。这些人的作品格调清新，视野广阔，主题广泛：或展现生活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微薄者、朝不保夕者、希望渺茫和生活呆板的人们的活生生的人间悲剧，或描绘处于深渊之中的下层人们的反抗和仇恨；或揭示金融家、巨头等大人物的发迹和胡作非为，或谴责触角无处不到的大企业大公司；或揭露党魁的专横、政党的肮脏，或批评政治制度的腐败；或从经济问题落墨，或专注于社会问题。总之，他们战斗的笔，辅之以自然主义的手法，从不同侧面和视角，触及美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主要领域和方面，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阴暗面、丑恶现象及其腐朽本质暴露无遗。在尖锐揭发之余，有的激进作家甚至呼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社会贫困一向是暴露文学作家着力耕耘的一块领地。早在1882年，作家、编辑、家庭经济学家海伦·斯图亚特·坎普尔（1839—1918年）就在关于纽约贫民窟的著作《穷人的难题》中对其有所揭露。同时她还给《论坛报》撰稿，后来结集为《穷困的囚徒》（1887年）出版。1890年，“美国梦”破灭了的丹麦移民雅各布·里斯发表《另一半人如何生活》，真实地描绘了城市贫民窟中的日常生活，其散文体和照片激发起美国人的良知。此

外，还有：罗伯特·亨特的《贫困》（1904 年）、约翰·斯帕哥的《儿童的痛苦哭声》（1906 年）、沃尔特·劳申布什的《基督教与社会危机》（1907 年）以及佛罗伦斯·凯利的《失业》（1915 年）。这些著述，使得很多人很难再相信：肮脏和饥饿是加给懒惰者和道德品行上有缺陷的人的神圣惩罚。揭发富豪统治集团的作家中，最多产的是社会主义者古斯塔夫斯·迈尔斯。为弄清美国的巨大财富是如何积累起来的，他进行了深入研究，出版了 3 卷本的《美国富豪史》（1909—1910 年），进一步证实了人们一向的指控：美国的巨大财富是靠掠夺和预先占有自然资源而形成的。

随着暴露文学的兴盛，涌现出一大批知名的写实主义作家，自然主义文学大师西奥多·德莱塞便是其中之一。德莱塞的父亲是来自欧洲的移民，生活极其艰难，德莱塞就是在贫困的家境之中长大成人的。他的代表作之一《嘉莉妹妹》描述了小人物如何不由自主地随波逐流的悲惨命运。在谈及 1901 年发表的《嘉莉妹妹》时，他说它"并非被设想成一部文学艺术师的巨著，而是一幅时代画卷。"[①] 他在生物学中找到了探索真理的答案，揭示出：人是受本能驱使的动物，在不具人格的宇宙中为生存而斗争；在为财富、权力和欲望的满足而奋斗的过程中，人恢复了真正的动物本性；社会势力是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并驱使不能公开反抗社会习俗的弱者去犯罪和采取暴力行动。1911 年他又发表了《嘉莉妹妹》的姊妹篇《珍妮姑娘》。他的"欲望三部曲"中的前两部——《金融家》（1912 年）和《巨人》（1914 年）是有影响的社会经济研究著作。两书取材于 19 世纪 90 年代芝加哥公共运输业巨头查尔斯·耶基斯的经历，描绘了人为了拼命地追

① 查尔斯·M·多纳：《美国：变动的时代》，纽约，威利出版社，1979 年，第 731 页。

求成功，如何滥用价值，如何常常导致暴力犯罪。

南太平洋铁路是弗兰克·诺里斯的小说《章鱼》（1901 年）的主题。作为描写有关小麦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未完成的三部曲的第一部，该书展示了南太平洋铁路如何控制加利福尼亚州政治、如何扼杀麦农。三部曲的第二部《深渊》（1903 年）描述了一家垄断性的铁路公司操纵小麦市场的企图及努力。戴维·格雷厄姆·菲利普斯在《天晓得的成功》（1901 年）和《第二代》（1907 年）中，发掘了金钱的腐蚀力这一主题；另外一本著作《苏珊·伦诺克斯的沉浮》（1917 年）则剖析了驱使一个农村姑娘在城市卖淫的社会势力。罗伯特·赫里克的《一个美国公民的回忆录》（1905 年）和《克拉克的战场》（1914 年），深刻描绘了在一个贪得无厌的社会中富豪的飞黄腾达。

另一些暴露文学作品尖锐地批判了美国民主政治的缺陷。罗伯特·亨特的《贫困》（1904 年）和本·林赛的《野兽》（1910 年），控诉了资本主义使贪婪、剥削、贫困和腐败不可避免。社会党领袖兼作家约翰·斯帕哥在《儿童的痛苦哭声》（1906 年）中，愤怒控诉吞噬儿童的资本主义制度，呼吁对童工状况进行改革。

社会主义批评家中最有影响的是厄普顿·辛克莱（1878—1968 年），他“毕生致力于对美国社会弊端的攻击，同时寻觅人道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改革”。[①] 其最重要的著作《屠宰场》（1906 年），通过讲述在芝加哥屠宰加工厂工作的一位立陶宛移民的故事，对带给广大人民群众以饥饿和不幸的经济制度进行了动人的控诉，呼吁实现社会主义。作品对芝加哥肉类加工、包装业中的状况尤其是对屠宰场污秽环境的暴露描写，激起民众极大

① 里查德·E·马歇尔、约翰·E·威尔兹：前引书，第 11 页。

的关注，最终导致罗斯福总统设立专门委员会对其进行调查，成为促进1906年肉食检查法通过的一个有力推动因素。卡尔·桑德堡的诗歌谴责了牲畜围场和钢铁厂内的非人道性。另一个社会主义作家杰克·伦敦，无疑是他那个时代最猛烈的文学上的激进派。《深渊中的人》（1903年）描述贫困，《铁蹄》（1907年）描绘了所谓最糟糕的资本主义制度；《阶级战争》（1905年）和《革命》（1910年）断言工人阶级必将取得最后胜利。

20世纪头10年，政治小说家对美国制度的批评虽然较温和，但更加多产。亨利·刘易斯的《老板》（1903年）是根据坦慕尼协会的"党魁"理查德·克罗克的经历写成的。埃利奥特·弗劳尔的《政党分赃制的赞助人》（1903年）描绘了政治腐败行为。布兰德·惠特洛克根据自己在俄亥俄州托莱多政府任职的经历，写成《第十三选区》（1902年）和《均势的转变》（1907年），是暴露文学中两部有影响的作品。布思·塔金顿的《印第安纳州来的绅士》（1899年）、《竞争场里》（1905年）及其他小说，主要描写州政治生活为铁路公司和企业界所腐蚀的现象。

新罕布什尔州的温斯顿·丘吉尔是最受欢迎的政治性暴露文学作家，他的《科尼斯坦》（1906年）和《克鲁先生的经历》（1908年）始终贯穿着一个信念，即只要坚强质朴的人民清除坏蛋，选贤任能，美国政治就会更新。为此他不遗余力地揭露政治腐败，他的作品也成了畅销书，销售高达几十万册。和一些作品失之肤浅的作家不同，戴维·格雷厄姆·菲利普斯的《李树》（1905年）试图揭露美国各地的腐化和特权现象，表现出一定的深度。

反对现状的文学家，对进步运动都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其写作的主题涵盖面广，包括童工问题、动用州军队镇压罢工、政治腐败、美国社会的阴暗面等等；其作品广为阅读，尤其是中产

阶级美国人。通过这些作品，暴露文学家唤醒了人们的良知，使得人们坚信：只要举国一致努力，一个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诚实政府一定能够实现。

二、进步主义思潮的形成

社会大变动在带来物质的、有形的变化的同时，最终也将不可避免地触及深层次的思想领域。19世纪下半叶，美国人的传统信仰——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放任思潮日益显现出其保守特性，并因不断受到挑战而走向没落；相应地，强调政府对无序经济行为实行宏观管理与干预，对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的整体发展进行协调与规划的进步主义思潮日渐形成。如果说黑幕揭发运动和暴露文学的兴起，为进步主义改革起了舆论动员作用的话，那么，进步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壮大，则为大规模的社会改革扫清了思想障碍，提供了思想武器。

〔保守思潮——自由放任主义趋向衰落〕　19世纪中叶以前，美国人奉行的哲学是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放任主义，具体表现为：强调政府不应干涉人们的生活，强调个人权利和人身自由的不受侵犯，提倡个人主义和自由企业，经济领域内则表现为经济个人主义，反对政府干预。这种哲学，以美国传统的个人主义信仰为基础，以古典经济法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其理论依据。

美国的个人主义传统源于英国，由移民将其引入北美大陆，随后在北美独特的土壤里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早在“杰克逊时代”，它就取得了国家信条的地位，甚至从美国独立起，“个人主义、对企业的热爱以及对个人自由的荣耀，就一直被美国人看作

不仅是他们的最佳选择，而且是他们独自拥有的财产”。[1] 美国人思想文化中的这种强调个体、自由和权利的自由主义传统，与源源而入的广大移民的积极进取精神相对应，对于推动北美大陆的大规模开发和美国的迅速崛起，曾经起到了有益的、值得肯定的作用。

古典经济学强调：惟有允许人们不受政府限制措施的掣肘，也不得助于政府的恩惠，自由地去追求自身的利益，才有可能实现最高的社会福祉。该学派的经济学家据此阐发出一系列的理论。所谓“财富的福音”，接受了古典经济学的推论，同时尽力为工业巨头的领导地位寻找道德和社会的根据。此说争辩说，成功以及财富的获得，是勤俭、节约和才智的正当回报，人类的芸芸众生之所以贫困，是由于其自身的懒惰以及天生的弱智。政府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维护秩序、保护财产；控制经济的事务，应该留给那些在竞争中取得了领导地位的天然贵族。另一方面，这些天生贵族对于社会负有大量义务，因为他们是国民财富的保护者。

南北战争以后，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传入美国，加剧了美国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同时也为其涂上了一层冠冕堂皇的理论保护色。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所揭示的物种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英国社会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却牵强地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法则运用于人类社会，认为人类社会如同动物界一样，通过适应环境缓慢地进化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仅仅是自然界的规律，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这种庸俗的社会观——即所谓社

---

① 詹姆斯·布赖斯：《美利坚共和国》，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12 年，第 590－591 页。罗伯特·凯利：《美国过去的塑造》，第 2 卷，新泽西，1986 年，第 416 页。

会达尔文主义起初影响并不大，倒是传人美国后立即赢得了广大的市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的主要阐释者和鼓吹者是耶鲁大学的知名教授、颇有影响的哲学家威廉·萨姆纳。由于他的努力，社会达尔文主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成为19世纪最后30余年间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哲学。

作为一种庸俗哲学，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于社会、现状、个人主义价值观和国家职能等问题有一套系统完整的解释。首先，它认为，人类社会自然地进化着，竞争、毁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社会藉此而前进。对现存制度的任何干预只会阻碍进步。在一个根据适者生存原则运行的自由社会里，权力会自然地流向最有才能者手中，财产的拥有和获得是神圣权利，“文明依赖于这种体制”。[①] 其次，它认为，进步源于自然进化，取决于自由竞争。“文明的进步依赖于选择的进程，选择的进程又有赖于不受限制的竞争的进行。竞争是一种自然的法则，这种法则就像地心引力一样无法摆脱或废除。”[②] 第三，国家应该只限于从事保护财产和维持秩序的治安活动；若国家干预经济事务，势必会破坏自然选择的有益影响。贫民窟和贫困是竞争带来的不幸，然而是不可避免的消极后果，由国家出面干涉来消灭贫民窟和贫困是方向性的错误。[③] 贸易有某些天然法则，运用这些法则将会给个人和社会带来最大的福利。自由竞争是经济生活的伟大调整器，它保证适者生存、劣者淘汰。干预竞争法则就是家长式统治或社会主义，它使得人类进步的冲动受到压制。因此，理想的政府就是这样一个政府，它只实行最低限度的

---

① 玛莉·诺顿等：《民族和国家：美国历史》，米夫林公司，1982年，第478页。

②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纽约，1959年，第57页。

③ J. 布鲁姆等：《美国的历程》下（一），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55页。

政治控制，对个人则给予最大的机会。[①]

显然，这是一种保守的哲学。它提倡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政府的任何干预；它主张严格限制政府权力，敌视行政管理；它维护现状，否认人有意识地改变目前环境的能力，阻碍任何可能的社会变革。这种维护现状的传统保守思想，不遗余力地为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和大企业的统治辩护，鼓吹宪法是富于“灵感”的文件，最高法院是“神判”的解释者，铁路建筑者、金融家和工业巨头对国家的进步有功。然而，正是这种哲学，成为“南北战争后一个时期内不断上升的资本家的一种度身定制的哲学”[②]，得到了垄断资本家的极力拥护。到1900年，这些观念在一般公众心中也同样根深蒂固，几乎成了美国人的信条。大工业家、大金融家和大企业主们，总是乐于运用这种哲学来证明19世纪末年至20世纪初美国空前剧烈的竞争、大规模的企业合并或者巨额财富积累的合理性、必要性与必然性，将其作为存在的“护身符”。于是，在“社会进步”的名义下，经济领域内的战争、贫困、剥削以及苦难，所有这一切都成了名正言顺的事情。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南北战争后美国的泛滥，离不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由于“美国是一个从未经历过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年轻的国家”，[③] 由于美国的主权基础“并不是在愚昧和迷信的暗淡时代奠定起来的，而是在一个新的时代里奠定起来的”，[④] 因此，较之其他国家，美国人民享有较多的个人自由，具有较强的自信心。同时，美国又是一个

① 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1865—1917》，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5页。

② 哈罗德·U·福克纳：《政治、改革与扩张，1890—1900》，纽约，哈珀和罗出版公司，1959年，第1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8页。

④ 菲利普·方纳编：《华盛顿文选》，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56页。

移民国家，将新教伦理和拓荒精神集于一身的移民们，在富于流动性的开拓丛林和荒原的生计中，把自己的贫富荣辱系于个人的勤俭、勇敢、机智和冒险精神之中，由此使得一般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和个人奋斗精神表现得更为突出。正因为此，个人主义在19世纪初就确立了国家信条的地位。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工业的繁荣、经济的发展、边疆的消逝、城市的崛起、国力的猛增，使得美国人的乐观主义达到极点，人们充满了信心。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使得刚刚摆脱内战苦难的美国人坚信："一个连接两洋，殷实富庶、联系紧密的崭新美利坚已经奇迹般地出现"。[①] 总之，美国独特的历史传统和自由竞争得到充分发展的现实，造就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广泛传播、迅速扎根的良好土壤。

〔*反传统的新社会思潮的形成*〕　任何社会变革，都离不开思想观念的革命；要想破除改革的障碍，首先必须抨击、摧毁上述保守思想，必须使得人民相信改革和公共管理措施的有效。实际上，19世纪后期起，主张劳工立法的人，社会正义措施的拥护者，新社会学的法理学的解释者，宣讲基督教救世教义的福音派领袖，力主像从个人角度一样来从社会角度看待恶行的社会学家们，都在朝这方面努力，都试图用经济与社会事实为实现积极的政府管理打下基础。

伴随着南北战争后的政治、工业和农业革命，深思的人们对于政府及其在人类事务中应起的作用的态度也逐渐发生深刻变化。惊人的工业化引起的社会状况、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惊人不平等，逐渐摧毁了美国早期个人主义和平等信仰的基础。许多知识分子开始抛弃抽象的、形式主义的一成不变的教条，对解释一切

---

① 罗伯特·威尔伯：《寻求秩序：1877—1920》，纽约，希尔和王出版公司，1967年，第11页。

行为的自然法则提出疑问。80年代中叶起，一批年轻的受过专业训练的学者开始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自由放任哲学提出挑战，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乃至哲学、法学和史学等领域，提出了反传统的进步主义思想。

社会学领域内，以莱斯特·沃德和 E. A·罗斯为首的社会学家对“斯宾塞—萨姆纳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解释进行了全面否定。首先，两人反对将进化论运用于社会和经济关系中。沃德论述道：“事实上，除了极有限的意义外，人类与社会并不受那控制其他动物世界的动力法则的影响，……如果我们说生物的进程是自然的，那么我们必须将社会的进程视作人为的。生物学的基本原理是自然选择，而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则是人为的选择。”[1]继之，沃德对社会理论中的自然法则加以攻击。在《动力社会学》（1883年）一书中，他指出：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而不是自然法则，是文明向前迈进的原因所在；统一而协调的活动（即有计划的和政府的干预）才是达到和睦幸福的最进步手段。[2] 在此基础上，沃德对放任主义进行了严厉批评：“如果自然藉着弱者的灭亡而进步，人类就应该是藉着保护弱者而得到发展。”[3] 在他看来，政府干预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个人自由只能通过社会调节来实现”；立法也不过是一项发明，与无数发明中的任何别的发明一样，都是人用以战胜自然的手段，立法乃是“社会集体智慧科学地控制各种社会力量以造福于社会的一种机制”。[4] 虽然沃德的同代人中鲜有人听说过他的名字，但

---

①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第79页。

② 玛莉·诺顿等：前引书，第479页。

③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第79页。

④ H.S.康马杰：《美国精神》，中译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312—313页。

是他在一大群年轻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中的影响，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个美国人。

经济学领域内，理查德·伊利和约翰·康蒙斯等联合发难，对古典经济学的正统主义、教条主义以及对自由放任主义的盲目信仰进行了严厉抨击。1885年夏，这些曾经留学德国或就读于霍普金斯大学的年轻经济学家集会于纽约州的萨拉托加，成立美国经济学会。“学会”发表的宣言谴责自由放任原则“政治上的危险性”和“伦理上的不健全”，声称“国家作为一个代理机构，它的有效帮助是人类进步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①]；“变动中的经济形势必须有不断变化的进步主义立法与之相适应”；经济学科的最高成就不在于“揣测推想，而是在于对人类经济生活情况作历史的和计量的研究”[②]。以之为指导，学者们开始对经济生活中的实际状况进行探索，开始研究公司的行为、市场的运行、金融活动、银行体制、劳工调解等等。

1887年，经济学会创始人之一的亨利·亚当斯发表《自由放任的限度》一文，认为垄断企业的产生不可避免，而且对社会生产有利，但必须将其置于国家的控制监督之下。文章指出：“人们并不抱怨垄断的存在，因为他们认识到垄断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人们对滥用垄断带来的特权及不寻常的权力去谋求个人私利而不是服务于它的崇高目的感到不满”，因此，“应当保证社会能够抑制那些用于个人私利的独断特权，而同时也应当保护集中的组织所带来的好处”。

反传统的经济学家、社会批评家索尔斯坦·维布伦将经济法

---

①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第147页。

② 阿瑟·林克：《美利坚时代：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史》，纽约，诺夫出版公司，1955年，第15页。

则视为人类贪婪的面具，其著《有闲阶级论》（1899 年）和《商业企业的理论》（1904 年）分析了商人阶层的“掠夺性财富”和“显形消费”，对工业巨头是“最适者”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攻击，指出商人阶级的居心和习惯基本上具有掠夺性。在著作中，他具体区分了商业和工业，发现惟有工业能造福于社会，因为它不像商业，关心的不仅仅是利润。工业制造出产品，商业仅仅销售产品。但是，维布伦对所有的大企业表示怀疑并进行了控诉。他的《技巧的本能》（1914 年）揭示了天生的创造欲是如何在毫无人性的垄断企业氛围中被挫败了。虽然维布伦的著作读者有限，但连同其他作品一起，“为进步主义改革的发动提供了论证、理论和技巧”①。

律师爱德华·贝拉米生长于新英格兰西部工业地区，对工业状况下社会的弊端多有了解。1887 年写成的乌托邦小说《回顾，公元 2000—1887 年》，对现存社会秩序和资本主义的弊端进行了批评，对未来的社会制度作了展望。他梦想一种合作制社会，在那里，贫困、贪婪、犯罪不复存在。他还认为，把生产事业交给不负责任的个人经营，造成了极大浪费，造成贫富悬殊的现象，而财富和贫困达到极点就会产生灾难。避免灾难的补救方法是通过和平的道路进行社会改革，实现充分的国有化，以“兄弟般的合作原则”代替邪恶的竞争和破坏性的垄断。于是，他设想了一种新的“国家主义”体制。在此体制下，政府拥有并掌握生产和分配的手段，工业实行国有，整个社会组成劳动大军，个人主义的竞争原则被抛弃，合作是新秩序的秘密，分发生活必需品的大百货商店取代了林立的竞争性商铺，信用卡代替了货币。这种主张对渴望财富的广泛分配的中产阶级很有吸引力，激发了许多主

① 查尔斯·M·多纳：前引书，第 730 页。

张公用事业国有化的国家主义俱乐部的形成。贝拉米也由此一夜之间成了全国闻名的改革家。

哲学领域内，由于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和教育学家约翰·杜威等人的努力，美国的哲学思想摆脱了爱默生的乐观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僵化教条的束缚，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实用主义哲学体系。这种新哲学重行动胜过逻辑，重实践胜过理论，重研究创新胜过墨守成规，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套新的方法论，有助于摆脱古典经济法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等教条主义的理论框框，为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提供良策。他们的作品促成的实用主义方法，使得美国知识分子确信：国家问题可以通过直接的、实际的方式加以批评攻击和解决；是社会而非自然产生了这些问题，社会能够加以纠正。

非难自由放任主义的进步哲学家们，还找到了自己的先知——亨利·乔治。早在1879年，乔治就在《进步与贫困》一书中对传统的贫困观（即马尔萨斯的理论）提出有力挑战。书中写道："当今这个世纪以财富生产能力的惊人增长而著称……人们很自然地去期望、过去也一直这样期望着……真正的贫困将成为昔日的一桩事情"，然而，事实并非如是，相反，"富裕阶层越来越富有；贫困阶层越来越具有依赖性。"① 亨利认为，贫困是一种社会罪恶，土地垄断是万恶之源，"地租吞噬了全部的利益，因此，贫困伴随着进步。"乔治将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弊端统统归咎于土地垄断，主张废除一切租税，单独征收地价税，即"土地单一税"，这是一种庸俗的经济学主张，但他对贫困问题的揭露以及坚信人类通过集体的政治行动能够改造社会的信念却深得人心。因为他反反复复地强调，通过经济和社会改进，能够带

① 罗伯特·戴维尼等：前引书，第317页。

来一个美好的未来。

作为“镀金时代”有影响的民主哲学家，乔治成为南北战争之前时期的改革运动和20世纪进步主义运动的主要联结点。《进步与贫困》问世不久就有了多种译本，据估计到1905年发行量已高达200万册。有人认为，除马克思以外，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的著述能像亨利·乔治那样轰动全球。在不少地方，乔治成了“人们多年来一直追寻的预言家和政治经济学及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哥伦布”。[①] 在美国，乔治也拥有大批信徒，1886年他竞选纽约市长时一举夺得6.8万张选票。

乔治的言论激励了一大批追随者。俄亥俄州阿什塔布拉年轻的乡村律师克拉伦斯·达罗是其中之一。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不同，达罗坚信，罪犯是由于“人类生活的不公正状况”而造成的，而不是天生的。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前往芝加哥，此后40余年间一直致力于推动人们相信贫困是犯罪之根源。

〔*克罗利的新政治哲学*〕　对自由放任主义、敌视政府管理进行最猛烈抨击的是克罗利、韦尔、李普曼等政治学家。

纽约新闻记者赫伯特·克罗利，是进步主义的主要哲学家，也是20世纪初美国最孚盛名的政治学家。1914年创办《新共和》杂志并自任编辑，团结了大批青年社会和经济思想家。他对进步政治理论作出了最重要的系统阐述，其著《美国生活的希望》(1909年)、《进步的民主政治》(1914年)具有深远影响。

克罗利指出：人们公认的美国政治传统，是不相信政府管理而在经济事务中实行极端自由放任主义的杰斐逊传统，这种传统已与民主政治合而为一，深入人心。相反，主张强有力的政府管理的汉密尔顿传统，由于在公众的头脑中被认为等同于上层阶级

---

① 罗伯特·凯利：前引书，第462页。

的特权，未予足够的重视。正是这种错误的观念造成目前弊病丛生。如果说杰斐逊传统在农业社会还只是潜在的危险，那么在工业化时代它已经是彻头彻尾的危害。然而，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坚信，只有收回一切特权，给予企业阶级以恢复竞争的黄金时代，美国生活的美好希望才能实现。

克罗利警告说：在一个必然出现大工业大金融的时代，这种不干涉和放任自流的政策，只能把国家带到一种同样不可避免的毁灭之途——特殊利益集团的权力扩张和广大群众的处境日益恶化。怎样把国家从这种危险中拯救出来？美国民主政治和机会均等的梦想怎样实现？对于克罗利而言，途径是：改革者们必须放弃浪漫的杰斐逊观念，而代之以州和联邦在所有经济战线实行积极广泛干预的纲领。这首先意味着改革者必须放弃对于阶级或特殊利益立法的敌视。

克罗利宣称，当前重要的任务首先是确定什么是“国家利益”，然后通过计划和立法加以实现。那么谁来确定国家利益？克罗利认为应该提倡一种“新国家主义”，吸引“最杰出的才智之士”，在调和有计划而积极的政府管理与民主传统的工作中进行领导，以适应民主所避免不了的新形势。克罗利的理论，对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期的国家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此外，沃尔特·韦尔的《新民主政治》（1912年）、沃尔特·李普曼的《政治学序言》（1913年）和《放任与控制》（1914年）中，也都以实用主义为指导，呼吁国家干预。韦尔认为，实现新的社会和工业民主政治纲领的动力是切身利益。一个民主国家不能允许大多数人遭受屈辱和剥削，因为这些人最终会诉诸暴力并可能摧毁社会。人们不转而求助于法律、政府和国家，新的民主便不会到来。正在放弃空谈激进主义的年轻社会主义者沃尔特·李普曼补充了克罗利尤其是韦尔的论点，赞成用实用主义的方法

对待政治，认为必须实行民主集体主义。他说，自由并不是没有计划或不受政府控制，也不是无政府主义的代名词，“清静无为和软弱政府，那是对自由主义的曲解。能干的自由主义者一向关心法律的制定，关心权利和义务的明确规定……”。[1]

〔破除改革的法律障碍：实用主义法学和政治科学的形成〕

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正义运动、女权运动、市政改革和州级改革的深入，改革面临的障碍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其中之一便是关于法律的狭隘理解和过时解释。教条主义的法理学认为：法律具有普遍性而且一成不变；美国宪法是一项“神圣的”文献，是上帝智慧和“灵感”的体现；对于它，只能作“严格解释”而不能作“宽松解释”，不能随意扩大联邦政府的职权。

20世纪初年，社会学的法理学开始取代教条主义的法理学。具有新社会思想的律师和法学理论家摈弃了这种看法，视立法为社会环境的反映，从而将立法本身视为社会变革的工具。以霍姆斯为首的实用主义法学家对长久把持美国法学界的“司法复审”原理进行了反击，认为：法律应该适应社会不断变化的情况，过去美国法律体制的传统主义所形成的保守性和僵化性，应对其加以改革。因为，昨日之法无拘束法官今日判案之效力，判案要根据“是”的精神：法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长期以来，司法部门固守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教条，凭借其“司法复审权”阻挠变革，为保守势力服务，成为保守主义的强大堡垒。霍姆斯倡导的社会学法理学，对于摧毁司法部门的专断，推动国家干预影响巨大。

在霍姆斯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法官在司法实践中也开始将

---

① H.S.康马杰：《美国精神》，第327页。

法律与社会改革联系起来，不再简单地视犯罪行为为个人弱点所致，而同样将其看作是社会问题的结果。路易斯·布兰代斯的生涯集中体现了这一变化。他原先是一个富有的公司律师，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萧条期间改变了关于社会问题的看法，开始抨击公司的恶行和政治腐败，并最终赢得“人民律师”的称号，深为民众所拥护。在穆勒诉俄勒冈案中，他以出色的辩护，为改革派赢得了一场巨大胜利。①

与此同时，政治科学领域内也出现极大变化，强调研究政治过程而不是政治学中的抽象法则。伍德罗·威尔逊在《政府的作用》（1889年）一书中指出，政府除了保障人民的“天赋权利”这项职能外，还应有广泛的“管理职能”，诸如监督管理工商业，处理劳工事务，发展公用事业和教育，赈灾济贫，保护森林等。后来在《新自由》、《论国家》等书中又围绕着国家干预、“政府行为的准则是必要的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理论阐释。艾伦·史密斯和查尔斯·比尔德等对宪法的保守性进行了探讨，指出宪法乃少数人从阶级利益出发而构思出来的，并得出结论说：如此经常阻碍改革的宪法，比起其他东西，并非更为神圣不可侵犯。这一“经济解释”，抹去了长期以来围绕在宪法头上的“光环”，揭开了蒙在宪法身上的神秘面纱，从根本上否定了宪法的“神源论”，从而为顺应时势发展之要求，适时修改宪法中过时条款，赋予联邦政府新的职能，管理、干预社会和经济以确保其良性协调发展开辟了道路。

〔新的宗教哲学——“社会福音”的兴起〕　基督教信仰危机的出现，推动了新的宗教哲学——“社会福音”的兴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怀疑主义的发展、达尔文主义者和原教旨主

---

① 有关穆勒诉俄勒冈案，详见本书“最高法院和社会立法”一节。

义者之间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唯物主义哲学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播等等，促进了世俗主义的成长。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美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信仰抱怀疑态度，但基督教的伦理学不仅保存下来，而且被赋予新的内涵。新教各教会大多放弃了原教旨主义，并重新发现古代基督教的所谓社会正义的“启示”；罗马天主教会则将其社会服务扩及贫民。世纪之交，新教发生的变化深刻。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分歧越来越突出，前者坚持古老教义和忏悔；后者主张开明的神学观，强调教会的社会使命。1900年以后，现代派开始占据优势。1908年，拥有1700万信徒的33个新教福音团体宣布成立美国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此举表明社会福音运动在美国新教中取得胜利。天主教会此间也获得巨大发展，1890—1916年，随着“新移民”的进入，天主教徒由734万上升到1572万，翻了一倍。19世纪晚期，美国出现了天主教会“美国化”的运动，结果由于罗马教皇顽固坚持传统习惯而将其扼杀。尽管如此，美国的天主教会并未减弱自己的社会良心，一些主教和教士热心于帮助、指导新移民和城市下层贫民。巴尔的摩的詹姆斯·吉本斯曾经积极投入19世纪80年代的劳动骑士团运动。美国天主教大学的神父约翰·瑞安等在20世纪争取通过社会和经济立法的运动中赫赫有名。

“社会福音”的兴起，也是基督教适应工业化社会的产物。

现代工业文明的兴盛带来了许多弊端，贫民窟的形成便是其中之一。雅各布·里斯曾写道：“贫民窟问题是历代的慢性病。可19世纪目睹的各种巨大变化，新工业及政治自由使这一疾病恶性发作，并直接威胁到政治自由本身。……我们的国家已经繁荣富强，源源不断地通过我们港口的是足够几百万欧洲人享用的食物。然而，在穷街陋巷里一堆堆目不识丁、缺吃少穿的人挤在一块。……在与贫民窟的斗争中，我们要么战胜，要么灭亡，没有

中间道路可走。”[①] 活跃于贫民窟当中的神父和牧师最先向贫民窟宣战。19世纪80年代起，基督教会开始将纯教义问题置于一边，关心起工业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贫民窟、酗酒、卖淫、血汗工厂、童工女工待遇、股票掺水等等“社会问题”。许多新教教士向他们的先驱——废奴主义者一样对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罪恶进行了猛烈抨击。“牧师对工业弊端大感困扰……他们不仅被工业现状所震惊，同时也因之警觉”。[②] 以公理会牧师华盛顿·格莱顿、浸礼会牧师沃尔特·劳申布施等为代表的新教教士严厉批评工业资本主义，认为它是“基督教决不能满意的拜金主义体制”，提出以合作、集体主义和民主来代替竞争法则，实现一种介于“竞争制度下的冷酷的个人主义与危险的社会主义之间的”仁慈的、温情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为实现这一理想，基督教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社会福音运动”，着手对各种社会问题加以改造。宗教界发起的这场运动，吸引了广大中产阶级和下层劳动人民的关注和欢迎。

社会福音运动的目的在于复兴基督教，并向工业社会宣布所谓基督教的“启示”。从18世纪卫理公会出现以来，美国基督教中一直存在一个关心社会的强大的新教左翼。1870—1890年是美国新教社会意识觉醒的时代，其间开展了内容广泛的讨论，“愈来愈多的牧师开始用基督教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竞争的、剥削的时代精神，并且发现这些新的价值不足为贵。”[③] 他们的来世观点更淡薄，并开始从社会和道德的以及神学的角度来看待灵魂的拯救。传统的新教教义强调个人的“得救”以及在另一世界过上美

---

① 戴安娜·拉维奇编：前引书，第491—493页。

②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纽约，1959年，第106页。

③ 阿瑟·林克等著，刘绪贻等译：前引书，第26—27页。

好生活，视贫困为“罪”的体现，贫困者只有责备自己。财富和赤贫、郊区和贫民窟，均是上帝之所安排。80年代起，一批教会开始在贫民窟中开展活动。由于生活于贫困者和无家可归者中间，这些都市传教士对于维护现状的宗教教义越来越不耐烦，很多人开始支持正在出现的新的宗教哲学，即“社会福音”，其内涵是在强调心灵拯救的同时同样强调改善居住条件。于是，教会日渐成为宗教活动和社会改进的中心。

90年代起，社会福音运动趋向成熟，开明的神学家完全接受了进化论。与此同时，一个独立的“社会工作者”阶层初步形成，其中绝大多数人属于中产阶级，且年轻而有理想。他们通常受雇于慈善组织或社区福利机构，以英国伦敦的汤因比会堂为榜样创建公共会堂来帮助穷人。19世纪80年代第一批公共会堂在纽约市和芝加哥建立，分别称之为“邻居互助会”和赫尔事务所，世纪之交时，这样的机构超过100家，到1910年则多达400余个。[①] 1900年以后，日益壮大的“社会工作者”阶层日渐成为美国社会中一支颇有影响的力量。

社会福音运动的领袖和代言人首推沃尔特·劳申布施。他起初在纽约市一个教堂中任职，90年代出任罗彻斯特神学院教会史教授，开始阐述教会在促进社会正义方面的责任。在对工业资本主义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之后，提出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主张。1907年发表著作《基督教和社会危机》，第二年联邦基督教协进会创立。在费城举行的会议上，联邦基督教协进会通过了《教会和现代工业》的声明，表示新教坚定地支持社会福音运动，

---

① 小奥蒂斯·格拉海姆：《伟大的运动：美国的改革和战争，1900—1928》，罗伯特·克雷格出版公司，1980年，第22页；罗伯特·戴维尼等：《美国今昔》，前引书，第318页。

支持通过社会福利立法和加强工会来结束剥削的资本主义制度。

最为活跃的社会福音运动领导人是公理会牧师、多产作家华盛顿·格莱顿。他通过将基督教和社会经济环境联系起来，毕生致力于“社会拯救”，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爱，谴责竞争，倡导雇主和雇员间建立一种“工业伙伴关系”并呼吁采取行动帮助穷人。

20世纪初年，反传统的进步思想家队伍迅速壮大。作为一个整体，此时期的知识分子已经全面抛弃了自由放任主义信条，开始用实用主义的方法为进步主义改革运动提供理论指导。这些思想家对于“人民”有一种诚挚的信念，普遍认为“人民”从根本上说都是正派的，一旦他们充分认识到社会存在的问题，将不可避免地要求变革，铲除美国生活中的腐败、贫困和罪恶。新社会思想的形成，瓦解了保守主义的思想体系，消除了社会变革道路上的某些无形障碍，为广泛深远的改革运动的兴起作好了理论准备。知识分子的反叛影响深远，对于使进步运动成为美国生活中的一种永久的力量起了不小的作用。“他们的重大贡献，在于推翻一直牢牢支撑现状的保守思想，在于为社会福利国家提出一种哲学体系。因此，在这方面以及因为这种原因，知识分子是进步主义的真正发酵剂。”①

三、社会经济领域的群众性改革运动

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一小撮百万富翁攫取了社会的大量财富，千百万劳动人民特别是童工、女工、城市贫民却难以维生。一些富有正义感的人士认为，两极分

① 阿瑟·林克等著，刘绪贻等译：前引书，第84页。

化是由于分配体制的不公所致，因此热衷于以改良手段祈求社会公正，掀起一场所谓“社会正义运动”。在贫民窟中开展工作的神父和牧师是这场运动的先锋，到1900年，“社会正义运动”已形成一股不小的社会力量。

社会正义运动是第一次大规模地旨在减少美国社会生活中阴暗面的尝试，它的广泛开展，推动了全国性的改革运动——“进步主义运动”的形成。到后期，社会正义运动本身也汇入了全国性的改革洪流之中，成为进步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正义运动的兴起〕　社会正义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处于都市社会最底层的贫困者，目标是为那些软弱无助的人提供某种帮助，减轻他们的疾苦，例如：贫民窟内悲惨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工业部门中对女工、童工的剥削；每况愈下的、毫无保障的工人的屈辱生活等等。

最先向贫民窟开战的是活跃于贫民窟当中的神父和牧师。如前所述19世纪80年代起，基督教会开始抛弃纯教义问题，关注工业化带来的贫民窟、酗酒、卖淫、血汗工厂和股票掺水等社会问题，并对这些社会罪恶进行猛烈抨击。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主张，并为此展开声势浩大的所谓“社会福音运动”，着手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改造。宗教界发起的这场运动，吸引了广大中产阶级和下层劳动人民的关注和欢迎。在慈善基金的赞助下，广大的社会工作者深入基层，针对工作条件、贫困的原因、缓和社会疾苦的办法等问题开展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在此过程中，他们当中出现了专业化的倾向：有的专注于关心照顾移民，有的忙于劳工问题的解决，有的则醉心于青少年犯罪问题的调研。

进入20世纪以后，社会正义运动发生了某些质的变化。初期它主要是一场“个人性质的改良”运动，到后来则转向期望借

助国家的管理权来重新调整经济关系，从而实现所谓“社会拯救”的最终目的。在投身这场运动的改革家看来，州政府、联邦政府也都应该加入到保护弱者的战斗中去。其具体做法是：先在“社会工作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法律，然后起用“社会工作者”加以实施。

在进步主义年代里，抱着寻求社会正义理想的改革家们更加热衷于“社会性的诊疗”而非个人的慈善之举。在他们看来，各类社会问题是无穷无尽的而且相互间纵横交错。在社会正义运动兴起的早期，他们较多地关注单个个体的福利，到后来，则将主要目光转向对整个邻里、职业阶层乃至阶级的科学分析。1900年，纽约市年轻的社会工作者劳伦斯·维勒举办公共会堂展览，展出1000多幅照片、贫民窟区详细的地图、统计图表以及纸板搭成的颇为逼真的住宅图像。透过形象生动的图片资料以及发人深思的数据文献，维勒揭示出了贫困和疾病同居住条件之间的关联，引起人们心灵极大的震动。在公众不满呼声的刺激下，纽约州长西奥多·罗斯福随即任命纽约州公共会堂委员会着手解决此类问题。[①]

维勒的成功树立了一个样板，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者争相效法。在地方性的社会工作者活动的基础上，1915年，社会正义运动的改革家组成了全国性的社会工作机构——“慈善机构和补救措施全国委员会”。借助于该组织，社会工作者之间加强了交流和切磋，并力图开辟社会科学当中的一个新领域。他们在哈佛、芝加哥以及其他主要大学组建职业学校，1909年发行自己的刊物《观察》。到这时，社会正义运动已不再局限于零星的改革，而是致力于综合性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最低工资立法、最

① 罗伯特·戴维尼等：前引书，第356页。

高工时立法、雇工赔偿以及寡妇津贴等。

妇女在社会正义运动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公共会堂中的很多社会工作者是女性，其中一些接受过高等教育。著名改革家简·亚当斯1889年在芝加哥建立了著名的赫尔[illegible]所，期望藉此

北方，1903—1904年间新泽西州、纽约州和伊利诺伊州也通过了类似法案。1904年，运动的南北两翼汇合，组成全国童工委员会，该委员会到1910年在22个州拥有25个分会。在该童工委员会及全国消费者联盟等组织的压力下，到一战前夕，社会正义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00年，24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没有规定工人的最低年龄。到1914年，除个别例外，每个州都制定了有关对从事工作的儿童提供保护的法律，通常确定的最低年龄限制为14岁，不少州还禁止14—16岁的儿童上夜班或从事危险工作。[1]

联邦对童工立法直到进步主义时代末期才见成效。印第安纳州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于1906年提出第一个联邦法案，但遭到全国童工委员会的拒绝，理由是最好在州一级再活动一段时间，取得更多的成效。1914年，联邦采取行动的条件趋向成熟：全国童工委员会向国会提出立法动议，草案要求：禁止在州际贸易中运输全部由或部分由14岁以下童工生产的商品以及雇佣16岁以下童工的矿山或采石场生产的产品。法案于当年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在参议院搁浅，主要原因在于全国制造商协会和南部纺织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谴责法案侵犯了州的管理权因而违宪。1916年夏，威尔逊总统为了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增加民主党人取胜的机会，促使参议院通过了童工立法，即所谓《基廷—欧文法》，至此，社会正义运动在联邦一级取得了意义深远的胜利。

然而，童工立法命运多舛。最高法院在1918年的哈默诉达根哈特案中裁定《基廷—欧文法》对地方劳工状况进行了“不适当的”管理。1919年国会通过第二个童工法，同样在1922年被

---

① 阿瑟·林克：《美利坚时代：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史》，前引书，第70—71页。

最高法院在巴莱诉德莱克塞尔家具公司案中推翻。直到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国会才成功地通过一项最高法院愿意遵守的全国童工立法。

〔女工保护及最低工资立法〕　社会正义运动指向的第二个主要目标是工业部门中的女工保护问题。由于芝加哥赫尔事务所的佛罗伦斯·凯利的努力，1893年伊利诺伊州曾通过一个强制法令，规定妇女工作时间为日8小时。但这项最早的妇女8小时工作日立法两年后被州最高法院宣布违宪。90年代晚期，运动的领导权转向东部地区，在妇女消费者联盟的努力下，争取妇女工时立法的运动迅速展开。纽约州（1896年）和马萨诸塞州（1900年）先后制定法规，将妇女工作时间限制为每周60小时。以此为开端，运动逐渐扩展到内布拉斯加州、密歇根州、科罗拉多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田纳西州。1909—1917年间，39个州制定了工作日立法，通常为每周不超过6天，每天不超过10小时。190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一项判决中裁定工时立法有效，从而扫除了关于妇女工时立法合法性问题上的疑问，至此改革的障碍终于被扫除。到1913年，39个州确定了妇女最高工时标准，或者禁止夜间雇佣妇女工作。

社会正义运动的第三个、或许也是最雄心勃勃的目标是女工的最低工资立法。1896年至1909年间，澳大利亚和英国制订出最早的这类立法，使得美国的改革者深受鼓舞。1911—1914年间美国政府和民间进行的调查提供了更为重要的推动力，这些调查揭示，大量妇女获得的工资不足以维持体面的生活水准。1910年，全国消费者联盟将最低工资立法列入其长远纲领之中。次年，妇女工会联盟也加入战斗。争取女工最低工资立法运动开始了。

改革联盟于1912年取得初次胜利，这年马萨诸塞州议会设

立工资委员会，授权其就妇女最低工资提出立法建议，并揭发拒绝守法的雇主。第二年，8个中西部和西部州通过终于生效的法案，并授权工资委员会确定有约束力的最低工资率。然而，1913年以后，运动大大减弱。1914—1923年间，仅有另外6个州、哥伦比亚特区以及美国海外属地波多黎各，加入致力于保障女工的生活水准、从而保障其健康和德行的州行列。

〔建立工伤事故保险体制〕　社会福利斗争的最后一个主要目标是建立工伤事故的公共保险制度。到1900年，西欧国家已经较长时期地显示出这类制度的优越和切实可行。然而在美国，与工伤事故有关的习惯法的条条框框仍然支配着事故赔偿金的支付。

根据习惯法的规定，如果受伤雇工是自愿承担这一工作的风险，如果致伤是由于他本人的疏忽或者其同事的疏忽，那么他就无权要求赔偿。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受伤雇工为要求赔偿就得起诉，并证明自己受伤确系雇主的直接疏忽所造成。显然，根据习惯法而实际上将工伤事故和死亡的全部财政负担加在工人及其家庭身上，具有显而易见的不公之处，这种现象引起早期要求废除或修改这些条款的运动。到1910年，大多数州已对习惯法的规定作了有利于受伤工人的修改。但受伤工人的境况较之从前并未有多少改观，因为要得到损害赔偿仍不得不进行起诉。

1902—1909年间，马里兰州、蒙大拿州及联邦政府曾试行过不完善的有限的事故保险制度。1909—1913年间，政府方面又就整个问题作了短期认真的调查。所有的委员会几乎一致地得出结论：现行的赔偿制度已经瓦解，建议颁布事故保险法。从此，立法浪潮席卷全国。1911年，有10个州建立保险制度；1912—1916年，又有20个州、3个地区及联邦政府步它们的后尘。

追求社会正义的力量在进步主义时代逐渐壮大起来，成为美

国民主政治中一支补救的力量，并在改革运动中紧密团结，将一个自由放任、相互角逐的社会，改造成某种近乎福利国家的社会。他们有好几十个组织，进行的社会改革斗争内容丰富，为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卓有成效的新的社会正义运动照亮了道路”。[①]

〔最高法院和社会立法〕 社会正义运动的深入开展，招致了来自几个方面的巨大阻力：一是雇主和自私自利的经济界其他代表人物的围攻；二是保守的法官和法庭的反对。

美国宪法制度中，法官具有特殊的权力，拥有决定立法是否违反州和联邦成文宪法条款的特权。20世纪初的美国律师和法官绝大多数都是按照英美法律传统培养出来的，这种传统重视自由甚于正义，重视产权甚于人性；坚信经济规律的自动运转，强烈反对公共管理的观念；一贯站在铁路和其他大公司一边。在判定涉及社会立法的案件时，美国的“法官们常常不知不觉地让传统的偏见而不是健全的法律准则来支配他们的判决。”[②] 19世纪8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已确立一个信条：根据宪法第14条修正案，公司就是法人。于是，公司有权请求联邦法院保护；而联邦法院则坚持复审州的立法，以判定它是否违反宪法第14条修正案中关于各州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的规定。

1898年，最高法院首次涉及对州劳工立法的复审。在霍尔登控诉哈迪案中，最高法院支持犹他州关于矿工8小时工作日的立法，裁定州有权限制危险职业中的劳动时间。其理由是：保护所属公民的身心健康是州的职责；可以适当使用州的管理权来提

① 阿瑟·林克等著，刘绪贻等译：前引书，第69页。
② 阿瑟·林克等著，刘绪贻等译：前引书，第70页。

供这种保护；在此情况下使用管理权并不侵犯宪法第14条修正案所保证的契约自由。然而，1905年的洛克纳诉纽约州案却使得这一理论受到挑战。案件涉及到纽约州一项限制面包工人每天劳动10小时、每周60小时的立法，控方认为该法不适当地侵犯了雇主与工人订立劳动合同的自由。最高法院以勉强过半数判定：由于做面包并非特别对健康有害，因而“限制成年干练工人赖以维生的工时的法规，无非是对个人权利的无理干涉”。即各州不得侵犯契约自由，除非有明显而且充分的行使管理权的理由。

随后不久发生了著名的穆勒控诉俄勒冈州案。1907年，雇主穆勒对俄勒冈州妇女10小时工作日法令提出异议，引起争论。应全国消费者联盟的请求，美国著名的“人民律师”、波士顿的路易斯·布兰代斯（1856—1941）挺身而出为此法辩护。他强调说，律师、法官都应该对案件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有所了解，“没有研究过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律师，很可能成为公众的敌人”。为此他建议用社会学的法理学来取代目光短浅的法律上的传统主义。在提交给法庭的长达104页的辩护状中，布兰代斯仅用两页纸进行通常的法律推理和援引判例，而为了说明妇女劳动时间长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竟用了102页，其中引用了数百种经济学、社会学和医疗方面的资料，包括工厂监督员、卫生和健康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的报告，来说明俄勒冈州10小时立法对于保护妇女的健康、安全和道德不可或缺。1908年1月，最高法院就案件进行辩论。控方声称：妇女与男人平等，同样有订立契约的自由，任何立法机关不得侵犯。布兰代斯再次用一系列有说服力的事实作了回答。尽管最高法院为守旧派所操纵，但布兰代斯的辩论深深地打动了法官。最终，法庭声称：在决定这类立法的合宪性时，“注意到……司法渊源之外的看法”，“或许不是错误

的”，“妇女的体质构造，以及由此承担的功能，使得特殊的立法正当、必要”，“该法规对其契约权施加的限制，……并非仅仅针对其个人利益，同时更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全体利益。”[①] 因此，俄勒冈州限制妇女10小时工作日法令，是“对州管理权的合法行使”。[②]

最高法院关于穆勒控诉俄勒冈州案的判决，堪称社会正义运动“一次划时代的胜利”。[③] 它确认了俄勒冈10小时工作日法令符合宪法精神；法院第一次承认需要用事实来证明社会立法是否合理。但是，社会立法的障碍并未清除掉，洛克纳案的判决并未被推翻。其后发生的几个案件中，法院否定了以行使管理权为根据的劳动法。但是，1908年以后，州有权通过特殊立法来保护社会成员中的弱者这一观点得到广泛接受，应用经济和社会资料为社会立法辩护的做法（所谓“布兰代斯理念”）很快流行起来。

1908—1915年间，又有四件涉及妇女劳动时间立法的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复审时均坚持穆勒诉俄勒冈案确定的原则，甚至还批准加利福尼亚一项内容广泛的妇女8小时工作日法令。1898—1915年间，最高法院还复审过一些州的童工法。尽管法院一贯声称各州有权保护儿童，禁止其从事危险职业或者在不利于健康和品德发展的年龄参加劳动，但是在1918年以前，国会能否运用其对商业的控制来管理儿童劳动，仍然悬而未决。到1917年，法院几乎认可了所有形式的劳工立法。在邦廷诉俄勒冈案中，最高法院认定俄勒冈州男工10小时工作日立法合法，从而推翻了洛克纳诉纽约州案的判决。在威尔逊诉纽约一案中，

---

① 约翰·格拉蒂：《1865年以来的美利坚民族》，前引书，第237页。

② 约翰·格拉蒂：《1865年以来的美利坚民族》，前引书，第237页。

③ 阿瑟·林克等著，刘绪贻等译：前引书，第72页。

法院认可了从事州际贸易的铁路工人的8小时工作制立法。在斯特勒诉奥哈拉案中，法院认可了一项规定女工最低工资的俄勒冈法令。在一系列判决中，最高法院承认当时各州实行的三种工业事故保障体制符合宪法。

〔*女权运动的深入*〕　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早在1848年即已开始，此后半个世纪内涌现出卢·莫特、卡迪·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等一批杰出领袖。但运动遇到不少阻力。女性自身的不团结，男性的反对，女权运动策略上的分歧（例如是在州级还是全国范围内开展行动），天主教会的抵制，来自酒类利益集团的反对（它们将女权运动与禁酒联系起来）等等，制约了女权运动的进展。到1900年，给予妇女以选举权的仅有怀俄明地区（1869年）、怀俄明州（1890年）、科罗拉多州（1893年）、爱达荷州（1896年）和犹他州（1896年）。

女权运动的深入有赖于新一代的美国女性。1890年，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正式组建，到1920年会员数将近200万。1900年，卡丽·卡特当选为该协会主席，从此，争取女权的斗争由散漫的运动转变为社会改革运动，其斗争从西向东展开，成为整个进步主义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赢得社会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妇女选举权协会开展了大量游说工作，发表演说，在大城市发起游行活动。平等联盟（后来的妇女政治同盟）、国会争取妇女选举权同盟和全国妇女党等组织更加富有战斗性，举行示威，进行纠察，诘难政治候选人，有时被捕入狱，便在狱中仿效英国妇女发动绝食斗争。类似妇女俱乐部总联盟这样的一些组织，也将日常的文学聚会转变为社会行动集会。为了吸引人们对妇女关注社会改革事业的注意力，1904年成为妇女俱乐部总联盟主席的萨拉·德克尔夫人面对其组织成员慷慨陈词：“丹东已经死了……我想，现在该是我们放弃研究他的地狱、将注意力转向我们

自己的时候了。”①

女权运动首先在州一级取得成效。1910年和1911年，华盛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分别给予妇女选举权。1912年，亚利桑那州、堪萨斯州和俄勒冈州采取同样行动。1913年，伊利诺伊州给予妇女选举总统的权利。1914年，蒙大拿州和内华达州同意给予妇女选举权。1917年，纽约州也转变立场支持女权主义者的主张。同年，蒙大拿州的珍尼特·兰金成为美国第一个国会女议员。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增，大量美国女性投身于与军事有关的生产或服务行业之中。在此过程中，妇女以其出色的表现越来越多地赢得男性同胞的尊重，个人尊严和社会地位均有所提高，推动了女权运动的深入。与此同时，女权运动也引起进步派的关注，他们认为妇女选举权将有助于“纯洁”政治。1918年1月10日，美国众议院在威尔逊总统的推动下，通过宪法第19条修正案，禁止各州以性别为理由拒绝给予选举权；参议院于1919年6月4日表示赞同。1920年8月26日，修正案经36州批准正式生效。2600万美国适龄女性由此获得了与男性同胞所享有的同等的选举权。

妇女选举权的宪法修正案生效后，美国各州针对本州的具体情况对法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订，允许妇女拥有、继承和遗赠财产，对原来的离婚法也作了相应修改，以便保障妇女的经济权和监护子女的权利。然而直至20世纪20年代，美国妇女在就业、工资待遇等方面仍然受到严重歧视，争取男女平等的斗争远未结束。

① 罗伯特·戴维尼等：前引书，第357页。

四、市政改革的深入

城市的迅速发展既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复杂而多变的社会问题。世纪之交，美国的城市化进入鼎盛时期，相应地，各方面的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日益突出。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深刻暴露了市政体制的内在矛盾，使得城市日益成为广大民众不满以及要求变革的“风暴的中心”。进入新世纪后，随着黑幕揭发运动的兴起，进步主义思潮的广为传播，社会正义运动以及女权运动的开展，市政改革运动获得新的动力。

〔城市之羞〕　美国在从乡村社会走向城市社会的过程中，市政管理和建设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城市经济利益集团和政党核心集团操纵市政府，经济集团和政党机器相互勾结，腐败成风，贿赂成灾；特权企业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特许状、承包合同和豁免权，严重危害大众利益；随着人口的剧增尤其移民的大量涌人，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城市管理日趋复杂，但现行市政管理低效无能，结果贫困、犯罪、疾病等“城市病”不断蔓延。针对这些弊端，19世纪末年很多政论家提出了批评。塞斯·娄说：“美国的麻烦是在几年之中迅速出现了大城市”；布赖斯认为，美国市政府是“美国政治机构最明显的失败”；安德鲁·怀特则宣称：“除极少数例外，美国的城市政府乃是基督教世界中最糟糕的——最奢侈，最无能，最腐败。”①

城市内部的社会问题相当突出。富裕与赤贫之间形成强烈的

①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时代，从布赖恩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纽约，1955年，第176页。

反差，往往一边是百万元的豪宅、公园和林荫小道环绕；另外一边则是荒废的棚户和肮脏无比的街道。拥挤的都市区内，卫生状况、治安状况和社会服务状况也极为糟糕。19 世纪末年，费城和圣路易的排水系统总长度仅仅略多于两个城市街道总长度的半数，而巴尔的摩、新奥尔良等城市则依旧主要依靠露天排水沟来排泄污水。由于不洁净水的供应，匹兹堡成为世界大城市中伤寒热、痢疾和霍乱死亡率最高的城市之一。[①] 城市犯罪率也急剧上升并居高不下。

对于大多数进步派来说，政治腐败和无能是所有困扰美国社会弊端的根源。政党机器由于太腐败而不能提供都市人口所必需的服务，而传统的管理机构则由于发育不全而不能满足城市居民的要求。20 世纪初，美国城市代议制政府几乎完全崩溃。大多数城市不是由公正选举的代表治理，而是由其等级结构类似于现代公司等级结构的政党核心小集团统治着。这种核心小集团成为大城市内名副其实的"无形政府"，其领导人称"头头"、"大人物"或"首领"。虽然他们本人由于声名狼藉而通常不出任公职，但其指令却能够有条不紊地、顺畅地从"小集团"一直下达到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早在杰克逊时代，美国城市被授予或修改特许状时，就有意识地将权力和责任分散给市长、两院制议会、独立的部门和委员会等诸多机构。在此体制下，责任制政府几乎难以形成，政党核心小集团便伺机进入这种相互牵制、平衡和分权的制度造成的权力真空之中。

在长期实践中，政党核心小集团形成了足够进行治理的内聚力和集中的权力，成为"混乱的都市社会生活中为数不多的聚合力和团结力之一"。他们懂得施舍，在各选区内，为大量的人提

① 阿瑟·林克、理查德·麦考密克：《进步主义》，前引书，第 29 页。

供服务。如派代理人到码头接待举目无亲的移民，帮助他们找住所和工作；还开展慈善工作，帮助鳏寡孤独者；给移民和少数民族群体提供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机会。这方面的工作卓有成效，以至于“到1900年时，多数选民并不问某个组织是否腐化，而只问它是否为他们做点事。”[①] 施恩图报的心理，促使很多选民投了政党核心小集团的票。政党核心小集团用于施舍的钱财大部分来源于“非法收入”，上至大公司提供的政治赞助和巨额贿赂，下至罪犯、妓女乃至酒吧间老板向政客和警察提供的所谓“保护费”。据芝加哥犯罪调查委员会1911年的报告，该城每年从犯罪中获利1500万美元，其中1/5是用贿赂形式付给警察的。由于不遗余力地获取非法利益，操纵市政的政党机器逐渐忽视并最终背离了公众的根本利益。

旧金山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典型。1901年以后，一个名叫阿比·鲁夫的精明律师操纵了腐败的旧金山市政机构。旧金山的街道上只能采用一种铺砌材料，鲁夫就是提供这种材料的公司的律师。当当地煤气公司提出每100立方英尺煤气涨价10美分时，鲁夫从这家公司索取了2万美元的贿赂，在此之前，他作为一个“零售商”每月从公司收取1000美元。当地街车公司需要市政府授权建立无轨电车的空中电线，为获得鲁夫的赞同花去了公司85000美元。旧金山的卖淫活动猖獗，鲁夫及其亲信则心安理得地从中分享利润。同样，在酒类专卖及其他方面也存在着非法勾当。“对于那些腐败分子而言，没有什么交易是太大或者太小。一个与销售一些家具给市府这件事沾上边有关的官员收受了26.1美元的贿赂。类似情形存在于无数社区。”[②] 为了给最著名

---

① 阿瑟·林克等著，刘绪贻等译：前引书，第85—86页。

② 约翰·格拉蒂：前引书，第234页。

的黑幕揭发杂志《麦克卢尔》写稿，林肯·斯蒂芬斯考察了圣路易、明尼阿波利斯、匹兹堡、纽约、芝加哥和费城，结果发现各地的情况无一例外。

为获得庇护特权、特许状和工程承包合同，逃避公平税收，大公司大企业往往不失时机地大肆行贿。核心集团的头头手中通常握有由他支配的特许权和承包合同，如有关市政建设方面的建筑新铁路线、排水系统、煤气管道、电线、自来水管道等。圣路易的民主党头头把特许权、执照和豁免权有组织地出售给企业界的头面人物。明尼阿波利斯的头头操纵着全国最引人注目的警察受贿网。匹兹堡的两名共和党领导人掌握着市镇会议，靠出售承包合同和公用事业公司的股票而致富。在黑幕揭发作家林肯·斯蒂芬斯看来，美国的大企业家都是“自以为正直的骗子”，他们“在圣路易收买行贿者，在明尼阿波利斯替受贿者辩护，在匹兹堡滋生腐败，在费城与政党老板们分摊好处，在芝加哥为改革而感到遗憾，在纽约以腐蚀性的金钱击倒善良的政府。”[①] 改革家福雷德里克·豪指出，辛辛那提市的老板乔治·考克斯像一个中世纪的男爵对待自己的农奴一样统治着这个城市。[②] 通过钱权交易，城市重大利益集团买得了对政党核心集团的控制权，从而“将美元变成选票，将财产变成政权”。

〔*城市的“反叛”：市政改革运动的兴起*〕　市政的普遍腐败和混乱，促成了进步主义运动的第一个重要政治运动——市政改革运动。1906年，改革家福雷德里克·豪在对都市生活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研究之后指出：城市的挑战，“已经成为人类体面

---

① 伯纳德·贝林等：《伟大的共和国：美国人民史》，里特尔和布朗公司，1977年，第892页。

② 有关考克斯统治辛辛那提的详细情况，参见赞恩·米勒：《“老板”考克斯的辛辛那提：进步主义时代的都市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年。

生存中的一个问题"。[1]

19 世纪 90 年代的经济危机加重了城市消费者的负担，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政党机器统治的缺陷上来，大大提高了人们对于改革的紧迫感，从此，城市逐渐成为"风暴的中心"。90 年代起，一些城市陆续展开了旨在消灭贪污腐化现象、恢复城市代议制政府、实行公平税收、加强对公用事业管理以及扩大公益服务事业的市政改革运动。1894 年，城市改革者组成全国市镇联盟，此后市政改革逐渐遍及全国，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其间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城市改革家，如克利夫兰市的汤姆·约翰逊、托莱多市长塞缪尔·琼斯、底特律市长黑兹恩·平格里以及芝加哥市长卡特·哈里森等等。各城市的改革虽因时因地而各具特色，但基本遵循同一途径，即：首先依靠城市俱乐部或都市选举人联盟驱除"党棍"，选出进步市长，组成"诚实政府"；继之进行市政机构改革，"还政于民"，促使公众能有效地参与和控制政治；最后实施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

都市改革的关键是"无形政府"，即市政当局与企业利益集团之间的邪恶联盟。"腐败的政府"与"傲慢的企业"之间纯粹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到 1890 年，美国绝大多数主要城市都出现了两者间的交易，而惟一的受害者是公众。[2] 为了消除政党核心集团对市政的控制，扩大公众的参与和监督，改革者要求建立直接预选制，实施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为了消除州立法机关对市政的干预，改革者要求实行城市自治。市政改革的核心是改革市政领导体制，改革者的目标是废除市长—市政会议制，代之以市政委员会制和城市经理制。1900 年得克萨斯州作为权

---

① 伯纳德·贝林等：《伟大的共和国：美国人民史》，第 890 页。

② 伯纳德·贝林等：前引书，第 891 页。

宜之计试行委员会制，随后迅速得到推广。城市范围内的改革到19世纪结束时初见成效，改进了市政府的功能和形式，提高了政府效率；解决了一些紧迫的社会问题；对深刻影响人民生活的大公司企业和公用事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管制或将其收归公有。

都市改革运动一开始往往以“人民运动”形式出现，旨在消除腐败现象，在都市交通和其他公共设施方面提供更好的服务。由于不存在阶级和职业的界限，且集中于某些特定的问题，如提高铁路叉口的安全、改进卫生设施、降低街车票价，因此，进步运动在早期阶段带有显著的民主特色和道德色彩，而企业家和政治老板则是这幕改革家道德剧中的两个孪生恶棍。

90年代后期开始，进步派对不诚实和无能的都市政府问题发起猛烈攻击。在旧金山，报人福雷蒙特·奥尔德和富裕的蔗糖制造家伦道夫·斯普莱克斯领导的一批人打碎了政治老板机器，最终将鲁夫送进监狱。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塞缪尔·琼斯1897年赢得选举，出任市长，成功地领导当地公民开展反腐败的斗争，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琼斯将写着“不要进草坪”的公园草坪告示牌，改换成“公民们，保护你们的财产”。这一做法集中体现了他的管理精神。此外，圣路易的约瑟夫·富克，纽约市的塞斯·娄及其继任者约翰·米切尔，底特律的黑兹恩·平格里，泽西市的马克·法根，也都为市政改革事业做出了较大贡献。

芝加哥的改革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当该市的市政会议准备将公众最宝贵的权利出卖给公用事业大亨查尔斯·耶基斯时，抗议非法出卖特权的呼声随之高涨。约232名市民领袖于1895年组成城市选民联盟，并发起一个超党派的运动，以清扫市政府的积弊。通过无情揭发腐败的市政官的老底，该联盟于1896年和1897年的高级市政官的选举中取得市政会议的控制权，并在1897年促成进步市长卡特·哈里森的当选。其他各地的市政改革

运动采取类似方式。1913 年，纽约市各种超党派的廉洁政府联盟联合起来，推翻坦慕尼协会的统治，选举年轻的改革家约翰·米切尔为市长。在明尼阿波利斯，一个精力充沛的市民委员会和无所畏惧的大陪审团，揭发出由市长艾姆斯操纵的警察贿赂网，并将市长及其亲信送进了监狱。

一般说来，市政改革运动中出现了两大模式：一类是在对政党机器的腐败和无能产生不满的企业家和专业工作者的领导下进行，着力于建设一个“诚实、高效、类似于商业”的政府。1895—1897 年间出任纽约市长的商人威廉·斯特朗是这类改革家的典型。另一类改革运动的动力来自于广大市民要求提供城市服务以及经济救济的压力，底特律市长平格里（1890—1897 年任职）属于此类。较之斯特朗，平格里更加关注社会福利、公用事业公司的管理以及税收负担的重新分配。到 1900 年，这两类模式及其交叉混合模式在全美各地得到广泛实施，“都市进步主义迈步进入其最具创造性阶段的门槛之上”。[①]

〔*克利夫兰市的改革*〕　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改革代表了另外一种类型的市政改革模式，即所谓“社会改革型”的都市进步主义。底特律市长平格里虽是这方面的先驱，但最具影响的是克利夫兰市的汤姆·约翰逊（1901—1909 年任市长）。他长期致力于改进城市生活，抑制腐败，削弱特权，调整税收，为克利夫兰市赢得了“美国治理得最好的城市”的声誉。

1901 年，约翰逊以平等税收和“3 分钱电车费”为竞选纲领，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当选为市长。执政后他罗致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市政管理人才，协助推进各方面的工作。他首先针对税收的不平等展开斗争；接着向在克利夫兰拥有大量财产但几乎不

① 阿瑟·林克、理查德·麦考密克：《进步主义》，前引书，第 39 页。

纳税的铁路公司和公用事业公司开火。1903—1904年，州议会加倍征收铁路税，公用事业部门则同意将税款翻一番。更加激烈的是争取“3分钱电车费”的伟大斗争。地方公共运输利益集团拒不屈服，约翰逊及其市政会议乃建设对抗性电车线路并邀请市外资本家来投标。地方公共运输界乃求助于州共和党核心集团。该集团向俄亥俄州最高法院上诉，结果州最高法院宣布俄亥俄州各城市所有特许状无效，理由是这些特许状是特别立法的产物。州核心集团随后召集议会举行特别会议，通过统一的市政法典，取消了各市旧的集权制度，而由分散的权力机关和独立部门进行治理。

克利夫兰市长约翰逊没有气馁，继续向人民呼吁，并得以再次当选。最后他断定，消除市政腐败罪恶根源的惟一出路只有一条，即将公用事业和公共运输业收归国有。1909年改选时，约翰逊被保守势力击败，不到一年后去世。但他的政纲却由于其主要副手牛顿·贝克在1911年当选市长而继承下来。

克利夫兰的改革在全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约翰逊之后，很多城市开始尝试性地推行所谓“煤气和自来水的社会主义”①，接管了公用事业公司，将其作为市政府的一些部门加以运作。到1915年，全国所有城市水厂当中，将近2/3收归公有，很多煤气、电力和街车系统也一样。进步派市长还取得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例如，托莱多的琼斯确立了市雇员的最低工资，兴建了运动场和高尔夫球场，放宽了严厉的刑罚。纽约的塞斯·娄改进了该市的公共运输系统，1901年《公共住房法》获得通过。

〔新型市政体制的建立〕　市政改革者面临的共同敌人，

① 约翰·格拉蒂：前引书，第236页。

是与企业特权和犯罪分子相互勾结的顽固腐化的政客；所追求的共同目标，是大公无私的政府、公平的税收、对公用事业公司的管理以及面向下层阶级的公益服务事业的扩大。然而，在与共同的敌人作斗争、朝着共同目标迈进的过程中，改革者们逐渐认识到：仅仅驱除恶棍并制定经济和社会改革纲领是不够的，只要党魁依然控制着党的机构，改革者就决不能高枕无忧，必须转而致力于政治机构的改革，让公众更多地参与和控制政治。为此，城市进步派与其他改革团体携手，对政党核心集团及其"头头"展开正面进攻，力争建立直接预选制以提名候选人，选举市政府部门的主要官员，实行创制、复决和罢免权。这些也是州级进步主义运动所追求的目标。

约翰逊等进步分子发现，城市核心集团都是州核心集团的组成部分。地方核心集团即使被打碎了，但州核心集团往往通过立法机关取消市级改革的成果。要结束、摆脱州立法机关对市政的干预，必须争取城市自治。为此，市政改革者进行了艰苦的斗争。1904年，仅有密苏里、明尼苏达、华盛顿和加利福尼亚4个州的城市已经获得自治权。到1914年，这样的州增加到12个。[①] 然而这些州中，只有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拥有一些举足轻重的大城市；更有甚者，即便是在这些获得了"自治宪章"的城市，城市改革家也毫无例外地没有能够改变市政体制，因而根本不能永久地摧毁地方党派机器。

1899年，全国城市联盟（此时加入的"好政府"已达200个）为寻求改进都市管理提供了一个模范性的"城市宪章"，其主要内容包括：扩大市长的职权；对市政会议成员进行普遍的而不是按选区的选举；削弱州对市政事务的干预；根据文官制度规

---

① 杰拉德·拉什：《伟大的转变：20世纪美国史》，波士顿，1971年，第45页。

则任命行政官员。不少城市创立研究局，以一种科学的、非党派的态度展开调查、研究或实践。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新型市政管理模式：强市长—议会制、委员会制和城市经理制。

第一种模式：强市长—议会制。该体制基本上是在原市长—议会制的基础上加以改革而形成的。在该体制之下，市长的权力得到加强，原来的市议会大多由两院变成一院。强市长不仅有权任命和罢免各部部长，享有全部行政管理权，在部属的帮助下制定和执行预算，管理公务，而且往往能够贯彻并实施建设性的政策，甚至有权否决议会的提案。布法罗市长格罗夫·克利夫兰就曾屡屡行使否决权，否决党派机器操纵下的市议会通过的许多法案，赢得了“否决市长”的称号，他也因此而倍受改革派的青睐，以致于后来终于荣登总统宝座。强市长—议会制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大城市中比较流行，1880 年，全国 23 个最大城市中还仅有 1 个实行这种体制，但到 1900 年时就已经增加到 12 个。[①] 该体制也存在着缺陷：一是在加强行政部门特别是市长权力的同时，导致权力过分集中；二是要求市长既是优秀的政治领导人又是高效的行政管理官员，而身兼两种品质的人毕竟太少。因此，美国更多的城市则尝试着采取其他类型的市政体制。

第二种模式：委员会制。为了彻底消除旧的市长—市政议会制的弊端，改革派探讨着组建超党派委员会的可行性。委员会制早在 19 世纪 90 年代即已提出并经多次讨论，1900 年，得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市作为一项应急措施首次采纳。这年 9 月 8 日，飓风和海啸袭击加尔维斯顿市，破坏惨重。面对迫在眉睫的救灾

① 约翰·布鲁姆等：《国家的经历：美国史》，哈考特和布雷斯世界公司，1968 年，第 473 页。

和灾后重建任务，腐败的市政会议束手无策。改革派要求撇开市政府，成立一个5人委员会，全权负责各项工作。市议会批准了这一要求，由此诞生了委员会制。

在后来的实践中，委员会制不断得到完善。它一般适合于中等规模的城市，通常情况下将行政和立法权力合而为一交给一个5人左右组成的小型委员会；委员会的委员分别担任各行政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其中1人由委员会推选为市长，但其权力并不比其他委员大多少。1903年以后，委员会的委员由人民选举产生。1907年，艾奥瓦州议会在得克萨斯州样板的基础上采纳一种更完善的形式，通过的法令规定：允许本州2.5万人以上的城市采用委员会制；将创制、复决和罢免权作为城市政治机制的组成部分，并规定在超党派选举中提名委员候选人。该州的得梅因市率先推行，颇为成功，从此，委员会制便因所谓“得梅因理念”而著称于世。到1910年，已有100多个城市采纳委员会制；一战前夕，这样的城市超过400个，主要是中西部、新英格兰和太平洋沿岸诸州的中等城市；到1917年，采用委员会制的城市达到500多个。[①]

实践证明，委员会制具有显著的优点：它打破了传统的分权学说，将行政权和立法权集中于一个小团体手中，使得职责集中，易于协调复杂的政府活动；它实施了管理的部门化，每个委员各自负责市政府的一个部门，职责明确，提高了工作效率；委员会制下的责任制政府对于遏制城市老板专权也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然而，委员会制也存在体制上的缺陷：它破坏了分权与制衡原则，虽然有一定的制约机制存在，但容易造成委员的揽权

① 阿瑟·林克：《美利坚时代：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史》，第85页；詹姆斯·伯恩斯等：《民治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121页。

和专权；与此同时，委员会内部又存在权力分散现象，各个委员地位相等，没有一个负责的单一行政首长来对全市的行政负责，缺少一个中心机构进行宏观调控和规划，结果造成一个市有5个市长的局面。此外，由于不能保证委员会的委员是管理专家，因而委员会难以使得管理责任集中。针对这些缺陷，进步派对其逐步加以改进，在吸纳商业经营的经验之后，形成一种新的体制——城市经理制。

第三种模式：城市经理制。该体制最先在弗吉尼亚州的小城镇斯汤顿市得到试验。斯汤顿是个后起的工业城市，为了适应城市快速发展的需要，1908年市议会任命一名总经理来指导该市的工作，并赋予其较大的行政权力，效果很理想。改革家理查德·蔡斯对这种新的尝试很为关注，经过研究发现倘若将委员会制和这种试验结合起来，效果将更好。在他的积极鼓吹下，城市经理制很快成为改革家和企业界精英的“宠物”，被称为“市政改革的最新口号”。

采纳城市经理制最为典型的是俄亥俄州的戴顿。1913年，戴顿市遭到特大洪水，市长及市政会议无能为力，于是率先完整地采用此制。城市经理制保存了市政委员会制的优点，摈弃了其大部分弱点。在这种体制之下，超党派选举产生的委员会负责制定政策及法令，批准预算，并对委员会任命的市经理实行监督；市经理（通常是受过训练的专家）是单一的行政首脑，负责全市的行政事务，领导市政府各部门编制预算，执行委员会所制定的政策；二者职责分明，前者不得干预后者的行政事务，后者则必须在一切事务中对前者负责。

上述三种模式中，城市经理制是效率最高的一种。它既有宏观控制，又有分散管理，既能得到可靠而内行的管理，又不牺牲民主管理原则，因而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市政管理的科学化。正因

为此，城市经理制迅速推广，很快在很多城市取代委员会制。到1923年，采纳城市经理制的城市达300多个，特别是中小城市，普遍采用这一管理模式。[1]

进步主义时代结束时，权威人士在对美国状况作了调查之后认为，美国的城市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它清除了城市的社会罪恶，抑制了市政管理中的腐败。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它弥补了美国“都市政府结构中的机械化缺陷”[2]，推进了民众政治

现了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中西部诸州是改革的大本营，这里有被称为“民主实验室”的威斯康星，还有不甘示弱的艾奥瓦和印第安纳。东部纽约州查尔斯·休斯领导的改革波澜壮阔，新泽西州的“新思想运动”浩浩荡荡，最终导致进步主义改革家伍德罗·威尔逊的上台。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在西拉姆·约翰逊和威廉·尤伦执政时期的政治面貌也焕然一新。

〔州的耻辱和改革运动的兴盛〕　如同城市的情形一样，本世纪初年，腐化和特权在许多州猖獗一时。各州盛行党魁制度，党的权力总是集中在州委员会手里。通常由州委员会主席来组织州议会，控制立法，并与铁路和公司的说客打交道。代表铁路公司和企业界利益的院外活动集团，贿赂、收买州议会中的政党核心小组，成为“合法机构后面操纵一切的真正起作用的政府”。这种情形在密苏里等州最为典型。而由大公司和政党核心集团结盟控制州政的情况则在新泽西州达到极点。这里的企业和金融界领袖，实际上常常是位居优势的共和党的领袖，企业人员通常不必去贿赂议员或州政府官员。例如，铁路公司通过院外活动集团在 1903 年就安插了自己人出任州首席法官、司法部长、州审计员、保险业特派员以及州税务官员。另外该州的两名国会参议员都和公用事业有利害关系，而退休的司法部长则在 3 个公用事业公司中任董事。因此，州公用事业公司得以逃避政府的管理和税收。

各州反对党魁制度的斗争在 19 世纪 90 年代即已展开，到进步主义时代达到极点。20 世纪初年，既得利益集团牢牢控制着中西部各州占统治地位的共和党。1900—1908 年间，该地区受到一连串共和党人“反叛”浪潮的震荡。在威斯康星州的罗伯特·拉福莱特、艾奥瓦州的艾伯特·卡明斯、印第安纳州的阿尔伯特·贝弗里奇等人的领导下，中西部各州由保守共和党人的堡垒，一

变而为进步主义的大本营。随着新面孔的出现和新力量的得势，改革在一州又一州产生影响。明尼苏达、内布拉斯加、南北达科他、俄勒冈等州的新州长，也都成功地建立了进步主义的政府。这些改革中，最激进、最知名的进步主义领导者是罗伯特·拉福莱特。

东部地区，进步派的反叛带有更明显的城市色彩。这里的城市改革运动早就如火如荼地展开，其规模、程度和影响较之中西部地区毫不逊色。查尔斯·休斯在1906年和1908年当选为纽约州长，为了直接预选和公用事业以及铁路的公共管理进行了英勇斗争。新泽西州，1906年共和党人内部出现的“造反”行动揭开了“新思想运动”的序幕，并最终导致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1910年当选为州长。俄亥俄州于1912年通过新宪法，并选举民主党进步派詹姆斯·考克斯为州长。

太平洋沿岸各州的政治也大为改观，进步派取得了一些胜利，如加利福尼亚州的西拉姆·约翰逊、俄勒冈州的威廉·尤伦。到1912年，进步派领袖们已经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以致于当时所有的观察家都认为：1900年以来一场彻底的革命已经完成。

〔“好斗的鲍勃”与威斯康星州的改革〕　威斯康星提供了州级改革“最为成功的典范”。[1] 20世纪的头10年，在“最杰出的时代人物之一”拉福莱特的领导下，威斯康星州经历了巨大的变革。

罗伯特·拉福莱特（1855—1925年），出身于威斯康星州普里罗斯镇一个劳动者家庭，深受农业平民党人传统的影响，但未曾成为一个平民党人。1885年，年仅30岁的他竞选国会参议员获胜，成为第49届国会中最年轻的成员。他来自威斯康星州的第

---

① 约翰·格拉蒂：前引书，第234页。

三选区，身高仅5英尺5英寸，比绝大多数议员稍矮，满脸胡须，但与多数来自中西部地区北部的人一样，对共和党抱有强烈信念，所不同的是他比很多同事更有雄心。1885—1891年间，他连续3届出任共和党人国会议员。期间，以不妥协地反对腐败和企业对政治的控制而著称，1901—1906年出任威斯康星州州长。[①] 他的政治信仰中的一个基本信条是：一旦人民被妥当地告知、得到激励，人民将做出正确的选择，“(政党）机器的控制是建立在不正确的代表和无知之上的。民主建构在知情之上……击败老板和头头统治的惟一途径是保持人民完全知情。”[②] 他的政治生涯证明了这一点。在和保守的威斯康星共和党人政党机器的不断冲突和斗争中，拉福莱特借助强有力的诉诸人民的选举，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为此，他也获得了“好斗的鲍勃”的绰号。

作为州长，拉福莱特冲击了威斯康星州的政治结构。面对屈服于州内铁路和木材利益集团的保守共和党人的反对，他团结支持者赢得提名候选人的直接预选法、腐败行为法、限制竞选支出和游说活动的法律。在权力上，他本人变得有点像老板，当时的著名新闻记者马克·沙利文就曾这样评价道：“作为一名州长，拉福莱特在多年来不断地痛斥党魁制度之后，自己事实上也成了威斯康星州的党魁。”[③] 他无情地利用赞助，要求属下绝对的忠诚，一味地迷信于将复杂问题交给选民选择，从而常常使得问题被扭曲或过分地简单化了。他献身于诚实政府的事业，如同很多都市改革家一样，他认识到知识分子以及专业训练对于解决复杂的现

① 有关拉福莱特的早年政治经历，请参阅戴维·希伦：《罗伯特·拉福莱特与反叛精神》，里特尔和布朗公司，1976年。

② 约翰·格拉蒂：前引书，第235页。

③ S.D.加什曼：《“巨头”时代的美国》，纽约，1988年，第52页。

代政府问题的重要性，意识到州的某些职能要求高技术专家的知识。在他的推动下，威斯康星州政府创立了一些专门委员会和机构，来处理诸如铁路管理、税收计算、资源保护、高速公路建设这样的问题。他还建立了一个立法参考图书馆，以帮助制定法律的人起草法案时参考。在这方面，他充分利用了威斯康星大学的资源，成功地劝说经济学家B·H·迈耶尔、政治科学家托马斯·亚当斯这样的人出任公职，并且随时能够从理查德·伊利、约翰·康蒙斯、爱德华·罗斯这样杰出的社会科学家那里得到有关决策的咨询意见。

威斯康星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被称为“威斯康星理念”，西奥多·罗斯福誉其为“民主的实验室”。到一战爆发前，威斯康星已经制定了一整套管理文官、院外活动和竞选费用的法规；同时引入直接预选制、创制权和复决权。其他方面取得的改革成就更是不胜枚举，如童工、女工立法，公共健康和纯净食品法，资源保护立法，州对银行和铁路的控制，高额的公司税收等。威斯康星还是美国第一个颁布工人赔偿法和所得税法的州。

威斯康星的改革树立了一个成功的榜样。艾奥瓦（1901年）、阿肯色（1901年）、俄勒冈（1902年）、明尼苏达、堪萨斯（1904年）、密西西比（1904年）、纽约（1906年）、佐治亚（1906年）、内布拉斯加（1909年）、新泽西（1910年）和科罗拉多（1910年）等州纷纷效法。有些州内，改革者主要是共和党人；另一些州，改革者主要是民主党人；还有一些州内，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协同作战，共同推进改革事业。但是，所有这些州以及其他很多州，都受到威斯康星的“样板”作用的极大影响。20世纪初年，要求提供经验和建议的请求从美国各地涌向威斯康星的管理者。1910年，已有15个州建立了立法参考服务机构，

其间工作的大多数人都在威斯康星州接受过培训。[1] 直接预选制也很快普及到其他州；有些州在试图推进政府充分体现民意方面甚至走到威斯康星的前面。1902 年，俄勒冈在威廉·尤伦的有力领导下，开始尝试创制和复决体制。到 1914 年，11 个州（绝大多数为西部州）制定了这方面的立法，13 个州给予妇女选举权。[2]

〔“还政于民”与政治领域内的改革〕　州级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恢复代议制的、真正民主的政府。改革派认为，由政党机器控制的州政府已不再代表人民，因而提出“还政于民”的战斗口号，并在这一口号的指导下对州政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主要措施包括：

建立直接预选制。在进步主义获胜的各州，都有敢作敢为的改革派领袖，他们发动人民起来斗争，并在胜利后建立认真负责而卓有成效的政府。他们认为，如果代议制政府已告崩溃，那就必须建立新制度，以便于公众控制政党和政府。如何实现？首要的目标是建立直接预选制，以之取代党魁控制的代表大会提名的旧制度。在进步派看来，代表大会提名的旧制度为党魁提供了永远占据统治地位的便利手段。1900 年以前，美国市、州的选任官，都是由地区、县和州的党代表大会提名，这样的代表大会容易被收买或控制，通常从属于政党核心小集团。通过建立由人民直接提名候选人的制度，选民将较易而党魁则较难控制政党。直接预选制 19 世纪 40 年代首创于宾夕法尼亚州，但直到 90 年代才在地方一级广泛采用，且主要在南部地区实行。1902 年密西西比州首先通过强制性的全州预选法。1903 年拉福莱特领导下

---

① 约翰·格拉蒂：前引书，第 235 页。

② 约翰·格拉蒂：前引书，第 236 页。

的威斯康星率先采纳直接预选制。此后，预选制迅速传播到各地。到1914年，至少有30个州有了直接预选的有关立法；到1916年，只剩下罗得岛、康涅狄格和新墨西哥3个州未颁布直接预选立法。[①]

实行联邦参议员直接选举，以代替州立法机关的推选。直接选举联邦参议员是19世纪90年代平民党倡导的主张之一，1900年民主党也将其列入党纲。1894年、1898年、1900年和1902年，联邦众议院四次提出参议员直接选举的有关宪法修正案，但每次都遭到参议院保守势力的阻挠和拒绝。在此情况下，很多州转变策略，采取一种间接方法来达到直接选举参议员的目的，即：要求参议员候选人在预选中提名，并要求州议会候选人宣誓投由人民这样提名的参议员候选人的票。1909年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党魁”威廉·洛里默被选入参议院的“丑闻”发生后，群情激愤，改革出现新的推动力。1912年，联邦参议院被迫通过了关于直接选举的第17条宪法修正案，1913年5月31日法案生效。

争取创制权和复决权，以改进民主的政治机构的运行。许多进步派人士认为，即使在新的更民主的体制下，代议制政府也可能被特权势力所推翻。因此，必须求助于“最后的手段”，即赋予人民以“创制权”和“复决权”。借助于前者，选民可以在达到规定的选民百分数要求的情况下，直接制定违背立法机关意愿的立法。此时，立法机关必须对选民提出的法案予以考虑，如果立法机关拒绝批准该法案，它必须另外举行特别选举。选民们可在这种选举中表决通过或否决该法案。凭借“复决权”，选民可以否决立法机关批准了的违背广大民众利益的立法。1898年，

① 杰拉德·拉什：前引书，第52页。

南达科他州率先采用创制和复决的做法。继之，西部的犹他州、内华达州、蒙大拿州、俄克拉何马州等纷纷效法。在俄勒冈州，创制和复决得到最好的试验，1902—1910年间不少于32项措施被提交人民表决。[1] 1908—1915年间，另有15个州（包括东部、南部的一些州）规定了公民的创制权和复决权。此后，由于保守派的反击，加上广大选民无力对付立法过程中的技术问题，运动陷入停顿。

为了进一步保护公众利益，进步派改革家呼吁赋予选民撤换不称职选任官的权力，即“罢免权”。罢免的做法1903年始于洛杉矶，最初只限于市政部门和地方上的选任官，在实行委员会制或城市经理制的城市里比较流行。1908年，俄勒冈州将其应用于州和地方的选任官。另有9个州（大多为西部州）在1911—1915年间效法。俄勒冈、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内华达、科罗拉多、堪萨斯和北达科他7个州，甚至授予人民罢免法官的权力，结果激起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实际上，罢免法官的做法在实践中基本上没有出现过。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不少州对不合时宜的州宪进行了修订。据估计，1900—1920年间提出的州宪修正案多达1500条以上。[2] 此外，州政改革中还通过一些其他方面的立法，如反贿赂、组成政府经济效能委员会、加强科学管理等。

〔经济和社会领域内的改革〕　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改革派也发动了强大攻势，取得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

经济领域内的改革总的指导思想是：加强立法，建立对大企业、公用事业公司和银行的管理与控制，限制集中的经济权力以

---

① 约翰·希克斯：《美国民主简史》，里沃萨德出版社，1946年，第647页。

② 杰拉德·拉什：《伟大的转变：20世纪的美国史》，第52页。

恢复经济生活的平等。1900—1917年间各州通过的各种各样的管理立法几乎多得无法数清。为了管理商业，实质上每个州都建立了委员会，授权其查阅公司账簿，举行公众听证会。1900年以后，委员会又被授予采取行动的新权力，而不是消极的等待着投诉，有时还确定最高限价和运费。州级管理委员会的一些做法后来被吸收到1906和1910年的联邦立法当中。一些企业领导人也支持联邦立法，宁可接受统一的管理机构而不是面对无数分散的州委员会。

威斯康星的改革在很多方面走在前列。那里的进步派创立了由超党派专家组成的强大的铁路委员会；制定了累进制的州所得税法，加强了州税收委员会，着手迫使公司承担适当的管理费用；极力争取管理保险公司的法律，仅1907年1年就通过了20多项法案，并建立了一个州属小型人寿保险公司，以之作为核定私人公司收费率的评判标准。1911年，创立了一个工业委员会以实施该州广泛的劳工和工厂立法体系，此外，还建立了一个由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查尔斯·范·西斯为首的资源保护委员会。[①] 各州在对铁路建立有力的公共控制方面，也不断取得重大进展。1905年，威斯康星州议会通过拉福莱特州长的铁路委员会法案，至此，各州对铁路的管理运动达到高潮。到1914年，管理铁路的运动"变得如此声势浩大，铁路经理们当时只得求助于国会，使其免遭州委员会的侵害"。[②] 在对公用事业公司的控制等方面，各州的基本做法是通过各种委员会对公用事业公司和保险投资公司的收费标准、保险费、利率以及服务等进行专门的管理，这一运动在进步主义时代达到第一个高潮。

---

① 约翰·格拉蒂：前引书，第238页。

② 阿瑟·林克等著，刘绪贻等译：前引书，第97页。

威尔逊任新泽西州长期间（1911—1913 年），新泽西也经历了一场立法的风暴。在威尔逊的力促之下，该州立法机构制订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创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公用事业委员会，授权其评估铁路、煤气、电力、电话和运输（快递）公司的财产，为这些公司确定税率和收费标准。立法机关还通过了储存和食品检查法，并在威尔逊已经入主白宫的 1913 年制定了 7 个法案（俗称“七姊妹”法），大力加强州对公司的控制，从而为新泽西州赢得了“信用之母”这一无可争辩的声誉。[1]

其他州的经济改革运动虽然不象上述州如此壮观，但总体上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纽约州一项关于大的人寿保险公司的调查，导致了该州保险立法的深刻变革，并将主持这次调查的查尔斯·休斯送上了州长的宝座。随后他领导开展了其他进步改革。在艾奥瓦州，1906 年通过了管理铁路的比较强硬的新法律。在内布拉斯加，立法机关 1909 年创立了一个银行储蓄保险体制。大约与此同时，明尼苏达州开征遗产税，并设立一个州所有的收割机工厂来抗衡收割机托拉斯。佐治亚州提高了公司的税收。所有这些，还仅仅是各州通过的成百条立法当中列举的几个典型。[2]

在社会领域内，改革派以州的管理权为依据，置法院根据宪法第 14 条修正案而强加的限制于不顾，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在争取童工立法、女工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立法、建立赔偿和保险体制乃至发展公共教育等所谓“社会正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就。

世纪交替之际，美国的政治生活仍然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地方政治和州政府在一般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远比联邦政府突

---

① 约翰·格拉蒂：前引书，第 238 页。
② 约翰·格拉蒂：前引书，第 238 页。

出，因而各州的改革行动在消除工业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弊端方面作出的努力中占有重要地位。大规模的市政改革和州政改革，动摇了政党核心小集团的权力基础，简化了政府的组织形式，拓宽了公民参政议政的渠道，从而一定程度上刷新了美国政治的理论和实践。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内，改革派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其意义同样不容低估。1913 年，罗伯特·拉福莱特在回顾自己作为威斯康星州州长为人民所作的艰苦奋斗时，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在威斯康星州任职的叙述到此结束。这是一段充满斗争的岁月，但也是一个我乐于回顾的时代。这曾是一场极其值得进行的战斗。我希望人民按照它实际取得的成果对它作出评价，象它最终必将得到的评价一样。如果能够证明威斯康星州是一个较幸福较美好的居留之邦，其制度较民主，其所有人民都享有较平等的机会，其社会正义较近于普遍，其人民生活较安全和愉快——那么，我就会怀着进步运动取得胜利的心情而心满意足。"[①] 这段话至今读起来，仍然意味深长，发人深思。

---

① 《罗伯特·拉福莱特自传》，威斯康星州麦迪逊，1913 年版，第 368—369 页。转引自阿瑟·林克等著，刘绪贻等译：前引书，第 98 页。

第五章

西奥多·罗斯福与进步主义改革

美国研究西奥多·罗斯福及其时代的专家乔治·莫里说，麦金莱的去世，使进步主义运动在白宫有了一个发言人。[①] 随着市、州改革的深入，改革派不得不转向首都华盛顿，以求解决全国性的重大问题，比如对铁路和其他大公司的进一步控制和管理，银行体制的改革，关税政策的修订，自然资源的保护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单纯依靠某个州或者某些州的努力都无济于事。更重要的是，改革事业呼唤一个充满活力的全国性的代言人，而西奥多·罗斯福正是进步派所要寻找的人物。

一、罗斯福的反托拉斯斗争

罗斯福上台后，如何控制工业联合体的势力，纠正和防止由它所带来的流弊，促使社会适应经济结构的调整，依然是一个亟

① 乔治·莫里：《西奥多·罗斯福时代与现代美国的诞生》，纽约哈珀公司，1958年，第106页。

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罗斯福在总统的第一任期内，针对托拉斯这个20世纪初年美国最敏感、最关键和最错综复杂的难题，采取了惊人之举，复活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对一系列民愤极大的大托拉斯集团提起诉讼并迫令其解散，由此赢得了“托拉斯轰炸机”的绰号。

〔白宫最年轻的总统〕　1901年9月，麦金莱总统遇刺身亡，年仅42岁的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继任，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此前很久，罗斯福就已经设计好了入主白宫的打算，这一意外事件，只不过提前实现了他的愿望。对此他写道：“这样就任总统之职，是很可怕的事，但如果为此而感到可怕，那就更糟糕得多了。”①

罗斯福是一个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物，集诸多经历于一身，既是警察、牛仔，又是战斗英雄和为正义而战的勇士。他出身名门，毕业于哈佛大学，早年即立志从政，是忠诚的共和党人。1898年11月当选为纽约州州长。州长任内（1899—1900年）厉行改革，向公用事业公司开战，迫使它们在重大问题上接受公众的控制。为此遭到共和党内保守派的排挤。长期控制纽约共和党人的党魁托马斯·普拉特参议员深为不安，于1900年设法提名罗斯福为副总统候选人，将其撵出纽约州。

作为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罗斯福写过很多迄今仍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任纽约市官员期间，就因为贫民窟的状况而深感震惊，并开始倾听社会改革家的主张。他从未对那些一心只想赚钱的人表示过好感，谈起这些人时，他总是习惯性地带着蔑视和诋毁的口吻。他的大门总是对知识分子、诗人、奖项追逐者、牛

① 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下册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03页。

仔、艺术家和急性子的年轻记者们敞开着。

他是一个共和党人，而且是一个虔诚的共和党人。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固有的生活方式。他是一个贵族，而共和党就是“社会上最杰出的人”的党。他曾哀叹盎格鲁萨克逊人出生率的下降。早在19世纪90年代，他就是一个坚定的本土主义者，支持限制移民。此外，他发自内心地厌恶公共事务中的不诚实。控制纽约市的坦慕尼政党机器、腐败盛行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使得他甚至不曾考虑要做一个民主党人。

他之所以选择共和党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首先，共和党哲学并非仅仅专注于精英政治和贵族政治，它还强调努力工作、不断进取、过道德和诚实的生活。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之所以投共和党的票正是因为这一点。共和党人坚持说，它们是可靠的个人主义者，通过工业化给有才能的普通人和企业提供致富的机会，至少使得他们感到舒适和自立。对于这些看法，罗斯福表示赞同。其次，还有国家主义因素的作用。罗斯福是一个带有浓厚色彩的国家主义者，共和党人也都是“美国至上”的国家主义者。罗斯福喜欢知识分子，但前提是，在他看来他们对美国不是持过分批评立场。弗兰克·诺里斯的暴露性小说曾令他不安。同样是他带着蔑视的口吻称呼那些暴露社会阴暗面的新闻记者为“黑幕揭发者”。他信赖大企业家，但认为大企业家在个人的自私自利方面走得太远了。他主张穷人有权获得体面的工资和生活条件，但是，社会主义者和平民主义者令他怒气冲冲。

政治上，罗斯福是汉密尔顿哲学的信徒，希望建设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美国，其做法是建立一个能够满怀信心带领这个国家前进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他认为总统是“人民的管家，应该为

人民鞠躬尽瘁”。[①]

如同这个时代的许多美国人一样，他常常说有必要借助于促使政府提高“效能”来解决国家的弊病。他坚信，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在于，将真正的权力赋予品行良好的强人和能人。罗斯福从不信赖立法程序，在他看来，州立法机构和国会每每出差错，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些立法部门被搞得晕头转向、缺乏领导以及沉迷于琐屑之事。在日后的总统生涯中，只要有可能，他总是以绕过国会赞同的方式处理内外事务。

作为总统，他比前任更看重强有力的独立委员会在管理国家事务中的作用。这些委员会往往由专家组成，不受国会的干涉。罗斯福希望借助强有力的管理来解决国家的弊端，在这点上，同时期的新中产阶级在市州政府内、农民组织内、专业机构内以及商业和工业方面所做的一切目标是相同的。必须看到，强有力的独立委员会虽然被广泛称赞为民主之举并代表着人民利益，但根本不是必要的民主理念。公共权力集中于少数人之手，想当然地以为这些人带着良好愿望，但是，这一权力如何行使，仍然是一个问题。罗斯福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所关心的只是务必将品行端正之人任命到委员会之中。罗斯福对能人的强有力领导的乐观主义信念，使得他创造了一种新的美国政府的制度模式。

罗斯福继任总统之后，政治上发挥自己才能的空间受到很大局限。他继承了麦金莱的政府，国会为保守派所控制，共和党组织紧紧地掌握在正统派手中。然而，他并未烦躁不安，而是充分利用自己进入白宫之前已积累的十余年从政经验，纵横捭阖，寻找良机。他博学多才，易于接受谋士意见，上任后即着手弄清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一一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他网罗了一

① 布卢姆等：前引书，第204页。

批出色的顾问和僚属到联邦政府部门供职，改组了联邦机构，十分巧妙地摆脱了共和党“党魁”马克·汉纳对党内事务的操纵，确保了官吏的任命权。他留用麦金莱的陆军部长伊莱休·鲁特并提升其为国务卿，任命威廉·塔夫脱继任陆军部长、吉福德·平肖任森林局长、詹姆斯·加菲尔德任内政部长，后两人是著名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

〔打击托拉斯："托拉斯轰炸机"〕　罗斯福就任之初，围绕关税和货币政策，国会即已闹得不可开交。作为一个渐进主义者，他决定先采纳参议院保守派对此问题的政策建议。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工业合并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政府有无能力控制”托拉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年，托拉斯的成长和壮大日益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突出现象。对于托拉斯的活动，不同阶级、阶层和集团的人们作出了大量的反应，各级政府也相应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到 19 世纪 80 年代，各州除了颁布铁路运费法令外，还通过了一些局部性的不完整的反垄断法。1890 年时，至少有 14 个州和领地（均在西部和南部）的宪法条文中包含有反托拉斯的条款，另外 13 个州通过了反托拉斯法。[①] 然而各州法律条文差异颇大，州的立法既不能摧毁垄断企业，也不能恢复竞争。1890 年，联邦政府在公众的强烈要求下通过了反托拉斯的“谢尔曼法”。法令规定：“凡以托拉斯或其他类似形式的契约和联合，以及限制州际贸易及对外贸易为目的的秘密协议，均属违法。任何人如缔结此类契约，或从事任何此类联合或秘密协议，均应认为犯罪”；“任何人如独占，或企图独占，或同任何其他个人或多人联合，或阴谋独占州际或对外商业和贸易的任何一部分，均应认

① 阿瑟·林克，《美利坚时代：19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美国史》，前引书，第 111 页。

为犯罪”，并规定受害者有权起诉，追回3倍的赔偿费。然而，垄断资本家反对该法，认为是对合法商业的打击，对经济发展不利，因而在司法部执行过程中处处掣肘；加上存在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难题，实际上司法部门未能认真执行该法，因而“谢尔曼法”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徒有虚名。1895年，联邦最高法院就“联邦诉奈特公司案”作出判决，宣布州内商务垄断不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打击之列，此举再次表明联邦政府无力控制托拉斯。

1895—1904年的公司合并高潮招致了广泛的忧虑。许多企业家（如罗斯福的好友、伯利恒钢铁公司的乔治·帕金斯等）为企业经营中的毁灭性竞争和非人道行为所震惊，开始希望政府对企业行为进行适当管理，以之作为改变混乱状况、恢复经济常态的手段。全国消费者联盟要求联邦政府保护消费者利益，反对大企业的胡作非为。一些进步派则担忧财富和权力集中于一小撮人之手将加剧不平等，构成对美国民主体制的威胁。共同的愿望（出发点不同但目标一致）促使联邦政府在大企业的管理上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1899—1900年间，国会内部掀起一股修改反托拉斯法的浪潮。一项旨在推翻奈特判决的宪法修正案被提交国会表决，结果由于未能获得2/3多数票赞成而流产。1900年，众议院以绝对优势的票数通过一项修改“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法案，但因参议院的阻挠而搁浅。同年，国会工业关系委员会提出一份关于托拉斯与工业联合的初步报告，总结关于垄断公司制的两种看法：一种意见偏向大公司，认为大企业为美国经济带来了许多好处，如节省资本与劳动，统一商标和专利垄断、集中管理、综合许多企业的管理技巧、有利于出口贸易等等；另一种意见对大公司持有异议，大肆指责大公司裁减雇员导致失业，采用不公正的竞争手

段提高产品价格，实行投机和股票掺水，大搞运费歧视，牟取市场垄断等等。[①] 对托拉斯认识上的这种分歧，直接影响到联邦政府在此问题上的政策取向。虽然到20世纪初年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由政府对大公司实行适当控制，但针对诸如如何控制、控制到何种程度之类的问题，并未达成共识。

罗斯福原则上不反对大公司，相反，认为它们是进化过程中必然的、富有成效的部分，因为大公司效能高得多，可以调动大量资金用于资源的开发、协调性的合作，消除“浪费性”的竞争。罗斯福总是羡慕有权势者，倾向于支持他们，放手让他们去干。然而，事实证明，这些有权势者中的某些人不恰当地运用自己的权力。因此，罗斯福相信，已经到了主权者——人民通过他们的联邦政府介入并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罗斯福政府选择反托拉斯作为本届政府工作的突破口，还有一定的政治上的考虑。反托拉斯作为一个政治性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主要是由于一些托拉斯企业招致了社会广泛的不满。罗斯福的反托拉斯政策的目的，一开始就不是要从总体上消灭托拉斯，而是就事论事有针对有选择地打击那些最劣迹昭彰的托拉斯企业。他从来没有认为摧毁托拉斯就可以解决当时存在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热衷于拆散托拉斯的人。他执政的7年间所提出的反托拉斯诉讼，甚至少于他“保守的”继任者塔夫脱在位4年所提出的数量。[②] 在1901年12月4日提交国会的咨文中，罗斯福定下了对托拉斯政策的基调，认为政府所要做的应该是监督、控制

---

① 路易斯·哈克编：《美国经济史主要文件集》第2卷，新泽西1961年，第7—11页。转引自李剑鸣：《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32页。

② 理查德·阿布拉姆斯：《进步的负担：1900—1929》，斯考特和福雷斯曼公司1978年，第69页。

和管理托拉斯而不是简单地禁止垄断。他说："我们的目标不是清除大公司，相反，这些大型企业是现代工业发展不可避免的产物，那些企图破坏它的努力必然是无效的……我们并不是攻击大公司，我们只是要去除其中的污垢。"① 他还说，"我个人的经验使我相信，……所要寻求的目标并非对所有企业联合不问目的如何一概加以禁止，而是采取监督的办法以防止有害的企业联合，从而保证所有发生的联合都有利于公众的利益。"② 任内，他反复强调这种观点，认为"这是一个联合的时代，任何阻止所有联合的努力不仅是无效的，最终也必然是错误的。"③ 美国史学家阿布拉姆斯甚至认为，罗斯福是工业合并的热心支持者，因为"在他的国会咨文、公开演说和私人信件中都充满着对为了提高效率而重建美国工商业的努力的同情"。④

罗斯福当政时期复活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并开始大规模地起诉大垄断公司。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北方证券公司。

北方证券公司是在金融家摩根操纵之下于1901年组建的一个铁路垄断集团，是由北方太平洋铁路、大北方铁路、芝加哥—伯林顿—昆西铁路三家铁路公司联合组成的庞大控股公司，控制了美国西北部的铁路交通运输。在它组建之前，金融界的巨头摩根公司、洛克菲勒集团、詹姆斯·希尔和E.H.哈里曼为了控制西北交通生命线，竞相争夺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结果引起1901年华尔街的金融恐慌。恐慌给不少经纪人带来灾难，也引起公众对残酷无情的投机活动的关注。随后，这些金融巨头达

---

① 杜威·格拉海姆：《西奥多·罗斯福》，新泽西1971年，第55页。

② 李剑鸣：《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前引书，第132页。

③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纽约，1979年，第223页。

④ 理查德·阿布拉姆斯：《进步的负担：1900—1929》，前引书，第69—70页。

成协议，共同组建了北方证券公司。公司共拥有4亿美元股份，其中含有30%的水分。公司的成立，也立即引起美国西北部地区农民的焦虑不安，他们担心铁路运费会随之上涨。

罗斯福觉得北方证券公司的成立大有文章可做，表示要在法庭上来检验该公司的合法性。在其指示下，司法部长诺克斯开始秘密收集证据。1902年2月19日下午，诺克斯宣布政府将控告北方证券公司违反谢尔曼法，消息传出，华尔街为之愕然。妄自尊大的摩根派律师与司法部长诺克斯商谈解决办法，以失败告终。结果双方只好对簿公堂。经过一年的努力，罗斯福赢得了诉讼案的胜利。1903年联邦法院下令解散北方证券公司，翌年，最高法院维持原判。罗斯福认为，此案"意义之重大是无法估量的"。它为联邦政府采取行动拆散那些庞大的、最具破坏性的联合，开辟了道路。

罗斯福任内，政府还对另外40余家公司提起诉讼。鉴于出售牲畜和牛肉消费者的普遍不满，1902年开始对"牛肉托拉斯"提出诉讼。1906—1907年开始起诉的美国烟草公司、杜邦公司、纽黑文铁路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同样不得人心。1911年，美孚石油公司案和美国烟草公司案以联邦政府获胜告终。通过这些诉讼，终于确立了一项原则，即根据最高法院的判断，倘若涉嫌公司确曾对自由贸易施加了不合理的限制，那么联邦政府事实上拥有宪法赋予的摧毁垄断的权力。

罗斯福当政时期，根据"谢尔曼法"对托拉斯提起一连串诉讼，司法部起诉18次，受理起诉25次，其总数超过以往历届政府提出的总和。[①] 北方证券公司、牛肉托拉斯、美孚石油公司和美国烟草公司等都在司法部的起诉之下被迫解散。为此，罗斯福

① 阿瑟·林克：《美利坚时代：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史》，前引书，第113页。

赢得了“托拉斯轰炸机”的绰号。

罗斯福任内，还实现了反托拉斯的制度化，使得反托拉斯逐渐成为美国政府一项长久的政策。为了弄清楚哪些工商业应由政府管理以及如何进行管理，设立公司管理局成为当务之急。然而在国会内，有关改组商务劳工部、下设公司管理局的议案，遭到了保守的共和党参议员的强烈反对。在搞清楚阻力所在之后，罗斯福指控约翰·洛克菲勒是幕后的主谋，一时间群情激愤，舆论哗然。1903 年，法案得以较快地获得通过。改组后的商务劳工部下设公司管理局，全权调查企业活动，负责收集企业合并、托拉斯、垄断的有关材料以备司法部门起诉之需。同年，国会通过另一法令——“紧急处置法”。为确保反托拉斯诉讼的有效开展，法案规定增加司法部内反托拉斯局处理反托拉斯事务的律师人手及费用。反托拉斯局一开始拥有 5 名检察官，并在 5 年内可支配 50 万美元的拨款；1908—1935 年间，该局的年度拨款一直维持在 10—30 万美元之间。[①]

〔罗斯福反托拉斯政策的评价〕　西奥多·罗斯福的反托拉斯政策，根植于他的思想体系——新国家主义。

首先，他看到了经济力量的集中是一种趋势，认为大公司是“现代工业制度的不可避免的发展”，承认大企业的优越性及其存在的合理性，认识到工业的发展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和大有裨益的，因而认为要摧毁公司一般说来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破坏托拉斯的做法并非适合于大多数企业，大企业降低了生产成本，并为国家赢得了世界的工业领导地位。“公司的惟一的过错在于规模太大，但因此而将其解散是办不到的事，除非政府也废

---

① 哈罗德·福克纳：《自由放任主义的衰落，1897—1917 年》，哈珀和罗出版公司 1951 年，第 185 页。

除蒸气、电力、大城市”，需要的是“应该持续不断地由见多识广的内行来管理”，只有联邦政府才适合这一任务。[1]

罗斯福不认为工业分裂为小单位会解决问题，认为必须树立联邦行政部门的权威，以便利用反托拉斯法来对付垄断或公然的不正当行为。对于现代工业的合并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经济难题，罗斯福具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他信任内行的管理人员，怀疑公众偏激的情绪；赞同提高联邦政府的权威，以之促进公众利益。从根本上来说，他不是与工商业为敌，认为公共利益不要求联邦政府对工商业进行惩罚，而是要由联邦政府对其实行内行的有效的管理，以防止以掠夺为目的的工商业的种种弊端，并鼓励有责任感的工商业发展其生产力。正是抱着这种理念，罗斯福开始实施他的管理战略。

其次，他注意到了经济活动中托拉斯的弊端和民众对它的不满和敌视情绪，因而主张采取相应的措施。随着大工业的兴起，私人权力大大膨胀并有超过政府权力的趋势。早在1888年，作家查尔斯·艾略特就在一篇文章中提醒世人，作为组织单位的大公司在规模和影响上都已远远超过了各级地方政府。例如：某一铁路公司在波士顿设立的办事处，共雇佣职员1.8万名，年收入4000万美元；而当地的马萨诸塞州政府机关，雇员不过6000人，年收入仅700万美元。[2] 相形之下，后者显得黯然失色。这种情况还是发生在企业合并远未达到高潮时期，进入20世纪以后，就连联邦政府也失去了昔日的光辉。例如，1901年组建的拥有10亿美元资本的钢铁托拉斯——美国钢铁公司所集中的资本，就足够支付当时联邦政府所有部门两年的开支。有感于此，后来

---

① J. 布卢姆等：前引书，第206页。

② 伍德罗·威尔逊：《新自由》，纽约，1913年，第187—188页。

的威尔逊总统曾在一次公开的演说中忧心忡忡地说："如果这些人大到足以拥有整个美国政府，我想他们是会去拥有它的"。[①] 罗斯福也有同样的忧虑，"当大企业使得很多典型的中产阶级公民感到经济上的威胁时，它们使他（指罗斯福）感到了政治上的威胁。罗斯福并非一个担忧被大企业挤压的小业主，也不是一个担忧涨价的消费者，他是一个在行使权力过程中遇到强大对手的政治家"，对于罗斯福来说，"反托拉斯行动当然部分是作为一种满足公众要求政府有所作为的呼声的方式，但主要是作为一种加之于工商业的威胁，以此来迫使企业界接受政府的调节。"[②]

在 1901 年 12 月递交给国会的国情年度咨文中，罗斯福写道："巨大而高度复杂的工业发展……使我们面对……一些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既然工业变动已如此巨大地增强了人类的生产能力，那么（那些过去曾经有用的法律与习惯）就已经不再够用了。"[③] 言下之意，为了顺应时代变迁所提出的新要求，必须对传统的法律与习惯作适当的调整与改革。罗斯福的反托拉斯理念和实践表明，他的反托拉斯行动并非针对所有的大公司。他将托拉斯区分为"好"、"坏"两种类型，并强调"目的不在于废除公司……而仅仅是努力去消除其中的邪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通过管制与监督方法给公司带来好处"。他还强调：在反托拉斯中，"我们的分界线必须按行为而不是按财富来划分：我们反对某一公司，并非由于它规模之大，而是因为它行为不轨"，对于通过自然增长而获致的垄断，政府应予以监督，使之不致危害社会；对于人为攫取的垄断，则可诉诸反托拉斯法。

---

① S.D. 凯什曼：《"巨头"时代的美国》，前引书，第 63 页。

②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前引书，第 222 页。

③ 李剑鸣：《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129 页。

第三，罗斯福的反托拉斯含有保护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一面。他曾严厉指责那些鼓吹毁灭托拉斯的人，说他们是共和国的敌人；同样，他也谆谆告诫那些反对政府干预的资本家，最好采取合作的态度接受政府的管理，以免招致社会极端势力的侵害。他还强调，只有能保护公司免受不正当侵犯的人，才能受托反对公司的错误行为，从而维护公众利益。在 1908 年 1 月的致国会咨文中，罗斯福认为反托拉斯行动将不可避免地要损害某些企业的利益，但是，那些受到损害的企业正是从长远看来会给整个国家带来损害的企业。[①] 实际上，从长远看，罗斯福的国家干预政策给企业界带来的并非损害而是利益。虽然国家干预意味着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政府干预的目的不是恢复自由竞争时代的经济秩序，而是调整大公司与社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政府所限制的是只是一些企业主的“短视行为”，维护整个企业界的整体利益，缓和因垄断公司制出现而造成的社会紧张状况。罗斯福反反复复地强调，自己的职责是把“资本的主人从他们自身的愚蠢行为中解放出来”，与那些拼命企图维持现状的人相比，自己的做法更为“明智”[②] 也正因为此，被视为“托拉斯轰炸机”的罗斯福在 1904 年大选时仍然能够得到华尔街大佬们的慷慨解囊，其数额高达 500 万美元之巨。

总之，从罗斯福反对托拉斯的理论和实践来看，作为资产阶级整体利益代表的他至少有以下几重考虑：第一，消除经济活动中的某些极端的邪恶现象，缓和资本主义内部的各种矛盾；第二，使大公司免遭“不正当的侵犯”，阻止摧毁托拉斯的“毁灭

---

① 杜威·格拉海姆：《西奥多·罗斯福》，前引书，第 57 页。

②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纽约 1979 年，第 218 页。

性力量发生作用"；第三，作为其当政时期各项政策的突破口；第四，借助反托拉斯诉讼向国会施压，促使国会加大立法力度，加快立法进程。

二、"公正施政"

20世纪初年的联邦政府在着力调整经济领域内的某些不适应时，也在社会领域内加强立法。调整劳工政策，缓和劳资冲突，加强保护劳工和保护公共利益的立法，便是其中一个方面。在1901年递交国会的第一个年度咨文中，罗斯福要求政府拥有的部门和企业率先垂范，制订出保护童工和女工的法令，使政府成为一个"好雇主"，对于全国性的劳资关系问题，则未加论述也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案。但在后来的实践中，罗斯福政府逐渐形成比较明确的政策，其指导思想便是限制垄断资本流弊，改善下层人民处境，从而缓和剧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罗斯福本人将这一做法冠之为"公正施政"。

〔"公正施政"的推行〕　罗斯福就任总统之后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政策变化，是针对劳工问题。与以往的政策不同，他试图采取仲裁而不是单纯压制的方法来解决工人的罢工问题。

19世纪末年，美国政府在劳资关系问题上一向"机械地偏袒资方"。这种态度在1894年芝加哥的普尔曼工人罢工问题上得到集中体现。芝加哥罢工发生后，联邦最高法院裁定组织工人罢工的工会活动"阴谋阻碍贸易"，并援引"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发布罢工禁令。结果，联邦政府据此派出军队，凭借武力强行镇压了罢工。罢工失败后，一些工会领袖还以"蔑视法庭罪"被判监禁。当时的美国政府对待劳工的政策就是以暴力镇压，而对引起罢工的经济和社会原因及其表现，诸如恶劣的工作条件、过长

的劳动时间、过低的劳动报酬、伤亡事故的频繁发生、劳动保障的缺乏、普遍存在的大量雇佣童工女工等等现象，则视而不见，对有关这方面的抱怨则听而不闻。19 世纪末年，在受雇于制造业和矿业中的工资收入者家庭，有 1/3 至一半的人极端贫困，全年收入不足以维持任何一种“舒适或过得去的状况”。[①] 世纪之交时，美国的阶级矛盾更趋尖锐，工人罢工此起彼伏，成为美国政府亟待解决的一个紧迫问题。

在罗斯福看来，工人的联合和工会的兴起具有必然性，因而反对法院在劳资冲突中滥用禁令压制工人。1902 年 4 月，罗斯福在一次演说时声称：“对劳工和资本来说，这都是一个大联合的时代。这些联合在许多方面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使它们都必须在法律之下活动，有关它们的法律则必须公正而明智，否则它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做出坏事来。”[②] 此后不久，罗斯福便面临着 1894 年普尔曼工人罢工以来又一次“工业战争”的严峻考验。

1902 年 5 月，宾夕法尼亚州无烟煤矿工人举行罢工，要求资方承认工会，实行 8 小时工作日制，增加 10—20%的工资。卷入罢工者多达 15 万人。拥有煤矿的铁路公司不愿同矿工联合会进行谈判，并雇佣非工会会员从事生产，导致流血冲突，伤亡多达 60 余人。在冲突过程中，劳工的行为表现得有秩序有纪律，并愿意将纠纷提交仲裁，日益赢得公众的同情，但资方毫不妥协，只是一味地坚持要求政府派兵镇压罢工者，结果罢工一直持续至 10 月份。此间，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曾派遣民兵 2000 人前往矿区维持秩序，但无济于事。

随着燃料的缺乏以及严冬的迫近，公众对矿主的不满加剧。

---

① 阿瑟·林克等著、刘绪贻等译：前引书，第 45 页。

② 转引自李剑鸣：《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第 143 页。

同情工人的罗斯福对于缺煤情况焦虑不安，但对于介入争端犹豫不决，原因是这样做无先例可循，且直接涉及总统的宪法权限以及契约自由和财产权利等美国人的基本信条问题。10月初，在事态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罗斯福召集劳资双方领导人到白宫进行磋商。工会领袖约翰·米切尔再次提出将争端交付仲裁，但矿主方面执拗不从，反而要求总统颁布禁令，并于必要时动用军队迫使工人停止罢工。这种"傲慢的愚蠢"态度激怒了罗斯福，促使他决定动用军队去接管煤矿并组织煤炭生产。形势趋向紧张，有关方面加紧调解，在摩根本人的协助下，矿主接受了妥协的解决办法。经商定，劳资双方同意：矿工复工，由总统任命一个委员会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仲裁。12月份，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委员会组成。罗斯福告诫委员会要秉公办事，"要努力在无烟煤矿区将雇主与工人的关系建立在一个公正而永久的基础上，并尽可能地消除重新引起你们将要去解决的这些困难的原因。"① 经过前后近4个月的调查研究，调查委员会于翌年3月裁定：矿工工资提高10%，非工会工人与工会工人应得到平等待遇；矿主与矿工之间的所有争执均由一个6人委员会（双方各指派3名成员）协调解决，协调未果时由当地联邦巡回法院一名法官作最后仲裁。这个折衷性的裁决结果，得到矿主和矿工双方的认可，且双方都声称自己获得了胜利。对此，《纽约论坛报》在3月22日评论道：委员会的报告"赋予这场争端的一方以胜利，但胜利的一方既不是工会，也不是矿主，而是第三方，那就是广大公众。公众的利益尽管常被劳资双方及其热心的斗士们所忽略了，但却

---

① 约瑟夫·毕肖普：《展现在其信件中的西奥多·罗斯福及其时代》，纽约1920年，第1卷第218页。

是永久的"。[①]

〔"公正施政"的评价〕　西奥多·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头一位召集劳资双方到白宫解决争端的总统，是头一位使双方都接受总统任命的委员会裁决的总统，也是以接管煤矿相威胁而迫使一个重要工业部门的资本家就范的第一位总统。这一切与1894年普尔曼罢工期间联邦政府的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罗斯福政府对1902年劳资纠纷的仲裁，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开创了美国国家政权干预劳资关系的先例，使得联邦政府首次以公共权力机关的角色进入以往纯属私人契约的领域实施干预与调节。调查委员会根据罗斯福关于在公正而永久的基础上确立雇主与工人之间关系的思想，建立了调解劳资纠纷的长久机制，为其他企业处理劳资关系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模式。裁决比较公正地处理了工人和矿主间的纠纷，使得工人的意志首次得到重视，工人的要求部分地得到满足。这一划时代的变化，"不仅反映出现代社会利益多元化的趋势，而且表明工人可以在现行制度的框架内争取自己的利益。"[②] 同时，仲裁的成功初步树立了罗斯福作为"强势总统"的形象，提高了他的政治威望，有助于推进在其他领域内的改革。

1904年大选期间，为了赢得工人的选票，罗斯福大肆渲染自己对无烟煤矿工人罢工的调解，标榜自己的政府不偏不倚，既不为富人，也不为穷人，而是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的正派公民，自己所奉行的是一种"公正施政"。

实际上，罗斯福政府对劳工政策所作的调整，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自南北战争及其重建以来，美国两党间的政策差异越

---

① 约瑟夫·毕肖普：前引书，第218页。

② 参见李剑鸣：《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第150—152页。

来越小，历届政府不管党派所属，均实行“亲企业”的政策。联邦政府日益投向企业界的怀抱，行政部门也多为亲企业界的人所掌握，结果，民众普遍认为政府成了有钱有势的工业家们的掌上玩物。罗斯福试图改变联邦政府的这种不光彩形象，让人们相信自己所主持的政府代表的是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个阶级、某个集团的囊中私物。正因为此，他反反复复地大谈特谈“公正施政”，强调说：“我在劳工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应当时时与我对资本家采取的行动联系起来考虑，而这两者都可概括为我所喜欢的一个公式：对每个人都实行公平施政。”①

另一方面，激烈的社会矛盾尤其劳资冲突推动了罗斯福政府在劳工政策问题上进行调整。19世纪末年，劳工对于飞速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垄断资本主义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主张“纯工会主义”的劳工领袖认为，劳工运动的目的在于获得较好的工资报酬和适当的工时限制，其手段是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利用罢工作为最后的武器。比较激进的劳工活动家认为，只有一个更人道的社会秩序才能不断改善人的处境，因而主张广泛的社会改革，包括土地改革、采取新的银行和货币体制，甚至对经济的主要部门实行政府所有。工会内的少数极端分子甚至要求展开反对资本主义的暴力战争，通过战争消灭所有形式的权力，包括政府本身。社会主义作为一股激进力量也在世纪之交兴起，组建于1901年的美国社会党公开宣称，它的目的在于“把工人阶级及其同情者组成为政党”，以期“取得政府权力，并用以达到将现有私人占有生产和分配手段的制度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目的”，为此提出了一个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

① 李剑鸣：《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第153页。

会诸领域内的改革方案。[1] 劳工运动的发展和激进社会主义的兴起，对于“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震惊了统治阶级，直接推动了统治集团的变革。19世纪90年代，美国工人只有1%是工会会员，到1914年，工会会员占了工人总数的6%。1900—1904年间，工会会员就由86万多上升至200万。[2] 统治集团惊恐地将工会的成长和工人大规模罢工称作“劳工的大起义”。持续的罢工及其达到的暴力程度，也不断在一般公众心中激起种种忧虑。比这“更为可怕”的是经常谈及革命、宣称“通过被剥夺阶级的公开反叛来‘解放人类’的左翼社会党人。1904年的总统选举中，社会党候选人得到42万张选民票，对此，罗斯福惊呼：社会主义的成长“远比昔日任何平民主义运动或类似的运动可怕”。一年以后，他又说道：“那些最富有者的愚蠢，他们的贪婪和傲慢，以及企业和政治中的腐败，已经趋向于在公众心目中造成一种极不健康的亢奋和愤怒状态，这一点从社会主义宣传鼓动的猛烈增长中得到很好说明。”[3] 比较开明的联邦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在1906年强调说：“应付目前社会主义的及烦扰不宁态势的惟一途径在于，着手处理并消除每种不公正的现象。”[4]

然而，调解也并非罗斯福政府处理劳资纠纷的惟一办法。对于不同情况下发生的不同罢工，罗斯福政府则采取不同的对策加以处置。针对1903年6月亚利桑那领地莫伦西矿工因反对该领

---

① 小阿瑟·施莱辛格：《美国政党史》第1卷，纽约，1980年，第2490页。

② 小奥蒂斯·格拉海姆：《伟大的运动：美国的改革和战争，1900—1928》，前引书，第23页。

③ 雷·金吉尔：《过剩的时代：1877年至1914年间的美国》，纽约，1965年，第299页。

④ 理查德·阿布拉姆斯：前引书，第43—44页。

地禁止地下矿井中超过8小时工作日的立法而掀起的罢工，罗斯福应邀派遣正规军前往，一举加以平息。1904年7月芝加哥屠宰业工人举行罢工时，罗斯福政府采取了观望立场。同年，科罗拉多的克里普尔—克里克发生罢工，州长请求罗斯福派兵弹压，罢工工人则要求总统派兵保护工人以使他们免遭州民兵的镇压，但罗斯福对双方的要求均置之不理。由此可见，罗斯福对待劳工方面并非一味地加以偏袒，对待企业主方面也并非执意地加以压制，总体而言，他是“林肯以后第一位能够比较理智、比较公正地对待工会的总统”。[①]

〔1904年选举〕　在前总统麦金莱遇刺的阴影笼罩之中，继任的罗斯福度过了他的第一任总统生涯。此间，个性特征非常鲜明的罗斯福总统轰轰烈烈地展开打击托拉斯的运动，打破常规利用政府的权威插手劳资纠纷，充分树立了作为“有为”总统的良好形象。他所取得的这些政绩，为争取下一届总统连任提供了政治资本。

对于一向高傲且富有强烈自尊心的罗斯福而言，1901年9月“踏着麦金莱的坟茔”而继任为美国总统毕竟是一件不够风光、让人悲哀的事情，他自己看重的则是在1904年大选时“以自己的名义”谋求总统职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在继任总统后便刻意培植自己的亲信和势力：为了协调与共和党内党魁们的关系，他不惜压抑个性，刻意逢迎，前倨后恭；为了确保党内的提名，他对可能成为障碍物的共和党党魁马克·汉纳软硬兼施；为了能扩大共和党在传统的民主党势力范围——南部的影响，他借助官职任免来改变南部的政治力量构成，并打破常规，邀请黑人领袖、教育家布克·华盛顿到白宫做客并兼任官职任免工作顾

① 李剑鸣：《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第154页。

问；为了扩大政治影响，阐述自己的施政方针，他曾自东向西作横贯大陆的旅游，发表演说，笼络人心；为了争取普通选民的支持，他强调要废除特权，扩大个人机会，声称自己的“天然盟友是农民、小商人和高级技工”，即那些“德智体三方面都根本健全的”中产阶级美国人；为了博得企业界的欢心，他不得不故作亲近姿态；为了迎合保守派，他重弹关税和繁荣问题的老调。①

1904年6月23日，在芝加哥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一致推举罗斯福为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候选人是印第安纳州的现任联邦参议员查尔斯·费尔班克斯，此人是一个82岁的富翁。两党的竞选活动也形成鲜明对比。罗斯福方面志在必得，不但有大公司大企业主们的钟情和慷慨资助，而且赢得了心存感激的劳工界对“公正施政”的回报；民主党方面则死气沉沉，直至败局已定时，总统候选人A·B·帕克才起而攻击罗斯福的竞选负责人乔治·科特柳从一些大公司得到竞选费用。帕克的指责并非完全捕风捉影，企业界确实为罗斯福的竞选出了大力，其中摩根捐献了15万美元，美孚石油公司捐献了12.5万美元。据1912年国会一个委员会的调查，1904年共和党的竞选费用中，大公司和企业主的捐款占了72.5%。

此次大选，共和党获得压倒优势的胜利。罗斯福获得57.4%的普选票，帕克获得37.6%的普选票；罗斯福赢得选举人票336张，帕克仅获得140张。罗斯福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

① 参见李剑鸣：《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第159—160页。

三、政府与企业

1905 年 3 月 4 日，西奥多·罗斯福开始了总统生涯中的第二任期。与此同时，大量进步派人士通过选举进入市镇、各州乃至联邦的行政和立法部门，进步主义改革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罗斯福开始新的总统任期时，联邦政府以及各州的改革均已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并不断深化。州级改革在中西部以及其他地区开展得轰轰烈烈，成效卓著；城市改革深入到“结构性的制度改革”阶段。改革思潮广为传播，改革理念深入人心，改革主张广泛张扬，标榜“进步派”成为时尚。所有这些，促使不久前凭借自身优势而获胜的罗斯福总统一反昔日的谨小慎微，思想上、行动上更趋激进和强硬，最终成为举国瞩目的进步主义“领袖”。

〔加强对铁路的管理〕　罗斯福第二任开始时追求的首要目标是加强对铁路的管理。早在 1904 年 12 月，他就在递交国会的年度咨文中系统地阐述了下一阶段改革的重点，内容涉及管理铁路、保护资源、劳工立法、节约政府开支、改进农业、反对腐败以及改善环境等等。其中，管理铁路位居首位。

铁路问题一直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上下非常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由于铁路运输中严重弊端的存在，早在 19 世纪 70、80 年代美国社会上便掀起一场要求政府管理铁路的运动。迫于压力，国会于 1887 年通过了第一个管理铁路的法案——州际贸易法。法案禁止铁路联营、歧视、运费折扣及短程收费高于远程等不正当行为，规定运费必须公平合理，铁路公司应公布运费表，并设立州际贸易委员会负责执行。但是，铁路公司对州际贸易委员会试图取消运费回扣加以抵制，联邦最高法院也在 1896—1897 年的几次判决中裁定州际贸易委员会无权确定铁

路运费，因而铁路经营中的种种不公正现象依然如故。19世纪最后几年，铁路经营更趋混乱，剧烈的竞争不仅加重了一般货主的负担，而且也给铁路利益集团带来一定损失，运费回扣逐渐成为铁路公司的包袱。于是，铁路巨头、货主连同政府官员，共同寻求有效的联邦控制措施。

罗斯福一向反对铁路的国有化，认为不能用不明智的政策去危害铁路这一经济生活的命脉。他上任后递交的第一篇国情咨文声称：州际贸易法作为一项实验，尽管其目标是明智的，但规定却不恰当，因而必须加以修改。1903年，在期望营造有序竞争环境的铁路公司经理们的要求下，国会通过了禁止运费回扣的"埃尔金斯法"。该法案同时还规定，任何偏离已公布运费的行为均属违法。然而，回扣之风禁而不止，各铁路公司随意变动运价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在此情况下，亟需制定新的法律，授权州际贸易委员会规定合理的、一视同仁的运费率，制止不公平的做法。中西部农场主和中小商人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最为强烈，为了对立法施加影响，他们组建了"州际贸易法大会"，积极开展院外游说活动。一些铁路公司也逐渐认识到与单一的联邦权力机关（而不是众多的州委员会）打交道的可取之处，但总体上倾向于保守的司法部门而不是州际贸易委员会。绝大多数铁路公司、享有特权的货主以及保守经济理论的信徒则强烈反对联邦政府规定运费率，认为此举将意味着授权全国政府规定价格，而规定价格一向被视为私人企业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权。

罗斯福在1904年的大选后意识到铁路问题的严重性，决定新任期内首先应着力解决这个紧迫的问题。在他看来，自由放任主义并非神圣不可侵犯，只有合乎道德的大公司行为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既然铁路公司的行为违反道德，那么，实施国家的干预和政府的管理就势在必行。在1904年度的国情咨文中，罗斯

福定下了管理铁路立法的基调，其基本点包含两项内容：其一，虽然不能授权州际贸易委员会确定运价，但委员会应有权根据货主的申诉展开调查，在证实某一运价确系不合理之后，可以制定新的合理运价取而代之；其二，法院有权对委员会的这一决定进行复审。为实现这一目标，罗斯福积极进行活动。1904 年和 1905 年间，他反复敦促国会授权州际贸易委员会调整货主所不满意的运费率，国会随之展开了漫长的辩论。各派力量纷纷登场，围绕着管理铁路立法时州际贸易委员会的权限、法院的作用、州际贸易委员会决定的生效时间以及法院禁令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大致说来，进步派主张授权州际贸易委员会确定铁路运价，保守派倾向于法院拥有最后的决定权；进步派主张将司法复审权局限于"程序"方面，保守派倾向于赋予法院"宽泛的"复审权，即法院有权对案件的事实作出重新解释；关于委员会决定的生效期限，进步派倾向于缩短，而保守派则力主延长，保守派还坚持赋予法院废止和取消委员会命令的权力，罗斯福代表的进步派则竭力反对法院拥有如此绝对的权力。①

1906 年 1 月，众议院通过艾奥瓦州国会众议员彼得·赫伯恩提出的铁路法案，授权州际贸易委员会在货主申诉时降低既定运费。参议院内的保守势力对此议案横加阻挠，铁路公司还发动一场全国性的宣传抵制运动。罗斯福针锋相对，发表了一系列激烈的演说予以还击，并大谈特谈关税改革，以之向参议院内的共和党保守派和企业界施压，迫其就范。5 月份，在罗斯福总统的活动下，一项折衷的修正案提出并获得通过。6 月份生效的"赫伯恩法"对"州际贸易法"进行了修订，扩大了州际贸易委员会的权限，授权州际贸易委员会可根据货主的申诉进行调查活动；废

① 李剑鸣：《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第 173 页。

除现行的不合理的运费率，另行规定新运费率，从而剥夺了铁路公司定价的最后控制权；铁路方面可就委员会的决定向法院上诉，倘若法院认可委员会的决定，铁路公司则必须执行。“赫伯恩法”还规定铁路公司实行统一的成本会计制度以消除核算上的舞弊，并要求铁路公司在规定的年限（1908 年）以后放弃铁路以外的财产。

“赫伯恩法”大大加强了州际贸易委员会的职权，摆脱了过去那种管理铁路时“只能诊断而不能开药方”的困境，建立起了联邦政府对铁路的有效监督和管理机制，其后几年，法令得到较好的实施。在最初的两年内，委员会就受理了 31053 起货主投诉案，而在 1906 年以前的 18 年中，总计受理的案件仅仅 873 起。此后，在拉福莱特等进步派的进一步推动下，铁路管理立法又取得新的突破。1910 年在进步派努力下通过的“曼恩—埃尔金斯法”进一步加强了州际贸易委员会的职能，授权贸易委员会中止铁路公司的普遍提价，并据其动议修改运价；规定设立贸易法庭以直接听取该委员会的控诉，规定电话、电报、电缆和无线电公司为运输业范畴。1913 年又通过法令规定州际贸易委员会对铁路公司资产进行估价，并以之作为订定运价的基础。至此，联邦政府基本上确立了对铁路的比较全面、有效的管理和控制。

1906 年，国会还先后通过几项其他立法。一是“雇主责任法”，它要求从事州际贸易的所有雇主必须为因工伤亡的雇员及其家属提供补偿，但在实施过程中被最高法院裁定违宪。二是“食品和药物卫生检验法”，此法早经众议院两度通过，但在参议院受阻，塞缪尔·亚当斯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揭露了专利药品的危害性，唤醒了社会舆论，加速了法案的最终通过，但最初 20 年间由于拨款不足没有得到很好实施。三是“联邦肉类检验法”，作家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屠场》（1906 年）对推动该法的颁

布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小说对芝加哥肉类加工行业极不卫生的生产过程作了详细的、生动的、有的甚至是令人恶心的描写，充分暴露了肉类加工业中令人吃惊的糟糕状况，引起广大消费者的严重关注。在舆论的推动下，罗斯福下令进行对肉类加工业进行专项调查，并最终促成此法的通过。同年，罗斯福还向国会提出一系列有关社会改革问题的建议，如废除童工、制定有效的工人赔偿法等，但国会未予采纳。

〔政府与企业间的“协作”〕　　历史学家在论述20世纪初年罗斯福政府的进步主义改革时，往往较多地、片面地强调政府与大企业的对立。这一点，尤其突出地体现在对待罗斯福的反托拉斯政策问题上。实际上，如上文所述，罗斯福的反托拉斯，本意不在于摧毁托拉斯，而是借此树立政府的权威，迫使企业界接受政府的行政干预和调节措施。逐渐地，垄断资本家也开始理解罗斯福政府的用心，甚至开始寻求政府的帮助，而罗斯福政府的政策表明政府的控制也并没有原来想像中的那样“可怕”。于是，政府与企业界、尤其是与大企业间逐渐建立起一种“合作”的关系。

1903年建立的公司调查局在政府与企业界的相互合作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一些历史学家曾指责该局缺乏“独立性”，可实际上公司调查局从来就不是一个反托拉斯机构。该局首任局长加菲尔德曾几次强调该局收集的资料不会用于反托拉斯诉讼。[①] 当时美国政府建立公司调查局主要是为将来可能的立法做一些调查和取证工作，在具体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公司调查局实际上成为美国政府与企业界之间相互沟通和联络的桥梁。加菲尔德在工作报告中说，该局的政策是“与工商界合作而非对抗……

① 加布里尔·柯尔可：《保守主义的胜利》，纽约，1963年，第75页。

正直的商人无须有任何疑虑”。[①]

一般说来，大企业都愿意同公司调查局合作，以避免被送上反托拉斯诉讼的法庭。1904年罗斯福就曾同美国钢铁公司董事长加里达成一项协议，加里保证：“如果在任何时候政府认为美国钢铁公司应该受到调查，你都将有机会检查我们的所有账本和记录，如果认为我们做错了，我们将证明我们是正确的或者我们加以改正。”[②] 同样，在公司调查局调查美孚石油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牛肉托拉斯等大企业时，这些垄断企业都愿意与之合作，提供所需资料，而公司调查局也保证为这些资料“保密”并不用于反托拉斯诉讼。当美国经济出现异常情况时，政府与企业界的合作还超出了公司调查局的范围。1907年的经济危机期间，罗斯福的财政部长亲赴纽约与摩根财团的银行家合作在各个银行之间融资以挽救证券市场，当摩根提出通过证券市场由美国钢铁公司购买由一些银行掌握的田纳西钢铁公司的股票，以使这些银行免于破产时，罗斯福默许了这笔交易，尽管这种做法明显地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③]

四、保护自然资源

研究罗斯福的美国学者普遍认为，罗斯福总统对美国乃至世界作出了一个最大贡献，那就是大力倡导和推动自然资源保护运动。罗斯福执政期间，大力推行自然资源保护政策，先后将美国各类土地2.35亿英亩收归国有（其中林地面积近1.5亿英亩），

---

① 加布里尔·柯尔可：《保守主义的胜利》，第77页。

② 加布里尔·柯尔可：《保守主义的胜利》，第79页。

③ 陈伟硕士论文：《论1901—1917年间美国政府的改革政策》，1991年华东师范大学。

使国有森林数目由41个增至149个，创立了51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建立了包括自然和历史等方面的18个国家纪念地。在资源保护领域内，他实行积极的国家干预政策，大力起用科学专家并采纳他们的建议，明确提出了以发展、持续、公平、效率为指导原则，以森林保护为中心环节，对水土、森林、牧场、矿产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进行全面保护，大力制止劫掠、浪费和破坏自然资源行径，提倡节制使用的长远的综合性的自然资源保护目标。罗斯福的这一理论和实践，为日后美国经济、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美国和世界的环境保护史开创了诸多先例，为世界各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①

〔*自然资源保护运动的兴起*〕　早在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即有人开始关注自然资源的保护问题并为此展开活动，但主要局限于民间，且多系自发的、零星的活动，因此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和效果。20世纪初期，由于罗斯福总统的大力提倡和推动，自然资源保护运动开始形成为一场全国性的、全社会普遍关注的大规模运动。

自然资源保护运动的兴起，从根本上说是人类在充分认识到工业化进程中对资源的过度掠夺和对环境的过分破坏之后所采取的一种补救和防范措施。长期以来，沉溺于"天定命运"论色彩之中的美国人自认为美国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绝，肆无忌惮地对广阔的西部大陆进行着挥霍性的开发和攫取。19世纪最后30年间，工业化掀起新浪潮，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浪费和破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过度的森林砍伐、土地开垦和草原放牧，导致土壤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大量流失，旱涝灾害频仍，沃

① 孙崇波：《西奥多·罗斯福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思想》，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9届年会论文。

土良田变成荒野。根据罗斯福的好友、后来出任森林局长的森林专家吉福德·平肖的估计，按照1910年的开发速度，美国的林木资源不够30年之用，每年仅密西西比河冲走的沃土就达4亿吨之巨，约有100平方英亩的肥沃土地被毁。森林的砍伐减少了河道上游水库的蓄水能力，导致河道淤塞，水位下降，既影响通航又影响到农业灌溉。自然环境的恶化也给稀有动植物带来灭顶之灾，野生动物遭到肆无忌惮的捕杀，很多物种濒临灭绝。19世纪末年的美国人还以极端浪费的方式进行煤炭、铁矿、石油、天然气等矿藏资源的开采。平肖指出，由于不科学的采掘方法，煤炭的采掘率仅有一半，另一半煤或质量稍次的煤，只好重新埋入地下且永远无法开采；使用煤时则仅有5%的能量得到利用；石油、铁矿采掘时的浪费同样惊人。这样下去，美国的无烟煤仅够用50年，烟煤可用200年。为此，平肖呼吁全国民众关注这些问题，为保护自然资源而战。[①]

罗斯福自幼热爱大自然，阅读过大量有关自然界的书籍，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曾接受过多门自然科学课程的正规教育和训练，并进行过大量的野外科学考察。1884—1886年间，他在达科他州当过两年的牧场主，一边经营牧场，一边从事野外狩猎、观察和研究动物，同时从事西部史研究。西部生活的经历不仅使罗斯福的感情更加接近于自然界，而且使他对西部干旱缺水、土地荒芜废弃、牧场主的疾苦等有了切身的了解和体会。这一经历以及个人爱好和思想认识，深刻影响了罗斯福对自然资源保护的看法。早在1887年，罗斯福就与自然科学家乔治·格林内尔一起建立了

① 吉福德·平肖：《为保护自然资源而战》，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6—7页、123—124页。转引自李剑鸣：《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第177—178页。

布恩—克罗克特俱乐部并创办《森林与河流》杂志，倡导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罗斯福在任俱乐部主席期间（1888—1893 年），俱乐部为保护黄石国家公园、推动公园保护法的制定、建立国家动物园以及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做出了巨大贡献。美国有学者认为，美国自然资源保护运动就是由布恩—克罗克特俱乐部所开创的。纽约州长任内，罗斯福同样关注自然资源的保护。在向州议会提交的第一篇年度咨文中，他提出要严格执行保护森林、动物和鱼的法律，随后不久便调查和改组了州的渔业、森林和野生动物委员会。他还盛情邀请平肖到阿尔巴尼，听取其有关自然资源保护的意见。1900 年 1 月，罗斯福在第二篇州长年度咨文中，详细阐述了自己关于自然资源保护的政策思想，论及的问题包括森林保护、森林火灾预防、洪水、河流污染、土壤流失和水利建设、野生动物保护以及森林与水流的关系等等。这在美国各州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同年 11 月，在"致全国水利大会的信"中，罗斯福又较全面地阐述了对全国自然资源保护的政策思想，提出了由联邦政府领导和资助发展美国西部的水利事业，修建水库，保护森林，防止水土流失，改变联邦政府自然资源管理职权分散和效率低下的状况，实行专家管理等主张。到这时，罗斯福关于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实行全面的国家干预的思想已经非常明晰。他在总统任内所推行的一系列自然资源保护政策，不过是这一思想和主张合乎逻辑的发展。

〔*罗斯福与自然资源的保护*〕　保护自然资源是罗斯福早就专注的一项事业。到罗斯福执政时期，这项事业开始取得辉煌的成就。

1901 年 12 月，罗斯福在递交国会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用了将近 1/4 的篇幅阐述自己的自然资源保护政策和主张，为本届政府的自然资源保护政策定下了基调。第一任内，罗斯福采取的

主要行动是加强对西部贫瘠土地的开发。1900年以前，西部很多州广泛兴建灌溉工程，但其中绝大多数由于财政原因而告中断。来自内华达的国会参议员法兰西斯·G·纽兰兹提议联邦政府设立开垦局、建立专项基金来支持灌溉工程的修建。法案首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但在众议院却引起激烈辩论。众议院“党魁”约瑟夫·坎农抵制该法案，罗斯福总统则为法案的最终通过提供了积极支持。1902年6月，“纽兰兹法”经罗斯福签署而生效。根据“纽兰兹法”的规定，组建了一个土地开发署，具体负责西部灌溉工程的修建和管理，开发署的主要成员是各类工程师和专业人员，人数多达400之众。为了促进西部土地的开发，建立了开垦区，移居开垦区的人在定居5年并耕作一定面积的土地后，即可获得80英亩土地，每年向政府支付20—30美元灌溉费用，政府利用这笔钱再去兴建新的水利设施，由此形成良性循环。“纽兰兹法”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到1920年，已经有约120万英亩的土地因此而得到开发。

罗斯福更重视的是森林资源的保护。在他看来，森林是整个自然资源良性循环的关键，水土的保持，环境的美化。野生动物的生息繁衍，林木资源产业的发展，无不与森林息息相关。但现实情况是，所有资源中森林资源遭受的毁坏和威胁最为突出。从克利夫兰当政时起，联邦政府就已经收回成百万英亩的林地，开辟为国有森林保留地，禁止私人任意砍伐。到罗斯福上任时，国有森林保留地的面积已经达到4641万余英亩。然而，国有林地的管理存在严重弊端。管理权分属于农业部的森林局和内政部的土地总署，后者掌握了决定性的权力，但对森林保护既无兴趣又缺乏专业知识，结果根本无法实行集中的有效的管理，在罗斯福和森林局长平肖的艰苦努力下，国会最终同意将森林管理权划归农业部。平肖领导的森林局在罗斯福总统的大力支持下不断发展

壮大，它的年拨款数由 1899 年的 2.8 万多美元剧增至 1908 年的 357 万多美元。它的影响也不断扩大，不仅仅成为一个高效的管理机构，同时也是保护自然资源运动的信息中心和宣传部门。

罗斯福所追求的另一个目标是建立新的森林保留地。入主白宫的头一年，他就下令建立了 15 个森林保留地。此后迫于压力，直至 1905 年一直没有采取新的举动。国会内代表自然资源保护运动反对派利益的议员，利用立法武器，极力阻挠扩大森林保留地。1907 年 2 月，该派势力在讨论一项关于农业部拨款的提案中附加上一条款，规定非经国会同意，不得在西部 6 州[①] 开辟新的森林保留地。当时农业部急需经费，罗斯福必须签署这项议案，但在签署法令的前 4 天，他突击下令将 7500 万英亩的林地划归国有，此面积相当于迄今美国所有森林保留地面积的总和。至此，美国国有林地达 150 个，总面积达 1.5 亿英亩。与此同时，罗斯福和平肖极力主张国家的森林理念应该进一步扩展，这最终导致了 1911 年法案的通过。该法允许国家获得大面积的东部林区，森林保护由此扩展至整个大陆。此外，罗斯福还在矿产资源、野生动物、风景名胜的保护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下令将 6500 万英亩矿产资源划归国有，禁止私人开采；建立了 53 个野生动物保护区，禁止任何猎杀活动；改善了国家公园的管理，下令建造 18 处国家历史纪念地。

在自然资源保护运动掀起的同时，一种名为自然保留的运动也一度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

自然保留运动最具戏剧性的领导人是约翰·穆尔。由于受到大卫·梭罗有关自然思想的影响，穆尔在约塞米蒂峡谷度过多年，并徒步穿越内华达山脉。他说，自然是一扇“开向苍穹的门户，

① 这 6 州是：俄勒冈、华盛顿、爱达荷、蒙大拿、科罗拉多和怀俄明。

一面反射造物主的镜子”，必须作为疲惫的现代人类的一帖兴奋剂而加以保留。在别人的帮助下，他在1890年取得一个重大胜利。是年，国会建立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专门保护这里优美的野生环境。1892年，他协助成立了旧金山山脉俱乐部，借以促进保留主张。一个时期内，穆尔和平肖是相互仰慕的盟友，然而两人的目标分歧颇大，一个赞成保留；一个主张有计划的利用。当羊群被许可在林地放牧时，穆尔对由此招致的花草破坏感到吃惊；平肖则认为这是对林地的明智利用，只要这种放牧适度即可，因为林地提供了必要的食物。19世纪90年代后期，两人针对应该采取何种原则来管理设立的新的森林保留地发生争论。1897年国会颁布“森林管理法”，此举表明平肖的主张赢得了胜利。

罗斯福虽然热爱荒野，但他非常赞成平肖的做法。强有力的管理，集中的规划，让资源结出硕果造福于人类社会，所有这些对于罗斯福都有强大的吸引力。在罗斯福总统的鼓励下，平肖将森林服务从一个为木材商人提供信息的小办事处，改造成为一个由意志坚决的森林学家组成的充满活力的、努力保护森林资源以免其遭到毁灭性的过度利用的大军团。在此过程中，罗斯福还极大地拓展了资源保护的概念，使之适用于水力资源和矿产资源。1903年，他否决了一项允许私人在田纳西河的麻瑟尔滩建立水坝和电站的法案，主张由国家来承担这样重大的工程。当政期间，他将3500个水力基址保留为国家所有，他甚至促使平肖撤销了2500个内河水电站，声称打算在这些地方设立守林站。1907年，罗斯福又在第7次年度国情咨文中提出了综合开发美国水资源的设想，以便将主要河流建成集发电、灌溉、航运于一体的综合水力体系。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田纳西河流域工程实际上便是将这一设想付诸实施。

罗斯福深知，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不是一代人、一个国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全人类永恒的一项事业。为此，必须唤醒全体美国人乃至全世界的人们共同关注、参与这一事业。1908年5月，在他的倡议之下，美国第一次全国性的自然资源保护大会在华盛顿召开，应邀与会的有44名州长、国会两院代表、最高法院法官、联邦政府内阁成员、70名民间团体代表、专家学者以及4名公民代表。罗斯福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着重阐述了自然资源保护的意义，其中说道："让我们牢记，自然资源的保护……不过是而且是另一个更大问题的一部分……这就是确保这个国家的安全与延续的国家效率和爱国义务问题。"[①] 同年12月，罗斯福又在白宫主持了第二次自然资源保护大会。在两次大会的推动下，各州相继成立了保护自然资源协会，全国性的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也于这年6月宣告成立。1909年2月，罗斯福总统还于离任前夕在白宫主持召开了北美保护自然资源大会，出席者包括加拿大、纽芬兰、墨西哥和美国的代表。罗斯福还计划发起召开自然资源保护国际会议，结果由于任期届满无果而终。

〔与"老卫士派"的分歧〕　1907—1908年间，罗斯福与共和党内"老卫士派"间的隔阂和分歧加深。这一点尤其突出地体现在自然资源保护问题上，罗斯福所采取的保护自然资源政策，触犯了靠掠夺自然资源发财致富的西部利益集团。经营私有灌溉工程的人反对"纽兰兹法"；牧场主、矿业主、林木业主抗议政府实行森林和矿山的国有化；电力公司对罗斯福多次否决将水力基址赠予私人企业的法案心怀不满；在公共禁地内偷牧牛群和偷伐木材的人因为遭到政府起诉而怀恨在心。国会越来越采取

① 罗伯特·凯利：前引书，第482页。

敌对态度。罗斯福任命的内河航道委员会提出控制河流和河水的建议，国会对此不予理睬。国会还拒绝提供经费出版乡村生活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主张联邦政府资助农村学校、道路、农村电气化和农民合作社。

1907年秋季的金融恐慌及其后短暂经济萧条的出现，加剧了罗斯福与“老卫士派”之间的分歧。虽然这次经济衰退有着复杂的原因，比如生产设备的扩大超过了当时国家近期的消费能力，银行和货币制度的不健全，金融家毫无节制的投机活动等等，但是，保守的工商界却将其简单地归结为罗斯福政府的经济政策。恐慌消逝后，罗斯福敦促国会采取行动，铲除美国金融体制的弊端，国会授权以参议员纳尔逊·奥尔德里奇为主席的专门委员会研究货币和银行政策并提出报告。与此同时，罗斯福谴责对金融恐慌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的“投机倒把、贪污腐化和舞弊欺诈”等行为。在1907年12月和1908年1月的两次国情咨文中，表示要进一步进行改革。其措施包括：所有州际企业改组为有限公司并由联邦政府加以管理；联邦政府对股票市场加以管理；限制反对劳工的禁令；对劳工争端进行强制性的调查；将8小时工作制法扩大至联邦政府雇员；征收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罗斯福还严厉批评工人赔偿法，认为该法违宪；谴责“来自掠夺的财富”，说有钱人干了不少蠢事，肆无忌惮地反对“工商业中每一项为了诚实而采取的措施”，还私下警告说，如果富人和不明是非的法官迫使工人的命运变得不堪忍受，那么，势必会爆发革命，若不改革，资本主义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①] 这些刺耳的话，加剧了保守派的不悦。

---

① J.布卢姆等著：前引书，第215—216页。

五、塔夫脱主政：改革的停顿

〔1908年的选举：塔夫脱上台〕　1908年是四年一度的大选年。早在1904年，罗斯福就已经明确宣布不再谋求连任，并抵挡住了人们打算再度提名其为总统候选人的诱惑。实际上，罗斯福早已选好了自己的接班人，此人就是威廉·塔夫脱。

在罗斯福看来，塔夫脱是执行他既定方针的理想人选。塔夫脱来自共和党传统的势力范围——中西部的俄亥俄州，曾任联邦法官、菲律宾总督，罗斯福执政期间担任过四年的陆军部长，持有较为保守的进步主义观点，一向支持罗斯福的政策。他出身于老世家，受过东部教育，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博学多才，享有较好的个人声望。罗斯福的青睐以及共和党内的一致支持，使得塔夫脱轻而易举地获得党内的提名。

塔夫脱遇到的竞争对手是民主党候选人威廉·J·布赖恩。1908年，民主党人第三次挑选布赖恩作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布赖恩声称自己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合法继承人。事实上，自从1900年总统选举以来，布赖恩的思想已远远超出自由银币问题。1905年他曾出国作环球旅行，期间拜访了俄国社会主义作家托尔斯泰。回到纽约时受到隆重欢迎，随即开始争取第三次总统候选人提名。布赖恩的偶像——托马斯·杰斐逊一向攻击财富具有天生的剥削性质，在这次竞选中，布赖恩的焦点是资本的力量。平民党人早已形成了猛烈攻击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要求对公司进行广泛的控制甚至收归国有的传统。布赖恩可以自由地利用这些遗产，同时求助于他在欧洲所学到的新鲜知识。

总体而言，布赖恩呼吁一种所谓的"积极的自由"。他倡导公用事业的公共所有（即所谓"煤气和自来水社会主义"），要求

终止证券市场的投机，要求废除童工，制定严格的纯净食品和药物法案，改革金融体制，以便通货能够以产量收益为基础、而非简单地根据国库地下室内的黄金储存量来发行。由于公开地支持罗斯福，布赖恩开始赢得民主党内日渐壮大的进步派别越来越多的支持，这些人开始将民主党不信任强大政府的传统置于一边。为了赢得龚伯斯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以及不断斗争中的劳工运动的支持，在1908年选举中布赖恩要求法院不得像过去那样随意地发布反对工人罢工的禁令。布赖恩的进步主义还增添了一些新内容：主张众议院的民主化；强调直接预选和创制权、复决权；要求降低关税；要求建立银行存款保证金以便保护工人的积蓄；倡导对托拉斯进行控制；倡导直接选举参议员以便消除公司的操纵，甚至主张禁止公司捐献竞选资金。

长期以来，布赖恩将自己视为改革派的当然领袖，将自己看作罗斯福之后的“合法继承人”。实际上，除南部以外，其他地区占优势的态度都对他不利。他普遍地受到蔑视，被人看不起，那些受人尊敬的人把他当作一个可笑的、目空一切的家伙。在他们的心目中，他只不过是一个狂妄自大的农村激进派。总之，布赖恩是一个受人蔑视的少数团体中的一员；他是南方的候选人，他所参加的三次总统竞选很少赢得南方以外州的支持。得意洋洋的共和党人北部和西部，以无可怀疑的优势操纵着这个国家。一个佐治亚州的参议员说：“南方被有效地置于美国政府管理方面的一切影响之外，就好像它是一个英国的皇家殖民地所应该的那样。”① 此外，布赖恩的基督教福音主义，他的关于人类之爱及和平主义的喋喋不休的说教，使其遭到世故的人们的嘲弄。他被视为一个没有多少学识的人、一个无知的人，一张滔滔不绝的说

① 罗伯特·凯利：《美国过去的塑造》，第2卷，第488页。

着话的嘴。他知道北方佬带着逗乐的鄙视对待他。因此在选举中他无视西部和南部之外的那些地区，除了北方的都市工人阶级。他坚信，自己是在替美国生活中的弱势者说话。

不出预料，本次选举布赖恩再次败北。塔夫脱以52%的普选票和321张选举人票而当选总统，布赖恩赢得了162张选举人票。共和党人虽然连续第四次在总统选举中赢得胜利，但由老卫士派、中西部市民、城市进步派和西部农民运动派所组成的共和党“联盟”内部的不融洽和裂痕在不断增加。1906年和1908年选举时，共和党人丢掉了众议院的一些议席，1908年又有几个州长的职位输给了民主党。

〔谨小慎微的塔夫脱总统〕　1908年赢得胜利的塔夫脱并不适合于做总统。他体态龙钟，行动迟缓，与充满生机活力的罗斯福恰成鲜明对比。更重要的是，他在性格和信念上均属于保守派。他忠诚于有权者当政的信念，政治上优柔寡断，缺乏老到，不善手腕。他认为总统不应该干涉立法过程，不愿充分行使总统权力，惧怕行政权力的扩大会侵犯政府其他部门的传统权力。在他看来，法官是社会争端的适当仲裁人，他敌视工会，怀疑直接民主。

塔夫脱是在进步派急于采取行动之际就职的，上台之前他曾承诺要实现罗斯福的纲领，但上台之后却处处谨慎从事，不愿迈大步前进。这一点颇令进步派失望。不久，塔夫脱便处于共和党内“造反派”的敌对包围之中。这些抱成一团的共和党参议员和众议员“造反派”主要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北部地区，喜爱罗斯福当政时期的做法，期望将改革运动进行下去。

塔夫脱并非对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历史发展大势毫无认识，他也认为必须变革，但内心的保守主义促使他不是特别喜欢变革。上台后他组建了一个保守的内阁，其中5名保守派是公司律

师。

进步派对塔夫脱的不满首先表现在关税问题上。在竞选过程中，塔夫脱曾表示希望适当降低关税，上台后他“履行诺言”召集国会特别会议着手这项工作。期望低关税的西部进步派指望塔夫脱承担起关税立法的领导重任，在促成关税的下调上有所作为，但塔夫脱根本不愿在此问题上施加自己的影响。结果众议院通过的一项关税提案只是降低了某些关税，并拟征收1—5%的等级不一的遗产税。1909年，共和党“造反派”在参议院发动猛烈攻势，以便正在讨论中的“佩恩—奥尔德里奇关税法”能够削减关税。但保守派操纵的参议院删除了草案中关于征收遗产税的条款，并对众议院早先通过的提案作了800多处修改。进步派转而联合民主党人，竭力主张征收所得税。结果进步派与保守派达成妥协：同意对股份公司征收2%的公司所得税，同时保证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以便征收个人所得税合法化。此后，两院组成的协商委员会对许多税率表作了适度修改，但大多数修订的税率有利于制造商，而不利于农民或消费者。最后通过的“佩恩—奥尔德里奇法”体现了关税保护主义者的胜利。共和党“造反派”认为塔夫脱应该对此负责，因为他保持缄默从而事实上给予了关税保护主义者以支持。关税问题上的争论，疏远了中西部“造反派”议员及其选民与塔夫脱总统之间的关系。同年9月，塔夫脱多次发表演说，责备进步派投票反对他所认为的“共和党所曾制订的最好的关税法”。

〔*共和党的四分五裂*〕　国会内的共和党“造反派”。议员还试图通过限制议长的权力来改革众议院。20世纪初年，众议院议长约瑟夫·坎农延袭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沙皇”托马斯·里德所确立的体制，行使着专制的权力，独揽一切委员会的任命权，从而事实上控制了整个立法的过程。1910年，国会重新开

会。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乔治·诺里斯领导下，共和党人“造反派”联合民主党人通过决议，剥夺了坎农对众议院程序委员会的控制，将议长的不少权力转移给众议院程序委员会，从此，委员会的任命由全体议员作为一个整体、通常通过政党核心集团来实现。这一变化显然是进步的，诺里斯说：“我们希望众议院代表人民，每个成员的想法都能够得以体现和表达。”①

随后，共和党人“造反派”又抛弃所谓的“党派忠诚”，与民主党人联手修改了塔夫脱总统提出的铁路议案。该议案包括三项内容：授权州际贸易委员会自行决定税率；设立拥有广泛权力可以复审州际贸易委员会决定的商务法庭（此条意味着一向保守的司法部门享有决定性的否决权）；准许铁路公司取得竞争性线路。进步派团结民主党人支持第一项内容，抨击其他两项，并成功地取消了第三项。同时将电话和电报公司也纳入州际贸易委员会管辖的范畴，并规定将铁路资产的实产估价作为决定公平合理的运费率的根据。后来，参议员奥尔德里奇与民主党人达成交易，以同意接纳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加入联邦为条件，换取民主党人同意撤销关于实产估价的规定。最终通过的“曼恩—埃尔金斯法”（1910年），授权州际贸易委员会中止铁路公司的普遍提价，并据其动议修改运价；规定设立贸易法庭以直接听取该委员会的控诉，规定电话、电报、电缆和无线电公司为运输业范畴。这些规定，进一步加强了州际贸易委员会的职能，使得联邦政府对铁路的管理在罗斯福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进步派与保守派在铁路管理问题上的新一轮较量，使得共和党“造反派”与塔夫脱的隔阂加深。针对共和党“造反派”的不满与反抗，塔夫脱采取报复手段，拒绝任命他们担任公职，并试图在1910年中期选举

① 约翰·格拉蒂：《1865年以来的美利民族》，第236页。

中击败他们。

在资源保护问题上，塔夫脱也同样表现出保守的立场。他所任命的内政部长理查德·巴林杰是全国有名的敌视自然资源保护运动的分子。在塔夫脱的同意下，巴林杰将几百万英亩公地和许多有价值的水力基址出售给私人公司，而这些地方恰恰是前总统罗斯福所信赖的好友平肖早已安排停止出售的。此时平肖仍任森林局长，在得知巴林杰帮助摩根和戴维·古根海姆共同控制的辛迪加购买了阿拉斯加的一处国有煤田之后，便将此事提请塔夫脱处理。结果没有料到塔夫脱处处为巴林杰开脱，平肖为此忿忿不平。随后不久。杂志上出现了两篇攻击巴林杰的文章，平肖虽不是文章的执笔人但提供了其中的某些材料。塔夫脱气愤之下解除了平肖的职务。塔夫脱此举，让成千上万的人认为“大利益集团”又恢复了控制，同时也使得刚从非洲丛林狩猎归来的前总统罗斯福深为不悦。塔夫脱的外交政策也加深了党内的不和。1911年初，塔夫脱提交国会的美加互惠协定将一些工业品和不少农产品列为免税货物，引起西部进步派和关税保护主义者的不满，结果遭到否定。塔夫脱与法国和英国议订仲裁条约也遭到罗斯福的批评与反对。

共和党人内部的不和与倾轧，最终酿成了1910年中期选举时的惨败苦果。这次改选，共和党丢掉了纽约和新泽西等几个州州长的职位；民主党人在东部战胜了老卫士派；进步派共和党人在西部获胜。这一结果表明，塔夫脱已遭到党内及其广大选民的遗弃。同时，民主党人自1882年以来第一次成为众议院的多数党，这一形势，更令塔夫脱处境艰难。

然而，塔夫脱也并非彻头彻尾的保守派，实际上他有自己的改革倾向。巴林杰的目标是要联邦政府将公共土地转让给各州，对此塔夫脱断然予以拒绝；他甚至还考虑进一步扩大森林保护

区。加强铁路管理的“曼恩—埃尔金斯法”也是在他的敦促之下通过的。在“美国制度结构方面发生的一个最重大的变化”上，塔夫脱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即促成了后来成为宪法第16条修正案的所得税立法。塔夫脱还是一个坚定的托拉斯打击者，任内被起诉的公司达65家，数量上超过罗斯福当政时期起诉的44个。

〔罗斯福与塔夫脱分道扬镳〕　塔夫脱执政后期，思想上日趋保守。在他看来，共和党内的进步党人“造反派”正在危及国家。他和他的“老大党”追随者坚定地相信，总体上不能依靠人民来提供有效的管理，当进步派呼吁要进一步促进政府的民主化时，塔夫脱退缩了。对于像他这样的保守共和党人而言，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听起来就像是危险的社会主义。他们担心，改革这样推进下去将会导致社会政策的制定权落入那些嫉妒富人的穷人手中。尤其是在进步派开始呼吁人民有权取消司法判决之后，保守共和党人震惊了。特别看重法律秩序的塔夫脱（后来他于1921—1930年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惊讶于这类看法，公开声称它们将摧毁自由和秩序，将使所有事情受到变化莫测的民意的左右。

对于塔夫脱的言行，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颇有几分失望。1910年8月，在堪萨斯州的奥萨瓦托密，罗斯福呼吁在美国建立一种基于真正的社会正义之上的新社会秩序，从而戏剧性的重新进入全国政治的视野。罗斯福声称，这种新社会秩序可以借助一种“新国家主义”来实现，人们将要看到的是一个“与利益集团作战”的更大的、更强有力的政府，总统实际上是“公共福利的管家”。其后不久，罗斯福对塔夫脱的不满加剧。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败北，资源保护问题上的分歧，外交上的举措，都令他深感不安。塔夫脱的反托拉斯政策也激怒了罗斯福。1911年最高法院在审理美孚石油公司和美国烟草公司的案件时，发现这

两家公司是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垄断组织，但法院的判决认为这一垄断是“合理的”，而只有不合理的贸易限制才是非法的。塔夫脱对这一“合理原则”表示满意，罗斯福则不以为然，认为这一判断应建立在对经济效率和商业行为有所考虑的基础之上。塔夫脱对美国钢铁公司的诉讼，也招致了罗斯福的不满。诉讼过程中，国会听证会公布了1907年经济危机期间罗斯福同摩根谈判的有关内容（详见前文），颇让罗斯福难堪；而诉讼的结果（宣布美国钢铁公司无罪）更令罗斯福有理由认为塔夫脱的起诉主要是与他为难。

随着时间的推移，罗斯福越来越明确地表示，如果美国人民再次需要他，他将出面竞选总统。1912年2月，他正式宣布参加总统竞选。与此同时，塔夫脱也主张，对复决权和罢免权的一味坚持和支持，极大地威胁了国家的健康和稳定。

为了争夺共和党内的提名，两人展开了恶战，甚至不惜进行激烈的人身攻击。进步派的老斗士拉福莱特也参加竞选，但以前支持他的人大都转向了罗斯福。受全国委员会操纵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第一轮投票中就提名塔夫脱为总统候选人。罗斯福派愤而脱离共和党，成立新党——进步党（亦称“雄麋党”）。同年8月，进步党代表大会召开，出席者有社会工作者、女权主义者、知识分子、被罗斯福个人品格和纲领所吸引的工业家以及对派系不再着迷的共和党政客，大会一致提名罗斯福为本党总统候选人。塔夫脱的支持者总体上赞成维护社会现状，反对变革，但其中也有某些人具有进步派思想，只是这些人不愿脱离本党。“雄麋党”的竞选纲领“堪称为一个为当时以及后世而制定的进步派改革宪章”，主张总统预选、妇女选举权、创制权和复决权、国会参议员普选；强调保护人类和自然资源、妇女最低工资、限制使用童工、工人补偿法、社会保险、联邦所得税、限制在劳工

争端中使用禁令；要求设立由专家组成的联邦委员会负责调整关税和管理州际工商业；主张社会正义和由人民治理国家，主张在处理公共问题时讲究效率。这一目标，吸引了很多进步人士和工商界人士。

共和党在1912年大选时的分裂，为在野党民主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继续推行进步主义改革还是中断改革？人们翘首以待。

第六章

威尔逊与进步主义改革的高潮

在经过塔夫脱时期的“退却”之后，进步主义改革在威尔逊入主白宫之后进入鼎盛时期。

作为学者出身的民主党总统，威尔逊颇具眼光和见识，这一点使得他上台后能够审时度势地团结党内外一切进步派人士，积极主动地担负起改革的领导重任。执政时期，威尔逊凭借自己作为行政首脑的独特地位、影响和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驾驭了国会立法的方向和进程，并在很多场合推动它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所建树，有所突破。针对举国关注的托拉斯和其他大公司大企业经济力量的集中问题，威尔逊进一步完善了反托拉斯法律体系，促成国会制订了“克莱顿法”。与此同时，国会立法建立联邦贸易委员会并赋予较大职能，此举标志着联邦政府对公司企业开始实行全面的管理与监督，在联邦政府干预经济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针对关税问题上存在的巨大弊端，威尔逊大力推进关税体制改革，促成了“安德伍德关税法”的通过并在任内开征累进所得税。针对货币金融方面的混乱和巨大缺陷，他成功地创立了一种新型的体制——联邦储备体制。在童工立法、工时立法等领

域，威尔逊政府也有所作为。威尔逊的这一施政纲领，总称“新自由”。

威尔逊的进步主义改革成就主要是在第一任内取得的。到1917年，“新自由”的立法目标基本完成，进步派历年来所倡导的各种各样改革主张也已初步实现。威尔逊的第二任开始后，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转向外交领域，随着美国的宣战和参战，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成为举国瞩目的焦点和全部工作的重心。在此情形下，进步主义改革运动告一段落。

一、威尔逊与“新自由”

民主党总统威尔逊上台后，抛出了不同于共和党人的施政纲领——“新自由”。在经济运行问题上，威尔逊认识到托拉斯和大公司出现的必然性，但比较多地强调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在托拉斯问题上，威尔逊主张加强管理和监督，但更多地强调恢复个人的经济机会；在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威尔逊看到了大企业的优势所在，但比较多地倾向小企业，强调为它们提供机会；在政府职能问题上，威尔逊认识到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干预的必要性，但比较多地信赖小政府，反对权力的过分扩大和集中。这些便是“新自由”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新自由”与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所主张的“新国家主义”本质上并非截然对立，只不过两者分别强调了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在实施过程中，威尔逊“新自由”的某些主张及时地得到修正，执掌白宫后期，“新自由”实际上被“新国家主义”所取代。

〔*1912年选举：改革派的胜利*〕　1912年是选举年，共和党内部发生分裂。威廉·塔夫脱和西奥多·罗斯福竞争候选人提名，互不相让，最后分道扬镳，前者以共和党候选人身份参加总

统竞选，后者则另立第三党——进步党参加角逐。共和党的分裂为民主党提供了有利时机，民主党人决心从共和党人手中夺回长达16年无缘问津的总统宝座。在1912年7月召开的巴尔的摩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精神世界保守、但却有进步名声”的新泽西州州长威尔逊，在第43轮投票时赢得多数票，在第46轮投票时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1912年的竞选基本上是在民主党和进步党之间展开。两党的竞选纲领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也存在一些重大分歧：民主党人要求大幅度降低关税，进步党人则赞同保护性关税；民主党人强调州权，进步党人则要求建立强有力的联邦管理机构。民主党人虽没有详细地提出广泛的社会福利计划，但主张限制使用反对工会的禁令，从而确保了“劳联”对民主党的支持。民主党还承诺降低农业贷款的利息，使农民更容易得到贷款，引起农民的好感。

两党候选人对于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态度，也明显折射出两党的分歧。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强调经济上的合并不可避免以及由此带来的益处，对大企业持欢迎态度，但要求由强大的联邦政府对大企业进行强有力的监督并促进非工商业集团的福利，主张制订积极全面的联邦计划来推进国家利益和社会改革。这些观点，早已在政治理论家赫伯特·克罗利的著作《美国生活的希望》（1909年）一书中得到有力阐发，西奥多·罗斯福只是现成地加以利用。威尔逊的看法有所不同。作为虔诚的长老教会信徒，他认为社会上的个体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上帝负责”，工商业经营过程中出现的过错也只是个人的过错；坚信只要国家保护和鼓励竞争，经济学的自由放任原则将会发挥作用，认为“国家应像赛跑中规定有利和不利条件的人员那样，决心使赛跑者在起跑时就享有公平的条件，也应像警察那样，决心使赛跑者

不乱抢跑道。"[①] 同时，威尔逊也憎恨政治领域和工商界的腐败现象，信仰人民民主，主张制订规章防止工业弊端。

威尔逊提出的竞选口号是"新自由"，其内涵是反对垄断，恢复自由竞争，为中小企业创造竞争条件。他说，罗斯福的设想，将导致"政府同托拉斯结成伙伴"；而民主党的计划，则会保证一种自由的经济，并维持一个自由的政府。他断言，"自由的人不需要保护人"，因为自由人如惟保护人之命是从，就不可能保持自由。威尔逊要求先实行"有节制的竞争"，而不是"有节制的垄断"，担心个人正在被庞大组织所"吞噬"，并谴责那种他认为是"异乎寻常、十分有害的工商业集中"，要求制订"大批法律来照顾那些流血流汗想在辛勤努力的世界上谋得立足之地的人们"。

威尔逊的这一纲领，罗斯福斥之为"农村保守主义"。然而，正是这个"保守的""新自由"纲领，重新燃起了美国农场主阶层、小城镇居民和广大中产阶级美国人的希望之光，受到中小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结果，威尔逊不仅保住了民主党的传统势力范围——南部，而且赢得了中西部农民、小城镇居民以及城市少数民族集团的拥护。本次大选，威尔逊获得42.5%的普选票和435张选举人票，独占鳌头；罗斯福获得27.8%的普选票和88张选举人票，位居其次；塔夫脱获得23.6%的普选票和8张选举人票，位列第三；社会党候选人尤金·德布斯获得近90万张选票。就普选票而言，罗斯福和塔夫脱两人的总和超过了威尔逊，如果共和党不发生分裂而共举一位候选人的话，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尔逊问鼎白宫的前景将要渺茫得多。在职总统塔夫脱的惨败，表明美国民众鄙弃了固执保守的政府，渴望建立积极进取的

① 布卢姆等著：前引书，第239页。

新政府。本次大选，民主党人不仅夺回了久违的白宫，而且在国会两院同时获得胜利，因而堪称“一次改革派的胜利”。

〔白宫新主——威尔逊〕　1913年3月初，当选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前往首都华盛顿就职。刚下火车，他就受到一群兴高采烈的“普林斯顿人”① 的簇拥。与此同时，大量人群聚集在国会广场上，等待着聆听威尔逊的就职演说。华盛顿的居民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人，都被威尔逊这个不同寻常的人强烈吸引着：白宫新主威尔逊是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之后白宫主人中的第一位知识分子；与两位前总统杰斐逊和麦迪逊一样，新总统也是出生于南方，在弗吉尼亚长大。随着南方人最终返回白宫，南方的力量和影响同时进入内阁、新总统的顾问圈、派驻国外的外交部门和国会当中。20年来，民主党人第一次在国会两院同时拥有多数，南方人不仅占据了主要的高层职务，而且控制了国会中的各主要委员会。

新总统威尔逊是美国著名的学者总统和教育家，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博士头衔的白宫主人。他于1856年出生于弗吉尼亚州斯汤顿城一个英国移民家庭，祖籍爱尔兰，父亲是长老教会牧师，童年在严肃的宗教气氛中度过。1872年进入北卡罗来纳州的戴维森学院，1875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大学期间曾在《国际评论》杂志上发表有关美国国会委员会体制的文章，毕业后至弗吉尼亚大学修读法律，1882年在亚特兰大当过一年律师，随后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继续深造。1885年发表的博士论文《国会制政府》，批评美国行政机构的软弱无能和国会的缺乏效率，赞美英国的议会制度。翌年获博士学位。1886年，威尔逊开始了教学生涯，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布林莫尔女子学院、康

① 指曾经或正在普林斯顿大学就读或就职的学生。

涅狄格州的韦斯利安大学执教，90年代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科学和历史学教授。1902—1910年，出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任内倡导并推行改革，所提倡的导师制树立了启发性讨论的学风，获得社会好评，并为哈佛、耶鲁等著名大学所仿效，20年代以后美国普遍推行。他关于大学生活区的设想，也颇具超前意识，成为日后欧美大学校园中极为普遍的一种形式。作为教育改革家，威尔逊在普林斯顿的一系列举动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赢得全国性的关注，被誉为“教育界的民主斗士”。作为一个学者，他一生留下许多著述，1902年出版的5卷本《美国人民史》便是其代表作之一。

1910年，由于建立研究生院的计划受阻，威尔逊辞去校长之职并离开普林斯顿。在民主党新泽西州党魁的支持下，他出面竞选新泽西州州长并当选。任内两年，针对教育体制、公职、选举程序、竞选费用筹措、公用事业经营以及市政管理等问题，推行全面改革，并对党魁干预政府予以抵制，建立了创制和复决制度。由于这些非凡表现，他赢得了“进步主义政治家”的名声。1912年大选来临之际，民主党人“带着感激和钦佩”将他推向全国政治舞台，结果不负众望，一举获得成功。

外表上，威尔逊显得有些严肃。他身体挺拔，举止端庄，瘦长的身材和整洁的外观，与臃肿的前总统塔夫脱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具有很强的思想力量，信仰道德的力量和正义的力量，同时渴求权力和权威。他那充满激情的品性和所拥有的渊博知识，使得他能够得心应手地驾驭所要阐发的主题。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时，他的学生常常爆发出阵阵掌声。西奥多·罗斯福曾说白宫是一个“暴徒的讲坛”，然而对于威尔逊而言，总统职务则是一项庄严神圣的职责。他坚信，上帝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使命而挑选上他的。

〔威尔逊的政治学："新自由"与强势总统〕　威尔逊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民主党人，也是一个深受欧美自由民主传统影响的人物。他的政治思想深受英国的自由主义领袖威廉·格拉斯顿的影响，在他看来，格拉斯顿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家"。早在19世纪70年代在普林斯顿求学时，他就将英国公共生活视为典范。他是一个坚定的、教条主义的自由贸易论者，坚实货币和金本位的笃信支持者，政治腐败的不屈服的反对者，也是一个相信强有力的管理是国家富强不可缺少的手段的政治科学家。此外，他的想像力丰富，能够紧紧抓住人的心灵。历史之所以让他着迷，是因为历史再现了无畏的人们持之以恒地、充满勇气地追求至上理想的心路历程。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民主党人，而是一个赤诚的民主党人。威尔逊这种个性的形成，与其强烈的宗教信念有很大关联。如同克利夫兰总统一样，他也是一个长老教徒，强调职责、强有力的管理、道德原则以及法律和秩序的最高需要。在威尔逊看来，上帝在人世间体现其意图，人的职责便是充当其代理人。这样一种信念，势必使得人们思想上趋向教条而保守，但也有可能催人奋进，因为长老教徒心目中的上帝——严厉的耶和华同样对人类生活中的恶行和腐败愤怒不已。当威尔逊像他之前的克利夫兰一样被这种恶行和腐败所激怒时，他也就成了被鼓动起来的改革家。

威尔逊一生追求权力，当他如愿以偿地登上了总统宝座之后，如何行使这一权力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还在1912年竞选期间，威尔逊就周游美国各地，发表一连串演说，提出了不同于罗斯福"新国家主义"的新纲领——"新自由"。他说，近些年来，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已经占据了美国人的生活，那就是大公司。这种非人的、不道德的大公司已经建立了一种强大的阴谋网络，使得它们得以剥削整个国家。它们躲藏在保护性关税的

背后，竭力主张它们的所有事务都应该秘密的进行，大公司贿赂政府为它们提供种种特权——施与和土地赠与，提供水电基址和司法上的豁免，乃至法庭发布禁令镇压劳工罢工。

威尔逊说，共和党人政府只听从那些经营着大银行、大工业公司和铁路的人的话。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奉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哲学，这种哲学认为，国家应该由富人和强者来执掌，因为这些人最明了什么是最好的。威尔逊强调说，这种看法极其荒诞，因为它违背了自主性和普通人的常识。“由受托人进行管理”的哲学应予彻底摈弃，人民应被允许重新接管他们的政府。特殊利益的代表，绝对不可能懂得普遍利益。

威尔逊说，关税是滋生托拉斯和垄断的怪物。剥去这层保护，美国经济将日趋增长和多样化。因此，联邦政府必须对托拉斯发动直接的进攻。威尔逊坚信，像罗斯福那样视托拉斯为不可避免之物，是错误的；由此简单化地要求政府代表公共利益对其进行管理，也是错误的。这样做将意味着“由受托人进行管理”的延续。因为有权势的银行家将与有权势的政府官员平起平坐，私下里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公众则只能伫立一旁等待。“新自由”将加强反托拉斯立法，以便打破现存的各种企业联合；将改造货币托拉斯，以便清除其对信用的扼制；特别是将会使得托拉斯不公平地毁灭竞争的那些行为方式成为非法之举。总之，美国必须经历一次个人主义的新复兴；人民的生机活力必须获得解放。

作为一个传统的民主党人，威尔逊最为关注的是，经济应该保持开放、活力和公平，以便小人物能够有所发展。而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呼吁，政府不仅要对托拉斯加以管理，而且要给社会上的弱者比如劳工、妇女、儿童和失业者，提供直接的帮助。恪守南方民主党人传统的威尔逊，对大政府持不信任态度，

反对运用政府的力量对经济进行直接的和积极的干预，强调说，如果机会公开的话，就没有人真的需要帮助。

威尔逊还决定确立一种新型的总统政治。长期以来，他认为美国总统应该是英国首相式的人物，不应该只是消极地坐在白宫里，等待着实施国会通过的法案，而应该积极地、主动地指导国会内本党党员的活动，推动立法工作的开展。因此，威尔逊通向国会大厦的电话总是忙个不停；党的领袖人物频繁地出入白宫与其进行紧急磋商；至于他亲笔手书的、捎给国会议员们的带有讨好性的、哄骗性的乃至威胁性的便条，更是源源不断。[①] 这种做法（即强有力的总统领导）是典型的民主党人执政的传统。共和党方面，只有西奥多·罗斯福曾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行政首脑，促使国会通过了很多重要立法，扮演了“人民领袖”的角色，实际上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罗斯福失去了共和党正统派的支持，最终不得不与自己的党决裂。然而，在民主党方面，强势总统的例子比比皆是，向上可以一直追溯到格罗夫·克利夫兰、詹姆斯·波尔克乃至安德鲁·杰克逊。

威尔逊把自己视为英国式的党魁，要求国会内民主党人遵循党的纲领，必要时则越过他们直接诉诸选民。就职后，他团结党内外各派力量，推动立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

二、关税政策和银行改革

关税和金融体制的改革，是整个进步主义时代美国联邦政府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威尔逊执政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一。

---

① 罗伯特·凯利：前引书，第498页。

〔关税改革：安德伍德—西蒙斯法〕　自从南北战争后的“重建”以来，美国各届联邦政府基本上奉行保护关税的原则。高额保护关税制刺激了大工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克利夫兰和塔夫脱当政时期，应舆论要求曾经力促国会降低关税，然均未能如愿。威尔逊入主白宫后，将关税改革视为一项主要目标。

在就职演说中，威尔逊指出，关税制度“违反了公正的征税原则，并使政府成为私人权益集团手中的顺从工具”。[1] 为履行竞选期间许下的诺言，就职后他立即召开国会特别会议，讨论修订关税问题。在4月份召集的国会特别会议上，他递交的关税改革咨文指责保护关税制度是人为特权，不利于竞争，其中说道：“我们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建立起一套特权和免除竞争的权利，在这种特权和权利的后面，可以很容易地用任何联合方式，哪怕是粗糙的联合方式来组织垄断公司；直到最后在我们这个大企业的世界中，没有什么事情是正常的，没有什么事情能经得起效率与节约的考验……只有新的行动原则才能使我们不致遭受垄断公司最后的吞噬，不致完全失掉那些增进人们的进取心并使人们保护独立能力的因素。”[2] 然而，威尔逊对于关税问题有比这更全面的理解。他并非彻底否定关税制度，认为保护关税是必要的，但其作用应该是保护那些“国内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工业”。[3] 在1913年4月的关税改革咨文中，威尔逊也并未认为关税制度毫无必要，相反只是认为它落后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在他看来，关税改革应该提到“刺激美国人运用其才智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商

① 台湾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编：《美国历任总统就职演说集》，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英文部分第201页。

② 德怀特·杜蒙德：前引书，第184页。

③ 索尔·帕丹佛：《威尔逊的理想》，华盛顿特区1942年，第62页。

人进行竞争”的作用。[1] 在1916年的一次演说中，他更加明确地指出关税改革的目的是“把美国商人的精力引向世界市场”。[2] 这种观点，成为他推动关税改革的真正动因。

同托拉斯问题一样，关税问题也存在着政治上的敏感性。在许多人看来，正是美国历届政府的高额保护关税制度刺激了垄断组织的发展，因此视关税为“托拉斯之母”。20世纪初年，很多人还将关税保护制度与个人收入无需纳税两者并列，称之为“工业和银行界联合控制联邦政府的象征”。[3] 应该说，关税保护对于确保美国民族工业经济的发展曾经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物极必反，长期的过度的关税保护，最终只会束缚民族经济尤其工业发展的手脚，使其由于远离市场竞争而失去发展的动力。同时，高额保护关税也使得美国的对外贸易相对处于不利的国际地位，高额关税壁垒换来的是他国的报复。虽然世界之交的美国联邦政府同法国、意大利和巴西等国签订了多项互惠协定，但都没有得到国会的批准。

威尔逊上台后，充分认识到关税改革的紧迫性，也意识到该问题的复杂性。因此，他推行关税改革的步伐显得既迅速又稳妥。还在国会召开前，他就积极活动，并且取得良好效果。国会开幕后，他打破常规，亲往国会发表演说，成为自约翰·亚当斯以来出现在国会的第一位总统。威尔逊在关税改革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主动性及其领导作用，对于促成法案的通过至关重要。这与前任总统塔夫脱在类似问题上的“无为”立场也形成了鲜明对比。

---

① 约翰·布莱曼：《威尔逊》，新泽西，1972年，第48页。
② 布莱曼：前引书，第53页。
③ 阿瑟·林克等著，刘绪贻等译：前引书，第116页。

面对关税改革问题上激烈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威尔逊总统自始至终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当民主党的领袖们提出一份降低工业品进口关税但维持农产品的高额关税的草案时，威尔逊立即加以否定，并责成安德伍德参议员重新起草，并指示将食品、蔗糖、皮革、羊毛和棉花等农产品也列入免税商品之列。一个月之后，众议院通过议案：平均税率降低 11%左右；一大批消费品增列为免税物品；取消对托拉斯生产的钢铁和其他多种产品实行的保护办法；征收适量的累进所得税以弥补税收的损失[①]。

议案提交参议院后，立即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民主党人在参议院仅拥有 3 席的优势，且来自蔗糖和羊毛生产州的本党参议员对议案将这两样产品列为免税物品持有异议。此外，赞成保护贸易制度的院外活动分子趁机大肆活动。针对这种形势，威尔逊一方面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对来自农业州的本党参议员施压；另一方面诉诸公众舆论，发表声明号召舆论界“制止并摧毁狡黠阴险”的院外活动分子所带来的“无法容忍的负担”，结果促成对所有参议员的私人财产进行调查。此举产生了显著效果，议案在参议院顺利通过。民主党参议员除两人外都投了赞成票。

最终通过的“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降低了 900 多种货物的关税，提高了 36 种，307 种税率未变，总的平均税率下降了 11%。[②] 新税法提高了美国没有或者不能生产的商品的税率，而“所有能够证明美国产品在世界贸易中占有统治地位的商品的进口关税却被削减了”。[③] 托拉斯企业生产的钢、铁、农业机器等被列入免税单内，非托拉斯企业生产的原材料、某些农产

① 两个月前批准的宪法第 16 条修正案已使征收累进所得税合法化。

② 阿瑟·林克：《伍德罗·威尔逊与进步主义时代》，前引书，第 38 页。

③ 杜蒙特：前引书，第 186 页。

品（如棉花和羊毛）、服装和食品亦位居免税之列。为弥补关税收入缩减部分，拟开征个人所得税。在各政党内进步派的共同努力下，法案将个人收人超额累进所得税的最高额提高了1倍。1913年宪法第16条修正案生效，规定对超过一定收入者征收1—6%的累进所得税。

新关税法设定的平均税率为29%，较之原税率降低了约10%，使得关税低于此前长期执政的共和党人时期制定的水准，并且创下了自内战爆发之前迄今一个漫长时期内的历史新低。法案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了一般阶层的利益，将部分负担转嫁给那些有能力承担的人，从而改变了联邦的税收结构。对垄断公司和垄断资本家而言，新税法是一个较大的打击，因为垄断企业生产的所有产品均属于免税名单之列，且其高额的个人收人必须按照相对说来较高的税率纳税。然而，这次关税改革，无论是从主要推动者威尔逊总统的动机来看，还是从整个立法过程抑或改革的最终结果来看，它都不是一次反对所谓企业特权的斗争，而是一次“使美国工业与欧洲制造商展开真正竞争的尝试”，[①] 为使美国商品能够顺利进入国际市场所作的准备，总体上有利于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因为如此，华盛顿的《星期六邮报》评论说：“整个关税改革事实上并没有太多的困难，在美国，每一个了解我们国家情况的人都会理解关税改革的必要性……其主要的问题只不过涉及方式方法以及所愿意削减的数量而已。”[②]

“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是威尔逊“新自由”纲领的三大基石之一。它的颁布，实现了威尔逊“新自由”目标的第一步，也充分体现了威尔逊的行政领导才能。

---

① 阿瑟·林克等著，刘绪贻等译：前引书，第144页。

② 布莱曼：前引书，第108页。

〔银行改革：联邦储备法〕　1913年夏秋，威尔逊促使国会着手处理另一棘手的难题——银行体制的改革。

货币问题也一直是19世纪下半叶争论不休的对象，绿背纸币和本位之争曾一度成为全国政治的焦点。长期以来，美国没有建立起稳固的中央银行制度，金融混乱由来已久。20世纪初，独立银行有3万多家。[①] 这些独立银行互相倾轧，操纵了国计民生。金融是经济的心脏，但在这方面，私人的控制却不受抑制，为所欲为。在确定诸如货币流通量、贴现率、银行设立于何处以及银行应与企业公司间保持什么样的联系之类的关键问题时，没有任何公共机构有任何发言权。南部和西部的农场主一直对东部的金融家集团不满。西部农场主抱怨说，所有的钱都存放在东部银行里，结果在他们的区域内导致了过高的利率，于是积极鼓动进行货币改革。进步派坚持说，货币流通量应该从私人之手解脱出来而置于公共机构的管理之中。银行家自身也为银行状况所警觉，因为不存在一个能够储备金以备不时之需的中央银行。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经济在不断增长，企业在不断扩大，但货币的流通量相对固定不变，僵化的金融体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工业化社会内充满活力的经济发展的需求。

1907年的金融恐慌，彻底暴露了通货不能变通和信贷缺乏适应性的弊端，让人们体会到了金融大权集中于东部一小撮私人银行家手中所产生的严重恶果。以众议员阿尔塞纳·皮若为主席的众议院委员会对此作了调查，其结论使得不少进步派人士相信确实存在"货币托拉斯"。因为在纽约、芝加哥和圣路易等大金融中心，都毫无例外地存在这种情况：一些大银行通过连锁董事会控制了大量银行、工业和商业的资本，形成庞大的金融帝国。

---

① 祖波克著、苏更生译：《美国史略》，三联书店，1959年，第317页。

这些庞大的金融帝国就是货币托拉斯。恐慌的经历，也逐渐使得银行家本身倾向于改革。罗斯福执政时期，国会曾通过“奥尔德里奇－弗里兰法”（1908年），授权成立一个货币委员会。以参议员奥尔德里奇为主席的委员会在对外国财政制度进行了长达四年的考察研究后，于1911年提出一份美国银行货币制度改革计划的报告。报告虽在塔夫脱当政时期提交到国会，但未受重视。

威尔逊任内，争取银行制度改革的斗争加剧。然而，究竟对货币银行进行怎样的改革，各派主张各异。大多数银行家主张由中央控制银行系统，并创立一种能够针对商业票据的膨胀和紧缩作出迅速反应的通货，而这种通货又以票据的膨胀和紧缩作为部分基础。这些人心目中的理想模式是英格兰银行和美国历史上引起争论的第二合众国银行。具体说来，他们期望建立一个由政府批准、但由私人控制的中央银行；中央银行自行负责发行通货。民主党保守派对这种设想不以为然，主张建立一批地区银行来代替单一的中央银行；地区银行将由银行家控制的一个联邦委员会予以监督。

威尔逊无意于摧毁私人金融，其目标是对金融界的某些方面建立某种形式的公共监督。1913年6月，他再次前往国会，向两院发表演说，呼吁创立联邦储备局来监督金融体制。根据他的设想，联邦储备局的成员将由总统任命并需经参议院认可（威尔逊认为银行家不适合于任命此类成员）；全国将被划分为12个联邦储备区域，每个区域设一个联邦储备银行；储备银行由董事会实施管理，董事会将主要由本区域内与联邦储备体制建立了会员关系的私人银行选举产生。

威尔逊提出的银行改革方案，核心是建立联邦储备体制。联邦储备体制将提供一种可变通的通货储备以应付不时之需，同时它也将负责纸币的发行。从联邦储备银行中，将会出现一种新式

的通货——联邦储备券。它将纯粹作为联邦政府的一种义务按下列方式发行：比方说，当一家私人银行准备向一家地方工厂发放贷款时，这家银行将从这家企业接受一种抵押或者其他形式的合法负债（通常称之为商业票据）；然后，这家银行来到联邦储备银行，以抵押作为担保，取得联邦储备券，并将之发放给借贷人。实际上，在此过程中，联邦储备银行通常并非按照抵押品的全部价值放款，而是通过对商业票据进行折扣来获取一些利息，联邦储备银行凭借提高或者降低贴现率得以控制获得贷款的难易程度。这就赋予了联邦储备体系控制货币流通量的潜在权力，从而抑制通货膨胀或者缓解通货紧缩。通货并非完全基于黄金或者某种形式的联邦债券之上，而是以企业和工业体制自身的收益为基础，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于这一规定，使得通货流通的总量得以根据商业活动的情况相应地做出增加或者减少的调整。更重要的是，联邦储备体制的分权化（建立了12个储备银行），有助于减轻华尔街的垄断。

然而，威尔逊提出的银行改革方案招致了进步派和保守派双方的不满。进步派要求建立完全由政府占有和控制的储备和货币制度，保守派的银行家则希望将货币和信贷统统置于私人银行集团的控制之下。针对这一方案，私人银行家首先提出强烈抗议。长期以来，他们带着银行体制就是自己的私人财产的情感处理着一切金融事务。而如今，华盛顿的那些“恶棍们”却在难以捉摸的威尔逊的带领下，图谋接管银行事务，对于早已习惯于控制这个国家经济生活的银行家而言，这简直是可怕的、不可容忍的前景。华尔街的传声筒——纽约的《太阳报》几乎怒不可遏地写道：“很难耐着一点性子去讨论这个愚昧无知和缺乏理智的荒谬产物（指联邦储备体制），但是，它却不能带着应有的耻辱离

去"，这个方案"周身沾满了布赖恩主义的粘液"。[1] 南部农民也对这一方案表示不满，要求增加新内容，例如：禁止连锁董事会，由国家来管理地区银行，准许储备银行给农业票据贴现，制止商业票据作为通货的基础。

威尔逊本来赞同民主党保守派的主张，但由于不能满足党内进步派和农民运动派的要求，只好作出让步。在国务卿布赖恩的居间调解下，威尔逊在农业票据贴现问题上作了让步，还允诺处理连锁董事会。作为交换条件，国会内的强硬派同意支持提案的其余部分。

1913 年 9 月，银行改革方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绝大多数的美国企业家对此方案表示欢迎，因为它毕竟是对现存状况的一个巨大改进。如同农场主一样，这些人也不满于华尔街一向的专横，赞成金融资源分散至全国各地。进步派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银行界则对众议院通过的方案有颇多抱怨。圣安东尼奥的一个银行家抗议说，改革方案"是一个共产主义的主张"。

议案提交参议院后再次遇到保守派的强大阻力。威尔逊一方面向本党参议员发出呼吁，另一方面直接诉诸民众，警告说银行家正在设法制造新的金融恐慌以便挫败该议案，这些举动消除了某些阻力。然而，尽管民主党人团结一致，但参议院保守派仍成功地对议案作了两点修改：一是增加了发行银行纸币所必需的黄金储备的百分比；二是缩小了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权限。12 月份，联邦储备法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根据该法，全国设一联邦银行，下设 12 个储备银行，地方性的国民银行和其他银行成为储备银行的会员银行，包括财政部长在内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统一领导储备系统，各储备银行亦设立相应的委员会管理其分行。

---

① 罗伯特·凯利：前引书，第 499 页。

〔对联邦储备法的简要评价〕　联邦储备法是威尔逊总统在内政改革方面取得的最辉煌成就，也是一项典型的威尔逊式的改革。它的颁布，再次体现了威尔逊总统“非凡的领导能力”。该法纠正了美国银行业和通货中的某些弊端。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地区储备银行的建立，使得美国自杰克逊时代以来第一次有了富有效率的银行系统。它创立了一种较为灵活可靠的货币制度，使得货币流通量能够按照工商业的需求适时作出调整；它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协调机构——联邦储备委员会，增强了整个金融体系防范、化解金融危机风险的能力。联邦储备体制的确立，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私人大银行对美国经济命脉的控制。在这种体制之下，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私人银行家共同拥有控制通货和信贷的权力，一方面，私人银行界凭借雄厚势力操纵着地区银行；另一方面，联邦储备委员会享有的管理权保证了国家比以往更能控制银行业。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调整贴现率控制货币流量的做法，从此成为美国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总之，联邦储备体系确立了对于金融活动的管理和控制，减少了私人银行、垄断公司对于美国商业与财政政策的影响，对稳定和发展美国经济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正因为此，威尔逊总统自认为联邦储备法也像安德伍德关税法一样，为美国工商业提供了一个“自由而公平的天地”①。美国历史学家布鲁姆等则更明确地指出，“如果不建立这个新系统（指联邦储备体制），国家将无法应付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财政重负。”②

然而，联邦储备法也招致非议。批评该法的人说，威尔逊的行动与其雄辩之辞并不相称。联邦储备法的颁布，很大程度上毕

① 理查德·阿布拉姆斯：前引书，第84页。

② 布鲁姆等：前引书，第244页。

竟只是对美国银行体制的一次技术性调整，法案中“没有一项条款有助于削弱大企业在获得贷款上较之于中小企业的优惠地位，也没有一项条款涉及禁止银行和工商界的连锁关系，更加没有削弱华尔街垄断财团在美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① 联邦储备体制建立后，私人银行家仍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货币的供应及其利用，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操纵着整个联邦储备体制，俨然成为美国的“金融首都”。联邦储备局既未能强大得足以充当一个中央银行，也未能强大得足以控制美国的银行家。在 1929 年的证券市场崩溃降临以前，它仅仅只是尝试性地运用了其对贴现率的影响，这一局限性与 30 年代大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不无关联。在联邦储备委员会的 5 名成员中，威尔逊将其中的 3 个职位给予了大银行家或有类似背景的人，1915 年以后更是将该委员会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大银行家“作为对商人阶级友好的表示”。② 因此，只能说，1913 年的联邦储备法对威尔逊自己声称的“我们国家最大的垄断即金融垄断”确立了初步的管理机制，但这一机制仍很脆弱，远不充分，包含着很多不足之处，例如仍然需要放宽长期农业贷款的条件，仍然需要给予政府一些调节商业循环的有力工具。尽管如此，联邦储备法的颁布在进步主义改革当中乃至整个美国历史上影响巨大。正如美国学者、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历史学教授罗伯特·凯利所指出的那样：“毕竟一项新的、灵活的通货已经创立，一个具有巨大潜能的公共管理体制也已应运而生。开端已经作出，在现情形之下，一个如此根本的改革，本身就是一项非凡的成就。”③

---

① 陈伟硕士论文：《论 1901 – 1917 年间美国政府的改革政策》，1991 年华东师范大学。

② 阿瑟·林克：《伍德罗·威尔逊与进步主义时代》，前引书，第 38 页。

③ 罗伯特·凯利：前引书，第 499 – 500 页。

三、反托拉斯立法

〔克莱顿反托拉斯法〕　　托拉斯问题是威尔逊整个议程中的另一项。该问题牵涉到的实质是事关整个美国企业的改组。前总统罗斯福和塔夫脱也都同样关注过这个问题。

19世纪末年，美国的公司企业内部发生了一场深刻变革，为了消除毁灭性的竞争行为和经济混乱现象，企业界加强了联合与协作，美国有的史学家将这一现象笼统地称之为“组织革命”。这场革命源于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导致了摩根事务所等巨型投资银行的出现。在它们的作用下，分散的美国个体企业被集中到一起，铁路得到重组。借助于连锁董事以及控制整个产业部门的大公司，这些投资银行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强有力的资本结构。公司内部的管理机制也发生相应变化，形成了一个高级白领阶层组成的管理者队伍。企业家之间，也形成了旨在交流信息、共同对付工会和改革家的一种复杂的企业联合网络。

威尔逊的“新自由”纲领试图促成国会针对这些巨大的新的公司权力中心进行立法。改革的主要矛头并非对准大公司的“大”，而是大公司用于挤垮小对手的“不公平的竞争方法”。当然，相对于共和党人而言，民主党人带有更多的反托拉斯倾向。因此，威尔逊对托拉斯采取何种政策，颇受关注。

对于大工业尤其托拉斯，威尔逊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还在1912年大选期间，他就痛斥罗斯福当政时期的政策使得大企业事实上控制了联邦政府。但是，这一立场并非他内心真实思想的反映。1911年，联邦最高法院在下令解散美孚石油托拉斯时，引进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合理原则”，声称“只有不合理的

联合和不正当的限制贸易才是违反谢尔曼法的。"[①] 这一原则的提出事实上在法律上承认了托拉斯的合法性，制裁"不合理"的联合，言下之意就是说最高法院将容忍"合理的"联合。威尔逊接受了"合理原则"，他在《新自由》一书中写道："我认为任何商人通过合法的途径，靠经营得法和效率提高而建立起来的大公司都是自然的，我们并不害怕它，不管它的规模有多大"，试图反对这个过程将是错误的。[②] 在威尔逊看来，对待托拉斯问题，合理的态度是惩罚那些"有罪的个人"而不是惩罚公司，正像对街上那些驾车乱开的人而不是对汽车加以惩罚一样。[③] 在这里，威尔逊事实上已经承认了托拉斯作为一个经常实体其存在是合理的，有罪的只是那些滥用权力的个人。当然威尔逊对中小商人有更多的同情，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托拉斯问题上的总体看法。他也像罗斯福一样，意识到"建筑在大规模合作基础上的企业的互相联合，是我们时代的特征，是随着现代文明的自然发展而来的……我们永远不可能回到个人竞争的旧秩序中去。"[④] 对此，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指出：到了威尔逊执政的年代，禁止任何垄断的企图已经不可能实现了，指望"谢尔曼法""作为一种武器对企业联合体进行全面的正面进攻已不可能，剩下的惟一选择就是，明目张胆地犯有不公平竞争的个别企业有时能够被拉出来进行诉讼。"[⑤] 威尔逊试图采取的举措，其意图正在于加强对工业

---

① S.D.凯什曼：《"巨头"时代的美国》，前引书，第69页。

②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前引书，第43页。

③ A.B.哈特编：《伍德罗·威尔逊演说和公共文件选集》，纽约1918年，第26页。

④ W·比尔蒙特：《伍德罗·威尔逊的经济思想》，巴尔的摩，1943年，第108年。

⑤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时代》（中译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8－209页。

的全面管理和调节，进一步抑制托拉斯经营中的弊端，尽可能地创造一个相对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

1914 年初，国会例会如期召开，威尔逊在提交国会的特别咨文中提出管理工业的计划，要求国会着手立法，以便：互有联系的集团无法操纵控股公司；建立委员会协助解散被裁定为属于限制贸易的公司；明确界定何谓不公平的商业做法。保守派认为这些建议过火，无法接受；劳工领袖也不满意，极力主张工会可免除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约束；“雄麋”派同样不满，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管理机构。此时，众议院已经收到几个有关托拉斯问题的提案，并分别就有关内容展开辩论和调查。1914 年秋，在威尔逊总统的要求下，民主党人、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克莱顿提出的法案终于获得参众两院的通过，这便是“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法案第 2 款禁止可能压制竞争、导致垄断的买主之间的价格歧视；第 3 款宣布束缚性契约、排他性交易协议以及价格让步等行为为非法；第 7 款禁止股份公司以削弱竞争为主要目的而取得其他企业的股份（铁路除外）；第 8 款禁止资本总额在 100 万美元以上从事州际贸易的相互竞争的工厂之间实行连锁董事制，禁止存款额在 500 万美元以上的银行的董事兼任其他银行的董事或高级职员。

得到威尔逊支持并获通过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对不公正的商业行为作了概念上的界定，并就其主要表现进行了一大长串的列举，明确宣称不公正的商业行为属于非法之举，其中包括禁止设置连锁董事会。参议院讨论时，保守派对禁止办法作了修改，规定凡是没有减少竞争倾向者，均免于禁止；此外提案增加了一个声明，宣称不应该视劳工为商品。“克莱顿法”对劳工利益作了让步，规定工会及农民组织不得作为以限制自由贸易为目的的组织，从而摈弃了援引“谢尔曼法”反对工会组织的先例。

对于威尔逊政府通过的克莱顿反托拉斯，历史学家大多认为它不过是对“合理原则”的一个诠释。虽然法案针对所谓被禁止的不正当贸易手段开列了一长串清单，但这一列举使得该法本身显得苍白无力，因为不正当竞争的手段自身在不断更新，人们根本无法凭借一次性的列举加以穷尽。

〔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建立〕 作为“克莱顿法”的补充，国会还通过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因为立法者清醒地意识到，单纯停留在纸上、法案中的列举，根本不可能达到消除掉各种各样的事实上属于不公正的商业行为的目的。狡猾的商人规避法律的手法变化多端，必须设立一个机构以制止对竞争的非法压制。

早在1912年的大选期间，罗斯福所代表的进步党就曾提出设立一个类似于州际贸易委员会的机构来专门管理公司企业。该机构或称全国工业委员会，或称联邦行政委员会，其拥有的权限和职能是制定最高价格，公布公司账簿，控制工人的工时和工资，调查公司的活动。如发现某公司存在垄断行为，可视具体情况加以区别对待：对于因运用不正当手段而谋求到的垄断，可以依据反托拉斯法予以解散；对于因自然增长所导致的垄断，则应借助于为该公司产品制定最高价格的办法而加以控制。任何接受该机构管理的公司，均可免除反托拉斯法的起诉。[①] 对于罗斯福的这一设想，威尔逊曾在大选中加以指责，但是入主白宫之后，威尔逊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不知不觉地接纳了这种主张。

在促成威尔逊的思想转变方面，律师路易斯·布兰代斯起了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布兰代斯一直是大公司的敌人，同时也是威尔逊的亲密顾问，曾经帮助拟定了“新自由”纲领，此时的他加入了国会进步派的行列，并以学术权威的身份促成一种新策

① 李剑鸣：《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第147页。

略。布兰代斯等进步派认为，威尔逊应该改变态度，赞成新国家主义的主张，即设立一个独立委员会，并赋予其广泛权力对商业行为进行调查，一旦证实确定采用不公正行为，立即发布终止指令。布兰代斯等人的意思是，威尔逊总统应该朝着“积极的自由”方面迈进一步，也就是说，要凭借直接干预，运用政府将社会从权势者的虐待中解放出来。这一建议，意味着“新自由”哲学的重大变化。经过一番深思，威尔逊接受了这一意见。

1914年秋，民主党人占优势的国会在威尔逊的要求下，很快通过了布兰代斯协助起草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法案规定：撤销原来的公司管理局，一切事务移交联邦贸易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存在，由5名成员组成，成员由总统提名同时须经参议院认可，任期7年；委员会有权调查公司活动，有权监督“克莱顿法”所适用的私人和公司以便防止其违法，并根据总统或国会委托草拟新法案。此外有权发布命令禁止托拉斯的活动，不服从者移交巡回法院审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5款还规定，商务中的不公平竞争方式、不公平或欺骗性行为与做法均属非法，这样，政府管理的范围就由原来单纯控制公司的垄断行为，扩展到规范企业活动、制约企业间的竞争方式等广大领域。“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的另一职责是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下设的总顾问处和竞争事务局拥有数百名职员和律师。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联邦贸易委员会被赋予的职能是通过确保企业公开、公平地竞争，以防止新的垄断组织的出现。然而，何为“公开、公平地竞争”，有关立法并未作具体阐述，且法案在最后通过之前增加的修改意见规定，联邦委员会发布的指令必须由司法部门进行普遍的复审。结果，法案未能使工商业经营达到威尔逊所谋求的程度，也未能完全赋予工会所期望的活动自由；联邦贸易委员会被赋予的权力也没有

达到很多改革派所期望的那样大。尽管如此，威尔逊政府的这一立法行动，令绝大多数进步派感到满意，即便是罗斯福也觉得威尔逊此举表明民主党人已采纳了“一点点进步党的纲领”。[①] 从长远来看，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设立，对于联邦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政府对公司企业开始实行全面的管理与监督。

到1914年，威尔逊已经可以自豪地宣称，“新自由”纲领已经实现，已经不再需要推动立法进行重大的改革。事实上，对于进一步的改革，他内心深处不再有兴趣。他反对特殊利益的立法，不仅制造商和银行家不能指望从政府那里得到帮助，即使劳工、农场主和儿童也会受到忽视。这实质上是传统的民主党人自由主义理论。政府应尽可能地不插手，不偏袒任何人。这是古老的亚当·斯密的立场，也是民主党人托马斯·杰斐逊的信条。当有人提议帮助社会上受到剥削的群体时，威尔逊挫败了这一企图。

四、转向新国家主义

两年一度的中期选举向来是衡量美国政治气候的一只晴雨表。正当威尔逊大刀阔斧地推行“新自由”改革纲领，并接二连三地取得成效时，1914年的中期选举降临了。这次选举对于民主党人而言，总体上是有利的。虽然共和党人由于进步党的瓦解而取得相当大的胜利，尤其是在东北部，但结果民主党仍然控制着国会两院，在不少地区，民主党人得到进步派的支持。威尔逊领导的联邦改革，又一次赢得了选民的授权。这一点，也为下一阶段的改革增添了动力。

---

① 李剑鸣：《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第148页。

中期选举之后，南部和西部农民在国会里享有比以往更大的发言权。为适应国会政治和全国政治的要求，威尔逊的思想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16 年，威尔逊突然令人吃惊地朝着新国家主义者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将联邦政府转变成社会改革的机构。

做一个无所作为的总统不是威尔逊的风格，权力一向是他追求的目标。在“新自由”纲领完成之后，要他静静地守候在一旁而无所事事根本办不到。他深知，当时的美国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弊端，只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政府才能加以革除；同时他又坚定地认为，政府应该因势利导、有所变化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在任总统的最初两年，威尔逊所任命的最高法院法官、联邦贸易委员会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基本上都是保守派，中期选举之后，他顺应时势，作了适当调整。1916 年，威尔逊引领国会朝新的方向迈进，促使国会制订出了“到当时为止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最有意义的进步主义立法。”[①] 这一年，他提名自己的亲密顾问、进步派人士、改革家路易斯·布兰代斯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此举令工商界震动不已，参议院也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说，威尔逊这一行动如同在华尔街挥舞起一面红旗，也有人因为布兰代斯是犹太人血统而加以反对。尽管如此，威尔逊仍成功地促成参议院对于布兰代斯提名的认可。

对于民主党改革派，威尔逊也大加鼓励。1916 年，他改变以往的反对态度，支持并成功地促成“联邦农场贷款条例”。条例规定，在美国乡村地区，建立 12 家农场贷款银行，每个银行由联邦政府提供 50 万美元资金。保守派叫嚣这是“社会主义”，但法案最终获得通过。接着通过的是“联邦雇员赔偿法”。此法草案早就提交国会，但被扼杀。此时由于威尔逊的大力提倡，重

---

① 罗伯特·凯利：前引书，第 500 页。

现生机，法案很快获得通过。这以后，威尔逊施加强大压力，要求国会制定童工立法。他亲自前往国会呼吁，终告成功。此法禁止州际贸易中运输由 14 岁以下儿童、或者每天工作 8 小时以上的 16 岁以下儿童生产的产品。童工法后来被宣布违宪。在这个里程碑式的立法当中，美国联邦政府作出了针对私人业主经营企业的方式进行管理的最初努力。国际贸易方面，威尔逊开始重视进步党关于促进美国工商业的纲领。他还赞同通过立法，准许从事出口贸易的公司联合起来对付外国竞争。为防止关税保护的商品在美国市场上倾销，国会通过立法设置超党派的、由专家组成的关税委员会，并赋予其就“科学的”关税变革提交建议的职能。对于此类做法，威尔逊在最初的新自由演说中曾专门加以谴责，如今他一反常态，改而积极支持关税的所谓“合理保护”。此举表明他已经极大的背离了传统的民主党原则。

至此，进步党人 1912 年提出的每一项重要立法建议，几乎都已经在威尔逊总统的支持下成了法律。这一点使得威尔逊在 1916 年竞选时有理由宣称：民主党也就是进步党，社会正义将出自他所代表的一面，而不是来自共和党。1916 年 6 月，一场巨大的铁路罢工又一次为他提供了表现自己进步倾向的机会。铁路工人要求 8 小时工作制，同时不削减工资。威尔逊同情并支持劳方，压铁路主满足劳工之要求。在铁路主拒绝之后，威尔逊立即促成国会通过“亚当森法”，强制实行铁路工人的 8 小时工作制，并使得更高的工资成为可能。此举博得了劳工组织的赞赏。

企业主为此对威尔逊深为不满。1916 年大选期间，他们投票支持纽约州进步州长、共和党候选人查尔斯·休斯。如同过去一样，本次选举期间，反对派大肆宣扬民主党候选人敌视企业。与此同时，威尔逊前往美国各地，提醒人民注意他为劳工、农场主以及儿童所做的一切。进步派汇集到威尔逊的旗帜之下。劳工

为拥有新的勇士而欣喜，竭力为威尔逊的胜利而努力。进步主义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称赞威尔逊将民主党转变成一个社会改革的机构。成千上万的都市少数族裔选民，在1912年大选时将选票投给了社会党候选人尤金·德布斯，这一次却转向威尔逊。这次大选本身非常微妙，东部州很大程度上支持休斯，但西部州则倾向威尔逊。结果，威尔逊以910万张普选票当选，休斯获得850万张。这是自从安德鲁·杰克逊时代以来民主党在职总统的首次连选连任。

五、"新自由"与美国黑人及南方

〔*1900年之后的南方*〕　对于南方而言，威尔逊入主白宫，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表明南方重新回到美国政治生活的主流之中。内战之后差不多过了20年，民主党人克利夫兰才有幸成为美国总统；内战之后差不多经历了60年，南方民主党人才由于威尔逊当选总统并获得连任而趋于辉煌。但即便这时，也还需要归功于共和党人内部的分裂。南方虽然有些勉勉强强地才回到了全国政治的中心，但这一情况毕竟发生了。

内战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南方是在处于战争的阴影及其"丢失的事业"的悲愤之中度过的。在重建后的岁月里，南方并未能享受到全国经济繁荣带来的好处，也没有沉迷于北方人那种持久的乐观主义的希冀之中。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社会生活方面，南方人都有着根深蒂固的诸多不幸，与进步主义时代全国的情形相距甚远。在进步主义时代这一全国获得长足进步的年代，南方滞后很多。普通百姓的生活一如既往地乏味和艰难。"老邦联州"佐治亚的情形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在这里，人民极端贫困，2/3的人口劳作于乡村。绝大多数是佃农，1900年年

收入仅260美元（按1929年的美元价格计算）。城镇内的非农业工人的境况少许要好些，年收入达到662美元。然而相比之下，典型的中西部州伊利诺伊州的普通非农业工人这一年的收入却高达1512美元，是前者的2.5倍。[1] 由于多数佐治亚人生活在贫困潦倒的乡村地区，远离为数少得可怜的公立学校和公共图书馆，鲜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因此白人和黑人当中的文盲非常普遍。

经济上，南方仍然是美国其他地区的殖民地。佐治亚州除了亚特兰大之外，几无制造业。相比较之下，在北方，单俄亥俄州辛辛那提这样一个城市，其支付给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就超过整个佐治亚州。佐治亚人主要种植棉花，或者在松树林和棉花工厂中劳作，将廉价的木材、松节油和棉花包输往北方。相应地，他们"接受北方的工业制品以及很多北方人的蔑视"。

生活方式方面，内战前即已存在的南北差异在世纪更替之际更加突出。南方人生活的中心依然是家庭和家族，浓厚的宗教影响使得上教堂成为黑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除了经济生活方面的极端艰难外，社会生活也充满了苦难。自殖民时代起，南方就是一个充满暴力的社会；随后发展起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奇特的、极端专断的"荣誉法则"。在全国性的笃信民主和"人民"的进步主义年代里，南方却陷入了鄙弃民主理念、沉迷于极端无情的种族主义的深渊之中。

南方的绝大多数暴力行为以日常的刀伤和枪击方式出现，它们多源于言行上对某人荣誉的伤害。既有黑人之间的，也有白人之间的。然而，白人暴徒以可怕的私刑袭击黑人的事件时有发生。据报道，19世纪80—90年代，整个南方一年内发生的此类事件就多达一百余起。白人无论如何总是抱怨黑人，说他们从奴

① 罗伯特·凯利：前引书，第504－505页。

隶制时代起就变得越来越“傲慢无礼”，后来又染上了北方佬宣扬的所谓人类尊严的思想。因此，尽管私刑总的趋势在下降，但一直持续至 20 世纪。根据历史学家巴特莱的研究，1890—1930 年的 40 年间，单佐治亚州公开报道的私刑就多达 450 起。[①] 此外还有频繁发生的所谓“合法私刑”，在此情况下，黑人受害者总是受到仓促的不公正的审判，被立即处以死刑。对黑人的正式指控通常是说黑人罪犯强奸白人妇女。但由于白人妇女无需出庭公开作证，因此犯罪的事实也颇成问题。更为常见的是，如果某个黑人和某个白人之间发生了争执的话，随之而来的将是白人的报复行动。美国学者通过对私刑的研究揭示，私刑几乎成了白人的一种民间仪式，其根本意图在于藉此对黑人制造恐怖气氛，借以维持白人的至上地位。一篇公开刊登的记述这样描写了白人对黑人的私刑：

“他们（指实施私刑的白人）小跑着把尼哥尔先生赶到一棵树的树荫下，把他的身体绑在树干上，然后开始嬉乐。他的周围堆起了一些柴禾。为了使火势更加旺盛，一加仑煤油倾倒在了柴禾之上，然后便划燃了火柴。很快地，佐治亚出现了一个烧焦了的尼哥尔。他的耳朵和鼻子以及身体的其他部分被割下来作为纪念品……这个尼哥尔招供时提到另外两个黑人，这两人也都在次日遭受私刑……”。[②]

鉴于美国黑人的痛苦处境，黑人牧师、亨利·特纳主教曾经严厉地指出：“我想毫不夸张地说，凡是与黑人有关的，地狱也比美国要好。”

威尔逊上台伊始，他的南方人控制的政府就开始在政府部门

---

① 罗伯特·凯利：前引书，第 505 页。

② 罗伯特·凯利：前引书，第 505 页。

中实行隔离做法，据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摩擦”。威尔逊认为，隔离实际上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政策，因为它将给黑人工作者提供单独拥有的工作领域，在此领域内，黑人无需担心白人的侵犯。

一般而言，黑人领袖倾向于相信威尔逊总统是一个真诚的人，然而他的有关隔离的辩词显得十分虚伪。威尔逊的父亲过去热情地支持过奴隶制，他的妻子是一个强烈的隔离论者，威尔逊自己除了以动听的言词掩饰“杰米·克劳法”的实践之外，似乎无所作为。更令黑人烦恼的是，政府部门的主管总是倾向于尽可能多地解雇黑人雇员，其惯用的手法是，先将黑人雇员置于某个特殊部门之中，然后再将该部门彻底关闭。

然而，也并非仅仅民主党人这样做。整个进步主义时代，两党都对非洲裔美国人的要求置若罔闻，西奥多·罗斯福和塔夫脱均以敌视黑人而著称。正因为此，1912 年大选时，数量可观的黑人将选票转向民主党，这是自黑人获得选举权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威尔逊似乎代表着未来而不是现在，他发布了不少激动人心的声明，但都令黑人沮丧和失望。全国各地的进步派们也都夸口说自己是社会上“被忘却者”的代言人，但是这些人也都毫无例外地回避种族问题。在他们看来，对于这样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自己无所作为，无能为力。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对南方种族问题曾经作过深入的通盘的考虑，但最终由于自觉无力解决而放弃努力，只是告诉黑人说，他们只能指望白人的良好愿望。此后，就像对无力解决的问题采取极端反应一样，罗斯福采取了深深冒犯黑人社会的措施。1906 年，他固执地解散了黑人士兵的 3 个公司，理由是他们被怀疑卷入了得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附近的骚乱。罗斯福甚至还对国会声称，之所以出现私刑，是由于黑人强暴白人妇女。罗斯福执政时

期，共和党人给黑人提供的就业机会很少。威尔逊的隔离政策，实际上早在塔夫脱时期就已经初露端倪。

〔北方的美国黑人〕　美国黑人所遭受的一切并非始于进步主义时代。自从1877年重建结束以来，北方白人越来越无视黑人的利益。内战后北方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抚平战争的创伤而将联邦重新连为一体。为了换取南方白人放弃建立独立国家的梦想，北方人觉得有必要将种族问题留待南方白人自己解决。联邦最高法院在1883年的一系列民权案判决中确立了这种主张，从而彻底背离了重建时代的联邦民权立法。最高法院采纳的哲学是“在种族关系问题上，个体能够自由地采取自己所希望采取的方式”。在1890年的路易斯维尔、新奥尔良和得克萨斯铁路诉密西西比案中，最高法院裁定：一个州可以在铁路运输中要求（而非仅仅允许）实行隔离。其后，在具有里程碑性的普莱西诉福格森案（1896年），联邦法院确立了公共设施中的“隔离但平等”原则。法院的观点是，试图通过法律来改变“种族天性”毫无用处。事实上，南方州的立法机构给黑人学校提供的经费少得可怜，这从根本上导致不平等。在1898年的威廉斯诉密西西比案中，法院裁定密西西比州剥夺黑人选举权的做法“符合宪法”。

北方的黑人虽然保留了政治上的权利和民权，但在社会和经济领域仍然遭受严重歧视。他们通常在黑人学校中就读，从事最卑贱的工作。北方的工会强烈敌视黑人，尤其美国劳联。矿工联合会仅仅是一个显著的例外，共2/3的会员是黑人。在北方，种族平等的观点几乎遭到普遍的谴责。白人美国人通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黑人跌倒在地的话，那是他们自作自受。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种族主义观念的盛行和美国帝国主义思潮的兴起，北方对黑人的歧视加剧。几乎不再有黑人被选进立法机构或担当被任命的职务。旅馆、餐厅和剧院常常歧视黑

人，很多北方州单独设立黑人学校。白人顾客不再从黑人商店购买物品，白人工会和企业拒绝雇佣黑人劳动力。绝大多数工会排斥黑人，大量进入的移民从黑人手中抢走了家庭服务、旅馆和餐饮工作。

〔南方的美国黑人〕　　较之北方，南方的黑人处境更糟。19世纪末年，南方盛行两种对立的种族关系哲学：一种公开宣扬种族仇恨，结果导致大规模的暴力和对黑人的恐吓。另一种是内战前即已存在的所谓“关怀和仁慈的信条”，一般为白人上层阶级所持有。毫无疑问，两种哲学都没有考虑到种族平等，但是所谓“仁慈说”强调，白人应该像受托人一样细致体贴地对黑人承担自己的责任。这种主张还强调说，北方州已经将问题留给了南方，南方白人就应该以一种负责的、文明的方式承担起这一职责。重建结束后的一个时期内，南方大量黑人继续享有选举权，一些人还担任公职，例如陪审团成员甚至法官，或者当选为市、州和联邦议员。然而，在绝大多数公共设施内，隔离成为通常的模式。经济上的状况也极糟糕。直至1900年，南方3/4的黑人农民仍然依靠别人的土地过活，绝大多数属于分成制农民或者佃农。与此同时，黑人往往由于微小的过错就受到监禁，而白人犯了同样的过错却会忽略不计。

19世纪90年代平民主义运动高涨时期，南方曾一度引入一种新的种族观念。南方的平民党人强调穷人的平等主义，欢迎黑人加入他们的运动行列。得克萨斯州一个平民党人说，“他们（指黑人）像我们一样，穷困潦倒。”[①] 这种平等理念颇为超前，但广大白人群众尚未作好心理准备接受任何形式的种族平等，尤其白人中的穷困者。这一点也颇具讽刺意味，因为平民党人的绝大多数

① 罗伯特·凯利：前引书，第507页。

主张主要诉诸于贫困的白人阶层，而恰恰他们在种族关系问题上表现出近乎疯狂的固执。在平民党人力量取得政治优势的州内，黑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一些平民党人行政长官任命黑人担任陪审团成员，平民党人的报刊编辑也不遗余力地称赞黑人所取得的成就。面对这些新进展，南方州内的白人种族主义者逐渐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歇斯底里式的叫嚣："白人必须抱成一团!"为了将白人拉回到民主党中来，种族鼓动家们开始大肆散布种族仇恨。

重建以来，南方黑人就一直遭受着政治上的歧视和限制。自19世纪70年代直至进步主义时代，南方州对选举权设置了种种障碍。通常规定，选民必须符合人头税、读写和登记方面的资格要求，必须有财产证书，必须能够"理解"宪法和法律文献。借助这些条款，大量黑人被排斥在投票站之外，与此同时，共和党也在南方遭到扼杀，被迫在绝大多数州内关闭，于是到1900年，形成了一个民主党人的所谓的"稳固的南方"。路易斯安那州的情形说明了黑人境地的恶化：1896年，13万黑人享有选举权；到1904年，享有选举权的人仅剩下1300人。[①]

美国南方黑人遭受如此不公待遇，与当时整个南方的大气候紧密相关。在黑人被广泛剥夺选举权的同时，大量贫穷白人也由于选举权的资格限制而散失政治上的权利。美国历史学家J·摩根·库泽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对黑人和贫穷白人）选举权的剥夺，是一项典型的进步主义改革。"白人上层认为，将选举权从社会上"卑贱者"手中拿开，是为恢复"好政府"而采取的手段。对此，托玛斯·纳尔逊·佩奇冠冕堂皇地说，选举权的资格限制应该足够的高，以便"选举权仅仅落在那些拥有足够的智慧将其作为确保好政府、而不是毁掉好政府的一个工具加以运用的人

---

① 罗伯特·凯利：前引书，第507页。

手中。”[①] 然而，白人的这种观点也遭到驳斥。广为人们阅读的《新奥尔良每日小报》谴责白人男子选择权思想“绝对违背自然，不合理性，不为任何公开原则所认可。”到20世纪20年代，南方拥有选举权的人大约仅占成人人口的20—25%，远远低于美国的其他地区。进步主义时代所取得的另外一项成就——预选制，在南方实施过程中也变了形。由于预选只对白人选民开放，因而这项看似民主的改革措施成了将黑人排除在政治之外又一工具。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方黑人遭受大规模的暴力之害和“杰米·克劳法”的歧视之苦加深。1898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威明顿，400名白人涌入一个黑人居住区，烧毁房屋，屠杀黑人居民，死伤无数，成百的居民因惶恐而远避他乡。1900年，整个新奥尔良市被屠杀和恐吓黑人的暴徒所控制。佐治亚州的情况更糟。1906年，在自我标榜为“进步派”的民主党人胡克·史密斯赢得该州州长宝座并掀起一场所谓“白人之上”的远征之后，该州首府亚特兰大陷入了白人动乱之中。史密斯自称“人民的候选人”，竞选时许诺要加强铁路管理并改善学校条件。整个进步主义时代，南方市、镇的白人学校确实大为改观，但黑人学校急剧衰落。更重要的是，由于不必担心失去黑人选票（因为黑人已被剥夺了选举权），所谓的“进步派”州政府制订了一系列的“杰米·克劳法”。于是，铁路车厢和候车室、公共汽车、剧院进出口通道、厕所、售票窗口、公园、马戏团表演、礼堂、观众席、球类运动场、居住区、课本、学校甚至妓院等等，均实行隔离。亚特兰大的各法院有分别供黑人和白人使用的《圣经》，公共建筑物内也分设两种电梯。在这个所谓的“杰米·克劳时代”，

---

① 罗伯特·凯利：前引书，第507页。

南方种族关系的紧张状况以及黑人遭受的歧视均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每个黑人，不管睿智的还是愚笨的，衣冠楚楚的还是衣衫褴褛的，有教养的还是无知的，都在法律上被确定为比白人低劣的“卑贱者”。

总之，即便是在经历了20世纪初荡涤一切恶行和社会弊端的进步主义时代大潮的冲刷之后，种族主义观念在美国尤其南方这片土壤里仍然根深蒂固，种族歧视问题仍然是长期困扰美国社会的难以治愈的顽疾之一。

六、进步主义改革的扼要评价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处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也是“自由放任”和“扩大政府管理职能”两种观念冲突变革的时代。从西奥多·罗斯福到伍德罗·威尔逊之间的历届联邦政府，通过一系列立法、司法和行政实践，初步确立了对于转变时期美国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直接干预，加强了政府的社会管理和调节职能，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所形成的以“扩大国家职能以调节经济与经济生活”和“关心全社会的利益以维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为核心内容的进步主义传统，对于美国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对工商业、交通运输和财政金融等经济领域实行全面调控的做法，虽出于战争特殊环境的需要，但与进步主义时代改革的遗产有较多较大的关联；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的“新政”，其思想渊源之一同样可以追溯到进步主义时代的改革。英国教授拉斯基曾明确指

出，罗斯福“新政”是威尔逊“新自由”政策的逻辑发展。①

进步主义时代的改革总体上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阿布拉姆斯说：从“进步主义时代”开始，共和党就从一个商人为了经济私利而向其交纳贡金的私人俱乐部，变成了一个为商人的总体需要服务的“公共组织”。② 改革政策的主要执行者老罗斯福也在阐述自己的施政纲领“新国家主义”时说，“新国家主义”就是“将国家的需要放在集团和个人的特权之上”，并且把政府视为“公共利益的管理者”。③ “新自由”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威尔逊总统在一封致财政部长的函件中总结其改革政策时说得更加明白，他说：“我们都在同一条船只上……我们的任务因而不是为了任何单个利益，而是为了作为整体的国家利益服务。”④ 虽然他们在推行联邦政策时不时地以诸如“国家需要”、“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之类的冠冕堂皇的漂亮辞藻加以妆扮，但其实质始终如一，那便是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当然，进步主义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下层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正如邓蜀生所指出的那样，“尽管从根本意义上说来，这些改革首先得益的是垄断资本集团，但是也不能无视对普通人民的积极作用。资产阶级政府的改革，是广大群众通过斗争争取来的。”⑤

---

① 哈罗德·拉斯基：《美国总统制》，伦敦 1943 年，第 250 页。
② 理查德·阿布拉姆斯：《进步的负担，1900－1929 年》，前引书，第 67 页。
③ 威廉·奥勒尔：《进步主义年代，美国的成年》，纽约 1975 年，第 155 页。
④ 约翰·布莱曼：《威尔逊》，第 50 页。
⑤ 邓蜀生：《美国历史与美国人》，第 380 页。

第 七 章

美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就在美国举国上下为消除工业化、城市化和垄断化所带来的巨大弊端而专注于推进广泛、深刻的进步主义改革的时候，大洋彼岸的欧洲列强加紧秘密外交和军事结盟活动，并最终在 1914 年将世界引入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深渊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震惊了世界，也令美国人颇为关注。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人类灾难，同时为美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大战结束时，欧洲延续数世纪之久的哈布斯堡、霍亨索伦、罗曼诺夫和奥斯曼王朝被扫进了历史的坟墓，满目疮痍、两败俱伤的欧洲交战诸国元气大伤，从此，曾在 19 世纪支配全球的"欧洲时代"终结了。美国在战争中大发战争财，坐收渔人之利，由战前的债务国摇身一变而成为欧洲的债权国，不仅跻身世界强国行列，而且开始试图扮演起作为一流大国领导世界的角色。

一、战争初期美国的中立政策

〔战争初期美国的反应〕　由于长期受孤立主义思潮的影

响，美国人民在战争爆发前对欧洲的内部纷争并不关心，“大多数美国人仍然生活在19世纪那种自负的国际社会里，对这即将来临的大灾难毫无准备。”[①] 对于欧战的爆发，美国人颇觉有些突然，因为他们对于战前欧洲的时局即便不是一无所知，也是知之甚少。战争爆发后，美国赶忙强调它与欧洲的不同，宣称无意于介入欧洲战端。美国驻英大使沃尔特·佩奇在给威尔逊的信中也强调了这一立场，信中写道：“现在当世界一半国家遭受战争不可言状的残忍时，我们要保持我们的道义力量、我们的政治权力和我们的理念。”[②] 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也始终是美国人不愿卷入欧洲争端的因素之一。美国与欧洲远隔重洋，相距甚远，美国人每每以此为之庆幸，很多人从内心深处“感谢上帝赐予……大西洋”。[③] 在他们看来，有了大西洋的阻隔，美国就可以避免欧洲战祸的侵扰。因此，对于欧洲爆发的战争，美国人觉得自己幸运得多。

然而，地理上的孤立并非欧战爆发初期美国保持中立地位的惟一决定因素。美国在战争初期远离战争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包括“人口构成、国家经济力量与世界经济事务联系、军事潜力、根本的道义的利益的界定”等等。[④] 美国的地理位置仅仅使美国保护了最初几个月的非交战国地位，最终还是美国的世界地位决定了它对战争的态度和在战争中的作用。1914年，美国已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人口约9000万。经过19

---

① 阿瑟·林克：《伍德罗·威尔逊和进步主义时代1910—1917年》，前引书，第145页。

② 伯顿·亨德里克编：《沃尔特·海因斯·佩奇生平与书信》，纽约，1921年，第3卷，第310－311页。

③ 伯顿·亨德里克编：前引书，第3卷，第310页。

④ 罗斯·格雷戈里：《美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纽约，诺顿公司，1971年，第3页。

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迅速的发展，美国已从农业国或半农业国，转变为一个技术领先、生产能量巨大的工业化国家，其工业产值雄居世界首位。相应地，美国与欧洲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

战争的爆发并没有改变美国需要向欧洲出售商品这一事实，也没有改变美国对欧洲国家原料的需求。战争之初，与美国商业往来密切的4个国家都是交战国，其中3个是欧洲国家。1914年8、9月间，美国大部分评论认为战争为美国提供了经济机会。不仅仅军火商，很多美国企业也感受到欧洲冲突使他们的收入发生了变化。这就决定了美国企业家们对战争的态度。

美国人民对于战争的态度究竟如何？一战期间，还没有民意测验的做法。人们只得求助于不太可靠的推测方法，例如"报纸时事杂志的观点；有影响的知名人物的立场；支持或反对的一些私下运动；任何选举中的投票直接或间接反映政府战时政策等。"① 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不同族裔的民众对战争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有关研究结果显示：占总人口15%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和德裔美国人强烈反对英国而支持德国；美籍犹太人也支持同盟国，这部分是由于他们的德国渊源，部分是由于俄国的反闪米特人的德性②；其余大部分人口是不赞成德国的，他们或者对英法漠不关心，或者对同盟国怀有敌意。③

〔英、德在美国的宣传及其影响〕 虽然美国对战争的态度较为淡漠，但交战双方却都想争取美国人，他们努力塑造自己良好的形象，以取得美国人的同情。1914—1915年间，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都各自开动宣传工具为自己的战争行为辩护，以

① 格雷戈里：前引书，第7页。

② 闪米特人的特性（Semitism）：尤指其起源与犹太人有关的思想、文化和气质等。

③ 格雷戈里：前引书，第7页。

便争取美国人的好感。

在“形象斗争”中，英国占有语言、通讯线路两大优势，并能充分利用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发挥作用，例如在美国受尊敬的、可信任的、知名的美国人——詹姆斯·布鲁斯。协约国的宣传致力于“在美国理想与协约国战争原因之间寻找相似之处”①，同时把德国描绘成一个无原则的、残忍的一心想控制世界的国家。虽然这种宣传并未能起到促进美国提前参战的效果，但它确实破除了某些美国人反对参战的思想情绪，使另一些人的反战呼声归于沉寂，并鼓励了美国人用广泛的人道主义理由来使他们的参战显得合理，不断赢得美国人的同情。

德国在宣传战中略输一筹。对于协约国的指责，德国很难作出反驳。首先，德国自己的行为不当；其次，它对美国历史、性格、思想和制度的了解有限。最重要的是，德国和奥地利当局在美国的一些军火工厂里暗中进行破坏和间谍活动，阻挠它们为协约国生产军事定货，引起美国公众的愤怒。最终导致美国要求德国政府召回驻美陆军武官冯·巴本上尉和海军武官博伊·埃德上尉，要求奥国政府召回驻美大使K·敦巴。

1914年8月为了达到迅速击败法国的目的，德国公然进攻中立国比利时，并彻底摧毁了比利时的城市卢万。此举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1915年5月间，美国报纸几乎每天刊登有关德国在比利时犯下残暴罪行的报道②。此时的美国人虽然被德国入侵比利时的残暴行为震惊了，但还是对战争抱观望态度。

〔美国政府的中立〕　1914年战争爆发时，执政才一年半的威尔逊政府正致力于内政改革，正在大力推行“新自由”的进

---

① 格雷戈里：前引书，第10页。
② 格雷戈里：前引书，第10页。

步主义改革纲领。在外交方面，缺乏经验的民主党人政府（此前16年一直是共和党人执政）相对地将其置于次要地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威尔逊政府的决策。

威尔逊政府在最初发表的关于外交政策的几个声明中，都正式认可了当时全国上下一致的态度。1914年8月4日，威尔逊正式发表中立宣言。8月19日，他又发表讲话，呼吁美国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保持不偏不倚”，“谨防那种对于中立的最深邃、最巧妙、最根本的破坏，这种破坏可能源于他们所属的民族，也可能出于过激偏袒，在这些考验人们灵魂的日子里，美国不仅必须在名义上，而且必须在事实上保持中立。我们既要在行动上，也要在思想上不偏不倚。”①

美国奉行中立外交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美国建国以来，不卷入欧洲事务、不与欧洲任何国家结盟历来是个传统，易为国会及人民所接受。1916年大选时，威尔逊总统正是凭借“他（指威尔逊）使我们置身战争之外”这一口号而再次当选总统。因此“中立”成为他争取舆论的有力武器。

其次，美国政府在大战爆发之初认为，交战国的任何一方的胜利对美国都不利。1914年8月22日，豪斯上校致信威尔逊总统说，“……依我所见，最可悲的一点是，战争看不出有任何好结果。如果协约国战胜，那主要就是说，俄国统治了欧洲大陆；而如果德国战胜，那就是未来的几代是军国主义的不言而喻的专制……”②。到1917年2月，美德矛盾日趋激化时，威尔逊在内

---

① 亨利·康马杰编：《美国历史文献》第10版，新泽西，西蒙与舒斯特公司，1988年，第2卷，第96页。

② 王铁崖选译：《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史资料丛刊：近代史部分），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3页。

阁会议上仍然表示“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获胜”[1]。

再次，美国可以利用中立地位，同交战双方大做生意，扩大贸易市场和经济实力。中立宣言发表后，美国政府便鼓励大企业、大商人以供应战争物资方式向交战双方提供信贷。摩根公司实际上成了协约国在美国的金融代理人。

最后，美国最终发挥世界性的领导作用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美国外交将在战争进程中寻找机会，实现美国领导世界的梦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则为美国大踏步走向这一目标提供了契机。大战爆发后不久，豪斯上校致信威尔逊说，“在这场悲剧中，世界希望您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您必将担当此任，因为上帝已经赋予您这种力量。”[2] 1916 年 10 月 5 日，威尔逊在奥马哈讲话中说：“美国远离现在这场冲突，而世界其他地区则战火蔓延，不是因为它不感兴趣，也不是因为它冷漠无情，而是因为它想要扮演的角色是一种不同与此的角色。”[3] 基于此想法，威尔逊在 1917 年初提出交战双方实现“没有胜利者的和平”的口号，以最高仲裁者身份出面干预战争，企图左右国际局势，并利用有利的政治、经济、外交地位攫取世界的领导地位。

然而，美国人在思想感情上长期保持中立是困难的，就是总统本人最后也证明是不可能的，威尔逊长期以来就是英国文化的崇拜者。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美国人忠诚于他们不同的祖国，所以甚至在交战国的宣传机器在美国开

---

① 查尔斯·比尔德、玛丽·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 2 卷，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54 年，第 628 页。

② 查尔斯·西摩编：《豪斯上校秘密文件》第 1 卷，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26 – 1928 年，第 325 页。

③ 阿瑟·林克编：《伍德罗·威尔逊文集》第 38 卷，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9 年，第 347 页。

动之前，绝大多数美国人已经立即同情“协约国”（除德裔和爱尔兰裔美国人支持中欧三国同盟外）。英裔美国人赞成西欧协约国。英美两国语言和制度相似，更使美国人对英国产生广泛的同情。但是更重要的也许是经济因素。

〔战争对美国经济的早期影响和政府保护经济的措施〕一战爆发前夕，美国经济已开始从繁荣滑向萧条，美国学者格雷戈里在其著述中描述了战争开始后美国的经济状况，认为美国经济已处于衰退过程中，这场冲突使之更加恶化。他写道：“面对英国证券的猛抛，美国证券市场的营业额急剧下降，然后关闭。随着所有欧洲市场的崩溃，棉花价格猛跌，到了1914年8月棉花价格仅为7月的一半，西部诸州面临着严重的经济萧条，如果外国市场不迅速恢复稳定，国家其他地区必然遭受经济损失。”①

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首先表现为相当严重的金融危机。战争爆发后，欧洲各国投资者纷纷抛售美国证券。1914年8月，纽约证券交易所被迫停业，直到1915年4月才完全复业。美国因出口大幅度下降进一步加深了已经十分严重的国际货币危机。棉花和粮食的出口由于欧洲的主要顾客（英国、法国和德国）卷入战争而中断，过剩的粮食和棉花堆积在美国仓库里，农产品价格暴跌。由于德国的潜水艇袭击了英国和其他盟国的船只，同时英国又对德国实施封锁，从而进一步破坏了美国的对外贸易。1914年钢的出口量比前一年的水平降低了将近50%，其他很多制造业部门，也都差不多受到沉重打击。多数工业品的价格跌落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威尔逊政府决定采取措施保护国内经济，扭转经济混乱局面。为减轻欧洲投资者抽回资本对美国黄金储备所造成的压力，

① 格雷戈里：前引书，第29页。

政府新成立的联邦储备局建立一项特别黄金基金。为了帮助南方的棉花业渡过危机，政府又建立了一项棉花贷款基金。通过这些特别措施，美国政府期望能有助于国内银行和其他财政机构不致收缩基本信贷。同时，威尔逊政府在金融方面采取禁止美国银行家给交战国提供贷款等措施，以保护国库黄金储备，防范金融市场崩溃。对此，美国史学家林克指出："政府在美国银行家给交战国政府提供贷款问题上的早期立场，应该被理解为作出巨大努力保护破坏严重的国内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①

1914 年 8 月初，法国政府请摩根公司在美国发行 1 亿美元的债券，美国政府拒绝批准。威尔逊让国务卿布赖恩发布文告，禁止美国银行家贷款给交战国政府。同年 8 月 15 日，布赖恩发表官方声明，宣称美国"毫无理由阻止给中立国政府发放贷款，但按照本政府的意见，美国银行家贷款给任何交战国是不符合中立的真正精神。"②

但是，美国政府很快认识到战争已经为他们所带来的机遇。1914 年，布赖恩曾宣布："本政府虽然不能创造贸易，但能够提供给贸易得以发展的一个环境。"③ 1914 年 7 月 4 日，威尔逊在演说中也指出，"没有人比我更关心把美国商人的企业带到地球上每一个地区。当我想使自己成为一个政治家之前很久，我就关心这件事。"④ 战争很快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发展机遇。当战争演进为持久的消耗战时，战争的巨大规模和堑壕战需要大量供应军用物资，而英法俄协约国的军事工业力量远远不能满足这一需要。于是，它们不得不从美国取得补给，以弥补物资的不足。

---

① 阿瑟·林克编：前引书，第 151 页。
② 阿瑟·林克编：前引书，第 151 页。
③ 艾米里·罗森伯格：前引书，第 657 页。
④ 阿瑟·林克编：前引书，第 30 卷，第 251 页。

随着欧洲各国购买美国货物的激增，美国的经济衰退在短短几个月内逐渐转向经济繁荣。1913—1916年，美国对欧洲出口总额从15亿美元一下增加到38亿美元。[①] 其中绝大部分是对英法两国的输出激增。同时，欧洲各国对美国的出口骤然减少。战争期间因欧洲各国输出减少，出现了世界市场的真空，美国商品逐渐填补进去。1913年，美国出口总额约为25亿美元，3年后激增为55亿美元。同期美国进口总额从18亿美元增为24亿美元左右。[②] 对外贸易的扩展，带来了工、农业两方面的发展，就业水平日益提高，国内需求逐渐增加，经济增长呈现良性循环的势头。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威尔逊政府立即改变了原先以违反“中立精神”为由禁止发放战争贷款的政策。1914年10月中旬，美国国务院改变立场，表示它将不阻止金融界对交战国贷款。1915年8月21日，财政部长威廉·麦卡杜在致威尔逊的机密信中谈到向交战国贷款对美国外贸的重要性。他声称美国经济繁荣正在到来，如果美国能向顾主扩大合理信贷，这种繁荣不仅得以维持，而且经济将获得惊人发展。“我们的繁荣取决于我们继续扩大的对外贸易，要维持这种状况，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帮助我们的顾主购买。”[③]

1915年9月6日，国务卿罗伯特·蓝辛（6月8日布赖恩辞职后，接任为国务卿）致信总统，“如果欧洲各国不能找到方法偿付美国售予和购自它们的货物之间的超出部分，它们就将停止购买，而我们目前的出口贸易将按比例缩减。其结果将是限制生

① 菲特和里斯：《美国经济史》，前引书，第614页。

②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615页。

③ 阿瑟·林克编：前引书，第34卷，第279页。

产、工业不景气、资本和劳动力过剩、许多公司倒闭、金融衰败，以及劳动阶级的普遍不安和痛苦。”[①] 美国政府决定允许交战国公开在美国筹措贷款。这样，美国银行的贷款、战争物资源源不断地涌向交战国，主要是协约国。到1917年，政府批准给协约国贷款达23亿美元，其中德国仅占2700万美元。由于英国控制着海洋，美国同欧洲的贸易日益变成完全是同英国和法国的贸易。大量的物资贸易尤其军火贸易，使得美国从中大获其利，带来了战时美国经济的繁荣。

二、通向美国参战之路

〔德国开始潜艇战〕　美国在战争初期因发战争财，财源滚滚，经济繁荣；但是，德国潜艇在海上的突然出现和捣乱，却使美国政府感到无比惊慌。早在1915年2月4日，德国海军部就宣布开始对英国诸岛实行潜艇封锁，“所有敌船将不经警告就被击沉，包括中立国的船只，因为英国滥用中立国的旗帜”。[②] 德国发言人对此解释说，帝国政府采取这种非常手段，是为了报复英国的食品封锁；如果英国放弃封锁，他们也将放弃潜艇封锁。对美国来说，英国放弃封锁和德国放弃潜艇是最理想的局面，但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双方都已进入战争“角色”，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双方互不相让，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对德封锁是英国迫使德国就范的一种手段；德国使用潜艇的目的乃是切断大西洋上英国供应品的来源。德国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

---

① 查尔斯·西摩：《美国中立：1914－1917》，耶鲁大学出版社，1935年，第100－101页。

②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15年，补遗，第94页。

茨在 1914 年 12 月说："英国想要困死我们，我们能够如法炮制，我们能使它成为瓮中之鳖，用鱼雷进攻英国任何港口的每一艘英国及其盟国的船只。"①

然而，德国使用潜艇必然与美国发生冲突。如果大西洋贸易线中断，美国经济遭到的冲击程度是难以想像的。威尔逊在 2 月 13 日致电豪斯说，德国的政策是"一种毁灭商业的特别计划"②。经济利益决定了美国必然反对德国的潜艇战。

1915 年 2 月 10 日威尔逊在复照柏林时提出警告：如果美国船只和美国人的生命遭到非法毁灭，德国应承担"严重责任"，美国政府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本国公民在公海上航行的权利③。美国依据国际法对德国潜艇战提出抗议，国际法规定，"战舰在进攻商船之前必须发出警告，首先要保证船上全体人员的生命安全"。与此同时，威尔逊极力说服英国放弃对德食品封锁。英国表示：如果德国停止对商船使用潜艇攻击，就允许粮食进入德国。但是，德国政府坚持要求英国准许原料像粮食一样自由进入德国。英国不同意德国的过分要求，德国也就未同意放弃潜艇战。

针对德国关于潜艇战区的声明，协约国针锋相对，宣布它们将"认为可以自由扣留或把那些载运它们认为是运往敌方目的地、为敌方所有或由敌方制造的货物的船只，押送入港口。它们无意没收这些船只或船货，除非它们有被定罪的理由。"④ 1915 年 3 月 11 日，协约国发布行政命令宣布执行上述规定。

对英国实行潜艇战威吓失败后，德国政府开始在北大西洋海

---

① 阿瑟·林克：《争取中立的斗争 1914－1915》，新泽西，1960 年，第 315 页。
② 阿瑟·林克编：前引书，第 32 卷，第 231 页。
③ 托马斯·贝利：前引书，第 625 页。
④ S.F. 比米斯：《美国外交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第 136 页。

域实行不经警告就击沉英国非武装客船的全面恐怖活动。这对美国构成了重大威胁，由潜艇战引发的美德危机缓缓拉开了序幕。1915年德美间发生重大危机。这年的3月28日，一艘德国潜艇未发警告就击沉英国客轮"法拉巴"号，船上1名美国乘客溺死，引起美德两国纠纷。随后，威尔逊总统及其顾问们试图制定既不引起美德严重危机、又能保护美国权利的政策。布赖恩主张政府应警告美国公民，不要乘交战国商船旅行。当时国务院法律顾问罗伯特·蓝辛认为：德国击沉非武装的"法拉巴"号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践踏，即使造成外交危机，美国也不能不采取坚定立场。然而威尔逊总统已决定不再追问"法拉巴"事件。

〔德国潜艇威胁加剧〕　但是1915年5月1日，又有一艘美国油轮被鱼雷击中，3名美国人丧生。同年5月7日，又发生了不幸的"卢西塔尼亚号"事件，美德关系再次出现重大危机，这一事件实际上预示着美国欧洲调停计划的破产，也把美德潜艇争执推向高潮。

卢西坦尼亚号是一艘豪华英国客轮，1915年5月7日在爱尔兰海面未经警告即被德国潜艇击沉，1152名旅客罹难，其中包括128位美国公民。这一事件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报刊杂志纷纷刊文谴责德国暴行。威尔逊的私人秘书图马尔蒂在回忆录中引用威尔逊本人的话说："我深知，国家的情绪现在也如痴如狂……"① 美国政府内部就此事件有两种极端主张：一派以国务卿布赖恩为代表，认为对德国抗议是必要的，但口气要缓和，使德国人放心地认识到美国并不准备参战，并建议禁止美国公民乘坐交战国船只旅行。另一派则主张美德断绝关系，借机参战，驻英

① 约瑟夫·图马尔蒂：《我所认识的伍德罗·威尔逊》，纽约，1921年，第233页。

大使佩奇说“强烈敦促总统站在协约国方面参战”。[①] 5 月 9 日豪斯认为，“即使战争随之而来，它将不是一场新战争，而是更为迅速地结束一场旧战争的努力，我们的干预不是增加、而是挽救生命的丧失”。[②] 这两种主张实际上均未反映出当时大多数美国人的想法。多数美国人的态度和立场是，既想从德国得到满意的答复，又不期望政府卷入战争。

威尔逊总统采取了基本上与舆论一致的立场。在一次公开讲演中，他说道：“有这样一种事情，一个人过于自傲而不屑战斗。也有这样一种事情，一个国家十分有理以致它不必用武力来使别国相信它有理。”[③] 总统对德国政府采取了一场颇有耐心的外交辩论。他在 1915 年 5 月 13 日关于“卢西塔尼亚”事件的首次照会中，以人权的名义，呼吁德帝国政府停止攻击非武装商船，要求德国道歉和经济赔偿，并要保证此类行动不再发生，第一次宣布了美国人乘坐交战国船只旅行的权利。[④] 德国外交部对此未作正面回答，威尔逊再次提出要求。1915 年 6 月 8 日，布赖恩因不愿再签发“卢西塔尼亚”事件照会而辞职（蓝辛接任为国务卿）。当德国政府第二次作出含糊答复时，威尔逊发出第三份“卢西塔尼亚”事件照会，宣称继续这种不加警告击沉船只的政策将被美国视为“蓄意为敌”，但德国态度强硬，双方交涉进展不大。

然而，德国政府已开始意识到这样做有进一步激怒美国的危险，于是在 1915 年 6 月 6 日发布密令，要求潜艇司令官们不要攻击大型客船；并且怂恿德皇于适当时机下令完全停止对所有客轮的无限制潜艇战。可是 8 月 19 日，又一艘德国潜艇击沉“阿

① 查尔斯·西摩编：前引书，第 1 卷，第 433 页。
② 阿瑟·林克编：前引书，第 33 卷，第 134 页。
③ 比米斯：前引书，第 139 页。
④ 亨利·康马杰编：前引书，第 104 页。

拉伯人号”邮船，2名美国人丧生。威尔逊总统和国务卿蓝辛决心迫使德国人摊牌。9月1日，德国驻华盛顿大使冯·伯恩施托夫通知蓝辛：德国潜艇不会攻击没有武装的“邮船”，只要它们不攻击德国船，并且在被召唤投降的时候不试图逃跑。[①]

通过“阿拉伯人”号事件的处理和德国提出的保证，总算维持了7个月的和平。但是，1916年3月24日，非武装的法国客船“苏塞克斯”号又被德国鱼雷击中，几名美国人受伤。不容置疑，德国违背了“未警告不击沉不抵抗客船”的诺言。美国面临最严重外交危机。1916年4月18日，国务卿蓝辛在给柏林照会中宣称：“除非（德）帝国政府立刻宣布并实行放弃它现行的攻击载客和载货船只的潜艇战方法，否则美国政府只有完全断绝同德意志帝国的外交关系而不能有其他选择”[②]。

德国政府在当时情况下对进行无限制潜艇战的胜利还没有把握，只得暂时屈服。1916年5月4日，德国许诺：“根据国际法所承认的登船检查和摧毁商船的一般原则，这种船只不论在宣布的海战区以内还是以外，将不再未予警告和没有拯救人命的情况下予以击沉，除非这些船只试图逃跑或抵抗。”这一许诺也暗示，如果美国不能迫使英国放弃封锁，德国还要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潜艇战。5月8日威尔逊总统告诉德国：“这类事情，责任是单方面的而不是各方面的；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③]

几次由潜艇战引发的美德关系危机均以德国暂时妥协而告终，表面上美国赢得了外交上的胜利，但这只是德国的权宜之计。德国的潜艇不仅使接近破裂的美德关系更为脆弱，而且使美

① 比米斯：前引书，第141页。
② 托马斯·贝利：前引书，第634页。
③ 托马斯·贝利：前引书，第635页。

国更接近参战的边缘。

〔1915年以来美国的调停〕　在欧洲战火熊熊燃烧之际，美国赢来了四年一度的大选。在1916年的选举中，外交政策成为竞选运动的中心问题。民主党人提出了“他（威尔逊）使我们没有卷入战争”的有效口号。威尔逊亲自对选民说，自己“不希望美国参战”。民主党还大事宣扬，“是要威尔逊和光荣的和平？还是要休斯、罗斯（共和党人）和战争？”民主党对保持和平、繁荣和执行进步政策的承诺，赢得了民众的拥护和赞赏，也为威尔逊赢得了大选的胜利。

在整个中立期间，和平希望时隐时显。美国国内舆论强烈要求政府既要坚持保护美国的海上权利，又要维护和平。于是，依靠调停来结束战争、摆脱困境便成为美国政府惟一可行的方法。1915年1月，威尔逊要求豪斯上校前往欧洲，开始了战争爆发后的首次调停使命。豪斯发现，只要德国同意撤出比利时和战后实行裁军，并对将来欧洲和平政策给予明确保证，英国官员就愿意商讨和平条件。但德国人不愿作出保证。豪斯的首次和平使命以失败告终。

调停失败后，威尔逊总统又准备召开一次和平会议。1916年2月22日，格雷－豪斯备忘录中写道，“豪斯上校告诉我，鉴于英法时机成熟，威尔逊总统准备建议召集一个会议以结束战争。如果协约国接受这个建议，而德国拒绝接受，那么美国将‘可能’参战反德”。[①] 由于德国拥有军事优势，而英国也不想在和平桌上被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束缚住手脚。所以，没有一方愿意召开和平会议。

1916年下半年，交战双方在大战场上的僵持状态正在打破，

---

① 托马斯·贝利：前引书，第635－636页。

双方都想利用各自手中掌握的最厉害的武器置对方于死地，赢得战争的胜利。美国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或者通过调停结束战争，或者被形势所迫卷入战争。

1916年11月下旬，为了避免美国介入战争，威尔逊打算继续通过调停结束战争，并意欲豪斯再次身负使命，前往伦敦。但是最终因时间不允许，他的欧洲之行被取消。威尔逊此次调停的动机是“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做，我们必然在潜艇问题上与德国作战”。[①] 威尔逊草拟了照会初稿，描述了战争的危害和对文明的不利影响，宣称战争起因模糊不清，中立国的权利受到侵犯，要求交战国明确表明各自的战争目标。

德国当局很快就获悉威尔逊的调停计划。12月12日，德国抢在威尔逊之前向协约国发出和平建议。12月18日，威尔逊向交战双方发出和平调停的建议，提出“交战双方的政治家在此次战争中所抱的目的，按照他们向其本国人民和全世界所一般地说明，实际上是一样的”[②]。这样，只要交战国公布各自的目标，就能找出和谈基础。

威尔逊还希望通过施加压力迫使英国接受调停，但这种压力却难以奏效。早在1916年9月底，英国陆军大臣劳合·乔治就明确表示，威尔逊可能“插手”结束战争，英国不能容忍任何外部干涉，在德国的威胁“最终和彻底消除之前，和平现在和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思议的。……战斗必须进行到最后一个敌人被消灭”。[③] 12月30日，协约国政府发出联合照会，拒绝德方召开和会的建议。1917年1月12日，协约国在对威尔逊12月18日照

---

① 查尔斯·西摩编：前引书，第2卷，第390页。
② 王铁崖选译：前引书，第82页。
③ 罗斯·格雷戈里：前引书，第108页。

会的复照中，“以最明确的态度，抗议美国照会中把交战国的两个集团混为一谈；这样的混为一谈，以中欧国家的公开声明为根据，是直接违背了有关过去的责任和将来的保证的明显事实；威尔逊总统在提这一点时肯定并无赞同这种提法的意思”[①]，由此拒绝与德国进行和平谈判。德国在12月26日给威尔逊的照会中指出，“帝国政府还认为，只有在目前的消耗性的战争结束后，才能从事阻止未来战争的伟大工作”[②]，委婉地拒绝了威尔逊的和平调停。威尔逊的调停努力终告失败。

〔中立时期的美英关系〕 一战爆发后，美英曾在许多问题上发生过争执。1909年，德、法、奥、英、俄等10国在伦敦签署了海战法宣言，其中规定在战争期间禁止把食物和原料列为禁运品。英国议会未批准这一宣言。战争爆发之初，德国宣布在海战中遵守伦敦宣言，试图利用宣言的规定打破英国对中欧国家发动的经济战。然而，英国以未批准为由宣称不承担履行伦敦宣言的义务。

美国不断抗议英国的这些措施。1914年12月26日对英国的照会中宣称：“非交战国家之间的商业不应被从事战争的国家干扰，除非这种干扰明显地是出于保护它们的国家安全的紧迫需要，并且即便那时也只能做限于必要程度的干扰。”[③] 而英国则认为干扰措施是非常必要的，并继续扩大它的违禁品清单。

不久，英国清除了德国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艇，并开始扩大它的控制面，以阻止中立国与同盟国的贸易。因此，美国政府开始与英国发生纠纷。直到1915年2月底，英国极力加强其海上控

---

① 王铁崖选译：前引书，第85－86页。
② 王铁崖选译：前引书，第84页。
③ 比米斯：前引书，第134页。

制体系，英国海军在北海布雷，对德国和欧洲中立国家设下很长的海军封锁线，并截获美国运载某些非禁运品[①] 特别是运粮食到意大利、荷兰和其他欧洲中立国以便转运德国的船只。

对于英国1915年3月实行的封锁，华盛顿政府表面上予以默认，曾于1915年7月14日在致伦敦外交部的照会中，表示美国将保持中立贸易权。10月21日，又给伦敦发出一份照会：抨击英国的封锁是“无效的，非法的和无防御力的”。开始，威尔逊坚持要完全尊重美国的商业权利。后来，他决定默认英国海事制度，保留美国权力以待将来裁决。只有英国在为危及美国安全的目的而战时，威尔逊才有理由试图中断英国从控制海洋中得到的那些利益。

为了防止禁运品流入中欧国家，英国海军甚至搜查美国邮船的包裹。这在美国人看来是对个人航海自由的严重侵犯。蓝辛在抗议照会中说，美国政府“不能再容忍由于这些方法使美国公民遭受的以及继续遭受的这些恶行之辱。忍受这样一种无视法律的做法将为交战大国屡屡侵犯国际法打开了大门”。[②]

邮件争执尚未解决，1916年的“黑名单”事件又使美英关系紧张，并且达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1916年7月18日，英国提出一份黑名单——美国的87家公司被怀疑向德国提供过援助，结果英国禁止其臣民与美国进行贸易。据英国政府宣称，“黑名单”是禁止英国臣民帮助敌人的一种合法尝试。这种措施实际上

---

① 按照传统的国际法，在战争期间，物资分为三类：1，绝对禁运物资，即那些将直接用于军事的物资；2，附有条件的禁运物资，即那些容易作为军用的物品；3，非禁运物资，即粮食、原料和那些预定只作民用的物品。按照传统法规，交战国可以截获和没收绝对禁运物资；要没收附有条件的禁运物资时，必须证实那些物资将用于军事；同时，交战国又被要求允许非禁运物资运往敌对国家。

②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16年，补遗，第608页。

取消了列入名单的美国公司做生意的权利，一方面英国人拒绝与它们做买卖；另一方面未列入名单的美国和其他中立国的公司再也不敢与它们有业务往来。“黑名单”公布之后，美国舆论哗然，谴责之声见于各大报刊杂志。连强烈亲英的《纽约时报》也把黑名单事件描绘成“战争期间英国政府最愚蠢、最不必要的行为”。甚至驻英大使佩奇也对之感到憎恶。[①] 1916 年 7 月 23 日，威尔逊向豪斯上校说道，“我对英国的忍耐到了尽头。黑名单事件是最后的稻草。……我们还能再忍受他们的不可容忍的行为吗？……我打算请求国会授权对协约国禁止贷款和限制出口”。[②] 9 月，国会在休会之前，投票授予总统对协约国采取报复措施的权力。9 月 8 日，国会投票通过海军拨款法，规定建造 137 艘各类新舰只。威尔逊宣称：“让我们建立一支比英国海军更强大的海军，随心所欲地行动”。[③] 与英国的冲突成为威尔逊政府建立一支强大海军的主要原因之一。在 1916 年的扩军运动中，威尔逊曾在圣路易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支海军像美国海军一样须控制如此广阔的防御区，因此，依我所见，美国海军应当成为举世无双、最完备的海军。”[④]

1916 年期间美英虽有冲突纠纷，但并未出现破裂局面。这是因为紧密的经济纽带和悠久的文化渊源已把两国无法解脱地联系在一起。威尔逊政府充其量也只是施加压力迫使英国改变一下不利于美国的某些做法。英国则想利用其海上优势，对敌国严加封锁以“困死”德国，彻底扭转战场上的不利局面，它清醒认识

---

① 托马斯·贝利：前引书，第 637 页。

② 托马斯·贝利：前引书，第 637 页。

③ 查尔斯·西摩编：前引书，第 2 卷，第 316－317 页。

④ 罗伊·沃森·柯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年，第 291－292 页。

到保持与美国友好关系的重要性。所以在整个中立期间，美英争执虽曾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但最终还是求同存异，顺利解决，两国关系安然无恙。此后，随着战争进程的向前推移，美国中立政策的天平不断地倾向英法这一边。

〔美国宣布参战〕　1917年1月22日，威尔逊在参议院发表了“没有胜利的和平”的演说，强调美国的目的是实现“没有战胜者和战败者”的和平，其结果是“无兼并和无赔偿”的媾和，因为只有这样的和平，才能获得持久的世界秩序。[①] 英国附和美国的建议。1月26日，英国外交家威廉·怀斯曼代表政府说，只要德国愿意，英国准备在一个合理的基础上与它谈判。1月31日，德国政府答复威尔逊的和平呼吁，宣布自2月1日起，德国潜艇将不加警告地击沉所有在英、法、意和地中海东部周围广大海域航行的交战国和中立国船只。对此，威尔逊“感到世界突然天翻地覆，东西旋转，无法保持镇静”。[②] 威尔逊别无选择，只有宣布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但即使如此他仍然不希望卷入战争。

1917年1月17日，德国外交大臣齐默尔曼用密码致电德驻墨西哥公使称，“如果德美之间发生战争，提议与墨西哥结为军事联盟，德国为墨政府提供财政援助，支持墨西哥收回19世纪中期与美战争中失去的领土。电报还提到由墨总统卡兰萨出面邀请日本加入反美联盟”。[③] 显然，德国想利用美墨的紧张关系，使美国纠缠于西半球事务，以便减轻对中欧盟国的压力。这份电报被英国情报部门破译，2月25日，佩奇将其寄给美国政府。

---

① 亨利·康马杰编：前引书《美国历史文献》，第2卷，第126页。

② 查尔斯·西摩编：前引书，第2卷，第439页。

③ 亨利·康马杰编：前引书，第128页。

威尔逊阅后认为这是对美国尊严的侮辱和对美国安全的挑战，3月1日他授权将电报交付新闻界。电报公布，美国舆论大哗，反德浪潮席卷全国。齐默尔曼电报的公布使一些美国人免于参战的侥幸心理几乎荡然无存，直接导致美国走向战争。

此后，事态发展愈益严重，德国潜艇在海上击沉美国商船，致使大批美国人丧生，美国国内对德国的愤怒情绪日益高涨，美国参战已是大势所趋。这时俄国国内又爆发革命，沙皇政府被推翻，临时政府建立，政治前景隐晦不明。这也成了促使美国作出参战决定的因素。1917年4月2日，威尔逊在国会特别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为了美国的权利与荣誉"，必须对德国宣战。4月4日参议院以82对6票、4月6日众议院以373对50票的压倒多数通过威尔逊的战争咨文，美国正式参战，并无条件地站到了协约国方面。

美国与协约国的联合主要原因在于：在政治上，美国人民由于文化上和政治上与英国和法国的民主制度比较接近因而产生一种天然的联合倾向；在经济上，由私人贷款促进的在美国企业与协约国订购军火之间的经济联系控制了美国的国内政治并导致威尔逊政府作出参战决定；在军事上，德国的潜艇战早已构成对美国安全和美国人生命财产的威胁，是促成美国参战抗德的重要因素。

三、战时美国

〔战争动员〕　美国公众对于参战反应不一，大部分人是勉强接受这一解决方法的。社会党人、极端激进派、许多进步派和德裔及爱尔兰裔美国人反对美国参与欧洲战争，他们仍然认为，美国的介入是威尔逊总统造成的。

为了让全体美国公民理解美国参战的目的，威尔逊总统在参

战决议通过一星期后，设立由丹佛进步记者乔治·克里尔领导的宣传委员会。克里尔兼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春花怒发式想像力、层出不穷的独创性和无限饱满的干劲”。[①] 他最初采取的行动是建立自愿的新闻检查制，既能使公众非常了解时局，而又保障了高度机密的消息不泄露。该制度进行得非常顺利。随后，他动员几百名演说家、作家、艺术家、演员和学者，进行美国历史上空前的宣传活动。“全国最高明的插图画家们画招贴画号召年轻人入伍，号召年纪大的人购买‘自由债券’。志愿‘民兵’在教堂、学校和剧院里向听众发表爱国演讲。关于威尔逊的战争目标的报道不仅充斥美国，也大量到欧洲和亚洲”。[②] 宣传委员会一方面着重宣传美国只是为促进全世界自由与民主事业而战，另一方面用骇人的笔调描绘德军的威胁是企图掠夺欧洲并将征服世界。

克里尔的宣传委员会是在美国人被“不忠”、“间谍”和“破坏”的谣言与罪名的恐吓下，乘机向他们灌输参战和安全意识的。克里尔宣传和诸如国家安全同盟和美国保护同盟的建立，在美国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狂热。每个州都有公共安全委员会，其分会遍及各县各市。它们对德裔美国人实行恐怖统治，尤其是在蒙大拿、明尼苏达和威斯康星等州。在他们的宣传下，“美国人禁止演奏德国音乐，禁止教授讲德语，将德国泡菜改称为‘自由白菜’；在辛辛那提，甚至把椒盐卷饼从酒吧中午餐时随意小吃的柜台上一概拿走”。[③]

---

① 塞缪尔·莫里森，亨利·康马杰等著：《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499 页。

② 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著：《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292 页。

③ 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前引书，第 274 页。

〔政府对经济的计划和统制〕　政府在经济上为应付战争危机所作的努力，在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全国经济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受到国家的控制，在战争期间，差不多有20－25%的生产是为适应战争需要服务的。经济统制始于1916年10月设立的国际委员会。1917年2月，军需品标准局成立，其任务在于规定军需品采购的标准。1917年3月，又设立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军需品总局，负责协调美国海陆军和协约国采购军需品事宜。美国对德宣战后，对军用物资的需要增加，导致美国海陆军以及协约国常常越过军需品总局而各自安排军事订货，结果造成了一片混乱。

由于军需品总局难尽其责，1917年7月国防委员会成立了战时工业局，担负有系统地在整个经济的工业部门制定优先分配和增加生产的计划。只由一个中央集权机构来负责战时整个经济动员与军事努力的一体化现象，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同年8月又成立协约国采购委员会，负责协调协约国和美国海陆军的军需品采购。

战时工业局开始时依赖私人工业的自愿合作，但不太成功。例如：新泽西锌业公司总裁、锌业委员会主席爱德加·帕尔默给威尔逊写信表示，他现在必须或者离开委员会，“或者禁止我的公司卖锌给政府”。[①] 不久，政府发现对自愿合作的依赖，难以满足美国军事力量日益增长的需要，保证对盟国有秩序的大量供应。由于缺乏强迫私人公司合作的强制力量，战时工业局的官员便主张把军事努力置于更强大的政府领导之下。由于这些官员本身就是私人企业主，所以他们寻求既使用强制权力机构，但又不

① 肯尼迪：《在这儿，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美国社会》，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128页。

危害私人经济力量的方式。

1918年春，为对抗强制权力，威尔逊签署立法，取消分配优先次序、核定物价和命令征用制造工厂的行政权力。他把价格核定权授予另一专门委员会，以致决定权不再属于战时工业局。"战时工业局从开始到最后都没有正式权力"。[1] 战时工业局在伯纳德·巴鲁克领导下，建立了一些职能部门，负责调节、资源保护、优先调拨物价、原料需求、劳工以及与盟国采购的协作。"1916到1920年间，石油生产和炼制保持与需求量一致或超过它，烟煤年产量上升到5.68亿多吨，汽车生产增加大约20%；但棉纺业使用很少的原材料，钢锭的总产量实际上静止未前"[2]

美国的经济动员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威尔逊政府进一步采取了官方与美国主要工业公司的紧密合作。这样，在美国参战的19个月中，美国政府才能保证连续不断地向盟国供应军需品和其他商品。战时的实践，特别是战时工业局的经验，使很多私人企业主相信"政府控制"未必意味着可能是敌意的或有损于私人利益的控制。美国对经济的控制还扩大到粮食和燃料。

〔政府对粮食和燃料的管制〕　一战期间英国和其他协约国粮荒严重。1917年4月20日，赫伯特·胡佛曾电告美国政府协约国的粮食情况已"非常严重"；意大利、法国和英国都仅有一个月左右的存粮。[3] 5月19日，威尔逊总统任命胡佛为食物管理局局长。6月19日，胡佛在参议院农业委员会说，"欧洲食物管理局天生是专制的，但……美国的食物政策应该建立在完全不同于欧洲的理念上……我们将注重人民的志愿努力……我们建议动

---

① 肯尼迪：前引书，第133页。

② 爱德华·柯克兰蒂：《美国经济生活史》，纽约，梅瑞狄斯公司，1969年，第470页。

③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626页。

员人民的自我控制和自我牺牲精神”。[1] 为此，食物管理局制订了一个防止浪费和减少稀有食物消费的宣传教育计划。对食糖、小麦、肉类、黄油和其他食品实行有效的管制，并鼓励全国人民节衣缩食。同时，采用各种措施鼓励农民增加生产。当时报纸曾有如下的一段报道，可见当时实行该计划的具体情景：

“根据食物管制的新条例，每个家庭成员每月配给面粉不超过6磅。这一点你去购买粮食时务请记住。请勿找事，要求粮店多卖一些，因为这对你、对他都会引起很大麻烦。

由于受到粮食供应的限制，原定下星期日在鲁克附近的自由大会堂举行的全日演唱宴会决定取消。

下面是本县食物管理科长芬德利为你们规定的今后四个星期的食谱，务请严格遵守：

星期一，每餐不吃面粉制品；

星期二，每餐不吃肉；

星期三，每餐不吃面粉制品；

星期四，早餐不吃肉，晚餐不吃面粉制品；

星期五，早餐不吃肉，晚餐不吃面粉制品；

星期六，每餐不吃猪肉，早餐不吃肉；

星期日，早餐不吃肉，晚餐不吃面粉制品；

食糖务必随时节约使用。喝咖啡不要放糖，除非已经有了长期养成的习惯，但在这种场合下也只能放一匙。

这些规定适用于家庭、旅馆、饭店和其他饮食点。”[2]

食物管制产生了积极的效果，1918年美国能出口3倍于它的正常份额的肉、糖和面粉供应协约国。

---

① 肯尼迪：前引书，第118页。

②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627页。

随着战局的发展，美国民用和军事工业都出现了严重的燃料荒。几乎所有的燃料供应都短缺，其中最重要的是缺煤。1917年8月联邦政府设立燃料管理局，负责增加燃料生产、进行燃料储备、管制燃料分配、规定燃料的最高价格、减少燃料消费等。1918年4月建立了一般家庭用煤的定量供应制度。同年1月还实行了对燃料油分配的控制办法，以后又把控制范围扩大到天然气和煤油。

〔对运输的战时管制〕　美国对德宣战时，德国炸沉美国轮船的速度超过了美国造船的速度。为了保证稳定的运输力量使供应品能在公海上运送，1917年4月，美国航运局建立附属机构——应急船队公司（资本5000万美元），负责监督造船计划的执行和经营政府船只的航运业务。公司形式上是私人的，但实际上是政府的一个机构。由政府出资购买它的股票，政府通过它建造百万吨船只。直到1918年查尔斯·M施瓦布成为公司董事长，应急船队公司才成为一个独立企业。应急船队公司最大的项目是从事建造总吨位1740万吨的3148艘船只。大约240万吨到停战时已交付使用；但公司生产继续到1919年。战争开始时美国商船从事对外贸易的几乎不超过150万吨；而到1920年数字高达1350万吨。[①] 国会授权总统将60万吨德国商船扣在美国港口。1917年8月，政府征用了正在建造中的所有钢铁船只，从而增加了30万吨的吨位。最后，政府还接收了所有2500吨以上适合于使用的美国船只，但允许船主自行管理行使。

陆上交通条件较好，政府不必重新创建运输网。“铁路在、铁路的调整者——州际贸易委员会也在。困难是这一体制尚未适

① 柯克兰蒂：前引书，第473页。

应战争紧急情况。”[1] 各条铁路的运输量因从内地运输大批军队和物资到大西洋港口而空前增加，铁路公司一直没有适当地补充设备，车皮不能满足战争的迫切需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于 1917 年 4 月成立战时铁路局，其领导人员都是各铁路公司的经理或董事，任务是在分配设备和其他协调活动方面取得合作，以支援铁路系统为战争所作的努力。私营铁路公司虽然乐于参加，但托运人因私人线路不按协定办事、铁路运价大幅度上涨而不满。工会要求提高工资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1917 年 12 月，威尔逊总统下令政府接管全部铁路。1918 年 3 月，国会颁布了一项用 5 亿美元周转基金来支援铁路营运的法令，到 1920 年 3 月 1 日把铁路交还原主。同时，国会把决定运费的权力交给铁路管理局。政府接管铁路是一项紧急措施，是使铁路业满足战时需要的必要作法。它使各终点站、设备和各机修厂能联合使用；车辆载重能力的新规章保存了资源，保证了铁路的高度综合使用，使铁路能更有效地运送军队和军需物资。1918 年年中，联邦政府还接管了全国的电报与电话系统。

〔战时财政和税收〕　美国参战以后，财政负担不断加重，美国不仅要维持自己参战的费用，而且还要为协约国的开支负责。早在 1917 年 7 月，英国财政大臣诺斯克利夫勋爵就曾通知豪斯上校，“我们可用以对美国付账的财力业已枯竭。除非合众国政府能够充分满足我们在美国的开销，……否则协约国的整个经济结构必将崩溃。”[2]

1917 年 4 月，美国国会通过“第一自由贷款法令”，授权财政部长经过总统的批准，可以在 100 亿美元的范围内给各盟国政

---

① 柯克兰蒂：前引书，第 473 页。

② 莫里森、康马杰等著：前引书，第 497 页。

府提供贷款。此后，私人贷款停止了。据官方估计，1917 年 4 月—1919 年 10 月美国所支出的全部直接战费（包括贷给盟国的 95 亿美元在内）大约为 350 亿美元。[①] 战前国债只有 10 亿美元，到 1919 年 8 月底猛增到空前的 254.845 亿美元，[②] 其中约有 191 亿美元为自由公债和胜利公债。

美国政府筹集用于国内和贷给协约国的巨款，主要靠贷款解决。1917 年 5 月 14 日，财政部公开发行第一批总额为 20 亿美元、利率为 3.5% 的长期公债，之所以选择 3.5% 的利率，麦卡杜解释说，"这个利率比通常储蓄银行的利率低得多。因为如果利率较高的话，恐怕会出现储金大回收局面。"[③] 这批公债被公众立刻认购一空，认购额超过了实际发行额。截至 1918 年 11 月 11 日，财政部共发行了 4 批自由公债，利率从 3.5% 到 4.5% 不等。停战后发行了一次"胜利公债"（即第 5 次）。据估计，战时公债中大约有 70 亿美元，即总数的 30%，是由收入在 2000 美元或 2000 美元以下的人认购的，大约有 100 亿美元是由收入在 2000 美元以上的人认购的，其余的是由包括银行在内的各家公司认购的。[④]

战时财政不仅依靠大量借款，而且还靠征收新的、更重的税款。1916 年 9 月国会通过增税法，是该计划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1917 年 10 月，国会又通过了一项增加联邦收入的税法，个人所得税从 15% 提高到 67%，而且，超额累进所得税的起征点

---

① 罗伯特·莱基：《美国战争》，第 1 版，纽约，哈珀和罗出版公司，1968 年，第 642 页。

② 柯克兰蒂：前引书，第 467 页。

③ 肯尼迪：前引书，第 101 页。

④ H.U. 福克纳，H.G. 沙伊贝等著：《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第 310 页。

从 2 万美元降低到 5000 美元；公司所得税从 2%提高到 6%；地产税率提高为 2%—25%；超额利润税提高为 20%—60%，但军火制造商利润税率却从 12.5%减为 10%；还提高了酒税、烟税、车辆牌照税、娱乐税等的税率。

1918 年 6 月联邦政府提出了另一项增税新建议并于 1919 年 2 月 24 日成为正式法律。它规定 1918 年个人所得税率为 6%—12%，规定 1919 年收入的正常个人所得税率为 4%—8%；超额累进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提高到 65%，这样就使正常税率和附加税率加在一起有可能对富豪征收高达 77%的个人所得税；公司税提高到 12%，超额利润税率提高为 30%—65%[①]。这条法律明确表示，增税是暂时的，税率以后要逐步降低。

联邦税收提高的税金额从 1914—1916 年的每年不足 8 亿美元增加到 1918 年的 42 亿美元，到 1919 年 6 月 30 日为止的这一财政年度为 46 亿美元。所得税和战时利得税共占税收总数的 2/3[②]。

最终"大约有 2/3 的直接战费是用贷款的方式解决，其余约 1/3 是用当时的税款支付的"[③]。美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筹款办法是比较妥善的；关税税率没有提高；税收的主要部分是靠提高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税率。

但大量发行公债和大量的黄金储备（到 1919 年，世界的黄金存贷的 1/2 在美国）导致美国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同时，由于政府和私人借款增多，银行存款和市面上流通的货币量约增加 50%，流通速度也加快。因此，"1916—1920 年间，总货币供给

① 柯克兰蒂：前引书，第 466 页。
② 福克纳、沙伊贝等著：前引书，第 312 页。
③ 柯克兰蒂：前引书，第 467 页。

增加大约 75%，消费品价格指数几乎增加一倍”。[①] 美国人民为战争付出了巨大代价。

〔战时劳工〕　1917 年美国参战前，国内就存在劳工缺乏的问题。1914 年到美国的移民为 121.848 万人，1915 年移民数是它的 1/4，1918 年移民数仅是它的 1/10。[②] 美国参战以后，由于老百姓被征入伍，工农业发展遇到了困难。外来移民的缺乏，导致黑人、妇女开始参加工业劳动但“战时任何一年，女工最大人数均未超过 100 万”。[③] 铁路上的职业技术性工作第一次雇佣了黑人。在铸造厂、炼钢厂、加工包装厂、建筑公司以及其他工业部门，黑人也找到了技术水平要求不高的工作。

由于劳力持续缺乏，1917—1918 年期间，普遍实行了 8 小时工作制，按美元计算的工资也迅速提高。然而，物价上涨也很快。因此，美国工人的平均实际收入增加很少。

美国参战后不久，威尔逊总统设立专门的调停局，负责管理与作战部订有合同的工业部门工人的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这些调停局（每个调停局包括一名由劳联指定的代表）努力使增加工资与生活费指数的上升保持一致。

由龚伯斯领导的劳联，拒绝和平主义的、反军事的劳工传统，他向众议院表白，“为了我们国家的安全、正义和理念，工人们将不会放弃履行自己提供服务的职责”[④]，这就等于说，有组织的劳工或其领导者作出“不罢工”的誓言。劳联成员总数从 1915 年的 256 万增加到 1920 年的 503.4 万。[⑤] 与此同时，威尔逊

---

① 肯尼迪：前引书，第 103 页。
② 柯克兰蒂：前引书，第 470 页。
③ 柯克兰蒂：前引书，第 471 页。
④ 柯克兰蒂：前引书，第 471 页。
⑤ 柯克兰蒂：前引书，第 472 页。

政府开展了一场根除、破坏激进工会，特别是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的运动。好战的反激进的雇主们，便利用这个机会，以爱国主义为借口，攻击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

1918年4—5月，战时劳工局和战时劳工政策局成立。战时劳工局是一个受理劳资纠纷案件的准司法机构。战时劳工政策局是制定关于工时、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总政策和总方针。尽管有劳联的合作，但政府的努力并不足以阻止争端或制止罢工。在19个月的战争期间，美国大约发生了6000起罢工事件。

〔战时的公民自由权〕　在极端危急关头，美国政府常常试图防止国内外两方面敌人。因此，威尔逊政府既要强迫士兵在国外作战，又要惩罚那些企图阻挠作战努力或援敌济敌的人。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场为了民主而使世界稳定的战争，看来已削弱了对民主进程的信心”。[①]

1917年6月15日的总统对付反战的《间谍活动法》规定：对故意编造假报告帮助敌人的人、煽动武装部队叛乱的人、或企图妨碍征兵或征兵工作的人，判处监禁或罚款；监禁可长达20年，罚款可高达1万美元。该法授权邮政部长对于他认为属鼓吹叛国或强行抵制法律的出版物有权拒绝投送。随后，《美国社会党人》被禁止邮寄；1917年8月和10月社会党的主要刊物《群众》和《密尔沃基导报》被禁止。《间谍活动法》成了压制民主、消除异议和批评政府的工具，“鼓吹用重税替代发行公债，即使在最高法院还未认可征兵的情况下说它违宪，说击沉商船合法，主张在宣战前举行公民投票，声明战争违反基督教义等等，均属犯罪。人们曾因批评红十字会和基督教青年会而受到处罚。”[②]

---

① 布莱克著：前引书，第293页。

② 阿瑟·林克等著、刘绪贻等译：前引书，第239页。

随着战争的进展，政府控制思想和言论的权力逐渐扩大。国会于1917年10月6日通过的与敌通商法增加了政府对外语印刷品进行检查的广泛权力。

不仅对言论进行控制而且破坏激进的工会组织。1917年9月5日，联邦特务们在整个西部袭击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的办事处，逮捕该工会领导人，被审讯、判刑和监禁者近100人。1918年4月20日国会通过惩治破坏活动法，将矛头对准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并将故意破坏战争物资、公用事业和运输设备规定为联邦罪。① 1918年5月16日总统签署惩治叛乱法，该法“扩大美国控制言论与出版物的权力，禁止对美国政府形式、旗帜或制服的各种背叛、玷污、下流或辱骂的议论，也禁止任何不论用何种方式阻碍战争努力的言谈”。② 根据间谍活动法与惩治叛乱法，共有2168人被起诉，1050人被判罪；因威胁总统而犯罪的有65人，因实际破坏活动而犯罪的有10人。其中，世界产业工会会员惨遭迫害。尤金·德布斯由于表示反战情绪而被监禁十年之久，这是其中最典型的压制民主自由的案件。

战争鼓励了美国政府对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侵犯和对工人组织的镇压，削弱了国内的改革运动，却保障了美国武装力量在海外的军事行动。

四、美国的军事行动

〔战前的国内军事动员〕　美国宣布参战以后，威尔逊总统及其军事顾问都认为，征兵是征集一支巨大军队惟一有效和民

---

① 即不能因州法律而得到豁免的罪。

② 亨利·康马杰编：前引书，第146页。

主的方法。在宣战之前，陆军参谋长休·斯科特将军曾向陆军部长贝克进言，必须通过征兵而不能依靠招募志愿兵来建立军队，[1] 威尔逊采纳这一建议。1917 年 5 月，众议院通过《选征兵役法》，要求所有 21 岁至 30 岁的成年男子一律登记应征。参议院最后通过的选征兵役法还授权威尔逊对志愿部队一事可相机处理。

1917 年 6 月上旬，900 多万男子进行登记，由陆军部委托的地方官员对征兵进行监督，全国秩序良好。1918 年 8 月 31 日，国会扩大应征年龄限制，将所有 18 至 45 岁的男性都包括在内。大战结束前，共有 2400 多万男子进行了登记，近 300 万人应征入伍。常备正规军、国民警卫队、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均仍采取募兵制招收志愿人员入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武装部队人员总数近 500 万人。威尔逊总统任命约翰·潘兴将军为美国远征军司令。“黑杰克”潘兴是一位干练坚强的西点军校毕业生，曾参加和指挥过与阿帕切人、菲律宾人和墨西哥人的战争。

美国刚宣布参战，协约国军事代表团就纷至沓来到白宫恳求提供援兵。潘兴将军立刻派遣一支“象征性”部队到法国，以鼓舞协约国士气。然而，威尔逊和潘兴都拒绝接受欧洲的建议，即将美国军队混编在需要兵员的协约国部队里。结果美国军队虽在统一调动下同其他国家的军队协同作战，但美国军队仍然保持单独编制和独立地位。因为美国希望有选择自由，并且不愿与协约国同流合污，追求谋取私利的战争目标。所以，美国坚称自己在战争中是“参战国”，而不是“协约国”。

〔美国海军和军事行动〕　1909 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卸

---

① 莫里森、康马杰著：前引书，第 507 页。

任时，美国海军实力已迅速增强。战争期间，美国海军得到迅速发展很快位居世界第二位。1914 年美国海军保持了继续发展的势头。这一年批准建造了“新墨西哥”号战列舰，军舰排水量达 32000 吨，装有 12 门 14 英寸大炮，同时下水的还有“内华达”号，它是美国第一艘以燃油机为动力的战列舰。[1] 但这时美国尚未进入战备状态。“卢西塔尼亚”号沉没后，美国加速了海军建设步伐。1916 年通过海军法案，进行扩军运动。

1917 年 4 月，以阿瑟·鲍尔弗为首的英国代表团和法国代表团先后到达华盛顿，他们预料美国一定会提出某种要求作为美国充分参战的条件。鲍尔弗携带着协约国之间缔结的、在最后胜利时各国实行分赃的秘密条约。但是美国热心于首先打赢战争然后才谈和平。1917 年 4 月 24 日，国会决定拨款 70 亿美元，其中 30 亿美元将贷给协约国政府。1918 年 11 月 11 日停战之前贷款总数迅速增加到 70.77 亿多美元，以后又增加了 21.7 亿多美元。[2]

1917 年以前，德国不打无限制的潜艇战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潜艇。到 1917 年 2 月，德国潜艇数量增加到 103 艘。德国海军部曾推测：如果每月击沉 60 万吨船只，6 个月内就会使英国屈服。1917 年内，德国潜艇共计击毁 650 多万吨船舶，而美国、协约国和中立国所有造船厂一共只建造了 270 万吨。因此，英国为自己运送给养已十分困难，更无力守卫美国向欧洲输送补给的航线。1917 年 4 月 10 日和 11 日，美国海军部长丹尼尔斯和参谋人员与英法海军将军们进行商谈，初步划分职责范围。美国海军在西半球防御和巡逻，并协助英国巡逻不列颠群岛周围的水域。第一批 6 艘驱逐舰在于 5 月 4 日到达爱尔兰的昆斯敦。之后 3 个月

① 丁朝弼编著：《世界近代海战史》，海洋出版社，1994 年，第 334 页。

② 参见比米斯：前引书，第 159 页。

内，共 47 艘美国驱逐舰驻守在欧洲水域。[1]

建立护航制和加强反潜艇战斗，是控制德军潜艇的两个决定因素。美国西姆斯海军上将主张使用驱逐舰和其他兵舰为横渡大西洋的商船护航。而英国商船船长却喜欢单独航行而不愿意组成船队在海军统率下航行。1917 年夏天，西姆斯说服了英国伙伴按照美国海军的计划行事。美国驱逐舰在 11 月 17 日首次摧毁一艘德国潜艇，新采用的商船护航策略和进攻性的海上巡航将协约国航运吨位损失从 88.1 万（4 月份），降低到了 28.9 万吨（11 月份），自 1918 年 4 月以后，英国每月损失从未超过 20 万吨。

美国海军的又一项任务是运送美国远征军。由于有了必要的反潜护航力量，把美国部队和补充物资安全运到法国才成为可能。1917 年 7 月 1 日，美国海军部共有 7 艘军船和 6 艘货船，共计 9.4 万吨。到 1918 年 11 月，它已建立起一支具有 143 艘舰艇的巡洋和运输部队，总计 325 万吨，共运载士兵 91 万多人到法国。[2] 1918 年，当运输任务紧张时，每艘可以利用的英国运输船也都被迫投入横越大西洋的渡运活动。英国船共运载士兵 100 多万。此外，美国海军还采取各种办法对德国潜艇队加压进逼。一支由 120 艘猎潜舰艇组成的舰队，在亚得里亚海与奥地利海军展开战斗。海军飞行员驾驶水上飞机，在欧洲参与战斗。

1918 年 6 月，美国海军首创实施横断北海（从苏格兰到挪威）的巨大规模的水雷布防，以封闭敌方潜艇的出路。据估算，如果要把北海的通道都严密封锁，至少需要 40 万枚水雷，英国海军部认为这是力所不及的。后来，美国发明家布朗发明了天线

---

① 莱基：前引书，第 633 页。

② 阿瑟·林克：前引书，第 227 页。

触角水雷。使用这种水雷，封锁北海通道只需 10 万枚水雷。[1]后因大战很快结束，这种水雷的效能未得到充分试验。在布设水雷壁障之前，海军少将林·罗德曼率领美国战斗舰队补充了若干艘驱逐舰后奉调前来奥克尼群岛，以加强斯卡帕弗洛港[2] 的英国主舰队。两支舰队结合起来不仅将德国的外洋海军截堵在港湾内，而且严重挫伤其士气，成为促使德国在 1918 年 11 月投降的一个因素。

战争结束时，美国海军共有 2000 多艘舰只、53.3 万名在役官兵。到 1918 年 11 月，美国舰艇巡逻着西半球的遥远地区，并在远东与日本、英国军队合作；同时还有 843 艘舰艇、20 万官兵，或者在欧洲水域服役，或者运送军队和给养前往法国。

由于坚决主张实行护航制，美国海军为确保协约国与美国海上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将驱逐舰投入反潜艇战斗，美国海军扭转了第一次大西洋之战中反潜艇作战的形势；而且，由于运送近半数远征军和几乎全部军用品到达法国，美国海军使协约国打败德国的计划提前到 1918 年实现。

〔美国陆军和军事行动〕　陆战形势不同于海战。1917 年 6 月，第一支美国分遣部队，即第一步兵师抵达法国，在美国独立纪念日（7 月 4 日）那天穿过巴黎街道举行检阅游行。潘兴将军检阅了到达法国的第一支美国军队。第 16 步兵团的一个营精神抖擞地通过巴黎的街道，近百万巴黎人狂热地投掷鲜花，拥抱美国步兵，尽情地欢呼。美国士兵是一支充满热情但缺乏训练的新兵。“这些人甚至连扛枪也不会。他们带着装了子弹的来福枪，

---

① 内森·米勒著：《美国海军史》，卢如春译，海洋出版社，1985 年，第 220－221 页。

② 奥克尼群岛在苏格兰东北面，斯卡帕弗洛港位于南奥克尼岛，是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主要海军基地。

就更加危险。”[①] 但是对于厌战的法国人来说，那些生气勃勃的美国军队是鼓舞人心的。1917 年年底，法国境内已有 20 万美军。

1917 年下半年，军事局势急剧转变。德国发起攻势击溃了意军、摧垮了俄军；10 月意军在卡波雷托败北，奥地利军队长驱直入弗留利平原；协约国不得不从西线急调部队以阻遏奥地利军队。协约国急需大批美军增援。11 月俄国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并宣布退出战争，致使数十万德军得以转调西线。1918 年春，西线德军已在人数上占有优势。德国统帅部信心十足地准备直取巴黎结束战争。协约国慌忙组成最高作战委员会统一指挥抵抗，并敦促潘兴增援，但遭拒绝。在德军的大举进攻面前，协约国战线溃不成军，此时威尔逊总统才同意任命法军元帅费迪南·福煦为最高统帅，潘兴将其 4 个可作战的师交由福煦统一指挥。

1918 年 4 月，威尔逊总统在巴尔的摩说，美国人必须使用“武力，最大限度的武力，毫不吝惜和不加限制的武力，能恢复世界的法律并消灭一切自私统治的正义的和胜利的武力”。[②] 给养运输立即给部队运送让路，新建造的运输船舰赶紧投入使用，美国士兵不久就大批投入战斗。在 1918 年 3—10 月的危急月份里，总计共有 175 万名美国士兵到达法国。德军总司令冯·鲁登道夫当时写道，“美国就这样成了在这场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③]

1918 年 5 月 27 日夜，德国发起了埃纳攻势，打得法国第六军团猝不及防，节节败退；6 月 3 日，德军再次进攻到离巴黎只有 56 英里的地方——马恩河。法军向美国远征军司令潘兴将军

---

① 科夫曼：前引书，第 4 页。
② 转引自帕特森：前引书，第 399 页。
③ 莫里森、康马杰著：前引书，第 511 页。

求救，美军第二师展开短兵相接的血战，制止了德军的进攻。在随后的反攻中，美国第二师及其所属海军陆战队向德军层层设防、重兵把守的贝莱奥森林发起进攻，美国反复向前推进，经过3周血战，终于把德军赶出了森林。在这次战斗中，美军共伤亡9777人，其中海军陆战队伤亡5383人。

德军企图在更多美军到来之前孤注一掷，速战速决。6月德军又在兰斯与苏瓦松之间的马恩河扇形地区发动进攻。幸好美国人及时到达法国，8个美军师参加了法军的反攻。8月上旬法美联军肃清了扇形地区的全部德军。潘兴指挥的美军第一军接管了圣米耶尔附近的南部战线，并于9月独自击溃了那里的德军。同月下旬，潘兴对凡尔登与色当之间的德军防线发动进攻。在默兹－阿尔贡战役（始于9月26日）中，美军赢得了决定性胜利，这是美国部队参战以来所进行的最大一次战斗：战事为期40余日，共投入兵力120万人，飞机840架，坦克324辆。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美国伤亡11.7万人。[①] 此次战役的胜利，加上英法军队在北部与中部战线分别反击成功，为停战谈判准备了条件。

早在8月间，鲁登道夫就已预感到德国的前景不妙，战事已临近结束。协约国兵力已占优势，福煦正计划在1919年春发动新攻势。10月2日，鲁登道夫通知德国政府，德军已难以支持48小时。次日，德国马克斯亲王向威尔逊总统首次提议：要求以威尔逊的“十四点”为基础进行议和。协约国方面在外交上又与德国周旋一个月，最后利用德国处境更趋恶化的时机才指示福煦与德方谈判停战。其时，德国海军发生兵变，使得德国无力继续抵抗。11月11日，停战协定签订，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了。

---

① 莫里森、康马杰著：前引书，第514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当时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残酷的战争之一，双方伤亡惨重。广大无辜百姓更是深受其害。美国军队为早日结束这场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美国人民同样付出了巨大代价。除了成千上万士兵和人民牺牲外，幸存的“美军、同盟军与敌军一样都患上了严重的弹震症，即一种由于作战疲惫，伴随毒气和战壕里的寒冷、泥泞、潮湿污秽而发生的肺结核病”。[1]

然而，战争刚结束，战场上的硝烟尚在弥漫，阵亡将士尸骨还未寒彻，发动战争和参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领袖们就已在为分配所谓“战利品”而处心积虑、勾心斗角了。

五、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

〔计划的提出〕　　美国参战的目的是企图取得对世界的领导地位，充当世界和平仲裁者从来就是美国决策者们梦寐以求的愿望。战争进行到 1917 年底，美国总统威尔逊试图利用沙皇俄国的崩溃、英法集团和德奥集团在战争中两败俱伤的形势，收拾残局；迫使他们在战后按照美国的设想建立世界和平，企图使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主宰。十四点计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自参战以来，美国就十分关注战后世界和平方案，而且了解协约国已经签订了瓜分德国领土、包括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的秘密条约。但是，美国不愿为英法等国的利益付出流血的代价。威尔逊声称：“美国不能为盟国的秘密条约而作战，为它们瓜分世界的目的而作战；美国强大的经济力量必须使盟国屈服于它的

① 布卢姆等著：前引书，第 268 页。

压力之下，从而接受美国的和平方案”。[1] 显然，美国参战的目的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为了实现美国的战后和平蓝图。

1917年8月以后，威尔逊政府就开始准备美国的具体战争目标与和平纲领。威尔逊一方面拒绝与德国统治者和解；另一方面又企图使德国自由主义者能在战后新世界组织中实行合作。对协约国，威尔逊警告说，“惩罚性的赔偿、对帝国的直接和排外性的自私经济联盟的建立，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幼稚可笑的，最终比无用还糟糕，不能成为任何类型的和平的适当基础，至少不能成为一个永久和平的适当基础。”[2]

9月，威尔逊特意建立“调查委员会”，专门研究交战国的战争目标，并针对性地制定美国的战争目标，企图做到有的放矢。这是威尔逊政府准备提出美国战争目标、和平纲领的第一步。10月下旬，威尔逊派豪斯赴伦敦和巴黎参加协约国之间军事合作问题的讨论，并让他在适当时机促成美国与协约国在战争目标上的合作，以便加强对德奥的和平攻势。但众盟国各怀居心，豪斯未能取得成功。

在没有取得协约国合作的情况下，威尔逊政府只好单独行动，决心公布美国的战争目标，在外交上展开对同盟国家一次强有力的攻势。正如豪斯所言，这样做“我们就容易让德国知道我们的打算，也能给所有德国人带来一种他们现在感觉不到的安全感。在中欧国家，全部军事宣传旨在造成对肢解和经济统治的担心。如果能够使德国人民认识到将会得到我们考虑的这样一种和

---

①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3卷（1871－1918）第43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

② 转引自王晓德：《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13页。

平保障时，……军国主义的理由将不攻自破”。[1] 但是威尔逊由于顾虑重重未敢贸然行事，然而他并未放弃这一打算。1918 年 1 月 5 日，豪斯上校致电贝尔福说：“总统希望我让首相和阁下知道，他认为现在必须发表某一具体声明，以反击德国的和平建议。”[2]

1917 年 10 月，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的和平倡议迅速在美英等国引起巨大反响，世界各国热爱和平的各阶层人士都纷纷谴责协约国，并强烈要求他们对苏维埃的和平倡议作出积极响应。1918 年 1 月 3 日，威尔逊对卸任的英国大使斯普林·赖斯说，面对国内的和平呼声，“如果布尔什维克的呼吁继续得不到答复，如果丝毫不去抵抗它，那么显然它的影响就会扩大和加强。”[3]

苏维埃政权为揭露协约国进行战争的真正目的，决定公布沙俄政府与临时政府同英法等国缔结的秘密条约。这些秘密条约的披露将打破威尔逊一向宣称的这场战争的“神圣性”，如果威尔逊政府对此不作出反应，必将对整个战局产生不利影响。1917 年 12 月 1 日，威尔逊致电豪斯，“我们的人民和国会将不会为任何交战国的任何自私目标而战，……我认为，冷却美国的热情将是致命的错误，所有人都能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一点。”[4] 威尔逊认为公布美国战争目标的时机已到。

总之，威尔逊打算公布美国战争目标由来已久，他的动机首先是回答苏维埃政权的和平建议以便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其次，这一计划是对中欧国家发动的一次和平攻势，揭露德国发动战争

① 转引自王晓德：前引书，第 214－215 页。
② 阿瑟·林克等编：前引书，第 45 卷，第 486 页。
③ 阿瑟·林克等编：前引书，第 45 卷，第 456 页。
④ 阿瑟·林克等编：前引书，第 45 卷，第 176 页。

的真实目的；再次，可以巩固美国人对这场战争“正义性”的信任，以稳定国内的民心，同时也要协约国放弃其对美国不利的战争目标，使战争符合美国利益。

〔计划的主要内容〕　1917年12月中旬，应豪斯上校的要求，调查委员会为威尔逊总统准备了一份关于战争目标与和平条款的备忘录，并认为现在颁布一个自由主义纲领对美国十分重要，“美国发动的这场强有力的自由攻势将大大刺激美国人在战争中的自豪感和兴趣，使政府保证能得到希望用理想主义解决战争的美国广大人民的支持”。[①] 12月23日，威尔逊在这份备忘录基础上进行修改补充，最后形成了十四点计划的蓝本。

1918年1月8日，威尔逊总统向国会发表了他的十四点和平宣言，宣称“世界和平的纲领就是我们的纲领”。具体内容如下[②]：

1. 公开外交，不得有任何秘密国际谅解。

2. 无论和平与战争时期，公海航行绝对自由。

3. 尽可能排除一切经济上的壁垒，国际贸易机会均等。

4. 充分地相互保证各国军备应缩减至足以维持国内安定的最低限度。

5. 解决一切殖民地纠纷时，须以诚相见，绝对公正，在决定一切有关主权的问题时，应兼顾当地居民的利益与殖民政府之正当要求。

6. 撤出全部俄国领土上的外国军队，世界其他国家应该提供俄国以独立决定其政治发展和国家政策不受阻碍的机会，对它的需求和希求的，给予一切帮助。

---

① 阿瑟·林克等编：前引书，第45卷，第468页。

② 邓蜀生著：《伍德罗·威尔逊》，前引书，第148－149页。

7. 从比利时撤军并使其复国。

8. 撤出法国所有占领区并恢复原状，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

9. 调整意大利边境。

10. 奥匈帝国的人民应获得自治的机会。

11. 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境内占领军撤退，巴尔干诸国的政治经济独立和领土完整，由国际保证。

12. 承认土耳其帝国内土耳其部分主权，但土耳其统治下的其他民族应获得绝对的自治权，达达尼尔海峡在国际保证下永远开放为自由航道。

13. 建立独立的波兰国家，其政治经济独立和领土完整由国际章约予以保证。

14. 必须根据旨在不分大小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提供相互保证的专门盟约。

十四点计划构成了威尔逊政府战后对国际秩序安排的基础。上述十四点的全部内容可以归纳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至第五点，是整个文件的核心，反映美国企图取得世界领导地位的要求。第六点涉及俄罗斯问题，即第二部分，反映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对苏俄的立场。第三部分包括第七至第十三点，涉及欧洲十几个国家的领土和民族问题的处置。第四部分，即第十四点关于建立国际联盟的问题，以保证各国都获得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随后，威尔逊不断对这一计划进行补充，强调美国对战后世界承担的特殊责任。1918 年 9 月，威尔逊又提出和平方案的民族平等、共同利益、国际联盟、国际经济合作、公开外交等五项原则。显然，美国总统的心愿就是以世界领袖自居。9 月 20 日，威尔逊说："这是一场由美国人民授权扮演一个独特和崇高角色的战争，因为他们无任何自私目的，为永远是我们自己国家生活

基础的原理与理想而战。我们正在试图给世界送去自由和良知以及无私服务于世界的礼物。”[①]

十四点计划发表后，美国国内反响强烈。1月9日《纽约论坛报》的一篇社论说：“在某种意义上讲，总统向整个世界创造和具体化美国在这场最大悲剧中的作用。……他确定了美国世界政策和整个文明世界的国际政策的理想。”[②] 这反映了当时的主流舆论，虽然也有不同声音。欧洲各国由于战争目标不一，对威尔逊的讲话反应也不同。协约国认为，自己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牺牲，并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决不愿意让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总统来决定一切，“威尔逊是廉价买到了和谈桌上的席位”，[③] 它们可以听取美国意见，但不能按照美国的要求处理和平问题。其中，英国认识到自己的霸权地位已经摇摇欲坠，美国正在取而代之，所以反对最为强烈。威尔逊的讲话在意大利也导致强烈的不满情绪。

但美国不管欧洲盟国的“不同声音”，我行我素，一意孤行。1918年9月和10月，威尔逊与德国和奥匈帝国就停战协定交换照会，更使协约国愈益不安并对十四点计划持坚决保留态度。为了“回敬”协约国的“保留”，威尔逊暗示美国可能与同盟国谈判单独媾和，同时豪斯也打算采取经济强制手段。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英、法、意遂在11月的停战协定中，勉强同意以十四点为基础开始和平谈判。但是分歧犹存。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从威尔逊“理想主义”的纲领中看出了暗藏的杀机，他们坚持在列宁的领导下，揭露战争的非正义性，

---

① 阿瑟·林克等编：前引书，第51卷，第81页。
② 王晓德：前引书，第220页。
③ 托马斯·帕特森等著：前引书，第400页。

致力于摆脱这场帝国主义战争。

中欧国家对威尔逊1月8日的讲话反响较大。尽管德国政府认识到十四点计划并非完全不利于德国，但如果同意以此作为未来交战国媾和的基础，但德国独霸欧洲的欲望将永成泡影，而且还会丧失一些领土，所以它婉拒威尔逊的建议。

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在交战国掀起轩然大波，没有实现他的既定目标。双方依然都想在战场上取胜，进而在谈判桌上强迫对方接受有利于己的和平条款。但是威尔逊没有放弃这个“心愿”，不断向世人推销美国称雄世界的蓝图。

大战末期，美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实力。欧洲国家在结束战争和战后建设问题上，尽管出于无奈，但都不得不依赖美国，所以协约国集团内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还是同意以美国提出的“十四点”作为对德和平谈判的基础。

〔计划作为和谈的基础〕　1918年同盟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德帝国主义仍想垂死挣扎，3—7月间，德军倾其全力发动了5次攻势。结果两败俱伤。幸亏美国运送越来越多的军事设备、弹药和军队到达欧洲，协约国才实力大振。7月18日，联军在马恩河、圣米耶尔和亚眠三个地带开始大规模反攻。

1918年8月13日，德军总参谋长兴登堡、鲁登道夫、宰相和外交大臣等举行会议，讨论战局。鲁登道夫说，“德军无力在前线展开攻势，凭借防御行动固守阵地也不可能。应当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①]。10月初，英军突破兴登堡防线。联军全线推进。比利时开始收复国土。至此，德国败局已定。

1918年10月3日，德国政府通过瑞士向美国发出首次照会：

---

① 王绳祖主编：前引书，第440页。

"德国政府请美国总统采取步骤恢复和平，将这一请求通知一切交战国，并请它们委派全权代表以便进行谈判。德国政府接受美国总统在他的1918年1月8日致国会的咨文中和在他的嗣后的声明中所规定的计划，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为避免继续流血，德国请求设法立即缔结全国陆海空停战协定"。[1] 之后，德国又于10月12日、10月20日、10月27日分别发出第二、第三、第四次照会。1918年11月5日美国政府第四次复照，通知德国政府：威尔逊总统已把此事交给将军们从军事形势方面判断是否应当停战。联军司令福煦回答说，假如德国同意有效地解除武装，他就准备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经过美国和协约国间交涉商议，美国总统的十四点和随后的几个声明，最终作为1918年11月11日的停战条件，成为协约国、美国同德国之间的经双方同意的和平谈判的基础。

停战谈判是在临近美国国会1918年改选的时候举行的。威尔逊总统担心假如共和党掌握国会，他的和平纲领将毁于一旦。1918年9月13日，他的一位朋友在白宫问他：假如他在选举中失败的话他将怎么办？威尔逊说，"由于世界范围的形势，美国在其中的影响是非常重要而且可能是决定性的，我不能这样做。现在碰到的情况是，即使被人民抛弃的话，我将不得不试图争取达到我们为之而战的目标。"[2] 由于担心在选举中失败，总统向全国发出公开呼吁：要求选举民主党人，使其在国会两院中占有多数席位，以便他可以在即将来到的交涉中完全不受束缚。这个呼吁引起了党派性的问题，威尔逊在政治上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

---

① 王铁崖选译：前引书，第140页。

② 比米斯：前引书，第169页。

选举结果事与愿违，共和党在新的参议院中占明显多数，该院将在 1919 年 3 月 4 日以后讨论和平条约。前总统罗斯福作为共和党人，在选举之后向世界宣称："我们的盟邦和我们的敌国，以及威尔逊本人，都应当了解威尔逊先生这个时候没有任何权力代表美国人民说话了。他的领导地位已被美国人民明显地否定了……。"① 但是，威尔逊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他还要作最后的争斗。

六、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争斗

〔威尔逊出席巴黎和会〕　法国为了迅速实现欧洲和平、避免出现无政府状态，于 1918 年 11 月 29 日，在给华盛顿的备忘录中向美国建议五大战胜国（美、英、法、意、日）应废除以前只在其中几个盟国间达成的一切特别协定，并立即在这几个国家之间就和平的主要基础取得一致。当涉及小交战国、中立国和正在形成的新国家的利益的时候，可以逐个将它们召唤来商量。当和约初步拟定后，所有国家可以一起来缔造维护世界和平的永久性组织——国际联盟。

威尔逊总统对法国的建议不予答复。因为他首先考虑的是建立国际联盟问题，并决定将它与和平条约交织结合起来。为此，他将亲自率领美国代表团去巴黎。虽然国会领袖们希望他呆在美国处理国内问题。在组团问题上，威尔逊又犯了一个政治错误，即没有任命一个重要的共和党人或者一个参议员参加美国和平代表团，其成员是：（国务卿）罗伯特·蓝辛、（总统的长期政治顾问）爱德华·豪斯上校、塔斯克·布利斯将军和职业外交家亨利·

① 托马斯·帕特森等著：前引书，第 402 页。

怀特。亨利是代表团中惟一的共和党人，但他却不怎么效忠共和党。在前往巴黎前，威尔逊又没有征求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意见。这种做法无疑是在他自己的前进道路上设下了重重障碍。

12月4日，威尔逊一行乘"乔治·华盛顿"号从纽约港启程。伴随美国代表团前往巴黎的还有国务院官员、情报官员、专家和秘书。这些专家是豪斯从学术界和其他各界招募来的。在船上，威尔逊对专家们讲，"他们的使命是进行新秩序与旧秩序的斗争"。[①] 代表团中有不少远东问题专家，除豪斯、蓝辛外，布利斯将军是协约国军事委员会的美方代表，据说他"在亚洲表现出高度的本民族责任感"；"亨利·怀特的心脏为门户开放而跳动"。[②]

〔巴黎和会对殖民地的处置和赔偿问题〕　1919年1月12日，英、法、美、意四国首脑及外交部长召开预备会议，决定加上日本，组成最高理事会。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开幕。这是一次典型的强权政治的国际会议。32个国家参加会议，德国和苏俄被排除于会外。英法美是会议的主角，"四巨头"即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蒙梭、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控制了和会。大多数会议是秘密举行的，这对威尔逊十四点计划中的"第一点（公开外交，不得有任何秘密国际谅解）"无疑是一种嘲弄。四巨头内部矛盾重重，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紧张气氛。

威尔逊对建立国联情有独钟，因为建立国际联盟不仅能为他赢得世界声誉，而且还能为美国带来世界的领导地位。因此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关心国联盟约的起草，并坚决主张国联盟约与

---

① 柯里著：前引书，第242页。
② 柯里著：前引书，第243页。

和约捆绑在一起。这样，批准和约就意味着批准盟约。法国代表要求首先讨论领土瓜分、赔偿等问题，把国联放在议程的最后一项。英国虽同意将盟约列入和约，但主张分开批准。双方经过紧张的讨价还价最后同意先讨论国联问题。2 月中旬，全体会议通过国联盟约草稿。4 月 28 日，盟约修改后正式通过。

盟约的主要精神是集体安全、仲裁国际争端、裁减军备、公开外交等等，它规定建立一个由 5 个大国（常任的）和若干小国的代表（选举产生）组成的权力很大的行政机构。建立了一个由所有国家参加讨论问题的大会。威尔逊将第十条视为盟约的核心，即旨在制止侵略和战争的条款："国联成员国保证尊重与维护所有联盟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现存的政治独立不受外部侵略。如发生任何这样的侵略或出现这样侵略的威胁或危险，行政院将提出履行上述义务之手段。"威尔逊成功地说服了与会者把国联盟约与和约条款合并在一起。这样，国联盟约便成为巴黎和约的前 26 条。

会议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殖民地的处置。威尔逊曾在十四点中呼吁民族自决，但各交战国早已经签订了掠夺战利品的秘密条约（瓜分德国在非洲、太平洋及亚洲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等。）为了不妨碍国际联盟的建立，威尔逊竟然放弃其"民族自决权"原则，向英、法、意让步，决定把先前德国和土耳其的殖民地交给已经占领它们的国家实行所谓"委任统治"，而由国联进行不严格的监督。根据委任统治制度，法国和英国获得中东的一部分；法国得到了德属莱茵兰的非武装化和盛产煤炭的萨尔盆地的一部分利益；意大利从崩溃的奥匈帝国吞并了南蒂罗尔和的里雅斯特。协约国在布尔什维克俄国周围建立起一些敌对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同时，为了解除法国对德国复活的担心，美英同法国签定了保证其边境安全的公约。

赔偿问题也同样棘手。威尔逊要求对德国"宽宏大量"些，让德国支付有限的赔款，他在会上说："如果我们使德国人民受屈辱，逼之太甚，我们将会破坏一切政体，布尔什维主义将取而代之。"① 但英法希望削弱德国，要求巨额赔偿。结果，威尔逊作了让步。赔偿委员会终于在 1921 年向陷入困境的德国提出 330 亿美元的赔偿要求，从而给以后 10 多年的国际经济关系增加了困难。

1919 年 6 月 28 日，德国在凡尔赛宫镜厅被迫签署和约。德国被迫付出 316.8 亿美元赔款（以后数额减少），丧失了 13% 的领土、10% 的人口和海外殖民地。德国原指望威尔逊的十四点能够给德国带来一种"宽大开明"的和平，但当他们在和约上签字后发现威尔逊背叛了德国，希望转成仇恨。阿道夫·柏里指责"威尔逊违背了自己的理想"。约瑟夫·富勒斥责美国"在一系列对帝国主义利益和报复要求的妥协中出卖了自己的原则"。② 1919 年 9 月，奥地利签约。11 月，保加利亚签约。威尔逊不但背叛了德国，更是出卖了殖民地人民的利益。

〔威尔逊牺牲中国利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德、俄被大战束缚了手脚，在远东中国积极进行侵略活动的只有日本。美国为了在远东的扩张竟牺牲中国利益以讨好日本，扶持日本成为在远东地区牵制其他列强的力量。

美国支持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它一方面宣布"对于中日两国政府间已经缔结或行将缔结的任何协定或约定，凡有损于美国及其在华公民的条约权利或中华民国之政治

---

① 小戈登·莱文：《伍德罗·威尔逊与世界政治：美国对战争和革命的反应》，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 年，第 134 页。

② 杨生茂主编：前引书，《美国外交政策史》，第 289 页。

或领土完整，一概不能承认”；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又要求其驻华公使芮施恩“劝告中日两国政府忍耐和相互宽容”[1]。1915年3月13日的照会中，美国对日本关于山东、南满和东部蒙古要求，没有提出异议，并宣称“美国坦率地承认领土相邻构成日本与这些地区间的特殊关系”。[2] 美国的妥协态度导致了《蓝辛-石井协定》的签订。1917年9月8日日本前外相石井菊次郎同美国国务卿蓝辛在华盛顿就中国问题进行正式会谈，11月2日签定《蓝辛-石井协定》。主要内容为：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与日本接壤部分，有特殊利益；两国政府同意不侵犯中国独立及领土完整，恪守门户开放和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原则。[3] 该协定是美国对日本所作的又一重大让步，促使日本进一步控制中国。然而，美国对中国利益的最大出卖，是在巴黎和会上。

战后初期，中国同其他国家一样，对美国政府抱有幻想。1918年，中国政府派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祖五人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到达巴黎后，却被告知属于第三类与会国家，只获两个全权代表名额。据美国《纽约论坛报》巴黎和会的特派记者说，“作出此种不公正决定的是豪斯上校向威尔逊建议的”。[4] 这种不公正的开端最终导致不公正的结果。

1919年3月7日，四巨头会议无理地决定将赤道以北的德国太平洋岛屿委托日本管理。早就垂涎取得德国在山东权益的日本毫不松口，并且扬言如果日本的要求不能满足，它将拒绝加入国

---

① 杨生茂主编：前引书，第293页。
② 杨生茂主编：前引书，第293页。
③ 杨生茂主编：前引书，第294-295页。
④ 杨生茂主编：前引书，第296-297页。

际联盟。这实际上把威尔逊置于一种两难境地，接受日本的要求将违反他屡屡宣布的公正与自决原则，若加拒绝则有可能使日本退出和会，造成国联盟约批准的被动。在此情况下，威尔逊决定牺牲中国以换取日本对国联盟约的赞成。1919 年 4 月 25 日威尔逊在美、英、法、日四国委员会上表示："日本领土的很大一部分是贫瘠的，因此它当然需要为它的人口找安身之处。它们已经在朝鲜或满洲找到了一些空间，……它现在在中国寻找更多的地方。"① 他的话活活勾画出了一副帝国主义者的丑恶嘴脸。当时美国自己严格限制日本向美国移民，但却鼓励日本向中国找"生存空间"。4 月 30 日，威尔逊等三巨头开会讨论山东问题，决定把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写入对德和约。中国代表团原指望威尔逊能够帮助中国收回山东主权，主持公道，至此幻想完全破灭，中国的利益再次成为大国之间交易的牺牲品。可以说，威尔逊的基本立场自始至终都是牺牲中国，讨好日本的。威尔逊宣扬的"公正"、"国家平等"、"民族自决"等说教是多么虚伪！

在美国等国的姑息下，日本竟然获得了战胜国中国的山东省和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历史是最好的见证。凡尔赛和约关于中国山东问题的条款如下：

第 156 条，德国将按照 1898 年 3 月 6 日与中国所订条约及有关山东省之其他文件，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及特权，其中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为尤要，放弃以与日本。

所有在青岛至济南铁路之德国权利，其中包含支路，连同无论何种附属财产、车站、工场、铁路设施及车辆、矿产，开矿所用之设备及材料，并一切附属之权利及特权，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

---

① 转引自杨生茂、林静芬编：《美国史论文选》，前引书，第 404 页。

自青岛至上海及自青岛至烟台之德国国有海底电线，连同一切附属之权利，特权及所有权，亦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各项负担概行免除。

第157条，在胶州领土内之德国国有动产及不动产，并关于该领土德国因直接或间接负担费用，实施工程或改良而得以要求之一切权利，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各项负担概行免除。

第158条，德国应将关于胶州领土内之民政、军政、财政、司法或其他各项档案、登记册、地图、地契及各种文件，无论存放何处，自本条约实行三个月内移交日本。

在同样期间内，德国应将关于以上两条内所指各项权利，所有权或特权之一切条约、协议或契约通告日本。[①]

威尔逊也许是做贼心虚，他在接受关于山东省的安排后，给图马尔蒂发了一份海底电报，概述事情缘由，以备将来公开讨论时用。用他自己的话讲，这件事“我认为是以一种尽可能圆满地解决中国自身陷人的这场条约纠纷的方式……解决的。”[②]

威尔逊牺牲中国主权与日本进行政治交易的行为，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也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美国人民反对威尔逊的行径，威尔逊的政敌也对他进行猛烈攻击。

〔威尔逊与国会围绕批准国联盟约的斗争〕　1919年2月24日—3月14日，在欧洲花了近6个月时间的威尔逊回到美国。几天之内，他会晤了参众两院的外交委员会。3月初，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参议员亨利·洛奇策划提出了一个“圆形签名声明”，由39个参议员签名（足够否决条约所需的2/3票数），就国联盟约

---

① 《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武汉大学出版社，上册，1983年，第490页。

② 柯里著：前引书，第267页。

提出质问，要求和约与国联盟约分别生效；共和党人还攻击条约中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要求取消巴黎和会通过的山东解决办法。

威尔逊不顾国内的反对意见，再次前往法国。

7月，他回到美国，此时对他的批评还没有平息下来。7月10日，威尔逊把巴黎和约提交参议院。威尔逊遭到来自两方面的严厉批评。参议员乔治·诺里斯等进步主义者认为，国联在减少战争可能性方面做得不够，它是一个大国继续谋求统治的工具。保守派批评者、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洛奇则认为，国联过多地剥夺了美国的主权。

洛奇成了威尔逊的主要障碍，他在外交委员会中安插了反对国联的参议员，使大多数共和党人在对条约投票时保持一致。共和党使用拖延战略（延期召开听政会）在舆论上取得很大的进展，极力反对国联这个他们所谓的“有一个神圣名字的邪恶事物”。[①] 洛奇又对国联盟约提出十四条保留案。“十四条保留有许多讲得很明白：例如，国会保留宪法赋予它的在外交方面的任务；明确地把门罗主义排除于国联监督之外；美国不同意对山东的解决方法；否决国联对美国国内立法有裁决权等。针对盟约第十条的保留是重要的：除非得到国会授权，美国不承担维护他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义务。”[②]

威尔逊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保留。他辩解说，附有保留条件而批准的条约须重新召开国际会议予以接受。他不愿意造成那样的局面，因为每一个国家都会因此而提出对它有利的保留意

① 比米斯：前引书，第202页。

② 比米斯：前引书，第203－204页。

见。[①] 后来，英国宣布接受美国的保留，以便国联得以成立、和约能够通过。

1919 年 9 月，威尔逊意识到拖延下去会使美国人民对和约感到厌烦，便决定在全国巡回演讲，宣传他的主张。威尔逊拒绝了医生要他作一次长期修养的建议，9 月 4 日他开始了行程 8000 英里的全美旅行。威尔逊对他的秘书约瑟夫·图马尔蒂说："我知道我已经智竭力穷了，但是，我不惜作出任何必要的个人牺牲，因为如果条约通不过的话，结果世界上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只有上帝知道了。在世界面临着大悲剧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正派人都不会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的。"[②] 威尔逊抨击诽谤他的人，斥责反对条约的爱尔兰裔和德裔美国人，并把批评他的人同布尔什维克相提并论。他说第十条意味着美国有使用武力的道义而不是法定的义务，美国仍然可以决定它参加什么样的战争。

威尔逊全美旅行共发表 37 次演说，主要谈到保证国联各成员国领土完整的第十条；关于门罗主义和移民、入国籍、关税、英国议院重复投票等项国内事务不受国联控制的保留条件；山东决议等。[③] 关于山东问题，9 月 6 日他在德斯摩勒演说中说，"我同你们一样不喜欢山东协定，但是环境如此，无他计可施……为了把山东还给中国，你们打算同日本、法国和英国作战吗?"[④] 显然，威尔逊在巡回演说中，还念念不忘极力推卸他牺牲中国的责任。1919 年 9 月 26 日，威尔逊途中病倒。返回华盛顿后，中风使他的左侧瘫痪，几乎丧命。由于中风，威尔逊的态度更加固

---

① 托马斯·帕特森等著：前引书，第 410 页。

② 〔法国〕安德烈·莫鲁瓦著：《美国史：从威尔逊到肯尼迪》，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110 页。

③ 柯里著：前引书，第 284 页。

④ 转引自杨生茂、林静芬编：前引书，第 407 页。

执，拒绝妥协。

当时参议院已分裂成4派：约有40名民主党人忠于威尔逊，为非保留派；以弗兰克·凯洛格为首的温和保留派，约有13个共和党人；由洛奇操纵的强硬保留派，约有30人，其中约有20个共和党人和少数民主党人；其余的由16个“不妥协分子”组成，包括拉福莱特、诺里斯和博拉，他们不管是否有保留都强烈反对和约。

1919年9月10日，外交委员会把它建议对条约作45处修改和4条保留的报告提交参议院。11月19日，参议院对凡尔赛条约进行表决。前两次是为附保留案的条约进行的。第一次表决以39票对55票被否决（不妥协分子和非保留派投反对票）。第二次表决是41票对51票被否决。第三次对不附有保留的条约进行表决，又以38票对53票遭否决（不妥协分子和保留派投反对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巴黎，威尔逊为了把国联写进和约时曾在国家利益的原则上作了重大让步，可是现在他却不准备为了同样目的在国内对他的政治反对者做必要的妥协。在美国国会的一片否决声中，1920年1月16日，国联正式成立。

洛奇和威尔逊这两个政敌为了相反的动机、共同铸成了条约在美国的悲剧命运。结果，洛奇战胜了威尔逊。1921年7月，国会正式结束战争，8月，通过对德和约，美国宣布巴黎和约条款有效，但国联条款不包括在内。提出建立国联的美国最终却不是它的成员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全人类而言是一场灾难，但是对美国来说，它既是一场灾难也是一个机遇。美国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它既为结束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又为发展自己创造了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美国人留下了一笔勿庸置疑的遗产。首先，大战为美国提高国际地位创造了

最有利的机会。战争中，英、法、俄、德等列强两败俱伤，美国坐收渔利。战后按照美国制定的和平计划重新安排世界，美国开始取代英国的霸主地位，发挥领导作用。

其次，战争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美国在战争中大发战争财，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华尔街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1919 年，商船超过战前规模的 60%。到 1920 年，美国生产世界煤炭的 40%，生铁的 50%。[①]1919 年 8 月，威尔逊沾沾自喜地说："金融领导地位将属于我们，工业首要地位将属于我们，贸易优势将属于我们，世界上其他国家期望我们给予领导和指引。"[②]

再次，在战争过程中，美国扩大了对外投资的规模和地区，加强了对亚洲、拉丁美洲的经济扩张。如：固特异公司打进了荷属东印度以取得橡胶，斯威夫特和阿穆尔公司在南美得到扩展，锡业集团进入玻利维亚，铜业公司渗入智利，石油公司在拉丁美洲开凿新的油井。

最后，战争促使美国政府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纳入战时轨道，加强联邦政府对国家的控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与发展，特别是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推动。当然，这一切都是以美国民众付出流血和生命的巨大代价而取得的。一战对美国的深远历史影响还将在 20 年代进一步显现。

① 托马斯·帕特森等著：前引书，第 420 页。

② 贝克和多德：《官方文件：战争与和平》第 1 卷，第 560 页。

第八章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

一、共和党执政的20年代

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以后，美国告别了威尔逊的新自由主义，结束了民主党八年的统治，开始了共和党统治的哈定－柯立芝－胡佛时代。整个20年代，共和党不仅占据了总统的宝座，而且控制了参众两院。正是在这一时期，自由放任在美国再次占了上风，并发展到了极至。

〔从威尔逊到哈定：1920年的大选〕　1920年，美国迎来了一战结束后的第一次大选。在经历了一战和战后初期的社会冲突及种族纷争之后，美国人已不愿再沉浸于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之中，对进步主义的热情已平息，他们需要的是“常态”的回归。这一切增强了共和党对赢得大选的信心，人们要做的只是选出一个足够听话的人作为候选人。当时共和党内的争夺主要集中在西奥多·罗斯福的追随者伦纳德·伍德将军、伊利诺伊州州长弗兰克·洛登和加利福尼亚州国会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3人之间。到了1920年的6月，如果继续这种相持不下的争斗，将会对共和党最后能否获胜产生影响。11日黄昏，在芝加哥黑石旅馆的那

间著名的烟雾缭绕的密室里，一项重要的决定正在酝酿。经过洛奇、斯墨特、乔治·哈维以及由查尔斯·克梯斯、布兰德吉等人组成的党内参议员集团的整夜磋商与努力，僵局最终在第二天凌晨2点多时被打破，他们选择了俄亥俄州参议员沃伦·G·哈定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他们这样对记者说，“哈定这个人不是会引起世界变化的人，但他却是那群人中最合适的一个。”①

哈定这个被很多人称为好人的人，拥有典型的美国人的经历。他出生在俄亥俄一个医生家庭中，所受的教育不算多，曾在俄亥俄的一个小镇上当过律师和记者，后来又做过地方银行和电话公司的董事长。有人认为他是个性格讨人喜欢、头脑空空、唯命是听的政党仆从。虽然才智不算出众，但在仕途上却一帆风顺。他可能是共和党历来所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中最不合格的一个，但他却是他们所需要的。在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时期，总统的权力得到了很大的扩张，而国会尤其是参议院的权威却在递减。因此，共和党的参议员们坚信：一个白宫中的英雄，无论是对他们的政党还是这个国家，都不是一件好事。他们所期望的不是一个英雄。“他们不信任伍德将军的勇气，他们怀疑洛登州长的强大。当然柯立芝也不是他们所想要的那种，但哈定正合他们的口味”②。

与此同时，民主党内部也同样出现了分歧和混乱。威尔逊不顾有病在身和从未有连任三届先例等众多因素，仍未放弃被提名的雄心。结果，却妨碍了他的女婿、最有希望获得党内提名的威廉·麦卡杜的仕途。司法部长帕尔默是麦卡杜最大对手，但他在

① 威廉·洛希滕伯格：《繁荣中的危机：1914－1932》，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8年，第85页。

② 华特·约翰逊等：《文件中的美国人的历史》，吉恩公司，1951年，第685页。

第三十八轮投票中被迫放弃角逐。经过44轮的投票，同样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M·考克斯坐收渔利，由于得到原先支持帕尔默的大部分代表的选票而击败麦卡杜，获得提名。

争斗便在哈定与考克斯之间展开。然而1918年以来出现的反民主党的浪潮使民众的意向到了1920年已经越来越倒向了共和党一方。“1920年的选举人厌倦了战时的兴奋激动，抛弃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而突然赞成哈定的‘常态’”[1]。西部的农民抱怨民主党的战时的小麦管制政策，不满于威尔逊把美国拖进了一场可以旁观的战争，这致使考克斯失去了太平洋沿岸每一个县的选票。而对民主党政府的不满并不仅仅存在于农民中，中产阶级中也有许多人也对高税率、通货膨胀和劳工纠纷感到愤慨，各少数民族集团则敌视威尔逊的外交政策。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共和党赢得最后的胜利。为了保证哈定能当选，共和党采取了让他呆在家里，三缄其口的策略，宾夕法尼亚的博义斯·潘罗斯劝告道：“把沃伦留在家里，不要让他去做任何演说。如果他出去进行竞选旅行的话，一定会有人向他提问，而他正是那种会努力回答问题的笨蛋”[2]。如此，哈定获得了61.6%的普选票和404张选举人票，而民主党候选人考克斯只获得了34.9%的普选票（另有约3.5%的普选票投向了社会党候选人尤金·德布斯）和127张选举人票。在东北部地区，“哈定席卷了纽约市的每一个选举区，考克斯则在整个新英格兰仅赢得了一个县”[3]。而在随后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同样大获全胜，分别以59对37和300对132赢得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在中断了八年之后，共和党终于重新上台执

① 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前引书，下册，第294页。

② 威廉·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88页。

③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前引书，第542页。

政，一个新的时代从此开始。

〔“俄亥俄帮”和政府丑闻〕　很多美国人把哈定描写成一个成天泡在扑克牌、威士忌和女人中玩乐，此外便无所事事的总统。随着他的入主白宫，他的牌朋酒友便也沾了不少光。上任后不久，哈定在任命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国务卿查尔斯·休斯等几个颇具实力的内阁要员的同时，对他的老朋友们特别是在竞选中帮了大忙的哈里·多尔蒂也给予了实质性的回报与照顾。他不顾众人的反对先后任命了多尔蒂为司法部长，艾伯特·福尔为内政部长，威尔·海斯为邮政总局局长，查尔斯·福布斯为退伍军人管理局局长等等。因此一支“俄亥俄帮”开进了华盛顿。

哈定是一个“道义上十分软弱，无力抗拒意愿较强或忌惮较少者施加于他的影响，或者抵制他的朋友们的纠缠强求”[1] 的人，他的这些朋友们就这样给他惹了不小的麻烦，1923 年以后政府丑闻接连不断。事情首先从多尔蒂的朋友杰西·史密斯的自杀开始。史密斯由于与违反禁酒者、逃税者等人勾结，而被要求回到俄亥俄去，但他不忍放逐，于 1923 年 5 月 30 日自杀。由此也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华盛顿被淹没在丑闻中。多尔蒂的另一个朋友托马斯·米勒也同样因为把酒类从政府仓库中非法运出而被处以 5000 美元的罚金和 18 个月的徒刑。退伍军人管理局局长查尔斯·福布斯利用哈定对其信任和政府对退伍军人的关心，挪用 2.5 亿美元用来修建医院和购置医院物资的退伍军人拨款，在签定有关退伍军人医院的合同时收受的回扣达 1/3。尽管哈定知道后允许他辞职出国来逃避调查受审，但最后他还是被参议院调查委员会以诈骗政府罪送进了监狱。与此同时，哈定的密友内政

---

①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前引书，第 543 页。

部长福尔爆出了石油丑闻。1921 年他说服哈定将加利福尼亚埃尔克丘陵、怀俄明蒂波特圆丘地的油田从海军部划归内政部管理。尔后他秘密将这两块地分别租给爱德华·多黑尼的泛美石油公司和哈里·辛克莱的马默思石油公司。1923 年 10 月以民主党人蒙大拿的托马斯·沃尔什为首的参议院公众地委员会对此进行了调查，揭发出多黑尼曾借给福尔 10 万美元，辛克莱曾赠送给福尔 22.3 万美元的政府债券、8.5 万美元现金并给福尔的牧场一些牲畜等内幕。1929 年 10 月，福尔被判处受贿罪，监禁一年，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因犯贪污罪而锒铛入狱的内阁成员。而与这多起事件都有牵连的司法部长多尔蒂因与哈定总统之间的私人关系，陪审团为了保护总统的美名而使他幸免入狱。

对于哈定来说，看到自己所信任的人犯下如此重大的罪行，他在震惊之余除了选择逃避外，不知道采取什么办法。于是，1923 年 6 月 23 日，他带着夫人和一批随从开始了横渡大陆的旅行，这也是他与华盛顿的诀别。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的哈定由于忧虑、焦急，此时已经心力交瘁。在旅途中先后突发心脏病、染上肺炎、中风，最后于 8 月 2 日在旧金山病逝。可悲的是，这个生前并不被人关注的总统的死却在美国人中引起了不小的波澜。随着丑闻详情以及有关总统的情妇的消息不断传出，美国人对于总统的死也出现了各种说法。“新闻界认为原因是食物中毒、医生们则认为是突发心脏病、谣言散布者们则说成是梅毒，浪漫主义者们理解为破碎的心。”①

〔从副总统到总统：柯立芝如愿以偿〕　得知哈定死后，正在家里度假的副总统柯立芝在其位于佛蒙特的家族农庄的起居

① 富里斯特·麦克唐纳：《传递的火炬：20 世纪的美国》，韦恩州立大学，1968 年，第 193 页。

室里，伴着一盏油灯，在父亲的主持下宣誓就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30任总统，并在1924年的大选中以绝对的优势战胜对手，获得连任。

在很多人的眼里，柯立芝是一个古板、平庸、保守、缺乏想像，但品行端正、奉公守法、节俭朴素的人。他的这些个性特点与其生活环境及经历十分有关。有人认为“柯立芝的平民风度乃是出于习惯，并非来自思想信仰；他的节俭并不表明厌弃财富；他的沉默寡言并非哲学修养所造成的宁谧恬静；他的朴素单纯并无内在的深度。”[①] 柯立芝出生在佛蒙特山区的农村里，父亲是一个商人。靠着自己做工，他读完了阿默斯特大学，随后到马萨诸塞州的北安普敦攻读法律，并在那里从底层开始做起进入政界。在1919年9月波士顿警察的罢工中，时任马萨诸塞州州长的柯立芝调用国民警卫队恢复秩序，阻止了罢工，并声称“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无权以罢工来反对公共安全”[②] 由此闻名全国，在仕途中开始时来运转。1920年大选，他被共和党选中，作为哈定的竞选伙伴，并在后来幸运地提前成为白宫的主人。

从副总统到总统，作为白宫的新主人，柯立芝因政治丑闻而对1924年的大选获胜失去信心的共和党人重新燃起了希望。他所具有的节俭、无所矫饰的性格，特别是他在公开场合所表现的寡言少语、出言慎重以及对结交私人朋友缺少热情和慷慨等特点，都使共和党在选民们面前重塑了尊严，并把哈定政府时期的种种丑闻体面地遮盖了起来。柯立芝具有的优点，同他的前任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因此对共和党来说不必在1924年的大选

---

①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前引书，第545页。

② 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前引书，下册第一分册，第295页。

时再考虑别的总统候选人提名。而民主党此时仍然处在内部的争斗中。在北方的民主党人中存在着强大的天主教势力，几乎一致反对禁酒；而南方民主党人却是新教徒，竭力拥护禁酒，反对废除宪法第18条修正案，有许多人参加了三K党的活动。内部争斗首先在南方派威廉·麦卡杜与北方派阿尔弗雷德·史密斯之间进行。最终，史密斯不敌，有着三K党和禁酒派强大支持的麦卡杜。1923年6月24日到7月10日民主党召开了代表大会，在会上鼓起勇气向三K党开战，并经过了一百多次投票推出了西弗吉尼亚州的约翰·戴维斯为候选人。但“或许在一代白宫英雄之后，一种柯立芝式的总统正是所有美国人在感情上能够接受的。也或许是因为柯立芝要比表面上厉害。”[①] 在目睹了哈定时期的丑闻之后，“只有一点是明显的，那就是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唤起道德尊崇的领袖”[②]。柯立芝成了最受欢迎的美国总统之一，在1924年的大选中，他击败了民主党的戴维斯和第三党罗伯特·拉福莱特。

柯立芝成为总统后，首先解除了内阁中哈定的牌朋酒友们，其中有的被送进了监狱，并代之以真正能胜任这些职务的人。1924年3月前司法部长多尔蒂辞职，柯立芝随即任命了哥伦比亚法学院杰出的前院长哈伦·菲斯克·斯通接任，从而政府作风由贪污腐败转变为廉洁。

〔在期待中走向前台：胡佛入主白宫〕　转眼就到了1928年，据说柯立芝曾私下里考虑争取再次连任，但他那句神秘的

---

① 富里斯特·麦克唐纳：前引书，第195页。

② 小阿瑟·施莱辛格：《旧秩序的危机：1919—1933年》，霍顿·米福林公司，1957年，第54页。

“我不选择较量”被认为是一种拒绝，使他失去了机会。[①] 因此，1928年春天当他看到在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中，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已经完全占据了优势时，他明显地表示出了对这位共和党内最有希望获得提名的候选人的日益不满。他甚至对他的农业部长说，“那个人（注：指胡佛）在六年里向我提出了很多无用的建议，所有的都是不好的”[②]。尽管如此，胡佛还是无可争议地在代表大会的第一轮投票中便获得了提名。

与此同时，民主党也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纽约州的阿尔弗雷德·史密斯也同样在第一轮投票中便获得了提名。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主要党派提名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徒，获提名前已四次连任纽约州的州长，被富兰克林·罗斯福称为“政治战场上的快乐战车”。一场党派的较量随即在史密斯与胡佛之间展开。“快乐战车”在东北部热情、拥挤的人群中不断发表演说，但在西南部的农业地区深受冷落。两个政党都为竞选募集了大量经费，共和党获得的要再多一点，但是打败史密斯的并不是金钱。

对广大选民来说，胡佛让他们更清楚地看到了美国神话，“胡佛的名字代表着个人成功，代表着管理粮食赈济饥民，代表着严厉的吏治[③]。胡佛，这个艾奥瓦州农场主的儿子，8岁时由于双亲过世便跟随亲戚来到西部，在那里他靠自己做工读完了斯坦福大学，成了一名工程师，家产日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时任威尔逊内阁粮食局长的胡佛成了救济比利时的英雄。后在担任商务部长期间，他又为创造美国的商业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普通的工人们已经得到了满足，普通的商人们也发了财，他们都

---

①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剑桥美国人民史》（卷三），新美国图书馆，1972年，第280页。

②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88页。

③ 布卢姆等：前引书，第321页。

没有任何要求改变的愿望，作为工业效率的代表，“胡佛正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人，而史密斯不是，所以选举也不是竞选了”[1]。最终，虽然史密斯获得了各主要大城市的选票，但胡佛还是以58.1%的普选票和压倒多数的444张选举人票而当选。在众人的期待中，胡佛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入主白宫。

但胡佛的运气似乎不好，他刚上任后不久，曾被美国人认为是“永恒的繁荣”不再繁荣，1929年10月29日成为了美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一场“大萧条”紧随而至。无可奈何花落去，共和党在1932年的大选中惨败，罗斯福和他的民主党上台，又一个新的时代开始。

〔哈定—柯立芝—胡佛的执政信条〕　在美国历史上，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一直是政府执政的两种不同的策略，并不断交替出现。如果说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的时代是国家干预对美国历史上自由放任传统的一次重大突破，那么进入20年代后，随着共和党的重新执政，自由放任又再次成为政府的政策原则。总统作为一种制度，其政策和决定已超越了担任这个角色的个人的意志。从哈定、柯立芝到胡佛，历届政府政策都受到了所属党派的影响，都把美国的繁荣和大企业的壮大联系在一起，提倡有利于特权集团的关税和税收政策，使联邦行政机关和企业界紧密合作，并反对那些妨碍投资或扩大政府管理范围的措施，政府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被尽可能地限制。

此时的自由放任首先反映在哈定的“恢复常态”上。对于经历了一次大磨难和波动的美国人来说，1920年最需要的是回复到过去的状态中。在参加竞选时，哈定便指出，“美国当前需要的不是豪情壮志，而是疗养生息；不是济事妙策，而是正常状

---

① 富里斯特·麦克唐纳：前引书，第212页。

态；不是革命，而是复原；不是激烈震荡，而是轻微调整；不是手术，而是静养；不是激情，而是冷静；不是试验，而是均势；不是沉湎于国际理想，而是维持国家的优势地位"①。所谓的"常态"就是对威尔逊时期的那种强势政府的否定，就是在国际事务中放弃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在国内则放弃对企业行为的管理等。"恢复常态"的核心就是把国家利益与特权集团的利益等同起来，在具体政策上，包括大幅度减税和补偿金、恢复高额关税、安排支持企业界人士进入并控制联邦管理机构等，实质上就是让代表大企业的特权集团来参与国家的管理，政府尽可能少管事。在威尔逊时期，为了整顿商业和工业曾在各重要经济部门建立了若干联邦机构，此时哈定为了实现"常态"的回复，通过将一些权益集团的成员安排在这些机构中或干脆撤销的方式，把各限制性的委员会交到各公司手里，停止实施反托拉斯法、鼓励大规模的企业联合。"凡是在有可能的地方，哈定及其同僚无不使进步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倒退回去。"②

从威尔逊到哈定，不仅是两个政党间简单的交锋，而且意味着进步主义在美国的衰落，美国人再次从激进的进步主义理想中回到了现实，哈定的"恢复常态"意味着自由放任的再次兴起。在对哈定政府进行评价时，有的学者把哈定政府说成是"一个专门追求一切利益而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政府"，并认为这样的政府加上"恢复常态"的政策和特权集团的掺和，导致了丑闻迭起的现象。但反过来，我们并不能因为丑闻的出现而否定"恢复常态"，这一政策的选择同样也是战后美国民众的普遍愿望，否则

① 丹尼尔·斯诺曼：《1920年以来的美国》，海内曼教育图书公司1978年，第1页。

② 布卢姆等：前引书，第308页。

也不会将选票投向哈定。

与哈定相比，柯立芝上台后对联邦政府未进行变动。尽可能地少说话是他的处世原则，“我永远不去谈及的事不会使我陷入困境”，“我永远不会被我未曾谈及的事伤害”①，沉默是最好的保护。每天下午，白宫总会有一段很长的午睡时间。有一次，当一名参议员指责总统，要求他做点什么的时候，柯立芝两脚翘在书桌上回答道，“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现在生活中所遇到的麻烦中有五分之四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我们愿意只坐在那里保持安静。”② 他崇拜财富和拥有财富的人，认为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努力工作，而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懒惰。他的这种观点代表了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价值观即世间财产是上帝进行选择的明证，“一个人的价值是同他所能赚的工资相称的”③，政府不应该向高尚的富人征税，以援助卑贱的穷人，富人最了解他们利益所在，政府不应该干预他们经营的企业，而应该促进企业。他提出“美国人主要的事业就是企业”的施政原则，对他来说，企业不仅仅是企业，而是一种信仰，“建造工厂的人实际建了一座教堂……工作在那里的人实际在那里做礼拜”④。

然而，正如美国学者、前总统顾问赫伯特·斯坦所说的，相对哈定而言，柯立芝却不是保守主义的，他并没有解除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主政时期的干预政策，他领导了一个新时代，所谓美国的事业即企业并不是说政府要让企业自行其是，

---

①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 57 页。
②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 58 页。
③ 布卢姆等：前引书，第 315 页。
④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 57 页。

而是说帮助企业是美国政府的事业。[1] 在柯立芝看来，联邦政府服务企业最好的办法就是使自己消失，“因为即使联邦政府不再存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不会在日常生活中觉察到有什么两样[2]。所以，政府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将其规模、活动和支出压缩到最小程度。值得注意的是柯立芝政府的联邦预算比塔夫脱时期更加庞大，而且美联储的作用也越来越被认同。这说明柯立芝时期的政府并非完全放任的，他对企业的崇拜使其政府的自由放任更多的是一种服务的需要。

柯立芝的继任者胡佛被许多美国学者称为是被遗忘的进步派，他对大企业的支持增进了经济的理性化，限制了“破坏性”的竞争。早在 1922 年，胡佛就在一本名为《美国的个人主义》的书中，提出了其要求加强美国进步主义传统和公平竞争的思想，“我们逐步明白有关政府对个人的保护，我们所能期望的就是自由、公正、合理的福利、平等的机会和对服务的刺激”。[3] 出任总统后，他的政策思想主要体现在其有限政府哲学的理论中。他认为，“自由主义的创立不是为扩充官僚政府，而是要限制它。真正的自由主义追求一切合法的自由。它首先坚信，倘若没有这种自由，那么对所有别的幸福和利益追求都是徒劳。这一信念是美国一切进步——无论是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基础”；“政府经营商业将损害政治平等。它将增加，而不是减少滥用职权、贪污贿赂现象。它将扼杀主动性、创造性。它将阻碍领导能力的发展。它将使我们的人民智力愚钝，萎靡不振。它将压制平等的机会。它将摧残自由和进步的精神。”“机会均等和美国个人主义的

---

① 赫伯特·斯坦：《美国总统经济史》，金清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3 页。

②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 57 页。

③ 理查德·E·马歇尔等：《从进步主义时代到常态》，前引书，第 88 页。

本质是，无论在商业和政治上这个共和国不存在任何集团或联合体的统治。相反，它既要政治和社会公正，也要求经济公正，它不是一种放任主义的制度”。[①] 联邦政府的责任是引导和指导，但不是在一个庞大的官僚制度之下管制进步的过程。“政府和企业之间将一年比一年独立……政府不应该和它的公民一起参与企业的竞争……另一方面，企业也有责任独立运作，以使政府的管理或竞争不再是必须的。”[②] 他坚决相信对经济自由的任何干涉不可避免地会破坏精神的自由。他的经济政策体现着对不受政府干涉的个人创造性，进取心和机会的绝对信仰。“你要是把政府的控制扩大到人民的日常生活方面就不可能不同时使政府成为人民的灵魂的思想的主宰者”[③]。

在20年代的三个总统中，胡佛是最有能力但运气最不好的一个。他好不容易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又遇到了一场大危机，他的政绩不幸因为萧条而被人遗忘了，甚至后来有人把“胡佛”当成了骂人的前缀。

〔*梅隆及其财政政策*〕　从个人能力角度来说，哈定显然不如他的前任，才智平平、缺乏领导才能，他主张同国会合作，在政策问题上宁愿放弃自己的主张而不愿反对他的政党的意愿。在他任内似乎只有一件事是得到全国上下称道的，即他的四项政府成员的任命，他们为他承担了制定和推行政府政策的重任。同时，由于一直到1932年财政部长始终是梅隆，而商务部长到1928年总统选举前一直是胡佛，这两个人成了政府中的核心人物，所以保证了共和党的工业与财政政策在近10年里的连贯性。

---

① 戴安娜·拉维奇编：前引书，第611、612页。
② 华特·约翰逊等：前引书，第696页。
③ 德怀特·杜蒙德：前引书，第470页。

因此，考察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政府对内政策，了解梅隆和他的财政政策是关键。

梅隆，被美国人称为是"继汉密尔顿以来最伟大的财政部长"①，1874年起便进入了匹兹堡的银行界，出任政府财长时已是铝垄断财团和金融—工业帝国的首领。他身材瘦弱、面容冷漠、神情疲倦，由于生活在古董瓷器、极品葡萄酒、昂贵雪茄和雅致的绘画中，他的举止穿着中充满了绅士般爱德华七世的风格。在这位拥有数百万元财富的富翁财长看来，"政府仅仅是一个企业，能够而且必须按照企业原则进行管理"②，因此他上任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平衡预算，然后就要偿还国债。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梅隆在其政策措施中贯彻了压缩政府开支和增加收入的原则。

压缩政府开支的政策，首先从改进联邦政府编制预算的程序开始。在梅隆的建议和倡导下，国会于1921年6月10日通过了曾被威尔逊总统否决过的预算法，并建立了联邦预算局，哈定总统任命了芝加哥银行家查尔斯·道斯为预算局第一任局长。与此同时，退伍军人的补偿金也成了压缩开支的对象。战后，退伍军人组织美国军团发起运动，要求国会对平民在国内享受战时繁荣时，增加曾在部队服役的人的补助金。然而当国会提出有关议案时，遭到了反对，并被总统予以否决。1922年3月国会众院赋税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修正的"退伍军人补助金"法案，规定对退伍军人支付20年补助金，其标准为国内服役一天1美元、国外服役的1.25美元。9月19日总统否决了这项法案。然而在势力日增的压力集团退伍军人团的压力下，1924年国会通过补偿金

①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98页。

②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62页。

法案，并使总统的否决无效，以发放已交保险费的为期20年保险单的形式给予补偿金，退伍军人拿这张保险单作抵押可以立即借到有限的现款。

对于梅隆来说，增加政府收入的途径之一就是促进生产，这也是增进全民福利的最好办法。而促进生产，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减少赋税。在他看来现存的高额税率已让人无法忍受，一个收入在100万美元的人要缴纳近30万美元的所得税，而这种高税率的恶果已四处可见，“新的企业不再出现，新的项目被遗弃，而所有这些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高额赋税”。没有人应该把其收入的1/4用来缴税，否则这将是美国创造力的结束。[①] 像汉密尔顿一样，梅隆认为繁荣是自上而下的，所以主张减少赋税尤其是富人的赋税，向富人征税会阻碍投资，从而延缓经济的发展。他提出了取消超额利得税、略增公司税并将正规和附加所得税从最高的73%降为40%的建议，但受到国会内中西部和民主党人的反对。经过妥协，1921年11月23日哈定总统签署了税收法。新税法废除了向公司征收的超额利得税，把高收入者应缴的附加税最高税率从65%降到50%，而公司净收入税额从10%增加到12.5%。新税法没有对基本所得税和财产税作变更，仍然维持单身汉1000美元基本免税额和已婚者2000美元的基本免税额，但规定每有一个18岁以下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还可以再增加400美元的免税额。尽管减税使联邦正常收入减少了15

① 美国1913年的税收法规定对公司利润中超过5000美元的部分征收1%的利得税，1917年又提高到6%，1918年提高到了10%。同时对所有利润中相当于股本的15%到20%的部分征收25%的超额利得税，相当于20%到25%的部分征收35%，相当于25%到35%的部分征收45%。这种税收于1921年被废除，直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时才恢复。

亿美元,但由于国债仍减少了近20亿美元并有3.1亿美元的结余，因此1923年12月梅隆再次提出将附加税的最高税率减至25%，并相应减轻小收入者的正规所得税，削减联邦财产税。1924年通过的税收法便把附加税的最高税率从50%减到了40%，将中小收入者的正规税减半，同时把最高财产税增加至40%，征收新的馈赠税。由于经济大繁荣的出现，1925年12月7日召开的第69届国会使政府完全控制了国家的财政政策，梅隆可以不受国会的限制贯彻他的财政税收政策了。1926年2月12日再次颁布了新的税收法，与前几次相比，这次的减税幅度大大加强，它不仅将附加税的最高税率减至了梅隆理想中的20%，而且削减了小收入者的正规所得税，废除了馈赠税，减半了财产税，并且单身汉和已婚者的基本免税额分别提高到了1500美元和3500美元。后来在1928年税收法中又稍微削减了公司税和消费税。梅隆的这种以高收入者为主要受益对象的减税政策，利用财政政策的调节，在一定程度上确实鼓励了投资，对20年代美国的繁荣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占人口比例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并没有从中获得什么益处，他们的收益与高收入者的投资所产生的效益之间呈现不平衡的增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梅隆的这种减税政策导致实际购买力与生产能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最终成为导致大萧条的原因之一。此外，这种政策在鼓励投资的同时，也同样助长了投机，使股市中的泡沫不正常膨胀。

在关税问题上，作为特权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梅隆主张恢复传统的共和党经济民族主义政策的原则，采取保护性关税政策。1921年5月27日首先通过了曾遭威尔逊总统否决过的《紧急关税法》，提高了小麦、肉类、羊毛、食糖等农产品的税率，并禁止从德国进口染料。1922年9月19日又通过了《福德

尼—麦坎伯关税法》，从保护主义原则出发，大幅度提高了向美国进口的重要工业品的关税，并指示关税委员会协助总统确定美国和其他国家间生产成本的差额，授权总统可根据该委员会的建议提高或降低任何税率，其范围为50%。后来在此法令执行的过程中，包括柯立芝政府时期，所变动的37种税率中有32种是提高的。正如威尔逊当初在否决《紧急关税法》时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希望让欧洲清偿它的政府债务和商业债务，我们就必须作好购买欧洲商品的准备"[①]，因此新的关税政策从长远来说是不利于美国的发展的，损害了对外贸易。虽然保护了美国的国内市场不受欧洲人的侵占，但也阻碍了他们购买美国产品尤其是农产品，因为他们除非借美元，否则没有能力购买，从而导致欧洲的旧账未还又欠新账。胡佛上任总统后，又于1930年通过了《霍利—斯穆行关税法》，再次将关税的平均值从32%上升到40%左右，对大约70种农产品和900多种工业制品提高了税率。这种高关税的状况对美国和欧洲，这都是一种有害的局面，大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农业集团和农业政策〕　从1920年夏季到1935年美国的农业经历了时起时落的萧条。1920年国外的需求急剧下降，同年5月31日政府取消了对小麦价格补助，就在这个时候共和党利用农民们的不满在大选中击败民主党，重新执政。而在国会中也由于上述原因，在1921和1922年间形成了由南部和中西部不满现状的农场主组成的农业集团，并对美国农业政策的制定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1921—1924年间甚至控制了政府的农业政策，1924年以后尽管提出的建议屡遭总统否决，但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对政府的政策仍然起了一定的作用。

---

①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前引书，第554页。

1921年8月通过了罐头厂主和牲畜围场主管理法，它授权农业部发布停止令以维护罐头厂主间的竞争，并迫使领取佣金的代理商、谷商和牲畜围场主必须合理定价。

1922年通过一项法律决定反托拉斯法不再适用于农业合作组织，并提出在联邦储备委员会内增加一名农业代表。

1923年3月通过了农业信贷法，并根据该法令设立了12家中间信贷银行，由财政部提供资本，通过联邦土地银行的附属机构信贷银行对银行、信托公司和信贷股份公司所握有的农业票据再贴现，并凭借仓库收据发放向合作组织和其他农业集团提供的为期6个月至3年的贷款。初期拨款6000万，用于发放短期贷款，用以在价格暂时下跌时，帮助合作组织不把农产品投入市场。

为了保证农产品价格的平等，伊利诺伊州的两名农业机械厂主皮克和约翰逊提出了将可供出售的剩余产品独立开来，以避免国内市场受世界价格的支配的建议，并被写入了1924年麦克纳里—霍根法中。法案计划成立一个由12个委员组成的联邦农场销售委员会，处理超过国内市场需要的剩余农业品，国内农产品价格提高到数额相当于关税额。同时提出委员会应该同出口商订立合同，使每种产品在国外的销售量足以使农产品价格得到提高，并应补偿出口商所蒙受的损失，其数额相当于关税的数额。1927年2月和1928年5月，国会两次通过了该项提案，但都被出身在农场却又不重视农业的柯立芝总统否决了。

在此期间，为了提高国内农产品价格、协助销售农产品，1924和1926年的特别关税法把小麦的关税提高到每蒲式耳0.42美元，奶油提高到每磅0.12美元。

胡佛总统上任后，把农业和关税作为其政府的施政重点。1929年在胡佛总统的支持下，通过了农业销售法并设立了联邦

农业局。由各个销售某种主要农产品的合作协会的代表组成的各委员会向该局提出各种意见，并设立5亿美元的周转性借贷基金，供各合作协会贷款，以利于它们更好地销售农产品。

20年代，尽管在农业集团的努力下，在加强农场主的经营能力、改善农民境遇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美国的农业总体上由于这一时期大企业的繁荣、工业的迅速发展，往往被政府忽视，在三位总统的执政信念中工业的位置更重要。农场主们只有在大选拉选票时才会受到一些重视。

〔最高法院的保守倾向〕　作为美国分权体制的重要一极的最高法院，在20年代总是摇摆于进步与保守之间，更多的时候由于哈定和柯立芝政府新任命了五位法官，而处于保守状态中。

为了得到最高法院的支持，哈定和柯立芝总统先后新任命了前总统威廉·塔夫脱、乔治·萨瑟兰、皮尔斯·巴特勒、爱德华·桑福德和哈伦·斯通为最高法院的法官，其中塔夫脱为首席法官。他们在最高法院内形成了强大的保守力量。1922年最高法院在审理巴莱诉德莱克塞尔家具公司一案中宣布对童工制造的产品课收寓禁税的联邦法律违宪，并宣布国会不得应用征税权来达到违宪的目的，从而保护了在各地尤其是南部纺织工厂广为采用的童工制。1923年在艾德金斯控告儿童医院一案中，判定哥伦比亚特区一项规定妇女最低工资的法律违宪；在此后的洛克控告纽约一案中，乔治·萨瑟兰法官作出了同样的判决，并声称各州有关调整女工工资的努力违反了她们签订劳动合同的自由。在1922年全国煤矿罢工中，为了结束罢工司法部颁布了一项禁止工会担任纠察或以任何方式鼓励工人离开工作岗位的禁令，最高法院对此表示认可，甚至还认可了规定雇员不得加入工会的“黄狗”合同。这些做法阻碍了工会的发展，剥夺了其为争取公平待遇举行

罢工的权利。此外，这一时期最高法院的保守还反映在它对言论自由的控制方面。在 1925 年吉特洛控诉纽约一案和 1927 年惠特尼控诉加利福尼亚一案中，法院以煽动性言行构成国家安全危险为理由，支持了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关于犯罪性捣乱行为和工团主义的法律。

当然，最高法院在某些方面还是保留了其部分进步性的。1923 年在迈耶控告内布拉斯加案和巴蒂斯控告艾奥瓦案中，推翻禁止在学校使用外语的一些州的战时法令。1925 年在皮尔斯控告姊妹社一案中宣布俄勒冈州三 K 党支持的一个法令为非法。1927 年最高法院又以违背宪法的第 14 和 15 条修正案为理由，取消了得克萨斯州排斥黑人选民的法令。

然而，在州权和联邦权力问题上，最高法院则再次表现出了保守性，使 20 年代联邦权力得到扩张。在 1922 年斯坦福控告华莱士一案中，最高法院宣布国会可以运用管理贸易的权力，对某一行业进行州际性的控制。在 1923 年马萨诸塞控告梅隆一案中，最高法院否决了马萨诸塞关于联邦对各州的拨款制度侵犯了州权的论点，对该制度予以确认。

二、管理革命与技术革新

提到 20 年代的美国历史，人们除了会想到三个总统、梅隆、休斯等政府要员外，更不会忘了两个引起生产管理领域革命性变化的人：泰勒与福特。因为在他们的推动下，科学的管理和先进的技术工艺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当 1920 年来临的时候，美国在泰勒制和技术革新的推动下，积聚了强大的发展动力，创造出了经济的繁荣。

〔泰勒制的推广〕　弗雷德里克·泰勒，美国科学管理的开

山祖。他1856年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律师之家，由于眼病不得不中断在哈佛的学习，但这给了他进人工厂学习的机会。1878年他进入米德瓦尔钢铁公司，这为他后来创立科学管理的理论提供了条件，在那里他开始进行劳动时间的研究，并于1885年获得史蒂文斯学院工程学硕士学位，次年成为米德瓦尔钢铁公司的总工程师。随后，他又在机械制造投资公司担任过总经理，并于1901年退休。1906年他出任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主席。泰勒一生共有40多项专利，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计件工资制》、《车间管理》等论著。

在泰勒的论著中，效率始终是其崇拜的偶像。他根据长期的工作经验，对每一步制造过程进行仔细的研究，将制造过程分解为各个单独的工序，使每道工序的工人和机器的功能都专门化，提出了一套管理原则、标准和控制手段，以提高经济效益，把人视为“经济人”，以报酬为奖励手段，推行“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政策，让工人发挥出最大限度的能力，并按照其产品付给工资，“工人和经理人员双方最重要的目的应该是干出最高档的工作——以最快的速度达到最高的效率”[①]。按照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的观点，正是从泰勒开始，人类才第一次将知识应用于研究、分析、监督工作，这是一场生产力的革命。

进入20年代后，经过泰勒协会制度化的科学管理方法被企业广泛采用，计件工资制的执行大大强化了工人们的工作效率，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的10年中美国人均每小时的产出平均增长40%[②]。

---

① 余志森、张海英主编：《影响历史的百部经典》，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483页。

②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66页。

泰勒制引起的另一个变化就是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科学管理理论成为了一门学科，企业管理专业在20年代走向成熟。因此，随着一大批专业管理人员的出现，单个所有主或合伙人、董事会逐步失去了对企业经营的控制，转而由那些在生产和销售方面受过训练的经理人员来对企业的现状和未来进行管理和规划，企业的扩大、产品的多样化和技术的现代化等企业发展的战略成为了职业经理人的责任。这种权力的分离大大加速了美国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为20年代的繁荣做出了贡献。当然，泰勒制在提高企业生产管理效率的同时，对工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卓别林在《摩登时代》等电影中所演绎的一幅幅可笑而辛酸的场面，正是资本家利用泰勒制对工人们进行压榨的真实表现。

〔福特工厂的流水线作业〕　流水作业在今天已经成为很多生产性企业的主要生产方式，它被生产者广泛接受要从福特1913年建立第一条固定的汽车生产流水线开始。“高地公园工厂体现了奇迹般的现代设计水平。一部电梯把原材料带到四楼。在这里它们被加工成挡板、挂钩和其他的大件，以及皮革质的车内装饰品。在三楼，轮胎被安在轮子上，车内地板被拼装好，车身被漆成黑色。在二楼，整个汽车被组装成型，然后沿着通过一楼办公室的斜坡，把车开下去。对这日益复杂的生产和装配工艺，有相应的15000台机器。每台机器都一尘不染，并有一个铜标版注明台号”①。这种流水作业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福特的发明，埃里·惠特尼互用件原则的发现，经过亨利·勒兰德等人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许多生产者在实际生产中的理论拓展，最后在泰勒的管理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日臻完善的机器、工种的专门化和对操

---

① 彼得·科利尔、大卫·霍罗维兹：《美国楷模》，李必龙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61页。

作的工作效率的分析是其主要元素。福特的汽车厂是所有这些人思想的集合。在1914年，福特工厂又在上述固定装配线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条流动装配线，通过使用传送带、重力滑板和架空单轨吊车为机器输送零件，使工人只要站在机器旁边操作便可以完成所有的装配工序。它使平均装配一辆T型车的速度从一年前的14小时缩短为93分钟。而到1925年10月31日，福特的流水线上实现了每10秒钟就有一辆汽车下线的生产速度[①]，达到了其技术革新的顶峰。这使福特的T型汽车在1927年停产时达到1500万的水平。

亨利·福特和其行政管理人员共同摸索出了一套流水作业的生产方法，实现了生产的产品越多、成本越低的现代工业主义的规模生产的目的。T型车的价格从1901—1910年的950美元，降到1929年的290美元[②]。正是因此，其他企业也纷纷仿效，建立了自己的流水线。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战争为美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契机，各行业都为了满足战争所带来的巨大需求而努力增加生产，尤其是造船、飞机引擎、军火等部门，流水线便在各行业出现。到20年代初，许多行业都采用了流水生产的方式。

三、20年代的经济繁荣及其问题

正是管理革命和技术进步才使美国拥有了繁荣。如果要让一个人来概括一下美国19世纪20年代的经济，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永恒的繁荣”，由于这一繁荣主要出现柯立芝担任总

①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79页。

②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阿伦：前引书，《巨变》，哈珀兄弟出版公司，1952年第111页。

统的时期，所以也有人称之为“柯立芝繁荣”。在经历了1921年战后的短暂危机后，美国的经济从1922年起进入了一个高速的发展时期。据统计，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20年的862亿美元增至1929年的1044亿美元[①]。当时，很多美国人都认为这种大繁荣将一直持续下去。然而1929年10月24日的股市大崩溃，使美国人的希望随着股指跌到了谷底。所以20年代的美国经济又被认为是“玫瑰色的噩梦”或“繁荣中的危机”。

〔汽车王国的出现〕　　柯立芝就任总统时，曾把“让每户美国家庭的锅里都有一只鸡，每家的车库里都有两辆车子”作为其政府目标，汽车王国的出现是美国19世纪20年代繁荣最重要的特征。

汽车王国的出现首先从汽车的数量增长开始。从1900年到1929年，美国的年汽车产量从4000辆跃升至480万辆，到1929年汽车拥有量超过了电话，达到2600多万辆，平均每5个人就有一辆车，大大超过了英国的每43人一辆、意大利的每325人和俄罗斯的每7000人的汽车拥有量[②]。汽车对于美国人来说，不再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它已经走进了寻常百姓的家。流水线生产首先在汽车工业中的应用，不仅增加了汽车的产量，而且由于成本的降低，使汽车的价格开始下降。福特的T型车一开始就将价格定位在供普通百姓使用的廉价汽车上。当1908年推出时其价格就首次打破1500美元的汽车底价，仅以950美元销售，而后又不断降价，到1929年仅售290美元。

当汽车工业刚开始起步时，曾经有许多具有机械天赋的人像福特那样，建立了他们的小汽车厂，比如克莱门特·斯都的贝克、

---

① 塞缪尔·莫里森：前引书，第288页。
②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85页。

皮尔斯·艾罗、哈里·斯杜茨等等。但20年代结束了初期的众多小厂并存的局面，进入了一个有少数几家大公司统治的时期。当时除了福特公司以外，还有威廉·杜兰特于1908年合并别克、奥兹及一些小公司建立的控股公司通用汽车公司。这家公司在1921年被杜邦和摩根集团控制，生产从豪华的卡迪拉克到廉价的雪弗莱等各种型号的汽车。另外一家相对较小的公司克莱斯勒公司于1923年建立。这三家公司几乎囊括了20年代美国所有汽车的生产。

汽车王国另一个主要表现便是汽车工业在美国20年代的产业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一方面，汽车工业推动了钢铁、机械工具、石油、橡胶等其他行业的发展，据统计1928年全美生产的4/5的橡胶、1/2的平板玻璃、8%的铜、11%的钢材和65%的皮革装潢材料被用在了汽车工业上；此外，全美汽车每年共要消耗70多亿加仑的石油①。其中，影响最直接的就是促进了道路的修建。1921年在美国汽车工业蓝皮书中曾这样警告那些驾车往返于佛蒙特和蒙特利尔的人："请在下雨天里务必用链条固定好车子的四个轮子"，并劝告游客"在遇到山路、沙漠边缘地带和泥泞的地方时，一把有可折叠柄的铲子"可能会非常有用②。一次大战前，美国北方9/10的车主在冬天会把汽车放一边，而重新用马车或蒸汽运输工具。所以，到了20年代为了让汽车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就必须改善道路的状况，因此各州都纷纷发展公路修筑。佛罗里达穿过埃佛格来得沼泽地修建了泰米阿密小路；亚利桑那修建了一条横穿斐尼克斯西部沙漠的公路；犹他州在靠近内华达州的一片泥地和古波尼凡尔湖的遗址上建了高速

---

① 马歇尔等：前引书，第96页。

②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巨变》，哈珀兄弟出版社，1952年，第122页。

公路等等。到1928年已经可以驾车从纽约往西一直到堪萨斯的圣马里。

另一方面，汽车工业的发展也促使了其他新行业的产生，它们包括在公路旁蓬勃发展起来的汽车修理服务厂、加油站、旅店、古玩商店等。随着汽车的发展，高速公路的延伸，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开车出行，因此“越来越多的加油站和汽车修理服务厂在公路干线旁冒了出来；充满冒险精神的农妇们开起了乡村饭店，以迎合开车兜风的人的需要；二流的企业主开设了舞厅，吸引寻欢作乐的人和他们偶然搭识的人；礼品老店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抢着赚驾车者的钱；曾经只有出差过路的销售员光顾的乡村旅馆现在也装修一新，并挂起了‘旧殖民主义时期’的标志。其他还有一些则建立了由一间间独立的小屋构成的旅行者宿营地，二战后则大多让位于汽车旅馆。”① 据说到1925年佛罗里达州共有178个获得政府认可的宿营地，为60万人提供了住宿，其中60%的游客是开车前来的，其中2/5来自南加州②。

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许多美国人的生活都受到了汽车的影响。美国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庞大的汽车工业中谋生的，1928年，汽车工业的生产工人数为375000人，其他与汽车相关的维修等企业的工作人员达到了3700000人③。与此同时随着汽车产量的增长和价格的降低，汽车消费成为美国人的主要开支，美国人用于买车的钱从1919年的13亿美元，增加到了1929年的30亿④。汽车同样也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方式和工作习惯。“T型车使美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变革。据说农民们可以愉快地利用汽车完

---

① 莫里森：前引书，第225页。
② 马歇尔等：前引书，第97页。
③ 马歇尔等：前引书，第95页。
④ 麦克唐纳：前引书，第198页。

成每件工作，除了洗碗以外；通过在车上加一个拖车，他们可以把庄稼运到市场上去；通过把后轮用千斤顶托起来并装上自制的附件，又可以用来锯木头、装填粮仓。城镇里的熟练工人可以住到离工作地点几英里以外的地方，而且可以在晚餐后或周末开车到乡村散散心。甚至南方黑人的聚集区也因福特汽车而得到改善，只要车是在当地买的，即使是最愚昧的三K党人也不会不承认他的。汽车不仅给予他娱乐消遣，而且在必要时可以集合家庭成员一起开车到北方去寻找工作。汽车以及燃油农业机械把西部种植小麦的农民从土地上解脱出来。由于不需要喂养动物，他可以在庄稼一收割完毕就锁上房门，开车到加利福尼亚或佛罗里达去过冬。"[①] 在引发的这场革命中更重要的是汽车对美国的社会的影响。"它逐步改变了美国的面貌，把繁荣带到了那些长期处于萧条中的地方，把不毛之地变成了一排排繁华的加油站和热狗店，它使那些铁路城镇与其他城镇相比不再具有优势，它把城市带到了乡村，把乡村带到了城市，它使许多乡下人第一次看到了摩天大楼的阴影和大城市中的罪恶，使很多城市居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牛、绿树、青山和大海，它使乡村的比例与过去相比缩小了，它还使这个国家移动了起来，它创造了车轮上的文明。"

〔工业帝国的壮大〕　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展和完成，美国在世纪之交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并趁着一战带来的机会在战后一举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许多发电厂建造了起来，输电线不断延伸，电力的应用范围也不断扩大。在1889年工业中使用的动力来源中电力只占2%，而到1919年则增加到了31%。1909—1929年发电量增长了19倍，从60亿千瓦时增加到1170亿，1929年工业中电气化程度也相应增加到70%，

---

① 莫里森：前引书，第225页。

1919—1927年间，共有44%的蒸汽机被电力所取代。庞大的铁路运输网络逐步建成，连接了东西海岸间的各大城市。到1920年，不仅通过铁路运输的货物量增加了许多，而且运送的旅客人数比1900年增加了一倍，空间距离也翻了三倍。从1920年到1928年，美国的人口增长了12%，但其工业产品增长30%①。

航空、建筑、电影和无线电工业是美国除汽车工业之外，在20年代发展比较突出的几个部门。1926年5月9日，理查德·拜德少尉首次驾驶一架220马力螺旋式飞机横越北极点。1927年5月，25岁的查尔斯·林白再次驾驶着相同型号的飞机，成功实现单独从美国长岛直飞法国巴黎、中间不做任何停顿的飞行，全程3735英里，共用时33小时39分。而后，美国的航空事业开始逐步开展商业活动。1927年美国开辟了第一条从波士顿到纽约的商业运输航线；1927年7月，泛美航空公司获得了第一份邮件运送合同；到1930年全美共有122家航空公司，航线总长度达5万英里。

在战争期间处于停滞状态的美国建筑业在20年代后，也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每个城市的上空都出现了新的空中轮廓线。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央地区几乎被完全重新翻造了一遍，第五大道回响着断断续续的铆接机的声音和钢铁吊车刺耳的碰撞声。在城市街道的高空，戴着头盔的工人们稳稳地站在房梁上，在他们的下面是正操作着巨大的起重机的工人或滚动着的混凝土搅拌机”②。到1931年，纽约竖立起了86层的帝国大厦，克利夫兰则为其52层的顶点大厦骄傲，而芝加哥则有它的护民大厦、休斯顿有石油大楼等等。美国人通过建造摩天大楼向世界炫耀着他的

---

① 约翰逊等：前引书，第712页。

②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83页。

富有，表现出一个暴发户的自信与自卑。而在大城市之外，由于人口向郊区的流动，住宅建筑业的发展也因此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整个20年代，从曼哈顿横跨东河的皇后镇上的人口增长了一倍，底特律附近的格罗斯点公园增长了700%，克利夫兰处的夏克海兹增长了1000%，而电影圣地比佛利山则增长了2500%①。房地产业在这些地方兴盛起来，其中佛罗里达州为最盛。1925年夏天当那里的房地产生意达到顶峰时，迈阿密的《每日新闻报》上挤满了各类房产广告，共有504页，创下了报刊史上版面最多的记录②。

电影和无线电产业是20年代美国兴起的新兴产业。战前还属于小产业的电影业，在这一时期成为了美国10大主要产业之一。1927年出现了有声电影，改变了以往电影不会说话的缺点，电影因此迅速发展。到1929年用于制作、播放电影的资本投资达到20亿美元，每年制作的电影达500部，每周电影的观众达到9500万人次（当时美国的总人口大约为1.2亿左右）。好莱坞在世界电影业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涌现了查理·卓别林、鲁道夫·瓦伦蒂诺等世界级明星。在无线电产业中，收音机的发展是最主要的。1923年美国建立了第一个无线电台后，收音机的销量急速上升。1922年收音机及其配件的销售额为6000万美元，而到1925年增加到4.3亿美元，1929年达到8.42亿美元，使每三户家庭就拥有一台收音机③。

作为工业帝国，美国的其他工业在20年代也取得了发展。比如，通讯业里，电话的安装量从1915年的525000门增加到了

---

①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84页。
②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84页。
③ 麦克唐纳：前引书，第196页。

1930 年的 20200000 门；纺织工业领域里，人造丝的产量在 1914—1931 年间增长了 69 倍；电器行业中，1921 年冰箱的产量是 1929 年的 0.6%[1]。

〔政府对企业兼并的政策〕　自由放任是 20 年代共和党执政的根本信条，因此在整个 20 年代美国政府并没有对企业界出现的新的兼并采取任何阻止行动，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财政部长梅隆，作为大企业的代表，认为政府的放任政策就是要不参与企业事务，并积极通过其税收政策来刺激企业的扩大投资。他指出“税收的下降能激发贸易和商业的动机”[2]，与此同时他又成功说服国会减少对巨额收入的征税额，返还了大公司 100 万的税款[3]，以鼓励投资。1925 年柯立芝总统任命了汉富雷为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的主席，这标志着由大企业组成的特权集团从此控制了 FTC。汉富雷上任后使 FTC 开始拥护企业的自我管理，谴责 FTC 过去对企业的干涉，并接连主持了许多会议鼓励工业部门在贸易中的联合。而政府在此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应该算胡佛领导的商业部。胡佛部长相信工业中的浪费应用合作的行动来加以铲除，并认为取得某一个工业的生产者相互合作的好处而又不破坏机会平等与个人创造性是可能的。“没有人会说这放松了对非法资本联合组织、垄断公司、规定价格、操纵、不公正作法和整个一系列有碍公共利益的集体行动的限制”。在胡佛看来实施谢尔曼法的限制给公众带来的损失与企业界利用联合组织掩盖上述活动而带来的损失相比更大[4]。1923 年初，他任命了一个商业流通与失业委员会，出版了《商业联合

①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 181、195 页。

②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 63 页。

③ 莫里森等：前引书，第 553 页。

④ 杜蒙德：前引书，第 432 页。

组织的活动》传布合作行动的主张；他将商业部置于FTC的活动之下，帮助各商业联合组织编制出一套规定，这些规定对消除贸易中的不平等有很大作用；他逐步将干涉渗入到降价等问题，通过利用商务部的机构规避最高法院和司法部的限制，从而为企业主共谋逃避反托拉斯法提供了阵地。

政府的这种态度使企业可以大胆地进行一场新的兼并活动，而随着20年代科学管理的深入，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现代大企业制度逐步在美国的建立也为这种趋势创造了条件。企业通过扩大控股公司的数量和范围使其本身的规模扩大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控股公司渗入到公用和交通领域，各商店被串了起来成为零售分销点；在所有的领域里，大公司侵吞小公司并与别的大公司合并。到1930年，200家最大的非金融企业在十年里的发展速度是小企业的两到三倍。它们控制了整个国家财富的一半”①。而与以往的企业兼并不同，这一时期的兼并的目标不是行业内的竞争对手而是散布在不同城市的同一行业公司，所以兼并的结果不是一家垄断公司的产生，而是在各行业内出现了几个庞大的控股集团，几个大公司瓜分了某一行业的主要市场。

电力等公用设施行业是兼并的最主要领域，从1917年到1930年，发电厂的功率从900万千瓦增加到3000万千瓦，年发电量从210亿度增加到750亿度，而电力公司的数量却从1917年的4300家减少到1930年的1600家左右②。该领域的兼并从1923年联合照明电力公司和美国超级电力公司的建立开始，至1929年尼亚加拉—哈德逊公司和南方联合公司的成立结束。据统计，

---

①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65页。

② 麦克唐纳：前引书，第197页。

到1930年10家控股集团公司控制了全美72%的电力供应[1]。塞缪尔·以撒，这个曾经是伦敦一家公司每周工资仅5先令的小职员，成为了这一行业里的巨人。他控股了23个州的煤气和电力公司，从缅因州的安德鲁斯克因电力公司到北卡罗来纳的潮水电力公司，担任了65家不同工厂的董事会主席。

银行的兼并此时也出现了加速增长。大银行要么直接兼并小银行，要么采取通过开设各地分行的形式抢走小银行的生意逼它们退出的形式不断扩大其在全美各地的市场。旧金山的美国国家信托储蓄联合银行在加利福尼亚州建立了500家分行，成为美国第四大银行，也是纽约以外的最大银行。而在曼哈顿，花旗银行兼并了农民信贷信托公司，抵押信托银行合并了商业银行，大通国民银行吸纳了公平信托公司。从1920年到1930年，美国大银行开设的分行数由1280家增加到了3516家，到1929年1%的银行控制了全美银行资源的46%。

兼并的另一个主要表现就是连锁企业的发展。比如，大西洋—太平洋茶叶公司的连锁店从1912年的400家，增加到了1932年的15500家。据统计，1918年的美国仅有连锁单位29000个，而到1929年便增加到了160000个；相应的连锁销售额也不断增长，1919—1927年间药店增长了124%、果品店为287%、服装店为425%；1928年美国70%的肉类食品和94%的香烟市场均被4家肉类加工企业和4家烟草商占有[2]。

〔广告与新的消费和生活观念〕　广告，曾经只是用来宣传一些寻人启示、医药信息的传播手段，在20年代的美国迅速地盛行起来，并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和生活观念。

---

①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91页。
②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92页。

广告在美国的兴起仍然要归功于汽车的发展。1910年的广告相对少而简单，但汽车工业的发展，汽车制造商间争夺消费者的激烈竞争孕育了广告这一新的产业。他们对广告的作用要比制药、化妆品、电器等行业多得多。“汽车时代把广告变成了一系列的使用和购买需求：一辆比你的邻居更宽敞的车子，一次豪华的旅行，一间全部由电器装备的厨房，为母亲准备的貂皮外套和钻石”[①]，广告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1927年的广告投入量达到15亿美元之多。妇女当然成为了广告主要的受宠对象之一，广告的作用使追求时尚的女性在着装上的花费更多，充分体现女性特点的丝袜的销售量从1900年的12000双猛增至1930年的3亿双，由于当时的妇女不断追逐广告里的高档服装的消费，所以被称为是“美国最大的皮毛动物”。虽然人们因为广告而产生了巨大的消费需求，但面临着钱不够花的问题。一个消费者曾这样说道，“汽车、真空吸尘器、盥洗室设备以及洗衣机都非常的好，但我不是所有都需要，更重要的是我没有钱买这些东西”[②]。正是这种有需求但缺钱的情况，导致了一种新的消费方式——分期付款的产生。在20年代，美国人所购买的收音机有3/4是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获得的，在汽车和家具的消费中这种新的消费方式占到了60%[③]。分期付款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全国上下都在疯狂消费，到1929年分期付款购物总额达到70亿美元[④]。这是广告带来的第一个影响。

此外，广告作为一种生产者间新的竞争方式，它在为消费者鉴别商品的优劣提供了帮助的同时，随着其本身的不断发展而成

---

① 莫里森：前引书，第228页。

② 约翰逊等：前引书，第716页。

③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95、200页。

④ 布莱克：前引书，第310页。

为了向公众宣传一种生产方式的工具，它对美国人改变生活的观念产生了影响。与美国的开国元勋富兰克林在其作品《穷理查》中所表现的殖民主义时期节约是一种美德的风尚不同，20年代的美国人认为，节俭可能对社会有害，消费才是一种美德。斯各特·菲茨杰拉德这样写道："我们穷得不能节俭了，节约是一种浪费"①。爱默生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曾这样说过，要让美国公众相信挣钱和花钱是一种美好的生活。20年代的美国人相信"缺少钱是惟一的罪过"，哥伦布环形办公大楼外的一幅巨大的霓虹灯广告——"当你30岁时，你应该有1万美元的财产；当你40岁时，应该有2.5万美元的财产；当你50岁时，应该是5万美元"②，明确地告诉人们应该为钱而奋斗。奢侈的生活和对金钱的追求成为了美国人的生活理想。

〔美国人日常生活的变化〕　　对于普通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在20年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其中包括了工作条件和待遇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提高、娱乐生活的丰富多彩和食品的多样化等。

工作条件和待遇的改善。据统计，在1923—1929年间美国人工资收入增长了11%，而与收入的增加相反的是工作时间的减少。1923年美国钢铁公司放弃了每天12小时的工作制度，让其所属的加里工厂实行每班8小时的工作制。而后1926年，福特公司又宣布实行每周5天工作的制度。除此之外，各企业的雇主们还纷纷开展了一场福利资本主义的计划，建造了干净整洁、光线充足的厂房，引进防止伤亡事故的设备，开设配有营养专家的自助餐馆，组织企业的合唱团和棒球队等。难怪林肯·斯蒂芬

①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98页。
② 约翰逊等：前引书，第715页。

斯，一个长期以来对美国的资本主义提出尖锐批评的人，会写道“在美国大企业正在创造出社会主义者作为他们奋斗目标的东西，即面向所有人的食品、住房和衣服。你将在胡佛政府时期看到这一切”①。

生活质量的提高。由于战后美国政府加大了在文教卫生方面的开支，使更多的美国人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也使美国人的身体健康有了进一步的提高。1928 年美国的政府教育开支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1900 年到 1931 年，一个美国人进入高中的机会从 1/10 上升到 1/7；进入大学的机会则从 1/33 上升到了 1/7;人的期望寿命由 1900 年的 49 岁延长到 1931 年的 59 岁，在此期间各类疾病的死亡率也大大降低。②

娱乐生活的丰富多彩。首先汽车的发展使美国人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大。过去骑自行车或驾马车，野餐只能到 5、6 英里远的地方去，而现在汽车使人们能够随时到几百英里以外的地方进行一次野餐，甚至还可以周游全国。电影业的发展，使电影院成为人们娱乐生活的主要去处。电影院每周的票房收入从 1922 年的 4000 万美元增加到 1930 年 1 亿美元。收音机的普及则使广播成为人们足不出户的最佳消遣。当时旧金山的一张报纸曾这样描写道：“在每个夜晚，每个地方的空气中都弥散着广播音乐，任何人能在家通过收音机听到，这种设备任何一个男孩都可以在一个小时内装配出来”③。另外，在 20 年代美国人生活中又多了一项新的重要内容即吸引了大量观众的体育运动。“网球俱乐部成倍地增长，商人们经过成百上千次的经验发现一个四次击球的高尔

①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 193、201 页。

②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 202 页。

③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就在昨天：20 世纪 20 年代的非官方历史》，哈珀和罗出版公司 1964 年，第 65 页。

夫球洞是进行商谈的最佳场所"[1]。1921年7月2日，美国泽西城汇集了91000名体育迷们，37000人花了100多万美元去看杰克·丹姆普塞与乔治·卡朋特的拳击赛。大学里的橄榄球比赛到20年代末吸引了很多的人，每年的门票收人可达2100多万美元。[2]

食品的多样化。运输条件的改善和储藏技术的提高，使美国人能够在寒冬吃到新鲜的水果和蔬菜——路易斯安那的樱桃、亚利桑那的西瓜、卡罗来纳的豌豆、亚拉巴马的玉米等等。罐头食品数量也在增加，1914—1929年间罐装果蔬增加了一倍，牛奶增加了两倍。"在很多城市家庭中，坐下来吃饭的第一道菜是罐装的汤，接着是罐装的肉类食品和蔬菜，最后是罐装的桃子"[3]。

〔投资热潮和股市泡沫〕　美国各企业在1922—1929年的大繁荣中，利润不断增长，净利润平均增长了76%；利润的增长又使这些公司在市场上的股票价格也随之上升，股东收益在此期间增长了108%[4]。更多的人开始把发行新股作为一种发大财的投机手段，不断向市场发行新的股票，套取更多的现金。1923年发行的新股总数达32亿美元，1927年100亿美元[5]。20年代美国企业的繁荣、社会生产的大幅提高等等，都保证了股票价值的上涨，但随着投机行为的出现和膨胀，股票的上涨从1925年起超过了其能够承受的范围。

日益繁荣的股票市场使今天买进的股票到明天一转手可以捞到一大笔钱，这使积累了相当资金的各家公司发现投资股票市场

---

① 艾伦：前引书，第66页。
②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95页。
③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81页。
④ 斯诺曼：前引书，第8页。
⑤ 布卢姆等：前引书，第342页。

要比生产投资能更快地赢利。他们逐渐地把钱交给股票经纪人，由他们把这些钱贷给那些需要更多资金进行股票买卖的人。“一种普遍高涨的情绪把越来越多的迷糊人拉进了投资市场中，股票经纪公司纷纷在各小城镇和大学校园附近开设分支机构，寡妇、工厂的工人、擦鞋匠和招待甚至那些并不十分渴望进入股市的人都冒险把他们的积蓄投入到股票中，以获取转眼可得的财富。这意味着每天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行情要比社会犯罪或国际事务更多地成为媒体报道的重点。大约有60多万个股票经纪的账号，估计超过150万人加入到了抵押交易中，而这足以培育出疯狂的投机行为”①。在这种新的被称为“抵押交易”的购买股票交易中，公司、经纪人和进入股市的主顾们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利益链，只要其中的一环出现问题，便会引起整个的危机。他们都想从股票上捞取一些好处，但没有一方是实实在在为股票增值而努力的。

投资变成了投机，泡沫被越吹越大，股市的繁荣在这种泡沫上危险地高涨。由于上述三方面的联合，使美国国内的资金在1927年以后，大量流向股票市场，促使证券市场上股票价格越来越偏离其实际价值，股指不断攀登新高，成交量不断放大。市值到1925年达到270亿美元，1929年又升至670亿美元；资本收益从1923年32亿美元上升到1927年100亿美元；成交量在1923年时为2.63亿股，到1927年放大到5.77亿股；国家的私人净债务额也从1920年1060亿美元增至1929年1620亿美元②。在看到股票上涨后，投资者并没有将股票套现出来，他们想赚更多的钱。同时，他们又因此以为自己已经确实拥有了这笔财富，所以便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不断买公司，掩盖了当时经济运行中购买

---

① 莫里森：前引书，第281页。

②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68页。

力不足的问题。

美国国内早在1926年就有人看到这种疯狂爆涨后面的危机了。1926年秋天，伯纳德·巴拉奇在给马克·沙利文的信中这样写道："毫无疑问，经济将达到它的发展顶点，我们在汽车、钢铁、铁路的报告中，所看到的是已经成为过去的繁荣的证明，而不是我们即将面临的未来……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来购买东西是一种明智的方法，它能很快促进经济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同时它也会被过度利用，而现在恐怕就已经过度了"①。但股市的泡沫继续在膨胀，1928年10月新股中的泡沫达到了51亿美元②。到了1929年，这种担忧更加多了。1929年3月，国际兑换银行主席保罗·华伯格警告说："如果继续放纵无节制的投资行为，使之继续发展的话，最后的崩溃不仅必定会影响投资者本身，而且会引起一场把整个国家都卷入其内的大萧条"③。1929年9月5日，罗杰·巴伯森就预言："一场危机即将来临，它可能是一场十分可怕的危机"，"道琼斯指数可能会下跌60到80点"④。然而所有的忠告都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狂热的投资者无法接受危机即将到来的预言，甚至当《纽约时报》的资深财经编辑亚历山大·挪伊斯预言不断上升的股票和经济的繁荣将会崩溃时，被人谴责为"试图玷污或停止美国的繁荣"。当10月来临的时候，经纪人的借贷达到了60亿美元的水平⑤。

在这场股市的投机中，共和党政府依然坚持了其自由放任的执政原则。自1921年以来，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贸易委员会的权

① 斯诺曼：前引书，第8页。
② 莫里森：前引书，第285页。
③ 斯诺曼：前引书，第8页。
④ 莫里森：前引书，第285页。
⑤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157页。

力被明显地削弱，它们所具有的对经济和金融的调节作用无法发挥。在关键时刻，美联储不能决定该做什么。尽管，1926 年 1 月商务部长胡佛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对分期付款消费的过度发展发出过警告，甚至还指责联邦储备系统的银根放松政策；但他没能说服柯立芝总统或梅隆部长接受他的观点，因为他们两个自己也陷入了投机活动中。据说，柯立芝总统曾以 32 美元一股的价格从内部购买了标准商标公司的股票 3000 股，当他退休时这种股票的市价已经涨到了 40 美元。1927 年联邦储备银行主席本杰明·斯特朗宣布贴现率从 4%降到 3.5%，联邦储备系统继续执行其放松银根的政策，对各地银行出现的投资坏账听之任之。世界上没有一个工业化国家的银行系统像美国这样不稳定、不负责任。一位作者这样写道，“银行为它的顾客们提供了除了汽车轮子以外的所有东西”。这是“一种新的不是由银行家组成的银行，看上去更像是证券推销商”[①]。银行的推动助长了股市的投机行为，也使银行内部的不良资产不断堆积。

过度膨胀的泡沫总有破灭的那一刻，1929 年夏天美国股市出现了波动，大规模的股市崩盘已经不远了。

〔1929 年股市的崩溃〕　尽管 1929 年初，为了防止坏账率的进一步提高，联邦储备委员会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不断施压下，同意向其下属银行发出警告：不应该再借款给投机活动。但经济运行中衰退的迹象仍然在夏天表现了出来：对拉动美国经济起了关键作用的建筑合同首先开始大量减少，全年住宅建设投资降到了 2.16 亿美元，比 1928 年减少了 10 多亿；国内商品的存货增加，从 1928 年的 5 亿美元上升到 1929 年的 18 亿美元；在消费速度方面，表现出了购买力的严重下降，1927 年到 1928 年曾经

---

①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 247 页。

增长7.4%的消费速度，在1928到1929年下降了1.5%[①]。对此，联邦政府没能采取迅速有效的防范行动，却在提高银行贴现率至6%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以美联储的阿道夫·米勒博士、摩根集团的鲁塞尔·拉夫因韦尔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认为应该提高贴现率，以使股市的膨胀速度放慢；而福斯特等扩张主义者则认为限制性政策可能引发通货紧缩，短期内提高利率可能会使真正的投资在投机之前放慢速度。胡佛总统则专注于农业和关税问题，未能及时做出反应。因此，当8月美联储最后同意6%的贴现率、采取强化紧缩银根的政策时，已经不能起到任何的调节、缓解作用。连续6年的股市上涨行情，使人们对政府这一举动未有任何注意，股指继续冲高，9月股票平均价格达到最高点。然而，危机也正在悄悄地到来。

9月，股指出现小幅下跌，但进入10月后投资者仍相信股指会有继续上升的势头。

10月23日，纽约证交所在收市前一小时出现意想不到的、戏剧性的变化，多方大量抛售股票，导致价格下跌，华尔街震荡，崩溃拉开序幕。

24日，“黑色星期四”，股票价值骤降到可怕的程度，几度出现不管多方以什么价格抛售股票都没有买家的局面。中午华尔街的大银行家紧急碰面磋商，决定每人出4000万美元联手干预，并一度恢复了股市的稳定。当天收盘时，交易量接近1300万股。

25日，为稳定市场，银行家、经济学家、财政部、白宫都发表声明，称最可怕的阶段已经过去。胡佛总统说：“这个国家基本产业也就是指商品的制造和分销是建立在一个成熟繁荣的基

---

①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157页。

础上的"[1]，希望人们放心。股票价格因此在周末得到了控制。但是，在歇市期间，银行家为了加强其自身抗拒更深危机的能力，把他们在23日所买进的股票悄悄地返还给市场。这就使经纪人不得不向那些借贷者追债。整个周末，人们心理上的恐惧在不断扩张。

28日，一开盘就爆发了新的震荡，一天内通用汽车的股票票面损失为20亿美元，股市在一种不祥的预感中收市。

29日，股市再次出现多方倾售的局面。经纪人，持股者以任何能够得到的价格抛售股票。中午交易量达到800万股，收盘时打破记录达1600万股。

尽管，报界在30日再度发表乐观的评论，看好股市的未来，但这只能是一些人最后的幻想。随后的几个星期，股指持续下跌。据估计，纽约证交所在这次股市的崩溃中，其上市股票的市值下跌了至少40%，损失达2600万美元[2]。

1929年纽约股票交易所12种股票价格

单位：(美元)

	最高价格	最低价格	缩水率%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	310.25	193.25	37.71
城市服务公司（Cities Service）	68.5	20	70.8
电力证券股票（Electric Bond & Share）	189	50	73.54
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	403	168.125	58.28
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	91.75	33.5	63.49
克鲁格—托尔公司（Kreuger & Toll）	46.375	21.125	5445
国家现金出纳机公司（National Cash Register）	148.75	59	60.34

①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158页。
②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159页。

（续表）

	最高价格	最低价格	缩水率%
美国收音机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n）	114.75	26	77.34
雷明顿—兰特公司（Remington Rand）	57.75	20.375	64.72
希尔·罗布克公司（Sears，Roebuck）	181	80	55.8
美国矿业冶金公司（United States Smelting，Refining & Mining）	72.875	29.875	59.01
美国钢铁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	261.75	150	42.69

（资料来源：《商业金融年鉴》（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1930年，转引自塞缪尔·莫理森：《牛津美国人民史》，第3卷，纽约，1972年，第286页。

股市的崩溃只是一种经济出现问题的信号。查尔斯·道威斯柯立芝政府时期的副总统，崩盘之后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对我来说，目前降临的灾难比美国任何其他时候更强烈地传达了一种信号"。但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仍然是少数。很多企业界人士也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特别的警告。对亨利·福特来说，"今天情况已经比昨天好转了"；纽约国民银行的副主席乔治·罗伯特则认为"并不存在什么大的经济失败，也没有出现的迹象，现在的各种情况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适合于永恒的繁荣"①。身为总统的胡佛，虽然意识到了这场股市危机背后所隐藏的购买力不足、农民和工人的收入低下、私人债务积聚、银行系统疲软等问题，但他的担忧并未促使他采取有效的行动；在对外借贷扩大、家庭分期付款消费增加、农业萧条等问题上，他的行动只是使情况更加恶化。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已经不可避免。

〔繁荣中的不平衡〕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也承受了一夜之间从繁荣的顶端跌入危机的深渊的

①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161、162页。

痛苦。痛定思痛，无论站在什么角度进行分析，最大的问题应该是潜藏在繁荣表象下面的严重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在《是繁荣、真相还是神话》一书中，经济学家斯都尔特·恰斯归纳了12种没有享受繁荣的人，即大西洋沿岸中部、中央东北部和太平洋沿岸各州的人们，农民，中产阶级中的大部分人（包括小业主、独立的店主、专业人士、批发商），失业者以及煤矿业、纺织业、制鞋业、皮革业、造船业、铁路设备业的从业者和大量破产的企业非熟练工人，这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了20年代美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不平衡现象。美国20年代的发展不平衡集中表现在收入的分配和产业发展两大方面。

繁荣中的不平衡首先体现在收入的分配问题上。统计表明，1923—1929年间，与企业利润增长62%、股权收益增加65%相对照，工人工资只上涨11%；1929年美国有71%的家庭年收入低于2500美元，3.6万个最富有家庭的收入相当于1200万户年收入低于1500美元的家庭的收入总和即42%的美国家庭收入①。1929年年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人口数量只占总人口的2.3%，但他们却拥有高达100亿的储蓄，占全部储蓄额的2/3。收入分配的不均，引起了贫富差距的拉大，再加上梅隆的税收政策强调减轻的是富翁的负担，而不是消费者，这就使大量资金积聚在少数几个人手中。因此，当机械化的流水线生产出大量商品投放到市场上时，缺乏足够的购买力来吸收这些产品。1923—1929年，工人每人每小时的产量增加了32%，但工资只涨了8%②，他们的收入水平使他们没有能力购买更多的东西，而那些有实力购买的人对产品的需求毕竟是有限的，这影响了经济运行中的现金合

---

①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93页。

② 小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67页。

理的流动。收入分配上的问题，使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间的距离日益扩大，但它被股市繁荣和分期付款盛行下虚假的购买所掩盖，而企业的高度集中化所引起的价格系统敏感度的降低，又使这一问题进一步为人们所忽视。

这种繁荣中的不平衡更明显地体现在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上。20年代农业的萧条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展，使农业生产完成了机械化，增加了产量，使美国能生产出足够的农产品满足国内市场和出口的需要。一战结束时，650万农民耕种着35000万英亩的土地，养活了5倍于其数量的人口[①]。但是，从1920年开始国外需求的急剧下降，政府政策的失误导致了1920—1935年的农业始终处在萧条中。战后原先因战争而被占用的耕地重新恢复了生产，使世界耕地增加，从1914—1930年世界耕地总面积增加了1亿英亩以上，各国提出了自给自足计划，这就使世界市场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缩小。面对农产品出口的日渐减少，历来信奉高关税政策的共和党政府，简单地认为只要提高美国农产品的进口关税，便可以保护国内市场不受国外产品的影响。但他们忽略了当时美国农产品面临的是如何在国内市场趋于饱和之后，开拓更大的国际市场（当时主要是欧洲市场）。而国际市场上，别人要买你的东西，首先他得有这个实力，手头要有美元才行。对经历了战争的破坏，尚处在恢复阶段的欧洲各国来说，获得美元的途径无非是要么在国际市场上抛售黄金换取美元，要么向美国人出口产品换取美元，要么直接向美国人借钱。抛售黄金会引起金融市场的震荡，向美国人借钱总不是长久之计，只有出售产品既能在短期内获得美元，又能促进战后的生产重建。然而，从哈定上台后，美国政府一直坚持着高关税的政

---

① 杜蒙德：前引书，第420页。

策，这无疑堵了欧洲人的路，也间接地砸了美国人自己的脚。从1914—1930年，输往欧洲的小麦从12000万蒲式耳降到了2000万，剩余产品的堆积，使国内市场上的价格下跌，小麦的国内价格从1.26美元降到0.47美元，棉花从每磅0.18美元降到0.05美元，生猪从0.11美元降到0.02美元①。农业收入因此减少。农产品价格的低迷影响了农民的购买力，使制造业产品的主要市场农村市场受到了影响。整个20年代，农民的购买商品所付的价格始终高于农产品的售出价格，付出的总比得到的多。除了农业的萧条以外，在20年代美国工业内部也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在《繁荣中的危机》一书中，洛希滕伯格把它们称为“病态的产业”。这其中包括煤炭业、皮毛业、纺织业等。

上述这种种不平衡，实质上都导致了同样的结果，即美国国内市场供需的失衡，这种失衡在自由放任的政府政策下被极度增强，以致最终大危机的爆发。1929年的股市崩溃和此后的经济大萧条成为了美国人心中永远无法忘记的痛苦回忆。

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社会运动

与美国经济的繁荣相对应的是，美国的社会运动在这一阶段此起彼伏。小阿瑟·施莱辛格在《美国史的危机》中，用周期发展的理论阐释了美国的历史，认为在这种发展中全国范围出现了公共目标和个人利益之间的持续转换，并每隔20—30年出现一个社会改革的时期，而后接着就是紧缩和一心追逐私人目标的时期，而20年代的美国社会就是处在后一个阶段，是改革力量和

① 杜蒙德：前引书，第426页。

进步时代对紧缩和私人利益的让步，是一个剧变的时期[①]。当时的美国社会虽然仍可以看到进步主义运动留下来的痕迹，但战争所引起的各方面的变化使保守主义占了优势地位，在这两种力量的碰撞中，整个社会呈现出各种运动交错的复杂状态。

〔“疲惫的进步运动”〕　尽管共和党在20年代上台执政时，恢复了保守主义的政策原则，放弃了很多进步主义时期的政策，但进步运动的力量仍然存在于美国社会中。这一时期的进步运动已经显得支离破碎，风光不再了，洛希滕伯格称之为“疲惫的进步运动”。

进步派在20年代的衰弱，并不因其数量减少，而主要是其内部的分裂所造成的。由于在战争问题上的分歧，罗斯福、威尔逊、拉福莱特、布赖恩、德布斯这些进步主义的领袖和他们的追随者们各自纠结、相互争斗。早已从威尔逊内阁辞职的布赖恩成了公开发表言论反对威尔逊的人；罗斯福的支持者们愤怒而轻蔑地把威尔逊和拉福莱特看成进步运动的叛徒，罗斯福本人还指责拉福莱特是“我们门内的破坏者”和“美国民主的罪恶最深的敌人”；德布斯则早被威尔逊关进了联邦监狱里，并把威尔逊嘲笑成是“世界上最值得同情的人”。[②]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进步主义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的力量在20年代走向了衰弱，但在当时国会内他们仍作为一种平衡力量，联合起来控制、影响着国会，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反对保守的共和党政府。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甚至能使国会通过他们自己的法案，如1920年的艾什—卡明斯法案和水力法。而1921—

---

① 埃里克·方纳编：《新美国历史》，齐文颖、林江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②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21页。

1925年间，参议员乔治·诺里斯的作为更是体现了这一点。他几乎一个人通过其精湛的政治手段，在国会立法上阻止了哈定和柯立芝政府想把位于田纳西河谷马瑟肖尔斯的电站转给私人利益集团的企图。1928年，诺里斯获得了足够的国会支持反对私人管理公用事业公司。国会两次通过了关于设立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的法案，但都被总统否决了。

1924年的总统竞选中出现的拉福莱特运动可以被看成是进步派力量在20年代的一次反弹。由于1920—1921年间出现的短暂经济危机，在1922年的国会选举中失望的农民把几个进步派选进了国会中。在艾奥瓦，愤怒的农民把史密斯·布鲁克哈特选进了参议院；在威斯康星，拉福莱特以30万的选票重返国会；明尼苏达、北达科他和蒙大拿州也分别选出了他们的进步派代表。在此基础上，他们于1924年7月4日，举行了大会，推举拉福莱特作为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拉福莱特在竞选中指出，"独立宣言中所宣布的、并被杰斐逊和林肯所坚持和捍卫的平等的机会是留给每一个美国人的财产，而这已经被少数人的特权所替代，被他们从多数人的政府手中抢了过去"[1]，并由此提出了征收高额遗产税、铁路国有化、废除童工等进步主义的竞选纲领。然而由于经费的明显不足，他仅有柯立芝4/10的经费，最后他只获得了482.3万张选票。拉福莱特运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它证明了当时进步派的依然存在。

令进步主义者庆幸的是，20年代出台的很多政策正是他们在战前所努力追求的，如妇女的选举权、禁酒和限制移民等等。"当1924年参议院通过限制移民法时，没有一个进步派对此表示

---

① 华特·约翰逊等：前引书，第686页。

反对，甚至连乔治·诺里斯这样的人也投了赞成票。”[①]

〔*劳工运动的低潮和美国共产党的成立*〕　1928年当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工会领导人来到美国时，他惊讶地发现当时美国劳工运动几近瘫痪的状况，轻蔑地称之为“磕头工会主义”。他观察到“劳工组织只存在于雇主们的容忍范围内……它并没有真正参与到产业条件的决定中”，更令他震惊的是劳工缺少统一性，“工会主义在美国并不是一种政治信仰，也不是一种社会运动”，每个行业的劳工都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没有时间去考虑别的。[②]

正如上面所描述的，美国的劳工运动在经历了“骚动的1919年”之后，在整个20年代都处在低潮时期，劳联的成员从1920年顶峰时期的500万骤降到1923年360万[③]。工会组织的软弱和发展的停滞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当时的杂志中充满了类似“劳工组织的崩溃”、“在美国有组织劳工的衰弱”和“美国劳联的暮日”等为题的文章[④]。正如1929年8月，《斯克里普斯—赫沃德报》的一篇名为“美国劳联在哪里?”的文章中所论述的，“事实是美国劳联在其领导者的位置上可怜地失败了，它的弱点一年比一年明显”[⑤]。另一方面，随着机械化生产的普及，传统的手工工艺在生产中的作用大大下降，过去的行业工会也已经不再适合新的经济发展趋势了。工会作为劳工运动最重要的组织者已经丧失了它的团结、组织工人的作用。劳工对工会组织失去了

---

①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27页。

② 欧文·伯恩斯坦：《贫乏的年代：1920—1933年美国工人史》，霍顿·米夫林公司1960年，第83页。

③ 伯纳德·贝林等：《伟大的共和国》，前引书，第765页。

④ 伯恩斯坦：前引书，第83页。

⑤ 伯恩斯坦：前引书，第83、84页。

信心，亨利·华莱士曾这样说过，“农民们从劳工领袖那里所忍受的损失要比从工业或财政领袖那里多”[①]。1923年一年中，美国劳联就丧失了26.9万个会员[②]。原因之二是复杂的劳工结构使他们很难团结起来。一次大战后从东南欧大量迁入的移民和离开南部农场的黑人增加了工人结构的复杂性，种族和民族成为最突出的问题，各种劳工力量因此难以团结起来，削弱了斗争的力量。其他诸如雇主采取了福利资本主义或直接破坏工人组织、法院对劳工案件的态度等也是影响20年代美国劳工运动进入低潮的原因。1920年美国参加工会人数为5047800人，而到1929年仅为3442600人，到1930年所有工人中参加工会的人数仅占10.2%，与1920年的19.4%相比大大降低了[③]。与此同时，工人罢工的次数和人数也减少。

整个20年代，惟一值得庆祝的可能就只有美国共产党的成立。1919年8月31日和9月1日，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和美国共产党分别成立。1920年5月两党合并成为美国统一共产党，但由于原共产党内部就合并出现了分裂，经过共产国际多次干涉调停后，才于1921年5月举行两党合并成美国共产党的大会。同时，1921年1月美国工人党宣告成立，1923年4月美国共产党合并工人党。1920年12月，美国共产党发表了《美国共产党宣言》，宣言把消灭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强调不与劳工党、社会党等怀疑革命的阶级战争的团体或党派共事。这些主张无疑把他们同社会其他的劳工力量对立了起来，不利于其在经历过“红色恐怖”后的美国的发展、壮大，20年代美国共产

---

①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29页。

② 杜蒙德：前引书，第360页。

③ 伯恩斯坦：前引书，第84页。

党并不成功的发展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结果。

〔限制移民的运动和政策〕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但是从19世纪80年代的排华开始，这个移民国家开始有选择地接受新的到来者。1917年，国会通过了移民入境的识字测验的规定，使相当数量的移民被排除在美国之外。一战以后，随着欧洲和平的实现，美国人开始担心会有大量的移民涌入。他们有的害怕大量从东南欧迁入的移民中有共产主义分子。战后初期出现的红色恐惧和劳工运动的高涨使他们对共产主义运动充满了恐惧，害怕会有劳工运动的领袖随着新移民一起迁入，从而引起美国劳工的不稳定。还有人认为当时美国经济和机械化的高度发展，以使它不再需要更多的移民和劳工了。据统计，从1920年到1929年机械性失业超过了650000人[①]。但最关键的是美国人担心，这些主要来自东南欧的移民会对美国的社会产生威胁。纽约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亨利·普莱特·费尔乔把美国的社会比作一棵树，当外部哪怕很小的敌对力量进入这棵树时，都会引起这棵树的生存。对于美国的社会来说，"一场能够被同化的移民运动是可以被忍受的"，而"不被同化的结果将是民族特性的毁灭"，当时的移民是一群无法同化的完全相异的部分，他们正"慢慢地、狡猾地、无法抑制地吞噬掉美国最核心的部分"[②]。1923年柯立芝总统也表示"美国制度完全是建立在好公民的品质之上的。这种制度是拥有自治历史的人民创立起来的。我们应当把新到来的人数限制在我们吸收他们参加好公民队伍的能力范围以内。我们必须使美国成为美国人的美国。为此目的，

① 约翰逊等：前引书，第709页。

② 马歇尔等：前引书，第84页。

必须继续推行限制移民的政策"[1]。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社会心理，政府采取了限制移民的政策。这种限制主要是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的。

第一，直接的移民法案。20年代，美国政府先后在1921、1924和1929年三次颁布移民法，对新移民的人数加以控制。1921年移民法把准许入境的移民总数限制在1910年美国人口统计各民族人数的3%以内，大约为358000个名额，其中200000个是分给北欧国家的，155000个属于东南欧，但其中由于担心黑手党势力的入侵和大量犹太人及可能的赤色分子的进入，对西西里人和东欧移民往往持怀疑的态度。因此，1924年又对移民法进行了修改，把定额改为不得超过1890年时人口总数的2%，每个国家的最低限额为100，每月允许进入的移民不超过全年限额的10%。1929年再次压缩限额，固定每年的总数为150000，其中北欧132000个，东南欧和亚洲共20000个[2]。

第二，移民签证制度。从1924年起，美国规定入境者必须要持有签证。这意味着每一个想要移民的人必须首先在所在国定额的范围内提出获准入境的申请，同时要通过文化测试，符合与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无关、没有可能成为公众的负担等条件。整个过程需要很多的文件，花费许多时间，而且会常常被拒签，只有那些十分坚定的人才会坚持到最后。

这种限制移民的政策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非英语的媒体在数量和影响方面都不如从前；城市里那些曾聚集了新来的移民寻找朋友和工作的所谓的贫民窟渐渐地衰弱了，但南部黑人和波多黎各人来到北方城市开辟了新的贫民窟；廉价移民劳动力的

---

① 杜蒙德：前引书，第406页。

② 莫里森：前引书，第235页。

减少使在美国每周的工资从1914年10.73美元升到了1926年的13.14美元"[1]。但另一方面，当时包括华人在内的少数族裔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到了很大限制，甚至因人为原因造成了很多悲剧。萨柯、万泽蒂案件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个无辜的人在经过了长达7年监禁后，仍被处以死刑，而直到50年以后才得以昭雪。尼古拉·萨柯和巴托罗美奥·万泽蒂是意大利的移民。1920年，他们被指控在马萨诸塞州谋杀了一个出纳员，尽管他们不懈地为自己的清白而辩护，但1927年8月22日，他们仍被判处死刑。正如万泽蒂在法庭上的最后申诉说的，"我正在遭受着迫害，因为我是一个激进主义分子，而我确实是一个激进主义分子；我已经遭受了迫害，因为我是一个意大利人，而我确实是一个意大利人"[2]，他们的冤案中包含了司法人员对少数族裔的歧视。

〔原教旨主义运动与布赖恩—斯科普斯案〕　当20年代的美国沉浸在机械文明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的时候，在农村出现了一股反对科学的力量，也就是所谓的"原教旨主义"。这一运动是从1910年两名狂热的浸礼会教徒出版了一系列名为《原教旨》的小册子开始，主要由农村的卫理公会教和浸会教的教徒组成。他们因为看到机械文明所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把科学看成是一种神秘的威胁力量，所以主张《圣经》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绝对正确的。20年代，这些人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上，禁止在学校里将进化论作为真理进行教授；1924年1月，北卡罗来纳州教育部门提出禁止在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并积极把宣传否定上帝创造世界的理论变为非法。正如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所说的那样，"我们的目的，我们

① 莫里森：前引书，第235页。
② 马歇尔：前引书，第87页。

惟一的目的就是支持那些家长们捍卫他们孩子的信仰，使之不受在科学的名义下的种种对超自然信仰的破坏”①。他们在南部和西南部各州展开运动，1923年5月佛罗里达州议会通过决议，称达尔文主义、无神论和不可知论不能也不应在该州公立学校里讲授任何形式的确认人类由低等动物演变而来的进化论；1925年10月，得克萨斯州当局命令删去该州公立学校采用的教科书中关于进化论的全部内容。

社会上的自由主义的力量对此展开了斗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25年发生在田纳西州代顿的“猴子审讯案”。该州年轻的生物教师约翰·托马斯·斯科普斯因为在课堂上讲授进化论而被捕受到起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为他提供了一支杰出的律师队伍，其中包括了著名的改革运动者、刑事案件律师克拉伦斯·达罗，另外还带来由15人组成的专家队伍作为证人。布赖恩则作为原教旨主义的代表，协助起诉。代顿小镇因此而热闹非凡，法庭的每次审理都挤满了旁听的人，以致好几次不得不临时延期。世界各地的报纸也对此进行了报道，其中一部分还通过广播传播。在审讯过程中，由于法庭拒不承认专家关于达尔文理论正确性的证词，双方的唇枪舌战往往是类似下面的问答中进行着。

达罗：布赖恩先生，你相信第一个女人是夏娃吗？

布赖恩：是的。

达罗：你相信她是由亚当身上的一根肋骨变的吗？

布赖恩：是的。

达罗：你是否发现过该隐（亚当和夏娃的长子）是在哪里得到他的妻子的？

布赖恩：没有，先生，我留给不可知论者来寻找她。

---

① 马歇尔：前引书，第78页。

达罗：圣经上说他找到了一个，是吗？当时地球上有其他的人吗？

布赖恩：我不知道。

达罗：你不知道，这有没有引起过你的思考？

布赖恩：从来没有困绕过我。

……①

布赖恩经不住达罗的连番诘问，他的回答后来常常引来听众的哄笑，他的追随者们开始怀疑他的主张了。最后的结果并不怎么令人满意，尽管田纳西州最高法院撤销了对斯科普斯的罚款，但仍然维护了有罪的判决和反进化论的法律。布赖恩在审判后不久便因疲劳和暴食而死。而斯科普斯则获得了奖学金进入芝加哥大学，在那里他成为一名地质学家，尽管他输了官司，但他仍是一个获胜者。原教旨主义运动的高潮也随之过去，在北卡罗来纳、佐治亚、肯塔基、佛罗里达等州纷纷拒绝通过反进化论的法案。

〔禁而不止的禁酒运动〕　作为进步运动的一部分，从19世纪末开始的禁酒运动，一战时期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到1917年，共有27个州实现了禁酒，1916—1919年间全国酒类消费达到了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②。战后，由于禁酒州抱怨邻近的非禁酒州影响了其辖内的禁酒运动；更多的家庭主妇们希望他们的丈夫能把工资全部带回家，而不是把一半用在和一群年轻人在酒廊喝酒上；酒类制造业被证明是引起政治腐败的重要诱因且和嫖娼、赌博及其他恶习联系在一起；企业主们希望通过禁酒来消除工人在每周一的旷工率等等这些因素，促使禁酒运

① 马歇尔：前引书，第81页。

② 莫里森：前引书，第237页。

动发展成为联邦政府的立法行为。1919年1月16日，宪法第18条修正案被批准，并于1920年起开始正式执行。根据该项修正案，联邦政府将“禁止在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一切领土内酿造、出售和运送作为饮料的致醉酒类；禁止此类酒输入或输出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一切领土”。然而，整个20年代禁酒运动的开展并不成功，出现了禁而不止的情况，更为严重的是禁酒本身引发出了种种社会问题，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

在全国性禁酒开始后不久，一种新的职业私酒业开始代替公开酒馆的出现。由于这一行业满足了相当一部分渴望饮酒的人需要，尽管联邦政府在整个20年代以反禁酒法逮捕了50万人，进行了30万次起诉①，但地下酿制和走私酒类的行为依然有增无减。在加拿大和墨西哥边境上，走私酒类的活动十分猖獗。“小船很容易地从古巴把大量酒类运到佛罗里达和海湾各州；山地烈酒走私者成倍地增加；加利福尼亚和纽约州内有求必应的葡萄园里提供了一桶桶的葡萄汁，只要花一点时间，放一点蛋糕酵母进去，便可以把它变成无与伦比的人间甘露；一车车的葡萄运到了意大利和希腊裔的美国人那里，然后用传统的制酒机榨出汁液并进行发酵。从缅因州到迈阿密，在离每个港口三英里限制以外的海上航行着一队装着各种酒类的海洋运输船队。由摩托艇把这些货物送上岸，它们速度之快使海岸警卫队或禁酒局无法抓到他。然后这些货物被转运到私酒者的车里，这些车子常常会遭到其他罪犯的抢劫，不管发生什么，这些高度酒将被用水稀释了之后出售。”② 对普通的城市居民来说，当时要想喝点酒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几乎每个城市家庭都会光顾当地的私酒店，甚至在一些

① 莫里森：前引书，第236页。
② 莫里森：前引书，第238页。

州花上10美元就可以在杂货店的货架上得到一瓶美国的杜松子酒。那些被以医疗目的而公开进口的酒类能很容易地在健康人的胃里找到。

禁酒运动还引起了其他的社会问题和变化。大学生在禁酒之前习惯于围坐在一起，喝着一小桶啤酒，唱着“达特摩斯—斯泰因之歌”，而现在则在澡盆里喝杜松子酒。由于宪法第19条修正案而获平等公民权的妇女们则和丈夫们一起违反禁令，帮着他们把过去从酒馆里省下的钱用在喝酒上。社会犯罪也因此而增加。有组织的犯罪在禁酒中产生。芝加哥的艾尔·卡彭是当时最出名的黑社会头子。他不仅在芝加哥开设了酒店、赌场、妓院和毒品馆，而且拥有一支约1000名左右的私人军队，专门从事各类非法活动。他们的活动得到了私酒者的资助，并很快发展了一套自己的遍及中西部地区的酒类生产和销售体系。1926—1927年在芝加哥发生的130起谋杀案中，大部分是他们干的。1929年，卡彭帮与以乔治·墨里为首的黑帮间发生了最大的一起帮派斗殴事件。对于其杀人等行为，卡彭并不认为是犯罪，“不错，我们是杀了一些人，但让我告诉你，他们都是非常坏的人”①。尽管卡彭帮干了很多违法的事，但由于他们每日向高级政府官员支付报酬，因此他们中没有一个被判罪的。

禁酒运动还对美国的党派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民主党内在禁酒问题上产生了明显的分歧。南部选区因禁酒有利于保证黑人的秩序而绝对地支持禁酒；而北方城市里充满了爱尔兰裔、德裔、意大利裔的美国人，他们是坚定地反禁酒主义者。由此引起的党派内部的矛盾影响了民主党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使之在整个20年代都处在下风。1924年民主党内在总统候选人问题上出现

---

① 麦克唐纳：前引书，第204页。

了两派的对立，详细情况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共和党在禁酒问题上相对比较一致，都支持这个被胡佛总统称为“动机高尚、目标远大的实验”[1]，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地区和中产阶级在党内最为强大。

这场禁而不止的禁酒运动，由于它所引起的种种社会问题和越来越多的人的不满，最终以1933年第21条宪法修正案废除禁酒法而宣告结束。

〔新三K党的猖獗〕　新三K党的出现与猖獗是20年代的美国出现的又一个危害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在农村社会中。这个组织创立于1915年感恩节的晚上，由前世俗传道士威廉·西蒙斯在佐治亚的亚特兰大的石山上燃烧的十字架下建立，其名称和统一的白色长袍源自重建时期南部的老三K党组织。这个组织的基本信条就是强调宗教和种族上的纯净，因此他们反对天主教、反对犹太人、反对教育不多的下层中产阶级老移民的后代。它影响最大的地区是西南部、中西部和远西部地区，主要在得克萨斯、俄克拉何马、阿肯色、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印第安纳、俄亥俄等州。这些地方的人们对外来移民侵占的担心远超过对黑人。但一开始，这个组织的发展并不迅速，到1920年其成员总共不到5000人[2]。

20世纪20年代，由于人们普遍存在着对移民、共产主义等的恐惧，为三K党的盛行创造了机会。与此同时，三K党内部也进行了调整。1920年，两名职业资金征募者爱德华·克拉克和伊丽莎白·泰勒夫人在三K党内找到了一条发财的道路，每个符合要求的人只要交10美元的入会费便可以成为三K党的成员，

① 莫里森：前引书，第239页。
②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210页。

这些钱的60%将上交给各州和全国的总部，剩下的40%归介绍人会的成员。这种奖励机制大大促进了新成员的发展，仅1920年一年就发展了10万新成员[①]。1922年，得克萨斯州的牙医海勒姆·伊万斯继任帝国术师，把三K党组织渗透到了西南部各州的政治中。三K党组织因此在20年代进入了最猖狂的时期。公开宣称自己是三K党的人当上了印第安纳、俄勒冈和亚拉巴马三个州的州长，三名成员进入了美国的参议院。根据《纽约世界》的报道，到1923年三K党控制了印第安纳、路易斯安那、俄亥俄、俄克拉何马、俄勒冈和得克萨斯政府，在亚拉巴马、阿肯色、佛罗里达、佐治亚、密苏里和堪萨斯与其他政治力量势均力敌，在纽约、伊利诺伊和加利福尼亚也有相当的力量[②]。除此之外，三K党还积极参与到党派政治中，1924年帮助麦卡杜参加民主党的提名竞选，1928年又发起反对民主党候选人史密斯的运动。这个组织达到了发展的顶峰，到1925年共有成员500万左右，曾一度出现每周成员增加约10万的疯狂状态[③]。

三K党采取的是鞭打、绑架、烧十字架、纵火、暗杀等恐怖手段。1921年佐治亚州的一黑人被三K党以谋杀一名白人妇女而处死，当时的情况是："这个黑人被带到了一个小丛林里，大约有500多人围在那里，每个人都穿着三K党的白色长袍，堆得有10英尺高的金字塔的树桩上绕了一个绳子。这个黑人被绑在了树桩上，并被问到是否还有什么要说的。这个被阉割、处在难以名状痛苦中的黑人要了一支烟，点燃了，对着这些令他痛苦的人的脸吹了一口烟。柴堆被点燃了。当这个黑人被焚烧时，许

① 林克、卡顿著：前引书，第339页。
② 麦克唐纳：前引书，第211页。
③ 杜蒙德：前引书，第376页。

多的男女老少还有他们的祖母们都一起围在边上跳舞。那天晚上，在附近的粮仓里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舞会。以对此表示庆祝。许多附近城市的人也开车前来参加这个庆祝事件。”[①]

三K党的种种暴行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在得克萨斯，担任了24年参议员的查尔斯·库伯森在1922年击败了一个受三K党支持的候选人；在俄克拉何马，州长沃顿号召所有该州的公民加入军事服务机构，宣布了一项试图消灭这个组织的军事立法，但后来他本人遭到三K党控制的议会的弹劾。三K党组织很快因为其自身的原因而开始衰弱。1924年印第安纳州的三K党领袖戴维·斯蒂芬森由于绑架、强奸并残忍地杀害了一名年轻的妇女而被起诉，并被判故意杀人罪。这使很多人开始认识到三K党腐败龌龊，这个组织的影响因此下降。同时，许多政客们从这件事中找回了与三K党作战的勇气，对该组织的领袖依法提起公诉。到1927年，三K党的政治力量已经被粉碎。20年代末，其人数大大减少到只有10万人左右。

〔女性的进一步解放〕　“新女性形象”是20年代美国女性解放运动的最突出的表现。她们放弃了掩盖颈项、手臂和脚踝的传统服饰，卷起了袜子、缩短了裙子的长度，1927年出现了及膝裙。她们还剪短了头发，有的开始吸烟、喝酒，享受与男性一样的消遣。传统的温顺、贤惠的淑女形象被干练、开朗，甚至有些放荡的新女性形象所代替。而在这一转变的背后，包含了当时妇女在政治、经济和观念上的解放。

1920年8月18日，宪法第19条修正案获得批准。根据这项法案，美国的妇女拥有了和男性一样平等的选举权。在经过了长期的斗争之后，妇女终于享受到了政治上的平等。从此成百万的

① 斯诺曼：前引书，第28页。

妇女参加了选举，有的被选担任了政府公职。在20年代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两个女州长和一个女国会议员。她们是1922年进入美国参议院的丽贝卡·费尔顿夫人以及分别于1924年和1925年出任怀俄明和得克萨斯州州长的内莉·罗斯夫人和米里亚姆·弗格森夫人。尽管这三个人担任公职的时间并不长，但她们开创了女性参政的先河，从而为20年代美国女性解放运动增添了重要的一笔。

政治上获得平等的同时，20年代的女性在经济上也获得了更多的机会。战后，虽然在工资待遇方面还存在对妇女的歧视，但妇女所能从事的职业范围得到了很大的扩展。当时的妇女可以“驾驶飞机、捕捞海狸、开出租车、架设电报线路、从事深水潜水员和高空作业修建工的工作，可以在丛林里狩猎老虎；当有的妇女们从事在港口装卸货物的工作时，另有一些妇女则指挥着交响乐队、参加棒球队、开凿油井”，到1930年有1000多万的妇女从事各种工作①。妇女们因此而更加独立，单身女性搬进了她们自己的公寓；已婚的女性大多仍在工作，由于离开了家庭，她们获得了更多行动和选择的自由。社会为妇女从家务中解放出来提供了方便，罐头食品和熟食店不断增多，1914—1924年面包产量增长了60%，洗衣店的使用率增加了57%②。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在1924年出版的《家的制造者》中所表现的整个过程，无非就是为了推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一个失败了的母亲却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而她的丈夫，一个事业上失败的人则呆在家里，成为了一个成功的父亲”③。

---

①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59页。

②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前引书，第80页。

③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61页。

除了上述妇女在政治和经济上地位的提高之外，20年代妇女更大的解放在于观念上的解放。这场所谓的性道德的革命则是弗洛伊德等人潜意识理论、性心理分析理论在美国传播的结果。早在1910年前后，弗洛伊德等人的理论便开始在美国传播，但直到一战结束后，他们的理论经过翻译、通俗化才开始渗透到美国人的思想中。年长女伴的保护等习俗消失了，训练代替了保护，女孩子开始被认为有足够的能力保护自己，男女之间有了更多的自由一起工作、游玩。更重要的是未婚妈妈们不再被逐出家门或成为社会排挤的对象了。女性不再需要从一而终，可以不必再忍受痛苦的婚姻了，男性在婚姻家庭中的优势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离婚率在当时不断上升。1914年美国的离婚率第一次突破了10万对，而到1929年仅当年一年的离婚率就超过了20.5万对①。

综上所述，回眸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了变化的、新奇的时代。有些美国学者把这10年看成是新秩序出现之前必须经历的旧秩序危机全面爆发的年代。持这种观点的人可能是因为1929年以后出现了可怕的大危机。但是，危机爆发的本身是为了调整失衡的经济，解决经济高速发展中的潜在问题。20年代，在政治上美国处在以党派为主导的弱势总统的时期；在经济上，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来说，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种种的问题被繁荣所掩盖；在社会层面上，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普遍的改善，但改善最多的却是极少数的有钱人，对普通人来说同样存在着失业的威胁与生存的压力，因此各种社会运动仍然存在。

---

①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62页。

第 九 章

20 年代美国的对外政策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外交所表现出的是美国人对其实用主义理论的淋漓尽致地运用和发挥，无论是孤立主义还是扩张主义，在制定外交政策中最根本的就是满足美国的需要，一切的外交举措都要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所以，在 20 年代的美国外交舞台上出现了“在远东主动干涉和在欧洲被动孤立”的局面。

一、20 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

20 年代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仅和其他阶段一样，受到了当时美国所处的各种国内外环境的影响，而且在其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还受到了不同思想观点的影响，从而出现了徘徊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局面。

〔20 年代的国内外环境〕　由于美国人的这种实用主义精神，因此 20 年代美国的外交与其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而言，20 年代对美国外交决策产生影响的主要有两点，即美国自身实力的增强和国际格局的重组。

20 年代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大收获的年代，在这 10 年中，

美国人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所取得的成果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制造业内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近63%，汽车拥有量从1919年的750万辆增加到1929年的2650万辆，公路长度从1919年的35万米延伸到1929年327.2万米。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因此上升。到1929年，美国生产了世界煤产量的40%、70%的原油、1/3的发电量、1/2的钢铁和几乎所有的天然气[①]。战争使世界经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1914年美国尚还是一个债务国，美国人欠的外债达到30亿美元，而到1919年美国摇身成为了债权国，拥有近30亿美元的对外投资，并有100多亿的外债[②]。

与美国这种实力不断增强相同步的是国际格局的重组。由于各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发展速度不同，世界列强改变了旧的座次，旧的世界格局已经不再适应新的变化。从本世纪初开始，各国特别是那些后起的国家都要求按实力和资本重新瓜分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而爆发。战后，在凡尔赛条约的基础上，世界牌局被重洗。欧洲各国由于战争的破坏，无论是英、法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刚刚崛起的德意志等后起之秀，都在这场战争中大伤元气。战后在修复创伤的同时，英国想继续保持过去的优势，尤其是庞大的海军力量，并对欧洲大陆的老大虎视耽耽；法国和德国都想成为欧陆的控制者，都想削弱对方的力量；在一战中推翻了沙皇政权的苏俄（后为苏联）则希望保住其革命成果，抵制外部的干涉，努力创造良好的国际生存环境，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验。而美国不仅本土丝毫未受战火破坏，而且利用战争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大发战争财。到

---

① 约翰·依尔·海因斯：《柯立芝和柯立芝时代》，国会图书馆，1998年，第192页。

② 威廉·E·洛希滕伯格：《繁荣中的危机：1914—1932》，前引书，第108页。

1929年，美国的国民收入超过了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日本以及其他17个国家的总和，走出了300年来对英国资本的依赖。纽约取代了伦敦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美国成为了西方世界的财经中心。在亚太地区，日本也从一战中获得了利益，而其日益壮大的实力，使之并不满足于此，其野心越来越大，大有赶超欧美之势。

一战改变了美国、改变了世界，但是此时的美国与二战以后的美国又是不同的，如果说二战以后美国已经可以公然以自由世界的领袖自称的话，那么20年代美国在国际外交的舞台上还只是初露锋芒，它当时的实力还不足以支撑它世界领袖的头衔。面对上述的国内外环境，20年代对美国来说就是要稳固其在一次大战中所取得利益并抓住一切机会尽力扩大。这种利益包括经济上的、政治上等的不同方面。对于欧洲，它希望拉大相互间的经济差距，不让一个强者在欧洲出现；对于新建立的社会主义苏联，它充满了敌意，因为它的出现不仅在欧洲和远东太平洋地区影响了美国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且在意识形态上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对于野心勃勃的日本，它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既想把这个小小的岛国作为其亚太战略的一个棋子，又害怕虎崽养大了之后反咬它一口。这些现实的原因决定了美国外交政策中一招一式的套路。

〔20年代美国外交决策的原则〕　无论美国在具体的外交事务中都采取了怎样的套路，在其制定的过程中无一不体现了美国人实用主义的精神，20年代美国的外交政策始终坚持了三个主要原则。

第一，坚持对国际事务的有限介入。无论是在对待国联问题还是战争债务和关税等问题上，美国人都坚持了有限介入的原则。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与一战后孤立主义在美国国内的复

兴有关。

对于传统的孤立主义，美国人是这样定义的：这是“一种只顾自己、不顾别国问题和事务的政策，是一种对条约、同盟、贸易、文化交流和其他国际政治、社会和经济关系普遍弃权或最低限度的卷入的政策”[①]。自美国建国以来，它就一直在决定美国外交政策中起重要作用。从华盛顿时期的中立政策到后来的门罗主义，都反映出美国人中存在着凭借美国所处的有利地理位置超脱于国际事务之外的思想。如果说这种孤立主义传统的出现是因为建国之初新生的美国的弱小，那么随着美国实力的增强，扩张主义的出现便是一种必然。而在20年代，当美国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时候，这种思潮的再次复兴，除了能说明威尔逊政府战时外交政策在国内的失败之外（在一战中，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威尔逊对国内政策进行的调整引起了中西部农民和城市里劳工的不满；人们都把战后初期出现的失业、通货膨胀等归咎于威尔逊，认为如果美国不卷入战争，就不会出现如此局面），更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孤立主义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已经成为了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之一。一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新闻记者弗兰克·西蒙兹曾这样写道：20年代的人们“回到了他们所惯用的方法和他们所熟悉的观念中……这种回归与其说是一种理性思考的结果，不如说是一种固有的本能……”[②]。因此，战后传统孤立主义的复兴是很自然的。

但是，孤立主义的复兴并不意味着完全地置身于国际事务之外。参议员威廉·博拉和时任《先驱报》编辑的阿瑟·范登堡是孤立主义复兴的领袖。博拉常说美国要时常做好履行其对人类义务

① 富里斯特·麦克唐纳：前引书，第178页。

② 杜勒斯：前引书，第146页。

的准备，同时他更强调这个国家应该独立的行动，不需要在任何其他国家的命令下或经过它们的同意。阿瑟也同样相信美国人应该充分地扮演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但要严格坚持维护国家绝对不受任何束缚的自我决定的权利。① 胡佛总统的国务卿亨利·史汀生认为在国内应该由较富裕的、较明智的公民来管理事务，而在国际上也是如此，美国便是国际社会的精英，要对国际事务进行管理。② 由此可见，20年代的孤立主义与传统相比，更侧重于对国际事务的有限度地参与，不是完全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而是强调在国际事务中独立自由的行动。因此，这种孤立主义便产生出了一种对别国的不信任，鼓励了国家主义的行为，高关税、限制移民和坚持战争赔款等政策便是很好的反映。

第二，高举和平的旗帜。"战争留给成百万美国人的是一个不再战斗的决定；在我们的历史上从没有任何时候比在两次战争期间所盛行的和平主义更强。"战后，美国人都竭力想忘记这场战争，在有些人看来美国的参战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错误③。因此，在当时出现了一个由各类爱好和平的团体共同组织的松散的和平运动，其中包括世界和平基金会、外交政策协会、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外交关系委员会、非党派民族领袖协会、卡内基国际和平捐赠基金、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太平洋关系研究会等。在这一运动的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受过教育的精英。他们深信，"世界正在发展成为一个由国家组成的有组织的整体，抛下过去狭隘的民族主义引起的战争之苦"，"集体安全是维持世界和平的核心，但对侵略最好的遏制是通过经济制裁而不是军事力

① 杜勒斯：前引书，第145页。

② 威廉·阿普曼·威廉姆斯：《美国外交的悲剧》，W·W·诺顿公司，1988年，第130页。

③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04页。

量"[1]。

在和平运动的影响下，美国政府为了国际利益，在对外政策上竭力创造和平的环境，谋求建立集体安全。柯立芝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表示，"这个国家完全相信一种公民的权利在各方面受到保护的可贵的和平"，"与其他国家一样，现在这个国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坚定地认为，要通过友好的方式和良好的愿望、通过相互的理解和宽容来推进和平"[2]。从华盛顿会议开始，美国政府就不断倡导国际范围内的裁军行动特别是对海军的限制。不仅如此，在柯立芝政府时还签订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以保证和平。然而，尽管美国谋求加强和保护世界和平结构，但由于受到孤立主义的影响，在20年代对外关系中，美国只追求和平的好处，却不愿承担保护和平的义务。更需要指出的是，当和平被作为一种政府政策原则时，它背后的目的已经超越了和平本身。作为一种民间行为，和平运动可能出于对战争的恐惧；但是当民众的这种情绪被政府利用时，便更多地是为了防止、遏制一个强大对手的出现，因此美国可以在和平的名义下大打出手，挂羊头卖狗肉的事对于美国外交并不是件稀奇事。

第三，不断地经济扩张。正如前面所述，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美国的外交政策开始转向，从"门户开放"到"大棒金元"，传统的门罗主义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扩张主义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信条。在20年代，从哈定、柯立芝到胡佛三届政府的对内政策的重点都是极力促进大企业的扩张，这种企业至上的政府原则也同样体现在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中。因此经济扩张的加强也成为了影响政府外交决策的主要原则之一。

---

① 艾米里·罗森伯格：前引书，第113页。
② 华特·约翰逊等：前引书，第689页。

战争削弱了美国的竞争对手，并刺激了美国本身的工业，扩大其投资资本的供应。“在20年代，美国用产品、分厂和投资资本淹没了世界，使这十年成为这个国家历史上经济扩张最厉害的时期之一”①。尽管抛弃了威尔逊的国际主义和拒绝参与集体安全计划，美国人却在世界和平的条件下，谋求全球经济利益。根据美国人的看法，这时的经济扩张主义主要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既是手段也是目标，所谓手段即指通过经济上的扩张来实现美国的和平和繁荣并为以后的扩张打下基础；所谓目标是因为美国要想长久地保持国内经济的繁荣，必须不断地扩张，只有实现了经济的扩张，才能保证美国经济不断增长的趋势。对此，当时美国的政界人士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这样的看法。哈定政府的国务卿查尔斯·休斯从美国利益出发强调控制主要原料的重要性，以致出现了石油外交等政策；柯立芝总统曾表示，“我们这样的投资和贸易关系使地球上任何地方发动任何冲突的企图几乎成为不可能，这些冲突将不会对我们产生不利的影响”；胡佛总统则明确表示，“我们必须为我们的盈余寻找有利的市场”②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一方面，20年代早期帮助欧洲、俄罗斯和日本的努力表明了美国人正开始认识到除了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之外，对外援助也能刺激经济的发展。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外经济援助的力度。美国借出外债额的不断增加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另一方面，共和党政府的对外援助则以非政府行为为主。非政府力量在经济的扩张中起了关键作用。当时的对外借贷和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私人和企业进行的。到20年代末，通过私人账户进行的附加外

① 罗森伯格：前引书，第122页。

② 威廉姆斯：前引书，第127页。

债和直接投资的净资产总额达到80多亿美元[1]。而诸如美国标准石油公司、通用汽车、福特公司、IBM、胜家缝纫机械等企业在20年代步入了跨国公司，通过企业海外业务的拓展，也实现着经济扩张的目的。

二、斡旋于国际事务之中

根据上述的三项原则，美国政府在各种国际事务中进行斡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三项原则都对美国的外交决策产生了影响，但在处理某个具体问题时，美国人对这三项原则的使用是有侧重的，关键在于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利益。

〔国联与国际法庭〕　一战后期，美国为了控制战后的欧洲，提出了建立国际联盟的设想，各国为了防止类似的战争再次发生，对此表示赞同。然而到最后签订盟约的时候，美国却因为并未达到其预期的挟国联以令天下的目标，而拒绝加入。20年代的美国外交的一个重点便是围绕是否加入国联和国际法庭而展开的。

哈定在其国情咨文中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不愿过多卷入国际事务，他说："把你们带入世界重建的计划并不是我的目的，这类计划主要应该由那些更直接相关的国家来实现，他们必须自己通过斗争寻求摆脱困境的途径，然后我们才能对他们进行帮助，我们要做的只能是帮助"，"我们不要求别人为我们承担责任，我们也不会承担别人必须自己承担的责任，除非国家主义被绝望地

① 杜勒斯：前引书，第130页。

吞噬在国际主义之中"[①]。因此，他坚持不同国联发生任何关系，以尽可能地避免卷入国际冲突中。"哈定不仅拒绝甚至是国联的健康计划，而且几个月中其政府官员甚至没有拆开日内瓦的来信。当在1924年的日内瓦草约中，国联试图建立一个比其原先的盟约规定更准确的集体安全系统时，国务卿休斯以尽可能严厉的方式回答了这个计划。"[②] 国务卿休斯尽管曾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并主张加入国联，但在这一时期他认为这种国际组织是不可能的，国际主义"没有什么好的结果，而且它将很可能成为阻碍其他可能的成功的障碍"[③]。美国国内不论是梅隆，还是拉福莱特、诺里斯，各种政治派别、社会力量都一样反对加入国联。柯立芝上台后，继续了这种政策，强调"避免以牺牲美国的适当独立为代价缔结永久的政治联盟"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原则之一，并指出"美国没有理由因为加入国联而要限制自身的自由和独立的行动"，尽管他承认国联作为一种国家间机构是有用的，但反对美国加入其中[④]。

然而美国政府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1922年开始，国务卿休斯首先派遣了非官方观察员到国联的各种机构和委员会中。而后1923年哈定总统在休斯的影响下，表示愿意让美国有条件地参加国际法庭，但遭到了国会的激烈反对。参加国际法庭问题成为了美国国内的又一争论焦点。国际法庭的目的是裁决某些类型的案件，随时根据国联的要求提出意见，并对它提交的案

① 《欧西那总统编年系列：沃伦·哈定》，欧西那出版公司，1970年，第73、110页。

② 洛希滕伯格：前引书，第106页。

③ 杜勒斯：前引书，第150页。

④ 《欧西那总统编年系列：卡尔文·柯立芝》，欧西那出版公司，1970年，第34页。

件作出仲裁。对此，柯立芝总统抱着积极的态度，1924 年在他的国情咨文中，他向国会表示，“我相信它（指国际法庭）将有利于这个国家，有助于其他国家的稳定”①。1925 年 3 月 3 日，众议院以 303 对 28 通过参加国际法庭的议案。但在孤立主义领袖博拉的鼓动下，众议院对议案增加了保留条件。在经过修改的议案中，尽管承认美国对国际法庭提供财政援助的义务，但同时允许美国可以随时退出国际法庭，并不许法庭在任何对美国利害有关的问题上提出劝告。1926 年 1 月 27 日，参议院以 76 对 17 通过有保留地参加国际法庭的议案②。这些保留意见事实上限制了法庭的权利，包括向国联提供咨询性意见的权利。对此，国联表示除了其中有关对美国问题的劝告内容外，愿意接受全部保留条件，但柯立芝总统把这看成是一种拒绝，因此整个问题被搁置。后来，虽然休斯和凯洛格等人都当过国际法庭的法官。美国政府中也曾有人作过努力，胡佛和罗斯福总统也都赞同加入国际法庭，但最终美国官方依然置身于国际法庭之外。

与加入国际法庭的努力结果不同的是，美国从 1924 年起由于看到日内瓦机构组织非政治性活动中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利益，因此改变了过去不理不睬的态度。1924 年美国首次派遣了官方的代表参加国联第二届鸦片会议，以后又先后参加了国际军火交易控制会议（1925）、通信与运输会议（1927）、废除进出口限制会议（1927）、经济统计会议（1928）、货币造假会议（1929）、国际法编纂会议（1930）等许多这类会议。到 1930 年，美国参加过约 40 次的国联会议，派出 5 个常任代表③，但美国从没有正

① 《欧西那总统编年系列：卡尔文·柯立芝》，第 57 页。

② 德怀特·L·杜蒙德：前引书，第 438 页。

③ 林克、卡顿：前引书，第 406 页。

式加入国联。

〔华盛顿会议与裁军行动〕　　在一战后的国际世界中，1920年11月的华盛顿会议以及与会各国在会上达成的各项协议是影响世界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而美国政府则从这次会议开始，不断地在整个20年代推行裁军计划，以期通过各国间的裁军，在实现世界和平的同时，在对手之间形成一种制约。不幸的是，美国人的和平理想和裁军行动并没能阻止又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谓的裁军更多的是为维护美国的既得利益，遏制强大对手出现的一种手段，因此其结果只能是导致更大的军备竞赛的出现和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

从门户开放政策开始，美国便开始把与欧洲各国的争夺范围扩大到了亚太地区；在经历了一次大战以后，美国更希望在亚太扩大其势力，出于这个目的美国邀请了与亚太利益相关的国家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会议召开的直接原因则是美国、英国和日本于一战后开始的军备竞赛，它改变了整个远东地区军事势力的划分。战争期间，日本破坏了远东地区的力量平衡，使英国与法国能够在战后重新分配海军力量，并且具备了自世纪之交德国海军兴起以来防御其在远东领地和利益的最稳固的能力。而美国的战列舰也在战争末期穿越了太平洋，其在珍珠港的基地也得到了发展。各列强都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纷纷在战后扩大海军的规模。早在1916年美国就通过了一项“大海军”的议案，为了能够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使美国的海军实力超过“海上霸主”英国，海军部在战后不断提出新的造舰计划。而英国方面，为了能保住其战前在海军力量上的领先地位，不得不与美国进行一场军备竞赛。正如英国首相宣称的那样，“英国将花掉最后一个金币以使

其海军优于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1]。1921 年 3 月，英国也提出了大规模发展海军的计划。与此同时，日本人开始不安于美国在太平洋力量的壮大，到 1919 年底美国驻太平洋舰队已经可以与整个日本海军相抗衡了，美国海军部还在夏威夷群岛和菲律宾群岛不断扩大海军基地并在关岛实施设防的计划。这些都使原本就想在远东称霸的日本在军事上投人更多的财力。1920 年，日本国会又核准一项造舰计划。到 1921 年，日本财政预算的 1/3 被用在了海军建设和维护上[2]。

这时，美国出现了参议员博拉发起的裁军运动。1921 年 5 月 21 日，博拉提出一项修正案，要求授权总统召集一次限制海军的会议，结束这种毫无意义的军备竞赛。5 月 25 日和 6 月 29 日国会参众两院先后通过了这项提案，要求政府同英国、日本进行裁军谈判。对于英国和日本来说，他们之间于 1902 年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正好到期，美国的提议正好合他们的意，除了裁军之外，他们还希望把讨论扩大到整个远东的事务。因此最后把参加对象的范围扩大为 9 个国家。8 月 11 日，美国国务卿休斯对英国、日本、中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葡萄牙发出正式邀请。

1921 年 11 月 11 日，9 个国家的代表聚会华盛顿，首先举行了纪念停战三周年的活动。12 日，会谈正式举行。哈定总统在开幕辞中信心十足的说道："我们在这里相逢是为了服务于人类。这里将用所有的朴实、诚挚和敬意记录下一个关于世界本性的公开宣言，它经过了战争中战火的洗礼并因为焦虑的结果而变得更

---

① 林克、卡顿：前引书，第 394 页。

② 罗伯茨·范雷尔：《美国 20 世纪的外交》，W.W. 诺顿公司，1988 年，第 169 页。

加敏感。我寄希望于那种对强调和平保障的理解能使世界安静的努力来减少负担，改善秩序。”[①] 随后，国务卿休斯发表了令所有代表惊愕的演说，英国舰队司令在听到裁减英国舰船的计划时，甚至吃惊地像一只躺在阳光照射的台阶上睡觉的大狗那样从他的座位上站了起来。在演说中，休斯提出了对裁减舰船的设想：美国废弃所有建设中的主力舰以及所有超过（但不包括）特拉华号和北达科他号的旧战列舰；英国停止四艘尚未下水的主力舰建造并且废弃其二线的战列舰和超过（但不包括）乔治五世国王号的一线战列舰；日本放弃它还没有实施的造舰计划，废弃3艘主力舰和4艘战斗巡洋舰以及所有二线的战列舰；根据计划总共裁减1878043吨舰船，美、英、日、法、意的海军力量比为5:5:3:1.67:1.67[②]。与会各国对这项设想反应不一，一场激烈的讨价还价就此开始。日本对其在三强中所占的劣势地位表示异议；法国也对其1.67的比例颇为不满。经过一番争论，日本和法国最终都接受了这个比例，但作为条件美、英、日、法首先在1921年12月13日签订了四强条约。条约保障了四国在太平洋的利益，并取代了此前的英日同盟。1922年2月6日，五强海军条约和九国公约在华盛顿签署。现代史上第一个通过谈判达成的裁军协议结束了各国间的军备竞赛，并且在远东建立了相对安全的均势。同时，美国维护了其在远东尤其是对中国的“门户开放”的政策。

但是好景不长，这种局面只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1924年，英国5艘重巡洋舰下水，一个新的造舰计划在英国实施。面对如此情况，日本和美国也不甘示弱。日本开始建造4艘重巡洋舰。

---

① 前引欧西那总统编年系列·哈定卷，第64页。
② 前引欧西那总统编年系列·哈定卷，第71页。

1924年12月，美国国会批准建造8艘巡洋舰。一场新的军备竞赛又将开始。美国人为了不使华盛顿会议的裁军成果就此化为泡影，柯立芝总统于1927年2月10日发出邀请，要求召开五强海军裁军会议。但是美国人的号召已经不灵了。先是意大利和法国拒绝参加，而后当美、英、日三个主要海军国家在日内瓦开会时，美国与英国又争论不休，结果会议不欢而散。由于裁军对于美国来说从一开始便不是单纯的为了防止战争，而是带着遏制其他国家强大、保持美国在一战后所获得优势的目的，美国人不愿意也不可能放弃在军事上对其他国家的控制和不断的扩张，因而美国人裁军的理想，最终被更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取代也就不足为怪了。

〔最惠国待遇的扩展〕　国际经济关系是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方面。20年代，美国政府除了利用向外投资、发放贷款等形式调节着国际经济关系外，更主要是通过关税来实现的，其中最大的突破就是美国人不仅制定了关税政策，而且提出了要把“最惠国待遇”扩展到全球范围，借以处理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各种事务。

建立这一政策的想法最早是从1899年美国政府提出对华“门户开放”的政策开始的，而后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以及其后签订的九国公约中，得到了加强。20年代早期，被国会中保护主义的压力孤立的关税委员会建议消除这种不一致，要求总统在各方面推行最惠国待遇或门户开放的政策。

“最惠国待遇的条款意味着两个国家间相互以最有利的方式给予对方相同的关税；对这一个原则的全球范围的接受将意味着平等的贸易税待遇和平等的市场准人”①。曾在1921—1929年担

① 罗森伯格：前引书，第141页。

任政府商务部长的胡佛是这一政策的积极推行者。这一政策的推行不仅反映了美国人对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充满了信心，也说明了在20年代，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目标是各国间的相互贸易中的平等准入，而不是自由贸易。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到1929年，美国共与其他国家签订了8项相关的条约和12项具体执行协议，但其中大多数是与一些小的贸易伙伴签订的①。

〔凯洛格—白里安公约〕　柯立芝政府时期，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签订是美国对外关系中重要内容。有关这项公约内容最早的设想是由芝加哥的律师萨蒙·莱文森提出的。他曾建议各个大国签订一项谴责战争的协定，并得到了当时美国国内和平运动团体的支持，其中包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博拉的关注。1927年初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詹姆斯·肖特韦尔在与法国外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进行一次非正式会谈中提出建议，希望法国与美国达成一项关于宣布战争为非法并对破坏和平的行为实行国际制裁的协议。然而，白里安更感兴趣的是利用这种协定达到把美国拉入法国的联盟体系中的目的。1927年4月6日，白里安利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0周年纪念的机会，为了消除法美两国在裁军和战债方面的摩擦、达到要求美国财政援助的目的，发表致美国人的公开信，建议在两国间拟订一项宣布战争为非法的公约。起初，他的提议并没有引起美国国内的重视，国务卿凯洛格对此反应冷漠。4月25日，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给《纽约时报》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人们注意，美国要接受白里安的邀请。经过媒体的报道，立刻引起了民众的广泛关注，和平运动团体对此积极支持，孤立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都站在了赞同的方面。华盛顿不得不开始对此给予重视。正在这个时候查尔

---

① 罗森伯格：前引书，第143页。

斯·林白于5月20日，单独驾机从纽约直飞欧洲并在巴黎郊外成功降落。这一事件不仅成为美国航空史上的重要的里程碑，而且一时间使美国与法国民间的友谊达到了高潮，对美国政府最终作出接受法国提议的决定起了推动作用。6月20日，白里安正式照会美国。美国政府遂表示赞同。但国务卿凯洛格认为双边条约是从法国利益出发的一种消极的军事同盟，同时为避免美国和法国建立某种同盟的感觉，因此12月美国政府在答复中建议扩大条约签订的范围，并于1928年4月13日向其他各国散发了根据这一意图拟订的声明草案，表示美国同意在巴黎签订这项公约。在此情况下，法国外长白里安只有勉强接受。1928年8月27日，美、法、德、意、比、英、日、波、捷等15个国家在巴黎开会，签订了《关于放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即通常所谓的《凯洛格—白里安条约》，缔约各方共同宣布："他们谴责诉诸于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并在处理相互关系上放弃以战争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做法"；"所有可能发生的争端或冲突的解决或处理，不论其性质或起因如何，都只能用和平的方式"①。1929年1月15日，该条约以81对1被美国参议院批准。凯洛格本人因为在这次行动中的表现，获得了192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继15国之后，又有其他国家加入了这个条约。截止1933年，该条约的缔结国共计62个。

然而，这项条约正如人们通常评论的那样，它只是一种"羊皮纸上的和平"，它所追求的和平只是建立在纸上的承诺中的。除了各国的诚意之外，没有其他保障这种和平的后盾，虽然提出了要放弃战争，但没有提出对侵略的惩罚。它完全依靠国际关系中的道义力量。尽管在条约中表示了"各国关系的所有变化只能

---

① 《欧西那总统编年系列·柯立芝卷》，第121、122页。

通过和平的手段，只能是和平的和有序调整的结果，在此签字的任何国家此后如果要用战争手段来谋求其国家利益，那么将不得享受本条约规定的利益”[①]；但是条约中并没有明确指出违反条约会受到哪些惩罚。因而，这个条约只能是防君子而非防小人。德、意、日尽管也加入了条约，但它们依然能够在后来发动20世纪最残酷的世界大战。

三、对欧洲的有限干预

20年代在对待欧洲问题上，美国始终坚持了有限干预的原则。在整个10年中，美国政府对欧洲政策中大致就只有与美国利益息息相关的两件事，即有关德国赔款的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以及处理与其意识形态对立的苏联的关系。

〔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　19世纪20年代战争的借款与赔款是影响欧洲乃至国际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人也是花费了不少精力。整个战争期间，协约国共从美国政府那里获得了利率为5%的贷款70亿美元[②]。为了处理战后赔款和战争债务等问题，1922年美国国会设立了战争外国借款委员会。由于美国政府高额的关税政策，影响了欧洲国家偿付借款的能力。1923年，国会同意减少部分战争借款的政策，从英国的30%到意大利的80%，各国借款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减免[③]。

尽管如此，但是欧洲最大的问题德国的赔款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1921年德国的赔款固定为330亿美元。战后，德国人失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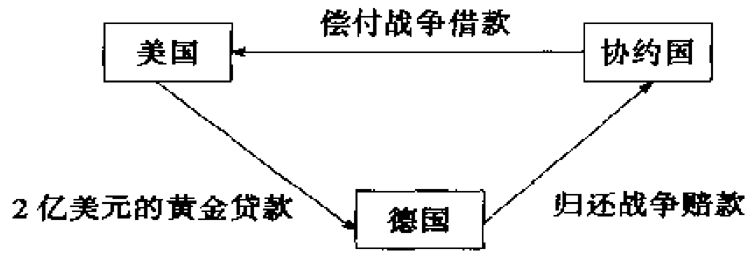
---

① 《欧西那总统编年系列·柯立芝卷》，第121页。

②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剑桥美国人民史》，第3卷，前引书，第265页。

③ 莫里森：前引书，第265页。

了富庶的鲁尔区，沉重的赔款负担使德国的经济日益困难，国内出现了通货膨胀。1923 年，这种通货膨胀达到了顶峰，德国马克降到了只有已分文不值。一张平信邮票要 100 万马克[①]。面对欧洲金融即将出现的动荡，法国、英国的无力调整，美国政府从自身利益考虑不得不出手。首先，波士顿的律师罗兰德·波依登一个具有敏锐洞察力的人，公开批评法国对德国的政策，提倡债务和赔款必须在“有能力支付”的原则上解决。1923 年 11 月，国会赔款委员会任命了由芝加哥银行家查尔斯·道威斯和亨利·罗宾逊、欧文·杨格等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负责解救美国有欧洲的借款，说服法国撤除鲁尔，帮助德国政府建立新的、健全的货币，使德国具有一定的偿付能力。1924 年 4 月 9 日，专家委员会发表了报告书即“道威斯计划”，1927 年 7—8 月的协约国伦敦会议正式通过。根据计划，美国向德国提供了 2 亿美元的黄金以帮助德国稳定金本位制的德国马克，并通过建立如下图所示的金融机制来收集和分配赔款，制定一个德国可以遵守的支付日程，从而使欧洲摆脱了金融崩溃。



美国人能如此慷慨地解囊相助，完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国务卿休斯曾这样说，“我相信道威斯计划的执行是必要的”，如果不那样的话“根据我的判断，我们必定不仅陷入国外的混乱的

① 莫里森：前引书，第 266 页。

局势中，而且要面对一种极度的失望"[1]。一方面正如很多国内外学者所说的，美国借着此项计划，扶植德国在欧洲大陆与法国保持力量的均衡，从而体现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均势外交的思想，有利于美国开展与欧洲的交往。而另一方面，美国人这样做更多的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这种援助既为美国的产品开拓了欧洲市场，又为美国国内的大量盈余资本找到了理想的输出渠道。德国因此成为了美国人投资的最主要对象。从1924年到1929年股市大崩盘之间，在德国的对外借贷中，美国占了80%[2]。1929年，杨格再度受胡佛总统委派，在上述计划的基础上重新制订了有关德国赔款的计划，把德国的赔款从原来本息相加330亿美元减少到90亿，并将最后的付款期限延长至1988年。到1931年，德国已经偿付了45亿美元的赔款，其中25亿来自于向美国私人投资者的借款[3]。

〔对苏俄的态度〕　美国在20年代处理欧洲事务中的又一个重点就是如何处理与苏俄的关系问题。一战期间，列宁领导俄国人民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由于列宁明确指出了共产主义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目标，意识形态问题成了美国与苏联两国关系之间最根本的障碍。威尔逊在苏联成立之初就采取了不承认的政策，除了上述这一主要原因之外，还包括他认为苏联政府不可能永久存在下去、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不守信义的原则、苏俄政府并不代表人民自由表示的意志等原因[4]。20年代共和党执政时期，在对苏联政策方面表现出了两重性。一方面，美国政府继续坚持威尔逊的不承认政策，

---

① 罗森伯格：前引书，第151页。
② 罗森伯格：前引书，第151页。
③ 莫里森：前引书，第266页。
④ 杜蒙德：前引书，第410页。

甚至和欧洲其他国家一起武装干涉苏联；另一方面，在胡佛的商业部的领导下又在经济方面与苏联保持着非官方的交往。

美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早在苏俄政府刚成立时便开始了。国务卿蓝辛首先草拟了支持白卫军卡列丁、阿力克赛夫等人的计划，从1918年开始便和日、英、法等国一起把军队开进了苏俄领土。5月24日，美国继日本登陆远东海参威之后，把巡洋舰"奥林匹亚"号开进了摩尔曼斯克港口，6月9日海军陆战队又在同一地点登陆，威胁苏联北方的安全，并企图向内地进攻。7月8日，美国又与日本签订了在远东和西伯利亚联合进行武装干涉的协定。9月1日，美国军队分别由格拉夫斯特和司徒华特率领，侵入西伯利亚和苏俄北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一次大战结束后，美国又和英国、法国一起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干涉行动。第一次干涉中，美国等14国军队援助了盘踞在西伯利亚被他们公认为是俄国最高统治者的高尔察克，编制成装备精良的30万白卫军。但结果在短短几个月里便被苏联红军打败。当第一次干涉还进行中时，美国又在南方开始了第二次武装行动，为叛军提供了足够装备10万人军队的武器，派遣了特别军事代表团，结果仍然是没撑多久便被打败了。美国并没有甘心，而是于1920年4月参加了第三次武装干涉，为波兰地主军队和白卫军提供大量军事装备，向波兰地主军队资助5000万美元的贷款，并宣布对苏俄停止商品输出，采取封锁政策。然而，苏俄在列宁的领导下，通过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等政策，保卫了革命的成果，使美国的干涉再次落空。

1921年苏俄发生饥荒，以胡佛为首的美国援助委员会，立刻展开了行动。1922年200名美国人在苏联进行着援助行动，据统计援助委员会共计营救了1100万人。美国的这次援助并不完全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而更多地是出于美国的自身利益。胡佛

部长希望通过援助行动扼止美国国内因大量盈余而不断下降的农产品价格，国会也从美国作物公司的基金中拨出2000万美元，并允许用它来购买美国多余的玉米[1]。此外，胡佛还把对苏联的援助看成是一种反对苏联政府（1922年底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的方式。他认为美国的援助可以有助于让俄罗斯人改变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所以，他迫使苏联政府同意援助委员会尽可能分散地与俄罗斯人进行直接的接触。美国的企业在这十年中也同苏联政府保持着联系。1925年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货车有1/3出口到了苏联，1927年苏联农民使用的货车中有85%是福特制造的，1929年福特公司还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一项关于帮助建设苏联汽车工业的协议书。其他诸如杜邦、通用电气等公司也都与苏联政府就贸易和技术转让达成了一致。苏联为20年代美国大量的多余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美国的私人投资等又为苏联经济的现代化提供了帮助。到1928年，在苏联的所有外国投资中美国占了1/4，1930年美国出口市场的25%在苏联[2]。

四、对美洲扩张政策的收缩

自从门罗宣言发表以来，美国一直在“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旗号下寻求成为美洲的老大。20年代，实力不断增强的美国更是如此。但在这一时期，美国在具体处理美洲事务时，往往从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扩张的角度，采取了收缩与扩张并用的手段。

---

① 罗森伯格：前引书，第117页。
② 海因斯：前引书，第240页。

〔美国对拉美的总体战略〕　　从门罗主义到西奥多·罗斯福的大棒政策到塔夫脱的金元外交、威尔逊的实用外交和理想主义，拉美尤其加勒比地区一直是美国重要的战略防御范围，美国长期对这一地区采取了直接干涉政策。对美国人来说，无论其对美国卷入欧洲或亚洲事务的态度如何，都对拉美问题表示关心。因为拉美地区为美国提供了有利的贸易环境，美国在这一地区拥有铁路、公用事业、石油等大量投资。进入 20 年代，争取民族独立成为了部分拉美国家的目标，而美国国内也出现了要求从加勒比撤军的呼声，因此这一时期美国的拉美政策处于从强行扩张干涉到睦邻友好的政策调整阶段。虽然哈定、柯立芝和胡佛的拉美政策并不一贯相同，但共和党政府对这一地区总体上目标是确定的，即通过撤军等手段限制解决各种争端，减少美国对该地区的政治控制，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实现正常化，最重要的是扩大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利益。

美国的这种对拉美的战略首先体现在三届政府的执政实践中。哈定在竞选时就针对富兰克林·罗斯福要在国联大会上控制 12 张拉美选票的说法，提出了美国不干涉加勒比各国事务的政策。上任后，在他仅有的几项比较成功的任命中包括了国务卿的任命，国务卿休斯的外交政策对整个 20 年代美国的国际形象起了重要的影响。在对待拉美问题上，他坚持贯彻了哈定竞选时的不干涉政策。在休斯的战略中，并不是要限制美国对拉美的责任，他同样认识到维持美国在加勒比的强大影响的重要性。所以，他所做的只是让其他国家相信美国对拉美的自由和独立方面没有别的企图。为了表示美国对建立友好关系的诚意，在休斯的努力下，美国与中美洲各国于 1922 年 2 月签订了条约，声明相互保持中立、建立中美洲法庭、同意限制军备。12 月，他又发起组织了华盛顿中美洲国家会议。在会上休斯明确表示了美国的

立场，“美国政府并没有通过损害你们的利益而使自己满足的野心，没有与你们的国家愿望相反的政策，也没有要在促进和平的利益以及用你们可以接受的方式帮助你们解决问题获得你们自己认为合适的有利条件两个方面有所保留的目的。美国的利益存在于这个半球的和平和你们的利益受到保护的条件中”①。同样，正如当年哈定总统的国情咨文中所反映的，20 年代的美国并不是完全放弃干涉权利，而是仍然坚持了有限介入的原则，“中美洲国家的代表团为了稳定他们的国家、消除所有不一致的迹象，现在正聚集在华盛顿的谈判桌前，寻求国家间的谅解。他们是应我们的邀请而在这里相遇的，而不是我们躲避。他们接受我们的好意，因为他们相信我们的无私和帮助”②。当凯洛格接替休斯之后，在继续坚持休斯时期的战略原则的基础上，美国对拉美政策的调整有了更进一步的变化。如果哈定时期这种调整还仅限于使美国不再与拉美国家发生冲突的话，那么柯立芝总统则更强调对美国公民人身和财产的保护，因而一方面他主张撤军；另一方面要求参与到各国的内部事务中。“这个地区所有的冲突能够平静、满意地解决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愿望。与我们追求和平的愿望同时存在的是我们对我们拉美兄弟国家财富增长的强烈希望，以及始终存在的推进与他们之间合作的目标，这种合作对双方都有利并常常受到最诚挚的友谊的鼓舞”③。而到了胡佛当选总统后，又大肆摆出睦邻友好的态势。胡佛本人首先是进行了一次所谓友好愿望的拉美之旅，而后又反复强调了美国愿意和南面的邻居们建立最诚挚的联系，同时他还宣称美国的政策是永远不介入任何

① 杜勒斯：前引书，第 154 页。
② 《欧西那总统编年系列·哈定卷》，第 110 页。
③ 《欧西那总统编年系列·柯立芝卷》，第 58、59 页。

国家的内部事务，拒绝用武力维持经济联系的做法，并声称“我们要用行动来维护我们的信念和理想”①。美国政府的努力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据统计，到1929年，美国在拉美的私人直接投资从1924年的10.26亿美元增加到了30.53亿，出口量增加了3倍达到9.86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20%。②

美国对拉美政策的调整另一个表现就是重新解释门罗主义，推翻罗斯福的推论。首先是休斯不断地强调门罗主义只是一种完全自卫的政策，它既不侵犯任何美洲国家的独立，也不承认美国可以干涉邻国的事务。副国务卿鲁本·克拉克发表了“门罗主义备忘录”指出：门罗主义是美国单方面的政策，是针对欧洲国家而提出的，并用来保护拉美免受欧洲列强的侵略；西奥多·罗斯福的推论既不来源于门罗主义，也不是其组成部分；并强调“就拉美而言，门罗主义现在不是，永远不是暴力和压迫的工具，而是在反对欧洲帝国主义阴谋中不带任何附加条件并且随时可以利用的一种对它们自由、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有效维护”③。

〔与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争斗〕　美国与哥伦比亚的问题起源于西奥多·罗斯福时期提出的泛美政策。他迫使哥伦比亚把巴拿马的控制权交给了美国。威尔逊政府时曾努力弥补美国在这一问题上造成的与哥伦比亚的矛盾。1914年威尔逊政府与哥伦比亚签订了条约，据此美国将对掠夺巴拿马一事向哥伦比亚道歉并支付2500万美元的赔偿。这引起了西奥多·罗斯福的强烈不满，他通过参议院中的共和党代表阻止了条约的批准。只是到了20年代，老罗斯福死后美国在这一问题上才出现转机。

---

① 杜勒斯：前引书，第156页。

② 洪国起、王晓德：《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美关系的历史考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第145页。

③ 洪国起、王晓德：前引书，第163页。

1921年，哥伦比亚准备收回私人开发地下石油矿藏的全部权利，美国在获得哥伦比亚的油田租赁上出现了困难。参议员洛奇为了美孚石油公司能得到哥伦比亚政府的特许，在参议院领导了一场有关支付赔偿和批准条约的斗争。当时，美国在哥伦比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石油方面。尽管当时有20名参议员表示反对，认为如果支付了赔偿就等于自己承认了错误，但道歉条约还是于1921年4月21日被批准。而后1922年哥伦比亚政府正式批准条约。至此，美国与哥伦比亚的紧张关系开始松动，美国在哥伦比亚的石油投资也从1922年的200万美元增至1929年的12400万美元。

然而，在美国与拉美关系中，最大的冲突焦点则是美国与南面的邻居墨西哥之间起伏不定的争端。两国的争吵是从墨西哥卡兰萨政府的国家主义政策开始的。1918年2月19日卡兰萨政府颁布实施1917年墨西哥宪法第27条命令，将1917年以前外国人获得的所有地下石油和矿产的所有权赋予墨西哥人民，并要求这些财产的外国主人向政府领取新颁发的特许使用证。这一政策由于美国和英国的抗议而被延期执行。但问题并没有解决。1920年4月奥夫雷贡将军领导的革命废除了卡兰萨政府。美国政府出于自己的商业利益，保护美国人财产权利，始终没有承认墨西哥政府。当休斯上任时，面临的是美国与墨西哥的谈判。1923年9月，双方签订了两项条约，墨西哥政府承认美国人在1917年以前获得的地下土地的权利，同意建立协调委员会解决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的其他问题等。而美国则承认了奥夫雷贡政府，并派军队帮助该政府平息国内的叛乱。但不久1924年卡列斯就任总统，再次推翻了1923年的协定，将所有外国人手中的油田、矿藏和其他财产国有化，并对天主教会进行打击。卡列斯提还提议通过了有关外国人只有拒绝接受其本国政府的保护才可以获得墨西哥土

地、同时，他要求美国的油田主们把所有权换为50年的租借权，美国和其他国家石油公司必须在1927年以前重新申请特许权。

卡列斯的这一举动对美国在墨西哥的利益将是很大的打击。因此，国务卿凯洛格和柯立芝总统一开始都抱着开战的态度。凯洛格说，“我们是有耐性的，而且当然认识到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我们不能纵容它违反自己的义务，不保护美国公民”[1] 美国国内甚至还有人指控卡列斯政府在与苏联合作，妄图在墨西哥培育共产主义。当1926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两国之间的战争眼看就要爆发了。在此危急时刻，美国国内的劳工组织、新教徒组织等公众团体高涨的反对战争的情绪，使参议院开始酝酿改善与墨西哥关系的友好行动。1927年1月，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和平解决争端。柯立芝派出了自己的好友、摩根集团的合伙人、职业外交官德怀特·莫罗出任驻墨西哥大使，负责解决与墨西哥的问题。莫罗与墨西哥政府进行了非正式的会谈；带着威尔·罗杰斯进行了一次参观访问，以通过牛仔的形象来改善墨西哥人对美国人的印象；邀请驾机飞越大西洋的查尔斯·林白访问墨西哥城，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等等。通过这些方法莫罗逐渐使卡列斯修改了石油法，使两国之间的油田纠纷取得和解，并使墨西哥政府调整了与教会的关系。1928年3月，美国宣布与墨西哥之间不再存在突出的矛盾，争斗终于得到暂时的解决。

哥伦比亚和墨西哥问题的解决不仅实现了共和党人解决争端、关系正常化的愿望，而且更维护了美国在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利益。

〔从加勒比撤军〕　20年代美国人在其后院加勒比地区采

---

① 杜蒙德：前引书，第440页。

取了收缩的战略，开始把驻扎在该地区国家内的军事力量撤回，实现这些国家的自治。但是，美国人的这一想法在具体问题上似乎有点一厢情愿，至少在尼加拉瓜问题上是如此。

美国对尼加拉瓜的干涉从塔夫脱总统时期开始。自 1909 年以来，美国在尼加拉瓜不顾多数尼加拉瓜人的意愿，一直用武力维持着不得人心但亲美的保守党政府。1923 年国务卿休斯承诺尼加拉瓜实行和平选举后，美国将撤走军事力量。1924 年尼加拉瓜大选，自由党人卡洛斯·索洛萨诺当选为总统。于是，美国就于 1925 年 8 月撤回了驻尼加拉瓜的海军陆战队警卫部队。然而，此后形势的发展是美国人未曾始料的。在美国撤军后不久，保守党领袖米利亚诺·查莫罗便立即迫使索洛萨诺辞职。美国政府对此采取了拒不承认的态度。为此尼加拉瓜国会又于 1926 年 10 月，选举了一直与美国政府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前总统阿尔多福·迪亚斯为新总统，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又一次犯了判断性错误，轻率地作出决定，立即承认了新的迪亚斯政府，从而造成了美国的被动局面。随着流亡自由党人前副总统胡安·萨卡沙回到尼加拉瓜，该国国内一场全面叛乱开始了。面对迪亚斯政府的求救，柯立芝总统作出的反应加深了美国的错误。从美国的利益考虑，当时出兵是必然的，因为美国权益集团在该国总计有 1200 万美元的投资[①]。1927 年，他派了一支 5000 人的军队重回尼加拉瓜，镇压起义维持秩序、保护美国人的利益。尽管派军行动暂时遏制了战斗的发展，但离最终解决问题还相差甚远，而在美国又出现了对这一行动的抗议活动。看来柯立芝此举是吃力不讨好。最后他派了后来出任胡佛政府国务卿的亨利·史汀生作为其私人代表前往尼加拉瓜解决冲突。经过史汀生的调停，尼加拉瓜冲突双方

① 杜蒙德：前引书，第 440 页。

终于达成一致，双方交出了武器，并同意在美国的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1928 年 11 月 4 日，尼加拉瓜举行大选，结果自由主义分子何塞·蒙卡达取得大权，1929 年 1 月 1 日正式就任。而美国军队由于叛军领袖桑迪诺发起了反对美国军队驻扎的战争，一直到 1934 年才从当地撤回。

类似的问题在多米尼加似乎要简单一点。因为休斯深信多米尼加人已经作好了恢复自治的准备。1922 年起，他开始与多米尼加领导人进行谈判，达成了“休斯—佩纳多计划”。根据双方的商定：多米尼加接受一个批准军政府签定的所有契约以及全部行政命令及法令的协定；承认 1918 年和 1922 年发行的债务；为保证上述协定的执行，1907 年条约继续有效；美国同意在一个临时的多米尼加政府控制下，进行立宪选举；一旦新政府成立，美国军队将全部撤走。1922 年 10 月 21 日，临时政府成立。1924 年 3 月 15 日，举行了立宪政府的选举。7 月 12 日，奥拉肖·巴斯克斯总统就职，美国的军政府宣布解散，美国占领军也结束了对圣多明各的军事占领逐渐撤出。然而美国并没有完全把多米尼加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来对待，在该国扶植亲美的政权并控制了海关，分割占有了部分的主权，并一直持续到 1941 年。而另一个国家海地，美国的撤军因为担心该国国内会出现无政府的混乱状况、对美国造成不良影响而不得不推迟。尽管休斯曾于 1922 年派专员到海地进行调查，以恢复海地自治。但调查的结果却使美国没有很快采取行动。1929 年，莱众市出现了要求自治的海地人攻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局面，胡佛总统再次派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1930 年 11 月，海地进行了民主选举，斯特尼奥·文森特就任总统。1934 年，美国军队全部从海地撤走。

20 年代，尽管美国在加勒比采取了撤军自治的战略，但加勒比海仍然是美国的内湖，美国的收缩是在不影响其安全和利益

的基础上进行的。

〔美国与加拿大〕　　在讨论20年代美国的对外关系时，美国与加拿大这个北方邻居的关系常常会被人忽略。一战中，加拿大也加入了战斗的行列，在西线战场上与美国相比遭受了较大的损失。1921年它仅有880万人口，只相当于美国宾夕法尼亚一个州的人口，却背负着22亿美元的战争借款，与美国的240亿美元相比，这个负担不能不说相当沉重[①]。而在政治上，战后加拿大国内出现了一个农业政党，国家激进党，在1921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进步党获65席位、保守党50席、自由党117席[②]，总督遂宣布由多数党自由党领袖麦肯齐·金组阁。

自由党一直和美国保持着友好、密切的关系，而麦肯齐本人又曾在美国学习工作过。他曾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1911年选举失败后回到美国加入了洛克菲勒基金对产业冲突的调查和调解。与此同时，战后加拿大也开始积极努力摆脱英国对其外交的影响。在巴黎和会上，首相罗伯特·博登便坚持要求加拿大独立于英国之外单独签署和批准凡尔赛条约。1922年当英国要求加拿大在国联就土耳其问题投票中站在英国这一边同意宣战时，麦肯齐断然拒绝了。这样的传统和经历，加上战后加拿大所面临的经济状况，美加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的浪潮也影响了加拿大，使之成为美国经济的一部分。1922年美国的投资者取代英国控制了加拿大的资本市场，20年代加拿大成为美国在世界上第二大商品出口国。“美国的三大汽车制造企业击败了加拿大本国的汽车工业；通用电气控制了加拿大最大的电气公司，美国的附属企业生产了加拿大2/3以上

① 莫里森：前引书，第272页。
② 莫里森：前引书，第272页。

的电气设备；美国的杂货店、小零售店和食品店遍及整个加拿大”[①]。当1926年加拿大在和英国之间经过谈判获得了准独立的地位，开始独立组织其外交事务的时候，美加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1927年初，文森特·马塞被作为加拿大的外交使节派往华盛顿，美国则派了威廉·菲利浦到渥太华。总体而言，20年代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系体现了美国的经济扩张的战略，两国之间的交往仅停留在经济上。

五、对亚太地区的继续争夺

正如前面所说，20年代美国对亚太地区奉行的是绝对干预的政策。当时的亚太地区，大部分国家尚处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对已经进行了两次工业革命的美国来说，这一地区成为理想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的销售市场。据统计，1926—1930年间，大约有12%的美国出口流向了亚洲，这是一战前1910—1914年间的2倍[②]。而作为一个地跨两大洋的国家，随着西部开发的不断推进，美国开始意识到太平洋地区在国家防御与安全中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不愿看到英法甚至日本这些实力不如它的国家在亚太地区分享着各种利益。这促使共和党政府在20年代对这一地区表现出了过分的兴趣。因此，1921年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在解决裁军问题的同时，亚太问题也是美国急切希望解决的问题。根据会后签订的几项条约，美国对亚太作了如下的安排：各国承认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等的完整，并尊重美国对华的门户开放政策；日本压缩对其所占领的群岛上的海军基地的建设

---

① 海因斯：前引书，第237页。

② 海因斯：前引书，第237页。

和扩展，其中包括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琉球群岛、佩斯卡多尔列岛、福摩萨等；英国、美国则答应不在其占领的新加坡的东部和北部以及夏威夷的西部发展新的防御或建设基地。整个20年代，美国在亚太地区忙得不亦乐乎，甚至“不管美国人是行动还是准备行动，他们的决定常常会决定谁成功、谁失败、谁还存在、谁被灭亡了”①。尽管20年代，美国极力想在亚太捞取好处，但那时美国对亚太的参与或因遭到其他列强的抵制或为了自身利益不愿冒风险而显得有限。当1929年中俄为了中东铁路在东北开战时，虽然国务卿史汀生原本想以凯洛格—白里安条约对此进行干涉，结果被苏联政府一句“管好自己的事”而顶了回去。

〔美日关系〕　自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在明治维新过程中启动以后，随着自身的实力增强，日本便开始要寻求在亚太地区的霸权。而美国在完成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变之后，也想在亚太地区扩大其势力范围。对于日本，美国既想使之成为其亚太战略的一个棋子，又害怕为虎作伥、危及自身的利益。因此，美国与日本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双方都想相互遏制对方，以求获得在远东特别是对中国的优势地位。一战后，日本受委任统治的前德国属地，正好位于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交通线上，这又为两国关系增加了复杂性。

一战爆发后，美国与日本之间对中国争夺也日益激烈。1917年11月2日，美国国务卿蓝辛和日本特使石井在华盛顿签订了《蓝辛—石井协定》。协定无视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存在，双方自行商定了关于日本在中国的特殊权益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等。但这不可能根本解决两国关系。首先是威尔逊为防止日本在经济上控制中国北部和满洲地区，宣布恢复了国际银行财团；接

① 海因斯：前引书，第237页。

着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和内战，日本于1919年1月初控制了东西伯利亚的全部战略中心，美国便对日本施加了压力，要求其撤军。1922年，华盛顿会议召开，两国的关系得到了缓解。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之后，美国又给予了日本慷慨的援助，使日本人十分感激。但两国关系很快由于美国的新移民法的通过，而再次陷入危机。

美国对移民的排斥最早就是从排华以及包括日本在内的亚裔移民开始的。哈定上任后立刻颁布了紧急移民法。1923年美国国会开始制定新的永久性的移民法。当时，美国国内存在着强烈的排外情绪，劳联、军团和其他一些组织和加利福尼亚人甚至明确提出排斥包括日本在内的移民。日本大使馆因此对休斯发出警告。休斯试图说服国会确定日本移民的定额每年总计246名，并劝告美国人不要采取排斥、侮辱日本人的态度。然而国会没有接受这种劝告。1924年4月10日，日本在一封概述其政府对君子协定态度的信中，提醒美国注意限制移民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尽管休斯在报上公开发表了这封信，并引起各界的评论，但4月16日，参议院依然以71对4票通过了新移民法，柯立芝总统也很快签署了这项法案。排外法伤害了日本人的自尊，美国与日本之间再次展开了军备竞赛。诚如休斯所言，“我们参议院的朋友们在几分钟之内就破坏了多年的工作成果，而且对我们大家的美国造成永久的创伤”①。

总之，在整个20年代，美国政府要竭力维护的是他们费尽心机构建的华盛顿体系，想通过它来制约日本在亚太的力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美国人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施加经济上的影响。到1932年，日本已经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在日

① 林克、卡顿：前引书，第399页。

本的投资达到 4.66 亿美元，1920—1930 年美国对日本的债券投资达 4 亿美元。遗憾的是，美国并没有从中获得有效的成果。日本的野心不断膨胀，在亚太的扩张不断发展。

〔菲律宾的独立问题〕 美国曾在 1916 年的琼斯法中承诺要让菲律宾实现独立，但是 1920 年代共和党重掌政权期间，菲律宾仍然是殖民地，独立问题又被延迟。哈定执政后为了兑现诺言，曾派了伦纳德·伍德少将和卡梅伦·福伯斯赴菲律宾调查情况。但是由于伍德是一个激烈反对独立的人，因此他向总统提交了一份充满偏见的报告，指责菲律宾人滥用了自治权。尽管菲律宾反驳了这份报告，但是独立问题仍因此被拖延了。而柯立芝总统本人又是反对菲律宾独立的，认为如果独立，菲律宾将会因为要自己承担防务并且在与美国贸易时要缴纳关税，而使其经济负担增加。独立问题也就被一拖再拖。

对 20 年代美国与菲律宾关系影响更大的是哈定和柯立芝都把伍德派到了菲律宾，担任总督一直到 1927 年才结束。他使哈里森总督时期取得的进步再次被斗争所掩盖。他把政府企业转让给私人资本，甚至废除了国务会议，并曾导致全体内阁辞职。伍德的统治引起了菲律宾人民的公开反对，美国国内也对此表示不满。1926 年柯立芝在国内外的压力下派卡密·汤普森调查此事。面对菲律宾人民希望立即独立的要求，面对伍德总督希望获得更大独裁权的愿望和总统渴望摆脱困境的要求，汤普森在报告中提出了推迟独立的建议，并提供了三条理由：菲律宾缺乏财力、共同语言和有力的舆论；美国需要菲律宾作为一个商业基地，相互的贸易有利于菲律宾的经济安全；菲律宾的独立可能会引起远东地区的关系复杂化。与此同时，他也提出了恢复总督与菲律宾议会间的合作、任命新总督等建议。因此，在伍德之后，史汀生继任总督，对菲律宾采取了安抚政策。他恢复了哈里森时期的一些

政策，如重开国务会议等等。

〔*扩大在中国的势力*〕　对美国人来说，中国这块肥肉，是他们觊觎已久的。当看到欧洲列强瓜分着中国的财富时，按捺不住的美国人便抛出了“门户开放”的政策。到了20年代，美国人又赋予这一政策原则新的解释——保持中国的完整以及一切外国人在中国都享有平等待遇。这个看起来冠冕堂皇的政策，其实只是美国人扩大在华利益的一种方式。“说穿了，中国的完整这个原则只是一种策略，用来防止像俄国那样的其他国家攫取如满洲这样的中国领土而把我们（注：指美国）排除在外”①。

一战后，美国最担心的对手是日本。为限制日本在华的扩张，1920年10月，美国提议组成了由37家美国银行参加的新的四国银行集团。而后，又竭力促使华盛顿会议的召开，签订了《九国公约》、《四国海军协定》等协议，企图以“门户开放”为幌子，限制日本在中国的活动，维护美国的利益。在这方面，美国更多地采取直接介入中国事务的政策，通过扶植中国国内的军阀，与日本人在中国的战场上针锋相对，在混战中捞取好处。在1920年7月爆发的直皖两系军阀混战中，由于得到美国支持的吴佩孚获得了胜利，美国也乘机从中获利，美国联合电报公司攫取了在上海建设无线电台，在汉口、广州、北京、哈尔滨设立分台的权利。日本由于不甘心自己支持的皖系失利，勾结奉系军阀张作霖，从而导致了直奉两系军阀在1922—1924年间的混战。美国则继续扶植吴佩孚，1923年资助了他价值300万美元的军火，并积极促进美国军火商和吴佩孚之间的买卖，达成了1万枝步枪、2000万发子弹、250挺机枪的交易。当曹锟贿选总统成功后，美国公使首先表示祝贺。1924年，美国又与英国勾结支持

---

①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305页。

直系江苏军阀齐燮元与以日本为后台的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进行江浙战争，使中国再次陷入混战中。后由于直系军阀内部的分裂以及皖系段祺瑞的再起，美国支持的直系战败。

美国处理对华事务的另一方面是对中国国内革命力量的态度和反应。当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时，美国政府对此采取了漠视的态度，有时则表现了一定的敌视。美国曾派出战舰阻止孙中山扣押广州海关的盈余。当革命力量不断扩大、北伐取得一系列成功之后，美国开始不得不为其在华利益考虑。1923 年国务卿休斯两次要求海军部长加强在长江巡逻舰队的力量。美国人以保卫租界为由调兵遣将。当北伐军打到武昌时，美国亚洲舰队停驻在烟台的两艘驱逐舰便以 25 海里的时速开赴汉口，长江巡逻队的海军部队则在汉口登陆。当北伐军击败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之后，1927 年 1 月 7 日，亚洲舰队司令威廉斯亲自从马尼拉赶到上海，可见其紧张的程度。到 2 月底，已有 850 名水兵、300 名陆战队员集结在上海，更多的部队在檀香山、菲律宾等地待命。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由于美国国内的排华而出现了一股反美的浪潮。各地民众纷纷抵制美货，要求结束在华美国人已经习惯了包括豁免权在内的各种特权、收回被外国军队舰船占领的土地和水域。美国政府拒绝了中国人的要求。当时美国驻上海商务官员甚至要求动用武力。但是，美国国内公众包括柯立芝总统在内则认为通过对一个弱国使用武力来实现商业利益和特权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1927 年 1 月柯立芝政府表示愿意修改与中国关系的条约，至少在美国人在华特权问题上作一些让步。3 月，国会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但这种让步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对在华美国人生命、财产利益的维护。当包括金陵大学美籍副校长在内的几名外国人被乱兵打死时，美国的军舰则毫不犹豫地炮击南京。整个事件的解决耗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美国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对两国都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美国之所以会在20年代在中国的混战中选择蒋介石，其一是因为虽然美国在旧军阀的混战中输给了日本，但美国的扩张欲望并没有减弱，他们需要寻找新的力量。另一个原因，可能与美国人对中国人在这一时期进行的革命的认识有关。柯立芝总统曾表示，中国的北伐是对美国革命有价值地仿效，是中国人争取国家统一、从外国统治下独立的完全值得称赞的努力[①]。而蒋介石是美国人最好的选择，他与孙中山有着师徒关系，他的周围有一批或多或少有着美国背景的人。经过“四一二”政变，蒋介石于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组成了国民政府，在外交上明显采取了亲美的路线。美国则于1928年7月25日在北平与他签订了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新条约，正式承认了蒋介石政府。

需要一提的是，当美国政府为了利益而争夺时，20年代在美国的民间也出现了私人对华的援助。无论这些援助是出于宗教的目的，还是属于院外集团为美国政府当局服务的一种形式，都从客观上给了中国一定的帮助。洛克菲勒基金会捐助修建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是迄今中国乃至世界比较著名的医学院，它于1921年竣工，在整个1924—1943年期间，为中国培养了313名医生[②]。而今天北京大学的校址所在地当年的燕京大学则靠着美国的财务支持，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新的亲美的中产阶级。

总之，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为实现它的世界战略，在20年代极力维护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努力发挥世界强国的领导作用，巩固了已经取得的扩张成果，调整了与某些地区的关系，加强了对亚太地区的侵犯。

---

① 海因斯：前引书，第239页。

② 费正清：前引书，第311页。

第 十 章

1898—1929 年美国政治体制的变化

20 世纪初年，美国社会政治体制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变化既是对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适应和调整；也是对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和促进。美国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狂飙的洗礼，美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完全建立在一个全新的现代工业之上。但是美国为在经济上取得重大进步付出了巨大代价。贫富拉开了距离，旧秩序出现动摇，新秩序尚未完善，社会出现动荡。一方面是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是社会秩序的部分和某种程度的失衡，社会持续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即旧的上层建筑和变化了的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美国的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它的政治体制面临改革和调整，以适应这种社会关系方面的剧烈变化，这就推动了美国政体的变革。也就是说在不改变美国政治的根本性质的前提下，美国的政治体制，就是政治制度在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中的具体化的方面产生了变化。

从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分析，20 世纪初美国政治体制的变化是为了适应美国经济现代化，也是为了进一步推动经济现代化，

这是美国朝着政治现代化目标前进的一个必然过程。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互相依存的互动过程。当三者出现错位或失衡时必须使之平衡和复位。20世纪初期美国政治体制演变就是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既相矛盾又相适应这个过程的反映。

一、三权分立的权力重心由国会转向总统

〔以“总统为中心”的三权分立新格局的形成〕 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的分立和制衡是美国政治体制的根本特征之一。一般认为，美国立国后的相当时间里，权力的重心落在国会手里。“在早期及整个19世纪，国会在制订国家政策方面往往起主导作用。像丹尼尔·韦伯斯特、亨利·克莱和约翰·卡尔霍恩这样的国会议员，在国会内对当时的重大问题施加了影响。迟至19世纪末，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称，‘国会是联邦制中主导的，不，是不可抗拒的力量’”① 国会在联邦制中占主导地位事出有因。美国人民一贯对暴政怀有特殊的反感，他们对行政权力的膨胀深怀顾忌。即使是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和林肯总统都属于强势总统，但他们还是没有改变三权分立中国会为重心的老格局。内战以后，由于国会对约翰逊总统的弹劾虽然因一票之差没有成功但是国会权威日益提高。国会剥夺了宪法赋予总统的任职权，还干涉内阁事务。总统只是“国会的仆人”，镀金时代成了国会权力居主导地位时期。诚如威尔逊所说，当时“美国国家权力结构实际

① （美）加里·沃塞曼：《美国政治基础》，中译本，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68—69页。

是国会至高无上的一种体制”。[1]

从海斯总统开始，美国三权分立的天平开始向行政权力倾斜了。尽管格兰特总统甘愿充当国会的“看门人”，海斯总统也认为国会应当承担全国事务的主要责任，但是克利夫兰总统在任职期间竟然动用了584次否决权，有力地遏制了国会对行政权力的干预。历史跨入20世纪以后，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的原有格局出现重大变化，总统的权力终于突破了平衡点向重心方向转化，逐步进入了以总统权力为重心，总统为主导地位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三权分立原则的演变出现了新的趋势，总统的权力不断扩大，国会的权力日趋削弱，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时期，形成了以总统为中心的三权关系新格局。这一格局一直保持下来，至今未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2]

在这一转化过程中西奥多·罗斯福起了重要作用。1901年12月3日，罗斯福接任总统后第一次谈到20世纪美国的政治时，他就说，旧制度为了面临新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必须改变。“18世纪末宪法制订之时，人类的智慧无法预言一扫无遗的变化……这种变化发生在20世纪初。……现在的条件完完全全地不同了，需要完完全全不同的行动。”[3] 罗斯福是一位强势总统，崇尚权力，追求政绩，以历史上有作为的总统华盛顿、林肯为楷模，他首先从改革行政机构着手，将权力逐步集中在总统手中。根据张定河教授的研究，罗斯福“为加强对国家经济的管理，要求国会

---

① 威尔逊：《国会政体——美国政治研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北京，1985年，第8页。

② 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北京，第126页。

③ 路易·赖特等：《民主的经历：美国简史》，斯各特·福斯曼出版公司，1968年，伊利诺伊，第298页。

增设商务与劳工部，1903 年商务与劳工部正式成立。虽然在他任职期间建立的行政机构并不多，但却开创了通过建立大批行政机构来扩大总统权力的先河。”1913 年，威尔逊执政后加快加大了罗斯福扩大总统权力的步伐。其实早在他当教授的时候，威尔逊就看出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并决心对此革故鼎新。1901 年，伍德罗·威尔逊教授认为“效率问题”对民主政治极端重要。他认为：“在政治领导和行政管理机构中，我们最缺乏的是集中。”美国一直由“大众会议”管理；他嘲笑说，美国的方针政策是由不具备任何或坚实的治国之才的国会委员会“一条一条地”制订的。威尔逊认为，能够提供权力之集中，保证“公共事务之统一”，实施有效统治必需之领导人非总统莫属。[①] 他当选为美国总统以后就步老罗斯福的后尘，继续为扩展总统权力采取措施竭尽全力。在罗斯福改革的基础上他又扩建行政机构。他先将商务与劳工部一分为二扩展成为商务部和劳工部两个内阁部，相应地扩大了有关的行政权力。后来他又连续通过有关法案，先后设置了联邦出版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联邦农业贷款委员会、美国海运委员会、铁路劳工委员会和预算局等 7 个重要的职能委员会。这些机构的建立大大削弱了国会的权力，如：预算局的建立就使国会失去了对国家财政的管理权。诚如美国学者所称：“预算局成立后，国会把执掌国库的权力交给了专家、官僚和行政部门，留在自己手里的只是资金最后拨用权和对个别项目的反应权。……他们‘位居国会山’权重但遥远；他们不是老板，而是董事会。”[②] 这种变化当然是议员们所不愿看到的。

在扩大总统权力上，总统立法权的扩大也是重要方面。一般

---

① 罗伯逊：前引书，第 404 页。

② 罗伯逊：前引书，第 408 页。

说，根据美国宪法规定的原则，20世纪以前美国的立法权基本掌握在国会手中，总统主要以使用否决权的方式参与立法，牵制立法部门。但进入20世纪之后，总统为扩大权力对立法机关加大了影响的力度，罗斯福总统在任内曾经直接干预国会通过许多由他建议的社会立法。通过向国会频繁提交国情咨文的方式，成为总统积极参与立法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威尔逊总统在这方面不愧是一个敢于创新、敢于打破传统的开拓者。他打破了自约翰·亚当斯总统以来把国情咨文转交给国会的传统，1913年4月8日，他在就职的第二个月就亲自到国会宣读咨文并提出改革关税的立法要求。他要求众议员和参议员们亲自看到的他，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不仅仅是向来自嫉妒权力孤岛的国会打招呼的一个政府部门。"[①] 威尔逊的举动，赢得国会的好感，因而直接推动国会迅速通过了他自己所希望的立法。威尔逊执政以后就提出了他的所谓"新自由"纲领，拟定了立法计划，引导议员们对此加以研究讨论最终通过立法。"总统提交的国情咨文实际上成为一种立法纲领，国会的许多主要立法就是在总统咨文的基础上制定的。"[②] 这种做法后来形成了一种制度，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演进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虽然宪法给予总统向国会提出措施的权利，直至20世纪，总统才定期而且主动地参与立法程序。总统在每年年初向国会联席会议作他的'国情'报告，提出政府的年度立法方案。他还向国会提出年度预算咨文、经济咨文和报告，并且频繁地向国会提交专门的咨文，以支持专门的立法。"[③] 威尔逊加强总统权力的做法对美国政治体制发生深远的影响，有

---

① 阿瑟·林克：《伍德罗·威尔逊与进步主义时代》，前引书，第35—36页。
② 张定河：前引书，第127页。
③ （美）沃塞曼：前引书，第50页。

的美国学者认为："威尔逊加强和扩展总统权力也许构成了他对美国政治实践的最久远的贡献。"[①] 与总统权力加强有关的是美国文官制度的最后确立，确保文官的政治中立性。彭德尔顿法曾规定文官政治中立，但仅适用功绩制文官，而政府任命的文官则不受其约束。1907 年西奥多·罗斯福曾以行政命令禁止所有文官参加政治竞选活动。1912 年，在政府文职人员的斗争下，国会通过《劳埃德——拉福莱特法》，给予联邦政府人员成立工会和向国会请愿的权利。文官制度的完善保证了美国文官队伍的素质和稳定，有利于总统权力的实施。

总统权力的扩展还表现在总统的对外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上。虽然美国总统握有对外事务的重权，但是根据三权分立和制约的原则，总统的对外事务和重大决策应该通过国会，至少要听取他们的意见或同他们打招呼。但是在罗斯福和威尔逊执政期间，总统经常绕过国会自行其是，独断专行。1905 年，罗斯福调停日俄战争绕过国会就是明显一例。同年，他又未与参议院商量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法与圣多明各政府签约。威尔逊在这方面决不比罗斯福逊色。1914 年，他在处理与墨西哥关系问题时先撇开国会，后又先斩后奏取得国会认可。一战期间美国总统权力更为膨胀。威尔逊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通过一系列法案，建立了一批战时机构。同时美国总统利用行政协定进行外交活动数量大增，据统计：美国政府在 1789—1839 年间，签订条约 60 项，行政协定仅 27 项，低于条约；1839—1889 年间，条约为 215 项，协定为 238 项，略多于条约；1889—1939 年间，条约为 524 项，协定为 917

---

① 阿瑟·林克：《伍德罗·威尔逊与进步主义时代》，前引书，第 34 页。

项，约为条约的一倍。[1] 原因在于总统签署的条约必须经过参院 2/3 的多数批准；而行政协定不经参院同意就可直接生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总统权力的强化。参议院批准和否决条约的权力是牵制总统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随着三权分立和制约格局的变化，总统权力的加强，“参议院批准和否决条约的权力也已在实践中有所改变。自从它在 1920 年拒绝批准美国加入国际联盟以来，参议院已很少拒绝批准条约。”[2]

随着美国总统权力的加强，美国总统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也迅速提升，总统成为美国人民注意的焦点人物。“美西战争的过程和结局使美国总统（以及宪法赋予总统的一些权力）成为美国人注意的焦点，过去只有亚伯拉罕·林肯——美国人心中一场最伟大的战争的领导者、英雄和烈士——才赢得如此深切的关注。”[3] 美国总统成为民众注意的焦点同总统利用宣传媒介提高总统在公众中的形象是分不开的，“从西奥多·罗斯福开始，记者招待会被总统用来作为新闻媒介与行政首脑直接接触的机会。”[4] 这种政治技巧也为后来的美国总统所效法，随着媒介和宣传工具的不断改进和提高，总统利用媒介扩大影响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在美西战争期间，可以清楚地看到总统利用传播媒介的情形，全国性媒介都利用美国人民对战争的关心把注意力集中在总统身上，总统的言论占据媒介的重要地位，不仅使他的形象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大为提高，更重要的是总统的政治主张和政策通过媒介向美国民众进行有效的传播和解释。“麦金莱以后的历届总统

---

① （美）詹姆斯·伯恩斯等：《美国式民主》，中译本，谭君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5 年，第 564 页。

② （美）沃塞曼：前引书，第 47 页。

③ 罗伯逊：前引书，第 400—401 页。

④ （美）沃塞曼：前引书，第 198 页。

采用不同的手法和技巧，越来越多地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目的是做宣教、说服工作，最重要的是划定讨论和辩论公共事务和公共政府的界限和内容。”①

总统权力的加强，也强化了美国总统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地位，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之后，即 1918 年底，亲赴巴黎参加和平条约的谈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任内离开美国的总统，第一位（几乎是惟一的一位）亲自与其他主要政府的首脑一起进行重要条约的谈判总统。”② 对于美国总统权力的加强，美国教授林德塞·罗杰斯认为威尔逊总统“已经行使了比他前任们更多对国会的几乎是绝对的权力。”③

总而言之，20 世纪初年美国三权分立和三权制约的基本特点发生了某种结构性的变异。从国会为重心、国会起主导作用转变为以总统为重心、总统起主导作用的新格局。尽管第 16 届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他领导北方进行国内战争时，对宪法的许多规定置之不理。国会后来也批准了这些行动，总统掌握了某些主动权。但是这种非常时期的领导方式并没有改变国会的强大地位，尚未确立起总统为重心的新的格局。所以林肯遇刺后不久国会很快与总统抗衡并接连取胜，进人国会起主导作用的时期。直到 20 世纪初，像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那样强有力的总统，不顾国会的反对或牵制，前者推行他的环境保护和反垄断政策，后者领导国家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在形式上他们似乎只是继承了林肯总统的某些做法，但是两者有很大区别。林肯的做法只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冲击了国会为主导作用的体制但没

---

① 罗伯逊：前引书，第 400—401 页。

② 罗伯逊：前引书，第 405—406 页。

③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前引书，第 334 页。

有能从根本上改变它；罗斯福和威尔逊则是改革了旧体制，建立了新格局，破中有立。当然这种政体上的变革及其成败不能完全归结于个别领导人物的个人作用。培育这种改革的土壤和条件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所以，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坛又出现了一种“回复”和“回归”的现象，强势总统被一些弱势总统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20世纪20年代一系列软弱的总统（哈定、柯立芝、胡佛），这也许代表了国内的一种情绪，即偏爱不活跃的行政首脑。”[1]

值得说明的是，20世纪初年的三权分立和三权制约的新格局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新变化，但并没有改变三权分立和制约的根本性质和结构。美国政治体制的分权和权力制衡的原则没有改变，只是三种制衡权力结构中的重心和力量配置发生了某种量的变化，总统权力有很大的扩展甚至可以发挥主导作用，但这种主导作用依然在立法和司法对其实行制约和牵制之下发挥的，总统成为权力的重心，只是在与其他两种权力的权衡中体现了轻与重的关系。

〔*新格局形成的具体原因和历史意义*〕　美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垄断化的历史进程是导致美国政治体制变革的根本原因。历史经验表明，严峻的国内经济政治形势和复杂的外部环境往往会要求一个国家或民族建立强有力的行政权力，果断及时处理各类危机。20世纪初，美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了工业社会综合症：垄断势力恶性膨胀，贫富差异扩大，社会矛盾激化，社会思潮激变，自然资源惨遭破坏等等。形势的发展要求联邦政府迅速有效地处理这些全国性、全局性的问题。但是国会本身是一个立法机构，它的特点是：多中心的权力结构，是各种地方势力

---

① 沃塞曼：前引书，第38—39页。

和经济利益集团的政治混合体，也是两党党魁争权夺利的场所，必然造成国会内部的意见分歧和无休止的争论，以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久拖不决或无限期的延宕，难以适应20世纪初的美国形势和急速治愈综合症的需求。相对于国会，行政权力较为集中，较少受地方势力和经济利益集团的影响，具有较高的办事效率。罗斯福上台时大垄断集团犹如恐龙横行美国，引起社会的种种不安，迫使罗斯福加强权力采取对策；国际上列强们已将世界瓜分完毕，美国利益何在？迫使罗斯福强化总统权力在国际上推行扩张主义，调整列强间各种复杂和微妙的关系，以获得美国的最大利益。威尔逊入主白宫后，不仅国内垄断势力十分嚣张，社会问题积重难返，而且面临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何去何从？正如林肯总统面临严峻的国内形势而采取许多非常时期的政治措施一样，威尔逊超越国会采取很多强化总统权力的做法势在必行。

其次，总统权力集中与当时美国社会思潮的变化有密切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国内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和扩大，特别是铁路、电报、电话和无线电通讯加强了不同地区人民的交流，使美国真正连成一片，美国人强化了或具有了真正的美国意识，联邦政府对他们不再是陌生和遥远的了，而且逐步成为他们可以依赖的力量，而总统恰恰就是这种力量的代表和象征。此外，20世纪初美国社会思潮已从自由放任转向国家干预，美国人民在镀金时代发现自由放任只是让少数暴发户和垄断资本家获得好处，社会达尔文主义只是他们进行弱肉强食、吞食弱者的理论依据，所以他们转而要求美国政府对社会经济领域加以干预，遏制垄断集团的过分膨胀，消除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政府既要进行干预就必须拥有足够的行政权力。这股思潮就为总统权力集中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社

会舆论。

新格局的形成与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总统掌握较大的行政权力成功推行进步主义改革是一个互动过程。新格局为美国政府解决20世纪初美国社会出现的工业社会综合症起了一定积极作用，通过立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克服了某些暂时出现的困难，理顺了经济领域的关系，遏制了破坏自然资源的势头等等，促使美国社会向良性方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促使美国总统在国际舞台上更加自如地发挥大国作用，更加放肆地推行扩张主义和强权主义，树立了美国是世界一等强国的形象。20世纪初年美国在世界上特别是在远东和拉丁美洲地区，所犯下的大量殖民主义罪行和推行卑劣的强权政治，大都是握有重权的美国总统一手策划和制造的。过大的权力可以使人成为天使，也可以使人成为魔鬼。

二、联邦制的变化

与总统权力加强相关的是美国联邦政府权力的强化，美国政治体制的总特点是权力的分割和制约，联邦的行政、立法和司法的三权分立是同水平上的权力分割和制约；联邦制度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关系则体现了纵向上的权力分割和制约。“联邦制，要求在中央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分配政治权力。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人民都会有直接影响，都有一些独有的权力。联邦制，像分权原则一样，把政治权力分散，防止权力集中在任何一个群体手里。”[1] 根据美国1787年宪法规定，美国建立了联邦制国家。这是十分符合美国国情和特点的国家权力组织形式。因为美国是一

① 沃塞曼：前引书，第25页。

个先有州后有国的国家，州的观念和地方观念在美国人的心中根深蒂固，酷爱自由和民主的美国人民出于对中央集权体制的害怕，经历了邦联制的实践，推动开国元勋们为未来的美国精心设计了联邦制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但是美国宪法包含了一种矛盾的思想：一方面宪法第6条明文规定，肯定宪法和联邦政府依据宪法制订的法律“均为全国的最高法律；即使与任何州的宪法或法律相抵触，各州法官仍应遵守”，同时在第1条第8款中又规定国会拥有“制订为执行以上各项权力和依据本宪法授予合众国政府或政府中任何机关或官员的其他一切权力所必要的和恰当的法律。”为以后联邦政府扩大权力提供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又肯定了保证州政府独立性的原则。宪法第10条修正案规定：“本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分别由各州或人民保留。”

不管宪法设计者们的主观愿望是什么，联邦制度在美国实施以后，州权色彩非常浓厚，州权论者表现活跃。人们往往将州权理论和维护美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联系在一起。因此维护联邦统一和维护州权的争端始终存在。由于美国的领土是由大西洋沿岸逐步向西扩展推进而成的，19世纪上半叶，现代美国的完整疆域尚未最后形成，人们缺乏对美国的整体概念，而对地方和州却怀有乡土情结。自从联邦制建立到19世纪前半期，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多次关于集权和分权、加强联邦权力和维护州权的斗争，这种斗争从思想发展到政治，从地方闹到联邦，并且越演越烈甚至闹到一些州提出脱离联邦的地步。19世纪60年代，最后以奴隶制与资本主义制度为深刻背景导致南北战争的爆发，用枪炮刺刀解决了奴隶制问题，也维护了联邦制和国家的统一。南北战争以后直到20世纪初，美国联邦制发生变化的最显著特点就是联邦权力的增大。

〔联邦权力的增大〕　美国的联邦制度经历一个多世纪的演变，出现过国会联邦主义、实用联邦主义和二元联邦主义、合作联邦主义等不同阶段。“我国联邦宪政制度已经演变为这样一种制度，与我们开始的制度相较，形式上差异不大，而实际上则不大相同。”[①] 内战以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联邦制进入权力扩大时期（1861—1932年）。有的美国学者认为该时期美国的联邦制度属于“二元联邦主义”阶段，即联邦和州都拥有较大权力，但联邦制演变的特点则是联邦政府的权力明显呈扩大趋势。

联邦权力的扩大是一个渐进过程。它是通过对州际商务的管理而扩张的。所谓州际商务（或译州际贸易）是指美国任何越过州界或涉及2个以上的州的商业贸易。历史上存在的传统看法是各州之间商业上的自由贸易不应受到阻挠。但是为了管理铁路，1887年，美国通过了《州际商务法》，成立了州际商务委员会。后来这种管理扩大到卡车、轮船、货物运输和其他州际间的运输。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03年2月4日国会通过了《埃尔金斯法》以加强1887年通过的《州际商务法》的法律效力；1906年又通过了众议员威廉·赫伯恩提出的《赫伯恩法》，进一步加强对铁路管理和加强州际商务委员会的权力。1914年通过《克莱顿反托拉斯法》，为进一步说明谢尔曼法详细说明了导致垄断和由垄断所造成的各种非法商业活动。禁止某些类型的持股公司和互兼董事，禁止歧视性运费协议和在所谓正常竞争者重新分配销售区域等等。克莱顿法的制订经过了一番周折，它曾经被修改得毫无棱角，参议员里德曾抱怨说：“克莱顿法首次成文时，它是一头满嘴利齿的狂怒狮子。可它已

① 伯恩斯等：前引书，第94—95页。

退化为一只没有牙齿、呜呜哀鸣和毫无血色的雌猫。它是立法机关向托拉斯的一种道歉：挥舞着手中的帽子，并保证不会出现无礼的举动。"[①] 威尔逊总统对此也深表不满。后经修改加以通过。同年国会还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决定设立联邦贸易委员会作为执行反托拉斯法的工作机构。反托拉斯法由司法部、联邦贸易委员会和联邦法院负责执行。1920 年的埃施——卡明斯法把管理办法加以改变来加强政府的管理。1912 年，国会通过了一项管制无线电通讯的州际商务法。1926 年通过了管制航空的空中商务法，1927 年通过了管制广播的广播管制法。[②] 联邦政府通过大量立法加强对州际贸易的管理，为了使各种法案付诸实践，联邦政府先后成立各种相应的行政机构。

在政治上，联邦政府通过上述立法还取得干预州的权力。国会通过的《埃尔金斯法》和《赫伯恩法》不仅加强了对州际商业交流的管理，而且进一步加强州际商务委员会的权力，使原来一些由州政府管辖的商业活动纳入到联邦政府的管辖权限之内。罗斯福和威尔逊总统执政时期还通过连续制订的一系列反托拉斯法和对一些托拉斯进行指控强化了联邦政府的权力，进一步显示联邦政府放弃自由放任政策加强对全国经济生活的干预力度。因为托拉斯一般均在州级政府机关注册，州政府有权对其进行管理。反托拉斯法通过以后，联邦政府可借反托拉斯为名行扩展联邦政府权力之实。

建立联邦储备银行体系是扩大联邦政府对全国金融和财政管理权的又一重大措施。1913 年 12 月 23 日，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随后根据该法建立起来的联邦储备系统（或译联邦储备

---

① 阿瑟·林克：《伍德罗·威尔逊与进步主义时代》，前引书，第 72—73 页。

② 杜蒙德：前引书，第 78 页。

制度）实际上在美国起了中央银行的作用，威尔逊总统在国会特别强调了政府对联邦储备系统的控制，他说："我们新法律将建立对银行和发行的控制必然是公众的而非私人的，必须归属于政府本身，以致银行可能是商业，私人企业和创造性的工具，而不是它们的主人。"① 威尔逊总统任内还通过了《联邦农业贷款法》，使联邦政府具有向农业贷款的权力。

更为重要的是，国会还通过宪法修正案的立法程序加强了联邦政府对全国经济生活的管理和影响。如 1909 年国会提出宪法修正案第 16 条，于 1913 年批准，授权国会征收所得税。修正案规定"国会有权对任何来源的收入规定和征收所得税，无须在各州按比例进行分配，也无须考虑任何人口普查或人口统计。"1919 年 1 月 16 日，国会又批准宪法第 18 条修正案，规定"本条批准一年后，禁止在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一切领土内酿造、出售和运送作为饮料的致醉酒类；禁止此类酒类输入或输出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一切领土。"② 这种征收所得税、禁酒等全国性法令的制订和实施增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威和权力。针对一些州对土地、森林、矿藏等资源加以掠夺性的开发的不正常现象，联邦政府通过法令加以制止。如：1902 年国会通过《新土开垦法》，1906 年通过《美国古迹保护法》。联邦政府根据法令加强对土地、森林、矿藏等自然资源的保护，阻止一些州对自然资源的滥砍滥伐，并且"建立 5 家国家森林公司、4 个野生运动保护区、51 个鸟类保护区、18 个国家纪念地。"③

联邦政府又采取给各州政府及其所属机构以联邦财政补贴的

---

① 阿瑟·林克：《伍德罗·威尔逊与进步主义时代》，第 48 页。

② 伯恩斯等：前引书，第 1173—1174 页。

③ 张定河：前引书，第 110 页。

措施来进一步削弱州权。由于联邦政府获权征收所得税奠定了联邦雄厚的财政基础，为给州政府实行财政补助创造了条件。实行财政补贴后，如果州政府不接受就会影响州的财政，接受了补助就会对联邦政府产生更大的依赖，失去某些州权，因为联邦财政补贴绝不是白给的，它往往带有许多监督和控制。如：1916 年国会制订了《联邦公路资助法》，联邦对州政府修筑的公路要进行监督。此后联邦补助金额不断增加，1918—1930 年间，每年为 1 亿美元左右。[①] 1917 年通过的史密斯——休斯职业教育法，规定国会要通过联邦职业教育委员会对各州实行此法进行指导和监督。总之，联邦政府通过财政补助收回了许多本该属于州权的权力。有人认为："总之，州权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受联邦政府财政补助的损害比受商业条款的损害更大。"[②]

联邦政府有关劳工问题的一系列立法也使部分属于州政府权限的事务归联邦政府所有。1915 年通过了《拉福莱特海员法》，威尔逊总统在签署该法案后说："我为什么最后决定签署该法案，因为这似乎是为被我们的法律一直忽略太多的劳工阶级干点公正事的惟一机会。"[③] 1916 年国会通过《亚当森法》，确定从事州际铁路运输工作的工人标准工作日为 8 小时。同年 9 月 1 日，威尔逊总统带着"真正的感情"签署了国会在 8 月 8 日通过的禁止童工的《基廷一欧文法》（也称《童工法》）等。联邦政府通过这些法律超越州政府（或通过州政府，或与州政府共同合作）直接干预劳工问题。霍夫斯塔特认为威尔逊总统在其第一任期内"产生的积极的立法成就比自汉密尔顿时代以来任何任期要多。"[④]

---

① 详见张定河：前引书，第 90—91 页。
②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86 年，北京，第 9 卷，第 508 页。
③ 阿瑟·林克：《伍德罗·威尔逊与进步主义时代》，前引书，第 63 页。
④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 334 页。

虽然“1900年后，美国州政府权力迅速削弱”[①]，但是州政府的权力和实际运作这些权力的范围仍有很大空间，即宪法最初所赋予州的权力基本上都依然保留着。美国人民不愿意交出他们的“地方自治权”。[②] 同时由于20世纪初美国社会的激变，有关社会生活和社会领域的大量问题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政府的社会职能大大强化，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工作范围都在迅速扩大。“比政府管理权的扩充更重要的是政府工作范围的扩大。”[③] 20世纪初年美国联邦权力的扩大和州政府权力的削弱是相对的，联邦权力是从以前过弱过小的程度上加大加强；州权则由以前过大过强的水平上减弱；这种权力方面的强弱盛衰变化完全是在美国联邦制的框架内进行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联邦政府权力的增强使美国的联邦制消除了邦联制的某些痕迹，发育得更为健全和名副其实。

〔*联邦权力增大的具体原因*〕　20世纪初，美国联邦权力的增大实际上可以认为是南北战争胜利带来的必然结果。南北战争的胜利不仅消灭了黑人奴隶制度而且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它是一场由资本主义制度取代黑人奴隶制的革命，也是一场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是美国长期来联邦主义和州权主义争论的最后摊牌，州权主义因其最终导致联邦分裂和维护奴隶制度的严重后果为多数美国人不齿。南北战争的胜利既然维护了国家统一，战后加强联邦的权力和统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世纪之交，美国经济的高度发展，现代化的交通不仅使美国变成两洋国家而且将城市乡村连成一起，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发

---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前引书，第9卷，第508页。
② 杜蒙德：前引书，第76页。
③ 杜蒙德：前引书，第79页。

展，统一的疆域和版图的出现，使美国从一个尚在不断向西推进中的、变化着的、不定形的国家最后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由48个州组成的一个稳定的美国。美国人经历了先有州后有国的政治道路，直到20世纪初他们才进入到真正完整的国家阶段。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时代，美国大陆扩张已经完成，西进结束，星条旗上已有48颗星在闪耀。联邦是国家的象征，48个独立的州虽享有很大权力，但毕竟难以处理和应对现代社会的各类问题，酷爱自治的美国人除了加强联邦权力外也别无出路。从外部条件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美国的参战直接推动了联邦权力的加强和政府机构的扩大。

联邦权力的集中和加强使美国的联邦制更为成熟和完善，从而使它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联邦权力的集中也有利于进一步发挥联邦和州的两级政府的积极性，使美国在大转变的时代里较为顺利地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化，保证了美国现代化进程的连续和发展。

三、政党制的新现象：两党趋同、第三党的壮大和利益集团的活跃

美国的政党制，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美国开国元勋们一般都反对建立政党和反对党派精神。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他著名的告别辞中谆谆教导国人：防止和反对党派精神以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但是两党制度还是在美国的现实政治需要中经由萌芽状态形成和发展，成为美国政治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了美国政治体制的鲜明特色之一。20

世纪初年，“政党的作用也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化。”[①]

〔两党的趋同〕　1884—1932年，美国两党制的发展进入了它第二阶段。从两党轮流执政的地位变化加以分析，期间民主党打破了共和党长期执政的局面。但老大党——共和党在两党政治角逐中仍占主导地位。从两大党的内部构成和政纲性质的变化上看，两党的政治倾向都在向自身的对立方向转化。它们在竞选政纲上的重大对立和政见分歧已经缩小，甚至出现相互靠拢、渗透的“趋同”现象。原因是由于在垄断资本的直接干预和经济资助下，两党逐渐成为垄断资本的代言人，它们的政策和经济主张都受到垄断资本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干预。两党的趋同还表现在第三党——人民党的冲击下，出现了共和党向“保守主义政党”和民主党向“自由主义政党”演变的倾向。1896年总统选举前，以保守为特征的民主党为了扩大势力采用了人民党的纲领并从组织上与其合并。结果，大批下层群众站在民主党一边，出现了民主党向自由主义政党演变的倾向性。[②] 在南北战争前后一向以改革著称的共和党则表现得越来越稳健，趋向保守主义。两大党都向着自己的相反方向演变，似乎更靠近了对方。于是也就引起了两党支持者的队伍发生“对流”现象：共和党曾经因反对黑人奴隶制而受到广大黑人的拥护和支持，黑人成为他们稳定的选民群体，但是20世纪初共和党转向保守，抛弃了黑人，共和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塔夫脱都坚持种族歧视。塔夫脱说：“我绝对不会稍稍偏离我的南部政策。……我不会在南部任命黑人为官员。……我不会放弃在那里建立一个像样的白人政党的希

① 伯恩斯等：前引书，第352页。

② 张定河：前引书，第332页。

望。"[①] 这样的政策当然受到黑人的反对，许多黑人转而支持民主党，如在1912年大选中，杜波依斯也支持了民主党的伍德罗·威尔逊。本来支持共和党的劳工也转向民主党。威尔逊时期的有利于劳工的某些立法吸引了劳工。共和党维护企业界的政策把劳工赶向民主党。同时两党内部都出现分化现象：党内形成了各自较为稳定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不同党的相同派别的成员们的观点更为接近趋同。

1908年一位杰出的新闻记者评论说："两党犹如两个瓶子。每个都贴着表明所盛液体的标签，但每个都是空的。"[②] 话虽尖刻了些，但很形象生动。美国两党在根本政策上的差别除了一些特定历史时刻有所表现外，历来就不是非常巨大和不可调和的，而且两党的这种政纲和宣传仅仅是一种为了获取选票的美丽包装，准备将它实行的程度和可行性甚至连党魁和政客们也心中无数。美国学者劳森认为美国两大党的争论焦点一般可以归纳为：1. 财富在国内的分配问题；2. 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适当作用问题。但是不能由此认为这种区别非常尖锐和不可调和。"虽然在一个既定时刻，根据他们的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根据他们的外交政策立场，政党间相互能被粗略地加以区分，但是他们的区别决不是非常巨大的。甚至在这些基本差别上偶然会出现一些非常明显的例外。"[③]

20世纪初年美国两党的这种趋同性表现更为显著，在政纲上两党事实上已经成为没有多大实际内容的两个"空瓶"。根据

---

① 小施莱辛格主编：《美国共和党史》，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28页。

②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218页。

③ 凯·劳森：《美国政党和民主》，杰尔斯·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纽约，1968年，第34—35页。

劳森的统计该时期两党在竞选中的主要争议事件是：1900 年是银币问题和帝国主义问题。即自由铸造银币运动，1896 年民主党人将自由铸造银币列为政纲的主要条目，并提名提倡此说最激烈的布赖恩为总统候选人。但因共和党获胜，1900 年大选民主党再次提出银币问题。共和党再次获胜。后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通过金本位制法案，规定美国货币的惟一本位是黄金。1904 年大选是托拉斯和关税问题；1908 年是托拉斯和关税问题；1912 年是腐败和大企业问题；1916 年是战争问题；1920 年是恢复常态问题；1924 年是繁荣问题；1928 年是经济状况，禁酒和宗教问题。但是两党在上述问题上的主张和政策不完全是对立的，更不是水火不容的。虽然有些问题在竞选时两党的歧见似乎很尖锐，争论十分激烈，甚至“势不两立”；但是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以后，两党关系往往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这在美国历史上是有传统的。1800 年，杰斐逊总统击败联邦党总统亚当斯人主白宫，不久他就宣称：“我们都是联邦党人，我们都是民主共和党人”。其次，两党内部也政见不一，民主党领袖克利夫兰反对民主党的自由铸造银币政策，他上台后基本奉行了共和党的政纲；共和党和民主党内部都形成了保守和自由两大派，共和党领袖西奥多·罗斯福后来与共和党主流派发生分歧，另立山头创建进步党；民主党总统威尔逊执政时的政策与共和党的罗斯福有很大的相似性和连续性，坚持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政策，都可归结为进步主义的框架内。

两党的趋同与两党的内部结构成分的变化也直接有关。

〔两党成分的变化〕　20 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已今非昔比，社会结构发生大变动，阶级和阶层出现重新组合，以前那种较为简单的农业社会结构被复杂而多层次的工业社会结构所取代，大量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宗教背景的移民的涌入，更使复杂的社会

结构添加纷纭变化的可变因素。这就导致美国两党的内部构成和成分产生变异。20世纪初加入两大党的民众已经不是昔日的美国人。内战前，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成分受政治观点影响较大，共和党以反对南方黑奴制的北方人士为多，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北方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还包括北方工人阶级等等；民主党的主流派为保守的南方种植园主阶层。两党在政治上有明显的区别。但是到了20世纪初年，诚如英国布赖斯勋爵在《美利坚共和国》中写道："现在美国政党之所以继续存在，因为他们已经存在。"① 由于两党的组成已不再是按政治立场和信仰决定，而按照经济利益和阶层利益决定。霍夫施塔特认为内战后的美国政党是基于恩施而不是原则；他们的分歧发生在分赃上而不是事件上。"② 此话十分中肯。

所以一般说来，根据小施莱辛格的研究，共和党作为老大党更加是殷实的中产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的党。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它一直能掌握40%的起作用的选举人。因为当时在美国，就能得到的经济上的机会来说，本地人要比外来移民多，新教徒要比天主教徒多，西北部的欧洲人要比东部和南部的欧洲人多。其结果在老大党内更多地集中了白领工人和技术工人（1900年美国的白领工人将近600万）、富裕农民、中产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城市居民、小商人、专门职业人员和一般受过教育的人。"③

随着资产阶级财力和权力的壮大，共和党内部聚集起大批企业家、实业家、银行家和公司巨头是顺理成章的逻辑发展。"实业家、金融资本家和大公司经理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共和

---

①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前引书，第218页。

②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前引书，第218页。

③ 小阿瑟·施莱辛格主编：《美国共和党史》，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08页。

党。”但是很少大实业家或金融家本人亲自在党内或政府内任职，只是大企业中的许多第二级领导人，特别是铁路和大公司律师，担任了由选举产生或任命的高级职务。例如，1869年至1901年，合众国参议员中有1/3的共和党人是企业家出身，而民主党人中只有1/7……企业家和专业人员所占比例这样高，这就保证了共和党可以源源不断地输送能干的人员到大部分城市、州和国会担任各级领导工作。”[①] 经过共和党和政府部门的这种人员交流循环，共和党内的有钱阶层不断扩大。当然在共和党对政府的控制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还是共和党派遣到国会去的那些人的经济思想。他们受到地区和州的利益的驱使，又因为他们是依赖企业的大部分竞选资金来源获取选票跻身政界的，所以他们的经济主张和政策倾向昭然若揭，何况许多共和党人本身就是企业家，或者通过他们的律师业务而同企业有思想上的联系。垄断大财团支持和资助共和党竞选，共和党获胜后再通过共和党成员控制国会，制订有利财团的一系列政策，回报财团的恩施。世纪之交，由于共和党长期执政，国会里形成了一个共和党的小核心控制了立法程序。由“乔大叔”坎农领导，小核心几乎形成了独断专行的恶劣作风，操纵政治，玩弄权术。“1894和1910年之间共和党控制联邦政府达到了美国政治史上罕见的程度。”[②] 所以共和党对劳工漠不关心或者持敌视态度。[③]

与共和党不同的是民主党得到比例较高的工人的支持，特别在与人民党合并以后，民主党中的农民比例增高。但是民主党中仍有相当比例的中产阶级和上层企业家，在党内占决策主导地位

① 小施莱辛格主编：前引书，第208—209页。
② 海斯：前引书，第144页。
③ 小施莱辛格主编：前引书，第209—211页。

的还是有产阶级。尽管两党的结构成分上存在差异，因此也影响了它们的经济主张和外交政策，但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基本事实是两党都与某些美国大财团相联系。两党都要依靠财团作为后台老板提供竞选经费和资助。南北战争后，美国南方逐渐形成了一个富裕的农业资本家阶层，随着南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进程，美国南方的大企业家和金融家也相继崛起，他们和民主党建立了紧密联系并往往成为民主党的“主心骨”。如犹太金融集团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是民主党的一个大后台。美国实业家休伊特在19世纪80年代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纽约市市长，击败共和党的西奥多·罗斯福。工业家、发明家麦考密克都全力支持民主党。财团支持两党竞选，党的领袖作为新的企业政治家的仆人而不是主人发挥作用。企业影响政党和操纵政党机器最典型的实例是，马克·汉纳是美国操纵竞选运动的实力人物，原在克利夫兰开煤铁公司，后又投资银行、运输和出版业。他支持共和党人威廉·麦金莱1892—1896年为州长，1897—1901年为总统。1896年竞选时期，他筹集350万美元向各地派出1400名人员，散发千百万本小册子，为麦金莱效力。麦金莱上台后即任命参议员谢尔曼为国务卿，让汉纳补其缺成为参议员。又如：前参议员托马斯·普拉特曾一度控制纽约州的共和党，在1900年操纵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这时期，美国两党内部滋生出一批党魁，他们不是合法产生的领袖，而是一些在党内有势力的职业政客。他们为垄断资本服务，仰资本家鼻息行事。

在一些根本性的政策上，民主党和共和党几乎没有原则性的差别，这是两党趋同的最基本的表现。如：在对待工人运动问题上，两党均采取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基本立场，只是在处理方法上略有差异；在关税政策的反复修改和制订中，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大都主张保护关税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或通过妥协

调和保持适当税率。在对外政策方面，两党的立场几无差异，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对外扩张主义外交政策，包括对远东和中国的侵略政策，“得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决策者几乎毫无保留的支持，并使国家更深和不断地卷入远东事务中去。”[①] 两党的趋同还反映在他们的地区差异日益淡化和消失。原先独占南部的民主党现在向西部、东北部扩展；共和党则在城市中占较大优势。由此可见，20 世纪初，美国的两党制发生了某种变化，政党制受到垄断资本和经济势力的重大影响，更加商业化和企业化，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党本身也变成了一个企业，一家股份公司。谁的股份大谁的发言权就大，谁的经济实力强大，谁就在党内具有决定性的地位。诚如西沃德所说：“一个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家股份公司，那些在其中贡献最多的人指导行动和管理有关事务。”[②]

20 世纪初，美国两党几无重大原则上的分歧，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谁都不是依靠他们的原则和纲领取得竞选的胜利，不是依靠他们政纲的先进和科学，不是因为他们的内外政策更符合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取得胜利，他们获胜的法宝是经济势力和政治手段。“共和党获胜所依靠的真正本钱，看来集中在金钱、组织和灵活运用戴维·希伦所谓的政治交易这三方面。”[③] 这是较为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但是权钱交易必然引起腐败。

两党制的演变和政党的腐败引起人民的严重不满，从 1890 年开始，为了民主的利益应将政党活动加以控制的想法进一步在立法中获得表现。“许多州通过了‘反腐败行为’条例。起初这

---

① 小施莱辛格主编：前引书。第 250 页。
② 转引自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 219 页。
③ 小施莱辛格主编：前引书，第 215 页。

些法律几乎无人理睬。但是在1904年选举以后，运动复活了，各州和联邦政府都采取了额外的措施。1907年联邦法铺平了道路，1911年的联邦法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这些规章的目的是为竞选运动的收支作出规定……”。[①] 塔夫脱政府于“1910年初，又在两项重要政治改革方面采取了初步措施。第一个是要求公布有关国会议员选举的费用的法案。在全国性的选举中，所有捐助竞选基金的人的姓名、捐款的数目以及竞选委员会一切费用的分类账目，都必需加以公布。第二个是关于成立节约与效率委员会来研究政府行政单位办事方法，以便消除浪费的方案。”[②] 可见美国的两党制尚处在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之中。

〔第三党运动的发展和变化〕　第三党在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早在1826年就有反共济会党，后有美国党（无所知党），脱离联邦派的民主党，宪法联盟等等，这些小党一般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他们虽曾多次企求取代两大党的地位，但都在全国竞选中败北；但有的小党如1848年成立的自由土壤党，党虽小，影响很大。它提出的“土壤自由、言论自由、劳动自由、人民自由”的口号受到小农、小贩和工人的支持。有些小党在州或地方竞选中获胜，但对全国没有造成影响。美国学者凯伊认为美国的第三党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是具有连续政纲的党，如德布斯领导的社会主义党；一是反复产生但存在时间不长的党，如1826年建立的反共济党，这些政党不是从一个大党中分裂出来就是产生于某些利益集团的联合。[③] 内战以后，第三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直到20世纪30年代。期间，特别在19世纪90年代，

---

① 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1865—1917》，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70页。

② 杜蒙德：前引书，第165页。

③ 凯·劳森：前引书。第45—46页。

美国平民党运动开启了第三党运动的新阶段。诚如凯·劳森所评价："1892年平民党（也译人民党）的建立标志着美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和最有影响的第三党运动的开始。"① 在这"最有影响的"第三党发展时期中，第三党的发展呈现如下特点：1. 发展迅速，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批第三党相继在美国政坛出现，如绿背党，禁酒党，平民党，社会劳工党，美国社会党，罗斯福的进步党和拉福莱特的进步党等；2. 发展规模扩大，如人民党和进步党都颇具规模，有很多的拥护者，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对两党真正构成了史无前例的威胁；3. 在竞选中发挥的作用增大，第三党有自己独特的政治纲领，很可观的选民群体，得票率提高；4. 第三党往往在大党的分裂中产生最后又被大党"吞食掉"，19世纪90年代的平民党和20世纪初的进步党的兴衰都是沿着这样的轨迹变化的，都脱离不了这个怪圈。

世纪之交，美国工业化带来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巨变，促使不同社会阶级和阶层对社会发展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和主张，但是由于垄断资本对两党的控制导致两党趋同，老大党和民主党已无法反映他们的社会政治要求，所以渴求建立新的政党提出他们本阶级或本阶层的政治主张，形成为一种强大的趋势。所以说，两党的趋同成了产生第三党的一个客观条件。其次，两党内部的分裂也为第三党的出现提供契机。20世纪初年，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内部都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自由派和保守派，这些党内的政治派别往往成为新党形成的基础。再次，"镀金时代"规模巨大的平民党的兴起，虽然它在1896年同民主党合流，政党的躯壳脱去，但平民党的政纲犹在，后来平民党的这笔政治思想遗产成了20世纪初进步党的"灵魂"，平民党的某些政纲后来为进步党"所

① 凯·劳森：前引书，第48页。

接受”。最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美国人民参政议政的意识大为加强，民众对政治的兴趣日增，如美国妇女为争取选举权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进步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崛起。参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在 1908 年指出美国经济被不到 100 人的富人们所控制。1909 年他创办《拉福莱特周刊》，后改为月刊并改名为《进步》。1909 年后国会中进步派力量大增，最为著名的进步人士有乔治·诺里斯和威廉·博拉，拉福莱特成为国会中进步人士的领袖，是“三个出色的改革运动领袖中最伟大的一个。”[①] 1911 年在他的领导下组成共和党进步同盟，与党内保守派抗衡。后来，同塔夫脱分道扬镳的罗斯福脱离共和党组织了他们自己的代表大会，于 1912 年 8 月 5 日在芝加哥召开大会，阿尔伯特·贝弗里奇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主张改革的政治纲领，赞成直接预选，创制、复决和罢免权等改革措施；赞成妇女选举权和制订防止政治腐败的措施，赞成禁止童工和 8 小时工作制等等，大会以欢呼的形式提名罗斯福为总统候选人。进步党作为第三党参加 1912 年大选。在这场驴、象、“雄麋”大战中，选举最后结果是，罗斯福仅获 88 张选举人票，选民票为 4119507 张，得票比例为 27.4%；威尔逊则获 435 张，选民票为 6293019 张，民主党获胜。作为第三党的进步党在选举中失败。后来，进步党建议提名罗斯福为 1916 年大选时的总统候选人，罗斯福拒绝后提议他的朋友亨利·洛奇为候选人。

另一类第三党在 20 世纪初的美国依然继续存在，即具有持续性的政纲、存在时间较长但并不谋求立即在大选中获胜的政党，当时有影响的是美国社会党，他们提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激

① 杜蒙德：前引书，第 157 页。

进纲领，也参与1912年大选的角逐，党的领袖德布斯获得901873票，比例为6%，取得了重大胜利。

1924年，新的第三党，即拉福莱特的进步党复出政坛。在政治倾向上这个党是更纯粹的平民主义。一些对民主党和共和党政纲和态度不满意的力量：铁路工会，非党联盟和其他的农业集团，社会党和其他许多的改革领导人在进步主义的旗号下提名拉福莱特为总统候选人。努力实现平民主义纲领，坚持劳工的组织权，主张铁路和水力资源公有化的必要性，国家要为农民利益保证农产品价格，对行政部门进行“大清扫”。与原先的平民主义相较，它更多地向工业劳动者发出了呼吁。在1924年大选中，进步党获13张选举人票和1/6的普通票，最后还是一部分成员并入了民主党，部分转为共和党。1925年拉福莱特逝世后进步党随之解散。此后，第三党运动进入低潮，禁酒运动、天主教和坦曼尼协会等政治力量在1928年的大选中，如同1924年后的拉福莱特的进步党一样都消失了。

从19世纪90年代平民党到20世纪初的进步党构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三党发展最活跃、影响最大的阶段。它们的兴衰与两党制的演进有何关系？

首先，第三党的出现和参政本身是当时美国政治体制演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它的出现和兴衰反过来又深化了这种变革。美国的政治体制包括两党制在20世纪初暴露了不少问题。作为第三党的进步党在形成过程中提出了进步主义理论和政纲，极力主张改革，对政治上的腐败进行全面抨击，他们不仅推动改革，有利改革，并成为一支重要的改革力量。同时，第三党的出现和活动也有利于美国社会的稳定，一些对两党不满的政治力量可以通过第三党提出他们自己的政治要求和主张，第三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一种缓解社会矛盾，调适社会关系的一种政治机

制，促使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向稳定方向转化。

其次，第三党的出现不但没有影响美国两党制的存在，相反却巩固了两党制的继续发展。“看一下美国第三党运动的历史就好似仅仅加深了我们对两党控制趋势的印象而已。”[①] 19世纪90年代平民党的存在和消亡最后加强了民主党，同样20世纪初进步党的形成对两党制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无论如何，平民党或进步党等都无法取代民主党和共和党。第三党只有成为第二大党时才有可能赢得总统选举，“少数党只有在政党制度经历一个激进转变，一个大党在解体进程中才有可能期望获得总统选举的胜利。”[②]

第三党的出现和消失促使两党的趋同。在思想上，第三党提出的主张经常被两大党所吸收，从而分别丰富了两党各自的政纲。其结果之一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原先两党的对立立场，如1912年大选中，民主党威尔逊吸收了进步党的许多主张。在组织上，第三党常常成为两党不同派别成员交流的工具。如共和党的自由派在大选中可能加入第三党——进步党，选举结束后，它们往往成为民主党的成员，反之也然。第三党的出现“结果似乎经常是两大党的思想阵线发生轻微变动。甚至可以把共和党在政治上由左向右，民主党由右向左的逐渐转变看作为一系列的运动。在这些运动中使选民流动的主要运输手段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消失了的第三党运动。……这些运动好像已经吸引了较自由的共和党人转而进入民主党，迫使该党较保守的成员们出党，在共和党的领地里去寻求新的居所。”[③] 劳森认为“第三党运动的纯

---

① 凯·劳森：前引书，第45页。
② 凯·劳森：前引书，第45页。
③ 劳森：前引书，第50页。

结果也许不是削弱而是加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两党制度。”① 关于第三党和大党的关系，V·D·凯伊概括地说：少数党“出生于政治混战的中心，它们在疲惫地从选举到选举行进时，依次影响了大党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②

美国两党制的演进同美国人民的斗争分不开的，其中美国人民的反政党主义的思潮起了一定作用。这种思潮在美国人民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且不断冲击两党制，促使其进行变革。“日益增长的非政党选举和国内政党改革运动的兴起，增长着的选民投票中独立的非党投票趋势，反映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居统治地位的美国反政党主义。”③

美国的两党作为沟通美国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桥梁而存在，但是这种“桥梁”还是难以满足参政意识日益提高和强化的美国民众。

〔利益集团的活跃〕　美国政治中又较大规模地发展出了“利益集团”这个发达工业社会政治体系中“次体系”④，构成20世纪初美国政治体制变化中的又一亮点。

对利益集团的定义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压力集团：有相同利益的人们联合起来设法影响立法和其他政治决定以有利于自己的目的，但并不谋求正式控制政府。”⑤ 劳森在回答何时一个团体就能成为压力集团时说：“压力集团就是一定数量具有某种公共态度，并为实现由公共态度而产生的目的向其他集团（或个

---

① 劳森：前引书，第50页。

② 转引自劳森：前引书，第49页。

③ 乔伊斯·吉尔伯和玛里安娜·帕利：《美国政党政治的传统和变化》，托马斯·克劳维乐出版公司，纽约，1975年，第305页。

④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07页。

⑤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卷，第751页。

人）提出某种要求的个人。”他还认为压力集团具有 4 个要素：即有一定数量的成员；这些成员必须有一个目标：这些成员必须相信存在一个值得他们去施加压力的对象，即必须有一个他们认为可以施加压力并有利于实现他们目的的对象——集团或个人；最后，集团一定相信他们具有一种有效实施压力的手段。① 有学者认为“有一类团体是‘利益集团’，又称‘压力集团’，也就是一群人组织起来为追求共同利益而对政治过程施加压力。”② 阿尔蒙德从比较政治学和结构功能主义的原理出发则将利益集团作为工业社会现代政治体系中的一个次体系。

利益集团种类繁多，组织各异，“有些是正式的协会或组织，另一些根本没有正式的组织。几个利益集团甚至可能存在于一个组织之内。……一个利益集团可以比一个具体组织范围或广或狭。”③ 从利益集团的性质和内涵加以区分，大致有经济利益集团，宗教利益集团，性别利益集团，族裔利益集团，有政治利益集团，甚至有娱乐方面利益的等等，不一而足。但其中尤以经济利益集团为主。加里·沃塞曼认为美国的利益集团中最大、最重要的是经济利益集团，它可分为企业集团、专业集团、劳工集团和农业集团。还有按照宗教、社会和政治利益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各种经济利益集团的具体经济利益不同，企业集团在所有各类组织中，它的联合会“最为纷繁众多。数千个全国性的同业公会和地方团体……在获得利润这一点上有共同利益。其中的主要代表有美国商会，全国制造商协会和全国小企业协会等等。专业集团则以某种职业或专业作为纽带组织而成的集团，如：美国医

---

① 凯·劳森：前引书，第 100—101 页；

② （美）加里·沃塞曼：《美国政治基础》，第 181—182 页。

③ 伯恩斯等：前引书，第 238—239 页。

学会、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学会和律师学会等等，所有这些集团在华盛顿都有强大的院外游说活动，对立法程序有较大的影响力。劳工集团中美国的工会组织是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他们一般都为劳工的经济利益影响立法机构，以作出有利于劳工的政治决定。农业企业利益集团建立很早，规模大、历史长，有很长的、影响很大的游说活动历史。集团中的美国农场局联合会、全国农场主联盟和全国农场主协进会是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几个。除经济利益集团外，在美国“有些利益集团是按宗教、社会或政治利益组织起来的。像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城市联盟，南方基督教徒领导会议等；有些利益集团，如自由主义的‘争取民主行动美国人’（ADA）和保守主义的‘争取宪法行动美国人’（ACA），分别代表具有类似政治观点的人们。”[①] 此外，还有以性别或族裔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与按经济利益或职业组成的社团相交错，或按种族的、或按性别的、或按意识形态的、或按娱乐的和其他的关系组成的集团。还有一些单项性质的利益集团，仅仅因为某一项“单一目标”，或经济或政治或宗教或性别的主张相同而结成的集团，向立法机构及其成员施加影响，如 19 世纪 90 年代的禁酒同盟就是一例。他们就是致力于禁止含酒精饮料的销售和制造的。就总体而言，美国人较为喜欢参加各种社会团体，并且愿意为争取自身（或集团）的利益进行不懈的努力。“美国人成为一个以上职业团体的成员的并不多，但是他们却有无穷无尽的非职业性的利益集团，而且往往在感情上和财力上更倾心于这些利益集团。”[②]

各种社会经济集团在美国出现较早。

---

① 沃塞曼：前引书，第 183—184 页。

② 伯恩斯等：前引书，第 252—253 页。

利益集团（或压力集团）的大量涌现和积极影响立法机关是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事情，20世纪初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里有三个历史条件值得注意。第一，随着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垄断化的历史进程的推进，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从多方面影响了政治体系。总的来说，这些变化既大大提高了为解决新问题而协调社会行动的需要，又增加了社会成员扩大政治参与和广泛表达政治要求的可能性。”① 原先的劳工组织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政治斗争的技巧方面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全国性的工会组织成为美国参加成员数量最多、影响力最大的社团。该时期农场主利益集团表现得最为活跃，院外活动十分频繁。企业界的各种大大小小的联合会风起云涌，1912年终于形成了全国性“联合会的联合会”的美国商会；现代工业的发展是现代劳工组织和企业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第二，美国政党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世纪初年，两党制暴露出一些问题，两党无法反映许多利益集团的意见，需要建立次级的政治系列作为两党的补充。“进步主义时期民主党和共和党构成了美国政治表现的主要渠道。可是，许多集团发现这些组织没有反映他们的利益。最后，他们需要对现存的政治表现的形式作重大的修改，创立新的超党派的政治技巧。”② 所谓超党派的政治技巧，就是在两党之外建立利益集团，企业家们组成了“百万富翁俱乐部”，参议员们来自不同利益集团，而不是来自不同的州。他们希望在两党制正常运作的框架外部建立一个对政府的决策过程发挥影响力的一个新的结构和运作程序。“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美国的政党组织太适合于表达特殊利益或特殊立场。利益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填补

① 阿尔蒙德等：前引书，第230—231页。

② 海斯：前引书，第152页。

了这个空白。"[1] 这就是20世纪初美国出现大量利益集团及其频繁活动的政治基础。第三，美国民众在实践中发现组织第三党并不能有效反映他们的利益，而且第三党本身命运多舛，自身难保。所以建立利益集团影响立法程序成了他们能够采取的最为有效的手段和方法。"有组织的劳工和农民在80年代和90年代参与党派活动遭遇不幸经历后不再参加第三党，他们精通非党派的'压力集团'活动的技巧。1910年，他们在国会组织了利益集团——由15名强者组成的劳工集团，1921年第一次组织了农民集团……"[2] 最后，利益集团大量形成和参与政治活动与美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参政意识的提高也有着必然联系。

20世纪初，形形色色的名目繁多的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土壤上滋生繁衍。"到本世纪初，强大而独立思想，主要代表行业工人的全国性工会联合会美国劳工联合会是主要组织。"[3] 这些工会组织为求得生存就必须成为压力集团，或者说这些工会组织必须具有压力集团的功能。劳工集团和企业集团在经济利益上是对立的，所以劳工集团经常遭遇到来自企业集团的反压力。由于企业集团有强大的经济势力和人才，他们在20世纪初与最高法院关系融洽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劳森认为："劳工的政治活动经常被归入到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成员福利这一类。然而，开始时劳工和他的朋友必须给予政府以强大压力作为保证它作为压力集团的存在的手段。劳工的第一次战斗是为争取权利组织、管理集体交易（与资方谈条件）和罢工，所有这一切都面临来自企业团体的沉重的反压力。因为企业集团在20世纪初的30年里受到一个

---

① 沃塞曼：前引书，第181—182页。
② 海斯：前引书，第154页。
③ 伯恩斯等：前引书，第251页。

最合作的最高法院的支持。”[1]

除了工人组织外，1902 年成立了农业组织：农场主联合会，它是在 19 世纪后期全国格兰其协会即保护农业协会的基础上成立的，明显地代表了美国大平原诸州的农场主的利益，并为争取保护小农场的立法而斗争。美国最主要的农业压力集团起源于 19 世纪后期对农业教育的需要。如 19 世纪 70 年代出现的农民组织：格兰其和 1902 年建立的全国农民联合会等等。企业界的联合会”则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数以千计的全国性的同业公会和地方团体纷纷应运而生，终于在 1912 年汇合成立了美国商会。美国商会是众多联合会的联合会，由几千个代表数万个商号的地方商会组成。在大部分问题上与美国商会结成松散联盟的是全国制造商协会。该协会于 1893 年萧条之后不久成立的；自成立以来，它一直倾向于代表比较保守的美国企业讲话。然而，一些较小而不知名的组织有相当大的势力。1916 年成立的协商委员会进行实际问题的研究，力图使公众了解企业在经济中的地位。[2]自由职业者们也组织了一些诸如美国医学协会、美国律师协会等全国最强大的联合会。

利益集团向立法机构及其成员施加政治影响的途径，詹姆斯·伯恩斯将其大致归结为：劝说、诉讼、制订法规、竞选活动和院外活动。其实各类罢工、示威等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看作为利益集团影响立法、给政府立法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

各类途径中，院外活动是利益集团经常采用而且十分有效的武器。世纪之交，美国利益集团利用“院外活动”这个武器影响立法盛极一时，蔚然成风。院外活动也有多种形式，如：各种上

---

① 凯·劳森：前引书，第 108—109 页。

② 伯恩斯等：前引书，第 252 页。

述利益集团的成员直接进行院外活动，或出资聘请专业院外活动者代表他们活动。具体形式繁多：利益集团的代表可以出席立法委员会会议，收集信息施加压力。一些公职人员可以被集团邀请到各种适当场所（甚至私人家里）进行长时间交谈。利益集团可以组织人员向公职人员或有关机构写信、打电话以表达他们所谓的意见和主张，并可以造成相当的声势，有的集团甚至扬言在不很长的时间里可以向政府发出几十万封信件，以示该集团之雄厚势力。利益集团可以在竞选中，为了达到目的向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提供金钱或其他物质和其他服务。为了对政府立法产生重大影响，集团要以组织各种运动如发动宣传攻势。有的集团或个人还可以向立法委员会提供有关争议问题的研究成果给立法委员们参考采纳。院外活动在世纪之交的美国十分活跃，其中取得最富戏剧性效果之一的就是禁酒运动。禁酒同盟（也译联盟）”在反对“该诅咒的酒”多年之后，通过大量的院外活动竟然设法使一项宪法修正案，即第 18 条宪法修正案于 1919 年 1 月 16 日在国会获得通过，成为美国的根本大法，这当然是美国立法中最高的也是最难的成就。1919 年 10 月 28 日，美国颁布全国禁酒法案（通称沃尔斯泰德法案）。同样富有戏剧性效果的是，“反对禁酒派”的院外活动集团也同样强大和成功，它竟然达到了废除禁酒修正案的目的，1933 年他们使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第 21 条，该条第一款宣布：“合众国宪法修正案第 18 条现予废止”。在美国禁酒运动中曾经形成过“禁酒党”获美国基督新教派的有力支持。在禁酒派的院外活动中反沙龙联盟成了 20 世纪初美国游说禁酒的主要组织，它于 1893 年在俄亥俄州建立，1895 年成为全国性组织。它要求各级政府通过立法手段继续禁止酿造和销售酒类。1919 年通过宪法 18 条修正案（禁酒）后，它大力推行禁酒法令。20 世纪初，美国宪法关于禁酒的第 18 条修正案的兴和废，可见禁

酒派和反禁酒派的院外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竟然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最高立法，最后使立法机关作出有利于他们各自集团利益的决定。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院外活动的兴盛是美国20世纪初政治体制变化的一个侧面，与此同时院外活动的弊端也引起美国公众的关注，加强院外活动的管理成了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新课题。院外活动的弊端早在19世纪最后30年里就开始为世人所瞩目，也被媒体揭露和曝光。1873年揭露内战后信贷公司收买国会议员企图操纵联合太平洋铁路建设合同。1877年佐治亚州把院外活动视为罪行写入州宪法。20世纪初自由派报刊指责公司把数以百万计的金钱投入本杰明·哈里森和威廉·麦金莱这类候选人的竞选活动，本世纪头10年中，国会立法宣布公司在联邦选举中捐款为非法，并且要公司公布钱款的用途。1925年国会通过联邦反腐败法，规定参议员和众议员候选人以及谋求在一个以上的州影响联邦选举的政治委员会，须在选举前和选举后提交款项收支的公开报告。[①] 对院外活动的管理和控制也是院外活动这个美国政治次体系走向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使其既能发挥某些填补政治空白的作用，作为对两党制的一种补充，又使其不能违背美国政治的游戏规则，在美国正常的政治机器内部运作。

利益集团或压力集团与政党的关系，从组织角度看，一般说政党比利益集团更为严密，但是因为美国的政党比较松散，相对而言，美国的一些利益集团有更为严密的组织，因为集团成员有较为具体的经济利益和共同为之奋斗的具体目标，在感情上也更为融洽较易沟通。沃塞曼认为：利益集团通常比政党组织更为严密。他们通常以捐款或会员交纳的会费作为经费。组织者通过简

① 伯恩斯等：前引书，第270—271页。

讯、邮寄品或会议，与会员取得联系。例如工会会员经常从领导那里收到定期通讯，通知他们有关工会的活动和福利事项，以及希望他们支持的立场。”① 相对利益集团而言，政党活动缺乏这种经常性，除了大选等特殊时刻外。从他们两者的功能和作用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集团与政党有着密切的关系。利益集团既是政党的组成部分，又是政党的竞争者。当利益集团强烈表明他们属于某一个政党并在这个政党内进行工作，影响政府决策达到它们的目标时，这个压力集团能被看成是某一政党的组成部分；但是当他们声称代表（正确或错误地）集团成员的利益，直接向政府官员施加压力希望通过与某政党不同政策的时候，他们能被看成是某政党的竞争者。事实上，大多数集团几乎同时起着上述两方面的作用。② 两者发挥作用的渠道不同。政党主要期望通过大选选出该党的总统提名人作为美国总统，从而控制美国的政府机器实施该党的政治纲领；集团并不谋求控制政府，也不依靠选举机器定期活动，只是利用劝说、交谈、院外活动、开展运动等等手段，通过影响立法机构或立法者、司法机关及其成员作出有利于实现该集团目标的决策或立法。

利益集团期望对立法机构及其成员施加影响获得自身利益，然而，立法机构本身在20世纪也出现了某些值得注意的重大变化。

四、国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国会是美国的最高立法机关，根据美国的政治游戏规则它应

① （美）加里·沃塞曼：《美国政治基础》，第181—182页。

② .凯·劳森：前引书：第117页。

该是代表民意制订法律的最高权威的机构。20世纪初年，如果说在三权分立政治的格局上权力重心偏向总统，出现了以总统的行政权力为重心的新格局，那么国会的变革是朝着立法程序更为完善的方向变化。在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垄断化的总背景下，促使国会变化的最基本原因是美国国会中的腐败现象，因为权钱勾结，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严重破坏了美国立法机构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如不加以改革就会失去民众的信任，动摇美国政体的基石，破坏政治游戏规则，在进步主义时期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国家的问题能够被归结为“利益”和“人民”之间的权力斗争，垄断资本对政治的操纵并利用攫取到的权力进一步侵犯人民的利益。国家的灾祸源于垄断，日益增长的企业集中正在扼杀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用政府立法来规范商业的手段对付垄断，即利用国家干预调节经济领域中的各种关系，遏制过度的集中和兼并。但是企业和政治的紧密结合堵塞了立法机关的通道，权与钱的密切结合使规范商业的立法难以通过，即使通过了也难以执行。人们经常发现在每一次反对变革行动的背后就有一个公司在那里作怪。美国黑幕揭发者的重要作家林肯·斯蒂芬斯收集了大量有关企业家为谋取特权收买政治家的证据，在他的作品中清楚地揭示了企业资助两党，决定选择候选人，为了扼杀对抗公司的法案进行暗中疏通的种种黑幕。所以，政治改革必须从立法机关开始；一旦“人民”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而不被企业的影响所牵制，他们就能解决他们的问题。[①] 国会改革成为国会体制变化的直接推动力。

国会体制的变化还基于美国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为适应现代化政治的需要国会必须进一步完善自身。为了适应美国民众

---

① 海斯：前引书，第141页。

参政意识提高和人口增长等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为了保证在复杂的政治、经济、国际形势下的立法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必须完善立法程序和立法机构。总之，国会的变化在两个方向上进行：一是为抵制腐败，一是为了适应新形势。

〔国会发展的现代时期〕　美国国会自建立以来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国会又在前现代的基础上发生了一些新变化。①

国会议员提名与选举方法的变革是意义深远的。1900年约有2/3的州通过法律，实行预选会制度。最重要的是1913年国会又通过宪法第17条修正案，对国会参议员选举进行了重大改革，由州议会选举改为普选，与众议员选举同期进行。"宪法原规定参议员应由各州议会选举。其目的是不让广大的公民参与竞选，而保证由较保守的人士来挑选参议员。这一程序后来由1913年通过的第17条修正案修正。现在参议员由各州有选举权的人民选举，与其他由选举产生的官员一样。"② 由各州民众直接选举参议员是一种进步，既能保证民意的表达也使参议员受到"乡民"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参议院的保守性。与此同时，国会议席也最后确立。1911年，国会根据1910年的人口普查，通过法律将众议院席位确定为435人。"1922年，国会通过一项法律规定众议院人数最多不得超过435名。"③ 1929年国会通过一项议席分配法，将众议院议席总数永久固定为435人。

国会政党组织的健全是国会变化的重要方面。这是一个涉及美国国会和政党制相互交叉的政治机制问题。美国的两党除了主

---

① 张定河：前引书，第194页。
② 沃塞曼：前引书，第71页。
③ 沃塞曼：前引书，第69页。

要在提名总统候选人的政治职能外，如何在立法领域发挥政党作用，政党通过什么渠道在国会中起作用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完善国会政党组织的改革在20世纪初显得十分迫切。有关改革首先是从参议院确立政党领袖体制开始的。1911年民主党首先决定由参议院民主党党团会议主席任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共和党于1913年步民主党后尘，于是政党领袖体制在参议院建立起来。两党在众议院则设立督导员制度，1897年詹姆斯·托尼为共和党督导员，1900年民主党也任命了该党第一位督导员。从此以后，督导员成为众议院政党的正式职位。后来，民主党在1913年，共和党于1915年也先后在参议院设立了督导员。接着就是建立政党委员会，1911年众议院民主党建立遴选委员会，1917年众议院共和党也建立遴选委员会。1919年共和党又建立政策委员会。[①] 由此可见，20世纪初年美国国会已经形成了较为健全的政党组织体制。

关于国会中的政党领袖的职能和运作，《美国政党政治传统和变革》的作者认为，党的领袖——多数党和少数党的领袖在国会两院——没有提供众议院议长以某些权力的制度上的责任，但他们对自己党的成员能施加实质性的影响。多数党领袖在众议院中作为正式和重要的职位约始于1899年。多数党领袖具有组织它们自己党的基本职责。“他们在参议院或众议院制订决定有关事务的基本日程表，以企求获得所需出席会议的人数，分配和收集信息，说服成员（通过讨价还价或施加压力）在有关个人的提案时采取特殊方式。”[②] 这些政党领袖还可以召开国会中的该党成员会议，即党团会议（有的称协商会议）。讨论该党在国会通

---

① 张定河：前引书，第194—199页。

② 吉尔伯和帕利：前引书，第284页。

过某些立法中应采取什么立场等问题，也可对党员施加压力达到政党领袖们的目标。有时人们也称国会中的政党领袖为政党首领（Whips）。他们在国会中的职责是努力保证有足够数量的票数，并且以党所选举的领导加以支持的形式通过他们所要求的法律，他们还是获得和交流信息的代理人。但是政党领袖们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和改进。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他们的活动还不是经常和全面的。虽然政党首领的作用在19世纪后期两党都得到了发展，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他们的活动还是零星的。[①] 政党领袖活动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有利于正常发挥两党在国会中的作用。

国会两院政党组织健全的原因在于国会内部两党斗争发展的结果。诚如张定河所言，这是“国会两党的政治斗争使然。”20世纪初，民主党与共和党虽然有趋同倾向，在重大问题上并没有原则性的差别，但是他们在具体的内外政策上由于受不同垄断财团或利益集团或地区利益的影响，依然有一定分歧，在国会制定立法时两党互不妥协。为了使有利于本党利益的国家法律得以通过，多数党往往利用占多数席位的有利地位施展各种手段，而少数党则采取各种手法阻挠多数党提出的立法议案，以致国会经常出现喋喋不休的争论和幕后的拉票活动以及种种肮脏的政治交易。所以，两党为了在国会的立法进程中强化党的力量和影响，就需要加强党内统一，集中力量与对方进行斗争，健全党内组织成为必然。同时，1913年参议员由州议会选举改为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之后，参议员的独立性加强，他们的地方观念胜于党派观念，他们认为自己是本地区选民利益的代表而不是党派利益的代言人，因而在投票时往往首先着眼于本选区选民而不是政党领

① 吉尔伯和帕利：前引书，第285页。

袖，以致在投票时参议员个人立场常常与政党领袖的立场存有一定距离。“为了协调本党议员的立法投票动向”[①]，也成了健全国会政党组织的动力。此外，院外活动的频繁开展加强了利益集团对美国立法程序的影响和干预，参议员由选举产生加强了地方利益对立法的影响，国会两党组织的健全可以看成是对利益集团和地方利益对立法影响的平衡和制约，即用传统的两党观念和政党利益牵制或抵消上述两种利益对立法的过分巨大的影响。

〔议长权力的减弱〕　国会议长权力的减小是国会变化的一个显著方面。众议院议长是众议院的首席官员，形式上由众议院选出，而实际上是由多数党选定的。众议院议长（the Speaker）在国会建立初期权力很小。后来亨利·克莱出任议长后议长权力出现扩大趋势。在托马斯·里德任议长（1889—1891，1895—1899）和约瑟夫·坎农任议长时（1903—1911），议长的权力达到顶峰。由于他们的权力过分巨大，所以里德被称为“沙皇”，坎农被称为“乔大叔”。1909年，坎农阻挠进步立法的通过遭到进步主义议员们的严厉抨击。1910年3月，众议院通过决议，废除议长担任议事规则委员会主席的规定，剥夺议长任命各委员会及其主席的权力，并将议事规则委员会由5人扩大到10人及由委员会选举该委员会主席。1911年坎农被迫下台。这次反议长的斗争被美国学者称为1910—1911年“革命”。詹姆斯·M·伯恩斯认为“1910年普通议员中的进步分子造反，剥夺了议长的大部分权力，包括对什么人能在国会委员会任职的控制权。……1910年的变革旨在缩减议长的权力，是作为进步的改革提出来的。”[②] 此次“革命”以后，从1911年开始，国会中的议长权力

---

① 张定河：前引书，第199—200页。

② 伯恩斯等：前引书，第495页。

减小，因而国会中的党团会议的权力也相继被削弱。相反，国会中的各委员会在数量和权力上相对增长，常设委员会经历了调整和固定。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国会众议院常设委员会的数量不断增加。1909 年常设委员会的总数达到 61 个，1913 年参议院常设委员会达 74 个。20 世纪初，国会两院已注意到滥设常设委员会的弊端，要求进行裁并。1909 年众议院裁撤了 6 个；参议院的各委员会 1921 年裁撤为 33 个。[①] 其间，国会众议院出现了委员会主席群雄并起的局面。一种新的权力分散的委员会主席领导体制逐步代替了政党领袖的集中领导体制。其实，议长权力被削弱不仅反映了国会内部的权力斗争，而且更重要的是说明了美国民众对立法机关的不满，参议员的直接民选和议长权力的减弱，“乔大叔”的权威被打倒都是美国人民斗争的产物。“在这个时期内，政府的立法部门自始至终因公众对其正直、能力和公正无私的精神缺乏信心而受到损害。地方议会和立法机关的诚实经常受到公众怀疑，而国会则常常被认为对民意关习不够——这种看法在要求人民直接选举参议员和反坎农主义的运动中充分表现了出来。”[②]

五、司法部门的变化

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以及国会随时规定设置的下级法院。”自从美国第一届联邦政府建立以来，司法部门成为三权分立政治结构中的一极，最高法院是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的最高组织，它通过审理涉及美国联邦宪法、法

---

① 张定河：前引书。第 203—204 页。

② 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1865—1917》，前引书，第 264 页。

律或美国参加的条约的案件；审理以美国为一方的争议案件；审理国内州际和公民间的争议等等，充当“调解员”和“裁判员”的角色裁决各种案例，明断是非，辨清黑白，维护社会稳定和牵制行政和立法部门的权力。它同行政和立法部门一样，都经历了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部门，联邦司法系统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20世纪初美国经济剧变，工业勃兴，社会迅速进步，但贫富悬殊，矛盾重重。法院系统面临判案激增应接不暇，同时它本身内部也受到政治腐败的侵袭，判案处理不公不平，引起民众不满，要求司法改革的呼声日增。“法院因公众对其公正无私的精神缺少信任而受到损害。司法部门在许多涉及多数人与少数人权利之争的案件中所作的判决的代表性未能满足民主的要求，而对立法的否决权虽然继续保持下去，却遭到激烈的攻击，威胁着要对它施加严格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而且付诸实现了”。[①]

20世纪初年，虽然最高法院批准了大量的重要的进步主义改革立法，接受了立法机关关于规范铁路费用和服务的立法，批准了几乎所有关于联邦政府对自然资源的合理运用的立法；但是最高法院坚持反对行政部门扩张权力的保守立场，无视当时美国社会和经济都随着内战后工业化而产生突飞猛进的变化，无视人民的要求。其实当时美国民众普遍认为，适应和管理这些变化最有效的部门就是总统的职位，所以扩大行政权力积极干预国家经济发展是民心所向。但最高法院仍然顽固地抵制州与联邦扩张管理权，虽然它所推翻的大多数法案（如最低工资法与童工法等）是美国人民所要求的。1890至1936年期间，最高法院共宣布47

---

① 梅里亚姆：前引书，第265页。

个法案部分或全部违宪。① 其中也否决了一些联邦和州的某些限制垄断和州际贸易的立法，使私人垄断资本获利，遭到反对垄断的民主人士的抗议，他们要求限制高院的权力，认为制订规章性的法律是立法机构的事情，最高法院无权干预。“最高法院利用否决州和联邦制订规章的法律，创造了一个私人企业面临最低限制的真空地带。那些要求立法机构对减低工业主义影响的集团作出反应的人，发出了要求限制最高法院权力的巨大呼声。他们认为法官们已经将法庭转变为国会的‘第三院’，裁定法律的合理性而不是裁定立法机关制订法律的权力。这样的政策事务是立法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的事，应留给选举产生的议员们去决定。”②

美国民众要求改革司法系统，司法系统必须适应变化了的美国社会经济，但是较之行政和立法系统，司法系统在20世纪初的变化幅度不是很大，没有发生一种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里程碑式的变化，没有出现司法系统在结构上和功能上的重大变异。这也许同司法系统本身所特有的稳定性、保守性和连续性有关，同它对立法的审理和裁决总是在法律制订之后，而不是在其前有关。

但是变化毕竟还是发生。首先，美国的司法和立法机关发生相互否定的牵制作用十分突出。“如果法院对一项法律的解释不合国会的意，国会往往以改写法律的方法来推翻最高法院的裁决。宪法修正案也能推翻最高法院的裁决。”③ 南北战争前最高法院曾作出了德雷德·斯各特判案，维护黑奴制度，宣扬白人至上主义，支持全国各地实行罪恶的蓄奴制，但1865年生效的宪

① 沃塞曼：前引书，第113—114页。
② 海斯：前引书，第160页。
③ 沃塞曼：前引书，第110—111页。

法第13条修正案却宣布美国领土“不准有奴隶制成强制劳役存在”，否定了最高法院的裁决。1895年最高法院裁决政府不得征收联邦所得税，但1913年批准生效的第16条修正案规定可以征收所得税，反其道而行之。

其次，最高法院维护种族主义的倾向非常严重。内战前后，最高法院的重大裁决倾向于维护黑人奴隶制度，成为种族主义的司法保护伞。重建时期又驳回民权法案。1896年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中竟然赞同种族隔离，宣称“隔离与白人优越无关”，即所谓“隔离而同等”，使种族隔离成为南方的传统。加里·沃塞曼说得好：“种族主义依然存在，对此，最高法院与我们这个政治制度的其他部门应该共同承担责任。因为在重建时期驳回民权法案并在黑人权力受到最严重摧残的1883至1937年，不去保护他们的是最高法院。使‘隔离而同等’成为白人至上主义的合法根据的，也是最高法院”。①

再次，总统任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时具有明显党派色彩和政治回报意图。总统在选用和任命法官的过程中，总是考虑政党的因素，很少从反对党方面挑选法官，同时经常用法官职位作为一种政治回报的方式。“总统选用法官同我们自己的反政党主义传统背道而驰。就总统能够使用任命法官作为政治回报而言，反政党主义似已不再存在。”② 根据美国学者的统计，作为政治恩施的联邦法官职位：克利夫兰执政时占97.3%，麦金莱为95.7%，老罗斯福为95.7%，塔夫脱为82.2%，威尔逊为98.6%，哈定为97.7%，柯立芝为94.1%。③ 可见总统和政党间进行权力交易

---

① 沃塞曼：前引书，第127—128页。

② 吉尔伯和帕利：前引书，第274页。

③ 伯恩斯：前引书，第605页。

之一斑；在大选中胜出的政党成员可以得到总统青睐被任命担任法官，作为总统对他们在选举中卖力的回报。有关总统选择同党同观点的人出任法官的原因，西奥多·罗斯福在给参议员洛奇的一封信中谈得较为坦白。他想任命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法官奥利弗·霍姆斯为最高法院法官时说："现在我想要知道，霍姆斯法官是完全赞同我们的观点，即赞同你和我的观点。……如果我竟然任命了哪一个对我们在公共生活中主张的重大国家政策不是完全清醒可靠的人，我就认为自己对国家犯了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①

当然，因为最高法官是终身制的，他的任期远远超过总统，所以这些党员在任职后与政党的联系相对淡化和松弛。

六、选举制度的改善

选举制在美国政治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一个国家在选拔公职人员过程中使用选举方法的程度的高低，即公民选举权的范围直接同政治现代化的进程紧密相关，选举制直接同民众的政治参与相关，甚至是民众政治参与程度高低的标志。"在整个美国历史上，参与政治的主要检验标准始终是选举。"② 20 世纪初美国选举制发生了三个重要变化：选举方法的改进，选举范围的扩大和选民范围的扩大。

〔**选举方法的改革：直接选举法**〕　一般而言，美国政党制建立以后，政党成了民众选择公职候选人的机器。上至美国总统、下至市镇官员大多数职位都是通过部分党员参加的代表大会

① 伯恩斯：前引书，第 606 页。

② 伯恩斯：前引书，第 305 页。

挑选和推举出来的。19世纪后期党魁势力横行，他们控制了各级政党组织；同时他们又利用政党机器控制和影响选民的选举行为，甚至垄断选票。严重损害了美国人民行使他们自己的选举权，破坏了美国式的民主。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美国改革派强烈要求取消党魁政治，极力主张实行直接选举法，不让党魁们操纵选举，左右候选人，“还权于民”。实际上，直接初选法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的克劳福德县于1842年采用过，但是在南北战争后它才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在南方正式出现。所谓初选是指选举那些准备竞选公职的候选人，或选举党的委员会成员或出席党的会议的代表的选举，“它的目标是扩大群众的参与”。① 1903年威斯康星州在改革中首当其冲，制订出美国第一部全州范围实行预选的法律。在直接预选中，特定地区里有权参加一个党竞选投票的公民，通过直接投票来选择政党的公职候选人。“为使党的挑选更为公平和更为民主，并削弱‘党魁’的权势，威斯康星州于1903年在全州范围内采用直接预选。此后15年间，各州相继采用直接预选。这种制度使一个党的每个党员都有权在预选中投票选举候选人。……直接预选被作为克服政党腐败现象的主要药方加以推广。但是，它并没有消除所有的弊病，而且还造成了一些新的弊端。预选的出现是美国的一个重要发展。”②

1905年，罗伯特·拉福莱特说服威斯康星州议会通过法律，规定通过直接选举来确定参加全国提名代表大会的代表。但对代表在会上投谁的票不作强制规定。1910年，俄勒冈通过法律要求选民在投票时必须表明他支持哪一位总统和副总统的候选人。直接选举立法机构首先广泛地在俄勒冈州建立起来，因而以“俄

---

① 吉尔伯和帕利：前引书，第241—242页。

② 伯恩斯等：前引书，第356页。

勒冈制度”闻名，不久在全国推广普及。后来预选发展出4种形式，即开放式预选（选民可选择他们希望投票的政党进行预选），封闭式预选（仅登记过的党员有权选举），混合式预选（选民不仅不要说明自己的党派归属，而且能参加若干个政党的初选，一党一候选人即可）和非党式预选（在无党派选举中，将竞选选举职位的候选人数减少到或是获50%选票以上者，或是在两个获最多选票但都没超过50%选票的人选中择其一。如两人旗鼓相当不分胜负，再在决胜选举中产生胜利者。）①

总之，“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和20世纪最初10年中，直接提名法像野火一样迅速遍及全国，到这个时期末，它被一致公认为选择州和地方官员的方法，而且进一步应用于国会选举，在许多情况下还应用于总统提名。在这个时期末，直接初选受到休斯、罗斯福、威尔逊以及国内其他强有力的政党领袖的支持。”②

此外，具体的选举方法也有了有利于选民实施选举权的重大改进，即无记名投票制得以推广。自19世纪80年代起，美国就采用了秘密投票制：公费印制选票，在投票站发票，然后秘密划上记号，折叠后交给工作人员，投入票箱。此法一直延续至今。

〔选民范围和选举范围的扩大〕　20世纪初美国选举制最具改革意义的变化是，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美国公民数量大增，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官员的范围扩大了。“公民选举权在群众控制的政府官员的数量上和有权选举的人数在美国已经极大扩大。”③ 选民范围扩大的最主要标志是美国妇女获得了选举权。美国妇女长期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在20世纪初取得辉煌成果。

---

① 吉尔伯和帕利：前引书，第195页。

② 梅里亚姆：前引书，第167页。

③ 凯·劳森：前引书，第73页。

1912年成立的进步党将妇女选举权作为政纲的重要内容。1913年在9个州妇女获得完全选举权，1914年蒙大拿州和内华达州统一给予妇女选举权。1917年纽约起了关键作用。美国总统威尔逊支持妇女选举权，众议院于1918年1月通过宪法修正案第19条，参议院应总统威尔逊个人之邀于1919年6月进行表决同意修正案，1920年8月生效。修正案宣布："合众国或任何一州不得因性别而否认或剥夺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国会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规定。"

选举范围的扩大主要是规定参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1913年批准生效的宪法修正案第17条规定"合众国参议院由每州人民选出两名参议员组成，"参议员改由选举产生是削弱政党领导作用的重要措施，对于民众的政治参与有很大意义。"初选思想对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变得非常有吸引力。就已经存在的减弱提名过程中的政党领导作用——即美国政党的中心作用的倾向而言，初选是一个反政党工具。1903年，威斯康星（进步主义力量强大的地方）成为第一个通过法律建立初选选举代表出席全国会议的州。初选对于进步主义的吸引力植根于他们的信念：初选制度将向更多民众打开参与候选人的选举。他们视全国会议制度是被政党领袖们所控制的，常常不能代表更广泛的选民。"①

妇女获得选举权和参议员改为由选举产生是20世纪初美国选举制最重要的标志性成就。此外，还在州或联邦范围内出现了加强民众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进步运动支持初选的同时也支持创制权、复决权和非党派的地方选举。到1910—1916年许多州已经制订了总统初选，虽然在未来

① 吉尔伯和帕利：前引书，第242页。

几年里对直接选举会议代表的热情已经减弱。"[1] 创制权是指公民在达到所规定的最低限度的人数时有权提出一项法律，该法律如在随后的选举中经大多数选民通过，即可付诸实施，保证了一定数量的选民对法案或宪法修正提出公民投票的要求；复决权就是允许占大多数的选民否决一项议案，或应一定数量选民的要求对议会通过的某项法案举行公民投票表决；罢免权则是公民用来罢免经选举产生但任期未满的公职人员的手段。"在美国，采用这些投票方式主要是作为一种手段，以便约束政党的权力，纠正立法机关滥用职权和纠正硬性立法的不完善之处。"[2] 1898 年，南达科达首先实行创制权和复决权，后向全国传播。1919 年已有 20 余州采用类似制度。[3] 罢免权 1913 年首行于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1926 年已有 10 余州推行。

〔选举制变革的原因〕　20 世纪初美国选举制向着有利于扩大民众选举权和提高民众政治参与程度的方向变革，首先是美国人民长期斗争的胜利成果。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历史表明，她们在经历了长期斗争后终于取得了梦寐以求的选举权。选举权不是靠谁恩赐的，而是她们不屈斗争得来的。

其次，这是进步派积极推行改革的产物。上述选举制的种种变化都是直接或间接在各州或联邦的进步派策划和推动下取得的。改革派在威斯康星州首推直接初选制为全国树立了榜样；进步主义的一系列立法从法律上保证和巩固了选举制改革的积极成果。

再次，党魁势力的衰落和选举制的变革互为因果，"政党机

---

① 吉尔伯和帕利：前引书，第 242 页。

②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前引书，第 3 卷，第 233 页。

③ 参见李剑鸣："关于进步主义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91 年，第 6 期。

器在20世纪初期就已失去它们大部分的杠杆作用，这是由于在这期间发生以下三件事：第一，地方、州和联邦机构接管了向穷人施舍的工作；第二，文官制度使大部分城市就业取决于有竞争性的成绩考核；第三，直接初选使政党提名的竞争成为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竞争。"① 在某种意义上，美国传统的反政党主义传统是选举改革的一个思想基础，而选举制的改革又助长了反政党主义传统的继续。加利福尼亚是美国政党制最弱的一个州，其原因之一就是它的反政党主义传统。乔伊斯·吉尔伯认为加利福尼亚的反政党传统源于社会政治条件的多样性：1.1910—1920年间的进步运动能够获得若干极大削弱州政党组织的方法的渠道。其中就是直接初选和在预选中登记作为一个以上政党的候选人。后者提供了一个候选人无需是他企求提名的党的登记成员。结果创立了一种州选举中的非党的特殊类别。州和县的党委员会由于缺乏官职的恩施和领导没有多大权力。2. 在加利福尼亚，所有的市镇选举都建立在非党派（正如县的选举和选举法官的选举）的基础之上，因而没有形成一个能够提名并为候选人竞选的强有力的基层选区组织。3. 加利福尼亚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多样性。4. 独立选举人的大量存在。"加利福尼亚的经历，犹如康涅狄格的经历，表明政治文化和州的选举法对于这些州的政党组织发展的关系。"② 这些分析是全面和中肯的。加利福尼亚的现象从一个侧面显示美国选举制改革和反政党主义传统的关系，可以认为是美国地方政党政治衰落的一个缩影。

最后，选举制的变革适应了美国政治现代化发展的需要。随着美国工业经济的巨大发展和城市化的迅速推进，美国人民原先

---

① （美）沃塞曼：前引书，第171页。

② 吉尔伯和帕利：前引书，第192—194页。

就很强烈的民主意识和自由传统获得了新的推动力，提到一个新的高度，终于使美国选举制度向更民主的方向转变。民主的扩大也是对飞速发展的经济扩张的适应和反对因为经济扩张而出现的种种腐败现象的需要。美国选举制度的变革对它的市镇管理体制也产生了直接影响。

七、市政管理体制的创新

在20世纪初年美国政治体制的演变中，美国市政管理体制的变化占有显著地位。这是因为政治体制是一个系统工程，政治体制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会随着整体的变革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市镇是美国联邦、州政治生活的基础，有关联邦和州的政治体制的改革直接影响市政改革；市镇政治体制的演变也会反作用于联邦和州，如三权分立新格局的形成、选举制的变化、政党制的变化等等都是如此。同时，1920年美国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是城市人口，标志美国城市化基本完成。城市化的进程与市政管理体制是同步发展的，城市化也是市镇改革的推动力。为适应城市化的进展，城市管理必须跟上。新的政治思想，其中包括地方自治感情的培育和增长，政府权力集中的思想都是市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思想基础。“在使旧的市政府适应于现代生活新形势的艰难过程中出现富有特性的政治思想。这些典型思想是：地方自治感情的增长；放弃牵制与平衡学说的趋势；政府职权的迅速扩张。”[①] 自治感情的增长势必要求政治上的自治，争取城市自治成为城市改革的关键。对于城市的自治权的重要性问题，梅里亚姆进一步指出：“福雷德里克·豪说，自由和责任是生存和发展所

---

① 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1865—1917》，前引书，第144页。

必不可少的。'我们给我们的城市穿上紧身衣，却期望它们发展力量和性格。我们剥夺了它们的自治，却不明白自治为什么失败了。'只要给城市足够的权力去解决地方上的问题，就会产生一种地方爱国精神，'这种精神将会把美国的市政从目前的衰弱地位提高到成就辉煌的地位'。"[①] 推动市政管理体制变革的直接动力是进步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讲，进步运动也是从市政体制改革开始的，这就形成了对市政改革的强大推动，使市政改革成为令人瞩目的重要领域。（详见本卷第四章有关内容）

总之，20 世纪初美国的政治体制，从三权分立的权力重心形成的新格局，到联邦体制，国会和法院系统，两党制，选举制和市政管理体制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这种种变化都是对工业革命的反应，对经济迅速增长的适应，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表现。集权和分权，民主和集中，是政治体制变化中的两根轴心，也是政治体制变革中的难题。何时何地实行集中和集权，何时何地扩大民主和自由，20 世纪初美国政体变化的历史事实似乎表明美国在行政领域强化了权力，在立法领域则扩大了民主，在选举制度方面扩大了民众选举范围，增强了选举透明度。[②]

美国政体的变化与当时美国社会政治思想的转变密切相关，两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政体的变化促进社会政治思想的变化，反之亦然。20 世纪初美国的社会政治思想经历了剧烈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自由放任思想的衰落和国家干预思潮的增长。可以这样认为，在"镀金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由放任主义，到了进

---

① 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1865—1917》，前引书，第 145 页。

② 参见张淑华硕士论文："美国社会转型时期（世纪之交）政治体制演变研究"1999 年 1 月，华东师范大学。

步主义时代，它的主导思想成了国家干预，因为进步主义的主要思想原则就是国家干预。根据霍夫施塔特的分析，“19世纪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开始转变为20世纪的福利资本主义”。[①] 他认为“国家干预的必要性被那些坚信威尔逊—布兰代斯—拉福莱特观点，即竞争是生来就合乎需要的人所接受，也为坚信罗斯福—克罗利—冯希斯观念，即集中是不可避免的人所接受。”有的学者认为“这世纪的头10年美国的自由思想常常害怕被冷淡而提心吊胆。”[②] 有人在1912年提出：“竞争的正当开展必须被限制在为了保持竞争的限度之内。因为竞争的过度会导致垄断，正如自由的过度会导致绝对主义一样……因此结果是：规范化的竞争对抗规范化的垄断。”[③] 进步主义思想的主要表达者，对罗斯福和威尔逊总统思想有重大影响的美国作家罗伯特·克罗利在他的《美国生活的前途》中坚持认为，美国人要学会用希望而不是用命运去思考，不惧怕政府的集中权力；去通过国家政策认识他们的希望。1914年他在自己创刊的《新共和》周刊上撰文认为民主制度必须经常修正，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W·李普曼则以肯定的口气谈论“新国家资本主义”。他说：“我们能够不再把生活视为慢慢流向我们的事物。我们必须审慎地去处理它，设计它的社会组织，改变它的工具，提出它的方法，教育和控制它。”[④] 也许正是在这种国家干预思想的指导下，总统和联邦的权力获得加强，三权分立出现了总统权力为重心的新格局。

国家干预学说的增长同当时多种学说思想影响社会政治思想

①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前引书，第119页。

② 莫顿·怀特：《美国社会思想对形式主义的反叛》，比肯出版公司，波士顿，1957年，第128页。

③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120—121页。

④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122页。

有关。19世纪后半期生物学中的达尔文主义影响社会学说生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科学的发展，社会学大大削弱了来自生物学的影响，相反，心理学、实用主义哲学等对社会学发生重要影响。“1890年和1915年间社会学受到社会领域和其他学科，特别是心理学变化的影响。社会学发展得如此迅速、它的文献如此丰富以致不可能讲清楚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命运，或不可能除了指明它的理论上的主要趋势外有更多的作为。”① 社会学方法上最最重要的变化是远离生物学，倾向于置社会研究于心理学的基础上。……奥尔平·斯莫尔在1897年写道：“斯宾塞先生的社会学是过去的社会学，而不是现在的。……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是想像中的生物学原理扩至到适应社会关系。但是，社会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是被当今社会学家作为心理学家而不是生理学家才理解的。”② 实用主义的兴起对美国政治发生重大影响。其中，以实用主义为指导提出政治理论的有罗伯特·克罗利等人，他们竭力宣扬国家干预的重要性。③

世纪之交，美国急剧变化的社会政治思想既是美国政治体制变化的思想基础，又是政治体制变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

①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156页。

②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158页。

③ 参见袁鹏硕士论文：“从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世纪之交美国社会思潮主流之转变”，1991年6月，华东师范大学。

第 十 一 章

文化思想新成果

19、20世纪之交，伴随美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迅猛进展，思想文化上也发生巨大变化，取得了可喜成果。

一、文学的繁荣

〔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美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产生于19世纪末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马克·吐温、威廉·迪恩·豪威尔斯、亨利·詹姆斯等文学大师们的作品一反感时伤怀的理想主义笔调，客观真实地描写了镀金时代美国的现实生活和社会风貌，深入地揭示出种种社会矛盾，其丰富性和深刻性大大超过了19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从而把美国文学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他们是美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1900年至20世纪初，随着垄断资本统治的加强，美国社会各种矛盾更加激化。此外，美西战争以后，美国迈向世界帝国的步伐日益加紧，对外扩张侵略活动越来越频繁，引起广大工农和进步人士的强烈反对。当投机、腐败、贿赂之风日趋严重，市、

州及国家各级责任政府走向崩溃的时候，当财阀们的财富滚雪球似地增长，而大城市中贫民窟、贫困和犯罪日益蔓延的时候，当劳动人民尤其是有色人种、妇女和儿童受剥削程度不断加深的时候，当工业、金融企业日益集中、垄断寡头统治深刻影响人民生活又超脱人民控制的时候，广大民众中的“美国梦”进一步幻灭。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在许多人心目中动摇甚至消失了。于是，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仔细观察美国社会的严酷现实，不得不重新认识美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新闻界掀起了“黑幕揭发运动”，对垄断资本集团为富不仁，巧取豪夺的卑劣伎俩和一些社会丑恶现象给予曝光，社会各界则兴起了要求改革的进步主义运动。正是在这一系列的背景下，美国现实主义文学逐步从发展走向成熟。

美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成熟主要表现在产生了像弗兰克·诺里斯、辛克莱·刘易斯、杰克·伦敦、西奥多·德莱塞和黑人作家杜波伊斯等一大批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文学作品更加广泛深刻地披露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出现了许多对不道德、不正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表示抗议的现实主义作品——所谓反叛文学。作家们用批判的眼光描写美国社会，用解剖刀揭露资本主义的脓疮。如弗兰克·诺里斯的作品揭露了西部垄断资本主义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描写了中小农场主联合起来反对铁路公司的斗争；杜波伊斯的作品反映了南部黑人农民与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指出了黑人和白人劳动者联合起来反对垄断组织的进步主张；德莱塞的作品以描写劳动妇女悲惨命运为主线，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使人堕落的罪恶；杰克·伦敦的作品从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高度揭示社会矛盾，歌颂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美国现实主义文学走向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突破了东部对文学的垄断，获得了广泛的发展。现实主义作家不仅限于东部地

区，在中西部、西部和南部都出现了一批有才华的作家。如豪威尔斯（俄亥俄）、哈姆林·加兰（威斯康星）、德莱塞（印第安纳）、杰克·伦敦（旧金山）、弗兰克·诺里斯（伊利诺伊）、辛克莱·刘易斯（明尼苏达）等，他们都以自己优秀的作品丰富了美国文坛。这个时期美国文学界虽然也受到欧洲的自然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但主流仍是继承了马克·吐温所开创的现实主义文学发展方向。

［主要的现实主义作家及其作品］　亨利·詹姆斯（1843—1916）是美国文坛一位跨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出生于一个百万富翁家庭。一生醉心于描写大资本家及其少爷小姐的生活和心理活动，是美国“高雅文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的许多作品发表于19世纪70、80年代，但在20世纪初连续发表了三部最好的长篇小说：《鸽翼》（1902）、《使命》（1903）和《金碗》（1904）。这三部作品以欧洲人的奸猾、冷漠为衬托，赞誉美国人的纯洁、仁慈、慷慨和忠诚无私的品质。在詹姆斯笔下，大资本家及其后代都是心地纯洁，品行高尚的人。由于詹姆斯的作品擅长心理描写，被称为“心理现实主义大师”。詹姆斯长期居住在欧美上层文人和遗老遗少的生活圈子里，根本无法理解美国下层群众的生活，在社会政治问题上态度保守。他蔑视甚至仇视社会变革，只热衷于挖掘有闲阶级的心理，因此他的作品脱离现实主义生活，缺乏时代气息，不过是“沙龙之作”。英美文学界称他为大资本家的理想小说家。

弗兰克·诺里斯（1870—1902）是个记者出身的作家。他的主要作品为“小麦史诗”三部曲：《章鱼》（1901）、《深渊》（1903）等（第三部《豺狼》没有写出来）。诺里斯早期作品受到过自然主义影响，后来转向现实主义。他的小说主要描写19世纪末垄断资本统治下城乡中下层群众的生活，着力于揭露垄断资

本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对劳动人民寄以深切的同情。《章鱼》写的是加利福尼亚州圣华金河谷农民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铁路公司像章鱼一样把触角伸向四面八方。它们侵占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剥夺了他们生存的权利。农民们为了捍卫自己的生命线，联合起来同垄断资本作斗争，结果发生了武装冲突，最后农民被打败，落得家破人亡的悲惨下场。这是美国文学史上头一次用现实主义手法控诉垄断资本对农民掠夺和歌颂农民斗争的史诗。作者把农民和垄断资本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比喻为两种超自然力量的较量。前者代表“善”，后者代表“恶”。“恶”势力超过了“善”的力量，故农民的斗争遭到了失败。这里反映了中小资产阶级在垄断资本压迫下走投无路无能为力的悲观主义情绪，是宿命论的反映。尽管如此，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进步意义。

厄普顿·辛克莱（1878—1968）也是个记者出身的现实主义作家。早年参加过美国社会党。主要作品有《屠场》（1906）、《石炭王》（1917）等。《屠场》描写立陶宛移民工人的悲惨遭遇，揭露了芝加哥肉类加工厂十分恶劣的劳动条件和资本家将腐烂的肉做成罐头出卖的可耻行径。小说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广大群众纷纷谴责资本家为富不仁的卑劣行为。在广大群众强烈要求下，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纯净食品和药物管理法”和“肉类检验法”，加强了对食品卫生质量的监督和检查。这部现实主义作品在揭露美国资本主义社会黑暗面，促进国会立法方面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石炭王》是根据1914—1915年科罗拉多州煤矿工人罢工事件而创作的长篇小说，揭露了煤矿大王剥削工人的罪行，歌颂了工人阶级顽强的斗争精神。辛克莱从批判现实主义立场出发，批判了豪威尔斯“写生活中微笑的侧面”的主张，痛斥了资产阶级“财神艺术”。这个时期辛克莱写过一系列政论

和随笔，如《宗教的利益》（1918）、《铜牌》（1919）、《鹅步》（1923）、《财神的艺术》（1925）等。这些文章指出了宗教、报刊、学校、艺术为垄断组织服务的本质，但也流露了作者的改良主义倾向。列宁称辛克莱是“一个有感情而无理论修养的社会主义者”。

杰克·伦敦（1876—1916）是20世纪初美国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是第一个用小说反映美国工人阶级生活的作家。杰克·伦敦生于加利福尼亚州一个破产农民家庭，从小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做过报童、童工、水手、运煤工和铁路工人，曾流浪全国，沿街乞讨。这些苦难经历使他对资本主义压迫有切肤之痛，为他后来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创作素材。杰克·伦敦一生写有长篇小说10部、短篇小说150部。最主要的有《狼之子》（1900）、《雪地的女儿》（1902）、《深渊中的人们》（1903）、《野性的呼喊》（1903）、《白牙》（1906）、《铁蹄》（1908）、《马丁·伊登》（1909）等。

《铁蹄》是一部政治幻想小说，写的是芝加哥工人武装反抗资本家压迫遭到残酷镇压的故事。作者预言，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和斗争的尖锐化，统治阶级必然要取消民主自由，实行法西斯专政。杰克·伦敦把资产阶级专政比作“铁蹄”有其深刻含义。小说主要意义是指出了无产阶级必须采取革命斗争手段，摧毁资产阶级“铁蹄”，否则就会沦为奴隶，丧失已有的一切权利。正是这种思想使这部小说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由于他的多数作品描写了下层群众的命运，被称为把小说交给平民手中的第一人。《铁蹄》中作者过分夸大了工人领袖的作用，把工人群众描绘成没有觉悟、不会思考的群氓，这与杰克·伦敦在思想上受尼采的“超人”哲学影响有关。《马丁·伊登》是自传体小说，描写了一位水手出身的青年马丁·伊登与资产阶级小姐罗丝

之间的爱情故事。马丁·伊登在爱情力量鼓舞下，唤起了创作热情，才华横溢，精力过人。然而，罗丝在父母反对下和他断绝了爱情关系。后来，马丁·伊登终于成名。此时，过去看不起他的人都来亲近和吹捧他。罗丝也哭哭啼啼跑来要求破镜重圆。这时，功成名就的马丁·伊登觉得，他从前梦寐以求的上流社会原来是那么贪婪和虚伪，连他苦苦相恋的罗丝也不是看重他的人品，而是看中他的声名和财富。于是他感到受了骗，精神极度空虚，最终投海自杀。1913 年以后，伦敦的创作热情明显衰退，由于他成名以后，名缰利锁，经不起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诱惑，追求物质享受，挥金如土，为求得稿费不惜赶写一些粗糙的作品，甚至写讨好资产阶级的作品。1914 年退出社会党，同年 11 月因精神空虚，服药自杀，年仅 40 岁。美国文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从此殒落。《马丁·伊登》这部小说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作者自己命运的写照。厄普顿·辛克莱对杰克·伦敦后期走上毁灭自己的道路作过深刻论述，指出："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的贪得无厌和利己主义盛行的美国，把个人的灵魂和他们的全部伟大的、无法估价的天才一起从我们手中窃走了。这对我们的文学简直是莫大的耻辱、莫大的悲剧。"[1]

西奥多·德莱塞（1871—1945）是美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现代美国进步文学的杰出代表。德莱塞出身贫寒，曾做过洗碗工、洗衣工、火车站检票员、商店伙计和煤矿工人。21 岁当记者时就开始文学生涯。他的多部重要著作都是在这个时期问世的，如《嘉莉妹妹》（1900）、《珍妮姑娘》（1911）、欲望三部曲中的头两部，《金融家》（1911）和《巨人》（1912）、《天才》（1915）、《美国的悲剧》（1925）、政论文《敲起来吧！战鼓》

① 刘保端译：《美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年，第 222 页。

(1920) 等。

《嘉莉妹妹》是德莱塞第一部成功作品，描写了纯朴的农村姑娘嘉莉到芝加哥谋生的悲惨历程。小说向人们揭示出在美国，靠诚实劳动是难以找到真正的出路的。嘉莉虽然靠出卖肉体，跻身上流社会，获得了金钱和地位，但那不是真正的幸福。这种美国式的成功对美国社会虚伪的道德观是有力的讽刺。难怪该书被认为"有伤风化"，长期遭禁。《珍妮姑娘》在题材和艺术风格上与《嘉莉妹妹》十分相似，塑造了美丽善良的工人女儿珍妮与富家公子相爱，由于社会地位悬殊饱尝凄苦的命运。美国文艺评论家亨利·路易斯·门肯称《珍妮姑娘》为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以来美国最优秀的小说。

《欲望》三部曲写的是金融资本家弗兰克·柯柏乌家庭的兴衰史。小说揭露了19世纪末美国垄断资本巧取豪夺，投机钻营以及与政府官员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卑劣行径。柯柏乌成为美国文学中典型的资本家形象。

最终奠定德莱塞在美国文学界地位的是他的代表作《美国的悲剧》。小说叙述了贫民的儿子克莱德在资本主义社会腐蚀下如何从一个天真纯朴的青年堕落成杀人犯最终毁灭自己的过程。书中描写了克莱德和女工洛蓓达及资本家女儿桑特拉的三角恋爱关系。克莱德为跻身名门，丧心病狂地谋杀了他诱奸已经怀孕的洛蓓达；同时也揭露了美国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和司法部门利用克莱德案件大搞政治投机的丑恶活动。小说情节曲折，语言生动，人物性格突出，心理刻画细致，被称为"美国最伟大的小说"。有人称德莱塞是第一个捕捉到现代美国本土气味的小说家。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小说之所以获得成功，并非因为它是悲剧，而是因为"它是美国的悲剧"。

德莱塞的许多作品洋溢着强烈的现实主义气息，在他笔下一

幕幕美国社会悲剧展现在读者面前。他的优点是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展开故事情节，从而暗示：书中主人公的命运都是和当时美国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无论是嘉莉、珍妮，还是克莱德，之所以走上堕落的道路，罪过首先在美国社会本身。美国资产阶级评论家把他完全说成是自然主义作家，甚至是自然主义流派的奠基人，[①] 未免言过其实。但应该看到，德莱塞早期的作品确实受到过自然主义思潮的影响。他过分强调了生物本能，如追求金钱、权势和性欲等，说什么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人的意志和行为不能控制天生的弱点和缺点[②]，从而忽视了人的社会因素和主观能动性。

辛克莱·刘易斯（1885—1951）是美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的现实主义多产作家，一生写有 22 部小说。这个时期的主要著作有：《大街》（1920）、《巴比特》（1922）、《阿罗史密斯》（1925）、《埃尔墨·甘特里》（1927）、《多兹沃斯》（1929）等。《大街》是刘易斯第一部成功之作。它描写一位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年女子力图改造乡村小镇最终失败的故事。小说艺术地再现了 20 世纪初美国社会的严酷现实，暗示乡村和城市一样，到处充满虚伪、邪恶、不平和欺诈，是市侩习气的滋生地，从而使人们对农村浪漫式的幻想一扫而光。《巴比特》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人物巴比特，描写了他由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精力充沛的商人变为屈服于环境和上级压力、思想空虚、唯唯诺诺随波逐流的市侩的过程。作者暗示：巴比特的个性是被社会扼杀的，他是美国社会制度的牺牲品。刘易斯小说的主要艺

---

① 阿瑟·林克、威廉·卡顿等著、刘绪贻等译：前引书，第 291 页。

② 坎利夫·马库斯：《美国政治的文学》，上册，今日世界出版社，1975 年，第 204 页。

术特色是讽刺，故有人称他是讽刺小说家。美国历史学家亨利·史蒂尔·康马杰认为，“在20年代的所有小说家当中，对所处社会作了最精心报道的是辛克莱·刘易斯”[1]。

〔“迷惘的一代”文学〕　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现代文学的高峰期。在这期间，既有现实主义这一坚实的文学流派，又有独树一帜的“迷惘的一代”文学。“迷惘的一代”作家指1900年前后出生并在20年代获得文学声誉、在思想上具有相似倾向的青年作家群。主要人物有欧内斯特·海明威、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约翰·多斯帕索斯、威廉·福克纳、托马斯·沃尔夫、E.E.卡明斯、A.麦克利什、T.S.埃利奥特、H.克莱恩等。他们有相似的经历、共同的志趣、共同的观点、相同的生活方式，并以巴黎为活动中心，形成“公认的一代文人”[2]。

“迷惘的一代”作家是时代的产物。他们中许多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残酷场面，战后又目睹欧洲列强对殖民地的无耻争夺和瓜分，从而使他们怀抱的民主与和平理想彻底破灭。后来当他们返回祖国，看到的则是物欲流和弥漫全国的享乐主义情绪。于是，他们又返回欧洲，希冀在那里找到创作灵感。可是，他们面对的都是满目疮痍和精神文化的倒退。现实生活使他们感到受骗和失望，对前途丧失信心，思想上产生失落感和幻灭感。他们成为失去精神家园的流浪者。

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是“迷惘的一代”作家中最突出的代表。他的生活经历丰富，充满冒险精神和传奇色彩。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多次负伤，腿上身上取出200多个弹

---

① H.S.康马杰：《美国精神》，前引书，第384页。

② 马尔科姆·考利：《流放者的归来》，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67页。

片，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的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战场上横尸遍野、九死一生的情景以及他心灵上所受的震撼成为他写反战小说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根源。《太阳照样兴起》是海明威第一部长篇小说，1926年出版后一炮打响，颇得好评。小说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群幻想破灭、亡命国外的美国青年放浪形骸的情况。这部小说反映了战后一部分美国青年悲观消极的思想风貌，被文学界称为“迷惘的一代”的宣言。海明威则被称为“迷惘的一代”的歌手。1929年，海明威第二部反战小说《永别了，武器》（旧译《战地春梦》）问世。小说描写了美国青年上尉亨利和英国护士凯瑟琳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海明威称这部小说是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从士兵到军官都有强烈的反战情绪。他们渴望早日结束战争，憧憬和平幸福的生活。作品告诉人们，“迷惘的一代”悲剧的社会根源是帝国主义战争。海明威的作品艺术风格独特，西方文学界称之为“海明威风格”。他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影响是最大的。国际上曾一度掀起海明威热。有人称他是美国仅次于梭罗的“最伟大的散文文体家”[①]。后来海明威还发表过一些有影响的小说[②]，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1896—1940）是“迷惘的一代”作家中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美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者之一。他的重要作品都是在20年代问世的。主要作品有《人间天堂》（1920）、《红颜薄命》（1922）、《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短篇小说集《爵士时代的故事》（1922）、《所有悲伤的年轻人》（1926）等。菲茨杰拉德出身于一个富商家庭，从小向往财富和特权，幻想有

---

① 董衡巽编：《海明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33页。

② 如《丧钟为谁而鸣》（1940）、《老人与海》（1952）等，1954年获诺贝尔奖。

朝一日能跻身上流社会，出人头地，过豪华的贵族生活。为此他极为炫耀自己的才华和能力，俨然一副纨绔子弟的派头。后来他与上流社会的一位漂亮而又风流的小姐姗尔达相恋，两人志趣相投，结为伉俪。婚后他们生活奢侈无度，狂欢纵欲。他的小说主人公多是一些饱食终日的花花公子。《人间天堂》是菲茨杰拉德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小说描写了20年代一群美国青年放荡不羁的生活。主人公阿莫瑞·布莱恩从小娇生惯养，渴望爬上富有阶层，娶“最漂亮的姑娘”。当他家破落后，那个“最漂亮的姑娘”抛弃了他。从此他诅咒那个社会，厌恶这个姑娘。小说表现了一战后经济繁荣时期美国青年追求金钱美女的社会风气，反映了20年代美国青年对未来充满希望而又焦躁不安的矛盾心理，塑造了“迷惘的一代”的时代性格，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本人生活的写照。《了不起的盖茨比》是菲茨杰拉德最成功之作。它描写的是出身贫穷家庭的盖茨比和上流社会姑娘苔西之间的爱情故事。盖茨比是中西部一个农民家庭出身的青年军官，他爱上了一位富家姑娘苔西，可是苔西嫌盖茨比穷，不肯嫁给他。待他从欧洲远征归来，苔西已和一个花花公子汤姆结了婚。然而，汤姆又另有情妇，苔西并不幸福。尽管如此，盖茨比对苔西仍一往情深，下决心要发财致富，重新赢得苔西的欢心。5年后，盖茨比果真发了财，当他找到苔西求与她重归于好时，苔西却舍不得汤姆的财产，态度暧昧。后来，汤姆发现了苔西与盖茨比之间的隐情，妒火中烧，竟然利用一次车祸，谋杀了盖茨比。小说谴责了上流社会自私、虚伪和残忍，对来自下层社会横遭排斥和暗算的盖茨比寄以深切的同情。盖茨比刚毅、勇敢，为了爱情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他千辛万苦从下层社会爬上来，却又遭到上流社会的暗杀。他朝思暮想苦苦追求的漂亮小姐竟是一个只迷恋金钱没有良心的庸俗女人。作者暗示，盖茨比希望的破灭

象征“美国梦”的幻灭。小说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哀伤情调，反映了20年代美国青年理想的破灭以及道德和精神的瓦解。正是这个主题使菲茨杰拉德成为“迷惘的一代”作家的又一突出代表，被称为“爵士时代的桂冠作家”。“他的小说和故事就某些方面来说是这一整个时期的绝妙记录”①。

约翰·多斯帕索斯（1896—1920）也是“迷惘的一代”作家。他出身于芝加哥一个律师家庭。哈佛大学毕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三个士兵》（1921）、《曼哈顿中转站》（1925）等。《三个士兵》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三个士兵的不同经历，具有明显的反战倾向，反映了这一代青年对美国社会的失望情绪和对战争的不满心情。多斯帕索斯较重要的作品是在30年代以后发表的。他早年是左翼作家，曾担任美共外围杂志《新群众》的编委，支持过工人的斗争，同情美共并为其刊物写稿。可是他的进步立场没有坚持到底。由于他思想上和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宿命论思想倾向，越到后来越向右转，成为美共和前苏联的反对者，成为变节分子。这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资产阶级价值观对知识分子的腐蚀作用，反映了美国资产阶级文化的危机。

〔诗歌〕　20世纪头20年，是美国诗歌蓬勃发展的年代。1912年芝加哥《诗刊》杂志的创刊是美国现代诗歌产生的重要标志。美国现代诗坛不仅人数众多，几乎是一代接一代，而且流派纷呈，有新英格兰派、芝加哥派，还有所谓意象派等。埃德加·阿林顿·罗宾逊（1869—1935）和罗伯特·弗罗斯特（1874—1963）属新英格兰派诗人。罗宾逊以写人物肖像组诗和抒情诗见

---

① 马尔科姆·考利：《流放者的归来》，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14页。

长。他以《独立望天涯》（1916）一诗成名。得过三次普利策奖。其他重要作品有长篇叙事诗《河下游的城镇》（1916）、《默林》、《兰斯洛特》、《特里斯特拉姆》三部曲（1917—1927）等。弗罗斯特的诗一般可分为三类：抒情诗、叙事诗和哲理诗。弗罗斯特这个时期的作品有《男孩的意愿》（1913）、《波士顿以北》（1914）、《新罕布什尔》（1924）、《西流小溪》（1928）等。他的抒情诗表达了对自然的深爱和对人类的强烈同情，是这个时期最优秀的田园诗人之一。有人称他是“本世纪美国最伟大的诗人”①。

本世纪初芝加哥是美国诗歌的中心之一。《诗刊》就是在这里创办的，它在培育诗歌新人，推动新诗运动发展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维切尔·林赛、埃德加·李·马斯特斯、卡尔·桑德堡这几位芝加哥派诗人都是通过《诗刊》登上诗坛的，其中又以桑德堡最为重要，影响最大。卡尔·桑德堡（1878—1967）是最接近普通劳动者的一位诗人。他做过工人、当过兵，还当过流浪汉，生活阅历十分丰富，是成名较早的诗坛新秀。他既是工业文明的歌颂者，也是中西部大草原的歌手。桑德堡的诗风粗犷豪放，语言朴实无华。在他的笔下，大城市的繁忙生活、工厂冒火花的烟囱、草原上的农民生活，城市里的妓女，都变成诗的语言。桑德堡在20年代就奠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但他的最重要的成就是在30年代以后。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芝加哥诗抄》（1916）、《剥玉米皮的人》（1918）、《烟与钢》（1920）等。维切尔·林赛、E·L·马斯特斯在这个时期没有写出有分量的作品，比起桑德堡来稍逊一筹。林赛的代表作是《威廉布思将军进天堂》（1916），马斯特斯的代表作为《匙河集》（1915）。

---

① 马库斯·坎利夫：前引书，第243页。

意象派诗歌在美国流行时间不长，但影响不小。主要人物有埃兹拉·庞德、希尔达·杜利特尔、艾米·洛厄尔、托马斯·S·埃利奥特等，其中庞德和埃利奥特最重要。庞德是意象派的盟主和精神领袖，是西方公认的现代派诗歌鼓吹者和理论家。庞德的主要作品有《面具》（1909）、《休·西尔文·毛伯莱》（1920）等。庞德还当过《诗刊》编委。他乐于助人，乔伊斯、埃利奥特、D·H·劳伦斯和弗罗斯特等新派诗人都是在他鼓励和支持下登上诗坛的。尽管他长期住在国外，但在美国青年诗人中影响很大。T·S·埃利奥特（1888—1965）是意象派中被认为最善于表达“迷惘的一代”心情的作家。1922 年发表的长诗《荒原》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从此奠定了其在英美诗歌界的地位。《荒原》描绘了精神荒原的战后文明，被认为是写出了整整一代幻灭感的划时代的巨著，是西方诗歌的一个里程碑。此外，埃利奥特的其他重要诗作还有《杰·阿·普鲁弗洛克的情歌》（1915）、《小老头》（1920）、《空心人》（1925）等。《普鲁特洛克的情歌》是他的成名作。意象派诗歌具有精简、浓缩、紧凑、韵律整齐的特点。他们从古典的、中世纪的和东方学中吸取养料，是一种自由体诗歌。

〔戏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多年间是美国现代戏剧兴起和繁荣的年代。在此以前，美国剧坛沉闷保守，不少剧院为演出公司所控制。戏剧舞台占主导地位的是一些表现历史题材的传奇剧或欧洲的时兴剧本，严肃的剧本如凤毛麟角。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广大群众对舞台上的传统戏剧越来越感到厌烦，迫切要求上演反映现实生活、能够展现人们内心世界真实感情的现代剧。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15 年前后，纽约、费城、波士顿、芝加哥等北方城市出现了摆脱旧的艺术传统、探索新的创作道路的“小剧场运动”，各种各样的小剧团纷纷涌现。据统

计，全国各地约有500多个，观众每年可达50万人次。其中，纽约的“华盛顿广场剧社”（1914）和马萨诸塞州的“普罗文斯顿”剧社（1915）最负盛名。“小剧场运动”是美国戏剧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它们提倡采用严肃的优秀剧本，上演现实题材的剧目，主张进行戏剧技巧的改革，热心扶持青年剧作家。至1925年，普罗文斯敦剧社共推出93个文学剧本，并建立了自己的剧院。蓬勃兴起的小剧场运动如春风化雨，培育了一批有才华的美国新一代剧作家，如西德尼·霍华德、菲利普·巴里、尤金·奥尼尔等，奥尼尔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

尤金·奥尼尔（1888—1953）出身于美国一个演员家庭，父亲是19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演员。奥尼尔先后就读于普林斯顿和哈佛大学，系统地学习过乔治·皮尔斯·贝克教授的戏剧理论和实践课程，参加了贝克戏剧演习班——“四十七剧社”。但奥尼尔并不太倾心于这种严肃单一的学院气氛和课程，其创作思路更重视揭示生活真实。他当过水手、游民、淘金者、搬运工和记者，坎坷经历以及从小生活在戏剧氛围中的环境为他积累了丰富生动的创作素材，那些下层劳动群众和落魄的失意者的悲惨命运引起了他深切的同情，从而使其剧作大都充满悲剧色彩。他把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创作方法结合起来，为美国戏剧发展打开了崭新的局面，成为现代戏剧的奠基人，被称为与易卜生·契科夫和萧伯纳齐名的西方现代戏剧的泰斗。1916年，奥尼尔第一个剧本《东航加的夫》上演，揭开了美国现代戏剧史的序幕。《东航加的夫》描写了一个名叫扬克的水手幻想能够得到几亩地，和老婆孩子在一起建立一个温馨的家。可是，他这个并不太高的渴望终成泡影。1920年，奥尼尔的第二个重要剧本《天边外》在纽约百老汇上演，此剧奠定了他作为当代美国最重要的剧作家的地位。剧本描写了美国农民罗伯特盼望到“天边外”去游历奇妙世

界最终幻想破灭的悲剧。评论界对此评价很高，奥尼尔首次获得了普利策奖。有人称此剧开创了美国戏剧严肃艺术的新纪元。1921年，奥尼尔又推出《安娜·克里斯蒂》。它揭示了代表邪恶势力的大海夺去了少女安娜的父亲，使她沦为妓女，最后又夺去了她爱情的归宿。剧本悲剧色彩较浓，演出后再次获普利策奖。此后几年，奥尼尔戏剧创作达到高潮，几乎每年写一个剧本。如《琼斯皇》、《与众不同》、《最初的人》、《难舍难分》、《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奇异的插曲》等，其中最重要的有《毛猿》(1922)、《榆树下的欲望》(1924)。奥尼尔的剧本大都以悲剧为主，力图表现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为了生存或爱情所经受的曲折经历和严酷斗争，着力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心灵折磨。奥尼尔还特别注重借助于场景、灯光和音响等戏剧手段来烘托戏剧人物的内心活动，加强听觉和视角形象，从而更好地突出了主题思想。奥尼尔是美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惟一的一个剧作家，曾4次获得普利策奖。奥尼尔这个时期剧作的最大弱点是，受到过自然主义的影响，太倚重于神秘主义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来解决戏剧矛盾，戏剧语言也欠精炼。

〔黑人文学〕　20年代兴起的哈莱姆文艺复兴是这个时期黑人文学的重要内容。哈莱姆文艺复兴（又称新黑人运动）在这个时期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美国黑人进一步觉醒和黑人民族文化繁荣的标志。随着20世纪初黑人的大规模北迁，在北方的一些大城市集中了大批黑人。纽约的哈莱姆成为全国最大的黑人聚居区；由于黑人受教育机会的增加，具备了广泛开展文艺活动的条件；20年代风靡全国的爵士乐极大地增强了黑人的自豪感；在一战后高涨的黑人民族运动的推动下，一些研究黑人历史文化的机构如“黑人历史研究会”(1912)、“黑人生活和历史研究会”(1915)等纷纷成立。正是在这一系列背景下，产生了以哈莱姆

为中心的黑人文艺复兴运动。哈莱姆一时成为“黑人麦加”，在那里聚集了一大批有才华的黑人知识分子和作家。黑人文艺复兴运动主要成员有兰斯顿·休斯、康迪·卡伦、克劳德·麦凯、阿兰·洛克、吉恩·图马、瓦尔特·怀特等。阿兰·洛克是黑人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描写人和精神领袖。1925年，他编辑出版了一部汇集青年黑人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的集子《释新黑人》，在当时文坛影响颇大。他在序言中指出：觉醒中的年轻一代黑人已粉碎了种族歧视的心理枷锁，具有了新的自尊心和独立人格。兰斯顿·休斯（1902—1969）是新黑人运动中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他写小说和评论，但主要成就是诗歌，被称为“哈莱姆的桂冠诗人”。他的诗通俗易懂，热情奔放，感情丰富，节奏感强，富于民族特色。他的第一本诗集《疲倦的布鲁斯》（1926）抒发了他对美国未来的憧憬，洋溢着黑人民族的自豪感，是他早期的优秀诗作。克劳德·麦凯（1890—1948）也是新黑人运动的重要骨干。在黑人文艺复兴高潮时期正是他的创作旺季。他一生写有诗集5部、小说4部、自传1部，其他著作2部。麦凯最佳诗集《新罕布什尔的春天及其他诗集》（1920）和《哈莱姆暗影》（1922）是在这个时期问世的。1928年发表了散文《回到哈莱姆》。他的作品展现了美国黑人遭受种族歧视和残酷迫害的悲惨情景。他对黑人诗坛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充满斗争精神的抗议诗歌。麦凯1919年为鼓励黑人抗暴斗争而写的《如果我必需死》成为后世传颂的佳作。康迪·卡伦（1903—1946）是黑人文艺复兴运动中主张突出诗的艺术性的一位出色的抒情诗人。他在这个时期的作品有《肤色》（1925）、《黄昏颂歌》（1927）等，他声称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应该表达人人都有意义的东西，并一再强调，作品主要是追求美，不宜宣传种族斗争，成为斗争的工具。但他流传下来极富感染力的作品恰恰是描写种族问题的诗。“哈莱姆文艺复兴”

中著名作品还有：休斯的《倦乏的忧郁》(1926)，詹姆斯·韦·约翰逊的《上帝的长号》（1927）等。1929年瓦尔特·怀特出版了《绞索与铁条：私刑法官传》，揭露了1919—1928年间美国黑人遭受私刑迫害的惨景。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有下列几个特点：受自然主义影响较严重，有些作家特别是其中的哈莱姆派醉心于描写黑人下层群众的放荡生活，突出地对酒店、夜总会、妓院和犯罪场所大肆宣染；小说大量采用城市黑人俗语和俚语写作，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许多作品否定了汤姆叔叔类型的那种逆来顺受的旧黑人形象，鼓励歌颂新黑人精神，树立新的黑人形象，反映美国黑人对种族歧视和迫害的愤怒反抗，显示了美国黑人新的觉醒。

与黑人文艺复兴运动几乎同时活跃于黑人文坛的是杜波伊斯博士。杜波伊斯（1868—1963）是美国黑人著名学者、编辑和作家。他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写了一批有影响的政论、小说和诗歌，重要的有《黑人的灵魂》（1903)、《黎明的黑暗》、《黑公主》、《费城黑人》等。《黑人的灵魂》是杜波伊斯的代表作。这是一部大型文集，包括诗歌、随笔、政论和小说。书中详细描述了南北战争后南方黑人仍然受歧视的生活状况，批判了布克·华盛顿的投降主义哲学，号召广大黑人团结起来，反对种族歧视，把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进行到底。美国学者把《黑人的灵魂》列为划时代的作品，称它是黑人的“政治圣经”[①]。杜波依斯则被称为美国“黑人的一个最伟大的代言人”[②]。

---

① （美）柯恩编，朱立民等译：《美国划时代作品评论集》，三联书店，1988年，第363页。

② 福斯特：《美国历史中的黑人》，三联书店，1960年，第456页。

二、艺术的发展

〔音乐〕 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音乐发展的重要时期。一个重要标志是，音乐界喊出了创建独立的民族音乐的呼声，并在探索音乐的美国化道路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迄20年代初，美国的音乐在民族独立性方面仍相当落后，许多美国作曲家的作品实际上还是西欧音乐流派的苍白的反映。于是，一些清醒的美国音乐界人士号召培养自己具有独创性的作家，创作符合民族特色的歌曲，以形成美利坚民族音乐文化。1923年，纽约成立了美国作曲家联盟，并创办了机关刊物《现代音乐》杂志。该联盟联合了不同爱好、不同创作倾向的青年作曲家，致力于创作从精神到语言方面都具有美国特色的音乐作品。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新一代的作曲家，如艾伦·科普兰、罗伊·哈里斯、亨利·考埃尔、费吉尔·汤姆森、沃尔特·皮斯顿、罗杰·塞欣斯和乔治·安泰等。他们中许多人在巴黎学习过，受到过欧洲现代主义的影响，但他们在探索音乐的美国化道路时，注意研究美国民间歌曲的根源，研究黑人圣歌、布鲁斯、爵士音乐和印第安部落的音乐，从其中吸取有益的养料。正是他们成为建立和发展独立的美国音乐文化的一支生力军。

这一时期美国音乐界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产生了在美国和世界乐坛都具有重要影响的爵士音乐。

爵士乐是源于非洲的一种黑人音乐。它和早期奴隶吟唱和演奏的做工歌、田间号子、圣歌、民谣和舞曲一样，既保留了非洲音乐的特色，又融合了欧洲音乐风格。这些不同的音乐形式互相影响，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黑人民歌风格：爵士乐。布鲁斯是爵士乐最主要的先驱。

布鲁斯和爵士乐有相同点又有相异之处。相同点是都源于非洲，具有非洲传统音乐风格，节奏感特别强，易于表达演唱者的喜怒哀乐。相异之处是诞生的时间不同。布鲁斯产生的确切年代虽无从查考，但形成较早；爵士乐一般认为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诞生地也不同，布鲁斯产生在密西西比和得克萨斯的乡村，爵士乐产生于城市，主要是新奥尔良；布鲁斯一直是一种口头流传而不上乐谱的音乐，歌手和乐师通过耳听他人的演唱来学习演奏，表演时不看乐谱，而运用即兴手法。爵士乐则完全不同，它受欧洲音乐影响较大，注意掌握一些传统音乐的谱法。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两种不同风格的黑人音乐相互影响和渗透。许多地方，演奏者往往把几种不同风格的音乐融合起来，如后来出现的黑人灵歌音乐就是集布鲁斯、爵士乐、宗教音乐和传统音乐之大成的一种更加奔放的黑人音乐，它更有利于表现黑人的自豪感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精神。也有人把布鲁斯说成是爵士乐的最主要形式。

爵士乐的发展经历了由南向北的扩展过程。新奥尔良是爵士乐的发祥地。因为在那里有大量的克里奥耳人。所谓克里奥耳人是指黑人奴隶和法国、西班牙人所生的后裔。他们对爵士乐的产生和发展起到过很重要的促进作用。据说不少克里奥耳人受过古典音乐的训练，具有良好的音乐素质，有的还拥有自己的歌剧院，但因为其有非洲血统，同样受到种族歧视，被迫与从前的奴隶为伍。“爵士乐的起源大体就是克里奥耳人与黑人结合的产物”，即“黑人奴隶的非洲音乐传统与克里奥耳人对欧洲古典音乐兴趣的溶合”[1]。由于新奥尔良当时拥有大量的黑人爵士乐师和爵士乐队，他们最早在新奥尔良开始演奏生涯，因此音乐史家

---

[1] 格雷厄姆·瓦里美：《爵士乐》，三联书店，1987年，第19页。

都把新奥尔良视为爵士乐的摇篮。

20世纪20年代开始，布鲁斯和爵士乐在美国迅速传播开来，特别影响到北方。主要原因是演奏这两种风格的南方黑人大量北移。1910—1920年，芝加哥的黑人人口从4万猛增至10万。其他北方城市如纽约、底特律、圣路易和费城也涌进大量黑人。黑人把自己的音乐带进这些北方城市，进一步扩大了爵士乐的影响。无线电的出现和唱片工业的兴起也为爵士乐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芝加哥就是当时唱片生产的中心，许多优秀的爵士乐唱片都是在那里录制的。此后，不仅在黑人中拥有广泛的爵士乐听众，白人中也有许多爵士乐迷。“爵士乐进入美国生活的主流”，20年代被称为“爵士乐黄金时代”[①]。仅仅10年左右时间，爵士乐不仅风靡整个美国，而且迅速传播到全世界，成为“一种新的全球性音乐”[②]。

20年代的美国乐坛涌现出一批出色的爵士乐歌手和乐师。查尔斯·博尔登、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贝西·史密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对爵士乐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查尔斯·博尔登是新奥尔良早期的黑人爵士乐大师之一。他擅长吹小号。19世纪90年代，他组织了美国第一个爵士乐队。他的乐队包括小号、单簧管、伸缩喇叭、吉他、低音提琴和大鼓。他把布鲁斯吉他手和歌手的演奏技巧运用到铜管乐器中去，大大推动了爵士乐风格的形成，被称为“小号演奏之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也是一位出色的小号演奏者。他的喇叭演奏具有对音符位置的良好感觉，善于结合节奏与旋律的微妙变化来制造音乐从紧张趋

---

① 格雷厄姆·瓦里美：前引书，第29页。

② 卡罗尔·卡尔金斯：《美国文学艺术史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4页；又参见罗伯特·M·克伦登：《美国文化简史》，赫尔辛基，1990年，第194页。

向徐缓的氛围，从而为小喇叭增添了许多音色变化，被誉为“爵士乐天才和最具才华的小喇叭手”[①]。他在1928年录制的优秀独奏曲《西部布鲁斯》是最出色的爵士乐唱片之一。贝西·史密斯是20年代名声最大的古典布鲁斯女歌星。她于1923年开始录制唱片，立即走红整个美国，人称“布鲁斯皇后”。她的唱片《穷人布鲁斯》受到广泛欢迎。她是当时大剧院和酒吧里十分叫座的歌星之一，常常与一些名牌明星同台演出，留下了许多一流的唱片。

爵士乐之所以广受垂青，还由于它本身的通俗性。爵士乐有很强的世俗感，形式生动活泼，风格独特，容易为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所接受。由于爵士乐注重节奏的运用和擅长用乐器模仿人声，从而为西方音乐传统注入新的活力，现代流行音乐、摇摆乐、摇摆舞曲都受到它的深刻影响。它对音乐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是20世纪许多其他音乐风格所不可比拟的。这也是美国黑人对美利坚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

爵士乐的发展造就了许多有才能的美国作曲家和音乐家。他们以色调鲜明的作品丰富了这种轻音乐艺术和整个美国乐坛。作曲家乔治·格什温（1898—1937）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位[②]。他的主要作品有《蓝色狂想曲》（1924）、《美国人在巴黎》、《古巴序曲》、《F大调钢琴协奏曲》以及歌剧《波吉与贝斯》等。格什温一生写有10个轻歌剧、许多影片乐曲和几百出歌剧，其作品清新有趣、漫柔华美，独具特色，其中一些抒情歌曲成为出色的典范。

20世纪初美国音乐教育开始普及，音乐课列为小学的必修

---

① 格雷厄姆·瓦里美：前引书，第36页。

② 罗伯特·M·克伦登：《美国文化简史》，第196页。

课。各种专业的音乐学院和机构纷纷建立。1900 年费城交响乐团宣告成立。1905 年成立了音乐艺术学院。1914 年美国作曲家及出版者协会诞生。1919 年黑人音乐协会成立。此外，新成立的音乐院校还有曼尼斯音乐学院（1916）、费城社区音乐学院（1916）、费城柯蒂斯音乐学院（1923）、朱丽亚音乐学院（1926）等。在此前后，纽约、芝加哥和新奥尔良等城市一些管乐队和舞蹈乐队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些音乐学院和团体的建立为培养美国专业音乐人才和促进美国音乐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是这个时期美国乐坛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

〔电影〕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电影在美国悄然兴起并迅速发展起来。1891—1927 年是电影史的默片时期。1891 年托马斯·爱迪生的助手威廉·迪克逊发明了一种电影放映机——电影视镜。这是通过一个小孔观看不断闪动的动画片的机器，有人称之为“供一人看的电影”。1896 年，爱迪生在纽约用活动电影放映机首次成功地将图像投射到一个大银幕上，可供许多人同时观看，从而开创了电影的新时代。爱迪生乃成为现代电影之父。1900 年以后，小型电影院像雨后春笋般在美国各地涌现出来。1903 年，美国拍摄了第一部连贯故事片《火车大劫案》。这是电影故事片的开端，也是西部牛仔片的鼻祖。1905 年，乔治·C·黑尔制作的《黑尔旅行》是美国第一部风光片。它综合了听觉、视角、触角和运动觉，模拟表现了行驶中的列车，使人产生一种非常逼真的列车旅行幻觉。放映后倍受观众欢迎，迅速传播到美国和世界各地，为电影的进一步普及开辟了道路。到 1908 年，美国已有 1 万家固定电影院。由于电影业有利可图，资本家纷纷向它投资，电影迅速成为一项产业并日益走向商业化和垄断化。电影业的领导权很快转入巨型垄断组织手中，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已成立了 5 个大的电影垄断

公司，即派拉蒙、米高梅、华纳、环球和联美。不久以后，哥伦比亚影业公司和20世纪福克斯影业公司也相继成立。加利福尼亚的好莱坞因集中了众多的电影制片厂，很快成为一座世界电影之都。到1925年，电影在美国已经普及。每周有1.3亿人次看电影。全国有2万家电影院，有些豪华的大型影院拥有7000个座位。

美国电影业的发展造就了一些著名的导演和演员。如金·维多、约翰·福特、马克·塞内特、塞西尔·德米特、戴维·沃克·格里菲思等，其中，格里菲斯是默片时代的一位最杰出导演，有人把1915（即他拍摄《一个国家的诞生》时）至20年代这段时间称为"格里菲斯时代"①。格里菲思（1875—1948）是演员出身的导演。1906年涉足戏剧界，次年进入影坛。1908年拍摄电影《陶丽历险记》开始电影生涯。一生拍有几百部影片，到1912年就已制成450部短片②。主要的有：《一个国家的诞生》（1915）、《党同伐异》（1917）、《被摧残的花朵》（1919）、《通向东方》（1920）、《暴风雨中的孤儿们》等。其中，《一个国家的诞生》和《党同伐异》是他最好的作品。前者取材于托马斯·迪克逊的小说《同族人》，描写了南北战争时期两个家族的命运。南方庄园主卡梅伦一家原本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爆发后，卡梅伦的儿子上了前线，与北方昔日好友斯通曼兄弟成了敌手。战后黑人烧杀抢掠，卡梅伦的长子组织了三K党进行报复。影片把三K党描绘成英雄，把黑人诬蔑为嗜杀成性的人，充满了种族主义色彩，放映后遭到黑人和进步人士的猛烈抨击。该影片成为第一次世界大

---

① 康纳德·伊·斯特普尔斯主编：《美国电影史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2页。

② 卡罗尔·卡尔金斯：《美国文学艺术史话》，前引书，第180页。

战期间及战后在美国各地煽动种族暴动的有力因素。许多州禁止上映。但影片以出色的现实主义手法描写了战争场面，节奏明快、场面壮观，表演细腻，被称为电影史上的一部杰作。

《党同伐异》描写了4个互不相关的故事：基督教的历史，波斯人对巴比伦人的攻击，法国胡格诺教徒被屠杀和一个美国工人被诬为杀人犯的故事。电影力图证明，党同伐异是自古以来的生物学现象。但影片也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慈善事业的自私本质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罪行。格里菲斯对电影制作技术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在摄影、剪辑、特写、蒙太奇手法等方面都有主要创新和突破，极大地丰富了电影语言和导演技巧，开创了电影通向艺术之路。

除了格里菲斯外，20世纪初，美国电影界的马克·塞内特、塞西尔·德米特、金·维多、约翰·福特等电影导演也拍摄了一些富于现实主义色彩的影片。马克·塞内特在默片时期为喜剧片开创了新局面。金·维多的《阅兵大典》（1925）和《群众》（1928）对战争和赤贫条件下“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作了生动的描绘。约翰·福特则开创了西部片的格式。塞西尔·德米特执导的宣扬美国生活方式和以《圣经》为题材的影片在20年代有很高的卖座率。如《为何换妻了?》、《莫换你丈夫!》《禁果》、《十诫》、《不信神的少女》、《万王之王》等。这个时期著名的电影演员有玛丽·皮克福德（1893—1979）（旧译壁克馥）、嘉宝等。前者擅长饰演纯情可爱的少女，被称为“美国情人”，曾使许多美国人心醉神迷。她所出演的《红伶秘史》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她有时也扮演活泼和富于反抗精神的女性，是当时许多妇女所崇拜的偶像。嘉宝成功地主演过《激流》、《肉与魔》、《仙女下凡》等默片，被誉为无声片中“安祥的女神”。后来她主演过《安娜·卡列尼娜》、《茶花女》等名片。她那秀丽的容貌、优雅高贵的气质和略带忧

伤的表情，赢得了亿万观众的心。

20年代，美国电影中喜剧片占相当比重。出现了一批出色的喜剧导演和演员。哈罗德·劳埃德、巴斯特·基顿、哈里·朗顿、查理·卓别林是默片时代的喜剧大师，而查理·卓别林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卓别林（1889—1977）生于英国。1913年在美国涉足影坛。他集编剧、导演、演员于一身，既是杰出的导演，又是出色的演员。他以高超的杂技和各种细微手势技巧，塑造了众多"小人物"的银幕形象。圆礼帽、小上衣、肥裤子、大皮鞋、小胡子，加上一根手杖是卓别林的典型形象。他的表演风趣幽默，哀婉动人。《寻子遇仙记》、《淘金记》、《马戏团》是他在默片的黄金时代创作的三部巨片。比起任何喜剧演员，卓别林最善于表现下层人物的喜怒哀乐。他既能引出人们的泪水，又会逼出观众的笑声。例如，在《淘金记》中，观众看到小乞丐与一位他热恋着的妙龄少女跳舞。在跳舞过程中，由于他的裤子总是掉下来而陷于十分尴尬的地步。他忙中抓起一根绳子，把它当作皮带系在腰间。然而，不幸的是绳子的另一端拴着一只大狗。当那条狗把小乞丐拽倒在地板上时，大家都笑了。但在笑声中，人们对那小家伙又寄以深切的同情。卓别林的作品幽默诙谐，有讽刺社会时弊的效果，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也受到美国右翼势力的迫害，曾一度被迫离开美国，定居瑞士。

1927年，华纳兄弟影业公司拍摄了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歌手》，揭开了美国电影史新的一页。从1929年起，整个美国电影业转入生产有声电影片。世界电影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绘画〕　美国民族绘画艺术是在19世纪后半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20世纪初进入一个新阶段。19世纪末被称为美国画坛"三巨头"（或三个"反叛者"）的三位现实主义大师温斯洛·霍默、托马斯·埃金斯、艾伯特·M·惠斯勒是跨世纪的人物。他

们在晚年宝刀不老，继续为美国艺术发展作贡献。他们的有些最优秀的作品都是在90年代发表的。霍默花甲之年满怀深情地歌颂黑人顽强斗争精神的作品《墨西哥湾流》(1899)、《猛击要害(1899) 均发表在这个时期。《墨西哥湾流》这幅画刻画了一位体魄健壮的黑人孤立无援地在大洋中同大自然搏斗的大无畏英雄形象。霍默被称为“美利坚合众国最著名的油画家，19世纪美国最出色、最深刻的现实主义大师”①。以画肖像画为基本题材，并擅长揭示人物个性和内心世界的埃金斯其许多优秀作品也是在这个时期问世的，如《威廉·马克·德雷尔》(1904)、《约翰·布卢默》(1904)、《查尔斯·艾·达纳》(1902)、《埃吉特·缅霍太太》(1904)、《霍姆斯·德·阿尔萨夫人像》(1902)，等等。由于埃金斯的肖像画总是栩栩如生，富于人物的个性特征，往往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得入木三分，许多人不愿请他画像，一位叫埃德温·艾比的画家风趣地说，我不愿意给埃金斯当模特，因为“他抓住的正是我从来不愿意让人家看到的”②。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都举办了埃金斯的大型个人画展，称他是“这个国家产生的最伟大的画家之一”③。正是这些“反叛者”为美国现实主义美术的发展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许多画坛新秀。罗伯特·亨利、约翰·斯隆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们继承和发扬了19世纪美国进步大师的优良传统，成为新一代现实主义画家。20世纪初现实主义画派是这个时期美国绘画的主流。他们是在同占统治地位的、以现代主义为特征的官方艺术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随着文化交流

① (苏) 阿·契格达耶夫：《美国美术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第65页。

② (苏) 阿·契格达耶夫：前引书，第74页。

③ (美) 莉莲·弗里德古德：《美国画家》，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

的扩大，西欧大量颓废的形式主义美术传进美国，如泛滥一时的表现主义、未来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和其他流派，在美国美术家中得到广泛响应。富有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对那些脱离人民、远离生活的畸形、怪诞的唯美主义学院派画风倍加赞赏。这股潮流无疑妨碍了健康美术事业的发展，阻碍了真正的民族美术的形成和繁荣。全国美术设计院是保守派的大本营。世纪之交成长起来的这批画坛新人必然要同这些保守派、同这股正统势力发生交锋和冲突。由于罗伯特·亨利等人作画的指导思想、内容和风格不符合正统派的口味，他们的作品常常被指斥为庸俗、丑陋，没有美感而被全国美术设计院和其他组织拒绝参加画展。为了争取艺术表现的自由权利，为了给现实主义美术开辟道路，罗伯特·亨利等人决心另谋出路，组织自己的画展。一场反对传统的美国学院派画风的战斗就这样开始了。1908 年 2 月 3 日，“八位独立画家作品展览”冲破重重阻力，在纽约市麦克佩斯美术馆举行了首次画展。这 8 位画家是：罗伯特·亨利、约翰·斯隆、乔治·B·卢克斯、威廉·J·布莱肯斯、阿瑟·B·戴维斯、莫里斯·B·普伦德戈斯特、埃弗雷特·希恩和欧内斯特·劳森；还有后来加入的乔治·贝洛斯。由于他们的作品摒弃传统标准，引进激进概念，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日常生活中的俗人俗事，被保守派认为“不合时尚”而加以指责，称他们为“垃圾箱画派”。一时间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有人咒骂他们是“鼓吹丑恶的人”，甚至把他们叫做“革命黑帮”。可是出人意料的是，“8 人画展”由于受到攻击，反而扩大了它的影响，许多人前往观看和购买他们的作品，销售额达 4 万美元。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和另外 8 个城市还邀请他们去展览其作品。从此，“8 人团”画家名声鹊起，独立派画家的地位得到承认。两年后，1910 年 4 月 1 日，亨利和斯隆等人在纽约举行了另一次更大规模的“独立派艺术家画展”，开幕之日门

庭若市。“8人团”画家的作品以清新的内容和风格一扫美国画坛保守沉闷的风气，使人耳目一新。他们的作品是新时期美国画坛进步倾向的主流。这两次画展标志着现实主义艺术在美国的兴起。

“8人团”的精神领袖和鼓舞者是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现实主义画家之一罗伯特·亨利。罗伯特·亨利（1865—1929）生于辛辛那提市，曾就读于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巴黎朱理安学院和巴黎美术学院。他虽然受到欧洲各种画派思潮的影响，但更多的是继承了本国的现实主义优秀传统。他顶着保守逆流，把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画家聚集在自己周围组成“8人团”，形成了向传统势力做斗争的重要力量；他谆谆教诲自己的学生“要表现生活，而不是表现技巧”，“不要摹仿，要有自己的风格”①。这些现实主义的主张时刻唤起人们把眼光投向生活的真实，影响了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画家。亨利除了少数风景画外，主要以肖像画见长。他尊重人的尊严和美德，思想敏锐，很善于发现人的精神世界的真善美。他的作品《化装舞会穿的布拉吉》（1912）、《小渔夫》、《里里安》以及《萨特·克拉拉的印第安姑娘》（1917）等，朴实严谨、真挚动人，使人感到亲切可爱。

约翰·斯隆（1871—1951）是“8人团”中最重要的画家之一，罗伯特·亨利的得意门生。斯隆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商人家庭，从小家境贫寒。16岁起就承担养家的部分重担，一生几乎有一半时间用来挣钱糊口。坎坷的经历使他对下层劳苦大众十分同情，目光总是瞄向芸芸众生。他以生动而敏锐的现实主义手法描绘纽约的城市生活。街道、贫民窟、妓院、下等酒吧常常是他作画的题材。“垃圾箱画派”这个带侮辱性的绰号很大

---

① （苏）阿·契格达耶夫：前引书，第102页。

程度上是针对他的作品来的。斯隆关心社会进步，曾从事政治题材的版画创作，并长期为社会改革刊物《群众》作插图。斯隆的作品主题鲜明，具有强烈的对比性。他的现实主义杰作之一，铜版画《第五街》，在画面上一边是坐在豪华马车上疾驰而去的贵妇人，旁边则是衣衫褴褛踯躅街头的乞丐，生动地揭示了美国社会贫富之间的深刻鸿沟。斯隆的其他作品如《春之花》、《麦克索利的酒吧》（1912）也充分表现了其特有的对比鲜明的画风。斯隆描绘下层群众生活的作品还有《后院——格林威治村》（1914）、《在宾吉小酒馆里的耶茨》、《把灯关掉》等，充分表现了他对悲剧生活的真实感受和对人的深切同情。斯隆在晚年仍作画不辍，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美国绘画艺术。

20世纪初，美国还有一位出色的现实主义画家乔治·维斯里·贝洛斯（1882—1925）。贝洛斯虽然没有参加“8人团”，但他的主张和画风与他们完全一致。贝洛斯也是罗伯特·亨利的学生。他厌恶当时泛滥一时的形式主义、脱离生活的抽象艺术，忠实地继承了霍默、埃金斯、惠勒斯和罗伯特·亨利等人的优秀现实主义传统。他竭尽全力展现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被称为“合众国里最富有美国气质的画家之一”，是“真正的人民画家，民族画家”①。贝洛斯既从事油画、素描，也创作石版画、肖像画和风景画，题材十分广泛。从各项运动如拳击、马戏、马球赛到熙熙攘攘的城市街道、花园、公园、桥梁和码头；从建筑工人、造船工人到贫民窟中的居民、监狱中的囚犯以及对黑人严刑拷打的场面，笔触所至，几乎包括了生活的各个侧面。贝洛斯的石版画《佐治亚州的祝福仪式》（1916），通过一位神父正在狱中训诫被戴镣铐的黑人囚犯，生动地讽刺了美国宗教的伪善本质。《峭

① （苏）阿·契格达耶夫：前引书，第107、105页。

壁上的栖居者》(1913)和《造船厂里的人》(1912)则深刻有力地揭露了美国社会下层群众的悲惨生活。贝洛斯的两幅反战作品更具特色:《回来了又怎样呢?》描写了从德国回来再不能从事劳动的法国伤残战俘。《杀害爱迪特·凯维尔》(1918)描绘了一位协助伤员从比利时的包围中逃出的英国女护士遭受枪杀之前的场面。作品着色凝重、寓意深刻,充满悲剧色彩,动人心魄,充分揭露了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罪恶。在另一幅《向和平致敬》(1918)中,贝洛斯以寓意的形式、浓重的色彩、动感很强的构图,歌颂了人类欢乐和光辉的未来。贝洛斯的作品深刻、真挚、大胆、创新,独具风格,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不愧为"20世纪美国最引人注目、最感人的一位现实主义画家"①。正是上述这些现实主义画师为美国画坛增光添色,把美国进步美术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与美国现实主义绘画发展的同时,正统派画家也在积极活动。1913年2月7日,由画家、雕塑家协会主持在纽约组织了一次大型美术展览会,由于它在纽约华盛顿街心花园附近69步兵团的军械库展出,故称为"军械库展览会"。这是欧洲现代艺术首次在美国大规模展出,展览会共收集了1300多件油画和雕塑。展品中不仅有19世纪法国画家的优秀作品,也有欧洲各种形式主义流派的作品。展览会先在纽约,以后又在芝加哥和波士顿展出,观众达30多万人。由于展览会的内容良莠不分,兼容并蓄,所以其效果也好坏兼具。好处是扩大了美国观众和艺术家的视野,使美国的美术发展不再孤立于世界艺术潮流之外。坏处是,它为欧洲各种现代派作品在美国舞台上大开方便之门,从而"起了极大的副作用","加速了早已露头的艺术解体,并没有促进艺

① (苏)阿·契格达耶夫:前引书,第104页。

术的繁荣"[①]。它促使一些"美国的青年画家努力模仿欧洲各种抽象派、形式主义的探索者"，"它使美国20世纪形式主义美术带上毫无个性的世界主义特点"[②]。然而，应该指出，尽管这次展览会在美国美术中给形式主义的发展以很大的推动，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延缓了它的最后形成。更主要的是"虽然在1913年军械库展览之后，很多美国艺术家都接受了现代主义，但也有人反对，他们赞成作为美国最持久的传统的现实主义"[③]。这些反对者主要就是像"8人团"这样一批现实主义画家。他们是美国美术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雕塑和建筑〕　20世纪初，美国雕塑界没有出现像圣-郭登斯和弗伦奇那样赫赫有名、作品影响深远的雕塑大师，但也有其特色，产生了一批擅长刻画西部风情和人物的雕塑家。弗雷德里克·雷明顿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1905年，他以印第安人为题材创作的"平原战士"、"冲锋战士"，造型生动、富有生气、栩栩如生，是反映印第安人生活的现实主义杰作。另外一些雕刻家也以印第安人为创作主题，如索伦·汉尼巴尔·博格姆的作品"苏族印第安人的水牛舞蹈"和赫尔曼·阿特金斯·麦克尼尔的作品"太阳宣誓"，都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准，生动地展现了印第安人的民族文化特色。萨特金·约翰逊则以黑人为创作题材。他公开声称："我所关心的只是美国黑人，力图通过他们富有特征的嘴唇、头发、体态和风采来反映他们的自然美感和人格尊严，并且表明黑人比白人更具有美感"[④]。他的代表作"面具"在美国美术史上享有较高的声誉。由于受到欧洲前卫艺术家如达达主义和超现

---

① （苏）阿·契格达耶夫：前引书，第115页。
② （苏）阿·契格达耶夫：前引书，第115页。
③ 卡罗尔·卡尔金斯：前引书，第90页。
④ 韦恩·克雷文：《美国艺术文化史》，纽约，布朗公司，1994年，第382页。

实主义雕塑的影响，美国雕塑家们开始尝试用扭曲的线条、怪异的形态以及特殊的材料等手段来表现丰富的联想和复杂的心灵体验。加斯顿·拉克艾斯是美国早期抽象派雕塑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最著名的作品“躯干”（1930）以极度夸张的手法表现了一种对人体的独特感受。但是，美国有些雕刻家那种荒诞怪异和注重偶然性的表现手法，使人觉得他们的作品抽象难懂，颇费理解。

20世纪初，美国建筑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出现了崭新的形式——摩天大楼。与这一新的建筑形式有关的著名建筑师主要有2个：弗兰克·L·赖特和路易斯·沙利文。弗·劳·赖特（1869—1959）是20世纪初闻名遐迩的建筑师，一生设计了800多幢建筑，其中380幢付诸建造，迄今仍有280幢。他的作品以形式和细节的相互衬托为主旨，对本质有深刻理解。他早年在芝加哥的沙利文建筑事务所任职。1893年自设事务所，创造了一种适合于中西部的建筑风格，形成所谓“草原派”。1900年草原式建筑风格趋于成熟，主要靠自学成才的赖特成为这一风格的主要创始人。此后，草原式住宅被作为商品建筑大量兴建。它用简洁的墙面、宽敞的起居室、环境取暖装置等取代了住宅中复杂的分间和细节，既宽敞实用，又方便舒适，使装饰、家具和实用设施浑然一体。1900—1910年间，他设计建造了50多幢草原式住宅。建于布法罗的D·D·马丁别墅和建于芝加哥的弗雷德里克·C·罗比庄园是其中的典范。1904年他设计建造的拉津邮购公司，采用封闭、防火、空气过滤调节、机械通风和吸声等一系列先进技术，成为20世纪初美国建筑艺术最优秀的代表作。同年设计的达尔文·D·马丁宫，体现了他重申的“草原家园”的简朴风格①。

---

① 悉尼·利布兰克：《20世纪美国建筑》，中译本，安徽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17页。

1906年建筑的惟一神教教堂被列为美国国家历史文物。他为日本设计的东京帝国大厦（1915—1922）豪华舒适，空间优美，结构独特，第二年经受了最严重的地震考验，是建筑史上的杰作。

路易斯·沙利文（1856—1924），美国现代建筑艺术的先驱。1872—1873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建筑设计课程。1874—1875年在巴黎艺术学院学习。他反对复古主义设计，提倡现代建筑风格，是"芝加哥学派"的奠基人。沙利文是美国建筑设计师中最谙哲理的人，他的信条是："功能决定形式，形式表达功能"。他认为，如果建筑不忠实地反映一个民族的生活，它就不具有真正的意义。他也是第一个强调建筑的社会责任的人，被称为"美国现代建筑之父"。他1891年设计的圣路易的温赖特大厦高137英尺，采用钢框架结构，不用承重外墙，奠定了现代摩天楼设计的基础，被认为是"此类建筑中史无前例的精美建筑"①，"是美国第一座成功的摩天楼"②。沙利文设计的摩天大厦是他对美国建筑艺术的最大贡献，成为20世纪初美国建筑艺术的代表作。摩天楼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电梯、钢筋结构、浮动基地的研制成功，使摩天楼的建筑成为可能；地价的日益升值加速了它的发展。芝加哥和纽约是摩天楼建立最早和最集中的城市。建于1913年的伍尔沃思大厦高792英尺，有55层。稍后建造的纽约帝国大厦高达1250英尺，在它102层的观察台上可俯瞰纽约市全景，迄今仍是世界著名的高层建筑之一。摩天楼的出现也是美国城市化、公司化、工商业和金融业迅猛发展的产物，能在摩天楼里安营扎寨的往往是大公司的老板或金融巨头，平民百姓是没有资格问津的。美国建筑师们的摩天楼的设计和建造中抛弃了欧

---

① H.S.康马杰：《美国精神》，前引书，第589页。

② 卡尔金斯：前引书，第160页。

洲传统建筑中复杂的内外装饰，把适用与美观结合起来，开创了这种全新的建筑形式。此后，摩天楼像雨后春笋般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涌现出来，而且越做越高，成为城市发展中的一大奇观。摩天楼的产生虽然在建筑史上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扩展了建筑空间，促进了城市发展，“一度曾被认为是美国建筑活力的骄傲标志”[①]。但是，摩天楼也有许多副作用。它那盒子式或笼子式的高大楼房使街道变成狭窄阴暗的缝隙，让人觉得压抑和难受；它遮天蔽日，妨碍周围住宅通风和采光，使人感到沉闷、窒息。连摩天楼的设计者们也对它提出尖锐的批评。赖特称摩天楼是建筑上的“巨怪”。路易斯·瓦福德称之为“供天使和飞行员居住的建筑”。有些城市规划者把它看作是社会灾难。沙利文则认为它是“反社会”的[②]。高耸入云的摩天楼与低矮败破的贫民窟形成鲜明的对比。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缩影。

三、史学新成就

〔*历史科学的新阶段*〕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历史科学进入一个新阶段。专业历史团体和高学历的历史人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是这个时期的一个显著变化。1884 年最早从“美国社会科学协会”中独立出来的“美国历史协会”到 1909 年已有 2500 名会员。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最有活力的历史学团体”[③]。1895 年，该协会的机关刊物《美国历史评论》杂志正式

---

① 卡尔金斯：前引书，第 153 页。

② 康马杰：前引书，第 591、593 页。

③ 阿瑟·林克：“美国历史协会 100 年，回顾与展望”，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现代史学的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455 页。

创刊。1907年，又成立了专门从事美国史研究的学术组织“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协会”（1965年改名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并办有《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评论》杂志（后改为《美国历史杂志》）。它们对于促进学术交流、提高专业研究水平，推动美国历史科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1882年全美国仅有5所大学有权授予博士学位，只有2个历史学博士生毕业。1912年已有22所大学具有历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当年有500人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20年代末已增加到600人，并且平均以每年50人的速度递增。这些博士生的毕业为美国历史科学的教学与研究输送了高素质的人才。大批经过细致整理的原始历史资料相继出版，是这个时期历史学界又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如三卷本《1787年联邦会议记录》（1911）、共三十四卷的《大陆会议记录》（1904年开始出版）、七卷本《1861—1865年美国南部同盟会议记录》（1904—1905）、五卷本《印第安人事务·法律和条约汇编》（1903年开始出版）、四卷本《美国和其他列强之间条约、公约、国际条例、协定书和协定汇编》（1910年开始出版）。还有哈特主编的分专题出版的二十八卷大型丛书《美国民族》，（1904年开始出版），等等。这些资料的公开问世，为开展美国史的有关课题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个时期美国史坛的又一突出表现是学派众多，“群雄并立”。既有特纳为代表的边疆学派、比尔德为代表的经济学派，还有以研究美国劳工问题为其特色的康蒙斯、威斯康星学派，以内文斯为代表的企业史学派，更有伯吉斯、邓宁等人为首的种族主义学派，可说是杂然纷呈。研究范围比以前进一步扩大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专家们的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殖民地时期和独立革命时期的历史，也研究内战和重建时期，研究课题除政治制度外，还涉及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劳工史、奴隶制和历史地理等方面，其广度和深度都比以前

大有进步，并出版了不少专著。

〔进步主义史学〕　进步主义史学是进步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定的意义上讲，进步运动是内战后美国社会公司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广大中下层群众，包括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极少数垄断资本集团控制社会经济命脉及其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十分不满，对各级责任政府的腐败和大城市中贫困和犯罪的日益增长深感忧虑，强烈要求实现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合理化，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正是在进步运动和进步主义思潮影响下，产生了进步主义史学和一批有才华的进步主义史学家，其中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有三位：弗雷德里克·特纳、查尔斯·比尔德和弗农·L·帕林顿。进步主义史学家注重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主张使历史成为实行政治变革或改良的工具；他们都来自中西部，接受过进化论的观点，也受到当时史坛上“新历史”思潮的影响；他们打破了新英格兰史学家对史学的垄断地位，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局面。在这三位学者中，特纳是在史学舞台上崭露头角的第一位。他在 1893 年发表的划时代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否定了当时在美国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生源说”，即认为美国历史是欧洲史的延续，主张从美国实际，特别是从西部的经济、政治和地理等因素来研究美国文化的起源，从而奠定了“边疆学说”的理论基础，成为美国资产阶级史学的转折点。特纳的历史观反映了美利坚民族独立意识的增强，与当时美国文坛要求建立独立的文学艺术的呼声是一致的，被称为“历史写作的独立宣言”。特纳一生著述不多，但其理论却在美国史学界占支配地位达 30 多年之久，是边疆学派的一代宗师。查尔斯·比尔德从经济角度对美国宪法的制订经过和实质重新进行解释，写出了名著《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帕林顿则从思想史角度阐述了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进程。特纳、比

尔德和帕林顿这三位史学家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史学领域”，被称为进步主义时期的三位大师，是“在史学上长期留下自己风格的学者”①。这个时期的进步主义史学家还有詹姆斯·鲁宾逊，他是“新史学”的开创者，重点写社会史，主张重写普通人阅读的美国通史。进步主义史学以其广泛的研究领域，独特的研究成果将美国史学发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是这个时期美国史学的主流。

〔比尔德与经济史观〕　查尔斯·A·比尔德（1874—1948）是美国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出生于印第安纳州，成长于平民党和进步主义改革运动时期。1898年大学毕业。曾在牛津大学攻读英国史和欧洲史。190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比尔德不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还是政治学家和社会思想家。他一生驰骋史坛近50载，写有300多篇论文和60部著作，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比尔德在美国学术界影响巨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的史学思想在美国史学界一直占支配地位。在这个时期，比尔德的重要著作有三部。《美国宪法的经济观》（1913）是他用“经济决定论”解释美国历史的代表作，也是探讨美国宪法制定过程的权威性著作。在本书中，比尔德采用大量翔实的材料仔细分析了美国开国元勋们发起和制定宪法的动机。他认为，制宪会议代表主要是四个动产利益集团，即货币、公债券、制造业、贸易和航运业。他们都是宪法通过的经济上的直接受益者。比尔德还认为，制宪的另一目的是加强资产阶级专政，防止和镇压“无财产”的群众的“骚动”。比尔德批判了美国早期学派所谓宪法是超阶级的、“全民意志的产物”的错误观点，相当程度上触及到美国宪法的本质，是历史的进步。正因为如此，所以有

① 康马杰：前引书，第428页。

人称他为“马克思学派”。但是，比尔德本人却否认他对宪法的经济分析来源于马克思学说，而是强调其研究是以麦迪逊的政治学思想为依据的。事实上，比尔德的“经济决定论”是机械的、片面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他不承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用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掩盖了阶级之间的矛盾；他有意缩小了种植园奴隶主在制宪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把宪法描绘成资本家债权人一致反对土地债务人的工具”[①]，是工商业资产阶级对种植园奴隶主的胜利，客观上否认了美国宪法是美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调和的产物这一要害实质。对于美国宪法在西方宪政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比尔德也未加详细论述，这就不可避免地削弱了该书的重要意义。

比尔德第二部重要著作是《杰斐逊民主的经济根源》(1915)。它是比尔德用“经济决定论”解释美国历史的又一力作。此书总的指导思想是：宪法是一小撮打算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以保护其财产不被农民群众侵犯的资本家集团制定的。比尔德认为，杰斐逊民主运动并不是如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对财产和政治集团的攻击，它不过是政权从资本家集团转到农业集团手中[②]。在本书中，比尔德指出，杰斐逊民主和联邦党人没有多大区别，因为双方都反对“多数人的暴政”，并认为，杰斐逊不了解政治的经济基础，因而不能给民主力量以足够的支持，推动他们去反对反动派和特权阶级。这是杰斐逊民主的局限性。

比尔德第三部有影响的著作是他与其妻子玛丽·比尔德合著的《美国文明的兴起》(1927)。本书的“突出特点是把杰斐逊民

---

① 约翰·海厄姆：“查尔斯·比尔德”，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美国史译丛（史学专号）》，1982年，第95页。

② 李世洞：《美国史学思潮专辑》第12页，载《美国历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1期。

主制解释为农工起义，把内战看成是‘第二次美国革命’，在这次革命中北部的商人剥夺了南部种植园主贵族的权力”，比尔德“把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发展了的经济决定论和对美国人民的文明成就的公开赞美结合起来了。书中还明确地赞扬了美国人民集体的力量和他们对于进步的坚定信心”①。《美国文明的兴起》一书再次显示了比尔德写作历史的独特视角。他突破了学院式的传统写作方式，把文化史看成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历史。全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文笔优美流畅，使人爱读，耐读，出版后在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一再重版增订。在比尔德逝世以后，美国《展望》杂志曾在编辑和教育界举行民意测验，投票推选他的这部书为阐述美国民主的最佳著作。

〔帕林顿与思想史学派〕　弗农·L·帕林顿是这个时期“史坛三星”中成名最晚的一位。如果说“特纳的名声只来自一篇文章”，“帕林顿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成名只靠一部书”②。他于1927年出版的三卷本名著《美国思想的主流》一炮走红，奠定了其在美国学术界的重要地位。这部皇皇巨著的写作范围从殖民地时期一直到20世纪。每一卷叙述从殖民地时期至杰斐逊任内的美国文化的兴起；第二卷以资本主义发展为背景，叙述了美国思想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第三卷讲述美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中产阶级的反抗运动。全书以政治思想发展史为主线，涉及政治、哲学、文学、艺术和社会学等领域，材料丰富、视野宽阔。纵观全书可以清楚地看到，帕林顿是美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歌颂者和崇拜者。他认为，自由主义与清教主义、保守主义思潮的斗争是美国思想发展的主旋律。美国文化史是自由和

① 约翰·海厄姆：“查尔斯·比尔德”：前引文。

② 康马杰：《美国精神》，前引书，第441页。

特权两种力量斗争的历史。“美国思想的伟大传统是自由主义和反抗精神”，只有“开口不离激进思想的人才有美国味”[①]。在他看来，由欧洲传来的清教主义并不是美国民主的福音。美国民主是在美洲大陆土生土长的。因此，在政治方面，他特别推崇杰斐逊民主，并注意研究美国普通劳动群众对美国民主思想发展所作的贡献。在文学艺术方面，他尤其赞赏那些反映民族文化特色的作品，对文艺界的唯美主义倾向给予严厉的批评。对于像塞缪尔·亚当斯、潘恩、杰斐逊、林肯等这些为美国历史发展做出过伟大贡献的人物，帕林顿总是给予热情歌颂。在他笔下的英雄，一个个都是人民大众的斗士。美国著名史学家康马杰高度评价帕林顿这部名著，称它是“号召人民冲锋陷阵的号角”，“是一篇伟大的檄文”[②]。帕林顿这部书的主要弱点是过分强调和渲染杰斐逊民主的作用，明显忽视工商业发展对于美国社会进步的意义。他由衷赞颂的美国的“激进主义”和所谓“理想”无疑都打上鲜明的资产阶级烙印。尽管如此，帕林顿所开创的跨学科研究思想文化史的做法值得借鉴，本书不失为一部有深度、有价值的著作。

〔种族主义史学〕　在美国的史学中从来就存在着种族主义幽灵。20世纪头10年，种族主义史观占有显著地位，其代表人物有约翰·W·伯吉斯和威廉·A·邓宁等人。约翰·W·伯吉斯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和历史教授。著有《政治科学与比较法》(1890)、两卷本《内战和宪法》(1901)、《重建和宪法》(1902)等。他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深受兰克的“客观”历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他认为历史发展是文明进化的优胜劣汰过程，极力宣扬

① 康马杰：《美国精神》，前引书，第438页。
② 康马杰：《美国精神》，前引书，第440、441页。

盎格鲁撒克逊人种族优越性，公开宣称，“种族之间在政治能力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白种人的使命、责任和权利就是将政治权力掌握在手中，以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和人类的普遍幸福”[①]。美国内战和重建是伯吉斯研究的重点，在这些著作中种族主义史观比比皆是。在他看来，美国内战不是北方资本主义和南方种植园奴隶制两种不同制度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而说什么内战是“废奴主义者煽动起来的”。他还鼓吹：重建时期激进派的重建方案企图实现黑白种族平等是不现实的，因为黑人属于劣等民族，不能平等地和白人社会融为一体。这种论调反映了南方种植园奴隶主的要求，客观上为战后在南方各州制定“黑人法典”，实行种族隔离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伯吉斯还把种族优越论扩大到美国对外政策的研究中去，鼓吹为了“迫使落后的民族屈服，甚至必要时不惜采用任何手段”[②]。这种观点完全适应了美帝国主义者对外扩张的需要。

威廉·A·邓宁是伯吉斯的学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也是重点研究美国内战和重建史的学者。主要著作有《论内战和重建》（1906）、《1865—1877 年政治和经济的重建》（1907）等。他把重建时期的斗争说成是不同种族之间理想的冲突，认为重建时期南部的问题并非在于奴隶制而在于同时存在两个性格明显差异因而无法融合的民族。这种“理论”掩盖了“重建是内战的继续，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深入”这一实质。邓宁还认为，内战虽然摧毁了奴隶制，但没有一个保障种族平等的制度取而代之；加之，激进派控制的民主政府吸收了一些没有文化、低能、不会

① 哈维·威什：《美国历史学家：美国历史撰述的社会思想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6 年，第 230 页。

② 伯吉斯：《政治学和比较法》，纽约，1890 年，第 45—48 页。转引自谢沃斯季扬诺夫：《美国近代史纲》，下册，第 1110 页。

治理的黑人参政，从而造成各州政府腐败无能，争权夺利，社会上则犯罪增加，一片混乱。他的结论是：重建是历史的悲剧。这是诋毁黑人及其白人同盟者的种族主义偏见。应该说，南部重建的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必然结果，把责任完全推到黑人头上是不公正的。属于邓宁学派的重要史学家还有克劳德·G·鲍尔斯，他的代表作是《悲剧时代：林肯后的革命》(1929)。该书和邓宁的观点同出一辙，其基调是贬低黑人的作用，否认重建的一切成果。在进步主义史观的影响下，邓宁学派这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观点在有些方面遭到一部分资产阶级史学家的反对，这就是在20年代末出现的所谓修正学派。

〔*康蒙斯—威斯康星学派*〕　康蒙斯—威斯康星学派是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出现的一个研究美国工人运动史的学派，也是美国工人运动史中产生最早、影响深远的一个正统学派，其最早奠基人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西奥多·伊利（1854—1943）。伊利于1886年出版了美国第一部"美国劳工运动"。1892年他就职于威斯康星大学并于1904年创办了"美国工业研究所"，它是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个研究中心。这是威斯康星学派的草创时期。他们出成果的黄金时代是在20世纪初其第二代传人康蒙斯接手以后。约翰·R·康蒙斯是伊利的得意门生，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康蒙斯不负老师厚望，他带领一批同事和学生积极开展科研工作。在进步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下，他们着重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研究劳工问题，主张政府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1910—1911年，他们收集和整理出版了十卷本《美国工业社会文献汇编》。这些资料集虽然有较大局限但材料翔实，不失为研究美国工人运动史的重要参考书。1918年以后，他们又陆续出版了四卷本的《美国劳工史》。从此，康

蒙斯成为研究美国工人运动史的权威。威斯康星大学成为美国工人运动史研究中心和威斯康星学派的摇篮。威斯康星学派的许多观点是不能同意的。例如，他们强调美国工人运动只需要实际利益，不需要革命理论；他们支持“劳联”的“单纯工会主义”斗争策略，反对工人搞革命斗争，主张美国工人运动走非阶级斗争，即阶级合作道路；他们迎合资产阶级政治需要，宣扬“美国例外论”，用“职工意识”代替和否认“阶级意识”，等等。威斯康星学派的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但是，威斯康星学派的产生及其著作的问世对美国工人运动史研究还是起了有益作用的。该学派的崛起，引起史学界对美国工人运动史的注意，从而把美国工人运动史研究提上日程，为工人运动史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它完成了美国工人运动史资料的大规模收集和整理工作，为工运史研究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它为美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培养和输送了一批专业人才。康蒙斯同时还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在公用事业管理、文官制度改革和失业保险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为威斯康星州草拟了许多经济和行政改革法规，为该州的立法工作做出了贡献，成为制度经济学派三巨头中的第三号人物[①]。

四、实用主义哲学与现代教育

〔实用主义的黄金时代〕　19世纪70年代，在皮尔斯等人倡导下，“形而上学俱乐部”创造了属于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哲学。但是，这一新的哲学最初并没有引起美国人太多的注意，直

① 美国制度经济学派的一、二号人物分别为索尔斯坦·维布伦和韦斯利·米切尔。

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经过詹姆斯和杜威的发展和传播，实用主义才在美国广泛流行，进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代。

1898 年，詹姆斯在加利福尼亚州作了著名的“哲学概念和实际效果”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正式引用了实用主义这一说法。与皮尔斯时期仅仅把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科学认识的方法论不同，詹姆斯在演讲中赋予了它浓厚的人本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对此，皮尔斯十分不满，1905 年 4 月，为了表示他与詹姆斯的不同，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实效主义”。然而，皮尔斯毕竟还只是从一个自然科学家的角度来阐释问题，在他的实用主义中没有包含哲学理论。詹姆斯的贡献便是对这种把实用主义原则局限于狭隘的逻辑和科学方法论范围的超越，先后发表了《实用主义》(1907)、《多元的宇宙》（1909 年）、《彻底的经验主义》（1912 年）等论著，把实用主义的原则贯彻于人生观、价值观、真理观等各个方面。他的理论主要强调两点即实用主义和彻底经验主义。对于实用主义，他解释为不讲原则，只讲效果，“实用主义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①]；对于彻底经验主义，他是这样阐释的：“我把世界观命名为彻底经验主义，因此我对事物的描述，从部分开始，并且使整体成为一个第二等的存在。我的经验主义本质上一种镶嵌哲学，一种多元事实的哲学，和休谟和他的后继者们哲学一样。他们既不把这些事实拉到实体上去，为它固有，也不把它们拉到一个绝对精神上去，以为它所创造，作为它的物件。但是我的经验主义和休谟类型的经验

① 俞吾金：《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英美哲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8 页。

主义有所不同，因此我把我的经验主义加上彻底的这个形容词，以表示它的特点”[①]。

詹姆斯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发展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把这一美国哲学推向颠峰的则是另一位大师杜威。他不仅系统论述了实用主义的基本思想，并且将之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各个领域，使之世俗化、现实化。正是因为他的努力，实用主义才会在美国政府和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充分体现出来。他的主要著作有：《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1909年）、《哲学的改造》（1920年）、《经验与自然》（1925年）、《确定性的追求》（1929年）等。在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中，经验自然主义和工具主义是最重要的内容。杜威认为实用主义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哲学理论，“经验既在自然之内，也是关于自然的。被经验到的并不是经验，而是自然——石头、植物、动物、疾病、健康、温度、电力等等。以某些方式起着相互作用的事物，乃是经验；它们是被经验到的东西。当它们以另一些方式与另一种自然对象——人的机体——发生联系的时候，它们也是事物怎样被经验到的情况。经验就是这样达到自然内部的；它有深度。它也有广度，而且在广度是有无限大的伸缩性。它伸张着。那伸张就造成了推论。”[②]。同时，他还提出了工具主义的说法，指出真理、方法都是人应付环境的工具，“各种概念、理论、体系，不管怎样精雕细琢、自圆其说，都只能算是一些假设。只能承认它们是行动的出发点，受行动的检验，而不是行动的结局。看清这件事实，也就清除了世界上的各种刻板的教条。这样也就认识到各种关于思想的见解、理论和体系是永远可以通过使用而得到发

---

① 俞吾金：前引书，第22页。

② 俞吾金：前引书，第73页。

展的。这样也就使我得到教训，必须注意找出毛病来改变它们，同时也要找到机会来肯定它们。它们是工具。同所有的工具一样，它们的价值并不存在于它们自身，而在于它们的功效，功效是显示在它们所造成的结果之中的。”[①]

〔进步主义教育运动〕　20世纪初的美国教育是以进步主义教育改革载入史册的，这是这个时期美国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起源于19世纪90年代的进步运动席卷了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改革派在揭露和批判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黑暗面的同时，矛头所向也触及到学校教育的弊端。如《论坛》杂志在1892年发表了约瑟夫·赖斯的文章，号召人们以弗朗西斯·帕克为榜样，广办“进步主义的学校”[②]，把它的激励作用和热情惠及全体民众。早在1875年，帕克就在马萨诸塞州昆西公立学校进行了教学改革。他强调重理解，不重强记，重生动活泼，不强调纪律。后来又主管芝加哥库克师范学校，进一步推行他所谓的“优质教学”试验[③]。由于他最早发起这方面的革新，被称为“进步教育之父”[④]。1896年，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大力倡导进步教育。他和其夫人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一所实验学校，又称“杜威学校”，以贯彻他的思想。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笃信进步主义原则的教师纷纷向他学习，也办起了类似的学校，以检验和发展杜威的进步教育理论，从而揭开了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改革运动的序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进步主义教育改革基本上处于试验阶段，而且主要在私立学校进行。随着战争的进行，进步主义教育改革在公立学校中也逐步开展起来

---

① 俞吾金：前引书，第61页。

② 指帕克在芝加哥市库克县主办的库克县师范学校。

③ 阿道夫·迈耶：《美国人民教育史》，纽约，1957年，第248页。

④ 卡尔金斯：《美国文化教育史话》，前引书，第19页。

了。杜威不仅身体力行，亲自创办学校进行试验，而且发表了一系列著作从理论上阐述进步教育的意义、办学经验、教学方法和学校组织管理等具体规则。这个时期杜威的主要著作有：《学校与社会》（1899）、《我们怎样思维》（1909）、《明日之学校》（1915）、《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等。杜威的教育理论对进步主义时期美国"教育思想和美国学校产生无与伦比的影响"[①]。被称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首席代言人"[②]。在杜威的教育理论中，他着重论述了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的区别、学生的学习与实践的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等等。在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杜威认为，学校是"雏形的社会"，每一个学校本身都应该是一个社会，儿童作为其中的一员参与这个雏形社会，最终将会了解他毕业后将要进入的那个大社会；他指出，学校乃是继承机构，应该承接社会中其他一些集团的各种功能而使之继续发挥；他还认为学校是社区的一个富有生气的活动中心，是当地社区和整个社会变革与改造的杠杆；但是，杜威又认为，学校单独不能进行这种改革，因为它只是许多重要教育机构的一种[③]。

关于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的区别，杜威认为，教育从其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是连续不断的、无处不在的、渗透一切的和强有力的，而一个人从实际生活中所接受的教育与学校中所提供的教育之间是有差别的。"在日常的生活进程中，教育是偶发的，在学校教育中，教育是有意的"[④]。

---

① 理查德·范斯科德等：《美国教育基础——社会展望》，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3页。

② 卡尔金斯：《美国文化教育史话》，前引书，第19页。

③ 理查德·范斯科德等：前引书，第24—25页。

④ 理查德·范斯科德等：前引书，第24—25页。

关于学生的学习与实践的关系，杜威指出，个人最好从“做”中学，不管是学走路、谈话、游泳、画图，或者解决问题和形成概念，都是这样。学生要取得最好成绩，不仅要从书本上学，还要会使用工具和有关材料，还应走向社会，在劳动和社交场所尽可能多地与人们接触，更多地了解社会和学习社会。杜威特别强调，为人类社会所必须的职业和生活上的联系，都应该包括在教育的基本范围之内。对学习最可信的测量标准，是个人在社会上理智地行动的能力。

关于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杜威认为，教师必须了解学生的个性特征，包括背景、经验和能力，以便因材施教；教师还应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掌握知识的新动向，并贯彻到教材中去，启发学生获得新知识、新见解。

对杜威及其拥护者进行的进步主义教育改革的目的和效果，美国史学家莫里森和康马杰等人作了如下概括：“这些人士和他们的信徒们所进行的‘革命’，乃是要完成一大转变，即着重从讲课转变到着重学习过程，从重视课目转变到重视对学生实际训练，从要求死记硬背转变到让学生获得亲身体验，从事教育为谋生的准备转变到以之作为生活本身。这一转变要求儿童们通过干木活、做饭菜、搞印刷、绘地图这类活动，自己实际参加学习过程……。这样就大大消除了教室中的拘谨、刻板，扩充了课程项目，其代价是学习不透彻和训练不严格。同时这一转变还鼓励儿童在学生自治等类活动中发挥积极主动作用，并力图使学生成为杜威所说的‘一种胚胎式’的群体生活，积极从事能反映出较大社会的实际生活的各类活动。为时不久，杜威便和他在师范学校的同道者们获得成功，把他们的教育哲学推行到了全国很大一部

分地区"[1]。

从上述杜威的教育理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核心是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主张从"干"中学。这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是一脉相承的。他所要实现的"雏形社会"的理想制度就是要把学校建成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训练基地，缩短学生的成长过程，更好更快地培养资产阶级社会之所需要的合格人才，其实质是一目了然的。但他所提出的一些具体观点和教学方法，如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在教学中着重理解、反对死记硬背，重视培养学生自学和自立能力，强调教师要了解学生的特点、有的放矢地教学等，无疑都有积极作用和借鉴意义，对于当时美国的教育发展起到过巨大的推动作用。1919 年 4 月 4 日，在华盛顿公共图书馆大厅正式成立了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协会，其纲领的核心是，用现代科学知识关心学生的身心、道德和社会性诸方面的成长，允许学生以最佳的自然表现和自我管理，来充分发展各个年轻人[2]。1920 年，该协会又公布了"七项原则声明"，内容是：(1) 学生有自然发展的自由；(2) 兴趣是全部活动的动机；(3) 教师是一个指导者，而不是布置作业的监工；(4) 注重学生发展的科学研究；(5) 对儿童的身体发展给予更大的注意；(6) 适应儿童生活的需要，加强学校与家庭之间的合作；(7) 在教育运动中，进步学校是一个领导。1924 年，进步主义教育协会创办了《进步教育》杂志月刊，由格特鲁德·哈特曼任编辑[3]。该杂志大力宣传进步教育理论，也介绍外国的教育经验，对于促进当时正在开展的进步教育改革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进步主义教育

---

① 莫里森、康马杰、洛伊希腾堡：《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年，下册，第 288 页。

② 范斯科德等：前引书，第 26 页。

③ 迈耶：前引书，第 316 页

协会刚成立时只有几百个成员，到 30 年代发展到约 1 万人，成为进步教育事业的最强有力的代言人[1]。在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推动下，美国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不同程度地都受到影响。学制方面，1910 年以前，八—四制和十一年的七—四制一直在美国占优势。后来除少数农村地区外，这种学制慢慢消失了，出现了两年或三年初中。六—三—三制成为“通用学制”[2]。在课程设置方面，有些学校从俄国传入教授金工、木工等技艺；有些中学开办了手工训练课程；中等商业专科学校增设了培养职员、簿记员、打字员的课目；许多学校增加了学生课外活动时间；麦克费读本时代那种机械背诵几乎全被抛弃，代之以包括几门学科的单元课程计划；一些农村贫民区的学校，学生们开始在房前屋后开荒种菜。“进步主义教育……在二三十年代达到了顶峰”，“在进步教育的汹涌澎湃时期，我国没有一所学校能完全逃避它的影响”[3]。

应该指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在一段时期内对美国教育的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影响深远，但它也存在一些严重的缺陷。它过分强调“实用”和“经验”，忽视了课程设置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它过于强调学生的个性发展，忽视了对他们的全面培育和严格的基本训练；片面强调儿童的天然善性和以儿童为中心，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等等。从 30 年代起，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尖锐批评，40 年代逐步走向衰落。

〔*20 世纪初美国教育的新发展*〕　随着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由于受到进步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个时期美国的各级

---

① 《外国教育资料》，1986 年，第 1 期，第 63 页。
② 范斯科德等：前引书，第 286 页。
③ 范斯科德等：前引书，第 27 页。

教育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都有新的发展。

早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公立学校中就增设了幼儿园这一级。但当时的幼儿园无论师资条件还是教学方法都不够完善，儿童得不到活泼健康的成长。进入90年代，扩大和改革幼儿教育成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1900年，美国全国各地还只有250个城市建有幼儿园，到1920年，几乎有8000个左右独立幼儿园，入园儿童达到51.1万人①。如果把公立学校中1—8岁的小孩包括在内，入学儿童达到19377927人，1930年增加到21278593人。② 这个时期儿童早期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所谓"蒙泰索里方法"。玛丽娅·蒙泰索里是意大利的心理医生和教育家。蒙泰索里方法是她所创立的对学龄前儿童的初等教育法。它强调幼儿读、写技能的早期培育，主张给儿童提供舒适的环境以利于智力的开发。发展个人独创性和自我发展是她的教学法的特点。她的教学法把生物的特性和人的智力发展联系在一起，认为儿童在一定年龄就存在着与这年龄相对应的"敏感期"，在这个时期，儿童的兴趣和智能最适于获得某种知识。儿童在6岁以前应该学习读、写、算。后来，她又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方法，使年龄稍大的儿童可以自学语法、几何、多位运算、分数、音乐、生物、地理和历史等。自我教育是蒙泰索里方法的核心。蒙泰索里方法引起美国人的极大兴趣。1912年美国出版了《蒙泰索里方法》，她的教学法在当时的美国风靡一时。蒙泰索里式幼儿学校在各地纷纷涌现。2年后由于受到一些人的批评逐渐冷落下来。

---

① 林克、卡顿：前引书，第21页。

② 美国人口统计局：《殖民地时代至1957年美国历史统计》，华盛顿·D·C，1961年，第207页。

20世纪初，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也有显著变化。1900年，公立学校制度已牢牢确立起来。义务教育有了可喜的进步。到1918—1919年，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最后通过义务教育法，至此，美国基本上完成了小学义务教育。1900年，美国大约只有6000所公立中学，1920年达到14000多所，增加一倍多。1900年，中等学校学生只有63万，到1930年增加到470万。全部中小学生注册总数（包括公私立学校）从1900年的16854832人，增加到1930年的28329059人。学生占5—17岁人口的百分比从1900年的72.4%上升到1930年的81.3%。[①] 1900年，美国公立中小学的常年经费为2.15亿美元，到1920年已突破10亿美元大关，1930年增加到20亿美元。同一期间（1900—1930），学校财产价值从不足10亿美元增加到70亿美元。1870—1920年的半个世纪内，公共教育的全国人均开支从1.64美元增加到9.8美元，花在每个中小学生身上的费用从9美元增加到48美元，增长一倍多[②]。由于受到杜威等人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中学的课程设置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890年，大多数中学生只念拉丁文、几何、代数、历史。到1900年，增加了自然地理、生物学、英国文学、文官政府概论。1910年后，又增添了德语、动物学、植物学。1920年起，学习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等这些基础课程的学生急剧减少。市政学、家政、手工、音乐、艺术、簿记、打字这些应用型科目则倍受欢迎。1918年，全国教育协会确定了中等教育的“七项基本原则”：促进健康、掌握基本技能、在家中表现良好、职业技能、公民义务、有效利用闲暇

---

① 美国人口统计局：《殖民地时代至1957年美国历史统计》，第207页。

② 莫里森、康马杰、洛伊希腾堡：前引书，第287页；杜蒙德：《现代美国》，第67页。

和道德品质。这七项基本原则明显地体现了资产阶级教育的德、智、体三方面要求，不仅影响20年代，而且成为以后几十年美国中等教育的标尺。这个时期，中小学的教学条件也大为改观。19世纪末，农村学校一般都是一间教室、一个教师、八个年级混在一起。城乡的学校实行小学八年制，中学四年制。20世纪以后，上述情况迅速改变。农村学校告别了旧式的单间教室，合并成较大的学校。普遍创立了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不再是大学的预备学校；不少学校建造了更多更好的礼堂、体育馆和试验室等教学设施。

这个时期，由于社会上所需技术人员急剧增加和政府的大力扶持，美国职业教育也获得较快发展。1914年颁布的《史密斯—利费法》和1925年颁布的《帕内尔法》要求普通中学开设农业技术教育课程。根据1916年全国220所中学抽样调查，有97%的中学开设有农业技术教育课。1918年受政府资助开设此课程的中学达609所，1929年增加到2693所。1917年国会颁布了《史密斯—休斯法》，责成联邦政府通过联邦职业教育委员会为地方职业教育提供资金，帮助各州发展职业教育，并规定了职业教育的领导机构和课程门类。1929年又颁布了《乔治·里德法》，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公立中学中的职业教育制度。职业教育的发展一方面为许多青年提供了学习文化掌握技术的机会，另一方面为国家培养了技术人才，满足了社会发展的需要。

教育方面一向比较落后的南方，这个时期也发生了重要变化。20世纪头10年，南部各州教育拨款增加一倍，达2亿美元。白人儿童入学率几乎增加1/3。文盲大为减少。土生白人文盲从1900年的11.8%降至1920年的5.5%。10岁和10岁以上的黑人

文盲从1900年的44.5%降至1920年的22.9%[①]。专为培养黑人教师和促进黑人教育的乔治·皮博迪基金和约翰·斯莱特基金到1927年已创办了300多所立案中学。另外，安娜·琼斯基金(1908)、“普及教育委员会”（1902)、卡罗琳·菲利普斯·斯托克斯基金（1913）和朱利叶斯·罗森沃德基金（1914）也在为黑人学生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以及在农村地区盖起新校舍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和北方其他地区相比，南部的教育发展水平还是相对落后的。教育方面的种族平等也远未实现。

高等教育也有了重要发展。1900年，美国大学协会成立，不久以后，各个地区也相继成立了协会。1900—1930年间，学院和大学从977所增加到1409所。与此同时，高等学校的注册人数由23.8万人增加到110.1万人，其中本科生105.4万人。州立大学发展也很快。有些办得好的州立大学，如密歇根、威斯康星、伊利诺伊、加利福尼亚等大学的学术上完全可以同那些较老的私立名牌大学并驾齐驱。

19世纪后半期通过两个摩里尔法的颁布和实施，美国的赠地学院迅速发展。1895年赠地学院的学生还只有25000人，到1926年就达到40万人。赠地学院成为美国高等教育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对美国高等教育结构和课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开创了一条耗资少、收费低、适应性强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新途径，标志着传统的、古典的、尖子学校垄断高等教育局面的结束。

起步于19世纪20年代，由哈佛率先实行的研究生教育制度在70—90年代得到进一步的确立和巩固。1876年成立的，以培养研究生为主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标志着美国现代大学的开端。此前，哈佛和耶鲁大学已先后建立了研究生院。此后，康

---

① 阿瑟·林克、威廉·卡顿：前引书，第22页。

奈尔、加利福尼亚、克拉克、威斯康星、芝加哥等大学也陆续成立了研究生院。到1900年，设立研究生院的大学已有150多所。1/3的高等院校开设有博士生课程。研究生已达6000人。此后逐年增加，到1930年已达47000人。

随着女权运动的开展和第19条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妇女进入大学的人数也有所增加。到1920年，女大学生已占大学生总数的47.3%。但是，性别歧视仍然存在，不少理科院校和许多医学院校把妇女拒之门外①。

这个时期，大学课程设置也有重大改革。哈佛大学在查尔斯·埃利奥特校长（1869—1909）领导下，首先推行用自由选修课制代替必修课制，使学生有更大的自由选课权利。此后，其他高等院校也纷纷效法，大力采用这一制度②。另外，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也受到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更多地偏重于一些专门化、应用性强的课程，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传统课程的开设。课程安排也显得过于分散化。后来，这一制度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到埃利奥特的继任者洛厄尔任内，对选修课制又作了一些调整，将课程设置相对集中，实行"主修"、"辅修"制。不过学生仍有相当程度的选课自由。选修课程制由于有其优越性的一面，从那时以后一直被沿用下来，为许多大学所采行。

五、宗教

〔美国教会的新发展〕　19、20世纪之交，美国的宗教团体无论在人数还是在财产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1890年，全国

---

①② 玛莉·诺顿、戴维·卡兹曼主编：《民族与国家：美国历史》，前引书，第361页。阿道夫·迈耶：前引书，第335—336页。

教徒总数为21699000人，到1916年为41927000人，到1931年又增加到59798000人[①]。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仍是美国教会的三大方面军。在三大宗教中，新教徒仍占优势，其次是罗马天主教，再次是犹太教。教徒的数字以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迅速递增。“20世纪初的美国可以说在各方面都是个基督教国家”，其“势力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大，而且还在不断增长”[②]

世纪之交美国宗教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罗马天主教势力的壮大。其教徒人数从1890年的734万多人发展到1920年的1800万人。达到6个美国人中有一个天主教徒，3个信教者中就有一个信仰天主教的。1929年猛增到20113000人[③] 天主教的迅猛发展与当时大批外来移民洪流涌入美国有关。据统计，从1891—1930年，共有22325970个移民进入美国，其中大多数来自中欧和南欧天主教国家[④]。这些天主教徒加盟美国无疑壮大了天主教教会的人马。大量罗马天主教徒的到来给美国社会和教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首先，是教徒的管理和与此相关的经费问题。这些新移民有不同的语言、传统和习俗，且大多数为穷人。要管理好他们就必须增加新的牧师，建立新的教区、教会、教堂和神学院。新增加的教士从1880年的6000人增加到1910年的17000人。到1914年教区数目在14个大主教区内共建立了100多个主教辖区[⑤]。教堂也有较大的增加。与此相联系，教会的经费支出猛增。虽然国外

---

① 美国人口统计局：《殖民地时代至1957年美国历史统计》，前引书，第288页。

② H.S.康马杰：前引书，第248、252页。

③ 《殖民地时代至1957年美国历史统计》，前引书，第288页。

④ 悉尼·阿尔斯特伦：《美国人民宗教史》，耶鲁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749—750页。

⑤ 黄兆群主编：《美国宗教史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06页。

宗教机构提供过不少援助，比如到1914年，欧洲信仰宣传团资助了600多万美元。德国、澳大利亚和瑞士也伸出过援助之手。但大部分财政开支还得靠美国本身来解决，从而增加筹措经费的压力。

其次，是天主教的目标和方法问题。教会围绕这一问题分成两派。“自由派”，即所谓“美国人”（多数为新教徒）认为，教会对天主教徒同化入美国主流方面应采取积极态度，加速新教成员的“美国化”，并支持宗教自由主义、容忍教派差别。“保守派”则希望保持天主教的特色和传统，并拒绝迁就“美国化”。他们希望加强自己的种族教区以对抗地区教区。与此相关的是，爱尔兰裔僧侣集团要求有较大的代表性。自由派则反对这种独立的教区制。“美国化”问题的争论一度引起教会内部的分裂。后来教皇作了让步，让一些独立的教区集团享有较大的代表性。关于“美国化”问题的争论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呈上升趋势的罗马天主教发展势头，削弱了长期以来新教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改变了美国宗教力量对比的格局。

第三，是天主教的教育体系问题。较多的天主教自由派人士包括红衣主教詹姆斯·吉本斯、大主教约翰·艾尔兰、约翰·基恩等人主张把公共教育作为他们的小孩同化入美国生活主流的手段。但是，保守派则主张多建立天主教独立的教区学校，以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德裔天主教徒是独立的教区学校的最积极支持者。他们把这些学校看作是保存其德国语言、文化的一种途径。最后由于大主教迈克尔·A·科里根支持后一种意见，争论以有利于建立教区学校制度而告一段落。到1914年，有100万儿

童进入天主教教区学校读书，教师有20万，年开支达150万美元[①]。然而迄这时为止，仍有大部分天主教徒的小孩进公立学校。天主教教区学校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不利于不同民族儿童“美国化”的进程，但是他们自办学校，减轻了政府教育经费负担，不失为社会办学的一种有益途径。

20世纪初，新教势力也达到了顶峰。1906年，新教各团体共有教徒20857303人，到1916年增加到26205039人[②]。而在新教各派中又以浸礼会、卫理公会团体人数最多，势力最大。1929年，卫理公会教徒有7246000人，南方浸礼会教徒有3771000人[③]。同一年其他教派教徒人数为，长老会1959000人，主教派教会1876000人。每天都有新教堂落成。做礼拜的人数空前增加。

随着美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和教会势力的增长，新教和天主教一样，其触角迅速伸向国外，海外布道团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它们和美国军队一起，成为这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扩张的一支重要力量。一百多年来，在美国历史的各个阶段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新教势力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一直居主宰地位。到20世纪20年代受到各种新的理性思潮的影响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以后，其优势已有所减弱。

这个时期，美国的犹太教也有所发展。最早到达美国的犹太人是17世纪中叶（1654）从巴西来的西班牙、葡萄牙裔犹太人。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犹太移民发展缓慢。1775年才只有2千人。美国建国后，由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犹太移民接踵

---

① 黄兆群主编：前引书，第59页。
② 林克、卡顿：前引书，第24页。
③ 《殖民地时期至1957年美国历史统计》，前引书，第288页。

而至。1870年以前，美国犹太人多为德国人。1870年以后，大批东欧犹太人涌入美国。1880—1920年代是犹太人移居美国的高峰期。“单从1881年到1924年这44年间，就有238.8万犹太人到了美国，其中大多为讲意第绪语的犹太教穷人”[①]。他们来自俄国、波兰、罗马尼亚、立陶宛和奥匈帝国。这些犹太人建造自己的教堂、学校、医院、互助社团。创办自己的报刊，开创自己的文学。他们在文学、科学、法律、音乐、医药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美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犹太人还是经商高手，是美国工商界的活跃分子。

在天主教成为美国教会中一支重要势力的同时，东正教也在美国逐步壮大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东正教徒发展到400万，他们分成18个全国性或地区性集团[②]。东正教是美国宗教团体中最不美国化的组织，一直保留着自身的许多特点。

20世纪初叶，美国宗教的繁荣昌盛一度使它们的教徒们激动不已，仿佛这是美国宗教的“黄金时代”。可是与这种发展的同时，美国的教会正面临新时代所带来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严峻挑战。

〔新的理性思潮和社会巨变对教会的影响〕　新旧世纪之交美国教会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首当其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唯物史观、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各种新的理性思维的传播给它带来的巨大冲击。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以魏德迈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先后来到美国，他们创办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南北战争后，达尔文的进化论就传播到美国。“主要的科学家几乎都站到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立场上”，“这种新的理

① 卡尔金斯：《美国文化教育史话》，前引书，第93页。

② 卡尔金斯：《美国文化教育史话》，前引书，第91页。

性潮流，以惊人的速度渗透到公众意识中”[①]。在大学课堂里、报刊杂志上，讲授和报道这一新的科学理论内容比比皆是；圣经考证学和比较宗教研究对《圣经》提出了一系列质疑，无疑对宗教的正统观念和《圣经》权威构成威胁；19世纪末日益发展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开始把宗教贬低为一种社会现象”[②]同样是对上帝威严的挑战；与此同时，新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地质学、考古学的兴起也引起神学家的恐惧。在这一系列新的理性思潮的冲击下，美国社会世俗主义迅速发展，宗教在人们中的影响急剧下降。“以致到1920年，或许大多数知识分子已不承认基督教信仰”[③]。康马杰生动地概括了20世纪中叶以前美国社会世俗化的状况。他指出，教会虽然在物质上达到空前强大，可是其精神力量却从来不像现在这样微弱。耶稣会传教士的布道已推动昔日的权威，著名的传教士钱宁和帕克已后继无人，教会本身日益走向世俗化；在教会伸入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同时，却退出了学术领域；200年来教会几乎一直是教士们的独占财产，此时却悄悄地从他们手中放走了；新时代的著名哲学家，如皮尔士、詹姆斯、桑塔雅纳和杜威等人都不是传教士；教派大学虽然很兴旺，但是像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和芝加哥这类名牌大学，再也不属任何教派；1840年，全国所有重要大学校长都由教会培养出来的人担任，100年后再也没有一个教士担任这类大学的校长[④]。

教育的进步和道德习俗的“革命”也对教会造成不小的冲击。宗教戒律对两性关系、结婚、节制生育不再具有约束力。过

---

① 黄兆群主编：前引书，第211页。
② 黄兆群主编：前引书，第211页。
③ 林克、卡顿：前引书，第24页。
④ 康马杰：前引书，第253－254，268页。

去为教会牧师所垄断的社会工作和精神病学现在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占据。高等教育的发展使许多会众的文化水平大大提高，把昔日职业牧师所具有的文化上的优势地位剥夺殆尽。以前牧师们独占的讲道领域现在为讨论科学、道德的内容所取代。本世纪初期，福音派著名传教士比里·桑戴讲道时，会众趋之若鹜，虔诚地向他敞开心扉，到了20年代以后，他的讲坛门前冷冷清清，门可罗雀。露营集会和信仰复兴大会在全国大片地区几乎绝迹。

教会所受的第三个冲击是工业化、城市化、垄断化带来的城乡巨变和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的激化。在美国经济大发展、工业化进程大大加速的同时，城市人口猛增。随着公司化进程的加快，垄断资本家不仅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而且直接间接操纵着政治。在垄断资本压迫剥削下，广大工农和中、小资产阶级日益贫困化，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日趋尖锐。19世纪末工农运动空前高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合又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如贫困、妓院、犯罪、酗酒等阴暗面有增无已。美国再也不是有些人所谓的“世外桃源”、“人间天堂”，正在迅速变为“涤罪所”。面对这一系列新问题、新现象，传统教义已经不能解释现实问题，许多教徒对此产生怀疑，甚至动摇，出现信仰危机。在此情况下，教会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坚持《圣经》无误说，固守阵地，等待教会削弱或自行消亡；要么进行改革，除旧布新，重振教业。社会福音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

〔现代主义和原教旨主义〕　美国的教会的派别纷呈。在基督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三大教中，又分化出现代派、原教旨主义派、福音派、自由派、温和派、保守派、进步派、极右派等，形成教中有派，派中有宗的复杂局面。不同教派代表不同的社会思潮。它们之间围绕对《圣经》的不同理解或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和对应政策常常存在分歧和斗争。在这个时期，基督教内

部现代派和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最引人注目。

所谓"现代派"又称"科学现代派"是基督教中最为激进的一个派别。科学现代派20世纪初开始出现，它以科学上的坚定信仰（现代主义）取代以前《圣经》绝对正确的信仰，并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宗教经验，把宗教教规、教会组织和教会实践看作是历史力量和社会环境的产物①。他们还认为，任何宗教声明只能在科学见解范围内进行。斯塔巴克在1899年宣称："科学已经征服了一个又一个领域，现在，它正向所有领域中最复杂、最难以接近、最神圣的领域进军——那就是宗教领域"②。现代主义的再现反映了科学的威力连最顽固的唯心主义堡垒宗教也难以抵挡它的胜利进军。芝加哥大学神学院是科学现代主义的中心。那里集中了像威廉·哈帕、谢勒·马修斯、G·B·福斯特等这样一些著名教授。马修斯是1912—1926年教会联合委员会主席、1915年北方浸礼会代表大会主席。在这些人的努力下，芝加哥大学在用科学的观点研究神学方面走在美国的前列，建立了富有特色的"芝加哥神学"。马修斯的一句话"有科学头脑的上帝将采用科学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一派人对上帝的看法。"在20年代、自由主义在美国新教领袖中几乎取得完全的胜利。许多自由主义者真诚接受进化论，同意用科学历史方法考证《圣经》，不再用神学解释《圣经》以宣传社会福音"。③

科学现代派和新教自由主义者是基督教中比较能顺应历史潮流的派别。他们能够根据新的形势，及时调整对基督教神学的理解，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从而得以适应新的环境，获得新的生

---

① 黄兆群主编：前引书，第221—222页。

② 迈克·赞拉帕姆斯：前引书，第51页。

③ 林克、卡顿：前引书，第33页。

机。改革后的犹太教也属此类。

原教旨主义者是基督教派中最保守的一个派别。面对各种新的理性思潮和社会巨变的挑战，他们顽固坚持《圣经》绝对正确论，抱残守缺，不肯越雷池一步。美国耶稣教会中地位最重要的是浸礼会、圣公会、卫理公会、路德教派、长老会和罗马天主教会。除了浸礼会和圣公会以外，其他各教会的社会纲领都十分保守，神学上均崇尚原教旨主义。19 世纪 70—90 年代，当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美国广泛传播和一系列科学发现揭示出宇宙奥秘的时候，激烈的宗教辩论立即开始。原教旨主义者憎恨科学侵犯了宗教。因为他们相信地球和人类是上帝在 6 天之内造出来的，而地理学家都提出地球形成已经几百万年了，它有自己形成的规律。他们强调圣经绝对正确，而圣经考证学却对《圣经》提出了一系列质疑。总之，新的科学所否定的东西正是新教保守派所一直信仰的根本原则。这就等于动摇了他们整个神学体系和上帝的无上权威。难怪原教旨主义者暴跳如雷。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查尔斯·霍奇宣布："生物进化是绝对不可能的"。威廉斯学院的院长马克·霍普金斯则咒骂，生物进化是"无神论"①。南部的原教旨主义势力最大，成为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也为一股强大的保守势力所控制。中部大西洋各州也存在保守倾向。太平洋沿岸各州的保守派根基虽有所松动，但总的基调还是保守的。19 世纪末开始，在那些保守势力强大的教会中，原教旨主义者大肆解雇对《圣经》持不同看法的牧师和大学教师，以此来惩罚自由派神学家和遏制新的理性思潮的传播。如伍德罗·威尔逊的伯父、哥伦比亚神学院教授詹姆斯·伍德罗就被南部长老会

① 赞拉帕姆斯：前引书，第 50 页。

全教会议解职，据说他认为进化论可以同《圣经》的解释相调和[1]。康马杰指出，“原教旨主义在20世纪继续存在并具有一定的势力，是美国思想史上的奇观之一”[2]。

这个时期，原教旨主义者对现代主义的最大一次进攻是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发动的反进化论运动（详见第八章中的“美国的社会运动”有关内容）。

---

① 黄兆群主编：前引书，第227页。

② 康马杰：前引书，第269页。

美国历史大事记

1898年1月至1929年12月

1898年

1月1日 经州立法机关批准，曼哈顿、布鲁克林、斯达腾及昆斯与韦斯切斯特两县的一些居民点将合并成新的大纽约市。

1月25日 以保护美侨为借口，战舰“缅因号”驶抵古巴哈瓦那港。

2月15日 “缅因号”战舰在哈瓦那爆炸沉没。

3月17日 美国海军第一艘实用的潜艇“荷兰”号建成下水。

3月19日 战舰“俄勒冈”号开始环绕南美大陆航行。

3月27日 驻西班牙公使伍德福德奉命对西班牙政府发出最后通牒。

4月25日 对西班牙宣战。

5月12日 路易斯安那州新宪法中制定“祖父条款”，剥夺了大多数黑人的公民权。

7月7日 威廉·麦金莱总统签署兼并夏威夷的法案。

8月9日－12日 西班牙同意投降，将菲律宾、波多黎各及关岛正式割让给美国。

9月15日 全国文学艺术会在纽约成立（1904年，该学会成立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

9月15日 美国黑人全国委员会在芝加哥成立。

10月6日 埃德蒙·罗斯坦德的剧本《西兰诺·德贝日拉克》在纽约市花园剧院上演。

12月10日 与西班牙签订《巴黎和约》，美西战争正式结束。

1899 年

2 月 1 日　正式建立对关岛的管辖权。

2 月 6 日　国会批准与西班牙签订结束美西战争的《巴黎和约》。

8 月 17 日　美国黑人全国委员会在芝加哥召开第一次年会。

9 月 6 日　国务卿海约翰提出对华国际贸易原则，即所谓“门户开放”政策。

10 月　劳联领导集团参加全国公民联合会。

1900 年

1 月 25 日　众议院投票表决剥夺当选议员、犹他州的布里格姆·H·罗伯茨在众议院的席位。

3 月 5 日　美国名人遗物收藏馆在纽约市纽约大学建立。

3 月 14 日　国会通过《金本位制法》。

3 月 20 日　国务卿海约翰宣布，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已为德、俄、英、意、日等国所接受。

4 月 7 日　国会通过《福勒克法》，建立波多黎各民政机关。

4 月 12 日　开始委派总督统治波多黎各。

4 月 30 日　夏威夷正式并入美国版图。

5 月 1 日　犹他州斯科菲尔德发生煤矿爆炸事件，200 多名工人丧生。

5 月 14 日　原夏威夷共和国总统桑福德·B·多尔被任命为夏威夷准州第一任州长。

6 月 30 日　新泽西州霍博肯的码头与几艘德国汽船起火，326 人丧生。

7 月 5 日　教育家、第一任教育专员亨利·巴纳德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去世。

9 月 8 日　飓风袭击得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郡，5000 多人丧生，城市遭到巨大破坏。

1 月 6 日　威廉·麦金莱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

1 月 15 日　安德鲁·卡内基在匹兹堡创建卡内基理工学院。

2月22日 美驻华公使协同其他列强驻华使节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联合通牒。

本年 美国大学协会成立。

费城交响乐团成立。

1901年

1月10日 得克萨斯州博蒙特南部斯平德托普的油井喷油，是该州石油的首次重大发现。

2月2日 陆军护士部队成立。

2月25日 美国钢铁公司成立。

3月2日 参议员普拉特提出《普拉特修正案》，规定美国结束占领古巴的各项条件。

4月29日 国会再次通过限制华工入美的法案。

5月27日 联邦最高法院就美西战争中产生的所谓“海岛案”作出裁决。

7月29日 美国社会党成立。

8月10日 美国钢铁公司工人举行大罢工。

9月6日 麦金莱总统在纽约州布法罗泛美博览会上发表演说时遇刺受伤。

9月14日 麦金莱总统因伤重去世，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继任，成为美国第26任总统。

11月18日 美、英签订有关开凿巴拿马运河权的《海约翰—庞斯福德条约》。

11月27日 陆军部长伊莱休·鲁特建立陆军军事学院。

12月3日 西奥多·罗斯福向国会发表第一份咨文，要求进行广泛的社会与经济改革，管理大企业财团。

1902年

2月18日 美国第一次对国内大金融家运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北方证券公司被限制州际贸易。

2月28日 国会通过“史普奈法案”，授权总统从法国手中购买开凿巴拿马

运河之权。

5月12日 美国无烟煤矿矿工14万人举行大罢工，直至1903年3月结束。

6月2日 俄勒冈州采取普遍创议权与公民投票的新措施。

6月17日 国会通过《开垦法》(也称《灌溉法案》)。

6月28日 国会通过《巴拿马运河法》。

7月1日 国会通过《菲律宾政府法》，由美国扶持建立菲律宾文官政府。

9月23日 地质学家约翰·韦斯利·鲍威尔在缅因州黑文逝世。

10月26日 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领导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在纽约市去世。

1903年

1月22日 国务卿海约翰与哥伦比亚代表埃尔兰订立《海约翰—埃尔兰条约》。

1月24日 美、加关于阿拉斯加边界的纠纷问题，提交由3名美国人、2名加拿大人与1名英国人组成的委员会处理。

2月23日 联邦最高法院在“钱皮恩对艾姆斯”的诉讼案中宣布，国会有权禁止越过州界邮寄彩票。确认联邦警察权力大于州警察。

5月23日 威斯康星州通过立法，在美国首次规定对州的候选人采用直接初选制度。

10月8日 迫使中国清政府订立《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

10月20日 英、美委员联合对付加拿大解决阿拉斯加特区与加拿大的边界争端。

11月2日 “纳什维尔号”军舰奉命驶抵巴拿马的科隆。

11月13日 强迫巴拿马签订《美巴条约》。

11月18日 国务卿海约翰与巴拿马代表比诺—瓦里亚订立条约。

12月17日 赖特兄弟发明制造的飞行器（飞机的雏形）试飞成功。

12月30日 芝加哥的易洛魁剧院失火，602人丧生。

本年 拍摄第一部连贯故事片《火车大劫案》。

1904年

1月3日 派遣海军陆战队抵达巴拿马，支持新组建的巴拿马政府军。

1月4日 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不得拒绝波多黎各人进入美国。

2月7日–8日 巴尔的摩市商业区发生火灾，约2600幢建筑物被毁。

2月26日 联邦参议院批准《海约翰—比诺—瓦里亚条约》。

2月29日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命一个由7人组成的巴拿马运河委员会，以监督巴拿马运河的修筑。

3月14日 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北方证券公司的成立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4月17日 国会通过新的排华法。

4月23日 购买法国人的巴拿马运河公司，并由美国人动工兴建巴拿马运河。

5月4日 获取巴拿马运河区，开始凿修运河工程。

7月1日–11月23日 圣路易举办第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7月4日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利用从旧金山到马尼拉的海底电缆，发出一份环球电报，12分钟后收到回电。

10月27日 纽约市地下铁道第一段开始启用。

11月8日 西奥多·罗斯福击败对手当选总统。

12月6日 罗斯福总统发表对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

1905年

2月4日 接管多米尼加全部海关。

2月7日 迫使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草签一项授权美国接管该国财政并清理其内外债务的议定书。

2月7日 获得管理圣多明各海关特权。

2月20日 联邦最高法院对“雅各布森诉马萨诸塞州”案裁决：州有权制定要求公民接种牛痘的法律。

2月23日 律师保罗·哈里斯在芝加哥创立“扶轮社”，又名“扶轮国际”。

3月31日 罗斯福总统任命一美国官员出任多米尼加共和国关税收税官，“协助”该国清理税收与财政。

3月27日 工人运动领袖德布斯等人在芝加哥组建世界产业工人联盟。

4月17日 联邦最高法院对“洛克纳诉纽约州”案裁决：州不得规定雇员劳动的最高时限。

6月5日 西奥多·罗斯福电令美驻俄公使向俄皇提议，调解日俄战争。

7月1日 国务卿海约翰在新罕布什尔州纽伯里逝世。

7月22日－10月 新奥尔良发生流行性黄热病。

10月31日 纽约警方勒令禁演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的作品《华伦夫人的职业》。

1906年

2月8日 著名短篇故事作家保罗·L·邓巴在俄亥俄州代顿去世。

3月12日 联邦最高法院就“黑尔诉亨克尔”案作出裁决。

3月13日 妇女选举权运动先驱苏珊·布劳内尔·安东尼在纽约州罗彻斯特去世。

4月18日 旧金山发生大地震并引起大火。

5月14日 政治家、改革家卡尔·舒尔茨去世。

6月4日 雷诺兹和尼尔关于肉罐头情况的报告发表。

6月8日 《美国古迹保护法》出台。

6月29日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签署法令，决定在巴拿马修建船闸型运河。

6月29日 国会通过《铁路运费管理法》(亦称《赫伯恩法》)。

6月30日 《纯净食品及药物管理法》和《肉类检验法》在国会通过。

9月24日 罗斯福总统规定怀俄明州的魔塔为第一个国家天然纪念物。

9月29日 陆军部长塔夫脱奉命帮助古巴成立临时政府。

10月3日 马古恩被任命为古巴总督。

11月9日 罗斯福视察巴拿马运河工地，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任职期间出国的总统。

12月10日 罗斯福总统因其为结束日俄战争所作的努力而获得诺贝尔和平

奖。

12月12日 犹太人奥斯卡·S·斯特劳斯被任命为商业与劳工部长。

1907年

2月8日 迫使多米尼加政府缔结关于美国监督多米尼加财政的条约。

3月14日 总统罗斯福与日本缔结“君子协定”，拒绝日本劳工入美。

3月21日 派遣海军陆战队在洪都拉斯登陆，干预该国内政。

4月1日 巴拿马运河委员会改组。

8月1日 陆军通信部队建立航空师，是为美国空军前身。

10月16日 陆军部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召开菲律宾群岛两院制议会第一次会议。

10月21日 纽约人信托公司发生挤兑，引起其他银行连锁反应，经济危机加剧。

11月16日 俄克拉何马州加入联邦，成为合众国第46个州。

12月16日 美国海军组成环航世界的“白色大舰队”，向全世界炫耀美国的海上实力。

本年 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协会成立。

1908年

2月3日 联邦最高法院就“洛伊诉劳勒”案作出裁决。

2月3日 “8人画展”在纽约麦克佩斯美术馆举行。

3月4日 大火烧毁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附近科林伍德的一所初级中学，175名学童丧生。

4月12日 马萨诸塞州切尔西城约1/3地区为大火所毁，约1万人无家可归。

5月28日 国会通过管理哥伦比亚特区童工的立法，以便使各州效法。

5月30日 国会通过《奥尔德里奇—弗里兰货币法》，规定成立国家货币委员会。

6月8日 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成立。

6月23日 美国与委内瑞拉断绝外交关系。

6月24日 第22和24届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去世。

8月14日 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市发生迫害黑人的暴行。

10月1日 福特汽车公司推广T型汽车。

11月3日 威廉·H·塔夫脱当选为美国第27任总统。

11月30日 国务卿伊莱休·鲁特与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在华盛顿签订《鲁特——高平协定》。

12月2日 联邦基督教协进会在费城成立。

12月24日 防止犯罪协会开创电影审查制度。

本年 联邦基督教协会成立。

1909年

2月21－22日 海军"白色大舰队"驶抵弗吉尼亚州汉普顿锚地，结束历时一年余的环球航行。

3月4日 国会通过《莱西法》。

3月8日 芝加哥女工举行大罢工和游行示威，后该日被定为"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3月30日 纽约市东河上的悬臂型昆斯博卢大桥通车。

4月1日 结束对古巴的临时管理。

4月6日 海军准将培里等人首先到达北极。

5月 关于黑人权利的全国性会议在纽约召开，全国黑人委员会成立。

7月12日 国会通过一项征收所得税的宪法修正案。

8月5日 塔夫脱签署有争议的《佩恩——奥尔德里奇关税法》。

10月26日 霍华德大学创始人兼校长奥利弗·奥蒂斯·霍华德在佛蒙特州伯林顿去世。

11月6日 国务卿诺克斯提出所谓的"诺克斯计划"。

11月13日 伊利诺伊州切里的圣保罗煤矿发生爆炸，250多人丧生。

12月16日 策动尼加拉瓜政变，并派海军陆战队入侵该国。

12月31日 纽约市东河上的吊桥曼哈顿大桥通车。

1910年

3月19日 赖特兄弟开办第一所飞行学校。

3月19日 众议院修改众议院规章，缩小议长权力。

3月26日 国会修改《移民法》，禁止乞丐、罪犯、病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入境。

4月1日 纽约举办“独立派艺术家画展”。

4月21日 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在康涅狄格州雷丁逝世。

5月16日 内政部设“矿务局”。

5月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成立。

6月5日 著名短篇小说作家欧·亨利去世。

6月18日 国会通过《曼——埃尔金斯铁路法》。

6月24日 国会通过立法，要求所有离开美国的客轮携带无线电设备。

6月25日 国会建立邮政储蓄银行制度。

6月25日 国会通过《竞选经费公开法》和《禁止贩卖妇女为娼法》(《曼法令》)。

9月7日 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宣布延长美国在纽芬兰渔场的捕鱼权。

10月17日 女权运动先驱朱莉亚·沃德·豪去世。

10月26日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代表、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去世。

11月8日 在中期选举中，民主党自1885年以来第一次获得对众议院的控制。

12月3日 基督教科学教会创始人玛丽·贝克·埃迪在马萨诸塞州牛顿去世。

1911年

1月15日 在旧金山航空大会上，陆军中尉克里西驾机投掷第一枚真炸弹获得成功。

1月16日 陆军中尉凯利驾机进行第一次空中摄影侦察飞行。

1月21日 以参议员拉福莱特为领袖的共和党进步派全国联盟成立。

1月26日 设计师柯蒂斯驾驶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架水上飞机试飞成功。

2月3日 汽车电气自动启动装置进行示范表演。

3月18日 罗斯福水坝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亲自主持下启用。

3月25日 大火席卷纽约市三角女式衬衫厂，约145人死亡。

4月11日 创办第一所陆军航空学校。

5月1日 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美国保留林属联邦政府管理，而不属于州管理。

5月8日 海军航空兵诞生。

5月15日 联邦最高法院在解释《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时首次使用"合理"这一准则。

5月22日 参加四国银团与清政府订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

5月29日 联邦最高法院宣布"烟草托拉斯"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7月24日 美、日续订通商条约，并约定继续履行1907年"君子协定"。

10月29日 普利策奖金的创始人约瑟夫·普利策在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去世。

12月18日 废除1832年与俄国签订的一项条约。

1912年

1月6日 新墨西哥作为第47州加入联邦。

1月7日 塔夫脱总统向国会建议采用制定年度国家预算。

1月12日 世界产业工人同盟领导马萨诸塞州劳伦斯纺织工人举行罢工，后遭到镇压。

1月22日 佛罗里达东海岸铁路公司在基韦斯特与大陆之间开辟了一条铁路线。

2月14日 亚利桑那作为第48州加入联邦。

2月25日 共和党在选举中发生分裂。

3月14日 司法部开始采取行动，制止南太平洋铁路公司与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合并。

5月13日 国会通过一项关于改革参议员选举方式的宪法修正案，并送交

各州批准。

5月15日　美国红十字会创始人克拉克·巴顿在马里兰州格伦埃科去世。

5月22日　建立海军陆战队航空兵。

5月30日　飞机发明者赖特兄弟之一威尔伯去世。

6月5日　海军陆战队在古巴登陆，干涉该国内政。

8月2日　参议院通过“洛奇推论”。

8月24日　国会通过《巴拿马运河法》。

8月24日　美国小件包裹投递业务获准由联邦邮局从1913年1月1日开始实行。

11月5日　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当选美国第28任总统。

12月3日　塔夫脱总统提出“以金元代替枪弹”的“金元外交”政策。

12月10日　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主席、前国务卿鲁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13年

2月17日　被称为“军械库展览”的欧洲现代艺术首次在美国纽约展出。

2月25日　第十六条宪法修正案经38个州批准后宣布生效。

2月25日－7月　威廉·海伍德亲自领导新泽西州帕森特丝织工人举行大罢工。

3月4－5日　国会将商业和劳工部分为两个内阁级的部，并成立联邦仲裁调解委员会。

3月12日－4月21日　约15万服装工人在纽约市开始大罢工。

3月21日－26日　俄亥俄河流域发生大水灾。

3月31日　大金融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在意大利罗马去世。

4月24日　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与21国签订的仲裁条约获得最后一国批准。

5月10日　国会规定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为“母亲节”。

5月31日　规定参议员直接选举的第十七条宪法修正案生效。

8月26日　得梅因河口的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基欧库克水坝启用。

8月28日　实业家安德鲁·卡内基赠送海牙城的礼物“和平宫”在荷兰海牙

落成。

10月3日 国会通过《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

12月23日 威尔逊总统颁布《联邦储备银行法》。

1914年

1月20日 海军航空学校建立。

2月13日 美国作曲家、作家、出版家协会在纽约市成立。

3月12日 发明家乔治·威斯汀豪斯去世。

4月1日 巴拿马运河区建立一永久性文官政府，以取代巴拿马运河委员会。

4月9日 美、墨发生“坦皮科事件”。

4月20日 科罗拉多州鲁德劳的洛克菲勒煤矿工人罢工。

4月21日 美国乘墨西哥政权不稳，借机炮击并侵占其维那库鲁斯港。

4月22日 国会授权威尔逊总统动用武力以维护美国在墨西哥的“荣誉”。

5月29日 “爱尔兰皇后”号在圣劳伦斯河与挪威运煤船相撞后沉没，1014人蒙难。

7月29日 科德角运河开放。

8月3日 巴拿马运河建成，并试航成功。

8月4日 欧洲爆发战争，威尔逊总统发布中立宣言。

8月15日 海军陆战队抵达海地太子港，以维护美国在该国的“利益”。

8月15日 巴拿马运河正式通航。

9月26日 威尔逊政府颁布《联邦贸易委员会法》。

10月15日 国会通过《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加强与扩大《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12月24日 探险家、博物学家约翰·米尔在洛杉矶去世。

12月26日 照会协约国，抗议破坏中立国贸易。

1915年

1月25日 贝尔在纽约与旧金山的沃森进行首次横贯大陆的电话通话。

1月25日 联邦最高法院就“科佩奇诉堪萨斯州”案作出裁决。

1月28日 美国海岸警卫队成立。

2月6日－20日 “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在旧金山开幕。

2月8日 影片《一个国家的诞生》在洛杉矶首次上映。

2月10日 威尔逊总统允许英国商船悬挂美国国旗。

5月1日 油轮“海湾之光”号事前未受警告，被德国潜艇击沉。

6月21日 威尔逊总统就“卢西塔尼亚”事件提出警告德国的第三份照会。

6月24日 游览船“伊斯特兰”号在芝加哥河停泊码头爆炸，800多人死亡。

7月3日 威尔逊政府派遣海军陆战队占领海地全境。

7月28日 派遣海军陆战队在海地太子港登陆。

8月10日 试验性的平民军事训练营活动在纽约州普拉茨堡举行。

8月15日 纽约《世界报》揭露德国在美国的间谍活动，美、德关系日趋恶化。

9月29日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董事长西奥多·N·维尔进行首次横贯大陆的无线电电话通话。

11月14日 著名黑人社会活动家布克·华盛顿去世。

12月4日 新“三K党”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附近建立。

12月27日—1916年1月13日 俄亥俄州的东扬斯郭城钢铁工人举行大罢工。

1914—1915年 科罗拉多煤矿工人大罢工。

1916年

1月24日 联邦最高法院就“布鲁沙伯诉联邦太平洋铁路公司”案作出裁决。

1月28日 威尔逊总统任命布兰代斯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

2月22日 威尔逊总统私人顾问豪斯会晤英外交大臣格雷，就议和与战争问题达成协议。

2月28日 “小说家泰斗”亨利·詹姆斯在伦敦去世。

2月29日 南卡罗莱纳州通过关于童工的立法。

4月18日 威尔逊总统对德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潜艇停止袭击商船。

5月5日 海军陆战队在多米尼加登陆，攻占圣多明各城杰罗尼莫堡。

6月3日 国会通过《国防法》。

6月22日 旧金山举行反战示威游行。

7月11日 威尔逊总统签署《联邦公路资助法》。

7月17日 国会通过《联邦农业贷款银行法》。

8月4日 美国以2500万美元购得丹麦所属的西印度群岛的维尔京群岛。

8月25日 内政部成立国家公园、建筑物和保留地管理局。

8月29日 国会通过《菲律宾群岛组织法》。

9月3日 政府颁布《亚当森法》，以避免预定的全国性罢工。

9月7日 美国海运委员会成立。

9月30日 中美订立铁路借款合同。

10月16日 第一家计划生育门诊所由玛格丽特·桑格在纽约州的布鲁克林开设。

11月7日 威尔逊当选总统。

11月22日 杰克·伦敦在加利福尼亚州格伦埃伦自杀身亡。

11月29日 宣布对多米尼加共和国实行军事占领（占领于1922年10月21日结束）。

12月8日 美、加签约，使《莱西法》、《候鸟法》的条款国际化。

1917年

1月29日 国会通过一项关于对移民进行文化测验的法案。

1月31日 德驻美大使伯恩斯照会国务卿蓝辛，德恢复“无限制潜艇战”。

2月3日 “豪桑图尼克”号被德潜艇击沉，美、德断绝外交关系。

2月5日 国会通过一项排斥所有亚洲移民的法律。

2月23日 国会通过《史密斯—休斯法》。

3月1日 国务院批准公布所谓“齐默尔曼电报”。

3月2日 国会通过《波多黎各组织法》（《琼斯法》），该岛成为美国领地。

3月12日 威尔逊总统下令武装美国商船。

3月12日 宣布凡在交战地带航行的商船将予以武装。

3月31日 从丹麦手中正式接管维尔京群岛。

4月2日 蒙大拿州共和党人珍妮特·兰金成为第一个取得众议院议员资格的妇女。

4月6日 正式对德宣战，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4月24日 国会通过《自由公债法》。

5月18日 国会通过《选征兵役法》。

6月15日 国会通过《惩治间谍法》。

7月24日 国会投票通过拨款6.4亿美元以发展军用飞机制造业。

8月10日 国会通过《利弗粮食与燃料管制法》。

10月3日 国会通过《战时岁入法》。

10月6日 国会通过《对敌贸易法》，决定管制对外贸易。

11月2日 与日本签订《蓝辛—石井协定》。

11月11日 纽约州修改宪法，给予妇女以选举权。

12月7日 对奥匈帝国宣战。

12月18日 联邦政府建立铁路管理局，将铁路系统置于政府管制之下。

12月18日 国会通过关于禁酒宪法修正案。

本年 国会颁布“史密斯—休斯法”。

1918年

1月8日 威尔逊总统就战争与和平问题对国会发表演说，提出“十四点计划”。

1月10日 众议院提出一项给予妇女选举权的宪法修正案。

[illegible]

4月20日 国会通过《惩治怠工法》。

5月15日 纽约市至首都华盛顿的美国首次航空邮政业务开办。

5月16日 国会通过《惩治煽动叛乱法》。

5月28日 铁路捷运公司成立。

6月3日 联邦最高法院就“哈默诉达金哈特”案作出裁决。

6月8日 战时劳工政策委员会成立。

9月12－16日 参加对德“圣米耶尔之战”。

9月26－11月11日 参加对德“马斯—阿尔贡之战”。

8月16日 美军在苏俄海参崴登陆。

9月14日 尤金·德布斯被指控违反《惩治间谍法》和《惩治煽动叛乱法》，判处10年徒刑。

10月13－15日 森林大火席卷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约1000人死亡。

10月16日 国会通过一项战时措施，禁止主张以武力推翻政府的外国人进入美国。

11月2日 纽约市布鲁克林高速运输系统地下铁道5节车厢出轨。

12月4日 威尔逊总统率团参加巴黎和会。

1918－1919年 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最后通过义务教育法。

本年 全国教育协会制定“七项基本原则”。

1919年

1月6日 西奥多·罗斯福在纽约去世。

1月29日 宣布批准第十八条修正案。

4月4日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协会成立。

7月4日 得克萨斯州发生迫害黑人事件。

7月10日 威尔逊总统将《凡尔赛条约》递交联邦参议院批准。

8月11日 钢铁工业先驱、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在马萨诸塞州伦诺克斯去世。

8月31日 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成立。

9月1日 美国共产党成立（1921年5月与共产主义劳工党统一为美国共

产党）。

9月9日 波士顿1100多名警察中约3/4人举行罢工。

9月11日 海军陆战队在洪都拉斯登陆。

9月22日 36万多钢铁工人和20万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持续近4个月。

10月16日 警察捣毁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处，逮捕美共领导人。

10月28日 国会通过《全国禁酒法》或称《沃尔斯特德法》。

11月1－11日 50万煤矿工人举行大罢工。

11月19日 参议院否决《凡尔赛和约》。

12月22日 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组织一系列搜捕。

本年 黑人音乐协会成立。

与英、法、日等组成14国武装干涉军队，侵犯苏俄。

1920年

1月2日 司法部长帕尔默利用战时颁布的《惩治间谍法》在70个城市同时进行大逮捕。

1月16日 关于禁酒的宪法修正案开始生效。

2月13日 国务卿罗伯特·蓝辛被总统撤职。

2月28日 国会通过《埃斯克—卡明斯法》（《运输法》），将铁路归还私人管理。

6月5日 颁布《商船法》。

6月10日 国会通过《水力法》。

8月13日 黑人运动领袖马库斯·加维主持召开普世黑人协进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世界黑人权利宣言》。

8月26日 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获得批准。

9月1日 与暹罗（泰国）缔约，使其获得关税自主。

9月8日 纽约与旧金山之间开始航空邮递业务。

10月17日 美共创始人之一约翰·里德去世。

11月2日 共和党人沃伦·哈定击败民主党人詹姆斯·柯克斯当选美国第29任总统。

12月10日 威尔逊总统获得1919年诺贝尔和平奖。

1921年

1月3日 联邦最高法院宣布《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条款适用于工会。

4月20日 参议院批准哥伦比亚条约（《汤姆森—乌鲁蒂亚条约》）。

5月4日 派伍德—福布斯使团前往菲律宾调查。

5月19日 国会通过《移民紧急限额法》。

5月27日 政府实施紧急关税法。

5月31日 照会日本，反对其占领西伯利亚和库页岛。

6月3日 阿肯色河泛滥，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约200人丧生。

6月10日 国会通过《国家预算和会计法》。

7月2日 国会宣布结束与德国及奥匈帝国的战争状态。

8月9日 退伍军人局成为一独立机构。

8月13日 波士顿工人组织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展开募捐救济苏维埃俄国灾民的运动的协议。

8月15日 国会通过《肉类批发商和牲畜围场法》。

8月24日 与奥地利缔结和约。

8月24日 与德国签订和约。

9月12日 伍德—福布斯使团反对向菲律宾兑现"给予独立"的诺言。

9月19日 英美6大教会合办的北京协和医学校改由洛克菲勒投资兴办。

9月30日 劳工部报道失业人数已达500万人，并透露许多工业已大幅度削减工资。

11月2日 美国节育联盟成立。

11月12日－1922年2月6日 华盛顿会议召开。

12月25日 哈定总统赦免正在服刑的尤金·德布斯。

1922年

2月11日 日美雅浦岛条约签字。

2月18日 国会通过《卡珀—沃尔斯特德合作社法》。

3月24日 参议院批准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议定的四国《太平洋条约》。

4月1日-9月4日 全国煤矿工人大罢工。

5月30日 华盛顿林肯纪念堂举行落成仪式。

7月1日-9月13日 40万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

8月2日 电话发明家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在新斯科舍的巴达克去世。

9月19日 国会通过《福特尼—麦坎伯关税法》。

9月22日 国会通过《凯布尔法》。

10月21日 结束对多米尼加的统治。

本年 《读者文摘》由D·华莱士及其夫人在纽约创刊。

1923年

3月4日 国会通过《农业信贷法》。

4月10日 石油生产居各州之首的俄克拉何马州的立法机关通过一项按比例分配的法律。

8月2日 哈定总统突然死亡，副总统卡尔文·柯立芝于3日继任。

8月31日 与墨西哥恢复外交关系。

9月15日 三K党恐怖活动猖獗，俄克拉何马州州长沃尔顿在州内实行戒严。

10月26日 电气工程师、发明家查尔斯·P·威金在英国哈罗去世。

12月6日 柯立芝总统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支持国际法庭，但反对美国参加国联。

本年 美国作曲家联盟在纽约成立。

《时代》周刊由H·R·卢斯和B·哈登在纽约创刊。

1924年

1月24日 道威斯任德国赔款专家委员会主席，主持制定德国赔款计划。

2月3日 威尔逊总统在华盛顿逝世。

2月12日 由保罗·怀特曼指挥的管弦乐队在纽约首演“蓝色狂想曲”。

2月27日 与多米尼加共和国签署一项取代1907年条约的新条约。

3月31日 联邦最高法院就“俄勒冈州诉讼案”作出裁决。

5月19日 国会通过《退役费法案》。

5月26日 国会通过一项《移民法案》。

6月2日 国会两院重提被宣布违宪的限制童工劳动时间及其他劳动条件的全国性法令。

6月15日 国会颁布法令：所有在美出生的土著印第安人均为美国公民。

7月1日 国会通过《罗杰斯法》。

8月24日 国会批准《农业信贷法》。

9月18日 美军撤离多米尼加。

11月4日 卡尔文·柯立芝击败对手约翰·戴维斯（民主党）和罗伯特·拉福莱特（进步党）当选为美国第30任总统。

12月13日 劳联领袖塞缪尔·龚伯斯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去世。

本年 《进步教育》创刊。

1925年

1月5日 内利·T·罗斯夫人就任怀俄明州州长，成为美国第一位女州长。

1月21日 著名作家乔治·华盛顿·凯布尔在佛罗里达州圣彼得斯堡去世。

3月13日 与古巴签署一项条约，承认古巴长期以来对松树岛所有权的要求。

3月13日 田纳西州州长签署“教授进化论为非法”的一项州法。

3月18日 龙卷风席卷密苏里州、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几十个城镇，约800人丧生。

4月18日 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在芝加哥开幕。

6月6日 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成立。

6月18日 进步主义运动领袖罗伯特·M·拉福莱特在首都华盛顿去世。

7月10－21日 约翰·斯科普斯教授因在学校讲授进化论而在田纳西州被捕受审，被判有罪并处以100美元罚款。

7月26日 威廉·J·布赖恩在田纳西州代顿去世。

8月8日 三K党在首都华盛顿召开第一届全国大会。

11 月 14 日　同意大利签订还债协定。

12 月 12 日　第一家汽车旅店在加利福尼亚开办。

12 月 29 日　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的三一学院改名为“杜克大学”。

本年　颁布“帕内尔法”。

贝尔电话实验室在纽约创建。

1926 年

1 月 27 日　参议院批准美国加入海牙国际常设法庭。

2 月 28 日　柯立芝总统签署一项岁入法。

3 月 7 日　伦敦和纽约之间进行第一次横跨大西洋的无线电电话通话。

4 月 11 日　著名实用园艺家卢瑟·伯班克于加利福尼亚州去世。

6 月 1 日　万国博览会在费城开幕。

7 月 2 日　国会将 1920 年成立的陆军航空兵司令部改为陆军航空队。

8 月 5 日　纽约市沃纳剧院上映世界上第一部配乐有声电影《唐璜》。

9 月 9 日　国家广播公司在纽约成立。

9 月 18 日　飓风席卷佛罗里达州和其他南部州。

10 月 25 日　联邦最高法院裁决 1867 年颁布的《官员任期法》违宪。

11 月 11 日　美国促成尼加拉瓜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在科林托城会谈。

11 月 15 日　全国广播公司在纽约成立。

1927 年

1 月 2 日　胡佛委员会宣布，一条连接圣劳伦斯河的水道可能是沟通北美五大湖与大西洋的最佳路线。

1 月 7 日　纽约与伦敦之间的第一个商业电话业务开始。

2 月 17 日　同土耳其复交。

2 月 23 日　国会通过经两院协商的《无线电台管理法案》，并送交柯立芝总统签字。

2 月 24 日　美英联合舰队闯到南京水域，并炮轰下关一带，制造了“南京事件”。

3月2日　美共创始人、原社会党左翼领袖鲁腾堡去世。

3月3日　根据《禁酒法改革条例》成立隶属财政部的禁酒局。

3月7日　联邦最高法院就“尼克松诉赫恩登”案作出裁决。

4月5日　罕见的暴雨在密西西比河下游河谷造成历史上最严重的水灾。

4月7日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开设了美国第一个长距离电视广播。

7月29日　第一架电动呼吸器（铁肺）在纽约市贝尔维尤医院投入使用。

9月14日　现代舞创始人、女舞蹈家邓肯在法国尼斯因车祸去世。

10月6日　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歌手》放映。

11月13日　第一条通车辆的水下隧道通车。

1928年

1月16日－2月20日　投票反对第六次泛美国家会议通过一项关于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决议。

2月2日　马萨诸塞州福尔河城发生大火灾。

2月6日　在华盛顿与法国签署一项仲裁条约。

2月10日　参议院表决通过一项“总统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决议案。

2月10日　美、德之间开始无线电话业务。

2月10日　纽约市律师协会宣布反对国家《禁酒法》及《沃尔斯特德法》。

2月21日　石油百万富翁哈利·F·辛克莱在首都华盛顿被判定犯有藐视法庭罪，并被判处六个月徒刑。

3月10日　柯立芝总统签署《外侨财产法》。

3月13日　洛杉矶北面四十英里处的一座水坝崩溃，圣克拉河谷大水泛滥，450人丧生。

5月3日　国会再次通过《麦克纳里—豪根法案》。

5月15日　国会拨款3.25亿美元控制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洪水。

5月22日　国会通过《商船法》。

6月19－20日　分别与奥地利和丹麦签订合作条约。

7月30日　第一批彩色电影在纽约州罗彻斯特献映。

8月27日　与14国签订了凯洛格—白里安条约，即巴黎非战条约。

11月6日 赫伯特·胡佛击败对手当选为第31任总统。

11月16日 纽约股票交易所成交额达6641250股，创造日成交额空前纪录。

11月21日 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约瑟夫·麦克纳于首都华盛顿去世。

12月18日 华特·迪斯尼公司卡通影片《蒸汽船威利》在纽约首映。

1929年

1月2日 和加拿大就尼亚加拉河工程签署协定。

1月12日 美国最长的隧道正式通车。

1月15日 参议院表决批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

1月27日 参议院批准一项由美、日签订的旨在控制两国之间非法酒类贸易的条约。

2月4日 福特汽车公司宣布已生产出第一批一百万台供A型汽车使用的发动机。

2月11日 银行家杨格对"道威斯计划"进行调整，从而制订"杨格计划"。

2月11日 托马斯·A·爱迪生在佛罗里达州举行庆祝其82岁寿辰的集会。

2月13日 柯立芝总统签署一项在今后3年内建造15艘万吨级巡洋舰的法案。

3月8日 美国向墨西哥政府提供军用物资，以帮助镇压在墨西哥几个州爆发的骚乱。

3月12日 可口可乐饮料创始人亚沙·坎得乐去世。

4月16日 国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有关农业救济和关税改革的建议。

5月16日 电影艺术科学院在好莱坞首次将学院奖颁给国内外最有艺术成就的电影，开"奥斯卡"奖之先河。

5月27日 联邦最高法院宣布总统使用搁置否决权是合法的。

6月15日 胡佛总统签署《农产品销售法案》。

6月27日 纽约贝尔电话研究所公开试播彩色电视。

7月22日－8月1日 美国发生了一系列监狱暴动。

10月24日 纽约股票行情暴跌，美国交易所破产，最严重的萧条从此开始。史称“黑色星期五”。

11月11日 横跨底特律河连接美国和加拿大的安巴萨多大桥落成。

12月16日 胡佛总统签署一项降低所得税的法案。

12月24日 首都华盛顿行政办公大楼被火烧毁，所幸大部分珍贵文件被抢救出来。

本年 乔治·里德法颁布。

主要中外文参考书目

I. 外文部分：

Aaron, *Daniel*: *Men of Good Hope*: *A Story of American Progressiv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阿龙，丹尼尔：《具有良好愿望的人们：美国进步派的故事》，牛津大学出版社，1951 年。）

Abrams, *Richard*: *The Burdens of Progress*, *1900—1929*, Glenview I11., Scott, Fresman and Company, 1978.（阿布拉姆斯，理查德：《进步的负担：1900—1929》，伊利诺伊州格伦维尤：斯科特和福雷斯曼公司，1978 年。）

Adams, *James*: *The Epic of America*, Blue Ribbon Books, New York, 1931.（亚当斯，詹姆斯·T：《美国史诗》，纽约：蓝带图书出版公司，1931 年。）

Addams, *Jane*: *Twenty Years at Hull Hous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0.（亚当斯，简：《在赫尔事务所的 20 年》，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10 年。）

Allen, *Frederick Lewis*: *Only Yesterday*: *An Informal History of the 1920's*, Harper & Row, New York, 1964.（阿伦，弗雷德里克·刘易斯：《就在昨天：1920 年代的非官方历史》，纽约：哈珀和罗出版公司，1964 年。）

Allen, *Frederick Lewis*: *The Big Change*, Harper & Brothers, New York, 1952.（艾伦，弗雷德里克·刘易斯：《巨变》，纽约：哈珀兄弟出版公司，1952 年。）

Alstrom, *Sydney E.*: *A Religions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阿尔斯特伦，悉尼·E：《美国人民宗教史》，耶鲁大学出版社，1972。）

Altschuler, Glenn C.: Race, Ethnicity and Class in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1865 – 1919, Harlan Davidson, Inc. Illinois, 1982.（奥尔茨库勒，格伦·C:《美国社会思想中的种族、族裔和阶级：1865—1919》，伊利诺伊：哈兰·戴维森出版公司，1982 年。）

Bailey, Thomas A.: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York, Appleton – Century – Crofts, 1969.（贝利，托马斯·A:《美国人民的外交史》，纽约：艾普兰顿·塞特里·克劳夫兹，1969 年。）

Bailyn, Bernard et.: The Great Republic: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Lexington Mass., D.C.Health & Company, 1981.（贝林，伯纳德等：《伟大的共和国：美国人民史》，马萨诸塞州列克星顿：D·C·希尔斯公司，1981 年。）

Barck Oscar T. And Blake, Nelson M.: Since 1900: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Our Time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5.（巴克，奥斯卡·T 和布莱克，纳尔逊·M:《1900 年以来：我们时代的美国史》，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65 年。）

Bates, J.L.: The United States, 1898—1928, Progressivism and Society in Transition, New York, McGraw – Hill, 1976.（贝兹，J·L:《1898—1928 年间的美国：进步主义和转型中的社会》，纽约：麦克格罗 – 希尔出版公司，1976 年。）

Beacroft, B.W. etc.: The Making of America, Second Edition UK: Longman 1982.（比克罗夫特：《美国的形成》，第 2 版，英国朗文，1982 年。）

Beale, Howard K.: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to World Power, Collier – Macmillan House Inc. New York, 1967.（比尔，霍华德：《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世界强权的兴起》，纽约：科利尔 – 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67 年。）

Beard, Charles and Mary: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Vol.2,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7.（比尔德，查尔斯和比尔德，玛丽：《美国文明的兴起》第 2 卷，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37 年。）

Bellot, H. Hale: America and American Historians: A Review of Recent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rprat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Progressive Era*), University of London, 1952.（贝洛特，希尔：《美国和美国历史学家》（进步主义时代），伦敦大学出版社，1952年。）

Bernstein, *Irving*: *The Lean Years*: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orker*, *1920—1933*,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0.（伯恩斯坦，欧文：《贫乏的年代：1920—1933年的美国工人史》，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60年。）

Bishop, *Joseph*: *Theodore Roosevelt and His Time Shown in His Own Letter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s Sons, 1920.（毕肖普，约瑟夫：《展现在其信件中的西奥多·罗斯福及其时代》，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之子公司，1920年。）

Blum, *John et* .: *The National Experience*: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cour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68.（布鲁姆，约翰等：《国家的经历：美国史》，纽约：哈考特和福雷斯曼公司，1968年。）

Braeman, *John*: *Wilson*,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2.（布莱曼，约翰：《威尔逊》，新泽西：普兰蒂斯－霍尔出版公司，1972年。）

Bryce, *James*: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7.（布赖斯，詹姆斯：《美利坚共和国》，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17年。）

Buell, *Raymond Leslie*: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Atheneum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1970.（布尔，雷蒙德·莱斯立：《华盛顿会议》，纽约：文学协会出版公司，`1970年。）

Burns, *James MacGregor*: *Roosevelt*: *The Lion and the Fox*, Norwalk, Connecticut: Easton Press, 1989.（伯恩斯，詹姆斯·麦克格雷格：《罗斯福：狮子和狐狸》，康涅狄格州诺沃克：伊斯顿出版社，1989年。）

Calhom, *Charles W.*: *The Gilded Age*,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96.（卡尔洪，查尔斯·W：《镀金时代》，特拉华：学术资料出版公司，1996年。）

Cary, *John H. And Weinberg*, *Julius*: *The Social Fabric*: *America Life From the Civil War to the Present*, Little, Brown & Company, Boston, 1978.（卡里，约

翰·H和温伯格，尤里乌斯：《社会经纬：自内战至今的美国生活》，波士顿：利特尔和布朗公司，1978年。）

Cashman, S. D.: America in the age of Titan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8.（凯什曼，S·D：《"巨头"时代的美国》，纽约大学出版社，1988年。）

Cebula, James E.: James M. Cox: Journalist and Politician, New York: Garland, 1985.（塞布拉，詹姆斯·E：《詹姆斯·M·考克斯：新闻工作者和政客》，纽约：加兰，1985年。）

Chamberlain, John: Farewell to Reform: The Rise, Life and Decay of the Progressive Mind in America,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5.（张伯伦，约翰：《告别改革：美国进步主义思想的兴起与消长》，芝加哥：四方图书公司，1965年。）

Chasan, Will: Samuel Gompers: Leader of American Labor,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1.（蔡森，威尔：《塞缪尔·龚伯斯：美国劳工领袖》，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71年。）

Cochran, Thomas C. and Miller, Wilson: The Age of Enterpris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2.（科克伦，托马斯·C和米勒，威尔逊：《企业时代》，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42年。）

Coffman, Edward M.: The War to End All Wars, Oxford University, 1968.（科夫曼，爱德华·M：《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年。）

Commager, Henry: 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Jersey, Prentice – Hall Inc., 1988.（康马杰，亨利：《美国历史文献》，新泽西：普兰蒂斯－霍尔出版公司，1988年。）

Cook, Luella B. et.: America Through Litera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8.（库克，柳娜等：《透过文献看美国》，纽约：哈考特和布雷斯公司，1948年。）

Coolidge, Calvin: The Autobiography of Calvin Coolidge, Rutland, Vermott: Academy Books, 1984.（柯立芝，卡尔文：《卡尔文·柯立芝自传》，佛蒙特州罗特兰：学院书店，1984年。）

Cornbise, Alfred E.: War As Advertised: The Four Minute Men and America's

Crusade, 1917—1918,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84.（康伯斯，阿尔弗雷德·E:《众人注目中的战争：四个小人物和美国的改革运动，1917－1918》，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美国哲学学会，1984 年。）

Cox, James M.: Journey Through My Year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46.（考克斯，詹姆斯·M:《岁月回想》，纽约：西门和舒斯特出版公司，1946 年。）

Cronon, E.D.: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Selected Readings, Homewood, Ill., Dorsey Press, 1965－1966.（克劳农，E·D:《20 世纪美国选本》，伊利诺伊州荷姆伍德：约翰·多尔希出版公司，1965－1966 年。）

Crunden, Robert Morse: A Brief History of American Culture, Helsinki, SHS, 1990.（克伦登，罗伯特·M:《美国文化简史》，赫尔辛基：SHS 公司，1990 年。）

Cuff, Robert D.: War Industries Board: 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 During World War I,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1973.（卡夫，罗伯特·D:《战时工业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商业界与政府的关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3 年。）

Cunliffe, Marcus: The Literature of United States, Hong Kong: World Today Press, 1975.（坎利夫，马库斯：《美国文学》，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5 年。）

Davis, Kenneth S.: FDR: The Beckoning of Destiny, 1882—1928: A History, New York: Putnam, 1971.（戴维斯，肯尼思·S:《富兰克林·D·罗斯福：命运的召唤，1882－1928：历史》，纽约：帕特南公司，1971 年。）

De Witt, Benjamin Parke: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A Non－partison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f Current Tendencies in American Politic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德威特，本杰明：《进步主义运动》，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8 年。）

Degler, Carl N.: Out of Past: the forces that Shaped Modern America, Harper & Row, New York, 1959.（德格勒，卡尔·N:《今从史出：形成当代美国的

力量》，纽约：哈珀和罗出版公司，1959 年。）

Degler, *Carl N.*: *The Age of the Economic Revolution 1876—1900*, Scott, Foresman, Illinois, 1977.（德格勒，卡尔·N：《经济革命的时代：1876—1900》，伊利诺伊：斯科特和福雷斯曼出版公司，1977 年。）

Dementyev Igor: *USA*: *Imperialists and Anti - Imperialists*, Progress Publishers, Moscow, 1979.（德门特也夫，I：《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英译本，莫斯科：进步出版公司，1979 年。）

Diamond, *William*: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Woodrow Wils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43.（戴尔蒙特，威廉：《伍德罗·威尔逊的经济思想》，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出版社，1943 年。）

Divine, *Robert*, *et.*: *America*, *Past and Present*, Glenview Ill.,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86.（戴维尼，罗伯特等：《美国今昔》，伊利诺伊州格伦维尤：斯科特和福雷斯曼出版公司，1986 年。）

Dollar, *Charles M. ed.*: *America*: *Changing Times*, New York, Wiley, 1979.（多纳，查尔斯·M 编：《美国：变动的时代》，纽约：威利，1979 年。）

Du Bios: *The Education of Black People*,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73.（杜波伊斯：《黑人的教育》，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1973 年。）

Dubofsky, *Melvyn*: *Industrialism and the American Worker*, 1865—1920, Harlan Davidson, Inc. Illinois, 1975.（杜波斯基，梅尔文：《工业主义和美国工人：1865—1920》，伊利诺伊：哈兰·戴维森出版公司，1975 年。）

Dulles, *Foster Rhea*: *America' s Rise to World Power*, *1898—1954*, Harper & Brother Publishers, New York, 1954.（杜勒斯，福斯特：《走向世界霸权的美国：1989—1954 年》，纽约：哈珀兄弟出版公司，1954 年。）

Eisenstedt, *Abraham S.*: *American History* (*Since* 1865), Vol.2, T.Y. Crowell Company, New York, 1970.（艾森斯坦德，阿伯拉罕·S：《1865 年以来的美国历史》第 2 卷，纽约：克劳维尔出版公司，1970 年。）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The Annals of America* (*Vol.*12), *1895—1904*, *Populism*, *Imperialism*, *and Reform* Chicago, 1968.（不列颠大百科出版公司：《美国年鉴（第 12 卷）1895 - 1904，平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改革》，

芝加哥，1968年。）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The Annals of America* Vol.14，1968.（不列颠大百科出版公司：《美国年鉴》第14卷，1968年。）

Ekirch, Arthur A., Jr.: *Progressivism in America: A Study of the Era from Theodore Roosevelt to Woodrow Wilson*, New York, Viewpoints, 1974.（埃科克，小阿瑟：《美国的进步主义：西奥多·罗斯福至伍德罗·威尔逊时代研究》，纽约：观点出版社，1974年。）

Faulkner, Harold: *Politics, Reform and Expansion, 1890—1900*, Harper & Row, New York, 1963.（福克纳，哈罗德：《政治、改革与扩张：1890—1900》，纽约：哈珀和罗出版公司，1959年。）

Faulkner, Harold: *The Decline of Laissez Faire, 1897—1917*, Harper & Row, New York, 1951.（福克纳，哈罗德：《自由放任主义的衰落：1897—1917》，纽约：哈珀和罗出版公司，1951年。）

Faulkner, Harold: *The Quest For Social Justice, 1898—1914*, New York, Collier-Macmillan House Inc.1972.（福克纳，哈罗德：《追求社会公正：1898—1914》，纽约：科利尔-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72年。）

Ferrell, Roberth: *American Diplomacy, the Twentieth Century*, W.W.Norton & Company 1988.（范雷尔，罗伯茨：《美国20世纪的外交》，W.W.诺顿公司，1988年。）

Filler, Louis: *Crusaders for American Liberalism*, Yellow Springs, Ohio, Antioch Press, 1961.（菲勒，路易斯：《美国自由主义的斗士》，俄亥俄州：安提俄克出版社，1961年。）

Filler, Louis: *Progressivism and Muckraking*, New York, R.R.Bowker Co., 1976.（菲勒，路易斯：《进步主义和黑幕揭发》，纽约：R·R·鲍克公司，1976年。）

Fine, Sidney: *Laissez Faire and the General Welfare State, A Study of Conflict in American Thought, 1865—1901*,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6.（费，悉尼：《自由放任与普遍福利国家》，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56年。）

Fine, Sidney and Brown, Gerald S.: *The American Past* Vol.2,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5.（芬尼，悉尼和布朗，杰拉尔德：《美国历史》第2卷，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65年。）

Frazier, Thomas R. ed.: The Private Side of American History, Vol.2,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New York, 1987.（弗雷泽，托马斯·R：《美国历史的民间部分》第2卷，纽约：HBJ出版公司，1987年。）

Galbraith J.: The Great Crash: 1929,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8.（加尔布雷斯，J：《大崩溃：1929》，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88年。）

Garraty, John G. and Divine, Robert A.: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Opinions, Little, Brown & Company, Boston, 1968.（格拉蒂，约翰·A、戴维尼，罗伯特·A：《20世纪美国：当代文件和观点》，波士顿：利特尔和布朗出版公司，1968年。）

Garraty, John: The American Nation since 1865, New York, 1966. （格拉蒂，约翰：《1865年以来的美利坚民族》，纽约：1966年。）

Gelb, Joyce and Palley, Marian: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merican Party Politics, Thomas Y. Crowell company New York, 1975.（吉尔伯，乔伊斯和帕利，玛里安娜·L：《美国政党政治的传统和变化》，纽约：托马斯·Y·克劳维尔出版公司，1975年。）

Gorege, Henry: Progress and Poverty, New York, Henry George School of Science, 1940.（乔治，亨利：《进步与贫困》，纽约：亨利·乔治科学院，1940年。）

Gerard, James W.: My Four Years in Germany,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 1917.（杰拉尔德，詹姆斯·W：《我在德国的四年》，纽约：乔治·多兰出版公司，1917年。）

Ginger, Ray: Age of Excess, the U.S. from 1877 to 1914,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5.（金吉尔，雷：《过剩的年代：1877年至1914年间的美国》，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65年。）

Goldman, Eric F.: Rendezvous with Destiny: A History of Modern America Reform, New York, Knopf, 1952.（戈德曼，埃里克：《同命运的汇合：现代美国

改革史》，纽约：诺夫出版公司，1952年。）

Gompers, Samuel: Seventy Years of Life and Labor, Ithaca, New York: ILR Press, New York State School of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Cornell University, 1984.（龚伯斯，塞缪尔：《生活和工作的70年》，艾沙卡，纽约：ILR出版公司，纽约州工业和劳工关系学校，康奈尔大学，1984年。）

Goodwyn, Lawrence: The Populist Mo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古德温，劳伦斯：《平民党时期》，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

Grab, Gerald N. et. ed.: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II,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67.（格拉布等编：《美国历史的解释》第2卷，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67年。）

Graham, Dewey: Theodore Roosevelt: Great Lives Observe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1.（格拉海姆，杜威：《西奥多·罗斯福》，普兰蒂斯-霍尔出版公司，1971年。）

Graham, Otis L., Jr.: The Great Campaigns: Reform and War in America, 1900—1928, New York, R.E. Krieger Pub. Co., 1980.（格拉海姆，小奥蒂斯：《伟大的运动：美国的改革和战争，1900—1928》，纽约：R·E·克里格尔出版公司，1980年。）

Green, William: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860,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68.（格林，威廉：《1860年以来的美国经济发展》，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68年。）

Gregory, Ross: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71.（格雷戈里，罗斯：《美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纽约，W.W.诺顿公司，1971年。）

Grubbs, Frank L.: Samuel Gompers and the Great War: Protecting Labor' s Standards, Wake Forest, North Carolina: Meridional Publications, 1982.（格拉布斯，福兰克·L：《塞缪尔·龚伯斯和伟大的战争：保护劳工标准》，北卡罗来纳韦克·福雷斯特：玛丽蒂奥诺尔出版社，1982年。）

Haines, Gerald K. and Walker, J. Samuel Edited: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A Historiographical Review, Greenwood Press, Connecticut, 1981.（哈纳斯，G·K

和沃克，J.S. 编：《美国外交关系》，康涅狄格：格林伍德出版社，1981年。）

Handlin, *Oscar*: *The Americans*: *A New History of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Little, Brown & Company, Boston, 1963.（汉德林，奥斯卡：《美国人：新美国人民史》，波士顿：利特尔和布朗出版公司，1963年。）

Haynes, *John Earl*: *Calvin Coolidge and the Coolidge Era*, Library of Congress 1998, Washington D.C.（海因斯，约翰·依尔：《柯立芝和柯立芝时代》，华盛顿D.C.：国会图书馆，1998年。）

Hays, *Samuel P.*: *Conservation and the Gospel of Efficien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海斯，塞缪尔：《资源保护与效率的福音》，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

Hays, *Samuel P.*: *The Response to Industrialism*, *1885—1914*,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57.（海斯，塞缪尔·P：《对工业主义的反应：1885—1914》，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7年。）

Hendrick, *Burton J.*, *editor*: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Walter H. Page*,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25－1926.（亨德里克，伯顿编：《沃尔特·海因斯·佩奇生平与书信》。纽约：道布尔戴和佩奇出版公司，1925－1926年。）

Hofstadter, *Richard*: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Boston, Beacon Press, 1959.（霍夫施塔特，理查德：《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波士顿：比肯出版社，1959年。）

Hofstadter, *Richard*: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D.R.* New York, Knopf, 1955.（霍夫施塔特，理查德：《改革时代：从布赖恩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纽约：诺夫出版公司，1955年。）

Hofstadter, *Richar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73.（霍夫施塔特，理查德：《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纽约：兰登出版社，1973年。）

Hofstadter, *Richard ed.*: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1900—1915*,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63.（霍夫施塔特，理查德编：《进步主义运动，

1900—1915》，新泽西：普兰蒂斯－霍尔出版公司，1963 年。）

Huberman，*Leo*：*We*，*the People*，New York，Harper，1947.（休伯曼，列奥：《我们美国人民》，纽约：哈珀出版公司，1947 年。）

Hunter，*Robert*：*Poverty*，*Social Conscience in the Progressive Era*，Harper & Row，New York，1965.（亨特，罗伯特：《进步时代中的贫困与社会良心》，纽约：哈珀和罗出版公司，1965 年。）

Hurd，*Charles ed*：*A Treasury of Great American Speeches*：*Our Country' s Life and History in the Words of its Great Men*，New York，Hawthorn Books，1959.（赫德，查尔斯选编：《美国重要演说宝库》，纽约：霍索恩出版社，1959 年。）

Johnson，*Walter and Craven Avery and Dunn*，*F.Roger*：*A Documenta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Boston，Ginn Company，1951.（约翰逊·华特等：《美国人民文献》，波士顿：吉恩公司，1951 年。）

Kelley，*Robert*：*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Past*，Vol.2，New Jersey，Prentice－Hall，Inc.，1986.（凯利，罗伯特：《美国过去的塑造》，第 2 卷，第 4 版，新泽西：普兰蒂斯－霍尔公司，1986 年。）

Kennedy，*David M.*：*Over Here*：*The First World War and American Socie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肯尼迪，戴维·M：《在这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美国社会》，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 年。）

Kirkland，*Edward C.*：*A History of American Economic Life*，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1969.（柯克兰，爱德华·C：《美国经济生活史》，纽约，1969 年。）

Kolko，*Gabrial*：*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New York，Free，Press of Glencoe，1963.（柯尔可，加布里尔：《保守主义的胜利》，纽约：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63 年。）

Lansing，*Robert*：*The War Memoirs of Robert Lansing*，Indianapolis，The Bobbs－Merrill Company，1935.（蓝辛，罗伯特：《罗伯特·蓝辛战争回忆录》，印第安纳波利斯：鲍勃斯－梅里尔公司，1935 年。）

Laski，*Harold J.*：*The American Presidency*，*An Interpretation*，Harper & Brothers，

New York, 1940.（拉斯基，哈罗德：《美国总统制》，纽约：哈珀兄弟出版公司，1940年。）

Lawson, Kay: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co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s Sons, 1968.（劳森，凯：《美国政党和民主》，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之子出版公司，1968年。）

Leckie, Robert: The Wars of America, The Harper & Row Company, New York, 1968.（莱基，罗伯特：《美国的战争》，纽约：哈珀和罗出版公司，1968年。）

Leuchtenberg, William E.: The Perils of Prosperity, 1914—1932,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洛希滕伯格，威廉：《繁荣中的危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8年。）

Leviatin, David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How the Other Lives by Jacob A. Riis, St.-Martin' s Press, New York, 1996.（利维廷，戴维编：《雅各布·里斯的"另一半人是如何生活的"》，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6年。）

Levin, N. Gordon: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 s Response to War and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68.（莱文，小戈登：《伍德罗·威尔逊与世界政治：美国对战争和革命的反应》，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年。）

Link, Arthur ed.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3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林克，阿瑟编：《伍德罗·威尔逊文件集》第30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9年。）

Link, Arthur S. & McCormick, Richard L.: Progressivism, Harlan Davidson, Inc. Illinois, 1983.（林克，阿瑟和麦考密克，理查德：《进步主义》，伊利诺伊：哈兰·戴维逊公司，1983年。）

Link, Arthur S.: Woodrow Wilso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 1910—1917, Harper & Row, New York, 1963.（林克，阿瑟编：《伍德罗·威尔逊和进步主义时代：1910—1917》，纽约：哈珀和罗出版公司，1963年。）

Link, Arthur: American Epoch,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1890' s, New York, knopf, 1955.（林克，阿瑟编：《美利坚时代：19世纪90年代

以来的美国史》，纽约，诺夫出版公司，1955 年。）

Mack，*Raymond W. and Bradford*，*Calvin P.*：*Transforming America*，*Patterns of Social Change*，Random House，New York，1979.（麦克，雷蒙德·W 和布雷德福，卡尔文·P：《转变中的美国：社会变化模式》，纽约：兰登出版社，1979 年。）

Magill，*Frank N. ed.*：*Great Events From History*：*American Series*，Vol.2、3，Salem Press，Incorporated，New Jersey，1975.（马吉尔，法兰克·N：《历史大事记：美国》第 2、3 卷，新泽西：萨伦出版公司，1975 年。）

Mann，*Arthur ed.*：*The Progressive Era*，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 1963.（曼，阿瑟编：《进步主义时代》，纽约：霍尔特－莱因哈特－温斯顿，1963 年。）

Markinnon，*Barbara*：*American Philosophy*：*A History Antholog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5.（马金诺，巴巴拉：《美国哲学：历史文集》，纽约州立大学出版，1985 年。）

Marshall，*Richard E. and Wiltz*，*John Edward*：（*From Progressive Era to Normalcy*，J.B.Lippincott Company，1973.（马歇尔，理查德·E 等：《从进步主义时代到常态》，里平科特公司，1973 年。）

Marshall，*S.L.A.*：*The American Heritage History of World War I*，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64.（马歇尔，S·L·A：《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历史遗产》，纽约：西门和舒斯特出版公司，1964 年。）

May，*Ernest R.*：*Imperial Democracy*：*The Emergence of America as a Great Power*，Harper & Row，New York，1961.（梅，欧内斯特·R：《帝国民主：美国作为强国崛起》，纽约：哈珀和罗出版公司，1961 年。）

McDonald，*Forrest*：*The Torch is Passed*：*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20th Century*，Wayne State University，1968.（麦克唐纳，富里斯特：《传递的火炬：20 世纪的美国》，韦恩州立大学，1968 年。）

Merk，*Fredrick*：*Manifest Destiny and Mission in American History*，Alfred A.Knopf，Inc. and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1966.（默克，F：《美国历史上的天定命运和使命感》，纽约：阿尔弗雷德·A·诺夫出版公司等，1967 年。）

Meyer, Adolphe Erich: An Educational History of American People, New York, McGraw-Hill, 1957.（迈耶，阿道夫·E：《美国人民教育史》，纽约：麦克格罗-希尔出版公司，1957 年。）

Miller, Zane L.: Boss Cox's Cincinnati: Urban Politics in the Progressive Er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米勒，赞恩：《"老板"考克斯的辛辛那提：进步主义时代的都市政治》，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 年。）

Mock, James R.: Words That Won the War: The Story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1917—191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39.（莫克，詹姆斯·R：《赢得战争的文字：公共情报委员会的历史，1917—1919》，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39 年。）

Mohl, Raymond A.: The New City: Urban America in the Industrial Age, 1860—1920, Harlan Davidson, Inc. Illinois, 1985.（莫尔，雷蒙德·A：《新城市：工业时代的城市美国：1860—1920》，伊利诺伊：哈兰·戴维森出版公司，1985 年。）

Morison, Samuel Eliot: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Vol.3,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Inc., New York, 1972.（莫里森，塞缪尔·埃利奥特：《牛津美国人民史》，第 3 卷，纽约：新美国图书出版公司，1972 年。）

Morris, Richard B.: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History, Harper & Row, New York, 1972.（莫里斯，理查德·B：《美国历史大百科》，纽约：哈珀和罗出版公司，1972 年。）

Mowry, George E.: The Era of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America, 1900—1912, New York, Harper, 1958.（莫里，乔治：《西奥多·罗斯福时代与现代美国的诞生：1900-1912》，纽约：哈珀公司，1958 年。）

Murray, Robert K.: The Politics of Normalcy: Government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Harding-Coolidge Era,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1973.（马瑞，罗伯特·K：《常态时期的政治：哈定-柯立芝时代的政府理论和实践》，纽约，W.W. 诺顿公司，1973 年。）

Myers, David R., ed.: Samuel Gompers, A Selected List of Reference About the

Man and His Times,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1986.（迈耶斯，戴维·R编：《塞缪尔·龚伯斯：有关他及其时代的参考书目选集》，华盛顿D.C.：国会图书馆，1986年。）

Nash, *Gerald*: *The Great Transition*: *A Short History of Twentieth – century America*,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71.（拉什，杰拉德：《伟大的转变：20世纪美国简史》，波士顿：艾林培根公司，1971年。）

Newbill, *James G. ed.*: *The American Spectrum*: *An Annotated History*,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Inc. California, 1971.（纽比尔，詹姆斯·G等：《美国历史注释本》，加利福尼亚：韦茨华斯出版公司，1971年。）

Noble, *David W.*: *The Paradox of Progressive Though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58.（诺布尔，戴维：《进步主义思想的矛盾》，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58年。）

Norton, *Mary Beth & Katzman*, *David M.*: *A People and a Nation*,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1982.（诺顿，玛莉·贝斯和卡兹曼主编：《民族和国家：美国历史》，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82年。）

Nye, *Russel B.*: *Midwestern Progressive Politics*: *A Historical Study of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1870—1958*,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9.（奈，拉塞尔：《中西部进步主义政治：起源和发展的一项历史研究，1870—1958》，密歇根州立大学出版社，1959年。）

O' Neil, *William L.*: *The Progressive Years*, *America Comes of Age*, New York, Dodd, Mead, 1975.（奥勒尔，威廉：《进步主义年代》，纽约：多德和米德公司，1975年。）

Pointer, *Nell Irving*: *Standing at Armageddon*: *the United States*, *1877—1919*, New York, W.W.Norton, 1987.（佩恩特，尼尔：《伫立在艾美吉登：1877—1919年的美国》，纽约：诺顿出版公司，1987年。）

Pallack, *Norman*: *The Populist Response to Industrial America*: *Midwestern Populist Though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平民主义者对工业美国的反应：中西部平民主义思想》，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

Palmer, *Frederick*: *John J. Pershing*, *General of the Armies*: *A Biography*, Har-

risburg, Pennsylvania: Military Service Publishing Company, 1948.（帕尔默，弗雷德里克：《约翰·J·潘兴将军传记》，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军事服务出版公司，1948年。）

Parrington, Vernon: *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7.（帕林顿，弗伦：《美国思想的主流》，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87年。）

Parsons, Stanley B.: *The Populist Context: Rural Versus Urban Power on a Great Plains Frontier*,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73.（帕森斯，斯坦利：《平民党人视野：大平原边疆地区乡村权力与都市权力的对抗》，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格林伍德出版社，1973年。）

Paul, Rodman W.: *The Far West and the Great Pains in Transition: 1895—1900*, Harper & Row, New York, 1988.（保尔，罗德门·W：《远西部和大平原的转变：1895—1900》，纽约：哈珀和罗出版公司，1988年。）

Pease, Otis ed.: *The Progressive Years: The Spirit and Achievement of American Reform*, New York, G.Braziller, 1962.（皮斯，奥蒂斯编：《进步主义年代》，纽约：G·布雷兹拉，1962年。）

Perrett, Geoffrey: *America in the Twentieth: A History*,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1982.（佩雷特，杰弗里：《20世纪美国史》，纽约：西门和舒斯特出版公司，1982年。）

Pershing, John J.: *My Experiences in the World War*, Blue Ridge Summit, Pennsylvania: Tab Books, 1989.（潘兴，约翰·J：《我在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宾夕法尼亚：泰伯书店，1989年。）

Pomeroy, Earl S.: *Pacific Outpost: American Strategy in Guam and Micronesia*,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70.（波默罗伊，E.S：《太平洋前哨：美国在关岛和密克罗尼西亚的战略》，纽约：拉塞尔出版公司，1970年。）

Porter, Glenn: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s Sons, 1980.（波特，格伦：《美国经济史大百科》，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之子出版公司，1980年。）

Robinson, Corinne Roosevelt: *My Brother, Theodore Roosevelt*,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2.（罗宾逊，卡琳·罗斯福：《我的兄弟西奥多·罗斯福》，纽约：卡雷斯·斯克林纳之子出版公司，1932年。）

Romasco, A.: Poverty of Abundance: Hoover, The Nation, The Depress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罗马斯科，A：《富足的贫困：胡佛、国家和经济萧条》，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

Roosevelt, Theodore: An Autobiography,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46.（罗斯福，西奥多：《自传》，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46年。）

Rosenberg, Emily S.: Spreading the American Dream: American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pansion, 1890—1945, New York, Hill & Wang Company, 1982.（罗森伯格，艾米里·S：《美国梦的传播：美国经济与文化的扩张，1890—1945年》，纽约：希尔和王出版公司，1982年。）

Russell, Francis: The Shadow of Blooming Grove: Warren G. Harding in His Times, New York: MaGraw-Hill, 1968.（拉塞尔，弗朗西斯：《密林中的阴影：沃伦·G·哈定及其时代》，纽约：麦克格罗-霍尔，1968年。）

Schlesinger, Arthur M.: New Viewpoints in America History,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22.（施莱辛格，阿瑟·M：《美国史新观点》，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22年。）

Schlesinger, Arthur M., Jr.: 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 1919—1933,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57.（施莱辛格，小阿瑟·M：《旧秩序的危机：1919—1933年》，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57年。）

Schlesinger, Arthur, M. Jr.: History of U.S. Political Parties, Vol.1,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0.（施莱辛格，小阿瑟：《美国政党史》，第1卷，纽约：切尔西·豪斯出版社，1980年。）

Sellers, Charles and May, Henry and McMillan, Neil R.: A Synopsis of American History, Rand McNally College Publishing Company, Chicago, 1977.（塞勒斯，查尔斯等：《美国历史专题》，芝加哥：兰德·麦克纳利学院出版，1977年。）

Seymour, Charles ed.: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Arranged as a Narrativ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6—1928*.（西摩，查尔斯编：

《豪斯上校秘密文件》，1914 年豪斯致威尔逊，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26—1928 年。）

Shannon，*David*：*20th Century America*，*The Progressive Era*，Chicago，Rand Ma-Nally College Pub.Co.，1974.（香农，戴维：《20 世纪的美国：进步主义时代》，芝加哥：兰德·麦克纳利学院出版公司，1974 年。）

Simkhovitch，*Mary*：*Neighborhood*：*My Story of Greenwich House*，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38.（希姆可维奇：《邻里之谊：我在格林威治事务所的故事》，纽约：W.W. 诺顿公司，1938 年。）

Sinclair，*Andrew*：*The Available Man*：*The Life Behind the Mask of Warren Gamaliel Harding*，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65.（辛克莱，安德鲁：《沃伦·加莫里尔·哈定面具后的生活》，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65 年。）

Snowman，*Daniel*：*America Since 1920*，London，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1978.（斯诺曼，丹尼尔：《1920 年以来的美国》，伦敦：海内曼教育图书公司，1978 年。）

Statis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New York，1961.（美国人口统计局：《美国历史统计：殖民地时代至今》，华盛顿 D.C.，1961。）

Stearn，*Gerald Emanuel*：*Gompers*，Englewood Cliffs，New Jersey：Prentice – Hall Inc.，1971.（斯蒂恩：杰拉尔德·伊曼纽尔：《龚伯斯》，新泽西：普兰蒂斯 – 霍尔出版公司，1971 年。）

Sullivan，*Mark*：*Our Times*：*1900—1925*，6 Vols.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27—1935.（沙利文，马克：《我们的时代：1900—1925.），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之子公司，1927—1935 年。）

"*The Harding Era*：*Warren G.Harding and his Administration*，Minni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69.（《哈定时代：沃伦·G·哈定及其政府》，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69 年。）

Thelen，*David P.*：*Robert M.LaFollette and the Insurgent Spirit*，Little，Brown & Company，Boston，1976.（希伦，戴维：《罗伯特·拉福莱特与反叛精神》，波士顿：里特尔和布朗公司，1976 年。）

"*Titles in the Oceana Presidential Chronology Series*: *Warren G. Harding*, Oceana Publications Inc.1970.（《欧西那总统编年系列：沃伦·哈定》，欧西那出版公司，1970 年。）

"*Titles in the Oceana Presidential Chronology Series*: *Calvin Coolidge*, Oceana Publications Inc.1970.（《欧西那总统编年系列：卡尔文·柯立芝》，欧西那出版公司，1970 年。）

Trask, *David F.*: *Captains & Cabinets*, Columbia, Miss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72.（特拉斯克，戴维·F：《首领和内阁》，密苏里大学出版社，1972 年。）

Trattner, *Walter I.*: *From Poor Law to Welfare State*: *A History of Social Welfare in Americ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89.（特拉纳，华尔特·I：《从济贫法到福利国家：美国社会福利史》，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9 年。）

Tumulty, *Joseph P.*: *Woodrow Wilson As I Know Him*,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21.（图马尔蒂，约瑟夫：《我所认识的伍德罗·威尔逊》，纽约：道布尔戴公司，1921 年。）

Vandiver, *Frank*: *Black Jack*: *The Life and Times of John J. Pershing*, College Station,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1977.（凡蒂佛，富兰克：《约翰·J·潘兴的生活及其时代》，学院研究所，得克萨斯 A 和 M 大学出版，1977 年。）

Vatter, *Harold G.*: *Drive to Industrial Maturity*: *the U.S. Economy*, *1860—1914*, Greenwood Press, Connecticut, 1975.（瓦特，哈罗德·G：《驱向工业成熟：美国经济 1860—1914》，康涅狄格州：格林乌德出版社，1975 年。）

Wald, *Lillian*: *The House on Henry Street*, New York, H.Holt and company, 1915.（沃尔德，莉莲：《亨利街事务所》，纽约：H·豪尔特公司，1915 年。）

Wall, *Joseph Franzier*: *Andrew Carnegie*,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9.（华尔，约瑟夫·F：《安德鲁·卡内基》，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89 年。）

White, *Morton*: *Social Thought in America*: *The Revolt Against Formalism*, Beacon

Press, Boston, 1957.（怀特，莫顿：《美国社会思想：叛离形式主义》，波士顿：比肯出版社，1957年。）

White, *William Allen*: *A Puritan in Babylon*: *The Story of Calvin Coolidge*, Gloucester, Massachusetts: Patterson Simth, 1973.（怀特，威廉·艾伦：《巴比伦的清教徒：卡尔文·柯立芝的故事》，格劳斯特，马萨诸塞：帕特森·史密斯，1973年。）

Wiebe, *Robert H.*: *Businessmen and Reform*: *A Study of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韦尔伯，罗伯特：《企业家与改革：进步运动研究》，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

Wiebe, *Robert H.*: *The Search for Order*, *1877—1920*, New York, Hill & Wang, 1967.（韦尔伯，罗伯特：《寻求秩序，1877－1920》，纽约：希尔和王出版公司，1967年。）

Williams, *William Appleman*: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W.W.Norton & Comnpany , 1988.（威廉姆斯，威廉·阿普曼：《美国外交的悲剧》，W.W.诺顿公司，1988年。）

Willis, *F.Roy*: *Western Civilization*: *An Urban Perspective*（Vol.2）D.C.Heath and Company, Massachusetts, 1977.（维利斯，F·R：《西方文明：城市视角》，第2卷，马萨诸塞：希斯出版公司，1977年。）

Wilson, *Jackson*: *Reform*, *Crisis and Confusion*, *1900—1929*,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杰克逊，威尔逊：《改革、危机和混乱，1900—1929年》，纽约：兰登出版社，1970年。）

Wilson, *Woodrow*: *New Freedom*,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13.（威尔逊，伍德罗：《新自由》，纽约：道布尔戴和佩奇公司，1913年。）

Woodward, *C.V.*: *The Origins of the New South*, *1877—1913*,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1.（伍德沃德，C·V：《新南部的起源，1877—1913》，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51年。）

Wright, *Louis B. and other editors*: *The Democratic Experience*, *A Short American History*,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Illinois, 1968.（赖特，路易·B等：

《民主的经历：美国简史》，伊利诺伊：斯各特和福雷斯曼出版公司，1968年。）
Wynn, *Neil A*: *From Progressive to Prosperity*, Holmes and Meier Publishers, 1986.（温，内尔：《从进步主义到繁荣》，霍姆斯和迈耶尔出版公司，1986年。）

2. **中文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2。
《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3。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
埃默里，埃德温等：《美国新闻史》，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2。
艾捷尔，J编、赵一凡等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0。
巴兰，保罗和斯威尔，保罗：《垄断资本》，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7。
贝拉米：《回顾》，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
比林顿，雷·艾伦：《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中译本，下册，商务印书馆，1991。
比米斯，S·F：《美国外交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
彼尔斯，尼尔·R和哈格斯特洛姆，杰里：《美国志——五十州现状》，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伯恩斯，詹姆斯·M等：《美国式民主》，中译本，谭君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伯恩斯，詹姆斯等：《民治政府》，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布尔斯廷，丹尼尔·J：《美国人：南北战争以来的经历》，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布莱克，纳尔逊·曼弗雷德：《美国社会生活和思想史》，下册，许季鸿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
布里登堡：《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7。
布卢姆，J等：《美国的历程》下册第一分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8。
曹绍濂：《美国政治制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
邓蜀生：《美国与移民：历史·现实·未来》，重庆出版社，1990。
邓蜀生：《美国历史与美国人》，人民出版社，1993。
邓蜀生：《伍德罗·威尔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董衡巽编：《海明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杜蒙德，德怀特·L：《现代美国：1896—1946》，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4。
范斯科德，理查德·C等人：《美国教育基础——社会展望》，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方纳，埃里克编：《新美国历史》，中译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方纳，菲利普编：《华盛顿文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
菲特，吉尔伯特·C和里斯，吉姆·E：《美国经济史》，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
弗里德古德，莉莲：《美国画家》，中译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
福克纳，H·U和沙伊贝，H·G等：《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福斯特：《美国历史中的黑人》，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龚维敬：《美国垄断资本》，人民出版社，1986。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美国经济概况》，人民出版社，1976。
洪国起、王晓德：《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美关系的历史考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
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
黄兆群主编：《美国宗教史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
霍夫施塔特，理查德：《改革时代》，中译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

加里，沃塞曼：《美国政治基础》，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卡尔金斯，卡罗尔：《美国科学技术史话》，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4。
卡尔金斯，卡罗尔：《美国社会史话》，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4。
卡尔金斯，卡罗尔：《美国文化教育史话》，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4。
卡尔金斯，卡罗尔：《美国文学艺术史话》，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4。
卡普洛：《美国社会发展趋势》，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
凯南，乔治·F、葵阳等译：《美国外交》，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康马杰，H·S：《美国精神》，中译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考利，马尔科姆：《流放者的归来》，中译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
柯恩编：《美国划时代作品评论集》，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柯里，罗伊·沃森：《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科利尔，彼得和霍罗维兹：《美国楷模》，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9。
库钦斯基，于尔根：《生产力的四次革命：理论与对比》，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拉齐尔，泽夫：《一八九〇年代的美国——迷惘的一代人的岁月》，中译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
拉维奇，戴安娜：《美国读本》，中译本，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雷雨田：《上帝与美国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李春辉：《拉丁美洲国家史稿》，商务印书馆，1973。
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李道揆：《美国政府机构与人事制度》，人民出版社，1985。
李剑鸣：《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
李剑鸣：《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梁茂信：《美国移民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林顿，加尔文·D：《美国两百年大事记》，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林广、张鸿雁：《成功与代价——中外城市化比较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
林克，阿瑟和卡顿，威廉：《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刘保端译：《美国作家论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陆镜生编著：《美国人权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考察》，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
罗伯逊，詹姆士·O：《美国神话美国现实》，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马伯格，克拉夫：《美国文化的经济基础》，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马格多夫，哈里《帝国主义时代》，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5。
麦格劳，托马斯·K：《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1865—1917》，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
梅里亚姆：《美国政治学说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8。
米尔斯，赖特：《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莫里森，塞缪尔和康马杰，亨利：《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下卷，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莫鲁瓦，安德烈：《美国史：从威尔逊到肯尼迪》，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纳罗奇尼茨基等：《远东国际关系史》，第一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6。
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美国史研究室编：《美国历史问题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帕特森，托马斯著：《美国外交政策》，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佩尔斯，理查德·H、卢允中等译：《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中译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

契格达耶夫，阿：《美国美术史》，中译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塞尔，柯克帕特里克：《权势的转移》，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6。
塞利格曼，本·巴鲁克：《美国企业史》，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施莱辛格，小阿瑟主编：《美国共和党史》，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施莱辛格，小阿瑟主编：《美国民主党史》，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施瓦茨，伯纳德：《美国法律史》，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后的世界》，中译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斯坦，赫伯特：《美国总统经济史》，中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斯特普尔斯，康纳德·伊主编：《美国电影史话》，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宋李瑞芳：《美国华人的历史和现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
索贝尔，罗伯特和西西利亚，戴维·B：《企业家：美国人的创业精神》，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瓦里美，格雷厄姆：《爵士乐》，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王锦瑭、钟文范、李世洞：《美国现代大企业与美国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
王绳祖等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 3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王铁崖选译：《1914—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商务印书馆，1982。
王玮主编：《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1776—1995》，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王晓德：《梦想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王旭、黄柯可主编：《城市社会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王旭：《美国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王旭：《美国西海岸大城市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王章辉、黄柯可：《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威尔逊，伍德罗：《国会政体》，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6。
威什，哈维：《美国近代社会思想发展史》，中译本，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民国70年）。
韦尔：《美国政治》，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
谢沃斯季扬诺夫：《美国近代史纲》，下册，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
休斯，H·S：《意识与社会：1890至1930年欧洲社会思想的新取向》，中译本，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民国74年）。
杨令侠：《加拿大与美国关系史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杨生茂、冯承柏、李元良编：《美西战争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杨生茂、林静芬主编：《美国史论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杨生茂、刘绪贻主编：《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人民出版社，1990。
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人民出版社，1991。
余志森：《美国史纲：从殖民地到超级大国》，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
俞吾金：《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英美哲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张友伦：《美国社会变革与美国工人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世界经济百科全书》，1987。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译丛（史学专号）》，1982。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现代史学的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祖波克：《美国史纲》，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索　　引

（按汉语拼音字母为序）

A

阿布拉姆斯，理查德　Abrams，Richard　307，380

阿尔赫西拉斯　Algeciras　158

阿奎纳多，E.　Aguinaldo，Emilio　108，107，123

阿拉伯人号　Arabic　393，394

阿姆斯特朗，路易斯　Armstrong，Louis Daniel　199，613

埃德，博伊　Ed，Boy　384

埃尔克丘陵　Elk Hill　442

埃佛格来得　Everglades　466

埃利奥特，查尔斯　Eliot，Charles William　653

埃利斯岛（纽约港）　Ellis Island (New York Harbor)　205

埃文思，奥利弗　Evans，Oliver　14

艾比，埃德温　Abbey，Edwin Austin　619

艾罗，皮尔斯　Arrow，Pierce　462

爱迪生，托马斯　Edison，Thomas Alva　70，75，615

爱默生　Emerson　471

安德鲁斯克因电力公司　Androscoggin Electric Company　469

安德生，谢尔伍德　Anderson，Sherwood　176

安东尼，苏珊　Anthony，Susan Brownell　275

安孔　Ancon　143，144

安泰，乔治　Antheil，George　611

奥尔德里奇，纳尔逊　Aldrich，Nelson Wilmarth　334，339，341，358，360

奥夫雷贡　Obregon　528

奥尼尔，尤金　O' Neill，Eugene　607，608

B

巴本，冯　Papen，Franz Von　384，386

巴伯森，罗杰　Babson，Roger W.　475

巴拉奇，伯纳德　Beruch Bernard　453，475，478
巴里，菲利普　Barry，Philip　607
巴林杰，理查德　Ballinger，Richard A.　340，342
巴鲁克，伯纳德　Baruch Bernard M.　404，406
巴拿马运河　Panama Canal　140–144，142，143，146
巴特莱　Bartley，Numan V.　373
巴特勒，皮尔斯　Butler，Pierce　456
白里安，阿里斯蒂德　Briand，Aristide　513，514
拜德，理查德　Byrd，Richard E.　465
班扬，约翰　Banyan，John　243
鲍尔弗，阿瑟　Balfour，Arthur　414
鲍特韦尔，乔治　Boutwell，George Sewall　168，169
北方证券公司　Northern Securitie' s Company　307，308
贝尔，亚历山大·格雷厄姆　Bell，Alexander Granham　14
贝尔电话实验室　Bell Telephone Laboratories，Inc.　14
贝弗里奇，阿尔伯特　Beveridge，Albert J.　112，270，290
贝克，雷·斯坦纳德　Baker Ray Stannard　239，240，242
贝克，乔治·皮尔斯　Baker，George Pierce　612
贝拉米，爱德华　Bellamy，Edward　244，256，257
贝利，利比迪　Bailey，Liberty Hyde　186
贝利，托马斯　Bailey，Thomas A.　176
贝洛斯，乔治·维斯里　Bellows，George Wesley　622，623
被忘却者　The forgotten man　374
本土主义者　Nativist　302
比尔，乔治　Bill，George F.　123
比尔德，查尔斯　Beard，Charles Austin　261，630–632
比洛　Bulow，von　158
比诺—瓦里亚　Bunau Varilla　140，141，144
波尔克，詹姆斯　Polk，James　352
波特，亨利　Potter，Henry　169
波依登，罗兰德　Boyden，Roland W.　515
伯顿，西奥多　Burton，Theodore　100
伯恩施托夫，冯　Bernstoff，Count Von　394
伯恩斯，乔治　Burns，George　199
伯吉斯，约翰·威廉姆斯　Burgess，

John W. 628, 633
伯杰，戴维 Bergey, David Hendricks 226
伯林，欧文 Berlin, Irving 199
博登，盖尔 Borden, Gail 14
博登，罗伯特 Borden, Robert 527
博拉，威廉 Borah, William E.513
布莱恩—查莫罗条约 Bryan-Chamoro Treaty 153
布赖恩，威廉·詹宁斯 Bryan, William Jennings 131, 130, 335－337, 360, 388
布赖斯，詹姆斯 Bryce (of Dechmont), James Bryce, Viscount 555
布兰代斯，路易斯 Brandeis, Louis 261, 273, 367, 369, 591
布兰代斯理念 Brandel Brief 274
布兰德吉 Brandegee 439
布朗，乔 Brown, Joe E. 199, 198
布朗斯维尔（得克萨斯） Brownsville (Texas) 375
布雷福德，加马列尔 Bradford, Gamaliel 167
布林莫尔学院 Bryn Mawr College 230, 353
布鲁克哈特，史密斯 Brookhart, Smith Wildman 484
布鲁克林（纽约） Brooklin (New York) 29, 231
布鲁斯 blues 612, 614
布鲁斯，詹姆斯 Bruce, James 384

C

查菲，A.（又译沙飞） Chaffee, Adna R.123
“常态” normalcy 438, 440, 447, 448
超现实主义 Surrealism 620, 624
潮水电力公司 Tidewater Power Company 469
城市经理（又译“市行政官”） City manager 281, 288, 289
城市老板 City Boss 287

D

达达主义 Dada 620, 624
达根哈特 Dagenhart 269
达罗，克拉伦斯 Darrow, Clarence Seward 258, 490, 491
大通国民银行 Chase National Bank 469
《大西洋月刊》 Atlantic Monthly 222, 238
代顿（田纳西） Dayton (Tennessee) 110, 491
戴维斯，阿瑟 Davies, Arthur Bowen 620
戴维斯，约翰 Davis, John W. 444
道格拉斯，刘易斯 Douglass, Lewis H. 164

道格拉斯，威廉　Dougass, William O.　199
道威斯，查尔斯　Dawes, Charles G.　479
得梅因理念　Des Moines Idea　287
德布斯，尤金　Debs, Eugene Victor　225－226, 238, 347, 371, 412, 483, 563
德尔卡塞　Delcasse, Theophile　159
德拉哥　Drago, Luis M.　137, 160
德莱塞，西奥多　Dreser, Theodore Herman Albert　245, 246, 594, 595, 598
德里昂　De Lèon, Daniel　225
德米特，塞西尔　Demitte, Cecil B.　616, 617
邓比，查尔斯　Denby, Charles　106
邓宁，威廉　Dunning, William A.　633, 634, 635
迪亚斯，阿尔多福　Diaz　148, 525
抵押信托银行　Guaranty Trust Bank　469
帝国术师　Imperial Wizard　495
第十八条修正案　the Eighteenth Amendment　574, 575
第十九条修正案　the Nineteenth Amendment　500
丁韪良　Martin,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127
杜波伊斯　Du Bois, 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234, 235, 594, 610
杜兰特，威廉　Durant, William C.　462
杜利特尔，希尔达　Doolittle, Hilde　606
杜威，约翰　Dewey, John　257, 639－642
镀金时代　Gilded Age　10, 258, 544, 561, 591, 593
敦巴，昆斯坦丁　Dumba, Konstantin　389
多尔蒂，哈里　Daugherty, Harry M.　441
多黑尼，爱德华　Doheny, Edward　442
多斯帕索斯，约翰　Dos Passos, John Roderigo　601, 604

E

20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　Twentieth Century－Fox Film Corporation　616

F

法根，马克　Fagan, Mark　282
法拉巴号　Falaba　392
反帝国主义同盟　Anti－Imperialist Leggue　167, 168
反共济党　Anti－Masonic Party　560
反沙龙联盟　Anti－Soloon League　181, 571

范登堡，阿瑟 Vandenberg, Arthur H.502，503
菲茨杰拉德，弗朗西斯 Fitzgerald, F.Scott 602，604
菲利浦，威廉 Phillipe, William 103，104，528
菲利普斯，戴维·格雷厄姆 Philips, David G. 243，248，247
菲尼克斯 Phoenix 24
费尔乔，亨利·普莱特 Fairchild, Henry Pratt 487
夫莱恩特，乔西亚 Fiynt, Josiah 238
弗罗斯特，罗伯特 Frost, Robert 604，606
弗洛伊德，S. Freud, Sigmund 498
福布斯，查尔斯 Forbbes, Charles R. 441
福尔，艾伯特 Fall, Albert B. 441
福克纳，威廉 Faulkner, William 606
福摩萨 Formosa 529
福特，亨利 Ford, Henry 11，34，70，75，80，462，460，461
福特，约翰 Ford, John 617
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 Fordney - McCumber Tariff Act 454
福煦，费迪南 Foch, Ferdinand 417，418
福音派 evangelical church 253
妇女消费者联盟 National Consumers' League（NCL） 270
富兰克林，本杰明 Franklin, Benjamin 32

G

戈德金，E. Godkin, E.L. 166
戈德马克，约瑟芬 Goldmark, Josephine Clara 232
戈瑟尔斯，乔治·华盛顿 Goethals, George Washington 142
哥伦比亚影片公司 Columbia Pictures, Inc. 616
格莱顿，华盛顿 Gladden, Washington 263，265
格兰其 Granger 570
格兰特 Grant, Ulysses S. 79，541
格雷戈里，罗斯 Gregory, Ross 387
格里菲斯，戴维·沃克 Griffith, David Wark 616，617
格什温，乔治 Gershwin, George 614
工具主义 instrumentalism 638
公共会堂 Settlement Houses 268
公海 High Seas 406，422
公平信托公司 Equitable Trust Company 469
公正施政 Square Deal 313，316，

317
龚伯斯 Gompers, Samuel 224, 223, 236, 410
古德诺 Goodnow, Frank Johnson 127
古金，弗雷德里克 Gookin, Frederick 166
《观察》 SURVEY 267
国际兑换银行 International Acceptance Bank 475
国际妇女节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232
国际收割机公司 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mpany 326
国联 League of Nations 427, 428, 429, 433, 435, 437, 506 - 508

H

哈定，沃伦 Harding, Warren G. 152, 438 - 444, 446 - 448, 450 - 452, 506, 507, 510, 520, 521, 530, 531, 543, 582
哈莱姆（纽约） Harlem（New York） 40, 608, 609
哈莱姆文艺复兴 Harlem Renaissance 608 - 610
哈里曼，E. Harriman, E.H. 56, 307
哈里斯，罗伊 Harris, Roy 611
哈帕，威廉 Harper, William Rainey 15
哈维，乔治 Harvey, George 439
海厄特，约翰·韦斯利 Haytt, John Wesley 14
海明威，欧内斯特 Hemingway, Ernest 601
海斯，塞缪尔 Hays, Samuel P. 179
海斯，威尔 Hays, Will 441
海约翰—比诺—瓦里亚条约 Hay-Bunau - Varilla Treaty 140, 143
汉富雷 Humphrey, W.E. 58, 467
汉纳，马克 Hanna, Mark 304, 558
汉普顿（纽约） Hampton（New York） 235
汉普顿概念 the Hampton Idea 235
豪，福雷德里克 Howe, Frederic 280, 589
豪，小伊莱亚斯 Howe, Eilas, Jr. 14
豪斯，爱德华 House, Edward Mandell 387, 385, 386, 420 - 422, 427, 428, 431
豪威尔斯 Howells, William Dean 595
好莱坞 Hollywood 33, 616
《赫伯恩法》 Hepburn Act 323,

324
赫尔事务所（芝加哥） Hull House （Chicago） 231
赫里克，罗伯特 Herrick，Robert 247
赫荣，乔治 Herron，George D. 169
赫斯特，威廉·伦道夫 Hearst，William Randolph 94，201，242，243
黑名单 Blacklist 398，399
黑幕揭发运动 Muckraker 61，238，244
黑幕揭发者 Muckraker 61，71，238，244，302，574
亨德里克，伯顿 Hendrick，Burton 242
亨利，罗伯特 Henri，Robert 622，621
亨特，罗伯特 Hunter，Robert 194，214，213，246，247
胡佛，赫伯特 Hoover，Herbert C. 404，406，441，445，446，449，450－455，467，477，479，503－505，517－519，526，521，543
华伯格，保罗 Warburg，Paul 475
华尔德，L. Wald，Lillian 213
华莱士，亨利 Wallace，Henry C. 441
华林，威廉 Walling，William Engilsh 235
华纳兄弟影片公司 Warner Brothers 616，618
华盛顿，布克 Washington，Booker Taliaferro 234
怀特，安德鲁 White，Andrew Dickson 277
怀特，亨利 White，Henry 136，137，428
怀特，玛丽 White，Mary O. 235
怀特，瓦尔特 White，Walter Francis 609，610
环球影片公司 Universal Pictures Company 616
惠斯勒，艾伯特 Whistler，James Abbott McNeill 618，622
惠特洛克，布兰德 Whitlock，Brand 248
惠特尼，埃里 Whitney，Eli 459
惠特尼，威利斯 Whitney，Willis R. 12
霍尔，乔治 Hoar，George 169
霍华德，西德尼 Howard，Sidney Coe 607
霍默，温斯洛 Homer，Winslow 618，619，622
霍姆斯 小奥利弗·温德尔 Holmes，Oliver Wendell，Jr. 260，583
霍普金斯，马克 Hopkins，Mark

656
霍奇，查尔斯　Hodge, Charles　656

J

积极的自由　Positive Liberty　367
基督教社会主义　Christian Socialism　263，264
基顿，马斯特　Keatom, Buster　618
激进主义　Radicalism　489，633
《基廷—欧文法》（又称《童工法》）　Keating – Owen Bill　269，550，
吉本斯，詹姆斯　Gibbons, James　262
吉尔曼，夏洛特·珀金斯　Gilman, Charlotte Perkins　220
吉廷斯，法兰克　Giddings, Frank　187
加兰，哈姆林　Garland, Hamlin　595
加里，艾伯特　Gary, Judge Eibert　326
杰米·克劳法　"Jim Crow" Laws　374，378
金，麦肯齐　King, Mackenzie　527
进步党　Progressive Party　562，563，564，569，586
进步派（进步主义者）　Progressives　278，288，289，297，484
进步主义　Progressivism　172，265，278，277，290，291，321，335，336，358，359，361，380，450，486，484，568，563，580，591
进步主义时代　the Progressive Era　238，239，320，318，337，352，371，374，377，378，379，380
进步主义运动　Progressive Movement　172，237，238，241，244，266，594
浸礼会　Baptists　651，656
禁酒党　Prohibition Party　571
禁酒法（令）　the Prohibition Law　571
禁酒运动　Prohibition Movement　172，181，492–494，563，571
巨型企业　Big Business　51–53，56，68，69
爵士乐　Jazz　611–614
军械库展览会　Armory Show　623

K

卡波雷托战役　Caporetto, Battle of　417
卡兰萨，V.　Carranza, Venustiano　148，149，400，402，523
卡列斯　Calles　523，524
卡伦，康迪　Cullen, Countee　609
卡明斯，艾伯特　Cummins, Albert Barid　290
卡内基　Carnegie, Andrew　57，61，62，70，72，75，76，78，80，81，

170
卡朋特，乔治　Carpentier, George 473
卡彭，艾尔　Capone, Al　493, 497
卡普顿，W　Caperton, W.B.　150
卡斯特罗，西普里亚诺　Castro, Cipriano　137
卡特，卡丽·查普曼　Catt, Carrie Chapman　230, 275
凯利，佛罗伦斯　Kelley, Florence 200, 232, 270
凯利，罗伯特　Kelley Robert　362
凯南，乔治　Kennan, George　233
坎农，约瑟夫　Cannon, Joseph Gurney　330, 338, 339, 551, 578
康蒙斯，约翰　Commons, John R. 223, 255, 293, 628, 635
考克斯，乔治　Cox, George B.　280
考克斯，詹姆斯　Cox, James Middleton　291
柯立芝，卡尔文　Coolidge, Calvin 438, 439, 442 – 444, 448, 449, 454, 455, 456, 460, 467, 476, 458, 459, 464, 470, 479, 482, 484, 504, 505, 507, 508, 512, 513, 520, 521, 525, 530, 531, 533
科普兰，艾伦　Copland, Aaron　611
克拉克，爱德华　Clarke, Edward Y. 494
克拉克，沃尔特　Clark, Walter van Tilburg　140
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又译《克莱顿法》）　Clayton Anti – trust Act 344, 365 – 367, 647
克莱恩，H.　Crane, Harold Hart 601
克莱斯勒　Crysler　462
克里奥耳人　Creoles　612
克里尔，乔治　Creel, George　402
克利夫兰，格罗夫　Cleveland, Grover　79, 286, 330, 350, 352, 353, 371, 558
克利斯托瓦尔　Cristobal　144, 143, 147
克罗利，赫伯特　Croly, Herbert David　258, 259, 260, 346
克梯斯，查尔斯　Curtis, Charles 439
库伯森，查尔斯　Culberson, Charles 496

L

垃圾箱画派　Ashcan School　620, 621
拉夫因韦尔，鲁塞尔　Leffingwell, Russell　477
拉福莱特，罗伯特　La Follette, Robert M.　292, 290, 291, 294,

297, 324, 342, 344, 444, 486, 483, 484, 507, 561 - 563, 591
《拉福莱特海员法》 La Follette Seamen' s Bill 550
拉塞尔，威廉 Russell, William W. 152
拉斯基，哈罗德 Laski, Harold Joseph 379
莱文森，萨蒙 Levinson, Salmon 513
莱茵兰 Rhine Land 429
赖斯，C.S. Rice , Cecil Spring 156
赖特，弗兰克·劳埃德 Wright, Frank Lloyd 625
蓝辛，罗伯特 Lansing, Robert 132, 131, 389, 392, 394, 398, 427, 428, 518, 529
劳埃德，哈罗德 Lloyd, Harold 628
劳埃德，亨利·德马雷斯特 Lyoyd, Henry Demarest 238, 244
劳动骑士团 Knights of Labor 223, 262
劳伦斯，D.H. Lawrence, D.H. 58
劳申布什，沃尔特 Rauschenbusch, Walter 246, 263, 264
老卫士派 The Old Guard 333, 334, 337, 340
勒兰德，亨利 Leland, Henry M. 459
雷明顿，弗雷德里克 Remington, Frederic 624
李普曼，沃尔特 Lippmann, Walter 259, 591
里斯，托马斯·B Reed, Thomas B. 109, 338, 578
里斯，雅各布 Riis, Jacob A. 197, 245, 262
里斯奇，保尔 Reinsch, Paul 131
理想主义 Ideailsm 178
《联邦储备法》 Federal Reserve Act 360 - 362, 548
联邦储备系统 Federal Reserve System 344, 358, 359, 361, 362, 548, 549
联邦党人 Federalist 631
联邦贸易委员会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344, 366 - 368, 548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366, 367, 548
《联邦农业贷款法》 the Federal Farm Loan Act 549
联合照明电力公司 United Light & Power Company 468
邻居互助会 Neighborhood Guild 264
林白，查尔斯 Lindbergh, Charles A. 465, 524

林克，阿瑟　Link, Arthur S.　126
林赛，本　Lindsey, Ben B.　248, 605
林赛，维切尔　Lindsay, Vachel　610
刘易斯，辛克莱　Lewis, Sinclair　596, 600, 601
娄，塞斯　Low, Seth　277, 282
卢克斯，乔治　Luks, George Benjamin　620
卢斯，S.　Luce, Stenphen Bleecker　111－112, 113
卢万（比利时）　Louvain　384
卢西塔尼亚号　Lusitania　392, 414
鲁宾逊，詹姆斯　Robinson, James Harvey　630
鲁夫，阿比　Ruef, Abe　279
鲁特，伊莱休　Root, Eilhu　129, 133, 304
路德　Luther　656
绿背劳工党（又称绿背党）　Greenback Labor Party　561
伦敦，杰克　London, Jack　245, 248, 594, 597, 598
伦敦宣言　the Declaration of London　397
罗宾斯，玛格丽特·德赖尔　Robins, Margaret Dreier　232
罗宾逊，埃德加·阿林顿　Robinson, Edwin Arlington　604
罗宾逊，亨利　Robinson, Henry M.　516
罗伯特，乔治　Robert, George E.　479
罗杰斯，林德塞　Rogers, Lindsay　542
罗杰斯，威尔　Rogers, Will　542
罗森沃德，朱利叶斯　Rosenwald, Julius　647
罗森兹维格，罗伊　Rosenzweig, Roy　195
罗斯，E.　Ross, Edward A.　254, 293, 395
罗斯福，西奥多　Roosevelt, Theodore　79, 89, 90, 92, 93, 94, 97, 99, 100－102, 104, 114, 122－124, 133, 134, 136, 137, 138－144, 145, 147, 151, 154－163, 222, 243, 300, 301－334, 339, 341, 342, 345－347, 350－352, 363, 366, 368, 370, 374, 379, 380, 448, 483, 520, 522, 537－539, 540－545, 553, 555, 558, 562, 585
罗斯福推论　The Roosevelt Corollary　99, 522
洛登，弗兰克　Governor Frank, Lowden　438
洛厄尔，约瑟芬·肖　Lowell, Jose-

phine Shaw 232
洛克菲勒，小约翰 Rockefeller, John Davison Jr. 222
洛克菲勒，约翰 Rockefeller, John Davison 54, 58, 66–67, 70, 76, 78, 79, 80, 81, 309
洛奇，亨利·卡伯特 Lodge, Henry Cabot 98, 101, 112, 120, 157, 165, 433–434, 562

M

马德罗，F. Madero, Francisco I. 148
马汉，阿尔弗雷德 Mahan, Alfred 84, 90, 112, 114, 122, 139, 154
马塞，文森特 Massey, Vincent 528
马斯特斯，埃德加·李 Masters, Edgar Lee 605
迈耶，G. Meyer, George Von L. 156
迈耶尔，B. Mayer, B.H. 295
麦金莱，威廉 McKinley, William 89, 96, 99, 107, 110–111, 166, 199, 301, 303, 304, 319
麦卡杜，威廉 McAdoo, William, Gibbs 391, 389, 408, 444
麦凯，克劳德 Mckay, Claude 609
麦克道尔，玛丽 MacDowell, Mary 232
麦克利什，A. MacLeish, Archibald 601
麦克卢尔 McClure' s 238, 239, 240, 241, 242, 280
梅隆，安德鲁 Mellon, Andrew W. 44, 450–454
美孚石油公司 Standard Oil Company 14, 54, 56, 74, 238, 239, 326, 341, 523
美国超级电力公司 American Superpower Corporation 468
美国钢铁公司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 57, 71, 310, 326, 342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490
美国国家信托储蓄联合银行 Bank of American National Trust & Savings Association 469
美国经济学会 American Economic Assciation 255
美国劳工联合会（简称“劳联”）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223–226, 336, 346, 375, 410–411, 485–486, 530
美国历史评论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27
美国历史协会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627

美国历史杂志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28
美国全国基督教协进会　National Ckuncil of the Churches of Christ in the U.S.A　262
美国烟草公司　American Tobacco Company　308，341
美国远征军　American Expeditionary　413
美西战争　Spanish – American War　133，135，139，164，200，593
门肯，亨利·路易斯　Mencken，Henry Louis　599
门罗主义　Monroe Doctrine　132，134，137，138，168，435，504，522
蒙太奇　montage　617
蒙泰索里，玛丽娅　Montessori，Maria　644
迷惘的一代　The Lost Generation　601，602，603，604
米高梅影片公司　Metro – Goldwyn – Mayer，Inc.　616
米勒，阿道夫博士　Miller，Adolph　477
米勒，托马斯　Miler，Thomas　441
米切尔，约翰　Mitchel，John Purroy　282 – 283，315
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评论　Mississ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628
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　Minneapolis（Minnesota）　215，240 – 241，280，283，298，402
摩根，J·皮尔庞特　Morgan，J.Pierpont　55 – 57，70，79 – 81，326，342
莫尔斯，塞缪尔　Morse，Samuel F.B.　14
莫里，乔治　Mowry George　300
莫里尔，J.　Morrill，Justin S.　169
莫罗，德怀特　Morrow，Dwright　524
莫特，卢　Mott，Lucretia　275
莫里，乔治　Moran，George　300
穆尔，约翰　Moore，John Bassett　331

N

南方联合公司　Commonwealth & Southern Corporation　468
南太平洋铁路　Southern Pacific Railroad　247
内文斯　Nevins Allan　628
尼加拉—哈德逊公司　Nigara Hudson Company　468
《纽约论坛报》　New York Tribune　110，315
《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80，475，513

农民借贷信托公司 Farmers Loam & Trust Company 469
挪伊斯，亚历山大 Noyes, Alexander D. 475
诺克斯，P. Knox, Philander Chase 103，125，126，127，148，308
诺里斯，弗兰克 Norris, Frank 245，247，302，594，595
诺里斯，乔治 Norris, George W. 339，562
诺斯克利夫 Northcliffe 407

P

帕金斯，乔治 Perkins, George 305
帕克，弗朗西斯 Parker, Francis Wayland 639
帕林顿，弗农 Parrington, Vernon 629，632，633
派拉蒙影片公司 Paramount Pictures Corporation 616
潘罗斯，博义斯 Penrose, Boies 440
潘兴，约翰 Pershing, John Joseph 413，417–418
庞德，埃兹拉 Pound, Ezra 606
佩奇，沃尔特·海因斯 Page, Walter Hines 382，393，399，400
佩斯卡多尔列岛 Pescadores 529
皮博迪，乔治 Peabody, George 647
皮尔斯 Pierce, John Davis 636–637
皮尔斯伯里，约翰 Pillsbury, John E. 136
皮克福德，玛丽（旧译璧克馥） Pickford, Mary 617
皮斯顿，沃尔特 Piston, Walter (Hamor) 611
平格里，黑兹恩 Pingree, Hazen S. 281–283
平民主义 Populism 563，565
平肖，吉福德 Pinchot, Gifford 304，328，340
普拉特，奥维尔 Platt, Orville Hitchcock 133
普拉特，托马斯 Platt, Thomas Collier 301，558
普利策，约瑟夫 Pulitzer, Joseph 94
“普罗文斯敦”剧社 Provincetown Players 607

Q

齐默尔曼，A. Zimmermann, Arthur 150，400
齐默尔曼电报 Zimmermann Telegram 401
恰斯，斯都尔特 Chase, Stuart 480
千岛群岛 Kuriles 529
强盗大王 Robber Baron 71

乔丹，戴维　Jordan, David S.　169
乔治，亨利　George, Henry　166, 238, 244, 257, 258
乔治，劳合　George, Lloyd　396, 428
青年联盟　The Junior League　232
琼斯，塞缪尔　Jones, Samuel Milton　281 - 282
全国妇女党　National Woman's Party　275
全国母亲理事会　National Council of Mothers　268
全国农场主联盟　National Farmers' Alliance　567
全国农民联合会　the Nation Farmers Union　567
全国消费者联盟　National Consumers' League　232, 269, 270, 273, 305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　567

R

芮恩施　Reinsch, Paul Samuel　127
瑞安，约翰　Ryan, John　262

S

萨卡沙，胡安　Sacasa　525
萨柯，尼古拉　Sacco, Nicola　489
萨莫，奥雷斯特　Zamor, Oreste　150
萨姆纳，威廉　Sumner, William Graham　165, 251
萨瑟兰，乔治　Sutherland, George　456
塞拉亚，J.　Zelaya, Jose Santos　147, 153
塞内特，马克　Seentt, Mack　616
塞欣斯，罗杰　Sessions, Roger (Huntington)　611
三K党　Ku Klux Klan　494 - 496, 616
桑德堡，卡尔　Sandburg, Carl　248, 605
桑福德，爱德华　Somford, Edward T.　456
桑格，玛格丽特　Sanger, Margaret　231
桑塔雅纳　Santayana, George　653
色当　Sedan　418
沙利文，路易斯　Sullivan, Louis Henry　34, 266, 625
沙龙　Salons　181, 195, 205
沙姆　Sam, Villbrun Guillaume　150
社会达尔文主义　Social Darwinism　249 - 254, 257, 260, 592
社会党　Socialist Party　226, 561, 562, 596
社会福音运动　Social Gospel　262 - 266

社会性的诊疗　Societal Cures　267
社会正义运动　Social Justice Movement　266－272，274，277
神秘主义　Mysticism　608
圣－郭登斯　Saint－Gaudens，Augustus　624
《时代》　Time　199
十四点计划　the Fourteem Points　419，422－425，428
实效主义　Pragmaticism　637
实用主义　Pragmatism　259，260，499，592，636－638
史密斯，阿尔弗雷德　Smith，Alfred E.　444－446
史密斯，贝西　Smith，Bessie　613－614
史密斯，杰西　Smith，Jess　441
"使命外交"　missionary diplomaticy　104，105
史汀生，亨利　Stimson，Henry　503，525，529
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简称"世界产联"）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224－225，411－412
《世界主义者》　Cosmopolitan　238，243
舒尔茨，卡尔　Scuhrz，Carl　166，169
斯宾格勒，奥斯瓦德　Spengler，Oswald　174
斯宾塞，赫伯特　Spencer，Herbert　250，592
斯蒂芬森，戴维　Stephenson，David C.　496
斯蒂分斯，林肯　Steffens，Joseph Lincoln　239，241，280，471，574
斯杜茨，哈里　Stutz，Harry C.　462
斯科普斯，约翰　Scopes，John Thomas　490－491
斯科普斯审讯　Scopes Trial　490
斯科特，休　Scott，Thew　413
斯克拉，罗伯特　Sklar，Robert　196
斯隆，约翰　Sloan，John French　620－621
斯密，亚当　Smith，Adam　368
斯莫尔，奥尔平　Small，Albion　592
斯帕哥，约翰　Spargo，John　246－247
斯普林菲尔德　Springfield　235
斯坦顿，卡迪　stanton，Elizabeth Cady　275
斯特赖特，维拉特　Straight，Willard　103，125
斯特朗，本杰明　Strong，Benjamin　476
斯特朗，威廉　Strong，William　283
斯腾伯格，斯潘克　Sternburg，Speck von　122

斯通，哈伦 Stone, Harlan F. 444, 456
苏立文，马克 Sullivan, Mark 475
苏塞克斯号 Sussex 394
索罗特，西奥多 Salout, Theodore 209

T

塔贝尔 Tarbell, Ida Minerva 61, 239, 240
塔夫脱，威廉 Taft, William H. 80, 89, 102 - 104, 108, 124, 125, 143, 145, 148, 304, 306, 308, 337 - 342, 344, 345, 347, 353 - 354, 358, 363, 374, 456, 520, 525, 553, 560, 562, 582
塔金顿，布思 Tarkington, Newton Booth 248
泰勒，弗雷德里克 Taylor, Frederick 12, 74, 75, 457 - 459
泰勒，伊丽莎白夫人 Tyler, Elliza-beth, Mrs. 494
坦曼尼协会 Tammany Hall 248, 283, 563
汤姆森，费吉尔 Thomson, Virgil 75
汤因比会堂 Toyndee Hall 264
特纳，弗里德里克·杰克逊 Turner, Frederick Jackson 268 - 269
特纳，亨利 Turner, Henry 373
特威德 Tweed, William Marcy 241
田纳西河谷管理局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484
图马，吉恩 Toomer, Jean 609
图马尔蒂，约瑟夫 Tumulty, Joseph P. 435
吐温，马克 Twain, Mark 166, 168, 593
托莱多 Toledo 199
托马斯，M·凯里 Thomas, Martha Carey 229 - 230

W

瓦伦蒂诺，鲁道夫 Valentino, Ru-dolph 466
万泽蒂，巴托罗美奥 Vanzetti, Bar-tolomeo 489
威尔斯，戴维 Wells, David 212
威尔逊，沃伦 Wilson, Warren H. 174 - 175
威尔逊，伍德罗 Wilson, Woodrow 79, 89, 104, 105, 126 - 127, 130 - 131, 148 - 150, 152, 222, 261, 290, 298, 344 - 358, 369 - 371, 374 - 375, 379, 380, 384 - 389, 391 - 404, 407, 410, 412, 413, 417 - 430, 432 - 440, 446 - 448, 453, 483, 502, 517, 520, 522, 529, 536, 538 - 540, 542, 543 - 544, 548 - 550, 554 - 555, 582,

586, 591, 656
威廉斯学院 Williams College 656
威斯康星理念 Wisconsin Idea 293
韦尔，沃尔特 Weyl, Walter 259
韦尔塔，维克托里亚诺 Huerta, Victoriano 148－149
唯美主义 Aestheticism 620
维布伦，索尔斯坦 Veblen, Thorstein 255
维尔，里维雷特 Vail, Reverend Chales 226
维拉，F. Villa, Francisco 149
维拉德，奥斯瓦德·加里森 Villard, Oswald Garrison 235
沃德，艾伦·蒙哥马利 Ward, Aaron Montgomery 23
沃德，莱斯特 Ward, Lester Frank 254
沃德，莉莲 Wald, Lillian 268
沃顿 Walton, J.C. 496
沃尔夫，托马斯 Wolfe, Thomas Clayton 601
沃尔克，J. Walker, J.G. 144
沃尔什，托马斯 Walsh, Thomas J. 442
沃纳，萨姆 Warner, Sam Bass 190
沃特森，亨利 Watterson, Henry 95
伍德，伦纳德将军 Governor Wood, Leonard 124, 133, 531
伍兹，罗伯特 Woods, Robert 268

X

西尔斯，理查德·沃伦 Sears, Richard Warren 23
西蒙兹，弗兰克 Simonds Frank H 502
希尔，詹姆斯 Hill, James 307
夏克海兹 Shaker Heights 466
现代派（科学现代派） Scientific modernists 655
现实主义 realism 245, 593－597, 599－601, 610
象征主义 Symbolism 607
萧伯纳 Shaw, George Bernard 607
小剧场运动 little theatre 606
小笠原群岛 Bonins 529
肖，阿尔伯特 Shaw, Albert 95
肖尔斯，马瑟 Shoals, Muscle 445
肖特韦尔，詹姆斯 shotwell, James T. 513
协约国 Ally 413, 414, 417, 421, 422, 426, 515
谢夫特，威廉·R Shafter, William R. 97
谢南道河谷 Shenandoah Valley 196
辛克莱，厄普顿 Sinclair, Upton 245, 247, 324, 596, 598

辛克莱，哈里　Sinclair, Harry F.　442
新国家主义　New Nationalism　104, 309, 341, 345, 346, 350, 351, 368, 380
新黑人运动　New Negro Movement　608
新自由　New Freedom　345, 347, 350, 351, 356, 363, 364, 367, 380, 384
雄麋党　Bull Moose Party　342
休斯，查尔斯　Hughes, Charles Evans　290, 291, 298, 370, 395, 441, 507, 516, 520－523
休斯，兰斯顿　Hughes, James Mercer Langston　609
选征兵役法　Selective Service Act　413

Y

压力集团（又译利益集团）　Pressure Group　565－573, 577－578
《亚当森法》　Adamson Act　370, 550
亚当斯，J.　Adams, Jane　213, 230, 268
亚当斯，布鲁克斯　Adams, Brooks　86, 157
亚当斯，亨利　Adams, Henry　71, 255
亚当斯，塞缪尔·霍　Adams, Samuel H.　324, 633
杨格，欧文　Young, Owen D.　516－517
耶基斯，查尔斯　Yerkes, Charles Tyson　246, 282
耶稣会　Jesus, Society of　653, 656
伊利，理查德·西奥多　Ely, Richard Theodore　255, 293, 635
伊斯曼，乔治　Eastman, George　14
伊斯曼—柯达公司　Eastman Kodak　14
伊万斯，海勒斯　Evans, Hiram W.　495
以撒，塞缪尔　Insull Samuel　469
尤伦，威廉　U'Rem, William　290, 291, 294
约翰逊，汤姆　Johnson, Tom　281, 282
约翰逊，西拉姆　Johnson, Hiram W.　291

Z

詹姆斯，亨利　James, Henry　593
詹姆斯，威廉　James, William　257, 637, 638
战时工业局　War Industries Board　403
战时劳工管理局　War Labor Board　411

战时劳工政策局 War Labor Policies Board 411
长老会 Presbyterian Church (U.S.A.) 651
政党首领 Whips 579
中产阶级 Middle-class 242，244，263，266，556
种族主义 Racism 242，582，633-635
州际贸易委员会（又译州际商务委员会）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321，324，339，366，547
卓别林，查理 Chaplin，Charlie 459，466，618
自然主义 Naturalism 245，246，595
自由派 Liberal 650
自由主义 Liberalism 247，250，260
组织革命 Organizational Revolution 363